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百部】

容斋随笔

● 宋 洪迈



容斋随笔

(宋) 洪 迈

容斋随笔方框对应字一览表

页码	对应文字(如果一页方框太多,按其出现的先后顺序排列)		
第 7 页	潤 環	第 11 页	頤
第 12 页	頤	第 13 页	邠
第 14 页	邠 烝 烝	第 32 页	伋
第 54 页	伋	第 70 页	環(此页方框为同一个字)
第 103 页	駟 駟	第 104 页	奔 奔
第 105 页	擿	第 108 页	嫫 嫫 嫫 嫫 嫫 嫫 嫫 嫫
第 109 页	械	第 110 页	顛 勣 犢
第 112 页	顛 顛 顛 顛 顛 顛 顛 顛	第 114 页	鄮 時 獠 鄮
第 115 页	鄮 時 獠 鄮	第 120 页	餅 短 綈 綈
第 122 页	咥 咥	第 123 页	湜 湜 湜 湜 湜 湜 湜 湜
第 124 页	潤 併	第 125 页	辨 湜 擿 愬 湜 辨 湜
第 126 页	愬 湜 跂 舐	第 130 页	環
第 133 页	湜	第 134 页	扞
第 135 页	環 環	第 136 页	泚 垧 菜
第 140 页	扞 珪	第 141 页	槩 扞 真 真 辉 辉 悖
第 147 页	悖	第 150 页	胤 擊
第 149 页	瑒 雉	第 160 页	悖
第 162 页	印	第 163 页	擿
第 164 页	义	第 167 页	泚 泚
第 168 页	駟 駟 駟	第 183 页	珪(共 11 处))
第 190 页	鄮	第 191 页	鄮 悖
第 227 页	珪 珪 珪	第 228 页	環
第 229 页	環	第 234 页	鄮
第 247 页	跂 眇	第 262 页	藝
第 263 页	嫫 睇 睇 睇	第 265 页	時
第 266 页	時	第 267 页	衰 擿
第 268 页	扞	第 270 页	泚 泚 泚 泚 泚 泚
第 276 页	奔 奔 奔 奔 駟	第 278 页	扞 邠 跟 蹙
第 279 页	援	第 280 页	邠 邠 拏 鸛 邠 邠
第 281 页	湜 湜 泚	第 282 页	垧 磻
第 287 页	奔	第 289 页	礪 礪 搯
第 292 页	駟	第 293 页	濩 軀
第 295 页	伋 伋	第 296 页	泚
第 297 页	扞	第 228 页	泚
第 299 页	環 環 環 環	第 300 页	鸛
第 303 页	珪	第 304 页	駟
第 309 页	泚	第 313 页	筭
第 315 页	齒 汙	第 317 页	瑀
第 318 页	瑀	第 320 页	憎
第 340 页	扞	第 354 页	珣

第 612 页	诌	第 614 页	鹭 缦 哏 璘
第 615 页	郤 郤 徯 稔 旂	第 616 页	哏 闾
第 626 页	钼 钻	第 630 页	搏
第 632 页	璘	第 639 页	绌
第 654 页	勅 勅 勅 恒 恒	第 655 页	璪 悦
第 657 页	跌 槻	第 658 页	颇
第 661 页	藟 缦	第 663 页	勑
第 667 页	愁 愁	第 668 页	悞
第 670 页	秣 驢 驢	第 671 页	悖 倘
第 674 页	泚	第 676 页	珪 璪
第 677 页	穉	第 678 页	湜 湜 湜
第 679 页	湜 湜 湜	第 680 页	烝
第 681 页	桌 组 枸	第 683 页	郤(共 4 处) 搏
第 684 页	铸 铸 铸 隼 卣	第 684 页	𪔐 𪔐
第 686 页	球 球 球 嫫(共 4 处)	第 687 页	筴
第 689 页	颍 颍	第 690 页	蓂
第 693 页	冲 凉 沉 减 决	第 695 页	松 松
第 697 页	睽 决	第 713 页	乂 乂 乂 乂
第 725 页	罍 罍 罍	第 729 页	雷
第 732 页	𪔐 𪔐 𪔐	第 735 页	偈
第 736 页	摘	第 738 页	施
第 741 页	沸	第 742 页	邳
第 743 页	伋	第 749 页	勺
第 751 页	𪔐 𪔐 𪔐	第 753 页	赵
第 754 页	醴	第 760 页	偃
第 761 页	苾	第 763 页	𪔐 𪔐 𪔐 𪔐
第 771 页	扑	第 774 页	嫫
第 775 页	禪	第 779 页	𪔐 焯
第 780 页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第 784 页	哏
第 789 页	挂	第 792 页	玅 玅 检 检 𪔐 玅 玅
第 797 页	碧	第 802 页	刈
第 803 页	𪔐	第 805 页	𪔐 修
第 806 页	惨 邠 惨 惨 惨	第 807 页	邠
第 813 页	勺	第 820 页	技
第 823 页	惨	第 825 页	𪔐
第 826 页	拊	第 829 页	𪔐
第 836 页	度	第 856 页	邠
第 859 页	璠 璠	第 860 页	𪔐 𪔐 𪔐
第 864 页	璠	第 867 页	𪔐
第 872 页	𪔐	第 873 页	𪔐 𪔐 𪔐
第 876 页	𪔐 𪔐	第 898 页	𪔐
第 900 页	𪔐 𪔐	第 903 页	𪔐
第 904 页	邠	第 905 页	𪔐
第 906 页	𪔐	第 909 页	𪔐 𪔐

第 612 页	诃	第 614 页	鹭 缦 哏 璘
第 615 页	郤 郤 僖 稔 苻	第 616 页	哏 阏
第 626 页	姆 钻	第 630 页	搏
第 632 页	璘	第 639 页	拙
第 654 页	勅 勅 勅 怙 怙	第 655 页	璪 悦
第 657 页	跌 槻	第 658 页	颇
第 661 页	藟 缦	第 663 页	勑
第 667 页	愁 愁	第 668 页	悛
第 670 页	秣 驢 驢	第 671 页	悖 僑
第 674 页	泚	第 676 页	珪 璪
第 677 页	穉	第 678 页	湜 湜 湜
第 679 页	湜 湜 湜	第 680 页	烝
第 681 页	桌 组 枸	第 683 页	郤(共 4 处) 搏
第 684 页	铸 铸 铸 隼 隼	第 684 页	𪔐 𪔐
第 686 页	球 球 球(共 4 处)	第 687 页	笑
第 689 页	颧 颧	第 690 页	篆
第 693 页	冲 凉 沉 减 决	第 695 页	松 松
第 697 页	睽 决	第 713 页	义 义 义 义
第 725 页	罽 璩 璩	第 729 页	雪
第 732 页	𪔐 𪔐 𪔐	第 735 页	偈
第 736 页	摘	第 738 页	陟
第 741 页	啡	第 742 页	邳
第 743 页	倂	第 749 页	勺
第 751 页	𪔐 𪔐 𪔐	第 753 页	赵
第 754 页	醺	第 760 页	偃
第 761 页	苾	第 763 页	𪔐 𪔐 𪔐 𪔐
第 771 页	扑	第 774 页	嫫
第 775 页	禪	第 779 页	凋 煇
第 780 页	雕 欸 毳 𪔐 欸 毳 𪔐 𪔐	第 784 页	哏
第 789 页	挂	第 792 页	玊 玊 俭 俭 𪔐 玊 玊
第 797 页	碧	第 802 页	刊
第 803 页	𪔐	第 805 页	苾 惨
第 806 页	惨 邠 惨 惨 惨	第 807 页	邠
第 813 页	勺	第 820 页	技
第 823 页	惨	第 825 页	烟
第 826 页	扑	第 829 页	鸱
第 836 页	度	第 856 页	邨
第 859 页	璩 璩	第 860 页	菜 𪔐 菜
第 864 页	璩	第 867 页	燎
第 872 页	类	第 873 页	邨 𪔐 𪔐
第 876 页	𪔐 𪔐	第 898 页	拏
第 900 页	陟 陟	第 903 页	蹶
第 904 页	邠	第 905 页	瑄
第 906 页	啡	第 909 页	鸱 桄

第 913 页	昉	第 921 页	攷
第 922 页	昉 昉 昉	第 923 页	駒 昉
第 924 页	昉(共 7 处)	第 927 页	昉 昉 𪔐 𪔐
第 931 页	𪔐 𪔐 𪔐 𪔐	第 934 页	𪔐 𪔐 昉
第 946 页	𪔐	第 948 页	𪔐 𪔐
第 952 页	𪔐	第 954 页	𪔐
第 955 页	𪔐(共 5 处)	第 959 页	𪔐
第 962 页	𪔐	第 963 页	𪔐 𪔐 𪔐
第 964 页	𪔐 𪔐	第 967 页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第 968 页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第 974 页	𪔐 𪔐 𪔐
第 975 页	𪔐	第 977 页	𪔐 𪔐 𪔐 𪔐
第 978 页	𪔐 𪔐 𪔐 𪔐	第 979 页	𪔐 𪔐
第 981 页	𪔐	第 988 页	𪔐 𪔐
第 992 页	𪔐 𪔐	第 993 页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第 994 页	𪔐 𪔐	第 996 页	𪔐
第 997 页	𪔐	第 1003 页	𪔐
第 1004 页	𪔐	第 1006 页	𪔐
第 1007 页	𪔐	第 1011 页	𪔐 𪔐
第 1016 页	𪔐	第 1018 页	𪔐
第 1020 页	𪔐 𪔐 𪔐 𪔐	第 1022 页	𪔐
第 1026 页	𪔐 𪔐	第 1027 页	𪔐
第 1038 页	𪔐	第 1039 页	𪔐 𪔐
第 1040 页	𪔐	第 1053 页	𪔐
第 1054 页	𪔐	第 1070 页	𪔐
第 1079 页	𪔐 𪔐	第 1080 页	𪔐
第 1094 页	𪔐	第 1096 页	𪔐 𪔐 𪔐
第 1101 页	𪔐 𪔐	第 1106 页	𪔐
第 1107 页	𪔐	第 1108 页	𪔐
第 1111 页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第 1115 页	𪔐
第 1116 页	𪔐	第 1122 页	𪔐
第 1123 页	𪔐	第 1123 页	𪔐(共 13 处))
第 1125 页	𪔐	第 1126 页	𪔐
第 1127 页	𪔐	第 1127 页	𪔐
第 1130 页	𪔐	第 1132 页	𪔐 𪔐

作者简介

洪迈（1123—1202年），字景卢，号容斋，又号野处，南宋鄱阳（今属江西）人。绍兴十五年以博学宏词中第，授两浙转运司干办公事，入为敕令所删定官，后因其父与秦桧不睦而受累，出为添差福州教授。绍兴二十八年，任秘书省校书郎。绍兴三十二年，以起居舍人、假翰林学士身份出使金国进行议和，被拘留十五年，归宋后竟以“奉使辱命”遭劾罢官。隆兴元年知泉州。乾道三年以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兼同修国史、实录院修撰、侍讲。乾道六年以后历知赣州、建宁府、婺州。淳熙十二年，任提举蠡神观、兼侍讲、同修国史。十三年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修国史。十五年以敷文阁直学士知镇江府。绍熙元年进焕章阁学士，以宣奉大夫知绍兴府，改提举隆兴府玉隆万寿宫。嘉泰二年，以端明殿学士致仕。卒后谥文敏。

洪迈博学强记，曾手抄《资治通鉴》三遍，中年以后所撰《容斋随笔》和《夷坚志》“考阅典故，渔猎经史”，影响深远。特别是《容斋随笔》（共五笔，七十四卷），由于它的史料价值而深受后人的亲睐。毛泽东生前最后要读的一部书便是它。

容斋随笔

作者自序

予老去习懒，读书不多，意之所之，随即记录，因其后先，无复詮次，故目之曰随笔。淳熙庚子，鄱阳洪迈景卢。

卷一

欧率更帖

【原文】 临川石刻杂法帖一卷，载欧阳率更一帖云：“年二十馀，至鄱阳，地沃土平，饮食丰贱，众士往往凑聚。每日赏华，恣口所须。其二张才华议论，一时俊杰；殷、薛二侯，故不可言；戴君国士，出言便是月旦；萧中郎颇纵放诞，亦有雅致；彭君睠藻，特有自然，至如《阁山神诗》，先辈亦不能加。此数子遂无一在，殊使痛心。”兹盖吾乡故实也。

【译文】 临川石刻杂法帖一卷，载有欧阳率更（欧阳询）一张墨迹说：“二十多岁时，到鄱阳，土地肥沃平坦，食品丰富而价廉，许多士人往往聚集到那儿。每天赏玩花卉，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其中两位姓张士人的才华和议论，是一时杰也人才；殷、薛二位侯，更不用说；戴君是国家杰出之士，出口就能定人的优劣；萧中郎行为很放纵，但也有雅情逸致；彭君善于写文章，特有自然之趣，至于像《阁山神》诗，就是前辈也不能超过他。这几位竟都没一个在世了，很使我痛心。”这是我家乡的历史典故。

罗外士志

【原文】 襄阳有隋《处士罗君墓志》曰：“君讳靖，字礼，襄阳广昌人。高祖长卿，齐饶州刺史。曾祖弘智，梁殿中将军。祖养、父靖，学优不仕，有名当代。”碑字画劲楷，类褚河南。然父子皆名靖，为不可晓。拓拔魏安同父名屈，同之长子亦名屈，祖孙同名，胡人无足言者，但罗君不应尔也。

【译文】 襄阳有一隋朝的《处士罗君墓志》说：“罗君名靖，字礼，襄阳个昌县人。高祖名叫长卿，曾任南齐饶州刺史。曾祖名叫弘智，曾任南朝梁殿中将军。祖父名养、父亲名靖，学问都很好，但没有做官，在当时皆有相当高的知名度。”书法工整有力，很像褚遂良的字。然而罗氏父子的名字都叫靖，却让人无法理解。拓拔魏的安同，父亲名叫屈，安同的长子也叫屈，祖父与孙子

同名，在胡人是无所谓的，但罗君却不应该这样。

唐平蛮碑

【原文】 成都有唐《平南蛮碑》，开元十九年，剑南节度副大使张敬忠所立。时南蛮大酋长染浪州刺史杨盛颠为边患，明皇遣内常侍高守信为南道招慰处置使以讨之，拔其九城。此事新、旧《唐书》及野史皆不载。肃宗以鱼朝恩为观军容处置使，宪宗用吐突承璀为招讨使，议者讥其以中人主兵柄，不知明皇用守信盖有以启之也。裴光庭、萧嵩时为相，无足责者。杨氏苗裔，至今犹连“晟”字云。

【译文】 成都有块唐代的《平南蛮碑》，开元十九年（731年），剑南节度副使张敬忠所建立。当时南蛮大酋长染浪州刺史杨盛颠成为边境的祸患，唐明皇派内侍高守信为南道招慰处置使去讨伐他，攻克了他的九个城池，这事《新唐书》、《旧唐书》和一些野史都不记载。唐肃宗用鱼朝恩为观军容处置使，宪宗用吐突承璀为招讨使，议论的人讥笑他们派宦官掌管兵权，不知道唐明皇用高守信就已经开了这先例。裴光庭、萧嵩在当时任宰相，是不值得责备的。杨氏的后代，至今名字还连着个“晟”字。

半择迦

【原文】 《大般若经》云：梵言“扇搊半择迦”，唐言黄门，其类有五：一曰半择迦，总名也，有男根用而不生子；二曰伊利沙半择迦，此云妒，谓他行欲即发，不见即无，亦具男根而不生子；三曰扇搊半择迦，谓本来男根不满，亦不能生子；四曰博义半择迦，谓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五曰留拿半择迦，此云割，谓被割刑者。此五种黄门，名为人中恶趣受身处。搊音丑皆反。“博义”，馆本作“搏义”。

【译文】 《大般若经》说：梵语“扇搊半择迦”，汉语是黄门，意思是天阉，类别有五种：第一种名叫半择迦，这是总名，指有男性生殖器，能性交而不能生孩子；第二种名叫伊利沙半择迦，汉语名为妒，是说性交时即将射精，忽然阳萎不振，也有男性生殖器，但不能生孩子；第三种名叫扇搊半择迦，指本来男性生殖器发育就很不成熟，也不能生孩子；第四种名叫博义半择迦，指半月

能性交，半月不能性交；第五种名叫留拿半择迦，即所谓的“阉割”，指受了“腐刑”或“宫刑”（割去生殖器）的人。此五种黄门，即为人类中的恶境应在自己的身上。擣，音丑皆反。博义，馆本作“搏义”。

六十四种恶口

【原文】 《大集经》载六十四种恶口之业，曰：粗语，软语，非时语，妄语，漏语，大语，高语，轻语，破语，不了语，散语，低语，仰语，错语，恶语，畏语，吃语，诤语，谄语，诳语，恼语，怯语，邪语，罪语，哑语，入语，烧语，地语，狱语，虚语，慢语，不爱语，说罪咎语，失语，别离语，利害语，两舌语，无义语，无护语，喜语，狂语，杀语，害语，系语，闲语，缚语，打语，歌语，非法语，自赞叹语，说他过语，说三宝语。

【译文】 《大集经》记载有六十四种恶劣言语的罪业，即：粗语、软语、非时语、妄语、漏语、大语、高语、轻语、破语、不了语、散语、低语、仰语、错语、恶语、畏语、吃语、诤语、谄语、诳语、恼语、怯语、邪语、罪语、哑语、入语、烧语、地语、狱语、慢语、不爱语、说罪咎语、失语、别离语、利害语、两舌语、无义语、无护语、喜语、狂语、杀语、害语、系语、闲语、缚语、打语、歌语、非法语、自赞叹语、说他过语、说三宝语。

八月端午

【原文】 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生，以其日为千秋节。张说《上大衍历序》云：“谨以开元十六年八月端午赤光照室之夜献之。”《唐类表》有宋睥《请以八月五日为千秋节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然则凡月之五日皆可称端午也。

【译文】 唐玄宗是八月五日出生的，就把那一天定为“千秋节”。张说《上大衍历序》说：“谨以开元十六年（728年）八月端午红色光芒照射房间的夜间上献。”《唐类表》有宋 《请以八月五日为千秋节表》说：“月份是仲秋，日子在端午（初五）”。那么凡每月的五日都可以称作“端午”。

赞公 少公

【原文】 唐人呼县令为明府，丞为赞府，尉为少府。《李太白集》有《钱阳曲王赞公贾少公石艾尹少公序》。盖阳曲丞、尉，石艾尉也。“赞公”、“少公”之语益奇。

【译文】 唐人称呼县令为明府，县丞为赞府，县尉为少府。《李太白集》有《钱阳曲王赞公贾少公石艾尹少公序》，其中说的就是钱别阳曲县丞、县尉和石艾县尉。文中的“赞公”、“少公”，是更为离奇了。

郭璞葬地

【原文】 《世说》：“郭景纯过江，居于暨阳。墓去水不盈百步，时人以为近水，景纯曰：‘将当为陆。’今沙涨，去墓数十里皆为桑田。”此说盖以郭为先知也。世传《锦囊葬经》为郭所著，行山卜宅兆者印为元龟。然郭能知水之为陆，独不能卜吉以免其非命乎？厕上衔刀之见浅矣。

【译文】 《世说新语》记载：“郭景纯南渡后，住在暨阳（今江苏江阴东），他亲自所选的墓地距江边不满一百步，当时许多人都认为距水太近。郭景纯说：‘不久就会变成陆地的。’现在泥沙上涨了，离墓地几十里的地方都成了良田。”这种说法，是把郭璞视为未卜先知的圣人。社会上广为流传的《锦囊葬经》据说就是郭璞所著，看坟地选宅基的，把它奉为经典。然而郭璞能预测到江水会变成陆地，就不能占卜一个好卦避开杀身之祸吗？在厕所里赤身披发，衔刀祭酒以求免死的法术，也太浅薄了。

黄鲁直诗

【原文】 徐陵《鸳鸯赋》云：“山鸡映水那相得，孤鸾照镜不成双。天下真成长会合，无胜比翼两鸳鸯。”黄鲁直《题画睡鸭》曰：“山鸡照影空自爱，孤鸾舞镜不作双。天下真成长会合，两凫相倚睡秋江。”全用徐语点化之，末句尤精工。又有《黔南十绝》，尽取白乐天语，其七篇全用之，其三篇颇有改易处。

乐天《寄行简》诗，凡八韵，后四韵云：“相去六千里，地绝天邈然。十书九不达，何以开忧颜！渴人多梦饮，饥人多梦餐。春来梦何处？合眼到东川。”鲁直翦为两首，其一云：“相望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十书九不到，何用一开颜？”其二云：“病人多梦医，囚人多梦赦。如何春来梦，合眼在乡社！”乐天《岁晚》诗七韵，首句云：“霜降水返壑，风落木归山。冉冉岁将晏，物皆复本源。”鲁直改后两句七字，作“冉冉岁华晚，昆虫皆闭关。”

【译文】 徐陵《鸳鸯赋》说：“山鸡映水那相得，孤鸾照镜不成双（山鸡在水中照见自己的影子哪能互相得到乐趣，孤单的鸾鸟在镜中自照并不能成双）。天下真成长会合，无胜比翼两鸳鸯（天下的事物真能长远相聚，没有比得上画中比翼双飞的鸳鸯）。”黄鲁直（黄庭坚）《题画睡鸭》说：“山鸡照影空自爱，孤鸾舞镜不作双（山鸡看它在水中的影子徒然自爱，孤单的鸾鸟在镜中飞舞并不成双）。天下真成长会合，两凫相倚睡秋江（天下真能长远团聚的，倒是两只野鸭子并倚着睡在秋江之中）。”全是用徐陵的语加以变通化用，末句更为精工。黄庭坚还有《黔南十绝》，完全取白乐天（白居易）的话，其中七篇全用它，其中三篇很有些改动的地方。白乐天《寄行简诗》，共八韵，后面四韵说：“相去六千里，地绝天邈然（相去有六千里路，地区相隔像天一样遥远）。十书九不达，何以开忧颜（十封信九封寄不到，怎么能解开忧愁的脸色）。渴人多梦饮，饥人多梦餐（口渴的人大抵梦见喝水，饥饿的人多数梦见吃饭）。春来梦何处，合眼到东川（春天以来梦见什么地方，闭上眼就到了东川）。”黄鲁直把它分为两首，其中一首说：“相望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在六千里外互相盼望，天地间有江山阻隔）。十书九不到，何用一开颜（十封书信九封到不了，有何办法使愁容解开）？”第二首说：“病人多梦医，囚人多梦赦（病人多能梦见医生，囚犯多会梦见赦免）。如何春来梦，合眼在乡社（怎么我春天以来做梦，闭上眼就到了家乡）！”白乐天《岁晚》诗七韵，开头几句说：“霜降水返壑，风落木归山（霜降以后水还到坑谷，风吹树叶落回山林中）。冉冉岁将晏，物皆复本源（渐渐地一年将到年底，万物都回复它的本源）。”黄鲁直改动后两句七个字，作：“冉冉岁华晚，昆虫皆闭关（渐渐地一年将近年底，昆虫都躲藏起来了）。”

禹治水

【原文】 《禹贡》叙治水，以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为次。考地理言之，豫居九州中，与兖、徐接境，何为自徐之扬，顾以豫为后乎？盖

禹顺五行而治之耳。冀为帝都，既在所先，而地居北方，实于五行为水，水生木，木东方也，故次之以兖、青、徐；木生火，火南方也，故次之以扬、荆；火生土，土中央也，故次之以豫；土生金，金西方也，故终于梁、雍。所谓彝伦攸叙者此也。与鲧之汨陈五行，相去远矣。此说予得之魏几道。

【译文】 《禹贡》记叙大禹治水的先后次序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荊州、豫州、梁州、雍州。按地理来说，豫州在九州中间，和兖州、徐州接界，为什么徐州之后便是扬州，反而把豫州排在后边呢？这大约是因为大禹是按五行方位治水的。冀州是帝都，应该在先，而且地理位置又在北方，按五行北方属水，水生木，木为东方，所以冀州后面是兖州、青州、徐州；木生火，火为南方，所以依次是扬州、荊州；火生土，土为中央，所以再次是豫州；土生金，金为西方，所以最后是梁州、雍州。这就是《尚书·洪范》所说的常理都有了序列。这和禹的父亲鲧打乱五行，相去很远。这种说法，我是从魏几道那儿听到的。

敕勒歌

【原文】 鲁直《题阳关图》诗云：“想得阳关更西路，北风低草见牛羊。”又《集》中有《书韦深道诸帖》云：“斛律明月，胡儿也，不以文章显，老胡以重兵困敕勒川，召明月作歌以排闷。仓卒之间，语奇壮如此，盖率意道事实耳。”予按《古乐府》有《敕勒歌》，以为齐高欢攻周玉壁而败，恚愤疾发，使斛律金唱《敕勒》，欢自和之。其歌本鲜卑语，词曰：“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鲁直所题及诗中所用，盖此也。但误以斛律金为明月。明月名光，金之子也。欢败于玉壁，亦非困于敕勒川。

【译文】 黄庭坚的《题阳关图》诗说：“想得阳关更西路，北风低草见牛羊。”他的《文集》中又有《书韦深道诸帖》说：“斛律明月，本是胡人，文章并不出名，老胡高欢因重兵被困于敕勒川，便召斛律明月作歌解闷。在仓猝之间完成作品，而歌词竟如此雄壮有力，气势磅礴，这大概是因为作者毫不掩饰地抒发感情、描绘当时真实情景的缘故吧！”我查考《古乐府》中有《敕勒歌》，认为是北齐高欢攻打北周的玉壁（今山西稷山西南）时惨遭失败，由于悲愤过度而生了病，于是让斛律金唱《敕勒歌》，高欢亲自和乐。歌词本是鲜卑语，内容是：“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黄庭坚所题的《阳关图》和诗中所引用的，大概来源于此，都是指这首

歌。但是他却把斛律金误以为斛律明月。斛律明月名叫光，是斛律金的儿子。而且高欢是在玉壁被打败，而不是被困于敕勒川。

浅妄书

【原文】 俗间所传浅妄之书，如所谓《云仙散录》、《老杜事实》、《开元天宝遗事》之属，皆绝可笑。然士大夫或信之，至以《老杜事实》为东坡所作者。今蜀本刻杜集，遂以入注。孔传《续六帖》，采摭唐事殊有功，而悉载《云仙录》中事，自秽其书。《开天遗事》托云王仁裕所著，仁裕五代时人，虽文章乏气骨，恐不至此。姑析其数端以为笑。其一云：“姚元崇开元初作翰林学士，有步辇之召。”按，元崇自武后时已为宰相，及开元初三入辅矣。其二云：“郭元振少时美风姿，宰相张嘉贞欲纳为婿，遂牵红丝线，得第三女，果随夫贵达。”按，元振为睿宗宰相，明皇初年即贬死，后十年，嘉贞方作相。其三云：“杨国忠盛时，朝之文武，争附之以求富贵，惟张九龄未尝及门”。按，九龄去相位十年，国忠方得官耳。其四云：“张九龄览苏暗文卷，谓为文阵之雄师。”按，暗为相时，九龄元未达也。此皆显显可言者，固鄙浅不足攻，然颇能疑误后生也。惟张彖指杨国忠为冰山事，《资治通鉴》亦取之，不知别有何据？近岁，兴化军学刊《遗事》，南剑州学刊《散录》，皆可毁。

【译文】 世俗间所流传的浅薄乱说的书，像所谓《云仙散录》、《老杜事实》、《开元天宝遗事》等等，都极为可笑。但士大夫们竟有相信它们的，甚至认为《老杜事实》是苏东坡（苏轼）所作的，现在四川刻本的《杜甫集》，就把它引进注文中。孔传《续六帖》，采录唐朝史事很有功劳，而把《云仙散录》中的事都收载进去，自己沾污了他的书。《开元天宝遗事》假托说是王仁裕所著，王仁裕是五代时人，虽然他的文章缺乏气势风骨，恐还不至错误至此。姑且分析其中几条作为笑谈之资。其一说：“姚元崇（姚崇）在开元初年做翰林学士，皇帝曾派用人拉的车去召他。”按：姚元崇从武则天时已经做宰相，到开元初年，已经三次入朝做宰相了。其二说：“郭元振（郭震）年轻时风度很漂亮，宰相张嘉贞想收他做女婿，就牵着红丝线择婚，配得张嘉贞第三个女儿，果然随着丈夫尊贵发达。”按：郭元振是睿宗的宰相，明皇初年就被贬官死去，其后十年，张嘉贞才做宰相。其三说：“杨国忠显赫当权的时候，朝廷中的文武官员，争着去趋附他以求富贵，只有张九龄从不到他门上。”按：张九龄离开宰相职位十年之后，杨国忠才得到官职。其四说：“张九龄看了苏 应试文卷，说是文章阵地

上的雄壮军队。”按：苏 做宰相时，张九龄还没有发迹。这都是很明显地可以指出的，固然鄙薄浅陋不值驳诘，但很能疑误后来的人。只有张象说杨国忠好比冰山这件事，《资治通鉴》也采取了它，不知还有什么根据。近年来，兴化军的学舍中刊印《开元天宝遗事》，南剑州学舍刊行《云仙散录》，这些书版都可毁掉。

五臣注文选

【原文】 东坡诋《五臣注文选》，以为荒陋。予观选中谢玄晖和王融诗云：“陆危赖宗袞，微管寄明牧。”正谓谢安、谢玄。安石于玄晖为远祖，以其为相，故曰宗袞。而李周翰注云：“宗袞谓王导，导与融同宗，言晋国临危，赖王导而被苻坚。牧谓谢玄，亦同破坚者。”夫以宗袞为王导固可笑，然犹以和王融之故，微为有说，至以导为与谢玄同破苻坚，乃是全不知有史策，而狂妄注书，所谓小儿强解事也。惟李善注得之。

【译文】 苏东坡指斥《五臣注文选》，认为它荒谬浅陋。我看到《文选》中谢玄晖（即谢朓）唱和王融的诗说：“陆危赖宗袞，微管寄明牧。”指的正是谢安和谢玄。谢安是谢朓的远房祖先，又是宰相，所以称他为宗族的袞冕。但李周翰注释说：“宗袞是指王导，王导与王融同族，这里是说晋国面临亡国的危机时，倚仗王导打败了前秦皇帝苻坚，才转危为安。明牧是指谢玄，与王导共同打败了苻坚。”说宗袞是王导固然可笑，但因为与王融唱和的缘故，还稍有可说，至于说王导和谢玄共同打败苻坚，却是完全不懂历史，然而还狂妄地注书，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无知儿童不懂装懂、勉强解事罢了。只有李善的注释最为正确。

文烦简有当

【原文】 欧阳公《进新唐书表》曰：“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夫文贵于达而已，繁与省各有当也。《史记·卫青传》：“校尉李朔、校尉赵不虞、校尉公孙戎奴，各三从大将军获王，以千三百户封朔为涉轶侯，以千三百户封不虞为随成侯，以千三百户封戎奴为从平侯。”《前汉书》但云：“校尉李朔、赵不虞、公孙戎奴，各三从大将军，封朔为涉轶侯、不虞为随成侯、戎奴为从平侯。”比于《史记》五十八字中省二十三字，然不若《史记》为朴贍可喜。

【译文】 欧阳公（欧阳修）《进〈新唐书〉表》说：“这书中所记的事比前人的增加，它的文字则比过去的要简省。”至于文章要讲求的是清楚表达意思而已，文字繁和简各有其适用的情况。《史记·卫青传》说：“校尉李朔、校尉赵不虞、校尉公孙戎奴，各人三次随从大将军出征俘获匈奴王，朝廷用一千三百户封李朔为涉轺侯，以一千三百户封赵不虞为随成侯，以一千三百户封公孙戎奴为从平侯。《前汉书》只说：“校尉李朔、赵不虞、公孙戎奴各人三从大将军出征，朝廷封李朔为涉轺侯、赵不虞为随成侯、公孙戎奴为从平侯。”比《史记》所用五十八字中减省了二十三字，但不及《史记》的质朴详备为更可喜。

地险

【原文】 古今言地险者，以谓函秦宅关、河之胜，齐负海、岱，赵、魏据大河，晋表里河山，蜀有剑门、瞿唐之阻，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吴长江万里，兼五湖之固，皆足以立国。唯宋、卫之郊，四通八达，无一险可恃。然东汉之末，袁绍跨有青、冀、幽、并四州，韩遂、马腾辈分据关中，刘璋擅蜀，刘表居荆州，吕布盗徐，袁术包南阳、寿春，孙策取江东，天下形胜尽矣。曹操晚得兖州，倔强其间，终之夷群雄，覆汉祚。议者尚以为操挟天子以自重，故能成功。而唐僖、昭之时，方镇擅地，王氏有赵百年，罗洪信在魏，刘仁恭在燕，李克用在河东，王重荣在蒲，朱宣、朱瑾在兖、郓，时溥在徐，王敬武在淄、青，杨行密在淮南，王建在蜀，天子都长安，凤翔、 、华三镇鼎立为梗，李茂贞、韩建皆尝劫迁乘舆。而朱温区区以汴、宋、毫、颖�睨然中居，及其得志，乃与操等。以在德不在险为言，则操、温之德又可见矣。

【译文】 古今论述地形险要的，都说秦地凭借函谷关、黄河的形胜，齐地依仗大海和泰山，赵国和魏国依靠黄河，晋国外河内山，西蜀占有剑门关、瞿塘峡的险阻，楚国以方城山为城垣，汉水为护城河，吴国有万里长江和太湖的险要，都能够凭借有利的地形建立国家。只有宋国、卫国周围，四通八达，没有一处险要可资防守。然而东汉末年，袁绍占有青、冀、幽、并四州，韩遂、马腾等分占关中，刘璋割据蜀地，刘表据有荆州，吕布占据徐州，袁术包罗南阳、寿春，孙策攻取江东，中国险要的地方，都被分割完了。曹操最后才得到兖州，据此崛起，结果消灭了群雄，倾覆了汉室。评议的人，还以为曹操挟持皇帝，提高自己的地位，所以才能成功。但是唐朝僖宗、昭宗时期，藩镇割据，王氏据有赵地一百多年，罗洪信在魏地，刘仁恭在燕地，李克用在河东，王重荣在蒲

州，朱宣、朱瑾在兖州、郓州，时溥在徐州，王敬武在淄州、青州，杨行密在淮南，王建在蜀地，皇帝建都长安，凤翔、 州、华州三镇鼎足而立，不听诏令，李茂贞、韩建都挟持过皇帝。然而朱温凭借小小的汴州、宋州、亳州、颍州，孤立地处在中间，等到他志得意满的时候，却和曹操一样扫平群雄，灭亡了唐王朝。如果说兴盛是依靠德行而不是依靠险要的地形，那么曹操和朱温的德行又在哪儿呢？

史记世次

【原文】 《史记》所纪帝王世次，最为不可考信，且以稷、契论之，二人皆帝喾子，同仕于唐、虞。契之后为商，自契至成汤凡十三世，历五百余年。稷之后为周，自稷至武王凡十五世，历千一百余年。王季盖与汤为兄弟，而世之相去六百年，既已可疑。则周之先十五世，须每世皆在位七八十年，又皆暮年所生嗣君，乃合此数，则其所享寿皆当过百年乃可。其为漫诞不稽，无足疑者。《国语》所载太子晋之言曰：“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皆不然也。

【译文】 《史记》所记载的帝王世系，最为不可考证信从。就拿稷和契来说，两人都是帝喾的儿子，同在唐尧、虞舜时代作官。契的后代是商，从契到成汤共十三代，历时五百余年。稷的后代是周，从稷到武王，共十五代，历时一千一百多年。论辈份周文王的父亲王季应当和商汤是兄弟，而时间竟相差了六百年，这已经是十分可疑的了。而周朝的先人十五代，必须每代在位七、八十年，又都是晚年得子，才符合此数。而他们的寿命，又都要超过一百岁才行。《史记》记载的荒诞无稽，是毋庸置疑的。《国语》记载太子晋的话说：“从后稷奠定基础，安定人民，经过十五代至文王才得以安定天下。”事实都不是这样的。

解释经旨

【原文】 解释经旨，贵于简明，惟孟子独然。其称《公刘》之诗“乃积乃仓，乃裹糒粮，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而释之之词，但云：“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其称《民》之诗：“天生 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夷，好是懿德。”而引孔子之语以

释之，但曰：“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用两“故”字，一“必”字，一“也”字，而四句之义昭然。彼训“曰若稽古”三万言，真可覆酱瓿也。

【译文】 解释经书的意思，要求能简单明白，只有孟子最能这样。他引用《诗经·公刘》中“乃积乃仓，乃裹糗粮，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物，爰方启行。”解释这段文字，只说：“所以留居本地的人有露积和入仓的粮食，出征的人携有充足的干粮，然后才可以开始出发。”孟子称引《诗经·盂民》：“天生盂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天生众多的百姓，有事物就有其法则，百姓的天性，爱好这美德）。”而引孔子的话来解释这诗，只说：“所以有事物一定有法则，是百姓的本性，所以爱好这美德。”用两个“所以”字样，一个“一定”字样，一个“也”字，而四句诗的意思就很明白。那些训释《尚书》中“曰若稽古”四字用了三万字的，真只可用来盖酱坛子了。

坤动也刚

【原文】 《坤》卦《文言》坤动也刚曰：“坤至柔而动也刚。”王弼云：“动之方正，不为邪也。”程伊川云：“坤道至柔，而其动则刚，动刚故应乾不违。”张横渠云：“柔亦有刚，静亦有动，但举一体，则有屈伸动静终始。”又云：“积大势成而然。”东坡云：“夫物非刚者能刚，惟柔者能刚尔。畜而不发，及其极也，发之必决。”张葆光但以训六二之直。陈了翁云：“至柔至静，坤之至也。刚者道之动，方者静之德，柔刚静动，坤元之道之德也。”郭雍云：“坤虽以柔静为主，苟无方刚之德，不足以含洪光大。”诸家之说，率不外此。予顷见临安退居庵僧昙莹云：“动者谓爻之变也，坤不动则已，动则阳刚见焉。在初为《复》，在二为《师》，在三为《谦》，自是以往皆刚也。”其说最为分明有理。

【译文】 《坤》卦《文言》说：“坤是最柔和的，但动起来却很刚强。”王弼说：“变化就向正的方面发展，不会走向邪道。”伊川先生程颐说：“坤的本身是最柔软的，但是其变化却很刚强。因为一变化就很刚强，所以能和乾卦不矛盾。”张载说：“坤柔中有刚，静中有动，任举其中一体，都有屈和伸，动和静，终和始。”又说：“积累势能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这样。”苏东坡说：“一切事物，并非刚强的能刚强，而是柔弱的能刚强，积蓄力量而不发作，等达到极点再发作，必定无坚不摧。”张葆光只用这句话解释六二爻的含义。陈了翁说：“至柔至静，是坤的极致。刚强是体的发动，方正是静的作用。柔和刚、静和动的辩

证关系，就是坤元的体和用。”郭雍说：“坤虽然以柔和静为主体，但是如果没有方和刚的作用，就不能发扬光大。”各家的说法，大概不外这几种。我最近见到临安（今浙江杭州）退居庵僧人昙莹，他说：“动是指爻的变化，坤不动则已，一动就会出现阳刚。当初爻变为阳便是《复》卦，第二爻变阳便是《师》卦，第三爻变为阳便是《谦》卦，从此以后便都是阳刚。”这个说法最为清楚有道理。

乐天侍儿

【原文】 世言白乐天侍儿唯小蛮、樊素两人。予读集中《小庭亦有月》一篇云：“菱角执笙簧，谷儿抹琵琶。红绡信手舞，紫绡随意歌。”自注曰：“菱、谷、紫、红皆小臧获名。”若然，则红、紫二绡亦女奴也。

【译文】 世人说白乐天（白居易）的侍女只有小蛮、樊素两人。我读《白乐天集》中《小庭亦有月》一篇说：“菱角执笙簧，谷儿抹琵琶，红绡信手舞，紫绡随意歌（菱角手拿着笙，谷儿弹着琵琶，红绡随手舞蹈，紫绡任意唱歌）。”白居易自注说：“菱角、谷儿、紫绡、红绡都是奴婢名字。”如果这样，那么红绡、紫绡两人也都是女婢。

白公咏史

【原文】 东坡《志林》云：“白乐天尝为王涯所谗，贬江州司马。甘露之祸，乐天有诗云：‘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不知者以乐天为幸之，乐天岂幸人之祸者哉？盖悲之也。”予读白集有《咏史》一篇，注云：九年十一月作。其词曰：“秦磨利刃斩李斯，齐烧沸鼎烹酈其。可怜黄绮入商洛，闲卧白云歌紫芝。彼为菹醢机上尽，此作鸾凰天外飞。去者逍遥来者死，乃知祸福非天为。”正为甘露事而作，其悲之之意可见矣。

【译文】 苏东坡《志林》中说：“白居易因为王涯向皇帝进谗言，而被贬到江州作司马。甘露之变发生后，白居易作诗说：‘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不了解的，以为白居易在庆幸他们的死，白居易难道是幸灾乐祸的人吗？实际上是悲痛他们的死呀！”我读白居易文集，看到有《咏史》一篇，他自己作注说：“大和九年十一月作。”诗的内容是：“秦磨利刃斩李斯，齐烧沸鼎烹酈其。可怜黄绮入商洛，闲卧白云歌紫芝。彼为菹醢机上尽，此作鸾凰天外飞。

去者逍遥来者死，乃知祸福非天为。”可知正是为甘露事件而写的，痛惜他们的悲情由此可见。

十年为一秩

【原文】 白公诗云：“已开第七秩，饱食仍安眠。”又云：“年开第七秩，屈指几多人。”是时年六十二，元日诗也。又一篇云：“行开第八秩，可谓尽天年。”注曰：“时俗谓七十以上为开第八秩。”盖以十年为一秩云。司马温公作《庆文潞公八十会致语》云：“岁历行开九帙新”，亦用此也。

【译文】 白公（白居易）诗说：“已开第七秩，饱食仍安眠（已开始第七个十年，但还吃得饱睡得安稳）。”又说：“年开第七秩，屈指几多人。”（年纪已开始第七个十年，屈指算来有多少人活到这岁数。）这时他年纪六十二岁，是元旦作的诗。又有一篇说：“行开第八秩，可谓尽天年（将要开始第八个十年，可以说是穷尽天赐的年龄了）。”注说：“通俗认为七十岁以上是开始第八个十年。”那是把十年当作“一秩”。司马温公（司马光）作《庆文潞公（文彦博）八十会致语》说：“岁历行开九秩新（年岁将要开始第九个十年）。”也用这说法。

裴晋公禊事

【原文】 唐开成二年三月三日，河南尹李待价将禊于洛滨，前一日启留守裴令公。公明日召太子少傅白居易，太子宾客萧籍、李仍叔、刘禹锡，中书舍人郑居中第十五人合宴于舟中，自晨及暮，前水嬉而后妓乐，左笔砚而右壶觞，望之若仙，观者如堵。裴公首赋一章，四坐继和，乐天为十二韵以献，见于集中。今人赋上巳，鲜有用其事者。予按《裴公传》，是年起节度河东，三年以病丐还东都。文宗上巳宴群臣曲江，度不赴，帝赐以诗，使者及门而度薨。与前事相去正一年。然乐天又有一篇，题云《奉和裴令公三月上巳日游太原龙泉忆去岁禊洛之作》，是开成三年诗，则度以四年三月始薨。《新史》以为三年，误也。《宰相表》却载其三年十二月为中书令，四年三月薨。而帝纪全失书，独《旧史》纪、传为是。

【译文】 唐朝开成二年（873年）三月三日，河南尹李待价将在洛河边上举行禊宴，前一天上书启给东都留守裴令公（裴度）。裴公明天又召来太子少傅

白居易、太子宾客萧籍，李仍叔，刘禹锡，中书舍人郑居中等十五人一起在船中宴饮，从早上到傍晚，先是玩水而后让歌妓奏乐，左边放着笔砚而右边放着酒壶酒杯，望去像神仙一样，去观看他们的人多得像一堵墙。裴度先做了一首诗，四面座上客人相继和作，白乐天做了十二韵献给裴公，见于他集子中。现在人作关于“上巳”（三月的第一个巳日）的诗，很少有用这典故的。我查考裴公的传记，这一年起用为河东节度使，开成三年（838年）因病要求还东都。文宗在上巳日宴请群臣于曲江池，裴度没有去，皇帝赏赐他诗，使者刚到他家门而裴度死去。这和前面所记的事相去正好是一年。但白乐天还有一篇，题目叫《奉和裴令公三月上巳日游太原龙泉忆去岁禊洛之作》，是开成三年（838年）的诗，那么裴度是开成四年（839年）三月才去世。《新唐书》以为是三年，错了。《宰相表》都记载他三年十二月任中书令，四年三月死去。而帝纪全没记载，只有《旧唐书》中本纪、列传都记得正确。

司字作入声

【原文】 白乐天诗，好以“司”字作入声读，如云：“四十著绯军司马，男儿官职未蹉跎”，“一为州司马，三见岁重阳”，是也。又以“相”字作入声，如云：“为问长安月，谁教不相离”，是也。相字之下自注云：思必切。以“十”字作平声读，如云：“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回”，“绿浪东西南北路，红栏三百九十桥”，是也。以“琵琶”字作入声读，如云：“四弦不似琵琶声，乱写真珠细撼铃”，“忽闻水上琵琶声”，是也。武元衡亦有句云：“唯有白须张司马，不言名利尚相从。”

【译文】 白居易的诗，喜欢把“司”字作入声字用，例如：“四十著绯军司马，男儿官职未蹉跎”，“一为州司马，三见岁重阳”，就是这样。又把“相”字当入声字用，例如：“为问长安月，谁教不相离”，就是这样。在“相”字下面，他自己作注说：“思必切。”还把“十”字作平声字读，例如：“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回”，“绿浪东西南北路，红栏三百九十桥”，就是这样。把“琵琶”字当入声字用，例如：“四弦不似琵琶声，乱写真珠细撼铃”，“忽闻水上琵琶声”，就是这样。武元衡也有诗句说：“唯有白须张司马，不言名利尚相从。”

乐天新居诗

【原文】 白乐天自杭州刺史分司东都，有《题新居呈王尹兼简府中三掾》诗云：“弊宅须重葺，贫家乏羨财。桥凭州守造，树倩府寮栽。朱板新犹湿，红英暖渐开。仍期更携酒，倚栏看花来。”乃知唐世风俗尚为可喜。今人居闲，而郡守为之造桥，府寮为之栽树，必遭讥议，又肯形之篇咏哉！

【译文】 白居易由杭州刺史任上调至东都洛阳任职，有一首《题新居呈王尹兼简府中三掾》诗写道：“弊宅须重葺，贫家乏羨财。桥凭州守造，树倩府寮栽。朱板新犹湿，红英暖渐开。仍期更携酒，倚栏看花来。”由此可以看到唐代风俗还是很好的。现在的官员离职闲居，如果太守为他造桥，府僚为他栽树，就必定要受到讥讽，哪里还敢写进诗里呢！

黄纸除书

【原文】 乐天好用“黄纸除书”字，如：“红旗破贼非吾事，黄纸除书无我名”，“正听山鸟向阳眠，黄纸除书落枕前”，“黄纸除书到，青宫诏命催。”

【译文】 白居易喜欢用“黄纸除书”四字，如：“红旗破贼非吾事，黄纸除书无我名”，“正听山鸟向阳眠，黄纸除书落枕前”，“黄纸除书到，青宫诏命催。”

白用杜句

【原文】 杜子美诗云：“夜足沾沙雨，春多逆水风。”白乐天诗“巫山暮足沾花雨，陇水春多逆浪风”，全用之。

【译文】 杜甫有诗写道：“夜足沾沙雨，春多逆水风。”白居易的诗句“巫山暮足沾花雨，陇水春多逆浪风”，全用了杜甫的诗句。

唐人重服章

【原文】 唐人重服章，故杜子美有“银章付老翁”，“朱绂负平生”，“扶病垂朱绂”之句。白乐天诗言银绂处最多，七言如：“大抵著绂宜老大”，“一片绂衫何足道”，“暗淡绂衫称我身”，“酒典绂花旧赐袍”，“假著绂袍君莫笑”，“腰间红绂系未稳”，“朱绂仙郎白雪歌”，“腰佩银龟朱两轮”，“便留朱绂还铃罍”，“映我绂衫浑不见”，“白头俱未著绂衫”，“绂袍著了好归田”，“银鱼金带绕腰光”，“银章调假为专城”，“新授铜符未著绂”，“徒使花袍红似火”，“似挂绂袍衣架上”。五言如：“未换银青绂，唯添雪白须”，“笑我青袍故，饶君茜绂新”，“老逼教垂白，官科遣著绂”，“那知垂白日，始是著绂年”，“晚遇何足言，白发映朱绂。”至于形容衣鱼之句，如：“鱼缀白金随步跃，鹄衔红绂绕身飞。”

【译文】 唐人最看重服章，所以杜甫有“银章付老翁”，“朱绂负平生”，“扶病垂朱绂”等诗句。白居易的诗中提到“银绂”的地方很多，七言的如：“大抵著绂宜老大”，“一片绂衫何足道”，“暗淡绂衫称我身”，“酒典绂花旧赐袍”，“假著绂袍君莫笑”，“腰间红绂系未稳”，“朱绂仙郎白雪歌”，“腰佩银龟朱两轮”，“便留朱绂还铃罍”，“映我绂衫浑不见”，“白头俱未著绂衫”，“绂袍著了好归田”，“银鱼金带绕腰光”，“银章调假为专城”，“新授铜符未著绂”，“徒使花袍红似火”，“似挂绂袍衣架上”。五言的如：“未换银青绂，唯添雪白须”，“笑我青袍故，饶君茜绂新”，“老逼教垂白，官科遣著绂”，“那知垂白日，始是著绂年”，“晚遇何足言，白发映朱绂。”至于形容衣和鱼的句子，如：“鱼缀白金随步跃，鹄衔红绂绕身飞。”等等。

诗讖不然

【原文】 今人富贵中作不如意语，少壮时作衰病语，诗家往往以为讖。白公十八岁，病中作绝句云：“久为劳生事，不学摄生道。少年已多病，此身岂堪老？”然白公寿七十五。

【译文】 现在人富贵的境况中说不如意的话，年轻强壮时说衰老有病的话，作诗的人往往以为是不祥的预言。白公（白居易）十八岁时，病中作绝句说：“久为劳生事，不学摄生道（长期做劳累生命的事，不学习养生之道）。少

年已多病，此身岂堪老（年少时已经多病，我这身体哪能到老）？”但白居易享年七十五岁。

青龙寺诗

【原文】 乐天《和钱员外青龙寺上方望旧山》诗云：“旧峰松雪旧溪云，怅望今朝遥属君。共道使臣非俗吏，南山莫动《北山文》。”顷于乾道四年讲筵开日，蒙上书此章于扇以赐，改“使臣”为“侍臣”云。

【译文】 白居易《和钱员外青龙寺上方望旧山》诗写道：“旧峰松雪旧溪云，怅望今朝遥属君。共道使臣非俗吏，南山莫动《北山文》。”不久前，在孝宗乾道四年经筵开讲的那天，承蒙皇上把这首诗写在扇子上赐给我，皇上把“使臣”改为“侍臣”。

卷 二

唐重牡丹

【原文】 欧阳公《牡丹释名》云：“牡丹初不载文字，唐人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咏花，当时有一花之异者，彼必形于篇什，而寂无传焉，唯刘梦得有咏鱼朝恩宅牡丹诗，但云一丛千朵而已，亦不云其美且异也。”予按：白公集有《白牡丹》一篇十四韵，又《秦中吟》十篇，内《买花》一章，凡百言，云：“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而《讽谕乐府》有《牡丹芳》一篇，三百四十七字，绝道花之妖艳，至有“遂使王公与卿士，游花冠盖日相望”，“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之语。又《寄微之百韵》诗云：“唐昌玉蕊会，崇敬牡丹期。”注：“崇敬寺牡丹花，多与微之有期。”又《惜牡丹》诗云：“明朝风起应吹尽，夜惜衰红把火看。”《醉归谿畔》诗云：“数日非关王事系，牡丹花尽始归来。”元微之有《入永寿寺看牡丹》诗八韵，《和乐天秋题牡丹丛》三韵，《酬胡三咏牡丹》一绝，又有五言二绝句。许浑亦有诗云：“近来无奈牡丹何，数十千钱买一窠。”徐凝云：“三条九陌花时节，万马千车看牡丹。”又云：“何人不爱牡丹花，占断城中好物华。”然则元、白未尝无诗，唐人未尝不重此花也。

【译文】 欧阳修所著的《牡丹释名》一书中说：“牡丹最初不见于文字记载，唐人像沈亚之、宋之问、元稹、白居易等，都善于咏花，当时只要有一种奇异的花，都要写入诗中，然而却没有人写牡丹。只有刘禹锡有一首咏鱼朝恩宅中牡丹的诗，但也只是说它一丛千朵罢了，并没有夸它美丽和奇异。”我考查，白居易的诗集中有《白牡丹》一篇，共十四韵，又有《秦中吟》十篇，其中有《买花》一章，共一百字，说：“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他的《讽谕乐府》中有《牡丹芳》一篇，三百四十七字，极力称道牡丹花的妖艳。甚至有这样的句子：“遂使王公与卿士，游花冠盖日相望。”“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他的《寄微之百韵》诗说：“唐昌玉蕊会，崇敬牡丹期。”自注说：“崇敬寺正开牡丹花，常邀元微之去看。”他的《惜牡丹》诗说：“明朝风起应吹尽，夜惜衰红把火看。”《醉归谿畔》诗说：“数日非关王

事系，牡丹花尽始归来。”元稹有《入永寿寺看牡丹》诗八韵，《和乐天秋题牡丹丛》三韵，《酬胡三咏牡丹》一绝句，又有五言二绝句。许浑也有诗说：“近来无奈牡丹何，数十千钱买一窠。”徐凝说：“三条九陌花时节，万马千车看牡丹。”又说：“何人不爱牡丹花，占断城中好物华。”既然如此，那么元稹、白居易并非没有牡丹诗，唐人也并非不重视牡丹啊！

长歌之哀

【原文】 嬉笑之怒，甚于裂眦；长歌之哀，过于恸哭。此语诚然。元微之在江陵，病中闻白乐天左降江州，作绝句云：“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起坐，暗风吹雨入寒窗。”乐天以为：“此句他人尚不可闻，况仆心哉！”微之集作“垂死病中仍怅望”，此三字既不佳，又不题为病中作，失其意矣。东坡守彭城，子由来访之，留百余日而去，作二小诗曰：“逍遥堂后千寻木，长送中宵风雨声。误喜对床寻旧约，不知漂泊在彭城。”“秋来东阁凉如水，客去山公醉似泥。困卧北窗呼不醒，风吹松竹雨凄凄。”东坡以为读之殆不可为怀，乃和其诗以自解。至今观之，尚能使人凄然也。

【译文】 有时表现为嬉笑的愤怒，比瞪眼还严重，长声歌唱的悲哀，超过了恸哭。这话确实如此。元微之（元稹）在江陵，正生病时听到白乐天（白居易）贬官到江州，做一首绝句说：“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行将熄灭的灯没有光亮而黑影笼罩着，这天夜间听说你被贬到九江）。垂死病中惊起坐，暗风吹雨入寒窗（我将死的病中吃惊地坐了起来，但觉昏暗的风吹着雨点飘进令人寒冷的窗子）。”白乐天以为：“这诗句别人尚且不忍听到，何况我的心呢！”《元微之集》作“垂死病中仍怅望（垂死者在病中仍然惆怅望着）”，这“仍怅望”三字既不好，又不题作“病中作”，失去它的本意了。东坡（苏轼）做彭城太守，苏子由（苏辙）来看他，留住一百多天而去，做了两首小诗说：“逍遥堂后千寻木，长送中宵风雨声（逍遥堂后面高八千尺的大树，永远送来的半夜里的风雨的声音）。误喜对床寻旧约，不知漂泊在彭城（错以为兄弟对着床来赴旧日的约会，不知道是漂泊寄住在彭城）。”“秋来东阁凉如水，客去山公醉似泥（秋天到来东阁中凉爽得像在水中，客人散去山涛已醉得像一堆泥）。闲卧北窗呼不醒，风吹松竹雨凄凄（闲来睡在北窗下边别人叫也没醒来，当时风正吹着松竹下着凄凄的雨点）。苏东坡以为读了这两首诗使人心中很难受，就和作了这些诗来自我警解。到今天看来，还能使人觉得凄凉。

韦苏州

【原文】 《韦苏州集》中，有《逢杨开府》诗云：“少事武皇帝，无赖恃恩私。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儿。朝持樗蒲局，暮窃东邻姬。司隶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骊山风雪夜，长杨羽猎时。一字都不识，饮酒肆顽痴。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读书事已晚，把笔学题诗。两府始收迹，南宫谬见推。非才果不容，出守抚茆嫠。忽逢杨开府，论旧涕俱垂。”味此诗，盖应物自叙其少年事也，其不羁乃如此。李肇《国史补》云：“应物为性高洁，鲜食寡欲，所居焚香扫地而坐，其为诗驰骤建安已还，各得风韵。”盖记其折节后来也。《唐史》失其事，不为立传。高适亦少落魄，年五十始为诗，即工。皆天分超卓，不可以常理论云。应物为三卫，正天宝间，所为如是，而吏不敢捕，又以见时政矣。

【译文】 《韦苏州集》中，有一首《逢杨开府》诗写道：“少事武皇帝，无赖恃恩私。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儿。朝持樗蒲局，暮窃东邻姬。司隶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骊山风雪夜，长杨羽猎时。一字都不识，饮酒肆顽痴。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读书事已晚，把笔学题诗。两府始收迹，南宫谬见推。非才果不容，出守抚茆嫠。忽逢杨开府，论旧涕俱垂。”体味此诗，大概是韦应物自写少年时的事情，没想到他竟然放荡到如此地步。李肇《国史补》中说：“韦应物性情高洁，生活俭朴，清心寡欲，在住所烧香扫地然后才坐。他的诗很有建安风骨，各有韵味。”这大概是他改邪归正以后的事情。《唐书》未收录这些材料，没有为他立传。高适少年时也不得意，到了五十岁才开始学作诗，但一作就很好。这两位都是天资过人，不能以常理论断。韦应物为三卫郎，是在玄宗天宝年间，他做事如此无法无天，然而官吏却不敢捕捉，由此又可想而知，当时政治的状况了。

古行宫诗

【原文】 白居易《长恨歌》、《上阳人》歌，元微之《连昌宫词》，道开元间宫禁事，最为深切矣。然微之有《行宫》一绝句云：“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语少意足，有无穷之味。

【译文】 白居易的《长恨歌》、《上阳人》歌，元稹的《连昌宫词》，描绘

唐玄宗开元年间宫院里的事，可谓是最深刻切实的了。然而元稹还有一首《行宫》绝句说：“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语句不多，内容却很丰富，令人回味无穷。

隔是

【原文】 乐天诗云：“江州去日听箏夜，白发新生不愿闻。如今格是头成雪，弹到天明亦任君。”元微之诗云：“隔是身如梦，频来不为名。怜君近南住，时得到山行。”“格”与“隔”二字义同，“格是”犹言“已是”也。

【译文】 白居易的诗写道：“江州去日听箏夜，白发新生不愿闻。如今格是头成雪，弹到天明亦任君。”元稹的诗写成：“隔是身如梦，频来不为名。怜君近南住，时得到山行。”“格”与“隔”两字义同，“格是”就相当于“已是”。

张良无后

【原文】 张良、陈平，皆汉祖谋臣，良之为人，非平可比也。平尝曰：“我多阴谋，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矣，以吾多阴祸也。”平传国至曾孙，而以罪绝，如其言。然良之爵但能至子，去其死才十年而绝，后世不复绍封，其祸更促于平，何哉？予盖尝考之，沛公攻睢关，秦将欲连和，良曰：“不如因其懈怠击之。”公引兵大破秦军。项羽与汉王约中分天下，既解而东归矣。良有养虎自遗患之语，劝王回军追羽而灭之。此其事固不止于杀降也，其无后宜哉！

【译文】 张良、陈平，都是汉高祖的得力谋臣，但张良的为人，却不是陈平可以相比的。陈平曾经说：“我屡次使用阴谋，这是道家所禁忌的，我的后代就要灭绝了，因为我为后人种下了祸根啊！”果然，陈平传国到他的曾孙，便因罪而被废绝，正如他说的那样。然而张良的爵位，却只能传到儿子，距他的死才十年，便被废除，后代也不再续封。张家遭到灾祸的时间比陈平还快，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曾考察过，沛公刘邦攻打蓝田（在今陕西蓝田东南）时，秦国守将想投降，张良说：“不如趁他戒备松懈之机发动突然袭击。”沛公听了张良的话，打败了秦兵。项羽和汉王刘邦立约，平分天下，之后项羽就带兵东去彭城（今江苏徐州）了。刘邦也想回关中，张良说这是放虎归山，后患无穷，劝汉王回兵追击项羽而灭掉他。这两件事，比诛杀降兵还缺德，他没有后代毫不

奇怪啊！

周亚夫

【原文】 周亚夫距吴、楚，坚壁不出。军中夜惊，内相攻击扰乱，至于帐下。亚夫坚卧不起。顷之，复定。吴奔壁东南陬，亚夫使备西北。已而果奔西北，不得入。《汉史》书之，以为亚夫能持重。按，亚夫军细柳时，天子先驱至，不得入。文帝称其不可得而犯。今乃有军中夜惊相攻之事，安在其能持重乎？

【译文】 周亚夫抵抗吴楚叛军，坚守营垒不出击。军队中夜间惊扰，内部自相攻击和骚扰，一直闹到主将幕帐下面。周亚夫睡着不起身。过一会又安定了。吴兵冲向汉军营的东南角，周亚夫叫部下在西北方设防，不久吴兵果然攻向西北，但攻不进来。《汉书》记载这事，认为周亚夫老成持重。按：周亚夫驻军细柳时，皇帝部下前驱的人到了，进不了军营。文帝称赞周亚夫是不可能侵犯的。现在竟有军队中夜间惊扰互相攻打的事，哪里能说他老成持重呢？

汉轻族人

【原文】 爰盎陷晁错，但云：“方今计，独有斩错耳。”而景帝使丞相以下劾奏，遂至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主父偃陷齐王于死，武帝欲勿诛，公孙丞相争之，遂族偃。郭解客杀人，吏奏解无罪，公孙大夫议，遂族解。且偃、解两人本不死，因议者之言，杀之足矣，何遽至族乎？汉之轻于用刑如此！

【译文】 爰盎陷害晁错，只是说：“为今之计，只有杀掉晁错。”而汉景帝指使丞相以下的官员弹劾他，结果晁错的父母妻子兄弟姐妹不管男女老少竟然都被斩首示众。主父偃陷害齐王至死，汉武帝不想杀他，丞相公孙弘坚决反对，于是就下令诛灭了主父偃全族。郭解的门客杀了人，官吏判郭无罪，公孙大夫认为郭解有罪，于是朝廷也下令诛灭了他的全族。再说主父偃、郭解两人本可以不杀，因为有人主张要杀，杀了也就够了，哪至于灭族呢？汉朝就是这样轻率地用刑。

漏泄禁中语

【原文】 京房与汉元帝论幽、厉事，至于十问十答。西汉所载君臣之语，未有如是之详尽委曲者。盖汉法漏泄省中语为大罪，如夏侯胜出道上语，宣帝责之，故退不敢言，人亦莫能知者。房初见帝时，出为御史大夫郑君言之，又为张博道其语，博密记之，后竟以此下狱弃市。今史所载，岂非狱辞乎？王章与成帝论王凤之罪，亦以王音侧听闻之耳。

【译文】 京房和汉元帝谈论周幽王、周厉王的事，至于十次发问十次回答。西汉史上所记君臣之间的谈话，没有过这样详尽曲折的。这是因为汉朝法律规定，泄漏出朝廷中的话是大罪，像夏侯胜出朝在人前讲述皇帝的话，宣帝责备他，所以退朝就不敢说，人们也没有能知道的。京房刚见皇帝时，出来对御史大夫郑君（郑弘）说了，又对张博说了这些话，张博暗中记下，后来竟因此被捕下监狱斩首。现在史书所记载的，岂不是当时审讯的供词吗？王章和汉成帝议论王凤的罪行，也是因为王章在旁偷听到的。

田叔

【原文】 贯高谋杀汉祖，事发觉，汉诏赵王，有敢随王罪三族，唯田叔、孟舒等自髡钳随王，赵王既出，上以叔等为郡守。文帝初立，召叔问曰：“公知天下长者乎？”曰：“故云中守孟舒，长者也。”是时，舒坐虏大入云中免。上曰：“虏入云中，孟舒不能坚守，士卒死者数百人，长者固杀人乎？”叔叩头曰：“夫贯高等谋反，天子下明诏，赵有敢随张王者，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钳，随张王，以身死之，岂自知为云中守哉！是乃所以为长者。”上曰：“贤哉孟舒！”复召以为云中守。按，田叔、孟舒同随张王，今叔指言舒事，几于自荐矣。叔不自以为嫌，但欲直孟舒之事，文帝不以为过，一言开悟，为之复用舒，君臣之诚意相与如此。

【译文】 贯高图谋杀害汉高祖，事情被发觉，汉朝下诏给赵王，臣下有敢跟随赵王张敖的诛灭三族，只有田叔、孟舒等人自己剃光头用铁索束缚头颈跟随赵王，赵王既已被释放，皇上用田叔等人做郡守。文帝刚即位，召来田叔问他说：“您知道天下有忠厚长者吗？”田叔说：“前云中守孟舒，是忠厚长者。”这

时，孟舒因为匈奴大举侵入云中而被免官。皇上说：“匈奴入侵云中，孟舒不能坚守，士兵战死的有几百人，忠厚长者竟杀人吗？”田叔叩头说：“那贯高等人谋反，皇帝下诏书，赵国有敢跟随赵王（张敖）的，以诛三族论罪。但孟舒自己剃光头缚铁索跟随赵王，准备自身为赵王而死，难道自己知道要任云中守吗！这就是他所以为忠厚长者。”皇上说：“孟舒真是贤德。”又召他来任云中守。按：田叔、孟舒一同跟随赵王，现在田叔指名讲孟舒的事，几乎等于荐引自己了。田叔不认为该避嫌疑，只想纠正孟舒的事情；文帝也不以为过分，一句话就觉悟过来，因此重新用孟舒，君臣之间用诚心相处到这样子。

孟舒 魏尚

【原文】 云中守孟舒，坐虏大入云中免。田叔对文帝曰：“匈奴来为边寇，孟舒知士卒罢敝，不忍出言，士争临城死敌，如子为父，以故死者数百人。孟舒岂驱之哉！”上曰：“贤哉孟舒！”复召以为云中守。又冯唐对文帝曰：“魏尚为云中守，虏尝一入，尚率车骑击之。士卒终日力战。上功幕府，坐首虏差六级，下吏削爵。臣以为陛下罚太重。”上赦魏尚，复以为云中守。按，孟舒、魏尚，皆以文帝时为云中守，皆坐匈奴入寇获罪，皆得士死力，皆用他人言复故官，事切相类，疑其只一事云。

【译文】 云中太守孟舒，因为匈奴攻进云中而被罢免。田叔对汉文帝说：“匈奴侵犯边境，孟舒知道战士疲惫，不忍心下令抵抗，但战士们争先恐后地上城拚死对敌，就像儿子保护父亲一样，因此死了几百人。这哪里是孟舒强迫他们去送死呢！”汉文帝说：“孟舒真是个贤才呀！”又让他作了云中太守。另外，冯唐对汉文帝说：“魏尚任云中太守，匈奴曾经进犯，魏尚率领军队反击。战士终日鏖战。魏尚上书将军府记功，因为差了六颗首级，就被下狱削去官爵。我认为陛下处罚的太重。”汉文帝便赦免了魏尚，仍让他回云中任太守。孟舒和魏尚都在汉文帝时任云中太守，都是因为匈奴进犯而获罪，都得到战士的拚死力战，最后又都因为别人为他们说话而复官，事情极其相似，我怀疑这是同一件事。

秦用他国人

【原文】 七国虎争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然六国所用相，皆其宗族及国人，如齐之田忌、田婴、田文，韩之公仲、公叔，赵之奉阳、平原君，魏王至以太子为相。独秦不然，其始与之谋国以开霸业者，魏人公孙鞅也。其他若楼缓赵人，张仪、魏冉、范雎皆魏人，蔡泽燕人，吕不韦韩人，李斯楚人，皆委国而听之不疑，卒之所以兼天下者，诸人之力也。燕昭王任郭隗、剧辛、乐毅，几灭强齐，辛、毅皆赵人也。楚悼王任吴起为相，诸侯患楚之强，盖卫人也。

【译文】 七国争夺天下，没有不广泛罗致四方游说之士的。但六国所任用的相国，都是他们的宗族和本国人，如齐国的田忌、田婴、田文，韩国的公仲、公叔，赵国的奉阳君、平原君，魏王甚至任用太子为相国。只有秦国不是这样，最初与秦国商讨大计、准备削平其他国家以开创霸业的是魏国人公孙鞅。其他如楼缓是赵国人，张仪、魏冉、范雎都是魏国人，蔡泽是燕国人，吕不韦是韩国人，李斯是楚国人。秦王都把国家大事托付给他们，而没有一点疑心，之所以最终兼并天下，便是依赖这些人的力量。燕昭王任用郭隗、剧辛、乐毅，几乎灭掉了强大的齐国，剧辛、乐毅都是赵国人。楚悼王任用吴起为相国，诸侯都惧怕楚国的强盛，而吴起却是卫国人。

曹参 赵括

【原文】 汉高祖疾甚，吕后问曰：“萧相国既死，谁令代之？”上曰：“曹参可。”萧何事惠帝，病，上问曰：“君即百岁后，谁可代君？”对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参何如？”曰：“帝得之矣。”曹参相齐，闻何薨，告舍人趣治行，吾且入相。居无何，使者果召参。赵括自少时学兵法，其父奢不能难，然不谓善，谓其母曰：“赵若必将之，破赵军者必括也。”后廉颇与秦相持，秦应侯行千金为反间于赵，曰：“秦之所畏，独赵括耳。”赵王以括代颇将。蔺相如谏，王不听。括母上书言括不可使，王又不听。秦王闻括已为赵将，乃阴使白起代王暉，遂胜赵。曹参之宜为相，高祖以为可，惠帝以为可，萧何以为可，参自以为可，故汉用之而兴。赵括之不宜为将，其父以为不可，母以为不可，大

臣以为不可，秦王知之，相应侯知之，将白起知之，独赵王以为可，故用之而败。呜呼！将相安危所系，可不监哉！且秦以白起易王暉，而赵乃以括代廉颇，不待于战，而胜负之形见矣。

【译文】 汉高祖病重，吕后问他说：“萧相国（萧何）如果去世以后，叫谁去代替他？”皇上说：“曹参可以。”萧何辅助汉惠帝，生了病，皇上问他说：“您如果去世以后，谁可以代替您？”回答说：“知道臣下的没有再比得上主上。”皇帝说：“曹参怎样？”回答说：“皇帝说对了。”曹参做齐国相，听说萧何死了，告诉僚属们整顿行李。我快入朝做宰相了。“过不几天，使者果然来召曹参。赵括从少年时学习兵法，他的父亲赵奢不能难倒他，但不称赞他，对他母亲说：“赵国如果一定要他当将军，使赵军破败的必然就是赵括。”后来赵将廉颇和秦兵相持，秦相应侯（范雎）出千金使用反间计于赵国，说：“秦国所害怕的，只有赵括。”赵王用赵括代替廉颇做将军。蔺相如进谏，赵王不听。赵括的母亲上书赵王说赵括不可以任用，赵王又不听。秦王听说赵括已经做了赵国主将，就暗中派白起代替王翦做主将，就此战胜赵国。曹参适宜做宰相，汉高祖以为可以，汉惠帝以为可以，萧何以为可以，曹参自己以为可以，所以汉朝用了他而兴盛。赵括不适合做主将，他父亲以为不可以，母亲以为不可以，大臣以为不可以；秦王知道，秦相应侯知道，秦将白起知道，只有赵王以为可用，所以用了他而战败。唉！将相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可以不用此作鉴戒吗！而且秦国用白起代王翦，而赵国却以赵括代替廉颇，用不到等开战，而胜败的形势已经可以看出来了。

信近于义

【原文】 “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程明道曰：“因恭信而不失其所以亲，近于礼义，故亦可宗。”伊川曰：“因不失于相近，亦可尚也。”又曰：“因其近礼义而不失其亲，亦可宗也。况于尽礼义者乎？”范纯父曰：“君子所因者本，而立爱必自亲始，亲亲必及人。故曰因不失其亲。”吕与叔分为三事。谢显道曰：“君师友三者，虽非天属，亦可以亲，舍此三者之外，吾恐不免于谄贱。惟亲不失其所亲，然后可为宗也。”杨中立曰：“信不失义，恭不悖礼，又因不失其亲焉，是亦可宗也。”尹彦明曰：“因其近，虽未足以尽礼义之本，亦不失其所宗尚也。”予窃以谓义与礼之极，多至于不亲，能至于不失其亲，斯为可宗也。然未敢以为是。“可为宗”，馆本作

“为可宗”。

【译文】 “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明道先生程颢说：“坚持恭信，而又不失掉亲情，近于礼义，所以说也可以尊崇。”伊川先生程颐说：“因为坚持恭信，而又不失于接近礼义，所以也是可以尊崇的。”又说：“因为恭信能近于礼义，而又不失去亲情，所以也是可以尊崇的，何况完全合乎礼义的呢！”范纯父说：“君子所依凭的是本性，而建立爱心必从亲人开始，爱自己的亲人，也一定要爱别人的亲人，所以说坚持恭信而又不失掉亲情。”吕与叔把信、恭、亲分成三件事。谢显道说：“君、师、友这三者，虽然不是天赋本性，但是也可以亲爱。除了这三者以外，就不免陷于谄媚和卑贱。只有亲爱而不失掉可亲爱的人，然后才可以崇尚。”杨中立说：“诚信而不失掉义，谦恭而不违背礼，又不失掉亲情，这也是可以崇尚的。”尹彦明说：“因为恭信近于礼义，虽然还不足以完全包容礼义的根本，但也是可以崇尚的。”我认为礼和义的极端，多至于丧失亲情，如能够达到不丧失亲情，这才是可以崇尚的。然而，我不敢自以为是。

刚毅近仁

【原文】 刚毅者，必不能令色。木讷者，必不为巧言。此近仁鲜仁之辨也。

【译文】 刚毅的人，必定不能装出和善的脸色。不善言谈的人，必定不说谄媚人的漂亮话。这就是分辨近仁与少仁的区别。

忠恕违道

【原文】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庸》曰：“忠恕违道不远。”学者疑为不同。伊川云：“《中庸》恐人不喻，乃指而示之近。”又云：“忠恕固可以贯道，子思恐人难晓，故降一等言之。”又云：“《中庸》以曾子之言虽是如此，又恐人尚疑忠恕未可便为道。故曰违道不远。”游定夫云：“道一而已，岂参彼此所能豫哉？此忠恕所以违道，为其未能一以贯之也。虽然，欲求入道者，莫近于此，此所以违道不远也。”杨中立云：“忠恕固未足以尽道。然而违道不远矣。”侯师圣云：“子思之忠恕，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此已是违道。若圣人，则不待施诸己而不愿，然后勿施诸人也。”诸公之说大抵不同。予窃以为

道不可名言，既丽于忠恕之名，则为有迹。故曰违道。然非忠恕二字亦无可以明道者。故曰不远。非谓其未足以尽道也。违者违去之谓，非违畔之谓。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苏子由解云：“道无所不在，无所不利，而水亦然。然而既已丽于形，则于道有间矣，故曰几于道。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此者。故曰上善。”其说与此略同。

【译文】 曾子（曾参）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夫子的道理就是忠恕而已）。《中庸》说：“忠恕违道不远（忠恕离开大道不远）。”学者们疑心二语意思不同。程伊川（程颐）说：“《中庸》恐怕人们不明白，所以指出忠恕离大道为近。”又说：“忠恕固然可以贯串大道，子思（孔 ）怕人难于理解，所以退一步来讲。”又说：“《中庸》因为曾子的话虽是这样讲，又怕人们还怀疑忠恕不能就算大道。所以说离开大道不远。”游定夫（游酢）说：“大道只有一个，岂是夹杂彼此所能参预到的。这就是忠恕所以离开大道，因为它不能用一个原则来贯串。虽然如此，要想进入大道的人，没有比此更近的了。这就是它离开大道不远。”杨中立（杨时）说：“忠恕固然还不能穷尽大道，但离开大道不远了。”侯师圣说：“子思所说忠恕，施行在自己身上而感到不愿意，也就不施行于别人。这已经是离开了大道。如果是圣人，就不必等施行于自己而觉不愿，然后再不施用于别人。”诸位先生的说法大抵不同。我窃自以为大道不可用名迹来说明，既附着在忠恕的名目上，就是有了迹象，所以说离开大道。但不用“忠恕”二字也找不到可以用来说明大道的。所以说“不远”。不是说它不足以穷尽大道。“违”（离开）的说法，是指离去的意思，不是指违反的意思。《老子》说：“最好的善像水一样，水善于滋润万物而不争它的功劳，处于卑下为众人所厌弃之地，所以近于大道。”苏子由（苏辙）解释说：“大道无处不存在，对万物没有不可以有利的，而水也是这样。但水既附着于形迹，那和大道还是不同了。所以说“近于大道”。然而可以用名称来说明的，没有再比它恰切了，所以说是‘最好的善’。”他的说法和这道理大致相同。

求为可知

【原文】 “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为之说者，皆以为当求为可知之行。唯谢显道云：“此论犹有求位求可知之道，在至论则不然，难用而莫我知，斯我贵矣，夫复何求？”予以为君子不以无位为患，而以无所立为患；不以莫己知为患，而以求为可知为患。第四句盖承上文言之。夫求

之有道，若汲汲然求为可知，则亦无所不至矣。

【译文】 “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解说这句话的人，都以为应当追求可以被人们了解的品德。只有谢显道解释说：“这种解释，还有追求官位、追求被人了解的行为。至理名言是不会这么说的，难被人用而又不被人知道，这就很可贵了，还追求什么呢？”我以为君子不忧愁没有官位，而忧愁不能立身；不忧愁不为人所知，而忧愁追求让别人知道。第四句是承接上文说的。本来追求应有道，如果一心追求被人知道，那么就会无所不为了。

里仁

【原文】 “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孟子论函矢巫匠之术，而引此以质之，说者多以里为居，居以亲仁为美。予尝记一说云，函矢巫匠皆里中之仁也。然于仁之中有不仁存焉，则仁亦在夫择之而已矣。尝于郑景望言之，景望不以为然。予以为此特谓闾巷之间所推以为仁者，固在所择，正合孟子之意。不然，仁之为道大矣，尚安所择而处哉？

【译文】 “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乡里有仁厚的风俗是很好的。选择乡里而不居住在这里，那就失去他的是非本心，哪能算智慧的人呢）。”孟子（孟轲）论到盔甲匠、箭匠、巫祝和棺匠的心理，而引这话来证明它，解说的人大多以“里”为居住之地，居住处以亲近仁人为好。我曾经记下一种说法道：“盔甲匠、箭匠、巫祝、棺匠都是乡里中仁人。但在仁的中间存在着不仁的成份，那么仁道也在于怎样选择它而已。”我曾经和郑景望说过，郑景望不以为然。我以为这只是说闾巷中人所推举以为仁的人，当然在自己去选择，正合于孟子的意思。不然的话，仁的作为道理是广大的，还有什么可选择而定居的呢？

汉采众议

【原文】 汉元帝时，珠崖反，连年不定。上与有司议大发军，待诏贾捐之建议，以为不当击。上以问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陈万年以为当击，丞相于定国以为捐之议是，上从之，遂罢珠崖郡。匈奴呼韩邪单于既事汉，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议，议者皆以为便，郎中侯应习边事，以为不可许。上问状，应对十策，有诏勿议罢边塞事。成帝

时，匈奴使者欲降，下公卿议，议者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禄大夫谷永以为不如勿受，天子从之。使者果诈也。哀帝时，单于求朝，帝欲止之，以问公卿，亦以为虚费府帑，可且勿许。单于使辞去。黄门郎扬雄上书谏，天子寤焉，召还匈奴使者，更报单于书而许之。安帝时，大将军邓骘欲弃凉州，并力北边，会公卿集议，皆以为然，郎中虞诩陈三不可，乃更集四府，皆从诩议。北匈奴复强，西域诸国既绝于汉，公卿多以为宜闭玉门关绝西域。邓太后召军司马班勇问之，勇以为不可，于是从勇议。顺帝时，交趾蛮叛，帝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属，问以方略，皆议遣大将发兵赴之，议郎李固驳之，乞选刺史太守以往，四府悉从固议，岭外复平。灵帝时，凉州兵乱不解，司徒崔烈以为宜弃，诏会公卿百官议之，议郎傅燮以为不可，帝从之。此八事者，所系利害甚大，一时公卿百官既同定议矣，贾捐之以下八人，皆以郎大夫之微，独陈异说。汉元、成、哀、安、顺、灵皆非明主，悉能违众而听之，大臣无贤愚亦不复执前说，盖犹有公道存焉。每事皆能如是，天下其有不治乎？

【译文】 汉元帝时，珠崖反叛，几年都没有平定。皇帝和大臣商议，准备派遣大军平叛，待诏贾捐之的建议，认为不应当派兵攻打。皇帝便询问丞相和御史，御史大夫陈万年认为应当攻打，丞相于定国认为贾捐之的建议很正确，皇帝最终采纳了贾捐之的意见，于是撤消了珠崖郡。匈奴呼韩邪单于归附汉朝后，上书说愿意保卫汉朝上谷以西的边塞，请求汉朝撤走戍边的军队，以便人民能够休养生息。皇帝让大臣们商议，大家都以为可行。郎中侯应非常熟悉边疆情况，认为不能答应。皇帝询问情况，侯应提出了十条不能答应的理由，皇帝于是下诏命令百官不要再谈撤掉边军的事。汉成帝时，匈奴派使者请求投降，皇帝让大臣们商议，大臣们认为应按旧例接受。光禄大夫谷永以为不如不答应，皇帝采纳了谷永的意见。匈奴使者果然是诈降。汉哀帝时，匈奴单于要求朝见皇帝，皇帝不想答应，便征求大臣意见，大臣们也认为此举只能白白耗费国家钱财，不宜答应。单于使臣便走了。黄门郎扬雄上书劝谏，皇帝醒悟过来，马上召回匈奴使臣，重新写了回复单于的诏书，答应了单于的请求。汉安帝时，大将军邓骘想放弃凉州，以便集中力量防守北部边境。朝廷召集公卿商议，大家都以为可行，郎中虞诩陈述了三条意见，认为不能放弃。于是又召集丞相、御史、车骑将军、前将军四府商议，众人都同意虞诩的建议。北匈奴再度强盛，西域诸国断绝了和汉朝的关系，大臣们多数主张关闭玉门关，与西域断绝交往。邓太后召来军司马班勇，询问他的意见，班勇以为不应当闭关，于是朝廷采纳了班勇的意见。汉顺帝时，交趾蛮反叛，皇帝召集公卿百官和四府的僚属商讨对策，大家都主张派大将率兵征讨，议郎李固持不同意见，要求选派称职的刺史

太守前往安抚，四府都听从了李固的意见，岭南不久便安定下来。汉灵帝时，凉州军士骚乱不止，司徒崔烈认为应该放弃，朝廷于是召集公卿百官商议，议郎傅燮认为不能放弃，皇帝听从了傅燮的建议。这八件事，都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当时公卿百官都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而贾捐之等八人，都是郎官、大夫之类的小官，却敢提出不同意见。汉元帝、成帝、哀帝、安帝、顺帝、灵帝都不是英明的皇帝，却都能够违背众议，听从他们的不同意见，大臣们不论贤愚，也不再坚持前议，这表明当时公道尚存。如果每件事都能这样，那么天下还会有不大治的吗？

汉母后

【原文】 汉母后预政，不必临朝及少主，虽长君亦然。文帝系周勃，薄太后曰：“绌侯绌皇帝玺，将兵于北军，不以此时反，今居一小县，顾欲反邪？”帝谢曰：“吏方验而出之。”遂赦勃。吴、楚反诛，景帝欲续之，窦太后曰：“吴王老人也，宜为宗室顺善，今乃首乱天下，奈何续其后！”不许吴，许立楚后。郢都害临江王，窦太后怒，会匈奴中都以汉法。帝曰：“都忠臣。”欲释之。后曰：“临江王独非忠臣乎？”于是斩都。武帝用王臧、赵绌，太皇窦太后不悦儒术，绌请毋奏事东宫，后大怒，求得二人奸利事以责上，上下绌、臧吏，杀之。窦婴、田贲廷辩，王太后大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且帝宁能为石人邪！”帝不直贲，特为太后故杀婴。韩嫣得幸于上，江都王为太后泣，请得入宿卫比嫣，后繇此衔嫣，嫣以奸闻，后使使赐嫣死。上为谢，终不能得。成帝幸张放，太后以为言，帝常涕泣而遣之。

【译文】 汉朝母后干预政事，不必是当她临朝听政和君主年少的时候，虽是年长的君主时也是这样。汉文帝囚禁周勃，薄太后说：“绌侯（周勃）系起皇帝的玺印，领兵于北军中，不在那时造反，现在住在一个小县，倒想反吗？”皇帝谢罪说：“官员正在查验释放他。”就此赦免周勃。吴楚等国反叛被诛杀，景帝想给他们续立后代，窦太后说：“吴王刘濞是老人，应该为皇族作顺服善良的榜样，现在竟带头扰乱天下，怎么可以继立后代！”不许吴国立后，只许立楚王的后代。郢都害死临江王，窦太后发怒，正逢匈奴使郢都触犯汉朝法律。皇帝说：“郢都是忠臣”，想释放他。太后说：“临江王就不是忠臣吗？”于是杀了郢都。汉武帝用王臧、赵绌，太皇太后窦氏不喜欢儒家学说，赵绌要求不必到太皇太后宫中上奏政事，太后大怒，找到二人阴私求利的事来责备皇上，皇上把赵绌、王

臧交付狱吏，杀了他们。竇嬰、田璆在朝廷上争辩，田璆的异父同母姐姐王太后大怒不进食，说：“我还在，而人们都蹂躏我的弟弟，而且皇帝怎能做石人不动心呢！”皇帝认为田璆没有理，特地为太后之故杀了竇嬰。韩嫣得到皇上宠幸，江都王对太后哭，请求能入居宫中和韩嫣相比，太后从此恨韩嫣，韩嫣以奸佞著闻，太后派使者赐韩嫣死。皇上给他说明，终于不能允准。成帝宠幸张放，太后对此说了话，皇帝常常哭着叫张放出宫去。

田千秋邓恽

【原文】 汉武帝杀戾太子，田千秋讼太子冤曰：“子弄父兵当何罪？”帝大感悟曰：“父子之间，人所难言也。公独明其不然，公当遂为吾辅佐。”遂拜为丞相。光武废郭后，邓恽言曰：“夫妇之好，父不能得之于子，况臣能得之于君乎？是臣所不敢言。虽然，愿陛下念其可否之计，无令天下有议社稷而已。”帝曰：“恽善恕己量主。”遂以郭氏为中山王太后，卒以寿终。此二人者，可谓善处人骨肉之间，谏不费词，婉而能入者矣。

【译文】 汉武帝杀了戾太子，田千秋为太子诉冤，说：“儿子玩弄父亲的兵器，应判什么罪？”武帝深受感动，知道错了，说：“父子之间的事情，是外人所难说的，唯独你敢阐明太子不反，将来必定是我的得力辅佐。”于是任命他为丞相。汉光武帝准备废掉郭皇后，邓恽进谏说：“夫妻之间的和谐关系，父亲无法从儿子那里得到，何况臣子能够从君主那里得到吗？这一点是臣所不敢妄言的。尽管这样，但我还是希望陛下仔细思量一下这种做法是否可行，千万不要让天下的人议论祖宗社稷啊。”光武帝说：“邓恽善于恕己量主。”于是，让郭氏作中山王的太后，寿终正寝。这两个人，可谓善于处理人们骨肉亲情之间的关系，进谏之言，简明扼要，婉转入耳，易于为皇上所采纳。

戾太子

【原文】 戾太子死，武帝追悔，为之族江充家，黄门苏文助充谮太子，至于焚杀之。李寿加兵刃于太子，亦以他事族。田千秋以一言至为丞相，又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然其孤孙囚系于郡邸，独不能释之，至于掖庭令养视而不问也，岂非汉法至严，既坐太子以反逆之罪，虽心知其冤，而有所不赦者

乎？

【译文】 戾太子死了，汉武帝非常后悔，因此诛灭了江充全族。黄门苏文因为曾帮助江充诋毁太子，武帝将他活活地烧死。李寿直接杀死太子，不久被借故灭族。田千秋为太子鸣冤，只说了一句话，就当上了丞相。武帝又建造思子宫，并修筑归来望思台。但是他的孤孙、戾太子之子，却被囚禁在郡狱不能释放，以至由掖庭令养护他，而武帝则不管不问。这难道不是汉朝法令过严、既叛处戾太子叛逆罪，那么即使知道太子冤枉，也不敢赦免吗？

灌夫任安

【原文】 窦婴为丞相，田𪚩为太尉，同日免。𪚩后为丞相，而婴不用无势，诸公稍自引而怠慢，唯灌夫独否。卫青为大将军，霍去病才为校尉，已而皆为大司马。青日衰，去病日益贵。青故人门下多去事去病，唯任安不肯去。灌夫、任安，可谓贤而知义矣。然皆以他事卒不免于族诛，事不可料如此。

【译文】 窦婴做丞相，田𪚩做太尉，同一天被免官。田𪚩后来做丞相，而窦婴不被任用没有权势，那些门客渐渐各自散去而且态度怠慢，只有灌夫不这样。卫青任大将军，霍去病刚任校尉，后来卫、霍都做大司马。卫青的权势日益衰落，霍去病越来越贵宠。卫青的旧友门客大多离开他去伺候霍去病，只有任安不肯去。灌夫、任安，可以说是贤良而知道义了。但他们都因为别的事终于不免被族诛，事情的不可预料到这样地步。

单于朝汉

【原文】 汉宣帝黄龙元年正月，匈奴单于来朝，二月归国，十二月帝崩。元帝竟宁元年正月，又来朝，五月帝崩。故哀帝时，单于愿朝，时帝被疾，或言匈奴从上游来厌人。自黄龙、竟宁时，中国辄有大故，上由是难之。既不许矣，俄以扬雄之言，复许之。然元寿二年正月，单于朝，六月帝崩。事之偶然符合，有如此者。

【译文】 汉宣帝黄龙元年（公元前 49 年）正月，匈奴单于前来朝见，二月回国，十二月宣帝就病死了。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 33 年）正月，单于又来朝见，五月元帝病死。所以哀帝时，单于请求来朝见，哀帝正在病中，有人

说，匈奴从汉朝上游来，因而在运势上总是压抑着我们。自从黄龙、竟宁以来，中国屡次发生重大事故。哀帝因此不想让单于来朝。已经明确拒绝了，可是不久又因扬雄建议，哀帝又答应单于来朝的请求。但元寿二年（公元前 1 年）正月，单于朝见，六月哀帝就病死了。事情的偶然巧合，竟有如此令人意想不到的。

卷三

进士试题

【原文】 唐穆宗长庆元年，礼部侍郎钱徽知举，放进士郑朗等三十三人，后以段文昌言其不公，诏中书舍人王起、知制诰白居易重试，驳放卢公亮等十人，贬徽江州刺史。白公集有奏状论此事，大略云：“伏料自欲重试进士以来论奏者甚众。盖以礼部试进士，例许用书策，兼得通宵，得通宵则思虑必周，用书册则文字不错。昨重试之日，书策不容一字，木烛只许两条，迫促惊忙，幸皆成就，若比礼部所试事校不同。”及驳放公亮等敕文，以为《孤竹管赋》出于《周礼》正经，阅其程试之文，多是不知本末。乃知唐试进士许挟书及见烛如此。国朝淳化三年，太宗试进士，出《卮言日出赋》题，孙何等不知所出，相率扣殿槛乞上指示之，上为陈大义。景德二年，御试《天道犹张弓赋》。后礼部贡院言，近年进士惟钞略古今文赋，怀挟入试，昨者御试以正经命题，多懵所出，则知题目不示以出处也。大中祥符元年，试礼部进士，内出《清明象天賦》等题，仍录题解，摹印以示之。至景盪元年，始诏御药院，御试日进士题目，具经史所出，摹印给之，更不许上请。

【译文】 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礼部侍郎钱徽主管科举，放榜录取进士郑朗等三十三人，后来因为段文昌说取士的做法不公正，皇帝下诏叫中书舍人王起、知制诰白居易重加考试，黜落所放榜录取的卢公亮等十人，把钱徽贬官为江州刺史。白公（白居易）的集子中有奏状议论这事，大略说：“巨窃自想到从要求重新考试进士来，论奏这事的人很多。这是因为礼部对进士进行考试，照例允许使用书籍，还许通宵写作，可以通宵写就一定能考虑得周密，能查书就引用文字不会出错。日昨重新考试时，书不许带一个字，蜡烛只许带两条，时间紧促慌忙，幸而都能写成了，如果比起礼部考试来情况就不一样。”讲到黜落放榜录取卢公亮等人的敕文，以为《孤竹管赋》的题目出在《周礼》这正式经典中，而审阅他们应试的文章，多数是不知道典故的本末。可以知道唐代考进士准许带书和点烛的情况是如此。我们宋朝淳化三年（992年），太宗考试进士，出了个《卮言日出赋》的题目，孙何等人不知道题目的出处，一起叩

打殿槛请求皇上指点，皇上给他们陈述了大略的意思。景德二年（1005年），皇帝亲自考士人《天道犹张弓赋》。后来礼部贡院上奏说，近年来进士只抄取古今人的文章辞赋，挟带应考，昨天皇上考他们时用正式经典中出题，他们大多不知出处在哪里，可知当时出题不告诉人们以出处。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考试礼部的进士，宫内提出《清明象天赋》等题，仍写录了题目的解释，模印出来给士人们看。到景祐元年（1034年），开始下诏到御药院，皇上亲临考试进士的题目，都出于经史，印出来给士子们看，再不许向上边提问。

儒人论佛书

【原文】 韩文公《送文畅序》，言儒人不当举浮屠之说以告僧。其语云：“文畅浮屠也，如欲闻浮屠之说，当自就其师而问之，何故谒吾徒而来请也？”元微之作《永福寺石壁记》云：“佛书之妙奥，僧当为予言，予不当为僧言。”二公之语，可谓至当。

【译文】 韩愈《送文畅序》，说儒生不应当向僧人讲论佛家学说。序中说：“文畅是佛教徒，如想听佛家学说，就应当亲自去问他的师父，为什么要来找我们儒生呢？”元稹作《永福寺石壁记》也说：“佛经的奥妙，僧人应当对我讲，我不应当给僧人讲。”两人的话可谓十分正确。

和归去来

【原文】 今人好和《归去来词》，予最敬晁以道所言。其《答李持国书》云：“足下爱渊明所赋《归去来辞》，遂同东坡先生和之，仆所未喻也。建中靖国间，东坡《和归去来》，初至京师，其门下宾客从而和者数人，皆自谓得意也，陶渊明纷然一日满人目前矣。参寥忽以所和篇示予，率同赋，予谢之曰：‘童子无居位，先生无并行，与吾师共推东坡一人于渊明间可也。’参寥即索其文，袖之出，吴音曰：‘罪过公，悔不先与公话。’‘今辄以厚于参寥者为子言。’昔大宋相公谓陶公《归去来》是南北文章之绝唱，《五经》之鼓吹。近时绘画《归去来》者，皆作大圣变，和其辞者，如即事遣兴小诗，皆不得正中者也。”

【译文】 现在的文人喜欢唱和陶渊明的《归去来词》，我最佩服晁以道所说的话。他的《答李持国书》说：“先生喜欢陶渊明所作的《归去来辞》，于是

与东坡先生和它，这我就不明白了。徽宗建中靖国元年，苏东坡有《和归去来》辞，刚传到京城时，他门下的宾客，随他唱和的有好几个人，都自以为作得很好，真是一日之间陶渊明满眼都是了。参寥忽然把他和的篇章让我看，大略和赋一样，我告诉他说：‘童子不敢占据高位，先生面前不敢同行，我和大师共同推举东坡先生与陶渊明并驾齐驱就足够了。’参寥就把他的文章索回，装在袖里走了，并且用吴语说：‘对不起先生，我后悔没有早点向先生请教。’现在我把爱重参寥子的话对先生说。”旧时大宋庠称陶渊明《归去来》是南北文章的绝唱，《五经》的传播者。近来画《归去来》的都画成了大圣变，唱和陶公的作品就如同即事所作的遣兴小诗，这些都是不符合中正之道。

四海一也

【原文】 海一而已，地之势西北高而东南下，所谓东、北、南三海，其实一也。北至于青、沧，则云北海，南至于交、广，则云南海，东渐吴、越，则云东海，无由有所谓西海者。《诗》、《书》、《礼》经所载四海，盖引类而言之。《汉·西域传》所云蒲昌海，疑亦睹居一泽尔。班超遣甘英往条支，临大海，盖即南海之西云。

【译文】 大海只是一个而已，天下的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所谓的东海、北海、南海，其实是一个海。北边到青州、沧州，就叫北海，南边到交州、广州，就叫南海，东边到吴、越，就叫东海，不可能有所谓的西海。《诗》、《书》、《礼》等经书记载的四海，只是从归的角度说的。《汉书·西域传》所记的昌蒲海，我怀疑它只是一个聚水的沼泽罢了。东汉的班超派甘英出使条支时，遇到了一个大海，大概就是南海的西部。

李太白

【原文】 世俗多言李太白在当涂采石，因醉泛舟于江，见月影俯而取之，遂溺死，故其地有捉月台。予按李阳冰作太白《草堂集序》云：“阳冰试弦歌于当涂，公疾亟，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为序。”又李华作《太白墓志》，亦云：“赋《临终歌》而卒。”乃知俗传良不足信，盖与谓杜子美因食白酒牛炙而死者同也。

【译文】 世俗之人多说李白在当涂的采石矶酒醉后乘船江上，见到月亮的影子弯下身子去拾取，就淹死了，所以这地方有捉月台。李阳冰所作太白《草堂集序》说：“李阳冰曾学礼乐于当涂，太白先生病重，诗文稿有万卷，亲自收集尚未修订，在枕上交给我叫作序。”又李华所作《太白墓志》也说：“作《临终歌》而死去。”根据这两篇文章，所以我知道俗人所传不可信，大约和说杜子美吃白酒牛肉而死的事是同一情况。

太白雪谗

【原文】 李太白以布衣入翰林，既而不得官。《唐史》言高力士以脱靴为耻，摘其诗以激杨贵妃，为妃所沮止。今集中有《雪谗诗》一章，大率载妇人淫乱败国，其略云：“彼妇人之猖狂，不如鹄之强强。彼妇人之淫昏，不如鹑之奔奔。坦荡君子，无悦簧言。”又云：“妲己灭纣，褒女惑周。汉祖吕氏，食其在傍。秦皇太后，隄亦淫荒。睨睨作昏，遂掩太阳。万乘尚尔，匹夫何伤。词殫意穷，心切理直。如或妄谈，昊天是殛。”予味此诗，岂非贵妃与禄山淫乱，而白曾发其奸乎？不然，则“飞燕在昭阳”之句，何足深怨也？

【译文】 李白以平民的身份进入翰林院，后来没有得到官职。《唐书》说高力士以给李白脱靴为耻辱，便摘取李白诗句，激怒杨贵妃，杨贵妃便阻止他任职。现在李白集中有《雪谗诗》一章，大致是讲妇人淫乱败坏国政，内容是：“彼妇人之猖狂，不如鹄之强强。彼妇人之淫昏，不如鹑之奔奔。坦荡君子，无悦簧言。”又说：“妲己灭纣，褒女惑周。汉祖吕氏，食其在傍。秦皇太后，盡亦淫荒。睨睨作昏，遂掩太阳。万乘尚尔，匹夫何伤！词殫意穷，心切理直。如或妄谈，昊天是殛。”我体味此诗，莫非杨贵妃与安禄山私通淫乱，李白曾揭发过他们的丑事吗？否则的话，“飞燕在昭阳”的句子，值得杨贵妃如此怨恨吗？

冉有问卫君

【原文】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说者皆评较蒯聩、辄之是非，多至数百言，惟王逢原以十字蔽之，曰：“贤兄弟让，知恶父子争矣。”最为简妙。盖夷、齐以兄

弟让国，而夫子贤之，则不与卫君以父子争国可知矣。晁以道亦有是语，而结意不同。尹彦明之说，与逢原同。惟杨中立云：“世之说者，以谓善兄弟之让，则恶父子之争可知，失其旨矣。”其意为不可晓。

【译文】 冉有问：“孔夫子帮助卫君吗？”子贡回答说：“我要问问先生。”于是进见孔子，问：“伯夷、叔齐是什么样的人呢？”孔子说：“是古时候的贤人！”子贡又问：“他们怨恨吗？”孔子说：“追求仁爱，得到了仁爱，还怨恨什么呢？”子贡告辞出来对冉有说：“先生不会帮助卫君的。”解说的人，评论比较蒯聩和辄的是非，多到几百字，只有王逢原用了十多个字就概括了，说：“赞成兄弟让国，就知道老夫子反对父子相争了。”最为简洁精妙。晁以道也有这样的话，但结句的意思不同。尹彦明的说法，和王逢原相同。只有杨中立说：“世上的解说者，以为赞成兄弟让国，就知道反对父子相争，不符合这句话的主旨。”他的意思是什么，让人无法理解。

商颂

【原文】 宋自微子至戴公，礼乐废坏。正考甫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太师，后又亡其七，至孔子时，所存才五篇尔。宋，商王之后也，于先代之诗如是，则其他可知。夫子所谓“商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盖有叹于此。杞以夏后之裔，至于用夷礼，尚何有于文献哉？邾国小于杞、宋，少昊氏远于夏、商，而凤鸟名官，邾子枚数不忘，曰：“吾祖也，我知之。”其亦贤矣。

【译文】 宋国从微子传到戴公，礼乐都废弃毁坏了。正考甫在周朝的太师那里得到《商颂》十二篇，后来又亡失七篇，到孔子时所保存的只有五篇。宋国，是商王朝的后代，对祖先的诗这样，那其他方面可想而知了。孔夫子所谓“商代的礼我能谈论，但宋国的制度不足征引。”这是有感而叹息这事，杞国是夏朝的后代，甚至用夷狄的礼，还存什么文献呢？邾国比杞、宋为小，少昊氏的年代比夏、商久远，而用凤鸟命名官职，邾子还能历数不忘，说：“这是我的祖先，我知道。”他也可称为贤了。

俗语有所本

【原文】 俗语谓钱一贯有畸曰千一、千二，米一石有畸曰石一、石二，长

一丈有畸曰丈一、丈二之类。按《考工记》：“殳长寻有四尺。”注云：“八尺曰寻，殳长丈二。”《史记·张仪传》：“尺一之檄。”汉淮南王安书云：丈一之组。《匈奴传》：尺一牍。《后汉》：尺一诏书。唐，城南去天尺五之类，然则亦有所本云。

【译文】 俗语叫一贯多钱叫“千一”、“千二”，米一石多些叫“石一”、“石二”，长一丈多些叫“丈一”、“丈二”之类。按：《考工记》：“殳（兵器）长寻（八尺）又四尺”。注说：“八尺叫寻，殳长丈二”。《史记·张仪传》：“尺一的檄文”。汉淮南王刘安的书（《淮南子》）说：“丈一的组（绶带）”。《匈奴传》说：“尺一的书牍”。《后汉书》说：“尺一的诏书”。唐朝俗语有“城有（韦杜），离开天只有一尺五”之类，这样说也有所根据。

鄱阳学

【原文】 鄱阳学在城外东湖之北，相传以为范文正公作郡守时所创。予考国史，范公以景盥三年乙亥岁四月知饶州，四年十二月，诏自今须藩镇乃得立学，他州勿听。是月，范公移润州。《余襄公集》有《饶州新建州学记》，实起于庆历五年乙酉岁，其郡守曰都官员外郎张君，其略云：“先是郡先圣祠宫栋宇皴剥，前守亦尝相土，而未遑締治，于是即其基于东湖之北偏而经营之。”浮梁人金君卿郎中作《郡学庄田记》云：“庆历四年春，诏郡国立学，时守都官副郎张侯谭始营之，明年学成。”与余公记合。范公在饶时，延君卿置馆舍，使公有意建学，记中岂无一言及之？盖是时公既为执政，去郡十年矣。所谓前守相土者不知为何人？

【译文】 鄱阳学馆在城外东湖的北面，相传是文正公范仲淹任郡守期间所创建的。我考察国史，范公在仁宗景盥三年乙亥岁四月任饶州太守，四年十二月，诏书规定必须是藩镇才可以建立学馆，别的州不许建。当月，范公改任润州知州。《余襄公集》有《饶州新建州学记》，称实为仁宗庆历五年乙酉岁建立，郡守是都官员外郎张君，其中大略说：“起初郡城里先圣祠宫房屋毁坏，前郡守也曾察看过地形地势，只是还没有来得及修建。于是张君就用祠宫旧基，在东湖北边建起学馆。”浮梁县人金君卿郎中所作的《郡学庄田记》说：“庆历四年春天，朝廷下诏书命令郡国建立学馆，当时郡守都官副郎张谭筹建，第二年学馆建成。”与余公所记相同。范仲淹在饶州时，请金君卿建立馆舍，如果范公有意建立学馆，记中难道会只字不提吗？况且此时范公已入朝掌管朝政，离开饶

州十年了。所记前太守曾察看地形地势，不知道是什么人？

国忌休务

【原文】 《刑统》载唐大和七年敕：“准令，国忌日唯禁饮酒举乐，至于科罚人吏，都无明文。但缘其日不合隄务，官曹即不得决断刑狱，其小小笞责，在礼律固无所妨，起今以后，纵有此类，台府更不要举奏。”《旧唐书》载此事，因御史台奏均王傅王堪男国忌日于私第科决作人，故降此诏。盖唐世国忌休务，正与私忌义等，故虽刑狱亦不决断，谓之不合厘务者此也。今在京百官，唯双忌作假，以其拜跪多，又昼漏已数刻，若单忌独三省归休耳，百司坐曹决狱与常日亡异，视古谊为不同。元微之诗云：“缚遣推囚名御史，狼藉囚徒满田地，明日不推缘国忌。”又可证也。

【译文】 《刑统》记载唐代大和七年敕令说：“根据法令，国家忌日只禁止喝酒奏乐，至于责罚百姓和吏员，都没有明文规定。但因为这日子不应处理事务，官府就不可以判决刑事案狱，至于小小的责打，在礼和法律上自然并无妨害，从今以后，即使有这些事，御史台再不要劾奏报告。”《旧唐书》记这件事，是因为御史台奏称均王师傅王堪的儿子在国忌的日子在私人宅里处罚人，所以降下这诏书。因为唐朝时国家忌日是停止办事务，正和私人忌日的意思一样，所以虽有刑狱也不加判决，说是不应处理事务的就是指这些。现在在京城百官，只有双忌日放假，因为它拜跪的事多，又记铜壶滴漏已到好几刻。如果单忌日只有尚书中书门下三省休息而已，百官和平常一样在署中判案，和古代制度不同。元稹诗说：“待遣推囚名御史，狼藉囚徒满田地，明日不推缘国忌（将要去推问囚徒因为是御史，许多囚徒乱糟糟地在面前等着，明天不能推问因为是国家的忌日）。”又可以作证。

汉昭顺二帝

【原文】 汉昭帝年十四，能察霍光之忠，知燕王上书之诈，诛桑弘羊、上官桀，后世称其明。然和帝时，窦宪兄弟专权，太后临朝，共图杀害。帝阴知其谋，而与内外臣僚莫由亲接，独知中常侍郑众不事豪党，遂与定义诛宪，明亦年十四，其刚决不下昭帝，但《范史》发明不出，故后世无称焉。顺帝时，梁

商为大将军辅政，商以小黄门曹节用事于中，遣子冀与交友，而宦官忌其宠，反欲害之。中常侍张逵、蘧政、杨定等，与左右连谋，共譖商及中常侍曹腾、孟贲，云欲议废立，请收商等按罪。帝曰：“大将军父子我所亲，腾、贲我所爱，必无是，但汝曹共妒之耳。”逵等知言不用，遂出矫诏收缚腾、贲。帝震怒，收逵等杀之，此事尤与昭帝相类。霍光忠于国，而为子禹覆其宗，梁商忠于国，而为子冀覆其宗，又相似。但顺帝复以政付冀，其明非昭帝比，故不为人所称。

【译文】 汉昭帝十四岁，就能够察知霍光的忠诚，知道燕王上书的欺诈，诛杀桑弘羊、上官桀，后代称赞他英明果断。然而汉和帝时，窦宪兄弟专权，太后垂帘听政，他们共谋杀害皇帝。和帝暗中了解到他们的阴谋，但和内外大臣不能接近，只知道中常侍郑众不巴结豪门奸党，于是与郑众定计，准备杀掉窦宪，当时也是十四岁，刚烈决断不在昭帝之下。但范晔《后汉书》没有指出这一点，所以后代没有人称赞和帝。汉顺帝时，梁商以大将军的身份辅佐政事，他看到小黄门曹节侍候皇帝，很受宠信，于是就派儿子梁冀和他交朋友，但太监们忌妒他们得到皇帝恩宠，反而想害他们。中常侍张逵、蘧政、杨定等，与皇帝左右的人共同策划诬蔑梁商及中常侍曹腾、孟贲，说他们想另立皇帝，要求逮捕梁商等治罪。顺帝说：“大将军父子是我所亲近的，曹腾、孟贲是我所喜欢的，他们必定不会有这种事，只不过是你们忌妒他们罢了。”张逵等知道顺帝不听他们的话，就假托皇帝的诏命逮捕曹腾、孟贲。顺帝大怒，马上把张逵等抓起来处死。此事尤其与昭帝相似。霍光忠于国家，却因为儿子霍禹的罪恶被灭了族，梁商忠于国家，却因为儿子梁冀的罪恶被灭了族，这事又极为相似。但顺帝之后又把政事交付给梁冀，表明他的英明不能和昭帝相比，所以不被后人称道。

三女后之贤

【原文】 王莽女为汉平帝后，自刘氏之废，常称疾不朝会。莽敬惮伤哀，欲嫁之，后不肯，及莽败，后曰：“何面目以见汉家。”自投火中而死。杨坚女为周宣帝后，知其父有异图，意颇不平，形于言色，及禅位，愤惋愈甚。坚内甚愧之，欲夺其志，后誓不许，乃止。李暉女为吴太子璉妃，暉既篡吴，封为永兴公主，妃闻人呼公主，则流涕而辞。三女之事略同，可畏而仰，彼为其父者，安所置愧乎？

【译文】 王莽的女儿做汉平帝的皇后，从刘氏被废之后，她常常称病不参

加朝见，王莽敬重忌惮而且悲伤，想让她改嫁，皇后不肯，到王莽失败，皇后说：“还有什么面目见汉朝的人。”自己投向火中而死。杨坚的女儿做周宣帝的皇后，她知道她父亲有篡位的意图，心里很不平，在脸色上表现出来，到周静帝禅位给杨坚时，她愤怒怨恨得更厉害。杨坚内心对她很惭愧，想改变她的志节，皇后誓死不答应，才作罢。李盘的女儿做吴王太子杨琁的妃子，李盘既篡了吴国，封她为永兴公主，妃子听到人们叫她公主，就流泪推辞。三个女子的事情大致相同，可敬畏而且仰慕，那些做她们父亲的，该怎样地惭愧呢？

贤父兄子弟

【原文】 宋谢晦为右卫将军，权遇已重，自彭城还都迎家，宾客辐凑。兄瞻惊骇曰：“汝名位未多，而人归趣乃尔，此岂门户之福邪？”乃以篱隔门庭，曰：“吾不忍见此。”又言于宋公裕，特乞降黜，以保衰门。及晦立佐命功，瞻意忧惧，遇病，不疗而卒。晦果覆其宗。颜竣于孝武有功贵重，其父延之，常语之曰：“吾平生不喜见要人，今不幸见汝。”尝早诣竣，见宾客盈门，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粪土之中，升云霞之上，遽骄傲如此，其能久乎？”竣竟为孝武所诛。延之、瞻可谓贤父兄矣。

隋高骘拜为仆射，其母戒之曰：“汝富贵已极，但有一斫头尔！”骘由是常恐祸变，及罢免为民，欢然无恨色，后亦不免为炀帝所诛。唐潘孟阳为侍郎，年未四十，母曰：“以尔之材，而位丞郎，使吾忧之。”严武卒，母哭曰：“而今而后，吾知免为官婢。”三者可谓贤母矣。

褚渊助萧道成篡宋为齐，渊从弟暕谓渊子贲曰：“不知汝家司空将一家物与一家，亦复何谓？”及渊为司徒，暕叹曰：“门户不幸，乃复有今日之拜。”渊卒，世子贲耻其父失节，服除遂不仕，以爵与其弟，屏居终身。齐王晏助明帝夺国，从弟思远曰：“兄将来何以自立？若及此引决，犹可保全门户。”及拜骠骑将军，集会子弟，谓思远兄思微曰：“隆昌之末，阿戎劝吾自裁，若从其语，岂有今日？”思远曰：“如阿戎所见，今犹未晚也。”晏叹曰：“世乃有劝人死者！”晏果为明帝所诛。暕、贲、思远，可谓贤子弟矣。

【译文】 南朝宋谢晦任右卫将军，权势很大，从彭城（今江苏徐州）回京接家眷，宾客车马拥挤。他的哥哥谢瞻惊骇地说：“你名声地位都不高，众人就如此巴结，这哪里是家门的福份呢？”于是就用篱笆隔开庭院，说：“我不愿看到这种情况。”又请求宋公刘裕对自己降级或免职，以便保住即将衰落的家门。

等到谢晦立了拥立新君的大功，谢瞻又忧又怕，得了病，坚决不去治疗，不久死去。谢晦后来果然被灭族。颜竣为宋孝武帝立了大功，官位很高，他父亲颜延之常对他说：“我平生不喜欢见到有权势的人，现在却不幸见到了你。”有一天早上去看颜竣，见宾客满门，可颜竣还没有起床，颜延之大为恼火，说：“你出身于粪土之中，却升到云霞之上，现在竟如此骄傲，难道能长久吗？”颜竣终于被孝武帝杀死。颜延之、谢瞻可谓是贤明的父兄了。

隋高璠被封为仆射，他母亲告诫说：“你富贵已达到顶点，只有等一个砍头罢了。”高璠因此常怕有祸变发生，等到罢官为民，欣喜异常，丝毫没有怨恨的颜色，但后来也不免被隋炀帝杀害。唐朝潘孟阳任侍郎时，还不到四十岁，他母亲说：“以你的才能，竟当了丞郎，这实在使我担惊受怕。”严武去世，他母亲哭道：“从今以后，我知道不会当官家的奴婢了。”这三位可算是贤明的母亲了。

褚渊帮助萧道成篡夺皇位，建立齐国，褚渊的堂弟褚璉对褚渊的儿子褚贲说：“我不知道你家司空把一家的东西送给另一家，是什么意思？”等到褚渊当了司徒，褚璉叹息说：“家门不幸，竟又有今天的升官。”褚渊死后，儿子褚贲以父亲失节为耻辱，服丧期满，不再作官，把爵位让给弟弟，自己终身隐居。王晏帮助齐明帝夺取了帝位，堂弟王思远说：“兄将来怎么立身？如果能现在就自杀，还可以保住门户。”王晏被委任为骠骑将军后，又召集子弟对王思远的哥哥王思微说：“隆昌元年（494年）底，思远弟劝我自杀，如果听了他的话，哪里会有今天？”王思远说：“依我所见，今天还不晚。”王晏叹息说：“世界上竟有劝人自杀的。”王晏后来果然被齐明帝杀死。褚璉、褚贲、王思远可谓是贤明的子弟了。

蔡君谟帖

【原文】 蔡君谟一帖云：“襄昔之为谏臣，与今之为词臣，一也，为谏臣有言责，世人自见疏，今无是焉，世人见亲，襄之于人，未始异之，而人之观故有以异也。”观此帖，乃知昔时居台谏者，为人所疏如此。今则反是，方为此官时，其门挥汗成雨，一徙他局，可张爵罗，风俗偷薄甚矣。又有送荔枝与昭文相公一帖云：“襄再拜，宿来伏惟台候起居万福。闽中荔枝，唯陈家紫号为第一，辄献左右，以伸野芹之诚，幸赐收纳，谨奉手状上闻不宣。襄上昭文相公阁下。”是时，侍从与宰相往还，其礼盖如是，今之不情苛礼，吁可厌哉！

【译文】 蔡君谟有一张贴说：“我蔡襄从前做谏官，和现在做文词之臣，是一样的。做谏官有说话的责任，世人自动和我疏远，现在没有这责任，世人就亲近我。我蔡襄对人，本来没有不同，而人们的看法本来有差别。”看这张贴，就知道从前在御史台和谏院做官的，被人们这样疏远。现在则相反，刚当上这官时，他的门上人多得挥汗成雨，一调任其他职务，就门上可以设网捕雀，风俗的衰薄极了。又见到他《送荔枝与昭文相公》一张贴说：“蔡襄再拜，近来私愿您起居万福。福建的荔枝，只有陈家紫号称第一，擅自献给您，来表示乡下人献芹菜的诚心，请赐收下，谨奉上手状不尽其意。蔡襄上昭文相公阁下。”这时侍从之臣和宰相来往，其礼节是这样，现在不近人情的苛刻礼节，唉，真可讨厌！

亲王与侍从官往还

【原文】 神宗有御笔一纸，乃为颖王时封还李受门状者，状云：“右谏议大夫、天章阁待制兼侍讲李受起居皇子大王。”而其外封，题曰：“台衔回纳。”下云：“皇子忠武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上柱国颖王名谨封。”名乃亲书。其后受之子覆以黄，缴进，故藏于显谟阁。先公得之于燕，始知国朝故事，亲王与从官往还公礼如此。

【译文】 宋神宗有一道御礼，是为颖王时封还李受的门状，门状上说：“右谏议大夫天章阁待制兼侍讲李受起居皇子大王。”而在其外封皮上题道：“台衔回纳。”下款说：“皇子忠武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上柱国颖王名谨封。”名字是颖王亲笔书写。后来李受的儿子用黄布盖上，进呈给皇帝，所以收藏于显谟阁。我的已故父亲从燕都得到，才知本朝旧事，了解到亲王与侍从官往来的礼节就是这样。

张嘉贞

【原文】 唐张嘉贞为并州长史、天兵军使，明皇欲相之，而忘其名，诏中书侍郎韦抗曰：“朕尝记其风操，今为北方大将，张姓而复名，卿为我思之。”抗曰：“非张齐丘乎？今为朔方节度使。”帝即使作诏以为相，夜阅大臣表疏，得嘉贞所献，遂相之。议者谓明皇欲大用人，而卤莽若是，非得嘉贞表疏，则误

相齐丘矣。予考其事大为不然。按开元八年，嘉贞为相，而齐丘以天宝八载始为朔方节度，相去三十年，安得如上所云者？又是时明皇临御未久，方厉精为治，不应置相而不审其名位，盖郑处诲所著《明皇杂录》妄载其事，史家误采之也。《资治通鉴》弃不取云。

【译文】 唐代张嘉贞任并州长史、天兵军使，唐明皇想叫他做宰相，而忘了他的名字，下诏叫中书侍郎韦抗说：“我曾记得他的风度操行，现在做北方的大将，姓张而名字是双名，你给我想想。”韦抗说：“不是张齐丘吗？现在任朔方节度使。”皇帝就叫写诏书用他做宰相，夜间阅读大臣们奏疏，得到张嘉贞所献章表，就任他为相。议论的人说唐明皇要重用人，而这样卤莽，如果不得到张嘉贞的表疏，则错任张齐丘为宰相了。我考证这事大大地不是这样。按开元八年（720年），张嘉贞做宰相，而张齐丘以天宝八载（749年）刚做朔方节度使，相去三十年，怎么会有像上面所说的事？又这时唐明皇统治天下还不久，正在励精图治，不该设置宰相而连他的名字和官位都弄不清。这是郑知诲著《明皇杂录》胡乱记下这事，史家们错误地采取了它，《资治通鉴》舍弃没有采取它。

张九龄作牛公碑

【原文】 张九龄为相，明皇欲以凉州都督牛仙客为尚书，执不可，曰：“仙客，河湟一使典耳，擢自胥史，目不知书，陛下必用仙客，臣实耻之。”帝不悦，因是遂罢相。观九龄集中，有《赠涇州刺史牛公碑》，盖仙客之父，誉之甚至，云：“福善莫大于有后，仙客为国之良，用商君耕战之国，修充国羌胡之具，出言可复，所计而然，边捍长城，主恩前席。”正称其在凉州时，与所谏止尚书事，亦才一年，然则与仙客非有夙嫌，特为公家忠计耳。

【译文】 张九龄任丞相，唐明皇想任命凉州都督牛仙客为尚书，张九龄坚决不同意，说：“牛仙客只是河湟地区的一个使典罢了，从小吏提拔上来，又目不识丁，陛下一定要用牛仙客为尚书，我实在感到耻辱。”唐明皇不高兴，因此就免去了张九龄的宰相职务。我看到张九龄的文集中有《赠刺史牛公碑》，是记牛仙客的父亲，评价很高，说：“福善莫过于有好的后代，仙客是国家的贤臣，用商鞅奖励耕战的政策，充实赵充国治服胡羌的方略，言必行，行必果，谋划都能成功。捍卫长城，皇恩隆重，朝廷对他十分器重。”正是记牛仙客在凉州时的作为，距离张九龄拦阻他任尚书之时，相差才一年，可见张九龄并不是与牛仙客有旧怨，而是为国家尽忠罢了。

唐人告命

【原文】 唐人重告命，故颜鲁公自书告身，今犹有存者。韦述《集贤注记》，记一事尤著，漫载于此：“开元二十三年七月，制加皇子荣王已下官爵，令宰相及朝官工书者，就集贤院写告身以进，于是宰相张九龄、裴耀卿、李林甫，朝士萧太师嵩，李尚书暉，崔少保琳、陈黄门希烈，严中书挺之，张兵部均，韦太常陟，褚谠议庭诲等十三人，各写一通，装缥进内，上大悦，赐三相绢各三百匹，余官各二百匹。”以《唐书》考之，是时，十三王并授开府仪同三司，诏诣东宫、尚书省，上日百官集送，有司供帐设乐，悉拜王府官属，而不书此事。

【译文】 唐代人看重任命官职的文书，所以颜鲁公（颜真卿）自己写告身（任命文书），现在还有保存着的。韦述《集贤注记》，记一件事尤为明显，随意记载在这里：“开元二十三年（735年）七月，皇帝下制书加给皇子荣王以下各人官爵，命令宰相及朝廷官员中字写得好的，到集贤院写告身进呈，于是宰相张九龄、裴耀卿、李林甫，朝廷官员太师萧嵩、尚书李嵩、少保崔琳、黄门侍郎陈希烈、中书严挺之、兵部张均、太常韦陟、谏议褚庭诲等十二人，各写一通，装裱好呈进内廷，皇上大喜，赐三位宰相绢各三百匹，其余官各二百匹。”用《唐书》来考订，这时，十二个王都授开府仪同三司，下诏叫到东宫，选日子百官集会相送，有关官员提供帐幕设置音乐，都被任为王府官属，而没有记这事。

典章轻废

【原文】 典章故事，有一时废革遂不可复者。牧守铜鱼之制，新除刺史给左鱼，到州取州库右鱼合契。周显德六年，诏以特降制书，何假符契？遂废之。唐两省官上事宰臣，送上，四相共坐一榻，各据一隅，谓之押角。晋天福五年，敕废之。

【译文】 典章故事，有一旦废除就不能再恢复的。刺史、郡守发给铜鱼的制度，即新任命的刺史发给铜鱼左半边，到州以后，取出库存的铜鱼右半边验证，必须两半完全吻合才行。周世宗显德六年，颁布诏书说委任官员时已经专门下达制书，还用什么符契？于是，就把这个制度废除了。唐朝两省官员有事

上报宰相，送上以后，四个宰相，同坐在一个矮床上，各占一角，这叫押角。晋高祖天福五年，下诏废除了这种制度。

卷 四

张浮休书

【原文】 张芸叟《与石司理书》云：“顷游京师，求谒先达之门，每听欧阳文忠公、司马温公、王荆公之论，于行义文史为多，唯欧阳公多谈吏事。既久之，不免有请：‘大凡学者之见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为欲闻者，今先生多教人以吏事，所未谕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时才，异日临事，当自知之。大抵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贬官夷陵，方壮年，未厌学，欲求《史》、《汉》一观，公私无有也。无以遣日，因取架阁陈年公案，反覆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以无为有，以枉为直，违法徇情，灭亲害义，无所不有。且夷陵荒远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当时仰天誓心曰：自尔遇事不敢忽也。’是时苏明允父子亦在焉，尝闻此语。”又有答孙子发书，多论《资治通鉴》，其略云：“温公尝曰：‘吾作此书，唯王胜之尝阅之终篇，自余君子求乞欲观，读未终纸，已欠伸思睡矣。书十九年方成，中间受了人多少语言陵藉’”云云。此两事，士大夫罕言之，《浮休集》百卷，无此二篇，今豫章所刊者，附之集后。

【译文】 张云叟（张舜民）《与石司理书》说：“近来游历京城，求见前辈的家门，常听欧阳文忠公（欧阳修）、司马温公（司马光）、王荆公（王安石）的议论，对道义文章和历史说得较多，只有欧阳公多数谈官务的事，长久之后，不免要请教：‘大凡从事学问的人来见先生，无不因为想听您讲道德文章的事，现在先生多教人以办政事的话，这是我所不懂的。’欧阳公说：‘不对。你们都是一时的人才，将来出去办事，自己当然会知道。大抵文学只有益于本身，政事则可以施惠于别人。我从前被贬官到夷陵，正是壮年，还没有足够地学习，要求《史记》、《汉书》读一遍，公家和私人都没有。我没法消磨日子，因此取架阁上的陈年公事档案，反复地看，见到其中歪曲错误处理的事例多得不可胜数，把没有的事说成有，把不正直说成正直，违背法律来徇私灭去亲情伤害道义的事，没有一样不有。而夷陵是一个荒僻遥远的小地方，尚且这样，天下的情况自然可想而知了。当时向天心中自己发誓说：“从今遇到事情不敢疏忽了。”这

时苏明允（苏洵）父子也在座，曾听到这话。又有《答孙子发书》，多论《资治通鉴》，其大略说：“温公（司马光）曾经说：‘我作这部书，只有王胜之曾经读完全书，其余一些士人要求阅读，读了不满一张纸，已伸懒腰想睡觉了。这部书写了十九年刚完成，中间受了别人多少讥讽反对的话’云云”。这两件事，士大夫们很少讲起，《浮休集》（张舜民的集子）一百卷中没有这两篇，现在豫章所刻的本子，附在集子的后面。

温公客位榜

【原文】 司马温公作相日，亲书榜稿揭于客位，曰：“访及诸君，若睹朝政阙遗，庶民疾苦，欲进忠言者，请以奏牍闻于朝廷，光得与同僚商议，择可行者进呈，取旨行之。若但以私书宠谕，终无所益。若光身有过失，欲赐规正，即以通封书简分付吏人，令传入，光得内自省讼，佩服改行。至于整会官职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计，并请一面进状，光得与朝省众官公议施行。若在私第垂访，不请语及。某再拜咨白。”乾道九年，公之曾孙盱出镇广州，道过赣，获观之。

【译文】 司马光任宰相时候，亲手写了一段“座右铭”，张贴在客人坐的地方，内容：“来访诸君，如看到朝政有失误遗漏，百姓疾苦，想进忠言的，请用奏章上奏给朝廷，我和同僚们商议，选择可以施行的，进呈给皇旁，经皇帝批准后，即刻施行。如果只是把私书交给我，那么最终也不会有什么益处。如果我自己有错误，诸位乐意赐教，就用全封书信交给有关官员，让他们转呈给我，我内心深刻反省后，佩带改过。至于涉及到任用官职、平反罪名等，凡牵涉到本身的，都请送来状纸，我和朝里众大臣商议后施行。如果是到我家私访，请不要谈公事。司马光敬启。”孝宗乾道九年（1173年），司马光的曾孙司马去广州作官，路过赣州（属江西），我看到了榜文。

李颀诗

【原文】 欧阳公好称诵唐严维诗“柳塘春水慢，花坞夕阳迟”及杨衡“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之句，以为不可及。予绝喜李颀诗云：“远客坐长夜，雨声孤寺秋。请量东海水，看取浅深愁。”且作客涉远，适当穷秋，暮投孤村古

寺中，夜不能寐，起坐凄惻，而闻檐外雨声，其为一时襟抱，不言可知，而此两句十字中，尽其意态，海水喻愁，非过语也。

【译文】 欧阳公（欧阳修）喜欢称赏诵读严维诗“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柳树旁春天水涨起，花坞的夕阳落得很慢）”和杨衡诗“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种有竹子的小路通向幽静之处，和尚的房子旁花木长得茂盛）”之句，（按：杨衡，一作常建。），以为不可及。我非常喜欢李颀诗说“远客坐长夜的，雨声孤寺秋（远方的旅客在长夜中独坐，听着孤寺中的秋雨声）。请量东海水，看取浅深愁（请你量一下东海的水，就可以知道愁情的深浅）”。况且作为客人远到他乡，正当深秋之时，傍晚投宿孤独村庄的古寺中，夜间睡不着，坐起来感到凄凉伤心，而听到檐外雨声，这作为一时间的心情，不说也可知道，而这两句十个字里，写尽了心情形态，用海水来比喻愁情，并非过分的话。

诗中用茱萸字

【原文】 刘梦得云：“诗中用茱萸字者凡三人。杜甫云‘醉把茱萸子细看’，王维云‘插遍茱萸少一人’，朱放云‘学他年少插茱萸’，三君所用，杜公为优。”予观唐人七言，用此者又十余家，漫录于后。王昌龄“茱萸插鬓花宜寿”，戴叔伦“插鬓茱萸来未尽”，卢纶“茱萸一朵映华簪”，权德舆“酒泛茱萸晚易曛”，白居易“舞鬟摆落茱萸房”，“茱萸色浅未经霜”，杨衡“强插茱萸随众人”，张谔“茱萸凡作几年新”，耿湋“发稀那敢插茱萸”，刘商“邮筒不解献茱萸”，崔櫓“茱萸冷吹溪口香”，周贺“茱萸城里一尊前”，比之杜句，真不侔矣。

【译文】 刘梦得说：“诗里使用茱萸一词的，共有三人。杜甫说：‘醉把茱萸子细看’，王维说：‘遍插茱萸少一人’，朱放说：‘学他年少插茱萸’，三位的写法，以杜甫的为最好。”我看唐人七言诗，用茱萸一词的，还有十多家，随便摘录如下：王昌龄“茱萸插鬓花宜寿”，戴叔伦“插鬓茱萸来未尽”，卢纶“茱萸一朵映华簪”，权德舆“酒泛茱萸晚易曛”，白居易“舞鬟摆落茱萸房”，“茱萸色浅未经霜”，杨衡“强插茱萸随众人”，张谔“茱萸凡作几年新”，耿湋“发稀那敢插茱萸”，刘商“邮筒不解献茱萸”，崔櫓“茱萸冷吹溪口香”，周贺“茱萸城里一尊前”，比起杜甫的诗句，的确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鬼宿渡河

【原文】 宋苍梧王当七夕夜，令杨玉夫伺织女渡河，曰：“见，当报我；不见，当杀汝。”钱希白《洞微志》载：“苏德哥为徐肇祀其先人，曰：‘当夜半可已。’盖俟鬼宿渡河之后。”翟公巽作《祭仪》十卷，云：“或祭于昏，或祭于旦，皆非是，当以鬼宿渡河为候，而鬼宿渡河，常在中夜，必使人仰占以俟之。”叶少蕴云：“公巽博学多闻，援证皆有据，不肯碌碌同众，所见必过人。”予按天上经星终古不动，鬼宿随天西行，春昏见于南，夏晨见于东，秋夜半见于东，冬昏见于东，安有所谓渡河及常在中夜之理？织女昏晨与鬼宿正相反，其理则同。苍梧王荒悖小儿，不足笑，钱、翟、叶三公皆名儒硕学，亦不深考如此。杜诗云：“牛女漫愁思，秋期犹渡河”，“牛女年年渡，保曾风浪生？”梁刘孝仪诗云：“欲待黄昏至，含娇浅渡河。”唐人七夕诗皆有此说，此自是牵俗遣词之过，故杜老又有诗云：“牵牛出河西，织女处其东。万古永相望，七夕谁见同。神光竟难候，此事终蒙胧。”盖自洞晓其实，非他人比也。

【译文】 南朝宋苍梧王（俊废帝刘昱）当七月七日夜，叫杨玉夫监看天上织女星渡银河，说：“见到了报告我；不见，要杀你。”钱希白（钱易）《洞微志》记载：“苏德哥为徐肇祭他的祖先说：‘当夜半可以举行了’。是以为等鬼宿（星名）渡过天河之后。”翟公巽作《祭仪》十卷，说：“有人黄昏举行祭礼，有人早上举行，都不对，应当用鬼宿渡河时为准，而鬼宿渡河，常在半夜，一定要叫人抬头仰望来等候。”叶少蕴（叶梦得）说：“翟公巽博兴知道得多，引证都有根据，不肯随便跟着众人，所主张的一定超过别人。”我按天上经常可见的星从古不动，鬼宿随着天的运转向两移动，春天黄昏见于南方，夏天早晨见于东方，秋天夜半见于东方，冬天黄昏见于东方，哪有所谓渡河及常在夜半的道理？织女星的位置早上和黄昏跟宿鬼正相反，其理由则相同。苍梧王是一个荒唐悖谬的小孩，不值一笑，钱、翟、叶三公都是有各的儒者学问很大，也不深加考察到这样。杜甫诗说：“牛女温愁思，秋期犹渡河”（牛郎织女随意发愁，到秋天的日期还能渡河相会）：“牛女年年渡，何曾风浪生”（牛郎织女年年渡天河，何曾超过风浪）？梁刘孝仪的诗说：“欲待黄昏至，含娇浅渡河”（织女想等黄昏到来，含着娇羞从浅处渡过天河。唐代人关于七夕的诗都有这说法，这自然是附会世俗的说法来写作文词的过失。所以杜老又有诗说：“牵牛出河西，织女处其东，万古永相望，七夕谁见同。神光竟难候，此事终蒙胧”（牵牛星在银

河之西，织女是在它东边，万古以来永远相望，七夕时谁见它们会合一起？织女渡河的神光难于等候，这事情终于蒙胧不明）。这是杜甫明知其事实，不是他人们可比拟的。

府名军额

【原文】 雍州，军额曰永兴，府曰京兆，而守臣以“知永兴军府事兼京兆府路安抚使”结衔。镇州，军额曰成德，府曰真定，而守臣以“知成德军府事兼真定府路安抚使”结衔。政和中，始正以府额为称。荆州，军额曰荆南，府曰江陵，而守臣则曰“知荆南”，通判曰“通判荆南”，自余掾幕县官则曰“江陵府”，淳熙四年，始尽以“江陵”为称。孟州，军额曰河阳三城，无府额，而守臣曰“知河阳军州事”。陕州无府额，而守臣曰“知陕州军府事”，法令行移，亦曰“陕府”。

【译文】 雍州（今陕西西安市西北），军名为永兴，府名为京兆，镇守该地的长官以“知永兴军府事兼京兆府路安抚使”为头衔。镇州（今河北正定），军名为成德，府名为真定，而镇守该地的长官以“知成德军府事兼真定府路安抚使”为头衔，徽宗政和年间，才正式规定以府名为官称。荆州（今湖北江陵），军名为荆南，府名为江陵，而镇守该地的长官就称为“知荆南”，通判称为“通判荆南”，其余的掾属幕僚县官则称为“江陵府”。孝宗淳熙四年（1177年），才都以“江陵”为官名。孟州（今河南孟县），军名为河阳三城，没有府名，镇守该地的长官称为“知河阳军州事”。陕州（今河南陕县）无府名，而镇守该地的长官被称为“知陕州军府事”，法令行文，也称为“陕府”。

马融皇甫规

【原文】 汉顺帝时，西羌叛，遣征西将军马贤将十万人讨之。武都太守马融上疏曰：“贤处处留滞，必有溃叛之变。臣愿请贤所不用关东兵五千，裁假部队之号，尽力率厉，三旬之中必克破之。”不从。贤果与羌战败，父子皆没，羌遂寇三辅，烧园陵。诏武都太守赵冲督河西四郡兵追击。安定上计掾皇甫规上疏曰：“臣比年以来，数陈便宜：羌戎未动，策其将反；马贤始出，知其必败。愿假臣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与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晓习，可

不烦方寸之印，尺帛之赐，可以涤患。”帝不能用。赵冲击羌不利，羌寇充斥，凉部震恐，冲战死，累年然后定。按马融、皇甫规之言晓然易见，而所请兵皆不过五千，然讫不肯从，乃知宣帝纳用赵充国之册为不易得，所谓明主可为忠言也。

【译文】 汉顺帝时，西羌叛乱，朝廷派征西将军马贤率领十万人讨伐他们。武都太守马融上疏说：“马贤处处停滞不进，必然有溃退叛变的事情，臣愿请求派马贤所不用的关东兵五千，适当考虑给予部队的名号，尽力率领并鼓励士兵，三十天内一定能破败敌人。”朝廷不听从。马贤和羌人作战失败，父子都战死，羌人就侵扰三辅，焚烧西汉帝王陵园。朝廷下诏叫武都太守赵冲督率河西四郡兵去追击。安定郡到京呈上年案收支帐目的掾属皇甫规上疏说：“臣近年以来，多次陈奏有利于对付羌人的策略；羌人还未发动叛乱，就料到他们将会反叛；马贤刚出发，就知道他必然战败。请让臣率领在屯驻吃粮的兵五千，出于羌人意料之外，和赵冲一起相首尾呼应。当地的地势和山谷险要之地，臣所熟悉，可以不必烦动公文印章和一尺帛的赏赐，即可扫除忧患。”皇帝不能采用其计。赵冲攻击羌人不利，羌人寇乱到处纷起，凉州一带都很恐慌，赵冲战死，经过几年然后平定。按：马融、皇甫规的话很清楚易知，而所请求的兵不过五千人，但朝廷最终不肯听，所以知道宣帝采用赵充国的策略是不易得的，所谓贤明的君主前可以进忠言。

孟蜀避唐讳

【原文】 蜀本石《九经》皆孟昶时所刻，其书“渊、世民”三字皆缺画，盖为唐高祖、太宗讳也。昶父知祥，尝为庄宗、明宗臣，然于“存勖、嗣源”字乃不讳。前蜀王氏已称帝，而其所立龙兴寺碑，言及唐诸帝，亦皆半阙，乃知唐之泽远矣。

【译文】 蜀本石刻《九经》都是后蜀孟昶在位期间刻的，经中凡是遇到“渊、世民”三字都缺画，这是为唐高祖、唐太宗避名讳呀！孟昶的父亲孟知祥，曾为后唐庄宗和明宗的大臣，然而对于“存勖、嗣源”等字却不避讳。前蜀王氏已经称皇帝了，然而他们立的龙兴寺碑，说到唐朝诸皇帝的名字，也都半缺，由此可知唐朝的恩泽影响真是太深远了。

翰苑亲近

【原文】 白乐天《渭村退居寄钱翰林》诗，叙翰苑之亲近云：“晓从朝兴庆，春陪宴柏梁。分庭皆命妇，对院即储皇。贵主冠浮动，亲王辔闹装。金钿相照耀，朱紫间荧煌。睚眦桃花骑，歌巡竹叶觞。注银中贵带，昂黛内人妆。赐褙东城下，颁馔曲水傍。樽罍分圣酒，妓乐借仙倡。”盖唐世宫禁与外廷不至相隔绝，故杜子美诗：“户外昭容紫袖垂，双瞻御座引朝仪。”又云：“舍人退食收封事，宫女开函近御筵。”而学士独称内相，至于与命妇分庭，见贵主冠服、内人黛妆，假仙倡以佐酒，他司无比也。

【译文】 白乐天（白居易）《渭村退居寄钱翰林》诗，叙述翰林院的接近皇帝说：“晓从朝兴庆，春陪宴柏梁。分庭皆命妇，对院即储皇。贵主冠浮动，亲王辔闹装。金钿相照耀，朱紫间紫煌。整族桃花骑，歌巡竹叶觞。注银中贵带，昂黛内人妆。赐褙东城下，颁馔曲水傍，尊罍分圣酒，妓乐借仙倡。”这是因为唐朝时宫禁和外朝不至于互相隔绝不通。所以杜子美（杜甫）诗说“户外昭容紫袖垂，双瞻御座引朝仪（门外的昭容紫色衣袖下垂着，双双地望见皇帝的宝座引进着朝臣入见的仪式）。”又说：“舍人退食收封事，宫女开函近御筵（舍人们退朝收进了郡臣封缄的奏疏，宫女们打开封函走近皇帝的几案）。”而翰林学士单被称为“内相”（宫内的宰相），以至可以和命妇们分庭而立，目见贵公主的冠饰衣服，宫中妇女画眉妆点，还可借用宫中使乐来陪着喝酒，其他官衙是无法比的。

宁馨、阿堵

【原文】 “宁馨”、“阿堵”，晋宋间人语助耳。后人但见王衍指钱云：“举阿堵物却。”又山涛见衍曰：“何物老媪生宁馨儿？”今遂以阿堵为钱，宁馨儿为佳儿，殊不然也。前辈诗“语言少味无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又“家无阿堵物，门有宁馨儿”，其意亦如此。宋废帝之母王太后疾笃，帝不往视，后怒谓侍者：“取刀来剖我腹，那得生宁馨儿！”观此，岂得为佳？顾长康画人物，不点目睛，曰：“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犹言“此处”也。刘真长讥殷渊源曰：“田舍儿，强学人作尔馨语。”又谓桓温曰：“使君，如馨地宁可斗战求胜？”王导与

何充语曰：“正自尔馨。”王恬拔王胡之手曰：“冷如鬼手馨，强来捉人臂。”至今吴中人语言尚多用宁馨字为问，犹言“若何”也。刘梦得诗：“为问中华学道者，几人雄猛得宁馨。”盖得其义。以宁字作平声读。

【译文】 “宁馨”、“阿堵”是晋、宋时期的语气助词。后代人只看到王衍指着钱说：“搬掉阿堵物。”又看到山涛见王衍时说：“什么老太婆生了个宁馨儿？”于是把阿堵当成钱，把宁馨儿当成佳儿，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前代人诗说：“语言少味无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又说：“家无阿堵物，门有宁馨儿”，意思也是这样。宋废帝的母亲王太后病重，废帝不去看问，王太后怒气冲天地对侍者说：“拿刀来剖开我的肚子，看看我怎么生了这么个宁馨儿！”根据这句话，怎么能说宁馨儿是佳儿呢？顾长康（恺之）画人物，不点眼珠。他说：“写真传神全在阿堵中。”阿堵，就如同说“此处”啊！刘真长（惔）讽刺殷渊源（浩）说：“庄稼汉，也强学别人作尔馨语。”又对桓温说：“使君，如馨地怎么能用武力求取胜利呢？”王导对何充说：“正自尔馨。”王恬拔开王胡的手说：“冷似鬼手馨，强来捉人臂。”到现在吴地的语言还多用宁馨二字发问，犹如说“若何”。刘梦得（禹锡）的诗说：“为问中华学道者，几人雄猛得宁馨。”这是正确的用法。他把宁字当平声读。

凤毛

【原文】 宋孝武嗟赏谢凤之子超宗曰：“殊有凤毛。”今人以子为凤毛，多谓出此。按《世说》，王劭风姿似其父导，桓温曰：“大奴固自有凤毛。”其事在前，与此不同。

【译文】 南朝宋孝武帝叹赏谢凤的儿子谢超宗说：“殊有凤毛”（很有父亲的遗风）。现在人以为儿子叫“凤毛”，多说出处在这里。按：《世说新语》：王劭的风度姿态像他的父亲王导，桓温说：“大奴（王劭）固然自有‘凤毛’（父风）。”这事在谢超宗之前，与前面解释不同。

牛米

【原文】 燕慕容皝以牛假贫民，使佃苑中，税其什之八；自有牛者，税其七。参军封裕谏，以为魏、晋之世，假官田牛者不过税其什六，自有牛者中分

之，不取其七八也。予观今吾乡之俗，募人耕田，十取其五，而用主牛者，取其六，谓之牛米，盖晋法也。

【译文】 十六国时期，前燕国王慕容𡇗把牛借给贫苦农民，让他们租种王室苑囿中的土地，然后收取总产量十分之八的重税；自己有牛的，收十分之七。参军封裕劝阻，认为魏、晋时期，租种官田和使用官牛的，收租不过十分之六，自己有牛的，双方各得一半，没有收十分之七或十分之八的。现在我故乡的习惯是：用佃户耕田，收租十分之五，使用主家耕牛的，收租十分之六，其中多收的那一成叫做“牛米”，这大约是晋朝的旧制。

为文矜夸过实

【原文】 文士为文，有矜夸过实，虽韩文公不能免。如《石鼓歌》极道宣王之事伟矣，至云：“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陋儒编诗不收拾，二雅褊迫无委蛇。”是谓三百篇皆如星宿，独此诗如日月也。“二雅褊迫”之语，尤非所宜言。今世所传石鼓之词尚在，岂能出《吉日》、《车攻》之右？安知非经圣人所删乎？

【译文】 文人做文章，有称赞夸耀超过事实的，虽韩文公（韩愈）也不能避免。像《石鼓歌》竭力称道周宣王的事很壮伟了，至于说“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陋儒编诗不收拾，《二雅》褊迫无委蛇。”这是说三百篇都像星星，独有这诗（《石鼓文》）像日月。“《二雅》气度狭促”的话，更不是他应当说的。现在所传《石鼓文》的文词还在，岂能《吉日》、《车攻》更高？又怎能知道它不是出于圣人所制定的？

送孟东野序

【原文】 韩文公《送孟东野序》云：“物不得其平则鸣。”然其文云：“在唐、虞时，咎陶、禹其善鸣者，而假之以鸣。夔假于《韶》以鸣，伊尹鸣殷，周公鸣周。”又云：“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然则非所谓不得其平也。

【译文】 韩愈的《送孟东野序》说：“事物不平则鸣。”然而他在文中却说：“在唐尧、虞舜时代，皋陶和禹是最善于鸣叫的，所以君主就借助他们鸣叫。舜的大臣夔借助《韶乐》鸣叫，殷朝凭借伊尹鸣叫，周朝凭借周公鸣叫。”又说：

“上天将和其声，而让他们高歌国家的昌盛。”那么从这些例证看，鸣叫并不一定是在遇到不公平之时啊！

喷嚏

【原文】 今人喷嚏不止者，必褻唾祝云“有人说我”，妇人尤甚。予按《终风》诗：“寤言不寐，愿言则嚏。”郑氏笺云：“我其忧悼而不能寐，女思我心如是，我则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遗语也。”乃知此风自古以来有之。

【译文】 现在打喷嚏不停的人，必定会吐口水说：“有人说我”，妇女尤其多。我按《诗经·终风》：“寤言不寐，愿言则嚏”（躺下不能入睡，但愿有人提起我使我打喷嚏）。郑玄《笺》说：“我因为忧伤而不能入睡，你想到我的心这样，我就打喷嚏，说‘有人讲到我’这是古代留下的说法。”这就知道这风俗从古以来就有。

野史不可信

【原文】 野史杂说，多有得之传闻及好事者缘饰，故类多失实，虽前辈不能免，而士大夫颇信之。姑摭真宗朝三事于左。

魏泰《东轩录》云：“真宗次澶渊，语寇莱公曰：‘虏骑未退，何人可守天雄军？’公言参知政事王钦若。退即召王于行府，谕以上意，授敕俾行。王未及有言，公遽酌大白饮之，命曰‘上马杯’，且曰：‘参政勉之，回日即为同列也。’王驰骑入魏，越十一日虏退，召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或云王公数进疑词于上前，故莱公因事出之。”于按澶渊之役乃景德元年九月，是时莱公为次相，钦若为参政；闰九月，钦若判天雄，二年四月，罢政；三年，莱公罢相，钦若复知枢密院，至天禧元年始拜相，距景德初元凡十四年。

其二事者，沈括《笔谈》云：“向文简拜右仆射，真宗谓学士李昌武曰：‘朕自即位以来，未尝除仆射，敏中应甚喜。’昌武退朝，往候之。门阑悄然。明日再对，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职。’”存中自注云：“向公拜仆射，年月未曾考于国史，因见中书记，是天禧元年八月，而是年二月王钦若亦加仆射。”予按真宗朝自敏中之前拜仆射者六人：吕端、李沆、王旦皆自宰相转，陈尧叟以罢

枢密使拜，张齐贤以故相拜，王钦若自枢密使转。及敏中转右仆射，与钦若加左仆射同日降制，是时李昌武死四年矣。昌武者，宗谔也。

其三事者，存中《笔谈》又云：“时丁晋公从真宗巡幸，礼成，诏赐辅臣玉带。时辅臣八人，行在祗候库止有七带，尚衣有带，渭之‘比玉’，价直数百万，上欲以足其数。公心欲之，而位在七人之下，度必不及己，乃谕有司：‘某自有小私带可服，候还京别赐可也。’既各受赐，而晋公一带仅如指阔，上顾近侍速易之，遂得尚衣御带。”予按景德元年，真宗巡幸西京，大中祥符元年，巡幸泰山，四年，幸河中，丁谓皆为行在三司使，未登政府。七年，幸亳州，谓始以参知政事从。时辅臣六人，王旦、向敏中为宰相，王钦若、陈尧叟为枢密使，皆在谓上，谓之下尚有枢密副使马知节，即不与此说合。且既为玉带，而又名‘比玉’，尤可笑。魏泰无足论，沈存中不应尔也。“越十一日”，一作“越七日”。

【译文】 野史杂说，很多是取材于传闻和好事之人的胡编乱造，所以叙事多数谬误失实，即使是前辈名人也不能例外，然而士大夫们却很相信它。这里姑且拈出真宗朝的三件事，列举如下：

魏泰的《东轩录》说：“真宗皇帝为了抵御亲自驾临澶渊（今河南濮阳市南），对莱国公寇准说：‘辽兵不退，谁可以固守天雄军？’寇莱公说参知政事王钦若可以。退下后寇准立刻在行营中召见王钦若，告诉他真宗的意旨，给他敕书催他马上出发。王钦若还没有来得及答话，寇莱公就赶忙斟一大杯酒让王钦若喝，名为‘上马杯’，并且说：‘请参政好自为之，回来时咱们就是同列了。’王钦若快马进入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到第十一天辽兵退去，于是朝廷便召他回朝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有人说王钦若屡次在真宗面前说寇莱公的坏话，所以寇莱公借故把他排挤出去。”我考查澶渊之战是在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九月，当时寇莱公是副宰相，王钦若是参知政事；闰九月，王钦若任判天雄军，景德二年四月，罢免参知政事；景德三年，寇莱公免相，王钦若又任枢密使，至真宗天禧元年才任宰相，距离景德元年整整十四年。

第二件事，沈括《梦溪笔谈》说：“向文简公任右仆射，真宗对学士李昌武说：‘我从登基以来，还没有任命过仆射，向敏中应当很高兴。’李昌武退朝后去看望他，见向家很寂静。第二天报告了皇帝，真宗笑着说：‘向敏中真恬淡，经得起大官。’”沈括自注说：“向君任仆射，年月未曾载于国史，因见到中书省的记录，才知是真宗天禧元年（1017年）八月，而这年二月王钦若也加仆射衔。”我考察在真宗朝，和敏中前边任仆射的有六个人：吕端、李沆、王旦都是从宰相转任的，陈尧叟因罢免枢密使转任，张齐贤因系旧宰相加封，王钦若从枢密

使转任。向敏中升任右仆射，是与王钦若封左仆射同一天颁发的制书，当时李昌武已死去四年了。李昌武就是李宗谔。

第三件事，沈括《梦溪笔谈》又说：“这时丁晋公（谓）跟随真宗出游，封泰山礼毕，诏命赐给辅弼大臣玉带。当时辅臣有八位，皇帝行宫盥候库只有七条玉带，尚衣署有一条玉带，名叫‘比玉’，价值几百万，真宗想让它凑足数目。丁晋公有心得到比玉，而自己的地位在其他七位辅臣之下，估计轮不到，于是告诉有关官员：‘我自己有小玉带可以使用，等回京后再另给我也行！’等各位辅臣都得到了玉带，丁晋公的玉带才有一指宽，真宗回头示意近臣，命令赶快给丁晋公换上，丁谓于是得到了尚衣署的御带。”我查考景德元年，真宗巡游西京（今河南洛阳市），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巡游泰山，四年到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薄州镇），丁谓都是行宫的三司使，并未进入政府。七年，真宗游亳州（今安徽亳县），丁谓才以参知政事的身份相随。当时辅弼大臣六人，王旦、向敏中是宰相，陈尧叟是枢密使，地位都在丁谓之上，丁谓下边还有枢密副使马知节，这种史实与《梦溪笔谈》的说法很不相同。况且既然是玉带，而又叫‘比玉’，尤其可笑。魏泰不值一提，沈括却不应该如此。“越十一日”，一作“越七日”。

谤书

【原文】 司马迁作《史记》，于《封禅书》中述武帝神仙、鬼灶、方士之事甚备，故王允谓之谤书。国朝景德、祥符间，治安之极，王文穆、陈文忠、陈文僖、丁晋公诸人造作天书符瑞，以为固宠容悦之计。及真宗上仙，王沂公惧貽后世讥议，故请藏天书于梓宫以灭迹。而实录之成，乃文穆监修，其载崇奉宫庙，祥云芝鹤，唯恐不详，遂为信史之累，盖与太史公谤书意异而实同也。

【译文】 司马迁作《史记》，在《封禅书》里讲述汉武帝求神仙、祠鬼神和丹灶以及方士的事很详尽，所以王允说是毁谤皇帝的书。本朝景德、大中祥符年间、政治极为太平，王文穆（王钦若）、陈文忠（陈尧叟）、陈文僖（陈彭年）、丁晋公（丁谓）等人伪造天书符谶祥瑞，以为求宠取悦的办法。到真宗死去，王沂公（王曾）怕被后代人讥笑议论，所以请求把“天书”都藏进真宗棺材里来灭迹。而实录的完成，是王钦若监修的，其中记载崇拜宫观庙宇，以及祥云芝草仙鹤的事唯恐不详，就此成为信史的累害，这和太史公（司马迁）的“谤书”用意不同而实效相同。

王文正公

【原文】 祥符以后，凡天书礼文、宫观典册、祭祀巡幸、祥瑞颂声之事，王文正公旦实为参政宰相，无一不预。官自侍郎至太保，公心知得罪于清议，而固恋患失，不能决去。及其临终，乃欲削发僧服以敛，何所补哉？魏野赠诗，所谓“西祀东封今已了，好来相伴赤松游”，可谓君子爱人以德，其箴戒之意深矣。欧阳公神道碑，悉隐而不书，盖不可书也。虽持身公清，无一可议，然特张禹、孔光、胡广之流云。

【译文】 宋真宗大中祥符以后，诸如天书礼文、宫观的典册、祭祀天地、巡幸各地、吉祥瑞符、歌功颂德等事情，文正公王旦身为宰相，都参预其事。王旦做官自侍部到太保，他自知得罪了不少士大夫，名声不太好，但却患得患失，不能断然辞职而去。到他临终前，才想剃发为僧并要求在自己死后身穿僧服入殓，这于事何补呢？隐士魏野曾有诗赠王旦说：“西祀东封今已了，好来相伴赤松游”，真可谓是君子爱人以德，其中所含的鉴戒之意也是很深远的。欧阳修先生在为王旦作神道碑文时，上述之事一点也没有写，大概是认为不能写。王旦虽然公正清廉，后人也不能议其是非，但他也只不过是像汉代的张禹、孔光、胡广之类的人罢了。

晋文公

【原文】 晋公子重耳自狄适他国凡七，卫成公、曹共公、郑文公皆不礼焉，齐桓公妻以女，宋襄公赠以马，楚成王享之，秦穆公纳之，卒以得国。卫、曹、郑皆同姓，刘、宋、秦、楚皆异姓，非所谓“岂无他人，不如同姓”也。晋文公卒未葬，秦师伐郑灭滑，无预晋事，晋先轸以为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背秦大惠，使襄公墨衰晶而伐之。虽幸胜于鄢，终启焚舟之战，两国交兵，不复修睦者数百年。先轸是年死于狄，至孙黶而诛灭，天也。

【译文】 晋国公子重耳从狄国到别国一共经七个国家，卫成公、曹共公、郑文公都不以礼节对待他；齐桓公把女儿嫁给他，宋襄公送给他马匹，楚成王宴请他，秦穆公送他回国当君主，终于得到国家。卫国、曹国、郑国都是晋国的同姓；齐国、宋国、秦国、楚国都不是同姓之国，这不像所谓“岂无他人，不

如同姓”（难道没有别的人，只是不如同姓亲近）。晋文公（即公子重耳）死了没有下葬，秦兵进攻郑国灭掉滑国，不干晋国的事。晋国的先轸以为秦国不为我国的丧事悲伤，而进攻我们同姓之国，背弃秦国的大恩，叫晋襄公穿着丧服去攻击秦兵。虽然幸而在盂地战胜，终于导致焚舟之役秦兵攻晋，两国交战，不再修好邦交达几百年。先轸这一年死于和狄人交战，到他孙子先臧而宗族诛灭，这是天意。

南夷服诸葛

【原文】 蜀刘禅时，南中诸郡叛，诸葛亮征之，孟获为夷汉所服，七战七擒，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蜀志》所载，止于一时之事。国朝淳化中，李顺乱蜀，招安使雷有终遣嘉州士人辛怡显使于南诏，至姚州，其节度使赵公美以书来迎，云：“当境有泸水，昔诸葛武侯戒曰：‘非贡献征讨，不得辄渡此水；若必欲过，须致祭，然后登舟。’今遣本部军将费金龙两条、金钱两千文并设酒脯，请先祭享而渡。”乃知南夷心服，虽千年如初。呜呼！可谓贤矣！事见怡显所作《云南录》。

【译文】 三国蜀汉后主刘禅时，南中地区各郡反叛，丞相诸葛亮率军征讨，反叛首领、为当地夷人汉人所佩服的孟获，与诸葛亮打了七仗，被擒七次，最后心悦诚服地说：“先生真是天助之威，南中之人再也不敢反叛朝廷了。”《三国志·蜀志》中所记载的，只是蜀汉时期的事。我大宋朝太宗淳化年间，李顺在蜀地反叛朝廷，招安使雷有终派遣嘉州（今四川乐山一带）士人辛怡显出使到南诏（今云南大理一带），到了姚州（今云南大姚），当地节度使赵公美捧着国书出城迎接，他对辛怡显说：“去南诏的路上有条河叫泸水，蜀汉时武侯诸葛亮先生告诫说：‘如果不是进贡或征讨，就不能渡过这条河；假若一定要过，就必须祭祀，然后才可以登舟过河。’现在，我已派本部将士带金龙二条、金钱二千文并摆上酒肉，请求先祭祀之后再渡河。”由此可见，南夷对诸葛亮心悦诚服，即使是千年之后也仍然和当初一样。唉，诸葛亮真可以称得上英明啊！此事见于辛怡显所作的《云南录》中。

二疏赞

【原文】 作议论文字，须考引事实无差忒，乃可传信后世。东坡先生作《二疏图赞》云：“孝宣中兴，以法驭人。杀盖、韩、杨，盖三良臣。先生怜之，振袂脱屣。使知区区，不足骄士。”其立意超卓如此。然以其时考之，元康三年二疏去位，后二年盖宽饶诛，又三年韩延寿诛，又三年杨惲诛。方二疏去时，三人皆亡恙。盖先生文如倾河，不复效常人寻阅质究也。

【译文】 作议论文章，必须考订所引的事实有没有错误，才可以留传下去取信于后代。东坡先生（苏轼）作《二疏图赞》说：“汉代孝宣帝中兴，用法来驾驭人才。但杀了盖宽饶、韩延寿、杨惲，是三个贤良的臣子。疏先生哀怜他们，振动衣袖脱去靴鞋。使别人知道区区这一些，并不足以骄傲地对待士人。他的立意超出别人卓越到这样。”然以此事的时间来考订，元康三年（前63年）疏广、疏受辞去官位，以后二年而盖宽饶被杀；又三年而韩延寿被杀，又三年而杨惲被杀。当二疏辞官归去时，三个人都没有受灾殃。这是因为东坡先生作文章像倾泻河水一样流畅，不再像普通人那样查究事实。

李宓伐南诏

【原文】 唐天宝中，南诏叛，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之，丧士卒六万人。杨国忠掩其败状，仍叙其战功。时募兵击南诏，人莫肯应募，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行者愁怨，所在哭声振野。至十三载，剑南留后李宓将兵七万往击南诏。南诏诱之深入，闭壁不战，宓粮尽，士卒瘴疫及饥死什七八，乃引还。蛮追击之，宓被擒，全军皆没。国忠隐其败，更以捷闻，益发兵讨之。此《通鉴》所纪。《旧唐书》云：“李宓率兵击蛮于西洱河，粮尽军旋，马足陷桥，为罽罗凤所擒。”《新唐书》亦云：“宓败死于西洱河。”予按，高适集中有《李宓南征蛮诗》一篇，序云：“天宝十一载，有诏伐西南夷，丞相杨公兼节制之寄，乃奏前云南太守李宓涉海自交趾击之，往复数万里，十二载四月，至于长安。君子是以知庙堂使能，而李公效节。予忝斯人之旧，因赋是诗。”其略曰：“肃穆庙堂上，深沉节制雄。遂令感激士，得建非常功。鼓行天海外，转战蛮夷中。长驱大浪破，急击群山空。饷道忽已远，县军垂欲穷。野食掘田鼠，晡餐

兼焚僮。收兵列亭候，拓地弥西东。泸水夜可涉，交州今始通。归来长安道，召见甘泉宫。”其所称述如此，虽诗人之言未必皆实，然当时之人所赋，其事不应虚言，则必盖归至长安，未尝败死，其年又非十三载也。味诗中掘鼠餐僮之语，则知粮尽危急，师非胜归明甚。

【译文】 唐玄宗天宝年间，南诏（今云南大理一带）反叛，剑南（今四川成都）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兵征讨，结果损失士卒达六万人之多。丞相杨国忠隐瞒战败之事，仍然给他记上战功。当时，又招募士兵攻打南诏，但人们都不愿应募，杨国忠就派御史到各道去抓人，抓到后就给他们带上枷锁送到军中，被抓的人心中积满愁怨，所到之处哭声遍野。到了天宝十三年（754年），剑南留后李宓率兵七万前去攻打南诏。南诏人诱敌深入，然后高垒不战，李宓久攻不下，军粮皆尽，士兵因得瘟疫和饿死者达十分之七八，无奈李宓只得率军返回。南诏人引兵追击，李宓被擒获，全军覆没。杨国忠隐瞒其败迹，声称取胜，传来捷报，然后征发更多的军队征讨南诏。这是《资治通鉴》中的记载。《旧唐书》中说：“李宓率军在西洱河攻击南诏人，在粮尽军回时，马足陷于桥上，被南诏首领盍罗凤擒获。”《新唐书》中也说：“李宓战败死于西洱河。”我考证，真实情况并非如此。在唐代著名诗人高适的文集中有一篇《李宓南征蛮诗》，序中说：“天宝十一年，皇帝下诏讨伐南诏，丞相杨国忠主持此事，就上奏皇帝说前云南太守李宓渡海绕道交趾（今越南河内）攻击南诏，来往数万里。十二年四月，李宓回到长安。人们也因此而知道朝廷所派之人很有才干，而李宓也确实效忠朝廷。我作为李宓的旧友，因而写下了这首诗。”他的诗是这样写的：“肃穆庙堂上，深沉节制雄。遂令感激士，得建非常功。鼓行天海外，转战蛮夷中。长驱大浪破，急击群山空。饷道忽已远，县军垂欲穷。野食掘田鼠，晡餐兼焚僮。收兵列亭候，拓地弥西东。泸水夜可涉，交州今始通。归来长安道，召见甘泉宫。”他是这样称赞李宓的，即使诗人的话不一定完全可信，但作为当时人所作的诗，这件事也不会是虚构的故事。既然这样，那么李宓大概还活着回到了长安，并没有战败而死，其年代也不是天宝十三年。品味高适诗中所说的掘鼠餐僮的话，那么我们知道当时军粮已尽，形势危急，显然李宓并非战胜而归。

浮梁陶器

【原文】 彭器资尚书文集有《送许屯田诗》，曰：“浮梁巧烧瓷，颜色比琼玖。因官射利疾，众喜君独不。父老争叹息，此事古未有。”注云：“浮梁父老

言，自来作知县不买瓷器者一人，君是也。作饶州不买者一人，今程少卿嗣宗是也。”惜乎不载许君之名。

【译文】 彭器资《尚书文集》有《送许屯田诗》，说：“浮梁巧烧瓷，颜色比琼玖。因官射利疾，众喜君独不。父老争叹息，此事古来未有。”注释说：“浮梁（今江西景德镇）的父老乡亲都说，来浮梁作知县的人，只有许君一人不买瓷器；来饶州（今江西波阳）作知州的人中，只有现在的少卿程嗣宗一人不买瓷器。”遗憾的是他没有把许君的名字记载下来。

卷 五

汉唐八相

【原文】 萧、曹、丙、魏、房、杜、姚、宋为汉、唐名相，不待诵说。然前六君子皆终于位，而姚、宋相明皇，皆不过三年。姚以二子及亲吏受贿，其罢犹有说，宋但以严禁恶钱及疾负罪而妄诉不已者，明皇用优人戏言而罢之，二公终身不复用。宋公罢相时，年才五十八，后十七年乃薨。继之者如张嘉贞、张说、源乾曜、王玕、宇文融、裴光庭、萧嵩、牛仙客，其才可睹矣。唯杜暹、李元颢为贤，亦清介龊龊自守者。释骐驎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可不惜哉！萧何且死，所推贤唯曹参；魏、丙同心辅政；房乔每议事，必曰非如晦莫能筹之；姚崇避位，荐宋公自代。唯贤知贤，宜后人之莫及也。

【译文】 萧何、曹参、丙吉、魏相、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 为汉唐名相，这不必细说。然而前六位君子终身任丞相之职，而姚崇宋 在唐明皇时任丞相，都不到三年。姚崇因为自己两个儿子及亲信小吏收贿赂被罢相，尚属事出有因。宋 仅仅因为严厉禁止劣质的钱币及嫉恨有罪而无休无止告状的人，唐明皇就根据优人的一句戏言而罢掉了他的丞相之位，姚崇、宋 两人终身再也没有被起用。宋 罢相时，年仅五十八岁，过了十七年才死去。继之为相的，如张嘉贞、张说、源乾曜、王玕、宇文融、裴光庭、萧嵩、牛仙客，他们的才能显而易见。只有杜暹、李元颢可称为圣贤，也是廉洁奉公、刚正不阿的人。放弃骏马不骑，反而急急忙忙地去找别的马，真可惜啊！萧何将死，所推荐的贤人只有曹参；魏相、丙吉同心协力，辅佐国政；房玄龄每次议论国事，必定说没有杜如晦就没有人能筹划决策；姚崇退让相位之时，推荐宋 代替自己。只有贤人才了解贤人，在这一点上后人是无法比拟的啊！

六卦有坎

【原文】 《易》《乾》、《坤》二卦之下，继之以《屯》、《蒙》、《需》、《讼》、

《师》、《比》，六者皆有坎，圣人防患备险之意深矣！

【译文】 《易经》中《乾》、《坤》二卦之下，接着是《屯》卦、《蒙》卦、《需》卦、《讼》卦、《师》卦、《比》卦，这六卦之中都有《坎卦》。坎，意味着凶险，圣人防患备险的意识可谓很强了！

晋之亡与秦隋异

【原文】 自尧、舜及今，天下裂而复合者四：周之末为七战国，秦合之；汉之末分为三国，晋合之；晋之乱分为十余国，争战三百年，隋合之；唐之后又分为八九国，本朝合之。然秦始皇一传而为胡亥，晋武帝一传而为惠帝，隋文帝一传而为炀帝，皆破亡其社稷。独本朝九传百七十年，乃不幸有靖康之祸，盖三代以下治安所无也。秦、晋、隋皆相似，然秦、隋一亡即扫地，晋之东虽曰“牛继马后”，终为守司马氏之祀，亦百有余年。盖秦、隋毒流四海，天实诛之，晋之八王擅兵，孽后盗政，皆本于惠帝昏蒙，非得罪于民，故其亡也，与秦、隋独异。

【译文】 从尧、舜至今，天下分裂而又统一的有四次：周朝末年为战国七雄，秦朝统一；汉朝末年为魏、蜀、吴三国鼎立，晋朝统一；晋朝大乱分裂为十几个小国，战争达三百年，隋朝统一；唐朝之后又分裂为八、九个小国，本（宋）朝统一。然而秦始皇传了一世而为胡亥，晋武帝传了一世而为晋惠帝，隋文帝传了一世而为隋炀帝，都葬送了自己的江山社稷。唯独本朝传了九世一百七十年，不幸遭遇了靖康之祸，大概三代以来没有如本朝这样和平安定的了。秦朝、晋朝、隋朝都有相似之处，然而秦、隋一旦灭亡即彻底消失了，东晋虽然被称为“牛继马后”，但毕竟保持了司马氏的社稷，也享国百余年。大概秦朝、隋朝流毒四海，罪恶极大，上天诛之，晋朝的八王之乱，“孽后”贾南风擅权乱国，都是因为晋惠帝昏庸无能造成的，并不是得罪了百姓，所以它的灭亡和秦、隋朝的灭亡不同。

上官桀

【原文】 汉上官桀为未央厩令，武帝尝体不安，及愈，见马，马多瘦，上大怒：“令以我不复见马邪？”欲下吏，桀顿首曰：“臣闻圣体不安，日夜忧惧，

意诚不在马。”言未卒，泣数行下。上以为忠，由是亲近，至于受遗诏辅少主。义纵为右内史，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不治，上怒曰：“纵以我为不行此道乎？”衔之，遂坐以他事弃市。二人者其始获罪一也，桀以一言之故超用，而纵及诛，可谓幸不幸矣。

【译文】 汉朝上官桀做未央宫的（马）厩令，汉武帝曾经身体不好，等病愈后，见到马匹，马多数很瘦，皇上大怒说：“厩令认为我不再能见马匹了吗？”要把他交给司法的官吏治罪。上官桀叩头说：“臣听说皇上圣体欠安，日夜忧愁惧，心意的确不在马身上。”话没完，就哭出不少泪水。皇上以为他忠心，因此得到亲近，以至于受遗诏辅助年幼的君主。义纵做右内史，皇上到鼎湖去，生病很久，后来病愈起身到甘泉，道路没修好，皇上发怒说：“义纵认为我再不走这路了吗？”恨他，就以别的事判他死罪。两人的开始得罪是一样的。上官桀因一句话被超迁擢用，而义纵则被杀，可以说有幸有不幸了。

金日昞

【原文】 金日昞没入宫，输黄门养马。武帝游宴见马，后宫满侧，日昞等数十人牵马过殿下，莫不窥视，至日昞，独不敢。日昞容貌甚严，马又肥好，上奇焉，即日拜为马监，后受遗辅政。日昞与上官桀皆因马而受知，武帝之取人，可谓明而不遗矣。

【译文】 金日昞被俘虏后，被派到皇宫的黄门养马。一天，汉武帝在皇宫内游宴，视察官马，他身边有许多妖艳的宫女。金日昞等数十人牵着马从殿下经过，其间没有不偷看宫女的，只有金日昞经过时不敢抬头窥视。金日昞容貌不凡，气宇轩昂，牵的马匹非常膘壮，汉武帝感到金日昞不同一般，当天就任命金日昞为马监。后来，金日昞又接受遗诏辅佐年仅八岁的昭帝。金日昞和上官桀都是因为马而被皇上了解的，汉武帝选拔人才，可以称得上圣明而不遗漏了。

汉宣帝忌昌邑王

【原文】 汉废昌邑王贺而立宣帝，贺居故国，帝心内忌之，赐山阳太守张敞玺书，戒以谨备盗贼。敞条奏贺居处，著其废亡之效。上知贺不足忌，始封

为列侯。光武废太子强为东海王而立显宗，显宗即位，待强弥厚。宣、显皆杂霸道，治尚刚严，独此事显优于宣多矣。

【译文】 西汉大将军霍光等人废黜昌邑王刘贺而立汉宣帝，刘贺移居原来的封国中，汉宣帝内心很疑忌刘贺，于是赐给山阳太守张敞玉玺手谕，告诫他要谨慎防备强盗贼寇。张敞逐条上奏刘贺在国中的状况，汇报了他被废之后的表现。汉宣帝知道刘贺不足为虑，才封他为列侯。光武帝废太子强为东海王，而立刘庄为太子，刘庄即帝位，史称显宗，他对待刘强更加优厚。汉宣帝、汉显宗都用“霸道”治国，崇尚严刑峻法，唯独这件事上汉显宗要比汉宣帝宽厚得多。

平津侯

【原文】 公孙平津本传称其意忌内深，杀主父偃，徙董仲舒，皆其力。然其可称者两事：武帝置苍海、朔方之郡，平津数谏，以为罢弊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上使朱买臣等难之，乃谢曰：“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愿罢西南夷专奉朔方。”上乃许之。卜式上书，愿输家财助边，盖迎合主意。上以语平津，对曰：“此非人情，不轨之臣不可以为化而乱法，愿勿许。”乃罢式。当武帝好大喜功而能如是，概之后世，足以为贤相矣！惜不以式事载本传中。

【译文】 公孙平津（平津侯公孙弘）在《史记》、《汉书》本传中说他心地猜忌内心深沉，杀主父偃，把董仲舒调出京城，都是他在起作用。但他的可称道处有两件事：汉武帝设置苍海、朔方等郡，平津侯多次谏止，以为使中原疲劳而去开发没有用的土地，希望停止。皇上叫朱买臣等人去诘难他，于是他谢罪说：“我是盱山以东的鄙陋的人，不知道开发朔方郡的便利到这地步，请不要开发西南夷专心去供给开发朔方郡的费用。”皇上同意了他的意见。卜式上书，请求捐献自己私家财产资助边境用途，这是迎合君主的意思，皇上把这事讲给平津侯听，平津侯回答说：“这不合人情，不守法的臣子不可以作为教化而会搞乱法治，请求不听他的。”于是拒绝了卜式。正当武帝好大喜功而平津侯能这样做，比起后代来，足够当作贤明宰相了，可惜史书没有把卜式的事记进本传中去。

韩信 周瑜

【原文】 世言韩信伐赵，赵广武君请以奇兵塞井陘口，绝其粮道，成安君不听。信使间人窥知其不用广武君策，还报，则大喜，乃敢引兵遂下，遂胜赵。使广武计行，信且成禽，信盖自言之矣。周瑜拒曹公于赤壁，部将黄盖献火攻之策，会东南风急，悉烧操船，军遂败。使天无大风，黄盖不进计，则瑜未必胜。是二说者，皆不善观人者也。夫以韩信敌陈馥，犹以猛虎当羊豕尔。信与汉王语，请北举燕、赵，正使井陘不得进，必有他奇策矣。其与广武君言曰：“向使成安君听子计，仆亦禽矣。”盖谦以求言之词也。方孙权问计于周瑜，瑜已言操冒行四患，将军禽之宜在今日。刘备见瑜，恨其兵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观瑜破之。”正使无火攻之说，其必有以制胜矣。不然，何以为信、瑜？

【译文】 世人都说韩信攻打赵国时，赵国的广武君李左车请求用一支奇兵堵塞井陘口防守，以断绝韩信大军的粮道，成安君陈馥没有采纳。韩信所派遣的间谍暗中刺探得知陈馥没有采纳广武君李左车的计策，回来报知，韩信大喜，马上率军挺进，随即战胜赵国。假使广武君李左车的计策得以实行，韩信就要战败被擒了，这大概是韩信自己说的话。周瑜和曹操在赤壁对阵，部将黄盖献火攻之策，正巧遇到很猛的东南风，这才烧毁了曹操的所有战船，曹军大败。假使没起大风，黄盖未献火攻之计，那么周瑜就未必能取胜。这两种说法都是不善于观察人的结果。用韩信对付陈馥，就如同用猛虎对付羊猪一样，韩信对汉王刘邦说，请求向北攻下燕国、赵国，假使井陘口不能通入，他必定会有其他奇策妙计。韩信对广武君李左车说：“假若成安君采纳您的计谋，我就要战败被擒了。”这大概是韩信谦虚以求李左车畅所欲言的说法。当孙权向周瑜询问破操之计，周瑜已经陈说了曹操冒然进军的四种弊端，并说将军擒之应该在今日。刘备拜见周瑜，嫌周瑜带的军队太少。周瑜说：“这些军队已经足够用了，您就看我周瑜怎么大破曹军吧！”假使没有火攻之策，周瑜也必定会有其他克敌制胜的办法。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他们还是韩信、周瑜吗？

汉武赏功明白

【原文】 卫青为大将军，霍去病始为校尉，以功封侯，青失两将军，亡翕

侯，功不多，不益封。其后各以五万骑深入，去病益封五千八百户，裨校封侯益邑者六人，而青不得益封，吏卒无封者。武帝赏功，必视法如何，不以贵贱为高下，其明白如此。后世处此，必曰青久为上将，俱出塞致命，正不厚赏，亦当有以慰其心，不然，他日无以使人，盖失之矣。

【译文】 卫青为大将军，霍去病才初为校尉，因功被封侯。卫青进攻匈奴时，损失了两个将军，翕侯阵亡，功不多，没有增加封赏。其后，两人各率五万骑兵深入匈奴腹地。霍去病增封五千八百户，偏将、校尉被封侯增加食邑的共六人，而卫青没有得到增封，手下的吏卒也没有得到封赏。汉武帝论功行赏，必定依法进行，不以贵贱分高下，就是如此公正无私清楚明白。后世对待这些，必定说卫青长期任上将，与霍去病都率兵出塞征战，即使没有厚赏，也应当有所表示以安慰其心，如果不这样，他日就无法驱使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周召房杜

【原文】 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观此二相，则刑措四十年，颂声作于下，不言可知。唐贞观三年二月，房玄龄为左仆射，杜如晦为右仆射，魏征参预朝政。观此三相，则三百年基业之盛，概可见矣。

【译文】 召公做太保，周公做太师，辅佐周成王作为左右相。看这两位宰相，使四十年中没有用过刑法，歌颂的声音出现于下面，不说就可知道。唐朝贞观三年（629年）二月，房玄龄任左仆射，杜如晦任右仆射，魏征参预朝廷政事。看这三个宰相，那三百年基业的兴盛，大概可以想见了。

三代书同文

【原文】 三代之时，天下书同文，故《春秋左氏》所载人名字，不以何国，大抵皆同。郑公子归生，鲁公孙归父，蔡公孙归生，楚仲归，齐析归父，皆字子家。楚成嘉，郑公子嘉，皆字子孔。郑公孙段、印段，宋褚师段，皆字子石。郑公子喜，宋乐喜，皆字子罕。楚公子黑肱，郑公孙黑，孔子弟子狄黑，皆字子皙。鲁公子瞞，郑公孙挥，皆字子羽。邾子克，楚斗克，周王子克，宋司马之臣克，皆字曰仪。晋籍偃，荀偃，郑公子偃，吴言偃，皆字曰游。晋羊舌赤，鲁公西赤，皆字曰华。楚公子侧，鲁孟之侧，皆字曰反。鲁冉耕，宋司马耕，皆

字曰牛。颜无繇、仲由，皆字曰路。

【译文】 夏、商、周三代之时，天下文字大体相同，所以《左传》中所记载的人名和字，不论是哪个国家的，大致都相同。如：郑国的公子归生，鲁国的公孙归父，蔡国的公孙归生，楚国的仲归，齐国的析归父，字都是子家。楚国的成嘉，郑国的公子嘉，字都是子孔。郑国的公孙段、印段，宋国的褚师段，字都是子石。郑国的公子喜，宋国的乐喜，字都是子罕。楚国的公子黑肱，郑国的公孙黑，孔子的弟子狄黑，字都是子皙。鲁国的公子盼，郑国的公孙挥，字都是子羽。邾子克，楚国的斗克，周王室的王子克，宋国司马的家臣克，字都是仪。晋国的籍偃、荀偃，郑国的公子偃，吴国的言偃，字都是游。晋国的羊舌赤，鲁国的公西赤，字都是华。楚国的公子侧，鲁国的孟之侧，字都是反。鲁国的冉耕，宋国的司马耕，字都是牛。颜无繇、仲由，字都是路。

周世中国地

【原文】 成周之世，中国之地最狭，以今地里考之，吴、越、楚、蜀、闽皆为蛮；淮地为群舒；秦为戎。河北真定、中山之境，乃鲜虞、肥、鼓国。河东之境，有赤狄、甲氏、留吁、铎辰、潞国。洛阳为王城，而有杨拒、泉皋、蛮氏、陆浑、伊雒之戎。京东有莱、牟、介、莒，皆夷也。杞都雍丘，今汴之属邑，亦用夷礼。邾近于鲁，亦曰夷。其中国者，独晋、卫、齐、鲁、宋、郑、陈、许而已，通不过数十州，盖于天下特五分之一耳。

【译文】 成周朝刚建立的时候，中国的疆域最小，按照今天的地理来考察，吴、越、楚、蜀、闽都是蛮族居住的地区；淮南是群舒少数民族所居住的地区；秦地为戎族所居住。河北路真定、中山一带，是鲜虞、肥、鼓国。河东路有赤狄、甲氏、留吁、铎辰、潞国。洛阳是王城，而王城周围有杨拒、泉皋、蛮氏、陆浑、伊雒等戎族。京东路有莱、牟、介、莒等东夷族。杞国都城雍丘，是今天汴京的属邑，也使用东夷的礼仪。邾国靠近鲁国，但是也属于东夷。属于中国的，只有晋、卫、齐、鲁、宋、郑、陈、许，总共不过数十州，大约仅为天下的五分之一！

李后主梁武帝

【原文】 东坡书李后主去国之词云：“最是苍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挥泪对宫娥。”以为后主失国，当恸哭于庙门之外，谢其民而后行，乃对宫娥听乐，形于词句。予观梁武帝启侯景之祸，涂炭江左，以致覆亡，乃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其不知罪己亦甚矣！窦婴救灌夫，其夫人谏止之，婴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无所恨。”梁武用此言而非也。

【译文】 苏东坡（苏轼）记李后主离开南唐国土的词说：“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挥泪对宫娥”（最伤心的是仓皇辞别宗庙的日子，教坊里还在奏着别离的乐歌，流着眼泪对着宫女）。以为李后主失了国家，应当在庙门外恸哭，向百姓谢罪而后出发，却对着宫女听着音乐，并且写进词中去。我看梁武帝召致侯景的灾祸，使江东大受蹂躏，以致梁朝复亡，却说：“由我得天下，由我失掉，也还有什么可怨的。”他的不知罪过已经太严重了。窦婴救灌夫，他夫人劝止他，窦婴说：“侯爵由我得到，由我失去，没什么可怨的。”梁武帝用这句话而用错了。

诗什

【原文】 《诗》《二雅》及《颂》前三卷题曰：“某诗之什。”陆德明释云：“歌诗之作，非止一人，篇数既多，故以十篇编为一卷，名之为什。”今人以《诗》为篇什，或称誉他人所作为佳什，非也。

【译文】 《诗经》的大、小《雅》及《颂》的前三卷题目说：“某诗之什”。陆德明解释说：“诗的作者不是一个人，因为篇数较多，因而以十篇编为一卷，称之为什。”现在的人因为《诗经》中有“什”的提法，于是有人称赞他人的作品为“佳什”，这纯属误解，是不正确的。

易举正

【原文】 唐苏州司户郭京有《周易举正》三卷，云：“曾得王辅嗣、韩康

伯手写注定传授真本，比较今世流行本及国学、乡贡举人等本，或将经入注，用注作经，小象中间以下句，反居其上，爻辞注内移，后义却处于前，兼有脱遗，两字颠倒谬误者，并依定本举正其讹，凡一百三节。”今略取其明白者二十处载于此：《坤》初六：“履霜坚冰至。象曰：履霜，阴始凝也，致其道，至坚冰也。”今本于象文“霜”字下误增“坚冰”二字。《屯》六三象曰：“即鹿无虞何？以从禽也。”今本脱“何”字。《师》六五：“田有禽，利执之，无咎。”元本“之”字行书向下引脚，稍类“言”字，转写相仍，故误作“言”，观注义亦全不作“言”字释也。《比》九五象曰：“失前禽舍逆取顺也。”今本误倒其句。《贲》：“亨，不利有攸往。”今本“不”字误作“小”字。“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注云：“刚柔交错而成文焉，天之文也。”今本脱“刚柔交错”一句。《坎》卦“习坎”上脱“坎”字。《睽》：“九四，包失鱼。”注：“二有其鱼，故失之也。”今本误作“无鱼”。《蹇》：“九三，往蹇来正。”今本作“来反”。《困》初六象曰：“入于幽谷，不明也。”今本“谷”字下多“幽”字。《鼎》彖：“圣人亨以享上帝，以养圣贤。”注云：“圣人用之，上以享上帝而下以养圣贤。”今本正文多“而大亨”三字，故注文亦误增“大亨”二字。《震》彖曰：“不丧匕鬯，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今本脱“不丧匕鬯”一句。《渐》象曰：“君子以居贤德，善风俗。”注云：“贤德以止巽则居，风俗以止巽乃善。”今本正文脱“风”字。《丰》九四象：“遇其夷主，吉，志行也。”今文脱“志”字。《中孚》彖：“豚鱼吉，信及也。”今本“及”字下多“豚鱼”二字。《小过》彖：“柔得中，是以可小事也。”今本脱“可”字，而“事”字下误增“吉”字。六五象曰：“密云不雨，已止也。”注：“阳已止下故也。”今本正文作“已上”，故注亦误作“阳已上故止也”。《既济》彖曰：“《既济》，亨小，小者亨也。”今本脱一“小”字。《系辞》：“二多誉，四多惧。”注云：“惧，近也。”今本误以“近也”字为正文，而注中又脱“惧”字。《杂卦》：“蒙稚而著。”今本“稚”误作“杂”字。予顷于福州《道藏》中见此书而传之，及在后省见晁公武所进《易解》，多引用之，世罕有其书也。

【译文】 唐代时，苏州司户参军郭京著有《周易举正》三卷，作者自己说：“我曾得到王辅嗣、韩康伯手写的注定传授真本，考校当今流行本及国学、乡贡举人等本，发现它们或者将经文误入注文，或者将注文误作经文，或在《象》词中以下句反居其上，爻辞注文内移，前后倒置，还有脱漏、两字颠倒谬误的，所有这些，我都依定本改正过来，总共有一百三十条。”这里，我姑且选取其中明白易懂的二十条摘录如下。

《坤》卦初六爻的爻词说：“履霜坚冰至。《象》曰：履霜，阴始凝也，驯致

其道，致坚冰也。”今本象文“霜”字下误增“坚冰”二字。《屯》卦六三爻的爻词说：“即鹿无虞何？以从禽也。”今本脱去“何”字。《师》卦的六五爻说：“田有禽，利执之，无咎（即无凶）。”原本“之”字为行书，笔脚向下延伸，有点象“言”字，经过辗转传抄，结果误作“言”字，而且从注文的意思看，也根本未作“言”解释。《比》卦九五爻的象词说：“失前禽，舍逆取顺也。”今本错误地把此句的前后次序搞反了。《贲》卦说：“亨，不利有攸往。”今本“不”字误作“小”字。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注释说：“刚柔交错而成文焉，天之文也。”今本脱漏“刚柔交错”一句。《坎》中“习坎”二字之上脱漏一个“坎”字。《眈》卦：“九四，包失鱼”注释说：“二有其鱼，故失之也。”今本误作“无鱼”。《蹇》卦说：“九三，往蹇来正。”今本作“来反”。《困》卦初六爻的象词说：“入于幽谷，不明也。”今本“谷”字下面多一“幽”字。《鼎》卦的象词说：“圣人亨以享上帝，以养圣贤。”注释说：“圣人用之，上以享上帝而下以养圣贤。”今本正文多出“而大亨”三字，因而注文也误增“大亨”二字。

《震》卦的象词说：“不丧匕鬯，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今本脱去“不丧匕鬯”一句。《渐》卦的象词说：“君子以居贤德，善风俗。”注释说：“贤德以止巽则居，风俗以止巽乃善。”今本正文脱漏“风”字。《丰》卦九四爻的象词说：“遇其夷主，吉，志行也。”今本脱漏“志”字。《中孚》卦的象词说：“豚鱼吉，信及也。”今本“及”字下多出“豚鱼”二字。《小过》卦的象词说：“柔得中，是以可小事也。”今本脱漏“可”字，而“事”字下误增“吉”字。六五爻的象词说：“密云不雨，已止也。”注释说：“阳已止下故也。”今本正文作“已上”。故注文也误作“阳已上故止也。”《既济》卦《彖传》说：“既济，亨小，小者亨也”（既已济及万物，亨通小的事物，小的事物也得到亨通）。现在的本子脱去一个“小”字。《明辞传》：“二多誉，四多眊”（第二爻为荣誉，第四爻多为忧眊）。注说“眊，近也”（眊，因为近）。现在的本子误以“近也二字为正文，而注中又脱去“眊”字。《杂卦传》：“《蒙》稚而著”（《蒙卦》是从稚幼而求其有所定着）。现在的本子“稚”字误作“杂”字。我近来在福州的《道藏》中见到这书而使之流传。到后省见了晁公武所进献的《易解》，多处引用此书，世间却很少有这部书。

其惟圣人乎

【原文】 《乾》卦：“其惟圣人乎？”魏王肃本作“愚人”，后结句始作“圣人”，见陆德明《释文》。

【译文】 《乾》卦的卦词说：“难道只有圣人吗？”曹魏著名学者王肃的本子作“愚人”，最后的结句才作“圣人”，这见于陆德明的《经典释文》一书。

易说卦

【原文】 《易·说卦》荀爽《九家集解·乾》“为木果”之下，更有四，曰：为龙，为车，为衣，为言。《坤》后有八，曰：为牝，为迷，为方，为囊，为裳，为黄，为帛，为浆。《震》后有三，曰：为王，为鹄，为鼓。《巽》后有二，曰：为杨，为鹳。《坎》后有八，曰：为宫，为律，为可，为栋，为丛棘，为狐，为蒺藜，为桎梏。《离》后有一，曰：为牝牛。《艮》后有三，曰：为鼻，为虎，为狐。《兑》后有二，曰：为常，为辅颊。注云“常，西方神也。”陆德明以其与王弼本不同，故载于《释文》。按：《震》为龙与《乾》同，故虞翻、干宝本作“睽”。

【译文】 《易经·说卦传》荀爽《九家集解》（《隋书·经籍志》作《九家注》）《乾》卦：“为木果”之下，还有四句，说：“为龙，为车，为衣，为言”。《坤卦》后面有八句，说：“为牝（雌），为迷惑，为方，为囊，为裳，为黄，为帛，为浆。”《震》卦后面有三句，说：“为王，为鹄，为鼓。”《巽》卦后面有二句，说：“为阳，为鹳。”《坎》卦后面有八句，说：“为宫，为律，为可，为栋，为丛棘，为狐，为蒺藜，为桎梏。”《离》卦后面有一句，说公牛。”《艮》卦有三句，说：“为鼻，为虎，为狐。”《兑》卦后面有二句，说：“为常，为辅颊。”注说：“常，是西方的神。”陆德明因为它和王弼本不同，所以记在《释文》中。按《震》“为龙”，和《乾》卦相同，所以虞翻、干宝的本子作“睽”（青色的马）。

元二之灾

【原文】 《后汉·邓骘传》：“拜为大将军，时遭元二之灾，人士饥荒，死者相望，盗贼群起，四夷侵畔。”章怀注云：“元二即元元也，古书字当再读者，即于上字之下为小二字，言此字当两度言之。后人不晓，遂读为元二，或同之阳九，或附之百六，良由不悟，致斯乖舛。今岐州《石鼓铭》，凡重言者皆为‘二’字，明验也。”汉碑有《杨孟文石门颂》云：“中遭元二，西夷虐残。”《孔耽碑》云：“遭元二臲軋，人民相食。”赵明诚《金石跋》云：“若读为元元，不成文理，疑当时自有此语，《汉注》未必然也。”按王充《论衡·恢国篇》云：“今上嗣位，元二之间，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四年，甘露降五县。五年，芝复生。六年，黄龙见。”盖章帝时事。考之本纪，所书建初三年以后诸瑞皆同，则知所谓元二者，谓建初元年、二年也。既称嘉德布流以致祥瑞，其为非灾眚之语，益可决疑。安帝永初元年、二年，先零、滇羌寇叛，郡国地震、大水。邓骘以二年十一月拜大将军，则知所谓元二年，谓永初元年、二年也。凡汉碑重文不皆用小二字，岂有《范史》一部唯独一处如此！予兄丞相作《隶释》，论之甚详。予修国史日，撰《钦宗纪赞》，用靖康元二之祸，实本于此。

【译文】 《后汉书·邓骘传》说：“邓骘被任命为大将军，当时正好遭逢元二之灾，饥荒严重，饿死的人触目可见。在这种形势下，盗贼蜂起，四方的少数民族也乘机反叛、入侵。”章怀太子注释说：“元二即元元，在古书中某字应重复时，就在第一个字下写一个小小的‘二’字，表明这个字应读两遍。后人不懂，于是读作元二，有人解释为阳九，有人附会为百六，实际上都是因为不懂才导致这样的错误。现在岐州的《石鼓铭》上，凡是重复的地方都写一个‘二’字，便是明证。”汉碑《杨孟文石门颂》说：“中遭元二，西夷虐残。”《孔耽碑》说：“遭逢元二坎坷，人民相食。”赵明诚的《金石跋》说：“如果读作元元，于文理不通，怀疑当时的确有元二的说法，《后汉书》的注释未必正确。”按：王充的《论衡·恢国篇》说：“当今的皇上继位后，元二之间，恩德遍布四方。三年，零陵长出了灵芝草。四年，甘露降于五县之地。五年，又发现了灵芝。六年，黄龙现形。”这是汉章帝时期的事情。查考《章帝本纪》，可以看出，本纪中所记的从建初三年（78年）以后各年的祥瑞，与王充所记的完全相同，显而易见，所谓的元二，乃是指建初元年和二年。既然说恩德遍布四方，则元二不是指灾祸，也就一目了然、毋庸置疑了。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二年，先

零、滇羌叛乱，全国许多地方发生地震、大水。邓骘于二年十一月拜大将军，可见所谓的元二，乃是指永初元年、二年。而且，并不是所有的汉碑中重复字都用小“二”字，难道只有范晔的《后汉书》一书中如此，而且唯独一处？我的哥哥丞相洪遵曾著《隶释》，对这个问题论述得非常详尽。我编纂国史的时候，撰《钦宗纪赞》，其中有“靖康元二之祸”一句，其根据就在于此。

圣人污

【原文】 孟子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瞞，不至阿其所好。”赵岐注云：“三人之智足以识圣人。瞞，下也。言三人虽小瞞不平，亦不至于其所好，阿私所爱而空誉之。”详其文意，足以识圣人是一句。“瞞，下也”，自是一节。盖以“下”字训“瞞”也，其义明甚。而老苏先生乃作一句读，故作《三子知圣人污论》，谓：“三子之智，不足以及圣人高深幽绝之境，徒得其下焉耳。”此说窃谓不然，夫谓“夫子贤于尧、舜，自生民以来未有”，可谓大矣，犹以为瞞下何哉？程伊川云：“有若等自能知夫子之道，假使瞞下，必不为阿好而言。”其说正与赵氏合。大抵汉人释经子，或省去语助，如郑氏笺《毛诗》“奄观艾”云：“奄，久。观，多也。”盖以久训奄，以多训观。近者黄启宗有《补礼部韵略》，于“淹”字下添“奄”字，注云：“久观也。”亦是误以《笺》中五字为一句。

【译文】 孟子说：“宰我、子贡、有若的智慧可以知道圣人。有低下之处，也不致于偏心于他所爱好的人。”赵岐注说：“三人的智慧足以认识圣人。眡，是下的意思。说三人虽小有低下不平，也不至于对所好的人，偏爱而空加称誉。”体会他的文意，足以认识圣人是一句。“眡”，是下的意思，另是一节。这是用“下”字训释“眡”字，文字的意思很明白。而老苏先生（苏洵）却作为一句来读，所以作《三子圣人污论》说：“三人的智慧，不足以到圣人高深奥妙的境地，只得到他粗浅之处而已。”这是说我私自以为不对。子贡说“孔子比尧、舜更高明，从有人类以来还没有过”，可以说是大了，还以为子贡眡下是为什么？程伊川（程颐）说：“有若等人自然能知道孔子的道理，假使他们有眡下处，一定不做阿私偏好说话。”他的说法已经和赵岐相符合。大抵汉朝人解释经书子书，有时省去语助词，为郑玄笺释《毛诗》“奄观昉艾”（长久而众多的人在割庄稼）。这是以“久”训释“奄”，以“多”训释“观”。近来黄启宗《补礼部韵略》，对“淹”字下添“奄”字，注说：“久观也。”也是误以《笺》中五个字为一句。

国初人至诚

【原文】 真宗时，并州谋帅，上谓辅臣曰：“如张齐贤、温仲舒皆可任，但以其尝历枢近，或有固辞，宜召至中书询问，愿往则授之。”及召二人至，齐贤辞以恐为人所谗。仲舒曰：“非敢有辞，但在尚书班已十年，若得改官端揆，赐都部署添给，敢不承命？”辅臣以闻，上曰：“是皆不欲往也，勿强之。”王元之自翰林学士以本官刑部郎中知黄州，遣其子嘉璽献书于中书门下，以为：“朝廷设官，进退必以礼，一失错置，咎在廊庙。某一任翰林学士，三任制诰舍人，以国朝旧事言之，或得给事中，或得侍郎，或为谏议大夫。某独异于斯，斥去不转一级，与钱谷俗吏，混然无别，执政不言，人将安仰？”予谓仲舒尝为二府，至于自求迁转及增请给；元之一代刚正名臣，至于公移笺书，引例乞转。唯其至诚不矫伪故也。后之人外为大言，避宠辞禄，而阴有营求，失其本真者多矣，风俗使然也。

【译文】 真宗时，并州某地要派位经略安抚使去，皇上对宰相们说：“像张齐贤、温仲舒都可以出任，但因为他们都曾历任枢密及接近皇帝的官职，也许会坚决抵辞。应该叫他们到中书省询问，愿去的就授任。”到召来两人时，张齐贤抵辞说怕被人谗害。温仲舒曰：“不敢抵辞，但在尚书的行班中已经十年，如果能改官为宰相衔，赐予都部署添给供应，不敢不听从命令”。宰相以此奏闻，皇上说：“这是都不想去，不要勉强。”王元之（王禹称）从翰林学士以本官刑部郎中出任黄州知州，派他儿子王嘉璽献书于中书门下二省，以为：“朝廷设置官员，进退一定要用礼，措置一失当，罪过就在朝廷。我一次任翰林学士，三次任制诰舍人，以国家旧例来说，有的能得给事中，有的得任侍郎，有的任谏议大夫。只有我和这不同，被斥而去不升一级，和管钱谷的俗吏，混同没有区别，执政大臣不说话，人们将如何仰望？”我说温仲舒曾经任职于中书省和枢密院，至于自己要求迁转和增加供给，王元之是一代刚正的名臣，至于公文书信，引旧例要求升转。正因为他极诚实不装模作样的缘故。后来的人外表上说大话，避去宠幸辞去俸禄，而暗中钻营，失去他本来的真相的很多，这是风俗造成的。

史馆玉牒所

【原文】 国朝（宋）熙宁以前，秘书省无著作局，故置史馆，设修撰、直馆之职。元丰官制行，有秘书官，则其职归于监、少及著作郎、佐矣。而绍兴中复置史馆修撰、检讨，是与本省为二也。宗正寺修玉牒官亦然。官制既行，其职归于卿、丞矣。而绍兴中复差侍从为修牒，又以他官兼检讨，是与本寺为二也。然则今有户部，可别置三司，有吏、刑部，可别置审官、审刑院矣。又玉牒旧制，每十年一进，谓甲子岁进书，则甲戌、甲申岁复然。今乃从建隆以来再行补修，每及十年则一进，以故不过三二年辄一行赏，书局覲赏，此最甚焉。

【译文】 本朝（宋）熙宁以前，秘书省没有著作局，所以置史馆，设立修撰直史馆的职务。元丰年间的官制实行后，有秘书官，那么它的职务归于秘书监、少监和著作郎、著作佐郎了。而绍兴年间又置史馆修撰、检讨，这是与本部门成为两个了。宗正寺修玉牒（皇室宗谱）官也是这样。官制既已推行，其职掌归于宗正卿、宗正丞了。绍兴年间又派侍从官修玉牒，又用别的官员兼任检讨，这就和宗正寺分为二个了。因此现在有户部，可以另置三司使，有吏部、刑部、可以别设审官院、审刑院了。又玉牒的旧例，每十年上送一次，说是甲子年上送，那就甲申年再送。现在却从建隆以来再加补修，每到十年进呈一次，以此不过二三年进行赏赐，书局滥领赏赐，这是最严重的。

稗沙门

【原文】 《宝积经》说僧之无行者曰：“譬如麦田，中生稗麦，其形似麦，不可分别。尔时田夫，作如是念，谓此稗麦，尽是好麦，后见穗生，尔乃知非。如是沙门，在于众中，似是持戒有德行者。施主见时，谓尽是沙门，而彼痴人，实非沙门，是名稗沙门。”此喻甚佳，而文士鲜曾引用，聊志于此。

【译文】 《宝积经》中说到那些没有德行的和尚们时，有这么一段话：“譬如麦苗，中生稗麦，形状像麦，不能分别。那时田农会想，这些都是好麦，后来发现穗长出来了，才知不是好麦。正如和尚，在大众之中，好似持戒甚严、行德积善之人。施主见时，认为都是和尚，而那痴人，实非和尚，这就叫做稗沙门。”这个比喻非常好，而文人学士很少有人曾经引用，所以我姑且在此抄录下来。

卷 六

建武中元

【原文】 成都有汉《蜀郡太守何君造尊榼阁碑》，其末云：“建武中元二年六月。”按范史本纪，建武止三十一年，次年改为中元，直书为中元元年。观此所刻，乃是虽别为中元，犹冠以建武，如文、景帝中元、后元之类也。又《祭祀志》载封禅后赦天下诏，明言云：“以建武三十二年为建武中元元年。”《东夷倭国传》云：“建武中元二年，来奉贡。”援据甚明。而宋莒公作《纪年通谱》乃云：“纪、志所载不同，必传写脱误。”学者失于精审，以意删去，殆亦不深考耳。韩庄敏家一铜斗，铭云：“新始建国，天凤上戊六年。”又绍兴中郭金州得一钲，铭云：“新始建国，地皇上戊二年。”按王莽始建国之后改天凤，又改地皇，兹二器各冠以始元者，自莽之制如此，亦犹其改易郡名不常，每下诏犹系其故名之类耳，不可用中元为比也。

【译文】 成都有一通汉代的《蜀郡太守何君造尊榼阁碑》，碑文末尾说：“建武中元二年（57年）六月。”查阅范曄所写的《后汉书·光武帝本纪》记载：汉光武帝的年号“建武”只到三十一年，第二年改为中元，直接写为“中元元年”。由这通碑可以看出，虽然年号已改为“中元”，但仍在前面冠以“建武”，正如汉文帝、汉景帝中元、后元一样。再看《后汉书·祭祀志》所记载的封禅后赦天下诏，诏书明确地说：“以建武三十二年光武帝建武中元元年。”《后汉书·东夷倭国传》也写着：“建武中元二年，来汉朝朝贡。”碑文写为“建武中元”的根据是十分清楚、确凿的。可是宋莒公作的《纪年通谱》却说：“《本纪》与《祭祀志》记载不同，必定是传抄过程中出了错误。”学者不认真研究，按自己的主观理解把“建武”二字删去，这也是没有认真考证的结果。本朝韩庄敏公家有一铜斗，上边的铭文是：“新始建国，天凤上戊六年（19年）。”还有高宗绍兴年间有个叫郭金州的人得到一个钲（古乐器名），上边的铭文也写着“新始建国，地皇上戊二年（21年）。”王莽称帝后的第一个年号为“始建国”，后改为“天凤”，再改为“地皇”。这两件器物上都把第一个年号写在前面，是因为王莽时代的制度就是如此，正如有些郡名改后不久，每下诏书还把原来的郡

名写在前面一样。这与“建武中元”的写法是不能相比的。

带职人转官

【原文】 绍兴中，王浚明以右奉直大夫直秘阁，乞磨勘，吏部拟朝议大夫。时相以为既带职，则朝议、奉直为一等，遂超转中奉。其后曾礪踵之。绍兴末，向伯奋亦用此，继而续晷复然。后省有言，不应蓦三级，自是但得朝议。予按故事，官制未行时，前行郎中迁少卿，有出身，得太常；无出身，司农；继转光禄，即今奉直、朝议也。自少卿迁大卿、监，有出身，得光禄卿；无出身，历司农卿、少府监、卫尉卿，然后至光禄。若带职，则自少农以上径得光禄，不涉余级，至有超五资者。然则浚明等不为过，盖昔日职名不轻与人，故恩典亦异。又自承务郎至奉议词人，但三转，而带职者乃与余人同作六阶不小异，乃有司之失也。

【译文】 绍兴年间，王浚明以右奉直大夫直秘阁，要求查核政绩升迁，吏部拟升为朝议大夫，当时宰相认为王浚明既然带职，那么朝议大夫和奉直大夫是一个等级，就超升为中奉大夫。其后曾礪跟着这样办。绍兴末年，向伯奋也因此升迁，继之者续晷又这样。后来中书省有人说，不应突然升三级，从此只能得朝议大夫。我按旧例，官制没实行的时候，前任行郎中升为少卿，有出身的得至太常少卿，没有出身的，为司农少卿。继之转为光禄，就是今天的奉直大夫、朝议大夫。从少卿到大卿、监，有出身，得任光禄卿，无出身的，历任司农卿、少府监、卫尉卿，然后到光禄卿。如果带职，则从司农少卿以上可直接得任光禄卿，不经过其余官级，甚至有超迁五级的。这样看王浚明不算过分，因为从前职名不轻易给人，所以恩典也不同。又从承务郎到奉议大夫，有文词的人，只需升转三次，而带职的和其余的人同样作为六个阶梯来升迁没有小的不同，这是有关官员的过失。

上下四方

【原文】 上下四方不可穷竟。正杂庄、列、释氏之寓言，曼衍不能说也。《列子》：‘商汤问于夏革曰：‘上下八方有极尽乎？’革曰：‘不知也。’汤固问，革曰：‘无则无极，有则有尽，朕何以知之？然无极之外，复有无极；无尽之中，

复无无尽。无极复无无极，无尽复无无尽，朕是以知其无极无尽也，而不知其有极有尽也，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大集经》：“‘风住何处？’曰：‘风住虚空。’又问：‘虚空为何所住？’答言：‘虚空住于至处。’又问：‘至处复何所住？’答言：‘至处何所住者，不可宣说。何以故？远离一切诸处所故，一切处所所不摄故，非数非称不可量故，是故至处无有住处。’”二家之说，如是而已。

【译文】 上下四方无穷无尽，没有边境，即使是《庄子》、《列子》和佛教经典中的一些含义很深的寓言，也不能说清楚。

《列子》记载：“商汤问夏革说：‘上下八方有穷尽吗？’夏革说：‘不知道。’商汤坚持要问，夏革就说：‘无就是没终点，有就是有个范围，我怎么知道它有没有终极。不过，在无终点以外，就不再存在没有终点之说；在没有范围的说法之内，也不存在没有范围。没有终点之外不再没有终点，没有范围之内不再没有范围，所以我只知道没有终点、没有范围的存在，而不知道有终点有范围的存在。既然如此，怎么能知道在看得见的天地之外，有没有比天地更大的东西存在呢？’”

佛教的《大集经》却另是一种说法：“‘风住在什么地方？’答：‘风住在虚空那里。’又问：‘虚空又住在哪里？’回答说：‘虚空住在至处。’又问：‘至处又住在哪里呢？’回答说：‘至处住的地方是不可明确地说的。为什么呢？因为至处是远离一切地方的地方，是任何地方都约束不了的地方，是任何数字、任何称都无法估量的地方。所以，至处没有住的地方。’”

两家的说法，也不过如此而已。

魏相 萧望之

【原文】 赵广汉之死由魏相，韩延寿之死由萧望之。魏、萧贤公卿也，忍以其私陷二材臣于死地乎？杨惲坐语言怨望，而廷尉当以大逆不道。以其时考之，乃于定国也。史称定国为廷尉，民自以不冤，岂其然乎？宣帝治尚严，而三人者，又从而辅翼之，为可恨也！

【译文】 汉宣帝时，京兆尹赵广汉被杀与魏相有关；曾任颍川、东郡太守和左冯翊的韩延寿被诬陷身死与萧望之有关。魏相、萧望之都是非常贤明的公卿大臣，怎么会忍心因私怨把二位有才能的贤臣置于死地呢？平通侯杨惲也是一位为朝廷立过大功的大臣，只是因为被免为庶人后，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了几

句牢骚话，就被掌刑狱的廷尉判为大逆不道，处以斩刑。按照时间来考察，这个廷尉正是于定国。史书称道于定国为廷尉，百姓们有罪自认为不会冤屈。果真是如此吗？汉宣帝崇尚严刑治国，而魏相、萧望之、于定国三人又顺承他的旨意推波助澜，这实在是天大的遗憾。

姓氏不可考

【原文】 姓氏所出，后世茫不可考，不过证以史传，然要为难晓。自姚、虞、唐、杜、姜、田、范、刘之外，余盖纷然杂出。且以《左传》言之，申氏出于四岳，周有申伯，然郑又有申侯，楚有申舟，又有申公巫臣，鲁有申腓、申枨，晋有申书，齐有申鲜虞。贾氏，姬姓之国，以国氏，然晋有贾华，又狐射姑亦曰贾季，齐有贾举。黄氏，嬴姓之国，然金天氏之后，又有沈、姒、蓐、黄之黄，晋有黄渊。孔氏出于商，孔子其后也。然卫有孔达，宋有孔父，郑有孔叔，陈有孔宁，齐有孔伋，而郑子孔之孙又为孔张。高氏出于齐，然子尾之后又为高强，郑有高克，宋有高哀。国氏亦出于齐，然邢有国子，郑子国之孙又为国参。晋有庆郑，齐有庆克，陈有庆虎。卫有石蜡，齐有石之纷如，郑有石暉，周有石尚，宋有石瞭。晋有阳处父，楚有阳丐，鲁有阳虎。孙氏出于卫，而楚有叔敖，齐有孙书，吴有孙武。郭氏出于虢，而晋有郭偃，齐有郭最，又有所谓郭公者。千载之下，遥遥世祚，将安所质究乎？

【译文】 姓氏的起源，后代人茫然不可考知，不过用史传来证明而已，但总之难于明白。从姚、虞、唐、杜、姜、田、范、刘几姓之外，其余的就纷纷杂乱。就以《左传》来说：申氏出于四岳，周朝有申伯，但郑国有申侯，楚国有申舟，又有申公巫臣，鲁国有申腓，申枨，晋国有申书，齐国有申鲜虞。贾氏是姬姓的国家，以国为氏，但晋国有贾华，又狐射姑也叫贾季，齐国有贾举。黄氏是嬴姓之国，但金天氏之后，又有沈、姒、蓐、黄的黄姓，晋国有黄渊。孔氏出于商朝的后代，孔子是孔氏后人。但卫国有孔达，宋国有孔父，郑国有孔父，陈国有孔宁，齐国有孔伋，而郑国子孔的孙子又叫孔张。高氏出于齐国，但子尾的后人又叫高强，郑国有高克，宋国有高哀。国氏也出于齐国，但邢国有国子，郑国子国的孙子叫国参。晋国有庆克，陈国有庆虎。卫国有石旾，齐国有石之纷如，郑国有石旼，周朝有石尚，宋国有石罫，晋国有阳处父，楚国有阳丐，鲁国有阳虎。孙氏出于卫国，而楚国有孙叔敖，齐国有孙武。郭氏出于虢国，而晋国有郭偃，齐国有郭最，又有所谓的郭公其人。一千年之后，遥远

的世系，将怎样加以考察推究呢？

畏无难

【原文】 圣人不畏多难而畏无难，故曰：“惟有道之主能持胜。”使秦不并六国，二世未亡；隋不一天下服四夷，炀帝不亡；苻坚不平凉取蜀，灭燕翦代，则无肥水之役；唐庄宗不灭梁下蜀，则无嗣源之祸；李景不取闽并楚，则无淮南之失。

【译文】 圣人并不害怕困难多，而是害怕没有困难。所以说：“只有有道明君才能始终保住胜利的果实。”假如秦国不吞并六国，统一天下，秦二世也未必会很快灭亡；假如隋文帝不统一全国，又征服了四周的少数民族，隋炀帝也不会身死国亡；如果十六国时期的前秦皇帝苻坚不平定凉国，攻取蜀国，灭掉燕国，翦除代国，也不会头脑发热，征集九十万人马去攻打东晋而招致淝水大战的惨败；五代时后唐庄宗如不灭梁国，攻蜀国，也不会招致李嗣源兵变而最后被杀；南唐李景如果不攻取闽国和楚国，也就不会有淮南的大败了。

孔子欲讨齐

【原文】 陈成子弑齐简公，孔子告于鲁哀公，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左传》曰：“孔子请伐齐，公曰：‘鲁为齐弱久矣，子之伐之，将若之何？’对曰：‘陈常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伐也。’”说者以为孔子岂较力之强弱，但明其义而已。能顺人心而行天讨，何患不克？使鲁君从之，孔子其使于周，请命乎天子，正名其罪。至其所以胜齐者，孔子之余事也。予以为鲁之不能伐齐，三子之不欲伐齐，周之不能讨齐，通国知之矣。孔子为此举，岂真欲以鲁之半，力敌之哉？盖是时三子无君与陈氏等，孔子上欲悟哀公，下欲警三子。使哀公悟其意，必察三臣之擅国，思有以制之，起孔子而付以政，其正君君、臣臣之分不难也。使三子者警，必将曰：鲁小于齐，齐臣弑君而欲致讨，吾三臣或如是，彼齐、晋大国，肯置而不问乎？惜其君臣皆不识圣人之深旨。自是二年，孔子亡。又十一年，哀公竟逼于三子而孙于越，比之简公，仅全其身尔。

【译文】 齐简公四年（公元前481年），齐国大臣陈成子弑杀齐简公，拥

立齐平公，自任国相。这时，孔子拜见鲁哀公，请求讨伐陈成子。鲁哀公说：“这件事你去找‘三子’（当时掌握鲁国政权的三家贵族，即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又称三桓），跟他们说吧。”孔子把他的想法告诉了“三子”，“三子”坚决不同意。《左传》记载：“孔子请求讨伐齐国，鲁哀公说：‘鲁国被齐国削弱已经很久了。你要讨伐他，将怎么讨伐呢？’孔子回答说：‘陈成子（即陈常）杀了他的国君，齐国老百姓不拥护的有一半。现在用鲁国的全部力量和齐国的一半力量，共同去讨伐，是可以取胜的。’”有人评论说：孔子哪里是在较量实力的大小呢？他只是为了表明道义而已。如能顺乎民心而代天讨伐，还用担心不会胜利吗？假如鲁哀公接受了孔子的请求，派孔子出使周朝廷，请求周天子给陈成子定罪，并布告天下，号召天下共讨，问题就解决了。至于说如何在战场上击败齐国，在孔子看来是不重要的。

我认为，鲁国因弱小不能讨伐齐国，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不想伐齐，周天子失去了权威也不能伐齐，这是全国无人不知的事实。孔子此举，难道真的是想以鲁国去与齐国相拼吗？不是的。大概当时鲁国的“三子”目无君主，情形与陈成子毫无二致，因此，孔子此举并不在于去打仗，而在于上可以使鲁哀公觉悟，下可以警告“三子”。如果鲁哀公明白了孔子的本意，就会认真看待三桓擅权、图谋不轨的事实，从而设法加以控制，并且起用孔子执掌国政，君臣之间的正常关系也就不难恢复了；假如“三子”因孔子的举动而自警，一定会说：鲁国比齐国小，齐国的大臣杀了自己的君主，鲁国人尚且要去讨伐；如果我们三人杀害君主，像齐、晋这些大国，怎么会置之不理呢？可惜，鲁国的君臣都未能明白圣人的这番深意。两年后，孔子辞世。又过了十一年，鲁哀公竟在三位大臣的威逼下流亡到越国，与齐简公相比，只是得免一死而已。

韩退之

【原文】 《旧唐史·韩退之传》，初言：“愈常以为魏、晋以还，为文者多拘偶对，而经诰之指归，不复振起。故所为文，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后学之士，取为师法。当时作者甚众，无以过之。故世称‘韩文’。”而又云：“时有恃才肆意，亦瞰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为罗池神，而愈撰碑以实之。李贺父名晋，不应进士，而愈为贺作《讳辩》，令举进士。又为《毛颖传》，讥戏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纰缪者。撰《顺宗实录》，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颇为当代所非。”裴晋公有《寄李翱书》曰：“昌黎韩愈，仆知之旧矣，其人信

美材也。近或闻诸侪类云：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今之不及之者，当大为防焉尔。”《旧史》谓愈为纰缪，固不足责，晋公亦有是言，何哉？考公作此书时，名位犹未达，其末云：“昨弟来，欲度及时干进，度昔岁取名，不敢自高。今孤茆若此，游宦谓何！是不能复从故人之所勉耳！但置力田园，苟过朝夕而已。”然则，公出征淮西，请愈为行军司马，又令作碑，盖在此累年之后，相知已深，非复前比也。

【译文】 《旧唐书·韩愈传》开头说：“韩愈时常以为从魏、晋以来，做文章的人拘泥于对仗，而对经典的思想意义，不再提倡，所以做文章抒发意见讲大道理，自己成为一家的新说法。后辈的学人都取他的榜样，当时这样做文章的很多，没人能超过他，所以世人称为‘韩文’。”而又说：“韩愈常常有倚仗自己的才华随意写作，也会违背孔子孟子的道理。如南方人错把柳宗元作为罗池神，而韩愈撰写碑文来加以证实。李贺的父亲名叫李晋，不应该考进士，而韩愈为李贺做《讳辩》，叫他应进士考试。又作《毛颖传》讥讽世态不近人情。这些是文章中很错误的。所作《顺宗实录》，繁简不妥当，记事情的取舍不当，很受当代人非议。”裴晋公（裴度）有《寄李翱书》说：“昌黎韩愈，我久已知道他了，这人的确有才能。近来有时听朋友们说：他倚仗出群的才华，往往肆意逞才，不用文章去建立法制，而以文章为游戏。这可以吗？现今一些不及他的人，应当为此提防着。”《旧唐书》说韩愈为错误，当然不必责怪，裴晋公也有这话，为什么呢？考裴公写这信时，名气官位当未显达，他在文章末尾说：“昨天你老弟来要我裴度及时求仕进，我前些年取得功名，不敢自以为高。现在孤苦至此，出外求官干什么？所以不能再听从老朋友的勉励了。只是尽力经营田园，苟且度过旦夕而已。”那么裴度出征淮西，要求韩愈做行军司马，又叫撰《平淮西碑》，是在好几年之后，互相认识已经深了，不再和从前一样。

诞节受贺

【原文】 唐穆宗即位之初年，诏曰：“七月六日，是朕载诞之辰。其日，百僚命妇宜于光顺门进名参贺，朕于门内与百僚相见。”明日，又敕受贺仪宜停。先是左丞韦绶奏行之，宰臣以古无降诞受贺之礼，奏罢之。然次年复行贺礼。诞节之制，起于明皇，今天下宴集休假三日，肃宗亦然。代、德、顺三宗皆不置节名，及文宗以后，始置宴如初。则受贺一事，盖自长庆年至今用之也。

【译文】 唐穆宗李恒即皇帝位的当年，下诏书说：“七月六日，是我的寿

诞之日。到了那天，百官和诰命妇人都应当到光顺门投名参贺，我在门内与百官相见。”第二天，又下诏说，诞辰受百官朝贺的仪式停止。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起初是尚书省总辖吏、户、礼三部的左丞韦绶上奏章，请求寿诞受贺为，于是下诏允准；接着宰相又以自古就没有寿诞受贺之礼为由，上书请求取消贺礼仪式为由，于是又下诏停止。但是到了第二年，又开始寿诞贺礼。

皇帝寿诞之日举行贺礼的制度，开始于唐明皇。当时，唐明皇下令在他寿诞之时，所有的臣民都可以尽情宴饮，并全体休假三天，之后，唐肃宗也照此办理。后来，代宗、德宗、顺宗三朝都没有设置这一节日名称。直到唐文宗以后，才像玄宗时一样盛宴庆贺。由此可知，寿诞受贺之礼，大致从唐穆宗长庆年间一直沿用到现在。

左氏书事

【原文】 《左传》书晋惠公背秦穆公事曰：“晋侯之入也，秦穆姬属贾君焉，且曰，尽纳群公子。晋侯 于贾君，又不纳群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晋侯许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东尽虢略，南及华山，内及解梁城，既而不与；晋饥，秦输之粟，秦饥，晋闭之籴。故秦伯伐晋。”观此一节，正如狱吏治囚，蔽罪议法，而皋陶听之，何所伏辜，不待韩原之战，其曲直胜负之形见矣。晋厉公绝秦，数其五罪，书词铿訇，极文章鼓吹之妙，然其实皆诬秦。故《传》又书云：“秦桓公既与晋厉公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与楚，欲道以伐晋。”杜元凯注云：“据此三事，以正秦罪。”左氏于文，反复低昂，无所不究其至。观秦、晋争战二事，可窥一斑矣。

【译文】 《左传》记晋惠公背弃秦穆公一事说：“晋惠公要回晋国的时候，秦穆姬把帮助惠公登基的事托附于贾君，并且说：要让各位公子都回晋国。可是晋惠公后来与贾君私通，又不让群公子归国，因此，秦穆姬非常怨恨贾君；晋惠公曾许诺中大夫里克，事成之后，把汾阳一带赏给他作为封地，后来也背弃了诺言；回国前他曾答应秦穆公，一旦在秦国的帮助下得到王位，要把黄河以南的王城割给秦国，东面包括虢略（今河南灵宝），南边到了华山，黄河以北包括解梁城（今山西临猗西南部），可是后来又不给；晋国遭到了饥荒，秦国援助了许多粮食，可秦国遇到饥荒的时候，晋国则严密封锁边关，不卖一粒粮食给秦国。因此秦穆公决计讨伐晋国。”根据这段叙述，真如法官审判犯人，以罪绳之以法，想逃遁是办不到的。就是古代最贤明的执法官皋陶听了，也会服气

的。不必等到秦晋两国的韩原（一说为今陕西韩城西南，一说为今山西芮城）大战，双方的是非曲直和胜负形势已经一目了然了。晋厉公与秦断交时，曾罗列秦王的五条罪状，言词铿锵有力，极尽其夸张鼓动之能事，然而实际上都是诬陷。于是《左传》又写道：“秦桓公已经与晋厉公订立了令狐（今山西临猗西）之盟，可是又与北方的狄人和南方的楚国商议讨伐晋国的事。”杜预注释说：“根据上述三件事，就可以认定秦国伐晋并无罪过。”左丘明《左传》的行文真是起伏跌宕，没有一件事不是追根求源。看看秦、晋之间的这两次战事，也就可以窥见其一斑了。

狐突言词有味

【原文】 晋侯使太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以十二月出师，衣之偏衣，佩之金玕。《左氏》载狐突所叹八十余言，而词义五转。其一曰：“时，事之征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其二曰：“敬其事，则命以始。服其身，则衣之纯。用其衷，则佩之度。”其三曰：“今命以时卒，睟其事也。衣之矜服，远其躬也。佩以金玕，弃其衷也。”其四曰：“服以远之，时以睟之。”其五曰：“矜凉，冬杀，金寒，玕离。”其宛转有味，皆可咀嚼。《国语》亦多此体，有至六七转，然大抵缓而不切。

【译文】 晋献公派太子申生讨伐东山皋落氏，以十二月出兵，给他穿一件杂色的衣服，佩挂着金饰的玉块。《左传》记狐突所叹息的八十多字，而文词意思五次转折。其一说：“时节，是事情的征验。衣饰，是人身的标志。佩饰，是衷心的象征。”其二说：“敬慎这件事，就以一年之始来颁布命令。给他以适当的服饰，就应使他穿得一色的衣服。诚心地使用他，就给他合适的佩饰。”其三说：“现在命令他的时节，是一年将尽的时候，这是让事情做不通。给他穿杂色的衣，是疏远他的身份。给他佩金玕，是内心抛弃他。”其四说：“服色上疏远他，时间上穷尽他。”其五说：“杂色寒凉，冬天有杀气，金很冷，玕有离别之意。”这文章宛转有滋味，都可以反复体味。《国语》也多有这种文体，有至六七个转折的，但大抵疏缓而不恳切。

宣发

【原文】 《孝工记》：“车人之事，半矩谓之宣。”注：“头发飘落曰宣。《易》：‘《巽》为宣发。’宣字本或作寡。”《周易》：“《巽》为寡发。”《释文》云：“本又作宣，黑白杂为宣发。”宣发二字甚奇。

【译文】 《孝工记》上说：“做车的工匠把半个方矩称为‘宣’。”注释说：“头发花白脱落叫‘宣’。《易经》说：‘《巽》卦为宣发。’‘宣’字本来有时也写作‘寡’。”《周易》说：“《巽》为寡发。”《释文》说：“‘寡’字本来又当作宣，黑白颜色相混杂的头发就是宣发。”“宣发”这两个字实在太奇怪了。

邾文公、楚昭王

【原文】 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迁也吉莫如之。”遂迁于绎，未几而卒。君子曰：“知命。”楚昭王之季年，有云如众赤鸟，夹日以飞三日。周太史曰：“其当王身乎？若矐之，可移于令尹、司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置诸股肱，何益？不眴不有大过，天其夭诸？有罪受罚，又焉移之？”遂弗。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国也宜哉！”按宋景公出人君之言三，荧惑为之退舍；邾文、楚昭之言，亦是物也，而终不蒙福，天道远而不可知如此。

【译文】 邾文公占卜迁都到绎的地方，巫史说：“有利于百姓而不利于君主。”邾文公说：“我的性命本在于爱养百姓，死的日子远近，只是时间问题。百姓如果得利，迁都的吉利就无可比拟了。”就迁都于绎，不久而死。君子评论说：“邾文公懂得天命。”楚昭王的末年，有云像许多红色的鸟，夹着太阳而飞共三天。周朝的太史说：“这会应在大王身上吧！如果祭祷它，可以把灾祸移在令尹和司马身上。”楚王说：“除去心腹的灾祸而移到股肱，又有什么好处？我没有大过失，老天会叫我夭亡？有罪而受罚，又怎能移给别人？”就不祭祷。孔子说：“楚昭王懂得大道了，他的不致失去国家是合理的！”按：宋景公说了有人君之德的话三句，荧惑（火星）为此后退了位置，邾文公、楚昭王的话，也是这道理，而没有得到福佑，天道悠远而不可预知竟至如此。

杜睨

【原文】 唐懿宗咸通二年二月，以杜睨为相。一日，两枢密使诣中书，宣徽使杨公庆继至，独揖睨受宣，三相起避。公庆出书授睨，发之，乃宣宗大渐时，宦官请郢王监国奏也。且曰：“当时宰相无名者，当以反法处之。”睨反复读，复封以授公庆，曰：“主上欲罪宰相，当于延英面示圣旨。”公庆去，睨谓两枢密曰：“内外之臣，事犹一体。今主上新践阼，固当以仁爱为先，岂得遽赞成杀宰相事！若习以性成，则中尉、枢密岂得不自忧乎！”两枢密相顾默然，徐曰：“当具以公言白至尊，非公重德，无人及此。”三相复来见睨，微请宣意，睨无言。三相惶怖，乞存家族。睨曰：“勿为他虑。”既而寂然。及延英开，上色甚悦。此《资治通鉴》所载也。

《新唐史》云：“宣宗世，夔王处大明宫，而郢王居十六宅。帝大渐，遗诏立夔王，而中尉王宗贯迎郢王立之，是为懿宗。久之，遣枢密使杨庆诣中书独揖睨。他宰相毕曠、杜审权、蒋伸不敢进，乃授睨中人请帝监国奏，因谕睨劾大臣名不在者。睨语之如前所云，庆色沮去，帝怒亦释。予以史考之，懿宗即位之日，宰相四人，曰令狐綯、曰萧邺、曰夏侯孜、曰蒋伸，至是时唯有伸在，三人者罢去矣。曠及审权乃懿宗自用者，无由有斯事。盖野史之妄，而二书误采之。温公以唐事属之范祖禹，其审取可谓详尽，尚如此。信乎，修史之难哉！”

【译文】 唐懿宗咸通二年（861年）二月，以杜睨为宰相，有一天，有两个枢密使来到中书省，宣徽使杨公庆跟着来了，单独向杜睨作揖叫他接受宣旨，其他三个宰相起来回避。杨公庆拿出诏书交给杜睨，打开看，是说宣宗临死时，宦官请求郢王监国的奏章，而且说：“当时宰相没有列名字的，应当以谋反的法律处置他们。”杜睨反复地阅读，又封好把它交给杨公庆，说：“皇上要加罪于宰相，应当在延英殿当面下达圣旨。”杨公庆去后，杜睨对两个枢密使说：“内廷和外朝的官员，事实上本属一体，现在皇上刚登位，自然应当以仁爱为首先要务，岂可马上赞成杀宰相的事！如果习惯了养成性格，那中尉、枢密使难道能不自己感到忧虑吗！”两个枢密使相对沉默无言，慢慢地说：“应该把您全部的话告诉皇上，如果不是您深厚的德行，没人想到这些。”三个宰相又来见杜睨，稍稍请问宣旨的意思，杜睨不说话。三个宰相很惶恐，要求保全家族。杜睨说：“不必有其他顾虑。”以后就寂然没有声音。到延英殿见面时，皇上脸色很高兴。这是《资治通鉴》所记的。《新唐书》说：“宣宗时，夔王住在大明宫，

而郢王住在十六宅。宣宗临死，遣诏立夔王，而中尉王宗贯迎郢王立为皇帝，就是懿宗。过了很久派枢密使杨庆去中书省光向杜耽作揖受命令。其他宰相毕沅、杜审权、蒋伸不敢进去，于是杨庆授给杜耽以宦官请懿宗监国的章奏，因此命令杜耽劾奏大臣中名字不在章奏上的人。杜耽对他像前面所讲的那样说，杨庆脸色沮丧而去，皇帝的怒气也消了。”我以历史来考订此事，懿宗即位的日子，宰相四人，叫令狐绹、叫萧邺、叫夏侯孜、叫蒋伸，到这时只有蒋伸在位，其他三人久已罢官去了。毕沅和杜审权是懿宗自己起用的，不可能有这事。这是野史的胡乱记载，而《通鉴》、《新唐书》二书错误地采取了它。温公（司马光）把唐代史事交托给范祖禹，他的审查采取史料可称详细齐备，还有这样的事。确实，修史之难啊！

唐书世系表

【原文】 《新唐·宰相世系表》皆承用逐家谱牒，故多有谬误，内沈氏者最可笑。其略云：“沈氏出自姬姓。周文王子聃叔季，字子揖，食采于沈，今汝南平舆沈亭是也。鲁成公八年，为晋所灭。沈子生逞，字修之，奔楚，遂为沈氏。生嘉，字惟良，嘉生尹戊，戊生诸梁，诸梁子尹射，字修文。其后入汉，有为齐王太傅敷德侯者，有为骠骑将军者，有为彭城侯者。”《宋书》沈约《自叙》云：“金天氏之后，沈国在汝南平舆，定公四年，为蔡所灭。秦末有逞者，征丞相不就。”其后颇与《唐表》同。按聃季所封自是一国，与沈了不相涉。《春秋》成公八年，晋侵沈，获沈子揖。昭二十三年，吴败顿、胡、沈、蔡之师于鸡父，沈子逞灭。定四年，蔡灭沈，杀沈子嘉。今《表》云：聃季字子揖，成八年为晋所灭，是文王之子寿五百余岁矣。逞为吴所杀，而《表》去奔楚，《宋书》云秦召为丞相。沈尹戊为楚将，战死于柏举，正与嘉之死同时，而以为嘉之子。尹射书于《左传》，三十四年始书诸梁，乃以为其子。又春秋时人立字皆从子及伯仲，岂有修之、惟良、修文之比？《汉列侯表》岂有所谓敷德、彭城侯？《百官表》岂有所谓骠骑将军沈达者？沈约称一时文宗，妄谱其上世名氏官爵，因可嗤诮，又不分别两沈国。其金天氏之裔，沈、瞻、蓐、黄之沈，封于汾川，晋灭之，春秋之沈，封于汝南，蔡灭之。顾合而为一，岂不读《左氏》乎？欧阳公略不笔削，为可恨也！

【译文】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都是承袭使用各家的谱牒，所以错误很多，其中沈氏的世系最可笑，它的大略说：“沈氏出自姬姓。周文王儿子聃叔季，

字子揖，享受采邑于沈，现在汝南平舆县的沈亭就是这地方。鲁成公八年（前583），被晋国所灭。沈君（子爵）生沈逞，字修之，出奔楚国，就成为沈氏。沈逞生沈嘉，字惟良，沈嘉生沈尹戌，沈尹戌生沈诸梁，沈诸梁的儿子沈尹射，字修文。他们的后代到汉朝，有任齐王太傅敷德侯的，有任骠骑将军的，有封彭城侯的。”《宋书》沈约《自序》说：“金天氏的后代。沈国在汝南平舆，鲁定公四年（前605），被蔡国所灭。秦末有沈逞其人，被徵为丞相不去就职。”这后面和《唐表》很多相同的。按聃季所封的别是一国，和沈国毫不相干。春秋成公八年，晋国侵伐沈国，俘获沈国君主揖。昭公二十三年（前519），吴国打败顿、胡、沈、蔡的军队于鸡父，沈国君主逞被灭。定公四年，蔡国定公四年，蔡国灭沈国，杀学甸君主嘉。现在《表》中说聃季字不揖，鲁成公八年被晋所灭，这是说文王的儿子寿命有五百多岁了。逞被吴所杀，而《表》说逃奔楚国，《宋书》说秦朝时徵召为丞相。沈尹戌是楚国的将军，战死于柏举，正和嘉之死同一时间，而以为是嘉的儿子。尹射记在《左传》，三十四年才记诸梁的事，却以为是他儿子。又春秋时人起表字都叫“子”和“伯”“仲”，岂有“修之”、“惟良”、“修文”这一类叫法。《汉书》记列侯的表中，岂有所谓“敷德侯”、“鼓城侯”？《百官表》岂有所谓骠骑将军沈达的？沈约号称为一时文章的宗主，胡乱地为他上世的姓名官爵作谱，固然可以讥笑指责，又不分别两个沈国。其中金天氏的后代，沈、昧、蓐、黄的沈，封在汾川，被晋所灭；春秋的沈，封于汝南，被蔡所灭，却被合成一个国家，难道不读《左氏传》吗？欧阳公（欧阳修）丝毫不加笔削，这是可以遗憾的。

鲁昭公

【原文】 春秋之世，列国之君失守社稷，其国皆即日改立君，无虚位以俟者。惟鲁昭公为季孙意如所逐而孙于齐，又适晋，凡八年乃没。意如在国摄事主祭，岁具从者之衣履而归之于乾侯。公薨之明年，丧还故国，然后其弟公子宋始即位，他国无此比也。岂非鲁秉周礼，虽不幸逐君，犹存厥位，而不敢绝之乎？其后哀公孙于越，《左传》终于是年，不知悼公以何时立也。

【译文】 春秋时代，各诸侯国的国君一旦失去了王位，这个国家马上就另立新君，没有虚位以待的。唯独鲁昭公被擅权的季孙意如驱逐后，先逃亡齐国，后来又回到晋国，流亡了八年才死去。这八年间季孙意如在国内总揽大权，主持祭祀，并且每年都把参加祭祀的人的衣物交给乾侯。鲁昭公死后第二年，灵柩

送回鲁国，然后他的弟弟公子宋才登基，其他国家没有这种事。这大概是因为鲁国坚持了周朝的礼仪，即使国君不幸被驱逐了，也要继续保留他的君位，而不敢立新君。后来鲁哀公逃亡到了越国，但是《左传》记事到这时为止，此后鲁悼公究竟何时继承了哀公的王位，也就知道了。

州县失故名

【原文】 今之州县，以累代移徙改割之故，往往或失其故名，或州异而县不同者。如：建昌军在江西，而建昌县乃隶南康；南康军在江东，而南康县乃隶南安；南安军在江西，而南安县乃隶泉州；韶州为始兴郡，而始兴县外属赣州为南康郡，而南康县外属郁林为州，而郁林县隶贵州；桂阳为军，而桂阳县隶郴州。此类不可悉数。

【译文】 当今的州县，因为历代治所的迁移和隶属关系的改变，所以有些州县原来的名字消失了，有些出现州县不一致的情况。例如，建昌军（治今江西南城）在江西，可是建昌县却隶属于南康军（治今江西星子）；南康军在江东，可是南康县却隶属于南安军（治今江西大余县）；南安军在江西，可是南安县却隶属于泉州（今属福建）；韶州（治今广东韶关）为始兴郡郡治所在地，可是始兴县却远离始兴郡而隶属于赣州（今属江西），为南康郡郡治所在地，而南康县又远离南康郡而隶属于郁林州（治今广西玉林市），郁林县又远离郁林州而隶属于贵州（治今广西贵县）；桂阳（今属湖南）是个军，可是桂阳县却不隶属桂阳军而隶属于郴州（今属湖南）。这类例子是数不胜数的。

严州当为庄

【原文】 严州本名睦州，宣和中以方寇之故改焉。虽以威严为义，然实取严陵滩之意也。殊不知子陵乃庄氏，东汉避显宗讳，以“庄”为“严”，故史家追书以为严光，后世当从实可也。

【译文】 严州（今浙江建德县东北梅城镇）本名睦州。徽宗宣和年间因为方腊起义而改为严州。之所以改为严州，虽然也有表示威严的意思，而实际上则是因为东汉严光避居之地严陵滩在此地。殊不知，严光（字子陵）本姓庄，东汉时为了避显宗孝明帝刘庄的名讳才字改为姓“严”。于是史学家们就写成了严光。后代的人应该实事求是地将“严光”改为“庄光”。

卷七

孟子书百里奚

【原文】 柳子厚《复杜温夫书》云：“生用助字，不当律令，所谓乎、欤、耶、哉、夫也者，疑辞也。矣、耳、焉也者，决辞也。今生则一之，宜考前闻人所使用，与吾言类且异，精思之则益也。”予读《孟子》百里奚一章曰：“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繆公之为污也，可谓智乎？不可谏而不谏，可谓不智乎？知虞公之将亡而先去之，不可谓不智也。时举于秦，知繆公之可与有行也而相之，可谓不智乎？”味其所用助字，开阖变化，使人之意飞动，此难以为温夫辈言也。

【译文】 柳宗元在《复杜温夫书》中说：“你写文章，使用助字，不合法则。常见的所谓乎、欤、耶、哉、夫等，是疑问词，表示疑问的意思。所谓矣、耳、焉等，是判断词，表示判断的意思。而今，你把这些字混为一谈。应当仔细查考前人对这些字的用法，若与我上面所说的不同时，进行认真的思考分析就会得启发，解决疑问。”我在读《孟子》一书时，见到关于百里奚的一段记载：万章问道：有人说百里奚把自己卖给秦国养牲畜的人，得到五张公羊皮，任务是养牛，然后他以此来干求秦穆公，这话可信吗？其回答是：他竟不知道用饲养牛的方法来干求秦穆公之举“为污也，可谓智乎？”他预见到虞公不可以劝阻，便不去劝阻，“可谓不智乎？”他又预见到虞公将要灭亡，因而早早离开，“不可谓不智也”。当他在秦国被推举出来的时候，便知道秦穆公是一位可以帮助而大有作为的君主，“可谓不智乎”？仔细辨别所使用的助字，开合变化，使人思绪飞动，这不是温夫之辈所能明白的。

韩柳为文之旨

【原文】 韩退之自言：作为文章，上规姚、瞽、《盘》、《诰》、《春秋》、《易》、《诗》、《左氏》、《庄》、《骚》、太史、子云、相如，阅其中而肆其外。柳子厚自言：每为文章，本之《书》、《诗》、《礼》、《春秋》、《易》，参之《谷梁

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韩、柳为文之旨，要学者宜思之。

【译文】 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曾说：写文章时，应当师法上古的名著名篇，诸如《尚书·盘庚》以及诸诰篇、《春秋》、《易经》、《诗经》、《左传》、《庄子》、《离骚》，以及司马迁、扬雄、司马相如的文章。

柳宗元则认为，写文章时，首先应当以《尚书》、《诗经》、《礼记》、《春秋》、《易经》根本，然后参照《谷梁传》的写法，可使文章思路开阔，气势磅礴。参照《孟子》、《荀子》，可使文章语气温流畅，说理精当。参照《庄子》、《老子》，可使文章酣畅泼墨，妙笔生花。参照《国语》，可使文章情趣横生，耐人寻味。参照《离骚》，可使文章意境幽远，发人深省。参照《史记》，可使文章语言优美，简洁精练。

韩愈、柳宗元二人为唐代文学大家。他们的写作方法和经验，学习写作的人应当高度重视。

李习之论文

【原文】 李习之《答朱载言书》论文最为明白周尽，云：“《六经》创意造言，皆不相师。故其读《春秋》也，如未尝有《诗》也；其读《诗》也，如未尝有《易》也；其读《易》也，如未尝有《书》也；其读屈原、庄周也，如未尝有《六经》也。如山有岱、华、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荣，不必均也。如渚有济、淮、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浅深，不必均也。天下之语文章有六说焉：其尚异者曰，文章词句，奇险而已；其好理者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溺于时者曰，文章必当对；病于时者曰，文章不当对；爱难者曰，宜深，不当易；爱易者曰，宜通，不当难。此皆情有所偏滞，未识文章之所主也。义不深不至于理，而辞句怪丽者，有之矣，《剧秦美新》、王褒《僮约》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词章不能工者有之矣，王氏《中说》、俗传《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极于工而已，不知其辞之对与否、易与难也。‘忧心悄悄，愠于群小’，非对也；‘遘闵既多，受侮不少’，非不对也；‘朕谗说殄行，震惊朕师’，‘菀彼桑柔，其下侯甸，捋采其刘’，非易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非难也。《六经》之后，百家之言兴，老聃、列、庄至于刘向、扬雄，皆自成一家之文，学者之所师归也。故义虽深，理

虽当，词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传也。”其论于文者如此，后学宜志之。

【译文】 李习之的《答朱载言书》，论述写文章之道最为明白、详尽。他说：“《诗经》、《书经》、《礼记》、《乐经》、《易》、《春秋》六经，创意用语，各有特点，互不仿效引用。所以在读《春秋》的时候，就如同不曾有过《诗经》。在读《诗经》的时候，就如同不曾有过《易经》。在读《易经》的时候，就如同不曾有过《书经》。甚至，读屈原、庄周的著作，也如同不曾有过《六经》。譬如高山，有泰山、华山、嵩山、衡山，它们共同的特点是高大，至于说山势、花草、林木等状况，则是不完全相同的。又如河流，有济水、淮河、黄河、长江，它们共同的特点是从发源地流出，最终注入大海，至于说河道的曲直，河水的深浅，则是不完全相同的。

现在天下人对于作文章，有六种观点。崇尚奇特的人说，文章的语言词句，要奇特惊险。重视道理的人说，文章叙事论理，要通顺流畅。拘泥时尚的人说，文章必须讲求对仗。反对时尚的人说，文章不应当讲求对仗。喜爱难的人说，主张文章应当深奥，而不应当浅显。喜爱容易的人则说，文章应当通俗，而不应当深奥。这六种观点，都是由于人的情感有所偏颇，不懂得文章的主题总旨为何。有些文章义理讲得浮浅不透彻，但是词句离奇华美，如扬雄的《剧秦美新》、王褒的《僮约》，便是如此。有些文章讲道理讲得很正确，但是不注意修辞，语言不优美，如王通的《中说》、俗传《太公家教》，便是如此。古时候的人，能够在语言文字上狠下一番工夫，却不大注意其词是对仗还是不对仗，是浅易还是艰深。‘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并不对仗。‘遘闵既多，受侮不少’，则很对仗。‘朕眎谗说殄行，震惊朕师’，‘菀彼桑柔，其下侯甸，捋采其刘’，并不容易。而‘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则并不难。自从《六经》出现之后，百家之言纷纷兴起，老聃、列子、庄子，以至于刘向、扬雄，在文坛上都自成一家。学习写文章的人，纷纷以他们为师。所以，有些文章即使道理讲得很深，说理亦很恰当，但是如果语言文字不好，就不能算是好文章，亦不应当传之于世。”李习之关于文章的论述，大致就是这样。作为后学，应当牢记于心。

魏郑公谏语

【原文】 魏郑公谏止唐太宗封禅，中间数语，引喻剀切，曰：“今有人十年长患，疗治且愈，此人应皮骨仅存，便欲使负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

隋氏之乱，非止十年，陛下为之良医，疾苦虽已安，未甚充实。告成天地，臣切有疑。”太宗不能夺。此语见于公《谏录》及《旧唐书》，而《新史》不载，《资治通鉴》记其谏事，亦删此一节，可惜也！

【译文】 封禅祭祀天地是古代帝王的一件大事。唐太宗也想仿效历代帝王前往泰山封禅，魏征竭力劝阻。他以确切的比喻、中肯的言词对唐太宗说：“现在有这么一个人，患病十年，卧床不起，经过治疗，逐渐痊愈。此人瘦得皮包骨头，如果一定要让他背一石米，一天走上一百里路，那是绝对不行的。隋朝末年，社会动乱不止十年，陛下作为良医，精心调治，虽然取得成效，天下太平无事，但是百姓还不富裕。在这个时候，隆重举行封禅大典，敬告天地大功告成，臣我实在怀疑这种做法是否得当。”唐太宗听了，无言反驳。魏征的这一段话，见于魏征的《谏录》和《旧唐书》，但《新唐书》中没有记载。《资治通鉴》里载有魏征劝谏的事迹，不知是什么原因，也删去了这一段话，真是太可惜了！

虞世南

【原文】 虞世南卒后，太宗夜梦见之，有若平生。翌日，下制曰：“世南奄随物化，倏移岁序。昨因夜梦，忽睹其人，追怀遗美，良增悲叹！宜资冥助，申朕思旧之情，可于其家为设五百僧斋，并为造天尊像一躯。”夫太宗之梦世南，盖君臣相与之诚所致，宜恤其子孙，厚其恩典可也。斋僧、造像，岂所应作？形之制书，著在国史，惜哉，太宗而有此也！

【译文】 虞世南去世后，唐太宗夜里梦见他，如同平常活着一样。第二天，下诏书说：“世南随着万物变化而去，很快已经有年头了。昨天因为夜里做梦，忽然见到他这个人，回想起他遗留下的美德，实在是增加了悲伤叹息。应当对他在地下加以帮助，以表示我的思念旧臣的心情。可以在他家里为他设置五百位僧人的斋饭，并且为他制做天尊像一躯。”太宗梦见虞世南，只是因为君臣交往的诚心而到这地步的，抚恤他的子孙，厚厚地给予恩典是可以的，斋僧、造像，难道是应该做的吗？这件事表现于诏书上，记载于国史中，可惜啊，作为唐太宗而竟做出这样的事来！

七发

【原文】枚乘作《七发》，创意造端，丽旨腴词，上薄《骚》些，盖文章领袖，故为可喜。其后继之者，如傅毅《七激》、张衡《七辩》、崔《七依》、马融《七广》、曹植《七启》、王粲《七释》、张协《七命》之类，规仿太切，了无新意。傅玄又集之以为《七林》，使人读未终篇，往往弃诸几格。柳子厚《晋问》，乃用其体，而超然别立新机杼，激越清壮，汉、晋之间，诸文士之弊，于是一洗矣。东方朔《答客难》，自是文中杰出，扬雄拟之为《解嘲》，尚有驰骋自得之妙。至于崔《达旨》、班固《宾戏》、张衡《应闲》，皆屋下架屋，章摹句写，其病与《七林》同，及韩退之《进学解》出，于是一洗矣。《毛颖传》初成，世人多笑其怪，虽裴晋公亦不以为可，惟柳子独爱之。韩子以文为戏，本一篇耳，妄人既附以《革华传》，至于近时，罗文、江瑶、叶嘉、陆吉诸传，纷纭杂沓，皆托以为东坡，大可笑也。

【译文】枚乘的《七发》，创意新颖，语言优美，已与名篇《离骚》相近。作为文章的典范，这是十分可喜的。其后，如傅毅的《七激》、张衡的《七辩》、崔真的《七依》、马融的《七广》、曹植的《七启》、王粲的《七释》、张协的《七命》等等，都是模仿《七发》，亦步亦趋，毫无新意。傅玄又将上述文章汇集成册，取名为《七林》。由于格调类同，读起来索然无味，还没读到最后一篇，就往往昏昏欲睡，于是急忙弃之高阁。但是，柳宗元所写的《晋问》一文，亦是采用《七发》的体例，但他并不生搬硬套，而是匠心独运，大胆创新，文章构思新颖，布局奇巧，高昂激烈，清秀雄伟。汉、晋之间，文坛上那种华而不实的弊病，为之一扫而光。

东方朔所写的《答客难》一文，自然是文章中非常杰出的一篇，扬雄仿之作《解嘲》，尚有纵横驰骋自得之妙。至于说崔真所写的《达旨》、班固所写的《宾戏》、张衡所写的《应闲》，都是屋下架屋，机械地摹仿每一章每一句，毫无新意。其弊病与《七林》相同。等到韩愈《进学解》问世，才一扫那种机械模仿、华而不实的风气。《毛颖传》刚刚问世的时候，遭到很多人的讽刺嘲笑，认为写得很怪。即使裴度也有些不以为然，只有柳宗元喜欢这篇文章。

韩愈以文为戏，本来就只有这一篇，无知妄为的人又牵强附会地加上《革华传》。而近年来，罗文、江瑶、叶嘉、陆吉诸传，纷纭杂乱，都假托为苏东坡所作，实在是天大的笑话。

将军官称

【原文】 《前汉书·百官表》：“将军皆周末官，秦因之。”予按《国语》：“郑文公以詹伯为将军。”又：“吴夫差十旌一将军。”《左传》：“岂将军食之而有不足。”《檀弓》：“卫将军。”《文子》：“鲁使慎子为将军。”然则其名久矣。彭宠为奴所缚，呼其妻曰：“趣为诸将军办装。”《东汉书》注云：“呼奴为将军，欲其赦己也。”今吴人语犹谓小苍头为将军，盖本诸此。

【译文】 《前汉书·百官表》：“将军都是周朝末年的官号，秦朝因袭而没有改动。”我查考《国语》“郑文公任命詹伯为将军”。又同书“吴王夫差出兵，一万人由一位将军统率”，《左传》“难道将军吃这些还不够”，《礼记·檀弓》“卫国的将军”，《文子》“鲁国任命慎子为将军”，那么这一名称来源也很久了。彭宠为奴仆捆绑，喊他的妻子说：“快点为诸位将军置办行装。”《后汉书》注释说：“把奴仆称为将军，这是要他们赦免自己。”至今吴地人还称小家奴为“将军”，原来是根据这段记载。

北道主人

【原文】 秦、晋围郑，郑人谓秦盍舍郑以为东道主。盖郑在秦之东，故云。今世称主人为主道者，此也。《东汉》载北道主人，乃有三事：“常山太守邓晨会光武于巨鹿，请从击邯郸，光武曰：‘伟卿以一身从我，不如以一郡为我北道主人。’”又“光武至蓟，将欲南归，耿 以为不可，官属腹心皆不肯，光武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彭宠将反，光武问朱浮，浮曰：‘大王倚宠为北道主人，今既不然，所以失望。’”后人罕引用之。

【译文】 秦国和晋国结成联盟，围攻郑国。郑人说秦国为什么不把郑国留下作为东道主。这是因为郑国位于秦国东部，所以这样说的。现在人们称主人为主道主，其由来就在于此。

《后汉书》中载有北道主人，共有三件事：

其一是《邓晨传》中记载：常山（治今河北唐县倒马关）太守邓晨（字伟卿）与汉光帝刘秀在巨鹿（今河北平乡）相会，邓晨要求跟随光武帝进攻邯郸（今属河北）的王朗。光武帝回答说：“伟卿你一人跟随我出战，不如以一郡之

地作为我的北道主人。”

其二是《耿弇传》记载，耿弇跟随汉光武帝来到了蓟州（治今河北蓟县）。听说敌方的军队已到邯郸，光武帝想率师南归，于是便召集各位将领商议。耿弇不赞成光武帝南归，认为只要调集渔阳（今河北密云）、上谷（今河北怀来东南）两郡的兵力，邯郸是不必多虑的。而光武帝的部下心腹们则不赞成这一意见。光武帝在进行裁决时，指着耿弇对众将说：“这是我的北道主人。”

其三是《彭宠传》记载，彭宠投归汉光武帝后，授予大将军之职。不久，又想举兵反叛。光武帝问幽州（治今北京市）牧朱浮：“彭宠为什么反叛？”朱浮说：“当初，彭宠率众来归，你赠送他衣服佩剑，依靠他为北道主人。二人亲切握手，交欢并坐。如今不是这样，所以他感到失望。”这里三处提到北道主人，但后世很少有人引用。

洛中盱江八贤

【原文】 司马温公《序赠礼》，书闾阎之善者五人，吕南公作《不欺述》，书三人，皆以卑微不见于史氏。予顷修国史，将以缀于孝行传而不果成，聊纪之于此。温公所书皆陕州夏县人。曰医刘太，居亲丧，不饮酒食肉终三年，以为今世士大夫所难能。其弟永一，尤孝友廉谨。夏县有水灾，民溺死者以百数，永一执竿立门首，他人物流入门者，辄出之。有僧寓钱数万于其室而死，永一诣县自陈，请以钱归其子弟。乡人负债不偿者，毁其券。曰周文粲，其兄嗜酒，仰弟为生，兄或时酗殴粲，邻人不平而唁之，粲怒曰：“兄未尝殴我，汝何离间吾兄弟也！”曰苏庆文者，事继母以孝闻，常语其妇曰：“汝事吾母小不谨，必逐汝！”继母少寡而无子，由是安其室终身。曰台亨者，善画，朝廷修景灵宫，调天下画工诣京师，事毕，诏选试其优者，留翰林授官禄，亨名第一。以父老固辞，归养于田里。

南公所书皆建昌南城人。曰陈策，尝买骡，得不可被鞍者，不忍移之他人，命养于野庐，俟其自毙。其子与猾狙计，因经过官人丧马，即磨破骡背，以炫贾之。既售矣，策闻，自追及，告以不堪。官人疑策爱也，秘之。策请试以鞍，亢亢终日不得被，始谢还焉。有人从策买银器若罗绮者，策不与罗绮。其人曰：“向见君帑有之，今何靳？”策曰：“然，有质钱而没者，岁月已久，丝力糜脆不任用，闻公欲以嫁女，安可以此物病公哉！”取所当与银器投炽炭中，曰：“吾恐受质人或得银之非真者，故为公验之。”曰危整者，买鲍鱼，其狙舞秤权阴厚

整。鱼人去，身留整傍，请曰：“公买止五斤，已为公密倍入之，愿畀我酒。”整大惊，追鱼人数里返之，酬以直。又饮驢醇酒，曰：“汝所欲酒而已，何欺寒人为？”曰曾叔卿者，买陶器欲转易于北方，而不果行。有人从之并售者，叔卿与之，已纳价，犹问曰：“今以是何之？”其人对曰：“欲效公前谋耳。”叔卿曰：“不可，吾缘北方新有灾荒，是故不以行，今岂宜不告以误君乎？”遂不复售。而叔卿家苦贫，妻子饥寒不恤也。呜呼，此八人者贤乎哉！

【译文】 司马温公（司马光）《序赠礼》，记载了乡里市井中五个有道德的人，吕南公写作《不欺述》，记载了三个人，都是因为卑贱低下而不见于历史典籍。我最近正在编修国史，打算编进《孝行传》中而不能实现，姑且记载在这里。司马温公所记载的都是陕州夏县人。一个是医生刘太，在为父母亲服丧期间，不喝酒不吃肉三年之久，温公认为是当今士大夫所难于做到的。他的兄弟刘永一，尤其孝顺友爱廉洁谨慎。夏县发生水灾，百姓淹死的数以百计。刘永一拿着竹竿站在门口，别人家里的东西漂流进家门的，就拨出去。有一个和尚在他家里寄存了几万钱后来死了，刘永一去到县官衙门里自己报告，请求把钱归还给和尚的亲戚后辈。乡里人欠他钱不还的，就把借据毁了。一个是周文粲，他的哥哥喜欢喝酒，依靠兄弟过日子。哥哥有时喝醉了殴打周文粲，邻居抱不平来安慰他，周文粲发怒说：“哥哥没有殴打我，你为什么要挑拨我们的兄弟关系呢？”一个叫苏文庆的人，奉事继母以孝顺闻名，他常常对他妻子说：“你侍候我母亲只要稍有疏忽，一定赶你出门。”继母年轻守寡而又没有亲生儿子，因此安心地住在他家一辈子。一个叫眭亨的人，善于画画，朝廷修建景灵宫，调集天下的画师去到京城绘画，事情完了，皇帝下诏选择考试其中技艺高超的，留在翰林院授给官职俸禄。眭亨名列第一，由于父亲年老坚决辞谢，回乡在农村奉养父亲。

吕南公所记载的都是建昌南城人。一个是陈策，他曾经买一头骡子，可是误买了不能放置鞍子的骡子。他不忍心把骡子转手给别人，叫人把它养在野外草棚里，等它自己死去。陈策的儿子和狡猾的市场经纪人合谋，乘路过当地的官员丢失了马，就磨破骡子的背部表示刚卸下鞍子，沿街叫卖这头骡子。卖掉以后，陈策听说了这件事，亲自追上官员，告诉他说骡子不能使用。官员怀疑陈策爱惜不肯卖，不肯说出实情。陈策请他把鞍子试放上去，高高地整天放不上，这才返回来道谢。有人向陈策买银器和罗绮丝织品，陈策不卖给他罗绮。那个人说，“过去在您的库房里有这东西，现在为什么吝惜了？”陈策说。“是的。有人用它向我抵押银钱以后死了，时间已经很久，蚕丝松脆不堪使用，听说您要想作为女儿的陪嫁，哪里能用这东西来害您呢？”又取出抵押给他的银器掷到

烧旺的火炭里，说：“我恐怕抵押的人也许得到的不是真银器，所以为您试验一下。”有一个叫危整的，买咸鱼。市场经纪人在秤锤上做手脚偷偷地照顾危整，卖鱼人离开以后，自己就留下在危整旁边，请求说：“您要买的只是五斤，我已经为您暗地里加了一倍，希望您请我喝酒。”危整大吃一惊，追赶卖鱼人追了几里把他追回来，付给他报酬。又请经纪人喝甜酒，说：“你所要求的不过是酒罢了，为什么要欺骗穷人呢？”有一个叫曾叔卿的，买了一批陶器要转卖到北方去而没能成行，有人向他批发这批陶器，曾叔卿卖给他，已经交了货款，还是问他说：“现在你要把这批陶器运到哪里去？”那个人回答：“想学您过去的计划运去北方。”曾叔卿说：“不行。我因为知道北方最近发生灾荒，所以不运去，现在怎么能不告诉您这消息而误您的事呢？”于是就不再出售。而曾叔卿家里又很贫穷，妻子儿子忍饥挨冻却置之不顾。啊，像这八个人，真是有道德啊！

王导小名

【原文】 颜鲁公书远祖《西平靖侯颜含碑》，晋李闾之文也。云：“含为光禄大夫，冯怀欲为王导降礼，君不从，曰：‘王公虽重，故是吾家阿龙。’君是王亲丈人。故呼王小字。”《晋书》亦载此事，而不书小字。《世说》：“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叹曰：‘人言阿龙超，阿龙故自超。’”呼三公小字，晋人浮虚之习如此。

【译文】 唐朝著名书法家颜真卿曾抄写了晋人李闾为其远祖颜含所作的《西平靖侯颜含碑》文。碑文中写道：“颜含在东晋初年为光禄大夫，冯怀想让他为丞相王导施礼，颜含坚辞不从，说：‘王导地位虽高，权势虽重，却是我们家的阿龙。’颜含本是王导的亲丈人，所以他才这样称呼王导的小名。”《晋书》中也记载了这件事，而没有说是王导的小名。《世说新语》中写道：“王导由丞相被拜为司空时，廷尉桓温很有感慨地说：‘人们都说阿龙升得很快，阿龙也确实升得快。’”对位极人臣的三公直呼其小名，晋人的浮虚之习就是这样。

汉书用字

【原文】 太史公《陈涉世家》：“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又曰：“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叠用七死字，《汉

书》因之。《汉·沟洫志》载贾让《治河策》云：“河从河内北至黎阳为石堤，激使东抵东郡、平刚；又为石堤，使西北抵黎阳、观下；又为石堤，使东北抵东郡津北；又为石堤，使西北抵魏郡昭阳；又为石堤，激使东北。百余里间，河再西三东。”凡五用石堤字，而不为冗复，非后人笔黑畦径所能到也。

【译文】 西汉司马迁在《史记·陈涉世家》中，记载了陈胜的话说：“今天，逃跑也是一死，造反也是一死，同样都是死，何不为国而死呢？”又说道：“十个戍边者中，有六七个都逃脱不了死的厄运，况且壮士不死则已，死就得做大事，从而名扬天下！”连用了七个“死”字。《汉书》也沿袭了这种写法。《汉书·沟洫志》记载贾让的《治河策》中说：“黄河从河内（今河南武陟）向北流到黎阳（今河南浚县），在此段筑起石堤，使黄河折而向东流到东郡（今河南濮阳）的平刚；又筑起石堤，使黄河折而向西北流到黎阳、观一带；又筑起石堤，使黄河折而向东北流到东郡渡口北；又筑起石堤，使黄河折而向西北流到魏郡（今河北临漳南）的昭阳；又筑起石堤，使黄河折而向东北方向流动。百余里内，黄河向西拐了两个弯，向东拐了三个弯。”这段文字共用了五个“石堤”，但并不令人感到重复冗杂，这种文笔不是后人循规蹈矩，如法炮制所能达到的。

姜昵简狄

【原文】 毛公注《生民》诗，姜 生后稷“履帝武敏歆”之句，曰：“从于高辛帝而见于天也。”《玄鸟》诗，“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之句，曰：“春分玄鸟降，简狄配高辛帝，帝与之祈于郊 而生契，故本其为天所命，以玄鸟至而生焉。”其说本自明白。至《郑氏笺》始云：“帝，上帝也。敏，拇也。祀郊 时，有大人之迹，姜 履之，足不能满，履其拇指之处，心体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己者，遂有身，后则生子。”又谓：“ 遗卵，简狄吞之而生契。”其说本于《史记》，谓：“姜 出野，见巨人迹，忻然践之，因生稷。”“简狄行浴，见燕堕卵，取吞之，因生契。”此二端之怪妄，先贤辞而辟之多矣。欧阳公谓稷、契非高辛之子，毛公于《史记》不取履迹之怪，而取其讹缪之世次。按《汉书》，毛公赵人，为河间献王博士，然则在司马子长之前数十年，谓为取《史记》世次，亦不然。盖世次之说，皆出于《世本》，故荒唐特甚，其书今亡。夫适野而见巨迹，人将走避之不暇，岂复故欲践履，以求不可知之 祥；飞鸟堕卵，知为何物，而遽取吞之。以古揆今，人情一也。今之愚人未必尔，而谓古圣人之后妃为之，不待辨而明矣。

【译文】 毛公为《诗经》中的《生民》姜昵生后稷一事作注释，对“履帝武敏歆”（踩着高辛足迹的大脚趾而怦然心动）这一句诗，注释说：跟随着高辛氏而上朝于天。《玄鸟》诗中“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上天命令黑色的鸟儿下降而生了商朝的祖先）的诗句，注释说：“春分时节，黑色的鸟儿降临，高辛帝和妻子简狄一起在郊外祭祀主管子嗣之神，因而生了契，所以本来是天帝的意志，由于黑色鸟儿的降临而出生。”到郑氏（郑玄）的笺注才说：“帝，是天帝。敏，是大脚趾。在郊外祭祀主管子嗣之神的时候，发现巨人的足迹。姜昵踩上去，脚不能踩满足迹，踩到大脚趾处，心里怦怦然如同有夫妻性爱的感觉，于是就有了身孕而生下契。”“简狄外出洗澡，见到燕子生蛋，拿来吞吃了，于是就生下了契。”这两件事的奇怪荒唐，过去的前辈们对此辨驳的已经很多了。欧阳公（欧阳修）说稷和契并不是高辛氏的儿子，毛公在《史记》中不采用踩足迹这一怪异的传说而采用其中错误的世代次序。查核《汉书》，毛公是赵国人，做过河间献王的博士，那么他就应该在司马子长（司马迁）之前几十年，说毛公采用《史记》中的世代次序，也不对。谈到去野外而见到巨大的足迹，人们将会逃开躲避还来不及，难道再故意要踩上去，以求得不可预知的祥瑞；飞鸟生蛋，知道它是什么，而一下子把它吞吃下去？用古代衡量今天，人的想法是一样的。今天的愚人未必这样，而说古代圣人的后妃会这样做，这不必等待辨别就可以明白了。

羌庆同音

【原文】 王观国彦宾、吴 材老，有《学林》及《叶韵补注》、《毛诗音》二书皆云：“《诗》、《易》、《太玄》凡用庆字，皆与阳字韵叶，盖羌字也。引萧该《汉书音义》，庆音羌。又曰：“《汉书》亦有作羌者，班固《幽通赋》‘庆未得其云已’，《文选》作羌，而他未有明证。”予按《扬雄传》所载《反离骚》：“庆夭 而丧荣。”注云：“庆，辞也，读与羌同。”最为切据。

【译文】 王观国（彦宾）的《学林》、吴皆（材老）的《叶韵补注》和《毛诗音》二书，其中都说：《诗》、《易》、《太玄》中凡用“庆”字的地方，都与阳字韵叶，就是指“羌”字。萧该在《汉书音义》中也指出，庆音羌。又说：“《汉书》中，‘庆’也有写作‘羌’字的，东汉班固的《幽通赋》中写道‘庆未得其云已’，《昭明文选》在选用时把‘庆’字写作‘羌’，其他并无明证。”我看到《扬雄传》中所记载的他的《反离骚》中有：“庆夭昭而丧荣”之句，注释

中说：“庆，辞也，读音与羌相同。”这是最为贴切的证据。

佐命元臣

【原文】 盛王创业，必有同德之英辅，成垂世久长之计，不如是，不足以为一代宗臣。伊尹、周公之事见于《诗》、《书》，可考也。汉萧何佐高祖，其始入关，即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以周知天下 塞，户口多少，强弱处，民所疾苦。高祖失职为汉王，欲攻项羽，周勃、灌婴、樊哙皆劝之，何独曰：“今众弗如，百战百败，愿王王汉中，收用巴蜀，然后还定三秦。”王用其言。此刘氏兴亡至计也。进韩信为大将，使当一面，定魏、赵、燕、齐，高祖得颡心与楚角，无北顾之忧；且死，引曹参代己，而画一之法成；约三章以蠲秦暴，拊百姓以申汉德。四百年基业，此焉肇之。唐房玄龄佐太宗，初在秦府，已独收人物致幕下，与诸将密相申结，引杜如晦与参筹帷。及为宰相，粲然兴起治功，以州县成天下之治，以租庸调天下之财，以八百府、十六卫本天下之兵，以谏争付王、魏，以兵事付靖、 ，御夷狄有道，用贤材有术。三百年基业，此焉肇之。其后制节度使而州县之治坏，更二税法而租庸之理坏，变府兵为 骑、诸卫为神策而军政坏，虽有名臣良辅，不能救也。赵韩王佐艺祖，监方镇之势，削支郡以损其强，置转运、通判使掌钱谷以夺其富，参命京官知州事以分其党，禄诸大功臣于环卫而不付以兵，收天下骁锐于殿岩而不使外重。建法立制，审官用人，一切施为，至于今是赖。此三君子之后，代天理物，硕大光明者，世有其人，所谓一时之相尔。萧之孙有罪及无子，凡六绝国，汉辄绍封之。国朝褒录韩王苗裔，未尝或忘。唯房公之亡未十年，以其子故，夺袭爵、停配享，讫唐之世不复续，唐家亦少恩哉！

【译文】 盛世之君创业时，必须有同心同德、出类拔萃的辅佐之臣，制定长治久安之计，否则，就不足以称为一代杰出的大臣。伊尹、周公的事迹可以从《诗经》、《尚书》中考知。西汉萧何辅佐汉高祖，他们刚进入关中，萧何就把秦朝丞相府、御史大夫府中的律令图册收集起来，认真研究，借以详细了解天下的要塞户口的多少强弱之处，百姓的疾苦。汉高祖不得志被封为汉王，想进攻项羽。周勃、灌婴、樊哙都劝他这样做，惟独萧何说：“现在我们的人马比不上项羽，只要打起来一定打一仗败一仗，希望大王统领汉中，收取利用巴蜀，然后回来平定三秦。”汉王采用了他的话。这是刘氏兴亡最关重要的根本大计。他又保荐韩信为大将，让韩信独当一面，平定魏、燕、赵、齐，汉高祖才能专

心和楚霸王争斗，没有北方的后顾之忧。萧何快要死的时候，引荐曹参代替自己，而整齐划一的法令得以完成。约法三章以去除秦朝的暴政。安抚百姓以申明汉王的恩德。汉朝四百年的基业，就是从此开始的。唐朝房玄龄辅助唐太宗，起初在秦王府的时候，已经独独招聚有才能的人到秦府中，和各位将领暗中结交，引荐杜如晦参与机密。等到房玄龄做了宰相，辉煌地兴起治理天下的功绩，以州县为基础完成对天下的治理，以租庸的赋税制度征集天下的财富，以八百府、十六卫为天下军力的根本，把规劝谏阻之事交给王彖、魏征，把军权交给李靖、徐昉，驾御夷人，使用贤才都有合理的方法和权术。唐朝三百年的基业，就是从此开始的。在这以后，任命节度使而州县为基础的制度败坏，改成二税法而租庸的税制败坏，改变府兵为彍骑、各种卫为神策军而军政败坏，虽然有著名的大臣贤良的辅佐，已经不能挽救了。赵韩王（赵普）辅佐艺祖（宋太祖），鉴于前代藩镇的势力，撤除边支的郡以削弱他们的强大，设置转运，通判使掌管钱粮赋税以剥夺他们的财富，间隔使用京官治理州府以分散他们的党羽，给各位功臣以厚重的俸禄作为禁卫而不给于兵权，招集天下的骁勇精锐之士集中在京城而不让他们在外居功自重。创建法令确立制度，审核官员使用人才，一切措施，到今天还依靠这些。这三位君子以后，代表皇帝治理天下，宏大而光明磊落的，每一代都有这样的人，但只是所谓一个时期的宰相而已，萧何的孙子有罪而且没有后代，总共六次不能保住封国，汉朝就继续加封。本朝表扬录用赵韩王的后代，从来没有忘记。唯房公死去不到十年，由于他儿子的缘故，削去世袭的爵位，停止配享太庙，终于唐朝一代不再继续，唐朝李家也太缺少恩德了！

名世英宰

【原文】 曹参为相国，日夜饮醇酒不事事，而画一之歌兴。王导辅佐三世，无日用之益，而岁计有余，末年略不复省事，自叹曰：“人言我愤愤，后人当思我愤愤。”谢安石不存小察，经远无竞。唐之房、杜，传无可载之功。赵韩王得士大夫所投利害文字，皆置二大瓮，满则焚之。李文靖以中外所陈一切报罢，云：“以此报国。”此六七君子，盖非扬己取名，了然使户晓者，真名世英宰也！岂曰不事事哉？

【译文】 西汉曹参担任相国以后，日夜饮酒，无所事事，然而天下稳定，国泰民安，人们称他为“萧规曹随”，不敢越雷池半步。东晋王导身为三朝宰相，

清静无为，而国家岁计有余，王导更是完全不理政事，他曾经自叹说：“人们都说我糊涂，后人当思念我的糊涂。”谢安不拘小节，但深谋远虑方面无人可比。唐代的房玄龄、杜如晦，他们的传记中没有可以记载的功劳。大宋韩王赵普凡是收到士大夫议论是非利害的奏书，都把它们放入两口大瓮中，装满后就全部烧掉。李文靖把中外上奏陈述利害的奏章全部压下，说：“我就以此来报效国家。”这六七位君子的本意，都不是想吹嘘自己，沽名钓誉，以便使自己的名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他们真是名世杰出的宰相啊！难道能说他们无所事事吗？

檀弓误字

【原文】 《檀弓》载吴侵陈事曰：“陈太宰 使于师，夫差谓行人仪曰：‘是夫也多言，盍尝问焉，师必有名，人之称斯师也者，则谓之何？’太宰 曰：‘其不谓之杀厉之师与！’”按 乃吴夫差之宰，陈遣使者正用行人，则仪乃陈臣也。记礼者简策差互，故更错其名，当云“陈行人仪使于师，夫差使太宰 问之”，乃善。忠宣公作《春秋诗》引斯事，亦尝辩正云。

【译文】 《礼记·檀弓》记载吴国入侵陈国这一段历史时说：“陈国的太宰出使军中，吴王夫差对行人仪说：‘这个人多说多话，何不问一下，出兵必定有名义，别人称呼这支军队，称他们什么？’太宰 说：‘岂不会称之为杀人害民的军队吗！’”查考太宰 是吴国夫差的太宰，陈国派遣使者正使用行人，那么行人仪乃是陈国的臣子。记录礼的人不小心把竹简竹策弄乱了，所以把名字也更改弄错了，应当说“陈国的行人仪出使军前，吴王夫差让太宰 去问他”，这才妥当。忠宣公（洪皓）写过《春秋诗》，并引用这件事，也曾加以辨正。

薛能诗

【原文】 薛能者，晚唐诗人，格调不能高，而妄自尊大。其《海棠诗序》云：“蜀海棠有闻，而诗无闻，杜子美于斯，兴象不出，没而有怀。天之厚余，谨不敢让，风雅尽在蜀矣，吾其庶几。”然其语不过曰：“青苔浮落处，暮柳闲开时。带醉游人插，连阴彼叟移。晨前清露湿，晏后恶风吹。香少传何许，妍多画半遗”而已。又有《荔枝诗序》曰：“杜工部老居西蜀，不赋是诗，岂有意而不及欤？白尚书曾有是作，兴旨卑泥，与无诗同。予遂为之题，不愧不负，将

来作者，以其荔枝首唱，愚其庶几。”然其语不过曰：“颗如松子色如樱，未识蹉跎欲半生。岁杪监州曾见树，时新入座久闻名”而已。又有《折杨柳》十首，叙曰：“此曲盛传，为词者甚众，文人才子，各炫其能，莫不条似舞腰，叶如眉翠，出口皆然，颇为陈熟。能专于诗律，不爱随人，搜难抉新，誓脱常态，虽欲勿伐，知音者其舍诸？”然其词不过曰：“华清高树出离宫，南陌柔条带暖风。谁见轻阴是良夜，瀑泉声畔月明中。”“洛桥晴影覆江船，羌笛秋声湿塞烟。闲想习池公宴罢，水蒲风絮夕阳天”而已。别有《柳枝词》五首，最后一章曰：“刘、白苏台总近时，当初章句是谁推。纤腰舞尽春杨柳，未有侬家一首诗。”自注云：“刘、白二尚书，继为苏州刺史，皆赋《杨柳枝词》，世多传唱，虽有才语，但文字太僻，宫商不高耳。”能之大言如此，但稍推杜陵，视刘、白以下蔑如也。今读其诗，正堪一笑。刘之词曰：“城外春风吹酒旗，行人挥袂日西时。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白之词曰：“红板江桥清酒旗，馆娃宫暖日斜时。可怜雨歇东风定，万树千条各自垂。”其风流气概，岂能所可仿佛哉！

【译文】薛能，是晚唐诗人，诗歌的格调不高，可是却妄自尊大。他的《海棠诗序》说：“蜀地的海棠有名声，而关于海棠的诗却没有名声。杜子美（杜甫）在蜀地的时候，没有即景的描写，死后为人怀念。上天的厚待我，使我不敢谦让，诗歌创作都在蜀地，我差不多也算其中之一吧。”然而他的诗不过说：“青苔浮落处，暮柳闲开时。带醉游人插，连阴彼叟移。晨前清露湿，晏后恶风吹。香少传何许，妍多画半遗（青苔附着的地方，杨柳闲闲地开放的时节。带醉的游人折取插在头上，连成一片是那位老者移栽。日出前被清凉的露水沾湿，日落后被恶风吹刮。香味不多飘到哪里，姿态妍丽却无法被画工完全描绘）”而已。他又有《荔枝诗序》说：“杜工部（杜甫）老来住在西蜀，不写关于荔枝的诗，难道是有意写作而没有顾得上吗？白尚书（白居易）曾经有过写荔枝的作品，格调低下迂腐，和没有诗并无两样。我就为此而写作，没有对不起也没有辜负荔枝，将来的写作者，把这首诗作为写荔枝的最早的作品，恐怕差不多了。”然而他的诗不过说：“颗如松子色为樱，未识蹉跎欲半生。岁杪监州曾见树，时新入座久闻名（颗粒如同松子颜色如同樱桃，蹉跎将及半世没有见到。年未来到州里曾经见过此树，新果献到座上久已闻名）”而已。又有《折杨柳》歌十首，诗序说：“这一曲调很流行，写作歌词的人很多。文人才子，各人卖弄自己的能耐，无人不说柳条像歌舞的少女腰肢，柳叶像少女的翠眉，出口都是这样，颇为熟滥缺乏新意。我薛能专门研究诗歌声律，搜寻新而难的词语，发誓要脱去通常所见的格调，虽然想不要自夸，知音的人难道能弃而不读吗？”然而他的诗不过说：“华清高树出离宫，南陌柔条带暖风。谁见轻阴是良夜，瀑泉声畔月明

中（华清宫中的高树露出宫墙，城南路上的柔软枝条带着暖洋洋的春风。谁见到它在轻云的良宵时分，瀑布泉水声旁月色之中的体态）。”“洛桥晴影覆江船，羌笛秋声湿寒烟。闲想习池公宴罢，水蒲风絮夕阳天（洛桥晴空柳荫覆盖江船，秋天羌笛在湿润的寒烟中奏出《折杨柳》曲子。闲中想象习池公宴散席以后，水中的蒲草风中的柳絮在夕阳中飘荡）”而已。另外有《柳枝词》五首，最后一首说：“刘白苏台总近时，当初章句是谁推？纤腰舞尽春杨柳，未有侬家一首诗（刘禹锡、白居易在苏州都离今天不远，当初他们的诗作是谁推许？少女摆动纤腰歌舞尽了春天的杨柳时节，可就是没有我薛能的一首诗）。”自己注释说：“刘禹锡、白居易两位尚书，相继出任苏州刺史，都写过《杨柳枝》的歌辞，世间流行传唱，虽然有显出才气的诗句，但是文字太生僻，格调也不高。”薛能的说大话就是这样。仅仅稍稍推许杜陵（杜甫），把刘禹锡、白居易以下看成没有什么了不起。现在读他的诗，真可以使人一笑。刘禹锡的诗说：“城外春风吹酒旗，行人挥袂日西时。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柳管别离（城外的春风吹动酒家的旗帜，路上行人在斜阳中挥动袖子。长安的路旁数不清的树木，唯有垂杨关心人们的别离）。”白居易的诗说：“红板桥边清酒旗，馆娃宫暖日斜时。可怜雨歇东风定，万树千条各自垂（江边的红板桥畔挑出酒旗，馆娃宫中暖洋洋白日西垂。最可爱的是雨停东风不再吹拂，万树千条的柳枝各自下垂）。”他们的风流气概，难道是薛能所可以近似的吗？

汉晋太常

【原文】 汉自武帝以后，丞相无爵者乃封侯，其次虽御史大夫，亦不以爵封为闲。唯太常一卿，必以见侯居之，而职典宗庙园陵，动辄得咎，由元狩以降，以罪废斥者二十人。意武帝阴欲损侯国，故使居是官以困之尔。表中所载：

侯萧寿成，坐牺牲瘦；蓼侯孔臧，坐衣冠道桥坏；郾侯周仲居，坐不收赤侧钱；绳侯周平，坐不缮园屋；睢陵侯张昌，坐乏祠；阳平侯杜相，坐擅役郑舞人；广阿侯任越人，坐庙酒酸；江邹侯靳石，坐离宫道桥苦恶；戚侯李信成，坐纵丞相侵神道；俞侯栾赅，坐雍牺牲不如令；山阳侯张当居，坐择博士弟子不以实；公安侯韩延年，坐留外国文书；新 侯赵弟，坐鞫狱不实；牧丘侯石德，坐庙牲瘦；当涂侯魏不害，坐孝文庙风发瓦； 阳侯江德，坐庙郎夜饮失火；蒲侯苏昌，坐泄官书；弋阳侯任官，坐人盗茂陵园物；建平侯杜缓，坐盗贼多。自侯至牧丘十四侯，皆夺国，武帝时也。自当涂至建平五侯，但免官，昭、宣

时也。下及晋世，此风犹存，惠帝元康四年，大风，庙阙屋瓦有数枚倾落，免太常荀寓。五年，大风，兰台主者求索阿栋之间，得瓦小邪十五处，遂禁止太常，复兴刑狱。陵上荆一枝围七寸二分者被斫，司徒、太常奔走道路，太常禁止不解，盖循习汉事云。

【译文】 西汉自武帝以后，凡是担任丞相而没有爵位的人就可以封为侯爵。丞相以下，即使是御史大夫，也不予封爵。九卿中只有太常卿一职，一定要以现任侯爵担任，太常职掌宗庙和先帝陵园，动辄得咎，从汉武帝元狩年间以后，以各种罪名被废斥的太常卿有二十人之多。我估计这是因为汉武帝心中想削减诸侯国，所以故意让他们担任此职以便找毛病收回爵位和封国。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等书记载任太常卿而被削去侯爵或官职的人主要有：侯萧寿成，因为所用牺牲（古代祭祀用的牲畜）太瘦而被废；蓼侯孔藏，是因为衣冠道桥损坏而被治罪；郾侯周仲居，是因为不收赤侧钱（汉钱币名，以赤铜为外边，故名）；绳侯周平，是因为不修缮园屋；睢陵侯张昌，是因为祭祀的次数不够；阳平侯杜相，是因为擅自征役郑地舞人；广阿侯任越，是因为宗庙里的祭祀用酒腐败变质；江邹侯靳石，是因为去离宫的道路、桥梁太难走；戚侯李信成，是因为纵容丞相侵占神道；俞侯桀，是因为雍地（今陕西凤翔）所贡牺牲不合乎要求；山阳侯张当居，是选拔博士时弄虚作假；成安侯韩延年，是因为私自留藏外国文书；新侯赵弟，是因为审判案件时弄虚作假；牧丘侯石德，是因为用于祭祀的牲畜太瘦；当涂侯魏不害，是因为孝文帝庙上的瓦被风吹落；阳侯江德，是因为看庙人夜间饮酒，致使宗庙失火；蒲侯苏昌，是因为泄露了官府文书的内容；弋阳侯任宫，是因为有人盗窃了茂陵的东西；建平侯杜缓，是因这一带盗贼暴徒太多。他们这些人中，从侯萧寿成到牧丘侯石德十四位侯，都被夺去爵位，削去封地，这是汉武帝时期的事。从当涂侯魏不害到建平侯杜缓五位侯，只是被免去官职，仍然保留爵位，这是昭帝、宣帝时期的事。此后到了晋代，这种风气仍然存在，晋惠帝四年（294年），有一天起了大风，宗庙阙楼上的屋瓦被吹掉几片，因此太常荀寓被免职。第二年，又起大风，御史台的长官到宗庙中检查受破坏的情况，发现有十五处瓦略微倾斜，于是就停止了太常的职务，并因此处罚了一大批官员。陵墓上有一根直径约七寸二分粗细的荆条被人砍去，司徒、太常四处奔波，非常紧张，不久太常便被关押，长期得不到释放。这大概是沿袭汉代的惯例吧。

卷 八

诸葛公

【原文】 诸葛孔明千载人，其用兵行师，皆本于仁义节制，自三代以降，未之有也。盖其操心制行，一出于诚，生于乱世，躬耕陇亩，使无徐庶之一言，玄德之三顾，则苟全性命，不求闻达必矣。其始见玄德，论曹操不可与争锋，孙氏可与为援而不可图，唯荆、益可以取，言如蓍龟，终身不易。二十余年之间，君信之，士大夫仰之，夷夏服之，敌人畏之。上有以取信于主，故玄德临终，至云“嗣子不才，君可自取”；后主虽庸懦无立，亦举国听之而不疑。下有以见信于人，故废廖立而立垂泣，废李严而严致死。后主左右奸辟侧佞，充塞于中，而无一人心害疾者。魏尽据中州，乘操、丕积威之后，猛士如林，不敢西向发一矢以临蜀，而公六出征之，使魏畏蜀如虎。司马懿案行其营垒处所，叹为天下奇才。钟会伐蜀，使人至汉川祭其庙，禁军士不得近墓樵采，是岂智力策虑所能致哉？魏延每随公出，辄欲请兵万人，与公异道会于潼关，公制而不许，又欲请兵五千，循秦岭而东，直取长安，以为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史臣谓公以为危计不用，是不然。公真所谓义兵不用诈谋奇计，方以数十万之众，据正道而临有罪，建旗鸣鼓，直指魏都，固将飞书告之，择日合战，岂复翳行窃步，事一旦之谲以规咸阳哉！司马懿年长于公四岁，懿存而公死，才五十四耳，天不祚汉，非人力也。“霸气西南歇，雄图历数屯。”杜诗尽之矣。

【译文】 诸葛孔明（诸葛亮）是流芳千载之人，他的用兵行军，都以仁义之道为根本来节制管理，从夏、商、周三代以下，是从未有过的。这是他的思考和行动，全都出于诚心。他生活在乱世，自己在田野中耕作，假如没有徐庶的一席话，玄德（刘备）的三顾茅庐，那么他必然是只求保全性命，不求闻名显达。他开始见到刘玄德，议论对曹操不能争斗以决胜负，孙氏可以互相支援而不可图谋，只有荆州、益州可以夺取，这些话如同准确的预卜，终身不变。二十多年之间，君主信任他，士大夫敬仰他，夷人和中原人服从他，敌人害怕他。对上有取得君主信任的原因，所以刘玄德临终时，甚至说“继位的儿子如果没有出息，您可以自己取代他”，后主刘禅虽然平庸懦弱不能自立，也带领全国听

从他而不加疑忌。对下有被人信任的原因，所以废弃廖立而廖立听到他的死讯就掉泪，废弃李严而李严听到他的死讯而发病致死。后主的身边左右，奸邪小人充塞，而没有一个人存心去陷害他的。魏国全部据有中原之地，在曹操、曹丕造成的威势之后，勇猛之士多得如同林中树木，却不敢向西发射一箭兵临蜀国，可是诸葛公却六次主动出征，使得魏国怕他像怕老虎一样。司马懿巡视他的营垒，惊叹说是天下奇才。钟会征伐蜀国，派人到汉川祭祀他的庙宇，禁令兵士不准靠近坟墓打柴，这难道是智谋力量所能达到的吗？魏延每次随诸葛公出征，就要请求自己领兵一万人，和诸葛公从不同道路会师潼关，诸葛公加以制止而不同意；魏延又想请求领兵五千人，沿秦岭往东走，直取长安，认为这样做一下子可以安定咸阳以西。史臣说诸葛公认为这是危险的计策而不采用，不是这样。诸葛公真所谓正义之师不用诈谋奇计，正在以几十万大军，占据正道而面对有罪之国，建树旌旗，奏鸣战鼓，直指魏国都城，本来应当飞马传书告知魏国，选定日子会战，岂能再暗地行军偷袭，采用一时的诡计去图谋咸阳吗！司马懿年纪比诸葛公长四岁，司马懿活下来而诸葛公死去，死的时候才五十四岁而已。上天不保汉室，不是人的力量所能决定的。“霸气西南歇，雄图历数屯”（霸者的气象在西南消歇，雄大的意图却遇上了气运不佳），杜甫诗已经全部说明白了。

沐浴佩玉

【原文】 “石骀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为后者，曰：‘沐浴佩玉则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执亲之丧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此《檀弓》之文也。今之为文者不然，必曰：“沐浴佩玉则兆，五人者如之，祁子独不可，曰：‘孰有执亲之丧若此者乎？’”似亦足以尽其事，然古意衰矣。

【译文】 春秋时期，卫国大夫石骀仲去世时，没有嫡子，只有庶子六人，于是请人占卜哪个儿子可以立为继承人，卜师说：“如果沐浴并佩带玉器就能得到吉兆。”于是其中五子都去沐浴佩玉。只有石祁子说：“哪里有在为父亲服丧期间沐浴佩玉的呢？”于是不沐浴，也不佩玉。”这是《礼记·檀弓》中的文字。如今写文章的人却不会这样写，他们必定要写道：“沐浴佩玉就能得到吉兆，其中五人都这样作，只有祁子不这样做，并且说：‘哪里有在居父丧期间这样做的人呢？’”似乎也足以说清楚这件事，然而韵味就差得很远了。

谈丛失实

【原文】 后山陈无己著《谈丛》六卷，高简有笔力，然所载国朝事，失于不考究，多爽其实，漫析数端于此。

其一云：“吕许公恶韩、富、范三公，欲废之而不能，及西军罢，尽用三公及宋莒公、夏英公于二府，皆其仇也。吕既老，大事犹问，遂请出大臣行三边，既建议，乃数出道者院宿，范公奉使陕西，宿此院，相见云云。”按吕公罢相，诏有同议大事之旨，公辞，乃庆历三年三月，至九月致仕矣。四年七月，富、范始奉使，又三公入二府时，莒公自在外，英公拜枢密使而中辍，后二年莒方复入，安有五人同时之事？

其二云：“杜正献、丁文简为河东宣抚，任布之子上书历诋执政，至云至于臣父，亦出遭逢，谓其非德选也。杜戏丁曰：‘贤郎亦要牢笼。’丁深衔之。其后二公同在政府，苏子美进奏事作，杜避嫌不预，丁论以深文，子美坐废为民，杜亦罢去。一言之讫，贻祸如此。”按杜公以执政使河东时，丁以学士为副。庆历四年十一月进奏狱起，杜在相位，五年正月罢，至五月，丁公方从翰林参知政事，安有深文论子美之说？且杜公重厚，当无以人父子为讫之理，丁公长者也，肯追仇一言陷贤士大夫哉？

其三云：“张乖崖自成都召为参知政事，既至而脑疽作，求补外，乃知杭州而疾愈。上使中人往伺之，言且将召也，丁晋公以白金赂使者，还言如故，乃不召。”按张两知成都，其初还朝为户部使、中丞，始知杭州。是时，丁方在侍从；其后自蜀知升州，丁为三司使，岂有如前所书之事？

其四云：“乖崖在陈，闻晋公逐莱公，知祸必及己，乃延三大户与之博，出彩骰子胜其一坐，乃买田宅为归计以自污，晋公闻之，亦不害也。”按张公以祥符六年知陈州，八年卒，后五年当天禧四年，寇公方罢相，旋坐贬，岂有所谓乖崖自污之事？

兹四者所系不细，乃诞漫如此。盖前辈不家藏国史，好事者肆意饰说为美听，疑若可信，故误人纪述。后山之书，必传于后世，惧诒千载之惑，予是以辨之。

【译文】 后山居士陈师道（字无己），著有《谈丛》六卷，文字优美通顺，简洁有力。然而他所记载的本朝大事，失于不考证核实，大多不符合事实，这里随便举出几件：

其一说：“许国公吕夷简厌恶韩琦、富弼、范仲淹三公，想要罢他们的官而不能。等到对西夏的战争结束，朝廷任用韩、富、范三公及莒国公宋庠、英国公夏竦为枢密院和中书门下省的长官。这些人都是吕许公的政敌。吕夷简年事已高，朝廷大事还征求他的意见。于是他就请求朝廷派出大臣宣抚河北、河东、陕西等沿边地区。建议被批准后，朝廷就按次序令赴边的大臣在枢密院宿夜。范仲淹奉命出使陕西，夜宿此院，与其他四人相见。”

考查吕公被罢免宰相，诏书中有一起商议大事的意思，吕公辞谢，这是庆历三年（1043年）三月，到九月就告老退休了。四年七月，富公、范公才奉使出巡，同时三公进入二府的时候，宋莒公在外任，夏英公官拜枢密使而中间停顿，以后二年宋莒公才重新入京，哪里有五个人同时进二府的事？其二说：“杜正献（杜衍）、丁文简（丁度）任河东宣抚，任布的儿子上书一一诋毁执政大臣，甚至说至于臣的父亲，也是碰上了机会，言下之意说不是从德行当选。杜衍对丁度说笑话说：‘令郎也要管束得紧一点。’丁度很恨他。这以后杜、丁二公一起在中枢执政，苏子美（苏舜卿）进奏院的事情发作，丁公苛刻地引用法律条文认为他有罪，杜衍避嫌疑不参加意见，子美由此得罪而废黜为百姓，杜衍也罢官而去。一句话的开玩笑，带来的祸患竟是这样。”查考杜公以执政的身分做河东宣抚使的时候，丁度以学士的身份任副使。庆历四年（1144年）十一月进奏院的案件兴起，杜公正在宰相的位子上，五年（1145年）正月被罢免宰相。到五月，丁公才从翰林升任参知政事，哪里有苛刻地引用法律条文认为苏子美有罪的说法？而且杜公忠厚持重，应当不会有把别人父子用来开玩笑的道理，丁公也是长者，岂肯追记前仇而为了一句话而陷害贤士大夫呢！其三说：“张乖崖（张咏）从成都召入京城任参知政事，已经到了京城而脑疽发作，请求外放，就让他出知杭州而痊愈了。皇上派宦官前去侦察，说是将要召他进京。丁晋公（丁谓）用银子贿赂派去的人，让他回来说病情像过去一样，于是就不再召他入京。”查考张乖崖两次出知成都，第一次回京任户部使、中丞，这才出知杭州，当时丁晋公还任侍从官；这以后张乖崖从蜀地知升州，丁晋公任三司使。哪里竟会有像上文所记的事情？其四说：“张乖崖在陈州，听到晋公赶走寇公（寇准），知道祸事必定要到自己身上，于是就请来三个大户和他们赌钱，掷骰子得采赢了，就买田买房的回老家打算以此自己弄脏自己的名声，丁晋公听说了，也就不去害他了。”查考张公在大中祥符六年知陈州，八年去世，后五年正是天禧四年，寇公正被免去宰相，不久被贬，哪里有所谓乖崖自己弄脏自己名声的事？这四件事关系不小，却随便乱说像这样。这是前辈家里并不藏有国史，喜欢多事的人任意夸张动听，好像很可以相信，所以就使人著作时发生错误。后山这

部分，一定传到后世，怕给千载以下留下疑惑，我因此加以辨正。

陶渊明

【原文】 陶渊明高简闲靖，为晋、宋第一辈人。语其饥则箠瓢屡空，无储粟；其寒则褐穿结，冬陈；其居则环堵萧然，风日不蔽。穷困之状，可谓至矣。读其《与子俨等疏》云：“恨室无莱妇，抱兹苦心。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管仲、鲍叔，分财无猜，他人尚尔，况同父之人哉！”然则犹有庶子也。《责子》诗云：“雍、端年十三”。此两人必异母尔。渊明在彭泽，悉令公田种秫，曰：“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请种粳，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其自叙亦云：“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犹望一稔而逝，然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即自免去职。所谓秫粳，盖未尝得颗粒到口也，悲夫！

【译文】 陶渊明清高简约萧闲宁静，是晋、宋之间第一人物。描写自己的饥饿，就说饭筐水瓢常常空无一物，瓶子里没有储存的粮食；描写自己的寒冷，就说短的粗布衣破破烂烂，冬天还穿葛布衣服；描写屋子，就说四壁空空，不能遮蔽冷风和阳光。穷困的样子，可以说是到了极点了。读他的《与子俨等疏》说：“自恨屋里没有老莱子之妻，只能独抱甘守贫穷的苦心。你们虽然不是—母所生，应当想到四海之内皆兄弟的道理。管仲、鲍叔，分财物的时候并无猜忌而能互相理解，外边人尚且能够这样，何况同父之人！”这样看来，他还是有妾生的儿子的。《责子诗》说：“雍端年十三。”（阿雍、阿端今年十三岁）这两个人必定不是一个母亲。陶渊明在彭泽做官的时候，让公田全部种植黏高粱，说：“我能常常在醉乡中就满足了。”妻子儿子坚决要求种植粳稻，于是就让二百五十亩地种植黏高粱，五十亩地种植粳稻。他自己的叙述也说：“公田所得的利益，足以酿酒，所以就求取它。”还希望过一年再辞官，然而从仲秋八月到冬天，在位八十多天，就自己挂冠而去。所谓黏高粱粳稻，都没有能到口一颗一粒，可悲啊！

东晋将相

【原文】 西晋南渡，国势至弱，元帝为中兴主，已有雄武不足之讥，余皆

童幼相承，无足称算。然其享国百年，五胡云扰，竟不能窥江、汉，苻坚以百万之众，至于送死淝水，后以强臣擅政，鼎命乃移，其于江左之势，固自若也，是果何术哉？尝考之矣，以国事付一相，而不贰其任，以外寄付方伯，而不轻其权，文武二柄，既得其道，余皆可概见矣。百年之间，会稽王昱、道子、元显以宗室，王敦、二桓以逆取，姑置勿言，卞壺、陆玩、郗鉴、陆晔、王彪之、坦之不任事，其真托国者，王导、庾亮、何充、庾冰、蔡谟、殷浩、谢安、刘裕八人而已。方伯之任，莫重于荆、徐，荆州为国西门，刺史常都督七八州事，力雄强，分天下半。自渡江讫于太元，八十余年，荷阍寄者，王敦、陶侃、庾氏之亮、翼，桓氏之温、豁、冲、石民八人而已，非终于其军不辄易，将士服习于下，敌人畏敬于外，非忽去忽来，兵不适将，将不适兵之比也。顷尝为主上论此，蒙欣然领纳，特时有不同，不能行尔。

【译文】西晋南渡之后，国势极为衰弱，晋元帝是中兴之主，已遭到“雄武不足”的讥讽，其余的君主都是童年甚至幼年时继承帝位，更不值一提。然而东晋享国百年之久，北方的各少数民族政权频繁南侵，竟不能攻入江、汉地区，前秦皇帝苻坚率领百万大军南下，竟被东晋八万精兵击溃于淝水边，惨败而归。后来因为强臣专权，政权才转移，但南方江山长期安然自若，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曾经考察研究过，东晋把国家政事交给丞相，毫不猜疑、牵制，把军事大权托付给方伯，权力很重。文武两方面的权柄，都能各行其道，其余的问题就可以想见了。东晋百年之间，会稽王司马昱、司马道子、司马元显是以宗室执政，王敦、二桓（桓温、桓冲）则以悖逆掌权，姑且置之不论；卞壺、陆玩、郗鉴、陆晔、王彪之、王坦之无所事事；真正托以国事的，只不过是王导、庾亮、何充、庾冰、蔡谟、殷浩、谢安、刘裕八人罢了。军事上的方伯之任，没有比荆、徐二州更重要的，荆州是国家的西大门，荆州刺史总是统领七八个州的军队，实力雄厚强大，占全国的一半。自晋元帝渡江即位到晋孝武帝太元末，八十余年，担负统兵重任的，不过王敦、陶侃、庾亮、庾翼、桓温、桓豁、桓冲、桓石民八人罢了，若非死于军中，朝廷对他们是不会轻易调动的，所以在下将士们熟悉服从他们，在外敌人敬重惧怕他们，不是那种忽去忽来，兵不适应将，将不适应兵的情况可以比拟的。不久前我曾为皇上论及这个问题，承蒙皇上欣然赞同，只是因为时代和形势有所不同，无法实行罢了。

赏鱼袋

【原文】 衡山有唐开元二十年所建《南岳真君碑》，衡州司马赵颐贞撰，荆府兵曹萧诚书。末云：别驾赏鱼袋、上柱国光大 。赏鱼袋之名不可晓，他处未之见也。

【译文】 衡山有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年）所立的《南岳真君碑》，碑文是衡州司马赵颐贞所撰，字是荆府兵曹萧诚所书。碑末还记载道：别驾赏鱼袋、上柱国光大 。赏鱼袋这个词儿无法理解，其他地方未曾见过。

浯溪留题

【原文】 永州浯溪，唐人留题颇多，其一云：“太仆卿分司东都韦臧，大中二年过此。余大和中以中书舍人谪宦康州，逮今十六年。去冬罢楚州刺史，今年二月有桂林之命，才经数月，又蒙除替，行次灵川，闻改此官，分司优闲，诚为忝幸。”按《新唐书》：“臧仕累中书舍人，与李德裕善，李宗闵恶之，德裕罢相，贬为明州长史，终桂管观察使。”以题名证之，乃自中书谪康州，又不终于桂，史之误如此。臧所称十六年前，正当大和七年，是时，德裕方在相位，八年十一月始罢，然则臧之去国，果不知坐何事也。

【译文】 永州的浯溪，唐朝人留下的题字很多，其中一条说：“太仆卿分司东都韦癯，大中二年（848年）经过这里。我在太和年间从中书舍人贬官到康州，到今天十六年。去年冬天罢免楚州刺史，今年二月又有赴桂林的任命。才经过几个月，又蒙朝廷授新官代旧官，走到灵川住下，听说改为这一官职。分司这个职位优闲无事，诚然是侥幸。”查《新唐分》，韦癯入仕逐渐升到中书舍人，和李德裕友好。李宗闵讨厌他，李德裕被罢免宰相，韦癯被贬为明州长史，去世时官居桂管观察使。用上面的题名来对证，乃是从中书贬谪到康州，又并不是死于桂林，史书的错误就是这样。韦癯所说十六年前，正当太和七年（833年），当时李德裕正在宰相的位子上，八年（834年）十一月才罢免。然而这样说来，韦癯离开京城，真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而得罪的。

皇甫 诗

【原文】 皇甫 、李翱，虽为韩门弟子，而皆不能诗，浯溪石间有 一诗，为元结而作，其词云：“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然长于指叙，约洁多余态。心语适相应，出句多分外。于诸作者间，拔戟成一队。中行虽富剧，粹美君可盖。子昂感遇佳，未若君雅裁。退之全而神，上与千年对。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概。文于一气间，为物莫与大。先王路不荒，岂不仰吾辈。石屏立衙衙，溪口扬素濑。我思何人知，徙倚如有待。”味此诗乃论唐人文章耳，风格殊无可采也。

【译文】 皇甫 和李翱，虽然都是韩愈门下的弟子，却都不善于写诗。在永州浯溪旁的石刻间有皇甫 的一首诗，是为元结而作的，内容是：“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然长于指叙，约洁多余态。心语适相应，出句多分外。于诸作者间，拔戟成一队。中行虽富剧，粹美君可盖。子昂感遇佳，未若君雅裁。退之全而神，上与千年对。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概。文于一气间，为物莫与大。先王路不荒，岂不仰吾辈？石屏立衙衙，溪口扬素濑。我思何人知，徙倚如有待。”仔细玩味这首诗，实际上是在评价唐代诗文，但在风格上却毫无可取之处。

人物以义为名

【原文】 人物以义为名者，其别最多。仗正道曰义，义师、义战是也。众所尊戴者曰义，义帝是也。与众共之曰义，义仓、义社、义田、义学、义役、义井之类是也。至行过人曰义，义士、义侠、义姑、义夫、义妇之类是也。自外入而非正者曰义，义父、义儿、义兄弟、义服之类是也。衣裳器物亦然。在首曰义髻，在衣曰义 、义领，合中小合子曰义子之类是也。合众物为之，则有义浆、义墨、义酒。禽畜之贤，则有义犬、义鸟、义鹰、义鹞。

【译文】 人和事物用“义”字命名的，它的区别最多。主持正道称为义，义师、义战就是。士众所推崇尊敬的称为义，义帝就是。和大众共有的称为义，义仓、义社、义田、义学、义役、义井就是。极高的德行超过常人称为义，义士、义侠、义姑、义夫、义妇之类就是。从外来而不是本来固有的称为义，义父、义儿、义兄弟、义服之类就是。衣裳器物也是那样。石头上称为义髻，在

衣服上称为义、义领，盒中的小盒子称为义子之类就是。聚合各种物品做成的，就有义浆、义墨、义酒。飞禽走兽中优秀的，就有义犬、义鸟、义鹰、义鹤。

人君寿考

【原文】 三代以前，人君寿考有过百年者。自汉、晋、唐、三国、南北朝下及五季，凡百三十六君，唯汉武帝、吴大帝、唐高祖至七十一，玄宗七十八，梁武帝八十三，自余至五六十者亦鲜。即此五君而论之。梁武召侯景之祸，幽辱告终，旋以亡国；玄宗身致大乱，播迁失意，饮恨而没。享祚久长，翻以为害，固已不足言，汉武末年，巫蛊事起，自皇太子、公主、皇孙皆不得其死，悲伤愁沮，群臣上寿，拒不举觞，以天下付之八岁儿。吴大帝废太子和，杀爱子鲁王霸。唐高祖以秦王之故，两子十孙同日 命，不得已而禅位，其方寸为如何？然则五君者虽有崇高之位，享耆耄之寿，竟何益哉！若光尧太上皇帝之福，真可于天人中求之。

【译文】 夏、商、周三代以前，国君寿命的有超过百岁的。从汉、晋、唐、三国、南北朝下至五代，总计有一百三十六位君主，只有汉武帝、吴大帝、唐高祖享年七十一岁，唐玄宗七十八岁，梁武帝八十三岁，其余的活到五六十岁的也很少。然而，就这五位长寿之君而论：梁武帝自己招致侯景叛乱之祸，都城被攻破后饥病而死，不久国亡；唐玄宗自己招致安史之乱，被迫流亡四川，返京后郁郁寡欢，含恨死去。皇位久长，反是祸害，本来也不值得再说。汉武帝末年，巫蛊事件发生，株连许多人，从皇太子、公主到皇孙都死于非命，汉武帝悲伤、忧愁、沮丧已极。群臣为他祝寿，他竟不举酒杯，临终不得不把天下交给八岁的小孩子刘弗陵。吴大帝废了太子和，又杀掉了爱子鲁王霸。唐高祖因为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的缘故，两个儿子、十个孙子同一天被杀，他不得已才禅位给秦王，他的心情会怎么样呢？由此看来，这五个长寿之君虽有崇高的帝位，又享有七八十岁的寿命，最终有什么益处呢？像光尧太上皇帝（即宋高宗赵构）这样的福气，真是只能在天仙中寻找了。

韩文公佚事

【原文】 韩文公自御史贬阳山，新旧二《唐史》，皆以为坐论宫市事。按公《赴江陵途中诗》，自叙此事甚详，云：“是年京师旱，田亩少所收。有司恤经费，未免烦诛求。传闻闾里间，赤子弃渠沟。我时出衢路，饿者何其稠！适会除御史，诚当得言秋。拜疏移宰相，为忠宁自谋。上陈人疾苦，无令绝其喉。下言畿甸内，根本理宜优。积雪验丰熟，幸宽待蚕 。天子惻然感，司空叹绸缪。谓言即施設，乃反迁炎洲。”皇甫 作公神道碑云：“关中旱饥，人死相枕藉。吏刻取恩，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请宽民徭而免田租，专政者恶之，遂贬。”然则不因论宫市明甚。碑又书三事云：“公为河南令，魏、郾、幽、镇各为留邸、贮潜卒以囊罪亡，公将 其禁，断民署吏，俟旦发，留守尹大恐，遽止之，是后郾邸果谋反，将屠东都，以应淮、蔡。及从讨元济，请于裴度，须精兵千人，间道以入，必擒贼。未及行，李 自文城夜入，得元济。三军之士，为公恨。复谓度曰：今借声势，王承宗可以辞取，不烦兵矣。得柏耆，口授其词，使耆执笔书之，持以入镇州，承宗遂割德、棣二州以献。”李翱作公行状，所载略同。而《唐书》并逸其事，且以镇州之功，专归柏耆，岂非未尝见 文集乎？《资治通鉴》亦仅言耆以策干愈，愈为白度，为书遣之耳。

【译文】 韩文公（韩愈）从御史贬谪到阳山，《新唐书》和《旧唐书》都以为是因为论宫市一事而获罪。查考韩公《赴江陵途中诗》，自己叙述这件事很详细，说：“是年京师旱，田亩少所收。有司恤经费，未免烦诛求。传闻闾里间，赤子弃渠沟。我时出衢路，饿者何其稠。适会除御史，诚当得言秋。释疏移宰相，为忠宁自谋！上陈人疾苦，无令绝其喉。下言畿甸内，根本理宜优。积雪验丰熟，幸宽待蚕 。天子惻然感，司空叹绸缪。谓言即施設，乃反迁炎洲（这一年京城里大旱，田亩中间很少收获。有关的官员顾虑到经常的费用减少，未免过度地进行需索。传说在百姓街巷之间，小孩子被抛进沟渠里。我时常出去经过大路，饥民为什么那么多。刚好遇上授我为御史，真是该说话的时候。递上奏章到宫中，一片忠心岂能为自己的安危打算？奏章上半陈说百姓的疾苦，不要断了他们的饮食。奏章下半说国境之内，治国之本应该优先。冬天看积雪的厚薄验证来年是否丰收，宽免赋税徭役等待蚕桑麦秋。天子惻然有感 写作韩公的神道碑说：“关中发生旱灾饥荒，百姓饿死的纵横相枕，官吏苛刻需索邀宠。先生列举治理天下的根本，百姓窘迫到这样，请求放宽徭役而减免租赋。当政

者讨厌他，就被贬谪。”这样说来不是因为论宫市而获罪就很明显。神道碑又记载三件事情说：“韩公任河南令，魏州、郢州、幽州、镇州的军事长官都在洛阳设有府邸，偷偷地藏有兵士以招纳犯罪亡命之徒，韩公将要揭发他们违反法令的事，戒严并布置官员，东都的留守尹太为恐慌，急忙劝止，这以后郢州府邸果然阴谋造反，将要屠杀东都民人，以响应淮州、蔡州的叛军。等到后来跟随大军讨伐吴元济，向裴度请求，需要一千名精兵，从小道偷袭蔡州，必定可以擒获贼人。还没来得及出发，李 从文城夜间进入，擒获吴元济。三军中因此有人为韩公感到遗憾。韩公又对裴度说：现在借着战胜的声势，王承宗可以用言辞劝说，用不着发兵了。找到柏耆，口授劝说之辞，让柏耆拿笔写下来，拿着进入镇州，王承宗就割出德州、棣州献给朝廷。”李翱写作韩公行状，所记载的大致相同，但《唐书》却遗漏了这几件事，而且把降服镇州的功劳，专门归于柏耆，难道不是没有见到皇甫 的文集吗？《资治通鉴》也只说柏耆谒见并把计策告诉韩愈，韩愈为他禀告裴度，写信派遣柏耆而已。

论韩公文

【原文】 刘梦得、李习之、皇甫持正、李汉，皆称诵韩公之文，各极其挚。刘之语云：“高山无穷，太华削成。人文无穷，夫子挺生。鸾凤一鸣，蝸蟠革音。手持文柄，高视寰海。权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余年，声名塞天。”习之云：“建武以还，文卑质丧。气萎体败，剽剥不让。拔去其华，得其本根。包刘越羸，并武同殷。《六经》之风，绝而复新。学者有归，大变于文。”又云：“公每以为自扬雄之后，作者不出，其所为文，未尝效前人之言而固与之并，后进之士有志于古文者，莫不视以为法。”皇甫云：“先生之作，无圆无方，主是归工，执经之心，执圣之权，尚友作者， 邪 异，以扶孔子，存皇之极。茹古涵今，无有端涯。鲸铿春丽，惊耀天下，栗密窈眇，章妥句适，精能之至，鬼入神出，姬氏以来，一人而已。”又云：“属文意语天出，业孔子、孟轲而侈其文，焯焯烈烈，为唐之章。”又云：“如长江秋注，千里一道，然施于灌激，或爽于用。”此论似为不知公者。汉之语云：“诡然而蛟龙翔，蔚然而虎凤跃，锵然而韶钧鸣，日光玉洁，周情孔思，千态万貌，卒泽于道德仁义，炳如也。”是四人者，所以推高韩公，可谓尽矣。及东坡之碑一出，而后众说尽废，其略云：“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历唐贞观开元而不能救，独公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

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岂非参天地而独存者乎？”骑龙白云之诗，蹈厉发越，直到《雅》、《颂》，所谓若捕龙蛇、搏虎豹者，大哉言乎！

【译文】 刘禹锡、李习之、皇甫持正、李汉，都极为诚恳地称赞韩愈的文章。刘禹锡的诗说：“高山无穷，太华削成。人文无穷，夫子挺生。鸾凤一鸣，蝸蟠革音。手持文柄，高视寰海。权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余年，声名塞天。”李习之的诗说：“建武以还，文卑质丧。气萎体败，剝剥不让。拔去其华，得其本根。包刘越羸，并武同殷。《六经》之风，绝而复新。学者有归，大变于文。”他又说：“韩公常认为从扬雄以后，就没有真正的作家出现，他所作的文章未曾模仿过前人，却总是能与前贤并驾齐驱。有于志学习古文的年轻人没有不把他的文章看作楷模的。”皇甫持正说：“先生的文章，无论什么形式，都十分高妙。他深入钻研六经的精髓，掌握圣人权衡事物的观点，与天下作家为友，坚决抵制异端邪说，以扶助孔子，捍卫伟大的儒家经典。他的思想包古含今，无边无涯。他的文章笔势雄健，词藻华丽，震惊天下，内容的充实缜密，章句的妥贴美妙，登峰造极，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从周代以来，仅此一人而已。”又说：“先生作文章，立意、语言似乎都是出自天然。他学习孔子、孟轲并以文章发扬他们的思想，鲜明壮美，是唐代散文的大家。”又说：“先生的文章，如长江秋天的洪流，一泻千里，气势磅礴，但如用于灌溉，则可能是不适用的。”这一点如同不了解韩公似的。李汉说：“韩公文章的奇诡如蛟龙在飞翔，文采如是虎凤跳跃，语言铿锵有力如韶乐鸣奏，文章像太阳那样光芒四射，像宝玉那样晶莹剔透，表现出孔子的思想，周代六经中的感情，千姿万态，最终是对道德仁义的润泽、表现，这是很明显的。”这四个人对韩公的推崇可谓到极点了。及至苏东坡的《韩文公庙碑》一问世，所有的评说都销声匿迹了。苏东坡说：“一个普通的人却成为百代宗师，说出一句话能成为天下人效法的准则，这是因为他和天地的化育万物并论，和国家命运的盛衰有深切的关系。从东汉以来，儒道衰丧，文风败坏，经过唐朝贞观、开元两个盛世也不能挽救，只有韩文公谈笑着挥斥邪说，天下人狂热地追随他，使思想和文风重新回到正道上。他的文章使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八代以来衰败的文风得到振兴，他宣扬儒道，把天下人从沉溺中拯救出来，这难道不就是赞助天地、关系盛衰、浩大独立的正气吗？”在碑文后面，苏东坡又写了一首骑龙遨游白云乡的诗，慷慨激越，直追《诗经》中雅、颂的风格，正是所谓的如捕龙蛇、搏虎豹似的。苏轼的语言，气势真大啊！

治生从宦

【原文】 韩诗曰：“居闲食不足，从仕力难任。两事皆害性，一生常苦心。”然治生从宦，自是两涂，未尝有兼得者。张释之以赀为郎，十年不得调，曰：“久宦减兄仲之产，不遂。”欲免归。司马相如亦以赀为郎，因病免，家贫无以自业，至从故人于临邛，及归成都，家徒四壁立而已。

【译文】 韩愈的诗说：“居闲食不足，从仕力难任。两事皆害性，一生常苦心。”然而经营家业与做官，本来就是两条不同的道路，从没有人能兼得的。张释之用钱财买了个郎官，十年不能升迁。他说：“长久做官耗费了兄仲不少财产，却又得不到升迁，真是太窝囊了。”于是打算辞职回家。司马相如也是用钱买了个郎官，因生病免官后，家里很穷无法谋生，不得已跟随老朋友到了临邛（今四川邛崃）。等他带着卓文君从临邛回到成都时，家里穷得只有四壁空立而已。

真宗末年

【原文】 真宗末年属疾，每视朝不多语言，命令间或不能周审，前辈杂传记多以为权臣矫制，而非也。钱文僖在翰林，有天禧四年《笔录》，纪逐日琐细家事，及一时奏对，并他所闻之语，今略载于此。寇莱公罢相之夕，钱公当制，上问：“与何官得？”钱奏云：“王钦若近出，除太子太保。”上曰：“近上是甚？”云：“太子太傅。”上曰：“与太子太傅。”又云：“更与一优礼。”钱奏但请封国公而已。时枢密有五员，而中书只参政李迪一人，后月余，召学士杨大年，宣云：“冯拯与吏书，李迪与吏侍。”更无他言。杨奏：“若只转官，合中书命词，唯枢密使、平章事，却学士院降制。”上云：“与枢密使、平章事。”杨亦忧虑，而不复审，退而草制，以迪为吏部侍郎、集贤相，拯为枢密相。又四日，召知制诰晏殊，殊退，乃召钱。上问：“冯拯如何商量？”钱奏：“外论甚美，只为密院却有三员正使，三员副使，中书依旧一员，以此外人疑讶。”上云：“如何安排？”钱奏：“若却令拯入中书，即是彰昨来错误，但于曹利用、丁谓中选一人过中书，即并不妨事。”上曰：“谁得？”钱奏：“丁谓是文官，合入中书。”上云：“入中书。”遂奏授同平章事。又奏兼玉清宫使，又奏兼昭文国史。又乞加曹利

用平章事。上云：“与平章事。”

按此际大除拜，本真宗启其端，至于移改曲折，则其柄乃系词臣，可以舞文容奸，不之觉也。寇公免相四十日，周怀政之事方作，温公《纪闻》，苏子由《龙川志》、范蜀公《东斋记事》，皆误以为因怀政而罢，非也。予尝以钱《录》示李焘，焘采取之，又误以召晏公为寇罢之夕，亦非也。

【译文】 真宗末年患病，每次临朝不多说话，发布命令有时不能周到慎重，前辈的杂记中大多认为是权臣假托伪造的制诰，其实不是这样。钱文僖（钱惟演）在翰林的时候，有天禧四年（1020年）的笔记，记录每天的琐细家务事和当时的奏答，以及其他所听到的话，现在大略记载在这里。寇莱公（寇准）被罢免宰相的晚上，钱公值班，皇上问：“给他什么官才可以？”钱惟演回答说：“王钦若最近出京判杭州，授为太子太保。”皇上说：“挨着高一点是什么？”回答说：“太子太傅。”皇上说：“给他太子太傅。”又说：“还要给予一项优礼。”钱惟演建议仅仅请求封他为国公而已。当时枢密有五人，而中书只有参政一人。之后一个多月，召见学士杨大年（杨亿），降旨说：“冯拯给予吏部尚书，李迪给予吏部侍郎。”更没有别的话。杨亿上奏说：“如果只是转官，应当由中书草拟制书，惟有枢密使、平章事，则是学士院草拟制书。”皇上说：“给他枢密使、平章事。”杨亿也表示忧虑，但不再考虑，退下以后就起草制书，任命李迪为吏部侍郎、集贤相，冯拯为枢密相。又过四天，召见知制诰晏殊，晏殊退下以后，就召见钱惟演。皇上问：“冯拯的事情怎么议论？”钱惟演上奏说：“外边的议论很好，只因为枢密院有三员正使，三员副使，中书省却照旧只有一员，由于这点，外边人怀疑惊讶。”皇上说：“怎么样安排？”钱惟演上奏说：“如果让冯拯进入中书省就是表明前些天的错误，现在只要在曹利用、丁谓中间选择一个人进入中书省，就不碍事了。”皇上说：“谁可以？”钱惟演上奏说：“丁谓是文官，应当进入中书省。”皇上说：“进入中书省。”于是就奏请授丁谓同平章事，又奏请授为兼玉清官使，又奏请授为兼昭文国史。又乞请加封曹利用平章事。皇上说：“给他平章事。”查考这时候大封官，本来是真宗开的头，至于移动改换的曲折，则权柄乃是操在文学侍从之臣手中，可以舞弄文字包藏奸谋而不会被发觉。寇公罢相之后四十天，周怀政的事件才刚发生，司马温公（司马光）《纪闻》，苏子由（苏辙）《龙川志》，范蜀公（范镇）《东斋纪事》，都错误地以为因为周怀政而被罢免，这是不对的。我曾经把钱惟演的笔录给李焘看过，李焘采取了这段记载，但又错误地把召见晏公记成为寇公罢相的晚上，也是不对的。

卷 九

霍光赏功

【原文】 汉武帝外事四夷，出爵劝赏，凡将士有军功，无问贵贱，未有不封侯者。及昭帝时，大鸿胪田广明平益州夷，斩首捕虏三万，但赐爵关内侯。盖霍光为政，务与民休息，故不欲求边功。益州之师，不得已耳，与唐宋睨抑郝灵侯斩默啜之意同。然数年之后，以范明友击乌桓，傅介子刺楼兰，皆即侯之，则为非是。盖明友，光女婿也。

【译文】 汉武帝对外治理少数民族，通常利用爵位来进行鼓励和奖赏，只要将士有了军功，不论出身显贵或低贱，没有不封侯的。到了汉昭帝时，掌管外交礼仪的大鸿胪田广明平定益州少数民族，斩杀俘虏敌人有三万之多，却只被赏赐关内侯的爵位。这是因为当时是霍光当权，他的为政之术在于力求让百姓休养生息，因此不刻求边塞的战功。益州之战，是不得已的，这与唐代宋抑制郝灵盗斩杀突厥可汗默啜的意图是相同的。但是几年之后，霍光却派范明友攻击乌桓，派傅介子刺杀楼兰王，成功之后都马上给他们封侯，情况就不是如此了，大概是因为范明友是霍光的女婿吧。

尺捶取半

【原文】 《庄子》载惠子之语曰：“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虽为寓言，然此理固具。盖但取其半，正碎为微尘，余半犹存，虽至于无穷可也。特所谓卵有毛、鸡三足、犬可以为羊、马有卵、火不热、龟长于蛇、飞鸟之景未尝动，如是之类，非词说所能了也。

【译文】 《庄子》中记载惠子的话说：“一尺长的木棍，每天取它的一半，万世也不会穷尽。”虽然是寓言，然而这一道理本来存在。因为只取它的一半，当它碎成微尘，余下的一半还在那里，即使至于无穷无尽也是可以的。但所谓蛋有毛、鸡三只脚、狗可以是羊、马有蛋、火不热、龟比蛇长、飞鸟的影子未

尝移动，像这一类，不是文字言语可以谈清楚的。

汉文失材

【原文】 汉文帝见李广曰：“惜广不逢时，令当高祖世，万户侯岂足道哉！”贾山上书言治乱之道，借秦为喻，其言忠正明白，不下贾谊，曾不得一官。史臣犹赞美文帝，以为山言多激切，终不加罚，所以广谏争之路。观此二事，失材多矣。吴楚反时，李广以都尉战昌邑下，显名，以梁王授广将军印，故赏不行。武帝时，五为将军击匈奴，无尺寸功，至不得其死。三朝不遇，命也夫！

【译文】 汉文帝召见李广时说：“可惜你生不逢时，假使处在高祖时代，封个万户侯又算什么！”贾山上书谈论天下安危存亡的道理，借用秦朝的事作比喻，他的言论忠烈正直、明白易晓，不在贾谊之下，可他竟然没有得到一官半职。但是史官们仍然称誉赞颂汉文帝宽宏大量，认为贾山的言辞过于激烈热切，即便如此，他最后也没有受到责罚，这是汉文帝用来广开言路的方法。仅以这两件事来看，我认为汉文帝丧失人才太多了。吴国、楚国反叛时，李广以都尉的身份攻下了昌邑，因而名声显赫，可是由于梁王曾授予李广将军之印，违背了禁忌，因此没有得到奖赏。汉武帝的时候，李广五次作为将军攻打匈奴，却没有为自己建立任何功名，直至最后不得其死。李广历经文帝、景帝、武帝三朝，却没有得到知遇之礼，这真是命啊！

陈轸之说疏

【原文】 战国权谋之士，游说从横，皆趋一时之利，殊不顾义理曲直所在。张仪欺楚怀王，使之绝齐而献商於之地。陈轸谏曰：“张仪必负王，商於不可得而齐、秦合，是北绝齐交，西生秦患。”其言可谓善矣。然至云：“不若阴合而阳绝于齐，使人随张仪，苟与吾地，绝齐未晚。”是轸不深计齐之可绝与否，但以得地为意耳。及秦负约，楚王欲攻之，轸又劝曰：“不如因赂之以一名都，与之并兵而攻齐，是我亡地于秦，取偿于齐也。”此策尤乖谬不义。且秦加亡道于我，乃欲赂以地；齐本与国，楚无故而绝之！宜割地致币，卑词谢罪，复求其援。而反欲攻之，轸之说于是疏矣。乃知鲁仲连、虞卿为豪杰之士，非轸辈所能企及也。

【译文】 战国时代权变谋略之士，游说合纵连横，都趋向暂时的利益，很不知道义理曲直究竟在哪里。张仪欺骗楚怀王，让他和各国绝交而献给他商於一带地方。陈轸劝谏说：“张仪必定背弃大王，商於不能得到而齐国、秦国反而会联合，这是北边断绝齐国的邦交，西边生出秦国的祸患。”他的话可以说是正确了。然而至于说“不如暗中联合而表面和齐国绝交，派人跟随张仪，如果给我们土地，和齐国真正绝交也不晚”，这是陈轸不去认真考虑齐国的邦交是否可以断绝，仅仅把得到土地放在心上而已。等到秦国背弃盟约，楚王想攻打秦国。陈轸又劝阻说：“不如因此而送给秦国一个大城市，和它合兵而攻打齐国，这是我丧失土地给了秦国，却在齐国取得了补偿。”这条计策尤其荒谬背理不合于道义。而且秦国把无道的行为强加于我楚国，而要送给他土地；齐国本来是盟国，楚国无缘无故而和它绝交，本应割让土地送去财物，用恭敬谦虚的话向它谢罪，再次求它的支援，而反倒要攻打它，陈轸的劝说在这里就是疏漏谬误了。这才知道鲁仲连、虞卿是豪杰之士，不是陈轸之流可以企及的。陈轸之流所能赶得上的。

颜率儿童之见

【原文】 秦兴师临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颜率请借救于齐。乃诣齐王许以鼎。齐为发兵救周，而秦兵罢。齐将求鼎，周君又患之。颜率复诣齐曰：“愿献九鼎，不识何途之从而致之齐？”齐王将寄径于梁、于楚，率皆以为不可，齐乃止。《战国策》首载此事，盖以为奇谋。予谓此特儿童之见尔！争战虽急，要当有信。今一给齐可也，独不计后日诸侯来伐，谁复肯救我乎？疑必无是事，好事者饰之尔，故《史记》、《通鉴》皆不取。

【译文】 秦国发动军队逼近成周城下，索求象征王权的九鼎，周王对此感到忧虑。颜率请求允许他到齐国去借救兵，于是到齐王那儿许诺把鼎给齐国。齐国为此派兵救周，而秦国也就罢兵了。齐国打算索求九鼎，周君又对此感到担忧。颜率又到齐国去说：“我们愿意献出九鼎，不知道该从哪条路送到齐国去呢？”齐王打算向梁国、楚国借路，颜率都认为不行，齐国于是停止索求。《战国策》首先记载这件事，大概认为这是奇谋。而我则认为这只不过是儿童的见识罢了！争战虽然紧急，但重要的是应当有信义。现在欺骗齐国一次可以，为什么不考虑将来各诸侯国来征伐的时候，谁又肯救自己呢？我怀疑一定没有这种事，这不过是好事的人假托矫饰的故事罢了，因此《史记》、《通鉴》都不采用。

皇甫 正闰论

【原文】 晋魏以来，正闰之说纷纷，前人论之多矣。盖以宋继晋，则至陈而无所终；由隋而推之，为周为魏，则上无所起。故司马公于《通鉴》取南朝承晋讫于陈亡，然后系之隋开皇九年，姑藉其年以纪事，无所抑扬也。唯皇甫之论不然，曰：“晋之南迁，与平王避戎之事同。而元魏种实匈奴，自为中国之位号。谓之灭耶，晋实未改；谓之禅耶，已无所传。而往之著书者有帝元，今之为录者皆闰晋，失之远矣。晋为宋，宋为齐，齐为梁，江陵之灭，则为周矣。陈氏自树而夺，无容于言。故自唐推而上，唐受之隋，隋得之周，周取之梁，推梁而上以至于尧、舜，为得天下统。则陈僭于南，元闰于北，其不昭昭乎？”此说亦有理。然予复考之，灭梁江陵者，魏文帝也，时岁在甲戌。又三年丁丑，周乃代魏。不得云江陵之灭，则为周也。

【译文】 东晋和北魏以来，关于正统的议论很多，前人论述得很多了。因为用南朝宋继承晋朝，那么到陈朝就没有完结终了；如果以正统的隋朝上推，所继承的是北周和西魏北魏，那么再往上就没有起源。所以司马公（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采取南朝继承东晋到陈朝灭亡为止，然后以隋朝开皇九年与之相联系，姑且借这一年用来纪事，并没有什么贬低和抬高。唯独皇甫的诉议论就不是这样，他说：“晋朝的南迁，和周平王躲避戎人的事情相同，而北魏实在是匈奴种族，自己制定中国的帝位国号。说是灭亡吧，晋朝实际上没有改变；说是禅让吧，已经没有再传下去。而过去著书的人有的以北魏为帝，今天写历史的人都奉晋朝为正统，背离事实也就远了。晋变成宋，宋变成齐，齐变成梁，梁灭亡在江陵就变复为北周了。陈氏自称为王，不为舆论所宽容。所以唐朝往上推，唐朝接受的是隋朝，隋朝又从北周得来，北周从梁朝取得，把梁朝上推以至于尧舜，是得天下的正统。如此，则陈朝僭位在南方，北魏僭位在北方，岂不是很明白的吗？”这一说法也有理。然而我又考查，灭亡梁朝江陵的，是西魏文帝，当时是甲戌年（554年），又过了三年到丁丑（557年），北周才代替西魏，不能说江陵的灭亡就是北周。

简师之贤

【原文】 《皇甫持正集》有《送简师序》，云：“韩侍郎贬潮州，浮图之士，欢快以 ，师独愤起，访余求序，行资适潮，不顾蛇山鳄水万里之妖毒，若将朝得进拜而夕死者。师虽佛其名，而儒其行；虽夷狄其衣服，而人其知。不犹愈于冠儒冠，服朝服，惑溺于经怪之说以 彝伦邪？”予读其文，想见简师之贤，而惜其名无传于后世，故表而出之。

【译文】 《皇甫持正集》中有《送简师序》，写道：“韩愈侍郎被贬官到潮州，信佛的人都欢欣鼓舞，唯独简法师愤慨而起，拜访我，请求我写序文送行，资助他到潮州去拜访韩愈，不管万里之途有多少蛇虫毒兽，大有哪怕早上见晚上即死也愿意的决心。简法师虽然名义上皈依佛门，但行为上却是儒者；虽然穿着异族的袈裟，却有着汉族人的智慧。这岂不更胜过那些戴着儒者帽子，穿着朝官衣服，却迷惑沉溺于佛经怪异之说而败坏天地人伦常道的人吗？”我读了这篇序文，想到简师的贤良，因而遗憾他的名字没有流传到后世，所以把他表彰出来。

老人推恩

【原文】 唐世赦宥，推恩于老人绝优。开元二十三年，耕籍田。侍老百岁以上，版授上州刺史；九十以上，中州刺史；八十以上，上州司马。二十七年，赦。百岁以上，下州刺史，妇人郡君；九十以上，上州司马，妇人县君；八十以上，县令，妇人乡君。天宝七载，京城七十以上，本县令；六十以上，县丞；天下侍老除官与开元等。国朝之制，百岁者始得初品官封，比唐不侔矣。淳熙三年，以太上皇帝庆寿之故，推恩稍优，遂有增年诡籍以冒荣命者。使如唐日，将如何哉？

【译文】 唐代赦免罪人宽宥过失，特别是对老人施及的恩惠，非常优厚。开元二十三（735 年）年，皇帝亲行籍田礼。对待百岁以上老人，封给上等州刺史的头衔；九十岁以上的，封中等州刺史；八十以上的，封上等州司马。开元二十七年（739 年），赦免天下。百岁以上老人，封下等州刺史，百岁以上妇女，封为郡君；九十岁以上的老人，封上等州司马，妇女封为县君；八十

岁以上的，封县令，妇女封乡君。唐天宝七年（748年），京城里七十以上的老人，依照县令的待遇；六十以上的，按县丞对待；对待京城外的老人，安排官衔跟开元年间一样。我们宋朝的制度，百岁的人才能得到初品官的封号，跟唐代就不相等了。淳熙三年（1176年），因为太上皇帝庆寿的缘故，施加恩惠稍为优厚，于是有虚加岁数谎报籍贯来冒领荣誉职命的人。如果象唐代那样，将会怎么样呢？

唐三杰

【原文】 汉高祖以萧何、张良、韩信为人杰。此三人者，真足以当之也。唐明皇同日拜宋睥、张说、源乾曜三故相官，帝赋《三杰诗》，自写以赐。其意盖以比萧、张等也。说与乾曜岂睥比哉！明皇可谓不知臣矣。

【译文】 汉高祖把萧何、张良、韩信作为杰出人物，这三个人真正是担当得起的。唐明皇同一天拜宋睥、张说、源乾曜三位宰相的官职，写作《三杰诗》，自己书写给这三个人，他的意思是以这三个人来比萧何、张良是等同的。张说和源乾曜难道能比宋睥吗？唐明皇可以说是不了解臣下了。

忠义出天资

【原文】 忠义守节之士，出于天资，非关居位贵贱、受恩深浅也。王莽移汉祚，刘歆以宗室之隽，导之为逆，孔光以宰相辅成其事。而龚胜以故大夫守谊以死；郭钦、蒋诩以刺史、郡守，栗融、禽庆、曹竟、苏章以儒生，皆去官不仕；陈咸之家，至不用王氏腊。萧道成篡宋，褚渊、王俭，奕世达官，身为帝甥、主婿，所以纵舆灭刘，唯恐不速；而死节者乃王蕴、卜伯兴、黄回、任侯伯之辈耳。安禄山、朱滔之变，陈希烈、张均、张增、乔琳、李忠臣，皆以宰相世臣，为之丞弼；而甄济、权皋、刘海宾、段秀实，或以幕府小吏，或以废斥列卿，捐身立节，名震海内。人之贤不肖，相去何止天冠地履乎！

【译文】 忠贞道义保持节操的人，是因为天赋所致，跟他们所处的地位高低，所受的恩惠深浅没有关系。王莽篡夺了汉朝的皇位，刘歆身为汉朝宗室中的隽秀却诱导王莽叛逆汉朝，孔光身为宰相也帮助王莽促成其事。而龚胜作为离职的大夫却遵守道义而死；郭钦、蒋诩作为刺史、郡守，栗融、禽庆、曹竟、

苏章作为儒生，都抛弃职位不愿在朝作官；陈咸的家中，甚至不采用王莽的年终祭礼。萧道成篡夺了南朝宋的政权，褚渊、王俭，都是历代显达的官宦，身为皇帝的外甥、主上的女婿，却怂恿鼓动别人颠覆刘宋，只嫌不够快速；保持气节而死的人竟是王蕴、卜伯兴、黄回、任侯伯这些小臣。安禄山、朱 叛乱，陈希烈、张均、张 、乔琳、李忠臣，都身为宰相或世臣却作了贼人的邦凶；而甄济、权皋、刘海宾、段秀实，有的作为军营公署中的小官，有的作为被罢免贬斥的卿相，牺牲性命建立名节，其声名震动了全国。人的贤良与否，相差何止只是天上地下呀！

刘歆不孝

【原文】 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刘歆事父，虽不载不孝之迹，然其议论每与向异同。故向拳拳于国家，欲抑王氏以崇刘氏；而歆乃力赞王莽，倡其凶逆，至为之国师公，又改名秀以应图讖，竟亦不免为莽所诛，子孺、女嫫皆以戮死。使天道每如是，不善者其知惧乎！

【译文】 事奉双亲孝顺，这份忠诚可以转移到皇帝身上，所以求取忠臣必定在孝子的家门里。刘歆事奉父亲，虽然史传没有记载他不孝的事迹，但他的议论常常和他的父亲刘向不同。所以刘向忠心谨慎地对国家，要压制王氏以尊崇刘氏，而刘歆却一力赞扬王莽，首倡凶恶叛逆，甚至做了王莽的国师公，又改名为刘秀以求符合图讖，到头来还不免为王莽所诛杀，儿子刘 ，女儿刘嫫被杀死。如果天道常常是这样，不善之人恐怕会知道害怕吧！

汉法恶诞谩

【原文】 李广以私忿杀霸陵尉，上书自陈谢罪。武帝报之曰：“报忿除害，朕之所图于将军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颡请罪，岂朕之指哉！”张敞杀絮舜，上书曰：“臣待罪京兆，絮舜本臣素所厚吏，以臣有章劾当免，受记考事，谓臣‘五日京兆’，背恩忘义。臣窃以舜无状，枉法以诛之。臣贼杀不辜，鞫狱故不直，死无所恨。”宣帝引拜为刺史。汉世法令，最恶诞谩罔上。广、敞虽妄杀人，一语陈情，则赦之不问，所以开臣下不敢为欺之路也。武帝待张汤非不厚，及问鲁谒居事，谓其怀诈面欺，杀之不贷，真得御臣之法。

【译文】 李广因个人怨恨杀了霸陵尉，上书给皇帝，自我表明情况承认罪过。汉武帝回复他说：“报复怨恨、剪除祸害，这正是我对将军你的要求。如果免冠赤足、叩头请罪，这就不是我的意图了！”张敞杀了絮舜，上书说道：“我是得罪待判的在职京兆尹，絮舜本来是我所厚待的吏员。因为我被人奏章弹劾，应当免职，以待罪之身暂时处理事务，絮舜就说我是‘只能当五天的京兆尹’，十分忘恩负义。我私下认为絮舜没有德操，故违背法律把他杀了。我杀害了无罪的人，审定案件当然不会正直，死了也没有什么遗憾。”汉宣帝提拔了张敞，授予他刺史之职。汉代的法令，最厌恶虚诞欺诈蒙骗主上。李广、张敞虽然妄自杀人，但一番话陈述了真实情况，就被赦免不加追究，这是开辟臣下不敢进行欺君之路所用的策略。汉武帝对张汤并不是不重用，等到问到鲁谒居的事，认为他心怀诡诈面带欺瞒，杀了他毫不宽恕。这真是掌握了统御臣下的方法了。

汉官名

【原文】 汉官名有不书于《百官表》而因事乃见者。如行冤狱使者，因张敞杀絮舜而见；美俗使者，因何并代严诩而见；河堤使者，因王延世塞决河而见；直指使者，因暴胜之而见。岂非因事置官，事已即罢乎？

【译文】 汉代的官名有的不见于《汉书·百官公卿表》，而因为某一事件才见到的。如行冤狱使者，是因为张敞杀死絮舜见到；美俗使者，因为何并取代严诩而见到；河堤使者，是因为王延世填埋黄河决口而见到；直指使者，是因为暴胜之而见到。岂不是因为某一事件而设置此官，事情了结就不再授予了吗？

五胡乱华

【原文】 刘聪乘晋之衰，盗窃中土，身死而嗣灭，男女无少长皆戕于靳准。刘曜承其后，不能十年，身为人禽。石勒尝盛矣，子夺于虎。虎尽有秦、魏、燕、齐、韩、赵之地。死不一年，而后嗣屠戮，无一遗种。慕容隼乘石氏之乱，跨据河山，亦仅终其身，至子而灭。苻坚之兴，又非刘、石比，然不能自免，社稷为墟。慕容垂乘苻氏之乱，尽复燕祚，死未期年，基业倾覆。此七人者，皆夷狄乱华之臣孽也，而不能久如此。今之金虏，为国八十年，传数酋矣，未亡

何邪！

【译文】 刘聪乘着晋朝的衰微，窃取中原，自己身死，后代也被灭绝，无论男女老幼都被靳准杀害。刘曜承接刘聪之后，不超过十年，自己就被人俘虏。石勒曾经兴盛过，儿子的皇位则被石虎夺走。石虎完全占有了秦国、魏国、燕国、齐国、韩国、赵国的土地。石虎死后不到一年，子孙就遭残杀，没有一个留下后代。慕容隼乘着石氏的内乱，占据了江山，也只是保全了自身，国家到他的儿子就覆灭了。苻坚的兴盛，又不是刘氏、石氏能比的，但是也不能免于失败，国家化为丘墟。慕容垂趁着苻氏的动乱，完全恢复了前燕的国土，然而死后不足一年，帝业又倾颓覆亡。这七个人，都是夷族祸乱中华的突出人物，可是都如此不能长久。当今的金国贼虏，建立政权八十年，传了好几代首领了，还没有灭亡，这是为什么呢？

石宣为彗

【原文】 石虎将杀其子宣，佛图澄谏曰：“陛下若加慈恕，福祚犹长；若必诛之，宣当为彗星下扫邺宫。”虎不从。明年，虎死；二年，国亡。《晋史》书之以澄言之验。予谓此乃石氏穷凶极虐，为天所弃。岂一逆子便能上干玄象，起彗孛乎？宣杀其弟韬，又欲行冒顿之事，宁有不问之理？澄言既妄，史氏误信而载之，《资治通鉴》亦失于不删也。

【译文】 石虎将要杀死他的儿子石宣，佛图澄劝阻说：“陛下如果给予慈爱宽恕，国家的福命还长，如果必定要杀他，石宣就要变成彗星下来扫平邺城宫殿。”石虎不听从。第二年，石虎死去，国家灭亡。《晋书》记载下来认为这是佛图澄预言的应验。我认为这是石氏穷极凶残暴虐，为上天所抛弃，而岂能是一个逆子就能上关天象，引起彗星发生吗？石宣杀了他兄弟石韬，又想干冒顿单于杀父的事情，哪有不被查问的道理？佛图澄的话既然是胡说，史官错误地相信而加以记载，《资治通鉴》也失之于没有删除。

三公改他官

【原文】 国初以来，宰相带三公官居位，及罢去，又多有改他官者。范质自司徒、侍中改太子太傅，王溥自司空改太子太保，吕蒙正自司空改太子太师

是也。天禧以前唯赵普、王旦及依旧公师，仍复迁秩。天圣而后，恩典始隆，张士逊致仕，至以兵部尚书得太傅云。

【译文】 宋朝初年以来，宰相带着三公的荣誉官职处在相位，等到免去相位，有很多人改任其他荣誉官职。范质从司徒、侍中改任太子太傅，王溥从司空改任太子太保，吕蒙正从司空改任太子太师就是这样。宋真宗天禧年间以前，只有赵普、王旦即使罢相依旧是国公、太师，同时又迁升官职。宋仁宗天圣年间以后，恩典才开始隆重，张士逊辞官以后，甚至以兵部尚书的身份得到太傅之位。

带职致仕

【原文】 熙宁以前，待制学士致仕者，率迁官而解其职。若有疾就闲者，亦换为集贤院学士。盖不以近职处散地也。带职致仕，方自熙宁中王素始。后改集贤学士为修撰，政和中又改为右文云。

【译文】 熙宁年间以前，待制学士退休的，大多是升迁官位而解除职务。如果是有病而希望休息的，也换为集贤院学士。因为是不让亲近皇帝的职官放置在闲散的地方。带着职务退休，才从熙宁年间的王素开始。后来把集贤学士改为修撰，政和中又改为右文。

朋友之义

【原文】 朋友之义甚重。天下之达道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妇而至朋友之交。故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须友以成者。“天下俗薄，而朋友道绝”见于《诗》：“不信乎朋友，弗获乎上。”见于《中庸》、《孟子》；“朋友信之”，孔子之志也；“车马衣裘，与朋友共”，子路之志也；“与朋友交而信”，曾子之志也。《周礼》六行，五曰任，谓信于友也。汉、唐以来，犹有范张、陈雷、元白、刘柳之徒，始终相与，不以死生贵贱易其心。本朝百年间，此风尚存。呜呼，今亡矣！

【译文】 朋友之间的道义很重。天下的人所共同遵从的道义有五种：君臣、父子、兄弟、夫妇而到朋友的交往。所以从天子下至百姓，没有不需要朋友才能有所成就的。“天下的风俗取信于朋友，不能得到上面的信任”，见于《中

庸》、《孟子》。“朋友就信任他”，这是孔子的志愿；“车马衣裘，和朋友一起使用”，这是子路的志愿；“与朋友交往有信用”，这是曾子的志愿。《周礼》中的六种好的行为，第五种叫“任”，就是说取信于朋友。汉、唐以来，还有范式、张劭、陈重、雷义、元稹、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这些人，始终交情笃好，不会因为死生贵贱的改变他们的心志。本朝建立的一百多年间，这种好风气还存在。唉，现在却丢掉了！

高科得人

【原文】 国朝自太平兴国以来，以科举罗天下士，士之策名前列者，或不十年而至公辅。吕文穆公蒙正、张文定公齐贤之徒是也。及嘉祐以前，亦指日在清显。东坡《送章子平序》，以谓仁宗一朝十有三榜，数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不至于公卿者，五人而已。盖为士者知其身必达，故自爱重而不肯为非，天下公望亦以鼎贵期之，故相与爱惜成就，以待其用。至嘉祐四年之制，前三名始不为通判，第一人才得评事、签判，代还升通判，又任满，始除馆职。王安石为政，又杀其法。恩数既削，得人亦衰矣。观天圣初榜，宋郑公郊、叶清臣、郑文肃公戡、高文庄公若讷、曾鲁公公亮五人连名，二宰相、二执政、一三司使。第二榜，王文忠公尧臣、韩魏公琦、赵康靖公玘连名。第三榜，王宣徽拱辰、刘相沆、孙文懿公 连名。杨劄榜，劄不幸即死，王岐公 、韩康公绶、王荆公安石连名。刘耀榜，耀不显，胡右丞宗愈、安门下煮、刘忠肃公摯、章申公 连名。其盛如此！治平以后，第一人作侍从，盖可数矣。

【译文】 宋朝自从太平兴国年间以来，用科举网罗天下的才士，策试名列前茅的士人，有的不出十年官职就升到三公或辅相了。文穆公吕蒙正、文定公张齐贤等人就是这样。等到嘉祐年间以前，进士也还可以不用多少时日就升到清高显赫的职位。苏东坡《送章子平序》说，宋仁宗一朝公布了十三次科举文榜，统计其中前三名，共有三十九人，这些人中，只有五名没有升到公卿之位。因为作为进士知道自己一定会显达，所以自爱自重而不肯做非份的事；社会公众也认为他们的显贵是指日可期的，所以对他们都爱护尊敬，帮助他们成就功名，等待将来的重用。到嘉祐四年（1059年）的制度改革，前三名才开始不再任通判，第一名仅能得到个评事、签判，一步步升到通判，又任职期满，才授予馆阁大臣之职。王安石执政时，又降低了任职等级。恩惠的数量既然减削了，得到的人才也就衰减了。观察天圣年的首次科举名榜，郑公宋郊、叶清臣、文

肃公郑戡、文庄公高若讷、鲁公曾公亮五人名次相连，两人做了宰相，两人做参执政事，一人做了三司使。第二次名榜，文忠公王尧臣、魏公韩琦、康靖公赵 名次相连。第三榜，宣徽使王拱辰、宰相刘沆、文懿公孙 名次相连。杨 那一榜，杨 不幸互去，岐公王瞻、康公韩绛、荆公王安石连名。刘 那一榜，刘 没有显贵，右丞胡宗愈、门下侍郎安燾、忠肃公刘摯、申公章 名次相连。人才是多么繁盛！治平年间以后，进士升职就没有这么快了，科试第一名当上侍从官的，寥寥可数。

辛庆忌

【原文】 汉成帝将立赵飞燕为皇后，怒刘辅直谏，囚之掖廷狱。左将军辛庆忌等上书救辅，遂得减死。朱云请斩张禹，上怒，将杀之，庆忌免冠解印绶，叩头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臣敢以死争。”叩头流血。上意解，然后得已。庆忌此两事，可与汲黯、王章同科。班史不书于本传，但言其为国虎臣，匈奴、西域敬其威信而已。方争朱云时，公卿在前，曾无一人助之以请，为可羞也。

【译文】 汉成帝将要立赵飞燕为皇后，因为刘辅直言劝谏而发怒，把他囚禁在宫中掖廷的监狱中，左将军辛庆忌等上书救援刘辅，于是就免去死刑。朱云请求斩杀张禹，皇上发怒，将要杀死他，辛庆忌脱下朝冠解开绶带，叩头说：“这个臣子素来以狂傲直爽著名，臣谨敢以死相争。”叩头流出血来。皇上的怒气缓解，然后事情才算完了。辛庆忌这两件事，可以和汲黯、王章列入一类。班固《汉书》不记载在本传里，仅仅说他是国家的勇猛之臣，匈奴、西域敬重他的威信而已。当他为朱云争论时，满朝公卿在前面，不曾有一个人帮助他请求，这实在是令人羞耻。

楚怀王

【原文】 秦楚之际，楚怀王以牧羊小儿为项氏所立，首尾才三年。以事考之，东坡所谓天下之贤主也。项梁之死，王并吕臣、项羽军，自将之，羽不敢争。见宋义论兵事，即以为上将军，而羽乃为次将。择诸将入关，羽怨秦，奋势愿与沛公西，王以羽矜悍祸贼，不许，独遣沛公，羽不敢违。及秦既亡，羽使人还报王，王曰：“如约。”令沛公王关中。此数者，皆能自制命，非碌碌孱

主受令于强臣者，故终不能全于项氏。然遣将救赵灭秦，至于有天下，皆出其手。太史公作《史记》，当为之立本纪，继于秦后，迨其亡，则次以汉高祖可也。而乃立《项羽本纪》，义帝之事特附见焉，是直以羽为代秦也，其失多矣。高祖尝下诏，以秦皇帝、楚隐王亡后，为置守冢，并及魏、齐、赵三王，而义帝乃高祖故君，独缺不问，岂简策脱佚乎？

【译文】 秦楚之际，楚怀王以牧羊小孩的身份，被项梁立为王，前后仅在位三年。根据史事来考究，楚怀王正是苏东坡所说的天下的贤明君主。项梁死了以后，怀王合并了吕臣、项羽的军队，自己统领全军，项羽并不敢力争。楚怀王召见宋义，谈论战事，就拜他为上将军，而项羽才是次将。怀王挑选诸位将领攻打关中，项羽怨恨秦朝，情绪激奋，愿意同刘邦一起西进，怀王认为项羽敏捷骁悍、凶狠残暴，不肯同意，只派遣了刘邦一人，项羽也不敢违抗。等到秦朝灭亡以后，项羽派人回来报告楚怀王，怀王说：“按照原来的约定行事。”命令刘邦统治关中。从这两件事情看，楚怀王都能够自主地发布命令，不是庸碌无为受制于强悍大臣的软弱君主，因此最终被项羽所杀。然而他调遣将领解救赵国，消灭秦国，直到夺取天下，都是他亲手所为。太史公作《史记》，应当为他写个本纪，接在秦朝的后面，写到他灭亡之后，再接着写汉高祖就可以了。可是竟然写了《项羽本纪》，义帝的事只附带着见于其中，仅仅认为项羽取代了秦朝，失误太多了。汉高祖曾经下过诏令，因为秦皇帝、楚隐王没有后人，所以为他们安排了守护坟墓的人，至于魏、齐、赵三王则一样对待，而义帝是高祖原来的君主，却偏偏遗漏，不管不问，这难道是竹简书册脱漏亡佚了吗？

范增非人杰

【原文】 世谓范增为人杰，予以为不然。夷考平生，盖出战国从横之余，见利而不知义者也。始劝项氏立怀王，及羽夺王之地，迁王于郴，已而弑之。增不能引君臣大谊，争之以死。怀王与诸将约，先入关者王之，沛公既先定关中，则当如约，增乃劝羽杀之，又徙之蜀汉。羽之伐赵，杀上将宋义，增为末将，坐而视之。坑秦降卒、杀秦降王、烧秦宫室，增皆亲见之，未尝闻一言也。至于荥阳之役，身遭反间，然后发怒而去。呜呼，疏矣哉！东坡公论此事伟甚，犹未尽也。

【译文】 世人都认为范增是人中豪杰，我认为并非如此。平心静气考察他的生平，可以把他看成是战国纵横家的残余，是见到好处就不管道义的人。开

始时他劝项梁扶立怀王，可是等到项羽夺得了怀王的土地，把怀王迁到郴（今湖南郴县），不久又杀了怀王，范增却不能依照君臣的大义以死相殉。怀王跟几位将领约定，先进入关中灭秦的为关中之王，沛公既然已经先平定了关中，那么就应该遵守约定，范增竟然劝项羽杀了沛公，事既不成，又将他迁移到蜀郡汉中一带。项羽在征伐赵军的时候，杀了上将军宋义，范增作为末将，坐视而不管。项羽活埋秦朝降兵、杀死秦朝的降王、烧毁秦朝宫室，范增都是亲眼所见，却没有听到他说一句劝说的话。到了荥阳之战，范增自己受到了敌方的离间，竟然又发怒离去。唉！疏失太多了！苏东坡对这件事的论述非常深刻，但还是不够充分。

翰苑故事

【原文】 翰苑故事，今废弃无余。唯学士入朝，犹有朱衣院吏双引至朝堂而止，及景灵宫行香，则引至立班处。公文至三省不用申状，但尺纸直书其事，右语云：“谘报尚书省伏候裁旨，月日押”，谓之谘报。此两事仅存。

【译文】 翰林学士院的旧制度，现在废弃无余。只有翰林学士上朝，还有红衣服的院吏两人引导到朝堂为止，等到景灵宫焚香礼拜，就引导到立班的地方。院里的公文送到尚书三省不用申状这种形式的公文，仅仅用一尺长的纸照直写上所要说明的事实，最后说：“谘报尚书省敬候裁决，某月某日，署名画押。”这叫做谘根。仅仅这两件事还保留下来。

唐扬州之盛

【原文】 唐世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斡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杜牧之有“春风十里珠帘”之句，张祜诗云：“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王建诗云：“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似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徐凝诗云：“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其盛可知矣。自毕师铎、孙儒之乱，荡为丘墟。杨行密复葺之，稍成壮藩，又毁于显德。本朝承平百七十年，尚不能及唐之什一，今日真可酸鼻也！

【译文】 唐代盐铁转运使住在扬州（今属江苏），全面掌管着财政大权，判

官多到几十人，商人往来如梭。所以民谚说：“扬一益二”，这是说天下最繁盛的地方，扬州为第一，而四川的益州仅次于它。杜牧之有“春风十里珠帘”的诗句，张祜的诗说：“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王建的诗道：“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似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徐凝的诗道：“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当时的盛况可想而知。自从毕师铎、孙儒的战乱，扬州被扫荡成为废墟。杨行密重新进行修复，渐渐又成为宏伟的藩镇，可惜又在后周显德年间被烧毁。我们宋朝太平了一百七十年，扬州还不能赶上唐朝时的十分之一，真令人鼻子发酸哪！

古人无忌讳

【原文】 古人无忌讳。如季武子成寝，杜氏之葬在西阶之下，请合葬焉，许之。入宫而不敢哭，武子命之哭。曾子与客立于门侧，其徒有父死，将出哭于巷者，曾子曰：“反，哭于尔次。”北面而吊焉。伯高死于卫，赴于孔子，孔子曰：“夫由赐也见我，吾哭诸赐氏。”遂哭于子贡寝门之外，命子贡为之主，曰：“为尔哭也，来者拜之。”夫以国卿之寝阶，许外人入哭而葬；己所居室，而令门弟子哭其亲；朋友之丧，而受哭于寝门之外；今人必不然者也。圣贤所行，固为尽礼，季孙宿亦能如是。以古方今，相去何直千万也。

【译文】 古代的人没有忌讳。例如季武子建成寝陵，杜氏的墓葬位于寝殿西边台阶之下。杜氏后人请求将其先人合葬在季氏寝陵之中，季武子同意了。杜氏家人进入寝殿却不敢哭，季武子就让他们哭。曾子跟客人站立在大门旁边，他有个弟子父亲死了，想出门到巷中哭悼，曾子说：“回去到你的住处哭吧。”并且面向北进行悼念。伯高死在卫国，有人向孔子报丧，孔子说：“正好因为端木赐（孔子的学生，字子贡，卫国人）来见我，我就对着端木赐哭悼吧。”于是在子贡的内室门外哭，让子贡作这件事的当事人。并说：“既然在你这里为伯高哭悼，那么来慰问的人，应该由你回拜。”身为公卿的人的寝殿阶下，允许外人进来哭悼甚至安葬；自己所住的居室内，能够让门下学生哭悼他的父亲；朋友有丧事的时候，能够内室门外接受哭悼；现在的人一定不会象这样。圣明贤人的所作所为，当然是全都符合礼数，连季孙宿（即季武子）也能这样。用古代来跟当今相比，相差何止千千万万！

宰我不诈

【原文】 宰我以三年之丧为久，夫子以食稻衣锦问之曰：“于女安乎？”曰：“安。”后人以是讥宰我，谓孔门高第乃如是。殊不知其由衷之言，不为诈隐，所以为孔门高第也。鲁悼公之丧，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达礼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闻矣。勉而为瘠，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则食食。”乐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恶乎用吾情！”谓勉强过礼也。夫不情之恶，贤者所深戒，虽孟敬子之不臣，宁废礼食食，不肯不情而为瘠。盖先王之泽未远，故不肖者亦能及之。

【译文】 宰我认为三年的丧期太久，孔子用吃稻米和穿锦衣这一问题问宰我，说：“这样做对你来说安心吗？”宰我说：“安心。”后人因此批评宰我，说是孔子门下的高足竟然如此。实不知这是他从衷心发出的话，不加欺骗隐瞒，所以才是孔子门下的高足。鲁悼公死后，孟敬子（孟捷）说：“服丧喝粥，这是天下都遵奉的礼仪。我们三个臣下不能对国君尽忠，天下人没有不知道的，勉强自己去饿瘦，恐怕会使人怀疑这不是因为君臣之情而变瘦的吧！我还是吃我的东西。”乐正子春的母亲死去，他五天没有吃饭，说：“我很后悔。从我母亲去世开始就不再能得到我的感情，我还用什么方式表达我的感情！”这是说勉强到超过礼仪规定。说到违背真感情这种过错，是贤明的人所深深戒惧的，即使像孟敬子的不合于臣道，也宁废去礼仪而吃东西，不肯违背真感情而减食饿瘦，这是因为古圣先王的教化不远，所以不贤之人也可以够得上。

李益卢纶诗

【原文】 李益、卢纶，皆唐大历十才子之杰者。纶于益为内兄，尝秋夜同宿，益赠纶诗曰：“世故中年别，余生此会同。却将愁与病，独对朗陵翁。”纶和曰：“戚戚一西东，十年今始同。可怜风雨夜，相问两衰翁。”二诗虽绝句，读之使人凄然，皆奇作也。

【译文】 李益、卢纶，都是唐代大历间的十大才子诗人中的杰出者。卢纶是李益妻子的哥哥，曾经在一个秋夜两人同宿一处，李益赠给卢纶一首诗说：“世故中年别，余生此会同。却将愁与病，独对朗陵翁。”卢纶和诗道：“戚戚一

西东，十年今始同。可怜风雨夜，相问两衰翁。”两首诗虽然属于短小的绝句，读起来却使人感到悲凉凄恻，都是奇作。

卷十

杨彪陈群

【原文】 魏文帝受禅，欲以杨彪为太尉，彪辞曰：“彪备汉三公，耄年被病，岂可赞惟新之朝？”乃授光禄大夫。相国华歆以形色忤旨，徙为司徒而不进爵。帝久不悵，以问尚书令陈群曰：“我应天受禅，相国及公独不怡，何也？”群对曰：“臣与相国，曾臣汉朝，心虽悦喜，犹义形于色。”夫曹氏篡汉，忠臣义士之所宜痛心疾首，纵力不能讨，忍复仕其朝为公卿乎？歆、群为一世之贤，所立不过如是。彪逊辞以免祸，亦不敢一言及曹氏之所以得。盖自党锢祸起，天下贤士大夫如李膺、范滂之徒，屠戮殆尽，故所存者如是而已。士风不竞，悲夫！章、蔡京为政，欲殄灭元璽善类，正士禁锢者三十年，以致靖康之祸，其不为歆、群者几希矣。

【译文】 魏文帝受禅称帝，想让杨彪当太尉，杨彪推辞说“我曾任过汉朝的三公之职，现在又年老多病，怎么可辅助新的朝廷？”魏文帝就授予他光禄大夫。相国华歆用不高兴的脸色消极违抗圣旨，被迁调为司徒而不提升爵位。魏文帝很长时间不开心，就问尚书令陈群：“我响应天命接受皇位，相国和您偏偏不愉快，这是为什么？”陈群回答说：“我跟相国，曾经作过汉朝的大臣，心中即使喜悦，在道义上仍不免要为先前的汉朝悲伤。”对于曹氏篡夺汉朝政权，凡是忠诚的臣子、正义的士人都应该痛心疾首，即使力量不够不能讨伐，难道还忍心再在他的朝中做公卿大官吗？华歆、陈群是一代贤良，他们的立身之道却不过如此。杨彪谦恭地推辞以避免灾祸，也不敢说一句谈及曹氏得天下的话。自从宦官迫害士大夫的党锢之祸以后，李膺、范滂之类的忠义之士，被屠杀得将要尽绝，因此活下来的人只有这样了。士人的风气不振，可悲呀！章、蔡京主持政事，想要杀尽宋朝元璽时的忠良之臣，正义人士被禁锢达三十年，从而导致了靖康年间的灾祸，士人不像华歆、陈群的几乎极少有了。

袁盎、温峤

【原文】 赵谈常害袁盎，盎兄子种曰：“君与斗，廷辱之，使其毁不用。”文帝出，谈参乘，盎前曰：“天子所与共六尺舆者，皆天下豪英，陛下奈何与刀锯余人载？”上笑下谈，谈泣下车。温峤将去王敦，而惧钱凤为之奸谋，因敦钱别，峤起行酒，至凤，击凤帻坠，作色曰：“钱凤何人，温太真行酒而敢不饮！”及发后，凤入说敦曰：“峤于朝廷甚密，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醉，小加声色，岂得以此便相谗貳。”由是凤谋不行。二者之智如此。

【译文】 宦官赵谈常常忌怕袁盎，袁盎哥哥的儿子袁种说：“您和他争斗，在朝廷上羞辱他，使他毁弃不被任用。”汉文帝出行，赵谈陪同坐一辆车，袁盎上前启奏说：“和天子共坐六尺宽的车子的，都是天下的豪杰英才，陛下为什么和受过宫刑的人一起乘坐？”汉文帝笑着让赵谈下车，赵谈哭泣着下了车子。温峤将要离开王敦，但害怕钱凤的奸计，乘王敦为他饯行的机会，温峤起立挨个敬酒，到钱凤那里，把钱凤的头巾一掌打掉，板起面孔说：“钱凤你是什么人，我温太真挨个敬酒而敢不喝！”等到温峤走后，钱凤进见王敦劝他说：“温峤对朝廷很密切，恐怕不会对您诚心诚意，不见得能信任。”王敦说：“温太真昨天喝醉了，对你稍稍严厉不礼貌，哪里能因为这个就说他的坏话。”由此钱凤的计谋没有成功。这两件事表现的才智就是如此。

日饮亡何

【原文】 《汉书·爰盎传》：“南方卑湿，君能日饮，亡何。”颜师古注云“无何，言更无余事。”而《史记·盎传》作“日饮毋苛”，盖言南方不宜多饮耳。今人多用“亡何”字。

【译文】 《汉书·爰盎传》说：“南方地势低下潮湿，您除了能整日饮酒之外，亡何（并无其它事情可做）。”颜师古作解释说：“亡何就是无何，说的是再没有其他事情。”可是《史记·袁盎传》却写作“每日饮酒不要太多（日饮无苛）。”大概是说在南方不宜多饮酒。现在人们多用“亡何”的字样。

爰盎小人

【原文】 爰盎真小人，每事皆借公言而报私怨，初非尽忠一意为君上者也。尝为吕禄舍人，故怨周勃。文帝礼下勃，何豫盎事，乃有“非社稷臣”之语，谓勃不能争吕氏之事，适会成功耳。致文帝有轻勃心，既免使就国，遂有廷尉之难。尝谒丞相申屠嘉，嘉弗为礼，则之承相舍折困之。为赵谈所害，故沮止其参乘。素不好晁错，故因吴反事请诛之。盖盎本安陵群盗，宜其伎心忍戾如此。死于刺客，非不幸也。

【译文】 爰盎是个真正的小人，每件事都假借公言来报私人的怨恨，出发点并不是竭尽忠诚一心一意地为君上办事。他曾经做过吕禄的舍人，因此怨恨周勃。汉文帝礼待周勃，跟爰盎有什么相干？竟然说周勃“不是国家的忠臣”，说周勃并不能为吕氏的事谏诤，只是奏巧碰上诛杀诸吕成功罢了。遂使汉文帝有轻视周勃的思想，周勃被免职回到封国之后，又使他遭受刑狱之难。爰盎曾经求见丞相申屠嘉，申屠嘉没有礼待他，爰盎得宠后就到丞相住处去折辱为难他。爰盎被赵谈害过，因此阻止赵谈作为皇上车舆的陪乘。爰盎素来不喜欢晁错，因此趁着吴王造反的事请求杀了晁错。爰盎出身于安陵群盗，难怪他心怀猜忌残忍乖张到这种地步。他被刺客杀死，没有死于王法并不是不幸的事。

唐书判

【原文】 唐铨选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谓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凡试判登科谓之入等，甚拙者谓之蓝缕，选未滿而试文三篇谓之宏辞，试判三条谓之拔萃，中者即授官。既以书为艺，故唐人无不工楷法；以判为贵，故无不习熟。而判语必骈俪，今所传《龙筋凤髓判》及《白乐天集·甲乙判》是也。自朝廷至县邑，莫不皆然，非读书善文不可也。宰臣每启拟一事，亦必偶数十语，今郑畋敕语、堂判犹存。世俗喜道琐细遗事，参以滑稽，目为花判，其实乃如此，非若今人握笔据案，只署一字亦可。国初尚有唐余波，久而革去之。但体貌丰伟，用以取人，未为至论。

【译文】 唐代量才授官的选择标准有四条：第一是身，说的是身体魁伟面貌丰满；第二是言，言语辞令辨析正大；第三是书，正楷遒劲美观；第四是判，

文章思理优美擅长。凡是考试判案得中叫做“入等”，很差的叫做“蓝缕”，选官没有满额而考试文章三篇叫做“宏辞”，考试判辞三条叫做“拔萃”。考中的就授予官职。既然把书法作为才能，所以唐朝人没有不工于正楷的；重视判案的能力，所以没有人不学习熟练。而判语必定要用骈体文，今天所流传的《龙筋凤髓判》和《白乐天集》中的《甲乙判》就是。从朝廷到县城，无不都是这样，不是读书善于做文章是办不到的。宰相大臣每拟一个批件，也必定要排偶几十句，到今天郑畋的代拟敕语和他的判辞还流存于世。世俗喜欢那些对琐碎的小事而间杂有滑稽词语的判辞，把它们叫做花判，其实也是这样，不像今天的人坐在公案后拿起笔，只写一个字也可以。本朝初年还有唐代的余波，很久以后才被革除。但是根据身体魁伟面貌丰满来作为选拔标准，就不是最恰当的做法了。

古彝器

【原文】 三代彝器，其存至今者，人皆宝为奇玩。然自春秋以来，固重之矣。经传所记，取郕大鼎于宋，鲁以吴寿梦之鼎贿荀偃，晋赐子产莒之二方鼎，齐赂晋以纪砮、玉磬，徐赂齐以甲父之鼎，郑赂晋以襄钟，卫欲以文之舒鼎、定之矲鉴纳鲁侯，乐毅为燕破齐，祭器设于宁台，大吕陈于元英，故鼎反乎磨室是已。

【译文】 夏、商、周三代的青铜器，其中留在到今的，人们都作为稀有的珍宝。但是从春秋以来，本来就对这些器物很宝重了。经传上所记载的有：在宋国取得郕国的大鼎，鲁国把吴王寿梦之鼎送给荀偃，晋赐给子产莒国的两个方鼎，齐国把纪国的 、玉磬送给晋国，徐国申父之鼎送给齐国，郑国把襄钟送给晋国，卫国想把文之舒鼎、定之 鉴进贡给鲁侯，乐毅为燕国攻破齐国，把从齐国取回来供祭祀的器物设置在宁台，大吕之钟陈列在元英宫，过去献给齐国的鼎回到了磨室，等等，都是这样。

玉蕊杜鹃

【原文】 物以希见为珍，不必异种也。长安唐昌观玉蕊，乃今缸花，又名米囊，黄鲁直易为山矾者。润州鹤林寺杜鹃，乃今映山红，又名红踯躅者。二

花在江东弥山亘野，殆与榛莽相似。而唐昌所产，至于神女下游，折花而去，以践玉峰之期；鹤林之花，至以为外国僧钵盂中所移，上玄命三女下司之，已逾百年，终归阆苑。是不特土俗罕见，虽神仙亦不识也。王建宫词云：“太仪前日暖房来，嘱向昭阳乞药栽。敕赐一窠红踯躅，谢恩未了奏花开。”其重如此，盖宫禁中亦鲜云。

【译文】事物以少见为珍贵，不一定要奇异的品种。长安的唐昌观中的玉蕊花，就是现在的花，又名米囊，黄鲁直改称为山矾的那种花。润州的鹤林寺中的杜鹃花，就是现在的映山红，又叫红踯躅的那种花。这两种花在江东满山遍野，几乎跟丛生的野草灌木一样。而唐昌观中所种的玉蕊，甚至引得仙女下凡，折花而去，去赴玉峰仙境的约会；鹤林寺的杜鹃花，人们甚至认为是从外国僧人的钵盂中移来的，上天命令三位仙女主管它已经超过一百年了，最终要回到阆苑仙境。因此这玉蕊、杜鹃不仅仅在民间很少见到，就连神仙也不认识。王建的宫词咏道：“太仪前日暖房来，嘱向昭阳乞药栽。敕赐一窠红踯躅，谢恩未了奏花开。”对它这样的看重，可见皇宫之中也很稀有。

礼寺失职

【原文】唐开元中，封孔子为文宣王，颜子为兖公，闵子至子夏为侯，群弟子为伯。本朝祥符中，进封公为国公，侯为郡公，伯为侯。绍兴二十五年，太上皇帝御制赞七十五首。而有司但具唐爵，故宸翰所标，皆用开元国邑，其失于考据如此。今当请而正之可也。绍兴末，胡马饮江，既而自毙，诏加封马当、采石、金山三水府。太常寺按籍，系四字王，当加至六字。及降告命至其处，庙令以旧告来，则已八字矣。逐郡为缴回新命，而别易二美名以宠之。礼寺之失职类此。方完颜亮据淮上，予从枢密行府于建康，尝致祷大江；能令虜不得渡者，当奏册为帝。洎事定，朝廷许如约。朱丞相汉章曰：“四渎当一体，独帝江神，礼乎？”予曰：“惩劝之道，人神一也。彼洪河长淮，受国家祭祀血食，不为不久，当胡骑之来，如行枕席，唯大江滔滔天险，坐遏巨敌之冲，使其百万束手倒戈而退，此其灵德阴功，于河、淮何如？自五岳进册之后，今蒋庙、陈果仁祠亦称之，江神之帝，于是为不矣。”朱公终以为不可，亦仅改两字。吁，可惜哉！

【译文】唐代开元年间，封孔子为文宣王，颜子为兖公，闵子到子夏为侯，其他弟子们为伯。本朝大中祥符年间，进封公为国公，侯为郡公，伯为侯。绍

兴二十五年（1155年），太上皇帝亲自撰写七十五首“硃”，但有关官员只开列唐代所封的爵位，所以御笔所写的都用的是开元年间的封国封邑的称号，有关官员考据上的疏失就是这样，现在应当请求改正了。绍兴末年，金人兵临长江，后来自取灭亡，下诏加封马当、采石、金山三仙水神。太常寺查考档案，这三位水神原来的封号是四个字的王爵，加封就应当加到六个字。等到封王的命令到达那里，神庙的官员把以前的封王命令上报，已经是八个字的封号了。于是一郡一郡上缴新的命令，另外换了两个字的美名表示为宠荣耀。掌管礼仪的官署的失职就是这样。当金朝的完颜亮兵据淮河边，我随从枢密行府在建康，曾经向长江祷告，说如果能让金人不能渡江，就上奏册封江神为帝。等到事情平定，朝廷允许照过去约定办理。朱丞相汉章说：“长江、淮水、黄河、济水四条大河应当一体对待，独独封长江之神为帝，合于礼吗？”我说：“惩罚和鼓励的方法，人和神是同样的。那大河（黄河）长、淮，指受国家祭祀的猪羊牺牲，不算不长久了。然而当胡虏铁骑前来入侵，好像走在枕席上那样容易，唯有长江滔滔天险，正当强敌的要冲，使敌人的百万兵马束手无策而退去，这样暗中的保佑和功绩，比起大河、长、淮来怎么样。自从泰山等五岳进封以后，现在蒋庙陈果仁祠也和它们相当了。江神封为帝，这样说来是没有什么可惭愧的了。”朱公始终认为不行，也只改了两个字。唉，可惜啊！

徐凝诗

【原文】 徐凝以“瀑布界破青山”之句，东坡指为恶诗，故不为诗人所称说。予家有凝集，观其余篇，亦自有佳处。今漫纪数绝于此。《汉宫曲》云：“水色帘前流玉霜，赵家飞燕侍昭阳。掌中舞罢箫声绝，三十六宫秋夜长。”《忆扬州》云：“萧娘脸下难胜泪，桃叶眉头易得愁。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相思林》云：“远客远游新过岭，每逢芳树问芳名。长林遍是相思树，争遣愁人独自行。”《玩花》云：“一树梨花春向暮，雪枝残处怨风来。明朝渐觉无多去，看到黄昏不欲回。”《将归江外辞韩侍郎》云：“一生所遇唯元白，天下无人重布衣。欲别朱门泪先尽，白头游子白身归。”皆有情致，宜其见知于微之、乐天也。但俗子妄作乐天诗，缪为赏激，以起东坡之诮耳。

【译文】 徐凝因为有“瀑布界破青山”的诗句，被苏东坡指摘为恶诗，因此不被诗人们所称道。我家中有徐凝的诗集，看看他其它的诗篇，也自有佳妙的地方。现在随意记下几首绝句在此。《汉宫曲》写道：“水色帘前流玉霜，赵

家飞燕侍昭阳。掌中舞罢箫声绝，三十六宫秋夜长。”《忆扬州》写道：“萧娘脸
下难胜泪，桃叶眉头易得愁。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相思林》诗
写道：“远客远游新过岭，每逢芳树问芳名。长林遍是相思树，争遣愁人独自行。”
《玩花》诗写道：“一树梨花春向暮，雪枝残处怨风来。明朝渐觉无多去，看到
黄昏不欲回。”《将归江外辞韩侍郎》写道：“一生所遇唯元白，天下无人重布衣。
欲别朱门泪先尽，白头游子白身归。”这些诗都很有情趣雅致，可见徐凝受到元
稹（字微之）、白居易（字乐天）的知遇是有道理的。只是世间俗子妄自仿作白
居易的诗，不加辨别地加以激赏，因此遭到苏东坡的责备罢了。

梅花横参

【原文】 今梅花诗词多用“参横”字，盖出柳子厚《龙城录》所载赵师雄
事，然此实妄书，或以为刘无言所作也。其语云：“东方已白，月落参横。”且
以冬半视之，黄昏时参已见，至丁夜而西没矣，安得将旦而横乎？秦少游诗：
“月落参横画角哀，暗香消尽令人老。”承此误也。唯东坡云：“纷纷初疑月挂树，
耿耿独与参横昏。”乃为精当。老杜有“城拥朝来客，天横醉后参”之句，以全
篇考之，盖初秋所作也。

【译文】 现在吟咏梅花的诗词中，有很多人用“参横”二字，这可能是出
自柳宗元（字子厚）《龙城录》所记载的赵师雄的事中。然而这实际上是错误的
记载，又有人认为是刘无言所写的。其中的话是：“东方已白，月落参横。”现
在姑且根据冬天过半的时节来考察，此时，黄昏之际参星已经出现，到深夜四
更时就在西边落下了，怎么会天快亮时还横在天上呢？秦少游的诗句：“月落参
横画角哀，暗香消尽令人老。”则是继承了这种错误。只有苏东坡说：“纷纷初
疑月挂树，耿耿独与参横昏。”才是精确允当的。杜甫有“城拥朝来客，天横醉
后参”的诗句，根据整个诗篇来考察，大约是初秋所作的。

致仕之失

【原文】 大夫七十而致事，谓之得谢，美名也。汉韦贤、薛广德、疏广、
疏受，或县安车以示子孙，卖黄金以侈君赐，为荣多矣。至于龚胜、郑弘辈，亦
诏策褒表，郡县存问，合于三代敬老之义。本朝尤重之。大臣告老，必宠以东

宫师傅、侍从。耆艾若晁迥、孙奭、李柬之亦然。宣和以前，盖未有既死而方乞致仕者，南渡之后，故实散亡，于是朝奉、武翼郎以上，不以内外高卑，率为此举。其最甚而无理者，虽宰相辅臣，考终于位，其家发哀即服，降旨声钟给赙，既已阅日，方且为之告廷出命，纶书之中，不免有亲医药、介寿康之语。如秦太师、万俟卨、陈鲁公、沈必先、王时亨、郑仲益是已。其在外者，非易箦属纆，不复有请，间千百人中有一二焉，则知与不知，骇惜其死，子弟游宦远地，往往饮泣不宁，谒急奔命，故及无事日，不敢为之。绍兴二十九年，予为吏部郎，因轮对，奏言：“乞令吏部立法，自今日以往，当得致仕恩泽之人物故者，即以告所在州，州上省部，然后夷考其平生，非有赃私过恶于式有累者，辄官其后人。若真能陈义引年，或辞荣知止者，乞厚其节礼，以厉风俗，贤于率天下为伪也。”太上览奏，欣纳曰：“朕记得此事之废，方四十年，当如卿语。”既下三省，诸公多以为是，而首相汤岐公独难之，其议遂寝，今不复可正云。

【译文】 大夫七十岁而辞官退休，称之为“得谢”，这是好的名称。汉朝的韦贤、薛广德、疏广、疏受，有的挂起坐车以向子孙表示心志，卖掉黄金以夸耀君王的恩赐，带来的光荣确实不少。至于龚胜、郑弘这些人，也是朝廷下诏表扬、郡县地方官去慰问，合于夏、高、周三代敬老的礼仪。本朝尤其重视，大臣告老辞官，必定加上东宫师傅、侍从这些头衔以表示恩宠。对很老的老人像晁迥、孙奭、李柬之也是这样。宣和年间以前，本来没有已经死了才乞求辞官的，南渡以后，过去的典章旧事都散失了，于是朝奉、武翼郎以上，不管内外高低，都是这么做的。其中最过分而最没有道理的，即使是宰相大臣，在位寿终正寝，他的家里发丧穿孝服，皇帝降旨允许撞钟给予丧葬财物，已经过了些日子，方才为死者在朝中公告发布命令，圣旨之中，不免还有“亲自关心医疗药物”、“祝健康长奉”的话。像秦太师（秦桧）、万俟卨（万俟卨）、陈鲁公（陈康伯）、沈必先、王时亨、郑仲益就是。其中在外地做官的，不到病重将要咽气，不再有所请求。间或千万人中间有一两个人这样做，那么不论知道这个人还是不知道这个人的，惊骇痛惜他的死去，子弟在远地方做官的，往往哭泣不安，谒告请假昼夜奔丧。所以在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是不敢那么做的。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我任吏部郎的时候，由于轮上奏对，就上奏，请求命令吏部立法：“从现在开始往后，应当得到退休恩泽的人物死后，就把死讯告诉所在的州，州上报到尚书省和部里，然后查考他的生平，如果并无受贿贪赃过失罪恶涉及到损害形象的，就封他的后人为官。如果真能深明大义告老辞官，或是辞谢荣光而甘于知足的，请求丰厚地送给他四时节礼，以鼓励好的风俗，这比起带领天下人去作假要贤明多了。”太上皇帝看了奏章高兴地接受，说：“朕

记得这件事情被废弃，不过四十年，应当照你所说的办。”转到尚书等三省以后，省内诸公大多表示同意，但首相汤岐公独独认为难办，这一建议就没被采纳，现在已经不能再拨正了。

南班宗室

【原文】 南班宗室，自来只以本官奉朝请。自隆兴以后，始带宫观使及提举。今嗣濮王、永阳、恩平、安定王以下皆然，非制也。

【译文】 南班的皇族宗室，从来只是在本身的官阶加上“奉朝请”的称号。自从宋隆兴年间（1163—1165年）以来，才开始加上宫观使和提举的头衔。现在的嗣濮王、永阳王、恩平王、安定王以下都是这样，这不符合制度。

省郎称谓

【原文】 除省郎者，初降旨挥，但云：“除某部郎官”。盖以知州资历者，当为郎中，不及者为员外郎。及吏部拟告身细衔，则始直书之。其兼权者，初云：“权某部郎官”，洎入衔及文书，皆曰“权员外郎”，已是他部郎中，则曰“权郎中”。至绍兴末，冯方以馆职摄吏部，欲为异，则系衔曰：“兼权尚书吏部郎官”。予尝叩其说，冯曰：“所被省札只言‘权郎官’，故不敢耳。”予曰：“省札中岂有‘尚书’二字乎？”冯无以对，然讫不肯改。自后相承效之，至今告命及符牒所书，亦云“权郎官”，固已甚野，至于尚左、侍右之名，遂入除目，皆小吏不谙熟故事，驯以致然，书之记注，为不美耳。

【译文】 任命省部郎官的人，原来皇上降下的任命诏书只写道：“任命为某部郎官”。一般有知州资历的人，可以做郎中，不到这个资历的人，则做员外郎。等到吏部拟定详细官衔的任职文书时，才直接写上。那些兼职和暂任的，原来写道：“权某部郎官”，等到授予具体官衔和文书时，都写道：“权员外郎”。如果已经是其他部的郎中，就写道：“权郎中。”到宋绍兴末年，冯方以馆阁职位掌握吏部，想要做得不同，就在原职称号外加上“兼权尚书吏部郎官”。我曾经询问其中的理由，冯方说：“我所接到的省中文书只说‘权郎官’，所以不敢写别的。”我说：“省中的文书难道有‘尚书’两个字吗？”冯方没有话来回答，但是终究不肯改。自此以后就继承仿效它，到现在皇上的诏令和符牒上写的，也

写成“权郎官”，当然已经很不雅了，至于“尚左”、“侍右”的名号，也就写进了任免名单中，这都是小吏不熟悉原来的事例，顺从现在习惯而造成的。把这些写进记注里，是不完美的。

水衡都尉二事

【原文】 龚遂为渤海太守，宣帝召之，议曹王生愿从，遂不忍逆。及引入宫，王生随后呼曰：“天子即问君何以治渤海，宜曰：‘皆圣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上果问以治状，遂对如王生言。天子悦其有让，笑曰：“君安得长者之言而称之？”遂曰：“乃臣议曹教戒臣也。”上拜遂水衡都尉，以王生为丞。予谓遂之治郡，攻效著明，宣帝不以为赏，而顾悦其佞词乎！宜其起王成、胶东之伪也。褚先生于《史记》中又载武帝时，召北海太守，有文学卒史王先生自请与太守俱。太守入宫，王先生曰：“天子即问君何以治北海令无盗贼，君对曰何哉？”守曰：“选择贤材，各任之以其能，赏异等，罚不肖。”王先生曰：“是自誉自伐功，不可也。愿君对言：‘非臣之力，尽陛下神灵威武所变化也。’”太守如其言。武帝大笑曰：“安得长者之言而称之，安所受之？”对曰：“受之文学卒史。”于是以太守为水衡都尉，王先生为丞。二事不应相类如此，疑即龚遂，而褚误书也。

【译文】 龚遂做渤海太守，汉宣帝召见他。议曹王生愿意跟从，龚遂不忍心违背他的心愿。等到引导进宫的时候，王生跟在他后面喊叫说：“天子问您用什么方法治理渤海郡，您应当说：‘都是圣明天子的德行，不是小臣的力量。’”龚遂接受了他的话。皇上果然问起治理的情况，龚遂就像王生所说的那样回答。天子为他能谦让感到高兴，笑着说：“您哪里学来这些长者的话而在朕面前称扬？”龚遂说：“这乃是臣的议曹告诫臣的。”皇上就委任龚遂为水衡都尉，任命王生为丞。我以为龚遂的治理渤海郡，效果显著，为什么汉宣帝不根据这点封赏，反而仅仅对他的恭维话表示高兴呢？

褚先生在《史记》中又记载汉武帝的时候，召见北海太守，有一个文学卒史王先生自己请求和太守一起上京。太守应召进宫，王先生说：“天子要是问您用什么方法治理北海郡使郡中没有盗贼，您用什么回答呢？”太守说：“选择贤能的人材，按他们的能力分别委任，奖赏成绩优异的，处罚没有才能的人。”王先生曰：“这里自己称赞自己夸耀功绩，不行的。希望您回答说：‘这不是臣的力量，都是陛下的神灵威武所影响的结果。’”太守按照他的话回答。汉武帝大

笑说：“哪里来这些长者的话而在朕面前称扬？从哪里学来的？”回答说：“从文学卒史那里学来的。”于是汉武帝任命太守为守衡都尉，任命王先生为丞。这两件事不应当相同到这样，怀疑就是龚遂而褚先生写错了。

程婴杵臼

【原文】 《春秋》于鲁成公八年书晋杀赵同、赵括，于十年书晋景公卒，相去二年。而《史记》乃有屠岸贾欲灭赵氏，程婴、公孙杵臼共匿赵孤，十五年景公复立赵武之说。以年世考之，则自同、括死后，景公又卒，厉公立八年而弑，悼公立又五年矣，其乖妄如是。婴、杵臼之事，乃战国侠士刺客所为，春秋时风俗无此也。元丰中，吴处厚以皇嗣未立，上书乞立二人庙，访求其墓，优加封爵。敕令河东路访寻遗迹，得其冢于绛州太平县。诏封婴为成信侯，杵臼为忠智侯，庙食于绛。后又以韩厥存赵，追封为公。三人皆以春秋祠于祚德庙。且自晋景公至元丰，千六百五十年矣，古先圣帝、明王之墓，尚不可考，区区二士，岂复有兆域所在乎？绛郡以朝命所访，姑指他丘垄为之词以塞责耳。此事之必然者也。处厚之书进御，即除将作丞，狃于出位陈言以得宠禄，遂有诟蔡新州十诗之事，所获几何，貽笑无极，哀哉！

【译文】 《春秋》在鲁成公八年（公元前583年）里记载了晋国杀赵同、赵括的事，在鲁成公十年（公元前581年）里记载晋景公死去。两件事相差两年。而《史记》却有屠岸贾想要灭掉赵氏，程婴、公孙杵臼合作藏匿了赵氏孤儿，过了十五年晋景公又立了赵武的说法。根据年代考察，那么，从赵同、赵括死后，景公又死了，厉公即位八年后被弑，悼公即位又五年了，这里面的错误竟如此厉害。程婴、公孙杵臼所做的事，是战国时侠士刺客的行为，春秋时尚没有这种风俗。元丰年间，吴处厚因为皇上后代尚未成人，上书请求建立程婴、杵臼二人的祠庙，寻访查找他们的墓地，加以优厚的封爵。皇上命令河东路查访寻找遗迹，在绛州太平县找到他们的坟墓。皇帝诏封程婴为成信侯，公孙杵臼为忠智侯，在绛州享受庙祭香火。后来又认为韩厥保护了赵氏，被封为公。这三个人都以春秋时人的身分在祚德庙立祠。再说从晋景公到元丰年间，有一千六百五十年了。古代祖先圣明帝王的陵墓，尚且不能够考查，普通的两个士人，哪里还有墓地存在呢？绛州因为是朝廷命令查访的地方，地方官就姑且指定别的坟墓编造托词搪塞职责罢了。这是事情的必然真象。吴处厚的奏书进奏给皇上，就被任命为将作丞，他后来越出本职陈述意见来贪图恩宠科禄，于是就有攻击

蔡确的十首诗的事，他获得的有多少？却留下无边的笑柄，可哀呀！

战国自取亡

【原文】 秦以关中之地，日夜东猎六国，百有余年，悉禽灭之。虽云得地利，善为兵，故百战百胜，以予考之，实六国自有以致之也。韩、燕弱小，置不足论。彼四国者，魏以惠王而衰，齐以闵王而衰，楚以怀王而衰，赵以孝成王而衰，皆本于好兵贪地之故。魏承文侯、武侯之后，表里山河，大于三晋，诸侯莫能与之争。而惠王数伐韩、赵，志吞邯郸，挫败于齐，军覆子死，卒之为秦所困，国日以蹙，失河西七百里，去安邑而都大梁，数世不振，讫于殒国。闵王承威、宣之后，山东之建国莫强焉。而狃于伐宋之利，南侵楚，西侵三晋，欲并二周为天子，遂为燕所屠。虽赖田单之力，得复亡城，子孙沮气，子子自保，终堕秦计，束手为虏。怀王贪商於六百里，受诈张仪，失其名都，丧其甲士，不能取偿，身遭囚辱以死。赵以上党之地，代韩受兵，利令智昏，轻用民死，同日坑于长平者过四十万，几于社稷为墟，幸不即亡，终以不免。此四国之君，苟为保境睦邻，畏天自守，秦虽强大，岂能加我哉！

【译文】 秦国据有关东的地方，日夜往东攻打六国，一百多年，全部灭亡了它们。虽然历来说秦国得到地利的优势，善于作战，所以百战百胜，但根据我的考查，实在是六国自己的原因导致到这一结果的。韩国、燕国弱小，可以放下不值得议论。那另外四国，魏国由于惠王而衰落，齐国由于闵王而衰落，楚国由于怀王而衰落，赵国由于孝成王而衰落，都是喜好武力贪得土地的缘故。魏国继承魏文侯、魏武侯以后，国家有山河要塞，在晋国三分以后最为强大，诸侯国没有能和他争夺的。但魏惠王几次攻打韩国赵国，志在吞灭赵国攻下国都邯郸，又在齐国遭受挫折失败，全军覆没，儿子战死，终于为秦国所盒逼迫，国土一天天狭小，失去了黄河以西七百里土地，离开安邑而迁都大梁，几代不能振作，直到亡国。齐闵王继承齐威王、齐宣王之后，太行山以东的国家没有比它强大的。但他为攻打宋国取得的利益所蒙蔽，又南边侵略楚国，西边侵略三晋，还想吞并东、西周成为天子，于是就被燕国所攻破。虽然靠着田单的力量，得以收复丧失的城地，但是子孙的志气已经沮丧，只能孤孤单单地自己保全自己，终于掉进秦国的奸计里，束手就擒成了俘虏。楚怀王贪图商於之地六百里，受到张仪的欺骗，丢掉自己的大城，丧失自己的带甲武士，不能取得报，自身遭到囚禁，受辱而死。赵国由于上党这地方，代替韩国受到秦国的攻击，利

益使头脑发昏，随随便便地让百姓牺牲，一天之内被活埋在长平的超过四十万人，社稷几乎变成废墟，幸而没有马上亡国，终于还是不免亡国之祸。这四个国家的国君，如果能保境睦邻，敬畏天道而自己固守，秦国虽然强大，岂能侵略它们呢？

临敌易将

【原文】 临敌易将，固兵家之所忌，然事当审其是非，当易而不易，亦非也。秦以白起易王翦而胜赵，以王翦易李信而灭楚，魏公子无忌易晋鄙而胜秦，将岂不可易乎！燕以骑劫易乐毅而败，赵以赵括易廉颇而败，以赵葱易李牧而灭，魏使人代信陵君将，亦灭，将岂可易乎？

【译文】 面对敌人而更换将领，当然是军事家所忌讳的。然而对事情应该审视它的利与弊，该更换的而不更换，这也不对。秦国用白起代替王翦战胜了赵国，用王翦替换李信而消灭了楚国，魏公子无忌取代晋鄙战胜了秦国，将领难道不能更换吗？燕国用骑劫代替乐毅而战败，赵国用赵括代替廉颇而战败，用赵葱代替李牧导致赵国灭亡，魏国派人代替信陵君为将，也遭到灭亡，将领难道可以更换吗？

司空表圣诗

【原文】 东坡称司空表圣诗文高雅，有承平之遗风，盖尝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恨当时不识其妙。又云：“表圣论其诗，以为得味外味，如‘绿树连村暗，黄花入麦稀’，此句最善。又‘棋声花院闭，幡影石坛高’，吾尝独入白鹤观，松阴满地，不见一人，惟闻棋声，然后知此句之工，但恨其寒俭有僧态。”予读表圣《一鸣集》，有《与李生论诗》一书，乃正坡公所言者，其余五言句云：“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时天”，“雨微吟足思，花落梦无砵”，“坡暖冬生笋，松凉夏健人”，“川明虹照雨，树密鸟冲人”，“夜短猿悲减，风和鹊喜灵”，“马色经寒惨，雕声带晚饥”，“客来当意惬，花发遇歌成。”七言句云：“孤屿池痕春涨满，小栏花韵午晴初”，“五更惆怅回孤枕，由自残灯照落花”，皆可称也。

【译文】 苏东坡称道司空表圣（司空图）的诗文高雅，曾经亲自列举他的

诗篇中有作为文字法则的二十四韵四十八句，自恨当时不了解它的妙处。又说：“表圣论他的诗，认为得到韵味之外的韵味，如‘绿树连村暗，黄花入麦稀（绿树连接着村庄一片幽暗，黄花飞进麦田纷纷散落）’，这两句最好。又‘棋声花院闭，幡影石坛高（棋子声音清脆，花院院门深闭，僧寺高高的石坛，铺着旗幡的阴影）’，我曾经独自到白鹤观里去，满地都是松树的阴影，不见一人，然后了解这诗句的精工，只不过恨它贫寒萧疏有和尚的味道。”我读司空表圣的《一鸣集》，有《与李生论诗》一封信，正是东坡所说的话。其他的五言诗说：“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时天（寒食节的人家月色，中午时候的花影）”，“雨微吟足思，花落梦元（春雨细微吟诗是以引起悲愁，春花落尽梦中也失去了依托）”，“坡暖冬生笋，松凉夏健人（山坡上暖和冬天生出竹笋，松阴凉快夏天使人身体康健）”，“川明虹照雨，树密鸟冲人（河水明亮彩虹映照着还没有完全停止的雨，树木浓密鸟儿飞去飞来有时撞在人身上）”，“夜短猿悲减，风和鹊喜灵（夜里的时间短了，猿猴的悲啼为之稍减，微风和畅，鹊鸟的预报显得灵验）”，“马色经寒惨，雕声带晚饥（马的颜色经过寒冷而凄惨，雕的鸣声带着晚来的饥饿之音）”，“客来当意惬，花发遇歌成（客人来到正碰上心情愉快，好花盛开又碰上新曲制成）”。七言诗说：“孤屿池痕春涨满，小栏花韵午晴初（池中孤岛春水上涨到最高线，花栏里的花朵格外美丽有致正当午间放晴之时）”，“五更惆怅回孤枕，由自残灯照落花（五更天惆怅地梦醒在孤枕上，依旧是残灯照着落花）”。这都是可以称道的。

汉丞相

【原文】 汉丞相或终于位，或免就国，或免为庶人，或致仕，或以罪死，其复召用者，但为光禄大夫或特进，优游散秩，未尝有除他官者也。御史大夫则间为九卿、将军。至东汉则大不然。始于光武时，王梁罢大司空而为中郎将，其后三公去位，辄复为大夫、列卿。如崔烈历司徒、太尉之后，乃为城门校尉，其体貌大臣之礼亦衰矣。

【译文】 汉代的丞相，有的去世于任职期间，有的免职回到封地，有的被免职成为平民，有的辞官退休，有的因犯罪而死，其中又有被召用的，只是作为光禄大夫或特进，都是待遇优厚而没有固定职守的官职，不曾授予其他职衔。而御史大夫则有的间或做了九卿、将军。到东汉就不大一样了。开始于汉光武帝时，王梁罢免大司空后做了中郎将，这以后太尉、司徒、司空（合称三公）离

位，则又去做大夫、列卿。例如崔烈历任司徒、太尉以后，就当上了城门校尉，那种优待大臣的礼节也衰微了。

册礼不讲

【原文】 唐封拜后妃王公及赠官，皆行册礼。文宗大和四年，以裴度守司徒平章重事，度上表辞册命，其言云：“臣此官已三度受册，有砣面目。”从之。然则唐世以为常仪，辞者盖鲜。唯国朝以此礼为重，自皇后、太子之外，虽王公之贵，率一章乞免即止，典礼益以不讲，良为可惜！

【译文】 唐代封拜后妃、王公以及追赠官职，都要行册封典礼。唐文宗太和四年，任命裴度署理司徒平章重事，裴度上表辞让册封的命令，说：“臣这个官位已经三次受到册封，不能再露面见人。”唐文宗同意了。然而唐代以册封为通常的礼仪，辞谢的人很少。唯独本朝把这项礼仪看得很重，除皇后、太子以外，虽然贵为王公，大致都是上一道奏章请求免于册封就停止了，典礼更加不讲求，实才可惜。

卷十一

将帅贪功

【原文】 以功名为心，贪军旅之寄，此自将帅习气，虽古来贤卿大夫，未有能知止自敛者也。廉颇既老，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以示可用，致困郭开之口，终不得召。汉武帝大击匈奴，李广数自请行，上以为老，不许。良久乃许之，卒有东道失军之罪。宣帝时，先零羌反，赵充国年七十余，上老之，使丙吉问谁可将，曰：“亡逾于老臣者矣。”即驰至金城，图上方略，虽全师制胜，而祸及其子伉。光武时，五溪蛮夷畔，马援请行，帝愍其老，未许。援自请曰：“臣尚能被甲上马。”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也！”遂用为将，果有壶头之厄。李靖为相，以足疾就第，会吐谷浑寇边，即往见房乔曰：“吾虽老，尚堪一行。”既平其国，而有高甑生诬罔之事，几于不免。太宗将伐辽，召入谓曰：“高丽未服，公亦有意乎？”对曰：“今疾虽衰，陛下诚不弃，病且瘳矣。”帝悯其老，不许。郭子仪年八十余，犹为关内副元帅、朔方河中节度，不求退身，竟为德宗册罢。此诸公皆人杰也，犹不免此，况其下者乎！

【译文】 把功名富贵作为愿望，贪图委以统帅的权力，这本来是将帅的习气，即使从古以来贤明的卿大夫，还没有能知足而自己收敛的人。廉颇已经年老，吃一斗米饭，十斤肉，身披盔甲上马，表示可以被任用，但遭到郭开的谗言，终于不能被召。汉武帝大举攻击匈奴，李广几次请求随同出征，武帝认为他老了，不允许，很久才允许了他，最后终于在东边道路上迷路误了限期而犯下罪过。汉宣帝时，先零羌造反，赵充国年已七十多岁，皇上认为他老了，让丙吉去问他谁可以当将领，他说：“没有超过老臣我的了。”就驰马到金城，呈上地图和破敌计划，虽然保全部队取得胜利，但祸害终于应在他儿子赵 身上。汉光武帝时候，五溪的夷弟反叛，马援请求出征，光武帝怜惜他年老，没有允许。马援自己请求说：“臣还能身披盔甲上马。”光武帝让他试一试，马援在马鞍上左顾右盼，表示可以被任用。光武帝笑着说：“这位老人真是精神健旺啊！”就任用他为将领，果然在壶头遇上疫气。李靖做宰相，因为脚痛回家休息，正

遇上吐谷浑侵扰边境，就去见房乔说：“我虽然年老，还能够走一趟。”把吐谷浑平定以后，就发生了高甑生诬陷这件事，差点儿不能免于祸难。唐太宗将要征伐辽国，召见李靖说：“高丽没有平服，您也有意思试一试吗？”李靖回答说：“现在虽然有病衰弱，如果陛下不嫌弃，臣的病就会痊愈了。”皇上同情他年老，没有允许。郭子仪到八十多岁，还担任关内副元帅、朔方和河中节度使，不求引退，竟然为唐德宗册令罢官。这几位都是杰出人物，还不能免于到这一地步，何况他们之下的人呢！

汉二帝治盗

【原文】 汉武帝末年，盗贼滋起，大群至数千人，小群以百数。上使使者衣绣衣，持节虎符，发兵以兴击，斩首大部或至万余级，于是作“沈命法”，曰：“群盗起不发觉，觉而弗捕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后小吏畏诛，虽有盗，弗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不言。故盗贼殫多，上下相为匿，以避文法焉。光武时，群盗处处并起。遣使者下郡国，听群盗自相纠，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吏虽逗留回避故纵者，皆勿问，听以禽讨为效。其牧守令长坐界内有盗贼而不收捕者，及以畏阹捐城委守者，皆不以为负，但取获贼多少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于是更相追捕，贼并解散。此二事均为治盗，而武帝之严，不若光武之宽，其效可睹也。

【译文】 汉武帝末年，盗贼滋生蔓延，大的盗匪群多达数千人，小的也有几百人。皇上派使者穿上绣衣，拿着符节印信，派军队进行攻击，把大部分盗贼都斩首了，有时斩首达一万多人。汉武帝于是建立“沈命法”，法律规定：“盗匪团伙出现没有发觉，发觉了而没有捕获到规定的标准的，二千石以下的官员及主管吏员都判死刑。”这以后下级官吏害怕被杀，即使有盗贼也不敢上报，唯恐不能捕获，违犯规定连累郡府，郡府也让他们不要上报。因此盗贼渐渐增多，上上下下却相互隐瞒，好躲避法令条文的制裁。汉光武帝时，盗贼团伙到处兴起。汉光武帝派遣使者下到各郡，听任盗贼们自己相互纠察揭发，五个人共同斩杀一人的，免除他们的罪行。官吏们即使停留拖延、回避不前、故意放纵盗贼的，也都不加追问，以擒讨盗贼的成效论处。那些郡守、县令犯了管辖区域内有盗贼而不收容捕捉的罪过的，以及因为害怕软弱丢弃城池和职守的人，都不看作过失，只根据捕获盗贼的多少来评定优劣，只有包庇隐藏的人才判罪。于是互相追捕，盗贼们都瓦解逃散。这两件事都是治理盗贼的，而汉武帝的严

厉不如汉光武帝的宽缓，它们的效果不同是显而易见的。

汉唐封禅

【原文】 汉光武建武三十年，车驾东巡，群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禅泰山。诏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吾谁欺？欺天乎！何事污七十二代之编录！若郡县远遣吏上寿，盛称虚美，必髡令屯田。”从此群臣不敢复言。后二年，上斋，夜读《河图会昌符》，曰“赤刘之九，会命岱宗。”感此文，乃诏梁松等按索《河》、《洛》讖文言九世封禅事者，遂奏三十六事。于是求武帝元封故事，以三月行封禅礼。

唐太宗贞观五年，群臣以四夷咸服，表请封禅，诏不许。六年，复请，上曰：“卿辈皆以封禅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安，家给人足，虽不封禅，庸何伤乎？昔秦始皇封禅，而汉文帝不封禅，后世岂以文帝之贤不及始皇邪？且事天，扫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颠，封数尺之土，然后可以展其诚敬乎？”已而欲从其请，魏郑公独以为不可，发六难以争之，至以谓崇虚名而受实害。会河南、北大水，遂寝。十年，复使房乔裁定其礼，将以十六年二月，有事于泰山，会星孛太微而罢。

予谓二帝皆不世出盛德之主，灼知封禅之非，形诸诏告，可谓著明。然不能几时，自为翻覆。光武惑于讖记，太宗好大喜名，以今观之，盖所以累善政耳。

【译文】 汉光武帝建武三十年（54年），光武帝东巡，群臣上奏说，陛下即位已经三十年，应当到泰山祭天地封禅。光武帝下诏说：“即位三十年，百姓满腹怨气。我欺骗谁，欺骗上天吗？为什么要玷污过去七十二代封禅的记录！如果郡县远道派遣官吏来祝寿，极力地宣扬和虚假地赞美功德，必定把他剃去头发让他去屯田劳作。”从此群臣不敢再说话。后两年，皇上斋戒，夜里读《河图会昌符》，书中说：“赤帝刘氏的第九代，应当在泰山祭祀封禅”。读了这段文字有所感动，就诏命梁松等人查考《河》《雒》讖纬文字中说到九世封禅事情的，梁松等上奏说有三十六处记载。于是光武帝寻求汉武帝元封年间的典章制度，在三月举行封禅大礼。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群臣因为四境蛮夷臣服，上表请求封禅。下诏不允许。贞观六年（632年），群臣再次请求。皇上说：“你们这些人都把封禅作为帝王的盛大事件，朕的意思不是这样。如果天下平安，家家富裕人人丰足，虽然不封禅，又有什么损害呢？过去秦始皇封禅，而汉文帝没

有封禅，后世难道认为汉文帝的贤明不及秦始皇吗？而且事奉上天扫除尘土而祭祀，何必要登泰山的顶峰，封几尺的土地，然后可以展布自己的诚心敬意呢？”后来又想同意群臣的请求，魏郑公（魏征）独独以为不可以，提出六条质问以争论可行与否，甚至说崇尚虚名而受实害，适逢黄河南北两岸发大水，就停止不再举行。贞观十年（635年），又让房乔裁酌决定封禅的典礼，将要在十六年（641年）二月，祭祀泰山，又适逢彗星入于太微星座而作罢。我认为汉光武、唐太宗两位皇帝都不是一代人里所能出现的盛德之君，清楚地知道封禅不必举行，写在诏书中，可以说是很明白了。然而没有多少时候，自己就反覆了。汉光武被图讖所迷惑，唐太宗爱好铺张喜欢声名，从今天来看，这就是对美好政事的损害吧。

汉封禅记

【原文】 应劭《汉官仪》载马第伯《封禅仪记》，正纪建武东封事，每称天子为国家，其叙山势峭膜、登陟劳困之状极工，予喜诵之。其略云：“是朝上山，骑行；往往道峻峭，下骑步牵马，乍步乍骑且相半。至中观，留马，仰望天关，如从谷底仰观抗峰。其为高也，如视浮云；其峻也，石壁砒砢，如无道径。遥望其人，端如行朽兀，或为白石，或雪。久之，白者移过树，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卧石上，亦赖赆酒脯，处处有泉水。复勉强相将行，到天关。自以已至也，问道中人，言尚十余里。其道旁山胁，仰视岸石松树，郁郁苍苍，若在云中。俯视溪谷，碌碌不可见丈尺。直上七里，赖其羊肠逶迤，名曰环道，往往有砦索，可得而登也。两从者扶挟，前人相牵，后人见前人履底，前人见后人顶，如画。初上此道，行十余步一休。稍疲，咽唇碣，五六步一休，牒牒据顿地，不避暗湿，前有燥地，目视而两脚不随。”又云：“封毕，诏百官以次下，国家随后。道迫小，步从匍匐邪上，起近炬火，止亦骆驿。步从触击大石，石声正聒，但聒石无相应和者。肠不能已，口不能默。明日，太医令问起居，国家云：‘昨上下山，欲行迫前人，欲休则后人所蹈，道峻危险，国家不劳。’”又云：“东山名曰日观，鸡一鸣时，见日欲出，长三丈所。秦观者望见长安，吴观者望见会稽，周观者望见齐。”凡记文之工悉如此，而未尝见称于昔贤；秦、吴、周三观，亦无曾用之者。今应劭书脱略，唯刘昭补注《东汉志》仅有之，亦非全篇也。

【译文】 应劭的《汉官仪》载录的马第伯《封禅仪记》，记录的正是建武

年间到东边祭祀上天的事，每提到皇帝时就称作国家，文章叙述山势峻峭险要、登攀劳累困难的情状非常精细，我喜欢诵读它。文章大致写道：“这天早上上山，骑马而行，常常因为道路险要陡峭，就下来牵马步行，一会儿走路、一会儿骑马，基本上各占一半。到了中观，留下马匹。抬头远望天关，好象从山谷底下仰看高峰一样。山的高耸，如同仰视飘浮的云彩；山的险峻，石壁深远，好似没有道路蹊径。远远地望见山上的人，很象腐朽的枯枝在行走，有的象是白色的石头，有的象是雪。长时间地看着他，白色的物体移动经过树木时，不知道是人。实在上不去时，就四散开来僵直地卧倒在山石的上面，也幸好带着酒和肉干可吃，到处都有泉水可喝。于是又努力地互相搀扶着行走，到达了天关。我们自认为已经到了，问路上的人，却说还有十多里。在那道路旁边，山的两侧，抬头看岩石上的松树，苍翠茂盛，犹如在浮云之中，低头看山谷中的溪流，石块累累，不能看清它们的尺寸。又直着向上七里路，走的是那弯曲漫长的羊肠小路，名称叫做环道，常常有绳索，可以用来攀登。两个随从的人在旁边扶着，前边的人拉着向上爬，后边的人可以看见前边的人鞋底，前边的人可以看见后边人的头顶，就象画中那样。刚走上这条路，走十多步歇一次，渐渐疲乏了，喉咙嘴唇干渴，于是五六步就歇一次。休息时跌跌绊绊地双手支撑坐倒在地上，也不管坐在阴潮的湿土上，前面有干燥的地方，眼睁睁地看着，两条腿却迈不动。”文章又写道：“祭完上天以后，皇上命令众官员按顺序下山，皇上跟在后面。道路拥挤窄小，随从爬着斜上山坡，站起来举近火把，停下来时也连接不断。随从敲击大石头，石头的声音真是响亮，但却没有谁敲石头跟他相应相和。饥肚鸣叫不止，嘴里也气喘。第二天，皇帝的医官询问皇上的身体状况，皇上说：“昨天上山下山，想走就迫近前面的人，想休息就会被后边的人踩上，道路险峻危险。但我不劳累。”文章还写道：“东面的山叫做日观，鸡一叫时，就看见太阳将要开始出来了，有三丈多长。从秦观那地方可以看到长安，从吴观那地方可以望见会稽，从周观那地方可以望见齐地。”这篇文章描述的细致，大致就是这样，却不见有先前的贤者称道它，秦、吴、周三观，也没有人曾经提到过。现在应劭的书有脱漏省略部分，只有刘昭所补注的《东汉志》里还有这篇文章，但也不是全篇了。

杨虞卿

【原文】 刘禹锡有《寄毗陵杨给事》诗云：“曾主鱼书轻刺史，今朝自请

左鱼来。青云直上无多地，却要斜飞取势回。”以其时考之，盖杨虞卿也。按唐文宗大和七年，以李德裕为相，与之论朋党事。时给事中杨虞卿、萧瑒、中书舍人张元夫依附权要，上干执政，下挠有司。上闻而恶之，于是出虞卿为常州刺史，瑒为郑州刺史，元夫为汝州刺史。皆李宗闵客也。他日，上复言及朋党，宗闵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辈，臣皆不与美官。”德裕曰：“给事中、中书舍人非美官而何？”宗闵失色。然则虞卿之刺毗陵，乃为朝廷所逐耳，禹锡犹以为自请，诗人之言，渠可信哉！

【译文】 刘禹锡有《寄毗陵杨给事》诗，诗中说：“曾主鱼书轻刺史，今朝自请左鱼来。青云直上无多地，却要斜飞取势回。”根据写诗的时间考证，杨给事可能是指杨虞卿。据考证，唐文宗在大和七年（833年），用李德裕当了宰相，跟他谈论朋党的事。当时给事中杨虞卿、萧瑒，以及中书舍人张元夫依附权贵大臣，向上干扰执政官员，向下阻挠主管官吏。皇上听说后，很厌恶他们，于是把杨虞卿贬出京城去做常州刺史，萧瑒做郑州刺史，张元夫做汝州刺史。这三个人都是李宗闵的门客。后来有一天，皇上又说到朋党，李宗闵说：“我向来很了解他们，因此象杨虞卿这些人，我都不给他们美官。”李德裕说：“给事中、中书舍人不是美官是什么？”李宗闵窘迫失色。这样的话，杨虞卿当毗陵刺史，应当是被朝廷放逐的，刘禹锡还说成是自己请求，诗人的话难道可以相信吗？

屯蒙二卦

【原文】 《屯》、《蒙》二卦，皆二阳而四阴。《屯》以六二乘初九之刚，《蒙》以六三乘九二之刚。而《屯》之爻曰：“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蒙》之爻曰：“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其正邪不同如此者。盖《屯》二居中得正，不为初刚所诱，而上从九五，所以为贞。《蒙》三不中不正，见九二之阳，悦而下从之，而舍上九之正应，所以勿用。士之守身居世，而择所从所处，尚监兹哉！

【译文】 《屯》卦、《蒙》卦两卦的卦象，都是两个阳爻四个阴爻。《屯》卦的六二爻位在初九之上，呈阴柔凌驾阳刚之象；《蒙》卦的六三在九二之上，也呈阴柔凌乘阳刚之象。但是《屯》卦的爻辞说：“女子贞洁，不生育，十年才生育”；《蒙》卦的爻辞却说：“不要娶女子，她见到有钱的男子，就会失身”；这两卦的正直和奸邪是这样的不同。《屯》卦的二爻在下卦位里处在中间，因而得到正气，不受初爻的阳刚诱惑，而且在上卦位里是九五，上下卦位阴阳都处在

中间，相互呼应，这就是贞洁的道理。《蒙》卦的三爻不在卦体的正中，见到九二的阳刚之象，就喜悦地向下跟随着它，而舍弃了与上九的正当呼应，这就是不要娶的道理。士人守身处世，选择跟随的对象、处世的方法，应当借鉴于这些道理呀！

汉诽谤法

【原文】 汉宣帝诏群臣议武帝庙乐，夏侯胜曰：“武帝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赤地数千里，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于是丞相、御史劾奏胜非议诏书，毁先帝，不道，遂下狱，系再更冬，会赦，乃得免。章帝时，孔僖、崔 游太学，相与论武帝始为天子，崇信圣道，及后恣己，忘其前善。为邻房生告其诽谤先帝，刺讥当世，下吏受讯。僖以书自讼，乃勿问。元帝时，贾捐之论珠崖事曰：“武帝籍兵厉马，攘服夷狄，天下断狱万数，寇贼并起，军旅数发，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障，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考三人所指武帝之失，捐之言最切，而三帝或罪或否，岂非夏侯非议诏书，僖、 诽谤，皆汉法所禁，如捐之直指其事，则在所不问乎？

【译文】 汉宣帝诏命群臣讨论汉武帝庙的祭祀音乐，夏侯胜说：“武帝竭尽百姓的财力，奢侈没有限制，天下消耗空虚，百姓流离失所，荒地几千里，没有恩德布及于百姓，不宜为他制作祭祀音乐。”于是丞相、御史参劾夏侯胜非议皇帝的诏书，毁谤先帝，大逆不道。就把他下狱，关了三个冬天，遇上大赦，才得以免罪。汉章帝的时候，孔僖、崔 在太学读书，互相议论武帝开始做天子的时候，崇尚信奉圣人之道，等到后来任意放纵，忘记了以前所做的好事。被隔壁屋子的太学生揭发检举他诽谤先帝讥刺当代，发交有关官吏受审讯。孔僖上书自己责备自己，就不再问罪。汉元帝的时候，贾捐之议论珠崖一役说：“武帝依仗武力，排斥征服夷狄，天下判案数以万计，盗贼并起，军队几次出动，父亲在前战死，儿子在后受伤，女儿戍守边境堡垒，孤儿在路上大声号哭，老母寡妇在巷子里吞声哭泣，这都是扩充土地太大，征伐没有停止的缘故。”查考这三个人所指责汉武帝的过失，贾捐之的话最为痛切，但三个皇帝或者下令治罪或者不治罪，难道不是夏侯胜非议皇帝的诏书，孔僖、崔 背后毁谤，都是为汉朝法令所禁止的，像贾捐之直接指斥事实，就在所不问吗？

谊向触讳

【原文】 贾谊上疏文帝曰：“生为明帝，没为明神。使顾成之庙，称为太宗，上配太祖，与汉亡极。虽有愚幼不肖之嗣，犹得蒙业而安；植遗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乱。”又云：“万年之后，传之老母弱子。”此既于生时谈死事，至云“传之老母”，则是言其当终于太后之前，又目其嗣为“愚幼不肖”，可谓指斥，而帝不以为过，谊不以为疑。

刘向上书成帝谏王氏事曰：“王氏与刘氏，且不并立，陛下为人子孙，守持宗庙，而令国祚移于外亲，降为皂隶，纵不为身，奈宗庙何？”又云：“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此乃于国存时说亡语，而帝不以为过，向不以为疑，至乞援近宗室，几于自售，亦不以为嫌也。

两人皆出于忠精至诚，故尽言触忌讳而不自觉。文帝以宽待下，圣德固尔；而成帝亦能容之，后世难及也。

【译文】 贾谊奏进疏文给汉文帝说：“活着做英明的皇帝，死了做圣明的神灵。要使顾成庙（汉文帝自立的宗庙）的庙号称为太宗，上跟太祖相配，下与汉朝的国运永远流传。即使有愚顽幼稚不成器的后代，仍然可以承蒙您留下的基业而平安。即使扶植的是遗腹的太子，那么通过朝拜您留下的衣服，天下也不会动乱。”又说：“您死了以后，或传位给老母亲或传位给弱小的太子。”这既是在帝王活着的时候谈他死后的事，甚至说到“传位给老母亲”，又是说皇帝会死在太后的前面，又把他的后代看成是“愚顽不成器”，可以说是指着责备了，可是汉文帝不认为是罪过，贾谊也不因此而疑虑。

刘向上书给汉成帝进谏王氏的事说：“王氏和刘氏，将不能并立，陛下作为汉室的子孙，守护维持宗庙，却让国家的权位转移到外姓亲戚手中，自己地位下降为奴仆，即使不为自己考虑，难道也不为宗庙考虑吗？”又说：“接受天命的人很多，不仅仅是一姓的人。”这是在国家还存在的时候说亡国的话，可是汉成帝不以此为罪过，刘向不因此而疑虑。说到请求帮助与自己相近的宗室，几乎是自我举荐，也不认为是涉嫌。

这两个人都是出于最高最纯的忠心和诚意，因此畅所欲言，触犯了忌讳也没有自我觉察。汉文帝以宽厚的态度对得下属，他圣明的德行固然如此；而汉成帝也能容忍触犯忌讳，这是后代难以企及的。

小贞大贞

【原文】 人君居尊位，倒持太阿，政令有所不行，德泽有所不下，身为寄坐，受人指麾，危亡之形，且立至矣。故《易》有“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之戒，谓当以渐而正之。说者多引鲁昭公、高贵乡公为比。予谓此自系一时国家之隆替，君身之祸福，盖有刚决而得志，隐忍而危亡者，不可一概而论也。汉宣帝之诛霍禹，和帝之诛窦宪，桓宗之诛梁冀，魏孝庄之诛尔朱荣，刚决而得志者也。鲁昭公之讨季氏，齐简公之谋田常，高贵乡公之讨司马昭，晋元帝之征王敦，唐文宗之谋宦者，潞王之徙石敬瑭，汉隐帝之杀郭威，刚决而失者也。若齐郁林王知鸾之异志，欲取之而不能；汉献帝知曹操之不臣，欲图之而不果；唐昭宗知朱温之必篡，欲杀之而不克，皆翻以及亡，虽欲小正之，岂可得也？

【译文】 君主处在高贵的位置上，把太阿宝剑倒着拿，政令有的不能推行，德泽有的不能流布，自身寄人篱下，受别人的指挥，危险亡国的形势，就立刻来到了。所以《周易·屯》卦有“储存脂膏，部分拨正，吉；全部拨正，凶”这样的告诫，认为应当逐渐使之走向正道。论说的人大多引用鲁昭公、高贵乡公来作比较。我认为这自然和一个时期国家的兴隆衰败、国君自身的祸福有关，但也有刚强果断而得志，克制忍耐而危险灭亡的，不能一概而论。汉宣帝的诛杀霍禹，汉和帝的诛杀窦宪，汉桓帝的诛杀梁冀，北魏孝庄帝的诛杀尔朱荣，这是刚强果断而得志的。鲁昭公的征讨季氏，齐简公的图谋田常，高贵乡公的征讨司马昭，晋元帝的征伐王敦，唐文宗的图谋宦官，潞王的迁徙石景瑭，后汉隐帝的谋杀郭威，这是刚强果断而失误的。如果南齐郁林王知道萧鸾怀有异心，想干掉他而不能够，汉献帝知道曹操有不臣之心，想图谋他而不成功，唐昭宗知道朱温的必然篡位，想杀掉他而做不到，都反而亡国，虽然想部分拨正，难道能办到吗？

唐诗戏语

【原文】 士人于棋酒间，好称引戏语，以助谭笑，大抵皆唐人诗，后生多不知所从出，漫识所记忆者于此。“公道世间惟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杜牧

《送隐者》诗也。“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李涉诗也。“只恐为僧僧不了，为僧得了尽输僧”，“啼得血流无歇处，不如缄口过残春”，杜荀鹤诗也。“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郑谷诗也。“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劝君不用分明语，语得分明出转难”，“自家飞絮犹无定，争解垂丝绊路人”，“明年更有新条在，挠乱春风卒未休”，“采得百花成蜜后，不知辛苦为谁甜”，罗隐诗也。高骈在西川，筑城御蛮，朝廷疑之，徙镇荆南，作《风筝》诗以见意曰：“昨夜箏声响碧空，宫商信任往来风。依稀似曲才堪听，又被吹将别调中。”今人亦好引此句也。

【译文】 士人们在下棋饮酒的时候，喜欢引用一些戏谑的话语，来帮助谈笑。所引的大多都是唐代人的诗句，年轻人多不知道这些诗句是从哪儿来的，我在这里随便记下我所记得的。“公道世间惟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这是杜牧《送隐者》诗中的。“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这是李涉的诗句。“只恐为僧僧不了，为僧得了尽输僧”，“啼得血流无歇处，不如缄口过残春”，这是杜荀鹤的诗句。“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这是郑谷的诗。“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劝君不用分明语，语得分明出转难”，“自家飞絮犹无定，争解垂丝绊路人”，“明年更有新条在，挠乱春风卒未休”，“采得百花成蜜后，不知辛苦为谁甜”，这些是罗隐的诗。高骈在西川时，筑城墙抵御蛮族，朝廷怀疑他，调他去镇守荆南，他作了《风筝》诗来表露自己的心思，诗歌写道：“昨夜箏声响碧空，宫商信任往来风。依稀似曲才堪听，又被吹将别调中。”现在人们也喜欢引用这首诗。

何进高碎

【原文】 东汉末，何进将诛宦官，白皇太后罢中常侍、小黄门，使还里舍。张让子妇，太后之妹也。让向子妇叩头曰：“老臣得罪，当与新妇俱归私门，唯受恩累世，今当远离宫殿，愿复一入直，得暂奉望太后颜色，死不恨矣。”子妇为言之，乃诏诸常侍皆复入直。不数日，进乃为让所杀，董卓随以兵至，让等虽死，汉室亦亡。

北齐和士开在武成帝世，奸蠹败国。及后主嗣立，宰相高睿与娄定远白胡太后，出土开为兖州刺史。后欲留士开过百日，睿守之以死，苦言之。士开载美女珠帘赂定远曰：“蒙王力，用为方伯，今当远出，愿得一辞觐二宫。”定远许之，士开由是得见太后及帝。进说曰：“臣出之后，必有大变，今已得入，复

何所虑！”于是出定远为青州而杀睿。后二年，士开虽死，齐室亦亡。

呜呼！奸佞之难去久矣！何进、高睿，不惜陨身破家，为汉、齐社稷计，而张让、士开以谈笑一言，变如反掌，忠良受祸，宗庙为墟。乃知背胁癰疽，决之不可不速；虎狼在阱，养之则自贻害。可不戒哉！

【译文】 东汉末年，何进将要诛杀宦官，奏请皇太后全部罢免中常侍、小黄门，让他们各回老家。中常侍张让的儿媳妇，是太后的妹妹。张让向儿媳妇叩头说：“老臣我有罪，应当和新妇你都回到自己家里去。不过几代人受到皇家的恩宠，现在要远离宫殿的时候，老臣我愿意再入宫值一次班，能够暂时望见太后的容颜，就是死也没有遗恨了。”儿媳妇为他向太后转述，太后就下诏让各个常侍都重新进宫值班。没有几天，何进就被张让所杀，董卓随着带兵来到长安，张让等虽然被杀，汉朝也就灭亡了。北齐的和士开在武成帝时期，奸邪虚伪，像蠹鱼一样败坏国家。等到后主继位，宰相高睿和娄定远上奏胡太后，让和士开出京去任兖州刺史。胡太后要留下和士开过一百天才让他走，高睿以死据理力争，苦苦陈述。和士开装上美女和珍珠簪子送给娄定远说：“承蒙王爷的大力，被任用为独当一面的大官，今天要远离京城，希望能辞别皇太后和皇上。”娄定远允许了他的请求，和士开因此而能见到太后和皇帝，劝说太后和皇帝，说：“臣出去以后，必定有大变化，现在已经进了宫，还有什么可顾虑的。”于是就把娄定远派遣出京为青州刺史而杀了高睿。后二年，和士开虽然死去，北齐皇室也灭亡了。啊！奸臣佞人的难于排除是由来已久了。何进、高睿，不惜身亡家破，为汉朝、齐朝的政权谋划，而张让、和士开只用在谈笑之间的一句话，使事情变化如同反掌，忠良受到祸难，宗庙变为废墟。这才知道背后胁下的毒疮，动刀子不能不快速。虎狼在陷阱之中，养着它就会给自己带来祸害。这难道能不引以为戒吗？

南乡掾史

【原文】 金石刻有《晋南乡太守司马整碑》，其阴刻掾史以下姓名，合三百五十一。议曹祭酒十一人，掾二十九人，诸曹掾、史、书佐、循行、干百三十一人，从掾位者九十六人，从史位者三十一人，部曲督将三十六人，其冗如此。以《晋史》考之，南乡本南阳西界，魏武平荆州，始分为郡。至晋泰始中，所管八县，才二万户耳，而掾史若是之多！掾史既然，吏士又可知矣。民力安得不困哉！整乃宗室安平王孚之孙也。

【译文】 金石碑刻中有一通《晋南乡太守司马整碑》，碑的背面刻有掾史以下的官吏姓名，共计三百五十一人。其中议曹祭酒十一人，廷掾二十九人，各曹的掾史、长史、书佐、循行、干僮一百三十一人，隶属掾位的九十六人，隶属史位的三十一人，军中督将三十六人，人员冗杂到这种地步。根据《晋史》来考察，南乡本是南阳西面的属界，魏武帝平定荆州时，才分出来为郡。到晋朝泰始年间，南乡郡所管八个县，才有二万户人家而已，可是掾史却有这么多！掾史既是这么多，吏员和士人就可想而知了。老百姓的力量哪能不乏困呢！司马整是皇族安平王司马孚的孙子。

汉景帝忍杀

【原文】 汉景帝恭俭爱民，上继文帝，故亦称为贤君。考其天资，则刻戾忍杀之人耳。自在东宫时，因博戏杀吴太子，以起老渎之怨。即位之后，不思罪己，一旦于三郡中而削其二，以速兵端。正信用晁错，付以国事，及爰盎之说行，但请斩错而已，帝令有司劾错以大逆，遂父母妻子同产皆弃市。七国之役，下诏以深入多杀为功，比三百石以上皆杀，无有所置，敢有议诏及不如诏者，皆要斩。周亚夫以功为丞相，坐争封匈奴降将事病免，心恶之，赐食不置箸，叱之使起，昧于敬礼大臣之义，卒以非罪置之死，悲哉！光武遣冯异征赤眉，敕之曰：“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诸将非不健斗，然好虏掠。卿本能御史士，念自修敕，无为郡县所苦。”光武此言，视景帝诏书，为不侔矣。

【译文】 汉景帝谦恭俭约、爱护百姓，上承汉文帝，因此也被称为贤明的君主。但考察他天性，却是个苛刻凶暴、残忍好杀的人。自从他在东宫当太子时，就因为赌博游戏而杀了吴国太子，因而引起吴王刘濞的怨恨。即位以后，不考虑责备自己，一天把三个郡国削减了两个，因而加速了战事争端。当时正相信任用晁错，把国家大事交付给他，但等到爰盎加害晁错的主张实施时，虽然只请求斩杀晁错一个人，汉景帝却命令官员们弹劾晁错有叛逆大罪，于是连他们父母、妻子、儿女、兄弟们都杀害了。在跟吴、楚等七国的战役中，下诏命令将士以深入七国多杀乱军为功劳，于是俸禄相当于三百石以上的官员都被杀死，没一个放过，如果敢有对命令存有疑议以及不按诏令行事的，都要腰斩。周亚夫因立功当了丞相，又因为给匈奴的降将争得封爵而犯罪，周亚夫由于生病幸免于难。汉景帝对他十分厌恶，常赐饮食却不给他安排碗筷，呵斥他让他

站起来，十分违背尊敬礼待大臣的道义，终于根据不正当的罪名把周亚夫置于死地，可悲呀！汉光武帝派遣冯异去征讨赤眉军，命令他说：“征战讨伐不一定非要掠夺土地屠杀人民，关键在于平定安抚百姓。将领们不是不勇健能战，但是太喜欢抢夺杀掠了。你本来善于控制官吏士人，希望你自我修整，不要做人民感到痛苦的事。”汉光武帝的这番话，比起汉景帝的诏令来，二者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了。

燕昭汉光武之明

【原文】 乐毅为燕破齐，或谗之昭王曰：“齐不下者两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欲久仗兵威以服齐人，南面而王耳。”昭王斩言者，遣使立毅为齐王。毅惶恐不受，以死自誓。

冯异定关中，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人有章言异威权至重，百姓归心，号为“咸阳王”，光武以章示异。异上书谢，诏报曰：“将军之于国家，恩犹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惧意？”及异破隗嚣，诸将欲分其功，玺书诘大司马以下，称异功若丘山。

今人咸知毅、异之为名将，然非二君之明，必困谗口矣。田单复齐国，信陵君败秦兵，陈汤诛郅支，卢植破黄巾，邓艾平蜀，王浚平吴，谢安却苻坚，慕容垂挫桓温，史万岁破突厥，李靖灭吐谷浑，郭子仪、李光弼中兴唐室，李晟复京师，皆有大功于社稷，率为谮人所劾，或至杀身。区区庸主不足责，唐太宗亦未能免。营营青蝇，亦可畏哉！

【译文】 乐毅为燕国攻破齐国，有人在燕昭王那里说他的坏话：“齐国还没有被攻下的不过两个城市，不是他的力量不能攻克，他是想长久地依仗武力的威势以慑服齐国人，面南而坐自己称王。”燕昭王杀死了说坏话的人，派使者立乐毅为齐王。乐毅惶恐不敢接受，用性命来发誓忠于昭王。冯异平定关中，自己因为长久在外，心里不踏实。别人有奏章说冯异威势权力都极重，百姓心悦诚服归附他，称他为“咸阳王”。光武帝把奏章寄给冯异，冯异上书谢罪，光武帝下诏回答说：“将军对于我来说，我们的恩情如同父子，有什么可猜疑的而产生了害怕？”等到冯异攻破隗嚣，各位将领想要分他的功劳，光武帝下诏书责问大司马以下的官员，称道冯异的功劳像山一样高。今天的人都知道乐毅、冯异是有名的将领，然而不是二位君主的贤明，也必然为说坏话的人所逼迫处于困境了。田单收复齐国，信陵君打败秦兵，陈汤诛杀郅支、卢植攻破黄巾，邓艾

平定蜀国，王浚平定吴国，谢安驱退苻坚，慕容垂挫折桓温，史万岁攻破突厥，李靖灭亡吐谷浑，郭子仪、李光弼中兴唐室，李晟收复京城，对国家都有大功，大多被造谣的坏人所诬陷，有的以至于丧生。那些平庸的君主不值得责备，连唐太宗也不免这样。《诗经》里说的像苍蝇一样的小人，也真是可怕啊！

周南召南

【原文】 《毛诗·序》曰：“《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据文义，“周公”、“召公”二“公”字，皆合为“南”字，则与上下文相应，盖简策误耳。“王者之风”，恐不当系之周公，而“先王之所以教”，又与“召公”自不相涉也。

【译文】 《毛诗·序》说：“《关雎》、《麟趾》的教化，有王者之风，因此它们跟周公有关系。南，指的是教化从北向南进行。《鹊巢》、《驺虞》的德行，则有诸侯之风，是先王的教化所导致的，因此它们跟召公有关系。《周南》、《召南》是整饬治理初始社会的正道。”根据上下文的意义，“周公”、“召公”两个“公”字，都应该是“南”字，那样就跟上下文相呼应了，这可能是古书上弄错了。“王者的风范”，恐怕不应该跟周公相联系，而“先王的教化所致”，又跟召公没有什么关系。

易中爻

【原文】 《易·系辞》云：“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中爻者，谓二三四及三四五也。如《坤》、《坎》为《师》，而六五之爻曰：“长子帅师”，以正应九二而言，盖指二至四为《震》也。《坤》、《艮》为《谦》，而初六之爻曰：“用涉大川”，盖自是而上，则六二、九三、六四为坎也。《归妹》之六五曰：“帝乙归妹”，以下配九二而言，盖指《震》也。而《泰》之六五亦曰：“帝乙归妹”，因亦下配九二，而九三、六四、六五，盖《震》体云。他皆类此。

【译文】 《易经·系辞》说：“杂聚事物，确定道德，辨别是非，那么离开了中爻就不完备。”所谓中爻，指的是二三四爻和三四五爻。如《坤》卦、《坎》卦合为《师》卦，《师》卦的六五爻爻辞说“长子帅师”，这是针对六五正

好呼应九二而说的，指的是二爻到四爻形成的经卦是《震》卦。《坤》卦和《艮》卦合为《谦》卦，《谦》卦的初六爻爻辞说：“用涉大川”，大概指的是从初六爻往上，就是六二、九三、六四，它们合为《坎》卦。《归妹》的六五爻爻辞说：“帝乙归妹”，是针对它下配九二爻而说的，大概指的是《震》卦。而《泰》卦的六爻爻辞也说：“帝乙归妹”，本来也是因为下配九二，而九三、六四、六五这三爻，合为《震》卦的卦体。其他都跟这些相似。

卷十二

利涉大川

【原文】 《易》卦辞称“利涉大川”者七，“不利涉”者一。爻辞称“利涉”者二，“用涉”者一，“不可涉”者一。《需》、《讼》、《未济》，指《坎》体而言。《益》、《中孚》，指《巽》体而言。《涣》指《坎》、《巽》而言。盖《坎》为水，有大川之象；而《巽》为木，木可为舟楫以济川。故《益》之彖曰：“木道乃行”，《中孚》之彖曰：“乘木舟虚”，《涣》之彖曰：“乘木有功”。又舟楫之利，实取诸《涣》，正合二体以取象也。《谦》、《蛊》则中爻有《坎》，《同人》、《大畜》则中爻有《巽》。《颐》之反，对《大过》，方有《巽》体，五去之远，所以言“不可涉”，上则变而之对卦，故“利涉”云。

【译文】 《周易》的卦辞中说到“利于渡过大河”的有七处，“不利于渡河”的有一处。爻辞中提到“利于渡河”的有二处，“用来渡河”的有一处，“不可以渡河”的有一处。《需》卦、《讼》卦、《未济》卦，指《坎》卦的本体而言。《益》卦、《中孚》卦，指《巽》卦的本体而言。《涣》卦指《坎》卦《巽》卦而言。这是因为《坎》卦是水，有大河的征象。而《巽》卦是木，木可以做船用来渡河。所以《益》卦的彖辞说“木的本性得到发挥”，《中孚》卦的彖辞说“乘坐中间虚空的船”，《涣》卦的彖辞说“乘坐木船有功效”。又说到舟船的利益，实在是取之于《涣》卦，正合于《坎》卦《巽》卦的本体取之以作为象征。《谦》卦、《蛊》卦的中间三爻有《坎》卦，《同人》卦、《大畜》卦中间三爻有《巽》卦。《颐》卦相对的是《大过》卦，《大过》卦刚有《巽》卦的本体，《颐》卦的倒数第五爻离开《巽》卦的本体已经远了，所以说“不可以渡河”，再往上一爻变化到对卦，所以说“利于渡河”。

光武弃冯衍

【原文】 汉室中兴，固皆光武之功，然更始既即天子位，光武受其爵秩，

北面为臣矣，及平王郎、定河北，诏令罢兵，辞不受召，于是始贰焉。更始方困于赤眉，而光武杀其将谢躬、苗曾，取洛阳、下河东，翻为腹心之疾。后世以成败论人，故不复议。予谓光武知更始不材，必败大业，逆取顺守，尚为有辞。彼鲍永、冯衍，始坚守并州，不肯降下，闻更始已亡，乃罢兵来归，曰：“诚惭以其众幸富贵。”其忠义之节，凛然可称。光武不能显而用之，闻其言而不悦。永后以他立功见用，而衍终身摈斥，群臣亦无为之言者，吁！可叹哉！

【译文】 汉朝中兴，固然都是汉光武的功劳，然而更始帝既已登上天子的大位，光武帝接受他的爵位俸禄，面向北方做臣子了。等到平定王郎，平定河北，更始帝下诏停止休战，光武帝推辞不受召，在这时才开始有了二心。更始帝正被赤眉所困逼，而光武帝杀了他的将领谢躬，苗曾，取洛阳，下河东，反而成了更始帝的心腹大患。后世以成败论英雄，所以不再议论这些事。我认为光武帝知道更始帝没有出息，必然要败坏大事，所以用不正当的手段取天下而以正当的名义治天下，还有话可说。而鲍永、冯衍，开始坚守并州，不肯归降，听到更始帝已死，这才停止作战前来归降，说：“带着部下侥幸取得富贵，确实感到惭愧。”他们忠义的节操，使人敬畏称道。光武帝不能使他们显贵而任用他们，听了他们的话反而不高兴。鲍永后来因为立下别的功劳而被任用，而冯衍终身被排斥，群臣中也没有为他说话的。啊！可叹啊！

恭显议萧望之

【原文】 弘恭、石显议置萧望之于牢狱，汉元帝知其不肯就吏，而讫可其奏。望之果自杀。帝召显等责问以议不详，皆免冠谢，乃已。王氏五侯奢僭，成帝内衔之，一旦赫怒，诏尚书奏诛薄昭故事，然特欲恐之，实无意诛也。窦宪恃宫掖声势，夺公主园，章帝切责，有孤雏腐鼠之比，然竟不绳其罪。三君之失政，前史固深讥之矣。司马公谓元帝始疑望之不肯就狱，恭、显以为必无忧，其欺既明，终不能治，可谓易期而难寤也。予谓师傅大臣进退罪否，人主当决之于心，何为谋及宦者？且望之先时已尝下廷尉矣，使其甘于再辱，忍耻对吏，将遂以恭、显之议为是耶！望之死与不死，不必论也。成帝委政外家，先汉颠覆；章帝仁柔无断，后汉遂衰，皆无足责。

【译文】 弘恭、石显商议把萧望之投置到牢狱之中，汉元帝明知道他不堪吏役的侮辱，却终于同意了弘恭他们的奏议。萧望之果然自杀了。汉元帝召见石显等人，责问他们审议不周到的罪过，石显等人都摘下官帽请罪，竟然完事

了。王氏的五个侯骄奢僭越，成帝心中怀恨，有一天赫然发怒，下令尚书奏议王氏诛杀薄昭的往事，然而这只不过是想让他们害怕，实际上并没有诛杀的意图。窦宪倚仗着皇宫内戚的声望权势，夺取了公主的园田，汉章帝激切地斥责，用了孤雏腐鼠来做比方，可是竟然没有治窦宪的罪。这三个君主的政治昏乱，以前的史官已经深刻地讥刺过了。司马光认为，汉元帝开始时就怀疑萧望之不肯接受囚禁，恭弘、石显却认为一定没有忧患，他们的欺罔既然已明了了，最终却不能够处治，可以说汉元帝是好欺骗却难使他醒悟啊！我认为，太师大臣的任免判罪与否，做君主的应该心中有所决断，怎么去跟宦官商量呢？况且萧望之开始时已经受过廷尉审讯了，让他甘心再受屈辱，忍着羞耻面对狱吏，这不是等于认为弘恭、石显的决议是对的吗！萧望之死或不死，就不必议论了。汉成帝把政事交给母舅家族，导致了西汉的颠覆；汉章帝仁慈优柔而不果断，导致了东汉的衰微，这都是无可责难的。

晁错张汤

【原文】 晁错为内史，言事辄听，幸倾九卿，及为御史大夫，权任出丞相右。张汤为御史，每朝奏事，国家用日旰，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决汤。萧望之为御史，意轻丞相，遇之无礼。三人者，贤否虽不同，然均为非谊，各以他事至死，抑有以致之邪！

【译文】 晁错作内史官时，无论什么建议皇上都听从，宠幸超过了九卿；等到做了御史大夫，权力比丞相还大。张汤做御史时，谈及国家政事，常常由早朝奏到天晚，丞相只处在虚位上，天下的事都由张汤决定。萧望之做御史，心中轻视丞相，遇到丞相十分无礼。这三个人，贤良与否虽然不同，但其行为都是不合适宜的。他们各自因为其他的事导致身死，或许有招致这种结局的因素吧！

逸诗书

【原文】 逸《书》、逸《诗》，虽篇名或存，既亡其辞，则其义不复可考。而孔安国注《尚书》，杜预注《左传》，必欲强为之说。《书》“汨作”注云“言其治民之功”，“咎单作《明居》”注云：“咎单，主土地之官。作《明居》，民

法”，《左传》“国子赋辔之柔矣”注云“义取宽政以安诸侯，若柔辔之御刚马”，如此之类。予顷教授福州日，林之奇少颖为《书》学谕，讲“帝厘下土”数语，曰：“知之为知之，《尧典》《舜典》之所以可言也；不知为不知，《九共》、《稿佚》略之可也。”其说最纯明可嘉，林君有《书解》行于世，而不载此语，故为表出之。

【译文】 已经亡佚的《尚书》、《诗经》，虽然篇名有的还存在，但辞句已经亡失，那么它们的内容就无可查考了。而孔安国注《尚书》，杜预注《左传》的时候，一定要勉强加以解释。《尚书》的“汨作”注释说，“说他治理百姓的功劳”，“咎单作《民居》”的注释说，“咎单，管理土地的官员。作《民居》，民法”。《左传》国子赋“辔之柔矣”的注释说，“赋‘辔之柔矣’的意思，在于使用宽大的政治以安定诸侯，如同柔软的马缰可以控制刚强的马”。就像这一类。我最近在福州做教授这一官职，林之奇少颖为《尚书》的学谕，讲到“帝厘下土”几句话，说：“知之为知之，《尧典》、《舜典》可以讲解就是；不知为不知，《九共》、《睪佚》，省略过去就可以了。”他的说法最明白单纯，值得称道。林君有《书解》一书在世上流传，但没有记载这几句话，所以特意提出来。

刑罚四卦

【原文】 《易》六十四卦，而以刑罚之事著于《大象》者凡四焉：《噬嗑》曰“先王以明罚敕法”，《丰》曰“君子以折狱致刑”，《贲》曰“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旅》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噬嗑》、《旅》上卦为《离》，《丰》、《贲》下卦为《离》，离，明也。圣人知刑狱为人司命，故设卦观象，必以文明为主，而后世付之文法俗吏，何邪？

【译文】 《易经》六十四卦，把刑罚法律的事写在《象传》的《大象》中的共有四卦：《噬嗑卦》说：“这是先王用来严明刑罚、颁布法律的。”《丰卦》说：“这是君子用来断狱判案实行刑罚的。”《贲卦》说：“这是君子用来处理庶政的，不轻易地判刑断狱。”《旅卦》说：“这是君子用来阐明谨慎用刑不滞留案件的。”《噬嗑卦》、《旅卦》的上位卦是《离卦》，《丰卦》、《贲卦》的下位卦是《离卦》。所谓“离”，就是“明”的意思。圣人知道刑罚牢狱关系到人的生命，因此安排卦辞、观察卦象，一定以文明为主，可是后代把刑罚牢狱的事交付给负责刑罚的庸俗官吏，这是为什么呢？

巽为鱼

【原文】 《易》卦所言鱼，皆指《巽》也。《睽卦》《巽》下《乾》上，故九二有鱼，九四无鱼。《井》内卦为《巽》，故二有射鲋之象。《中孚》外卦为《巽》，故曰“豚鱼吉”。《剥卦》五阴而一阳。方一阴自下生，变《乾》为《睽》，其下三爻，乃《巽》体也。二阴生而为《遁》，则六二、九三、九四乃《巽》体。三阴生而为《否》，则六三、九四、九五乃《巽》体。四阴生而为《观》，则上三爻乃《巽》体。至五阴为《剥》，则《巽》始亡。故六五之爻辞曰：“贯鱼”，盖指下四爻皆从《巽》来，如鱼骈头而贯也。或曰：“《说卦》不言‘《巽》为鱼’，今何以知之？”曰：“以类而知之，《说卦》所不该者多矣。如‘长子’、‘长女’、‘中女’、‘少女’见于《震》、《巽》、《离》、《兑》中，而《坎》、《艮》之下，不言‘为中男’、‘为少男’之类，他可推也。”

【译文】 《周易》卦中所说的鱼，都是指的《巽》卦。《映》卦的卦体是《巽》卦在下、《乾》卦在上，因此它的九二爻的爻辞中有鱼，九四爻爻辞中没有鱼。《井》卦的内卦是《巽》卦，所以倒数第二爻有射鲋鱼的征象。《中孚》卦的外卦是《巽》卦，所以说“豚鱼吉”。《剥》卦五个阴爻一个阳爻。当一个阴爻从底下产生，把《乾》卦变成《姤》卦，《姤》卦的下边三爻，乃是《巽》卦的本体。倒数第二个阴爻生成，把《乾》卦变成《睽》卦，那么倒数第二阴爻、倒数第三阳爻、倒数第四阳爻合成《巽》卦的本体。倒数第三个阴爻生成，就把《乾》卦变成《否》卦，那么倒数第三阴爻、倒数第四阳爻、倒数第五阳爻合成《巽》卦的本体。倒数第四阴爻生成而把《乾》卦变成《观》卦，那么上边三爻乃是《巽》卦的本体。到倒数第五阴爻是《剥》卦，《巽》卦才开始消失。所以《剥》卦倒数第五阴爻的爻辞说“贯鱼”，这是指下边四爻都从《巽》卦而来，像鱼的齐头并进而被一箭射中。有人说：《说卦》并没有说“《巽》卦是鱼”，现在是怎么知道的？回答是：从同类推想而知，的，《说卦》所不能包括的多了。例如“大儿子”、“大女儿”、“第二个女儿”、“小女儿”，见于《震》卦、《巽》卦、《离》卦、《兑》卦中间，而《坎》卦、《艮》卦之下，不说“是第二个儿子”、“是小儿子”之类，其他就可以推想而知了。

三省长官

【原文】 中书、尚书令在西汉时为少府官属，与太官、汤官、上林诸令品秩略等，侍中但为加官，在东汉亦属少府，而秩稍增。尚书令为千石，然铜印墨绶，虽居几要，而去公卿甚远，至或出为县令。魏、晋以来，浸以华重。唐初遂为三省长官，居真宰相之任，犹列三品，大历中乃升正二品。入国朝，其位益尊，叙班至在太师之上，然只以为亲王及使相兼官，无单拜者。见任宰相带侍中者才五人：范鲁公质、赵韩王普、丁晋公谓、冯魏公拯、韩魏王琦。尚书令又最贵，除宗王外，不以假人。赵韩王、韩魏王始赠真令，韩公官止司徒，及赠尚书令，乃诏自今更不加增，盖不欲三师之官赘其称也。政和初，蔡京改侍中、中书令为左辅、右弼，而不置尚书令，以为太宗皇帝曾任此官。殊不知乃唐之太宗为之，故郭子仪不敢拜，非本朝也。

【译文】 中书令、尚书令在西汉时是属于少府，跟太官令、汤官令、上林苑令等官的品级地位大致相等，侍中只是附加的官号，在东汉时也属于少府官，但品级稍微增高。尚书令的俸禄为千石，授予铜印墨绶，虽然身处机要部门，品级却比公卿差得很远，甚至有的出京到地方只做了县令小官。魏、晋以来，地位渐渐显赫重要。唐朝初年就成为三省的长官，担任真宰相的职位，但仍只是三品官。大历年间就升成正二品。到了宋朝，尚书令的地位更加尊贵，朝见排班甚至在太师之上，然而只作为亲王以及使相的兼官，没有单独授予的。现在任宰相而带侍中官号的人才有五人：鲁公范质、韩王赵普、晋公丁谓、魏公冯拯、魏王韩琦。尚书令又最显贵，除了宗姓王以外，不授予其他人。韩王赵普、魏王韩琦开始授予的是真尚书令，韩琦的官号只是司徒，等到赐予尚书令时，就下令从今往后不再增加官号，这是不想用三师（太师、太傅、太保）的官号赘加在它的称号上。宋政和初年，蔡京改为侍中、中书令改为左辅、右弼，而不设尚书令，认为太宗皇帝曾经任过这个官，却不知道这个太宗是唐朝的太宗，因此郭子仪后来不敢拜受尚书之职，事情不是出于本朝。

王瘡 李靖

【原文】 杜子美《送重表侄王评事》诗云：“我之曾老姑，尔之高祖母。尔

祖未显时，归为尚书妇。隋朝大业末，房杜俱交友。长者来在门，荒年自糊口。家贫无供给，客位但箕帚。俄顷羞颇珍，寂寥人散后。”云云。“上云天下乱，宜与英俊厚。向窃窥数公，经纶亦俱有。次问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风云合，龙虎一吟吼。愿展丈夫雄，得辞儿女丑。秦王时在坐，真气惊户牖。及乎贞观初，尚书践台斗。夫人常肩舆，上殿称万寿。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朽。”观此诗，疑指王 。相唐太宗，赠礼部尚书。然细考其事，大不与史合。蔡绦诗话引《唐书·列女传》云：“母卢氏，识房、杜必贵。”质之此诗，则 母乃杜氏也。《桐江诗话》云：“不特不姓卢，乃 之妻，非母也。”予按《唐列女传》元无此事， 传末只云：“始隐居时，与房玄龄、杜如晦善，二人过其家，母李窥之，知其必贵。”蔡说妄云有传，又误以李为卢，皆不足辨。但唐高祖在位日，太子建成与秦王不睦，以权相倾。 为太子中允，说建成曰：“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但以长年，位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今刘黑闥散亡之余，宜自击之，以取功名。”建成乃请行。其后杨文干之事起，高祖责以兄弟不睦，归罪 等而流之。太宗即位，乃召还任用。久之，宴近臣于丹霄殿，长孙无忌曰：“王 、魏征，昔为仇讎，不谓今日得同此宴。”上曰：“ 、征尽心所事，我故用之。”然则 与太宗非素交明矣。《唐书》载李氏事，亦采之小说，恐未必然，而杜公称其祖姑事，不应不实。且太宗时宰相，别无姓王者，真不可晓也。

又有杜光庭《虬须客传》（《虬须客传》当为《虬髯客传》之误）云，隋炀帝幸江都，命杨素留守西京，李靖以布衣往谒，窃其一妓，道遇异人，与俱至太原，因刘文静以见州将之子，言其真英主，倾家资与清，使助创业之举，即太宗也。按史载唐公击突厥，靖察有非常志，自囚上急变。后高祖定京师，将斩之而止，必无先识太宗之事。且炀帝在江都时，杨素死已十余年矣。此一传，大抵皆妄云。

【译文】 杜子美（杜甫）《送重表侄王评事》诗说：“我之曾老姑，尔之高祖母。尔祖未显时，归为尚书妇。隋朝大业末，房杜俱交友。长者来在门，荒年自睽口。家贫无供给，客位但箕帚。俄顷羞颇珍，寂寥人散后。”（我的曾祖姑，你的高祖母。你的高祖没有显达的时候，她嫁过去后来成为尚书的妻子。隋朝大业末年，和房玄龄、杜如晦都是至交朋友。长者光临，但适逢荒年只能睽口，家里贫穷不能待客，只有依靠妻子。顷刻之间佳肴纷呈，客人散尽家里依然那么孤寂。）又说：“上云天下乱，宜与英俊厚。向窃窥数公，经纶亦俱有。次问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风云合，龙虎一吟吼。愿展丈夫雄，得辞儿女丑。秦王时在座，真气惊户牖。及乎贞观初，尚出践台

斗。夫人常肩輿，上殿称万寿。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朽。”读这首诗，怀疑是指王瘡。王瘡辅助唐太宗，追封礼部尚书。然而仔细查考这件事，和历史大大地不能符合。蔡绦的《诗话》引《唐书·列女传》说：“王瘡的母亲卢氏，知道房玄龄、杜如晦必定显贵，而对照这首诗，王瘡的母亲却是杜氏。《桐江诗话》说：“这个妇女不但不姓卢，而是王瘡的妻子，不是母亲。”我查考《唐书·列女传》本来没有这件事，《王瘡传》最后只说：“开始隐居的时候，和房玄龄，杜如晦友好。这两个人前去他家里，他的母亲李氏偷看，知道房、杜必定显贵。”蔡绦错误地说《列女传》有王瘡母亲的传记，又错误地把李氏写成卢氏，都不值得一辩。但是唐高祖在位的日子，太子建成和秦王不和睦，以权势相倾轧。王瘡官居太子中允，劝说建成说：“秦王功劳盖过天下，里里外外都倾向于他。殿下仅仅由于年长，才得以立为东宫太子，并没有大功劳可以镇伏海内。理在刘黑闥的部下四散逃亡，殿下应当亲自攻打，以取得功劳和声名。”建成就请求出征。这以后杨文干的事件发生，唐高祖责备建成兄弟不和睦，把罪责归于王瘡等人而加以流放。唐太宗即位，就召回王瘡重新任用。很久以后，唐太宗在丹霄殿召集近臣赐宴，长孙无忌说：“王瘡、魏征，从前是仇人，没有想到今天能够一同参加这个宴会。”皇上说：“王瘡、魏征为主子尽心竭力，所以我任用他们。”这样说来，王瘡和唐太宗不是过去有交情，就很明白了。《唐书》记载他母亲李氏的事情，也是从小说中采录的，恐怕未必是这样，而杜公称颂他曾祖姑的事情，不应该不是事实。而且唐太宗时的宰相，没有别的姓王的，真是搞不清楚。还有杜光庭的《虬须客传》说，隋炀帝到江都去，命令杨素留守西京，李靖以平民的身份前去拜见杨素，并暗中带走了他一乐妓，路上还遇见了奇异的高人，跟他们一起到太原。又通过刘文静见州将的儿子，说他是真正的英明君主，于是异人把所有的家产资金给了李靖，让李靖帮助他创建国业的大事。州将的儿子就是唐太宗。据考证，历史记载唐公李渊攻打突厥时，李靖察觉他有不同平常的志向，自己拘禁了太宗皇上，发动紧急兵变。后来唐高祖平定京师，打算杀了李靖又没有杀。可见一定没有李靖事先就认识唐太宗的事。再说隋炀帝在江都的时候，杨素已经死了十多年了。这篇传奇，大概都是虚妄的。

虎夔藩

【原文】 黄鲁直《宿舒州太湖观音院》诗云：“汲烹寒泉窟，伐烛古松根。相戒莫浪出，月黑虎夔藩。”夔字甚新，其意盖言抵触之义，而莫究所出。惟杜

工部《课伐木》诗序云：“课隶人入谷斩阴木，晨征暮返，我有藩篱，是阙是补，旅次于小安。山有虎，知禁。若恃爪牙之利，必昏黑矜突。夔人屋壁，列树白桃，幔焉墙，实以竹，示式遏。为与虎近，混沦乎无良宾客。”其诗句有云：“藉汝跨小篱，乳兽待人肉。虎穴连里闾，久客惧所触。”乃知鲁直用此序中语。然杜公在夔府所作诗，所谓“夔人”者，述其土俗耳，本无抵触之义，鲁直盖误用之。

又《寺斋睡起》绝句云：“人言九事八为律，傥有江船吾欲东。”按《主父偃传》：“上书言九事，其八事为律令，一事谏伐匈奴”，谓八事为律令而言，则为字当作出声读，今鲁直似以为平声，恐亦误也。

【译文】 黄鲁直（黄庭坚）宿舒州太湖观音院》诗说：“汲烹寒泉窟，伐烛古松根。相戒莫浪出，月黑虎夔藩。”（在寒冷的泉水洞窟中汲水烹煮，伐取古松的树根以作照明。互相告诫不要随便出去，月黑之夜老虎冲触篱笆。”“夔”字很新，它的意思是说冲撞，而无从查考出处。只有杜工部（杜甫）《译伐木》诗的序言说：“督促仆人到山沟里去砍伐不见阳光的树木，早晨出发晚上回来。我家的篱笆，缺口靠它们修补，旅途中的住处稍稍得到安定。山上有老虎，还知道有所禁忌。如果倚仗爪牙的锋利，在黑夜必然横冲直撞。夔州人屋子的墙外，铺满了白桃，种满了竹子，表示阻拦。因为和老虎相近，混混然没有佳宾来到。”他的诗句中说：“藉汝跨小篇，乳兽待人肉。虎穴连里闾，久客惧所触。”（依靠着你们这些树木搭成小篱笆，因为母老虎在等着吃人肉。老虎的洞穴连接着村庄，在这里长久作客害怕被他冲撞接触。）这才知道鲁直用的是这篇诗序中的话。然而杜公在夔州所写的诗，所谓“夔人”，不过说的是当地风俗，本来没有冲撞的意思，鲁直错误地使用了这个字。又，《寺斋睡起绝句》说：“人言九事八为律，傥有江船吾欲东。”（人们说的九件事情有八件是法律条令，如果遇有江船我安往东而去。）查《汉书·主父偃传》：“上奏谈到九件事，其中八件事是为了法律条令，一件事是劝谏征讨匈奴。”说八件事是为了法律条令，那么“为”字应当作去声来读，现在鲁直似乎把它作为平声，这也是错误的。

曹操用人

【原文】 曹操为汉鬼蜮，君子所不道。然知人善任使，实后世之所难及。荀彧、荀攸、郭嘉，皆腹心谋臣，共济大事，无待赞说。其余智效一官，权分

一郡，无小无大，卓然皆称其职。恐关中诸将为害，则属司隶校尉钟繇以西事，而马腾、韩遂遣子入侍。当天下乱离，诸军乏食，则以枣祗、任峻建立屯田，而军国饶裕，遂芟群雄。欲复盐官之利，则使卫觊镇抚关中，而诸将服。河东未定，以杜畿为大守，而卫固、范先束手禽戮。并州初平，以梁习为刺史，而边境肃清。扬州陷于孙权，独有九江一郡，付之刘馥而恩化大行。冯翊困于砮盗，付之郑浑而民安寇灭。代郡三单于恃力骄恣，裴潜单车之郡，而单于砮服。方得汉中，命杜袭督留事，而百姓自乐，出徙于洛、邺者至八万口。方得马超之兵，闻当发徙，惊骇欲变，命赵俨为护军，而相率还降，致于东方者亦二万口。凡此十者，其为利岂不大哉！张辽走孙权于合肥，郭淮拒蜀军于阳平，徐晃却关羽于樊，皆以少制众，分方面忧。操无敌于建安之时，非幸也。

【译文】 曹操算是汉朝的阴险的叛逆，是君子所不愿谈及的。然而他了解并善于任用他人，实在是后代所难以赶得上的。荀彧、荀攸、郭嘉都是他的心腹谋士，共同成大事，不必称赞评说。至于其他的人，有智慧就授予一个官位的，有权变就让他分掌一个郡的，无论官职大小，都使他们卓然有成，十分称职。曹操担心关中的将领们祸害关中，就让司隶校尉钟繇去主管西边的事务，结果马腾、韩遂派遣儿子到宫中侍候。当时天下纷乱，军队缺乏粮食，就让枣祗、任峻屯田，结果军队、国家富饶丰裕，于是消灭了群雄。当想恢复盐务管理的利益时，就让卫觊镇守安抚关中，结果将领们都心服。河东没有平定，就派杜畿去当太守，使得卫固、范先束手被擒被杀。并州刚刚平定，就派梁习去当刺史，使得边境平静安泰。扬州被孙权攻陷，只剩有九江一个郡，曹操把权力交给刘馥，结果恩德教化广泛实行。冯翊被鞮州盗寇所困，曹操就交给郑浑去办理，结果百姓安定盗寇消灭。代郡有匈奴三单于军队，倚仗武力骄横恣肆，裴潜只乘一辆车进入代郡，使得单于心中折服。才得到汉中，就任命杜袭负责留守之事，结果百姓自得其乐，从洛阳、邺地迁来的人口达到八万。刚刚得到马超的军队时，马超军队听说将把他们发配他地，都惊恐想要兵变，曹操命令赵俨为护军，结果马超军都互相带领回来归降，送到东方的人口也有两万。以上十件事所产生的好处难道不大吗？张辽在合肥打跑孙权，郭淮在阳平抵御蜀国军队，徐晃在樊城打关羽，都是以少胜多，解除了一方面的忧患。曹操在建安时期天下无敌，不是侥幸的。

汉士择所从

【原文】 汉自中平黄巾之乱，天下震扰，士大夫莫不择所从，以为全身远害之计，然非豪杰不能也。荀彧少时，以颍川四战之地，劝父老亟避之，乡人多怀土不能去，或独率宗族往冀州，袁绍待以上宾之礼。彧度绍终不能定大业，去而从曹操。其乡人留者，多为贼所杀。袁绍遣使迎汝南士大夫，和洽独往荆州，刘表以上客待之。洽曰：“所以不从本初，避争地也。昏世之主，不可黷近，久而不去，谗慝将兴。”遂南之武陵，其留者多为表所害。曹操牧兖州，陈留太守张邈与之亲友。郡士高柔独以为邈必乘间为变，率乡人欲避之，众皆以曹、张相亲，不然其言。柔举家适河北，邈果叛操。郭嘉初见袁绍，谓其谋臣辛评等曰：“智者审于量主，袁公多端寡要，好谋无决，难与共济大难，吾将更举以求主，子盍去乎？”评等曰：“袁氏今最强，去将何之？”嘉不复言，遂去依曹操。操召见，与论天下事。出曰：“真吾主也。”杜袭、赵俨、繁钦避乱荆州，钦数见奇于表，袭曰：“所以俱来者，欲全身以待时耳。子若见能不已，非吾徒也。”及天子都许，俨曰：“曹镇东必能济华夏，吾知归矣。”遂诣操。河间邢劭在无终，闻操定冀州，谓田畴曰：“闻曹公法令严，民厌乱矣，乱极则平。请以身先。”遂装还乡里。畴曰：“劭，天民之先觉者也。”孙策定丹阳，吕范请暂领都督，策曰：“子衡已有大众，岂宜复屈小职！”范曰：“今舍本土而托将军者，欲济世务也。譬犹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败，此亦范计，非但将军也。”策从之。周瑜闻策声问，便推结分好，及策卒权立，瑜谓权可与共成大业，遂委心服事焉。诸葛亮在襄阳，刘表不能起；一见刘备，事之不疑。此诸人识见如是，安得困于乱世哉！

【译文】 汉朝自中平年间黄巾之乱，天下震动搔扰，士大夫没有不选择自己的去向，作保全自身远离祸害的打算，但如果不是豪杰之士是不能办到的。荀彧年轻时，由于颍川是容易四面受攻的平坦之地，就劝说老人们赶紧躲避，乡里人大多怀恋故土不能离开，荀彧独自率宗族前往冀州，袁绍用上等宾客的礼节来接待他。荀彧估计袁绍最终成不了大事，又离开冀州而去跟从曹操，他的乡里人留下的，大多为贼人所杀。袁绍派使者去迎接汝南的士大夫，唯独和洽前往荆州。刘表把他作为上等宾客来对待。和洽说：“我之所以不跟从袁绍，是避开争战之地。昏乱时世的主子，不能随便接近，时间久了不离开，挑拨离间的坏话就要起来了。”于是就往南去到武陵，和他同去留下的大多为刘表害死。

曹操但任睢州牧，陈留太守张邈和曹操亲密友好。郡中的士人高柔独独认为张邈必定乘机变乱，率领乡里人要躲开，大家都认为曹操、张邈互相亲密，不同意高柔的话。高柔带领全家去到河北，张邈果然背叛曹操。郭嘉开始见到袁绍，对他的谋士辛评等人说：“聪明的人审慎地衡量主子，袁公的头绪很多而要领很少，喜好计议而缺乏决断，难于和他共同渡过艰难困苦，我将要改变举动寻求明主，您何不也离开呢？”辛评等人说：“袁氏在当今力量最强，离开他还能去哪里？”郭嘉不再多说，就离开袁绍去依附曹操。曹操召见，和他议论天下大事。郭嘉出来以后说：“他真是我的主子。”杜袭、赵俨、繁钦在荆州躲避祸乱，繁钦屡次被刘表认为有奇特的才能，杜袭说：“我之所以和您一起前来，是想保全自身以等待时机而已。您如果卖弄才能没有个完，就不是我的同道了。”等到天子定都许昌，赵俨说：“曹镇东（曹操）必然能挽救中原大局，我知道向哪里去了。”就到了曹操那里。河间邢颍在无终，听说曹操平定冀州，对田畴说：“听说曹公法令严明，百姓厌恶混乱，混乱久了就会太平，我愿意自身首先行动。”于是就收拾行装回到家乡。田畴说：“邢颍，是百姓中间先知先觉的人。”孙策平定丹阳，吕范请求暂时兼职为都督，孙策说：“子衡（吕范）已经拥有众多人马，难道还应当屈居低下的职务！”吕范说：“现在离开本乡本土而追随委托于将军，就是要成就大事。譬如像同船过海，有一处不牢靠，就一起为它所败坏。这也是为了吕范我自己打算，不仅仅为将军您打算。”孙策听从了他的意见。周瑜听说孙策的名声，就主动和孙策结交友好，等到孙策死去孙权继位，周瑜认为可以和孙权一起成就大事，就全心全意事奉孙权。诸葛亮在襄阳，刘表不能请他出来，但一见到刘备，就由心事奉毫不迟疑。这些人的见识这样高明，哪里能在乱世中受到限制而窘困呢！

刘公荣

【原文】 王戎诣阮籍，时兖州刺史刘昶字公荣在坐。阮谓王曰：“偶有二斗美酒，当与君共饮。彼公荣者无预焉。”二人交觞酬酢，公荣遂不得一杯，而言语谈戏，三人无异。或有问之者，阮曰：“胜公荣者，不得不与饮酒；不如公荣者，不可不与饮酒；唯公荣可不与饮酒。”此事见戎传，而《世说》为详。又一事云，公荣与人饮酒，杂糅非类，人或讥之，答曰：“胜公荣者，不可不与饮；不如公荣者，亦不可不与饮；是公荣辈者，又不可不与饮，故终日共饮而醉。”二者稍不同。公荣待客如是，费酒多矣，顾不蒙一杯于人乎？东坡诗云：“未许

低头拜东野，徒言共饮胜公荣。”盖用前事也。

【译文】 王戎到阮籍那儿去，当时兖州刺史刘昶（字公荣）在坐。阮籍对王戎说：“偶然有两斗美酒，应当跟您一起痛饮。那个叫公荣的，没有他的事！”两个人就交杯劝饮，公荣始终也没有喝到一杯，却仍然谈笑嬉戏，三个人没有不正常的神色。有人问起这事，阮籍说：“胜过公荣的人，不能不跟他喝酒；不如公荣的人，可以不跟他喝酒；只有公荣，可以不跟他喝酒。”这件事见于《王戎传》，而《世说新语》里叙述地更详细。又有一件事，说的是公荣跟一个人喝酒，什么样混杂肮脏的对象都有，跟公荣不是一类人，有人就讥笑他。公荣回答说：“胜过我公荣的人，不能不跟他喝酒；不如我公荣的人，也不能不跟他喝酒；跟我公荣是一类人的人，还是不能不跟他喝酒，因此整天与人共饮而醉。”两件事略微有点不同。公荣这样对待客人，所费的酒可谓多了！怎么还不能从别人那里得到一杯来饮呢？所以苏东坡的诗中说：“未许低头拜东野，徒言共饮胜公荣”，大概就是用的上面所说的典故。

元丰官制

【原文】 元丰官制初成，欲以司马公为御史大夫，又将俟建储时，以公及吕申公为保傅。元璽初，起文潞公于既老，议处以侍中、中书令，为言者所攻，乃改平章军国重事。自后习以为制，不复除此等官，以谓前无故事，其实不然也。绍兴二十五年十月，中批右正言张扶除太常卿，执政言自来太常不置卿，遂改宗正；复言之，乃以为国子祭酒。近岁除莫济秘书监，济辞避累日，然后就职。已而李焘、陈瓘、郑丙皆为之，均曰：“职事官，何不可除之有？”

【译文】 元丰年间的官制刚刚制定完成，想要任命司马公（司马光）为御史大夫，又将要在立皇太子的时候，任命司马公和吕申公（吕公著）为太子太保和太子太傅。元璽初年，重新起用已经告老退休的文潞公（文彦博），准备让他担任侍中、中书令，为人们所攻击批评，就改任为平章军国重事。从此后习惯成为制度，不再授予这些官职，说是以前没有过的例子，其实不是这样。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十月，御批任命右正言张扶为太常卿，执政大臣说是从来太常不设置卿，就改为宗正；执政大臣又认为不合适，才任命为国子祭酒。近年来任命莫济为秘书监，莫济辞谢躲避了好些日子，然后就职。不久以后李焘、陈瓘、郑丙都做这个官，都说：“这是职事官，有什么不能任命的？”

耳余袁刘

【原文】 张耳、陈余少时为刎颈交，其后争权，相与致死地而不厌，盖势利之极，其究必然。韩馥举冀州以迎袁绍，而终以惧死。刘璋开门延刘备，坐失益州。翟让提兵授李密，而举族不免。尔朱兆以六镇之众付高欢，而卒毙于欢手。绍、密、欢忘其所自，不足深责。孰谓玄德之长者而忍为此邪！

【译文】 张耳和陈余年轻时是生死之交的朋友，后来为了争权夺利，相互不惜把对方致于死地。大凡权势利益到了极点，其结果一定会是这样的。韩馥把冀州让给袁绍，而最后却因忧惧而死。刘璋打开城门迎请刘备，却失去益州的地盘。翟让把军队交给李密，而整个家族不能免于被害。尔朱兆把六个镇的军队交付给高欢，而最后却死在高欢手下。袁绍、李密、高欢这些势利的人，忘了自己的地位是从哪儿来的，并不值得深切地指责。可谁想到象刘备这样的有德行的长者也忍心干这种事呢！

周汉存国

【原文】 周之初，诸侯千八百国，至王赧之亡，所存者才八国耳，七战国与卫也。然赵、韩、魏分晋而立，齐田氏代姜而兴，其有土各不及二百年，俱非旧邦。秦始皇乃吕氏子，楚幽王乃黄氏子，所谓嬴、之先，当不歆非类。然则惟燕，卫二姬姓存。而卫至胡亥世乃绝，若以为召公、康叔之德，则周公岂不及乎！

汉列侯八百余人，及光武而存者，平阳、建平、富平三侯耳。建平以先降梁王，永夺国。平阳为曹参之后，富平为张安世之后。参犹有创业之功，若安世则汤子也，史称其推贤扬善，固宜有后，然轻重其心，杀人亦多矣，独无余殃乎！汉侯之在王莽朝，皆不夺国，光武乃但许宗室复故，余皆除之，虽侯亦不绍封，不知曹、张两侯，何以能独全也？

【译文】 周朝初年，分封的诸侯国有一千八百个，到了周赧王亡国，所留下来的不过八国而已，就是战国七雄和卫国。然而赵、韩、魏三国分裂晋国而建立国家，齐国的田氏代替姜氏而兴起，他们拥有国土的日子都不到二百年，都不是原来的国家。秦始皇乃是吕氏的儿子，楚幽王乃是黄氏的儿子，所说的秦

国嬴氏、楚国牟氏的先人，应当不会享用不是他们后代的祭祀。然而唯有燕国、卫国两国姬氏还得以延续存在，而卫国到秦二世胡亥的时候才亡国，如果以为这是召公、康叔的德泽才能这样，那么周公难道比不上他们吗？汉朝列侯八百多人，等到汉光武时代还存在的，不过是平阳、建平、富平三个侯国而已。建平侯由于先降了梁王，永远削夺国土。平阳侯是曹参的后代，富平侯是张安世的后代。曹参还有创建国家的功劳，像张安世则是张汤的儿子，史书上称许张汤推举贤能表扬善士，固然应当有能显扬宗族的后代，然而他任凭心意的轻重，所杀的人也很多了，独独没有遗留的祸殃吗？汉朝的侯爵在王莽时代，都没有削夺国土，光武帝只允许宗室恢复原有侯爵，其余都删除了，即使侯那样也不继续加封，不知道曹、张两侯，为什么独独能保全呢？

曹操杀杨修

【原文】 曹操杀杨修之后，见其父彪，问曰：“公何瘦之甚？”对曰：“愧无日晷先见之明，犹怀老牛舐犊之爱。”操为之改容。《古文苑》载操与彪书，数修之罪，以为“恃豪父之势，每不与吾同怀，将延足下尊门大累”，便令刑之。且赠彪锦裘二领，八节角桃杖一枝，青牛二头，八百里骅骝马一匹，四望通砮七香车一，驱使二人。又遗其妻裘、靴，有心青衣二人，钱绢甚厚。卞夫人与袁夫人书云：“贤郎有盖世文才，阖门钦敬。明公性急，辄行军法。”以衣服、文绢、房子官锦、香车送之。彪及袁夫人皆答书引愆致谢。是时汉室将亡，政在曹氏，袁公四世宰相，为汉宗臣，固操之所忌，彪之不死其手，幸矣。呜呼，危哉！

【译文】 曹操杀了杨修以后，见到杨修的父亲杨彪，问他说：“您为什么瘦得这么厉害？”杨彪回答说：“我羞愧自己没有金日昕那样的先见之明，又仍然怀着老牛舐犊的爱心。”曹操为此变了脸色。《古文苑》记载了曹操写给杨彪的书信，数落杨修罪状，认为他“倚仗着父亲的势力，常常不跟我同心，这将会使您的家门遭受牵累”，于是就处死了杨修。曹操还赠给了杨彪锦绣的皮裘两件，八节角桃杖一支，青色的母牛两头，八百里骅骝骏马一匹，四望通砮七香车一辆，奴仆两人。另外又赠送给杨彪妻子皮裘、靴子，以及有能力的女仆两人，赠送的钱和绢帛都很厚重。卞夫人也给袁夫人写了信，信中说：“您的儿子有盖世的文才，我们家都很钦佩敬重他；曹操性子急躁，断然对他执行了军法。”并且送给袁夫人衣服、纹绢、房子，县产的官锦以及香车。杨彪和袁夫人都回

信承认罪过表示谢意。这时候汉朝将要灭亡，政权在曹氏手中，袁绍家四代当过宰相，是汉朝的宗臣，因而为曹操所忌恨；杨彪没有死在曹操手中，已经是幸运了，可也非常危险哪！

古人重国体

【原文】 古人为邦，以国体为急，初无小大强弱之异也。其所以自待，及以之待人，亦莫不然。故执言修辞，非贤大夫不能尽。楚申舟不假道于宋而聘齐，宋华元止之曰：“过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杀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杀之。及楚子围宋既急，犹曰：“城下之盟，有以国毙，不能从也。”郑三卿为盗所杀，余盗在宋，郑人纳赂以请之。师慧曰：“以千乘之相，易淫乐之簠，宋无人焉故也。”子罕闻之，固请而归其赂。晋韩宣子有环在郑商，谒诸郑伯，子产弗与，曰：“大国之求，无礼以斥之，何厌之有？吾且为鄙邑，则失位矣。若大国令而共无艺，郑鄙邑也，亦弗为也。”晋合诸侯于平丘，子产争贡赋之次，子大叔咎之。子产曰：“国不竞亦陵，何国之为！”郑驪偃娶于晋，偃卒，郑人舍其子而立其弟。晋人来问，子产对客曰：“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晋大夫而专制其位，是晋之县鄙也，何国之为！”楚囚郑印董父，献于秦，郑以货请之。子产曰：“不获。受楚之功而取货于郑，不可谓国，秦不其然。若曰郑国微君之惠，楚师其犹在敝邑之城下。”弗从，秦人不予。更币，从子产而后获之。读此数事，知春秋列国各数百年，其必有道矣。

【译文】 古人治理国家，把国家的体面看得很重，最初是没有大小强弱的差别的；他们怎么对待自己，就用这种态度去对待别人，没有哪国不是这样的。因此发表言论斟酌辞句，不是贤明的大夫就不能胜任。楚国的申舟不向宋国借路而派使者问候齐国，宋国的华元阻止了他，说：“经过我国而不向我国借路，这是鄙视我国。鄙视我国，我国就要亡了。杀了楚国的使者，他们必然要攻打我国。攻打我国，也只是灭亡。灭亡，是一样的。”就杀了申舟。等到楚王包围宋国国都形势已经非常紧急，华元还说：“兵临城下被迫订立盟约，宁可让国家灭亡，也是不能服从的。”郑国的三个卿被叛乱者所杀，余下的叛乱分子留在宋国，郑国人给宋国送去财物请求逮捕叛党。被作为财物之一，送到宋国的师慧说：“把拥有千乘战车的相国，交换一个演奏通俗音乐的盲人，这是宋国没有人的缘故。”宋国的大臣子罕听到了，坚决向宋公请求把财物退还给郑国。晋国的韩宣子有一个玉环在郑国商人手里，韩宣子为此谒见郑伯，子产不肯给，说：

“大国的要求，如果不按礼法加以驳斥，他们哪里会有什么满足？我们要是成为他们边境里的土地，那就失去国家的地位了。如果大国有命令而让我们供应没完没了，这是把郑国当成边境中的土地，我们也是不肯干的。”晋国在平丘会合诸侯，子产争论进贡物品的次序，子太叔责备他，子产说：“国家不和别国竞争也会遭到欺凌，还成个什么国家！”郑国的驷偃娶了晋国女子，驷偃死去，郑国人不立他的儿子而立了他的兄弟。晋国人来质问，子产回答客人说：“如果寡君的几个臣下，其中有去世的，晋国的大夫却要专断地干涉继承人，这是把我们当成边境内的县城，还成什么国家！”楚国囚禁郑国的印堇父，献给秦国，郑国奉上财物请求放他回来。子产说：“这是得不到的。接受了楚国的俘虏，而在郑国拿取财物，不能认为像个国家的样子。如果说郑国没有秦国君主的恩惠，楚军恐怕还在敝邑的城下。”使者不听从，秦国人不给。把财物改为一般礼品，按子产的话去说，然后得到了印堇父。读到这几件事，知道春秋列国各有几百年，是必然有它们存在的道理的。

卷十三

谏说之难

【原文】 韩非作《说难》，而死于说难，盖谏说之难，自古以然。至于知其所欲说，迎而拒之，然卒至于言听而计从者，又为难而可喜者也。秦穆公执晋侯，晋阴飴甥往会盟，其为晋游说无可疑者。秦伯曰：“晋国和乎？”对曰：“不和。小人曰必报仇，君子曰必报德。”秦伯曰：“国谓君何？”曰：“小人谓不免，君子以为必归；以德为怨，秦不其然。”秦遂归晋侯。秦伐赵，赵求救于齐，齐欲长安君为质。太后不肯，曰：“复言者，老妇必唾其面。”左师触龙愿见，后盛气而揖之入，知其必用此事来也。左师徐坐，问后体所苦，继乞以少子补黑衣之缺。后曰：“丈夫亦爱怜少子乎？”曰：“甚于妇人。”然后及其女燕后，乃极论赵王三世之子孙无功而为侯者，祸及其身。后既寤，则言：“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于是后曰：“恣君之所使。”长安君遂出质。范雎见疏于秦，蔡泽入秦，使人宣言感怒雎，曰：“燕客蔡泽，天下辨士也。彼一见秦王，必夺君位。”雎曰：“百家之说，吾既知之，众口之辩，吾皆摧之，是恶能夺我位乎？”使人召泽，谓之曰：“子宣言欲代我相，有之乎？”对曰：“然。”即引商君、吴起、大夫种之事。雎知泽欲困己以说，谬曰：“杀身成名，何为不可？”泽以身名俱全之说诱之，极之以閼夭、周公之忠圣。今秦王不倍功臣，不若秦孝公、楚越王，雎之功不若三子，劝其归相印以让贤。雎竦然失其宿怒，忘其故辩，敬受命，延入为上客。卒之代为秦相者泽也。秦始皇迁其母，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谏者杀之。”死者二十七人矣。茅焦请谏，王召镬将烹之。焦数以桀、纣狂悖之行，言未绝口，王母子如初。吕甥之言出于义，左师之计伸于爱，蔡泽之说激于理，若茅焦者真所谓硃虎牙者矣。范雎亲困穰侯而夺其位，何遽不如泽哉！彼此一时也。

【译文】 韩非写作《说难》，而就死在谏说的困难上。因为谏说的困难，自古以来就是这样。至于被谏说者知道谏说者想要谏说的，主动听取而加拒绝，最后到达言听计从的，这又是困难而可以欣喜的事。秦穆公抓住晋侯，晋国的阴飴甥前去会盟，这是为晋国去游说而无可怀疑的。秦穆公说：“晋国上下和睦吗？”

阴飴甥回答说：“不和睦。小人说必定要报仇，君子说必定要报德。”秦穆公说：“国内认为国君会怎么样。”阴飴甥说：“小人说他不会被赦免，君子认为他必定回国。把感激变成怨恨，秦国不会这样的。”秦国就放回了晋侯。秦国攻打赵国，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国要长安君作为人质。赵太后不肯，说：“再说这件事的，我老太婆必定要向他脸上吐唾沫。”左师触龙愿意进见，太后气呼呼地作揖迎入，知道他必然是为这件事而来的。左师慢慢地坐下，问候太后身体如何，接着请求把小儿子补充宫中卫士的缺额。太后说：“大男人也喜欢小儿子吗？”左师说：“比女人还要喜欢。”然后说到太后的女儿燕国王后，于是就极力论说赵王三代的子孙没有功劳而封侯的，祸患及于自身。太后明白以后，左师就说“长安君凭什么功劳自己在赵国立脚安身。”于是太后说：“随您怎么使用他。”长安君就出国作为人质。范雎被秦王疏远，蔡泽去到秦国，让人散布言论激怒范雎，说：“燕国人蔡泽，是天下善于的辩说的人。他一见到秦王，必定夺取您的地位。”范雎说：“诸子百家的学说，我早已了解，众人的论辩，我都驳倒了他们，这个人哪里能夺取我的地位呢？”使人召见蔡泽，对他说：“您宣称要代我为相，有这件事吗？”蔡泽回答说：“是这样。”就引用商君、吴起、大夫种被杀的事情。范雎知道蔡泽想要用这种说法使自己陷于窘困，就假意说：“杀身成名，为什么不可以？”蔡泽就用身体和名声都能保全的说辞来引导范雎，最后说到闾天、周公的忠诚圣德。现在秦王不背弃功臣，不像秦孝公、楚王、越王，范雎的功劳不及那三个人，劝他奉还相印让给贤能。范雎惊恐不安失去了过去的怒气，忘掉了过去的辩才，尊敬地接受蔡泽的话，请他进府作为上宾。最终代替范雎作为秦国丞相的就是蔡泽。秦始皇迁走他的母亲，下命令说：“谁敢把太后的事情作为劝谏的就杀了他。”被杀死的已经有二十七个人了。茅焦请求入谏，秦王叫人抬来大锅将要煮了他。茅焦以桀、纣狂妄背理的行为责备他，话还没有说完，秦始皇感悟，恢复了母子关系同过去一样。阴飴甥的话出于大义，左师的计谋从感情延伸出来，蔡泽的话用道理来激励，像茅焦这样，真所谓是去磨平老虎牙齿了。范雎亲自使穰侯陷于困境而夺取了他的地位，为什么一下子就不如蔡泽呢？这就是此一时、彼一时。

韩馥 刘璋

【原文】 韩馥以冀州迎袁绍，其僚耿武、闵纯、李历、赵浮、程涣等谏止之，馥不听。绍既至，数人皆见杀。刘璋迎刘备，主簿黄权、王累，名将杨怀、

高沛止之，璋逐权，不纳其言，二将后为备所杀。王浚受石勒之诈，督护孙纬及将佐皆欲拒勒，浚怒欲斩之，果为勒所杀。武、纯、怀、沛诸人谓之忠于所事可矣，若云择君，则未也。呜呼！生于乱世，至死不变，可不谓贤矣乎？

【译文】 韩馥率领冀州军民迎请袁绍，他的所属耿武、闵纯、李历、赵浮、程涣等人劝他不要这样做，韩馥不听。袁绍来到以后，这几个人都被杀。刘璋迎请刘备，主簿王权、黄累、著名将领杨怀、高沛劝阻他不要这样做，刘璋赶走王权，不采纳他的话，两位将领后来被刘备所杀。王浚受到石勒的欺骗，督护孙纬和将士们都要拒绝石勒，王浚发怒要斩杀他们，后来果然被石勒所杀。耿武、闵纯、杨怀、高沛这些人，说他们忠于所事奉的主子是可以的，如果说选择君主，那就没有能做到。啊！生在乱世之中，到死也不改变，能不说是贤人吗？

萧房知人

【原文】 汉祖至南郑，韩信亡去，萧何自追之。上骂曰：“诸将亡者以十数，公无所追；追信，诈也。”何曰：“诸将易得，至如信，国士亡双，必欲争天下，非信无可与计事者。”乃拜信大将，遂成汉业。唐太宗为秦王时，府属多外迁，王患之。房乔曰：“去者虽多不足吝，杜如晦王佐才也，王必欲经营四方，舍如晦无共功者。”乃表留幕府，遂为名相。二人之去留，系兴替治乱如此，萧、房之知人，所以为莫及也。樊哙从高祖起丰、沛，劝霸上之还，解鸿门之厄，功亦不细矣，而韩信羞与为伍。唐俭赞太宗建大策，发薄津之谋，定突厥之计，非庸臣也，而李靖以为不足惜。盖以信、靖而视哙、俭，犹熊黑之与狸狌耳。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必待将如韩信，相如杜公，而后用之，不亦难乎！惟能置萧、房于帷幄中，拔茅汇进，则珠玉无胫而至矣。

【译文】 汉高祖刘邦行军到达南郑，韩信不告而别，萧何亲自去追赶他。高祖骂萧何道：“将领们逃跑了几十人，你都没有去追赶，说追赶韩信，是骗我的。”萧何说：“这些将领容易得到，至于韩信这样的人，则是天下无双的国士。您如果一定要争夺天下，除了他，再也没有一起计议大事的人了。”于是高祖封授韩信为大将，终于完成汉室大业。唐太宗李世民为秦王时，幕府属吏很多外调任职，秦王为此忧虑。房乔（名玄龄）说：“离去的人尽管不少，也不值得可惜，杜如晦是辅佐君王的干才，大王想要经营天下大业，舍弃如晦就没有能共事的人了。”于是，秦王上疏请将杜如晦留在幕府中，终于使他成为一代名相。

韩、杜二人的去留，与兴衰治乱竟然有这么密切的关系，而萧、房二人的善于发现人才，也是无人能比得上的。樊哙跟随高祖在丰、沛起兵，攻占咸阳后劝高祖还军霸上，鸿门宴上又替高祖解脱困厄，功劳也不算小了，可是韩信却耻于和樊哙交往。唐俭帮助高祖、太宗下决心灭隋建唐，在薄津揭发孤独怀恩发动叛乱的阴谋，帮太宗制定诱降突厥的办法，不能说是平庸之臣，可是李靖认为失去他并不值得惋惜。这大概是以韩信和李靖的眼光来看樊哙、唐俭，就好像拿熊黑比去狸猫而已。创建帝王之业，决不是依靠个别谋士的谋略，一定要等到有了韩信那样的大将，杜如晦那样的贤相，然后才加重用，岂不太难了吗？只要能把萧何、房玄龄一类人安排到帐下，选贤进能，那么，贤能大才就会不请自至了。

俞似诗

【原文】 英州之北三十里有金山寺，予尝至其处，见法堂后壁题两绝句。僧云：“广州铃辖俞似之妻赵夫人所书。”诗句洒落不凡，而字画径四寸，遒健类薛稷，极可喜。数年后又过之，僧空无人，壁亦隳圯，犹能追忆其语，为纪于此，其一云：“莫遣鹄鹰饱一呼，将军谁志灭匈奴？年来万事灰人意，只有看山眼不枯。”其二云：“传食胶胶扰扰间，林泉高步未容攀。兴来尚有平生履，管领东南到处山。”盖似所作也。

【译文】 英州城的北边三十里有一座金山寺，我曾经到过那里，看见佛堂后边的墙上题有两首绝句。和尚说：“这是广州铃辖俞似的妻子赵夫人所书写的。”诗句洒脱不凡，而字的直径有四寸左右，遒劲雄健近似于薛稷，极为可喜。几年之后又经过那里，和尚已经走空了，墙也倒塌了，但我还是能回忆起这两首诗，记载在这里。第一首说：“莫遣鹄鹰饱一呼，将军谁志灭匈奴？年来万事灰人意，只有看山眼不枯（不要派遣皮套袖上吃饱了的猎鹰去捕兔，将军们谁还想去剿灭匈奴？近年来万事使人心灰意懒，只有面对青山双眼不枯）。”第二首说：“传食胶胶扰扰间，林泉高步未容攀。兴来尚有平生履，管领东南到处山（在繁嚣不安之中受到供养，退居山林泉石之间的优闲不允许我追求。不过兴致上来的时候还能穿上平常登山的木屐，东南的山水到处如同我的领地受我管辖）。”这是俞似所写作的。

吴激小词

【原文】 先公在燕山，赴北人张总侍御家集。出侍儿佐酒，中有一人，意状摧抑可怜，叩其故，乃宣和殿小宫姬也。坐客翰林直学士吴激赋长短句纪之，闻者挥涕。其词曰：“南朝千古伤心地，还唱《后庭花》。旧时王、谢，堂前燕子，飞向谁家？恍然相遇，仙姿胜雪，宫髻堆鸦。江州司马，青衫湿泪，同是天涯。”激字彦高，米元章婿也。

【译文】 先父在燕山，到北国人张总侍御家赴宴。侍女出来劝酒，其中有一人，强抑悲伤的样子十分可怜。询问缘故，原来她是流落在外的宣和殿小宫女。坐中宾客翰林直学士吴激赋词一首记下这件事，听到的人无不挥泪。那首词道：“南朝千古伤心地，还唱《后庭花》。旧时王、谢，堂前燕子，飞向谁家？恍然相遇，仙姿胜雪，宫髻堆鸦。江州司马，青衫湿泪，同是天涯。”吴激，字彦高，是米芾（字元章）的女婿。

君子为国

【原文】 《传》曰：“不有君子，其能国乎？”古之为国，言辞抑扬，率以有人无人占轻重。晋以诈取士会于秦，绕朝曰：“子无谓秦无人，吾谋适不用也。”楚子反曰：“以区区之宋，犹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无乎？”宋受郑赂，郑师慧曰：“宋必无人。”鲁盟臧纥之罪，纥曰：“国有人焉。”贾谊论匈奴砮侮，曰：“倒悬如此，莫之能解，犹谓国有人乎？”后之人不能及此，然知敌之不可犯，犹曰彼有人焉，未可图也。一士重于九鼎，岂不信然？

【译文】 《左传》说：“不拥有君子，难道能治理好国家吗？”古人对治理国家进行褒扬或批评，都以国家有无君子作标准。晋国用诈谋从秦国争取到足智多谋的士会，临行时绕朝对他说：“您别说秦国没有人才，只是我的计谋正好不被使用罢了。”楚国的子反曾说：“凭着微不足道的宋国，尚且有不欺人的臣子，难道可以认为楚国就没有吗？”宋国多次接受郑国的贿赂，郑国的师慧说：“宋国必定没有贤才。”鲁国季武子采纳孟椒的意见把臧纥的罪行写入盟辞，臧纥听到了，说：“国内有人才啊！”贾谊在《治安策》中论及匈奴对汉的羞辱侵略时说：“本末颠倒到这地步而不能解救，难道能说国内有明智之人吗？”后人

对人才的重视达不到这一步，然而当知道敌对一方不可侵犯时，仍说对方有人才，不可谋取他们。一个贤士比政权还重要，难道不的确如此吗？

兑为羊

【原文】 《兑》为羊，《易》之称羊者凡三卦。《噬》之九四曰“牵羊悔亡”，《归妹》之上六曰“土砾羊，无血”，皆《兑》也。《大壮》内外卦为《震》与《乾》，而三爻皆称羊者，自《复》之一阳推而上之，至二为《临》，则《兑》体已见，故九三曰“羝羊触藩，羸其角”，言三阳为《泰》而消《兑》也。自是而阳上进，至于《乾》而后已。六五“丧羊于易”，谓九三、九四、六五为《兑》也，上六复“触藩不能退”，盖阳方《噬》决，岂容上《兑》俨然乎？九四中爻亦本《兑》，而云“不羸”者，赖《震》阳之壮耳。

【译文】 《兑》卦表示“羊”，《易经》中称为“羊”的共有三卦。《睽》卦的九四爻辞是“牵着羊没有后悔”，《归妹》卦的上六爻辞是“男人杀羊，没有血”，都是《兑》卦。《大壮》卦的内卦、外卦为“震”为“乾”，而三爻都称为“羊”，都是从《复》卦的一阳往上推，到二爻为《临》卦，那么《兑》卦就出现了，所以九三爻辞是“羝羊触篱笆，羸其角”，即是说三阳为《泰》卦而消《兑》卦。从这而阳上进，至于《乾》卦就算完了。六五爻辞是“丧羊于易”，即谓九三、九四、六五三爻组成《兑》卦，上六爻又是“触篱笆后不能后退”，因为阳爻正形成《睽》卦，难道还能包容上《兑》卦吗？九四中爻也来源于《兑》卦，反而说“没有卡在篱笆上”，都是依赖《震》卦的阳过分壮罢了。

晏子 扬雄

【原文】 齐庄公之难，晏子不死不亡，而曰：“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及崔杼、庆封盟国人曰：“所不与崔、庄者。”晏子叹曰：“婴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与，有如上帝！”晏子此意正与豫子所言众人遇我之义同，特不以身殉庄公耳。至于毅然据正以社稷为辞，非豫子可比也。扬雄仕汉，亲蹈王莽之变，退托其身于列大夫中，不与高位者同其死，抱道没齿，与晏子同科。世儒或以《剧秦美新》贬之；是不然，此雄不得已而作也。夫诵读新莽之德，止能美于暴秦，其深意固可知

矣。序所言配五帝冠三王，开辟以来未之闻，直以戏莽尔。使雄善为谀佞，撰符命，称功德，以邀爵位，当与国师公同列，岂固穷如是哉？

【译文】 齐庄公被崔杼逼死，晏子不为他而死也不逃亡，而说：“国君为国家而死别人就为他而死，为国家而逃亡别人就为他逃亡。如果为自己而死为自己而逃亡，不是他自己所宠爱的人，谁会去跟他死跟他逃亡？”等到崔杼、庆封和国内的人们结盟时说：“有不亲附崔氏、庄氏的——”晏子叹气说：“我晏婴如果不亲附忠君利国的人，有天帝为证！”晏子这意思正和豫让所说的：“以对一般人的态度对待我”相同，仅仅不以身去殉庄公而已。至于毅然地根据正道用国家作为理由，又不是豫让所能比得上的了。扬雄在汉朝做官，亲身经历王莽篡位的变乱，退而托身于大夫们的行列中，不和身居高位的人同样地去死，坚守正道以终其身，和晏子类似。世上的读书人有的用他写作的《剧秦美新》来贬责他，这不合实际情况，这篇文章是不得已而写作的。歌颂称述新朝王莽的功德，只能超过暴虐的秦朝，其深刻的含义本来就可以领会了。序言中所说王莽可以上配五帝超过三王，开天辟地以来没有听到过，简直是在取笑王莽而已。假如扬雄善于阿谀奉承，假造符命，称颂功德，以求取爵位，他就应当和国师刘歆排在一起，难道会甘于不得志像这个样子吗？

一以贯之

【原文】 “一以贯之”之语，圣贤心学也。夫子以告曾子、子贡，而学者犹以为不同。尹彦明曰：“子贡之于学，不及曾子也如此。孔子于曾子，不待其问而告之，曾子复深喻之曰‘唯’。至于子贡，则不足以知之矣，故先发‘多学而识之’之问，果不能知之以以为然也，又复疑其不然而请焉，方告之曰‘予一以贯之’。虽闻其言，犹不能如曾子之唯也。”范淳父亦曰：“先攻子贡之失，而后语以至要。”予窃以为二子皆孔门高第也，其闻言而唯，与夫闻而不复问，皆已默识于言意之表矣。世儒所以卑子贡者，为其先然“多学而识之”之旨也，是殆不然。方闻圣言如是，遽应曰“否”，非弟子所以敬师之道也，故对曰“然”，而即继以“非与”之问，岂为不能知乎？或者至以为孔子择而告参、赐，盖非余人所得闻，是又不然。颜氏之子，冉氏之孙，岂不足以语此乎？曾子于一“唯”之后，适门人有问，故发其“忠恕”之言。使子贡是时亦有从而问者，其必有以诏之矣。

【译文】 “我的学说贯穿着一个基本观念”。这番话，是圣贤治学的心得，

孔老夫子分别把它告诉曾子、子贡，可是学者们却以为其中有什么不同之处。尹彦明说：“子贡在学习上，在程度上赶不上曾子。孔子对曾子，不等他发问就告诉他‘贯穿一个基本观念’那番话，曾子再加深刻理解而说‘是的’。至于子贡，就不能直接听懂那意思了。所以孔子先提出‘多多地学习又能记得住’的问题，子贡果然不懂这问话的真义，再次怀疑恐怕不对而问孔子，孔子这才告诉他‘我有一个基本观念来贯穿它’。子贡听到这话，仍不能像曾子那样答‘是的’。”范淳父也说：“先指出子贡的失误，然后再告诉他问题的要害。”我个人认为曾子、子贡都是孔子门下的高足弟子，他们听到孔子的话答“是的”也好，或者听到后再提出疑问也好，其实都已把孔子所说的话的含义默记于心了。社会上的儒生们贬低子贡的原因，在于他先赞同了“多多学习又能记得住”这句话，这看法是不对的。一听到圣人的话这样讲，就回答说“不对”，并非弟子用来敬重师长的作法，所以先回答说“是的”，然后紧接着用“不是这样吗”的方式提出疑问，这难道就是不能晓知道理的表现吗？有人甚至认为孔子有选择地告诉曾子、子贡，大概其他人不能听到，这看法又不对了。对于颜氏、冉氏的子孙颜渊、冉求，难道就不可以告诉他们这些话吗？曾子在答应了一声“是的”之后，刚巧有别的学生问他，所以发挥出“老师的学说只是忠恕两个字”的说法。假使子贡当时也有人紧接着问他，他也一定会有什么话告诉他们的。

裴潜 陆俟

【原文】 曹操以裴潜为代郡太守，服乌丸三单于之乱。后召潜还，美其治代之功，潜曰：“潜于百姓虽宽，于诸胡为峻。今继者必以潜为治过严，而事加宽惠；彼素骄恣，过宽必弛；既弛又将摄之以法，此怨叛所由生也。以势料之，代必复叛。”于是操深悔还潜之速。后数十日，单于反问果至。元魏以陆俟为怀荒镇将，高车诸莫弗讼俟严急无恩，复请前镇将郎孤。魏使孤代俟，俟既至，言曰：“不过期年，郎孤必败，高车必叛。”世祖切责之，明年，诸莫弗果杀孤而叛。帝召俟问曰：“何以知其然？”俟曰：“高车不知上下之礼，故臣治之以法，使知分限，而诸莫弗讼臣无恩，称孤之美。孤获还镇，悦其称誉，专用宽恕待之，无礼之人，易生骄慢，孤必将复以法裁之，众心怨恚，必生祸乱矣！”帝然之。裴潜、陆俟，可谓知为治之道矣。郑子产戒子大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宽服人，其次莫如猛。”大叔不忍猛而宽，是以致萑苻之盗，故孔子有宽猛相济之说。乌丸、高车不知礼法，裴、陆先之以威，使其久而服化，必渐施之以宽政矣。后

之人读纸上语，专以鹰击毛挚为治，而不思救弊之术，无问华夷，吾见其败也。

【译文】 曹操任命裴潜为代郡太守，平服了乌丸三单于的动乱。后来把裴潜召回，称赞他治理代郡的功劳。裴潜说：“我裴潜对于百姓虽然宽大，但对各部胡人却很严峻。现在代替我的必然认为我治理过严，而事事加以宽大；胡人素来骄横放纵，过于宽大必然松弛，松弛以后又将会用法令法整顿他们，这样，怨恨叛乱就由此而生出来了。以形势来预料，代郡必然再次叛变。”于是曹操十分悔恨过早地召回了裴潜。过后几十天，单于叛变的消息果然来到。北魏任命陆俟为怀荒镇将，高车的各部莫弗（首领）告发陆俟严厉峻急没有恩惠，再次请求前任镇将郎孤复任代替陆俟。陆俟到达平城，魏太武帝严厉地责备他。第二年，各部莫弗果然杀了郎孤而叛变。太武帝召见陆俟问他说：“为什么能预料是这样？”陆俟说：“高车人不知道上下尊卑的礼法，所以臣用法令来制约他们，使他们知道名分规矩，各部莫弗就告发臣对他们没有恩惠，称颂郎孤的好处。郎孤得以重新回任镇将，为受到的称颂而高兴，专用宽大容忍来对待他们。不知礼仪的人，容易产生骄傲轻慢，郎孤必定就会再用法令来制裁他们，大家的心里怨恨，就必然发生祸乱了！”太武帝认为的确是这样。裴潜、陆俟，可以说是懂得统治的道理了。郑国的子产告诫子太叔说：“只是有道德的人能够用宽大来使人服从，做不到这一点，其次就是威猛。”太叔不忍心用威猛而用宽大，所以导致了萑苻地方成为强盗出没的地方。所以孔子才有宽大和威猛互相补充沟通的说法，乌丸、高车不懂得礼法，裴潜、陆俟先用威猛统治，让他们时间久了服从教化，必然就会逐渐施行宽大的统治了。后来的人读了这些纸上的记载，专门学张开羽毛的老鹰捕食一样，而不思考补救弊病的方法，不论是对待华人还是夷人，我可以坐等他的失败。

拔亡为存

【原文】 燕乐毅伐齐，下七十余城，所存者唯莒、即墨两城耳，赖田单之力，齐复为齐，尺寸之士无所失。曹操收兖州，州叛迎吕布，郡县八十城皆应之，唯鄆城、范、东阿不动，赖荀彧、程昱之力，卒全三城以待操，州境复安。古之人拔亡为存，转祸为福，如此多矣。靖康、建炎间，国家不家，秦、魏、齐、韩之地，名都大邑数百，翦而为戎，越五十年矣。以今准古，岂曰无人乎哉？

【译文】 燕国大将乐毅攻打齐国，攻下七十多座城池，只剩下莒、即墨两个城池，后来靠田单的努力，齐国得以恢复，一点国土也没有损失。

曹操收服兖州，兖州州牧背叛曹操迎附吕布，全州八十个城都起来响应，只有鄆城、范、东阿没有动静，靠荀彧、程昱的努力，终于保全三城等待曹操，州境内又安定下来。

古人把灭亡变成生存，把灾难扭转为福，像这样的例子多了。靖康、建炎年间，国家不强，秦、魏、齐、韩等地，几百座名都大邑，全被金人所占，已经五十年了。拿现实比古代，难道说今天就没有那样的人才吗？

孙吴四英将

【原文】 孙吴奄有江左，亢衡中州，固本于策、权之雄略，然一时英杰，如周瑜、鲁肃、吕蒙、陆逊四人者，真所谓社稷心膂，与国为存亡之臣也。自古将帅，未尝不矜能自贤，疾胜己者，此诸贤则不然。孙权初掌事，肃欲北还，瑜止之，而荐之于权曰：“肃才宜佐时，当广求其比，以成功业。”后瑜临终与权笺曰：“鲁肃忠烈，临事不苟，若以代瑜，死不朽矣！”肃遂代瑜典兵。吕蒙为寻阳令，肃见之曰：“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遂拜蒙母，结友而别。蒙遂亦代肃。蒙在陆口，称疾还，权问：“谁可代者？”蒙曰：“陆逊意思深长，才堪负重，观其规虑，终可大任，无复是过也。”逊遂代蒙。四人相继，居西边三四十一年，为威名将，曹操、刘备、关羽皆为所挫，虽更相汲引，而孙权委心听之，吴之所以为吴，非偶然也。

【译文】 孙氏的吴国包括江西一带，和中原抗衡，固然主要依靠孙策、孙权的雄图大略，然而当时的英雄豪杰，像周瑜、鲁肃、吕蒙、陆逊四个人，真所谓是国家的心腹臂膀，和国家兴存共亡的臣子。自古以来的将帅，未尝不夸耀才能自己认为贤明，嫉妒胜过自己的人，这几位贤能之士就不是这样。孙权刚刚掌握国家大事，鲁肃想回到北方去，周瑜把他劝住，推荐给孙权说：“鲁肃的才能可以为时世的辅佐，应当广泛寻求像他的这一类人，以成就功业。”后来周瑜临终给孙权的信上说：“鲁肃忠诚刚正，遇到事情从不随便马虎，如果能代替我周瑜，我就死而不朽了！”鲁肃就代替周瑜统率军队。吕蒙任寻阳令，鲁肃见到他说：“您今天的才能谋略不再是在吴地时候的阿蒙了。”于是就去拜见吕蒙的母亲，和吕蒙结成朋友然后分别。吕蒙后来也就代替了鲁肃。吕蒙在陆口，说是有病回去，孙权问他：“谁是可以代替你的？”吕蒙说：“陆逊的思想深刻高远，才能足以负起重责，看他的规划考虑，终究可以付予大任，别的人没有超过他的了。陆逊就代替了吕蒙。四人一个接替一个，镇守吴国西方三四十一年，成

为威名远扬的大将，曹操、刘备、关羽都被他们所打败，虽然他们是互相举荐的，但孙权能够放心地听从他们，吴国之所以成为吴国，这不是偶然的。

魏明帝容谏

【原文】 魏明帝时，少府杨阜上疏，欲省宫人诸不见幸者，乃召御府吏问后宫人数。吏守旧令，对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数之曰：“国家不与九卿为密，反与小吏为密乎？”帝愈严惮之。房玄龄、高士廉问少府少监窦德素北门近有何营造，德素以闻。太宗大怒，谓玄龄等曰：“君但知南牙耳，北门小小营造，何预君事耶？”玄龄等拜谢。夫太宗之与明帝，不待比拟，观所以责玄龄之语，与夫严惮杨阜之事，不迨远矣；贤君一话一言，为后世法。惜哉！《魏史》以谓“群臣直谏之言，帝虽不能尽用，然皆优容之，虽非谊主，亦可谓有君人之量矣。”

【译文】 魏明帝曹睿的时代，少府杨阜上奏，要减省宫女中不受宠爱的，就召来御府吏询问后宫宫女的人数。御府吏按照过去的规定，回答说：“这是宫廷中的秘密，不能泄露。”杨阜生气，打了他一百下，责备说：“国家不同九卿一起保密，反而和小吏一起保密吗？”魏明帝因此而对杨阜更加尊敬害怕。房玄龄、高士廉向少府少监窦德素询问宫内北门禁卫军那里近来有什么土木工程，窦德素把这上奏唐太宗。唐太宗大为生气，对房玄龄等人说：“您只需要管好南衙宰相府里的事，北门里小小的营造，跟您有什么关系呢？”房玄龄等人下拜谢罪。唐太宗和魏明帝，用不着比较就知道高低，但看到所用来责备房玄龄的话，和尊敬害怕杨阜的事情相比，就远远不如了。贤明君主的一句话都要为后世效法，可惜啊！《魏史》认为魏明帝对于群臣直谏的话，虽然不能完全采用，然而都能宽大地对待，所以他即使不是深知礼义的君主，也可以说是具有君临天下的度量了。

汉世谋于众

【原文】 两汉之世，事无大小，必谋之于众人，予前论之矣，然亦有持以藉口掩众议者。霍光薨后，宣帝出其亲属补吏，张敞言：“朝臣宜有明言霍氏颺制，请罢三侯就第。明诏以恩不听，群臣以义固争而后许之。今明诏自亲其文，

非策之得者也。”哀帝欲封董贤等，王嘉言：“宜延问公卿、大夫、博士、议郎，明正其义，然后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众心。暴平其事，必有言当封者，在陛下所从；天下虽不说，咎有所分，不独在陛下。前成帝初封淳于长，其事亦议。谷永以长当封，众人归咎于永，先帝不独蒙其讥。”哀帝乃止。是知委曲迁就，使恩出君上，过归于下，汉代多如此也。

【译文】 西汉时期，无论事情大小，必定跟众人商议，这一点我前边已议论过。然而，也有拿这种方式为借口堵塞众人意见的情况。霍光死后，宣帝把他的亲属派到外地做官，张敞说：“朝臣之中本来已经有人公开议论霍氏专制朝政，请求罢免他三个封为列侯的子孙的爵位，不让他们到封地上任。陛下先降旨为了情义不能听取，群臣用义理坚持谏诤，然后再答应他们。如今陛下又自己起草诏书让他们出去作官，是失策的啊！”

哀帝打算封授董贤等人官爵，王嘉说：“应请教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公开议论封授的意义，然后再加封爵位、土地；不然，恐怕大失众望。突然公开评议此事，必定有人说应当封授，顺从陛下的意愿，天下人尽管不高兴，但怨恨自有人承受，不单在陛下身上。先前成帝加封淳于长时，亦曾和大臣评议其事，谷永认为淳于长应当加封，众人把罪责归于谷永，先帝不致独自蒙受讥议。”哀帝于是暂停封授。

由此可知，委曲迁就，使恩泽出自君王，过失属于臣下，汉代大多如此。

国朝会要

【原文】 国朝会要，自元丰三百卷之后，至崇宁、政和间，复置局修纂。宣和初，王黼秉政，罢修书五十八所。时会要已进一百十卷，余四百卷亦成，但局中欲节次觐赏，故未及上。既有是命，局官以谓若朝廷许立限了毕，不过三两月可以投进。而黼务悉矫蔡京所为，故一切罢之，官吏既散，文书皆为弃物矣。建炎三年，外舅张渊道为太常博士，时礼寺典籍散佚亡几，而京师未陷，公为宰相言：“宜遣官往访故府，取见存图籍，悉辇而来，以备掌故。”此若缓而甚急者也。宰相不能用，其后逆豫窃据，鞠为煨烬。吁，可惜哉！

【译文】 本朝《会要》，自神宗元丰年间编修了三百卷之后，直到徽宗崇宁、政和年间，才又重新设置机构编纂。宣和初年，王黼主持政务，撤销了五十八所修书机构。当时《会要》已进呈给朝廷一百一十卷，其余四百卷也已完成，但修书局企图多次进呈以求多次得赏，所以没有全部进呈。撤销修书局的

命令下达之后，主管官吏又说如果朝廷允许限期限了结，不超过三两个月便呈献。可是，王黼力求全盘纠正蔡京所作之事，所以一切统统撤消。官吏遣散之后，文书全成了丢弃之物。建炎三年（1129年），高宗岳父张渊道任太常博士，当时礼寺所存典籍，散佚不多，而且京师尚未陷落，张渊道向宰相建议：“应派专人前往京师旧府寻勘，取出现存图书典籍，全部装车运来，以备查询掌故。”这是一件看似平常却又亟待解决的事。宰相不予采纳，后来就被伪齐刘豫窃据，多被烧成灰烬。唉，可惜啊！

孙臆减灶

【原文】 孙臆胜庞涓之事，兵家以为奇谋，予独有疑焉，云：“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二万灶。”方师行逐利，每夕而兴此役，不知以几何人给之，又必人人各一灶乎？庞涓行三日而大喜曰：“齐士卒亡者过半。”则是所过之处必使人枚数之矣，是岂救急赴敌之师乎？又云：“度其暮当至马陵，乃斫大树，白而书之，曰：‘庞涓死于此树之下。’遂伏万弩，期日暮见火举而俱发。涓果夜至，斫木下，见白书，钻火烛之。读未毕。万弩俱发。”夫军行迟速，既非他人所料，安能必其以暮至，不差晷刻乎？古人坐于车中，既云暮矣，安知树间之有白书？且必举火读之乎？齐弩尚能俱发，而涓读八字未毕。皆深不可信。殆好事者为之，而不精考耳。

【译文】 孙臆战胜庞涓这件事，军事家认为是奇特的策略，唯独我却有怀疑。说：“齐国军队进入魏国造十万口灶，第二天减为五万，第三天减为二万。”正当军队进发争夺有利条件，每晚上去干这些事，不知道要费多少人工，同时难道非得是每人一口灶吗？庞涓走了三天，大为高兴，说：“齐国的士卒逃亡的过了半数。”那就是所经过的地方必定派人一一点过，这难道是救援危急前去作战的军队的样子吗？又说：“估计庞涓当晚应当抵达马陵，就砍下大树的树皮，在白色的树干上写上‘庞涓死于此树之下。’于是就埋伏一万弓箭手，等待天黑以后点火就发射。庞涓果然夜间来到所砍的树下，看到白色树干上的字，钻木取火而照。还没有读完，一万弩箭一起发射。”军队行进的快慢，已经不是别人能预料，哪里能以为他到晚上必定来到，不差一时刻吗？古人坐在车子里，既然已经天黑，哪里能知道树木之间有砍下树皮写上的字而且必定点火而读它吗？齐国的弩箭还未来得及一起发射，而庞涓却八个字还没有读完，这些都是不能深信不疑的。这大约是好事的人编造出来的，而司马迁没有仔细考查而已。

虫鸟之智

【原文】 竹鸡之性，遇其俦必斗。捕之者扫落叶为城，置媒其中，而隐身于后操罔焉。激媒使之鸣，闻者，随声必至，闭目飞入城，直前欲斗，而罔已起，无得脱者，盖目既闭则不复见人。鹧鸪性好洁，猎人于茂林间净扫地，稍散谷于上，禽往来行游，且步且啄，则以碇竿取之。麕行草莽中，畏人见其迹，但循一径，无问远近也。村民结绳为环，置其所行处，麕足一挂，则倒悬于枝上，乃生获之。江南多土蜂，人不能识其穴，往往以长纸带黏于肉，蜂见之必衔入穴，乃蹑寻得之，熏取其子。虫鸟之智，自谓周身矣，如人之不仁何？

【译文】 竹鸡的本性，遇到同类必定争斗。捕竹鸡的人寻落叶作围墙，把诱鸟放在里面，自己隐蔽在后边操纵罗网。刺激诱鸟让它鸣叫，听到叫声的竹鸡，必定随声到来，闭着眼睛飞进树叶堆起的围墙，一直向前要争斗一番。可是网已收起，没有能逃脱的。这是因为原来眼已经闭上，就不再看得见人了。鹧鸪本性喜欢清洁，猎人在茂密的树林中打扫干净一片地方，多少撒些谷米在上面。鹧鸪来往飞行，边走边食，猎人就用长杆粘取它。麕出没在荒草中，害怕人看到它的足迹，无论远近，只沿着一条小路走。村民把绳结成环套，安放在麕经过的地方，麕足一被绊住，就会倒挂在树枝上，被人们生擒活捉。江南多土蜂，人们找不到它的洞穴，往往把长纸带粘在肉上，蜂看见肉必定衔入洞穴，人们就能追踪寻找到它，用火熏取它的幼虫。虫鸟的智慧，自以为可以保全身体了，但怎么能够抵抗得住人类的不仁呢？

卷十四

张文潜论诗

【原文】 前辈议论，有出于率然不致思而于理近碍者。张文潜云：“《诗》三百篇，虽云妇人女子小夫贱隶所为，要之非深于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至‘入我床下’，于七月已下，皆不道破，直至十月方言蟋蟀，非深于文章者能为之邪？”予谓三百篇固有所谓女妇小贱所为，若周公、召康公、穆公、卫武公、芮伯、凡伯、尹吉甫、仍叔、家父、苏公、宋襄公、秦康公、史克、公子奚斯，姓氏明见于大序，可一概论之乎？且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本自言农民出入之时耳，郑康成始并入下句，皆指为蟋蟀，正已不然，今直称此五句为深于文章者，岂其余不能过此乎？以是论《诗》，隘矣。

【译文】 前辈的议论，也有由于粗心，思考不周密而导致情理不通的。张文潜说：“《诗经》三百篇，虽然说的是妇人、女子、小夫、贱隶的事情，总之只有对文章精通的人才能写得出来。如‘七月在野’至‘入我床下’，从“七月”一句往下，都不说破，直到“十月”一句才说出蟋蟀，不是对文章精通练达的人，能作出这样的诗句吗？”我以为三百篇中固然说的有所谓妇人、女子、小夫、贱隶的事情，然而像周公、召公、穆公、卫武公、芮伯、凡伯、尹吉甫、仍叔、家父、苏公、宋襄公、秦康公、史克、公子奚斯这些大人物，姓氏分明地出现在《毛诗·关雎》的大序之中，能一概而论吗？再说“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本来是说农民的出入季节，到郑康成注诗时才合并入下句，认为全都是指蟋蟀而言。这种纠正本来已经是错的了，如今又特意称赞这五句是精通文章之道的，难道其它就没有超过这五句的吗？以此议论《诗经》，未免太偏狭了。

汉祖三诈

【原文】 汉高祖用韩信为大将，而三以诈临之：信既定赵，高祖自成皋度

河，晨自称汉使驰入信壁，信未起，即其卧，夺其印符，麾召诸将易置之；项羽死，则又袭夺其军；卒之伪游云梦而缚信。夫以豁达大度开基之主，所行乃如是，信之终于谋逆，盖有以启之矣。

【译文】 汉高祖任用韩信为大将，却三次用欺诈来对待韩信：韩信平定赵国以后，汉高祖从成皋渡过黄河，早晨自称是汉王的使者骑马进入韩信的营垒，当时韩信还没有起床，乘他睡着，夺了他的印和兵符，召见指挥将领们调换职务防地；项羽死后，就又夺取了韩信的军权；最终假装出震云梦而擒住了韩信。以汉高祖那样豁达大度开创基业的君主，所做的事情却是这样，韩信的终于谋反，也是有原因促成的。

有心避祸

【原文】 有心于避祸，不若无心于任运，然有不可一概论者。董卓盗执国柄，筑坞于碓，积谷为三十年储，自云：“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殊不知一败则扫地，岂容老于坞耶？公孙瓒据幽州，筑京于易地，以铁为门，楼橹千重，积谷三百万斛，以为足以待天下之变，殊不知梯冲舞于楼上，城岂可保耶？曹爽为司马懿所奏，桓范劝使举兵，爽不从，曰：“我不失作富家翁。”不知诛灭在旦暮耳，富可复得耶？张华相晋，当贾后之难不能退，少子以中台星坼，劝其逊位，华不从，曰：“天道玄远，不如静以待之。”竟为赵王伦所害。方形势不容发，而欲以静待，又可嗤也。他人无足言，华博物有识，亦暗于几事如此哉！

【译文】 为躲避灾祸煞费心机，倒不如漫不经心地听凭命运的安排，不过也不能一概而论。董卓盗掌国务大权，在晶（今陕西眉县东北）修筑号称“万岁邬”的城堡，积储了足够用三十年的粮食，自称：“即便大事不成，守着这座城堡，也完全可以终生到老。”殊不知，一旦失败，财产即刻扫荡净尽，哪里容他老死在晶坞？公孙瓒占据幽州，在易（今河北雄县西北）修筑高丘，人称易京，用铁造门，高台望楼千层，积存粮食三百万斛，以为足以应付天下之变，殊不知袁绍的云梯、冲车舞动在楼前，坚城怎能保守得住呢？曹爽被司马懿弹劾，桓范鼓动他发动兵变，曹爽不听，说：“我即使不行还可做个大富翁嘛。”岂不知满门抄斩就在眼前，富翁还能当得成吗？张华在西晋任司空，当贾后在宫廷发动事变时不能辞官避祸，小儿子张懿因中台星分裂，劝他辞去官位，他不听，说：“天象的规律玄奥深远，不如静心等待。”终于被赵王司马伦所害。当情势

万分紧迫时，却想静心等待，太可笑了。别人且不说，张华学识渊博，也对命运大事糊涂到这种程度吗？

蹇解之险

【原文】 《蹇》卦《艮》下《坎》上，见险而止，故诸爻皆有蹇难之辞。独六二重言蹇蹇，说者以为六二与九五为正应，如臣之事君，当以身任国家之责，虽蹇之又蹇，亦匪躬以济之，此解释文义之旨也。若寻绎爻画，则有说焉，盖外卦一《坎》，诸爻所同，而自六二推之，上承九三、六四，又为《坎》体，是一卦之中已有二《坎》也，故重言之。《解》卦《坎》下《震》上，动而免乎险矣。六三将出险，乃有负乘致寇之咎，岂非上承九四、六五又为《坎》乎？《坎》为舆为盗，既获出险而复蹈焉，宜其可丑而致戎也，是皆中爻之义云。

【译文】 《蹇》卦是《艮》卦在下《坎》卦在上，见到《坎》卦的险就按《艮》卦而止，所以各爻都有蹇难的说法。惟独倒数第二阴爻重复地说“蹇”，解说的人认为倒数第二阴爻和倒数第五阳爻正相呼应，如同臣下的事奉君主，应当以一身承担国家的责任，虽然险而又险，也并不为自己打算而去辅助国家，这是解释文字意义的主旨。如果寻求爻象，那就又有解说了。因为上卦是一个《坎》卦，这是各爻所相同的，而从倒数第二阴爻推上去，上面承接倒数第三阳爻，倒数第四阴爻，合起来又是《坎》卦的本体，这是一封之中已经有了两个《坎》卦了，所以重复地说。《解》卦是《坎》卦在下《震》卦在上，一动就免于危险了。《解》卦的倒数第三阴爻将要脱离危险，爻辞又有背负东西乘车招致强盗的过错，难道不是和上面两爻合起来又是《坎》卦的缘故吗？《坎》卦是车子是盗贼，已经到了脱离危险而又重新踏入，就活该可丑而遭抢劫了，这都是中爻的意义。

士之处世

【原文】 士之处世，视富贵利禄，当如优伶之为参军，方其据几正坐，噫鸣诃核，群优拱而听命，戏罢则亦已矣。见纷华盛丽，当如老人之抚节物。以上元、清明言之，方少年壮盛，昼夜出游，若恐不暇，灯收花暮，辄怅然移日不能忘；老人则不然，未尝置欣戚于胸中也。睹金珠珍玩，当如小儿之弄戏剧，

方杂然前陈，疑若可悦，即委之以去，了无恋想。遭横逆机阱，当如醉人之受骂辱，耳无所闻，目无所见，酒醒之后，所以为我者自若也，何所加损哉？

【译文】 读书人为人处世，看待富贵利禄，应像戏剧演员扮演军官。当他身凭几案，正襟危坐，发号施令时，众演员拱手而立听从他的命令，一出戏演完，一切也就结束了。见到豪华艳丽的场面，就应如同老年人对待应时节的景物。拿上元、清明节来说，正当年轻力壮的人，昼夜出游，似乎唯恐时间不足；彩灯收了，鲜花凋零，就一副懊恼的样子，长时间不能忘怀。老年人则不然，不曾把欣喜、忧戚一直放在心上。而对黄金、珠宝、珍贵器物，也应当如同儿童作游戏，当那些东西杂乱摆在面前时，看似喜欢的样子，倘若丢下它走开，却一点也不留恋。遇上强暴无理、设计陷害的事，应当如同醉酒之人遭受辱骂，支着耳朵什么也没听到，睁着眼睛什么都没看见，酒醒之后，我还是原来那副老样子，又有什么损害呢？

张全义治洛

【原文】 唐洛阳经黄巢之乱，城无居人，县邑荒圯，仅能筑三小城，又遭李罕之争夺，但遗余堵而已。张全义招怀理葺，复为壮藩。《五代史》于《全义传》书之甚略，《资治通鉴》虽稍详，亦不能尽。辄采张文定公所著《砮绅旧闻记》，芟取其要而载于此。曰：“今荆襄淮沔创痍之余，绵地数千里，长民之官，用守边保障之劳，超阶擢职，不知几何人？其真能仿佛全义所为者，吾未见其人也，岂局于文法讥议，有所制而不得骋乎？全义始至洛，于麾下百人中，选可使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将，人给一旗一榜。于旧十八县中，令招农户自耕种，流民渐归。又选可使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副，民之来者绥抚之，除杀人者死，余但加杖，无重刑，无租税，归者渐众。又选谙书计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判官，不一二年，每屯户至数千。于农隙时，选丁夫，教以弓矢枪剑，为坐作进退之法。行之一二年，得丁夫二万余人，有盗贼即时擒捕。关市之赋，迨于无籍，刑宽事简，远近趋之如市，五年之内，号为富庶，于是奏每县除令簿主之。喜民力耕织者，知某家蚕麦善，必至其家，悉召老幼亲慰劳之，赐以酒食茶果，遗之布衫裙裤，喜动颜色。见稼田中无草者，必下马观之，召田主赐衣服，若禾下有草，耕地不熟，则集众决责之。或诉以阙牛，则召责其邻伍曰：‘此少牛，如何不众助？’自是民以耕桑为务，家家有蓄积，水旱无饥人，在任四十余年，至今庙食。”呜呼！今之君子，其亦肯以全义之心施诸人乎？

【译文】 唐代洛阳经历黄巢之乱，城空无人，周围县城荒废坍塌，残破砖石只能筑起三座小城，又遭李罕之争夺，只剩下了断垣残壁。张文义招集安抚百姓加以修葺，又重新成为壮观的屏障。《五代史》在张全义的传中记载这件事很简略，《资治通鉴》记载虽然比较详细，也不能完备。我就采取张文定公（张齐贤）所著的《劄记》，节录它的主要部分而记载在这里，文章说：“现在荆、襄、淮、河一带在饱经战乱、创夷满目之余，地区绵延九千里，统治百姓的官员，因为守边保障的功劳，升级提职，不知道有多少人。他们之中真能学习张全义的所作所为，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人。难道是限于条条法令，怕人批评议论，因而有所约束限制而不能做想做的事吗？张全义刚刚到洛阳，在部下一百人中间，选择可以使用的十八人，称之为屯将。每人给一面旗子一张布告，在以前的十八县中，命令招聚农户自己耕种，流亡的百姓逐渐返回。又选择可以使用的十八人，称之为屯副。百姓回来的加以安抚，除了杀人的抵命以外，其余犯罪的仅仅加以杖责，没有重的刑罚，没有租税，回来的百姓就逐渐增多。又选择熟悉文书会计的十八人，称之为屯判官。不到一二年，每一屯中户口达到几千。在农闲时候，选择年轻男子，教他们使用弓箭枪剑，练习起坐进退的阵法。推行了一二年，得到青年男子二万多人，遇有盗贼立即擒拿。市场门口的赋税，几乎近于不征收，刑罚宽大事情简省，远近百姓纷纷前去如同赶集，五年之内，号称富庶，于是才上奏任命每县的县令和主管。喜欢百姓中努力耕田织布的人，知道某一家养蚕种麦技术好，必定去到那一家，召集全家老少亲自慰劳他们，赐给他们酒食茶果，送给他们布衫裙子裤子，喜悦之情见于脸色。见到庄稼地里不长杂草的，必定下马观看，召见田主赐给衣服；如果庄稼下边有草，耕地耕得不合标准，那就召集大众对田主加以责备。有人告诉他说家里缺少耕牛，就召集邻居责备说：“这个人缺少耕牛，为什么大家不帮助他？”从此百姓把耕田种桑作为正业，家家有积蓄，发生水灾旱灾没有饥饿的人，在任上四十多年，到今天百姓还在他的庙里祭祀。”啊！今天的君子，难道也肯用张全义的一片心意施之于百姓吗？

博古图

【原文】 政和、宣和间，朝廷置书局以数十计，其荒陋而可笑者莫若《博古图》。予比得汉研，因取一册读之，发书捧腹之余，聊识数事于此。父癸研之铭曰“爵方父癸”。则为之说曰：“周之君臣，其有癸号者，惟齐之四世有癸公，

癸公之子曰哀公，然则作是器也，其在哀公之时欤？故铭曰‘父癸’者此也。”夫以十干为号，及称父甲、父丁、父癸之类，夏、商皆然，编图者固知之矣，独于此器表为周物，且以为癸公之子称其父，其可笑一也。周义母研之铭曰“仲砮义母作”。则为之说曰：“晋文公杜祁让研砮而已次之，赵孟云‘母义子贵’，正谓杜祁，则所得仲砮者自名也，义母者襄公谓杜祁也。”夫周世砮姓女多矣，安知此为研砮，杜祁但让之在上，岂可便为母哉？既言仲砮自名，又以为襄公为杜祁所作，然则为谁之物哉？其可笑二也。汉注水砮之铭曰：“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则为之说曰：“汉初始元年十二月改为建国，此言元年正月者，当是明年也。”按《汉书》王莽以初始元年十二月癸酉朔日，窃即真位，遂以其日为始建国元年正月，安有明年却称元年之理？其可笑三也。楚姬盘之铭曰“齐侯作楚姬宝盘”。则为之说曰：“楚与齐从亲，在齐砮王之时，所谓齐侯，则砮王也。周末诸侯自王，而称侯以铭器，尚知止乎礼义也。”夫齐、楚之为国，各数百年，岂必当砮王时从亲乎？且砮王在齐诸王中最为骄暴，尝称东帝，岂有肯自称侯之理？其可笑四也。汉梁山砮之铭曰“梁山铜造”。则为之说曰：“梁山铜者，纪其所贡之地，梁孝王依山鼓铸，为国之富，则铜有自来矣。”夫即山铸钱，乃吴王濞耳，梁山自是山名，属冯翊夏阳县，于梁国何预焉？其可笑五也。观此数说，他可知矣。

【译文】 宋徽宗政和、宣和年间，朝廷设置几十所修书机构，所修书籍中最荒唐粗陋而令人可笑的要数《博古图》了。我接连得到几个汉代的贐，因而取来一册阅读，打开书捧腹大笑之后，姑且记几件可笑的事在这里。

父癸贐的铭文是“爵方父癸”。该书对此解释道：“周代君臣，其中名号有癸字的，只有齐的第四代癸公，癸公的儿子是哀公，既然如此，那么制作这个器物，大约是在哀公时期吧？所以铭文为‘父癸’，就是这个原因了。”用十天干作为称号，以及称父甲、父丁、父癸之类，夏、商两朝都是如此，编图的人原本懂得这些，单单把这件器物的时代标为周朝，并把铭文解释成癸公的儿子称呼他的父亲，这是书中可笑的一例。

周义母贐的铭文是“仲瞽义母作”。于是对此解释说：“晋文公的姬妾杜祁让瞽瞍而把自己的位次排在她后面。赵孟（即赵盾）说‘母义子贵’，指的正是杜祁，那么所谓仲瞽，就是杜祁的自称，义母就是襄公对杜祁的称谓。”周代瞽姓女子太多了，怎知这里就是瞽瞍？杜祁只是表示谦让，使她位次排在前边，怎么就成了襄公的母亲了呢？既然说仲瞽是杜祁自称，又认为此贐是襄公为杜祁制作的，那么究竟是谁的器物呢？这是书中可笑的例子之二。

汉注水贐的铭文是“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于是对此解释说：“汉

代初始元年（公元8年）十二月改年号为始建国，这里指元年正月，应当是指第二年。”查考《汉书》，王莽在初始元年十二月初一窃据帝位，于是把那一天定为始建国元年正月，怎么会第二年再称元年呢？这是可笑处之三。

楚姬盘的铭文是“齐侯作楚姬宝盘”。于是对此解释说：“楚国与齐国合纵相亲，是在齐鴟王时期，所谓齐侯，就是指鴟王。周朝末期诸侯自封为王，而在器物铭文上称侯，是还懂得在礼义方面克制一下。”齐、楚作为诸侯国，都有数百年了，难道一定要在鴟王时合纵相亲吗？再说鴟王在齐的所有国君中是最骄横强暴的，曾自称东帝，哪有肯自称为侯的道理？这是可笑处之四。

汉梁山臚的铭文是“梁山铜造”。于是对此解释说：“梁山铜，是记此臚进贡的地点。梁孝王靠山冶铜铸钱，使封国富裕，那么铜也就是有来由的了。”靠山铸钱，指的吴王刘濞而已，梁山本是山名，属冯翊夏阳县，跟梁国有何相干？这是可笑处之五。

本书的荒陋可笑，只要看这几条解释，其它便可知道了。

士大夫论利害

【原文】 士大夫论利害，固当先陈其所以利之实，然于利之中而有小害存焉，亦当科别其故，使人主择而处之，乃合毋隐毋欺之义。赵充国征先零，欲罢骑兵而屯田，宣帝恐虏闻兵罢，且攻扰田者。充国曰：“虏小寇盗，时杀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诚令兵出而虏绝不为寇，则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释坐胜之道，非所以视蛮夷也。”班勇乞复置西域校尉，议者难曰：“班将能保北虏不为边害乎？”勇曰：“今置州牧以禁盗贼，若州牧能保盗贼不起者，臣亦愿以要斩保匈奴之不为边害也。今通西域，则虏势必弱，为患微矣。若势归北虏，则中国之费不止十亿。置之诚便。”此二人论事，可谓极尽利害之要，足以为法也。

【译文】 士大夫分析利害，当然应该先陈述之所以有利的实情，可是在有利之中同时有小害存在，因此也应当说明缘故，让君主选择决断，这才符合对君主不隐不欺的道理。赵充国征伐先零，打算解除战马武器实行屯田，宣帝担心先零人听说此事，将进攻骚扰屯田之户。赵充国说：“先零是小股寇盗，不时地杀害人民，这情况原本是不能彻底禁绝的。如果大军出征真能使先零人绝对不再作乱，那么出兵是可以的。事实并非如此，因而同是一种结局，却放弃坐等胜利的方式，不是对待少数民族的好办法。”班勇请求重新设置西域校尉，参与讨论的大臣责问道：“班将军能保证匈奴不在边疆为害吗？”班勇答：“现在设

置州牧来禁绝盗贼，如果各州牧能保证不出现盗贼的话，我也甘愿拿受腰斩之刑来担保匈奴不在边疆为害。如今跟西域各族交往，匈奴的势力就必定减弱，这样，匈奴的危害就小多了。如果西域的形势被匈奴掌握了，那么内地的损失就不止十亿。设置西域校尉确实有利。”这二人分析事情，可以说把利害双方的要点全都讲透了，这种方式足以供后人效法。

舒元與文

【原文】 舒元與，唐中叶文士也，今其遗文所存者才二十四篇。既以甘露之祸死，文宗因观牡丹，摘其赋中杰句曰：“向者如逐，背者如诀。拆者如语，含者如咽。俯者如怨，仰者如悦。”为之泣下。予最爱其《玉箸篆志》论李斯、李阳冰之书，其词曰：“斯去千年，冰生唐时，冰复去矣，后来者谁！后千年有人，谁能待之？后千年无人，篆止于斯！呜呼主人，为吾宝之！”此铭有不可名言之妙，而世或鲜知之。

【译文】 舒元與是唐代中叶的文人，现在他遗留的文稿保存下来的才二十四篇。后来他因受甘露之变的株连被杀，唐文宗因观赏牡丹，曾摘读他辞赋中杰出的句子：“向者如逐，背者如诀。拆者如语，含者如咽。俯者如怨，仰者如悦。”为此流下泪来。我最喜欢他的《玉箸篆志》中论述李斯、李阳冰的书法的部分，他写道：“斯去千年，冰生唐时，冰复去矣，后来者谁！后千年有人，谁能待之？后千年无人，篆止于斯！呜呼主人，为吾宝之！”此铭文有不可言传之奥妙，可惜世上很少有人知道它。

绝唱不可和

【原文】 韦应物在滁州，以酒寄全椒山中道士，作诗曰：“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欲持一樽酒，远慰风雨夕。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其为高妙超诣，固不容夸说，而结尾两句，非复语言思索可到。东坡在惠州，依其韵作诗寄罗浮邓道士曰：“一杯罗浮春，远饷采薇客。遥知独酌罢，醉卧松下石。幽人不可见，清啸闻月夕。聊戏庵中人，空飞本无迹。”刘梦得“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之句，白乐天以为后之诗人，无复措词。坡公仿之曰：“山围故国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坡公天才，出语警

世，如追和陶诗，真与之齐驱，独此二者，比之韦、刘为不侔，岂非绝唱寡和，理自应尔邪！

【译文】 韦应物在滁州，把酒寄给全椒山中的道士，写诗说：“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欲持一樽酒，远慰风雨夕。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今天早晨在郡中官舍感到寒冷，忽然想念山中的远客。也许正在捆缚荆条，准备回去煮食仙人食用的白石。想着要手执一杯酒，遥远地去慰问你在那风雨之夕。落叶堆满空山，又到哪里去寻觅你的行迹）？”诗的高妙超脱，固然用不着多所夸奖，而结尾的两句，已不再是语言思索所能达到的境界。苏东坡（苏轼）在惠州，按照这首诗的韵脚写诗寄罗浮山邓道士说：“一杯罗浮春，远饷采薇客。遥知独酌罢，醉卧松下石。幽人不可见，清啸闻月夕。聊戏庵中人，空飞本无迹（一杯罗浮春美酒，送给与世隔绝的采薇之客。远远地想像你独酌已毕，醉卧在松树下的大石上。幽居的人不可得见，只听到清亮的啸声在那明月之夕。这不过是随意戏弄庵中的居人，凭空飞翔本来没有踪迹）。”刘梦得（刘禹锡）“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四周围绕古都的群山依然无恙，拍打空城的江潮寂寞地退去）”两句，白乐天（白居易）认为后来的诗人，已经不能再写出同样水平的诗句来了。东坡摹仿这两句说：“山围故国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群山围绕古都惟有城墙徒然存在，潮水拍打空城意气不平）。”东坡的天才，下笔就使世人吃惊，例如追和陶渊明诗，真可以和原作并驾齐驱，惟独这两首，和韦应物、刘梦得的原作不能相比，难道不是绝唱很少能有和作，理应如此吗？

赠典轻重

【原文】 国朝未改官制以前，从官丞、郎、直学士以降，身没大抵无赠典，唯尚书、学士有之，然亦甚薄。余襄公、王素自工书得刑书，蔡君谟自端明、礼侍得吏侍耳。元丰以后，待制以上皆有四官之恩，后遂以为常典，而致仕又迁一秩。梁扬祖终宝文学士、宣奉大夫，既以致仕转光禄，遂赠特进、龙图学士，盖以为银青、金紫、特进只三官，故增其职，是从左丞得仆射也。节度使旧制赠侍中或太尉，官制行，多赠开府。秦桧创立检校少保之例，以赠王德、叶梦得、张澄，近岁王彦遂用之，实无所益也。元璽中，王岩叟终于朝奉郎、端明殿学士，以尝签书枢密院，故超赠正议大夫。杨愿终于朝奉郎、资政殿学士，但赠朝请大夫，以执政而赠郎秩，轻重为不侔，皆掌故之失也。

【译文】 宋朝元丰年间改革官制以前，从官丞、郎、直学士以下的官，身死以后一般没有赠典，只尚书、学士有，不过也很菲薄。余襄公、王素死后只不过从工部尚书得到刑部尚书的赠典，蔡君谟死后从端明殿学士、礼部侍郎得到吏部侍郎的赠典罢了。元丰以后，待制以上的官员都可得到升四级官阶的恩惠，后来就把它作为定规，而退休辞官又升迁一级。梁扬祖最终官作到宝文阁学士、宣奉大夫，退休之后转为光禄大夫，于是赠给特进、龙图阁学士。因为银青光禄大夫、金紫光禄大夫、特进只三个官阶，所以增一级官职，这就从左丞得到仆射了。节度使按旧规定赠给侍中或太尉，元丰官制实行后，大多赠给开府仪同三司。秦桧创立检校少保的例规，把它赠给王德、叶梦得、张澄，近年来王彦就采用它，实际上没有什么增益。元盩年间，王岩叟官作到朝奉郎、端明殿学士，因为曾任枢密院签书，所以越级赠给正议大夫。杨愿官作到朝奉郎、资政殿学士，而只赠给朝请大夫，根据做过执政官就赠给郎官级别，这样则使轻重不同等，都属在掌故上有所失误。

李陵诗

【原文】 《文选》编李陵、苏武诗，凡七篇，人多疑“俯观江汉流”之语，以为苏武在长安所作，何为乃及江、汉？东坡云“皆后人所拟也”。予观李诗云“独有盈觞酒，与子结绸缪”。盈字正惠帝讳，汉法触讳者有罪，不应陵敢用之，益知坡公之言为可信也。

【译文】 《文选》编入的李陵、苏武诗，共计七篇，人们很多怀疑“俯观江汉流（下望长江、汉水的水流）”的话，认为苏武在长安所写的诗，为什么写到长江、汉水？东坡（苏轼）说：“这都是后人摹拟而写的。”我看到李陵诗中说“独有盈觞酒，与子结绸缪（独有满杯的酒，和你同饮情意殷勤）”，“盈”字正是汉惠帝的名讳。而汉朝的法令犯讳的有罪，李陵不应谈敢使用，更知道东坡的话是可信也。

大曲伊凉

【原文】 今乐府所传大曲，皆出于唐，而以州名者五，伊、凉、熙、石、渭也。凉州今转为梁州，唐人已多误用，其实从西凉府来也。凡此诸曲，唯伊、

凉最著，唐诗词称之极多，聊纪十数联，以资谈助。如：“老去将何散旅愁？新教小玉唱《伊州》”，“求守管弦声款逐，侧商调里唱《伊州》”，“钿蝉金雁皆零落，一曲《伊州》泪万行”，“公子邀欢月满楼，双成揭调唱《伊州》”，“赚杀唱歌楼上女，《伊州》误作《石州》声”，“胡部笙歌西部头，梨园弟子和《凉州》”，“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空数米嘉荣”，“《霓裳》奏罢唱《梁州》，红袖斜翻翠黛愁”，“行人夜上西城宿，听唱《梁州》双管逐”，“丞相新裁别离曲，声声飞出旧《梁州》”，“只愁拍尽《凉州》杖，画出风雷是拨声”，“一曲《凉州》今不清，边风萧飒动江城”，“满眼由来是旧人，那堪更奏《梁州曲》”，“昨夜蕃军报国仇，沙州都护破梁州”，“边将皆承主恩泽，无人解道取凉州。”皆王建、张祜、刘禹锡、王昌龄、高骈、温庭筠、张籍诸人诗也。

【译文】 如今乐府诗所流传的大曲，都出自唐代，以州名为名的有五种，分别是伊州、凉州、熙州、石州、渭州。凉州现在变成了梁州，唐代已有许多人搞错了，其实是从西凉府来的。在这些大曲中，只有伊州、凉州最突出，唐代诗词很多都提到它们。姑且记下十几联，以供谈话的资料。如：“老去将何散旅愁？新教小玉唱《伊州》”，“求守管弦声款逐，侧商调里唱《伊州》”，“钿蝉金雁皆零落，一曲《伊州》泪万行”，“公子邀欢月满楼，双成揭调唱《伊州》”，“赚杀唱歌楼上女，《伊州》读作《石州》声”，“胡部笙歌西部头，梨园弟子和《凉州》”，“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空数米嘉荣”，“《霓裳》奏罢唱《梁州》，红袖斜翻翠黛愁”，“行人夜上西城宿，听喝《梁州》双管逐”，“丞相新裁别离曲，声声飞出旧《梁州》”，“只愁拍尽《凉州》杖，画出风雷是拨声”，“一曲《凉州》今不清，边风萧飒动江城”，“满眼由来是旧人，那堪更奏《梁州曲》”，“昨夜蕃军报国仇，沙州都护破梁州”，“边将承主恩泽，无人解道取凉州。”这些诗句，都出自王建、张祜、刘禹锡、王昌龄、高骈、温庭筠、张籍等人的诗篇。

次山谢表

【原文】 元次山为道州刺史，作《舂陵行》，其序云：“州旧四万余户，经贼以来，不满四千，大半不胜赋税。到官未五十日，承诸使征求符牒二百余封，皆曰‘失期限者罪至贬削’。于戏！若悉应其命，则州县破乱，刺史欲焉逃罪？若不应命，又即获罪戾。吾将静以安人，待罪而已。”其辞甚苦，大略云：“州小经乱亡，遗人实困疲。早餐是草根，暮食乃木皮。出言气欲绝，意速行步迟。

追呼尚不忍，况乃鞭扑之。邮亭传急符，来往迹相追。更无宽大恩，但有迫催期。欲令鬻儿女，言发恐乱随。奈何重驱逐，不使存活为？安人天子命，符节我所持。逋缓违诏令，蒙责固所宜。”又《贼退示官吏》一篇，言贼攻永破邵，不犯此州，盖蒙其伤怜而已，诸使何为忍苦征敛。其诗云：“城小贼不屠，人贫伤可怜。是以陷邻境，此州独见全。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今彼征敛者，迫之如火煎。”二诗忧民惨切如此。故杜老以为：“今盗贼未息，知民疾苦，得结辈十数公，落落参错天下为邦伯，天下少安，立可待矣。”遂有“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之句。今《次山集》中，载其《谢上表》两通，其一云：“今日刺史，若无武略，以制暴乱；若无文才，以救疲弊；若不清廉，以身率下；若不变通，以救时须，则乱将作矣。臣料今日州县堪征税者无几，已破败者实多，百姓恋坟墓者盖少，思流亡者乃众，则刺史宜精选谨择以委任之，固不可拘限官次，得之货贿出之权门者也。”其二云：“今四方兵革未宁，赋敛未息，百姓流亡转甚，官吏侵刻日多，实不合使凶庸贪猥之徒，凡弱下愚之类，以货赂权势，而为州县长官。”观次山表语，但因谢上而能极论民穷吏恶，劝天子以精择长吏，有谢表以来，未之见也。世人以杜老褒激之故，或稍诵其诗，以《中兴颂》故诵其文，不闻有称其表者，予是以备录之，以风后之君子。次山临道州，岁在癸卯，唐代宗初元广德也。

【译文】元次山（元结）任道州刺史的时候，写了《舂陵罢》，诗序说：“州中原有四万多户，经过贼人动乱以来，已经不满四千，其中一大半又不能承受赋税。我到任没有五十天，就收到各使征收各种费用的公文二百多封，都说‘误了期限的应当贬官削职’。啊！如果全部按照他们的命令去办，那么州县就更会更加残破动乱，刺史能到哪里逃避罪责？如果不按照命令去办，又会立即得罪。我将要用镇静来安抚百姓，等候处理而已。”诗歌很凄苦，大致说：“州小经乱亡，遗人实用疲。朝餐是草根，暮食乃木皮。出言气欲绝，意速行步迟。追呼尚不忍，况乃鞭扑之！邮亭传急符，来往迹相追。更无宽大恩，但有迫催期。欲令鬻儿女，言发恐乱随。奈何重驱逐，不使存活为？安人天子命，符节我所持。逋缓违诏令，蒙责固所宜（州小又经过兵乱逃亡，遗留下来的百姓实在困顿疲乏。早晨吃的是草根，晚上吃的是树皮。说话没有力好像要断气，想着快走可抬脚却是迟慢。递送文书的驿馆传来紧急命令，来来往往足迹跟着足迹。更没有什么宽大的恩典，有的只是催迫的限期。要让百姓卖儿鬻女，发了话恐动乱跟着就来。为什么重加驱赶，不让百姓活下去？安抚百姓是天子的命令，权力掌握在我的手里，缓交赋税违背诏令，蒙受责罚本来就是应该的）。”另外有《贼退示官吏》一篇，说盗贼攻永州破邵州，不侵犯这个道州，这是因为受到盗

贼的怜悯而已，使者们为什么要忍心苦苦征收赋税。这首诗说：“城小贼不屠，人贫伤可怜。是以陷邻境，此州独见全。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今彼征敛者，追之如火煎（城小贼人不来攻取，百姓贫困惨伤可怜，所以邻郡失陷，这个州却独独能被保全。使臣手持王命，难道还不如贼人吗？现在那些征收赋税的人，逼迫百姓如同烈火煎熬）。”两首诗为百姓担忧，惨切到这样，所以杜老（杜甫）认为：“现在盗贼没有平息，知道百姓的疾苦，能有像元结这样的十几位，分散开来任命任命为天下地方长官，天下的稍稍安定，可以很快就等到了。”因此而就有“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两篇诗和秋夜的月光相对，一个字和光亮的星星并比）”之句。现在元次山的集子里，记载他的《谢上表》两封，第一表说：“今天的刺史，如果没有武略以镇压暴乱，如果没有文才以挽救现时的弊病，如果不能清廉以自身作为表率，如果不能随机变通以适合现时的需要，那么动乱就要发生了。臣估计今天能够承担征税的州县没有几个，已经破产败落的太多，百姓依恋祖籍故土的不多，打算流浪他乡的却不少，那么刺史的人选就应该精细认真地挑选和委派，当然不应受本人原有官阶的限制，或只凭得到多少贿赂，是否出自豪门望族。”另一篇说：“现在到处战乱尚未止息，赋税征收不止，百姓流离失所日益严重，官吏对百姓欺凌刻薄愈加增多，实在不该让凶残、庸俗、贪婪、卑鄙之辈，平庸懦弱、智能低下这类人，凭着行贿的办法，依仗权势，担任州县的长官。”看次山上表中的话，只是通过向皇上致谢而能透彻论述百姓穷困、官吏凶恶的情况，规劝天子精心选择地方长官，自有谢表以来，还没有见过这种写法。人们因为杜甫表彰的缘故，或许多少读过一些元结的诗，因为《中兴颂》的缘故诵读他的文章，却不见有称道他上表的，我因此全抄录下来，拿它感化后代的君子。次山赴道州上任，是癸卯年，即唐代宗广德元年。

光武仁君

【原文】 汉光武虽以征伐定天下，而其心未尝不以仁恩招怀为本。隗嚣受官爵而复叛，赐诏告之曰：“若束手自诣，保无他也。”公孙述据蜀，大军征之垂灭矣，犹下诏谕之曰：“勿以来歟、岑彭受害自疑，今以时自诣，则家族全，诏书手记不可数得，朕不食言。”遣冯异西征，戒以平定安集为急。怒吴汉杀降，责以失斩将吊民之义，可谓仁君矣。萧铣举荆楚降唐，而高祖怒其逐鹿之对，诛之于市，其隘如此，《新史》犹以高祖为圣，岂理也哉？

【译文】 东汉光武帝虽然靠武力征伐平定天下，可是他的用心总是以仁慈、恩情、招降、安抚为根本。隗嚣接受官爵后再次反叛，光武帝下诏书告诉他：“如果你放弃抵抗主动投降，保证没有其它处分。”公孙述据守蜀地，光武帝派大军前去征伐，即将平灭时还下诏告诉他：“不要因为你杀了我的大将来歙、岑彭而心怀疑虑，现在及时归降，仍可保全家族。皇帝亲笔诏书不可多得，我说话算数。”派遣冯异西征，告诫他平定地方、安抚百姓是当务之急。因为吴汉纵兵掳掠成都已归降的官吏人民而发怒，责备他不符合斩杀敌将、吊慰民众的道理，这样才可以说是仁义之君。萧铣割据长江中游，兵败降唐，可是唐高祖恼怒他曾跟自己争夺天下，把他杀死在长安的大街上，李渊心地狭隘到这种地步，《新唐书》还把他称为圣人，有这样的道理吗？

卷十五

张文潜哦苏杜诗

【原文】 “溪回松风长，苍鼠窜古瓦。不知何王殿，遗缔绝壁下。阴房鬼火青，坏道哀湍泻。万籁真笙竽，秋色正萧洒。美人为黄土，况乃粉黛假。当时侍金舆，故物独石马。忧来藉草坐，浩歌泪盈把。冉冉征途间，谁是长年者？”此老杜《玉华宫》诗也。张文潜暮年在宛丘，何大圭方弱冠，往谒之，凡三日，见其吟哦此诗不绝口。大圭请其故，曰：“此章乃《风》、《雅》鼓吹，未易为子言。”大圭曰：“先生所赋，何必减此？”曰：“平生极力模写，仅有一篇稍似之，然未可同日语。”遂诵其《离黄州》诗，偶同此韵，曰：“扁舟发孤城，挥手谢送者。山回地势卷，天豁江面泻。中流望赤壁，石脚插水下。昏昏烟雾岭，历历渔樵舍。居夷实三载，邻里通借假。别之岂无情，老泪为一洒。篙工起鸣鼓，轻櫓健于马。聊为过江宿，寂寂樊山夜。”此其音响节奏，固似之矣，读之可默喻也。又好诵东坡《梨花》绝句，所谓“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者，每吟一过，必击节赏叹不能已，文潜盖有省于此云。

【译文】 “溪回松风长，苍鼠窜古瓦。不知何王殿，遗缔绝壁下。阴房鬼火青，坏道哀湍泻。万籁真笙竽，秋色正萧洒。美人为黄土，况乃粉黛假。当时侍金舆，故物独石马。忧来藉草坐，浩歌泪盈把。冉冉征途间，谁是长年者？”这是杜甫的《玉华宫》诗。张来（字文潜）晚年住在宛丘（今河南淮阳东南）时，何大圭正当二十来岁，前去拜见他，在文潜处三天，见他老是吟哦这首诗。何大圭问这是什么原因，文潜回答道：“这首诗是象《诗经》的《风》诗、《雅》诗那样的妙歌雅奏，不容易对您说清楚。”大圭说：“先生所创作的诗篇，哪会比这首差呢？”文潜称：“一辈子极力地模仿它，只有一篇略微与它相似，可是优劣未可同日而语。”接着就背诵他的《离黄州》诗，这首诗的韵律与杜甫的诗偶然相同。诗中写道：“扁舟发孤城，挥手谢送者。山回地势卷，天豁江面泻。中流望赤壁，石脚插水下。昏昏烟雾岭，历历渔樵舍。居夷实三载，邻里通借假。别之岂无情，老泪为一洒。篙工起鸣鼓，轻櫓健于马。聊为过江宿，寂寂樊山

夜。”此诗，它的平仄节奏，与杜诗很相似，一读就可知道所言何事。文潜又喜欢吟诵苏东坡（苏轼）的《梨花》绝句，即所谓“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的那一首，每当吟哦一遍，必定叹赏不已，他大概对于此诗有非常之深的理解吧。

任安 田仁

【原文】 任安、田仁，皆汉武帝时能臣也，而《汉史》载其事甚略，褚先生曰：“两人俱为卫将军舍人，家监使养恶恶马。仁曰：‘不知人哉！家监也！’安曰：‘将军尚不知人，何乃家监也！’后有诏募择卫将军舍人以为郎。会贤大夫赵禹来，悉召舍人百余人，以次问之，得田仁、任安，曰：‘独此两人可耳，余无可使用者。’将军上籍以闻。诏召此二人，帝遂用之。仁刺举三河，时河南、河内太守皆杜周子弟，河东太守石丞相子孙，仁已刺三河，皆下吏诛死。”观此事，可见武帝求才不遗微贱，得人之盛，诚非后世所及。然班史言：“霍去病既贵，卫青故人门下多去事之，唯任安不肯去。”又言：“卫将军进言仁为郎中。”与褚先生所书为不同。《杜周传》云：“两子夹河为郡守，治皆酷暴。”亦不书其所终，皆阙文也。

【译文】 任安、田仁，都是汉武帝时代有能力的大臣，但是汉朝的史籍记载他们的情况很简略。褚先生说：“两个人都是卫青将军的侍从宾客，卫将军府中总管让他们饲养暴烈咬人的马匹，田仁说：‘这个总管真是不了解人啊！’任安说：‘将军尚且不了解人，何况是总管呢！’后来朝廷有诏书选择卫将军的侍从宾客作为郎。正好贤明的大夫赵禹来办理这件事，召集全部侍从宾客一百多人，挨个儿加以询问，得到了田仁、任安，说：‘唯独这两个人可以，余下的没有可以任用的人。’卫将军把两个人的户籍奏报给汉武帝。下诏召见这两个人，武帝就任用他们。田仁侦视揭发三河地区，当时河南、河内太守都是杜周的子侄兄弟，河东太守是石庆丞相的子孙，田仁侦察到三河的情况，这些人都会被关进监狱诛杀。”从这件事情看，可见汉武帝访求人才不遗漏出身微贱的人，所以当时得到的人才之盛，确实不是后世所能赶得上的。然而班固《汉书》说：“霍去病贵显以后，卫青的旧人和门下宾客士多离开卫青投靠霍去病，唯有任安不肯离去。”又说：“卫将军保奏田仁为郎中。”和褚先生所记载的不同。《杜周传》说：“两个儿子被任命为夹着黄河的两郡郡守，统治都很暴虐严酷。”也没有写明他们的最后结果，这都是文字有遗漏。

杜延年 杜钦

【原文】 《前汉书》称：杜延年本大将军霍光吏，光持刑罚严，延年辅之以宽，论议持平，合和朝廷；杜钦在王凤幕府，救解冯野王、王尊之罪过，当世善政，多出于钦。予谓光以侯史吴之事，一朝杀九卿三人，延年不能谏。王章言王凤之过，天子感悟，欲退凤，钦令凤上疏谢罪。上不忍废凤，凤欲遂退，钦说之而止。章死，众庶冤之，钦复说凤，以为：“天下不知章实有罪，而以为坐言事，宜因章事举直言极谏，使天下咸知主上圣明，不以言罪下。若此，则流言消释矣。”凤白行其策。夫新莽盗国。权舆于凤，凤且退而复止，皆钦之谋。若钦者，盖汉之贼也，而谓当世善政出其手，岂不缪哉？

【译文】 《前汉书》记载：杜延年本来是大将军霍光手下的官吏，霍光用刑处罚都很严厉，杜延年用宽大来辅助，论议公平，协调朝廷上下；杜钦在王凤的幕府中，救援解脱冯野王、王尊的罪行过错，当时好的政治措施，大多由杜钦所经办。我认为霍光由于侯史吴的事情，一早上杀了三位九卿，杜延年却不能劝谏。王章上书揭露王凤的过错，天子感动明白，想要解除王凤的职位，杜钦让王凤上疏谢罪。皇上不忍废黜王凤，王凤却不想再当权任事，杜钦说服王凤，王凤才不再坚持。王章死了以后，百姓认为他冤曲，杜钦又劝说王凤，认为：“天下人不知道王章实在有罪，而以为只是上书言事而得罪，您应当乘着王章的事件保荐极言直谏的官员，让天下人都知道皇上圣明，不因为说话不合适而把下面的官员治罪。如果这样，那么流言就消除了。”王凤按照他的计策上奏。王莽窃国，开端在于王凤。王凤就要被解除职位而又没有解除，都是杜钦的谋划。像杜钦这样的人，是汉朝的敌人，反而说当时好的政治措施是由他经办的，难道不荒谬吗？

范晔作史

【原文】 范晔在狱中，与诸甥侄书曰：“吾既造《后汉》，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唯志可推耳。博瞻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

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晔之高自夸诩如此。至以谓过班固，固岂可过哉？晔所著序论，了无可取，列传如邓禹、窦融、马援、班超、郭泰诸篇者，盖亦有数也，人苦不自知，可发千载一笑。

【译文】 范晔在狱中时，对他的外甥和侄子们写信道：“我已经写成了《后汉书》，细看古今的著述及有关的评论，很少有符合自己心意的。班固的名望最高，全是随意写作，一无体例，不值得评判其优劣，只是书中的志写得是很不错的。在材料的全面和丰富上，我可能比不上他，若论材料的整理我却未必有愧。我写的杂传的末尾的议论文字，都有精深的意旨。至于《循吏》以下及至六夷部分的诸篇序论，笔力雄健，尽情挥洒，实在是天下的奇作。其中适当的篇章，往往不低于贾谊的《过秦论》。曾经同班氏所作之书放在一起比较，强之多多，并不只是不感到惭愧。赞语的部分自然是我的文章的杰出部分，大抵没有一字虚设，行文求变出奇，奇异变化无穷无尽，就是相同的内容也要采用不同的表达方式，竟然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称赞它。这部书出现于社会，自然会得到人们的赏识的。自古以来结构宏大并且思致精审之作，还没有这样的。”范晔自高自大、自吹自擂居然达到如此地步！至于自称超过了班固，难道班固随便就可以超过吗？范晔所写的序论，全无可取之处，列传如邓禹、窦融、马援、班超、郭泰诸篇，也只不过是有限的几篇。人最怕没有自知之明，象范晔这样自夸，千载之后也免不了被人耻笑。

唐诗人有名不显者

【原文】 《温公诗话》云：“唐之中叶，文章特盛，其姓名湮没不传于世者甚众，如：河中府鹳雀楼有王之涣、畅诸二诗。二人皆当时所不数，而后人擅诗名者，岂能及之哉？”予观《少陵集》中所载韦迢、郭受诗，少陵酬答，至有“新诗锦不如”、“自得随珠觉夜明”之语，则二人诗名可知矣，然非编之杜集，几于无传焉。又有严恽《惜花》一绝云：“春光冉冉归何处，更向花前把一杯。尽日问花花不语，为谁零落为谁开？”前人多不知谁作，乃见于皮、陆《唱和集》中。大率唐人多工诗，虽小说戏剧，鬼物假托。莫不宛转有思致，不必颛门名家而后可称也。（涣、畅诸，馆本作涣、畅当）

【译文】 温公（司马光）《诗话》说：“唐代的中叶，文章特别兴盛，其中

姓名湮没不传于世的人很多，例如河中府鹳雀楼有王之涣、畅诸两首诗，这两个人都是在当时数不上的，然而后人中以诗得名的，难道能及得上吗！”我看到少陵（杜甫）集子中所记载的韦迢、郭受的诗，少陵的回赠诗中，甚至有称赞“新诗锦不如（新诗的华美连锦缎都比不上）”、“自得随珠觉夜明（自从得到像随侯珠一样的诗篇觉得夜里也明亮了）”这些话，那么这两个人的诗名可以想象而知了，然而不是编在杜少陵的集子里，几乎就不能流传。又有严恽的《惜花》一首绝句说：“春光冉冉归何处，更向花前把一杯。尽日问花花不语，为谁零落为谁开（春光渐渐归去归向哪里，还是在花前手执一杯。整天问花花不说话，你为了谁而零落又为了谁而开放）？”前人数数不知道是谁的作品，实则见于皮日休、陆龟蒙的唱和诗集中。大致唐朝人数数工于诗，虽然是小说戏剧中假托于鬼物的作品，无不是宛转而有思想意趣，不必专门以诗著称的人才是值得称道的。（原注：“涣”、“畅诸”，馆本作“涣”、“畅当”。）

苏子由诗

【原文】 苏子由《南窗》诗云：“京城三日雪，雪尽泥方深。闭门谢还往，不闻车马音。西斋书帙乱，南窗朝日升。展转守床榻，欲起复不能。开户失琼玉，满阶松竹阴。故人远方来，疑我何苦心。疏拙自当尔，有酒聊共斟。”此其少年时所作也。东坡好书之，以为人间当有数百本，盖闲淡简远得味外之味云。

【译文】 苏辙（字子由）在《南窗》诗中写道：“京城三日雪，雪尽泥方深。闭门谢还往，不闻车马音。西斋书帙乱，南窗朝日升。展转守床榻，欲起复不能。开户失琼玉，满阶松竹阴。故人远方来，疑我何苦心。疏拙自当尔，有酒聊共斟。”这是他少年时代的作品。东坡很喜欢写这首诗，认为人世间应当有几百本流传，因为它风格闲淡简远，有种超越语言文字的情味。

呼君为尔汝

【原文】 东坡云：“凡人相与号呼者，贵之则曰公，贤之则曰君，自其下则尔汝之。虽王公之贵，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则进而君公、退而尔汝者多矣。”予谓此论特后世之俗如是尔，古之人心口一致，事从其真，虽君臣父子之间，出口而言，不复顾忌，观《诗》、《书》所载可知矣。箕子陈《洪范》，对武王而汝

之。《金縢》策祝，周公所以告大王、王季、文王三世祖考也，而呼之曰尔三王，自称曰予。至云：“尔之许我，我其以璧与珪，归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珪。”殆近乎相质责而邀索也。《天保》报上之诗，曰：“天保定尔，俾尔戩戩”，《瞽瞍》颂君之诗，曰：“俾尔炽而昌”、“俾尔昌而炽”，及《节南山》、《正月》、《板荡》、《卷阿》、《既醉》、《瞻岐》诸诗，皆呼王为尔。《大明》曰“上帝临女”，指武王也。《民劳》曰“王欲玉女”，指厉王也。至或称为小子，虽幽、厉之君，亦受之而不怒。呜呼！三代之风俗，可复见乎？晋武公请命乎天子，其大夫赋《无衣》，所谓“不如子之衣”，亦指周王也。

【译文】 苏东坡说：“大凡人们在一起互相称呼，认为以对方尊贵就称之为公，认为以对方贤德就称之为君，对地位在他下边的人就称之为尔、曰汝。即使是贵为王公，天下人表面上敬畏，可是心里不服，就当面称君、称公，背后称尔、称汝，这样的事例是很多的。”我认为这种论断并不全面，只是后代的风气如此罢了，古代人心口如一，说话做事讲究朴质，即使是君臣父子之间，张口就说，不讲客套，不存在什么顾虑和忌讳，看看《诗经》、《尚书》中的记载就可了解了。箕子陈述《洪范》，对武王说话就是称之为汝。《金縢》是在以简策祝告鬼神，是周公求告大王、王季、文王三代父祖的祝辞，可是称呼他们曰尔三王，称呼自己曰予。至于说道：“假如你们答应我的要求，我就拿着璧与珪死去，等待你们的命令，假若你们不答应我的要求，那我就要把璧和珪抛掉。”大抵接近于那种做生意讲价钱求赔偿的口吻。《天保》是一篇臣下赞美周王的诗，说：“上天使你安定，使你得到福禄”，《瞽瞍》是一篇歌颂国君的诗，说“使你盛大兴旺”、“使你兴旺盛大”，至于《节南山》、《正月》、《板荡》、《卷阿》、《既醉》、《瞻岐》各篇诗作，皆直呼王曰尔。《大明》曰“上帝临女”，“女”指的是武王。《民劳》曰“王欲玉女”，“女”指的是厉王。甚至于有时称为小子，即使是像幽王、厉王那样的暴君，也坦然接受这种称呼而不生气。哎！三代时的纯朴风俗，还能出现于今天吗？晋武公向天子请命，他的大夫赋《无衣》之诗，所言“不如子之衣”，“子”也是指的周王，子为敬称，不同于尔汝，但用子称王为后世所罕见。

世事不可料

【原文】 秦始皇并六国，一天下，东游会稽，度浙江，矍然谓子孙帝王万世之固，不知项籍已纵观其旁，刘季起喟然之叹于咸阳矣。曹操芟夷群雄，遂

定海内，身为汉相，日夜窥伺龟鼎，不知司马懿已入幕府矣。梁武帝杀东昏侯，覆齐祚，而侯景以是年生于漠北。唐太宗杀建成、元吉，遂登天位，而武后已生于并州。宣宗之世，无故而复河陇，戎狄既衰，藩镇顺命，而朱温生矣。是岂智力谋虑所可为哉？

【译文】 秦始皇并吞六国，统一天下，东边巡游到会稽，渡过浙江，很威风地说是子孙帝王万世的基业已经牢固，不知项羽已经在旁边放肆地观看，刘邦已经在咸阳生出感叹了。曹操削除群雄，于是平定海内，身为汉朝丞相，日日夜夜窥伺皇帝的宝座，不知司马懿已经进入他的幕府了。梁武帝杀了东昏侯，灭亡了南齐，而侯景就在这一年生于北方大漠。唐太宗杀了建成、元吉，就登上了皇位，而武后已经出生在并州。唐宣宗时代，朝中无事而收复河、陇地区，蛮夷衰弱，藩镇服从命令，而颠覆唐朝的朱温出生了。这些难道是智力谋略所能预料到的吗？

蔡君谟帖语

【原文】 韩献肃公守成都时，蔡君谟与之书曰：“襄启：岁行甫新，鲁钝之资，日益衰老。虽勉就职务，其于精力不堪劳苦。念君之生，相距旬日，如闻年来补治有方，当愈强健，果何如哉？襄于京居，尚留少时，伫君还轸，伸眉一笑，倾怀之极。今因樊都官西行，奉书问动静，不一一。襄上子华端明阁下。”此帖语简而情厚，初无寒温之问、寝食之祝、讲德之佞也。今风俗日以偷薄，士大夫之浮者，于尺牋之间，益出新巧，习贯自然，虽有先达笃实之贤，亦不敢自拔以速嘲骂。每诒书多至十数纸，必系衔，相与之际，悉忘其真，言语不情，诚意扫地。相呼不以字，而云某丈，僭紊官称，无复差等，观此其少愧乎！忆二纪之前，予在馆中，见曾监吉甫与人书，独不作札子，且以字呼同舍，同舍因相约云：“曾公前辈可尊，是宜曰丈，余人自今各以字行，其过误者罚一直。”行之几月，从官郎省，欣然皆欲一变，而有欲败此议者，载酒饮同舍，乞仍旧。于是从约皆解，遂不可复革，可为一叹。

【译文】 韩绛（字子华，谥献肃）作成都知府时，蔡襄（字君谟）向他写过一封信，信上说：“襄启：光阴荏苒，又是一年，我生来就天资愚鲁，加之一天比一天衰老。尽管还能勉强从事本职工作，但是由于精力不济，有种难以忍受的劳苦。想起您的出生，和我相差十天，听说您近年来多方保养身体，或进补，或治疗，现在您定当更加强壮健康，不知真正的情况究竟如何？我住在京

城，还要停留一个时期，等着您受诏还京，那时彼此相见，将开怀大笑，高兴之极。而今趁着樊都官要到西边去，顺便奉上一信问候起居，其他的事不再一一禀告。蔡襄奉上子华端明殿学士阁下。”这张柬帖，语言简短，情意深厚，全然没有那些问候寒暖、祝福寝食，恭惟道德的客套话。现今的风气一天天地轻薄，虚浮的士大夫，在书信中弄出越来越多的新巧花样，且习惯成自然，弄得即使是通达务实的贤人，也不敢超越于流俗，而招来嘲笑谩骂。每次写信就多达十几张，信中一定写清楚官衔，在这相互交流思想的场合，全都忘了写信的真正目的，说出的话一点也不实在，真诚弃之无余。相互称呼不称字，都称某某丈，超越礼制，使官称错乱失序，不再有等级的差别，这些轻浮之辈看到这封信大概也会多少感到羞愧！回忆起二十四年之前，我在馆阁任职，看到秘书少监曾监（字吉甫）给人写信，硬是不用奏事文书的公文形式，并且对其同事称字，同事们因而相互约定，说：“曾公是前辈，宜加尊敬，称呼他应称之为丈，其他的人从今以后都以字相称，那些搞错了的罚他值班一次。”这个方法施行了将近一个月，郎署及台省的从属官员，都高高兴兴地想着一改旧习。可是，也有想取消前约的人，备酒请朋友的客，请求仍照先前的称呼。于是一起达成的协议被破坏了，从而再也无法改变，多么让人惋惜啊！

孔氏野史

【原文】 世传孔毅甫《野史》一卷，凡四十事，予得其书于清江刘靖之所，载赵清献为青城宰，挈散乐妓以归，为邑尉追还，大恚且怒。又因与妻忿争，由此惑志。文潞公守太原，辟司马温公为通判，夫人生日，温公献小词，为都漕唐子方峻责。欧阳永叔、谢希深、田元均、尹师鲁在河南，携官妓游龙门，半月不返，留守钱思公作简招之，亦不答。范文正与京东人石曼卿、刘潜之类相结以取名，服中上万言书，甚非言不文之义。苏子瞻被命作《储祥宫记》，大貂陈衍干当宫事，得旨置酒与苏高会，苏阴使人发，御史董敦逸即有章疏，遂坠计中。又云子瞻四六表章不成文字。其他如潞公、范忠宣、吕汲公、吴冲卿、傅献简诸公，皆不免讥议。予谓决非毅甫所作，盖魏泰《碧云》之流耳。温公自用庞颖公辟，不与潞公、子方同时，共谬妄不待攻也。靖之乃原甫曾孙，佳士也，而跋是书云：“孔氏兄弟曾大父行也，思其人欲闻其言久矣，故录而藏之。”汪圣锡亦书其后，但记上官彦衡一事，岂弗深考云。

【译文】 世上流传的孔毅甫（孔平仲）《野史》一卷，总共有四十条，我

在清江刘靖之那里得到这本书，记载赵清献（赵曠）任清城县令的时候，带着流散的乐妓回来，被县尉追回，大为悲痛而且生气，又因为和妻子忿而争吵，因此而产生了疑惑不满。文潞公（文彦博）任太原郡守，征召司马温公（司马光）任通判，文潞公夫人的生日，司马温公献上一首小词，被都漕曹子方（曹蹤）严厉责备。欧阳永叔（欧阳修）、谢希深（谢绛）、田元均（田况）、尹师鲁（尹洙）在河南，带着官妓到龙门游玩，半个月不回来。留守钱思公（钱惟演）写信招他回来，也不作答复。范文正（范仲淹）和京东人石曼卿（石延年）、刘潜等人互相结交以求取声名，在服丧期间上万言书，很不同意孔子“说话没有文采就不能到达远方”的道理。苏子瞻（苏轼）被命令写作《储祥宫记》，大太监陈衍管理宫中事务，奉旨摆酒和苏子瞻一起饮宴，苏暗中使人宣扬，御史董敦逸就有本章上奏以为不当，就掉进了苏子瞻的计谋里。又说苏子瞻的四六骈文表章文字不通。其他像文潞公、范忠宣（范纯仁）、吕汲公（吕大防）、吴冲卿（吴冲）、傅献简（傅尧俞）诸公，都免不了受到批评议论。我认为这部书决不是孔毅甫所撰写的，也是魏泰的《碧云騭》托名梅尧臣一类而已。司马温公自从被庞颖公（庞籍）征召，不和文潞公、唐子方同时，这种荒谬胡说是不要等人指责就可以明白的。刘清之是刘原甫（刘敞）的曾孙，是优秀的读书人，却在这部书后题上跋语说：“孔氏兄弟是我曾祖同辈，想会其人而要听到他的意见已经很久了，所以抄录而加以收藏。”汪圣锡（汪应辰）也在后边题上字，只记上官彦衡（上官均）一件事，难道没有仔细考核吗？

有若

【原文】 《史记·有若传》云：“孔子没，弟子以若状似孔子，立以为师。他日，进问曰：‘昔夫子当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问何以知之，夫子曰：《诗》不云乎？月离于毕，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毕乎，他日，月宿毕，竟不雨。商瞿年长无子，孔子曰瞿年四十后当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问何以知此？’有若无以应。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予谓此两事殆近于星历卜祝之学，何足以为圣人，而谓孔子言之乎？有若不能知，何所加损，而弟子遽以是斥退之乎？《孟子》称：“子夏、子张、子游，以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不可”，但言“江、汉秋阳不可尚”而已。未尝深诋也。《论语》记诸善言，以有子之言为第二章，在曾子之前；使有避坐之事，弟子肯如是哉？《檀弓》载有子闻曾子“丧欲速贫，死欲速朽”两语，以为“非君子之

言”，又以为“夫子有为言之”。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则其为门弟子所敬久矣。太史公之书，于是为失矣。且门人所传者道也，岂应以状貌之似而师之邪？世所图《七十二贤画像》，其画有若遂与孔子略等，此又可笑也。

【译文】 《史记》中的《有若传》说：“孔子亡故，弟子们因为有若相貌近似孔子，就立他为老师。后来，向他请问说：‘从前夫子要出行，让弟子拿着雨具，随即果然下雨。弟子问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夫子说：《诗》不是说过，月亮靠近毕宿，就会大雨滂沱了。昨天晚上月亮不是挨着毕宿吗？后来，月亮挨着毕宿，竟然没有下雨。商瞿年纪大了而没有儿子，孔子说商瞿四十岁以后会有五个男孩子，以后果然如此。请问夫子是怎么知道是这样的。’有若没有能回答。弟子们站起来说：‘有子躲开这里吧，这不是您的座位。’”我认为这两件事几乎近于占星占卜的学问，就凭这些哪里是足以是圣人，而非要说成是孔子的话呢？有若不能知道，有什么损害，而弟子们就一下子因为这原因把他赶走吗？孟子说过子夏、子张、子游因为有若相貌近似圣人，要想用事奉孔子的礼仪来事奉有若，曾子（曾参）不同意，只是说孔子如同曾经用江汉之水洗过、秋天的太阳晒过，洁白得无可比拟而已，并没有把有若骂得很厉害。《论语》记载各种有益的话，把有子的话作为第二章，在曾子之前；假如有离开座位的事情，弟子们肯这样编排吗？《礼记·檀弓》记载有子听到曾子说“罢了官要快点贫穷，死了以后要快点朽烂”两句，认为“不是君子的话，”又听说的确是孔子说的，认为“夫子是有所指而说的”。子游说：“有子的话非常像夫子的话啊！”那么他被门弟子尊敬已经很久了，太史公（司马迁）的著作，在这里是失误了。而且门人所传的是孔子之道，难道应该因为相貌的相似而以他为师吗？世上所画的七十二贤的画像，所画有若的画貌就和孔子大略相同，这又是可笑的事。

张天觉为人

【原文】 张天觉为人贤否，士大夫或不详知。方大观、政和间，时名甚著，多以忠直许之，盖其作相适承蔡京之后，京弄国为奸，天下共疾，小变其政，便足以致誉，饥者易为食，故蒙贤者之名，靖康初政，遂与司马公、范文正同被褒典。予以其实考之，彼直奸人之雄尔。其外孙何麒作家传云：“为熙宁御史，则逐于熙宁；为元璽廷臣，则逐于元璽；为绍圣谏官，则逐于绍圣；为崇宁大臣，则逐于崇宁；为大观宰相，则逐于政和。”其迹是矣，而实不然。为御史时，以断狱失当，为密院所治，遂摭博州事以报之，三枢密皆乞去，故坐贬。为谏

官时，首攻内侍陈衍以摇宣仁，至比之于吕、武；乞追夺司马公、吕申公赠谥，仆碑毁楼；论文潞公背负国恩，吕汲公动摇先烈；辩吕惠卿、蔡确无罪。后以交通颖昌富民盖渐故，又贬。元符末，除中书舍人，谢表历诋元璽诸贤，云：“当元璽之八九年，擢党人之二十辈。”及在相位，乃以郭天信交结而去耳。平生言行如此，而得美誉，则以蔡京不相能之故。然皆章子厚门下客，其始非不同也。京拜相之辞，天觉所作，是以得执政。

【译文】 张天觉为人如何，士大夫们中有些人并不详细了解。他在大观、政和年间名望非常之高，多人称赞他忠直。因为他作宰相刚好在蔡京之后，蔡京操纵国政干尽坏事，天下之人都痛恨，只要稍微变更他的施政措施，就足以获取名誉，就像饥饿的人不择饮食，所以得到了贤者的名声，靖康初年政治局面稍变，从而和司马光、范文正一起受到朝廷的褒扬封典。我根据他的实际情况来考察他，他只不过是奸险小人之特殊者罢了。

张天觉的外孙何麒在为他所写的家传说：“熙宁年间作御史，就在熙宁年间被驱逐；元螽年间作廷臣，就在元螽年间被驱逐；绍圣年间作谏官，就在绍圣年间被驱逐；崇宁年间作大臣，就在崇宁年间被驱逐；大观年间作宰相，就在政和年间被驱逐。”他为官的履历大致是这样。可是他所以失意的实际原因却不是同权奸抗争的缘故。作御史时，因为判断刑狱不当，被枢密院追查，于是就检取博州（今山东聊城）的另一件事来报复追查他的人，诬陷人家也断狱不当，结果三位枢密院的主管官员都去乞求皇上允许他们离任，所以他因此而被贬官。在作谏官时，首先攻击内侍陈衍，用以动摇宣仁皇太后的地位，甚至把她比成汉初的吕后和唐代的武则天；要求取消司马光、吕公著的封赠谥号，把他们墓前的碑楼捣毁；定文潞公的罪是背负国恩，定吕汲公的罪为动摇先烈的地位；替奸佞小人吕惠卿、蔡确申辩，称其无罪。后来因为勾结颖昌府（今河南许昌）富户盖渐诬陷执政，又被贬官。元符末年，任命为中书舍人，在答谢皇上的章表中一一诬蔑元螽年间的各位贤臣，说：“在元螽的八九年间，提拔了结党营私之徒二十余人。”等到他身居相位，竟然又是因为与郭天信勾结被罢黜。其人一生言行如此之卑劣，却得到了美好的名誉，就因为和蔡京闹矛盾的缘故。然而他们都是章子厚的门下客，其根本并非不同。蔡京答谢被任命为宰相的章表的文词，是天觉写的。因此得到蔡氏的引荐提拔才得以进入执政者的行列。

为文论事

【原文】 为文论事，当反复致志。救首救尾，则事词章著，览者可以立决。陈汤斩郅支而功未录，刘向上疏论之，首言：“周文叔、吉甫诛獫狁。”次言：“齐桓公有灭项之罪，君子以功覆过。李广利靡亿万之费，捐五万之师，仅获宛王之首，孝武不录其过，封为列侯。”末言：“常惠随欲击之乌孙，郑吉迎自来之日逐，皆裂土受爵。”然后极言：“今康居国强于大宛，郅支之号，重于宛王，杀使者罪甚于留马，而不烦汉士，不费斗粮，比于贰师，功德百之。”又曰：“言威武勤劳则大于方叔、吉甫，列功覆过则优于齐桓、贰师，近事之功则高于安远、长罗，而大功未著，小恶数布，臣窃痛之！”于是天子乃下诏议封。盖其一疏抑扬援证，明白如此，故以丞相匡衡、中书石显，出力沮害，竟不能夺。不然，衡、显之议，岂区区一故九卿所能亢哉？

【译文】 写文章论述事情，应当反反复复突出中心思想务必使首尾连贯，这样，就会使得事理明白，词气充沛，看的人马上就可以形成决定性的意见。陈汤斩杀匈奴的郅支骨都单于，可是功劳未被朝廷记录，刘向上奏章论述此事，开头说：“周代方叔、尹吉甫诛灭獫狁（匈奴的古称），功成名就。”其次说：“齐桓公有伐灭项国之罪，可是有道德的人根据他具有尊周的大功，也就一再掩饰他的过错。李广利耗费了亿万的费用，损失了五万军队，只获得了大宛国王的脑袋，孝武皇帝却不追究他的罪过，封他为列侯。”末了说：“常惠只是随着愿意打仗的乌孙兵进击匈奴，郑吉也只是迎来了自愿归附匈奴的日逐王，然而都被认为有功，封茅袭土，授于爵位，常惠为长罗侯，郑吉为安远侯。”然后极力进言：“现在康居国比大宛强大，郅支的名号，也比大宛国王的重要，郅支诛杀汉朝使臣的罪过也超过大宛的保留良马汗血马不来进贡，无论从哪方面说前者都是强敌。可是陈汤不用汉军一兵一卒，没有耗费升斗之粮，立此大功，要是和贰师将军李广利相比，功劳则为其百倍。”又说：“陈汤这功，要论威武勤劳，则比方叔、尹吉甫的大；要说陈述大功不计小过，则要比齐桓公、贰师将军的贡献大；要谈时间远近，同是近日立功，其功也要高于安远侯和长罗侯。可是，这么大的功，竟未见记录，然而小的过错，却屡次传播，我内心里实在为他感到痛惜。”于是，天子才下令要群臣议论该如何封赏。因为他的一封奏章，或抑或扬，多方取证，写得这样的明明白白，所以任凭丞相匡衡、中书令石显竭力阻止，终究没能破坏成功。不是这样的话，匡衡、石显的议论，哪里是小小的

一个至多做过九卿之一的刘向所能对抗的呢？

连昌宫词

【原文】 元微之、白乐天，在唐元和、长庆间齐名。其赋咏开宝时事，《连昌宫词》、《长恨歌》皆脍炙人口，使读之者情性荡摇，

如身生其时，亲见其事，殆未易以优劣论也。然《长恨歌》不过述明皇追悼贵妃始末，无他激扬，不若《连昌词》有监戒规讽之意，如云：“姚崇、宋璟作相公，劝谏上皇言语切。长官清贫太守好，拣选皆言由相至。开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渐渐由妃子。禄山宫里养作儿，虢国门前闹如市。弄权宰相不记名，依稀忆得杨与李。庙谟颠倒四海摇，五十年来作疮痍。”其末章及官军讨淮西，乞“庙谟休用兵”之语，盖元和十一、二年间所作，殊得风人之旨。非《长恨》比云。

【译文】 元微之（元稹）、白乐天（白居易），在唐元和、长庆年间名声相等。他们所写的天宝年间的事，《连昌宫词》、《长恨歌》都为人们所称道，能让读者的感情动荡，如同生在当时，亲自见到这件事，恐怕不容易评论谁优谁劣。然而《长恨歌》不过记述唐明皇回忆感伤杨贵妃的过程，没有其他的激越悠扬，不像连昌宫词有鉴戒规劝的意义，例如说：“姚崇宋 作相公，劝谏上皇言语切。长官清贫太守好，拣选皆言由相至。开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渐渐由妃子。禄山宫里养作儿，虢国门前闹如市。弄权宰相不记名，依稀记得杨与李。庙谟颠倒四海摇，五十年来作疮痍。”它的末章提到官军征讨淮西，请“朝廷决定罢兵”的话，这是在元和十一二年（816、817年）间所写作的，很有古代诗人讽谏的遗意，不是《长恨歌》所能比得上的。

二士共谈

【原文】 《维摩诘经》言，文殊从佛所将诣维摩丈室问疾，菩萨随之者以万亿计，曰：“二士共谈，必说妙法。”予观杜少陵寄李太白诗云：“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使二公真践此言，时得洒扫撰杖屦于其侧，所谓不二法门，不传之妙，启聪击蒙，出肤寸之泽以润千里者，可胜道哉！

【译文】 《维摩诘经》中说，文殊从佛所在的地方将要到维摩诘居士的方

丈室探病，跟随他的菩萨数以万亿计，大家说：“二位道德高深的人在一起谈话，肯定要谈论义理深奥的佛法。”我看到杜甫寄给李白的诗中说：“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假使二位大诗人真的实践了这句话，其时大家都充当仆役，或洒扫庭院，或撰杖捧履，即可听到他们所谈的为诗为文的不二法门、不能言传之秘密，启迪聪明，打破蒙昧，其得益当非浅鲜，就象云气出山弥漫千里、润泽天下一样，哪能说得尽呢？

张子韶祭文

【原文】 先公自岭外徙宜春，没于保昌，道出南安，时犹未闻桧相之死。张子韶先生来致祭，其文但云：“维某年月日具官某，谨以清酌之奠昭告于某官之灵，呜呼哀哉，伏惟尚飨！”其情旨哀怆乃过于词，前人未有此格也。

【译文】 先父从岭外迁官宜春，死在保昌，路过南安，当时臣没有听到秦桧丞相的死讯。张子韶（张九成）先生前来祭奠，祭文仅仅说：“某年某月某日，某某官某人，谨以清酒作为祭品敬告某某官的灵前，呜呼哀哉，敬请享用！”感情的悲哀凄怆，超过了文词的表达，以前人没有过这一体格。

京师老吏

【原文】 京师盛时，诸司老吏，类多识事体，习典故。翰苑有孔目吏，每学士制草出，必据案细读，疑误辄告。刘嗣明尝作《皇子剃胎发文》，用“克长克君”之语，吏持以请，嗣明曰：“此言堪为长堪为君，真善颂也。”吏拱手曰：“内中读文书不如是，最以语忌为嫌，既克长又克君，殆不可用也。”嗣明悚然亟易之。靖康岁都城受围，御敌器甲砒弊。或言太常寺有旧祭服数十，闲无所用，可以藉甲。少卿刘珣即具稿欲献于朝，以付书史。史作字楷而敏，平常无错误，珣将上马，立俟之，既至，而结衔脱两字。趣使更写，至于三，其误如初。珣怒责之，逡巡谢曰：“非敢误也，某小人窃妄有管见，在《礼》，‘祭服敝则焚之’。今国家迫急，诚不宜以常日论，然容台之职，唯当秉礼。少卿固体国，不若俟朝廷来索则纳之，贤于先自背礼而有献也。”珣愧叹而止，后每为人言，嘉赏其意。今之胥徒，虽公府右职，省寺掌故，但能鼓扇狎浮，顾赅谢为业，簿书期会之间，乃漫不之晓，求如彼二人，岂可得哉！

【译文】 原来京都全盛之时，中央机关各署办事的老吏，大多能够懂得事体，熟习典制和掌故。当时翰林院有个叫孔目的吏员，每当学士们代拟制书的草稿写出来，一定伏案仔细研究，有疑误之处就告诉起草人。刘嗣明曾作过一篇《皇子剃胎发文》，用了《诗经》中克长克君的话，孔目吏拿着稿子来请教此话怎讲，嗣明说：“这句话是说能做师长能做君王的意思，完全是好的颂辞。”孔目吏拱手致谢，说：“大内里面读文书不象这样，最厌恶语言忌讳，克睹同音，很可能被理解成既睹长又睹君，这句话不能用。”嗣明悚然恐惧，赶快换成了其他的话。靖康那一年都城被敌人包围，御敌器甲都破旧不堪。有人说太常寺存有旧的祭服数十套，听说没有什么用处了，可以用来衬垫铠甲。太常少卿刘珣就起草奏章想着把它们献给朝廷，把奏章的草稿交给掌管文书的吏员抄写。那位吏员写字工笔楷书。速度又快，平常未曾出错，刘珣就要上马，站着等奏章，送来之后一看，却在签署官衔的地方掉了两个字。催促他赶快重写，一直写了三回，其错如故。刘珣发了脾气斥责他，书吏迟疑不决地谢罪道：“本来不敢写错，但因小人我心里有点不踏实的感觉，根据《礼记》记载，‘祭服坏了就把它烧掉’。现在国家处于危急之中，实在不应该以平常时候的老规矩办事，可是礼部官员的职分所关，应当按礼制行事。少卿这样做固然是体谅国家的困难，不如等朝廷来索要再交上去，那样要比自己首先违背礼制去进献的要好。”刘珣感到惭愧，慨叹再三，中止了这件事，后来经常同人谈起，嘉许赞赏那位书吏的一片苦心。现在的办事人员，即便是在公卿府中担任高级职位的吏员，了解中央各部机关的掌故，也只能是用来扇动虚浮不实的风气，追求收受钱财谢礼，以之为业；至于处理文书、办理公务，竟然全然不懂，再找像上述那样两位，能够找得到吗！

曹操 唐庄宗

【原文】 曹操在兖州，引兵东击陶谦于徐，而陈宫潜迎吕布为兖牧，郡县皆叛，赖程昱、荀彧之力，全东阿、鄄、范三城以待操。操还，执昱手曰：“微子之力，吾无所归矣。”表为东平相。唐庄宗与梁人相持于河上，梁将王檀乘虚袭晋阳。城中无备，几陷者数四，赖安金全帅子弟击却之于内，石君立引昭义兵破之于外，晋阳获全。而庄宗以策非己出，金全等赏皆不行。操终有天下，庄宗虽能灭梁，旋踵覆亡，考其行事，概可睹矣。

【译文】 曹操在兖州，领兵在东边徐州攻击陶谦，而陈宫就暗地迎接吕布

为兖州牧，兖州的郡县都叛变了，靠着程昱、荀彧的力量，保全了东阿、鄄、范三个城池以等待曹操。曹操回来，握着程昱的手说：“如果没有您的力量，我就没有地方可以回来了。”上表保荐程昱为东平相。后唐庄宗和后梁人在黄河边上作战相持不下，后梁将领王檀乘虚偷袭晋阳，城中没有防备，好几次都几乎陷落，靠着安金全率领子弟把敌军在城内击退，石君立率领昭义兵把敌军在城外击破，晋阳才得以保全。而庄宗因为破敌之策不是自己的主意，都不给安金全等封赏。曹操最终得了天下，庄宗虽然能灭亡梁国，但一转身也就覆灭，考查他们的行为事迹，也可以看到一个大概了。

云中守魏尚

【原文】 《史记》、《汉书》所记冯唐救魏尚事，其始云：“魏尚为云中守，与匈奴战，上功幕府，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其赏不行。臣以为陛下赏太轻、罚太重。”而又申言之云：“且云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虏差六级，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罚作之。”重言云中守及姓名，而文势益遒健有力，今人无此笔也。

【译文】 《史记》和《汉书》所记载的冯唐救魏尚的事，冯唐在开始说：“魏尚作云中郡（今内蒙古托克托）郡守，和匈奴打仗，向幕府呈报战功，有一句话说错了，执政官吏根据法律条文处分他，对他的奖赏未得施行。臣认为陛下奖赏太轻、处罚太重。”并且又申述这件事，说：“云中郡守魏尚，犯了呈报战功时斩首俘虏的人数中差了六个人的首级，陛下就把他交由法吏审理，取削了他的官爵，罚他去做苦工。”这里两次说到云中郡守及其姓名，文章气势显得更加遒劲有力，现代的人没有这样的笔力。

卷十六

文章小伎

【原文】 “文章一小伎，于道未为尊。”虽杜子美有激而云，然要为失言，不可以训。文章岂小事哉！《易·贲》之彖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称帝尧焕乎有文章。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诗》美卫武公，亦云有文章。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圣贤，桀、纣、幽、厉之昏乱，非诗》、《书》以文章载之，何以传？伏羲画八卦，文王重之，非孔子以文章翼之，何以传？孔子至言要道，托《孝经》、《论语》之文而传。曾子、子思、孟子传圣人心学，使无《中庸》及七篇之书，后人何所窥门户？老、庄绝灭礼学，忘言去为，而五千言与《内》、《外篇》极其文藻。释氏之为禅者，谓语言为累，不知大乘诸经可废乎？然则诋为小伎，其理谬矣！彼后世为词章者，逐末而忘其本，玩其华而落其实，流宕自远，非文章过也。杜老所云“文章千古事”，“已似爱文章”，“文章日自负”，“文章实致身”，“文章开砭奥”，“文章憎命达”，“名岂文章著”，“枚乘文章老”，“文章敢自诬”，“海内文章伯”，“文章曹植波澜阔”，“庾信文章老更成”，“岂有文章惊海内”，“每语见许文章伯”，“文章有神交有道”，如此之类，多指诗而言，所见狭矣！

【译文】 “文章一小伎，于道未为尊。”这两句诗虽然是杜甫（字子美）有所感而发，但是应该算是失言，不足为训。文章难道是小事吗？《易·贲》的《彖》辞中说：“刚柔互相交错，形成天文，以文明之道立身处事，形成人文。观察天上日月星辰的运行，用以体察一年四季的时令变化；观察人间诗书礼乐之类的典章制度，以此来教化天下。”孔子称赞帝尧的文物制度光明灿烂。子贡说：“老师的文章，可以领悟。”《诗经》中赞美卫武公，也称其有文章。帝尧、帝舜、大禹、成汤、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圣贤，夏桀、商纣、幽王、厉王的昏乱，不是《诗经》《尚书》用文章记载，怎么能传于后世？伏羲画八卦，文王推衍重叠，不是孔子用文章加以解释辅导，怎么能传于后世？孔子的至理明言和重要的大道，依托于《孝经》、《论语》的文章而传下来。曾子、子思、孟子传

授圣人修心养性的学问，假如没有《中庸》和七篇《孟子》，后人从哪里能窥见学问的入门之处？老子、庄子绝灭礼教学问，要忘掉言语无所作为，但《老子》五千言和《庄子》内外篇却极尽了文采藻饰。佛家学习禅宗的，认为语言是多余的，不知道大乘佛教的各种经典能够废弃吗？那么抵毁它是雕虫小伎，这道理就是错误的了。后世那些做文章的人，追逐它的细枝末节而忘了根本，赏玩它和花朵而丢了果实，流浪放荡自己远离大道，并不是文章的过错，杜老（杜甫）所说：“文章千古事（文章是千古以来的大事），”“已似爱文章（已经像酷爱文章）”，“文章日自负（文章一天天自负）”，“文章实致身（文章是献身出仕之本）”，“文章开阡奥（文章开启了深微奥妙）”，“文章憎命达（文章憎恨命运通达）”，“名岂文章著（声名难道是由文章而显扬）”，“枚乘文章老（枚乘的文章老练成熟）”，“文章敢自诬（对于文章岂敢自己加以贬低）”，“海内文章伯（海内的文章领袖）”，“文章曹植波澜阔（文章像曹植那样波澜壮阔）”，“庾信文章老更成（庾信的文章年老而更加成熟完美）”，“岂有文章惊海内（难道有文章使海内感到震怪）”，“每语见许文章伯（常常承蒙赞许为文章领袖）”，“文章有神交有道（文章如有神助交游符合道德）”，如此之类，大多是指诗说的，所见到的也不免偏狭了！

三长月

【原文】 释氏以正、五、九月为“三长月”，故奉佛旨皆茹素。其说云：“天帝释以大宝镜，轮照四天下；寅、午、戌月，正临南瞻部州，故当食素以徼福。官司谓之“断月”，故受驿券有所谓羊肉者，则不支。俗谓之“恶月”，士大夫赴官者，辄避之。或人以谓唐日藩镇暂事，必大享军，屠杀羊豕至多，故不欲以其月上事，今之他官，不当尔也。然此说亦无所经见。予读《晋书·礼志》，穆帝纳后，欲用九月，九月是“忌月”。《北齐书》云高洋谋篡魏，其臣宋景业言：“宜以仲夏受禅。”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终于其位。”景业曰：“王为天子，无复下期，岂得不终于其位乎？”乃知此忌相承，由来已久，竟不能晓其义及出何经典也。

【译文】 佛家称正月、五月、九月为“三长月”，所以信奉佛教的人在这三月都吃素。他们的说法是：上帝和释迦牟尼用大宝镜，轮流照耀天下四方，月建为寅、午、戌的三个月，正照到我们所在的南瞻部州，所以应当以吃素求福。官僚衙门称这三个月为“断月”，所以驿站接受驿券中的领羊肉之券，就不再支

付。世俗称这三个月为“恶月”，士大夫为官赴任，总是避开这三个月。有人认为是唐时藩镇到官视事，一定要大肆犒赏军队，屠杀的羊、猪非常之多，所以不愿在这三个月上任，现在上任做其他的官，不应当如此。然而，这一说法的由来，也无从查考。我读《晋书·礼志》时，见到其中说穆帝娶皇后，想用九月，可九月是“忌月”。《北宋书》称高洋密谋篡夺东魏政权，他的大臣宋景业说：“应该在仲夏五月接受禅让。”有人说：“五月不能到官上任，谁要违犯了，就会老死于那个官位。”宋景业说：“大王做了天子，不再有更大的期望，哪能不终于其位呢？”从而知道这种忌讳世代相承，由来已久，可始终不能理解它的意义及出自何种经典。

兄弟直西垣

【原文】 《秦少游集》中，有《与鲜于子骏书》云：“今中书舍人皆以伯仲继直西垣，前世以来未有其事，诚国家之美，非特衣冠之盛也。除书始下，中外欣然，举酒相属。”予以其时考之，盖元璽二年，谓苏子由，曾子开、刘贡甫也。子由之兄子瞻，子开之兄子固、子宣，贡甫之兄原甫，皆经是职，故少游有此语云。绍兴二十九年，予仲兄始入西省，至隆兴二年，伯兄继之，乾道三年，予又继之，相距首尾九岁。予作谢表云：“父子相承，四上銮坡之直；弟兄在望，三陪凤阁之游。”比之前贤，实为遭际，固为门户荣事，然亦以此自愧也。

【译文】 秦少游（秦观）的集子中，有《与鲜于子骏（鲜于曄）书》说：“现在中书舍人都是以兄弟相继进入中书省值班，前代以来没有这样的事，这确实是国家的美谈，不但是士大夫的盛事。任命书刚刚下达，京城内外一片欣然，一杯接一杯地喝酒庆贺。”我从时间上来考查，这是在元暉二年（1087年），说的是苏子由（苏辙）、曾子开（曾肇）、刘贡甫（刘晔）。苏子由的兄长子瞻（苏轼），曾子开的兄长子固（曾巩）、子宣（曾肇），刘贡甫的兄长原甫（刘敞），都曾经担任过这一职务，所以秦少游才有这样的话。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我的二哥开始进入中书省，到隆兴二年（1164年），大哥接着进入，乾道三年（1167年），我又接着进入，头尾相距九年，我写作谢恩表说：“父子相继，四次入值翰林学士院；弟兄相望，三人追陪中书省诸公之后。”比起前辈贤人，实在是蒙受恩宠，这固然是家门的光荣，然而也以此感到惭愧。

续树萱录

【原文】 顷在秘阁抄书，得《续树萱录》一卷，其中载隐君子元撰夜见吴王夫差，与唐诸诗人吟咏事。李翰林诗曰：“芙蓉露浓红压枝，幽禽感秋花畔啼。玉人一去未回马，梁间燕子三见归。”张司业曰：“绿头鸭儿哢萍藻，采莲女郎笑花老。”杜舍人曰：“鼓鼙夜战北窗风，霜叶沿阶贴刮红。”三人皆全篇。杜工部曰：“紫领宽袍漉酒巾，江头萧散作闲人。”白少傅曰：“不因霜叶辞林去，的当山翁未觉秋。”李贺曰：“鱼鳞珠空排嫩碧，露桂梢寒挂团壁。”三人皆未终篇。细味其体格语句，往往逼真。后阅《秦少游集》，有《秋兴》九首，皆拟唐人，前所载咸在焉。关子东为秦集予云“拟古数篇，曲尽唐人之体”，正谓是也。何子楚云：“《续萱录》乃王性之所作，而托名他人。”今其书才有三事，其一曰贾博喻，一曰全若虚，一曰元撰，详命名之义，盖取诸子虚、亡是公云。

【译文】 不久前在秘阁抄书，得《续树萱录》一卷，其中记载隐士元撰夜间见到吴王夫差，和唐时诸诗人一起吟咏的事情。翰林学士李白在诗中写道：“芙蓉露浓红压枝，幽禽感秋花畔啼，玉人一去未回马，梁间燕子三见归。”曾任国子监司业的张籍在所撰诗中写道：“绿头鸭儿哢萍藻，采莲女郎笑花老。”舍人杜牧诗曰：“鼓牵夜战北窗风，霜叶沿阶贴乱红。”三人的诗在书中皆为全篇。工部员外郎杜甫诗曰：“紫领宽袍漉酒巾，江头萧散作闲人。”太子少傅白居易诗曰：“不因霜叶辞林去，的当山翁未觉秋。”李贺诗曰：“鱼鳞暄空排嫩碧，露桂梢寒挂团壁。”三个人的诗都未写完。仔细玩味其风格语句，每每感到逼真。后来读《秦少游集》，有《秋兴》九首，都是模拟唐人之作，前面所记载的都在里面。关子东在给秦少游诗集写的序言中说：“拟古的几篇，婉转细致地表现出唐人诗的体态。”说的就是这些诗。何子楚说：“《续萱录》为王性之所撰，可是托名为他人。”现在这部书中托名有三个，一个叫贾博喻，一个叫全若虚，一个叫元撰，详考其命名的意义，大概是从子虚，亡是公变化而来。

馆职名存

【原文】 国朝馆阁之选，皆天下英俊，然必试而后命。一经此职，遂为名流。其高者，曰集贤殿修撰、史馆修撰、直龙图阁、直昭文馆、史馆、集贤院、

秘阁。次曰集贤、秘阁校理。官卑者，曰馆阁校勘、史馆检讨，均谓之馆职。记注官缺，必于此取之，非经修注，未有直除知制诰者。官至员外郎则任子，中外皆称为学士。及元丰官制行，凡带职者，皆迁一官而罢之，而置秘书省官，大抵与职事官等，反为留滞。政和以后，增修撰直阁贴职为九等，于是材能治办之吏、贵游乳臭之子，车载斗量，其名益轻。南渡以来，初除校书正字，往往召试，虽曰馆职不轻畀，然其迁叙，反不若寺监之径捷。至推排为郎，即失其故步，混然无别矣。

【译文】 我朝馆阁官职的人选，都是天下的贤良之才，然而必须经过国家正式考试，中试之后才任命。凡是担任过这种官职的，就成为社会的名流。官位高的，称集贤殿修撰、史馆修撰、直龙图阁、直昭文馆、直史馆、直集贤院、直秘阁；次一等的，称集贤院或秘阁校理；官位低的，称馆阁校勘、史馆检讨，这些，都被称为馆职。修起居注的官员出现空缺，肯定从馆职官员里挑选递补，不经过记注官的阶段，没有直接任命为知制诰的。官阶为员外郎的就可以保举子弟一人为官，朝廷内外都称其为学士。等到元丰年间新官制颁行，凡是兼任其他职事官的，都官升一级但不再担任馆职，可是设置秘书省的官员，阶官却大抵与职事官相等，反而不易升迁。政和之后，增加修撰、直阁的贴职，形成九个等级，贴职是种加恩兼职，并不担任馆阁职务，于是乎有治国理民才能的官吏、乳臭未干的贵族子弟都染指于此，车载斗量，馆职的名声更加低微。自从我朝南渡以后，开始任命为校书、正字之官的时候，往往召集起来进行考试，虽说是馆职不能轻易予人，但是他们按序升迁，反而没有其他寺、监部门升得快。至于被排挤去作郎官的，则失去了原来的地位，和其他官员混同而无别了。

南宫适

【原文】 南宫适问羿、殛不得其死，禹、稷有天下，言力可贱而德可贵。其义已尽，无所可答，故夫子俟其出而叹其为君子，奖其尚德，至于再言之，圣人之意斯可见矣。然明道先生云：“以禹、稷比孔子，故不答。”范淳父以为禹、稷有天下，故夫子不敢答，弗敢当也。杨龟山云：“禹、稷之有天下，不止于躬稼而已，孔子未尽然其言，故不答。然而不正之者，不责备于其言，以沮其尚德之志也，与所谓‘雍之言然’则异矣。”予窃谓南宫之问，初无以禹、稷比孔子之意，不知二先生何为有是言？若龟山之语，浅之已甚！独谢显道云：“南宫适知以躬行为是，是以谓之君子。知言之要，非尚德者不能，在当时发问间，必

有目击而道存，首肯之意，非直不答也。”其说最为切当。

【译文】 南宫适询问羿和夏不得好死，大禹、后稷得天下，说明勇力低贱而德行可贵。这个问题的意义已经说完了，没有什么可以答复，所以孔子等他出去以后而赞叹他是君子，表扬他的崇尚德行，竟至于两次说这话，圣人的意思在这里就可以见到了。然而明道先生（程颢）说：“把大禹、后稷来比孔子，所以不答复。”范淳父（范祖禹）以为大禹、后稷得天下，所以孔子不敢答、不敢当。杨龟山（杨时）说：“大禹、后稷的得天下，不止于亲自从事耕作而已，孔子并没有完全同意他的意见，所以不回答。然而不去纠正他，是因为对他的话不作求全责备，而阻止他崇尚德行的志愿，和所谓‘雍的话是对的’就有所不同了。我私下以为南宫适的提问，本来就没有把大禹、后稷和孔子相比较的意思，不知道两位先生为什么有这样的话。像杨龟山的话，就非常粗浅了。惟独谢显道说：“南宫适知道以亲自实践，所以称他为君子。懂得说话的要领，不是崇尚德行的人做不到。在当时发问之时，孔子必定有看到南宫适深切大道而点头赞赏的意思，不是不回答。”他的说法最为切合恰当。

吴王殿

【原文】 汉高祖五年，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吴芮为长沙王。十二年，以三郡封吴王濞，而豫章亦在其中。又赵佗先有南海，后击桂林、象郡。则芮所有，但长沙一郡耳。按芮本为秦番阳令，故曰番君。项羽已封为衡山王，都邾。邾，今之黄州也。复侵夺其地。故高祖徙之长沙而都临湘，一年薨，则其去番也久矣。今吾邦犹指郡正厅为吴王殿，以谓芮为王时所居。牛僧孺《玄怪录》载，唐元和中，饶州刺史齐推女，因止州宅诞育，为神人杀死，后有仙官治其事，云：“是西汉鄱阳王吴芮，今刺史宅，是芮昔时所居。”皆非也。

【译文】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的时候，用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数郡之地册立番君吴芮作长沙王。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将包括豫章在内的其中三郡册封给了吴王刘濞。又加上赵佗原先拥有南海，后来又攻占了桂林、象郡。于是，吴芮所占据之地，就仅仅长沙一郡。据查吴芮本来是秦时番阳县县令，所以称番君。项羽已经把他封为衡山王，建都于邾。邾，就是现在的黄州（今湖北黄冈）。后来又侵占夺取了他的土地。所以汉高祖把他迁移到长沙做了长沙王，建都临湘（今湖南长沙市），一年就死了。可见他离开番阳

已经很久了。然而，现在我家乡的人还指认郡府官署的正厅为吴王殿，说它是吴芮为王时所居住的地方。牛僧孺《玄怪录》记载：唐代元和年间，饶州刺史齐推的女儿，因为宿止在州府官宅里生小孩，被神人击死，后来有道士办理这件事，说：“这是西汉鄱阳王吴芮为祟。现在的刺史官宅，是吴芮过去的居住地。”这些说法，都不符合实际。

王卫尉

【原文】 汉高祖怒萧何，谓王卫尉曰：“李斯相秦皇帝，有善归主，有恶自予，今相国请吾苑以自媚于民，故系治之。”卫尉曰：“秦以不闻其过亡天下，李斯之分过，又何足法哉！”唐太宗疑三品以上轻魏王，责之曰：“我见隋家诸王，一品以下皆不免其蹶顿，我自不许儿子纵横耳。”魏郑公曰：“隋高祖不知礼义，宠纵诸子，使行非礼，寻皆罪黜，不可以为法，亦何足道！”观高祖、太宗一时失言，二臣能用其所言随即规正，语意既直，于激切中有婉顺体，可谓得谏争之大义。虽微二帝，其孰不降心以听乎！

【译文】 汉高祖刘邦对相国萧何感到很恼火，于是对王卫尉说：“李斯辅佐秦朝皇帝，有了好事归国君，有了坏事自己承担，现在相国萧何竟然请求开垦我的上林苑荒地以便自己讨好老百姓，所以我将他收审治罪。”王卫尉说：“秦朝皇帝因为听不到自己的过失而丢了天下，李斯分担失误责任又有什么用处呢？这种作法哪值得后人学习吗？”唐太宗李世民怀疑三品以上官员轻视自己的儿子魏王李泰，便责备他们说：“在隋朝，我看见一品以下官员见到诸王时无不毕恭毕敬地行礼，我当然是不会允许皇子们随心所欲，胡作非为的。”郑公（魏征）闻听，说道：“隋高祖（文帝）不知礼义，过分地宠爱、放纵自己的儿子，使他们多行非礼，不久诸王就都因罪被罢免，这种作法值得学习，也值得一提呢？”汉高祖和唐太宗一时失言，王卫尉和魏郑公二臣听到后随即规正，直接了当，但激切又不失婉转、恭敬，可谓深得谏争之大义。即使不是汉高祖和唐太宗这两位具有雄才大略的明君，其他人谁能不虚心听取、诚恳接受呢？

前代为监

【原文】 人臣引古规戒，当近取前代，则事势相接，言之者有证，听之者

足以监。《诗》曰：“殷监不远，在夏后之世。”《周书》曰：“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监！”又曰：“我不可不监于有殷。”又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周公作《无逸》，称商三宗。汉祖命群臣言吾所以有天下，项氏所以失天下，命陆贾著秦所以失天下。张释之为文帝言秦、汉之间事，秦所以失，汉所以兴。贾山借秦为喻。贾谊请人主引商、周、秦事而观之。魏郑公上书于太宗云：“方隋之未乱，自谓必无乱；方隋之未亡，自谓必无亡。臣愿当今动静以隋为监。”马周云：“炀帝笑齐、魏之失国，今之视炀帝，亦犹炀帝之视齐、魏也。”张玄素谏太宗治洛阳宫曰：“乾阳毕功，隋人解体，恐陛下之过，甚于炀帝。若此役不息，同归于乱耳！”考《诗》、《书》所载及汉、唐诸名臣之论，有国者之龟镜也，议论之臣，宜以为法。

【译文】 臣子引用古代的事作为规劝告戒，应当就近引用前一代的事，这就情况相接近，说话的人有证据，听话的人足以鉴戒。《诗经》说：“商代的鉴戒不远，在夏后氏的时代。”《尚书》中的《周书》说：“现在商代丧失了天命，我岂可不把它作为大的鉴戒！”又说：“我不能不有鉴于商代的教训。”又说：“商人接受天命，已经有很多年了，惟其不能敬奉他的德行，于是就丧失了天命。”周公作《天逸》，称赞商代的中宗、高宗、祖甲三代。汉高祖命令群臣都发表意见，说我为什么能得到天下，项羽为什么失去天下，命令陆贾写出秦朝为什么失去天下的文章。张释之为汉文帝讲说秦汉之间的事情，秦为什么灭亡，汉为什么兴起。贾山借着秦国作为比喻对汉文帝说明治乱之道。魏郑公（魏征）给唐太宗上书说：“当隋朝还没有动乱的时候，自以为必然没有动乱；当隋朝还没有灭亡的时候，自以为必然不会灭亡。臣希望皇上对一切迹象要把隋朝作为鉴戒。马周说：“隋炀帝嘲笑北齐、西魏把国家丢掉，今天看待炀帝，也如同炀帝看待北齐、西魏一样。”张玄素劝谏唐太宗修建洛阳宫说：“乾阳宫造完，隋朝就四分五裂，恐怕陛下的过失超过隋炀帝。如果这一工程不停止，只能一起归于动乱！”查考《诗经》、《尚书》所记载以及汉、唐诸位名臣的议论，这是统治国家者的占卜吉凶的龟甲和区别美恶的镜子，职责在议论朝政的臣子，应当以此为法。

治盗法不同

【原文】 唐崔安潜为西川节度使，到官不诘盗。曰：“盗非所由通容，则不能为。”乃出库钱置三市，置榜其上，曰：“告捕一盗，赏钱五百缗。倡者告

捕，释其罪，赏同平人。”未几，有捕盗而至者。盗不服，曰：“汝与我同为盗十七年，赃皆平分，汝安能捕我？”安潜曰：“汝既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来？则彼应死，汝受赏矣。汝既为所先，死复何辞？”立命给捕者钱，使盗视之，然后杀盗于市。于是诸盗与其侣互相疑，无地容足，夜不及旦，散逃出境，境内遂无一人为盗。予每读此事，以为策之上者。及得李公择治齐州事，则又不然。齐素多盗，公择痛治之，殊不止。他日得黠盗，察其可用，刺为兵，使直事铃下。间问以盗发辄得而不衰止之故。曰：“此由富家为之囊。使盗自相推为甲乙，官吏巡捕及门，擒一人以首，则免矣。”公择曰：“吾得之矣。”乃令凡得藏盗之家，皆发屋破柱，盗贼遂清。予乃知治世间事，不可泥纸上陈迹。如安潜之法可谓善矣，而齐盗反恃此以为沈命之计，则变而通之，可不存乎其人哉！

【译文】唐朝的崔安潜被委任为西川节度使，到任后并不先去整治社会上的盗贼，他说：“如果没有所经之处人们的通容，盗贼就无法达到目的。”于是，他从公家仓库里拨出巨款放到三个市场上，并且张贴告示宣布：“告发和捕捉到一名盗贼，赏钱五百缗（一千文一缗）。如果同伙告捕，则免其罪，赏钱与一般人相同。”不久，有人送来了一盗贼。盗贼很不服气地向捉他的人嚷道：“你和我一同为盗十七年，赃物都平分，你怎么能捉我呢？”崔安潜说：“你既然知道已经出了告示，为什么不将他捉来？如果你把他捉了来，那么他应当被处死，而你则要受到奖赏。现在你既然已经被人家告发了，你就应当处死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随即下令付给捕盗者赏钱，让盗贼亲眼看见，然后将这个盗贼在街市上处死。于是，盗贼们与其同伙相互猜疑，无地容足，竟在一夜之间纷纷散逃出境，从此境内再无一人盗。我每读此事，总认为崔安潜的作法的确是治盗的上策。

后来，当我读了李公择治理齐州（今山东济南）的事迹，才知道还有更高明的办法。齐地一向多盗贼，李公择严加治理，但是禁不止。有一次，一名狡猾的惯犯落网，李公择发现他可以利用，便在他脸上刺字编入军队，分在自己帐下听差。得便时，李公择询问齐州盗贼大量被捕却屡禁不止的原因，那名原先的盗贼回答说：“这是由于富裕之家为他们作掩护的缘故。假如使盗贼自相推为甲乙，而官吏巡捕上门搜查，捉住一个窝藏犯予以重惩，借此杀一儆百，这样不久之后，就可以没有盗贼之患了。”李公择说：“我有办法了！”于是，便下令凡是窝藏盗贼的人家被发现后，一律拆房破柱。没过多久，盗贼就绝迹了。

我从上述两件事中认识到，世上的事情，不可拘泥于书本上的记载。像崔安潜的办法可谓高明了，但齐地的盗贼反而借此作为保命之计，可见根据具体情况有所变通，关键还在于事在人为。

和诗当和意

【原文】 古人酬和诗，必答其来意，非若今人为次韵所局也。以《文选》所编何劭、张华、卢谌、刘琨、二陆、三谢诸人赠答，可知已。唐人尤多，不可具载。姑取杜集数篇，略纪于此。高适寄杜公云：“愧尔东西南北人。”杜则云：“东西南北更堪论。”高又有诗云：“草《玄》今已毕，此外更何言？”杜则云：“草《玄》吾岂敢，赋或似相如。”严武寄杜云：“兴发会能驰骏马，终须重到使君滩。”杜则云：“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无径欲教锄。”杜公寄严诗云：“何路出巴山”，“重岩细菊斑，遥知簇鞍马，回首白云间。”严答云：“卧向巴山落月时”，“篱外黄花菊对谁，马望君非一度。”杜送韦迢云：“洞庭无过雁，书疏莫相忘。”迢云：“相忆无南雁，何时有关章？”杜又云：“虽无南去雁，看取北来鱼。”郭受寄杜云：“春兴不知凡几首？”杜答云：“药裹关心诗总废。”皆如钟磬在虞，叩之则应，往来反复，于是乎有余味矣。

【译文】 古人酬答唱和的诗，必定要回答对方原作的用意，不是像今天做这一类诗被按照原韵所局限的。看到《文选》中所编入的何劭、张华、卢谌、刘琨、二陆（陆机、陆云）、三谢（谢灵运、谢惠连、谢 ）、等人的赠答诗就可以知道了。唐朝人尤其多，不能一一列举，姑且取杜集中的几篇，大致记载在这里。高适寄杜公（杜甫）说：“愧尔东西南北人（愧对你四处漂泊之人）。”杜诗就说：“东西南北更堪论（哪里还能谈得上四处漂泊）。”高适又有诗说：“草《玄》今已毕，此外更何言（写作《太玄经》现在已经完毕，此外还有什么可说）！”杜诗就说：“草《玄》吾岂敢，赋或似相如（我哪敢写作《太玄经》，不过作赋也许近似于司马相如）。”严武寄杜公说：“兴发会能驰骏马，终须重到使君滩（兴致上来应当能驱驰骏马，终久会重到使君滩）。”杜诗就说：“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无径欲教锄（空自置身于您的旌旗之下而离开城中府第，长满了荒草没有路径须要芟锄）。”杜公寄严武的诗说：“何路出巴山（从哪条路出巴山）”，“重岩细菊斑。遥知簇鞍马，回首白云间（重重的山岩上野菊花斑斑点点。远远地知道侍从簇拥着鞍马，回首眺望已置身于高山白云之间）。”严武答诗说：“卧向巴山月落时（睡下已在巴山月落的时候）”，“篱外黄在菊对谁（篱下的黄菊花想来已经开放，您对着谁同饮），睨马望君非一度（停下马来远远望您不止一次）”。杜公送韦迢的诗说：“洞庭无过雁，书疏莫相忘（洞庭没有飞过的传书大雁，但书信往来可不能忘记）。”韦迢的诗说：“相忆无南雁，何时有关章（互

相思念但没有南来传书大雁，什么时候能得到你的回信)？”杜公又说：“虽无南去雁，看取北来鱼（虽然没有往南的传书大雁，等待着北来的鱼书）。”郭受寄给杜公说：“春兴不知凡几首（受到春天的启发感染不知总共写了多少首诗）”。杜公回答说：“药裹关心诗总废（关心的是吃药，做诗也就荒废了）。”都像钟磬悬在架子上，叩打它就发出声音，往来反复，在这中间才有不尽的味道呢。

稷有天下

【原文】 “稷躬稼而有天下”、“泰伯三以天下让”、“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皆以子孙之事追言之。是时，稷始封于郃，古公方邑于梁山之下，文王才有岐周之地，未得云天下也。禹未尝躬稼，因稷而称之。

【译文】 “周族的祖先后稷亲自耕作因而拥有天下”，“周太王的长子泰伯多次辞让天下”，“周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古书中的这些说法都是以子孙之事推想追述的。当时，后稷刚被封于郃（今陕西武功县），古公昧父（即太王）刚刚在梁山下修筑城邑，周文王刚刚据有岐周（今陕西岐山县）之地，还远远谈不上天下。夏禹不曾亲自耕作，是由于后稷而称赞他。

一世人材

【原文】 一世人材，自可给一世之用。苟有以致之，无问其取士之门如何也。今之议者，多以科举经义、诗赋为言，以为诗赋浮华无根柢，不能致实学，故其说常右经而左赋。是不然。成周之时，下及列国，皆官人以世，周之刘、单、召、甘，晋之韩、赵、荀、魏，齐之高、国、陈、鲍，卫之孙、宁、孔、石，宋之华、向、皇、乐，郑之罕、驷、国、游，鲁之季、孟、藏、展，楚之斗、矧、申、屈，皆世不乏贤，与国终毕。汉以经术及察举，魏、晋以州乡中正，东晋、宋、齐以门第，唐及本朝以进士，而参之以任子，皆足以尽一时之才。则所谓科目，特借以为梯阶耳！经义、诗赋，不问可也。

【译文】 一代的人才，自可以供一代使用。如果有办法得到人才，不必问他取士的方法是什么样的。今天议论的人，大多根据科举中的经义、诗赋来做议论的题目，认为诗赋浮华没有坚实的基础，不能招致有真实学问的人，所以他们的议论常常重经而轻赋。这不是这样。周朝时代，往下到列国时代，都是

世代为官。周朝的刘氏、单氏、召氏、甘氏，晋国的韩氏、赵氏、荀氏、魏氏，齐国的高氏、国氏、陈氏、鲍氏，卫国的孙氏、宁氏、孔氏、石氏，宋国的华氏、向氏、皇氏、乐氏，郑国的罕氏、驷氏、国氏、游氏，鲁国的季氏、孟氏、臧氏、展氏，楚国的氏、鬬氏、瞿氏、申氏、屈氏，都代代不乏贤人，和国家一起告终。汉朝用经学和察举取士，魏、晋用州、乡中正取士，东晋、宋、齐凭门第高下取士，唐朝和本朝用进士而参用保举官员的儿子为官，都是以竭尽一个时代有才能的人。这样，所谓科举，不过是借此以为阶梯而已。经义还是诗赋，可以不必过问。

由此可见，所谓的取士科目，只不过是用来作为阶梯而已！至于说是以经义为主，还是诗赋为主取士，可以不必过多地去追究。

王逢原

【原文】 王逢原以学术，邢居实以文采，有盛名于嘉璽、元丰间。然所为诗文，多怨抑沈愤，哀伤涕泣，若辛苦憔悴不得其平者，故皆不克寿，逢原年二十八，居实才二十。天畀其才而啬其寿，吁，可惜哉！

【译文】 王逢原以学问、邢居实以文采，在宋仁宗嘉璽、神宗元丰年间享有盛名。然而，他们所作的诗文，多怨抑沉闷、哀伤含愤，好像是辛苦憔悴却没有得到公正待遇，因而心神不宁，牢骚满腹，结果这两个人都未得长寿，王逢原活了二十八岁，邢居实只活了二十岁。老天赐给他们非凡的才能却舍不得给他们寿命，多么令人痛惜啊！

吏文可笑

【原文】 吏文行移，只用定本，故有绝可笑者。如文官批书印纸，虽宫、观、岳、庙，亦必云不曾请假；或已登科级，见官台省清要，必云不曾应举若试刑法。予在西掖时，汉州申显惠侯神，顷系宣抚司便宜加封昭应公，乞换给制书。礼、寺看详，谓不依元降指挥于一年限内自陈，欲符下汉州，告示本神知委。予白丞相别令勘当，乃得改命。淳熙六年，予以大礼恩泽改奏一岁儿，吏部下饶州，必欲保官状内声说被奏人曾与不曾犯决笞，有无翦刺，及曾与不曾先经补官因罪犯停废，别行改奏；又令供与予系是何服属。父之于子而问何服

属，一岁婴儿而问曾与不曾入仕坐罪，岂不大可笑哉！

【译文】 正式公文的来往，有统一规定的格式，因而有极为可笑的。如文官批写印纸，即使是提举宫、观、岳、庙等事务的闲散官员，也一定要说“不曾请假”；有些人已经科举及第、现任政府要职，却一定要说不曾应举及考试刑法。我在中书省任职时，汉州（今四川广汉）申奏：本州的显惠侯神，近来由宣抚使司临时加封为昭应公，请求换成皇帝下发正式的制书。礼部和有关的寺卿审定，说显惠侯神未依原先颁布的诏令在一年的期限内自行申诉，因而准备将公文发往汉州，告示本神知道。我向丞相建议重新审核，才得以改下制书。宋孝宗淳熙六年（1167年），我因为大礼恩泽，改奏一岁的儿子为官，吏部却将公文发往饶州，要求在保官状内必须说明被奏人是否曾被判处笞刑，是否受过剪发刺字的处罚，及是否在此前已经补官却因罪被免，于是另行改奏；吏部还要求被奏人说明与我是什么亲属关系。我们是亲父子而吏部却问我们是何种亲属关系，我的儿子是个一岁的幼婴，而吏部却问他是否曾做官犯罪，这实在令人笑破肚皮？

靖康时事

【原文】 邓艾伐蜀，刘禅既降，又敕姜维使降于钟会，将士咸怒，拔刀斫石。魏国燕于中山既久，城中将士皆思出战，至数千人，相率请于燕主，慕容隆言之尤力，为慕容麟沮之而罢。契丹伐晋连年，晋拒之，每战必胜。其后，杜重威阴谋欲降，命将士出陈于外，士皆踊跃，以为出战，既令解甲，士皆恸哭，声振原野。予顷修《靖康实录》，窃痛一时之祸，以堂堂大邦，中外之兵数十万，曾不能北向发一矢、获一胡，端坐都城，束手就毙！虎旅云屯，不闻有如蜀、燕、晋之愤哭者。近读《朱新仲诗集》，有《记昔行》一篇，正叙此时事。其中云：“老种愤死不得战，汝霖疽发何由痊？”乃知忠义之士，世未尝无之，特时运使然耳。

【译文】 邓艾攻打蜀国，刘禅已经投降，又下命令让姜维向钟会投降，将士们都发怒，拔出刀来砍石头泄忿。北魏在中山围困后燕已经很久，城里的将士都想出城作战，人数达到几千，接连地请求后燕国主下令作战，慕容隆劝说尤为尽力，但被慕容麟阻挠而没有成功。契丹连年攻打后晋，后晋抵御契丹，每次作战必定取得胜利。后来，杜重威阴谋要投降，命令将士们在城外摆开阵势，士兵都很踊跃，以为出城作战，结果是下令解除盔甲放下武器，士兵们都放声

大哭，声音震动原野。我最近编写《靖康实录》，私下里悲痛当时的祸患，以堂堂大国，京城内外的兵士有几十万，并没有能够向此射一枝箭，抓获一个胡人，而是端坐在京城里，束手待毙？像猛虎般的部队集结一起，没有听到像蜀国、后燕、后晋士兵悲愤痛哭的。近来读朱新仲的诗集，集中有《记苦行》一篇，正是叙述当时的情况，其中说：“老种怨死不得战，汝霖疽发何由痊（种师道怒而死不让作战，宗泽背上生疽哪能痊愈）！”这才知道忠义之士，世上未尝没有，仅仅是命运让他们这样而已。

并韶

【原文】 梁武帝时，有交趾人并韶者，富于词藻，诣选求官，而吏部尚书蔡撙以并姓无前贤，除广阳门郎。韶耻之，遂还乡里谋作乱。夫用门地族望为选举低昂，乃晋、宋以来弊法，蔡撙贤者也，不能免俗，何哉？

【译文】 南朝梁武帝时，交趾人有个名叫并韶的，富于词藻，才能非凡。他来到吏部请求给予官职，吏部尚书蔡撙鉴于姓并的人没有前辈人做官的，便任命他为广阳门郎。并韶感到这是一个耻辱，于是回归故里，准备起兵反叛。众所周知，以门第和家族声望的高低来决定选举等级高低，乃是东晋、刘宋以来的弊法，蔡撙是位贤者，却不能摆脱其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讖纬之学

【原文】 图讖星纬之学，岂不或中，然要为误人，圣贤所不道也。眭孟睹公孙病己之文，劝汉昭帝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不知宣帝实应之，孟以此诛。孔熙先知宋文帝祸起骨肉，江州当出天子，故谋立江州刺史彭城王，而不知考武实应之，熙先以此诛。当涂高之讖，汉光武以诘公孙述，袁术、王浚皆自以姓名或父字应之，以取灭亡，而其兆为曹操之魏。两角犊子之讖，周子谅以劾牛仙客，李德裕以议牛僧孺，而其兆为朱温。隋炀帝谓李氏当有天下，遂诛李金才之族，而唐高祖乃代隋。唐太宗知女武将窃国命，遂滥五娘子之诛，而阿武婆几易姓。武后谓代武者刘，刘无强姓，殆流人也，遂遣六道使悉杀之，而刘幽求佐临淄王平内难，韦、武二族皆殄灭。晋张华、郭璞，魏崔伯深，皆精于天文卜筮，言事如神，而不能免于身诛家族，况其下者乎！

【译文】 以文字、图画、星相等术数预卜吉凶祸福的图讖星纬之学，虽然也有偶而言中的时候，但是更多的则是使人误入歧途，因而不为圣贤所道及。眭孟看到“公孙病己”之文，劝汉昭帝求索贤人，禅让帝位，却不知此讖应验在宣帝身上，眭孟因此被诛。孔熙先知道宋文帝将祸起萧墙，江州当出天子，因此谋立江州刺史彭城王刘义康为帝，却不知此讖应验在孝武帝刘骏身上，孔熙先因此被杀。“当涂高”之讖，汉光武帝刘秀以此诘问公孙述，袁术、王浚都自以为姓名或父亲的名应对，结果自取灭亡，而其兆实为曹操的魏国。“两角犊子”之讖，周子谅以此弹劾牛仙客，李德裕以此影射牛僧孺，而其兆实为朱温。隋炀帝听说李氏当有天下，于是诛杀了李金才一族，而最终却是唐高祖李渊取代隋朝。唐太宗知武氏女子将篡夺李唐的江山，于是大量地处死姓武的女子，而武则天几乎使李家的江山改换了主人。武则天认为取代武周的乃是刘氏，而刘姓没有强有力的人物，估计大概是流民，于是派六道使者将他们全部杀掉，而最后却是刘幽求帮助临淄王李隆基平定内难，韦、武二族都被诛灭。晋代的张华、郭璞，北魏的崔伯深，都精通天文卜筮，料事如神，却不能保护自己的身家避免满门抄斩的命运，何况有不少人的占卜术数还不如他们呢！

真假皆妄

【原文】 江山登临之美，泉石赏玩之胜，世间佳境也，观者必曰如画。故有“江山如画”，“天开图画即江山”，“身在画图中”之语。至于丹青之妙，好事君子嗟叹之不足者，则又以逼真目之。如老杜“人间又见真乘黄”，“时危安得真致此”，“悄然坐我天姥下”，“斯须九重真龙出”，“凭轩忽若无丹青”，“高堂见生鹘”，“直讶杉松冷”，“兼疑菱苒香”之句是也。以真为假，以假为真，均之为妄境耳。人生万事如是，何特此耶？

【译文】 江山登临之美，泉石赏玩之胜，看到的人必定要说其景色优美如画，因此有“江山如画”，“天开图画即江山”，“身在画图中”等句子。至于画作之妙，人们叹服之余，仍觉言犹未尽，于是又说画得很逼真。如杜甫的“人间又见真乘黄”，“时危安得真致此”，“悄然坐我天姥下”，“斯须九重真龙出”，“凭轩忽若无丹青”，“高堂见生鹘”，“直讶杉松冷”，“兼疑菱苒香”等诗句都是这样。以真为假，以假为真，都是虚妄的境界。人生在世，万事无不如此，哪里是只限于艺术呢？

容斋续笔

作者自序

是书先已成十六卷，淳熙十四年八月在禁林日，八侍至尊寿皇圣帝清闲之燕，圣语忽云：“近见甚斋随笔。”迈竦而对曰：“是臣所著《容斋随笔》，无足采者。”上曰：“曷有好议论！”迈起谢，退而询之，乃嫔女所刻，贾人贩鬻于书坊中，贵人买以入，遂尘乙览。书生遭遇，可谓至荣。因复哀瞇说缀于后，惧与前书相乱，故别以一二数而目曰续，亦十六卷云。绍熙三年三月十日，迈序。

卷一

颜鲁公

【原文】 颜鲁公忠义大节，照映今古。岂唯唐朝人士罕见比伦，自汉以来，殆可屈指也。考其立朝出外，在明皇时，为杨国忠所恶，由殿中侍御史出东都、平原。肃宗时，以论太庙筑坛事，为宰相所恶，由御史大夫出冯翊。为李辅国所恶，由刑部侍郎贬蓬州。代宗时，以言祭器不饬，元载以为诽谤，由刑部尚书贬峡州。德宗时，不容于杨炎，由吏部尚书换东宫散秩。卢杞之擅国也，欲去公，数遣人问方镇所便，公往见之，责其不见容，由是衔恨切骨。是时年七十有五，竟堕杞之诡计而死，议者痛之。呜呼！公既知杞之恶己，盍因其方镇之问，欣然从之。不然，则高举远引，挂冠东去，杞之所甚欲也。而乃眷眷京都，终不自为去就，以蹈危机，《春秋》责备贤者，斯为可恨。司空图隐于王官谷，柳璨以诏书召之，图阳为衰野，堕笏失仪，得放还山。璨之奸恶过于杞，图非公比也，卒全身于大敌之世，然则公之委命贼手，岂不大可惜也哉！虽然，公囚困于淮西，屡折李希烈，卒之捐身殉国，以激四海义烈之气，卢元反正，实为有助焉。岂天欲全畀公以万世之名，故使一时堕于横逆，以成始成终者乎！

【译文】 颜鲁公（颜真卿）的忠义大节，古往今来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不但在唐朝人士中很少有人可比，就是从汉代算起，恐怕也是屈指可数的人物。考察一下他在朝中的进退，在唐明皇（唐玄宗李隆基）时代，因为受到杨国忠忌恨，由殿中侍御史外调东都判官、平原太守；肃宗（李亨）时代，因为议论太庙既被毁，请求筑祭坛于野外，招致宰相厌恶，由御史大夫外调冯翊太守；又因为李辅国假借圣旨迁太上皇玄宗居西宫，而他首先率领百官上表请问起居，与李辅国结怨，由刑部侍郎降职为蓬州长史；代宗（李豫）时代，他主管太庙，指责祭器不加修饰，宰相元载认为这是诽谤时政，由刑部尚书降职为峡州别驾；德宗（李适）时代，又不能容于宰相杨炎，由吏部尚书改为东宫太子少傅，成了有职无权的散官。等到卢杞当政专权，一心想把他从京城撵开，几次让人问他外放到什么地方感觉方便，他不得不去见卢杞，斥责其排挤异己，卢杞从此更加怀恨在心。这时他已七十五岁，最后竟然还是堕入卢杞的诡计中而死，人们

谈到这件事没有不感到痛心的。唉！他既然已知道卢杞不喜欢自己，何不乘其来问愿意外放何处的机会，高高兴兴地唯命是从。否则，便可以远走高飞，辞官归隐，这也正是卢杞非常盼望的。然而他却偏偏眷恋京城，始终不肯自为退身之计，以致于陷入危难境地。《春秋》一书对贤者有苛责之词，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司空图在中条山王官谷隐居，柳璨用诏书召司空图入朝，司空图佯装衰老村野，朝见时丢落手板，有失仪态，终于被放还山林。柳璨的奸诈恶毒胜过卢杞，司空图也无法和颜公相比，但司空图却能够在乱世的世道中得以保全性命，如此说来，颜公被卢杞算计而死于叛贼李希烈之手，岂不是大可哀叹吗！尽管是这样，但颜公被叛贼囚困于淮西，屡次挫败李希烈的诱逼，最后以身殉国，从而激发了天下忠义壮烈的正气，对于贞元元年（785年）德宗由乱而治来说，无疑是有帮助的。莫非是苍天要成全颜公的万世英名，因而才让他一生处于强暴的逆境之中，以成就他善始善终的德操吧。

戒石铭

【原文】 “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太宗皇帝书此以赐郡国，立于厅事之南，谓之《戒石铭》。按成都人景焕，有《野人闲话》一书，乾德三年所作，其首篇《颁令箴》，载蜀王孟昶为文颁诸邑云：“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长，抚养惠绥。政存三异，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舆是切，军国是资。朕之赏罚，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尔为戒，体朕深思。”凡二十四句。昶区区爱民之心，在五季诸僭伪之君为可称也，但语言皆不工，唯经表出者，词简理尽，遂成王言，盖诗家所谓夺胎换骨法也。

【译文】 “你们的薪俸，都是民脂民膏；虽然百姓容易虐待，但上天却难欺骗。”宋太宗写了这四句，赐给各地方官员，让他们立碑在官府大堂南面，称做《戒石铭》。成都人景焕曾著有《野人闲话》一书，是太祖乾德三年（965年）所作的。第一篇名叫《颁令箴》，记载了后蜀国王孟昶曾作文颁发给各地方长官，说：“我关心百姓，勤于政务。要求各位令、长，一定要爱护黎民。治理地方要达到蝗虫不入境，鸟兽懂礼仪，儿童有仁爱之心这样三异的标准，要让百姓弦歌赞颂把政务调理得好。要像驱鸡那样恰到好处，要像时苗留犊那样清正廉洁，政治要宽猛适当，才能移风易俗扶植正气。不能侵害百姓的利益，不

要让百姓遭受苦难。虐待百姓很容易，可是上天却难以欺瞒。田赋和车马是国家的要事，是军队和政府的凭借。我对你们的赏罚，是决不会拖延时间的。你们的薪俸，都是民脂民膏。作为百姓的父母官，个个都应以对百姓仁慈为本。希望你们都要以此为鉴戒，深刻地体会我的良苦用心。”共写了二十四句。孟昶的这点爱民之心，在五代十国那些割据地方、自称帝王的君主里面是值得称赞的。但他这篇文章语言不精炼，只有从中归纳出来的四句，言简意赅，富含哲理，道理尽说，于是成为帝王的不朽名言。这种方法，大概就是诗人们常用的脱胎换骨的写作方法。

双生子

【原文】 今时人家双生男女，或以后生者为长，谓受胎在前；或以先生者为长，谓先后当有序。然固有经一日或亥、子时生，则弟乃先兄一日矣，辰时为弟，巳时为兄，则弟乃先兄一时矣。按《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立适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何休注云：“子谓左右媵及侄娣之子。质家亲亲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侄，其双生也，质家据见立先生，文家据本意立后生。”乃知长幼之次，自商、周以来不同如此。

【译文】 现在的人家有了孪生子女，有的以后出生者为长，说是受胎在前；有的以先出生者为长，说是以出生先后为顺序。这样就造成了一天之中或亥时出生，或子时出生，弟弟竟比哥哥早生一天；如果辰时出生者为弟弟，巳时出生者为哥哥，那么弟弟比哥哥也要早生一个时辰。查《春秋公羊传》鲁隐公元年（前722）说：“立骖（即嫡子，正夫人所生）要立先出生的长者，不管是否贤明；立子（非正夫人所生）要按地位贵贱为长幼，不管出生是否在先。”汉代何休作注说：“所谓‘子’是指正夫人出嫁时随嫁的妹妹或侄女的儿子。务实的时代爱其亲属先立随嫁妹妹的儿子，尚礼的时代敬其尊者先立随嫁侄女的儿子。对于孪生子，务实者根据所见立先出生的孩子，尚礼者根据本意立后出生的孩子。”由此可知，长幼的次序，从商、周以来就是有不同说法的。

李建州

【原文】 建安城东二十里，有梨山庙，相传为唐刺史李公祠，予守郡日，

因作祝文曰：“亟回哀眷。”书吏持白回字犯相公名，请改之，盖以为李回也。后读《文艺·李频传》，懿宗时，频为建州刺史，以礼法治下。时朝政乱，盗兴相椎砧，而建赖频以安。卒官下，州为立庙梨山，岁祠之，乃证其为频。继往祷而祝之云：俟获感应，则当刻石纪实。已而得雨，遂为作碑。偶阅唐末人石文德所著《唐朝新纂》一书，正纪频事，云除建州牧，卒于郡。曹松有诗悼之曰：“出旌临建水，谢世在公堂。苦集休藏篋，清资罢转郎。瘴中无子奠，岭外一妻孀。恐是浮吟骨，东归就故乡。”其身后事落拓如此。《传》又云：“频丧归寿昌，父老相与扶柩葬之。天下乱，盗发其冢，县人随加封掩。”则无后可见云。《稽神录》载一事，亦以为回，徐炫失于不审也。

【译文】 福建建安郡（今福建建瓯）城东二十里，有座梨山庙。相传是唐代李刺史的祠庙。我在这里担任太守的时候，曾写了祝文去祭祀他。文中有“亟回哀眷”一句，办事的书吏说这个“回”字犯了李刺史的名讳，请我改一下，这是因为他以为李刺史就是李回。后来，我读了《唐书》中的《文艺·李频传》其中记有唐懿宗时李频担任建州刺史，用礼法治理地方的事情。当时朝政混乱，到处有盗贼杀人抢劫，而建州独因有李频治理而十分安定。后来李频死在任上，建州的后继官长为纪念他，特意在梨山建庙，每年都要去祭祀。这就证明了是李频的祭庙。以后我又去祀祷并许愿说：如果能得到灵验，就刻块石碑把他的事迹记下来。不久，果然下了一场雨，于是我为他立了一块碑。后来偶然看到唐末石文德所著的《唐朝新纂》一书，正好记载有李频的事。书上说，李频担任建州太守，死在任上。曹松曾经写了一首诗悼念他说：“出旌临建水，谢世在公堂。苦集休藏篋，清资罢转郎。瘴中无子奠，岭外一妻孀。恐是浮骨吟，东归就故乡。”他死后的事竟然凄凉到这种程度。他的传记里又说：“李频去世后送回故乡寿昌（今浙江建德南）时，是由父老乡亲们把灵柩安葬入土的。后来天下大乱，有盗墓贼把他的坟挖了，县里人又帮助封掩起来。”这样，可见李频的确是没有后代的。本朝的《稽神录》也记载了这件事，并认为是李回。这是因为作者徐铉没有认真地考证。

侍从官

【原文】 自观文殿大学士至待制，为侍从官，令文所载也。绍兴三十一年，完颜亮死于广陵，车驾将幸建康，从官列衔上奏，乞同班入对。时汤岐公以大观文为行宫留守，寄声欲联名，众以名位不同为辞。岐公曰：“思退亦侍从也。”

然竟不克从。绍熙二年，吏部郑尚书侨上章乞荐士，诏令在内近臣台谏、在外侍从，各举六人堪充朝士者。吏部遍牒，但及内任从官与在外待制以上，而前宰相执政皆不预。安有从官得荐人，而旧弼乃不然，有司之失也。

【译文】 自观文殿大学士直到待制，都属于侍从官范围，这是国家法令明文规定的。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国国君完颜亮被哗变士兵杀死在广陵（今江苏扬州），高宗准备到建康（今江苏南京）去巡视，侍从官们联名上奏章劝阻，还准备集体向皇帝面奏，当时岐国公汤思退以观文殿大学士的资格担任行宫留守，让人传话说也想参加联名，大家以为不属于同一系列的官员，而拒绝他参加。汤思退说：“我也是侍从官。”但终究未被同意。光宗绍熙二年（1191年），吏部尚书郑侨上奏皇帝，要求举荐人才，皇帝下诏，让宫内近臣、台谏各官和在外的侍从官们各举荐六名能够充当朝廷官员的人才。于是吏部便发出通知给在宫内的现任侍从官和在外的待制以上的官员，让他们荐人，可是却没有让当过宰相执政的大臣参加。难道侍从官可以举荐人才而前宰相却不能荐人吗？这是吏部官员的失误。

存亡大计

【原文】 国家大策，系于安危存亡。方变故交切，幸而有智者陈至当之谋，其听而行之，当如捧漏瓮以沃焦釜。而愚荒之主，暗于事几，且惑于谀佞孱懦者之言，不旋踵而受其祸败，自古非一也。曹操自将征刘备，田丰劝袁绍袭其后，绍辞以子疾不行。操征乌戎，刘备说刘表袭许，表不能用，后皆为操所灭。唐兵征王世充于洛阳，窦建德自河北来救，太宗屯虎牢以扼之，建德不得进，其臣凌敬请悉兵济河，攻取怀州、河阳，逾太行，入上党，徇汾、晋，趣蒲津，蹈无人之境，取胜可以万全，关中骇震，则郑围自解。诸将曰：“凌敬书生，何为知战事，其言岂可用？”建德乃谢敬。其妻曹氏，又劝令乘唐国之虚，连营渐进，以取山北，西抄关中，唐必还师自救，郑围何忧不解。建德亦不从，引众合战，身为人擒，国随以灭。唐庄宗既取河北，屯兵朝城，梁之君臣，谋数道大举，令董璋引陕、虢、泽、潞之兵趣太原，霍彦威以汝、洛之兵寇镇定，王彦章以禁军攻郢州，段凝以大军当庄宗。庄宗闻之，深以为忧。而段凝不能临机决策，梁主又无断，遂以致亡。石敬瑭以河东叛，耶律德光赴救，败唐兵而围之，废帝问策于群臣。时德光兄赞华。因争国之故，亡归在唐，吏部侍郎龙敏请立为契丹主，令天雄、卢龙二镇分兵送之，自幽州趣西楼，朝廷露檄言之，虜必有内

顾之虑，然后选募精锐以击之，此解围一算也，帝深以为然。而执政恐其无成，议竟不决，唐遂以亡。皇家靖康之难，胡骑犯阙，孤军深入，后无重援，亦有出奇计乞用师捣燕者，天未悔祸，噬脐弗及，可胜叹哉！

【译文】 国家的重大决策是安危存亡攸关的大事情，当变故急切袭来时，如果幸而有人提出了最正确的计策，这时候听从他的计策，就如同捧着一个不断滴漏的瓦罐来浇淋烧焦的铁锅一样刻不容缓。但是，愚蠢而荒废政务的君主，往往不了解事情的时机，而且容易被奸巧懦弱的言论所迷惑，一转身之间即遭受到灾祸和失败，这样的事例自古以来非止一端。曹操亲自带兵征讨刘备，田丰劝说袁绍乘机袭击曹操的后方，袁绍推辞说儿子正患病不能出兵；曹操北征乌桓，刘备劝说刘表乘机袭击许都，刘表没能采用刘备的计策，后来袁绍、刘表都被曹操灭掉了。唐朝军队进兵洛阳讨伐王世充，窦建德从河北来救王世充，唐太宗（李世民）屯兵虎牢加以扼阻，窦建德无法前进，谋臣凌敬提议全部兵马北渡黄河，夺取怀州、河阳，翻越太行山，入上党境，巡行汾州、晋州，直奔蒲州的黄河渡口，这如同踏进无人防守的地域，可以确保取得胜利，只要关中一带感到惊恐震动，那么郑帝（王世充）被围困的情况就可以得到缓解。窦建德身边的众将却说：“凌敬不过是一介书生，怎么会知道行军作战的事，他的话难道也是可以听从的？”窦建德于是拒绝了凌敬的建议。窦建德的妻子曹氏，也劝说窦建德乘唐朝内部空虚，诸营联合，逐步推进，先夺取太行山以北地区，然后向西包抄关中，唐朝兵马势必回师自救，郑帝的困境还怕不能解除。窦建德也没听从曹氏劝说，坚持率兵与唐军会战，结果不仅自己做了俘虏，所建的夏国也随即灭亡了。后唐庄宗（李存勖）攻下河北以后，兵马驻守朝城，后梁计划分为几路大举出兵，一路命董璋率领陕州、虢州、泽州、潞州的军队直取太原，一路命霍彦威率领汝州、洛阳的军队进犯镇州、定州，一路命王彦章率领禁军攻打郢州，一路命段凝率大军抵挡庄宗。庄宗听到这一情报，感到十分忧虑。但是段凝不能抓住战机，后梁末帝（朱友贞）又缺少决断，终于导致了后梁亡国。石敬瑭占据河东反叛，后唐出兵讨伐，契丹耶律德光（辽太宗）发兵求援，后唐兵败而被包围，废帝（李从珂）向群臣征求良策。当时耶律德光的哥哥耶律赞华因为在国内争夺王位，被迫亡命出走后唐，吏部侍郎龙敏请求立耶律赞华为契丹皇帝，命天雄、卢龙二镇派兵护送，从幽州奔赴西楼，由朝发布文书宣扬此事，契丹必然产生后顾之忧，此后再选募精锐军力出击，这可能是唐兵解除困境的一个办法。废帝非常赞成这样做，但掌权的大臣唯恐事情办不成，最后也没能下决心去做，后唐终于也灭亡了。我朝皇家靖康年间的那场灾难，金兵南侵，孤军深入，后面并没有大量的后援，当时也有人献出奇计，

请求派精锐兵力趁机直捣金国后方的幽燕地区，大概是老天有意给大宋降下灾祸，而此计没被采用，以致后来后悔也来不及了，真是可叹啊！

唐人诗不传

【原文】 韩文公《送李础序》云：“李生温然为君子，有诗八百篇，传咏于时。”又《卢尉墓志》云：“君能为诗，自少至老，诗可录传者，在纸凡千余篇。无书不读，然止用以资为诗。任登封尉，尽写所为诗，投留守郑馀庆，郑以书荐于宰相。”观此，则李、卢二子之诗多而可传。又裴迪与王维同赋辋川诸绝，载于维集，此外更无存者。杜子美有寄裴十诗云：“知君苦思缘诗瘦”，乃迪也，其能诗可知。今考之《唐史·艺文志》，凡别集数百家，无其书，其姓名亦不见于他人文集，诸类诗文中亦无一篇。白乐天作《元宗简集序》云：“著格诗一百八十五，律诗五百九。”至悼其死，曰：“遗文三十轴，轴轴金玉声。”谓其古常而不鄙，新奇而不怪。今世知其名者寡矣，而况于诗乎！乃知前贤遗稿，湮没非一，真可惜也！

【译文】 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送李础序》中说：“李生是位谦和的君子，作有诗八百篇，传诵于当时。”又在《卢尉墓志》中说：“卢君能写诗，从年青时写到老，值得抄录流传的诗，写在纸上的有一千多首。他无书不读，然而都是为了写诗。担任登封（今属河南）县尉的时候，抄写了自己的全部诗作，送请留守郑馀庆审阅，馀庆为此专门写了信，将这个人才推荐给宰相。”从这里来看，李、卢二人所写的诗，是有很多而且可以流传的。裴迪和王维共同写过描写辋川的很多绝句，这些都录载在王维的诗集里，此外裴迪便没有别的诗流传了。杜甫有《寄裴十》诗，诗中亦有“知君苦思缘诗瘦”的句子。裴十就是指裴迪，由此可见，他是能写诗的。今查《唐书·艺文志》，其中著录有诗集的诗人数百位，没有裴迪的诗集，就连裴迪的姓名，在其他人的文集中也查不到，各类诗文中也没有收录他的一首诗。白居易作《元宗简集序》说他“著有格诗一百八十五首，律诗五百零九首。”又在悼念他去世的诗中说：“遗文三十轴，轴轴金玉声。”评价他的诗文古朴平易但不鄙俗，新奇而不怪诞。可是现在知道他名字的人也很少了，何况他的诗作呢！由此可知，过去文人才子的遗作，湮没失传的绝不在少数，真是太可惜啦！

泰誓四语

【原文】 孔安国《古文尚书》，自汉以来，不列于学官，故《左氏传》所引者，杜预辄注为逸书。刘向《说苑·臣术篇》一章云：“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与闻国政而无益于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进贤者逐。’此所以劝善而黜恶也。”汉武帝元朔元年，诏责中外不兴廉举孝。有司奏议曰：“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与闻国政而无益于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进贤者退。此所以劝善黜恶也。”其语与《说苑》所载正同。而诸家注释，至于颜师古，皆不能援以为证。今之《泰誓》，初未尝有此语也。汉宣帝时，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献之，然年月不与序相应，又不与《左传》、《国语》、《孟子》众书所引《泰誓》同，马、郑、王肃诸儒皆疑之，今不复可考。

【译文】 孔安国的古文《尚书》，从汉代以来，一直未在学校设置博士讲授。因此，《春秋左传》中凡有《尚书》引文，晋杜预作注时都称作《逸书》。刘向的《说苑·臣术篇》中有一章写道：“《泰誓》说：‘附和民众而欺骗国君的人应当处死，附和国君而欺骗民众的人应当惩罚，参预国家政事而不能为民众着想的人应当贬退，身居要职而不能为国举荐贤才的人应当驱逐。’这四条都是为了除恶劝善。”汉武帝（刘彻）元朔元年（前128年），有诏令谴责中央和地方官不能选拔廉直孝敬的人才报效国家，主管官吏上书说：“附和民众而欺骗国君的应当处死，附和国君而欺骗民众的人应当惩罚，参预国家政事而不为民众着想的人应当斥逐，身居要职而不为国举荐贤才的应当贬退，这四条都是为了除恶劝善。”《汉书》中的这几句话与《说苑》所载正好相同，但各家的注释，直至唐颜师古，都未曾援引《泰誓》为证。现在通行的《泰誓》篇，当初并没有这几句话。汉宣帝（刘询）时，河内女子献上一篇《泰誓》，但成书年代与孔安国序不能互相呼应，又与《左传》、《国语》、《孟子》等书中所引的《泰誓》文字不同，汉马融、郑玄、魏王肃等人作注时都曾提出怀疑，现在已不可能再作考证了。

重阳上巳改日

【原文】 唐文宗开成元年，归融为京兆尹，时两公主出降，府司供帐事繁，

又俯近上巳曲江赐宴，奏请改日。上曰：“去年重阳取九月十九日，未失重阳之意，今改取十三日可也。”且上巳、重阳，皆有定日，而至展一旬，乃知郑谷所赋《十日菊》诗云：“自缘今日人心别，未必秋香一夜衰”，亦为未尽也。唯东坡公有“菊花开时即重阳”之语，故记其在海南 菊九畹，以十一月望，与客泛酒作重九云。

【译文】 唐文宗开成元年（836年），归融担任京兆府尹时，有两位公主出嫁，府里和有关衙门供应物品和庆贺事宜特别繁忙，而当时又临近三月三日的上巳节，皇帝照例要在这一天去京都郊外的风景区曲江大宴群臣。府尹实在忙不过来，便上奏请求更改宴会日期。文宗皇帝批复说：“去年重阳节改为九月十九日，并没失去重九的本意，今年上巳就改为三月十三日吧。”自古以来，上巳、重阳都有固定的日期，但也有延期十天的例子。由此可知，唐朝诗人郑谷所作的《十日菊》诗说：“自缘今日人心别，未必秋香一夜衰。”也是重阳没有过去的意思。惟有苏东坡有“菊花开时即重阳”的诗句，是记他在海南做官时种菊花九畦，于十一月十五日与客人饮酒赏菊，仍能当作九月九日重阳节来过。

田宅契券取直

【原文】 《隋书·志》：“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历宋、齐、梁、陈，如此以为常。以人竞商贩，不为田业，故使均输，欲为惩劝。虽以此为辞，其实利在侵削也。”今之牙契投税，正出于此。田宅所系者大，奉行唯谨，至于奴婢马牛，虽著于令甲，民不复问。然官所取过多，并郡邑导行之费，盖百分用其十五六，又皆买者独输，故为数多者率隐减价直，賒立岁月，坐是招激讦诉。顷尝因奏对，上章乞蠲其半，使民不作伪以息争，则自言者必多，亦以与为取之义。既下有司，而户部引条制沮其说。

【译文】 《隋书·食货志》说：“自东晋以来，凡买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书契券者，一般是交易一万钱，要向官府纳税四百，卖家三百，买家一百；没有文书契券者，按货物所能承受的程度，也收百分之四的税，称为零散交易税。经过宋、齐、梁、陈四朝，都是如此，习以为常。因为人人争着经商贩卖，不务农田，所以要实行统一征收、买卖和运输，为的是有所类责和奖励。虽然可以用这种说法来解释，但实际上还是有利于官府的剥夺。”现在的交纳牙契税，正是从这里发展来的。买卖田宅之事关系重大，执行税收也非常严格。至于买

卖奴婢、马牛，虽然有法令规定，但老百姓一般不加过问。这样官府收税收多，连同地方官的导行费（正税以外的额外进贡）在内，大概占到百分之十五六，又都是买家独自交纳，所以交易数目较多的，一般要隐瞒或减少价值，文契上缺欠年月，因此又往往招致揭发和起诉。不久前曾借着上朝应对的机会，进呈表章希望能将牙契税免除一半，使得老百姓不再弄虚作假，从而平息纷争，那么他们自报的数目必然会多起来，这也是为了帮助多收税的意思。这个建议下达到官府，竟被户部引用现有条例制度加以阻止。

公子奚斯

【原文】 《睥宫》诗曰：“新庙奕奕，奚斯所作。”其辞只谓奚斯作庙，义理甚明。郑氏之说，亦云作姜 庙也。而扬子《法言》，乃曰：正考甫尝 尹吉甫，公子奚斯 正考甫。宋咸注文，以谓奚斯慕考甫而作《鲁颂》，盖子云失之于前，而宋又成其过耳。故吴秘又巧为之说曰：“正考甫《商颂》盖美禘祀之事，而奚斯能作闵公之庙，亦 《诗》之教也，而《鲁颂》美之。”于义迂矣。司马温公亦以谓奚斯作《睥宫》之诗。兼正考甫只是得《商颂》于周大师耳，初非自作也。班固、王延寿亦云奚斯颂鲁，后汉曹褒曰：“奚斯颂鲁，考甫咏商。”注引薛君《韩诗传》云：“是诗公子奚斯所作。”皆相承之误。

【译文】 《诗经·鲁颂·睥宫》诗说：“新庙奕奕，奚斯所作。”这两句诗说庙是奚斯建造的，意思十分明确。郑玄注释也说奚斯建造的是姜昵庙。可是扬雄所著的《法言》中却说“正考甫曾仰慕尹吉甫，公子奚斯又仰慕正考甫。”宋咸在注释《法言》时，又认为奚斯仰慕正考甫，因而才作《鲁颂》。这是扬雄弄错在前，而宋咸又进一步肯定了这个错误说法。所以，后来吴秘又牵强附会地引申说：“正考甫作《商颂》是为了赞美祭祀的事，而奚斯能作闵公庙，亦是仰慕《诗经·商颂》，所以《鲁颂》赞美他。”这种解释也太迂远了。司马光也以为《睥宫》这首诗是奚斯所作。实际上，正考甫只是从周太师那里得到《商颂》，本来就不是他自己作的。班固、王延寿等人也说奚斯作《鲁颂》，后汉时的曹褒也说：“奚斯颂鲁，考甫咏商。”注释又引用了薛君的《韩诗外传》说：“《鲁颂》诗是公子奚斯所作。”这些都是互相承袭了错误的说法。

唐藩镇幕府

【原文】 唐世士人初登科或未仕者，多以从诸藩府辟置为重。观韩文公送石洪、温造二处士赴河阳幕序，可见礼节。然其职甚劳苦，故亦或不屑为之。杜子美从剑南节度严武辟为参谋，作诗二十韵呈严公云：“胡为来幕下，只合在舟中。束缚酬知己，蹉跎效小忠。周防期稍稍，太简遂匆匆。晓入朱扉启，昏归画角终。不成寻别业，未敢息微躬。会希全物色，时放倚梧桐。”而其题曰：《遣闷》，意可知矣。韩文公从徐州张建封辟为推官，有书上张公云：“受牒之明日，使院小吏持故事节目十余事来，其中不可者，自九月至二月，皆晨入夜归，非有疾病事故，辄不许出，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若宽假之，使不失其性，寅而入，尽辰而退，申而入，终酉而退，率以为常，亦不废事。苟如此，则死于执事之门无悔也。”杜、韩之旨，大略相似云。

【译文】 唐朝的读书人刚考中进士或没有登科做官的，大多数都以能到各藩镇当幕僚为荣。读韩愈写的送石洪、温造二处士（即未做官或不做官的士人）赴河阳军幕府的两篇序文，可以看出作幕僚的礼节。但这种职务是十分辛苦的，所以也有些人不屑一顾。杜甫被剑南节度使严武聘为参谋，曾作诗二十韵呈送给严武，诗中说：“胡为来幕下，只合在舟中。束缚酬知己，蹉跎效小忠。周防期稍稍，太简遂匆匆。晓入朱扉启，昏归画角终。不成寻别业，未敢息微躬。会希全物色，时放倚梧桐。”这首诗的题目叫《遣闷》，他的心情便由此可想而知了。韩愈被徐州节度使张建封聘为推官，有书信呈给张建封说：“我受到聘书的第二天，就有节度使衙门的小职员送来了过去的制度项目十几件，其中有些是做不到的，例如从九月到二月，都是凌晨进入衙门，夜晚才能回家，除非有疾病事故，否则一律不许外出，像这样的制度不是我能做得到的。如果能够宽松一点，使我不压抑自己的本性，寅时（凌晨3点到5点）去办公，辰时（上午7点到9点）可以出来，申时（下午5点到7点）再去办公，酉时结束可以告退，以此为固定的制度，也不会荒废公务。如果能够这样，那么在这地方干到老死，我也不会后悔。”杜甫和韩愈的意思，大致是相同的。

文中子门人

【原文】 王氏《中说》，所载门人，多贞观时知名卿相，而无人能振师之道者，故议者往往致疑。其最所称高第，曰程、仇、董、薛，考其行事，程元、仇璋、董常无所见，独薛收在《唐史》有列传，踪迹甚为明白。收以父道衡不得死于隋，不肯仕，闻唐高祖兴，将应义举，郡通守尧君素觉之，不得去。及君素东连王世充，遂挺身归国，正在丁丑、戊寅岁中。丁丑为大业十三年，又为义宁元年，戊寅为武德元年，是年三月炀帝遇害于江都，盖大业十四年也。而杜淹所作《文中子世家》云：“十三年江都难作，子有疾，召薛收谓曰：吾梦颜回称孔子归休之命。乃寝疾而终。”殊与收事不合，岁年亦不同，是为大可疑者也。又称李靖受《诗》及问圣人之道，靖既云：“丈夫当以功名取富贵，何至作章句儒”，恐必无此也。今《中说》之后，载文中次子福 所录云：“杜淹为御史大夫，与长孙太尉有隙。”予按淹以贞观二年卒，后二十一年，高宗即位，长孙无忌始拜太尉，其不合于史如此。故或者疑为阮逸所作，如所谓薛收《元经传》，亦非也。

【译文】 王通在《中说》一书里所记载的弟子，多是唐贞观年间著名的公卿大臣，然而却没有一个人能够振兴他们老师的学问，所以评论家往往对此产生怀疑。在他的弟子们中最为人称道的高才生，叫做程元、仇璋、董常、薛收，考察这四个人行止事迹，程元、仇璋、董常一无所见，唯独薛收在《新唐书》中有传，事迹记得很清楚。薛收因为其父薛道衡在隋朝死于非命（炀帝时，下狱被杀），从此不肯做官，听说唐高祖（李渊）起兵，就打算前去响应这一正义行动，蒲州通守尧君素察觉后，软禁了薛收的生母，薛收无法离去，等到尧君素与东边的王世充相勾结，薛收就毅然回归唐朝，这时正是丁丑（617年）、戊寅（618年）之间。丁丑为隋炀帝（杨广）大业十三年（617年），又为隋恭帝（杨侑）义宁元年（617年），戊寅为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这一年的三月隋炀帝在江都遇害，也就是大业十四年（618年）。但是，杜淹所写的《文中子世家》却说：“十三年，江都发生灾难（隋炀帝死），文中子正在病中，把薛收召到身边说：‘我梦见颜回告诉我孔子要让我回去休息。’于是卧床而死。”这与薛收的事迹很不合拍，所说的年代也和史传不同，其真实性是大可怀疑的。《文中子世家》又说李靖向文中子学习《诗三百篇》及孔孟圣人之道，李靖曾以“大丈夫当通过建功立业获取富贵，决不作注解经书的儒生”自诩，恐怕未必会有

向文中子学习的事。现在的《中说》一书卷后，载有文中子次子王福 的笔记说：“杜淹任御史大夫，与长孙太尉（长孙无忌）不和睦。”我考察杜淹死于贞观二年（628年），二十一年后，唐高宗（李治）继承皇位，长孙无忌才做了太尉，王福 的记录竟如此不符合历史。所以有人推测《中说》乃阮逸（宋朝人）所作，这就像题名薛收的《元经传》一样，实际上也不是薛收所作。

晋燕用兵

【原文】 万事不可执一法，而兵为甚。晋文公围曹，攻门者多死，曹人尸诸城上。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谋曰：“称舍于墓。”言若将发冢者。师迁焉，曹人凶惧。因其凶而攻之，遂入曹。燕将骑劫攻齐即墨，田单纵反间言：吾惧燕人掘吾城外冢墓。燕军乃尽掘冢墓，烧死人，齐人望见皆涕泣，其欲出战，怒自十倍，已而果败燕军。观晋、燕之所以用计则同，而其成败顿异者何邪？晋但舍于墓，阳为若将发冢，故曹人惧；而燕真为之，以激怒齐人故尔。

【译文】 世界上的事情千变万化，不能机械地采用一种办法处理，而在用兵打仗方面尤其如此。春秋时期，晋文公领兵包围了曹国都城，攻打城门时，士兵死了很多人，曹国人把这些尸体陈列在城墙上，向晋兵示威，晋文公十分忧虑。士众们献计说：“把兵营迁移到曹国人祖先的墓地去，并且扬言准备挖他们的祖坟。”文公听从此计，把兵营移向曹人坟地。曹国人看见后，恐惧得喧嚷骚动起来。晋兵便趁曹军混乱恐惧之机出兵突击，很快攻下了曹国都城。战国时期，燕将骑劫攻打齐国的即墨，守将田单派间谍去散布谣言，说齐国人最害怕的是燕国人掘他们城外的祖坟。燕军听了，真的去把城外的坟墓都挖开，把死人尸骨堆起来烧掉。齐国人在城上看见后都痛哭了起来，纷纷要求出兵，愤怒增加十倍，结果把燕军打得大败。看起来晋燕两国所用的计策相同，而成败结果却截然相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晋文公驻兵于曹国坟地，假装要挖他们的祖坟，所以曹国人担心害怕；而燕军却真的去挖掘坟墓，以致激怒了齐国人。

李卫公帖

【原文】 李卫公在朱崖，表弟其侍郎遣人饷以衣物，公有书答谢之，曰：“天地穷人，物情所弃。虽有骨肉，亦无音书。平生旧知，无复吊问。阁老至仁

念旧，再降专人，兼赐衣服器物茶药至多，开缄发纸，涕咽难胜。大海之中，无人拯恤，资储荡尽，家事一空，百口嗷然，往往绝食。块独穷悴，终日苦饥。惟恨垂没之年，须作馁而之鬼。十月末，伏枕七旬，药物陈，又无医人，委命信天，幸而自活。”书后云：“闰十一月二十日，从表兄崖州司户参军同正李德裕状侍郎十九弟”。按德裕以大中二年十月自潮州司马贬崖州，所谓闰十一月，正在三年，盖到崖才十余月尔，而穷困苟生已如是。《唐书》本传云：“贬之明年卒。”则是此书既发之后，旋踵下世也。当是时宰相皆其怨仇，故虽骨肉之亲，平生之旧，皆不敢复通音问。而某侍郎至于再遣专使，其为高义绝俗可知，惜乎姓名不可得而考耳。此帖藏禁中，后出付秘阁，今勒石于道山堂西。绍兴中赵忠简公亦谪朱崖，士大夫畏秦氏如虎，无一人敢辄寄声，张渊道为广西帅，屡遣兵校持书及药石、酒面为馈。公尝答书曰：“鼎之为己为人，一至于此。”其述酸寒苦厄之状，略与卫公同。既而亦终于彼，手札今尚存于张氏。姚崇曾孙勛为李公厚善，及李譖逐，索支党，无敢通劳问。既居海上，家无资，病无汤剂，勛数馈饷候问，不傅时为厚薄，其某侍郎之徒与！

【译文】唐武公时宰相李德裕被贬职到朱崖（今海南琼山东南）以后，他的担任侍郎的表弟派人送去一些衣物接济他。德裕写封书信答谢他说：“我是个天地间的穷困人，现在受到社会人情的抛弃，虽然还有至亲骨肉存在，但是却没有人与我通音信了。生平的朋友故旧，也不再问候我。你怀着仁德之心，不忘故旧，两次派专人来看望，并赐给我衣服器物茶药等很多东西，打开你的来信，我忍不住落下涕泪。现在我处于大海之中的孤岛上，没有人帮助和怜恤，所带的钱财也早已花光了，家里一贫如洗，百口的家属饿得嗷嗷叫，常常绝食断顿。我因为孤独和穷苦变得憔悴，整天苦于饥饿难挨，可叹我临到晚年，还得作个饿死鬼。十月末，我病倒在床，躺了七十天，到处是药物，又没有良好的医生，只好听天由命，幸而现在还能活着。”书信落款是：闰十一月二十日，从表兄崖州司户参军同正李德裕回复侍郎十九弟。按：李德裕是在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从潮州司马任上被贬到崖州（今海南琼山），信里说的闰十一月正是大中三年，这距他到崖州才十个月，而穷困潦倒、苟且偷生竟已到达这种地步。《唐书·李德裕传》中说他“贬职的第二年去世。”那么，应当是在这封信发出后不几天就病逝了。当时在位的宰相都是他的冤家对头，所以虽是骨肉至亲，平生故交，也都不敢和他通信问侯，可是这个侍郎却敢派出专人去探望，足见他的高尚品质和义气，远远超过了世俗之人，可惜他的姓名无从考证了。李德裕写的这封信，原本收藏在皇宫内，后来才移交给管理图书档案的秘阁，现在已刻成石碑，立在道山堂的西边。高宗绍兴年间，忠简公赵鼎也被贬官到朱

崖，大小官员害怕宰相秦桧就像畏惧老虎一样，没有一个人敢向赵鼎传话问侯。而在广西当军队统帅的张渊道却屡次派兵和下属军官拿着书信和药物、酒、面去探望他。赵鼎曾经回信说：“我自问平生没有做过亏心事，可是现在竟落拓到这种地步。”他诉说自己辛酸穷苦的状况大致和李德裕相同。后来，赵鼎也死在崖州，他写的信至今还保存在张家。唐朝宰相姚崇的孙子姚勔，与李德裕交情甚好，等到李德裕因谗言被放逐后，还要揭发搜寻他的同党，所以没有人敢向李德裕通信问侯。后来德裕又贬到海南岛上，家里没钱，生病没药，姚勔多次送去粮食和药品，并致以问候，不怕时人议论短长，他也是和某侍郎一样刚正不阿的君子啊！

王孙赋

【原文】 王延寿《王孙赋》，载于《古文苑》，其辞有云“颜状类乎老翁，躯体似乎小儿”，谓猴也。乃知杜诗“颜状老翁为”盖出诸此。

【译文】 王延寿的《王孙赋》一文载于《古文苑》中。赋文有句子说：“颜状类乎老翁，躯体似乎小儿（面容像老翁，身体像儿童）。”这是指猴子。由此可知，杜甫诗所谓“颜状老翁为（面容类似老翁的样子）”大概就是从这里来的。

汉郡国诸官

【原文】 西汉盐铁、膳羞、陂湖、工服之属，郡县各有司局幹之，其名甚多，然居之者罕。尝见于史传，今略以《地理志》所载言之，凡铁官三十八，盐官二十九，工官九，皆不暇纪其处。自余若京兆有船司空，为主船官。太原有马官，主牧马（元名家马官），辽东有牧师官，交趾有羞官，南郡有发弩官，严道有水官，丹阳有铜官，桂阳有金官，南海有鬲浦官，南郡江夏有云梦官，九江有陂官、湖官，胸忌、鱼复有橘官，鄱阳黄金采，主采金，亦有官。在内则奉常之均官、食官；司农之幹官；少府之大官主膳食，汤官主饼饵，导官主择米，如是者盖以百数。

【译文】 西汉时，盐铁、饮食、陂湖水利、手工技艺等方面，各州县都设有专门官吏管理，名目很多，但真正派有官员到任的却很少，这在史书中是可

以看到的。现在将《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的简单说一下。全国共有铁官三十八个，盐官二十九个，工官九个，但都没记载他们设在什么地方。其余的如京兆（今陕西西安）有船司空，是管理船只的官员。太原有驸马官，主管放牧马群，辽东有牧师官，交趾郡（治今越南河内西北一带）有管饮食的羞官。南郡（今湖北江陵）有发弩官，严道（今四川荣经）有水官，丹阳（今安徽当涂）有铜官，桂阳郡（今湖南郴州）有金官，南海郡（今广东）有瞞浦（今广东英德西南）官，南郡江夏（今湖北云梦东）有云梦官，九江有陂官、湖官，朐忍（今四川云阳西）、鱼复（今四川奉节）有桔官，鄱阳黄金采，主管采金矿，也有官。在朝廷内则在奉常下，设有主管乐器的均官，主管祭品的食官；司农寺卿下又设有主管粮食贩卖的榦（音义同管）官；少府下又设有主管皇帝膳食的大官、主管糕饼的汤官、主管选米的导官，这样的官职数以百计。

汉狱名

【原文】 汉以廷尉主刑狱，而中都他狱亦不一。宗正属官有左右都司空。鸿胪有别火令丞，郡邸狱。少府有若卢狱令，考工共工狱。执金吾有寺互、都船狱。又有上林诏狱，水司空掖受秘狱，暴室、请室、居室、徒官之名。《张汤传》苏林曰：“《汉仪注》狱二十六所。”《东汉志》云：“孝武帝所置，世祖皆省之。”东汉洎唐，虽鞫囚非一处，然不至如是其多。国朝但有大理及台狱，元丰、绍圣间，蔡确、章子厚起同文馆狱之类，非故事也。

【译文】 汉朝是由廷尉主管刑狱，但是京城里其他衙门的监狱也不止一处。宗正府的属官中就有负责审案和监禁犯人的左右都司空。鸿胪寺衙门有别火令丞和郡邸狱。少府衙门又设有若卢狱令，考工衙门也有共工狱。执金吾衙门有寺互、都船狱。还有上林诏狱（奉皇帝诏命关押犯人的地方），水司空掖受秘狱，以及暴室、请室、居室、徒官等监狱名称。《汉书·张汤传》苏林注释说：“《汉仪注》记载的监狱有二十六所。”《后汉书》里又说：“各监狱都是汉武帝设立的，光武帝把这些监狱都撤消了。”从东汉到唐朝，虽然有权审问和囚禁犯人的衙门不止一处，但不至于有这样多。我们大宋朝，只有大理寺衙门和台狱管审案和监禁囚犯。至于神宗元丰、哲宗绍圣年间，蔡确、章 曾兴起的同文馆狱之类，都是不合乎旧制的。

卷二

权若讷冯臧

【原文】 唐中宗既流杀五王，再复武氏陵庙。右补阙权若讷上疏，以为：“天地日月等字，皆则天能事，贼臣敬晖等轻紊前规，削之无益于淳化，存之有光于孝理。又神龙制书，一事以上，并依贞观故事，岂可近舍母仪，远尊祖德。”疏奏，手制褒美。钦宗在位，惩王安石、蔡京之误国，政事悉以仁宗为法。左谏议大夫冯 上言：“仁宗皇帝，陛下之高祖也；神宗皇帝，陛下之祖也。子孙之心，宁有厚薄？王安石、司马光皆天下之大贤，其优劣等差，自有公论，愿无作好恶，允执厥中，则是非自明矣。”诏榜朝堂。侍御史李光驳之，不听，复为右正言崔 所击。宰相不复问，而迁 吏部侍郎。按若讷与 两人，议论操持绝相似，盖 在崇宁中，首上书乞废元 皇后，自选人除寺监丞，其始终大节，不论可见。建炎初元，乃超居政地，公议愤之。

【译文】 唐中宗即位后，听信武三思的诬陷，流放和处死五位王爷，又恢复了武氏的陵庙。右补阙权若讷上奏疏说：“天地日月等新字，都是武后（即武则天）所创造的，奸臣敬晖等轻率地改变从前的制度，如果把这些字废除，并无益于淳厚风俗教化，如果保存下来，还有发扬孝道的作用。还有，神龙年间所颁布的诏书，大小事都依据太宗贞观时的旧例，怎能舍弃最亲近的母亲，而去推崇较远祖先的道德呢？”这份奏疏送到中宗那里，中宗特加了批语表扬他。钦宗在位时，谴责王安石、蔡京擅权误国，因而所有政策都仿效仁宗时的做法。左谏议大夫冯臧上书说：“仁宗皇帝是陛下的高祖，神宗皇帝是陛下的祖父，子孙敬祖之心，难道还分厚薄吗？王安石、司马光都是神宗时名闻天下的大贤人，他们的优劣好坏，自有天下人的公论，希望陛下不要先有成见，而要公平中肯地看问题，那么他们的是非自然就能看得明白了。”钦宗阅读后，将它公布于朝堂内让大臣们议论。侍御史李光驳斥冯臧，冯臧不接受；后来，右正言崔 对冯臧也猛烈攻击。宰相不过问这件事，反而把冯臧升任吏部侍郎。权若讷和冯臧两人，议论和品行十分相似，冯臧在徽宗崇宁年间，首先上书要求废掉元 皇后，因而他才从后补官员被任命为寺监丞，他一生大节，不言而喻。高宗建

炎初年，他竟然被越级提拔为执政，社会舆论大哗。

岁旦饮酒

【原文】 今人元日饮屠酥酒，自小者起，相传已久，然固有来处。后汉李膺、杜密以党人同系狱，值元日，于狱中饮酒，曰：“正旦从小起。”《时镜新书》晋董勋云：“正旦饮酒先从小者，何也？勋曰：‘俗以小者得岁，故先酒贺之，老者失时，故后饮酒。’”《初学记》载《四民月令》云：“正旦进酒次第，当从小起，以年小者起先。”唐刘梦得、白乐天元日举酒赋诗，刘云：“与君同甲子，寿酒让先杯。”白云：“与君同甲子，岁酒合谁先？”白又有《岁假内命酒》一篇云：“岁酒先拈辞不得，被君推作少年人。”顾况云：“不觉老将春共至，更悲携手几人全。还丹寂寞羞明镜，手把屠酥让少年。”裴夷直云：“自知年几偏应少，先把屠酥不让春。倘更数年逢此日，还应惆怅羡他人。”成文干云：“戴星先捧祝尧觞，镜里堪惊两鬓霜。好是灯前偷失笑，屠酥应不得失尝。”方干云：“才酌屠苏定年齿，坐中皆笑鬓毛斑。”然则尚矣。东坡亦云：“但把穷愁博长健，不辞最后饮屠酥。”其义亦然。

【译文】 现在的人正月初一饮屠酥酒，先从年龄小的人饮起，这一风俗相传已久，不过当初还是有来源的。东汉时，李膺、杜密因为属于朋党中人而被一同关进监狱，正月初一这一天在狱中饮酒，说：“今天是正月初一，从年龄小的人开始。”《时镜新书》引晋朝董勋说：“同正月初一饮酒先从年龄小的人开始，为什么？董勋答：‘习惯上认为年龄小的人长了一岁，所以让他先饮作为祝贺；年龄老的人过一年少一年，所以饮酒在后。’”《初学记》记载的《四民月令》中说：“正月初一饮酒的先后次序，应当从小辈开始，以年龄小的人起头。”唐刘梦得（禹锡）、白乐天（居易）正月初一饮酒作诗，刘说：“与君同甲子，寿酒让先杯（我和您同年出生，喝寿酒先让您一杯）。 ”白说：“与君同甲子，岁酒合谁先（我和您同年出生，贺岁酒该谁先喝）？”白又有《岁假内命酒》诗一篇说：“岁酒先拈辞不得，被君推作少年人（贺岁酒只得先饮，因为我被您定为年龄小的人）。 ”顾况的诗说：“不觉老将春共至，更悲携手几人全（不知不觉间老年与春天一起降临，更可悲的是携手同行的友人已所剩无几）。还丹寂寞羞明镜，手把屠苏让少年（我没有丹术驻颜羞于对镜自照，甘愿手举屠苏酒让年轻人先饮）。 ”裴夷直的诗说：“自知年几偏应少，先把屠苏不让春（我知道自己的年龄应是最小的，便当仁不让先饮屠苏酒）。倘更数年逢此日，还应惆怅羡他人（如

果再过数年后的今天，恐怕也要满怀惆怅的看着他人先饮了)。”成文干的诗说：“戴星先捧祝尧觞，镜里堪惊两鬓霜（一大早就起来祝颂太平盛世，镜子里两鬓苍苍的梅子使我吃惊不小）。好是灯前偷失笑，屠苏应不得先尝（心里不免偷偷一笑，这回屠苏酒该不会让我先饮了）。”方干的诗说：“才酌屠苏定年齿，坐中皆笑鬓毛斑（饮屠苏酒时刚刚分过年龄大小，座中人无不笑自己鬓发斑白）。”如此说来，这一可俗是很受尊重的。东坡（苏轼）也说：“但把穷愁博长健，不辞最后饮屠酥（只要能用穷愁换来健康长寿，就是后饮屠酥酒也不推辞）。”他所表达的意思也是如此。

存歿绝句

【原文】 杜子美有《存歿》绝句二首云：“席谦不见近弹棋，毕曜仍传旧小诗。玉局他年无限笑，白杨今日几人悲。”“郑公粉绘随长夜，曹霸丹青已白头。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间不解重骅骝。”每篇一存一歿。盖席谦、曹霸存，毕、郑歿也。黄鲁直《荆江亭即事》十首，其一云：“闭门觅句陈无己，对客挥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温饱未，西风吹泪古藤州。”乃用此体。时少游歿而无己存也。近岁新安胡仔著《渔隐丛话》，谓鲁直以今时人形入诗句，盖取法于少陵，遂引此句，实失于详究云。

【译文】 杜子美（甫）有《存歿》两首绝句说：“席谦不见近弹棋，毕曜仍传旧小诗（近日不曾看到席谦下棋，毕曜旧日的小诗仍在流传）。玉局他年无限笑，白杨今日几人悲（期望席谦他日再来下棋取乐，可怜今日毕曜的墓地已是白杨萧萧）”；“郑公粉绘随长夜，曹霸丹青已白头（善于画山水的郑虔已经随长夜而去，精于画马的曹霸已经满头白发）。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间不解重骅骝（从此天下更无山水之奇，人间还有谁知道千里马的价值）”。每篇各写一生一死，大抵席谦、曹霸健在，毕曜、郑虔已死。黄鲁直（庭坚）有《荆江亭即事》十首，其中一篇说：“闭门觅句陈无己，对客挥毫秦少游（陈师道闭门作诗，秦观对客挥毫）。正字不知温饱未，西风吹泪古藤州（不知道陈师道现在温饱如何，只听说秦观已死在滕州）。”这首诗就是用杜子美的写法。当时少游（秦观）已死而无己（陈师道）健在。近来新安人胡仔写了一本《渔隐丛话》（《苕溪渔隐丛话》），其中说鲁直（黄庭坚）把当代活着的人写入诗句，大概是从少陵（杜甫）那里学来的，还引录了上面的句子，实际上这种认为所写的两个人都还在世的说法并没有作过详细考究。

汤武之事

【原文】 汤、武之事，古人言之多矣。惟汉辕固、黄生争辩最详。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杀也。”固曰：“不然。桀、纣荒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因天下之心而诛桀、纣，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今桀、纣虽失道，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反因过而诛之，非杀而何？”景帝曰：“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未为愚。”遂罢。颜师古注云：“言汤、武为杀，是背经义，故以马肝为喻也。”《东坡志林》云：“武王非圣人也，昔者孔子盖罪汤、武。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至孟轲始乱之，使当时有良史，南巢之事，必以叛书；牧野之事，必以弑书。汤、武仁人也，必将为法受恶。”可谓至论。然予窃考孔子之序《书》，明言伊尹相汤伐桀，成汤放桀于南巢；武王伐商，武王胜商杀受，各蔽以一语，而大指皎如，所谓六艺折衷，无待于良史复书也。

【译文】 商汤和周武王的事情，古人议论的已经很多了。惟有汉朝的辕固和黄生二人，争辩得最详细、最深刻。黄生说：“商汤和周武王不是受命于天做国君的，而是杀君自立。”辕固说：“不是这样。夏桀和殷纣王是荒淫残暴的国君，当时天下人心已转向商汤和周武王，商汤和周武王顺应天下人心才去诛杀桀、纣，之后不得已而即位，民心就是天心，这不是受命于天又是什么呢？”黄生说：“帽子虽然破旧，但是仍然得戴在头上；鞋子虽新，却只能穿在脚上。桀、纣虽然无道，但毕竟是君王；商汤和周武王虽然圣明，但毕竟是臣子，却因君主有过就把他们杀掉，这不是弑君又是什么呢？”汉景帝说：“吃肉的人不吃有毒的马肝，未必就是不知道肉味；讲究学问的人不说商汤、周武王是上承天命，也不一定就是愚昧无知。”他们这才停止争论。唐朝的颜师古注解这一段话时说：“认为汤、武杀君，是违背了经义的，所以景帝才用马肝作比喻。”《东坡志林》说：“武王不能算是圣人，过去孔子也是责备商汤和武王的。伯夷、叔齐不愿吃周朝的粟米而饿死，孔子给他们以很高评价，这也等于严厉责备了周武王。直到孟子，才把这种看法混乱颠倒过来。假如当时有秉笔直书的史官，就一定会把商汤将夏桀流放到南巢（今安徽巢县南）一事，记成商汤叛乱；将周兵大战殷纣王于牧野（今河南淇县南）一事，记成周武王弑君。商汤、武王都是仁德的人，也必然会为了礼法而接受弑君犯上的恶名。”这是十分中肯的议论。但是

我考查了孔子给《书经》写的序言，其中明确地说：伊尹帮助成汤起兵征伐夏桀，成汤把夏桀流放到南巢；武王征伐殷商，获胜后诛杀纣王。孔子各给他们一句评语，把自己的观点说得十分明白透彻，这就是六艺里讲的折衷方法，根本不需要什么良史再去评写。

张释之传误

【原文】 《汉书》纪、传、志、表，矛盾不同非一，然唯张释之为甚。本传云：“释之为骑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调，亡所知名，欲免归。中郎将袁盎惜其去，请徙补谒者，后拜为廷尉，逮事景帝，岁余，为淮南相。”而《百官公卿表》所载，文帝即位三年，释之为廷尉，至十年，书廷尉昌、廷尉嘉又二人，凡历十三年，景帝乃立，而以张驱为廷尉，则是释之未尝十年不调，及未尝以廷尉事景帝也。

【译文】 《汉书》的纪、传、志、表之间虽说矛盾不同处很多，但最严重的莫过于张释之的记载。本传说：“释之任骑郎，倚奉文帝（刘恒），十年时都没能调迁，一直默默无闻。他想免职返归乡里，中郎将袁盎舍不得他离去，请求让他改任谒者（掌宾赞受事，秩六百石）。后来升任尉（掌刑狱）。等到侍奉景帝（刘启）时，一年多即出任淮南王国丞相。”但《百官公卿表》的记载却是，文帝即位三年（前177年），释之任廷尉；到了文帝十年（前170年），又写的是廷尉昌和廷尉嘉；后来又有两个人（廷尉宜昌、廷尉信），共经过了十三年，景帝才立为皇帝，而此时的廷尉是张闳，这说明释之并没有十年不调转的事，也没有在景帝时任廷尉的事。

张于二廷尉

【原文】 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于定国为廷尉，人自以不冤。此《汉史》所称也。两人在职皆十余年。周勃就国，人上书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吏稍侮辱之，勃以千金与狱吏，吏使以公主为证，太后亦以为无反事，乃得赦出。释之正为廷尉，不能救，但申理犯辟、盗环一二细事耳。杨恽为人告骄奢不悔过，下廷尉案验，始得所予孙会宗书，定国当恽大逆无道，恽坐要斩。恽之罪何至于是？其徇主之过如此。传所谓决疑平法，务在哀矜者，果何为哉！

【译文】 张释之担任廷尉时，天下没有遭受冤屈的人。于定国担任廷尉的时候，犯人们自信不会受到冤屈。这是《汉书》里称赞他们的话。两人在职都有十几年。绌侯周勃回到自己封地时，有人诬告他谋反，皇帝下诏让廷尉逮捕审问。狱吏对周勃稍加辱骂虐待，周勃便拿了千两黄金交给狱吏，狱吏于是献计，让他请公主出面证明自己没有谋反之心，后来太后也以为周勃没有谋反的事，这才释放了他。当时，张释之正担任廷尉，却不能救周勃这位大功臣，只是依法公正地审理了有人惊了文帝的车驾，和高祖庙坐前玉环失窃二件小案子而已。平通侯杨惲被废为庶人后，有人告发他仍然居功自骄，毫不悔过，皇帝下诏让廷尉审查，才获得杨惲写给孙会宗的一封信。于定国认为信中有大逆不道的言词，于是判决杨惲大逆不道，腰斩了杨惲。杨惲的罪行，难道能严重到这种程度吗？这完全是于定国迎合君主旨意结果。史传上说他们所谓能决断疑案，公平执法，非常怜悯犯人，到底是指什么呢？

汉唐置邮

【原文】 赵充国在金城，上书言先零、罕羌事，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玺书报从其计。按金城至长安一千四百五十里，往反倍之，中间更下公卿议臣，而自上书至得报，首尾才七日。唐开元十年八月己卯夜，权楚璧等作乱，时明皇幸洛阳，相去八百余里。壬午，遣河南尹王怡如京师按问宣慰，首尾才三日。置邮传命，既如此其速，而廷臣共议，盖亦未尝淹久，后世所不及也。

【译文】 赵充国在金城（今甘肃永靖县西北）时，上书朝廷报告有关先零、罕羌的事，六月戊申上报，七月甲寅皇帝的诏书回复可以按计划行事。考察一下金城到长安一千四百五十里，往返加一倍，中间还要交给公卿大臣讨论，但从上报到获得回复，前后才有七天。唐朝开元十年（722年）八月己卯夜间，权楚璧等发生叛乱，当时唐明皇（李隆基）巡行洛阳，距离出事地点八百余里。壬午，派河南尹王怡前往京城查究审问、安抚百姓，前后才三天。设置邮路来传达命令是这样迅速，而朝廷中大臣们共商大事也从不敢长久耽搁，这是后来各朝各代所无法企及的。

龙且 张步

【原文】 韩信击赵，李左车劝陈馀勿与战，馀曰：“今如此避弗击，诸侯谓吾怯，而轻来伐我。”遂与信战，身死国亡。是时，信方为汉将，始攻下魏、代，威声犹未暴白，陈馀易之，尚不足讶。及灭赵服燕，则关东六国，既定其四矣。信伐齐，楚使龙且来救。或言汉兵不可当，龙且曰：“吾平生知韩信为人易与耳，不足畏也，何为而止？”一战而没，项随以亡。耿 讨张步，斩其大将军费邑，走邑之弟敢，进攻西安、临淄，拔其城，又走其弟蓝，势如破竹。先是， 已破尤来、大枪、延岑、彭宠、富平、获索矣。时步所盗齐地，太半为 所得。然步犹曰：“以尤来，大彤十余万众，吾皆即其营而破之。今 兵少于彼，又皆疲劳，何足摧乎？”竟出兵大战，兄弟成擒。兵法云：“知彼知己，百战不殆。”龙且、张步，岂复识此哉！梁临川王宏伐魏，魏元英御之，宏停军不前。魏人劝英进据洛水，英曰：“萧临川虽 ，其下有良将韦、裴之属，未可轻也。宜且观形势，勿与交锋。”宏卒败退，英之识见，非前人可比也。然遂进军围钟离，魏邢峦以为不可，魏主召使还，英表称必克，为曹景宗、韦睿所挫，死亡二十余万人。智于前而昧于后，为可恨耳！

【译文】 韩信攻打赵国，李左车劝说陈馀不要与韩信交战，陈馀说：“现在像这样避让不出击，各诸侯国必然认为是我们怯战，都会轻易来攻击我们。”于是与韩对阵，结果陈馀身死，赵国也灭亡了。当时，韩信刚刚成为汉王将领，虽说攻下了魏、代二地，但威名还不够显赫，陈馀轻视他，尚不足为怪。等到韩信灭掉赵国、制服燕国，关东六个诸侯国已平定了四个。这时韩信讨伐齐国，楚国派龙且来救援。有人建议说汉军的锋芒不可抵挡，龙且说：“我平时就知道韩信的为人，容易对付。没什么可怕的，为什么要按兵不动！”结果一场战斗下来龙且被杀，项王（项羽）也随之走向败亡。（东汉）耿 进讨张步，杀了张步的大将费邑，费邑的弟弟费敢败阵逃走；耿 又进兵西安、临淄，攻下二城，张步的弟弟张蓝也是落荒而逃，耿 一路杀来势如破竹。在此之前，耿 已经连续攻克尤来、大枪、延岑、彭宠、富平、获索等部。当时张步所侵占的齐地已大半被耿 夺得，但张步还是说：“当初尤来、大彤有十多万兵力，我都能够一出击即取胜。现在耿 的兵力比尤来、大彤要少，又是疲劳作战，有什么可怕的呢！”竟贸然出兵大战，最后兄弟数人都成了俘虏。兵法上说：“了解对方也了解自己，才能够在作战中永不陷于危险境地。”龙且、张步哪里还会认识到这

一点呢！（南朝）梁临川王宏（萧宏）率兵征讨北魏，北魏元英抵御，宏屯兵不进。北魏有人劝说元英进兵占据洛水流域，英说：“萧临川（萧宏）虽然愚蠢，但其手下有良将韦睿、裴邃等人，不可轻敌。应该先静观形势，不必和他交锋。”后来萧宏全军溃散。元英的识见不是前人所能比拟的。然而他随即进军围困钟离，北魏的邢峦认为这样做不妥，魏宣武帝（元恪）诏令元英回朝，而元英上表称一定会攻克钟离，结果反而被梁曹景宗、韦睿挫败，损失伤亡二十多万人。开头很很明智，后来反而糊涂起来，这真让人感到遗憾。

义理之说无穷

【原文】 经典义理之说最为无穷，以故解释传疏，自汉至今，不可概举，至有一字而数说者。姑以《周易·革卦》言之，“己日乃孚，革而信之。”自王辅嗣以降，大抵谓即日不孚，己日乃孚，己字读如矣音，盖其义亦止如是耳。唯朱子发读为戊己之己。予昔与《易》僧昙莹论及此，问之曰：“或读作己（音纪）日如何？”莹曰：“岂唯此也，虽作巳（音似）日亦有义。”乃言曰：“天元十干，自甲至己，然后为庚，庚者革也，故己日乃孚，犹云从此而革也。十二辰自子至巳六阳，数极则变而之阴，于是为午，故巳日乃孚，犹云从此而变也。”用是知好奇者欲穿凿附会，固各有说云。

【译文】 经典里所讲的义理奥妙无穷，所以各种注释和解说，自汉朝到现在，多的不胜枚举，甚至一个字有好几种不同说法的。拿《周易·革卦》来说，其中“己日乃孚，革而信之”一句话，自三国时王弼注释《周易》以来，大体上都把这句话解释成当日还不能取得信任，到己日才能取信于天下万民，己字应读为矣音，因这句话的意思也是这样。唯有朱熹主张读作戊己的己。我过去和研究《易经》的和尚昙莹讨论过这个问题，问他说：“有的人将‘己日’读作‘己（音纪）日’怎么样呢？”昙莹说：“岂止只有这一种说法？就是读作‘巳（音似）日’也能解释得通。”于是他解释说：“天元分为十干，从甲至己，己以后是庚，庚就是变革，所以说‘己日乃孚’，意思就是说从此而开始变革了。十二辰从子到巳共六个数，为阳，数到极点就要变，变就成为阴，于是下边就是午，午属阴，所以‘巳日乃孚’，可以解释为从这里开始取得诚信了。”由此可知好奇的人想穿凿附会，本来就各有各的说法。

开元五王

【原文】 唐明皇兄弟五王，兄申王 以开元十二年，宁王宪、 王守礼以二十九年，弟岐王范以十四年，薛王业以二十二年薨，至天宝时已无存者。杨太真以三载方入宫，而元稹《连昌宫词》云：“百官队仗避岐、薛，杨氏诸姨车斗风。”李商隐诗云：“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皆失之也。

【译文】 唐明皇共有弟兄五人封为亲王，哥哥申王李璿在开元十二年（724年），宁王李宪、 王李守礼在开元二十九年，弟弟岐王李范在开元十四年，薛王李业在开元二十二年便先后都去世，到唐明皇天宝年间，已没有一个活在世上。杨贵妃是天宝三年（744年）才进皇宫的，而元稹的《连昌宫词》里却说：“百官队仗避岐、薛（指岐王、薛王），杨氏诸姨车斗风。”李商隐的诗亦说：“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都是不符合史实的。

巫蛊之祸

【原文】 汉世巫蛊之祸，虽起于江充，然事会之来，盖有不可晓者。武帝居建章宫，亲见一男子带剑入中龙华门，疑其异人，命收之，男子捐剑走，逐之弗获。上怒，斩门候，闭长安城门，大索十一日，巫蛊始起。又尝昼寝，梦木人数十，持杖欲击己，乃惊寤，因是体不平，遂苦忽忽善忘。此两事可谓异矣。木将腐，蠹实生之。物将坏，虫实生之。是时帝春秋已高，忍而好杀，李陵所谓法令无常，大臣无罪夷灭者数十家。由心术既荒，随念招妄，男子、木人之兆，皆迷不复开，则谪见于天，鬼瞰其室。祸之所被，以妻则卫皇后，以子则戾园，以兄子则屈，以女则诸邑、阳石公主，以妇则史良娣，以孙则史皇孙。骨肉之酷如此，岂复顾他人哉？且两公主实卫后所生，太子未败数月前，皆已下狱诛死，则其母与兄岂有全理？固不待于江充之譖也。

【译文】 汉朝巫术为害的祸端虽说起于江充这个人，但事情发生的时机也有不可知的一面。汉武帝住在建章宫，亲眼看见一男子带剑进入中龙华门，怀疑不是平常人，下令逮捕，男子丢下剑就跑，追来追去也没抓住。武帝大怒，处斩了门卫，命令关闭长安城门，大事搜索了十一天。巫术为害从此开始兴起。又曾经有一次，武帝大白天睡觉，梦见有几十个木头人，手持棍棒要打他，就在

这时惊醒过来，此后身体一直不舒服，精神恍惚，爱忘事。这两件事都够怪异的。树木将要腐烂，实在是因为里面生了蠹虫；物体将要破坏，实在是因为里面生了蛀虫。当时汉武帝年事已高，残忍好杀，正如李陵所说的那时是法令变化无常，本来没罪的大臣被抄家灭族的就是几十家。由于心思已经淫乐放纵，伴随着各种杂念招来了形形色色荒诞不经的事，男子和木头人这两件事是一个先兆，都陷于迷乱而无法解释，可见这是上天要谴责时，鬼怪就要来窥视你的房室。这场巫蛊之祸所加于人的灾难，从妻子这方面说有卫皇后被废自杀，从儿子这方面说有戾园太子（刘据）逃亡自杀，从侄子这方面说有刘屈氂（武帝庶兄刘胜之子）下狱腰斩，从女儿这方面说有诸邑公主、阳石公主（二公主皆卫皇后之女）被杀，从媳妇这方面说有史良娣（戾园太子的内官）遇害，从孙子这方面说则有史皇孙（史良娣子）一同惨遭毒手。骨肉残杀是如此酷烈，又怎么会顾念他人呢！况且两位公主实际上是卫皇后所生，太子（刘据）还没有失败的几个月前，她们都已经被关押杀戮，那么她们的母亲和哥哥又怎么会有保全性命的道理，事情的发生本来就不必等待江充的诬陷。

唐诗无讳避

【原文】 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如白乐天《长恨歌》讽谏诸章，元微之《连昌宫词》，始末皆为明皇而发。杜子美尤多，如《兵车行》、前、后《出塞》、《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哀王孙》、《悲陈陶》、《哀江头》、《丽人行》、《悲青阪》、《公孙舞剑器行》，终篇皆是。其他波及者，五言如：“忆昨狼狈初，事与古先别。”“不闻夏商衰，中自诛褒姒。”“是时妃嫔戮，连为粪土丛。”“中宵焚九庙，云汉为之红。”“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拓境功未已，元和辞大炉。”“内人红袖泣，王子白衣行。”“毁庙天飞雨，焚宫火彻明。”“南内开元曲，常时弟子传。法歌声变转，满座涕潺湲。”“御气云楼敞，含风彩仗高。仙人张内乐，王母献宫桃。”“须为下殿走，不可好楼居。”“固无牵白马，几至著青衣。”“夺马悲公主，登车泣贵嫔。”“兵气凌行在，妖星下直庐。”“落日留王母，微风倚少儿。”“能画毛延寿，投壶郭舍人。”“斗鸡初赐锦，舞马更登床。”“骊山绝望幸，花萼罢登临。”“殿瓦鸳鸯坼，宫帘翡翠虚。”七言如：“关中小儿坏纪纲，张后不乐上为忙。”“天子不在咸阳宫，得不哀痛尘再蒙。”“曾貌先帝照夜白，龙池十日

飞霹雳。”“要路何日罢长戟，战自青羌连白蛮。”“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如此之类，不能悉书。此下如张祜赋《连昌宫》、《元日仗》、《千秋乐》、《大毬乐》、《十五夜灯》、《热戏乐》、《上巳乐》、《王小管》、《李谟笛》、《退宫人》、《玉环琵琶》、《春莺啭》、《宁哥来》、《容儿钵头》、《娘羯鼓》、《耍娘歌》、《悖儿舞》、《华清宫》、《长门怨》、《集灵台》、《阿汤》、《马嵬归》、《香囊子》、《散花楼》、《雨霖铃》等三十篇，大抵咏开元、天宝间事。李义山《华清宫》、《马嵬》、《骊山》、《龙池》诸诗亦然。今之诗人不敢尔也。

【译文】唐朝人的诗歌，对于前代和当时的事，往往能直截了当地写入诗里，毫不隐讳。甚至皇宫里的一些风流韵事，不是外边人所应知道的，诗人也反复张扬，而统治者也不怪罪他们。比如白居易《长恨歌》和进行讽刺劝谏的一些诗篇，元稹的《连昌宫词》，从头到尾都是针对唐明皇而写的。杜甫的此类诗尤其多，如《兵车行》、前、后《出塞》、《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哀王孙》、《悲陈陶》、《哀江头》、《丽人行》、《悲青阪》、《公孙舞剑器行》等，整篇都是讽刺时政。其他诗里涉及批评时政的句子，例如五言诗里有：“忆昨狼狈初，事与古先别。”“不闻夏商衰，中自诛褒姒。”“是时妃嫔戮，连为粪土丛。”“中宵焚九庙，云汉为之红。”“先帝正好武，环海未凋枯。”“拓境功未已，元和辞大炉。”“内人红袖泣，王子白衣行。”“毁庙天飞雨，焚宫火彻明。”“南内开元曲，常时弟子传。法歌声变转，满座涕潺湲。”“御气云楼敞，含风彩仗高。仙人张内乐，王母献宫桃。”“须为下殿走，不可好楼居。”“固无牵白马，几至著青衣。”“夺马悲公主，登车泣贵嫔。”“兵气凌行在，妖星下直庐。”“落日留王母，微风倚少儿。”“能画毛延寿，投壶郭舍人。”“斗鸡初赐锦，舞马更登床。”“骊山绝望幸，花萼罢登临。”“殿瓦鸳鸯坼，宫帘翡翠虚。”等等。

七言诗中有：“关中小儿坏纪纲，张后不乐上为忙。”“天子不在咸阳宫，得不哀痛尘再蒙。”“曾貌先帝照夜白，龙池十日飞霹雳。”“要路何日罢长戟，战自青羌连白蛮。”“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像这样的诗句还有很多，不能一一列举。

在此之后，张祜写的《连昌宫》、《元日仗》、《千秋乐》、《大毬乐》、《十五夜灯》、《热戏乐》、《上巳乐》、《王小管》、《李谟笛》、《退宫人》、《玉环琵琶》、《春莺啭》、《宁哥来》、《容儿钵头》、《娘羯鼓》、《耍娘歌》、《悖儿舞》、《华清宫》、《长门怨》、《集灵台》、《阿瞞汤》、《马嵬归》、《香囊子》、《散花楼》、《雨霖铃》等三十篇，基本上都是描写唐明皇开元、天宝年间的事。李商隐的《华清宫》、《马嵬》、《骊山》、《龙池》等诗也是这样。现在的诗人就不

敢这样写了。

李晟伤国体

【原文】 将帅握重兵居阃外，当国家多事时，其奉上承命，尤当以恭顺为主。唐李晟在德宗朝，破朱泚，复长安，功名震耀，盖社稷宗臣也。然尝将神策军戍蜀，及还，以营妓自随，节度使张延赏追而返之，由是有隙。晟既立大功，上召延赏入相，晟表陈其过恶，上重违其意，乃止。后岁余，上命韩 谕旨于晟使释怨， 因使晟表荐，延赏遂为相。然则辅相之拜罢，皆大将得制之，其伤国体甚矣。德宗猜忌刻薄，渠能释然！晟之失兵柄，正缘此耳。国学武成王庙，本列晟于十哲，乾道中有旨，退于从祀，寿皇圣意岂非出此乎？

【译文】 将帅统领大军在外，当国家可能发生变故的时候，他们辅助帝王接受命令，尤其应当以恭谨顺从为根本。唐朝的李晟在德宗（李适）时，打败朱 泚，收复长安，功名显赫，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同姓大臣。但他率领禁军入蜀戍守，返回时把当地官妓随身带走，节度使张延赏让人将官妓追回，从此两人的关系出现裂痕。李晟立下大功，德宗却注意延赏，召延赏为宰相，李晟上表陈述延赏的过错，德宗不愿违背李晟的意思，召延赏为宰相的事就停了下来。后来过了一年多，德宗命韩 谕告诉李晟，让李晟和延赏化解怨恨，韩谕于是让李晟上表推荐延赏，延赏遂成为宰相。如此看来，宰相的任命和罢免，全要受到大将的牵制，这种做法对于国家体制的伤害实在太严重了。德宗是一个猜忌刻薄的人，他怎么能放过得罪他的人。李晟后来丧失兵权，正因为上面的缘故罢了。国家所设学校里的武成王（唐封太公望为武成王）庙本来把李晟列为“十哲”之一，乾道年间，有圣旨要求把他降格为附祭，寿皇（宋孝宗赵昚）的意思难道不是也考虑到这一点吗？

元和六学士

【原文】 白居易分司东都，有诗《上李留守相公》，其序言：“公见过池上，泛舟举酒，话及翰林旧事，因成四韵。”后两联云：“白首故情在，青云往事空。同时六学士，五相一渔翁。”此诗盖与李绛者，其词正纪元和二年至六年事。予以其时考之，所谓五相者，裴贻、王涯、杜元颖、崔群及绛也。绍兴二十八年

三月，予入馆，明年八月，除吏部郎官，一时同舍秘书丞虞雍公并甫、著作郎陈魏公应求、秘书郎史魏公直翁、校书郎王鲁公季海，皆至宰相，汪庄敏公明远至枢密使，恩数与宰相等，甚类元和事云。

【译文】白居易到东都洛阳担任分司御史，有一首诗题目叫《上李留守相公》，其序言说：“李公来湖边我住处拜访，便一同在湖里泛舟饮酒，讲到过去同在翰林院任职时的一些旧事，因而有感写了这篇四韵的律诗。”诗的后两联是：“白首故情在，青云往事空。同时六学士，五相一渔翁。”这首诗是写给东都留守李绛的，内容是记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年）到六年间的事。我查考了这一段历史，所谓的五个宰相，是指裴、王涯、杜元颖、崔群和李绛。高宗皇帝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三月，我进入翰林院，第二年八月，又调到吏部担任郎官，同时任学士的还有秘书丞虞允文，后封雍国公；著作郎陈俊卿，后封魏国公；秘书郎史浩，后封魏国公；校书郎王淮，后封鲁国公，他们后来都官至宰相；还有汪澈，官至枢密使，此职被人们称为“使相”，地位相当于副宰相。这与元和年间事非常相似。

二传误后世

【原文】自左氏载石事，有“大义灭亲”之语，后世援以为说，杀子孙，害兄弟。如汉章帝废太子庆，魏孝文杀太子恂，唐高宗废太子贤者，不可胜数。《公羊》书鲁隐公、桓公事，有“子以母贵，母以子贵”之语，后世援以为说，废长立少，以妾为后妃。如汉哀帝尊傅昭仪为皇太太后，光武废太子强而立东海王阳；唐高宗废太子忠而立孝敬者，亦不可胜数。

【译文】《左传·隐公四年》记载石碏杀儿子的事后，评论说这是“大义灭亲”之举，后世人便以此为借口，随便杀子孙，害兄弟。比如汉章帝废掉太子庆，魏孝文帝杀太子恂，唐高宗废掉太子贤等等，举不胜举。《公羊传》记载鲁隐公、鲁桓公立后嗣的事，有“子以母贵，母以子贵”的话，后世人便以此为借口，废长立幼，以妾侍充当皇后、皇妃。比如汉哀帝把傅昭仪尊为皇太太后；汉光武帝废掉太子强而立年幼的东海王刘阳为太子；唐高宗废掉太子忠而立李弘为太子，这类事还有很多，举不胜举。

卜子夏

【原文】 魏文侯以卜子夏为师。按《史记》所书，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孔子卒时，子夏年二十八矣。是时，周敬王四十一年，后一年元王立，历贞定王、考王，至威烈王二十三年，魏始为侯，去孔子卒时七十五年。文侯为大夫二十二年而为侯，又十六年而卒，姑以始侯之岁计之，则子夏已百三岁矣，方为诸侯师，岂其然乎？

【译文】 战国时魏文侯聘请卜子夏为老师。根据《史记》记载，子夏比孔子小四十四岁，孔子去世时，子夏已二十八岁。当时是周敬王四十一年（公元前479年），过了二年周元王即位，又经周贞定王、周考王，到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周王室才正式任命魏斯为诸侯，这时距孔子去世已七十五年。魏文侯当了二十年大夫才被立为侯，又十六年后去世，姑且以他开始做诸侯的那一年算，当年子夏已一百零三岁，才当诸侯的老师，这种说法难道可信吗？

父子忠邪

【原文】 汉王氏擅国，王章、梅福尝言之，唯刘向勤勤恳恳，上封事极谏，至云：“事势不两大，王氏与刘氏亦且不并立。陛下为人子孙，守持宗庙，而令国祚移于外亲，降为皂隶。为后嗣忧，昭昭甚明。”其言痛切如此。而子歆乃用王莽举为侍中，为莽典文章，倡导在位，褒扬功德，安汉、宰衡之名，皆所共谋，驯致摄篡，卒之身亦不免。魏陈矫事曹氏，三世为之尽忠，明帝忧社稷，问曰：“司马懿忠正，可谓社稷之臣乎？”矫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懿竟窃国柄。至孙炎篡魏为晋，而矫之子骞乃用佐命勋，位极公辅。晋郗廙忠于王室，而子超党于桓氏，为温建废立之谋，超死，廙哀悼成疾。后见超书一箱，悉与温往反密计，遂大怒曰：“小子死恨晚！”更不复哭。《晋史》以为有大义之风。向、矫、廙之忠如是，三子不胜诛矣！

【译文】 汉朝时，王氏家族专权，王章、梅福都曾上书论述过王氏擅权的问题，惟有刘向，勤勤恳恳，上奏章竭力劝谏，说：“事势不能二者并存，王氏和刘氏同样不能并立。陛下作为刘家子孙，应当守护刘家的宗庙和天下，可是

却让国家大权转移到外戚王氏的手里，陛下的身份也将降到王氏奴仆的地位。现在应该为刘氏的后代而担忧，这道理是很明显的。”他的言语这么深刻痛切。但他的儿子刘歆，却被王莽举荐为侍中，专门为王莽管理文书，代笔写作，首先提出要王莽即位，为王莽歌功颂德，封王莽“安汉公”、“宰衡”这些名号，都是刘歆参与谋划出来的。他成功地帮助王莽篡位，最终却被王莽杀掉。三国时魏国的陈矫，三代都为曹氏尽忠，魏明帝担忧国家的前途，便问陈矫：“司马懿是个忠诚正直的大臣，他能称得上是国家的栋梁之臣吗？”陈矫回答说：“他在朝廷中地位是非常显赫的，但是否是忠于朝廷的国家栋梁，我就知道了。”后来司马懿竟篡夺了国家大权。到他的孙子司马炎时，便改国号为晋，而陈矫的儿子陈騫因为帮助司马炎篡位有功，而位极人臣。晋朝的郗癘，忠于司马氏，而他的儿子郗超却与桓温结党营私，替桓温策划废去废帝海西公、改立新帝的阴谋。郗超病死后，郗癘因为悲伤成疾。后来整理遗物，发现郗超的一箱书信，都是与桓温往来策划废立阴谋的内容，郗癘十分愤怒，说：“可惜这小子死得太晚了！”从此不再哭儿子。《晋史》以为他很有大义之风。刘向、陈矫、郗癘都如此忠诚，他们的儿子却参与废立皇帝，做大逆不道之事，真是太该死了，罪不容诛。

苏张说六国

【原文】 苏秦、张仪同学于鬼谷，而其从横之辩，如冰炭水火之不同，盖所以设心者异耳。苏欲六国合从以摈秦，故言其强。谓燕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谓赵地亦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谓韩地方九百里，带甲数十万，天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韩卒之勇，一人当百；谓魏地方千里，卒七十万；齐地方二千余里，临淄之卒，固已二十一万；楚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至于张仪，则欲六国为横以事秦，故言其弱。谓梁地方不过千里，卒不过三十万；韩地险恶，卒不过二十万；临淄、即墨非齐之有；断赵右肩；黔、巫非楚有；易水、长城非燕有。然而六王皆耸听敬从，举国而付之，未尝有一语相折难者，彼皆长君，持国之日久，逮其临事，乃顾如桔槔，随人俯仰，得不危亡幸矣哉！且一国之势，犹一家也。今夫主一家之政者，较量生理，名田若干顷，岁收谷粟若干；园若干亩，岁收桑麻若干；邸舍若干区，为钱若干；下至牛羊犬鸡，莫不有数，自非童孱愚之人，未有不能件析而枚数者，何待于疏远游客为吾借箸而筹哉？苟

一以为多，一以为寡，将遂挈挈然举而信之乎？晁错说景帝曰：“高帝大封同姓，齐七十余城，楚四十余城，吴五十余城，分天下半。”以汉之广，三国渠能分其半？此错欲削诸侯，故盛言其大尔。胶西王将与吴反，群臣谏曰：“诸侯地不能当汉十二，为叛逆非计也。”是时反者即吴、楚、诸齐，此胶西臣欲止王之谋，故盛言其小尔。二者视苏、张之言，疑若相似，而用心则否，听之者惟能知彼知己，则善矣。

【译文】 苏秦和张仪都是鬼谷子的学生，但他们合纵与连横的辩论却像冰炭水火那样大不相同，这不过是因为他们的用心迥异而已。苏秦想让燕、赵、韩、魏、齐、楚六国南北联合以对抗秦国，故意夸说那些国家强大的一面：称“燕国方圆二千余里，披甲将士数十万，战车六百辆，战马六千匹”；称“赵国也是方圆二千余里，披甲将士数十万，战车一千辆，战马一万匹”；称“韩国方圆九百里，披甲将士数十万，天下的精良武器都出自韩国，韩国的兵士骁勇，一个顶一百个”；称“魏国方圆一千里，军队七十万”；“齐国方圆二千余里，只是临淄一地的军队就已经达到二十一万”；“楚国方圆五千里，披甲将士上百万，战车一千辆，战马一万匹”。至于张仪，他是想让六国东西连为一体共同听命于秦国，故意挑剔那些国家弱小的一面：称“梁国（即魏国）方圆不过千里，兵士不过三十万”；“韩国地势险恶，兵士不过二十万”；“（秦若攻齐），临淄、即墨就不会再是齐国的了”；“（齐国献给秦国鱼盐之地，）等于斩断了赵国的右臂”；“（秦国一旦攻楚，）黔中、巫郡就不会再是楚国的了”；“（秦国如驱赵攻燕，）易水、长城就不会再是燕国的了”。然而六国的国君无不恭恭敬敬地言听计从，把国家交付给张仪，不曾有一句驳斥张仪的话。他们都是年长的国君，治理国家的时间也已经很久了，等到大事临头，竟反而像井上提水的桔槔，跟随他人的俯仰而上下起落，若能不陷入危亡境地就算是万幸了。况且从形势上说一个国家就像是一个家庭，现在主持家政的一家之主，衡量谋生之道，势必要计算私家的田产有多少顷，每年收获谷粟多少，园林有多少亩，每年所收桑麻有多少，房舍有多少区，值多少钱，甚至牛羊鸡狗，一切都心中有数，只要不是孩童呆傻的人，谁都能一件件进行分析，何必要等待远方来的游客，借用筷子指指点点为我指划呢？如果一个人认为多，一个人认为少，又将如何比较而完全相信其说法呢？晁错劝说汉景帝（刘启）说：“高祖（刘邦）大封同姓王，齐王（刘肥）封地七十余城，楚王（刘交）封地四十余城，吴王（刘濞）封地五十余城，分掉了天下一半的土地。”以汉朝的广大疆域来说，三个诸侯国难道能分去一半国土，这不过是晁错主张削弱诸侯，故意夸大其辞罢了。胶西王（刘端）准备与吴王（刘濞）反叛，群臣规劝说：“诸侯国的封地还抵不上汉朝国土的十分

之二，就此反叛，肯定不是取胜之策。”当时的反叛者即吴王（刘濞）、楚王（刘戊）与济南、淄川、胶东、胶西诸王，这是胶西王的臣属为了劝阻胶西王的反叛计划，故意夸说封地狭小罢了。晁错夸说诸侯封地过大，胶西王群臣极言封地过小，二者的说法和苏秦、张仪的言论比较起来，好像很类似，但彼此的用心则不同，只要听话的人做到知己知彼就好了。

卷三

一定之计

【原文】 人臣之遇明主，于始见之际，图事揆策，必有一定之计，据以为决，然后终身不易其言，则史策书之，足为不朽。东坡序范文正公之文，盖论之矣。伊尹起于有莘，应汤三聘，将使君为尧、舜之君，民为尧、舜之民，卒之相汤伐夏，俾厥后惟尧、舜，格于皇天。传说在岩野，爰立作相，三篇之书，皎若星日，虽史籍久远，不详纪其行事，而高宗克鬼方，伐荆、楚，嘉靖商邦，礼陟配天，载于《易》之《既济》，《书》之《无逸》，《诗》之《殷武》，商代之君莫盛焉。罔俾阿衡，专美有商，于是为允蹈矣。管仲以其君霸，商君基秦为强，虽圣门羞称，后世所贱，然考其为政，盖未尝一戾于始谋。韩信劝汉祖任天下武勇，以城邑封功臣，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传檄而定三秦；下魏之后，请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粮道，西会荥阳，至于灭楚，无一言不酬。邓禹见光武于河北，知更始无成，说帝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帝与定计议，终济大业。耿 与光武同讨王郎，愿归幽州，益发精兵，定彭宠，取张丰，还收富平、获索，东攻张步，以平齐地。帝常以为落落难合，而事竟成。诸葛亮论曹操挟天子令诸侯，难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可与为援而不可图。荆州用武之国，益州沃野千里，劝刘备跨有荆、益，外观时变，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及南方已定，则表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已而尽行其说，至于用师未战而身先死，则天也。房乔杖策谒太宗为记室，即收人物致幕府，与诸将密相申结，辅成大勋，至于为相，号令典章，尽出其手，虽数百年犹蒙其功。王朴事周世宗，当五季草创之际，上《平边策》，以为：“唐失吴、蜀，晋失幽、并，当知所以平之之术。当今吴易图，可挠之地二千里，攻虚击弱，则所向无前，江北诸州，乃国家之有也。既得江北，江之南亦不难平。得吴则桂、广皆为内臣，岷、蜀可飞书而召之，不至则四面并进，席卷而蜀平矣。吴、蜀平，幽可望风而至。唯并必死之寇，候其便则一削以平之。”世宗用其策，功未集而殁。至于国朝，扫平诸方，先后次第，皆不出朴所料。独幽州之举，既至城下，而诸将不能成功。若乃王安石颺国，言听计从，以身任天下之重，而师

慕商鞅为人，苟可以取民者，无不尽，遂诒后世之害，则在所不论也。

【译文】 臣子遇到英明的君主，在最初见面的时候，谋划事情制定策略，必然要提出一定的计划，并据此决定方针步骤，然后一辈子也不变地去实施，这样就载入史册，足可以使其不朽。苏东坡给范仲淹的文集作序，已经议论得十分透彻。伊尹出生于有莘（今山东曹县北，一说今河南伊川）之地，应允商汤对他的三次聘请，决心使汤成为尧、舜之君，使百姓成为尧、舜之民，最终帮助商汤灭掉了夏桀，以使其以后成为尧、舜盛世，这精神感动了上天。传说隐居在傅岩（今山西平陆东）的荒山野谷里，被任命为宰相，写了《说命三篇》，如同日月星辰一样光芒四射。虽然时代久远，古书里没有详细记载他的事迹，而商高宗攻克鬼方（古代小国，地点说法不一），征伐荆、楚（今湖北一带），安定了商国，功盖天下，德配天地，这在《易经》的《既济》，《书经》的《无逸》，《诗经》的《殷武》等篇里都有记载，商代的各朝君王，没有比高宗更有作为的了。所以傅说的功绩，足以使伊尹不能专美于商朝，这才是比较公平的。管仲使他的君主称霸于诸侯，商鞅为秦国强大奠定了基础，虽然儒家不称赞他们，后世的人亦不重视他们的学说，但是考查他们从政的经历，也不曾有一件事是违反他们当初所定谋略的。韩信劝汉高祖刘邦多依靠天下有武勇的人，把城邑分封给功臣，以义兵追击那些盼望回东方故乡的楚军将士，这样用一纸文告就可以平定三秦地区；后来攻下魏国以后，韩信又请汉王出兵北伐燕、赵，东击齐国，南面截断楚军运粮的道路，西边又在荥阳和楚霸王决战，终于灭掉楚国，没有一句话未实现。东汉时邓禹到河北去见光武帝刘秀，他知道更始帝刘玄不会有什么作为，就劝说光武帝招揽英雄，安定民心，建立像汉高祖刘邦那样的功业，以拯救全国百姓。光武帝与他认真商定了计划，终于统一了全国。耿弇与光武帝一同领兵去讨伐王郎，提出愿意回到幽州（今北京一带），征发更多的精兵，以平定彭宠叛乱，收复富平、获索，东攻张步，平定齐国地盘。光武帝常觉得耿弇性格孤癖，和人合不来，结果他竟然成就了大功。诸葛亮评论曹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很难与他相争；孙权占据江东，只能团结他做后援，而不能图谋占领他的地盘。荆州是个有利于用兵的地方，益州（今四川成都）沃野千里，劝刘备占据这两处地方，然后等待时局的变化，这样就可以创立霸业，汉朝的复兴也就有希望了，等到南方安定，则对三军加以表彰，率领他们北伐中原。以后，诸葛亮都是按这个策略进行的。至于出兵作战还没成功就病故了，那是天意。房玄龄骑着马去求见唐太宗，太宗任用他作记室，此后他便广泛聘请文士来作幕僚，并与武将们密切合作，终于辅佐唐朝建立大功。以后他任宰相，各种法令和典章制度，都是他亲手制订的，虽经过了几百年，他制订的法

令还在发挥作用。王朴在周世宗手下做官，当时正是五代混乱时候，国家草创，他就献上《平边策》，认为唐朝失去了吴地和蜀地，晋国失去了幽州、并州的地方，应当知道平定这些地方的策略。现在吴国是容易攻取的，可以攻击的地方有二千里，只要避实击虚，就一定会所向无敌，长驱直入，这样长江以北的各州县，便可为国家所有了。既得江北，江南的地方也就不难平定了。得到吴地的疆土，那么广西、广东等地方也就必定归附，四川一带，可以凭一纸檄文召降，如不来降，就可四面并进，席卷全川了。吴、蜀两地平定了，北方的幽州也就会闻风而降。只有并州（今山西太原西）是最凶恶、最顽固敌人，应当找时机一举把它消灭。”世宗采用了他的计策，可惜还没完成，世宗便病故了。到了宋朝建立，扫平了四方小国，其先后次序，都没有超出王朴的预料。只有征伐幽州一件事，兵已达城下，可是诸将攻城都未能成功。至于王安石当权的时候，皇上对他十分宠信，言听计从，可是他肩负治理天下的重任，却喜欢仿效商鞅的做法，凡是可以从百姓身上榨取到的财富，他没有不取的，以致给后世带来了祸害，这些他就在所不顾了。

太史慈

【原文】 三国当权、魏之际，英雄虎争，一时豪杰志义之士，落落，皆非后人所能冀，然太史慈者尤为可称。慈少仕东莱本郡为奏曹吏，郡与州有隙，州章劾之，慈以计败其章，而郡得直。孔融在北海为贼所围，慈为求救于平原，突围直出，竟得兵解融之难。后刘繇为扬州刺史，慈往见之，会孙策至，或劝繇以慈为大将军。繇曰：“我若用子义，许子将不当笑我邪？”但使慈侦视轻重，独与一骑，卒遇策，便前斗，正与策对，得其兜鍪。及繇奔豫章，慈为策所执，捉其手曰：“宁识神亭时邪？”又称其烈义，为天下智士，释缚用之，命抚安繇之子，经理其家。孙权代策，使为建昌都尉，遂委以南方之事，督治海昏。至卒时，才年四十一，葬于新吴，今洪府奉新县也，邑人立庙敬事。乾道中封灵惠侯，予在西掖当制，其词云：“神早赴孔融，雅谓青州之烈士。晚从孙策，遂为吴国之信臣。立庙至今，作民司命。一同之言状，择二美以建侯，庶几江表之间，尚忆神亭之事。”盖为是也。

【译文】 三国时正值汉、魏交替之际，英雄龙争虎斗，一时间志向远大的豪杰们，磊磊落落，都是后人比不上的，其中东吴大将太史慈，尤其值得称颂。他年轻时在故乡东莱郡（今山东半岛一带）担任奏曹吏，郡守和州官有矛盾，州

官上奏章弹劾郡守，太史慈用计破坏了他的诬告，郡守的冤屈才得以澄清。孔融任北海（今山东寿光东南）国相时被贼寇包围，太史慈为他到平原郡（今属山东）求救兵，单身冲出包围圈，终于搬来刘备的兵马，解了孔融的围。后来刘繇担任扬州刺史，太史慈前去求见，正好孙策领兵来攻扬州，有人劝刘繇任命太史慈为大将军，率兵抗拒孙策，刘繇说：“我如果用子义（太史慈的字）为将，恐怕许子将要嘲笑我部下无能人。”于是仅派太史慈一人一马去前方侦察孙策军队的虚实轻重，不巧在神亭与孙策遭遇，双方便厮打起来，经过一场恶斗，夺得孙策的头盔回来。后来刘繇失败逃往豫章（今江西南昌），太史慈被孙策擒获，孙策握着他的手说：“还记得咱二人在神亭那场恶斗吗？”又称赞太史慈忠义勇烈，是当今天下有才能的人，说着便亲手为太史慈松绑，任用他为将，并让太史慈去安抚刘繇的儿子，安排好刘繇家属的生活。孙权代替孙策在东吴执政后，任命太史慈为建昌（今江西奉新）都尉，遂委派他管理吴国南方的军政事务，设衙门于海昏（今江西永修）。太史慈去世时，年仅四十一岁，葬于新吴，这就是现在的洪府奉新县，当地的人给他盖了庙宇以便祭祀。孝宗乾道年间，下诏封太史慈为灵惠侯，实际上是尊他为神。我当时在中书省负责起草诏书，诏书中写道：“太史慈早年营救孔融，是青州声名卓著的有志于建功立业之士。后来又追随孙策，成为吴国忠心耿耿的大臣。自从建庙祭祀到现在，您一直是当地人民的保护神。采纳众口一声对你的赞美之词，根据你的两件被传为美谈的事迹，现在封您为惠灵侯，这样一来，大概长江流域一带的百姓，就都能记得神亭大战的壮烈了。”就是因为这件事。

谥法

【原文】 “先王谥以尊名，节以壹惠。”语出《表記》。然不云起于何时，今世传《周公谥法》，故自文王、武王以来始有谥。周之政尚文，斯可验矣。如尧、舜、禹、汤皆名，皇甫谧之徒附会为说，至于桀、纣，亦表以四字，皆非也。周王谥以一字，至威烈、贞定益以两，而卫武公曰睿圣武公，见于《楚语》。孔文子曰贞惠文子，见于《檀弓》。各三字，意当时尚多有之。唐诸帝谥，经三次加册，由高祖至明皇皆七字，其后多少不齐。代宗以四字，肃、顺、宪以九字，余以五字，唯宣宗独十八字，曰：元圣至明成武献文睿智章仁神聪懿道大孝。国朝祖宗谥十六字，唯神宗二十字，曰：体元显道法古立宪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盖蔡京所定也。

【译文】 “为逝世的先王加上尊贵的谥号，以概括他一生的功德。”这句话出于《礼记·表记》。但是没有说此制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现在流传有《周公谥法》，所以应该是从周文王、周武王时才开始有谥号的。这也是周朝崇尚文治的一个例证。至于尧、舜、禹、汤，则都是名字，皇甫谧等人穿凿附会地说他们都有谥号，甚至于说桀、纣有四字谥号，这些都是错误的。周王是用一个字的谥号，到周威烈王、贞定王，才增加到两个字。而卫武公的谥号是睿圣武公，这记载在《国语·楚语》里；孔文子的谥号是贞惠文子，见于《礼记·檀弓》；他们的谥号各有三个字，估计当时谥三字的人还有很多。唐朝皇帝们的谥号，经过三次的加封，从唐高祖到唐明皇，都是七字，此后就多少不齐了。唐代宗谥号是四字，唐肃宗、顺宗、宪宗的谥号是九个字，其余都是五个字，唯有宣宗的竟有十八个字，即：“元圣至明成武献文睿智章仁神聪懿道大孝”皇帝。我们大宋朝的历代皇帝，都是谥十六个字，唯有神宗皇帝是二十个字，即：“体元显道法古立宪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这是蔡京所定的。

汉文帝受言

【原文】 汉文帝即位十三年，齐太仓令淳于意有罪当刑，其女缇萦，年十四，随至长安，上书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罪。帝怜悲其意，即下令除肉刑。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议，请定律，当斩右止者反弃市，笞者杖背五百至三百，亦多死，徒有轻刑之名，实多杀人。其三族之罪，又不乘时建明，以负天子德意，苍、敬可谓具臣矣。史称文帝止辇受言，今以一女子上书，躬自省览，即除数千载所行之刑，曾不留难，然则天下事岂复有稽滞不决者哉？所谓集上书囊以为殿帷，盖凡囊封之书，必至前也。

【译文】 汉文帝继位的第十三年（前167年），齐王国的太仓令淳于意犯了罪，应当处以刑罚。淳于意的女儿叫缇萦，当时只有十四岁，随着被囚禁的父亲来到长安，向文帝上书说：“我愿意被官府没收去做奴婢，请求赎免父亲的刑罚。”文帝哀怜她的苦心，立即下令废除残害肉体的刑罚。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建议制定法律，认为：“应当砍掉右足的人反而执行死刑，应当打板子的打脊背五百至三百下，也大多数会死亡，白白落了个减刑的名义，实际上杀人更多了。犯人三族（父族、母族、妻族）连坐的罪名又不能及时定下来，这些都违背了皇帝轻罚减刑的用意和恩德。”张苍、冯敬可以说是十分称职的大臣。史书上称赞汉文帝能停下车来听人讲话，现在因为一个女孩子上书，他亲自监

察，立即废除了几千年来所实行的残害肉体的刑罚，竟然一点也不阻挠为难，这样天底下的事情难道还会有拖延不决的吗？传说汉文帝收集上书的封袋连缀成帐幔，看来只要是有封袋的上书都会送到他的面前。

丹青引

【原文】 杜子美《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云：“先帝天马玉花，画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牵来赤墀下，迥立闾阖生长风。诏谓将军拂绢素，意匠惨澹经营中。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廷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赐金，圉人、太仆皆惆怅。”读者或不晓其旨，以为画马夺真，圉人、太仆所为不乐，是不然。圉人、太仆盖牧养官曹及驭者，而黄金之赐，乃画史得之，是以惆怅，杜公之意深矣。又《观曹将军画马图》云：“曾貌先帝照夜白，龙池十日飞霹雳。内府殷红玛瑙盘，婕妤传召才人索。”亦此意也。

【译文】 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一诗说：“先帝天马玉花骢，画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牵来赤墀下，迥立闾阖生长风。诏谓将军拂绢素，意匠惨澹经营中。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廷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赐金，圉人、太仆皆惆怅。”读者或许不知道其中的含义，以为所画的马太逼真了，所以养马人和管马的官吏心中不高兴，其实，这种理解是不对的。圉人和太仆是养马和管马的人，而黄金却赏给画马的人，所以他们心理惆怅。杜甫这样说，其中的寓意是很深刻的。另外杜甫还有《观曹将军画马图》一诗说：“曾貌先帝照夜白，龙池十日飞霹雳。内府殷红玛瑙盘，婕妤传召才人索。”也是这个意思。

诗文当句对

【原文】 唐人诗文，或于一句中自成对偶，谓之当句对。盖起于《楚辞》“蕙兰藉”、“桂酒椒浆”、“桂棹兰砭”、“斫冰积雪”。自齐、梁以来，江文通、庾子山诸人亦如此。如王勃《宴滕王阁序》一篇皆然。谓若襟三江带五湖，控蛮荆引瓯越，龙光牛斗，徐孺陈蕃，腾蛟起凤，紫电青霜，鹤汀凫渚，桂殿兰宫，钟鸣鼎食之家，青雀黄龙之轴，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天高地迥，兴尽悲来，宇宙盈虚，丘墟已矣之辞是也。于公异《破朱磼露布》亦然。如“尧、舜、

禹、汤之德，统元立极之君；卧鼓偃旗，养威蓄锐；夹川陆而左旋右抽，抵丘陵而浸淫布，声塞宇宙，气雄钲鼓，咒作威，风云动色，乘其跼藉，取彼鲸鲵，自卯及酉，来拒复攻，山倾河泄，霆斗雷驰，自北徂南，舆尸折首，左武右文，销锋铸镝”之辞是也。杜诗：小院回廊春寂寂，浴凫飞鹭晚悠悠，清江锦石伤心丽，嫩蕊浓花满目斑，书签药里封蛛网，野店山桥送马蹄，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犬羊曾烂漫，宫阙尚萧条，蛟龙引子过，荷芰逐花低，干戈况复尘随眼，鬓发还应雪满头，百万传深入，环区望匪他。象床玉手，万草千花，落絮游丝，随风照日，青袍白马，金谷铜驼，竹寒沙碧，菱刺藤梢，长年三老，捩柁开头，门巷荆棘底，君臣豺虎边，养拙干戈，全生麋鹿，舍舟策马，拖玉腰金，高江急峡，翠木苍藤，古庙杉松，岁时伏腊，三分割据，万古云霄，伯仲之间，指挥若定，桃蹊李径，栀子红椒，庾信罗含，春来秋去，枫林桔树，复道重楼”之类，不可胜举。李义山一诗，其题曰《当句有对》云：“密迩平阳接上兰，秦楼鸳瓦汉宫盘。池光不定花光乱，日气初涵露气干。但觉游蜂饶舞蝶，岂知孤凤忆离鸾。三星自转三山远，紫府程遥碧落宽。”其他诗句中，如“青女素娥”，对“月中霜里”；“黄叶风雨”，对“青楼管弦”；“骨肉书题”，对“蕙兰蹊径”；“花须柳眼”，对“紫蝶黄蜂”；“重吟细把”，对“已落犹开”；“急鼓疏钟”，对“休灯灭烛”；“江鱼朔雁”，对“秦树嵩云”；“万户千门”，对“凤朝露夜。”如是者甚多。

【译文】 唐朝人的诗文中，有的在一句话里所使用的词汇两两相对，称为“当句对”。这种情形首先出现在《楚辞》的“蕙蛊兰藉（以蕙草包裹，以兰草垫底。“蕙蛊”对“兰藉”下同）、“桂酒椒浆（发桂花酿酒，以椒木浸渍）”、“桂棹兰橈（以桂木为棹，以木兰为橈）”、“斫冰积雪（凿开冰层，冲破积雪）”等句子中。从南北朝时期的齐、梁以来，江文通（江淹）、庾子山（庾信）等人也都是这样做的。譬如王勃的《宴滕王阁序》这篇文章，通篇都有当句对，好比说“襟三江带五湖（旁边围着三江和五湖）”、“控蛮荆引瓯越（前后靠着荆楚和闽越）”、“龙光牛斗（龙文光芒、牛斗星座）”、“徐孺陈蕃（都是汉朝人）”、“腾蛟起凤（蛟腾凤舞）”、“紫电青霜（电闪霜飞）”、“鹤汀凫渚（仙鹤栖息的小岛野鸭停留的小洲）”、“桂殿兰宫（桂树构建之殿木兰构建之宫）”、“钟鸣鼎食之家（鸣钟列鼎的人家）”、“青雀黄龙之轴（画有青雀黄龙的船舵）”、“落霞孤鹜（天西边的虹霞和孤单的野鸭）”、“秋水长天（秋水远天）”、“天高地迥（天高地远）”、“兴尽悲来（欢欣尽净悲哀袭来）”、“宇宙（上下四方古往今来）”、“盈虚（增长消减）”、“丘墟已矣（山丘和废墟都已成过去。按，原文是‘梓泽丘墟’）”，如此等等的词句就是这样。于公异的《破朱 露布》（《全唐文》卷

五一三《李晟收复西京露布》》也是如此，如“尧、舜、禹、汤之德（尧、舜、禹、汤的品德）”、“统元立极之君（开天辟地的君王）”、“夹川陆而左旋右抽（围绕山河之间左右周旋）”、“抵丘陵而漫淫布矚（抵达丘陵一带逐渐扩散）”、“声塞宇宙（天地间充塞着喊杀声）”、“气雄钲鼓（钲鼓传出雄强的气势）”、“睮兕作威（兵将耀武扬威）”、“风云动色（风云因此而变色）”、“乘其跲藉（趁其溃退中互相践踏）”、“取彼鲸鲵（擒获敌方首恶之人）”、“自卯及酉（从卯时至酉时）”、“来拒复收（失而复得）”、“山倾河泄（山河倾覆）”、“霆斗雷驰（雷霆奔驰）”、“自北徂南（从北往南）”、“輿尸折首（车载尸体，割取左耳）”、“左武右文（文武同建功勋）”、“销锋铸镝（销毁刀箭武器）”之类的句子就是这样。杜甫的诗句如“小院回廊春寂寂，浴凫飞鹭晚悠悠（小院回廊沐浴在寂静春光里，江边的野鸭白鹭在晚霞中自由飞翔）”、“清江锦石伤心丽，嫩蕊浓花满目斑（江水中有让人看了心情激动的彩色卵石，河岸上娇嫩浓艳的花朵满目斑斓）”、“书签药裹封蛛网，野店山桥送马蹄（很久以来没有翻书，只是在路上奔波）”、“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返程的战马比出征时跑得快，一路看到战后人家十不存一）”、“犬羊曾烂漫，宫阙尚萧条（来犯的吐蕃曾经嚣张一时，唐朝宫廷还没有振作起来）”、“蛟龙引子过，荷芰逐花低（秋水多而使水而加宽、蛟龙可带领儿子通过，水大泥少，荷花根部脱露，花朵低垂）”、“干戈况复尘随眼，鬓发还应雪满头（战乱不息，鬓发已白）”、“百万传深入，寰宇望匪他（百万北伐大军已向纵深开进，天下寄希望于李光弼北伐）”、“象床玉手（象牙床、白玉手）”、“万草千花”、“落絮游丝”、“随风照日”、“青袍白马（指严武幕府）”、“金谷铜驼（指洛阳）”、“竹寒沙碧”、“菱刺藤梢”、“长年三老（指老船工）”、“捩柁开头（指划船）”、“门巷荆棘底，君臣豺虎边（家园被荒草埋没，朝廷还处在豺虎旁边）”、“养拙干戈（在乱世用迂拙保全自己）”、“金生麋鹿（像麋鹿一样苟全性命）”、“舍舟策马”、“拖玉腰金”、“高江急峡”、“翠木苍藤”、“古庙杉松”、“岁时伏腊（每年的伏日和腊日）”、“三分割据”、“万古云霄”、“伯仲之间（兄弟之间）”、“指挥若定”、“桃蹊李径”、“梔子红椒”、“庾信罗含（都是古人名）”、“春去秋来”、“枫林桔树”、“复道重楼（驾在空中的通道和重重的楼阁）”等等，不胜枚举。李义山（李商隐）有一首诗，题目就叫《当句有对》，诗云：“密迩平阳接上兰，秦楼鸳瓦汉宫盘（地方邻近平阳府和上兰观，建筑样式富丽堂皇）。池光不定花光乱，日气初涵露气干（池水动荡，花光撩乱，早上日光开始照射露气渐干）。但觉游蜂饶舞蝶，岂知孤凤忆离鸾（花光撩乱招来众多蜂蝶，那里知道孤凤怀恋离鸾）。三星自转三山远，紫府程遥碧落宽（天上的心宿在转，海上神山邈远。海外仙宫漂渺，苍天宽阔无垠）。 ” 在其他的诗句里，如

以“青女素娥（霜神月神）”对“月中霜里”，“黄叶风雨”对“青楼管弦”、“骨肉书题（家人寄信）”对“蕙兰蹊径（怀念乡园）”、“花须柳眼（花蕊柳叶）”对“紫蝶黄蜂”、“重吟细把”对“已落犹开”、“急鼓疏钟”对“休灯灭烛”，“江鱼朔雁（江南的鱼，北方的雁）”对“秦树嵩云（关中的树、河南的云）”、“万户千门”对“风朝露夜（早晨的风，夜晚的露）”，像这样的句子非常多。

东坡明正

【原文】 东坡《明正》一篇送于盱眙失官东归云：“子之失官，有为子悲如子之自悲者乎？有如子之父兄妻子之为子悲者乎？子之所以悲者，惑于得也；父兄妻子之所以悲者，惑于爱也。”按《战国策》齐邹忌谓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也。”复问其妾与客，皆言“徐公不若君之美。”暮寝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东坡之斡旋，盖取诸此。然《四菩萨阁记》云：“此画乃先君之所嗜，既免丧，以施浮图惟简，曰：‘此唐明皇帝之所不能守者，而况于余乎！余惟自度不能长守此也，是以与子。’”而其末云：“轼之以是与子者，凡以为先君舍也。”与初辞意益不同，晚学所不晓也。

【译文】 苏东坡的《明正》一文，是送于 免官后东归故乡的，文章说：“你被免职后，有没有人像你自己一样为你感到悲伤呢？有没有人像你的父兄妻子一样为你悲伤呢？你自己之所以悲伤，是因为计较利害得失；父兄妻子之所以为你悲伤，是因为爱护你。”《战国策·齐策一》记载，齐国的邹忌曾对妻子说：“我的相貌与城北的徐公相比，谁长得漂亮？”他的妻子说：“当然是你长得漂亮，徐公怎能比得上你呢？”邹忌又问他的妾和客人，都说：“徐公不如你长得漂亮。”晚上，邹忌躺在床上想：“妻子说我比徐公漂亮，是因为偏爱我；妾说我漂亮是因为害怕我，客人说我漂亮是因为有事求我。”苏东坡用来安慰于失官的说法，就是从这里套来的。但他在《四菩萨阁记》中说：“这画是我父亲生前所珍爱的，三年的守丧期结束后，便布施给和尚惟简，并且说：‘这是唐明皇的遗物，他尚且不能让子孙永远保有，更何况我呢！我自知不能长期拥有这幅画，所以才赠送给你。’”而在这篇文章末尾又说：“我之所以把这幅画送给你，都是代替我父亲施舍的。”与文章开头的意思不同，这是我无法理解的。

台谏不相见

【原文】 嘉璽六年，司马公以修起居注同知谏院，上章乞立宗室为继嗣。对毕，诣中书，略为宰相韩公言其旨。韩公摄飧明堂，殿中侍御史陈洙监祭，公问洙：“闻殿院与司马舍人甚熟。”洙答以“顷年曾同为直讲”。又问：“近日曾闻其上殿言何事？”洙答以“彼此台谏官不相往来，不知言何事”。此一项温公私记之甚详。然则国朝故实，台谏官元不相见。故赵清献公为御史，论陈恭公，而范蜀公以谏官与之争。元丰中，又不许两省官相往来，鲜于子骏乞罢此禁。元璽中，谏官刘器之、梁况之等论蔡新州，而御史中丞以下，皆以无章疏罢黜。靖康时，谏议大夫冯 论时政失当，为侍御史李光所驳。今两者合为一府，居同门，出同幕，与故事异，而执政祭祀行事，与监察御史不相见云。

【译文】 嘉熈六年（1061年），司马公（司马光）从修起居注（侍从皇帝、记录皇帝言行）升任同知谏院（谏院的副长官，职责是向皇帝提出批评和建议），上奏章建议宋仁宗赵祯尽早从宗室中选出继承人。与仁宗对话以后，又到中书省（总掌行政大权的官署），向宰相韩公（韩琦）大略报告了他的建议。有一次韩公在明堂（皇帝宣明政教的地方）主持飧祭，殿中侍御史（御史台的监察官员，职责是纠察百官朝会时的失仪者）陈洙监祭。韩公问陈洙：“听说您和司马光很熟。”陈洙回答说：“近几年曾经和他一同担任直讲（国子监讲解经术的官员）。”韩公又问：“这几天曾听说他上殿面见皇帝，知道他说些什么事吗？”陈洙回答说“我们御史台和谏院的官员彼此不相往来，不知他说些什么事。”这件事温公（司马光封温国公）写进了他的日记，非常详细。既然如此，那么可以证明本朝的旧例，御史台和谏院的长官原来是不见面的。所以当赵清献公（赵，谥清献）任殿中侍御史，评论陈恭公（陈执中，谥恭）不学无术时，范蜀公（范镇，封蜀郡公）却以知谏院（谏院长官）的身份同他争辩。元丰年间，又不允许两省官（指门下省的给事中、起居郎、左散骑常侍、右谏议大夫、左司谏、左正言和中书省的中书舍人、起居舍人、右散骑常侍、右谏议大夫、右司谏、右正言）互相往来，鲜于子骏（鲜于暉）上书要求废除这个禁令。元熈年间，谏官刘器之（刘安世，当时任右正言）、梁况之（梁焘，当时任左谏议大夫）等连上奏章要求确定蔡新州（蔡确）有罪，而御史台方面因为失职不报，从御史中丞以下都被罢官。靖康（1126年）时，谏议大夫冯 评论当时的政治措施有不妥当的地方，遭到殿中侍御史李光的反驳。现在御史台和谏院合成一府，

出入同一个门口，乘坐同样的车幕，与旧日的典章制度完全不同，执政者（宋代的宰相称中书以下平章事，副职称参知政事，参知政事也称执政）主持的祭祀活动，也和监察御史没有见面的时候。

执政四入头

【原文】 国朝除用执政，多从三司使、翰林学士、知开封府、御史中丞进拜，俗呼为“四入头”。固有尽历四职而不用，如张文定公（谓仁、英朝，至神宗初始用）、王宣徽之类者。越清献公自成都召还知谏院，大臣言故事近臣自成都还，将大用，必更省府（谓三司使、开封府），不为谏官。以是知一朝典章，其严如此。至若以权侍郎方受告即为参枢，如施钜、郑仲熊者，盖秦桧所用云。

【译文】 我大宋朝任命正、副宰相，大多数是从三司使、翰林学士、知开封府、御史中丞中挑选出来的，所以人们俗称这四种职务为宰相的“四入头”。但也有做遍这四种官职，仍没有当宰相的，比如张方平（在仁宗、英宗朝都未能当宰相，到神宗时才拜相）、王宣徽等都是。赵 从成都被召回来，担任知谏院，大臣们说：按照惯例，大臣从成都召回，准备重用，必定要安排到三司或开封府任职，而不任谏官。由此可知当时典章制度，就是这样的严格。至于刚任代理侍郎就跻身宰相行列，如施钜、郑仲熊这样的人，只不过是出于秦桧专擅朝政、培植私人势力而已。

无望之祸

【原文】 自古无望之祸玉石俱焚者，释氏谓之劫数，然固自有幸不幸者。汉武帝以望气者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于是遣使者分条中都官诏狱系者，亡轻重一切皆杀之，独郡邸狱系者，赖丙吉得生。隋炀帝令嵩山道士潘诞合炼金丹不成，云无石胆石髓，若得童男女胆髓各三斛六斗，可以代之，帝怒斩诞。其后方士言李氏当为天子，劝帝尽诛海内李姓。以炀帝之无道嗜杀人，不啻草莽，而二说偶不行。唐太宗以李淳风言女武当王，已在宫中，欲取疑似者尽杀之，赖淳风谏而止。以太宗之贤尚如此，岂不云幸不幸哉！

【译文】 自古以来因为飞来横祸以致玉石俱焚的，佛家称之为“劫数”，但是也有幸与不幸之分。汉武帝时，望气的术士说长安监狱里有天子气，于是汉

武帝便派了使臣分头下令给京都里的有关官员，提出各狱犯人，不论罪行轻重，一律处死，只有郡邸狱所关押的皇曾孙刘病已（后改名为询），因为廷尉监丙吉的保护才幸免于难，这就是后来的汉宣帝。隋炀帝让嵩山道士潘诞合炼金丹，可是一直炼不成，他说是因为缺少石胆石髓，如能弄到童男童女的胆、髓各三斛六斗，便可以代替，炀帝闻听勃然大怒，下令将潘诞处死。后来方士又说李姓当为天子，劝炀帝把全国姓李的人统统杀掉，炀帝没有接受。像隋炀帝那样喜欢杀人的无道昏君，与土匪无异，以上两件事，他偶而没有实行。唐太宗听李淳风说以后姓武的女性当为天子，并且已经进宫，便打算把可疑的宫女全都杀掉，幸亏李淳风加以劝谏，才没有实施。像唐太宗这样英明杰出的皇帝尚且如此，所以说世间的事有幸运与不幸运之分。

燕说

【原文】 黄鲁直和张文潜八诗，其二云：“谈经用燕说，束弃诸儒传。滥觞虽有罪，末派 九县。”大意指王氏新经学也。燕说出于《韩非子》，曰：“先王有郢书，而后世多燕说。”又引其事曰：“郢人有遗燕相国书者，夜书，火不明，谓持烛者曰：‘举烛。’已而误书‘举烛’二字，非书本意也。燕相受书，曰：‘举烛者尚明也。尚明者举贤而用之。’遂以白王，王大说，国以治，治则治矣，非书意也。”鲁直以新学多穿凿，故有此句。

【译文】 黄庭坚与张文潜唱和的八首诗，其第二首说：“谈经用燕说，束弃诸儒传。滥觞虽有罪，末派贻九县。”这大致是针对王安石的新经学而说的。“燕说”，源出于《韩非子》一书。书中说：“先王有郢书，而后世多燕说。”作者接着又叙述此事的原委：“郢（楚国都城，今湖北江陵的纪南城）都有人夜里给燕国的相国写信，因为灯光不明，就对侍从说：‘举烛’（再点支蜡烛）。结果把‘举烛’两个字误写到信里去了，并不是信里原来的意思。燕相收到书信后，看到有‘举烛’二字，起初觉得奇怪，稍作思考后说道：‘举烛，就是崇尚光明，就是要多举荐贤能的人加以任用。’于是把这意思报告国王，国王十分高兴，从此大力选贤任能，结果使燕国大治。尽管如此，但此举却并非那封信里的本意。”黄庭坚以为王氏新学喜欢穿凿附会，所以才这样写的。

折槛行

【原文】 杜诗《折槛行》云：“千载少似朱云人，至今折槛空嶙峋。娄公不语宋公语，尚忆先皇容直臣。”此篇专为谏争而设，谓娄师德、宋睥也。人多疑娄公既无一语，何得为直臣？钱仲仲云：“朝有阙政，或娄公不语，则宋公语。”但师德乃是武后朝人，睥为相时，其亡久矣。杜有祭房相国文，言“群公间出，魏、杜、娄、宋”，亦并二公称之，诗言先皇，意为明皇帝也，娄氏别无显人有声开元间，为不可晓。

【译文】 杜甫的《折槛行》一诗里说：“千载少似朱云人，至今折槛空嶙峋。娄公不语宋公语，尚忆先皇容直臣。”这是专门为敢于直言劝谏皇帝的臣子而写的。所谓娄公、宋公，就是指唐朝的宰相娄师德和宋 。有人怀疑娄师德一言不发，怎么能称得上是直臣呢？钱仲仲曾说：“朝政有缺失的时候，娄师德不提出，宋 一定会提出”。但是娄师德是武则天当政时期的人，到宋 当宰相时，娄师德已死去多年了。杜甫又写过一篇祭房相国的文章，其中说道：“有名的宰相不断出现，有魏、杜、娄、宋等”，这里也把娄师德和宋 并称。先皇是指唐明皇，在唐明皇开元年间，并没有姓娄的达官贵人，所以杜甫的诗十分费解。

朱云 陈元达

【原文】 朱云见汉成帝，请斩马剑断张禹首。上大怒曰：“罪死不赦。”御史将云下，云攀殿槛，槛折，御史遂将云去。辛庆忌叩头以死争，上意解，然后得已。及后当治槛，上曰：“勿易。因而辑之，（辑与集同，谓补合也。）以旌直臣。”刘聪为刘后起砮仪殿，陈元达谏，聪怒，命将出斩之，时在逍遥园李中堂，元达先锁腰而入，即以锁绕堂下树，左右曳之不能动。刘氏闻之，私敕左右停刑，手疏切谏，聪乃解，引元达而谢之，易园为纳贤园，堂为愧贤堂。两人之事甚相类。云之免于死，由庆忌即时争救之故，差易为力。若元达之命在须臾间，聪之急暴且盛怒，何暇延留数刻而容刘氏得以草疏乎？脱使就刎其首，或令武士击杀亦可，何恃于锁腰哉？是为可疑也。成帝不易槛以旌云直，而不能命以一官，乃不若聪之待元达也。至今宫殿正中一间横槛，独不施栏癘，谓

之折槛，盖自汉以来相传如此矣。

【译文】 朱云晋见汉成帝（刘骘），请求赐给他斩马剑将张禹（曾任成帝的老师，当时为丞相）斩首。成帝大怒，说：“你胆敢诽谤我的老师，罪该万死，不能赦免！”御史要把朱云拿下，朱云抓住大殿的栏杆不放，栏杆折断，御史才把朱云抓走了。当时左将军辛庆忌免冠叩头，拼死为朱云争辩，成帝口气松下来，这样朱云才免于一死。到后来要重修大殿栏杆时，成帝说：“不用换成新的。就利用折断的栏杆补合一下，以便借此表彰直言谏诤的大臣。”刘聪为刘皇后建筑仪殿，陈元达出来劝阻。刘聪大为生气，命人把陈元达推出去斩了，事情当时发生在逍遥园李中堂，事先陈元达就有绳索锁在腰间，事情发生后便把绳索锁在树上，那些人怎么也拽不动他。刘皇后听到消息，私下传命让那些人停止动手，然后赶紧亲手写成奏书规劝刘聪，刘聪的怒气得以排解，拉着陈元达的手表示道歉，还把逍遥园改名为纳贤（绍纳贤才）园，把李中堂改名为愧贤（愧对贤者）堂。朱云、陈元达两个人的事迹十分相似。朱云能够免于死罪，是由于辛庆忌即刻挺身争辩救助的缘故，比较容易马上产生效果。像陈元达顷刻间性命就要完了，刘聪的性情急躁暴烈，又是在盛怒的情况下，哪里容得停留一些时间而让刘皇后写完奏书呢？倘若刘聪当时就让陈元达自刎，或者命令武士刺杀也可以，陈元达锁住自己的腰又有什么用呢？这是值得怀疑的。汉成帝保留旧栏杆以表彰朱云的直言不阿，但后来不能给朱云一官半职，竟不如刘聪对待陈元达那样好。到现在宫殿的正中央有一处用横排的栏杆隔开，只是不用横木连成一体，称作“折槛”，大概从汉代以来世代相传就是这样的吧。

杜老不忘君

【原文】 前辈谓杜少陵当流离颠沛之际，一饭未尝忘君，今略纪其数语云：“万方频送喜，无乃圣躬劳。”“至今劳圣主，何以报皇天？”“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天子亦应厌奔走，群公固合思升平。”如此一类非一。

【译文】 前辈们常说唐朝的著名诗人杜甫，在流离颠沛的处境中，一顿饭也没有忘记君王。这里略记他的一些诗句为证：“万方频送喜，无乃圣躬劳。”“至今劳圣主，何以报皇天？”“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天子亦应厌奔走，群公固合思升平。”像这样的句子还有很多。

栽松诗

【原文】 白乐天《栽松诗》云：“小松未盈尺，心爱手自移。苍然涧底色，云湿烟霏霏。栽植我年晚，长成君性迟。如何过四十，种此数寸枝？得见成阴否？人生七十稀。”予治圃于乡里，乾道己丑岁，正年四十七矣。自伯兄山居手移稚松数十本，其高仅四五寸，植之云壑石上，拥土以为固，不能保其必活也。过二十年，蔚然成林，皆有干霄之势。偶阅白公集，感而书之。

【译文】 白乐天（白居易）的《栽松》诗说：“小松未盈尺，心爱手自移（小松树不到一尺高，是我亲手移栽过来的）。苍然涧底色，云湿烟霏霏（像涧底松那样一片苍翠之色，笼罩在烟雨霏霏的氛围里）。栽植我年晚，长成君性迟（移栽时我已经进入晚年，而松树生长又很缓慢）。如何过四十，种此数寸枝（为什么年过四十，还要栽种这几寸高的松树呢）？得见成阴否，人生七十稀（人生七十古来稀，我还能看到松树长大成阴吗）。”我在家乡修治园圃时，正当乾道己丑（1169）年，当时已经四十七岁了，从大哥（洪适）家的住地亲手移来几十棵小松树，树高仅有四五寸，栽植在石头地上，培上土加固起来，不敢保证松树一定能成活。过了二十年，竟然形成了一片繁茂的松林，松树一棵棵都有上冲云霄的气势。偶然翻阅白公的文集，有所感慨而写了这段话。

乌鹊鸣

【原文】 北人以乌声为喜，鹊声而非；南人闻鹊噪则喜，闻乌声则唾而逐之，至于弦弩挟弹，击使远去。《北齐书》，奚永洛与张子信对坐，有鹊正鸣于庭树间，子信曰：“鹊言不善，当有口舌事，今夜有唤，必不得往。”子信去后，高俨使召之，且云敕唤，永洛诈称堕马，遂免于难。白乐天在江州，《答元郎中杨员外喜乌见寄》，曰：“南宫鸳鸯地，何忽乌来止。故人锦帐郎，闻乌笑相视。疑乌报消息，望我归乡里。我归应待乌头白，惭愧元郎误欢喜。”然则鹊言固不善，而乌亦能报喜也。又有和元微之《大觜乌》一篇云：“老巫生奸计，与乌意潜通。云此非凡鸟，遥见起敬恭。千岁乃一出，喜贺主人翁。此乌所止家，家产日夜丰。上以致寿考，下可宜田农。”按微之所赋云：“巫言此乌至，财产日丰宜。主人一心惑，诱引不知疲。转见乌来集，自言家转孳。专听乌喜怒，信

受若长离。”今之乌则然也。世有传《阴阳局鸦经》，谓东方朔所著，大略言凡占乌之鸣，先数其声，然后定其方位，假如甲日一声，即是甲声，第二声为乙声，以十干数之，乃辨其急缓，以定吉凶，盖不专于一说也。

【译文】 北方人认为乌鸦鸣叫是有喜事，喜鹊鸣叫则不吉；南方人听到喜鹊鸣叫则喜，听到乌鸦鸣叫就吐唾沫把它赶走，甚至拿弹弓击打它，让它远远地飞走。《北齐书》里记载：奚永洛和张子信对坐，有喜鹊在庭院的树上鸣叫，子信说：“喜鹊的叫声不善良，可能会出现口舌之事，今天夜里如果有人召唤你去，你一定不要前往。”子信走后，琅玕王高俨派人来叫他，并说是奉皇帝旨意来的，永洛假称从马上跌下受伤，不能前往，结果免去一场灾难。白居易在江州（今江西九江）作官时，写了一首《答元郎中杨员外喜乌见寄》的诗，内容是：“南宫鸳鸯地，何忽乌来止。故人锦帐郎，闻乌笑相视。疑乌报消息，望我归乡里。我归应待乌头白，惭愧元郎误欢喜。”由此可见，喜鹊鸣叫并不是好事，而乌鸦鸣亦能报喜。白居易又有一首唱和元稹《大觜乌》的诗说：“老巫生奸计，与乌意潜通。云此非凡鸟，遥见起敬恭。千岁乃一出，喜贺主人翁。此乌所止家，家产日夜丰。上以致寿考，下可宜田农。”元稹的原诗是：“巫言此乌至，财产日丰宜。主人一心惑，诱引不知疲。转见乌来集，自言家转孽。专听乌喜怒，信受若长离。”现在人对乌鸦也是这样的。世上流传有一种《阴阳局鸦经》，据说是汉朝的东方朔所作。这书大略说凡用乌鸦的叫声来预测凶吉，应先数它的叫声，然后看它的方位，假如是甲日叫第一声就是甲声，第二声就是乙声，以十天干来计数，再看它叫声的轻重缓急，以判断吉凶，也就是说，乌鸦鸣叫有吉有凶，而不机械地认定一种说法。

卷 四

淮南守备

【原文】 周世宗举中原百郡之兵，南征李景。当是时，周室方强，李氏政乱，以之讨伐，云若易然。而自二年之冬，讫五年之春，首尾四年，至于乘輿三驾，仅得江北。先是河中李守贞叛汉，遣其客朱元来唐求救，遂仕于唐。枢密使查文徽妻之以女。是时，请兵复诸州，即取舒、和。后以恃功偃蹇，唐将夺其兵，元怒而降周。景械其妻，欲戮之。文徽方执政，表乞其命，景批云：“只斩朱元妻，不杀查家女。”竟斩于市。郭廷谓不能守濠州，以家在江南，恐为唐所种族，遣使诣金陵禀命，然后出降。则知周师所以久者，景法度犹存，尚能制将帅死命故也。绍兴之季，虜骑犯淮，逾月之间，十四郡悉陷。予亲见沿淮诸郡守，尽扫官库储积，分寓京口，云预被旨许令移治。是乃平时无虞，则受极边之赏，一有缓急，委而去之，寇退则反，了无分毫 于吏议，岂复肯以固守为心也哉？

【译文】 五代时，周世宗柴荣发动了中原倾国的军队，征讨南唐。当时，后周正处于强盛阶段，而南唐李氏政治却十分混乱，用兵去征讨它，可以说是很容易取胜的。但是，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 年）冬天起，直到显德五年的春天，历时四年，并且三次御驾亲征，才仅仅占领了长江以北地区。在这以前，河中（今山西永济一带）节度使李守贞背叛北汉，曾派遣客卿朱元来南唐求救，朱元竟留在南唐做了官，又娶了枢密使查文徽的女儿为妻。这时，朱元请求出兵收复南唐失去的土地，并很快攻克了舒州（今安徽潜山）、和州（今安徽和县）等地。后来朱元居功骄傲，南唐打算解除他的兵权，朱元一怒之下又投降了周世宗。李景便把朱元的妻子囚禁起来，准备杀掉。这时查文徽正在南唐政府里当权，便上表乞求保全女儿的性命，李景批示说：“只斩朱元妻，不杀查家女。”结果还是把她斩头示众了。南唐的将军郭廷无法固守濠州（今安徽凤阳），因为家室在江南，害怕家属亲族被南唐杀掉，所以派人到金陵（今南京）报告请示以后，才出城向周兵投降。由此可见，周兵征伐南唐之所以花费了很长时间，是因为李景的法度还在，仍然能够牢牢地控制将帅。高宋绍兴年间，金国的军队

侵犯江淮一带，不过一个多月时间，就攻陷十四个郡的地方。我亲眼看到江淮一带的地方官们，带着地方官库的全部财产，逃到江南京口寄居，他们声称是事先得到皇帝的允许，敌兵来时可以把地方政府临时迁到安全地方去。因此，在平安定的时候，他们可以享受到守边将吏的特殊赏赐，一旦形势危急，就可以舍弃边关而逃离，等敌人退去后再返回，丝毫不把社会舆论放在心上。这样一来，他们还怎么能有固守疆土的决心呢？

周世宗

【原文】 周世宗英毅雄杰，以衰乱之世，区区五六年间，威武之声，震慑夷夏，可谓一时贤主，而享年不及四十，身没半岁，国随以亡。固天方授宋，使之驱除。然考其行事，失于好杀，用法太严，群臣职事，小有不举，往往置之极刑，虽素有才干声名，无所开宥，此其所短也。薛居正《旧史》纪载翰林医官马道元进状，诉寿州界被贼杀其子，获正贼见在宿州，本州不为勘断。帝大怒，遣窦仪乘 往按之。及狱成，坐族死者二十四人。仪奉辞之日，帝旨甚峻，故仪之用刑，伤于深刻，知州赵砺坐除名。此事本只马氏子一人遭杀，何至于族诛二十四家，其他可以类推矣。《太祖实录》、《窦仪传》有此事，史臣但归咎于仪云。

【译文】 五代后周世宗英明刚毅是杰出的君主，在衰乱的时势中，短短五六年中，威武的名声，震动了中国和外夷，可以说是一时贤明君主，而享年不到四十岁，死后半年，国家随着灭亡。固然是老天保佑宋朝，叫他给宋朝驱除敌人。但考察他的行为，失误在于好杀，用刑法太严厉，群臣管事务的，小有不称职，往往处以极刑，虽然素有才干和声名，也不宽恕，这是他的短处。薛居正《旧五代史》记载翰林医官马道元呈进状子，诉说寿州界中有盗贼杀了他儿子，捕获凶手正身现正在宿州，而本州不给审判处理。皇帝大怒，派窦仪坐快马车去按问。到案狱定下时，因此族诛死的二十四人。窦仪受命那天，皇帝旨意很严峻，所以窦仪使用刑法，失于深求苛刻，知州赵砺因此削职为民。这事本来只有马氏儿子一个人被杀，何至于要族灭二十四家，其他事可以类推了。《太祖实录·窦仪传》记有这件事，史官只归罪于窦仪而已。

窦贞固

【原文】 窦贞固，汉隐帝相也。周世罢政，以司徒就第。后范质用此官在中书，乃归洛阳。常与编户课役，贞固不能堪，诉于留守向拱，拱不听。熙宁初，富韩公为相，神宗尝对大臣称知河南府李中师治状。公以中师厚结中人，因对曰：“陛下何从知之？”中师衔其沮己，及再尹河南，富公已老，乃籍其户，令出免役钱，与富民等。乃知君子失势之时，小人得易而侮之，如向拱、李中师辈，固不乏也。

【译文】 窦贞固是五代时后汉隐帝的宰相。后周建立后，他被免去宰相职务，以司徒衔回家休养。后来范质做了司徒，掌握国家大权，贞固便回洛阳闲住。在洛阳，他常常与普通百姓一样承担赋税徭役，实在不堪忍受，便向西京留守向拱诉苦，向拱不予理睬。神宗熙宁年间，韩国公富弼担任宰相时，神宗曾对大臣们称赞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尹李中师的政绩，富弼知道李中师是送厚礼交结宦官，让他们为自己吹嘘的，但不好明说，便问皇帝说：“陛下是从哪里知道这些事的呢？”从此，李中师心中恼恨富弼拆自己的台。后来，李中师再次任河南府尹时，富弼已经年老退休，住在洛阳，李中师便把他编入平民户籍，让他出免役钱，负担与富裕的百姓一样。由此可知，君子在失势的时候，很容易受到小人们的轻视、欺侮，像向拱、李中师这样的小人，自古就不少见。

郑权

【原文】 唐穆宗时，以工部尚书郑权为岭南节度使，卿大夫相率为诗送之。韩文公作序，言：“权功德可称道。家属百人，无数亩之宅，僦屋以居，可谓贵而能贫，为仁者不富之效也。”《旧唐史》权传云：“权在京师，以家人数多，奉入不足，求为镇，有中人之助。南海多珍货，权颇积聚以遗之，大为朝士所嗤。”又《薛廷老传》云：“郑权因郑注得广州节度，权至镇，尽以公家珍宝赴京师，以酬恩地。廷老以右拾遗上疏，请按权罪，中人由是切齿。”然则其为人，乃贪邪之士尔！韩公以为仁者何邪？

【译文】 唐穆宗时，任用工部尚书郑权为岭南节度使，公卿大夫们一起作诗送行。韩文公（韩愈）作序，说：“郑权的功德可以称道。他的家属上百个人

没有几亩地的住宅，租了房子居住，可以说是尊贵之后能守清贫，致力于仁道就不富裕的表现。”《旧唐书·郑权传》：“郑权在京城，因家人众多，俸禄收入不够支出，要求出去镇守外地，有宦官从中帮助，当时南海郡多有珍宝，郑权积聚了很多去贿赂那宦官，大大地被朝臣所讥笑。”又《薛廷老传》说：“郑权因为靠郑注帮助得任广州节度使，郑权到任后，把公家的珍宝全送往京城，用来酬报恩德。薛廷老以右拾遗身分上疏，请求按问郑权的罪名，宦官因此切齿痛恨薛廷老。”那么郑权的为人，乃是贪污邪恶的人而已，韩公为什么要把他说成仁者呢？

党锢牵连之贤

【原文】 汉党锢之祸，知名贤士死者以百数，海内涂炭，其名迹章章者，并载于史。而一时牵连获罪，甘心以受刑诛，皆节义之士，而位行不显，仅能附见者甚多。李膺死，门生故吏并被禁锢。侍御史景毅之子，为膺门徒，未有录牒，不及于谴。毅慨然曰：“本谓膺贤，遣子师之，岂可以漏籍苟安！”遂自表免归。高城人巴肃被收，自载诣县，县令欲解印绶与俱去，肃不可。范滂在征羌，诏下急捕。督邮吴导至县，抱诏书，闭传舍，伏床而泣。滂自诣狱，县令郭揖大惊，出解印绶，引与俱亡。滂曰：“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张俭亡命，困迫遁走，所至，破家相容。其所经历，伏重诛者以十数。复流转东莱，上李笃家。外黄令毛钦操兵到门，笃谓曰：“张俭亡非其罪，纵俭可得，宁忍执之乎？”钦抚笃曰：“蘧伯玉耻独为君子，足下如何自专仁义？”叹息而去。俭得免。后数年，上禄长和海上言：“党人锢及五族，非经常之法。”由是自从祖以下，皆得解释。此数君子之贤如是，东汉尚名节，斯其验欤？

【译文】 汉朝时，因党锢之祸被处死的知名贤士数以百计，使全国人民都遭受到很大的灾难，其事迹昭著的人士已经名列史册。可是一时因牵连而获罪、甘心受刑的都是一些有气节的忠义之士，由于他们的地位和知名度不高，因此有许多人只能在史书中附见于别人的传记之后。李膺被处死以后，他的学生和下属被牵连而遭囚禁的人很多。侍御史景毅的儿子，是李膺的学生，因为没有登记在册，所以未受到追查。景毅斩钉截铁地说：“我原以为李膺是个品德学问高尚的人，所以才让儿子拜他为师，现在岂能因为漏载入册而苟安度日呢！”于是自己上表辞职还家。高城（今河北盐山）人巴肃被列入搜捕名单，他便自己到县衙投案，县令打算封印，和他一同逃亡，巴肃没有同意。范滂被免职后住

在征羌县（今河南偃城东部）故乡，朝廷又下诏立即逮捕他，所派来的督邮吴导来到县里后，心中不忍，抱着诏书，紧闭客馆的房门，躺在床上哭泣。范滂知道后，亲自去监狱投案。县令郭揖大吃一惊，要抛弃官印和他一同逃亡。范滂说：“我一死这场灾祸也就平息了，怎能连累你呢！”张俭因被追捕而流亡在外，凡是他所到的地方，主人总是冒着家破人亡的危险来收留他。在他住过的人家当中，后来被处以死刑的有十几户。张俭又流亡到东莱郡（今山东半岛一带），投奔到外黄（今河南杞县东）李笃家里。外黄县令毛钦闻讯，领兵包围了李笃家，李笃对他说：“张俭被迫流亡，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罪过，即使能把他捕获，难道你忍心抓吗？”毛钦抚摩着李笃的肩膀说：“春秋时的蘧伯玉耻于独自当正人君子，先生为什么这样独占仁义呢？”说罢，叹息着领兵回去了，张俭这才免于被捕。过了几年，上禄（今甘肃成县西南）县长和海上奏疏说：“搜捕禁锢党人而牵连五族，捕人太多，这不是长治久安的办法。”因此，朝廷才把党人自从祖父以下旁支亲属都释放出来。这几个君子的品德都是这么好，东汉时人注重名节，这不是个很好的例证吗？

汉代文书式

【原文】 汉代文书，臣下奏朝廷，朝廷下郡国，有《汉官典仪》、《汉旧仪》等所载，然不若金石刻所著见者为明白。《史晨祠孔庙碑》，前云：“建宁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鲁相臣晨，长史臣谦顿首死罪上尚书，臣晨顿首、顿首，死罪、死罪。”末云：“臣晨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上尚书。”副言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司农府。《樊毅复华下民租碑》，前后与此同。《无极山碑》：“光和四年某月辛卯朔廿二日壬子，太常臣耽、丞敏顿首上尚书。”末云：“臣耽愚戆，顿首、顿首上尚书。制曰：可。大尚（读为太常）承书从事，某月十七日丁丑，尚书令忠奏雒阳宫。光和四年八月辛酉朔，十七日丁丑，尚书令忠下。”又云：“光和四年八月辛酉朔，十七日丁丑，太常耽、丞敏下。”《常山相孔庙碑》，前云：“司徒臣雄、司空臣戒，稽首言。”末云：“臣雄、臣戒愚戆，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闻。制曰：可。元嘉三年三月廿七日壬寅，奏雒阳宫。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七日壬寅，司徒雄、司徒戒下鲁相的。”又云：“永兴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辛酉，鲁相平、行长史事、卞守长擅，叩头死罪，敢言之司徒、司空府。”末云：“平惶恐叩头，死罪、死罪，上司空府。”此碑有三公奏天子，朝廷下郡国，郡国上公府三式，始末详备。

文惠公《隶释》有之。无极山祠事，以丁丑日奏雒阳宫，是日下太常；孔庙事，以壬寅日奏雒阳宫，亦以是日下鲁相，又以见汉世文书之不滞留也。

【译文】 汉代的公文，无论是臣子上奏朝廷的，还是朝廷下达地方的，其格式都记载在《汉官典仪》、《汉旧仪》等书里，但是不如留传下来的碑刻记载得更详细更明白。《史晨祠孔庙碑》所载，前边说：“建宁二年（169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鲁相臣晨、长史臣谦顿首死罪上尚书，臣晨顿首顿首，死罪死罪。”末尾说：“臣晨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上尚书。”并附带提到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司农府等。《樊毅复华下民租碑》前后格式与此相同。《无极山碑》开头说：“光和四年（181年）某月辛卯朔廿二日壬子，太常臣耽、丞敏顿首上尚书。”末尾说：“臣耽愚戆，顿首顿首上尚书。制曰：可。大尚（读太常）承书从事，某月十七日丁丑，尚书令忠奏雒阳宫。光和四年八月辛酉朔十七日丁丑，尚书令忠下。”又说：“光和四年八月辛酉朔十七日丁丑，太常耽、丞敏下。”《常山相孔庙碑》前边说：“司徒臣雄、司空臣戒稽前言。”末尾说：“臣雄、臣戒愚戆，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闻。”下为皇帝批语：“制曰：可。”办理此事的过程为：“元嘉三年（153年）三月廿日壬寅，奏雒阳宫。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七日壬寅，司徒雄、司空戒下鲁相。”又记有“永兴元年（153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鲁相平、行长史事、太守长擅，叩头死罪，敢言之司徒、司空府。”末尾是：“平惶恐叩头，死罪死罪，上司空府。”这块碑有三公上奏皇帝、朝廷下达郡国和地方官上报公府三种文书的格式，公文处理始末都记载得十分详细完备。我的哥哥文惠公洪适编著的《隶释》一书里记载有这些碑文。无极山祭祀的事情是丁丑日在雒阳宫上奏皇帝的，当天就批下来给太常；孔庙的事，是壬寅日在雒阳宫上奏皇帝，也是当天就批复给鲁相，由此又可以看出汉代公文处理速度的快捷，很少积压。

资治通鉴

【原文】 司马公修《资治通鉴》，辟范梦得为官属，尝以手帖论撰述之要，大抵欲如《左传》叙事之体。又云：“凡年号皆以后来者为定。如武德元年，则从正月，便为唐高祖，更不称隋义宁二年。梁开平元年正月，便不称唐天监四年。”故此书用以为法。然究其所穷，颇有窒而不通之处。公意正以《春秋》定公为例，于未即位，即书正月为其元年。然昭公以去年十二月薨，则次年之事，不得复系于昭。故定虽未立，自当追书。兼经文至简，不过一二十字，一览可

以了解。若《通鉴》则不侔，隋炀帝大业十三年，便以为恭皇帝上，直至下卷之末，恭帝立，始改义宁，后一卷，则为唐高祖。盖凡涉历三卷，而炀帝固存，方书其在江都时事。明皇后卷之首，标为肃宗至德元载，至一卷之半，方书太子即位。代宗下卷云：“上方励精求治，不次用人。”乃是德宗也。庄宗同光四年，便系于天成，以为明宗，而卷内书命李嗣源讨邺，至次卷首，庄宗方殂。潞王清泰三年，便标为晋高祖，而卷内书石敬瑭反，至卷末始为晋天福。凡此之类，殊费分说。此外，如晋、宋诸胡僭国，所封建王公，及除拜卿相，纤悉必书，有至二百字者。又如西秦丞相南川宣公出连乞都卒，魏都坐大官章安侯封懿、天部大人白马文正公崔宏、宜都文成王穆观、镇远将军平舒侯燕凤、平昌宣王和其奴卒，皆无关于社稷治乱。而周勃薨，乃不书。及书汉章帝行幸长安，进幸槐里、岐山，又幸长平，御池阳宫，东至高陵，十二月丁亥还宫；又乙未幸东阿，北登太行山，至天井关，夏四月乙卯还宫。又书魏主七月戊子如鱼池，登青冈原，甲午还宫；八月己亥如泽，甲寅登牛头山，甲子还宫。如此行役，无岁无之，皆可省也。

【译文】 司马光奉旨编纂《资治通鉴》，聘请范祖禹参加，曾经亲笔写一些手谕给他，讲述编辑要点，大体要求同《左传》一样使用编年叙事的体例。又说：“凡同一年内的年号，都以后来的那个为准。如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同时又是隋恭帝义宁二年，则从正月起便是唐高祖武德元年，不再称隋义宁二年。五代梁开平元年（907年）正月，就不称唐天璽四年。”所以，这部书凡遇到同一年内有两年号的都采用这种处理办法。但是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有些讲不通的地方。司马光的本意是以《春秋》鲁定公为例，在定公尚未即位时，就记正月是他的元年。但是，因为昭公死于上年十二月，第二年的事，当然不能再放到昭公名下，所以这时定公虽然还没有当国君，自然得把前几个月的事情追记在他的名下。况且，《春秋》经文十分简单，每年记事不过一二十字，一览可知。但《通鉴》就大为不同了。比如，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便标为隋恭帝上卷，但是直至下卷末尾，恭帝即位，才改元义宁；紧接着的一卷便是唐高祖武德元年的事。这里前后共涉及三卷，而隋炀帝还在世，内文记载的是他在江都（今江苏扬州）的事。唐明皇后卷的开头，标为唐肃宗李亨至德元年（756年），到一卷内容过半，才写到太子李亨即位。唐代宗下卷说：“皇上正在励精图治，不断破格使用人才。”说的却是唐德宗。唐庄宗同光四年（926年），便记为明宗天成元年，而卷内却记载皇帝命李嗣源（明宗本名）去征讨邺郡（今河南安阳一带），到下一卷初，庄宗李存勖才驾崩，明宗即位。潞王清泰三年（936年），便标为晋高祖天福元年，而卷内记载有石敬瑭（晋高祖本名）叛

乱，直到卷末，才为晋天福元年。像这种情况，解释起来都十分费力。此外，还记载了晋、宋等割据一方的少数民族国家，他们所封的王公，以及所任命的大臣、宰相，都记的十分详尽，有的记到二百字之多。又如，本书记载了西秦丞相南川宣公出连乞都的死，魏国章安侯封懿的死，还记有文正公崔宏、文成王穆观、平舒侯燕凤、平昌宣王和他的奴仆等人的死，这些都是无关国家政权和社会安定的事。而有关汉朝历史变化的周勃之死，却没有记载。还记载了汉章帝出游长安（今陕西西安），并游槐里，岐山，又到长平，住进池阳宫，向东到高陵（以上各地均在今陕西省），十二月丁亥还宫；又于乙未日游行东阿，北登太行山，到天井关，夏天四月回到宫里。又记有魏国国君七月到鱼池、游览青冈原，甲午回宫；八月又到瞻泽、牛头山游览，甲子回宫等。像这些游览的事，每年都有，完全可以省略不记。

弱小不量力

【原文】 楚庄王伐萧，萧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杀，吾退。”萧人杀之，王怒，遂灭萧。楚伐莒，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杀，吾归而俘。”莒人杀之，楚师围莒，莒溃，遂入郢。齐侯伐鲁，围龙，顷公之嬖人卢蒲就魁门焉，龙人囚之。齐侯曰：“勿杀，吾与而盟，无入而封。”弗听，杀而膊诸城上。齐遂取龙。夫以齐、楚之大，而莒一小国，萧一附庸，龙一边邑，方受攻之际，幸能囚执其人，强敌许以勿杀而退师，乃不度德量力，致怨于彼，至于亡灭，可谓失计。传称子产善相小国，使当此时，必有以处之矣。

【译文】 春秋时期，楚庄王率兵攻打萧国（今安徽萧县），萧国把楚国的熊相宜僚和公子丙囚禁起来，准备杀掉。庄王说：“不要杀他们，我可以退兵。”萧国人不听，坚持把二人杀了。楚庄王大怒，立即进兵灭掉了萧国。楚庄王又征伐莒国（今山东莒县），莒国把楚国的公子平囚禁起来，准备杀掉。楚国人说：“不要杀他，我们可以放还你们被俘的兵将。”莒国人不听，同样把公子平杀了。楚国军队于是包围了莒国，莒国军队溃败，国君只好逃到郢国（今山东沂水县北）去。齐国发兵征伐鲁国，包围了鲁国的龙（今山东泰安）地，齐顷公派宠幸的侍臣卢蒲就魁去劝降，龙地的人便乘机把卢蒲就魁囚禁起来。齐顷公说：“不要杀他，我可以与你们讲和结盟。”龙人不听，反而把卢蒲就魁杀了，并悬尸城头示众。齐国人一怒之下攻占了龙地。齐、楚是实力雄厚的大国，而莒是个小国，萧是个更弱的附庸国，龙只不过是边境的一个小城，在他们受到攻击

的时候，幸好能擒获对方的要人，强敌许诺只要不杀人质就可以退兵，这实在是个保全小国自己的好机会。可是莒国却不考虑自己的力量，以致结怨大国，自取灭亡，可谓是大大的失策。相传子产特别擅长治理小国，如果子产处于这种情况下，一定会有好办法妥善处理的。

田横 吕布

【原文】 田横既败，窜居海岛中。高帝遣使诏之，曰：“横来，大者王，小者乃侯耳。”横遂与二客诣雒阳。将至，谓客曰：“横始于汉王俱南面称孤，今汉王为天子，而横乃为亡虏，北面事之，其愧固已甚矣！”即自刭。横不顾王侯之爵，视死如归，故汉祖流涕称其贤，班固以为雄才。韩退之道出其墓下，为文以吊曰：“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其英烈凛然，至今犹有生气也。吕布为曹操所缚，将死之际，乃语操曰：“明公之所患，不过于布，今已服矣。令布将骑，明公将步，天下不足定也。”操竟杀之。布之材未必在横下，而欲忍耻事仇。故东坡诗曰：“犹胜白门穷吕布，欲将鞍马事曹瞒。”盖笑之也。刘守光以燕败，为晋王所擒，既知不免，犹呼曰：“王将复唐室以成霸业，何不赦臣使自效？”此又庸奴下才，无足责者。

【译文】 田横兵败以后，率领残兵逃到海岛上去。汉高祖刘邦派人去召降，说：“田横若来，说大了可以封王，说小了也可以封为侯爵。”田横于是带着两位门客前往洛阳。快要到达的时候，田横对门客说：“我过去和汉王刘邦都是诸侯王，都南面称孤道寡，现在汉王当了天子，而我却成了亡国奴，要我向他叩头称臣，这实在是一件十分羞耻的事！”随即拔剑自杀。田横不羡慕王侯爵位，视死如归，所以汉高祖听到田横自杀消息后，流着眼泪称赞他的贤良。班固则认为田横是一个“雄才”。唐朝的韩愈路过田横墓时，写了一篇文章悼念他说：“自古以来死去的人太多了，而先生虽死，而光芒至今还照耀人间。”田横那种英烈凛然的气节，至今还有着强大的生气。三国时，吕布被曹操活捉，将要被处死的时候，吕布对曹操说：“您所惧怕的，不过就是我吕布罢了，现在我已愿意降服了。如果能让我统领一支骑兵，您则统领步军，我们携手合作，天下就不难平定了。”最后曹操还是把他杀了。吕布的勇武未必在田横之下，可是他却想忍受耻辱去投靠仇敌，所以苏东坡曾有诗说：“犹胜白门穷吕布，欲将鞍马事曹瞒。”这是对吕布的嘲笑。五代时后梁的刘守光自称燕帝，占据了卢龙（今河北北部），后来被晋王石敬瑭击败，自己也被擒获。刘守光自知不能活命了，还

哀求石敬瑭说：“大王想恢复唐朝以成就霸业，为什么不能赦免我的罪过，让我立功自效呢？”这个人是个庸碌无行的小人，奴性十足，根本不值得一提。

中山宜阳

【原文】 战国事杂出于诸书，故有不可考信者。魏文侯使乐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故任座云：“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翟璜云：“中山已拔，无使守之，臣进李克。”而《赵世家》书武灵王以中山负齐之强，侵暴其地，锐欲报之，至于变胡服，习骑射，累年乃与齐、燕共灭之，迁其王于肤施。此去魏文侯时已百年，中山不应既亡而复存，且肤施属上郡，本魏地，为秦所取，非赵可得而置他人，诚不可晓。惟《乐毅传》云：“魏取中山，后中山复国，赵复灭之。”《史记·六国表》：“威烈王十二年，中山武公初立。”徐广曰：“周定王之孙，西周桓公之子。”此尤不然。宜阳于韩为大县，显王三十四年，秦伐韩，拔之。故屈宜臼云：“前年秦拔宜阳。”正是昭侯时。历宣惠王、襄王，而秦甘茂又拔宜阳，相去几三十年，得非韩尝失此邑，既而复取之乎？

【译文】 战国时期的历史只是零星地见载于多种图书，所以有很多事情难以考证清楚。魏文侯派乐羊率兵征伐中山国（今河北定县），攻克以后，魏文侯把它作为自己儿子的封地。所以他的臣子任座批评说：“国君得到中山，不封给自己的兄弟，却封给自己的儿子。”另一个臣子翟璜也说：“中山国已经攻下来了，但还没有派人去镇守，我推荐李克去。”而《史记·赵世家》却说，赵武灵王因为中山依靠强大的齐国作为靠山，时常侵犯赵国的领土，于是下定决心要报复，甚至于大力实行改革，要求从国君开始，全国的人都要穿上胡人的服装，练习骑射，又过了几年，才与齐、燕等国，共同攻灭了中山国，并把中山王迁到肤施（今陕西延安）。这时距魏文侯时已经有一百年，中山国不应该既被文侯所灭，却还仍然存在；而且肤施属于上郡，本是魏国的地方，早已被秦国攻占，赵国是不可以随便安置人的，这实在不好理解。惟有《史记·乐毅列传》记载：“魏国占领中山，后来中山复国，赵国又攻灭了中山。”《史记·六国表》记载：“威烈王十二年（公元前414年），中山武公初立。”徐广则说：“武公是周定王之孙，西周桓公之子。”这就更矛盾了。宜阳（今属河南）是韩国的一个大县，周显王三十四年（公元前335年），秦国伐燕时占领宜阳，所以屈宜臼说：“前年秦军攻克宜阳。”这正是韩昭侯时的事，以后又经过韩宣惠王、襄王，秦国的甘茂又占领宜阳，两者相差近三十年，莫不是韩国失去这座城池后，又将它收

复了呢？

相六畜

【原文】 《庄子》载徐无鬼见魏武侯，告之以相狗、马。《荀子》论坚白同异云：“曾不如好相鸡、狗之可以为名也。”《史记》褚先生于《日者传》后云：“黄直，丈夫也，陈君夫，妇人也，以相马立名天下。留长孺以相彘立名。荥阳褚氏以相牛立名。皆有高世绝人之风。”今时相马者间有之，相牛者殆绝，所谓鸡、狗、彘者，不复闻之矣。刘向《七略》《相六畜》三十八卷，谓骨法之度数，今无一存。

【译文】 《庄子》记载徐无鬼去见魏武侯，告诉他一些相狗相马的方法。《荀子》里论述坚白同异时也说过：“还不如善于相鸡、相狗那样更容易扬名于世呢！”《史记·日者列传》后边褚少孙先生说：“黄直是个男人，陈君夫，是个妇女，以善于相马而闻名天下。留长孺以善于相猪著称。荥阳褚氏以善于相牛著称。这些人都有超凡脱俗的风范。”现在，会相马的人有时还能见到，而会相牛的人，则几乎绝灭了，至于所谓的相鸡、相狗、相猪的人，很久以来就没有听说过了。汉朝刘向编著的《七略》中，著录有《相六畜》三十八卷，讲究骨法的度数，到现在已经没有一种流传下来。

卜筮不同

【原文】 《洪范》七、稽疑，择建立卜筮人，有“龟从，筮逆”之说。《礼记》：“卜筮不相袭。”谓卜不吉，则又筮，筮不吉，则又卜，以为渎龟。《左传》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从筮。”卜人曰：“筮短龟长，不如从长。”鲁穆姜徙居东宫，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杜预注云：“《周礼》大卜掌三《易》，杂用《连山》、《归藏》，二《易》皆以七、八为占，故言遇《艮》之八。史疑古《易》遇八为不利，故更以《周易》占，变爻得《随》卦也。”汉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取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辩讼不决，以状闻。制曰：“避诸死忌，以五行为主。”则历卜诸家，自古盖不同矣。唐吕才作《广济阴阳

百忌历》，世多用之。近又有《三历会同集》，搜罗详尽。姑以择日一事论之，一年三百六十日，若泥而不通，殆无一日可用也。

【译文】 《尚书·洪范》九畴第七“稽疑”中说，选择善于卜筮的人，分别让他们用龟甲占卜或用蓍草占卦，其中有“用龟甲占卜同意，用蓍草占卜不同意”的说法。《礼记》说：“卜和筮是不会重复的。”意思是说占卜的结果不吉，又去占筮；占筮的结果不吉，又去占卜，这是对卜筮的一种亵渎。《左传》记载，晋献公打算立骊姬为夫人，占卜得到的结果是不吉，又占筮，得到的结果却是吉利。献公说：“就依筮占的结果吧。”占卜的人说：“龟卜是表现形象的，筮占是计数的，事物先有形象、然后才有数字，所以筮短龟长，龟应在先，不如依据长的。”鲁穆姜迁居东宫，用蓍草占凶吉，得到的结果是艮之八。史官说：“这就《艮》卦变为《随》卦。”杜预注解：“《周礼》中讲过大卜掌管三《易》，常杂用夏朝的《连山易》和商朝的《归藏易》，这两种《易》都是用七、八来占卦的。所以说占得的是艮之八。古人以为古代《易》上称遇八为不吉利，所以后来改用《周易》占卜。爻变得到随卦，所以称之为“艮之随。”汉武帝时，朝廷曾把各种流派的占卜家召集到一起，问他们说：“某日可不可以娶妇？”五行家说：“可以。”堪舆家说：“不可以。”建除家说：“不吉。”丛辰家说：“大凶。”历数家说：“小凶。”天人家说：“小吉。”太一家说：“大吉。”结果各家争论不休，无法决定，只好奏报给汉武帝。武帝说：“避开各种死忌日期，以五行家为主。”由此可见择日、占卜的各家各派，自古就存在着分歧。唐朝的吕才，著有《广济阴阳百忌历》一书，世人多使用这本历书。近来又出现了一种《三历会同集》，搜罗的内容非常详尽。暂且拿选择吉日这一件事来说，一年三百六十天，如果拘泥于历书而不知变通，那么一年之中恐怕就没有一天可以使用了。

日者

【原文】 《墨子》书《贵义》篇云：“子墨子北之齐，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听，遂北，至淄水，不遂而返。日者曰：‘我谓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若子之言，不可用也。’”《史记》作《日者列传》，盖本于此。徐广曰：“古人占候卜筮，通谓之曰者。”如以五行所直之日而杀其方龙，不知其旨安在，亦可谓怪矣。

【译文】 《墨子》中的《贵义》篇说：“墨子先生向北到齐国去，路上遇到一位日者（古时指以占候卜筮为业的人），日者说：‘今日是天帝杀黑龙于北方的日子，而先生的肤色黑，很不吉利，因而不可往北走。’墨子先生没有听从，而是坚持继续北行，到达淄水，因渡河受阻只好返回。日者说：‘我说先生不可以往北走，现在应验了吧？’墨子先生说：‘淄水那里，南边的人无法过河往北走，北边的人也不能过河往南走，他们皮肤颜色有黑的，有白的，为什么都不顺利呢。况且，像你所说的那样，天帝于甲乙日杀青龙于东方，于丙丁日杀赤龙于南方，于庚辛日杀白龙于西方，于壬癸日杀黑龙于北方，这是不可信的。’”《史记》中的《日者列传》，出处大概就在这里。徐广注释说：“古人对以占候卜筮为业的人，统称为日者。”如果在五行当值的日期，而杀他那一方的龙，不知道其用意何在，这也可以说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了。

柳子厚 党叔文

【原文】 柳子厚、刘梦得，皆坐王叔文党废黜。刘颇饰非解谤，而柳独不然。其《答许孟容书》云：“早岁与负罪者亲善，始奇其能，谓可以共立仁义，裨教化。暴起领事，人所不信，射利求进者，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恣怨，诋诃万状，尽为敌仇。”及为叔文母刘夫人墓铭，极其称诵，谓：“叔文坚明直亮，有文武之用。待诏禁中，道合储后。献可替否，有康弼调护之勤；谟定命，有扶翼经纬之绩。将明出纳，有弥纶通变之劳；内赞谟画，不废其位。利安之道，将施于人。而夫人终于堂，知道之士，为苍生惜焉！”其语如此。梦得自作传云：“顺宗即位时，有寒俊王叔文以善弈棋得通籍博望，因间隙得言及时事，上大奇之。叔文自言猛之后，有远祖风，唯吕温、李景俭、柳宗元以为信。然三子皆与予厚善，日夕过，言其能。叔文实工言治道，能以口辩移人。既得用，其所施为，人不以为当。上素被疾，诏下内禅，宫掖事秘，功归贵臣，于是叔文贬死。”韩退之于两人为执友，至修《顺宗实录》，直书其事云：“叔文密结有当时名欲侥幸而速进者刘禹锡、柳宗元等十数人，定为死交，踪迹诡秘。既得志，刘、柳主谋议唱和，采听外事。及败，其党皆斥逐。”此论切当，虽朋友之义，不能以少蔽也。

【译文】 柳子厚（柳宗元）、刘梦得（刘禹锡）都因王叔文党被废弃贬黜。刘梦得作了不少掩饰来消除诽谤，唯独柳子厚不这样。他在《答许孟容书》中说：“我早年和负有罪名的人友善，起初以他才能为奇，认为可以一起建立仁义

之道，有益于教化。突然起来掌管政事，人们所不信任，而求利想进身的人，百人中没一人得到满足。一旦得意，人们就更放肆地怨恨，用种种方法诋毁，都成了敌人。”到他给王叔文的母亲刘夫人作墓志铭时，极力称赞，说：“王叔文坚定明察忠直坦率，有文武才干，在宫禁中待诏召见，他的学说和太子相符合。进献计谋否定不合适的意见，有辅佐德行调理保护的勤劳。称叹谋议，有扶助经纬邦国的功绩。奉命去明辨发出的和收到的文书，有经纶国事通达变化的劳绩。在内帮助皇帝定政策，使各人不失其职掌。利国安民的道理，行将施于人民。而太夫人寿终于堂上，懂得大道的士人，为百姓惋惜。”他的话是这样。刘梦得自己作传说：“顺宗即位时，有寒门的才俊之士王叔文以善于下棋得以通名籍于博望苑（汉武帝为太子设立的接见宾客场所）因此得到机会论及时政，皇上大为赏识。王叔文自称是晋代王猛的后代，有他远祖的遗风，只有吕温、李景俭、柳宗元相信他。但三人都和我结交很厚，每天来往，讲王叔文的才能。王叔文实在很会说话，能用口才辩论改变人的想法。他既被任用，他的所作所为，人们不以为确当。皇上素来有病，下诏禅位给太子，宫中事情很秘密，功劳归于尊贵的臣僚，于是王叔文被贬死去。”韩退之（韩愈）和柳、刘二人是朋友，至于修《顺宗实录》，直记这事说：“王叔文暗中勾结当时有名气，而且有侥幸于快速进升的人刘禹锡、柳宗元等十几个人，定为生死交，行踪诡异秘密。已得志后，刘禹锡、柳宗元倡计谋互相唱和，打听外边的事情，到失败后，他们的党羽都被贬斥驱逐。”这议论切实妥当，虽然有朋友的道义，不能稍为给他们掩饰。

汉武心术

【原文】 《史记·龟策传》：“今上即位，博开异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技之士咸得自效。数年之间，太卜大集。会上欲击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预见表象，先图其利。及猛将推锋执节，获胜于彼，而蓍龟时日亦有力于此。上尤加意，赏赐至或数千万。如丘子明之属，富溢贵宠，倾于朝廷。至以卜筮射蛊道，巫蛊时或颇中。素有眦睚不快，因公行诛，恣意所伤，以破族灭门者，不可胜数。百僚荡恐，皆曰龟策能言。后事觉奸穷，亦诛三族。”《汉书音义》以为史迁没后十篇阙，有录无书。元、成之间，褚先生补阙，言辞鄙陋，《日者》、《龟策列传》在焉。故后人颇薄其书。然此卷首言“今上即位”，则是史迁指武帝，其载巫蛊之冤如是。今之论议者，略不及之。《资治通鉴》亦

弃不取，使丘子明之恶，不复著见。此由武帝博采异端，驯致斯祸。倘心术趋于正当，不如是之酷也。

【译文】 《史记·龟策列传》说：“当今皇上即位后，才大开艺能的门路，把各种学说的人都请了来，通一种技艺的人都得以发挥其功效。几年之中，掌管卜筮的人大量聚集。正遇到皇上想攻击匈奴，西边开拓大宛，南面收取百越，卜筮时甚至所预见征兆，先图谋其利益。到勇猛的将军手执锋刃符节，在那些地方取胜，而蓍草龟卜及关于时日的推算也有这方面的功劳。皇上尤其注意，所以有些人受赏赐到几千万。像丘子明等人，富足贵宠，使朝廷中人为之倾倒。至于以卜筮来查察有人用蛊术谋害的事，也常常很能查出巫蛊的情况。素来和卜筮者有怨恨的人，他们就借此加以诛杀，随意伤害，因此破族灭门的人，不可胜计。百官们都很恐惧，都以为龟壳蓍草能向皇帝进言。后来事情发觉奸计穷尽，也被诛灭三族。《汉书音义》以为司马迁死后《史记》缺少十篇，有目录而无书。元帝、成帝之间褚先生（褚少孙）补缺，文辞鄙陋，《日者》、《龟策》列传在其中，所以后来人很看不起这书。但此卷开首说：“当今皇上即位”，则应是司马迁指汉武帝而言，其中记载巫蛊之事冤枉人的情况如此。现在的议论者，全不提到此文。《资治通鉴》中舍弃不取，使丘子明的罪恶，不再为人知道。这是由于汉武帝广采种种异端，招致这灾祸。如果他心术正当，不应该这样残酷的。

禁天高之称

【原文】 周宣帝自称天元皇帝，不听人有天、高、上、大之称。官名有犯，皆改之。改姓高者为姜，九族称高祖者为长祖。政和中，禁中外不许以龙、天、君、玉、帝、上、圣、皇等为名字。于是毛友龙但名友；叶天将但名将；乐天作但名作；句龙如渊但名句如渊；卫上达赐名仲达；葛君仲改为师仲；方天任为大任；方天若为元若；余圣求为应求；周纲字君举，改曰元举；程振字伯玉，改曰伯起；程 亦字伯玉，改曰伯禹；张读字圣行，改曰彦行。盖蔡京当国，遏绝史学，故无有知周事者。宣和七年七月，手诏以昨臣僚建请，士庶名字有犯天、玉、君、圣及主字者悉禁，既非上帝名讳，又无经据，谄佞不根，贻讥后世，罢之。

【译文】 南北朝时期，北周宣帝自称“天元皇帝”，于是不允许别人用“天、高、上、大”等字作名字，官名中有犯这几个字的，一律更改。又改姓高

的为姓姜，九族中的高祖改称长祖。本朝徽宗皇帝政和年间，曾下令中外，不允许臣民使用“龙、天、君、玉、帝、上、圣、皇”等字作名字。于是毛友龙改名为毛友，叶天将改名为叶将，乐天作改名为乐作，句龙如渊改名为句如渊；卫上达被皇帝赐名为卫仲达，葛君仲改名为葛师仲，方天任改名为方大任，方天若改名为方元若，余圣求改名为余应求；周纲字君举，改为元举；程振字伯玉，改为伯起；程 的字也是伯玉，改为伯禹；张读字圣行，改为彦行。这是因为蔡京掌权，禁止人们学历史，所以没有人知道北周已闹过这种笑话。到宣和七年（1125 年）七月，徽宗才颁布手诏说：以前臣下曾经提出，官员和百姓名字中有犯天、玉、君、圣和主字的都要禁止；这些字既不是上帝名号，又没有经典可以依据，实在是谄媚者的无稽之谈，只能给后人留下笑柄，所以一律废除。

宣和冗官

【原文】 宣和元年，蔡京将去相位，臣僚方疏官僚冗滥之敝，大略云：“自去年七月至今年三月，迁官论赏者五千余人。如辰州招弓弩手，而枢密院支差房推恩者八十四人；兖州升为府，而三省兵房推恩者三百三十六人。至有入仕才二年，而转十官者。今吏部两选朝奉大夫至朝请大夫六百五十五员，横行右武大夫至通侍二百二十九员，修武郎至武功大夫六千九百九十一员，小使臣二万三千七百余员，选人一万六千五百余员。吏员猥冗，差注不行。”诏三省枢密院令遵守成法。然此诏以四月庚子下，而明日辛丑以赏西陲诛讨之功，太师蔡京，宰相余深、王黼，知枢密院邓洵武，各与一子官，执政皆迁秩。天子命令如是即日废格之，京之罪恶至矣！

【译文】 宣和元年（1119 年），蔡京将要离开宰相之位，臣僚们刚上疏说到官员繁衍昌滥的弊端，大略说：“从去年七月到今年三月，升官行赏的有五千多人。如辰州招募弓弩手，而枢密院支差房中受到恩赏的八十四人；兖州升格为府，而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兵房中蒙受恩赏的三百三十六人。甚至有进朝做官不到两年而十次升转官职的人。现在吏部文武官员的选举从朝奉大夫到朝清大夫共六百五十五员，从横行右武大夫到通直侍郎二百二十九员，修武郎至武功大夫六千九百九十一员，小使臣二万三千七百多员，应选人一万六千五百多员。吏员猥琐冗滥，差注的办法已不实行。”皇帝下诏给三省和枢密院命令他们遵守已定的法律。但这诏书在四月庚子下达，而明天辛丑日就以赏赐西部边境讨伐

夏国的功劳，给太师蔡京、宰相余深、王黼、知枢密院邓洵武等，各人给一个儿子官职，执政官都加俸禄。皇帝的命令如此等于是当日就废止和搁置了昨天的诏书，蔡京的罪恶是重到极点了。

卷五

秦隋之恶

【原文】 自三代讫于五季，为天下君而得罪于民，为万世所麾斥者，莫若秦与隋，岂二氏之恶浮于桀、纣哉？盖秦之后即为汉，隋之后即为唐，皆享国久长。一时论议之臣，指引前世，必首及之，信而有征，是以其事暴白于方来，弥远弥彰而不可盖也。尝试哀举之。

张耳曰：“秦为乱政虐刑，残灭天下，北为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外内骚动，头会箕敛，重以苛法，使父子不相聊。”张良曰：“秦为无道，故沛公得入关，为天下除残去贼。”陆贾曰：“秦任刑法不变，卒灭嬴氏。”王卫尉曰：“秦以不闻其过亡天下。”张释之曰：“秦任刀笔之吏，争以亟疾苛察相高，以故不闻其过，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贾山借秦为喻曰：“为宫室之丽，使其后世曾不得聚庐而托处，为驰道之丽，后世不得邪径而托足，为葬埋之丽，后世不得蓬颗而托葬。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雠，天下已坏而弗自知，身死才数月耳，而宗庙灭绝。”贾谊曰：“商君遗礼谊，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灭四维而不张，君臣乖乱，六亲殃戮，万民离叛，社稷为虚。”又曰：“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其视杀人若刈草菅然。置天下于法令刑罚，德泽亡一有，而怨毒盈于世，下憎恶之如仇雠。”晁错曰：“秦发卒戍边，有万死之害，而亡铢两之报。天下明知祸烈及己也，陈胜首倡，天下从之如流水。”又曰：“任不肖而信谗贼，民力罢尽，矜奋自贤，法令烦，刑罚暴酷，亲疏皆危，外内咸怨，绝祀亡世。”董仲舒曰：“秦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圣之道，而颢为自恣苟简之治。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又曰：“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群盗并起，死者相望，而奸不息。”淮南王安曰：“秦使尉屠睢攻越，凿渠通道，旷日引久，发谪戍以备之，往者莫反，亡逃相从，群为盗贼。于是山东之难始兴。”吾丘寿王曰：“秦废王道，立私议，去仁恩而任刑戮，至于赭衣塞路，群盗满山。”主父偃曰：“秦任战胜之威，功齐

三代，务胜不休，暴兵露师，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死者相望，天下始叛。”徐乐曰：“秦之末世，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陈涉之所以为资也。此之谓土崩。”严安曰：“秦一海内之政，坏诸侯之城，为知巧权利者进，笃厚忠正者退。法严令苛，意广心逸。兵祸北结于胡，南挂于越，宿兵于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天下大畔，灭世绝祀。”司马相如曰：“二世持身不谨，亡国失势，信谗不寤，宗庙灭绝。”伍被曰：“秦为无道，百姓欲为乱者十室而五。使徐福入海，欲为乱者十室而六。使尉佗攻百越，欲为乱者十室而七。作阿房之宫，欲为乱者十室而八。”路温舒曰：“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贾捐之曰：“兴兵远攻，贪外虚内，天下溃畔，祸卒在于二世之末。”刘向曰：“始皇葬于骊山，下锢三泉，多杀宫人，生埋工匠，计以万数，天下苦其役而反之。”梅福曰：“秦为无道，削仲尼之迹，绝周公之轨，礼坏乐崩，王道不通，张诽谤之网，以为汉驱除。”谷永曰：“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养生泰奢，奉终泰厚也。”刘歆曰：“燔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是遂灭。”凡汉人之论秦恶者如此。

唐高祖曰：“隋氏以主骄臣谄亡天下。”孙伏伽曰：“隋以恶闻其过亡天下。”《薛收传》：“秦王平洛阳，观隋宫室，叹曰：‘炀帝无道，殫人力以事夸侈。’收曰：‘后主奢虐是矜，死一夫之手，为后世笑。’”张元素曰：“自古未有如隋乱者，得非君自专、法日乱乎？造乾阳殿，伐木于豫章，一材之费，已数十万工。乾阳毕功，隋人解体。”魏征曰：“炀帝信虞世基，贼遍天下而不得闻。”又曰：“隋唯责不献食，或供奉不精，为此无限，而至于亡。方其未乱，自谓必无乱，未亡，自谓必不亡。所以甲兵亟动，徭役不息。”又曰：“恃其富强，不虞后患，役万物以自奉养，子女玉帛是求，宫室台榭是饰。外示威重，内行险忌，上下相蒙，人不堪命，以致陨匹夫之手。”又曰：“文帝骄其诸子，使至夷灭。”马周曰：“贮积者固有国之常，要当人有余力而后收之，岂人劳而强敛之以资寇邪？隋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积布帛东都，而王世充据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陈子昂曰：“炀帝恃四海之富，凿渠决河，疲生人之力，中国之难起，身死人手，宗庙为墟。”杨相如曰：“炀帝自恃其强，不忧时政。言同尧、舜，迹如桀、纣，举天下之大，一掷弃之。”吴兢曰：“炀帝骄矜自负，以为尧、舜莫己若，而讳亡憎谏。乃曰：‘有谏我者，当时不杀，后必杀之。’自是謇谔之士去而不顾，外虽有变，朝臣钳口，帝不知也。”柳宗元曰：“隋氏环四海以为鼎，跨九垓以为炉，爨以毒燎，煽以虐焰，沸涌灼烂，号呼腾蹈。”李珣曰：“隋文帝劳于小务，以疑待下，故二世而亡。”凡唐人之论隋恶者如此。

【译文】 从夏、商、周三代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统治

天下的帝王对人民犯下罪恶，以致被千秋万代所痛斥的，没有比得上秦始皇和隋炀帝的，难道这两个人的罪恶比夏桀、商纣王还深重吗？这大概是因为，秦朝之后是汉朝，隋朝之后是唐朝，这两个朝代存在的时间都很长久，而且非常强盛，号称“汉唐盛世”，一时议论的臣子，指出前代的过失，必然首先提到秦、隋，说得可信而有徵验，所以它们的事情暴露于后世，时间越久而越明显不可掩盖。我曾试着搜集而举出一些例子。张耳说：“秦朝推行昏乱的政策和暴虐的刑罚，残害毁灭天下，向北有筑长城的工役，向南有戍守五岭的事，国内境外骚扰动乱，抽人头税官吏甚至用畚箕挨户催赋税，加以苛刻的法令，使百姓父子不能相依靠。”张良说：“秦国推行无道的政令，沛公（刘邦）因此得以攻入函谷关，为天下人除去残暴的民贼。”陆贾说：“秦国只依靠刑法而不变更，终于使嬴氏灭亡。”王卫尉说：“秦朝因听不到他的过失而亡失天下。”张释之说：“秦朝信任刀笔之吏，他们争相以办事快速、苛刻细碎为成绩高超，因为不愿听到自己的过失，因此政局混乱到二世时，天下就土崩瓦解了。”贾山借秦朝作比方说：“秦朝建造宫室的宏丽，使他的后代连聚居屋下托身之处也没有了，修筑驰道的壮丽，使他后世连插足的小路也没有了，兴建墓葬的靡丽，使他的后代连蓬头赤身埋葬的处所也没有了。用一千八百国的民力奉养自己，人们使尽力气也担负不起他的劳役，化尽财产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人人和他有怨仇，家家视他为敌人，天下已经乱了而自己不知道，秦始皇刚死才几个月，而秦朝的宗庙就灭绝了。”贾谊说：“商君（商鞅）抛弃礼义，废掉仁慈恩德，专心于进取土地财物，实行了二年，秦国风俗日益败坏，使礼义廉耻四维绝灭而不能伸张，君臣的名分混乱，六亲遭殃被杀，众多的百姓离散，秦国的社稷也就化为乌有。”又说：“秦始皇使赵高做胡亥的师傅，而教胡亥判刑狱。胡亥今天即位，明天就用箭射人，他看待杀人就像割草一样轻易。把天下放在法令刑罚的统治之下，德行恩惠一点也没有，而怨恨充满于世上，下面的人仇恨秦朝如同仇敌。”晁错说：“秦朝调发士兵戍守边界，出征有万死的危害，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报酬。天下人都很清楚自己必将遭受大祸，所以陈胜首先揭竿而起，天下人就像流水一样追随他。”又说：“秦始皇任用没有德才的人，偏信谗言害人的小人，民力都被耗尽了，他却沾沾自喜，向世人夸耀自己贤明，而事实上法令繁多苛刻，刑罚暴虐残酷，天下人无论亲疏都人人自危，朝廷内外都很怨恨他，国家因此灭亡了。”董仲舒说：“秦朝严厉禁止礼乐典制和学术文化，严禁私人收藏儒家经典及其他历史书籍，抛弃甚至讨厌听到礼义情谊。其目的是为了彻底消灭古圣先贤的学说，而专门实行随心所欲、一味重法的治国方法。自古以来，没有像秦朝这样以乱治乱、使天下人民深受其害的朝代。”又说：“学习申不害、商鞅的法术，推

行韩非的法治学说，厌恶贤明君主的治国之道，把贪婪凶狠做为习俗，横征暴敛没有限度，人民精力殫竭、财力散尽，为生计所迫揭竿而起的人遍地都是，死亡的人很多，但专擅朝政的奸臣却毫不收敛。”淮南王刘安说：“秦朝派尉屠睢进攻南越，开凿灵渠，修筑官道，旷日持久，又调发大批罪犯戍守边关，这些人常常有去无回，逃跑的人一个接一个，结伙成为盗贼，于是山东（崤山或华山以东）地区的战乱开始了。”吾丘寿王说：“秦始皇废弃王道，树立自己的观点，抛弃仁义道德而专用刑罚杀人，以致罪犯充满道路，盗贼满山遍野。”主父偃说：“秦始皇凭着战胜六国的威力，功比夏、商、周三代，恋战不止，军队常年在外面征战，老百姓疲惫不堪，孤寡老弱不能得到奉养，死亡的人很多，天下人开始背叛他。”徐乐说：“秦朝末期，人民生活贫困，但君主却不给以抚恤，下边怨声载道而上边却不知道，风俗败坏而政治却得不到改善，这是陈胜起义的原因啊。这就是所谓的土崩。”严安说：“秦朝统一中国后，毁掉原来各诸侯国的城池，投机取巧、追求功名的人得以重用，忠实厚道、耿直仁义之士遭到排斥。法令严峻苛刻，统治野心膨胀，为所欲为。向北用兵攻打匈奴，向南和越人交战，把军队驻守在没有用的地方，一直向前推进而不得后退，天下人都背叛它，因此，国家便灭亡了。”司马相如说：“秦二世胡亥对自己要求不严，丢掉国家，失去权势，偏信谗言而不醒悟，结果招致江山社稷覆灭。”伍被说：“秦朝统治黑暗，老百姓十户里有五户想造反。秦始皇派徐福东渡日本寻求长生不老之药后，老百姓中十户有六户想起来造反。派尉佗进攻东南越人后，老百姓中十户有七户想起来造反。修建阿房宫后，老百姓中十户有八户想起来造反。”路温舒说：“秦朝有十个人死，如果有一个人活下来，那么这个人必定就是管理监狱的人。”贾捐之说：“秦朝兴师远征，贪图扩大地盘却使得国内日益空虚，众叛亲离，最终在秦二世胡亥时亡国。”刘向说：“秦始皇在骊山为自己建造豪华的墓室，用熔化的金属堵住墓道缝隙，以明珠作为日月星辰，用水银作为江河湖海，杀戮大量的宫女作为殉葬品，又活活埋进数以万计的修墓工匠，天下人以其劳役为苦而起来反它。”梅福说：“秦国作为不合道义，削去仲尼（孔子）的足迹，断绝周公的遗轨，使礼乐被废弃毁坏，王道不能通行，又张开诽谤罪的法网，以此反而为汉朝驱除障碍。”谷永说：“秦朝所以传二世十六年而灭亡的道理，是奉养自己太奢侈，用于送葬过于丰厚。”刘歆说：“秦朝焚毁经书，杀害儒生，建立藏书的禁令，对称道古代的人加以罪名，道德和学术由此被消灭。”大抵汉朝人的议论秦代罪恶就是这样。唐高祖说：隋朝皇帝因君主骄奢臣下谄媚而亡失天下。”孙伏伽说：“隋代因厌恶听到他的过失而亡天下。”《薛收传》：“秦王（唐太宗）平定洛阳，观看隋代宫室，叹气说：‘炀帝无道，穷尽人力来

从事夸耀和奢侈。’薛收说：‘后主（炀帝）奢侈暴虐而自以为有能力，身死于一个匹夫之手，被后代人所嗤笑。’”张元素说：“从古以来没有乱到像隋代那样，岂不是因为国君自以为是而很专断、法令日乱吗？他建造乾阳殿，在豫章郡砍伐木材，一根木料的费用，已需几十万工。乾阳殿完后，隋朝的人民就解体了。”魏征说：“隋炀帝信任虞世基，盗贼满天下而炀帝听不到。”又说：“隋炀帝就责备官员不进献食品，有的供应很不精，为这种要求而无限止，以至于灭亡。隋朝没有乱时，自认为一定没有乱，没有亡时，自认为一定不会亡。所以刀兵屡次发动，劳役不停止。”又说：“隋炀帝自恃国力富强，不考虑后患，竭尽天下财力供自己享用，无休无止地追求美女钱财，随心所欲地装饰宫殿、楼阁。对外耀武扬威，对内阴险多疑，君臣上下互相欺骗，人民不堪重负，炀帝自己最终也丧命于奸贼之手。”他还说：“隋文帝使他的儿子们骄逸自大，最终使他们都走向毁灭。”马周说：“存储粮食本是一个国家的常政，但一定要等到人民有余粮时再征收，怎么能够强行征收人民的口粮以资助盗寇呢？隋朝建洛口仓存储了大量的粮食，结果却被李密得去；在东都洛阳存积了无数的布匹丝织品，结果却被王世充据为己有；西京长安的国库，也被大唐朝取用。”陈子昂说：“隋炀帝自恃国家富足，开挖河渠，竭尽老百姓的力量，酿成中国的灾难，最终自身死于他人之手，江山社稷变为废墟。”杨相如说：“隋炀帝自恃强大，不关心国家政事。言语像尧、舜的一样美好，所作所为如同夏桀王、商纣王那样残暴，将偌大个国家轻易抛弃。”吴兢说：“隋炀帝骄傲自负，以为尧、舜二帝也不如自己，又忌讳人们谈论亡国，拒绝大臣们的谏言。甚至说：‘向我进谏言的人，即使当时不杀他，日后也一定要杀掉他。’于是正直敢言的人都毫不留恋地离开了他，朝廷之外虽然有叛乱，而朝廷大臣却都闭口不言，隋炀帝根本不知道。”柳宗元说：“隋朝把中国当作一个大鼎炉，用毒火烈焰来烧煮它，鼎炉内沸水涌起，鼎炉外大火熊熊，老百姓在炉中号呼挣扎。”李珣说：“隋文帝在细小的事情上非常劳心费神，常常以猜疑之心对待朝廷大臣，所以帝位传了两代就亡国了。”大凡唐朝人就是这样议论隋炀帝罪恶的。

汉唐二武

【原文】 东坡云：“古之君子，必忧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绝人之资，而治世无可畏之防。”美哉斯言！汉之武帝，唐之武后，不可谓不明，而巫蛊之祸，罗织之狱，天下涂炭，后妃公卿，交臂就戮，后世闻二武之名，则憎恶之。蔡

确作诗，用郝觚山上元间事，宣仁谓以吾比武后；苏辙用武帝奢侈穷兵虚耗海内为谏疏，哲宗谓至引汉武上方先朝。皆以之得罪。人君之立政，可不监兹！

【译文】 苏东坡说：“古代道德高尚的人，必定认为治世值得担忧，而明君同样危险。明君有过人的资质，但治世没有可怕的政治从而使人产生防范心理。”这句话说得真好啊！汉朝的汉武帝，唐朝的武则天，不能说不贤明，但是国家仍然有巫蛊之祸和罗织之狱，人民生活极端困苦，后妃与王公大臣常因一点小事就惨遭杀害，后世的人听到汉武帝和武则天的名字，就非常憎恶。蔡确写了一首诗，其中提到郝觚山正月十五元宵节的事，宣仁太后就认为蔡确把她比作武则天；苏辙用汉武帝奢侈腐化、穷兵黩武、虚耗国家资财等事实规劝皇帝，哲宗皇帝就认为苏辙引用汉武帝的故事把他与前朝相比。蔡、苏两人都因此而被判了罪。君主治理天下，能不以此为鉴吗？

玉川子

【原文】 韩退之《寄卢仝》诗云：“玉川先生洛城里，破屋数间而已矣。一奴长须不裹头，一婢赤脚老无齿。昨晚长须来下状，隔墙恶少恶难似。每骑屋山下窥瞰，浑舍惊怕走折趾。立召贼曹呼五百，尽取鼠辈尸诸市。”

夫奸盗固不义，然必有谓而发，非贪慕货财，则挑暴子女。如玉川之贫，至于邻僧乞米，隔墙居者岂不知之？若为色而动，窥见室家之好，是以一赤脚老婢陨命也，恶少可谓枉著一死。予读韩诗至此，不觉失笑。仝集中《有所思》一篇，其略云：“当时我醉美人家，美人颜色娇如花。今日美人弃我去，青楼珠箔天之涯。梦中醉卧巫山云，觉来泪滴湘江水。湘江两岸花木深，美人不见愁人心。相思一夜梅花发，忽到窗前疑是君。”则其风味殊不浅，韩诗当亦含讥讽乎？

【译文】 韩愈《寄卢仝》一诗说：“玉川先生洛城里，破屋数间而已矣。一奴长须不裹头，一婢赤脚老无齿。昨晚长须来下状，隔墙恶少恶难似。每骑屋山下窥瞰，浑舍惊怕走折趾。立召贼曹呼五百，尽取鼠辈尸诸市。”奸人盗贼固然不仁义，但是也必定有原因才这样做，不是贪图钱财，就是为了强暴女人。像玉川先生这样贫穷的人，以至于常到邻近的僧人那里去乞讨米粮，隔墙居住的恶少难道不知道？如果是因贪图女色，偷看邻居家的妇女，这可以说他是因为一个光着脚丫子的老姬而丧命，那么这个恶少死的也实在冤枉。我每次读韩愈的这首诗，就情不自禁地要发笑。卢仝诗集中有《有所思》一诗，其大概内容是说：“当时我醉美人家，美人颜色娇如花。今日美人弃我去，青楼珠箔天之涯。

梦中醉卧巫山云，觉来泪滴湘江水。湘江两岸花木深，美人不见愁人心。相思一夜梅花发，忽到窗前疑是君。”这首诗的确很有情趣，韩愈的诗莫非也蕴含着讥讽吗？

银青阶

【原文】 唐自肃、代以后，赏人以官爵，久而浸滥。下至州郡胥使军班校伍，一命便带银青光禄大夫阶，殆与无官者等。明宗长兴二年，诏不得荐银青阶为州县官，贱之至矣。晋天福中，中书舍人李详上疏，以为十年以来，诸道职掌，皆许推恩，藩方荐论，动逾数百，乃至藏典书吏，优伶奴仆，初命则至银青阶，被服皆紫袍象笏，名器僭滥，贵贱不分。请自今节度州听奏大将十人，他州止听奏都押牙、都虞候、孔目官。从之。冯拯之父俊，当周太祖时，补安远镇将，以银青光禄检校太子宾客兼御史大夫。至本朝端拱中，拯登朝，遇郊恩始赠大理评事。予八世从祖师畅，畅子汉卿，卿子膺图，在南唐时，皆得银青阶，至检校尚书、祭酒。然乐平县帖之，全称姓名，其差徭正与里长等。元丰中，李清臣论官制，奏言：“国朝踵袭近代因循之弊，牙校有银青光禄大夫阶，卒长开国而有食邑。”盖为此也。今除授蕃官，犹用此制。绍兴二十八年，广西经略司申安化三州蛮蒙全计等三百十八人进奉，乞补官勋，皆三班借差。三班差使，悉带银青祭酒，而等第加勋，文安公在西垣为之命词。

【译文】 唐朝自肃宗李亨、代宗李豫以来，常常以官爵作为奖赏，时间长了便没有节制，以至州郡的小官吏和军队中职位很低的小官，一旦任命就佩带银青光禄大夫品级的银印青绶，几乎与没有官职一样，到了后唐明宗李嗣源长兴二年（931年），下诏书不准荐举银青阶的人为州县官，这是轻贱极了。后晋天福年间，中书舍人李详上疏，以为十年以来，各道管事的人，都允许推恩荫任官吏，藩镇们荐举人做官，动辄超过几百人，以至掌管文书的小吏、优伶奴仆，初次任命就到银青的官阶，穿紫袍执象笏，名位服饰超逾制度很滥，贵贱不分。请从今凡设节度的州可允许奏荐大将十人，其他州只许奏荐都押牙、都虞候、孔目官，朝廷听从了这建议。冯拯的父亲冯俊，当周太祖时，补任安远镇将，以银青光禄大夫为检校太子宾客兼御史大夫。到宋朝端拱年间，冯拯进朝廷，遇到皇帝郊祭天地时颁布恩命，才赠冯俊大理评事。我八世的堂祖洪师畅，洪师畅子汉卿，洪汉卿子洪膺图在南唐时，都得到银青阶，甚至有检校当书、祭酒等衔。然乐平县给的派差帖子中，全称姓名，他们服的差役正和里正

相同。元丰年间，李清臣议论官制，奏称：“本朝丞袭了近代以来因循的积弊，军中校有银青光禄大夫官阶，士兵中的队长封为“开国”的爵位而有封邑。”即为此而发。现今授任藩属的官员，还用这制度。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广西经略司申报三州蛮族蒙全计等三百十八人进献物品，请求补官阶勋劳，都在三班中给予差使。三班中的差使，都带银青祭酒官阶而根据等级加赐勋劳，文安公（洪遵）在西垣（中书省）时撰写了任命词。

买马牧马

【原文】 国家买马，南边于邕管，西边于岷、黎，皆置使提督，岁所纲发者盖逾万匹，使臣、将校得迁秩转资。沿道数十州，驿程券食、厩圉薪刍之费，其数不貲，而江、淮之间，本非骑兵所能展奋，又三牙遇暑月，放牧于苏、秀以就水草，亦为逐处之患。因读《五代旧史》云：“唐明宗问枢密使范延光内外马数。对曰：‘三万五千匹。’帝叹曰：‘太祖在太原，骑军不过七千。先皇自始至终，马才及万。今有铁马如是，而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养士练将之不至也。’延光奏曰：‘国家养马太多，计一骑士之费可贍步军五人，三万五千骑，抵十五万步军，既无所施，虚耗国力。’帝曰：‘诚如卿言。肥骑士而瘠吾民，民何负哉？’”，明宗出于蓄戎，犹能以爱民为念。李克用父子以马上立国制胜，然所蓄只如此。今盖数倍之矣。尺寸之功不建，可不惜哉！且明宗都洛阳，正临中州，尚以为骑士无所施。然则今虽纯用步卒，亦未为失计也。

【译文】 我们大宋朝为了充实骑兵，在南边的邕管（今广西南宁），西边的岷州（今甘肃岷县）、黎州（今四川汉源）等边远地区购置马匹，并且设有专门的机构与官员负责，每年成批送往内地的马超过一万匹，参与此事的使臣、将校往往因此得以升迁官职。为了运送马匹，沿途几十个州县，都要建立驿站，招待官兵，盖马圈、备草料，所花费用无法估量。然而长江、淮河之间的广大地区，本来就不适于骑兵奔驰作战，遇到炎热天气，还得将幼马赶到苏州（今江苏吴县）、秀州（今浙江嘉兴）一带放牧，给各地造成很大损失。据《旧五代史》记载：“后唐明宗李嗣源询问枢密使范延光全国的马匹数目，范延光回答说：‘有三万五千匹。’唐明宗叹息说：‘太祖在太原时，骑兵不过七千人。先皇（庄宗李存勖）自始至终，也仅有一万匹马。现在有这么多的军马，却不能统一天下，这是我养兵练将还做得很不够啊。’范延光随即上奏说：‘国家养的马匹太多了，一个骑兵的开销，可以养五个步兵，三万五千名骑兵的费用可以抵得上

十五万步兵的开支，这么多的骑兵既不能发挥作用，又白白消耗国家财力。’”唐明宗说：‘确实像你所说的那样。厚养骑兵而使人民受苦，人民怎能承受的了呢’”。唐明宗出身于少数民族家庭，还能想到爱护老百姓。李克用父子靠骑马打仗克敌制胜，建立国家，然而他们所蓄养的马匹却如此之少，而今天所养的马比当时已经多好几倍了，却一点功劳也没有建立，能不令人为之深感惋惜吗！何况后唐明宗定都洛阳，雄视中原，尚且认为骑兵无用武之地。由此可见，现在即使完全使用步兵，也未必是失策啊！

杜诗用字

【原文】 律诗用自字、相字、共字、独字、谁字之类，皆是实字，及彼我所称，当以为对，故杜老未尝不然。今略纪其句于此：“径石相萦带，川云自去留。”“山花相映发，水鸟自孤飞。”“衰颜聊自哂，小吏最相轻。”“高城秋自落，杂树晚相迷。”“百鸟各相命，孤云无自心。”“胜地初相引，徐行得自娱。”“云里相呼疾，沙边自宿稀。”“暗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猿挂时相学，鸥行炯自如。”“自吟诗送老，相劝酒开颜。”“俱飞蛱蝶元相逐，并蒂芙蓉本自双。”“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此时对雪遥相忆，送客逢春可自由。”“梅花欲开不自觉，棣萼一别永相望。”“桃花气暖眼自醉，春渚日落梦相牵。”此以自字对相字也。“自须开竹径，谁道避去萝。”“自笑灯前舞，谁怜醉后歌。”“死去凭谁报，归来始自怜。”“哀歌时自短，醉舞为谁醒。”“离别人谁在，经过老自休。”“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此以自字对谁字也。“野人时独往，云木晓相参。”“正月莺相见，非时鸟共闻。”“江上形容吾独老，天涯风俗病相亲。”“纵饮久判人共弃，懒朝真与世相违。”“此日此时人共得，一谈一笑俗相看。”此以共字、独字对相字也。

【译文】 律诗用“自”字、“相”字、“共”字、“独”字、“谁”字一类字眼，都是实字，以及用之称呼别人和自己，应当用作对仗，所以杜老（杜甫）作诗从未不这样使用。现在略记他的句子于此：“径石相萦带，川云自去留（小路上石块连延，河上的云任意飘去或停留）。”“山花相映发，水鸟自孤飞（山中的花相映开放，水上的鸟独自飞翔）。”“衰颜聊自哂，小吏最相轻”（衰老的容颜只好自己讥笑，小官吏轻视人最甚）。“高城秋自落，杂树晚相迷（高天的秋色自然降临，杂生的树木到晚上使人难辨方向）。”“百鸟各相命，孤云无自心（众多的鸟各自鸣叫求其同类，孤云则随风飘荡并无自己的意志）。”“胜地初相引，

徐行得自娱（风景优美的地方开始吸引人，慢慢地走着得以自求乐趣）。”“云里相呼疾，沙边自宿稀（云中的飞鸟鸣叫着呼唤它们的伙伴，而在沙边上宿居的则数量很少）。”“暗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萤火虫在暗中飞靠它的光照亮自己，鸟在水边宿时互相呼唤）。”“猿挂时相学，鸥行炯自如（猿群互相模仿地攀挂在树枝上，鸥鸟的飞行显然很自由自在）。”“自吟诗送老，相劝酒开颜（自己以吟诗度过老年，互相劝酒以此解开愁颜）。”“俱飞蛱蝶元相逐，并蒂芙蓉本自双（一起飞翔的蝴蝶本在互相追逐，靠在一起开放的荷花原是成双）。”“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堂上的燕子自己飞来自己飞走，水中的鸥鸟互相亲近互相靠拢）。”“此时对雪遥相忆，送客逢春可自由（这时对着雪景思念着远方的朋友，当时正逢春日送客岂能自己作主）。”“梅花欲开不自觉，棣萼一别永相望（梅花要开放时它并非自觉，到花落时花瓣花萼永远分散相望）。”“桃花气暖眼自醉，春渚日落梦相牵（温暖的气候看着桃花眼睛自然迷醉，春天日落时水边的旧事还牵挂于梦中）。”这都是以“自”字对“相”字。“自须开竹径，谁道避云梦（自己要辟竹中小路，谁说要避开云梦）。”“自笑灯前舞，谁怜醉后歌（在灯前起舞连自己也觉可笑，醉后的狂歌有谁怜悯）。”“死去凭谁报，归来始自怜（要是死去消息有谁相告回来后才自觉可怜）。”“哀歌时自短，醒舞为谁醒（悲歌时常常自己加以节制，醉后起舞又有谁来叫醉）。”“离别人谁在，经过老自休（分别以后谁还在这里，平生经历的事人老以后也就休止了）。”“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长夜中的吹角声中我悲叹自语，正挂在天空中的月色虽好有谁去观看）。”这是以“自”字对“谁”字。“野人时独往，云木晓相参（山野的人时常独自前往，高耸入云的树木时常见到）。”“正月莺相见，非时鸟共闻（正月里出现黄莺，不合时的鸟声大家都听到）。”“江上形容吾独老，天涯风俗自相亲（江边上的我形貌独自显出衰老，远在天涯不习惯这风俗因此疾病越来越多）。”“纵饮久判人共弃，懒朝真与世相违（放纵地渴喝久已豁出去被人们所共弃，懒于上朝真是跟世相隔绝）。”“此日此时人共得，一谈一笑俗相看（今天这时人人都自得其乐，一谈一笑世俗的人都觉奇怪而来观看）。”这是以“共”字“独”字对“相”字。

唐虞象刑

【原文】 《虞书》：“象刑惟明。”象者法也。汉文帝诏，始云：“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弗犯。”武帝诏亦云：“唐虞画象，而民不犯。”

《白虎通》云：“画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赭著其衣，犯髡者以墨蒙其髡，犯宫者淋。淋，草屨也，大辟者布衣无领。”其说虽未必然，扬雄《法言》，“唐、虞象刑惟明”，说者引前诏以证，然则唐、虞之所以齐民，礼义荣辱而已，不专于刑也。秦之末年，赭衣半道，而奸不息。国朝之制，减死一等及胥吏兵卒配徒者，涅其面而刺之，本以示辱，且使人望而识之耳。久而益多，每郡牢城营，其额常溢，殆至十余万，凶盗处之恬然。盖习熟而无所耻也。罗隐《谗书》云：“九人冠而一人硃，则硃者慕而冠者胜，九人硃而一人冠，则冠者慕而硃者胜。”正谓是欤？《老子》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则为恶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可谓至言。荀卿谓象刑为治古不然，亦正论也。

【译文】 《尚书·虞书》记载：“（皋陶）方施象刑惟明。”意思是说，皋陶在考察案情使用刑罚时务求公允得当。象，就是法律。汉文帝的诏书一开始就说：“有虞氏（舜）在位的时候，没有肉刑，只是画衣服、帽子和花纹特异的服饰来象征五刑，以示惩罚，但人民却不犯法。”汉武帝的诏书也说：“唐尧虞舜时代以画衣帽和花纹特异的服饰来象征五刑，而人民不犯法。”《白虎通》一书记载：“以画衣帽和花纹特异的服饰作为刑法，是用这些服饰象征五种刑法。对那些本应处以墨刑（在面部刺字）的犯人，就让他们头上蒙一块头巾；本应处以劓刑（割去鼻子）的犯人，就让他们穿红褐色的衣服；本应处以髡刑（挖去膝盖骨）的犯人，就用墨涂黑他们的膝盖；本应处以宫刑（阉割或幽闭生殖器）的犯人，就让他们穿草鞋；本应处以大辟刑（砍头）的犯人，就让他们穿没有领子的衣服。”这种说法也不一定对。扬雄《法言》一书说：“唐尧虞舜在考察案情使用刑罚时务求公允得当。”引用汉文帝、汉武帝的诏书作为证据。然而唐尧虞舜教化天下百姓，是依靠礼义荣辱，而不是刻意实行刑罚啊。秦朝末年，刑罚严酷，犯人几乎占路上行人的一半，然而违犯刑罚的行为却没有停止过。我们大宋朝的法律规定，犯死罪被免死的和胥吏士卒被处于徒刑、流配的人，都要染黑他们的脸并刺上字，目的是为了羞辱他们，并且让人看到后就知道他们是罪犯。时间一长，犯人越来越多了，各郡囚禁罪犯的监狱，常常超过定额，人满为患，恐怕达到了十多万人，但凶犯盗贼却满不在乎。这大概是因为司空见惯而不以为耻辱了。罗隐《谗书》说：“如果有九个人戴帽子而只有一个人用麻束发，那么用麻束发的人就非常羡慕戴帽子的人，戴帽子的人也很自得；如果有九个人用麻束发而只有一个人戴帽子，那么戴帽子的人就非常羡慕用麻束发的人，用麻束发的人就很得意。”这说明了什么呢？《老子》一书上说：“老百姓常常是不怕死的，为什么要用死刑来恐吓他们？如果让老百姓经常害怕

死，那么我捉到作恶的人就杀了他，这样，谁还敢犯罪呢？”这可以说是至理名言。荀卿认为象刑治理国家不对，也是正确的论述。

崔常牛李

【原文】 士大夫一时议论，自各有是非，不当一一校其平生贤否也。常衮为宰相，唐德宗初立，议群臣丧服，衮以为遗诏云：“天下吏人三日释服”，古者卿大夫从君而服，皇帝二十七日而除，在朝群臣亦当如之。盭甫以为遗诏无朝臣、庶人之别，凡百执事，孰非吏人？皆应三日释服。相与力争，衮不能堪，奏贬盭甫。已而衮坐欺罔贬，盭甫代之。议者以盭甫之贤，远出衮右，故不复评其事。然揆之以理，则衮之言为然。李德裕为西川节度使，吐蕃维州副使悉怛谋请降。德裕遣兵据其城，具奏其状，欲因是捣西戎腹心。百官议皆请如德裕策。宰相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万里，失一维州未能损其势。比来修好，约罢戍兵，彼若来责失信，上平凉坂，万骑缀回中，怒气直辞，不三日至咸阳桥。此时西南数千里外得百维州，何所用之？”文宗以为然，诏以城归吐蕃。由是德裕怨僧孺益深。议者亦以德裕贤于僧孺，咸谓牛、李私憾不释，僧孺嫉德裕之功，故沮其事。然以今观之，则僧孺为得，司马温公断之以义利，两人曲直始分。

【译文】 士大夫们一时的议论，自然各有其是非，并不能据此一点一滴来评论他们平生的优劣。常衮做宰相，唐德宗刚即位，讨论群臣给代宗服丧的问题，常衮以为遗诏说“天下吏员百姓三天后除去丧服”，古代卿大夫跟着君主服丧，皇帝二十七天而除去丧服，而在朝的臣子也应如此。崔盭甫以为遗诏没有提到朝廷官员和普通百姓的区别，凡是有职务的官员，谁不是吏员百姓？都应三日除丧。互相争论，常衮不能容忍，奏请贬斥崔盭甫。不久常衮因欺君罔上贬斥，用崔盭甫代替他。议论的人认为以崔盭甫的贤明，远在常衮之上，所以不再评论这事。但以道理来测度，那么常衮的话该是对的。李德裕任西川节度使，吐蕃的维州副使悉怛谋请求降唐。李德裕派兵占领了维州城，上奏此事，想因此直捣吐蕃的腹心要地，百官的议论都要求照李德裕的策略办。宰相牛僧孺说：“吐蕃的境界，四方都达万里，失去一个维州不能伤害它的实力。近来正和我们和好，约定撤去戍守的兵士，他们如果来责备我们失信，出兵上平凉坂，用一万骑兵进扰回中，鼓足勇气理直势强，不到三天就到了咸阳桥，这时西南几千里外即使得到一百个维州，又有什么用？”文宗以为他说得对，下诏把城归还

吐蕃。因此李德裕恨牛僧孺更深了。议论的人也以为李德裕此牛僧孺要好，所以说牛、李因私人怨恨不解，牛僧孺嫉妒李德裕之功，所以沮败这事。但以今天来看，那还是牛僧孺对。司马温公（司马光）用义和利来区别，两人的曲直才得以分辨。

盗贼怨官吏

【原文】 陈胜初起兵，诸郡县苦秦吏暴，争杀其长吏以应胜。晋安帝时，孙恩乱东土，所至醢诸县令以食其妻子，不肯食者辄支解之。隋大业末，群盗蜂起，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黄巢陷京师，其徒各出大掠，杀人满街，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者皆杀之。宣和中，方腊为乱，陷数州，凡得官吏，必断离支体，探其肺肠，或熬以膏油，丛镝乱射，备尽楚毒，以偿怨心。杭卒陈通为逆，每获一命官，亦即梟斩。岂非贪残者为吏，倚势虐民，比屋抱恨，思一有所出久矣，故乘时肆志，人自为怒乎？

【译文】 陈胜刚起兵时，各郡县恨秦朝官吏暴虐，争着杀死长官去响应陈胜。晋安帝时，孙恩在东方作乱，所到之处把各县令斩成肉酱叫他妻儿吃，不肯吃的常被分尸。隋代大业末年，盗贼到处起事，抓到隋朝官员和士族子弟都杀掉。黄巢攻陷京城，他的部下都出去大抢掠，杀人满街，黄巢无法禁止，他们尤其恨官吏，抓住都杀死。宣和年间，方腊作乱，攻陷几个州，凡抓住官吏，一定要暂断四肢，挖他们的肝肠，或者用油煎，用乱箭射，极尽种种酷刑，来报复怨恨。杭州士兵陈通叛乱，每抓到一个官员，也就杀死示众。岂不是因为贪污残暴的人做官吏，仗势欺压人民，家家恨他，久已想有报复的机会，所以乘机发泄怨恨，人人有其怒气吗？

作诗先赋韵

【原文】 南朝人作诗多先赋韵，如梁武帝华光殿宴饮连句，沈约赋韵，曹景宗不得韵，启求之，乃是竞病两字之类是也。予家有《陈后主文集》十卷，载王师献捷，贺乐文思，预席群僚，各赋一字，仍成韵，上得“盛病柄令横映奭并镜庆”十字，宴宣猷堂，得“迕格白赫易夕擲斥坼哑”十字，幸舍人省，得“日谧一瑟毕讠橘质帙实”十字。如此者凡数十篇。今人无此格也。

【译文】 南朝人作诗大多先制定韵脚，比如梁武帝萧衍在华光殿宴请群臣，席间作诗助兴，沈约负责限定韵脚，曹景宗没有得到韵脚，向沈约要求，才得知是“竞、病”两个字。我家中藏有《陈后主文集》十卷，上面记载，陈军打胜仗后凯旋而归，陈后主特意在文思殿设宴张乐庆贺，与会的群臣各赋一个字，都成韵脚，得到“盛病柄令横映簪并镜庆”十个字，在宣猷堂的酒筵上，得到“连格白赫易夕掷斥坼哑”十个字。皇上到舍人省察看，得到“日谧一瑟毕讫橘质帙实”十字。像这样的文章，有几十篇。现在文人作诗，没有这种规定了。

后妃命数

【原文】 《左传》所载郑文公之子十余人，其母皆贵胄，而子多不得其死，惟贱妾燕碣生穆公，独继父有国，子孙蕃衍盛大，与郑存亡。薄姬入汉王宫，岁余不得幸，其所善管夫人、赵子儿先幸汉王，为言其故，王即召幸之，岁中生文帝，自有子后希见。及吕后幽诸幸姬不得出宫，而薄氏以希见故，得从子之代，为代太后。终之承汉大业者，文帝也。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愿进，而饬侍者唐儿使夜往，上醉不知而幸之，遂有身，生长沙王发。以母微无宠，故王卑湿贫国。汉之宗室十有余万人，而中兴炎祚，成四百年之基者，发之五世孙光武也。元帝为太子，所爱司马良娣死，怒诸娣妾，莫得进见。宣帝令皇后择后宫家人子五人，虞侍太子。后令旁长御问所欲，太子殊无意于五人者，不得已于皇后，强应曰：“此中一人可。”乃王政君也。一幸有身，生成帝，自有子后，希复进见。然历汉四世，为天下母六十余载。观此四后妃者，可谓承恩有限，而光华启佑，与同辈辽绝，政君遂为先汉之祸。天之所命，其亦各有数乎？徽宗皇帝有子三十人，唯高宗皇帝再复大业。显仁皇后在宫掖时，亦不肯与同列争进，甚类薄太后云。

【译文】 《左传》所载郑文公的儿子十多个人，他们的母亲都是贵族出身，而儿子却多数不得好死，只有一个微贱的妾燕生了郑穆公，独自继承父亲享有国土，子孙蕃衍众多，和郑国同存亡。薄姬进入汉王宫，一年多不得亲近皇帝，和她相友好的管夫人，赵子儿先被汉王亲近，代她给汉王说起，汉王就召她来亲近她，年内生了文帝，自从有了儿子后也很少再见到汉王。到吕后囚禁各宠姬不许出宫时，而薄氏因很少见到汉高帝之故，得许跟儿子到代国去，做代国太后。最后继承汉朝大业的是文帝。景帝召见程姬，程姬因为在月经期内

不能进见，而派侍候她的唐儿夜间去见皇帝，皇上喝醉了酒不知道而亲近她，就有了身孕，生下长沙王刘发。刘发因母亲微贱没宠，所以封在地势低而潮湿贫困的长沙国。汉朝的宗室十多万人，而中兴汉朝气运，完成四百年基业的，是刘发的五世孙光武帝。元帝做太子时，所爱幸的司马良娣死去，发怒各姬妾，没有能进见的。宣帝叫皇后在后宫中选择五个女子，去侍奉太子。皇后叫身旁经常侍候的人去问太子喜欢谁，太子对五个人都没有好感，但迫于皇后面子，勉强回答说：“这里只有一个人可以。”这就是王政君。一次亲近有了身孕，生下成帝，自从有儿子后，很少再进见。但经历汉朝元、成、哀、平四朝，王政君做天下人之母六十多年。看这四个后妃，可以说受到皇帝恩幸有限，而得到神灵保佑，和同辈人远为不同，王政君就成为前汉灭亡的祸根。老天的命令，大约各有其定数吧？宋朝徽宗皇帝有儿子三十人，只有高宗皇帝再次恢复皇室大业。他母亲显仁皇后在宫中时，也不肯和同辈争宠，据说很像汉朝的薄太后。

公为尊称

【原文】 柳子厚《房公铭》阴曰：“天子之三公称公，王者之后称公，诸侯之入为王卿士亦曰公，尊其道而师之称曰公。古之人通谓年之长者曰公。而大臣罕能以姓配公者，唐之最著者曰房公。”东坡《墨君堂记》云：“凡人相与称呼者，贵之则曰公。”范晔《汉史》：“惟三公乃以姓配之，未尝或紊。”如邓禹称邓公，吴汉称吴公，伏公湛、宋公宏、牟公融、袁公安、李公固、陈公宠、桥公玄、刘公宠、崔公烈、胡公广、王公龚、杨公彪、荀公爽、皇甫公嵩、曹公操是也。三国亦是有诸葛公、司马公、顾公、张公之目。其在本朝，唯韩公、富公、范公、欧阳公、司马公、苏公为最著也。

【译文】 柳宗元《房公铭》的刻文中说：“天子的三公称公，王爵的后代也称公，诸侯到天子朝廷任执政的也称公，尊重他的学问而向他学习的人也称为公。古代的人通称年纪大的长为公。除了最有名望的人之外，一般大臣很少有能够在姓氏后面配公字的，唐朝最有名望的大臣就是房公（即房玄龄）。苏轼《墨君堂记》中说：“人们见了面，互相打招呼时，称地位尊贵的为公。”范晔《后汉书》记载：“只有太师、太傅、太保三公才可以在姓氏后配公字，从未出现过混乱。”例如邓禹称为邓公、吴汉称为吴公，其他如伏湛伏公、宋宏宋公、牟融牟公、袁安袁公、李固李公、陈宠陈公、桥玄桥公、刘宠刘公、崔烈崔公、胡广胡公、王龚王公、杨彪杨公、荀爽荀公、皇甫嵩皇甫公、曹操曹公等都是

这样。三国时候也有诸葛公、司马公、顾公、张公这些名称。在我大宋朝，唯有韩公韩琦、富公富弼、范公范仲淹、欧阳公欧阳修、司马公司马光、苏公苏轼最有名望。

台城少城

【原文】 晋、宋间，谓朝廷禁省为台，故称禁城为台城，官军为台军，使者为台使，卿士为台官，法令为台格。需科则曰台有求须，调发则曰台所遣兵。刘梦得赋《金陵五咏》，故有《台城》一篇。今人于他处指言建康为台城，则非也。晋益州刺史治大城，蜀郡太守治少城，皆在成都，犹云大城、小城耳。杜子美在蜀日，赋诗故有“东望少城”之句。今人于他处指成都为少城，则非也。

【译文】 晋、宋时期，把皇宫禁地称为台，所以又把皇宫称为台城，守卫台城的军队称为台军，受命出使的人称为台使，所用官员称为台官，所颁布的法令称为台格。需要各种东西则叫台城有求须，调发军队则叫台城所派遣的军队。所以刘梦得所作的《金陵五咏》，其中有一篇名叫《台城》。现在的人在外地称建康（今江苏南京）为台城，这是不对的。晋朝时，益州（治今四川成都）刺史的治所在大城，蜀郡太守的治所少城，都在成都城中，就如同称大城、小城一样。杜甫在四川期间，所作诗歌中有“东望少城”的句子。现在的人在外地称成都为少城，这也是不对的。

卷 六

严武不杀杜甫

【原文】 《新唐书·严武传》云：“房琯以故宰相为巡内刺史，武慢倨不为礼，最厚杜甫，然欲杀甫数矣，李白为《蜀道难》者，为房与杜危之也。”甫传云：“武以世旧待甫，甫见之，或时不巾。尝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衔之，一日欲杀甫，冠钩于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旧史》但云：“甫性褊躁，尝凭醉登武床，斥其父名，武不以为忤。”初无所谓欲杀之说，盖唐小说所载，而《新书》以为然。予按李白《蜀道难》，本以讥章仇兼琼，前人尝论之矣。甫集中诗，凡为武作者几三十篇，送其还朝者，曰“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喜其再镇蜀，曰：“得归茅屋赴成都，直为文翁再剖符”。此犹是武在时语。至《哭其归棹》及《八哀诗》“记室得何逊，韬铃延子荆”，盖以自况，“空余老宾客，身上愧簪缨”，又以自伤。若果有欲杀之怨，必不应眷眷如此。好事者但以武诗有“莫倚善题《鹦鹉赋》”之句，故用证前说，引黄祖杀祢衡为喻，殆是痴人面前不得说梦也，武肯以黄祖自比乎！

【译文】 《新唐书·严武传》说：“房琯以前任宰相的身份做剑南节度使严武辖区内的刺史，严武对他傲慢自大不守礼节，而对杜甫最厚，但曾多次想杀害杜甫。李白作《蜀道难》，就是感叹房和杜甫的处境危险。《杜甫传》说：“严武以世交故旧之情对待杜甫，杜甫见他，有时不带头巾。曾经因酒醉登上严武的床瞪了眼看他说：‘严挺之（严武父）却有这儿子！’严武记恨他，有一天想杀杜甫，而帽子三次被髻钩所挂住，左右的人告诉了严武的母亲，赶去救劝才作罢。《旧唐书》只说：“杜甫性情褊狭急躁，曾因醉登上严武的床，叫出他父亲的名字，严武并不以为触犯。”本没有所谓想杀杜甫的说法，大约是唐代小说所记，而《新唐书》以为事实加以采砾。我按“我白《蜀道难》，本是讥讽章仇兼琼，从前人早已说过。杜甫集子中的诗，凡是为严武而作的几乎有三十篇，送他还朝廷的，说：“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我独自回到江边村中，寂寞地度过馀下的岁月）。欢迎他再来镇守蜀地，说：“得归茅屋赴成都，直为文翁再剖符”（我得以回到成都的茅屋，是因为像文翁这样的好官再来上任）。这些还

是严武还在世时的话。到哭严武灵柩回乡及《八哀诗》中说“记室得何逊，韬铃延子荆（起草文翰的人如同何逊，掌管印章的人聘请了（孙楚一流人），这是用以自比；“空馀老宾客，身上愧簪缨”（徒然留下我这老宾客，还插着官员的簪和挂着帽缨），又以此表示自己的伤感。如果严武做有要杀他的怨恨，杜甫不应该这样眷恋。喜欢多事的人只因严武诗有“莫倚善题《鹦鹉赋》”（不要倚仗善作《鹦鹉赋》的才能）之句，所以用来证明前面的说法，引黄祖杀祢衡作为比喻，真是在痴人面前不能说梦，严武岂肯自此黄祖呢？

王嘉荐孔光

【原文】 汉王嘉为丞相，以忠谏忤哀帝。事下将军朝者，光禄大夫孔光等劾嘉迷国罔上不道，请与廷尉杂治。上可其奏。光请谒者召嘉诣廷尉，嘉对吏自言：“不能进贤退不肖。”吏问主名，嘉曰：“贤，故丞相孔光，不能进。”嘉死后，上览其对，思嘉言，复以光为丞相。按嘉之就狱，由光逢君之恶，而嘉且死，尚称其贤，嘉用忠直陨命，名章一时，然亦可谓不知人矣。光之邪佞，鬼所唾也，奴事董贤，协媚王莽，为汉螽蟴，尚得为贤也哉？

【译文】 王嘉任丞相期间，因忠言直谏触怒了汉哀帝，汉哀帝把这件事交给将军和朝中官员商议处罚意见，光禄大夫孔光等人弹劾王嘉迷乱国政，欺蒙皇上，大逆不道，要求与主管刑狱的廷尉共同审问王嘉。汉哀帝表示同意。孔光派谒者把王嘉召到廷尉府，王嘉对狱吏说：“我一生最遗憾的事，就是身为丞相，却不能进用贤人，黜退小人。”狱吏问贤人是谁，王嘉说：“贤人，就是前丞相孔光，我没有使他得到重用。”王嘉死后，汉哀帝看了王嘉的奏章，想起王嘉所说的话，便又重新任用孔光为丞相。事实上，王嘉入狱，是由于孔光迎合汉哀帝的过错造成的，而王嘉死前，还称赞孔光有才能，王嘉因为忠诚直言而丢了性命，名声显扬一时，然而他可以说是太不了解人了。孔光奸险邪恶，鬼神也唾弃他，他奴颜卑膝地侍奉董贤，谄媚附合王莽，是危害汉朝江山的坏人，还能够称得上是贤臣吗？

朱温三事

【原文】 义理所在，虽盗贼凶悖之人，亦有不能违者。刘仁恭为卢龙节度

使，其子守文守沧州，朱全忠引兵攻之，城中食尽，使人说以早降。守文应之曰：“仆于幽州，父子也，梁王方以大义服天下，若子叛父而来，将安用之？”全忠愧其辞直，为之缓攻。其后还师，悉焚诸营资粮，在舟中者凿而沉之。守文遗全忠书曰：“城中数万口，不食数月矣，与其焚之为烟，沉之为泥，您乞其所余以救之。”全忠为之留数盗，沧人赖以济。及篡唐之后，苏循及其子楷，自谓有功于梁，当不次擢用。全忠薄其为人，以其为唐鸱枭，卖国求利，勒循致仕，斥楷归田里。宋州节度使进瑞麦，省之不怿，曰：“宋州今年水灾，百姓不足，何用此为？”遣中使诘责之，县令除名。此三事，在他人为不足道，于全忠则为可书矣，所谓憎而知其善也。

【译文】 如果确实符合道义，合理的话，尽管是盗贼凶恶悖逆的人，也有无法违反的时候。刘仁恭做卢龙节度使，他的儿子刘守文镇守沧州，朱全忠（朱温）领兵来攻打，城中粮食吃尽，朱温派人劝说他早点投降，刘守文回答说：“我对于幽州（刘仁恭）是父子关系，梁王（朱温）正要以大义服天下，如果叫儿子叛父而来降，你把我怎么使用呢？朱全忠对他正直的话感到惭愧，因此放缓进攻。他后来退兵，把各营粮草都烧掉，在船里的凿沉船只使之沉入水底。刘守文给朱全忠写信说：城中几万人，几个月没吃的了，与其烧成烟，沉入水中为泥，乞求你用所余的粮食来救济人们。朱全忠因此留下了几砵粮食，沧州人靠此得救。在朱全忠篡唐后，苏循和他的儿子苏楷，自以为对后梁有功，应不按等第升擢任用。朱全忠看不起他的为人，以为是唐朝的叛逆，卖国求利，勒令苏循辞官，罢斥苏楷回乡。宋州节度使进献祥瑞的麦子，朱全忠看了不高兴，说：“宋州今年水灾，百姓粮食不足，何必干这个？”派朝廷使者诘责他，并把县令削职。这三件事，在别人来说不足道，对朱全忠就可以记载了，这就是所谓憎恶他但也能知道他的长处。

文字润笔

【原文】 作文受谢，自晋、宋以来有之，至唐始盛。《李邕传》：“邕尤长碑颂，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赍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巨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故杜诗云：“干谒满其门，碑版照四裔。丰屋珊瑚钩，骥骥织成罽。紫骝随剑几，义取无虚岁。”又有《送斛斯六官诗》云：“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钱。本卖文为活，翻令室倒悬。”盖笑之也。韩愈撰《平淮西碑》，宪宗以石本赐韩宏，宏寄绢五百匹；作

王用碑，用男寄鞍马并白玉带。刘义持愈金数斤去，曰：“此谀墓中人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愈不能止。刘禹锡祭愈文云：“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犴金如山。”皇甫 为裴度作《福先寺碑》，度赠以车马缯彩甚厚， 大怒曰：“碑三千字，字三缣，何遇我薄邪？”度笑酬以绢九千匹。穆宗诏萧碣撰成德王士真碑，碣辞曰：“王承宗事无可书。又撰进之后，例得赐遗，若龟勉受之，则非平生之志。”帝从其请。文宗时，长安中争为碑志，若市买然。大官卒，其门如市，至有喧竞争致，不由丧家。裴均之子，持万缣指韦贯之求铭，贯之曰：“吾宁饿死，岂忍为此哉？”白居易《修香山寺记》，曰：“予与元微之，定交于生死之间。微之将薨，以墓志文见托，既而元氏之老，状其臧获、舆马、绛帛、洎银鞍、玉带之物，价当六七十万，为谢文之贄。予念平生分，贄不当纳，往反再三，讫不得已，因施兹寺。凡此利益功德，应归微之。”柳碣善书，自御史大夫贬泸州刺史，东川节度使顾彦晖请书德政碑。碣曰：“若以润笔为赠，即不敢从命。”本朝此风犹存，唯苏坡公于天下未尝铭墓，独铭五人，皆盛德故，谓富韩公、司马温公、赵清献公、范蜀公、张文定公也。此外赵康靖公、滕元发二铭，乃代文定所为者。在翰林日，诏撰同知枢密院赵瞻神道碑，亦辞不作。曾子开与彭器资为执友，彭之亡，曾公作铭，彭之子以金带缣帛为谢。却之至再，曰：“此文本以尽朋友之义，若以货见投，非足下所以事父执之道也。”彭子皇惧而止。此帖今藏其家。

【译文】 为人写文章而得到酬谢，从晋、宋时期就开始有了，到唐朝开始盛行。《李邕传》记载：“李邕特别善长写碑志颂辞，朝中大臣官员和天下各佛寺道观的僧人道士，都携带金银绢帛去请他写文章。李邕先后为人写了几百篇碑铭颂辞，所得到的馈赠，也价值上亿。当时的舆论认为，自古以来卖文章发财的，没有能与李邕相比的。”所以杜甫有诗说：“干谒满其门，碑版照四裔。丰屋珊瑚钩，骐骥织成帔。紫骝随剑几，义取无虚岁。”又有《送斛斯六官诗》说：“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钱。本卖文为活，翻令室倒悬。”大概是讥笑他的。韩愈撰写了《平淮西碑》，唐宪宗把石本赐给韩宏，韩宏便寄了五百匹绢给韩愈，作为酬谢；韩愈给王用写碑文，王用的儿子给韩愈送去了鞍马和白玉带。刘义拿走了韩愈的几斤金子，并说：“这是吹捧坟墓中的人所得到的钱财，不如送给刘某人作寿礼。”韩愈无法制止。刘禹锡给韩愈写的祭文中说：“韩公文名盖世，曾应邀为王侯将相们写了许多墓志碑铭，一个字的价格，就需要主人载运金钱堆积如山。”皇甫 给裴度写了《福先寺碑》文，裴度赠送给皇甫 许多车马和绸绢，皇甫 怒气冲冲地说：“碑文有三千字，一个字值三匹细绢，为什么给我这么少的东西？”裴度急忙陪着笑脸又送了五千匹绢作为酬谢。唐穆宗下诏命萧

为成德的王士真撰写碑文，萧 推辞说：“王士真的儿子王承宗没有什么事迹可写。再说写好进呈朝廷之后，按照惯例应得到馈赠，如果勉强接受，那就违背我平生的志向了。”唐德宗答应了萧 的请求。唐文宗时，长安（今陕西西安）城中争着为别人写碑文，就好像市场上做买卖一样。达官贵人死了，他家门前就如同市场一样，要求为死者撰写碑文的喧哗竞争，甚至连死者的家人也做不了主。裴钧的儿子，携带一万匹细绢到韦贯之家中求作碑文，贯之说：“我宁愿饿死，也不会做这种事。”白居易在《修香山寺记》中说：“我和元微之是生死之交，微之临死时托我给他写碑文，事过不久，元家的老人说要将他家的奴婢、车马、绫绢、银鞍、玉带等价值六、七十万两白银的东西送给我作为报酬。我想起平日和微之的交情，认为不应该接受这些礼物，元家前后送来多次，最后迫不得已才收下，施舍给香山寺。这些功德，都应当归于元微之。”柳砮的书法很好，他从御史大夫任上被贬为泸州刺史，东川（今四川遂宁）节度使顾彦晖请他为自己书写德政碑文。柳砮对他说：“如果赠送给我财物作为酬谢，我就不能从命。”我大宋朝仍然存在这种风俗，只有苏轼很少给别人写碑文，平生只给五位德高望重的人物写过，他们是：富弼、司马光、赵 、范镇、张方平。此外赵康靖公、滕元发二人的碑文，乃是代张方平写的。苏轼任翰林学士时，皇帝诏令他为同知枢密院赵瞻写墓志，苏轼也推辞不写。曾子开与彭器资是挚友，彭器资死后，曾子开为他写了碑文，彭器资的儿子送给他金带绢绸作为酬谢，曾子开推辞再三，说：“这篇碑文是我为了尽朋友之义而写的，如果你送给我钱物，那么这就不是你对待你父亲挚友的方式了。”彭器资的儿子听了惶恐不安，马上收回东西。这篇碑文现在还藏在彭家。

汉举贤良

【原文】 汉武帝建元元年，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是时，对者百余人，帝独善庄助对，擢为中大夫。后六年，当元光元年，复诏举贤良，于是董仲舒等出焉。《资治通鉴》书仲舒所对为建元。按策问中云：“朕亲耕籍田，劝孝弟，崇有德，使者冠盖相望，问勤劳，恤孤独，尽思极神。”对策曰：“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必非即位之始年也。

【译文】 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下诏命朝廷大臣推举贤能、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卫绾上奏说：“所推举的贤良之才中，有些人是钻研申

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等人学说的，扰乱朝政，请求皇上将他们全部罢黜。”汉武帝同意了他的上奏。当时，向皇帝上对策的有一百多人，汉武帝唯独欣赏庄助的对策，于是提拔他为中大夫。六年之后，正是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又下诏推举贤良人才，于是董仲舒等人被免职。《资治通鉴》中说董仲舒是建元元年向汉武帝上对策的。可是，据查汉武帝所出试题中说：“我每年春天都要亲自去耕种籍田，勉励大家孝顺父母，尊敬兄长，推崇有德行的人，派出许多使者，慰问勤劳的人，抚恤孤苦伶仃的人和老而无子的人，为此竭尽心思，不遗余力。”董仲舒回答说：“阴气与阳气交错，大气团充塞，一切生物都很少有顺遂的，黎民百姓未能安居乐业。”这必定不是汉武帝即位那一年的事。

戊为武

【原文】 十干“戊”字只与“茂”同音，俗辈呼为“务”，非也。吴中术者，又称为“武”。偶阅《旧五代史》梁开平元年，司天监上言日辰，内“戊”字请改为“武”，乃知亦有所自也。今北人语多曰“武”，朱温父名诚，以“戊”类“成”字，故司天谄之耳。

【译文】 在十天干中，“戊”字只和“茂”字同音，一般的人把它读作“务”，这是不对的。吴中术士又读作“武”。我偶然翻阅《旧五代史》，书中说：后梁太祖朱温开平元年（907年），司天监上书谈论历法，请求把天干中的“戊”字改为“武”，我这才知道“戊”读作“武”也是有来历的。现在北方人大多读“武”这个音，朱温的父亲名叫朱诚，“戊”字象“成”字，所以司天监才上书要求把“戊”字改为“武”字，以谄媚朱温。

周亚夫

【原文】 汉景帝即位三年，七国同日反，吴王至称东帝，天下震动。周亚夫一出即平之，功亦不细矣，而讫死于非罪。景帝虽未为仁君，然亦非好杀卿大夫者，何独至亚夫而忍为之？

窃尝原其说，亚夫之为人，班、马虽不明言，然必悻直行行者。方其将屯细柳，只以备胡，且近在长安数十里间，非若出临边塞，与敌对垒，有呼吸不

可测知之事。今天子劳军至，不得入，及遣使持节诏之，始开壁门；又使不得驱驰，以军礼见，自言介冑之士不拜。天子改容称谢，然后去。是乃王旅万骑，乘輿黄屋，顾制命于将帅，岂人臣之礼哉！则其傲睨帝尊，习与性成，故赐食不设箸，有不平之意。鞅鞅非少主臣，必已见于辞气之间，以是陨命，甚可惜也！

秦王猛伐燕围邺，苻坚自长安赴之。至安阳，猛潜谒坚，坚曰：“昔周亚夫不迎汉文帝，今将军临敌而弃军，何也？”猛曰：“亚夫前却人主以求名，臣窃少之。”猛之识虑，视亚夫有间矣。

【译文】 汉景帝刘启即位后的第三年，吴、楚、赵、胶东、胶西、济南、淄川等七国同时举兵发动叛乱，吴王刘濞甚至自称东帝，全国为之震动。汉景帝派周亚夫率兵平叛。周亚夫出师不久，就平定了叛乱，功劳可谓不小，然而最终却死于非罪。汉景帝虽然说不上是仁慈的君主，但是也并非是个喜欢杀戮卿大夫的人，为什么偏偏对周亚夫这么残忍呢？

我曾私下探究此事的原委。周亚夫的为人，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中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但可想而知他是一个任性倔强的人。当初，汉文帝任命周亚夫为将军，率兵驻守细柳（今陕西咸阳西南），只是为了防备匈奴侵犯，况且细柳与京城长安相距仅几十里地，完全不同于边界要塞，与敌人直接对阵，瞬间就能发生不可预料的军情。可是汉文帝亲自到细柳慰劳军队时，守军却不让他进营门，直到汉文帝派遣使者手持符节并下诏书，周亚夫才命令打开营门。但是，周亚夫又不许汉文帝一行在军营中快马驰骋，并按军中礼节与汉文帝见面，自称穿甲戴盔的军人，不行跪拜之礼。汉文帝见状，颜色更改，匆忙道谢后就离去了。由此看来，在千军万马之前，皇帝受制于手下的将帅，这哪里是臣下对待皇帝的礼节啊！可见周亚夫高傲自负、目无君主，习以成性，所以，当汉景帝赏赐给他食物而没有摆设筷子时，周亚夫就流露出一不满神情。心怀不满的人不适合做年轻气盛之君的臣子，周亚夫的不满在言辞之中表露出来，得罪了皇帝，才丢了性命，真是太可惜啦！

前秦大将王猛率兵攻打前燕，并围困前燕都城邺（今河北临漳），前秦皇帝苻坚从长安（今陕西西安）来到前线。当走到安阳（今河南安阳）时，王猛秘密地前来拜见苻坚。苻坚说：“当年周亚夫不迎接汉文帝，现在将军你却临阵丢下军队来拜见我，这是为什么呢？”王猛说：“周亚夫不迎接皇帝是为了沽名钓誉，我很看不起他的为人。”王猛的见识和思虑，与周亚夫相比大为不同啊。

炀王 炀帝

【原文】 金酋完颜亮隕于广陵，葛王褒已自立，于是追废为王，而谥曰炀。迈奉使之日，实首闻之。接伴副使秘书少监王补言及此，云北人戏诮之曰：“奉敕江南干当公事回。”及归，覲德寿宫奏其事，高宗天颜甚悦，曰：“亮去岁南牧，已而死归。人皆以为类苻坚，唯吾独云似隋炀帝，其死处既同，今得谥又如此，岂非天乎！”此段圣语，当不见于史录，故窃志之。

【译文】 金国首领完颜亮死于广陵，葛王完颜褒已经自立为帝。于是追废完颜亮为王（海陵王），而谥号叫“炀”。洪迈奉命出使的时候，实在先听到此事。金方接伴副使砵书少监王补讲到此事，说北边的人开玩笑讥笑他说“奉敕书到江南干公事回来。”到回来后，在德寿宫朝见高宗上奏此事，高宗脸色很高兴，说：“完颜亮去年南侵，后来死了回去。人家都以为像苻坚，只有我说像隋炀帝，他的死处与隋炀帝既相同，所得谥号又如此，岂非天意吗！”这段皇帝的话，史书不会记载，所以私自记下。

郑庄公

【原文】 《左传》载诸国事，于第一卷首书郑庄公，自后纪其所行尤详，然每事必有君子一说，唯诅射颖考叔，以为失政刑，此外率称其善。杜氏注文，又从而奖与之。按庄公为周卿士，以平王貳于虢而取王子为质，以桓王畀虢公政，而取温之麦，取成周之禾。以王夺不使知政，忿而不朝，拒天子之师，射王中肩。谓天子不能复巡守，以泰山之碣易许田。不胜其母，以害其弟，至有城颖及泉之誓。是其事君、事亲可谓乱臣贼子者矣！而曾无一语以贬之。书姜氏为母子如初，杜注云：“公虽失之于初，而孝心不忘，故考叔感而通之。”书郑伯以齐人朝王曰：“礼也。”杜云：“庄公不以虢公得政而背王，故礼之。”书息侯伐郑曰：“不度德。”杜云：“郑庄贤。”书取郕与防归于鲁曰：“可谓正矣。以王命讨不庭，不贪其土，以劳王爵。”书使许叔居许东偏曰：“于是乎有礼，度德而处，量力而行，相时而动，可谓知礼。”书周、郑交恶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是乃以天子诸侯混为一区，无复有上下等威之辨。射王之夜，使祭足劳王，杜云：“郑志在苟免，王讨之非也。”此段尤为悖理。唯公羊子于克段于鄢

之下，书曰：“大郑伯之恶”，为得之。

【译文】 《左传》记载了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大事，在第一卷首先记载了郑庄公，尤为详细地记述了他的所做所为，而且每件事后必定要以“君子曰”的形式抒发作者的看法和评论，其中只有对他下令军中诅咒射杀颍考叔之人表示微词，以为有失政刑，此外一概称颂他的美德。杜预为《左传》做注释，也对郑庄公大加称赞。

郑庄公本是周天子朝廷中的最高执政大臣，因周平王同时又重用虢公以分郑权，于是郑庄公要求派王子狐到郑国为人质，以示诚意。桓王给予虢公执政的地位，郑庄公便把周天子温地（今河南温县西）的麦子抢走，又把成周（今河南洛阳东效白马寺以东）的庄稼强行收割。因为周王剥夺了他辅政的权利，他心中便忿恨不满，不去朝见天子，并抗拒天子的大兵，把周王的肩头射伤。他说天子不能再巡守，用泰山的砗磲换取许（今河南许昌东）的田。他不能容忍自己的母亲，迫害自己的弟弟，甚至在城颖（今河南临颖西北）发出不到黄泉不与母亲相见的誓言。他对君主、对亲人所做所为，可以说是一个乱臣、贼子的行径！而《左传》中却没有一句贬低他的话。

《左传》记载郑庄公与他母亲姜氏和好，关系像当初一样，杜预注释说：“郑庄公虽然起初有过错，但却没有忘掉孝顺之心，所以考叔能够感化他，使他们母子重归于好。”

《左传》记载郑庄公劝说齐国国君拜见周王时，说：“这是有礼貌啊！”杜预注释说：“郑庄公不因为虢公得到执政权而背叛周王，所以仍然以礼事之。”

《左传》在记述息侯攻打郑国时说：“息侯没有揣度衡量自己的德行和力量。”杜预注释说：“郑庄公很贤良。”

《左传》记载郑庄公把郕国（今山东成武县东南）和防邑（今山东金乡县西南）归还给鲁国（今山东南部一带）时，说：“这可以说是正义之举啊。奉周王的命令讨伐不效忠王室的人，得胜后又不贪取其土地，以劳王爵。”

《左传》记载郑庄公命许国大夫百里奉许叔居于许国（今河南许昌一带）东部，说：“郑庄公在这件事上做得很合乎礼仪，揣度自己的品德而处理事情，衡量自己的能力去做，审视时机而行动，可以说很懂礼仪了。”

《左传》记载周王与郑庄公关系恶化，说：“双方不能出自真心的信任，交换人质有什么好处呢？”这实在是把天子与诸侯混为一体，不再有上下、贵贱之别了。

郑庄公射伤周王的当晚，派祭足慰劳周王，杜预注释说：“郑庄公的本意是想苟且求免，周王讨伐他是不对的。”这段话尤其不合情理。

唯有公羊高在“郑庄公战胜共叔段于鄆（今河南鄆陵县境内）”下面写道：“突出郑庄公的罪恶。”这句话说得非常正确。

百六阳九

【原文】 史传称百六阳九为厄会，以历志考之，其名有八。初入元百六曰阳九，次曰阴九。又有阴七、阳七、阴五、阳五、阴三、阳三，皆谓之灾岁。大率经岁四千五百六十，而灾岁五十七。以数计之，每及八十岁，则值其一。今人但知阳九之厄。云经岁者，常岁也。

【译文】 史书所说“百六阳九”是灾祸来临的时刻，用历志来考察，它的名称有八种。开始进入一个元（四千六百十七年为“一元”）的“百六”（一百〇六年）叫“阳九”，其次叫阴九。又有阴七、阳七、阴五、阳五、阴三、阳三，都叫灾年。大抵平常的年份为四千五百六十年，而灾年有五十七年。以数目来统计，每到八十年，就要遇到一次灾年。现在人们只知“阳九”是灾难。所谓“经岁”，就是平常的年份。

左传易筮

【原文】 《左传》所载《周易》占筮，大抵只一爻之变，未尝有两爻以上者。毕万筮仕，遇《屯》之《比》，初九变也。成季将生，遇《大有》之《乾》，六五变也。晋嫁伯姬，遇《归妹》之《睽》，上六变也。晋文公迎天子，遇《大有》，乃九三变而之《睽》。叔孙庄叔生子豹，遇《明夷》，乃初九变而之《谦》。

崔杼娶妻，遇《困》，乃六三变而之《大过》。南蒯作乱，遇《坤》，乃六五变而之《比》。赵鞅救郑，遇《泰》，乃六五变而之《需》。占者即演而为说。然崔杼“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叔孙“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殆若专为二子所作也。唯陈厉公生敬仲，遇《观》之《否》。周史曰：“《坤》，土也；《巽》，风也；《乾》，天也。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杜氏注云：“自二至四有《艮》象，《艮》为山。”予谓此正是用中爻取义，前书论之详矣。又有相与论事，不假蓍占而引卦以言者，如郑公子曼满欲为卿，王子伯謩曰：“《周易》有之，在《丰》之《离》。”晋先穀违命进师，知庄子曰：“《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楚王谕侈，子大叔曰：“在

《复》之《颐》。”但以爻辞合其所行之事耳！至于“为嬴败姬”、“伐齐则可”等语，自是一时探赜索隐，非后人所可到也。卫襄公生子，孔成子占之，亦遇《屯》之《比》，与毕万同，虽史朝与辛廖之言则异，然皆以“利建侯”为主。

【译文】 《左传》中所记载的《易经》占筮，大都只有一爻变化，不曾有两爻以上的。毕万占卜仕途，遇《屯》之《比》卦，初九爻由阳变阴。成季将生，遇《大有》之《乾》卦，六五爻由阴变阳。晋国嫁伯姬，遇《归妹》之《睽》卦，上六爻由阴变阳。晋文公迎周天子，遇《大有》卦，乃九三爻变由阳变阴而成为《睽》卦。叔孙庄叔生子豹，遇《明夷》卦，乃初九爻由阳变阴而成为《谦》卦。崔杼娶妻，遇《困》卦，乃六三爻由阴变阳而成为《大过》卦。南蒯作乱，遇《坤》卦，乃六五爻由阴变阳而成为《比》卦。赵鞅救郑，遇《泰》卦，乃六五爻变化而至于《需》卦。占卜的人根据卦象演绎解释。然而，崔杼娶妻，《困》六三爻的爻辞说：“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叔孙庄叔生儿子豹，《明夷》卦初九爻的爻辞说：“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似乎就是专门为这两个人所作的卦辞。只有陈厉公生敬仲，遇到《观》之《否》卦。周朝的史官说：“《坤》为土，《巽》为风，《乾》为天。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杜氏注解：“从二至四爻有《艮》卦象，《艮》为山。”我认为这正是用中爻取义，前书论述得已经很详细了。又有相互论事，不借助占筮而直接引用卦词来解说的，如郑公子曼满想做卿，王子伯廖说：“《周易》中有这种卦象，即《丰》之《离》。”晋先眎违抗命令率军前进，知庄子说：“《周易》中有这种卦象，即《师》卦变化为《临》卦。”楚王骄傲自大，荒淫无度，子太叔说：“《周易》中有这种卦象，即《复》卦变为《颐》卦”，这只是直接引用爻辞来附合对方所做的事情罢了！至于“为嬴败姬”、“伐齐则可”等说法，自是一时探赜索隐之词，并不是后人所可以达到的。卫襄公生子，孔成子占筮，也得到《屯》之《比》卦，和毕万占卜任途前程相同，虽然史朝和辛廖的解说有差别，但是他们都认为以“利建侯”为主。

钟繇自劾

【原文】 汉建安中，曹操以钟繇为司隶校尉，督关中诸军。诏召河东太守王邑，而拜杜畿为太守。郡掾指繇求留邑，繇不听，邑诣许自归。

繇自以威禁失督司之法，乃上书自劾曰：“谨按侍中守司隶校尉东武亭侯钟繇，幸得蒙恩，以斗筭之才，仍见拔擢，显从近密，衔命督使。明知诏书深疾

长吏政教宽弱，检下无刑，久病淹滞，众职荒顿。既举文书，操弹失理。轻慢宪度，不与国同心，为臣不忠，大为不敬。臣请法车召诣廷尉治繇罪，大鸿胪削爵土。臣辄以文书付功曹从事，伏须罪诛。”诏不许。

予观近时士大夫自劾者，不过云乞将臣重行窜黜阖门待罪而已，如繇此章，盖与为他人所纠亡异也，岂非身为司隶，职在刺举，故如是乎！

【译文】 汉代建安年间，曹操以钟繇为司隶校尉，监督关中各军队。诏书征召河东太守王邑，而任命杜畿为太守。郡中掾吏到钟繇那里要求留下王邑，钟繇不许，王邑自己到许昌回归朝廷。钟繇自以为应以威权禁止失去了监督官员的责任，就上书弹劾自己说：“谨按侍中现任司隶校尉东武亭侯钟繇，幸运得受恩宠，以微薄的才能，仍被拔擢，居于接近皇帝的显职，奉命监督之任。明知诏书中深深地痛恨地方官员政教失于过宽措施软弱无力，统率下属官员没有威刑，长期有病使政令积压，许多职事荒废。既接到文书，而执行和纠弹不合法理。轻忽怠慢法令，不和国家同心，作为臣子不忠，大为不恭敬。臣请求派执法车辆征召我钟繇到廷尉治他的罪，大鸿胪削去他的爵位封邑。臣自动把文书交付功曹从事，等待定罪诛罚。”诏书不许。我看近来士大夫弹劾自己的，不过说请求把臣从重窜逐贬黜关门等待罪命而已，像钟繇这章表，却和被别人纠弹没有两样，难道不是因为他自己是司隶校尉，任职就在弹劾举奏，所以这样做的吧！

大义感人

【原文】 理义感人心，其究至于浹肌肤而沦骨髓，不过语言造次之间，初非有怪奇卓诡之事也。楚昭王遭吴阖庐之祸，国灭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返矣，何患无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贤也！”相与从之，或奔走赴秦，号哭请救，竟以复国。汉高祖入关，召诸县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凡吾所以来，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乃使人与秦吏行至县乡邑，告谕之，秦民大喜。已而项羽所过残灭，民大失望。刘氏四百年基业定于是矣。唐明皇避禄山乱，至扶风，士卒颇怀去就，流言不逊，召入谕之曰：“朕托任失人，致逆胡乱常，须远避其锋。卿等仓卒从朕，不得别父母妻子，朕甚愧之。今听各还家，朕独与子弟入蜀，今日与卿等诀。归见父母及长安父老，为朕致意。”众皆哭曰：“死生从陛下。”自是流言遂息。贼围张巡于雍丘，大将劝巡降，巡设天子画像，帅将士朝之，人人皆泣。巡引六将于

前，责以大义而斩之，士心益劝。河北四凶称王，李抱真使贾林说王武俊，托为天子之语，曰：“朕前事诚误，朋友失意，尚可谢，况朕为四海之主乎？”武俊即首唱从化。及奉天诏下，武俊遣使谓田悦曰：“天子方在隐忧，以德绥我，何得不悔过而归之？”王庭凑盗据成德，韩愈宣慰，庭凑拔刃弦弓以逆。及馆，罗甲士于廷。愈为言安、史以来逆顺祸福之理，庭凑恐众心动，麾之使出，讠为藩臣。黄巢伪赦至凤翔，节度使郑畋不出，乐奏，将佐皆哭。巢使者怪之，幕客曰：“以相公风碇不能来，故悲耳。”民间闻者无不泣，畋曰：“吾固知人心尚未厌唐，贼授首无日矣。”旋起兵率倡诸镇，以复长安。田悦以魏叛，丧师遁还，亦能以语言动众心，誓同生死。乃知陆贄劝德宗痛自咎悔，以言谢天下，制书所下，虽武人悍卒，无不感动流涕，识者知贼不足平。凡此数端，皆异代而同符也。国家靖康、建炎之难极矣，不闻有此，何邪？

【译文】 理义的力量足以深深地打动人心，能够穿透肌肤，深入骨髓，这只不过是在言语瞬息间的事，原本没有什么奇怪诡异之处。楚昭王遭到吴王阖庐进攻的祸难，国灭出逃，父老们送他，昭王说：“父老们回去吧，哪用怕没君主呢！”父老们说：“君主是这样的贤明！”就都跟着他，有奔走到秦国，痛哭请求救兵，竟得收复国土。汉高祖入关，召来各县豪杰说：“父老们被秦朝苛刻的法令所苦已很久了，我应当在关中称王，和父老们约定法律只有三章。我所以要来这里，是为父兄们除害，不是要侵扰大家，不必害怕！”于是派人和秦朝原有官吏到各县和乡邑，告诉百姓，秦国人民大为高兴。后来项羽所到之处残害人物毁灭城邑，百姓大失所望。刘氏四百年的皇位基业在这时已确定了。唐明皇逃避安禄山叛乱，到达扶风，士兵们心中对去留很有异议，流言对皇帝很不恭敬，唐明皇把士兵们召来告谕他们说：“朕委任的人不当，以致逆乱的胡人违反伦常，需要到远处避他的兵锋。你们仓促跟着朕，不能和父母妻子告别，朕很惭愧。现在允许各人回家，朕独自和子弟们进入蜀地，今天和大家分别。回去见父母和长安父老，给朕转达这意思。”众人都哭着说：“死活也跟着陛下。”从此流言就停止了。反贼围困张巡于雍丘，部下大将劝张巡投降。张巡摆出皇帝的画像，率领将士朝见，人人都哭。张巡叫六员将领前来，用大义责备他而加以斩杀，士兵的心更为发奋。河北四镇叛将自称为王，李抱真派贾林去说服王武俊，假称是皇帝的话，说：“朕以前的事确实错了，朋友中有得罪之处，还可谢罪，何况朕是天下之主呢？”王武俊就首先倡议服从朝廷。到唐德宗在奉天所下诏书到达后，王武俊派使者对田悦说：“皇帝正处在忧患之中，用恩德来安抚我们，哪能不悔过而归附他？”王庭凑窃据成德军，韩愈去安抚慰问，王庭凑叫部下拔出刀拉开弓来接他。到了客馆，陈列穿甲的士兵在门庭里。韩愈对他

讲安、史以来作逆和归顺所得祸福的道理，王庭凑怕部众动心，就赶他出去，但终于做了藩臣。黄巢伪旨大赦送到凤翔，节度使郑畋不出来接，音乐奏起时，将领部属都哭了。黄巢的使者感到奇怪，幕中宾客说：“因为相公（指郑畋）得了风痹病不能来，所以悲哀。”民间听到的没有人不哭，郑畋说：我本来知道人心还没厌弃唐朝，贼人的头不几天就可送来了。不久就起兵带动各藩镇，来收复长安。田悦以魏州叛变，兵败逃还，也能以语言打动众人的心，发誓同生共死。所以知道陆贽劝唐德宗深自改悔，用语言来向天下谢罪，制书所下到的地方，即使武人和凶悍的兵丁没有不感动流泪，知道形势的人预知反贼不难平定。凡这几件事，都是不同朝代而事情全部相符合的。本朝靖康、建炎年间的祸难极严重了，却听不到这类事，这是为什么？

卷七

田租轻重

【原文】 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云：“一夫治田百亩，岁收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盖十一之外，更无他数也。

今时大不然，每当输一石，而义仓省耗别为一斗二升，官仓明言十加六，复于其间用米之精粗为说，分若干甲，有至七八甲者，则数外之取亦如之。庾人执概从而轻重其手，度二石二、三斗乃可给。至于水脚、头子、市例之类，其名不一，合为七八百钱，以中价计之，并僦船负担，又须五斗，殆是一而取三。以予所见，唯会稽为轻，视前所云不能一半也。

董仲舒为武帝言：“民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而田租口赋，二十倍于古。”谓一岁之中，失其资产三十及二十倍也。又云：“或耕豪民之田，见税十五。”言下户贫民自无田，而耕垦豪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输本田主，今吾乡俗正如此，目为“主客分”云。

【译文】 战国时期，李悝给魏文侯制订了充分发挥地力的文告，文告说：“一个农民耕种一百亩田地，每年共收获粮食一百五十石，除去交纳十分之一的税收十五石，还剩下一百三十五石。”大概在十分之一的税收之外，便没有其他名目的杂税了。

现在就大不一样了，农民每当交纳一石粮食的税，义仓就借口运输、储存中有折损，另外要再加上一斗二升作损耗，官仓则明确规定要额外多收十分之六，在这中间还要根据粮食的精、粗不同，分为若干等级，有的甚至分为七、八等，而额外多收的粮食也照此办理。管理粮仓的人拿着刮平粮食斗斛的器具，下手轻重不同，随心所欲地坑农，这样一来，定额应交纳一石粮食的，估计要交纳两石二、三斗才行。至于水路运输所需费用、租赋以外附加的头子钱、买卖交易时的附加费、市例钱等，名目不一，合在一起有七、八百钱，以中价计算，另加上租赁船只的费用，又需要五斗粮食，这几乎相当于本应交纳定额一石粮食的却要交纳三石粮食。据我所知，只有会稽（今浙江绍兴）一带田租较轻，不到前面所说数量的一半。

董仲舒对汉武帝说：“现在老百姓一年的徭役，比古时候要重三十倍，而所要交纳的田租口赋比古代要多二十倍。”意思是说老百姓一年当中，所失去的资产是古时候的三十到二十倍。董仲舒又说：“有的百姓耕种富豪的田地，要交纳所得收入十分之五的重税。”说的是贫民自己没有田地，而要租种富豪人家的田地，所收入的粮食十分之五要交纳给田地的主人，现在我的家乡的习惯也是这样，这个名目叫“主客分”，即占有土地的主户与没有土地的客户之间平均分配所得。

女子夜绩

【原文】 《汉·食货志》云：“冬，民既入，妇人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谓一月之中，又得半夜，为四十五日也。必相从者，所以省费燎火，同巧拙而合习俗也。

《战国策》甘茂亡秦出关，遇苏代曰：“江上之贫女，与富人女会绩而无烛，处女相与语，欲去之。女曰，妾以无烛故，常先至扫室布席，何爱余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赐妾。”以是知三代之时，民风和厚勤朴如此，非独女子也，男子亦然。

《豳风》“昼尔于茅，宵尔索綯”，言昼日往取茅归，夜作綯索，以待时用也，夜者日之余，其为益多矣。

【译文】 《汉书·食货志》上说：“到了冬天农闲时，老百姓都闲居家中，妇女们聚集在一起，夜里纺麻织布，这样一个月可干四十五天的活。”就是说，一个月中，每天又多出半夜，所以一个月就相当于四十五天。妇女们之所以要聚集在一起，是为了节省灯火照明费用，又可以相互取长补短，密切合作，这已经积久成俗。

《战国策》记载，甘茂逃离秦国，出了函谷关，遇见了苏代，便对苏代说：“长江边有一个贫家女子和富家女子一起织布，自己却没有灯烛，一起织布的女子们商议，想赶走她。贫家女说：‘我因为没有灯，所以常常提前赶到打扫房屋，铺设坐席，你们何必吝啬照在四周墙壁上的余光呢？希望您们把多余的光亮赐给我。’由此可知，夏、商、周三代时期，民风是如此的纯厚、朴素、勤劳。不但妇女如此，男子也是这样。《诗经·豳风》中说：“昼尔于茅，宵尔索綯”，意思是说，白天男子上山采集茅草，晚上把茅草搓成绳子，以备需要时使用。夜晚是白天的延续，它的好处是很多的。

淮南王

【原文】 汉淮南厉王死，民作歌以讽文帝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此《史》、《汉》所书也。高诱作《鸿烈解叙》，及许叔重注文，其辞乃云：“一尺缙，好童童，一升粟，饱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殊为不同，后人但引尺布斗粟之喻耳。

厉王子安复为王，招致宾客方术之士，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汉书·艺文志》《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列于杂家，今所存者二十一卷，盖《内篇》也。寿春有八公山，正安所延致客之处，传记不见姓名，而高诱叙以为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然唯左吴、雷被、伍被见于史。雷被者，盖为安所斥，而亡之长安上书者，疑不得为宾客之贤也。

【译文】 汉朝淮南厉王（刘长）死去，百姓作歌来讥讽汉文帝说：“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一尺布，还可缝制，一斗米还可舂打，兄弟二人却不能互相容忍）。这是《史记》、《汉书》所记的。高诱作《淮南鸿烈解叙》，和许叔重（许慎）的注文，其文辞却说：“一尺缙，好童童，一升粟，饱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一尺帛，美好光洁，一升米，做成饭可以吃得很饱，兄弟二人却不能相互容忍）。文字颇不相同，后来人只是引“一尺布一斗粟”的比喻。厉王的儿子刘安又做淮南王，招来宾客及方术的士人，作了《内书》二十一篇，《外书》很多；又有《中篇》八卷；专讲神仙和炼黄金的方法。《汉书·艺文志》：《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列在杂家类，现在所保存的二十一卷，就是《内篇》。寿春有八公山，正是刘安所招致宾客的地方，传记中不记八公姓名，而高诱以为是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个人，但其中只有左吴、雷被、伍被见于史书。雷被其人，是被刘安所斥去，而至长安上书告发的人，我怀疑他不能作为宾客中的贤者。

建除十二辰

【原文】 建除十二辰，《史》、《汉》历书皆不载，《日者列传》但有“建除

家以为不吉”一句。惟《淮南鸿烈解·天文训篇》云：“寅为建，卯为除，辰为满，巳为平，主生；午为定，未为执，主陷；申为破，主衡；酉为危，主杓；戌为成，主少德；亥为收，主大德；子为开，主太岁；丑为闭，主太阴。”今《会元官历》，每月逢建、平、破、收日，皆不用，以建为月阳，破为月对，平、收随阴阳月递互为魁罡也。《酉阳杂俎·梦篇》云：“《周礼》以日月星辰各占六梦，谓日有甲乙，月有建破。”今注无此语。《正义》曰：“按《堪舆》，黄帝问天老事云：‘四月阳建于巳，破于亥，阴建于未，破于癸，是为阳破阴，阴破阳。’”今不知何书所载，但又以十干为破，未之前闻也。

【译文】 与子、丑、寅、卯、辰、巳、戌、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相配的建立、除、满、平、定、执、破、危、成、收、开、闭十二辰，《史记》、《汉书》中都没有记载，《史记·日者列传》中仅有“专门研究建除十二辰的人认为不吉利”这样一句话。只有《淮南鸿烈解·天文训篇》中说：“寅为建，卯为除，辰为满，巳为平，主管生；午为定，未为执，主管陷；申为破，主为衡；酉为危，主管杓；戌为成，主管少德；亥为收，主管大德；子为开，主管太岁；丑为闭，主管太阴。”现在我们大宋朝的《会元官历》中，每月逢见建、平、破、收这几天，都不用它们来与地支相配，因建为月阳，破为月对，平、收随阴阳月次递互为魁罡。《酉阳杂俎·梦篇》说：“《周礼》用日、月、星、辰各占六梦的吉凶，说日有甲乙，月有建破。”现在的注释没有这句话。《正义》上说：“按《堪舆》记载，黄帝向天老问事时说：‘四月份阳建于巳，破于亥，阴建于未，破于癸，这就是阳破阴，阴破阳。’”现在不知道什么书上有记载，但是，另外又用十天干为破，以前没有听说过。

俗语算数

【原文】 三三如九，三四十二，二八十六，四四十六，三九二十七，四九三十六，六六三十六，五八四十，五九四十五，六九五十四，七九六十三，八九七十二，九九八十一，皆俗语算数，然《淮南子》中有之。三七二十一，苏秦说齐王之辞也。《汉书·律历志》刘歆典领钟律，奏其辞，亦云八八六十四。杜预注《左传》，天子用八，云八八六十四人，又六六三十六人，四四十六人。如淳、孟康、晋灼注《汉志》，亦有二八十六，三四十二，六八四十八，八八六十四等语。

【译文】 三三得九，三四一十二，二八一十六，四四一十六，三九二十七，

四九三十六，六六三十六，五八四十，五九四十五，六九五十四，七九六十三，八九七十二，九九八十一，这些都是民间计算时用的口诀，但《淮南子》一书中也有记载。三七二十一，是纵横家苏秦游说齐王时所说的话。《汉书·律历志》记载：刘歆典领钟律，向皇帝报告时，也说过八八六十四。西晋大臣杜预在给《左传》作注解时说，天子用八，说八八六十四人，又说六六三十六人、四四一十六人。如淳、孟康、晋灼注释《汉志》时，也有二八一十六，三四一十二，六八四十八，八八六十四等语。

砢文用事

【原文】 唐顺宗即位，抱疾不能言，王砢、王叔文以东宫旧人用事，政自己出，即日禁宫市之扰民，五坊小儿之暴闾巷，罢盐铁使之月进，出教坊女伎六百还其家。以德宗十年不下赦令，左降官虽有名德才望，不复叙用，即追陆贽、郑餘庆、韩皋、阳城还京师，起姜公辅为刺史。人情大悦，百姓相聚欢呼。又谋夺宦者兵，既以范希朝及其客韩泰总统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中人尚未悟。会诸将以状来辞，始大怒，令其使归告其将，“无以兵属人。”当是时，此计若成，兵柄归外朝，则定策国老等事，必不至后日之患矣！所交党与，如陆质、吕温、李景俭、韩晔、刘禹锡、柳宗元，皆一时豪俊知名之士，惟其居心不正，好谋务速，欲尽据大权，如郑瑜、高郢、武元衡稍异己者，皆亟斥徙，以故不旋踵而身陷罪戮。后世盖有居砢、文之地，而但务啸引沾沾小人以为鹰犬者，殆又不足以望其百一云。白乐天讽谏，元和四年作，其中《卖炭翁》一篇，盖为宫市，然则未尝能绝也。

【译文】 唐顺宗即位，因得病不能说话，王砢、王叔文因为他在做太子时的旧人掌管政事，政令由他们发布，即日起禁止“宫市”的侵扰百姓、五坊中少年在街巷中逞凶，免去盐铁使每月进献的银钱，放出教坊中使女六百人回她们的家。因为德宗十年不下大赦的命令，被贬谪的官员虽然有名誉德行和才干，都不再被任用，所以就追调陆贽、郑餘庆、韩皋、阳城等人回到京城，起用姜公辅做刺史。人们的情绪大为高兴，百姓们互相聚集在一起欢呼。他们又策划夺宦官们的兵权，既已用范希朝及其门客韩泰总领京城以西各城镇行营的兵马，宦官们尚未觉察。遇上各将领上状子来告辞，宦官们才大怒，叫他们的使者回去告诉他们的将领，“不要把兵权交给别人。”当这个时候，这计策如果成功的话，兵权就归朝中官员掌握，那么所谓“定策国老”等名目，必定不会像后来

那样成为灾患了。王础、王叔文所结交的朋友，像陆贽、吕温、李景俭、韩晔、刘禹锡、柳宗元等，都是一时的豪杰俊才知名的人士，只是因为他们居心不正，喜用计谋而力求速成，想掌握大权，像郑 瑜、高郢、武元衡等稍和他们意见不同的人，都急于斥退外调，以此原因不多久就被加罪名而杀死。后人若有处在王础、王叔文的地位，而只求牵引一些沾沾自喜的小人来做爪牙的，恐怕还不能及他们的百分之一。白居易（白居易）作讽谏的诗，元和四年（809 年）所作，其中《卖炭翁》一篇，就是为“宫市”而作，那么并没有能禁绝。

五十弦瑟

【原文】 李商隐诗云：“锦瑟无端五十弦”，说者以为锦瑟者，令狐丞相侍儿小名，此篇皆寓言，而不知五十弦所起。刘昭《释名》，箜篌云：“师延所作靡靡之乐，盖空国之侯所作也。”段安节《乐府录》云：“箜篌乃郑、卫之音，以其亡国之声，故号空国之侯，亦曰坎侯。”吴兢《解题》云：“汉武帝依琴造坎侯，言坎坎应节也。后讹为箜篌。”予按：《史记·封禅书》云：“汉公孙卿为武帝言：‘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于是，武帝益召歌儿，作二十五弦及空侯。”应劭曰：“帝令乐人侯调始造此器。”《前汉·郊祀志》备书此事，言“空侯瑟自此起。”颜师古不引劭所注，然则二乐本始，晓然可考，虽刘、吴博洽，亦不深究，且“空”元非国名，其说尤穿凿也。《初学记》、《太平御览》编载乐事，亦遗而不书。《庄子》言“鲁遽调瑟，二十五弦皆动”，盖此云。《续汉书》云“灵帝胡服作箜篌”，亦非也。

【译文】 唐朝大诗人李商隐的诗说：“锦瑟无端五十弦”，解说的人认为：锦瑟，是令狐丞相家侍儿的小名，这一篇都是寓言，却不知五十弦的出处。刘昭在其所著《释名》中解释“箜篌”时说：师延所作的乐曲多为靡靡之音，“箜篌”大概是空国诸侯所作的。”段安节在《乐府录》中说：“箜篌是指郑国、卫国的靡靡之音，认为它是亡国的音乐，所以称为空国之侯，又叫作坎侯。”吴兢在《解题》中说：“汉武帝在琴的基础上制成坎侯，意思是坎坎应合节拍，后来误传为‘箜篌’。我查考《史记·封禅书》中说：“汉朝的公孙卿对武帝说：‘天帝命令素女当场鼓五十弦瑟，调太悲，令听者伤心，天帝想制止，可素女不停手，一气之下传令将瑟弦弄断，只留下二十五弦。’于是，武帝又召集更多的唱歌人，作二十五弦及空侯。”应劭说：“武帝使乐人侯调首次制造这种乐器。”《前汉书·郊祀志》对此事记载的很详细，说“空侯瑟自此才开始有。”唐代著

名学者颜师古不引用应劭的注解。然而两件乐器的由来，清清楚楚，很容易考证，虽然刘、吴二公学问渊博，却也不去追根究底，而且“空”本来就不是国名，这种说法尤其穿凿附会。《初学记》、《太平御览》记述乐事，也遗漏不写。《庄子》说：“鲁遽调瑟，二十五弦皆动”，就是指此而言的。《续汉书》说：“汉灵帝胡服作箜篌”，也是不对的。

迂固用疑字

【原文】 东坡作《赵德麟字说》云：“汉武帝获白麟，司马迁、班固书曰‘获一角兽，盖麟云’，盖之为言，疑之也。”予观《史》、《汉》所纪事，凡致疑者，或曰若，或曰云，或曰焉，或曰盖，其语舒缓，含深意，姑以《封禅书》、《郊祀志》考之，漫记于此。“雍州好，自古诸神祠皆聚云。盖黄帝时尝用事，虽晚周亦郊焉。”“三神山，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未能至，望见之焉。”新垣平望气言：“有神气，成五采，若人冠冕焉。”“权火举而祠，若光辉然属天焉。”“出长安门，若见五人于道北。”“盖夜致王夫人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见焉。”“登中岳太室，从官在山下，闻若有言万岁者云。”“祭封禅祠，其夜若有光。”封禅大诏：“天若遗朕土，而大通焉。”河东迎鼎，“有黄云盖焉。”“见神人东莱山，若云欲见天子。”方士言：“蓬莱诸神若将可得。”“天子为塞河，兴通天台，若见有光云。”“获若石云于陈仓。”此外，如所谓：“及群臣有言老父，则大以为仙人也。”“可为观，如缑城，神人宜可致。”“天旱，意乾封乎？”“然其效可睹矣。”词旨亦相似。

【译文】 苏东坡在其所著《赵德麟字说》中指出：“汉武帝在打猎的时候，捕获一只白麒麟，司马迁、班固在著作中都记作‘获一只独角兽，盖麟云’，在这里用‘盖（即大概）’的意思，就是不十分肯定、难以证实。”我阅读《史记》和《汉书》，发现关于事物的描写，凡是有疑问的地方，多用若、云、焉、盖等字眼，这样行文不激烈、不武断，含意也比较深刻。这里权且以《封禅书》、《郊祀志》二篇为例作一考查，将结果随便记录在下边。如：“雍州好，自古诸神祠皆聚云。盖黄帝时尝用事，虽晚周亦郊焉。”“三神山，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未能至，望见之焉。”新垣平善于望云气知吉凶，他说：“（那里）有神气，成五彩，若人冠冕焉。”“权火举而祠，若光辉然属天焉。”“出长安门，若见五人于道北。”“盖夜致王夫人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见焉。”“登中岳太室，从官在山下，闻若有言万岁者云。”“祭封禅祠，其夜若有

光。”册封栾大的诏书中说：“天若遗朕土而大通焉。”从河东（今山西省西南部）地区迎鼎时，“有黄云盖焉。”“见神人东莱山，若云欲见天子。”方士说：“蓬莱诸神若将可得。”“天子为塞河，兴通天台，若见有光云。”“获若石云于陈仓（今陕西宝鸡市东）。”此外，如所谓的“及群臣有言老父，则大以为仙人也。”“可为观，如缙城，神人宜可致。”“天旱，意乾封乎？”“然其效可睹矣。”等句子，意思也与上述各例句相似。

僭乱的对

【原文】 王莽窃位称新室，公孙述称成家，袁术称仲家，董卓称坞，公孙瓒称易京，皆自然的对也！

【译文】 王莽窃取帝位自称“新室”，公孙述称“成家”，袁术自称“仲家”，董卓叫“砣坞”，公孙瓒叫“易京”都是自然的贴切对仗。

月不胜火

【原文】 《庄子·外物篇》：“利害相摩，生火甚多，众人焚和，月固不胜火，于是乎有碣然而道尽。”注云：“大而暗则多累，小而明则知分。”东坡所引，乃曰：“郭象以为大而暗，不若小而明。陋哉斯言也！为更之曰，月固不胜烛，言明于大者必晦于小，月能烛天地，而不能烛毫厘，此其所以不胜火也，然卒之火胜月耶？月胜火耶？”予记朱元成《萍洲可谈》所载：“王荆公在修撰经义局，因见举烛，言：‘佛书有日月灯光明佛，灯光岂足以配日月乎？’吕惠卿曰：‘日煜乎昼，月煜乎夜，灯煜乎日月所不及，其用无差别也。’公大以为然，盖发言中理，出人意表云。”予妄意《庄子》之旨，谓人心如月，湛然虚静，而为利害所薄，生火炽然，以焚其和，则月不能胜之矣，非论其明暗也！

【译文】 《庄子·外物篇》说：“人们由于不能排除荣辱利害，心中时忧时乐，郁闷烦乱，利与害的念头相互交错，使得内心焦灼不安，如同起了火一样。世俗之人因为驰心于利害之间，所以内心的中和之气都被烧光了。人心本来像月光一样清明，怎能禁得住这种火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精神崩溃，生机熄灭。”注解：“月亮虽大，却昏暗不明，且容易亏欠；火苗虽小，但很明亮，能照见非常细小的东西。”苏东坡引用时曾说过：“郭象认为，月亮虽大但不明亮，

照不见细微的东西，这样看来还不如星火明亮呢，因火能照亮细小的东西。这样的认识显得多么的鄙陋啊！应当更改为：月亮赶不上蜡烛明亮，是说光明照射范围大的，必是照顾不到小的角落，比如月亮能够照亮天地，却不能照亮一些很小的角落，在这种情况下月光是赶不上火光亮的。然而，归根结蒂，是火比月亮明呢？还是月亮比火明呢？”我记得朱元成的《萍洲可谈》上说：“王安石在修撰经义局，因看见有人举烛照明，便说：‘佛教的经典中有日月灯光明佛，灯光那能够同日月相比呢？’吕惠卿接口说：‘太阳照耀白天，月亮照耀夜间，灯光照亮日月所照射不到的地方，三者都是明亮，其作用是没有多大差别的。’王荆公认为他说的有理，大概他的话击中要害，说到理上了。这种看法真是出乎意料之外。”我个人认为《庄子》此篇的意思，是说人心像月亮一样的光明磊落，清彻明亮，毫无杂念，然而一旦被利害关系所缠绕，就会像生火一样炽烈地燃烧起来，从而焚毁心平如镜的和谐状态，月光是无法战胜火的，庄子此处并不是论述究竟哪个明哪个暗的。

灵台有持

【原文】 《庄子·庚桑楚篇》云：“灵台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郭象云：“有持者，谓不动于物耳，其实非持。若知其所持而持之，持则失也。”陈碧虚云：“真宰存焉，随其成心而师之。”予谓是皆置论于言意之表，玄之又玄，复采庄子之语以为说，而于本旨殆不然也，尝记洪庆善云：“此一章谓持心有道，苟为不知其所以持之，则不复可持矣。”盖前二人解释者，为两“而”字所惑，故从而为之辞。

【译文】 《庄子·庚桑楚篇》中说：“灵台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郭象注释说：“有持，是指不动于物，其实非持。若知其所持而持之，持则失也。”陈碧虚解释说：“真宰存焉，随其成心而师之。”我认为这些看法都是只见到表面现象而没有涉及问题的实质，反而搞得神乎其神，玄上加玄，又采用庄子的言辞来进行解释，可是这些解释距离庄子的本意相差甚远。我记得洪庆善说过：“这一章说的是持心有道，如果不知道为什么保持这种状态，那么就不能再强求保持这种状态了。”大概说郭、陈二人的注释，是受到两个“而”字的迷惑，因而才这么解释的。

董仲舒灾异对

【原文】 汉武帝建元六年，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董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蒿未上，主父偃窃其书奏之。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此本传所书。而《五行志》载其对曰：“汉当亡秦大敝之后，承其下流。又多兄弟亲戚骨肉之连，骄扬奢侈，恣睢者众，故天灾若语陛下：‘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如吾燔辽东高庙乃可；视近臣在国中处旁仄及贵而不正者，忍而诛之，如吾燔高园殿乃可’云尔。在外而不正者，虽贵如高庙，犹灾燔之，况诸侯乎！在内不正者，虽贵如高园殿，犹燔灾之，况大臣乎！此天意也。”其后，淮南、衡山王谋反，上思仲舒前言，使吕步舒持斧钺治淮南狱，以《春秋》谊颺断于外，不请。既还奏事，上皆是之。凡与王谋反列侯二千石豪杰，皆以罪轻重受诛。二狱死者数万人。呜呼！以武帝之嗜杀，时临御方数岁，可与为善，庙殿之灾，岂无他说？而仲舒首劝其杀骨肉大臣，与平生学术大为乖刺，驯致数万人之祸，皆此书启之也。然则下吏几死，盖天所以激步舒云，使其就戮，非不幸也。

【译文】 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辽东的高庙、长陵的高园发生火灾，经学大师董仲舒在家里，推测这两件事的含义，将自己的见解写成奏折，奏折还没有呈送上去，大臣主父偃就将其偷来上报给皇帝。皇上召见许多读书人，其中有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他不知道这是老师的奏疏，认为这种看法太愚蠢了。于是董仲舒被交给有关官员收审，依律应当处死。后来皇帝下诏，特赦董仲舒不死。从此以后，董仲舒就不敢再说灾异了。这在《汉书》董仲舒的本传上有记载。而《五行志》上记载董仲舒所上对策的内容是：“汉朝是在秦亡以后建立起来的，继承的是秦朝破败的局面。因为宗室有许多兄弟、亲戚，不少人仗着势力，骄奢淫逸，飞扬跋扈，无所不作，所以，天降灾祸，好像敬告皇上说：‘如果不公正无私，国家就治理不好。只有把刘氏的亲近亲属中贵为诸侯而又最坏的人，下狠心消灭掉，就像我焚毁辽东高庙一样；同时把皇上身边的近臣和地位高而又坏的大臣，下决心除掉，就像我焚毁高园殿一样。’在京城以外任职的坏人，即使像高庙一样显贵，也要消灭掉，何况是普通诸侯呢！在朝内胡作非为的人，即使像高园殿一样显贵，也要付之一炬，何况是大臣呢！这乃是上帝的意思。”此后不久，淮南、衡山王图谋反叛，皇上才想起董仲舒以前

说过的话是对的，便差吕步舒拿着象征权力的斧钺去审理淮南王谋反案，用《春秋》上说的谊断于外，不用请示，就可以便宜行事。事情办完以后，把经过报告皇帝，皇帝认为都作的对。凡参与同淮南王、衡山王谋反的王国相、郡太守一级的官员，依据其罪恶轻重，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因为这两起案件而被处死的人数以万计。唉！汉武帝天性残忍，嗜杀如命，当时他刚即位几年，作为大臣，本应劝皇上做善事，让人民休养生息，在庙殿所发生的火灾，难道没有说法？然而，董仲舒第一个劝皇帝杀死那些亲骨肉和大臣，这是和他一生的学术思想大为矛盾的，导致数万人遭受大祸，都是董仲舒的奏疏造成的。然而董仲舒被投入狱中几乎死去，这大概是上帝激励吕步舒这样干的，叫董仲舒受死，不能说是一件不幸的事。

李正己献钱

【原文】 唐德宗初即位，淄青节度使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献钱三十万缗。上欲受之，恐见欺，却之则无辞。宰相崔祐甫，请遣使慰劳淄青将士，因以正己所献钱赐之，使将士人人戴上恩，诸道知朝廷不重货财。上悦从之。正己大惭服。天下以为太平之治，庶几可望。绍兴三十年，镇江都统制刘宝乞诣阙奏事，朝廷以其方命刻下，罢就散职。宝规取恩宠，扫一府所有，载以自随，巨舟连檣，白金至五舰，他所赍挟皆称是。其始谋盖云此行不以何事，必可力买。既至，赳赳国门，不许入觐，或以谓欲上诸内府。予时为枢密检详，为丞相言：“援祐甫所陈，乞以宝所赍等第赐其本军，明降诏书，遣一朝士以宝平生过恶，告谕卒伍，使知明天子惠绥惻怛之意。或宝靳固奄有，仍为己物，则宜因人之言，发命诘问在行之物，本安所出，今安所用？悉取而籍之。就其舟楫，北还充赐，尤可以破其溪壑无厌之谋。”汤岐公当国，不能用也。

【译文】 唐德宗刚即位，淄青节度使李正己，畏惧皇上的威名，上表献钱三十万缗。皇上想接受，又怕受骗，想拒绝又不好说话。宰相崔彛甫请求派使者去慰劳淄青的将士，就此把李正己所进献的钱赏赐给将士们，使将士们人人感谢皇上的恩惠，各路节度使也可知道朝廷不重视财物。皇上高兴地听从了。李正己大为惭愧佩服。天下的人以为太平的政治，有希望可以见到了。绍兴三十年（1160），镇江都统制刘宝请求到朝廷陈奏政事。朝廷因为他违反命令刻薄对待下级，罢免他使他当了闲散官职。刘宝想取得恩宠，把一府所有的财物搜括起来，运载着跟自己上路，所用的大船檣桅相连，银子多到载了五艘大船，其

他所带的物品都和这相等。他开始时谋划大约认为这次行动不为别的，一定可以用财力买到宠幸。既到京城，在国都门口踌躇不进，朝廷不许他入朝见皇帝，有人说他要交纳到内府中去。我当时任枢密检详，对宰相说：“可以引用崔蠡甫所陈奏的办法，请求把刘宝所带的分等级赏赐给镇江府的各军队，明白地颁布诏书，派一个朝廷官员把刘宝平生的过失罪恶告诉士兵们，使他们知道圣明的皇帝下恩安抚士兵的怜悯之意。如果刘宝固执地认为自己所有，定要作为自己所有，就应当根据别人的话，发布命令诘问他所带着的东西，本来从哪里来的，现在准备怎样使用？全部加以没收，就用他的船只，向北运到镇江作为赏赐，更可以击破刘宝的像山谷那样无法填满的计谋。”这时是汤岐公（汤思退）当权，不能接受我的意见。

宣室

【原文】 汉宣室有殿有阁，皆在未央宫殿北，《三辅黄图》以为前殿正室。武帝为窦太主置酒，引内董偃，东方朔曰：“宣室者，先帝之正处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文帝受矜于此，宣帝常斋居以决事。如淳曰：“布政教之室也。”然则起于高祖时，萧何所创，为退朝听政之所。而《史记·龟策传》云：“武王围纣象郎，自杀宣室。”徐广曰：“天子之居，名曰宣室。”《淮南子》云：“武王甲卒三千，破纣牧野，杀之宣室。”注曰：“商宫名，一曰狱也。”盖商时已有此名，汉偶与之同，《黄图》乃以为“汉取旧名”，非也。

【译文】 汉朝的宣室很大，周围有殿堂楼阁，位置在未央宫大殿的北边，但专记载长安古迹的《三辅黄图》一书认为是前殿正室。汉武帝刘彻为窦太主设酒宴，让太监董偃在一边侍候。文学家太中大夫东方朔说：“宣室，是先皇帝办公或居住的地方，若不是有关国家法律制度的大事，一般不得擅入。”汉文帝刘恒曾在这里接受祭余之肉以示受福，汉宣帝刘询也常在此斋居议决国家大事。如淳说：“这是皇上宣布国家大政方针的地方。”由此可见，宣室开始建于汉高祖刘邦时期，是丞相萧何创建的，是皇帝退朝之后，处理国家政务的地方。而司马迁的《史记·龟策传》却说：“周武王围困殷纣王的时候，纣王自杀于宣室。”南朝刘宋时徐广注释说：“皇帝长住的地方叫做宣室。”《淮南子》说：“周武王率领将士三千，在牧野（今河南新乡北）打败了殷纣王，并把他杀死在宣室里。”注解：“宣室是商代的宫殿名，也有人认为是监狱。”大概在商代已有宣室这个名称，汉代的宣室，偶然巧合与商代的宣室名称相同，《三辅黄图》认为汉代

宣室是取殷时旧名，其实并不是这样。

将帅当专

【原文】 《周易·师卦》：“六三，师或舆尸，凶。”“九五，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爻意谓用兵当付一帅，苟其侑杂然临之，则凶矣。舆尸者，众主也。安庆绪既败，遁归相州，肃宗命郭汾阳、李临淮九节度致讨。以二人皆元勋，难相统属，故不置元帅，但以宦者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步骑六十万，为史思明所挫，一战而溃。宪宗讨淮西，命宣武等十六道进军，虽以韩弘为都统，而身未尝至。既无统帅，至四年不克，及裴度一出，才数月即成功。穆宗讨王庭凑、朱克融，时裴度镇河东，亦为都招讨使，群帅如李光颜、乌重嗣，皆当时名将。而翰林学士元稹，意图宰相，忌度先进，与知枢密魏简相结，度每奏画军事，辄从中沮坏之，故屯守逾年，竟无成绩。贞元之诛吴少诚，元和之征卢从史，皆此类也。石晋升运中，为契丹所攻，中国兵力寡弱，桑维翰为宰相，一制指挥节度使十五人。虽杜重威、李守正、张彦泽辈，弩材反虏，然重威为主将，阳城之战，三人者尚能以身殉国，大败强胡，耶律德光乘囊驼奔窜，仅而获免。由是观之，大将之权，其可不专邪？

【译文】 《周易·师卦》：“六三，出师疑惑不定，以致战败卒死，以车载着死尸回来，不吉利。”“九五，长子率领军队，次子战败，以车载着死尸回来，表明很不吉利。”爻的意思是说，用兵打仗时，应当给予带兵的将帅以足够的权力，如果大家一样，没有头领，仗是一定打不好的。我认为“舆”是“众”的意思，“尸”是“主”的意思，“舆尸”就是“众主”，政出多门，几个人乱当家。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被打败后，逃回相州（今河南安阳），唐肃宗李亨命令郭子仪、李光弼等九个节度使一起攻打安庆绪。因为郭、李二人都是功盖天下的大臣，很难相互统属，所以不设置元帅，只是派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结果朝廷步兵骑兵六十万，被史思明挫败，一战而溃不成军。唐宪宗李纯征讨淮西，命令宣武等十六道节度使分头进军，虽用韩弘为都统帅，但韩弘本人未曾亲到前线。由于没有统帅，历时四年也没能打下来。等到宰相裴度一出，才几个月就大功告成。唐穆宗李恒征讨王庭凑、朱克融，当时裴度镇守在河东，也是都招讨使，群帅李光颜、乌重嗣，都是当时的名将。而翰林学士元稹，想当宰相，忌恨裴度立功，于是和知枢密魏简勾结，裴度每次向皇帝汇报军情，他们就从中作梗破坏，所以尽管屯守一年有余，可最终毫无建树。唐德宗李适贞

元年间，讨伐吴少诚；宪宗李纯元和年间征讨卢从史，都是由于这类原因而遭到失败的。到了五代后晋齐王石重贵开运年间，契丹起兵攻打中国，中国的兵力很弱小，当时桑维翰为宰相，统一指挥节度使十五人。虽然如杜重威、李守正、张彦泽一类的人物，才能平庸，而且都是反复无常的小人，但是杜重威为主将，阳城（今河北保定西南）之战中，三个人尚能够齐心协力，拼死作战，打败了强大的契丹人。契丹首领耶律德光骑着骆驼仓惶奔逃，才免于一死。由此来看，当大将的，怎么能够没有全权指挥军队的权力呢？

卷八

蓍龟卜筮

【原文】 古人重卜筮，其究至于通神，龟为卜，蓍为筮，故曰：“假尔泰龟有常，假尔泰筮有常”，“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所以，使民信时日，敬鬼神，畏法令。”舜之命禹，武王之伐纣，召公相宅，周公营成周，未尝不昆命元龟，袭祥考卜。然筮短龟长，则龟卜犹在《易》筮之上。《汉·艺文志》、刘向所辑《七略》，自《龟书》、《夏龟》之属，凡十五家至四百一卷，后世无传焉。今之揲蓍者，率多流入于影象，所谓龟策，惟市井细人始习此艺。其得不过数钱，士大夫未尝过而问也。伎术标榜，所在如织，五星、六壬、衍禽、三命、轨析、太一、洞微、紫微、太素、遁甲，人人自以为君平，家家自以为季主，每况愈下。由是，藉手于达官要人，舟车交错于道路，毁誉纷纭，而术益隐矣。《周礼》：“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杜子春云：“玉兆，颡帝之兆；瓦兆，帝尧之兆；原兆，有周之兆。”“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又“掌《三易》之法，曰《连山》，曰《归藏》，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今独《周易》之书存，他不复可见。世谓文王重《易》六爻为六十四卦，然则夏、商之《易》已如是矣。《左氏传》所载懿氏占曰：“凤皇于飞，和鸣锵锵。有妣之后，将育于姜。”成季之卜曰：“其名曰友，在公之右。同复于父，敬如君所。”晋献公骊姬之繇曰：“专之渝，攘公之碣”。嫁伯姬之繇曰：“车说其辐，火焚其旗。寇张之弧，侄其从姑。”秦伯伐晋曰：“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文公纳王，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鄢陵之战，晋侯筮曰：“南国殛，射其元王，中厥目。”宋伐郑，赵鞅卜救之，遇水适火，史龟曰：“是谓沈阳，可以兴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史墨曰：“盈，水名；子，水位。名位敌，不可干也。”杜氏谓“鞅姓盈，宋姓子”，盖言“赢”与“盈”同也。史赵曰：“是谓如川之满，不可游也。”卫庄公卜梦，曰：“如鱼硕尾，衡流而方羊裔焉。阖门塞窦，乃自后逾。”此十占皆不可得其说，故杜元凯云：“凡筮者用《周易》，则其象可推。非此而往，则临时占者或取于象，或取于气，或取于时日、王相以成其占，若尽附会以爻象，则架虚而不经”。可

为通论，然亦安知非《连山》、《归藏》所载乎？

【译文】 古人注重卜筮，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与“神”沟通，用龟甲占卜称为“卜”，用蓍草占卜称为“筮”，所以说“借助你这神龟预测规律，借助你这神草预测规律”，“断定天下的吉凶祸福，成就社会的前途发展”，“主要用来使百姓相信天象，敬奉鬼神，畏惧法令。”舜任命禹，周武王讨伐商纣，召公占视宅院，周公营建成周（今河南洛阳东）城，没有不命令占卜的人使用元龟，多次卜筮的。然而，筮短龟长，那么龟卜的地位还在《易经》筮卜之上。《汉书·艺文志》和刘向（应为刘歆）所编著的《七略》中，著录《龟书》、《夏龟》之类，共有十五家，多达四百零一卷，可惜后世都没有传下来。今天，用蓍草占筮的人，大都流于表面的现象，所说的“龟策”，也只有市井小人才学习此艺，他们占卜所得的报酬不过数钱，士大夫们从不屑于过问。以技艺、数术相标榜的人，比比皆是，有五星、六壬、衍禽、三命、轨析、太一、洞微、紫微、太素、遁甲，人人自比为神算“君平”，家家自称为季主再世，真可谓每况愈下。因此，又借助于达官要人，舟车交错，络绎不绝，毁誉纷纭，而术数更加衰微。《周礼》上说：“太卜执掌三兆之法，一是玉兆，二是瓦兆，三是原兆。”杜子春解释说：“玉兆即是颞颥占卜的方法；瓦兆即是帝尝预测占卜的方法；原兆是周代预测占卜的方法。”“经兆的形状都是一百二十种，其颂辞都是一千二百条。”另外，“执掌《三易》之法，即《连山》、《归藏》、《周易》。经卦都是八个，其别卦都是六十四卦。”如今，只有《易经》保存下来，其他的已经无法见到。世人都说周文王重叠《易经》六爻为六十四卦，但是，根据前边的引文，实际上夏、商之时，《易经》已经是这个样子了。据《左传》记载，懿氏占辞是：“凤凰于飞，和鸣锵锵。有妣之后，将育于姜。”成季卜辞是：“其名曰友，在公之右。同复于父，敬如君所。”晋献公娶骊姬的爻辞说：“专之渝，攘公之珪”。嫁伯姬的爻辞说：“车说其辐，火焚其旗。寇张之弧，侄其从姑。”秦国攻打晋国时所占卦的卦辞说：“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晋文公保护周王复位，占卜遇到了黄帝战于阪泉的征兆。鄢陵之战，晋侯卜筮的结果说：“南国碑，射其元王，中厥目。”宋攻打郑，赵鞅占卜是否援救它，遇水敌火，史龟说：“这就是所说的‘沉阳’，可以兴兵，攻打姜姓很有利，对于子商没有好处。”史墨却说：“‘盈’是水名，‘子’是水的方位。名和位相当，这仗是不能打的。”杜子春认为“鞅姓盈，宋姓子”，大盖是说“赢”与“盈”音同。史赵却说“这是说如大河水满，不可游啊。”卫庄公占梦，说：“如鱼赤尾，衡流而彷徨裔焉。阖门塞窦，乃自后逾。”这十个占例今日都无法详细考究了，所以杜预说：“凡是占筮的人使用《易经》，那么其象可推。除此之外，那些临时占卜的，或取于象，

或取于气，或取于时日、王相来完成预测。如果都附会以爻象，那么就是虚具形式、胡说八道。”这段话可谓通论，然而又怎么知道不是《连山》、《归藏》所记载的呢？

地名异音

【原文】 郡邑之名有与本字大不同者，颜师古以为土俗各有别称者是也。姑以《汉书·地理志》言之：冯翊之栎阳为“药阳”，莲勺为“辇酌”；太原之虑碻为“庐夷”；上党之沾为“添”；河内之隆虑为“林庐”，荡阴为“汤阴”；颍川之不羹为“不郎”；南阳之郦为“擲”，堵阳为“者阳”， 为“赞”；沛之为“嵯”，郾为“多”，清河之碣为“输”；汝南之平舆为“平预”；济阴之宛句为“冤碣”；江夏之沙羡为“沙夷”；九江之橐皋为“拓姑”；庐江之雩娄为“吁间”；山阳之方与为“房豫”；琅邪之不其为“不基”；东海之承为“证”；长沙之承阳为“ 阳”；临淮之取虑为“秋庐”；会稽之诸暨为“诸既”，太末为“閼末”；豫章之余汗为“余干”；广汉之汁方为“十方”；蜀郡之徙为“斯”；益州之味为“昧”；金城之允吾为“铅牙”，允街为“铅街”；武威之朴碣为“蒲环”；张掖之番禾为“盘和”；安定之乌氏为“乌支”；上郡之龟兹为“丘慈”；西河之鹄泽为“桔泽”；代郡之碓氏为“权精”；辽西之且虑为“赳庐”；令支为“铃祗”；辽东之番汗为“盘寒”；乐浪之黏蝉为“黏提”；南海之番禺为“潘隅”；苍梧之荔浦为“肄浦”；交趾之羸碣为“莲葵”；九真之都庞为“都聋”；日南之西卷为“西权”；淮阳之阳夏为“阳贾”；鲁国之蕃为“皮”。皆不可求之于义训，字书亦不尽载也。

【译文】 郡县的名称有时和本字的读音有大不相同的，颜师古以为各地风俗读音各有不同的名称的说法是对的。姑且以《汉书·地理志》来说它：冯翊的栎阳，读作“药阳”，莲勺读作“辇酌”；太原的虑碻，读作“庐夷”；上党的沾，读作“添”；河内的隆虑，读作“林庐”，荡阳读作“汤阴”；颍川的不羹读作“不郎”；南阳的郦读作“擲”，堵阳读作“者阳”，酈读作“赞”，沛的酈读作“嵯”，郾读作“多”；清河的碣读作“输”；汝南的平舆读作“平预”；济阴的宛句读作“冤碣”；江夏的沙羡读作“沙夷”；九江的橐皋读作“拓姑”；庐江的雩娄读作“吁间”；山阳的方舆读作“房豫”；琅邪的不其读作“不基”；东海的承读作“证”；长沙的承阳读作“烝阳”；临淮的取虑读作“秋庐”；会稽的诸暨读作“诸既”，太末读作“閼末”；豫章的余汗读作“余干”；广汉的汁方读作

“十方”；蜀郡的徙读作“斯”；益州的昧读作“昧”；金城的允吾读作“铅牙”，允街读作“铅街”；武威的朴砮读作“蒲环”；张掖的番禾读作“盘和”；安定的乌氏读作“乌友”；上郡的龟兹读作“丘慈”；西河的鹄泽读作“楷泽”；代郡的标氏读作“权精”；辽西的且虑读作“赳庐”，令支读作“铃祗”；辽东的番汗读作“盘寒”；乐浪的黏蝉读作“黏提”；南海的番禺读作“潘隅”；苍梧的荔浦读作“肄浦”；交趾的羸硃读作“莲婆”；九真的都庞读作“都聋”；日南的西卷读作“西权”；淮阳的阳夏读作“阳贾”；鲁国的蕃读作“皮”。都不可以在宋义训诂上求解释，宋书也并不都记载。

韩婴诗

【原文】 《前汉书·儒林传》叙《诗》云：汉兴，申公作《鲁诗》，后苍作《齐诗》，韩婴作《韩诗》。又云：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婴为文帝博士，景帝时至常山太傅，推诗人之意，作《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归一也。武帝时，与董仲舒论于上前，精悍分明，仲舒不能难。其后韩氏有王吉、食子公、长孙顺之学。《艺文志》，《韩家诗经》二十八卷，《韩故》三十六卷，《内传》四卷，《外传》六卷，《韩说》四十一卷。今惟存《外传》十卷。

庆历中，将作监主簿李用章序之，命工刊刻于杭，其末又题云：“蒙文相公改正三千余字。”予家有其书，读首卷第二章，曰：“孔子南游适楚，至于阿谷，有处子佩瑱而浣者。孔子曰：‘彼妇人其可与言矣乎！’抽觴以授子贡，曰：‘善为之辞。’子贡曰：‘吾将南之楚，逢天暑，愿乞一饮以表我心。’妇人对曰：‘阿谷之水流而趋海，欲饮则饮，何问妇人乎？’受子贡觴，迎流而挹之，置之沙上，曰：‘礼固不亲授。’孔子抽琴去其轸，子贡往请调其音。妇人曰：‘吾五音不知，安能调琴？’孔子抽五两以授子贡，子贡曰：‘吾不敢以当子身，敢置之水浦。’妇人曰：‘子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今窃有狂夫守之者矣。’《诗》曰：‘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谓也。”观此章，乃谓孔子见处女而教子贡以微词三挑之，以是说《诗》，可乎？其谬戾甚矣，他亦无足言。

【译文】 《前汉书·儒林传》叙述《诗》时说：“汉朝建立后，申公作《鲁诗》，后苍作《齐诗》，韩婴作《韩诗》。又说：申公的《诗》是对古诗中的字词

加以解释。而齐国的辕固、燕国的韩生都是为诗作注，有些地方采用《春秋》，博取众说，都不是原来的本义，只有鲁诗与本义最为接近。韩婴曾当过汉文帝刘恒的博士官，到景帝刘启的时候，任常山王的太傅，他揣摩诗人的意思，撰写了《外传》诗，有好几万字，其中的语言与齐诗、鲁诗有很大的差别，然而大体总旨是一样的。到了汉武帝刘彻时，韩婴和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在皇上面前辩论诗的进步意义，见解精悍分明，董仲舒难不倒他。从此以后，继承韩诗的有王吉、食子公、长孙顺等学派。《艺文志》记载，当时有《韩家诗经》二十八卷，《韩故》三十六卷，《内传》四卷，《外传》六卷，《韩说》四十一卷。但这些大都失传了，现在只有《外传》十卷尚存。

到了仁宗庆历年间，将作监主簿李用章曾作序，并在杭州叫工人刊刻，其后边又题道：“承蒙文相公改正三千余字。”我家里藏有这种书，第一卷第二章是这样说的：“孔子南游到楚国（今湖北省），走到阿谷，有个少女戴着玉耳坠在河边洗衣服。孔夫子对子贡说：‘那位妇女，可以和她说话吗？’他拿出一只酒杯交给子贡，并且叮咛道：‘你要好好对她说。’子贡说：‘我们往南边的楚国去，恰遇天气炎热，请允许我敬你一杯水，以表我们的诚心。’那位妇女对他们说：‘阿谷的水东流到大海，想喝你们就喝吧，何必问一个妇道人家呢？’她接过子贡的酒杯，到上游盛了一杯水，放在沙地上，并且说：‘为了遵守礼节，我不能亲手递给你。’孔子拿出琴，把琴轸（琴下转动琴弦的东西）卸下，子贡又把琴递给那位妇女，请她先调正音，给抚一曲。那位妇女说：‘我不懂得五音，怎么能够调琴？’孔子又取出细丝五两递给子贡，子贡说：‘我不能将东西当面递给你，就把它放在水边吧。’那位妇女说：‘你的年纪很小，我怎么能接受你的东西呢？你如果不及早离去，恐怕我那位狂夫会对你不客气。’《诗经》上说：‘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说的就是这件事。”观看这一章，是孔夫子看见少女，便派徒弟子贡前去用委婉的言辞再三挑逗，用这种方法来解释《诗经》，行吗？这是大错而特错的，其他的也不值一提。

五行衰绝字

【原文】 木绝于申，故𣎵字之训为木自毙。水土绝于巳，故汜字之训，《说文》以为穷渚，圯字之训为岸圯及覆。火衰于戌，故𤇗为灭。金衰于丑，故钮为键闭。制字之义昭矣。

【译文】 木被申金所克，所以“𣎵”字的意思是木自死。水土被巳所克，

所以汜字的解释，《说文》上认为是水域尽处，圮字的解释为岸毁和堤毁。火被戍抑制，所以 为戍灭。金被丑制约，所以钮为键闭。创造字的意义是很明白的。

汉表所记事

【原文】 《汉书·功臣表》所记列侯功状，有纪传所轶者。韩信击魏，以木罌缶度军，表云：祝阿侯高邑以将军属淮阴，击魏，罌度军。（《史记》作“罌”。）盖此计由邑所建也。信谋发兵袭吕后，其舍人得罪信，信囚欲杀之。舍人弟上书变，告信欲反。晋灼注曰：“《楚汉春秋》云，谢公也。”表有滇阳侯乐说，《史记》作“栾说”，以淮阴舍人告反，侯，盖非谢公也。须昌侯赵衍从汉王起汉中，雍军塞渭上，上计欲还，衍言从他道，道通。中牟侯单于车，始，高祖微时，有急，给高祖马，故得侯。碓侯黄极忠以群盗长为临江将，已而为汉击临江王。祁侯繒贺从击项籍，汉王败走，贺击楚迫骑，以故不得进，汉王顾谓贺祁王。（《史记》作“侯”）颜师古曰：“谓之祁王，盖嘉其功，故宠褒之，许以为王也。”他复有与传小异者。《史记·张良传》，项梁立韩王成，以良为韩申徒。徐广云：“申徒即司徒，语音讹转也。”而《汉表》，良以韩申都下韩。师古云：“韩申都即韩王信也，《楚汉春秋》作‘信都’，古‘信’‘申’同字。”按良与韩王信了不相干，颜注误矣。自“司徒”讹为“申徒”，自“申徒”为“申都”，自“申都”为“信都”，展转相传，古书岂复可以字义求也？韩信归汉，为治粟都尉，表以为票客。师古曰：“与纪传参错不同，或者以其票疾而宾客礼之，故云票客也。”《史记》作“典客”，《索隐》以为“粟客”。此外又有官名非史所載者。如：孔聚以执盾从；周灶以长碣都尉；郭蒙以户卫；宣虎以重将，重将者，主将领辎重也；碓跖以门尉；棘丘侯襄以执盾队史；郭亭以塞路，塞路者，主遮塞要路以备敌寇也；丁礼以中涓骑；爰类以慎将，谓以谨慎为将也；许盎以骈邻说卫，骈邻者，二马曰骈，谓并两骑为军翼也，说读曰税，税卫者，军行初舍止之时主为卫也；许惲以赵右林将，林将者，将士林，犹言羽林之将也；清侯以弩将；留 以客吏；冯解散以代大与，大与，主爵禄之官也，《史记》作“太尉”；靳强以郎中骑千人之类。聊纪于此，以示读史者云。

【译文】 《汉书·功臣表》中所记载的关于列侯的功绩，有的材料是纪传中所没有的。韩信攻打魏国的时候，用木头和小口大肚、大口小肚的瓦器渡军队过河，表上这样说：祝阿侯高邑，以将军的身份隶属于淮阴，攻打魏军的时

候，用瓦器罍渡军队过河。（《史记》上罍字作 ）。大概这条计策是由高邑所建议的。韩信打算出兵攻打吕后，有一位舍人，得罪过韩信，韩信把他囚禁起来，准备杀掉。这个舍人的弟弟便给皇后打报告，说韩信想谋反。晋灼注释说：“《楚汉春秋》说，是谢公告发的。”表上记有滇阳侯乐说，《史记》上作“栾说”，因为淮阴舍人告发这件事，这里说的侯，并不是指的谢公。须昌侯赵衍，随从汉王刘邦起兵于汉中，由于雍王章邯的军队密集设防于渭河边，以抵御汉军，因而想退兵回去。赵衍建议从别的道路前进，结果汉军顺利地通过了。中牟侯单右车，“当初汉高祖卑贱时，有急难，单右车给了高祖马匹，因此得封侯。”

侯黄极忠，“以群盗首领做临江国将军，后来助汉军进攻临江王。”祁侯繒贺，跟从汉高祖进击项籍（项羽），“汉王战败逃走，繒贺进攻禁军追击汉王的骑兵，以此楚军不能前进，汉王看着繒贺叫他祁王。”（原注《史记》作侯。）颜师古说：“叫他‘祁王’，是嘉奖他的功勋，所以宠幸褒扬他，许他做王。”其他还有和列传小有不同的。《史记·张良传》，“项梁立韩王成，以张良为韩国的申徒。”徐广说：“申徒就是司徒，语音的转变弄错了。”而《汉书》的《表》则说张良以韩国的申都攻下韩国。颜师古说：“韩申都就是韩王信，《楚汉春秋》作‘信都’，古代‘信’、‘申’同是一字。”按：张良和韩王信毫不相干，颜注错了。从“司徒”错成“申徒”，从“申徒”错成“申都”，又从“申都”成为“信都”，辗转相传，古书难道还可以从字义上求得解释吗？韩信归附汉朝，任治粟都尉，《表》上写作“票客”。颜师古说：“与纪传有出入不一样，或者因为他骠悍快疾而以宾客之礼对待他，所以说是‘票客’。”《史记》作“典客”，《索隐》以为是“粟客”。此外又有官名不是史书上所记载的。如孔聚以“执盾”跟随汉高祖；周灶以“长都尉”；郭蒙以“户卫”；宣虎以“重将”，“重将”，是主管辎重的将领；跖以“门尉”；棘丘侯以“执盾队史”；郭亭以“塞路”，“塞路”，是主管遮拦交通要道以防备敌人的；丁礼以“中涓骑”；爰类以“慎将”，是说以谨慎充当将领；许盎以“骈邻说卫”、“骈邻”，是两匹马并排叫“骈”，意为并排放两骑兵以为军队的左右翼护卫，许惲以“赵国右林将”，“林将”，是将士之林，好比说羽林的将领；清侯以“弩将”；留以“客吏”；冯解散以代（国）大与，大与，是主管爵禄的官，《史记》作“太尉”；靳强以“郎中骑千人”之美。随意记在这里，用来告诉读史的人。

萧何给韩信

【原文】 黥布为其臣贲赫告反，高祖以语萧相国，相国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诬之，请系赫，使人微验淮南。”布遂反。韩信为人告反，吕后欲召，恐其不就，乃与萧相国谋，诈令人称陈郢已破，给信曰：“虽病强入贺。”信入，即被诛。信之为大将军，实萧何所荐，今其死也，又出其谋，故俚语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之语。何尚能救黥布，而翻忍于信如此？岂非以高祖出征，吕后居内，而急变从中起，己为留守，故不得不亟诛之，非如布之事尚在疑似之域也。

【译文】 黥布被他的部下贲赫控告想要谋反，汉高祖刘邦把这件事告诉了相国萧何，萧何说：“黥布不应当会做这种事，恐怕是仇家造谣陷害，请皇上先把贲赫拘押起来，然后派人暗中到淮南查访验证。”黥布于是起兵反叛。韩信被人控告想要谋反，吕后想把他召回京师，又担心韩信不就范，就和萧何商量计策，派人诈称陈郢的叛乱已被平定，并欺骗韩信说：“陈郢的叛乱已被平定，你即使有病，也要挣扎着前来祝贺。”韩信一到京师，就被吕后杀死了。

韩信能够做大将军，实际上是萧何在汉王刘邦面前推荐的结果，现在韩信被杀，又是萧何出的计谋，所以俗语中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说法。萧何尚且能救黥布，为什么这样对待韩信呢？莫非是因为汉高祖刘邦带兵出征，吕后在朝中留守，紧急变故突然发生，萧何身为留守大臣，所以不得不立即杀掉韩信，不像黥布的事情还处于真假难辩、似是而非的境地，可以从长计议吗？

彭越无罪

【原文】 韩信、英布、彭越皆以谋反诛夷。信乘高祖自将征陈郢之时，欲诈赦诸官徒，发兵袭吕后、太子。布见汉使验问，即发兵东取荆，西击楚，对高祖言欲为帝，其为反逆已明。唯越但以称病不亲诣邯郸之故，上即赦以为庶人，而吕后令人告越复谋反，遂及祸。

三人之事，越独为冤。且扈辄劝越反，越不听，有司以越不诛辄为反形已具，然则贯高欲杀高祖，张敖不从，其事等耳，乃以为不知状，而敖得释，何也？

乐说告信，赍赫告布，皆得封列侯。而梁太仆告越不论赏，岂非汉朝亦知其故耶？栾布为越大夫，使于齐而越死，还奏事越头下，上召骂布，欲烹之，布谓越反形未见，而帝以苛细诛之。上乃释布，拜为都尉。然则高祖于用刑，为有负于越矣，伤哉！

【译文】 韩信、英布、彭越都以谋反被杀灭族。韩信趁汉高祖自己统军征讨陈 的时机，想假称朝廷命令，赦免各官府服刑囚徒，发兵攻击吕后、太子。英布见到汉朝使者去查问罪状，就发兵东向攻取荆国，西向攻击楚国，对着高祖说想做皇帝，他作为叛逆已很明白。只有彭越只有因为称病不亲自到邯郸去的缘故，皇上已经赦免他为平民，而吕后却叫人告发彭越谋反，就此遭祸。三人的事，彭越独为冤枉。而且扈辄劝彭越谋反，彭越不听，有关官员因彭越不杀扈辄为谋反的情状已具备，那么贯高想杀高祖，张敖不听，其事实是相同的，却以为张敖不知道情况，而张敖得到释放，为什么？乐说告发韩信，赍赫告发英布，都得封为列侯。而梁国太仆告发彭越却不得赏赐，岂非汉朝也明知其中缘故吗？栾布做彭越的大夫，出使于齐国而彭越被杀死，回来后他在彭越的首级之下回奏出使情况，皇上召来栾布责骂，想烹煮死他，栾布说彭越造反的情况并未出现，而皇帝以苛细的事情杀了他，皇上就释放栾布，任他为都尉。那么汉高祖对于用刑罚，是有负于彭越了，可悲啊！

蜘蛛结网

【原文】 佛经云：“蠢动含灵，皆有佛性。”《庄子》云：“惟虫能虫，惟虫能天。”盖虽昆虫之微，天机所运，其善巧方便，有非人智虑技解所可及者。蚕之作茧，蜘蛛之结网，蜂之累房，燕之营巢，蚁之筑垤，螟蛉之祝子之类是已。

虽然，亦各有幸不幸存乎其间。蛛之结网也，布丝引经，捷急上下，其始为甚难。至于纬而织之，转盼可就，疏密分寸，未尝不齐。门槛及花梢竹间，则不终日，必为人与风所败。唯闲屋碰垣，人迹罕至，乃可久而享其安。故燕巢幕上，季子以为至危。李斯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仓中之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岂不信哉？

【译文】 佛经说：“蠢动含灵，皆有佛性。”《庄子》中也说：“惟虫能虫，惟虫能天。”意思是说，虽然昆虫很微小，但也和天机有联系，它们的巧妙便利，有着人类的智慧和技能所比不上的地方。诸如蚕作茧，蜘蛛织网，蜜蜂垒房，燕

子筑巢，蚂蚁构窝时所堆的小土堆，螟蛉祝子等等都是。

虽然这样，它们之间也有幸与不幸之分。如蜘蛛织网，布置蛛丝，牵引经线，敏捷急促地上下爬动，开始的时候非常艰难。到了经纬线时，则转眼间就织好了，而且宽窄疏密很有分寸，没有不整齐的。织在门槛和花木、竹林之间的，往往不到一天必定就被人或风破坏了。只有织在没人住的空屋里和残垣断壁之间，没有人迹的地方，才可以长时间的安然无事。所以，燕子在帷幕上筑巢，苏秦认为这样很危险。李斯看见衙门的厕所中老鼠吃不干净的食物，人和狗接近时，常常惊慌害怕，粮仓中的老鼠吃仓库中积储的粮食，住在大房子下面，没有人狗接近时的惊恐，李斯由此感叹地说：“人贤能还是不贤能，就像这老鼠一样，完全在于它所处的位置不同啊！”难道不是这样吗？

孙权称至尊

【原文】 陈寿《三国志》，固多出于一时杂史，然独《吴书》称孙权为至尊，方在汉建安为将军时，已如此，至于诸葛亮、周瑜，见之于文字间亦皆然。

周瑜病困，与权书曰：“曹公在北，刘备寄寓，此至尊垂虑之日也。”鲁肃破曹公还，权迎之，肃曰：“愿至尊威德加乎四海。”吕蒙遣邓玄之说郝普曰：“关羽在南郡，至尊身自临之。”又曰：“至尊遣兵，相继于道。”蒙谋取关羽，密陈计策，曰：“羽所以未便东向者，以至尊圣明，蒙等尚存也。”陆逊谓蒙曰：“下见至尊，宜好为计。”甘宁欲图荆州，曰：“刘表虑既不远，儿子又劣，至尊当早规之。”权为张辽掩袭，贺齐曰：“至尊人主，常当持重。”权欲以诸葛恪典掌军粮，诸葛亮书与陆逊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疏，粮谷军之要最，足下特为启至尊转之。”逊以白权。

凡此之类，皆非所宜称，若以为陈寿作史虚辞，则魏、蜀不然也。

【译文】 陈寿编撰的《三国志》，资料大多数来源于当时的杂史，然而唯独《三国志·吴书》中称孙权为“至尊”，当孙权在汉朝建安年间作将军时，就已经这样称呼了，甚至于诸葛亮、周瑜二人，见于文字记载的也是这样称呼孙权。

周瑜病重时，给孙权写信说：“曹操占据北方，刘备借居荆州，这才是值得至尊您日夜警惕的事啊。”鲁肃奉命和诸葛亮合兵在赤壁大破曹操归来，孙权去迎接，鲁肃说：“祝愿至尊您的兵威恩德遍布天下。”吕蒙派邓玄之游说郝普时说：“关羽统领南郡（治今湖北江陵），至尊亲自去对付他。”又说：“至尊调兵

遣将，军队在道路上连绵不断。”吕蒙想用计谋打败关羽，秘密地向孙权陈述计谋，他说：“关羽之所以没有很顺利的向东扩展势力，是因为‘至尊’圣明，我们这些人还在。”陆逊对吕蒙说：“我见到至尊，应当很好地为他出谋画策”。甘宁想夺取荆州，说：“刘表考虑事情不甚长远，他的儿子又懦弱不成才，至尊您应当早日谋划。”孙权被曹操的大将张辽偷袭，贺齐说：“至尊您身为君主，应当始终老成持重。”孙权想让诸葛恪主管军中粮草，诸葛亮写信给陆逊说：“我的哥哥诸葛瑾年纪已经很大了，而他的儿子诸葛恪性情疏散，粮草是军中至关重要的物资，他不宜掌管，请您特意转告至尊，另换他人。”陆逊把这话转告了孙权。

所有这些，都是不适宜这样称呼的，如果认为陈寿写《三国志》时，用的是不真实的言词，那么魏国、蜀国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康山读书

【原文】 杜子美赠李太白诗：“康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说者以为即庐山也。吴曾《能改斋漫录》内《辨误》一卷，正辨是事，引杜田《杜诗补遗》云范传正《李白新墓碑》云：“白本宗室子，厥先避仇客蜀，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绵州之属邑，有大、小康山，白读书于大康山，有读书堂尚存。其宅在清廉乡，后废为僧房，称陇西院，盖以太白得名。院有太白像。”吴君以是证杜句，知康山在蜀，非庐山也。

予按当涂所刊《太白集》，其首载《新墓碑》，宣、歙、池等州观察使范传正撰，凡千五百余字，但云：“自国朝已来，编于属籍，神龙初，自碎叶还广汉，因侨为郡人。”初无《补遗》所纪七十余言，岂非好事者伪为此书，如《开元遗事》之类，以附会杜老之诗邪？欧阳礪《舆地广记》云：“彰明有《李白碑》，白生于此县。”盖亦传说之误，当以范碑为正。

【译文】 杜子美（杜甫）赠李太白（李白）的诗说：“康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康山读书的地方，现在年老发白该回来了）”。解说的人以为“康山”就是庐山。吴曾《能改斋漫录》中《辨误》一卷，正是辨别这件事，他引杜田《杜诗补遗》说：“范传正《李白新墓碑》说：‘李白本是唐朝皇族子弟，他的祖先避开仇人客居于蜀地，住在蜀的彰明，李太白生在这里。彰明，是锦州的属县，有大、小康山，李白读书于大康山，有读书堂还存在。他的宅子在清廉乡，后来荒废成为和尚的房屋，称为陇西院，是因李太白而得名。院中有李太白的

像。’”吴君用这来证明杜甫诗句，知道康山在蜀，不是庐山。按：当涂所刻的《李太白集》，其书首卷载有《新墓碑》，题宣、歙、池等州观察使范传正撰，一共一千五百多字，只说：“从本朝（唐朝）以来，编入皇族谱籍。神龙初年，从碎叶还到广汉，因此侨民为广汉郡人。”根本没有《补遗》所记载的七十多字，难道不是喜欢多事的人伪造这书，像《开元遗事》之类，用来附会杜甫的诗吗？

欧阳 《輿地广记》说：“彰明县有《李白碑》，李白生于这个县。”大约也是传说的错误，应当以范传正所作碑为据。

列国城门名

【原文】 郡县及城门名，用一字者为雅驯近古。今独姑苏曰吴郡吴县，有盘门、阊门、葑门、娄门、齐门，他皆不然。

春秋时，列国门名见于《左氏传》者，郑最多，曰渠门、纯门、时门、将门、闺门、皇门、碾门、墓门，又有师之梁、桔槔之门。周曰圉门。鲁曰雩门、雉门、稷门、莱门，鹿门，又有子驹之门。《公羊传》有争门、吏门。宋曰碣门、桐门、卢门、曹门、泽门、扬门、桑林之门。邾曰鱼门、范门。卫曰闕门、盖获之门。齐曰雍门，亦有扬门、鹿门、稷门。吴曰胥门。宋埳泽之门，见《孟子》。

【译文】 郡、县和城门的名称，使用一个字的可谓文雅古朴。现在只有姑苏城叫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它的城门名称有盘门、阊门、葑门、娄门、齐门等，其他的郡县和城门则都不是这样。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城门名称记载于《左传》一书中的，以郑国（今河南新郑一带）最多，有渠门、纯门、时门、将门、闺门、皇门、 门、墓门，还有师之梁门、桔 之门。周国有圉门。鲁国（今山东南部一带）有雩门、雉门、稷门、莱门、鹿门，还有子驹门。《公羊传》中记载有争门、吏门。宋国（今商丘一带）有 门、桐门、卢门、曹门、泽门、扬门、桑林门。邾国（今山东邹县一带）有鱼门、范门。卫国（今河北南、河南北一带）有闕门、盖获门。齐国（今山东北部一带）有雍门，也有扬门、鹿门、稷门。吴国（今长江下游一带）有胥门。宋国还有埳泽门，见于《孟子》一书。

缁尘素衣

【原文】 陈简斋《墨梅》绝句一篇云：“粲粲江南万玉妃，别来几度见春归。相逢京洛浑依旧，只恨缁尘染素衣。”语意皆妙绝。晋陆机《为顾荣赠妇》诗云：“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齐谢元晖《酬王晋安》诗云：“谁能久京洛，缁尘染素衣。”正用此也。

【译文】 陈简斋（陈与义）有绝句一篇说：“粲粲江南万玉妃，别来几度见春归。相逢京洛浑依旧，只恨缁尘染素衣（美好的江南万株梅树如玉妃一样，别去以来几次曾见春回大地。在京城洛阳相遇还和以前完全一样，只是遗憾灰墨的尘土玷污了白色的衣服）。”语言和用意都极妙。晋朝陆机《为顾荣赠妇》诗：“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京城洛阳常常刮风扬起很多尘土，白色的衣服变成了灰黑色）”。南朝齐谢元晖（谢）《酬王晋安》诗说：“谁能久京洛，缁尘染素衣（谁能长久住在京城洛阳，让灰黑的尘土来玷污白色的衣服）”。正是用这个典故。

去国立后

【原文】 齐高氏食邑于卢，高弱以卢叛齐，闾丘婴围之，弱曰：“苟使高氏有后，请致邑。”齐人立高碯，弱致卢而出奔晋。鲁臧氏食邑于防，臧纥得罪，使来告曰：“苟守先祀，敢不辟邑。”乃立臧为，纥致防而奔齐。

按弱、纥二人，据地要君，故孔子曰：“臧武仲以防求后于鲁，虽曰不要君，吾不信也。”然齐、鲁之君，竟如其请，不以要君之故而背之，盖当是时先王之泽未熄，非若战国务为诈力权谋之比，所谓杀人之中又有礼焉者也。降及末世，遂有带甲约降，既解甲即围而杀之者，不仁孰甚焉！

【译文】 春秋时，齐国高氏的封地在卢（今山东长清西南），高弱以卢地为资本，背叛了齐国，齐君派闾丘婴率兵围攻他，高弱说：“如果能让我高家后继有人，那么我就请求归还封地于齐君。”齐君便让高 继承高弱的爵位，高弱于是归还了卢地，而后逃到晋国。鲁国臧氏的封地在防（今山东费县东北），臧纥犯了罪，派人对鲁君说：“如果你能保全我的家人，那么我怎敢不奉还封地呢？”于是鲁国让臧为继承臧纥的爵位，臧纥归还防地后逃到了齐国。

按：高弱、臧纥这两个人，凭借自己占的地盘而要挟国君，所以孔子说：“臧武仲用防这块地盘，请求鲁君保全自己的家人，为高氏立后，即使他说不要挟国君，但是我根本不相信。”然而齐国、鲁国的君主，竟能接受这种请求，并不因为他们要挟君主而予以拒绝，这是因为当时先王的恩泽还未完全消失，并不像战国时一心用诈骗手段，竭力施展权术那样，这就是所谓的杀人之中还有礼仪。到了后来，就出现了士兵整装投降，等到俘虏们被全部解除武装之后，对方便发动进攻，将他们全部围歼的惨剧，人世间还有比这更不仁义的行为吗？

诗词改字

【原文】 王荆公绝句云：“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吴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复圈去而改为入，旋改为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绿。

黄鲁直诗：“归燕略无三月事，高蝉正用一枝鸣。”用字初曰抱，又改曰占、曰在、曰带、曰要，至用字始定。予闻于钱仲仲大夫如此。今豫章所刻本，乃作“残蝉犹占一枝鸣”。

向巨原云：“元不伐家有鲁直所书东坡《念奴娇》，与今人歌不同者数处，如‘浪淘尽’为‘浪声沉’，‘周郎赤壁’为‘孙吴赤壁’，‘乱石穿空’为‘崩云’，‘惊涛拍岸’为‘掠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为‘多情应是笑我生华发’，‘人生如梦’为‘如寄’。”不知此本今何在也？

【译文】 王安石有一首绝句说：“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吴中（今江苏吴县）士人家收藏有他的草稿，从草稿中可以看到，当初“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句作“春风又到江南岸”；后来“到”字被圈掉，并加注文说“不好”，改为用“过”字，但又圈掉改用“入”字，接着又改用“满”字，这样反复改了十几个字，最后才确定用“绿”字。

黄庭坚有二句诗说：“归燕略无三月事，高蝉正用一枝鸣。”句中“用”字，最初为“抱”字，后改为“占”字，接着又改为“在”、“带”、“要”等字，直到改为“用”字才确定下来。这是我从钱仲仲大夫那里听来的。但现在豫章（今江西南昌）所刻印的版本中却写作“残蝉犹占一枝鸣”。

向巨原说：“元不伐家中藏有黄庭坚书写的苏轼《念奴娇》词，和现在人们所传唱的词句有好几处不同，如‘浪淘尽’为‘浪声沉’，‘周郎赤壁’为‘孙

吴赤壁’，‘乱石穿空’为‘乱石崩云’，‘惊涛拍岸’为‘惊涛掠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为‘多情应是笑我生华发’，‘人生如梦’为‘人生如寄’。”只是不知道这种版本现在在什么地方？

姑舅为婚

【原文】 姑舅兄弟为婚，在礼法不禁，而世俗不晓。按《刑统·户婚律》云：“父母之姑舅、两姨姊妹及姨若堂姨、母之姑、堂姑，己之堂姨及再从姨、堂外甥女、女婿姊妹，并不得为婚姻。”议曰：“父母姑舅、两姨姊妹，于身无服，乃是父母缌麻，据身是尊，故不合娶。及姨又是父母大功尊；若堂姨虽于父母无服，亦是尊属；母之姑、堂姑，并是母之小功以上尊；己之堂姨及再从姨、堂外甥女亦谓堂姊妹所生者、女婿姊妹，于身虽并无服，据理不可为婚。并为尊卑混乱，人伦失序之故。”然则中表兄弟姊妹正是一等，其于婚娶，了无所妨。

予记政和八年，知汉阳军王大夫申明此项，敕局看详，以为如表叔取表侄女，从甥女嫁从舅之类，甚为明白。徽州《法司编类续降》有全文，今州县官书判，至有将姑舅兄弟成婚而断离之者，皆失于不能细读律令也。惟西魏文帝时，禁中外及从母兄弟姊妹为婚，周武帝又诏不得娶母同姓以为妻妾，宣帝诏母族绝服外者听婚，皆偏闰之制。漫附于此。

【译文】 姑家的兄弟姐妹同舅家的兄弟姐妹可以互相结婚，这在礼法上是不禁止的，但在社会上一般老百姓却不知道。《刑统·户婚律》上说：“父母的姑舅、两姨姐妹、姨及堂姨、母亲的姑、堂姑，自己的堂姨和再从姨、堂外甥女、女婿的姊妹，都不能互相结婚。”议论的人说：“父母的姑舅、两姨姐妹，于自身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也不为她（他）们服丧服，但这是父母的缌麻亲属，对自己来说是长辈，所以不应该相互嫁娶，结为婚姻。说到姨，又是父母的大功亲属，也是自己的长辈；像堂姨虽然和父亲没有五服关系，但也是长辈；母亲的姑姑、堂姑，都是母亲的小功以上亲属，也是长辈；自己的堂姨和再从姨、堂外甥女也即堂姐妹所生的女儿，女婿的姐妹，从自身说也无五服关系，但根据道理来说，也不可以互相结婚。如果那样，尊卑即长辈晚辈的关系就搞乱了，人伦的关系就乱套了。”然而表兄弟姐妹，由于是同辈，他们互相结婚，则没有多大妨害。我记得徽宗政和八年（政和只有七年，没有八年，1117年为政和七年，次年即改元为重和元年，此处可能为重和元年），知汉阳军王大夫特别申明这件

事，敕局详审，认为像表叔娶表侄女，叔伯外甥女嫁叔伯舅之类，写得很明白。徽州（今属安徽）《法司编类续降》有全文，现在州县官书写判决书，甚至有将姑舅兄弟成婚而判离婚的，这都是因为不详细钻研有关法律的原故。只有在西魏文帝的时候，禁止宫内外和从母兄弟姐妹结婚。周武帝的时候，又诏令不准娶与母亲同姓的女子为妻妾。汉宣帝的时候，曾下令：虽与母亲同族，但在五服以外的，可以随便结婚，这些都是附属的制度。现在随便附记在这里。

卷 九

三家七穆

【原文】 春秋列国卿大夫世家之盛，无越鲁三家、郑七穆者。鲁之公族，如臧氏、展氏、施氏、子叔氏、叔仲氏、东门氏、 氏之类固多，唯孟孙、叔孙、季孙实出于桓公，其传序累代，皆秉国政，与鲁相为久长。若揆之以理，则桓公弑兄夺国，得罪于天，顾使有后如此。郑灵公亡，无嗣，国人立穆公之子子良，子良辞以公子坚长。乃立坚，是为襄公。襄公将去穆氏。子良争之，愿与偕亡。乃舍之，皆为大夫。其后位卿、大夫而传世者，罕、驷、丰、印、游、国、良，故曰七穆。然则诸家不逐而获存，子良之力也。至其孙良霄乃先覆族，而六家为卿如故，此又不可解也。

【译文】 春秋时期，各国卿大夫世家最兴盛的，没有超过鲁国三桓，及郑国七穆的。鲁国的公子，如臧氏、展氏、施氏、子叔氏、叔仲氏、东门氏、癸氏之类，固然很多，但只有孟孙、叔孙、季孙三家，实际上是桓公的后代。他们一代接一代地传下来，没有间断，都掌管国家的大权，和鲁国同样长久。如果揣度其道理，那就是桓公杀害兄长，夺取政权，得罪了上天，所以上天特意让他们的子孙后代兴旺发达。

公元前 605 年，郑灵公被杀后，没有儿子，国人就拥立穆公的儿子子良，但子良不肯，理由是公子坚年龄更大。他建议让公子坚继位。于是灵公的庶弟公子坚继位，这就是郑襄公。襄公执政后，想除掉穆氏。子良不赞成这样做，便与襄公进行论争，并且表示你如果一定要除去穆氏，那么我愿意与他们一起受死。结果，襄公被迫让步，放弃了除去穆氏的打算。从此，穆氏都为郑国的大夫。其后，官居卿、大夫而世代相传的有罕、驷、丰、印、游、国、良等七家，被人们称为七穆。他们之所以不被驱逐而幸存下来，完全是依靠子良的大力帮助。可是到子良的孙子良霄时，子良这一支就被灭族了。而其他六家，仍有世袭的官爵。此事，也很费解。

贡薛韦匡

【原文】 《汉元帝纪赞》云：“贡、薛、韦、匡迭为宰相。”谓贡禹、薛文德、韦元成、匡衡也。四人皆握璫自好，当优柔不断之朝，无所规救。衡专附石显，最为邪臣；文德但有谏御楼船一事；禹传称在位数言得失，书数十上；元成传称为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贤，而文采过之。皆不著其有过。按《刘向传》：“宏恭、石显白逮更生下狱，下太傅韦元成、谏大夫贡禹与廷尉杂考。劾更生前为九卿，坐与萧望之、周堪谋排许、史，毁离亲戚，欲退去之，而独专权。为臣不忠，幸不伏诛，复蒙恩召用，不悔前过，而教令人言变事，诬罔不道。更生坐免为庶人。”若以汉法论之，更生死有余罪，幸元帝不杀之耳。《京房传》房欲行考功法，石显及韦丞相皆不欲行。然则韦、贡之所以进用，皆阴附恭、显而得之。《班史》隐而不论，唯于《石显传》云：“贡禹明经著节，显使人致意，深自结纳。因荐禹天子，历位九卿，至御史大夫。”正在望之死后也。

【译文】 《汉书·元帝纪赞》说：“贡、薛、韦、匡相继任宰相。”是说贡禹、薛广德、韦玄成、匡衡，这四个人都是拘谨自守，正当皇帝优柔没有决断的朝廷中，却不能有所规劝补救。匡衡专门趋附石显，最是奸邪的臣子；薛广德只有谏皇帝乘楼船一件事；《贡禹传》说贡禹在位时多次讲到朝政的得失，曾几十次上书；《韦玄成传》说韦玄成做宰相七年，守正道而办事慎重，不及父亲韦贤，但文采超过父亲。对这四个人都不明说他们有过错。按《刘向传》：“弘恭、石显上言逮捕刘更生（刘向）下监狱，交给太傅韦玄成，谏大夫贡禹和廷尉一起审问。他们劾奏刘更生‘以前任九卿，因和萧望之、周堪等合谋排挤许、史二家，毁谤离间皇帝的亲戚，想斥退许、史二家，而和萧、周单独专权。作为臣子不忠，幸而未被诛杀，又蒙恩征召起用，不悔改以前过失，而教别人上言有变故的事，诬陷欺罔不守正道。’刘更生因此被免去官职成为平民。”如果以汉代法律来论罪，刘更生可以是死有余罪，幸而元帝不杀他而已。《京房传》载，京房要实行考察官员功绩的法令，石显和丞相韦玄成都不想实行。那么韦玄成、贡禹之所以被进升擢用，都是暗中依附弘恭、石显而得到的。班固《汉书》隐讳而不说，只在《石显传》中说：“贡禹明经书而以节操著名，石显派人向他致意，深深地与他勾结。因此向皇帝推荐贡禹，历任九卿，官至御史大夫。”此事正在萧望之死后。

宽张安世

【原文】 《汉史》有当书之事，本传不载者。武帝时，宽有重罪系，按道侯韩说谏曰：“前吾丘寿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杀宽，后将复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赏宽，复用之。宣帝时，张安世尝不快上（所为不可上意），上欲诛之，赵充国以为安世本持橐籥笔事孝武帝数十年，见谓忠谨，宜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二事不书于宽及安世传，而于刘向、充国传中见之。岂非以二人之贤为讳之邪？韩说能以一言救贤臣于垂死，而不于说传书之，以扬其善，为可惜也。

【译文】 在《汉书》里，有些应当记载的事，而人物本传里却不记载。汉武帝时，宽犯重罪被关入牢狱，拟处死刑。按道侯韩说向武帝进谏说：“先前处死了吾丘寿王，陛下至今还后悔不已。现在把宽杀掉，恐怕日后陛下会更加后悔了。”汉武帝听了，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于是赦免宽，并且恢复了他的官职。

汉宣帝时，大臣张安世曾经得罪过皇上，宣帝一怒之下，想把他杀掉。赵充国对宣帝说，张安世久居朝中，作为近侍兢兢业业地事奉武帝数十年，对皇上一片忠心，办事谨慎，应当免他一死。宣帝接受了赵充国的规劝，从而使张安世免遭杀身之祸。

以上二事，在《汉书·宽传》及《张安世传》中都没有提及，而分别写入《刘向传》及《赵充国传》。这岂不是因为宽、张安世二人是贤臣而为史家有意避讳呢？韩说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力主正义，一句话来挽救了一个贤臣岌岌可危的性命，像这样的好事，不在本传中述及，以扬其善，这也实在太令人感到惋惜了。

深沟高垒

【原文】 韩信伐赵，赵陈馀聚兵井陘口御之。李左车说馀曰：“信乘胜而去国远斗，其锋不可当。愿假奇兵从间道绝其辎重，而深沟高垒勿与战。彼前不得斗，退不得还，不至十日，信之头可致麾下。”馀不听，一战成擒。七国反，周亚夫将兵往击，会兵荥阳，邓都尉曰：“吴、楚兵锐甚，难与争锋。愿以梁委

之，而东北壁昌邑，深沟高垒，使轻兵塞其饷道，以全制其极。”亚夫从之，吴果败亡。李、邓之策一也，而用与不用则异耳。秦军武安西，以攻阬与。赵奢救之，去邯郸三十里，坚壁，二十八日不行，复益增垒。既乃卷甲而趋之，大破秦军。奢之将略，所谓玩敌于股掌之上，虽未合战而胜形已著矣，前所云邓都尉者，亚夫故父绛侯客也。《晁错传》云：“错已死，谒者仆射邓公为校尉，击吴、楚为将。还，上书言军事，拜为城阳中尉。”邓公者，岂非邓都尉乎？亚夫传以为此策乃自请而后行，颜师古疑其不同，然以事料之，必非出于己也。

【译文】 韩信进攻赵国，赵国的陈馥集结兵力在井陘口抵御他。李左车游说陈馥说：“韩信乘着战胜而离开本国远征作战，他的兵锋不可抵挡。请求借给我一支奇兵从旁的路上去绝断他的辎重通道，而您挖深沟筑高的壁垒不和他交战。他向前不能交锋，退又回不去，不到十天，韩信的头颅就可以送到您的大旗下面。”陈馥不听，一战就被韩信擒捉。吴楚七国造反，周亚夫率兵前往讨伐，两军在荥阳相遇，邓都尉说：“吴国和楚国的兵锋很勇锐，难于和他们争胜负。请求先把梁国让他们攻打，而我军向东北去驻扎在昌邑，挖掘深沟高筑壁垒，派轻装的军队阻断他们运量的道路，用全盛之气来制服他们的疲极之兵。”周亚夫听从了他，吴国果然败亡。李左车、邓都尉的计策是一样的，而用和不用则不同了。战国时秦军驻在武安之西，用以进攻阬与。赵将赵奢前往援救阬与，离开邯郸三十里，就坚守壁垒，二十八天不移动，又更增加营垒。后来又卷起甲奔赴前方，大破秦军。赵奢的为将谋略，所谓玩弄敌人于股掌之中，虽然还没有交战而胜败的形势已很明白了。前面所说的邓都尉其人，是周亚夫已故父亲绛侯周勃的门客。《晁错传》说：“晁错已死之后，谒者仆射邓公任校尉，攻击吴、楚军时作为将领。回京城，上书论述军事情况，被任命为城阳中尉。这位“邓公”，岂不是“邓都尉”吗？《周亚夫传》以为这计策是周亚夫自己请示之后实行的，颜师古对二说不同表示怀疑，但以事实来料想，一定不是周亚夫自己出的主意。

定之后，回京，上书论述军事，升为城阳中尉。”这里所说的邓公，莫非就是邓都尉吗？《周亚夫传》说这一策略是周亚夫自己提出而后实行的。颜师古对此说法表示怀疑。然而，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一策略，必定不是出自于周亚夫本人。

生之徒十有三

【原文】 《老子》“出生入死”章云：“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死地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王弼注曰：“十有三，犹云十分有三分取其生道，全生之极，十分有三耳；取死之道，全死之极，十分亦有三耳。而民生生之厚，更之无生之地焉。”其说甚浅，且不解释后一节。唯苏子由以谓“生死之道，以十言之，三者各居其三矣，岂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而已乎？《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以寄无思无为之妙。”其论可谓尽矣。

【译文】 《老子》“出生入死”章中说：“始出于世而生，终入于地而死。走向生长的十分有三，走向死亡的十分有三，人的生长，由于活动而致于死地，也十分有三。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追求生活过分强烈呀。”王弼作注说：“十有三，就是说走向生长道路的只有十分之三；保住生命达到终点的，也只有十分之三；走向死亡之道，加速死亡的，也只有十分之三。而那些富贵的人们以优裕的生活条件追求长生，一旦改变了，他们就没有了生存的地方。”王弼的解释很浅显，而且没有解释后面一节。只有苏辙（字子由）的解释比较详尽。他说：“生死的道理，如果说有十种，三种情况各占三份，这难道不是说生死之道有九，而不生不死之道只不过有一种吗？《老子》只说九不说一，是想让人们自己思考，以寄托无思无为之妙处。”这种解释实在是太精当了。

臧氏二龟

【原文】 臧文仲居蔡，孔子以为不智。蔡者，国君之守龟，出蔡地，因以为名焉。《左传》所称“作虚器”，正谓此也。至其孙武仲得罪于鲁，出奔邾，使告其兄贾于铸，且致大蔡焉，曰：“纆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纳请，其可？”盖请为先人立后也。贾再拜受龟，使弟为为己请，遂自为也。乃立臧为。为之子曰昭伯，尝如晋，从弟会窃其宝龟倮句（龟所出地名），以卜为信与僭，僭吉（僭，不信也）。会如晋。昭伯问内子与母弟，皆不对。会之意，欲使昭伯疑其若有他故者。归而察之，皆无之，执而戮之，逸奔。及昭伯从昭公孙于齐，季平子立会为臧氏后，会曰：“倮句不余欺也。”臧氏二事，皆以龟故，皆以弟而

夺兄位，亦异矣。

【译文】 臧文仲居于蔡国，孔子认为这是不明智的。蔡国之所以叫蔡，是因为国君用以占卜的龟甲出自于蔡地，蔡就是乌龟，所以才命名为蔡。《左传》中所说的“作虚器”，正是指此而言。到了臧文仲的孙子武仲时，因得罪了鲁国国君，而出逃到邾国，然后派人告诉在铸地的哥哥臧贾，并且送去一只大乌龟，说：“纆所犯的罪行达不到断绝对先人祭祀的程度。你向鲁君献上这只大龟以便求情，可以吗？”大概是请哥哥为祖先立后的。臧贾二次叩拜后接受大龟，让弟弟臧为为自己陈情求立，而臧为却乘机为自己请求，于是就立臧为为接班人。臧为的儿子叫昭伯，有一次去晋国，他的堂弟臧会就趁机偷出他的出于倭句的宝龟，来占卜昭伯的继承权是真还是假，结果是假。臧会也到了晋国。昭伯问妻子和自己的弟弟，臧会都不回答。臧会的意图，是想让昭伯怀疑似乎是有其他什么变故。昭伯回来察看，什么事也没有，但是他却将妻子和弟弟抓起来处死了，然后逃到了豳地。到了昭伯跟随鲁昭公投奔到齐国时，季平子把臧会立为臧氏之后。臧会说：“倭句之龟的确没有欺骗我。”臧氏这两件事，都是因为龟甲的缘故，都是弟弟篡夺哥哥的地位，也可谓是很稀罕的事了。

有扈氏

【原文】 《夏书·甘誓》，启与有扈大战于甘，以其“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为辞，孔安国传云：“有扈与夏同姓，恃亲而不恭。”其罪如此耳。而《淮南子·齐俗训》曰：“有扈氏为义而亡，知义而不知宜也。”高诱注云：“有扈，夏启之庶兄也。以尧、舜举贤，禹独与子，故伐启。启亡之。”此事不见于他书，不知诱何以知之？传记散轶，其必有以为据矣。庄子以为“禹攻有扈，国为虚厉”，非也。

【译文】 《夏书·甘誓》中记载，夏启和有扈氏在甘地（今陕西户县西南）展开大战，启讨伐有扈的理由是：“侮辱了五行（即金、木、水、火、土，指自然界和社会的运用规律），抛弃了三正（指历法），上帝因此要置之于死地。”孔安国解释说：“有扈和夏同姓，他恃亲而不恭敬。”其罪恶就是这些。但《淮南子·齐俗训》中却说：“有扈氏是为义而死的，他只知道大义而不知道变通，不善于顺应潮流。”高诱的注释说：“有扈氏是夏启的庶兄，因为尧、舜举荐贤人继位，而禹却把帝位让给儿子启，所以有扈氏举兵讨伐启，结果却被启消灭了。”这件事在别的书里见不到，不知道高诱是怎么知道的？传记都散失了，他

必定是有根据的。庄子认为“禹攻打有扈氏，有扈氏因此国空人绝”，看来这不是事实。

太公丹书

【原文】 太公《丹书》今罕见于世，黄鲁直于礼书得其诸铭而书之，然不著其本始。予读《大戴礼·武王践阼篇》，载之甚备，故悉纪录以遗好古君子云：“武王践阼三日，召士大夫而问焉，曰：‘恶有藏之约，行之行，万世可以为子孙常者乎？’皆曰：‘未得闻也。’然后召师尚父而问焉，曰：‘黄帝、颡顼之道可得见与？’师尚父曰：‘在《丹书》。王欲闻之，则斋矣。’王斋三日，尚父端冕奉书，道书之言曰：‘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凡事不强则枉，弗敬则不正，枉者灭废，敬者万世。’藏之约，行之行，可以为子孙常者，此言之谓也。”又曰：‘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王闻《书》之言，惕若恐惧。退而为《戒书》，于席之四端为铭。前左端铭曰：“安乐必敬。”前右端铭曰：“无行可悔。”后左端铭曰：“一反一侧，亦不可以忘。”后右端铭曰：“所监不远，视尔所代。”几之铭曰：“皇皇惟敬，口生硠，口戕口。”鉴之铭曰：“见尔前，虑尔后。”盥盘之铭曰：“与其溺于人也。宁溺于渊。溺于渊，犹可游也；溺于人，不可救也。”楹之铭曰：“毋曰胡残，其祸将然；毋曰胡害，其祸将大；毋曰胡伤，其祸将长。”杖之铭曰：“恶乎危？于忿碻。恶乎失道？于嗜欲。恶乎相忘？于富贵。”带之铭曰：“火灭修容，慎戒必共，共则寿。”屨之铭曰：“慎之劳，劳则富。”觴豆之铭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礪，礪则逃。”户之铭曰：“夫名难得而易失。无勤弗志，而曰我知之乎？无勤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扰阻以泥之，若风将至，必先摇摇，虽有圣人，不能为谋也。”牖之铭曰：“随天之时，以地之财，敬祀皇天，敬以先时。”剑之铭曰：“带之以为服，动必行德，行德则兴，倍德则崩。”弓之铭曰：“屈申之义，发之行之，无忘自过。”矛之铭曰：“造矛造矛，少间弗忍，终身之羞。予一人所闻，以戒后世子孙。”凡十七铭，贾谊《政事书》所陈教太子一节千余言，皆此书《保傅篇》之文，然及胡亥、赵高之事，则为汉儒所作可知矣。《汉昭帝纪》“通《保傅传》”，文颖注曰：“贾谊作，在《礼·大戴记》。”其此书乎？荀卿《议兵篇》：“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计胜欲则从，欲胜计则凶。”盖出诸此。《左传》晋斐豹“着于丹书”，谓以丹书其罪也。其名偶与之同耳。汉祖有丹书铁契以待功臣，盖又不同

也。

【译文】 姜太公的《丹书》如今难以见到，黄庭坚从礼书中将它的各种铭文抄录下来，但是没有注明最原始的出处。我阅读《大戴礼记·武王践阼篇》，其中记载的很详细，所以全部记录下来赠送给好古的人们：“周武王刚登极三天，就召集士大夫问道：‘哪里有密藏的古代规约、行动方法，特别是那些可以永远指导子孙后代的呢？’士大夫们都说：‘没听说过。’然后武王又召来太师姜尚问道：‘能够见到黄帝、颡顓的治国之道吗？’太师姜尚说：‘在《丹书》中有。大王要想听讲，就斋戒吧。’武王斋戒了三天，姜尚戴正冠冕，手捧书本，为武王读书中的话：敬慎胜过了怠慢的就得吉祥，怠慢胜过了敬慎的就要灭亡；道义战胜了欲望的可以如愿，欲望战胜道义的就遭凶祸。凡事情不能自强就会邪枉，不恭敬就不正当，邪枉的人被灭绝废弃，恭敬的人能传万世。隐藏不行者困窘，实行者成功，可以作为子孙经常实行的道理，就是说这些话’。又说：‘用仁道得到天下，以仁道来保持它，其传世可以一百代；以不仁道得天下，以仁道保持它，其传业可以十代；以不仁道得天下，以不仁道来保持它，必然在本人一世就灭绝。’武王听了《丹书》的话，警惕而惶恐。退下来作《戒书》，他在坐席的四角都设置铭辞。前方左边铭辞说：‘在安乐的时候必须恭敬。’前方右边铭辞说：‘不要做会后悔的事。’后方左边的铭辞说：‘一转身一侧身，也不可忘记大道。’后方右边的铭辞说：‘所引为 戒的事并不远，看你所代替的朝代。’几的铭辞说：‘谨慎地恭敬行事，每次说话都要恭敬，口舌会招来耻辱，口舌会残害出言的人。’镜子的铭辞说：‘看见你前面，就考虑你后面。’洗脸 的铭辞说：‘与其溺惑于人，宁可淹在渊水中。跌进渊水中，还可以游泳；溺惑于人，就不能救了。’柱子的铭辞说：‘别说算什么残害，它的灾祸将如火一样烧起来；别说有什么害处，它的灾祸将很大；别说有什么损伤，它的灾祸会很长远。’手杖的铭辞说：“什么事危险？就是忿恨妨碍道理。什么事会失去道理？在于嗜好欲望。什么事会使人忘记道义？在于富贵。’衣带的铭辞说：‘灯火熄灭时整顿容貌，谨慎而为须恭敬，恭敬的人就长寿。’鞋子的铭辞说：‘要慎于勤劳，勤劳就富有。’酒杯和盛饭的器皿上铭辞说：‘吃饭要用礼约束自己，吃饭要用礼约束自己，警惕骄傲随意，骄傲随意就会离开正道。’门上的铭辞说：‘那名誉是难于得到而易于丧失的。无所依赖而不去思考，而能说我知道吗？无所依赖而不去努力，而能说我保持着吗？拂拭着门户给它涂上泥土，如果风将要吹到，房屋就会摇摆，虽有圣人，也没有计谋可施。’窗上的铭辞说：‘顺着天的时令，利用地的财富，恭敬地祭祀老天爷，祭祀之前恭敬地斋戒。’剑的铭辞说：‘带着剑作为服饰，动作必须实行有德的事，施行道德就能兴盛，违反道德必然崩

溃。’弓的铭文说：‘弓有拉紧放松的意义，发命和实行事情，不要忘己自己会有过分的时候。’矛的铭文说：‘造矛造矛，片刻的不能忍耐，会引来终身的羞耻。我一人所听到的，用来告诫后代子孙。’”一共十六个铭辞。贾谊的《政事书》（《陈政事疏》），所陈奏教育太子的一节一千多字，都是这《大戴礼保傅篇》的文字，但讲到了胡亥、赵高的事，那么可见是汉朝儒者所作了。《汉书·昭帝纪》说：“通晓《保傅传》”，文颖注说：“贾谊作，在《礼·大戴记》中。”就是这书吧？荀卿（荀况）的《荀子·议兵篇》：“恭敬胜过怠慢就得吉祥，怠慢胜过恭敬就灭亡；计谋胜过欲望就顺利，欲望胜过计谋就遇凶祸。”大约出于这里。《左传》记晋国的斐豹“记在《丹书》中”，是说用红颜色书写记录他的罪名。它的名目偶然和太公《丹书》相同而已。汉高祖有红字文书铁铸文契来赏给功臣，那又不同了。

汉景帝

【原文】 汉景帝为人，甚有可议。晁错为内史，门东出，不便，更穿一门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庙礲垣也。丞相申屠嘉闻错穿宗庙垣，为奏请诛错。错恐，夜入宫上谒，自归。上至朝，嘉请诛错。上曰：“错所穿非真庙垣，乃外礲垣，且又我使为之，错无罪。”临江王荣以皇太子废为王，坐侵太宗庙地为宫，诣中尉府对簿责讯，王遂自杀。两者均为侵宗庙，荣以废黜失宠，至于杀之，错方贵幸，故略不问罪，其不公不慈如此！及用袁盎一言，错即夷族，其寡恩忍杀复如此。

【译文】 汉景帝的为人，甚有值得商议之处。晁错任内史时，门从东边走，不太方便，于是另开一门从南边出入，从南门出来，就是太上皇的宗庙院墙。丞相申屠嘉听说这件事后，启奏景帝请求诛杀晁错，晁错心中非常害怕，连夜入宫谒见皇帝，然后独自回来。第二天，皇上临朝，申屠嘉又请求处罚晁错。景帝说：“晁错出南门走过的地方并非真正的宗庙院墙，而是外墙，况且又是我同意他干的，晁错无罪。”临江王刘荣是被废除了的皇太子，他在太宗庙内外围墙之间的空地建造宫殿，景帝便命令他到中尉府接受审讯，临江王忧惧自杀了。这两件事都是侵犯宗庙地，刘荣因为被废黜失宠而导致杀身之祸，晁错刚刚显贵受宠，于是就不问罪，这是多么的不公平不仁慈啊！后来因为袁盎一句话，景帝便把晁家诛灭九族，这又是多么的寡恩残忍啊！

萧何先见

【原文】 韩信从项梁，居戏下，无所知名。又属羽，数以策干羽，羽弗用，乃亡归汉。陈平事项羽，羽使击降河内，已而汉攻下之。羽怒，将诛定河内者。平惧诛，乃降汉。信与平固能择所从，然不若萧何之先见。何为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召何，何固请，得毋行。则当秦之未亡，已知其不能久矣，不待献策弗用，及惧罪且诛，然后去之也。

【译文】 韩信跟随项梁时，只是部下的一名小吏，没有多少人知道他。后来又投奔项羽，几次向项羽献计献策，项羽都没有采纳，于是他就投奔刘邦。陈平为项羽效力，项羽派他率兵进攻河内（今河南沁阳），他迫使河内归降。可是，不久刘邦的人马又攻占了河内。项羽大怒，打算诛杀平定河内的将领。陈平害怕被杀，于是投降汉王刘邦。韩信与陈平固然也算是善于选择何去何从，但都比不上萧何有先见之明。萧何在担任泗水郡卒史时，政绩为第一。秦朝的御史打算向皇帝进言征调萧何，萧何坚决辞谢，这件事这才作罢。他是在秦国尚未灭亡时，早就知道它不会长久了，而不必等到献计策不被采纳，或者有罪将要被杀头时，才仓惶逃离，可见他比韩信、陈平都高明。

史汉书法

【原文】 《史记》、《前汉》所书高祖诸将战功，各为一体。《周勃传》：攻开封，先至城下为多；攻好 ，最；击咸阳，最；攻曲遇，最；破臧荼，所将卒当驰道为多；击胡骑平城下，所将卒当驰道为多。《夏侯婴传》：破李由军，以兵车趣攻战疾；从击章邯，以兵车趣攻战疾；击秦军洛阳东，以兵车趣攻战疾。《灌婴传》：破秦军于杠里，疾斗；攻曲遇，战疾力；战于蓝田，疾力；击项佗军，疾战。又书：击项冠于鲁下，所将卒斩司马、骑将各一人；击破王武军，所将卒斩楼烦将五人；击武别将，所将卒斩都尉一人；击齐军于历下，所将卒虏将军、将吏四十六人；击田横，所将卒斩骑将一人；从韩信，卒斩龙且（所将之卒），身生得周兰；破薛郡，身虏骑将；击项籍陈下，所将卒斩楼烦将二人；追至东城，所将卒共斩籍；击胡骑晋阳下，所将卒斩白题将一人；攻陈碭，卒斩特将五人；破黥布，身生得左司马一人，所将卒斩小将十人。《傅宽传》：属

淮阴，击坡历下军；属相国参，残博；属太尉勃，击陈硕。《酈商传》：与钟离昧战，受梁相国印；定上谷，受赵相国印。五人之传，书法不同如此，灌婴事尤为复重，然读之了不觉琐，史笔超拔高古，范晔以下岂能窥其篱奥哉？又《史记·灌婴传》书：受诏别击楚军后；受诏将郎中骑兵；受诏将车骑别追项籍；受诏别降楼烦以北六县；受诏并将燕、赵车骑；受诏别攻陈硕。凡六书受诏字，《汉》减其三云。

【译文】 《史记》、《前汉书》中所记载的汉高祖刘邦手下大将的战功，各有不同。《周勃传》中说：“攻打开封时，周勃的士兵抢先到达城下的比其他部多；攻打好 时，功劳最大；攻打咸阳时，功劳最大；攻打曲遇时，功劳最大；攻破臧荼时，他率领的士兵占领驰道最多；在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下攻击胡骑时，他所率领的士兵占领驰道也最多。《夏侯婴传》中说：进攻李由的军队，他带领战车疾攻猛战；跟随高祖进攻章邯的军队，他带领战车疾攻猛战；在洛阳以东袭击秦军，他又带领战车疾攻猛打。《灌婴传》中说：在杠里打败秦军，他猛攻猛打；在曲遇攻打秦军，他又疾攻力战；在蓝田与秦军交战，他还是疾攻猛战；攻打项佗的军队，他同样英勇冲杀。又说：在鲁下攻打项冠的军队，他带领的士兵杀敌司马、骑将各一人；打败王武的军队，所率士兵斩了楼烦五名将领；攻击王武的其他部将时，他率领的士兵斩杀都尉一名；在历下打击齐军，他率领的士兵俘虏将军、将吏四十六人；攻击田横时，他的士兵杀了一位骑将；跟随韩信时，他的部下斩杀了龙且，自己又亲手生俘了副将周兰；攻破薛郡时，他亲自俘虏骑将一人；在陈下攻打项羽时，他的手下人杀了楼烦将领二名；追击到东城，他部下将士一起杀了项羽；在晋阳城下攻打胡骑，部下将领杀了匈奴白题将领一人；攻打反叛的陈 ，部下将士斩杀侯敞和特将五人；攻打黥布时，他又亲自生俘左司马一人，部下将士杀小将十名。《傅宽传》记载：作为淮阴侯韩信的部下，曾打败了历下军；跟随相国曹参时，攻破并摧毁了博城；跟随太尉周勃时，攻打过陈 。《酈商传》中说：与楚将钟离昧交战时，汉王授与他梁国相国印；以右丞相身份率兵平定上谷（今河北怀来东南），被授予赵国相国印。这五个人的传记，写法就是这样不同。灌婴的事迹特别繁杂，读后却不觉得琐细，史书笔法的超拔高古，从范晔以下哪里还有能窥其堂奥的呢？又如《史记·灌婴传》中记载：灌婴受诏另外统率一支军队从背后攻击楚军；又受诏统率郎中骑兵；受诏率领车骑兵追击项羽；受诏率军降服了楼烦（今山西宁武附近）以北的六个县；受诏统领燕、赵等国车骑兵；受诏率兵攻打陈 。这里共用了六次“受诏”，《汉书》里却减为三个。

薄昭 田

【原文】 周勃为人告欲反，下廷尉，逮捕，吏稍侵辱之。初，勃以诛诸吕功，益封赐金，尽以予太后弟薄昭。及系急，昭为言太后，后以语文帝，乃得释。王恢坐为将军不出击匈奴单于辎重，下廷尉，当斩。恢行千金于丞相田蚡，蚡不敢言上，而言于太后。后以蚡言告上，上竟诛恢。蚡者，王太后同母弟也。汉世母后豫闻政事，故昭、蚡凭之以招权纳贿。其史所不书者，当非一事也。神宗熙宁七年，天下大旱，帝对朝嗟叹，欲尽罢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怫然争之，帝曰：“比两宫泣下，忧京师乱起，以为更失人心。”安石曰：“两宫有言，乃向经、曹佺所为耳。”是时，安石力行新法，以为民害，向经、曹佺能献忠于母后，可谓贤戚里矣。而安石非沮之，使遇薄昭、田蚡，当如何哉？高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宣仁圣烈后临朝，宰相蔡确乞复其官，后曰：“遵裕，灵武之役，涂炭百万，得免刑诛幸矣，吾何敢顾私恩而违天下公议！”其圣如此。虽有昭、蚡百辈，何所容其奸乎？

【译文】 周勃被人告发说想谋反，被发下廷尉审问，把他逮捕，狱吏稍加凌辱。当初，周勃因诛杀吕氏诸人的功劳，增加封邑赏赐金子，他悉数拿来给了太后的弟弟薄昭。到被囚禁情况紧急，薄昭给他对太后讲情，太后就告诉了汉文帝，于是周勃得到释放。王恢因作为将军不出兵攻击匈奴单于的辎重，被发下廷尉审问，应处斩。王恢用千金贿赂丞相田蚡，田蚡不敢对皇上说，而对太后说。太后把田蚡的话告诉皇上，皇上终于杀了王恢。田蚡这人，是王太后同母异父的弟弟。汉代母后参预政事，所以薄昭、田蚡依仗她们来招权纳贿，其中史书所没有记载的，该不止一件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天下大旱灾，皇帝对着朝臣叹气，想把不好的法令全部废除。王安石忿然争论此事，皇帝说：“最近两宫太后哭了，担心京城中发生扰乱，以为更会失去人心。”王安石说：“两宫有这话，是向经、曹佺所干的事而已。”这时，王安石竭力推行新法，成为百姓的灾害，向经、曹佺能向母后进献忠言，可以说是好的外戚了，而王安石反对说他们坏话，假使遇上薄昭，田蚡，又该怎么样呢？高遵裕因西征西夏违令战败服罪，宣仁圣烈皇太后来朝，宰相蔡确请求恢复高遵裕的官职，太后说：“高遵裕在灵武战役中，使百万之众受难，得免受刑杀戮已很幸运了，我怎么敢照顾私恩而违反天下的公议呢！”她的圣明如此，虽有薄昭、田蚡辈上百人，还能实行其奸计吗？

文字结尾

【原文】 《老子·道经》“孔德之容”一章，其末云：“吾何以知众甫之然哉？以此。”盖用二字结之。《左传》：“叔孙武叔使 马正侯犯杀 宰公若藐，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剑过朝，公若必曰：谁之剑也？吾称子以告，必观之，吾伪固而授之末，则可杀也。’使如之。”《孟子》载：“齐人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必厌酒肉而后反。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妻殫其所之，乃之东郭碓间之祭者，乞其余。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此二事反复数十百语，而但以“使如之”及“今若此”各三字结之。《史记·封禅书》载武帝用方士言神祠长陵神君，李少君、谬忌、少翁、游水发根、栾大、公孙卿、史宽舒、丁公、王朔、公玉带、越人勇之之属，所言祠灶，化丹沙，求蓬莱安期生，立太一坛，作甘泉宫台室、柏梁、仙人掌，寿宫神君，斗棋小方，泰帝神鼎，云阳美光，缙氏城仙人迹，太室呼万岁，老父牵狗，白云起封中，德星出，越祠鸡卜，通天台，明堂，昆仑，建章宫，五城十二楼，凡数十事，三千言，而其末云“然其效可睹矣”。则武帝所兴为者，皆堕诞罔中，不待一二论说也。文字结尾之简妙至此。

【译文】 《老子·道经》“孔德之容”一章的末尾说：“我怎么能知道万物始初时的样子呢？以此。”只用两个字就收了尾。《左传》中说：“叔孙武叔指使登国的马正侯犯杀害登国宰相公若藐，未能成功。他的养马人说：‘我拿着剑走过朝廷，公若一定会说：‘这是谁的剑？’我就说是您的，他必定要观看，我假装同意却把剑尖递给他，就可以趁机杀了他。’（叔孙武叔）使如之（即让他按照他说的计策去办）。”《孟子》中记载：“齐国有个人有一妻一妾，共处一室，丈夫每次出门回来，都必定声称是酒足饭饱之后才返回的。妻妾问他和谁在一起吃喝，他所说的都是富贵之士。有一次，妻子偷偷看他去什么地方，竟发现自己的丈夫原来是到城东郊坟场里的祭者那里，向祭者乞求剩余的饭菜。她回家后对妾说：‘咱们的官人，是我们敬仰并寄托终身的人，今若此！’”这两件事反复有数十上百字，而仅以“使如之”和“今若此”各三字就结尾了。《史记·封禅书》中记载汉武帝采用方士的劝告祭祀长陵神，李少君、谬忌、少翁、游水发根、栾大、公孙卿、史官宽舒，丁公、王朔、公玉带、越人勇之等人，按所说祠灶，化丹沙，乞求蓬莱仙人安期生，设立太一坛，制作甘泉宫台室、柏梁、仙人掌，寿宫神君，斗棋小方，泰帝神鼎，云阳美光，缙氏城仙人迹，太室山

呼喊万岁，老人牵着狗，白云起自封中，德星出，越祠鸡卜，通天台，明堂，昆仑山，建章宫，五城十二楼，共几十件事，三千字，而结尾只是说“然其效可睹矣”。可见，汉武帝所兴所作的事，都很荒诞虚妄，不必辨析就昭然若揭。古书结尾竟是如此的简洁巧妙。

国初古文

【原文】 欧阳公书韩文后云：“予少家汉东，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尧辅颇好学。予游其家，见有敝篋贮故书在壁间，发而视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脱落颠倒无次序，因乞以归读之。是时，天下未有道韩文者，予亦方举进士，以礼部诗赋为事。后官于洛阳，而尹师鲁之徒皆在，遂相与作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补缀之。其后天下学者亦渐趋于古，韩文遂行于世。”又作《苏子美集序》云：“子美之齿少于予，而予学古文，反在其后。天圣之间，学者务以言语声偶裂以相夸尚，子美独与其兄才翁及穆参军伯长作为古歌诗杂文，时人颇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顾也。其后学者稍趋于古。独子美为于举世不为之时，可谓特立之士也。”《柳子厚集》有穆修所作《后叙》云：“予少嗜观韩、柳二家之文，柳不全见于世，韩则虽目其全，至所缺坠，亡字失句，独于集家为甚。凡用力二纪，文始几定，时天圣九年也。”予读《张景集》中《柳开行状》云：“公少诵经籍，天水赵生，老儒也，持韩愈文仅百篇授公曰：‘质而不丽，意若难晓，子详之，何如？’公一览不能舍，叹曰：‘唐有斯文哉！’因为文章直以韩为宗尚。时韩之道独行于公，遂名肩愈，字绍先。韩之道大行于今，自公始也。”又云：“公生于晋末，长于宋初，扶百世之大教，续韩、孟而助周、孔。兵部侍郎王祐得公书曰：‘子之文出于今世，真古之文章也。’”兵部尚书杨昭俭曰：“子之文章，世无如者已二百年矣。”开以开宝六年登进士第，景作行状时，咸平三年。开序韩文云：“予读先生之文，自年十七至于今，凡七年。”然则在国初开已得《昌黎集》而作古文，去穆伯长时数十年矣，苏、欧阳更出其后，而欧阳略不及之，乃以为天下未有道韩文者，何也？范文正公作《尹师鲁集序》，亦云：“五代文体薄弱，皇朝柳仲涂起而麾之。洎杨大年专事藻饰，谓古道不适于用，废而弗学者久之。师鲁与穆伯长力为古文，欧阳永叔从而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变而古。”其论最为至当。

【译文】 欧阳公（欧阳修）《书韩文后》说：“我年少时家居汉东，有家大族姓李的，他家儿子李尧辅很喜学问。我到他家玩，见到有个破箱放着旧书置

于壁角里，打开看看，得到唐代的《昌黎先生文集》六卷，文字脱落颠倒没有次序，因此要求拿回去读这书。这时，天下还没有人讲韩愈的文章，我也正在应进士考试，从事礼部所规定的诗赋写作。后来在洛阳做官，而尹师鲁等人都在那里，就一起写作古文，我就拿出所藏的《昌黎集》而加以修补编排。其后天下学文章的人也渐渐趋向古体，韩愈的文章就通行于世间。”他又作《苏子美集序》说：“苏子美（苏舜卿）的年轻比我轻，而我学做古文，反在他之后。天圣年间，学者们专想以言语声律对仗怪奇来互相夸耀崇尚，苏子美独跟他哥哥苏才翁以及参军穆伯长（穆修）写作古体诗歌杂文，当时人很有一起非议讥笑他的，而苏子美不去管这些。其后学者们稍稍趋向古体。只有苏子美在世人所不写这种文体时去写作，可以说是特异有志节的士人。”《柳子厚集》有穆修所作的《后叙》说：“我年少时喜爱阅读韩愈、柳宗元二家的文章，柳文并未在世上全部见到，韩文虽说目录是全的，至于所缺佚，丢失字和句，在各家集子中算严重的。我用了两个十二年的力气，这些文章才近于编定，时间是天圣九年（1031年）。我读《张景集》中《柳开行状》说：“柳公年少时诵读经书典籍，天水赵先生，是位老儒者，拿出韩愈文章上百篇给柳公说：‘质朴而不华丽，意思好像较难懂，你仔细读它，如何？’柳公一阅读就放不下手，叹息说：‘唐代有这样的文章啊！’因此写文章直接把韩愈作为宗师来效法。当时韩愈作文之道只在柳公那里流行，他就改名‘肩愈’，字‘绍先’。韩愈作文之道在今天大为流行，是从柳公开始的。”又说：“柳公出生于五代后晋末年，成长于宋初，扶起百代的宏大教化，继承韩愈、孟子而辅助周公、孔子。兵部侍郎王祐得到了柳公的书说：‘您的文章出于现今的世上，可真是古代的文章啊。’兵部尚书杨昭俭说：‘您的文章，世上没有可以比得上的已经二百年了’。”柳开以开宝六年（973年）中进士，张景作《行状》时，是咸平三年（1000年）。柳开为《韩愈文集》作序说：“我读先生的文章，从十七岁起直到今天，一共读了七年。”那么在本朝初年柳开已得到《昌黎集》而写作古文，距穆伯长时几十年了。苏子美、欧阳修则更在他之后，而欧阳修不提到柳开，却以为天下没有人称道韩愈文章的，为什么？范文正公（范仲淹）作《尹师鲁集序》，也说：“五代时文体浅薄纤弱，皇朝柳仲涂（柳开）起来改变它。到杨大年（杨亿）专门追求辞饰雕饰，认为古代的作文之道不适于使用，因此废弃不用了很长时间。尹师鲁（尹洙）和穆伯长努力写作古文，欧阳永叔（欧阳修）又起来振作古文，从此天下的文章一变而成为古体。”他的议论最为确当。

卷十

经传烦简

【原文】 《左传》：蔡声子谓楚子木曰：“善为国者，赏不僭而刑不滥。赏僭则惧及淫人；刑滥则惧及善人。若不幸而过，宁僭无滥，与其失善，宁其利淫。”其语本于《大禹谟》“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也。晋叔向诒郑子产书曰：“先王议事以制，诲之以忠，耸之以行，教之以务，使之以和，临之以敬，莅之以强，断之以刚，犹求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其语本于《吕刑》“惟良折狱，哲人惟刑”也。旨意则同，而经传烦简为不侔矣。

【译文】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载：蔡国的声子对楚国的令尹子木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赏赐不过分而刑罚不滥用。赏赐过分，恐怕就会及于坏人；刑罚滥用，恐怕就会及于好人。如果不幸有了不当之处，宁可赏赐过分，不可滥用刑罚。与其失去好人，倒宁可利于坏人。”这段话的根据是《尚书·大禹谟》中的两句话：“定罪一定要轻，赏功一定要重。与其杀害无辜的人，倒宁可对罪人失于惩罚。”《左传·昭公六年》又记载：晋国的叔向给郑国的执政子产写了一封信说：“先王依据制度来处理事情，对臣民百姓，要用忠诚训诫他们，根据行为奖励他们，用专业知识技艺教导他们，用平和使用他们，用严肃对待他们，用威严接触他们，用坚决的态度判断他们的罪行，还要访求聪明睿智的贤相，明察秋毫的官吏，忠实诚信的乡长，慈祥和蔼的老师。”这段话源出于《尚书·吕刑》的“判断案件一定要实事求是，制服百姓一定要用刑罚”。上述两则，经文和传文旨意相同，而详略却大不相同。

曹参不荐士

【原文】 曹参代萧何为汉相国，日夜饮酒不事事，白云：“高皇帝与何定天下，法令既明，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是则然矣，然以其时考之，承暴秦之

后，高帝创业尚浅，日不暇给，岂无一事可关心者哉？其初相齐，闻胶西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盖公为言治道贵清净而民自定。参于是避正堂以舍之，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然入相汉时，未尝引盖公为助也。齐处士东郭先生、梁石君隐居深山，蒯彻为参客，或谓彻曰：“先生之于曹相国，拾遗举过，显贤进能，二人者，世俗所不及，何不进之于相国乎？”彻以告参，参皆以为上宾。彻善齐人安其生，尝干项羽，羽不能用其策。羽欲封此两人，两人卒不受。凡此数贤，参皆不之用，若非史策失其传，则参不荐士之过多矣。

【译文】 曹参替代萧何做汉朝的相国，白天黑夜地喝酒不管政事，自己说：“高祖皇帝和萧何平定了天下，法令既已明确，只要遵守而不违失，不就可以了么？”这自然是如此，但以他那时代来考察他的行事，当时汉代紧接着暴虐的秦代之后，高帝创业日子还不长，每天应处理的事还忙不过来，难道就没有一件事可以关心的吗？曹参刚做齐国的相，听到胶西盖公善于治黄帝、老子的学说，叫人带着厚礼去请他。盖公对他讲治政的道理贵于清净而百姓自然得到安定。曹参于是自己迁出正屋来让盖公住下，他根据盖公学说去治理齐国主要就是黄帝、老子的方法。所以做了九年齐相，齐国人安居团结。但当他入京做汉朝宰相时，并没有引荐盖公做辅助。齐国有不愿做官的士人东郭先生、梁石君二人隐居深山，蒯彻是曹参的宾客，有人对蒯彻说：“你先生对于曹相国，可以辅助他缺漏举出他的过失，显扬贤良进荐材能，像东郭先生、梁石君二人这样，是世俗人所不能企及的，何不把他们推荐给曹相国呢？”蒯彻以此告诉曹参，曹参把二人都当作上宾。蒯彻和齐国人安其生友善，曾经求见项羽，项羽不能用他们的计策。项羽想封蒯彻和安其生，两个人终于不受。凡这几位贤士，曹参都没有任用，如果不是史书失传的话，那曹参不荐举士人的过失很多了。

汉初诸将官

【原文】 汉初诸将所领官，多为丞相。如韩信初拜大将军，后为左丞相击魏，又拜相国击齐。周勃以将军迁太尉，后以相国代樊哙击燕。樊哙以将军攻韩王信，迁为左丞相，以相国击燕。酈商为将军，以右丞相击陈霸，以丞相击黥布。尹恢以右丞相备守淮阳。陈涓以丞相定齐地。然《百官公卿表》皆不载，盖萧何已居相位，诸人者，未尝在朝廷，特使假其名以为重耳。后世使相之官，本诸此也。

【译文】 西汉初年诸将所戴的官衔，多为丞相，如韩信起初被拜为大将军，后来以左丞相的身份率兵攻打魏王豹，又被拜为相国（即丞相）率兵攻打齐王田广。周勃以将军升任太尉，后来又以相国的身份取代樊噲率兵攻打燕王。樊噲以将军的身份率兵攻打韩王信，后来升迁为左丞相，以相国的身份率兵攻打燕王。酈商是位将军，以右丞相的身份率兵攻打陈，以丞相的身份率兵攻打黥布。尹恢以右丞相的身份驻守淮阳（今属河南）。陈涓以丞相的身份率兵平定齐地。然而，《汉书·百官公卿表》对这些都没有记载，大概是因为当时萧何已经高高地占据着丞相的位置，上述诸将都没有在朝廷就职，皇帝只不过是让他们假借丞相的名义以示身份尊贵而已。后代的“使相”一职，就是由此发端的。

汉官名

【原文】 汉官名既古雅，故书于史者，皆可诵味。如“朝臣礧礧不可光禄勋”，“谁可以为御史大夫者”，“御史大夫言可听”，“郎中令善愧人”，“丞相议不可用”，“太尉不足与计”，“大将军尊贵诚重”，“大将军有揖客”，“京兆尹可立得”，“大夫乘私车来邪”，“天官丞日晏不来”，“谢田大夫晓大司农”，“大司马欲用是忿恨”，“后将军数画军册”，“光禄大夫、大中大夫耆艾二人以老病罢”，“驸马都尉安所受此语”之类。又如所书路中大夫、韩御史大夫、叔孙太傅、郑尚书、鲍司隶、赵将军、张廷尉，亦烨然有法。《后汉书》“执金吾击郾”，“大司马当击宛”，“大司马习用步骑”等语，尚有前史余味。

【译文】 汉代的官名非常的古朴典雅，因而从史书中所看到的，都值得诵读玩味。例如：“朝臣激烈辩论，不同意光禄勋的意见”，“谁可以为御史大夫”，“御史大夫之言可听”，“郎中令善于使人羞愧”，“丞相认为不可用”，“太尉不足与计谋”，“大将军尊贵诚重”，“大将军有揖客”，“京兆尹可立得”，“大夫乘私车来吗”，“天官丞（即吏部丞）日晏不来”，“谢田大夫告诉大司农”，“大司马将因此忿恨”，“后将军数画军册”，“光禄大夫、大中大夫耆、艾两人因年老多病被罢职”，“驸马都尉从哪儿听到这样的话”，等等。又如史书中所记的路中大夫、韩御史大夫、叔孙太傅、郑尚书、鲍司隶、赵将军、张廷尉，也写得光彩照人，极有章法。范曄的《后汉书》中有“执金吾攻郾”，“大司马应当攻打宛（今河南南阳）”，“大司马善于使用步兵和骑兵”等话，还保留有前汉史的余韵。

汉唐辅相

【原文】 前汉宰相四十五人，自萧、曹、魏、丙之外，如陈平、王陵、周勃、灌婴、张苍、申屠嘉以高帝故臣，陶青、刘舍、许昌、薛泽、庄青翟、赵周以功臣侯子孙，窦婴、田蚡、公孙贺、刘屈氂以宗戚，卫綰、李蔡以士伍，唯王陵、申屠嘉及周亚夫、王商、王嘉有刚直之节，薛宣、翟方进有材，其余皆容身保位，无所建明。至于御史大夫，名为亚相，尤录录不足数。刘向所谓御史大夫未有如硃宽者，盖以余人可称者少也。若唐宰相三百余人，自房、杜、姚、宋之外，如魏征、王珪、褚遂良、狄仁杰、魏元忠、韩休、张九龄、杨绾、崔祐甫、陆贽、杜黄裳、裴膺、李绛、李藩、裴度、崔群、韦处厚、李德裕、郑畋，皆为一时名宰，考其行事，非汉诸人可比也。

【译文】 西汉一代前后共有宰相四十五位，除了萧何、曹参、魏相、丙吉之外，像陈平、王陵、周勃、灌婴、张苍、申屠嘉等人拜相是因为他们乃高祖刘邦的老臣，陶青、刘舍、许昌、薛泽、庄青翟、赵周等人拜相是因为他们乃功臣列侯的子孙，窦婴、田蚡、公孙贺、刘屈氂等人拜相是因为他们乃皇室的外戚，卫綰、李蔡等人拜相是因为他们乃武将，只有王陵、申屠嘉及周亚夫、王商、王嘉等人有刚直的气节，薛宣、翟方进等人有才干，其他的人都明哲保身，贪恋富贵，不敢犯颜直谏，因而没有多大的建树。至于御史大夫，则尤其庸碌无为，不值一提。刘向曾说御史大夫没有像硃宽样的，大概是因为其余的御史中值得称道的太少了。唐朝的宰相前后有三百余人，除了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之外，像魏征、王珪、褚遂良、狄仁杰、魏元忠、韩休、张九龄、杨绾、崔祐甫、陆贽、杜黄裳、裴膺、李绛、李藩、裴度、崔群、韦处厚、李德裕、郑畋等人，都是一时名相，考察他们的所作所为，显然绝不是汉代诸相所能比拟的。

汉武留意郡守

【原文】 汉武帝天资高明，政自己出，故辅相之任，不甚择人，若但使之奉行文书而已。其于除用郡守，尤所留意。庄助为会稽太守，数年不闻问，赐书曰：“君厌承明之庐，怀故土，出为郡吏。间者，阔焉久不闻问。”吾丘寿王

为东郡都尉，上以寿王为都尉，不复置太守，诏赐玺书曰：“子在朕前之时，知略辐凑，及至连十余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职事并废，盗贼从横，甚不称在前时，何也？”汲黯拜淮阳太守，不受印绶，上曰：“君薄淮阳邪？吾今召君矣，顾淮阳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观此三者，则知郡国之事无细大，未尝不深知之，为长吏者常若亲临其上，又安有不尽力者乎？惜其为征伐、奢侈所移，使民间不见德泽，为可恨耳！

【译文】 汉武帝天资聪明过人，他亲自处理国家政事，一切自己说了算，因而对辅政的宰相人选，不太重视，似乎只是让他们奉行成命而已。但是，对于任用郡守一级的高级地方官员，汉武帝却十分留心。辞赋家庄助任会稽（今浙江绍兴）太守后，汉武帝数年没有得到他的问候，于是给庄助写了一封信说：“你厌倦了京师豪华的住宅，怀恋故乡绍兴的山水，因而出任会稽郡守。转眼间，我已经很久没有得到你的问讯了。”吾丘寿王任东郡（今河南濮阳西南）都尉，武帝鉴于有寿王任都尉，就未再任命郡太守，后来又写了一封盖有玺印的书信说：“你在我面前的时候，足智多谋，颇有建树，可是现在到地方上治理十几个城池，肩负着品级都是两千石的郡太守和郡都尉两项重任，却荒废了所有的政事，使得盗贼横行，民不聊生，这样的表现与在我面前时很不相称，究竟是什么缘故呢？”汲黯被任命为淮阳太守，却不接受印绶，汉武帝说：“莫非你看不起淮阳？我之所以命你前去，就是因为淮阳的官民关系很不融洽，所以特意借重你的威名，卧而治之。”从这三件事可以看出，诸侯国和郡中之事，无论大小，汉武帝都十分熟悉，做地方官的常常感到皇帝好像就在自己的面前，又怎敢不尽心尽力呢？可惜，这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帝王后来被对外征战和奢侈腐化迷住了心窍，使得老百姓看不到他的恩泽，实在是一大憾事！

苦苣菜

【原文】 吴归命侯天纪三年八月，有鬼目菜生工人黄磬家，有苣菜生工人吴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广尺八寸，下茎广五寸，两边生叶绿色。东观按图，名鬼目作芝草，苣菜作平虑草。以磬为侍芝郎，平为平虑郎，皆银印青绶。《唐·五行志》，中宗景龙二年，岐州郿县民王上宾家有苦苣菜，高三尺余，上广尺余，厚二分。说者以为草妖。予按苣菜即苦苣，今俗呼为苦磬者是也。天纪、景龙之事甚相类，归命次年亡国，中宗后二年遇害，虽事非此致，亦可谓妖矣。平虑草不知何状，扬雄《甘泉赋》“并闾”注，如淳曰：“并

间，其叶随时政，政平则平，政不平则倾也。”颜师古曰：“如氏所说自是平虑耳。”然则亦异草也。鬼目，见《尔雅》，郭璞云：“今江东有鬼目草，茎似葛，叶圆而毛如耳榘也，赤色丛生。”《广志》曰：“鬼目似梅，南人以饮酒。”《南方草木状》曰：“鬼目树，大者如木子，小者如鸭子，七月、八月熟，色黄，叶酸，以蜜煮之，滋味柔嘉，交趾诸郡有之。”《交州记》曰：“高大如木瓜而小，倾邪不周正。”《本草》曰：“鬼目，一名东方宿，一名连虫陆，名羊蹄。”

【译文】 吴归命侯（孙皓）天纪三年（279）八月，有鬼目菜生长在工人黄 家里；有莢菜生长在工人吴平家里，高四尺，厚三分，像枇杷的形状，上边宽一尺八寸，下茎宽五寸，两边生出绿色的叶子。掌管图籍的官员们按图考察，把鬼目草叫作芝草，莢菜叫作“平虑草”。于是，孙皓任黄 为“侍芝郎”，吴平为“平虑郎”，都是银印青绶。《唐书·五行志》记载，中宗景龙二年（708），岐州郿县百姓王上宾家有苦莢菜，高三尺多，上部宽一尺多，厚二分。论说的人以为是草的妖异。按：莢菜就是苦莢，现在俗称叫作“苦 ”的就是。天纪和神龙的事件很相类似，归命侯次年就亡国，中宗在此事后二年就被害死，虽然事情并非由此招致，但也可以说是妖异了。“平虑草”不知是什么形状，扬雄《甘泉赋》有“并间”，《汉书注》如淳说：“并间，它的叶子跟着当时政治变化，政局太平叶子就平，政局不太平叶子就倾邪。”颜师古说：“如淳所说的自然是‘平虑’了。”那么也是奇异的草。鬼目，见《尔雅》，郭璞注说：“现今江东有鬼目草，茎像葛，叶子圆而有毛，形如耳坠，红色丛生。”《广志》说：“鬼目像梅子，南方人用它下酒。”《南方草木状》说：“鬼目树，大的像木瓜大，小的像鸭蛋大，七月、八月成熟，颜色发黄，味酸，用蜜煮它，滋味很好，交趾各郡都有。”《交州记》说：“高大如木瓜树而果实小些，长得歪邪不园正。”《本草》说：“鬼目，一名东方宿，一名连虫陆，又名羊蹄。”

唐诸生束碬

【原文】 《唐六典》：“国子生初入，置束帛一筐、酒一壶、碬一案，为束碬之礼。太学、四门、律学、书学、算学皆如国子之法。其习经有暇者，命习隶书，并《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每旬前一日，则试其所习业。”乃知唐世士人多攻书，盖在六馆时，以为常习。其《说文》、《字林》、《苍》、《雅》诸书，亦欲责以结字合于古义，不特铨选之时，方取楷法遒美者也。束碬之礼，乃于此见之。《开元礼》载皇子束碬，束帛一筐五匹，酒一壶二斗，

碣一案三慙。皇子服学生之服，至学门外，陈三物于西南，少进曰：“某方受业于先生，敢请见。”执筐者以筐授皇子，皇子跪，奠筐，再拜，博士答再拜，皇子还避，遂进跪取筐，博士受币，皇子拜讫，乃出。其仪如此，州县学生亦然。

【译文】 《唐六典》载：“国子生始入学时，需要置办束帛（即五匹）一竹箱，酒一壶，干肉一案，这就是酬谢老师的束廩之礼。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等学生也都依照国子学的办法进行。那些在攻读经学之外还有余暇时间的学员，奉命学习隶书，以及《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等书，教师们于每旬的前一天考核学生所修的功课。”由此可知，唐代的读书人多钻研书法，大约在国子、太学、四门等六馆学习时，练习书法已是经常性的功课。教师们要求学生学习《说文》、《字林》、《三苍》、《尔雅》等书，也是为了让他们在安排字的间架结构时能够符合古义，并非只是科举考试时，才选拔楷书刚劲优美的人。束廩之礼的作用，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了。《开元礼》中记载了皇子的束廩礼，内容是：束帛一箱五匹，酒一壶二斗，干肉一案三。皇子穿着学生的服装，来到学校门外，将三样东西陈列在西南方位，然后前行几步说：“我刚刚受业于先生，现在冒昧来求见您。”于是，提箱子的人把箱子交给皇子，皇子跪下，放好箱子，拜两拜，博士也回报以两拜，皇子必须回避，随后跪着上前取箱子进献，博士接受礼物，皇子再次恭拜，然后才能退出。这就是皇子拜师的礼仪，州县学生拜师也与此相同。

范德孺帖

【原文】 范德孺有一帖，云：“纯粹忝冒固多，尤其是家兄北归，遂解倒悬之念，庆快安幸，此外何求？四月末雇舟离均，借人至邓，本待家兄之来。今家兄虽得归颖昌，而尚未闻来耗。已累遣人稟问所行路及相见之期，人尚未还，未知果能如约否。盖恐太原接人非久到此，法留半月，则须北去也。”予以其时考之，元符三年四月，德孺除知太原，是月二十一日，忠宣公自邓州分司，复故秩，许归颖昌府，则此帖当在五月间，忠宣犹未离永州也。德孺自均州守擢帅河东，至于雇舟借人以行，又云接人法留半月，过此则须北去，虽欲待其兄，亦不可得。今世为长吏，虽居蕞尔小垒，而欲送还兵士，唯意所欲。若接人之来，视其私计办否为迟速耳，未尝顾法令以自儆策。使申固要束，稍整摄之，置士大夫于无过之地，亦所以善风俗也。

【译文】 范德孺（范纯粹，范仲淹子）有一封信说：我范纯粹幸得蒙滥受

恩宠已很不少，尤其是家兄得回北方，就使我解去倒悬似的挂念，高兴地认为是大幸，此外还有什么要求？四月末雇子船离开均州，借人力送我到邓州，本想等待家兄的到来。现在家兄虽然得回颖昌，而当未听到来的音讯。已多次派人请问他走什么路及相见的时间，去的人还没回来，不知道果能如约相见否。因为恐太原来接我的人不久到这里，依法只停留半个月，我就须要向北去。”我以此信时间来考察，是元符四年（1100年）四月，范德孺被任为太原知府，这个月二十一日，忠宣公（范纯仁从邓州分司，恢复原来的官秩，允许人回颖昌府，那么这帖子应在五月间所写，范忠宣公还没有离开永州。范德孺从均州知州升任河东节度使，甚至要雇船借人来上路，又说来接的人依法只留半个月，过了这时候就回北边去，虽想等待他哥哥，也不可得。现在那些做地方官的人，虽然只在区区的小地方，但要派兵丁送他回籍。只要凭意志就可办到。如果有人来迎接，那赴任时间就得看他私事办得如何来决定快慢，从不考虑法令来警戒鞭策自己。如果能申明约束，稍稍加以整顿管理，使士大夫处于没有过错的地位，这也是改良风俗。

民不畏死

【原文】 老子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人常畏死，则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读者至此，多以为老氏好杀。夫老氏岂好杀者哉！旨意盖以戒时君、世主视民为至愚、至贱，轻尽其命，若刈草菅，使之知民情状，人人能与我为敌国，懍乎常有朽索驭六马之惧。故继之曰：“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希有不伤其手矣。”下篇又曰：“人之轻死。以其生生之厚，是以轻死。”且人情莫不欲寿，虽衰贫至骨，濒于饿隶，其与受磔而死有间矣，乌有不畏者哉？自古以来，时运礌扰，至于空天下而为盗贼，及夷考其故，乱之始生，民未尝有不靖之心也。秦、汉、隋、唐之末，土崩鱼烂，比屋可诛。然凶暴如王仙芝、黄巢，不过僥觊一官而已，使君相御之得其道，岂复有滔天之患哉！龚遂之清渤海，冯异之定关中，高仁厚之平蜀盗，王先成之说王宗侃，民情可见。世之君子，能深味老氏之训，思过半矣。

【译文】 老子说：“老百姓经常不怕死，用死来吓唬他们有什么用呢？如果真的能够使人人都怕死，那么对于极少数胆敢作奸犯科、不顾身家性命的人，我就可以把他们抓起来统统处死，这样一来，谁还敢违法取死呢？”读到这里，多数人都会认为老子是个好杀之人。实际上，老子哪里是什么好杀之人呢？他

的本意只不过是告诫那些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千万不要把老百姓视为最愚蠢、最卑贱的人，随心所欲地处死他们就如同不加思索地铲除小草一样。老子希望君主们能全面了解老百姓的真实情况，明白每一个人都可能像实力相当的敌对国家一样对自己构成严重的威胁，因而时刻提心吊胆，高度警惕，犹如用腐朽的绳索套着六匹马拉的一辆破车。所以他接着说道：“从来都是由专门负责屠宰的人来进行屠宰。代替专司屠宰的人去屠宰，就如同代替木匠砍木头。代替木匠砍木头，很少有不砍伤自己手指的。”老子在下一篇中又说道：“老百姓之所以轻率地不惜生命去冒险，是因为统治者拚命地想使自己生活得更加舒适，以致逼得百姓不惜生命去冒险。”况且希望长寿是人之常情，即使是穷困潦倒到了极点的人，其处境已与饥寒交迫的奴隶相似，但是和受戮而死仍然是大不相同的，难道会有人不害怕吗？自古以来，时运多变，甚至于普天之下的人都揭竿而起，铤而走险，可是仔细地探究事变发生的原因后就会发现，事变初起时，老百姓并没有不安份之心。秦、汉、隋、唐末期，形势犹如土崩瓦解、鱼腐肉烂，几乎家家有罪，人人可杀，可是像王仙芝、黄巢这样的“罪魁祸首”，所覬覦的也只不过是一官半职而已。如果国君和宰相御下有方，难道会造成无法收拾的局面吗？从西汉龚遂肃清渤海郡（今河北南皮北），东汉冯异平定关中地区，高仁厚镇压蜀地（今四川）农民起义，王先成劝说王宗侃等事，可以清楚地看出民情，只要能够勉强活下去，他们并不愿意犯上作乱。世上的君子（指统治者），如果能够仔细地玩味老子的这番话，就可以少犯很多错误。

天下有奇士

【原文】 天下未尝无魁奇智略之士，当乱离之际，虽一旅之聚，数城之地，必有策策知名者出其间，史传所书，尚可考也。郑燭之武、弦高从容立计，以存其国。后世至不可胜纪，在唐尤多，姑摭其小小者数人载于此。

武德初，北海贼帅蔡公顺攻郡城，为郡兵所败，后得刘兰成以为谋主，才用数十百人，出奇再奋，北海即降。海州臧君相帅众五万来争，兰成以敢死士二十人夜袭之，扫空其众。

徐圆朗据海岱，或说之曰：“有刘世彻者，才略不世出，名高东夏，若迎而奉之，天下指挥可定。”圆朗使迎之。世彻至，已有众数千，圆朗使徇谯、杞，东人素闻其名，所向皆下。

裘甫乱浙东，朝廷遣王式往讨，其党刘礪劝甫引兵取越，凭城郭，据府库，

循浙江筑垒以拒之，得间则长驱进取浙西，过大江，掠扬州，还修石头城而守之，宣歙、江西必有响应者，别以万人循海而南，袭取福、建，则国家贡赋之地，尽入于我矣。甫不能用。

高骈之将毕师铎攻骈，乞师于宣州秦彦，彦兵至，遂下扬州。师铎遣使趣彦过江，将奉以为主。或说之曰：“仆射顺众心为一方去害，宜复奉高公而佐之，总其兵权，谁敢不服？且秦司空如今已为朝奉郎，但还没有脱去旧职。”蔡京问道：“用什么官来安置他？”蔡卞说：“须要给他一个提学。”蔡京拿过一张纸，写了他的姓名及提举学事几个字，空下了他所分的路名，回头看着蔡卞说：“要什么地方？”蔡卞说：“他家里极穷，非得俸禄收入优厚的地方不可。”于是又写了“河北西路”几个字，交付给老兵拿了出去。一会儿另有一兵带着一封书信及紫色匣子走进来，乃是福建转运判官直龙图阁郑可的书信，以新茶献上，蔡京马上就在郑可书信的空隙处写上“秘撰运副”（秘阁修撰充转运副使）四个字交给他。这时蔡卞才说到吴说，他介绍说：“他是安中司谏的儿子，颇能自立。而且是王逢原的外孙，和舒王（王安石）夫人是姻亲，他的母亲年老，想求得一个现缺的省局官员。”蔡京问道：“吴曾经寻访得有空缺的吗？”回答说：“打套局刚好有缺。”蔡京又写了一纸交付出去。过了一会儿，蔡卞用眼看了一下吴说，让他先出去。吴说的本家姊姊嫁给门下侍郎薛昂，因此吴说住在他家里，才回到住处，就详细地告诉了薛昂，并感叹所见开具任免名单的迅速。薛昂说：“这三个人已经按着次序写在黄纸上准备下诏了。”这才知道杨国忠还是第二等。

题先圣庙诗

【原文】 兖州先圣庙壁，尝有题诗者云：“灵光殿古生秋草，曲阜城荒散晚鸦。惟有孔林残照日，至今犹属仲尼家。”不显姓名，颇为士大夫传诵。予顷在福州，于吕虚己处，见邵武上官校书诗一册，内一篇题为《州西行》，州西者，蔡京所居处也。注云：“靖康元年作。时京谪湖湘，子孙分窜外郡，所居第摧毁，索寞殆无人迹，故为古调以伤之。”凡三十余韵，今但记其末联云：“君不见乔木参天独乐园，至今仍是温公宅。”其意甚与前相类。绍兴二十五年冬，秦桧死，空其赐宅，明年，开河，役夫犍泥土堆于墙下。天台士人左君作诗曰：“格天阁在人何在？偃月堂深恨亦深。不见洛阳图白发，但知鄱坞积黄金。直言动便遭罗织，举目宁知有照临。炙手附炎俱不见，可怜泥滓满墙阴。”语虽纪实，然太露筋骨，不若前两章浑成也。左颇有才，最善谗，二十八年，杨和王之子被，除

权工部侍郎，时张循王之子子颜、子正，皆带集英修撰，且进待制矣。会叶审言自侍御史、杨元老自给事中，徙为吏、兵侍郎，盖以缴论之故。左用歇后语作绝句曰：“木易已为工部侍，弓长肯作集英修。如今台省无杨、叶，豚犬超升卒未休。”左居西湖上，好事请谒，人或畏其口，后竟终于布衣。

【译文】 兖州先圣庙的墙壁上，曾经有人题诗说：“灵光殿古生秋草，曲阜城荒散晚鸦。惟有孔林残照日，至今犹属仲尼家。”这首诗的作者没有署其姓名，却为文人士大夫所传诵。我不久前在福州的吕虚己家里，见到有邵武人上官校书的一本诗，其中有一篇题目是《州西行》，所谓州西，就是蔡京居住的地方。在这里作者自注说：“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作。此时蔡京被贬到湖湘，子孙分别逃窜到外郡，他原来居住的房子被拆毁，冷冷清清，无人问津，所以写一首古调抒发哀伤之情。”这首诗共有三十多韵，如今只记得最后一联是：“君不见乔木参天独乐园，至今仍是温公宅。”其表达的意思和前面的那首诗很相似。高宗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冬天，秦桧死去，他住的地方变成了空宅，第二年挖河时，民工把泥土用车子推到秦宅墙下。天台文人左君为此作诗说：“格天阁在人何在？偃月堂深恨亦深。不见洛阳图白发，但知鄜坞积黄金。直言动便遭罗织，举目宁知有照临。炙手附炎俱不见，可怜泥滓满墙阴。”语言虽然侧重纪实，但太露骨，不如前面提到的两首寓意深刻。左君颇有才气，最擅长戏谑，绍兴二十八年（1258年），杨存中的儿子杨惕，被提拔为权工部侍郎，这时循王张俊的儿子张子颜、张子正，都带集英修撰的头衔，而且进升为待制。正好叶审言从侍御史、杨元老从给事中，升迁为吏部和兵部侍郎，大盖都是由于被非议的缘故。左君用歇后语作了一首绝句：“木易已为工部侍，弓长肯作集英修。如今台省无杨叶，豚犬超升卒未休。”左君居住在西湖上，好事者请他谒见，有人畏惧他的言辞，其人竟终生都是平民布衣。

季文子魏献子

【原文】 拟人必于其伦，后世之说也，古人则不然。鲁季文子出一莒仆，而历引舜举十六相去四凶，曰：“舜有大功二十而为天子，今行父虽未获一吉人，去一凶矣，于舜之功二十之一也。”晋魏献子为政，以其子戊为梗阳大夫，谓成昵曰：“吾与戊也，县人其以我为党乎？”昵诵《大雅》文王克明克类、克长克君、克顺克比、比于文王之句，而以为九德不愆。勤施无私曰类，择善而从之曰比。言：“主之举也，近文德矣。”且季孙行父之视舜，魏舒之视文王，何啻

天壤之不侔！而行父以自比，舒受人之谏不以为嫌，乃知孟子所谓：“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非过论也。

【译文】 与人相比一定要有可以比的地方，这是后代人的说法，古代人则不然。鲁国的季文子季孙行父除掉一个为害的莒地仆人，就引舜举荐十六相而除去四凶，他说：“舜立了二十件大功而当了天子，而今我行父虽然没有获得一为节度使，庐州、寿州其肯为之下乎？切恐功名成败未可知也。不若亟止秦司空勿使过江，彼若粗识安危，必未敢轻进，就使他日责我以负约，犹不失为高氏忠臣也。”师铎不以为然，明日，以告郑汉章，汉章曰：“此智士也。”求之，弗获。

王建镇成都，攻杨晟于彭州，久不下，民皆窜匿山谷，诸寨日出抄掠之。王先成往说其将王宗侃曰：“民入山谷，以俟招安，今乃从而掠之，与盗贼无异。旦出淘虏，薄暮乃返，曾无守备之意，万一城中有智者为之画策，使乘虚奔突，先伏精兵于门内，望淘虏者稍远，出弓弩手炮各百人，攻寨之一面，又于三面各出耀兵，诸寨咸自备御，无暇相救，如此能无败乎？”宗侃矍然。先成为条列七事为状，以白王建，建即施行之。榜至三日，山中之民，竞出如归市，浸还故业。

观此五者，则其他姓名不传，与草木俱腐者，盖不可胜计矣。

【译文】 天下不曾缺乏具有雄才大略的智识之士，每当社会动荡不安之时，即使只有数百人聚在一起，或者在只有数城之地的范围内，也必定会涌现出能够出奇谋划异策的高人，这从史书的记载中可以很容易地得到证明。比如在先秦时期，郑国的烛之武和弦高，沉着冷静地定计，最终保全了自己的国家。后代的此类事例举不胜举，在唐朝尤其多，这里姑且选几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为例。

唐高祖武德初年，北海（今山东益都）郡义军首领蔡公顺到处攻城掠地，在攻打郡城时却被郡兵击败，后来得到刘兰成作为谋士，仅用了数千人，出奇兵抖擞精神再战，北海郡很快便宣布投降。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西南）的臧君相率领五万人马来争夺北海，刘兰成派遣二十名敢死队员趁夜色发动突然袭击，一举将猝不及防的敌军打得落花流水。臧君相的人马连夜四散逃去。

徐圆朗占据今山东、江苏一带，有人劝告他说：“有个名叫刘世彻的人，才智超群，世所罕见，在东部地区声名卓著，如果能把 he 请出来并且奉之为主，那么天下就可以唾手而得。”徐圆朗接受了建议，马上派人去迎请刘世彻。当刘世彻到来时，帐下已有数千名愿意听从号令的人。徐圆朗派他去攻取讷（今安徽亳县）、杞（今河南杞县）一带，由于东方的人早就听说过他的大名，因而刘世

彻所到之处，无不望风披靡。

裘甫在浙东地区起事，朝廷派遣王式前去讨伐。裘甫的副手刘 劝他率兵攻取越（今浙江绍兴一带）州，凭借越州高大的城墙，利用那里充实的仓库，并且沿浙江构筑防御工事以抵抗官军，如果有机会就长驱直入，进取浙西，渡过长江，占领扬州，然后掉回头整修、加固石头城（今江苏南京）的防御设施，准备坚守。在这种形势下，宣州（今安徽宣城）、歙州（今安徽歙县）一带及江西一带必定有人起来响应，我们再分出一万人马沿海南下，袭取福州和建州（今属福建）一带，这样，国家财赋的主要供应地，就全部归入咱们的版图了。然而，裘甫拒不接受刘 的计策。

高骈的部将毕师铎反叛攻击高骈，向宣州秦彦要求派兵支援，秦彦的兵到了，就攻下扬州。毕师铎派使者催促秦彦过长江，将要奉他作主将。有人说服毕师铎说：“仆射您顺从众人的心情为一方除去祸害，应该重新奉高骈为主而帮助他，总管他的兵权，谁敢不服从您？而且秦司空（秦彦）作节度使，庐州、寿州的将领难道肯做他下级吗？实在怕功名成败不可预料。不如赶快阻止秦司空不要叫他过江，他如果稍知安危之计，一定不敢轻易前进，即使他将来责备我们背弃约定，还不失是高氏的忠臣。”毕师铎不以为然，明天，他告诉郑汉章，郑汉章说：“这是个智谋之士。”再访求他，已找不到了。

王建镇守成都，进攻杨晟于彭州，久攻不下，百姓都逃藏在山谷中，各营寨每天出兵去抄掠百姓。王先成去说服王建的部将王宗侃说：“百姓进入山谷，等待招安他们，现在却出兵去抄掠他们，这行径就和盗贼没有差别了。白天出去抄略抓人，天晚才回来，毫无守御防备的意思，万一城里有智谋的人给杨晟出主意，叫他乘虚突击，先埋伏精兵于城门内，看出去掳掠的人走得稍远时，派出弓弩手和投石机手兵士各一百人，进攻营寨的一面，又在三面各派兵显示威力，各营寨都各自抵御防备，没有时间相救援，这样能不战败吗？”王宗侃吃惊地感悟。王先成给他陈述七件事作为启状，用以告诉王建，王建就加以实施。榜示贴出三天，山中的百姓，争着像赶集一样出来，渐渐地回到各自的家园产业中去。

看了这五个人的记载，那么其他姓名没有传下来，和草木一起腐烂的人，大约是不可胜数的了。

易卦四德

【原文】 《易》元、亨、利、贞，谓之四德，唯《乾》、《坤》为能尽之。若《屯》、《随》二卦，但大亨贞。《临》、《无妄》、《革》三卦，皆大亨以正而已。有亨、利、贞者十一，《蒙》、《同人》、《离》、《咸》、《兑》、《恒》、《遁》、《萃》、《涣》、《小过》、《既济》也。元、亨、利者一，《蛊》也。利、贞者八，《大畜》、《大壮》、《明夷》、《家人》、《中孚》、《蹇》、《损》、《渐》也。亨、贞者三，《需》、《困》、《旅》也。元、亨者三，《大有》、《升》、《鼎》也。亨、利者五，《贲》、《复》、《大过》、《巽》、《噬嗑》也。亨者九，《小畜》、《履》、《泰》、《谦》、《节》、《坎》、《震》、《丰》、《未济》也。利者五，《讼》、《豫》、《解》、《益》、《噬》也。贞者四，《师》、《比》、《否》、《颐》也。唯八卦皆无之，《观》、《剥》、《晋》、《睽》、《睺》、《归妹》、《井》、《艮》也。若以卦象索之，如《剥》、《睽》、《睺》犹可强为之辞，他则不复容拟议矣。

【译文】 在《周易》中，元、亨、利、贞被称为“四德”，这只有《乾》、《坤》二卦能够占全。像《屯》、《随》二卦，只是大亨贞而已。《临》、《无妄》、《革》三卦，都是大亨以正而已。占有亨、利、贞三德的有十一卦，即：《蒙》、《同人》、《离》、《咸》、《兑》、《恒》、《遁》、《萃》、《涣》、《小过》、《既济》。具有元、亨、利三德的只有一卦，即《蛊》。具有利、贞二德的有八卦，即：《大畜》、《大壮》、《明夷》、《家人》、《中孚》、《蹇》、《损》、《渐》。具有亨、贞二德的有三卦，即《需》、《困》、《旅》。具有元、亨二德的有三卦，即：《大有》、《升》、《鼎》。具有亨、利二德的有五卦，即：《贲》、《复》、《大过》、《巽》、《噬嗑》。唯有亨德的有九卦，即：《小畜》、《履》、《泰》、《谦》、《节》、《坎》、《震》、《丰》、《未济》。只有利德的有五卦，即：《讼》、《豫》、《解》、《益》、《睺》。只有贞德的有四卦，即：《师》、《比》、《否》、《颐》。连一德也不具备的仅有八卦，即：《观》、《剥》、《晋》、《睽》、《睺》、《归妹》、《井》、《艮》。如果从卦象上探究，《剥》、《睽》、《睺》三卦尚可勉强与四德扯上关系，至于其他五卦就毫无可能了。

孙坚起兵

【原文】 董卓盗国柄，天下共兴义兵讨之，惟孙坚以长沙太守先至，为卓所惮，独为有功。故裴松之谓其最有忠烈之称。然长沙为荆州属郡，受督于刺史王琬。琬先与坚共击零、桂贼，以坚武官，言颇轻之。及琬举兵欲讨卓，坚乃承案行使者，诈檄杀之，以偿曩忿。南阳太守张咨，邻郡二千石也，以军资不具之故，又收斩之。是以区区一郡将，乘一时兵威，辄害方伯、邻守，岂得为勤王乎？刘表在荆州，乃心王室，袁术志于逆乱，坚乃奉其命而攻之，自速其死，皆可议也。

【译文】 东汉末年，董卓窃取了国家军政大权，全国各地纷纷起兵讨伐他，其中只有孙坚以长沙太守的身份率兵先于众人赶到，为董卓所忌惮，从而为国家立下了功勋。所以，《三国志注》的作者裴松之称赞他最有忠烈之心。然而，长沙是荆州的属郡，理应接受刺史王琬的指挥。王琬先前曾与孙坚一同镇压零陵（今湖南永州）、桂阳（今湖南汝城）一带的农民起义军，他认为孙坚只是一介武夫而已，因而在言语上对他颇为轻视，孙坚怀恨在心。及至王琬举兵准备讨伐董卓时，孙坚便假托案行使者的手令，用巧计将他杀死，以泄旧愤。南阳太守张咨，乃是邻郡的二千石官，因为没有及时为他供应足够的军用物资，结果竟被孙坚斩首示众。孙坚身为一名小小的郡将，凭着一时的兵威，竟动不动就杀害最高地方长官和邻郡的太守，这难道能够称得上是勤王吗？荆州牧刘表对皇室忠心耿耿，而淮南的袁术则一心想犯上作乱，孙坚却奉袁术之命前去攻打刘表，结果被刘表部将黄祖射死，真是自取灭亡。所有这些，都是孙坚一生中值得深入探讨的不光彩经历。

孙权封兄策

【原文】 孙权即帝位，追尊兄策为长沙王，封其子为吴侯。按孙氏奄有江、汉，皆策之功，权特承之耳，而报之之礼不相宜称。故陈寿评云：“割据江东，策之基兆也，而权尊崇未至，子止侯爵，于义俭矣。”而孙盛乃云：“权远思盈虚之数，正本定名，防微于未兆，可谓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其说迂谬如此。汉室中兴，出于伯升，光武感其功业之不终，建武二年，首封其二子为王，

而帝子之封，乃在一年之后。司马昭继兄师秉魏政，以次子攸为师后，常云：“天下者景王之天下。”欲以大业归攸。以孙权视之，不可同日论也。

【译文】 孙权登上皇帝之位，追封他哥哥孙策为长沙王，封孙策之子为吴侯。按孙氏的占有江汉，都是孙策的功劳，孙权只是继承他而已。而孙权报答他的礼数不适当不相称。所以陈寿评论说：“割据江东，是孙策创立的基业，而孙权对他的追尊不够，孙策之子只封侯爵，在道义上太欠缺了。”而孙盛却说：“孙权为久远计考虑了事情盛衰的气数，端正根本以定名位，预防隐微之事于出现之先，可以说没有出事之前已作准备，没有动乱之前已作治理。”他的说法迂腐荒谬至此。汉朝中兴，出于刘伯升（刘 ），光武思念他功业的没有完成，在建武二年（26 年），首先封他的两个儿子为王，而皇帝的儿子受封，却在一年之后。司马昭继承哥哥司马师掌握魏国政权，把次子司马攸作司马师的后嗣，常说：“天下是景王（司马师）的天下。”想把天下大业交给司马攸。以此来看孙权，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逾年改元

【原文】 自汉武帝建元纪年之后，嗣君绍统，必逾年乃改元。虽安帝继殇帝，亦终延平而为永初。桓帝继质帝，亦终本初而为建和。唐宣宗以叔继侄，亦终会昌六年，而改大中。独本朝太祖以开宝九年十月二十日上仙，太宗嗣位，是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改为太平兴国元年，去新岁才八日耳。意当时星辰历象考卜兆祥，必有其说，而国史传记皆失传。窃计岭、蜀之远，制书到时已是二年之春。是时，宰相薛居正、沈伦、卢多逊失于不考引故实，致行之弗审，使人君即位而无元年，尤为不可也。若唐顺宗以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嗣位，至八月辛丑，改元永贞。盖已称太上皇，嫌于独无纪年，故亟更之耳。刘禅、孙亮、石宏、苻生、李暉未逾年而改，此不足责。晋惠帝改武帝太熙为永熙，而以为欲长奉先皇之制，亦非也。唐中宗仍武后神龙，梁末帝追承太祖乾化，孟昶仍父孟知祥明德，汉刘知远追用晋天福，隐帝仍父乾盭，周世宗仍太祖显德，皆非礼之正，无足议者。唐哀帝仍昭宗天盭，盖畏朱温而不敢云。

【译文】 自从汉武帝使用“建元”的年号纪年（此为追定之年号，年号真正开始使用是在 25 年之后）后，后世继承君位的人登基后必定要等到次年才改新元。就连汉安帝继承年仅一岁就夭折的殇帝，也是等到延平元年结束之后才改为永初元年。汉桓帝继承质帝，也是等到本初元年过完之后才改为建和元年。

唐宣宗以皇太叔的身份继承侄儿的帝位，也是等到会昌六年结束后才改为大中元年。只是本朝太祖皇帝于开宝九年十月二十日仙逝，太宗皇帝继位，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改元为太平兴国元年，此时距新的一年仅仅只有八天。估计当时必定有人观测天象，推算历法，占卜祥瑞，证明此举确有道理，只是史书中都缺乏记载而已。我计算了一下岭南和巴蜀地区距离京师的遥远里程，当朝廷关于改元的诏书到达时，这里已是太平兴国二年的春天。当时的宰相薛居正、沈伦、卢多逊失于不仔细地查考已有的先例，以致轻率地进行改元，使得新君继位后竟无元年，实在是太不象话了。唐顺宗李诵于贞元二十一年正月继位，到八月辛丑日改元为永贞。这大概是因为顺宗此时已经被迫退位，改称太上皇，他对唯有自己没有年号感到十分遗憾，所以急忙更改年号。刘禅、孙亮、石宏、荷生、李 等人继位后未到次年就改元，这对于这类人来说，也没有什么值得大加指责的。晋惠帝继位的当年，把武帝司马炎的年号“太熙”改为永熙，并认为此举乃是要长奉先皇之制，这实际上也是很不可取的。唐中宗沿用武则天的年号“神龙”，梁末帝追承太祖的年号“乾化”，孟昶沿用父亲孟知祥的年号“明德”，后汉刘知远追承晋高祖石敬瑭的年号“天福”，后汉隐帝沿用父亲的年号“乾蠡”，后周世宗柴荣沿用太祖的年号“显德”，所有这些都不符合正统的礼仪，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唐哀帝沿用昭宗的年号“天蠡”，大概是因为畏惧朱温不敢更改年号。

贼臣迁都

【原文】 自汉以来，贼臣窃国命，将欲移鼎，必先迁都以自便。董卓以山东兵起，谋徙都长安，驱民数百万口，更相蹈藉，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鸡犬。高欢自洛阳迁魏于邺，四十万户狼狈就道。朱全忠自长安迁唐于洛，驱徙士民，毁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长安自是丘墟。卓不旋踵而死，曹操迎天子都许，卒覆刘氏。魏、唐之祚，竟为高、朱所倾。凶盗设心积虑，由来一揆也。

【译文】 自从汉朝以后，奸臣们窃取国家政权、准备改朝换代时，必定要先行迁都以避开敌对势力，以便更有把握地实现自己的狼子野心。董卓看到东部各州都纷纷起兵讨伐自己，于是决定把东汉的都城从洛阳迁到长安（今陕西西安）。一时间，数百万居民被驱起程入关，沿路之上，人马相杂，相互践踏，死亡无数。董卓把洛阳的宫庙、官府、居家全部付之一炬，以致二百里内屋室

荡尽，无有人烟。高欢把东魏的都城从洛阳迁到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令下三日即动身，四十万户居民匆忙上路。朱全忠（即朱温）把唐朝的都城从长安迁到洛阳，强迫士民上路东迁，并且拆毁了长安的宫殿、百官衙门以及居民的房屋，长安因此成为一片废墟。董卓迁都后不久就被杀死，曹操迎汉献帝建都许昌，最终覆灭了刘氏的江山。东魏和唐朝的政权，最终也被高氏父子和朱全忠所倾覆。凶恶的奸贼处心积虑地要达到自己的个人目的，为此可以不顾一切，自古就是这样。

舆地道里误

【原文】 古今舆地图志所记某州至某州若干里，多有差误。偶阅元璽《九域志》，姑以吾乡饶州证之，饶西至洪州三百八十里，而《志》云：“西至州界一百七十里，自界首至洪五百六十八里。”于洪州书至饶，又衍二十里，是为七百六十里也。饶至信州三百七十里，而《志》云：“东南至本州界二百九十里，自界首至信州三百五十里。”是为六百四十里也。饶至池州四百八十里，而《志》云：“北至州界一百九十里，自界首至池州三百八十里。”是为五百七十里也。唐贾耽《皇华四达记》所纪中都至外国，尤为详备，其书虔州西南一百十里至潭口驿，又百里至南康县。然今虔至潭口才四十里，又五十里即至南康，比之所载不及半也。以所经行处验之，知其他不然者多矣。

【译文】 古今关于地理的图志中所记某州到某州有多少里路，数目常有错误。偶然阅读元璽《九域志》姑且以我家饶州来论证此事。饶州向西到洪州共三百八十里，而《志》说：“向西到州界一百七十里，从州界开始处到洪州五百六十八里。”在记洪州的部分说到饶州的路程，又多出了二十里，这样就成了七百六十里。饶州到信州三百七十里，而《志》说：“向东南到本州界二百九十里，从信州边界开始处到信州三百五十里。”这就是六百四十里了。饶州到池州四百八十里，而《志》说：“向北至州界一百九十里，从池州边界开始处到池州三百八十里。”这就成为五百七十里了。唐朝贾耽《皇华四达记》所纪中国都城到外国的道里数，更为详细完备。其中记虔州向西南行一百十里到潭口驿，又经一百里到南康县。但现在从虔州到潭口只有四十里，又行五十里就到南康，此所记载的数目还不到一半。以所经过处来加以检验，知道其中记载不实的多了。

卷十一

孙玉汝

【原文】 韩庄敏公缜字玉汝，盖取君子以玉比德，缜密以栗，及王欲玉汝之义，前人未尝用，最为古雅。按唐《登科记》，会昌四年及第进士有孙玉汝。李景让为御史大夫，劾罢侍御史孙玉汝。会稽《大庆寺碑》，咸通十一年所立，云衢州刺史孙玉汝记。荣王宗绰书目，有《南北史选练》十八卷，云孙玉汝撰。盖其人也。

【译文】 韩缜（谥庄敏）字玉汝，大概是取君子以玉比德，缜密坚实，以及王欲玉汝（即以汝为玉）之意，前人未曾用过，最古雅不过了。按：唐代的《登科记》记载，在唐武宗会昌四年（844年）及第的进士中有个名叫孙玉汝的。李景让担任御史大夫时，曾劾免了侍御史孙玉汝。会稽（治今浙江绍兴）的《大庆寺碑》是唐懿宗咸通十一年（870年）所立，碑文的落款是衢州刺史孙玉汝撰。荣王李宗绰的书目中有《南北史选练》十八卷，说是孙玉汝所撰。所有这些地方出现的孙玉汝，大约是一个人。

唐人避讳

【原文】 唐人避家讳甚严，固有出于礼律之外者。李贺应进士举，忌之者斥其父名晋肃，以晋与进字同音，贺遂不敢试。韩文公作《讳辩》，论之至切，不能解众惑也。《旧唐史》至谓韩公此文，为文章之纰缪者，则一时横议可知矣。杜子美有《送李二十九弟晋肃入蜀》诗，盖其人云。裴德融讳“皋”，高锴以礼部侍郎典贡举，德融入试，锴曰：“伊讳‘皋’，向某下就试，与及第，困一生事。”后除屯田员外郎，与同除郎官一人，同参右丞卢简求。到宅，卢先屈前一人入，前人启云：“某与新除屯田裴员外同祇候。”卢使驱使官传语曰：“员外是何人下及第？偶有事，不得奉见。”裴苍遽出门去。观此事，尤为乖刺。锴、简求皆当世名流，而所见如此。《语林》载崔殷梦知举，吏部尚书归仁晦托弟仁泽，

殷梦唯唯而已。无何，仁晦复诣托之，至于三四。殷梦敛色端笏，曰：“某见进表让此官矣。”仁晦始悟己姓，殷梦讳也。按《宰相世系表》，其父名龟从，此又与高相类。且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父名皋，子不得于主司姓高下登科，父名龟从，子不列姓归人于科籍，揆之礼律，果安在哉？后唐天成初，卢文纪为工部尚书，新除郎中于邺公参，文纪以父名嗣业，与同音，竟不见。邺忧畏太过，一夕雉经于室。文纪坐谪石州司马。此又可怪也。

【译文】 唐朝人避家讳是非常严格的，有的甚至已经远远超出了礼律的范畴。才华横溢的诗人李贺考进士时，嫉贤妒能的人指责他不避父亲晋肃的名讳，因为“晋”与“进”同音，李贺于是不敢参加考试。韩文公（即韩愈）曾写了一篇《讳辩》，情真意切地深刻论述这个问题，却无法把鬼迷心窍的众人说服。《旧唐书》甚至说韩愈的文章是一篇错误的文章。由此可以想见，当时社会舆论对韩愈是一片反驳、责难之声。杜甫（字子美）的《送李二十九弟晋肃入蜀》诗，大概写的就是李贺的父亲。裴德融因父亲名叫“皋”而讳此字，当高锴以礼部侍郎的身份主持科举考试时，裴德融正巧参加了考试，高锴说：“他讳‘皋’字，又在我主持时参加考试，如果考取了，终生都要因此受困。”裴德融后来被委任为屯田员外郎，便与另一位新受命的郎官一起去拜见右丞卢简求。到达卢府门前，卢简求让裴的同伴先进见，那人禀告说：“我与刚刚被委任为屯田的裴员外一起敬候您的接见。”卢简求命驱使官到门口传话说：“员外是何人门下考中的？右丞大人凑巧有急事要办，无法接见。”裴德融知道右丞对自己不避父讳感到不满，慌忙出门而去。我觉得，这件事实在是荒唐之极。高锴和卢简求都是当时的名流，而思想却如此迂腐。《语林》记载：崔殷梦主持科举考试时，吏部尚书归仁晦托他关照自己的弟弟归仁泽，崔殷梦只是恭敬地含糊其词，不置可否。不久，归仁晦又去找崔殷梦相托，前后达三、四次。崔殷梦于是神情庄重地拿出笏板说：“我现在就上表请求辞去此职。”归仁晦这时才醒悟过来，原来自己的姓正是崔殷梦的家讳。查考《宰相世系表》可知，崔殷梦的父亲名叫龟从，“龟”字与“归”字同音，这与“高”、“皋”同音的情形是一样的。父亲名叫晋肃，儿子就不能考进士；父亲名叫皋，儿子不能在姓高的主考官下登科；父亲名叫龟从，儿子主持科举就不能录取姓归的人，这种规矩，从礼律上看，道理何在呢？后唐明宗天成初年，卢文纪任工部尚书，新任命的郎中于邺参与处理公务，卢文纪因为父亲名叫嗣业，与于邺的名同音，所以始终不愿看到于邺。于邺忧惧过头，竟在一天夜里自缢身亡于家中。结果，卢文纪也因此被贬为石州（今山西离石）司马。这实在是一件更加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咄咄怪事。

高锴取士

【原文】 高锴为礼部侍郎，知贡举，阅三岁，颇得才实。始，岁取四十人，才益少，诏减十人犹不能满。此《新唐书》所载也。按《登科记》，开成元年，中书门下奏：“进士元额二十五人，请加至四十人。”奉敕依奏。是年及二年、三年，锴在礼部，每举所放，各四十人。至四年，始令每年放三十人为定，则《唐书》所云误矣。《摭言》载锴第一榜裴思谦以仇士良关节取状头，锴庭谴之。思谦回顾厉声曰：“明年打脊取状头。”第二年，锴知举，诫门下不得受书题。思谦自携士良一缄入贡院，既而易紫衣趋至阶下，白曰：“军容有状荐裴思谦秀才。”锴接之，书中与求巍峨。锴曰：“状元已有人，此外可副军容意旨。”思谦曰：“卑吏奉军容处分：‘裴秀才非状元请侍郎不放。’”锴俯首良久，曰：“然则略要见裴学士。”思谦曰：“卑吏便是也。”锴不得已，遂从之。思谦及第后宿平康里，赋诗云：“银盃斜背解明砖，小语低声贺玉郎。从此不知兰麝贵，夜来新惹桂枝香。”然则思谦亦疏俊不羁之士耳。锴徇凶砖之意，以为举首，史谓颇得才，实恐未尽然。先是，大和三年，锴为考功员外郎，取士有不当，监察御史姚中立奏停考功别头试，六年，侍郎贾礪又奏复之，事见《选举志》。

【译文】 高锴任礼部侍郎，掌管科举考试，过了三年，很能得到一些有才能实学的人。开始时，一年取四十人，人才越来越少，诏书叫减十个还不能满额。这是《新唐书》所记载的。按：《登科记》，天成元年（836年），中书、门下二省上奏说：“进士原定名额二十五人，请求加到四十人。”奉敕书依照所奏的办。这年和二年（837年）、三年（838年），高锴在礼部，每科所发放名单，各为四十人。到开成四年（839年），才命令每年发放三十人为定额，那么《唐书》所说的是错了。《摭言》记载高锴发放第一榜的裴思谦因仇士良通关节取得第一名，高锴当众谴责他。裴思谦回顾他厉声说：“明年打我脊梁也要取得第一名。”第二年，高锴掌管科举，告诫门下的人不许接受请托的书信。裴思谦自己携带仇士良一封信进入贡院，接着换穿紫色走向陛下，向上报告说：“军容使（仇士良）有状子荐举裴思谦秀才。”高锴接了信，书信中要求录取在前列。高锴说：“状元已经有人了，此外可以照军容使意旨办。”裴思谦说：“我小吏奉军容使的决定：裴秀才若不是状元就请你侍郎不要放榜。”高锴低头沉思好久，说：“那么要见一下裴学士。”裴思谦说：“我小吏便是。”高锴不得已，就只好听从了他。裴思谦中举后住宿在平康里，作诗说：“银 斜背解明 ，小语低声贺玉

郎。从此不知兰麝贵，夜来新惹桂枝香”（斜背着银灯脱下明亮的耳坠，暗暗地低声祝贺情郎。从此以后不知道兰花麝香的高贵，夜来沾染了攀折桂枝的香气）。那么裴思谦也是个有才能而放纵的士人。高锴听从凶恶的太监的意旨，举他为状元，史书说他很得人才，实在怕未必尽然。在此前，大和三年（829年），高锴做考功员外郎，取士有不适当的，监察御史姚中立奏请停止考功另作考试，六年（832年），侍郎贾锴又奏请恢复考功另外主持考试，事见《选举志》。

兵部名存

【原文】 唐因隋制，尚书置六曹。吏部、兵部分掌铨选，文属吏部，武属兵部。自三品以上官册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敕授，皆委尚书省奏拟。两部各列三铨：曰尚书铨，尚书主之；曰东铨，曰西铨，侍郎二人主之。吏居左，兵居右，是为前行。故兵部班级在户、刑、礼之上。睿宗初政，以宋璟为吏部尚书，李 、卢从愿为侍郎；姚元之为兵部尚书，陆象先、卢怀慎为侍郎。六人皆名臣，二选称治。其后用人不能悉得贤，然兵部为甚。其变而为三班流外铨，不知自何时。元丰官制行，一切更改，凡选事，无论文武，悉以付吏部。苏东坡当元 中拜兵书，谢表云：“恭惟先帝复六卿之名，本欲后人识三代之旧，古今殊制，闲剧异宜，武选隶于天官，兵政总于枢辅，故司马之职，独省文书。”盖纪其实也。今本曹所掌，惟诸州厢军名籍，及每大礼，则书写蕃官加恩告。虽有所辖司局，如金吾街仗司、骐驎车辂象院、法物库、仪鸾司，不过每季郎官一往耳。名存实亡，一至于此！

【译文】 唐朝继承隋代的制度，尚书设置六个部门。吏部、兵部分掌官员的任用选拔，文官归吏部，武官归兵部。从三品以上官用册授，五品以上用制授，六品以下用敕授，都是尚书主管这些事。又有称东铨、西铨的，由侍郎二人主管这事。吏部在左边，兵部在右边，这是“前行”（行班的前列）。所以兵部的班级在户、刑、礼等部之上。唐睿宗刚即位，用宋 做吏部尚书，李 、卢从愿做侍郎；姚元之（姚崇）做兵部尚书，陆象光、卢怀慎为侍郎。六人都是名臣，文武二种官员的选拔号称公正。其后用人不能都很贤明，但兵部更为严重。其变成为三班流外铨，不知开始于何时。元丰时实行新官制，把一切都加以更改，凡选拔官员的事，无论文武，都归属吏部。苏东坡（苏轼）当元 年间被任为兵部尚书，谢表说：“恭敬地想到先帝恢复六卿的名目，本来要后人知道三代的旧制，古今制度不同，职务的空闲和繁剧各有不同。武官的选拔属于

吏部，军政归枢密院总管，所以司马（兵部尚书）的职务，文书很少。”这是纪其事实。现在兵部所掌握的，只有各州厢军（地方军队）的名册，以及每次举行大礼时，就书写少数族官员加恩的告示。虽有所管辖的各下属部门，如金吾街仗司、骐驎车辂象院、法物库、仪鸾司，不过每季度去一次而已，名存实亡，竟到了这个地步！

武官名不正

【原文】 文官郎、大夫，武官将军、校尉，自秦、汉以来有之。至于阶秩品著，则由晋、魏至唐始定。唐文散阶二十九，自开府、特进之下，为大夫者十一，为郎者十六。武散阶四十五，为将军者十二，为校尉者十六。此外怀化、归德大将军，讫于司戈、执戟，皆以待蕃戎之君长臣仆。本朝因之。元丰正官制，废文散阶，而易旧省部寺监名，称为郎、大夫，曰寄禄官。政和中，改选人七阶亦为郎，欲以将军、校尉易横行以下诸使至三班借职，而西班用事者嫌其途辙太殊，亦请改为郎、大夫，于是以卒伍厮圉玷污此名，又以节度使至刺史专为武臣正任。且郎、大夫，汉以处名流，观察使在唐为方伯，刺史在汉为监司，在唐为郡守，岂介胄恩幸所得处哉？此其名尤不正者也。

【译文】 文官郎、大夫，武官将军、校尉，从秦汉以后一直都有。至于官吏的品级、俸禄和衣饰，则从晋、魏到唐朝才逐渐确定下来。在唐朝，文散阶有二十九级，自开府、特进以下，大夫有十一级，郎有十六级。武散阶有四十五级，其中将军十二级，校尉十六级。此外，从怀化、归德大将军至司戈、执戟等头衔，都是专门授给少数民族酋长以及其臣仆的。我们大宋朝继续沿用这种制度。元丰年间改革官制时，废除了文散阶，而改为过去的省、部、寺、监名，称郎、大夫等，这就是所谓的寄禄官，仅表示官吏的品级，而无实际职掌。徽宗政和年间，将选人七阶也改为郎，计划用将军、校尉等名称取代横行以下诸使至三班借职，可是西班的当权者嫌两种仕途悬殊太大，也请求将本系统的官名改为郎、大夫，于是造成以军人、杂役等玷污这些官名的后果，又以节度使至刺史专门作为武臣的正任。况且，郎、大夫之职在汉代是用来安置名流的，观察使在唐代是一方最高长官，刺史在汉代是监察官，在唐代是郡守，哪里是武夫和受宠的小人所能充任的？这是武官中名实尤其不符的。

名将晚谬

【原文】 自古威名之将，立盖世之勋，而晚谬不克终者，多失于恃功矜能而轻敌也。关羽手杀袁绍二将颜良、文丑于万众之中。及攻曹仁于樊，于禁等七军皆没，羽威震华夏，曹操议徙许都以避其锐，其功名盛矣。而不悟吕蒙、陆逊之诈，竟堕孙权计中，父子成禽，以败大事。西魏王思政镇守玉壁，高欢连营四十里攻围之，饿冻而退。及思政徙荆州，举韦孝宽代己，欢举山东之众来攻，凡五十日，复以败归，皆思政功也。其后欲以长社为行台治所，致书于崔猷，猷曰：“襄城控带京洛，当今要地，如其动静，易相应接。颍川邻寇境，又无山川之固，莫若顿兵襄城，而遣良将守颍川，则表里俱固，人心易安，纵有不虞，岂足为患？”宇文泰令依猷策，思政固请，且约：贼水攻期年、陆攻三年之内，朝廷不烦赴救。已而陷于高澄，身为俘虏。慕容绍宗挫败侯景，一时将帅皆莫及，而攻围颍川，不知进退，赴水而死。吴明彻当陈国衰削之余，北伐高齐，将略人才，公卿以为举首，师之所至，前无坚城，数月之间，尽复江北之地。然其后攻周彭城，为王轨所困，欲遏归路。萧摩诃请击之，明彻不听，曰：“搴旗陷陈，将军事也；长算远略，老夫事也。”旬之间，水路遂断。摩诃又请潜军突围，复不许，遂为周人所执，将士三万皆没焉。此四人之过，如出一辙。

【译文】 自古有威名的将帅，立了盖世的功勋，而晚年错误不能得善终的人，大多失于恃功骄傲自以为有才能而轻敌之故。关羽在千军万马中亲手杀死袁绍的颜良、文丑二员大将。到他进攻曹仁于樊城，魏军的于禁等七支军队都覆没，关羽的威风震动中华大地，曹操商议迁出许昌都城以避开他的兵锋，他的功名极盛了。但他不察觉吕蒙、陆逊的诡计，竟落入孙权的计谋之中，父子都被擒获，使大事失败。西魏的王思政镇守玉壁，高欢连营四十里来围攻他，却因饥饿寒冷而退走。到王思政移任荆州，荐举韦孝宽来代替自己，高欢调动华山以东全部兵力来进攻，一共五十天，又以战败而归，这都是王思政的功劳。其后他想把长社作为朝廷行台的治所，写信给崔猷，崔猷说：“襄城这地方控制着旧京洛阳，是当今的重要地方，如果有什么动静，易于接应。颍川郡靠着敌人境地，又没有山川的险固，不如屯兵在襄城，而派善战将军去镇守颍川，那就里外都很巩固，人们的心也易于安定，纵使有想不到的事，岂能成为灾患。”宇文泰命令依从崔猷的计策，王思政坚持请求，并且约定，敌人从水路进攻一年，

从陆路进攻三年之内，不必烦朝廷派兵去救援。后来被高澄攻陷，自己当了俘虏。东魏慕容绍宗打败了侯景，一时的将帅都不及他，而在围攻颍川时，不知道进退，竟投水而死。陈代吴明彻当陈国衰弱土地缩小之际，北伐高齐，以将略人才论，公卿首先推举他，他的军队所到之处，前面没有坚固的城池，几个月之中，就把江北土地全部收复。但后来他攻围北周的彭城，被王轨所困，王轨要截断他退回的道路。萧摩诃请求出击，吴明彻不听，说：“拔去敌军大旗攻克阵地，是你将军的事情；长远的战略考虑，是我老夫的事情。”十天之间，水路就被截断。萧摩诃又请求暗中出兵突围，他又不许，就此被周军所擒获，将士三万人都覆没了。这四个人的过失，如出一辙。

唐帝称太上皇

【原文】 唐诸帝称太上皇者，高祖、睿宗、明皇、顺宗凡四君。顺宗以病废之故，不能临政；高祖以秦王杀建成、元吉；明皇幸蜀，为太子所夺；唯睿宗上畏天戒，发于诚心，为史册所表。然以事考之，睿宗以先天元年八月，传位于皇太子，犹五日一受朝，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皆自决之。故皇帝之子嗣直、嗣谦、嗣 封王，皆以上皇诰而出命。又遣皇帝巡边。二年七月甲子，太平公主诛，明日乙丑，即归政。然则犹有不获已也。若夫与尧、舜合其德，则我高宗皇帝、至尊寿皇圣帝为然。

【译文】 在唐朝诸帝中称太上皇的，共有高祖、睿宗、明皇、顺宗四位。其中唐顺宗因为患病失音、无法处理朝政；高祖因为秦王李世民杀死了太子建成、齐王元吉，不得不让位；明皇（即玄宗）因为安史之乱逃往四川，以致被太子李亨夺去了帝位；只有睿宗皇帝是因为害怕上天的儆戒，出于至诚，因而受到了史书的赞扬。然而，当我查考当时的历史事实时发现，睿宗于先天元年（712年）八月传位给皇太子后，仍然五日一受朝理政，三品以上官员的任用及大刑政皆由自己决定。所以，皇帝的儿子嗣直、嗣谦、嗣 等被封为王时，都是用太上皇的诰命加封的。而且，太上皇还派皇帝外出巡边。到先天二年七月甲子日，太平公主被赐死，次日即乙丑日，太上皇就归政于玄宗皇帝。由此可见，唐睿宗退位是出于迫不得已，而非自愿。至于能够与唐尧、虞舜的禅让美德相匹敌的君主，则只有我大宋朝的高宗皇帝和至尊寿皇圣帝（即孝宗）两位了。

杨 注荀子

【原文】 唐杨礪注《荀子》，乃元和十三年。然《臣道篇》所引：“《书》曰：‘从命而不拂，微谏而不倦。为上则明，为下则逊。’”注以为《伊训篇》，今元无此语。《致士篇》所引曰：“义刑义杀，勿庸以即，汝惟曰未有顺事。”注以为《康诰》，而不言其有不同者。

【译文】 唐朝的杨 为《荀子》一书作注，乃是宪宗元和十三年（818年）的事。但是，《荀子·臣道篇》所引的“《书》曰：‘从命而不拂，微谏而不倦。为上则明，为下则逊。’”杨注以为出于《尚书·伊训篇》，可现在所见的《尚书》中却没有这两句话。《致士篇》所引的“义刑义杀，勿庸以即，汝惟曰未有顺事。”杨注以为出于《尚书·康诰》篇，却不说二者并非完全相同。

昭宗相朱朴

【原文】 唐昭宗出幸华州，方强藩悍镇，远近为梗，思得特起奇士任之，以成中兴之业。水部郎中何迎，表荐国子博士朱朴才如谢安，朴所善方士许岩士得幸，出入禁中，亦言朴有经济才。上连日召对，朴有口辩，上悦之，曰：“朕虽非太宗，得卿如魏征矣。”上愤天下之乱，朴自言得为宰相，月余可致太平。遂拜为相，制出，中外大惊。《唐制诏》有制词，学士韩仪所撰，曰：“梦傅岩而得真相，则商道中兴；猎渭滨而载献臣，则周朝致理。朕自逢多难，渴伫英贤，暗祷鬼神，明祈日月，果得哲辅，契予勤求。朱朴学业优深，识用精敏，久徊翔而不振，弥贞吉以自多。朕知其才，遂召与语。理乱立分于言下，闻所未闻；兵农皆在于术中，得所未得。不觉前席，为之改容；须委化权，用昌衰运。自我拔奇，宁拘品秩；百度群伦，俟尔康济。”其美如此。仪者，礪之兄，所谓“暗祷鬼神，明祈日月”之语，必当时所授旨意也。朴为相才半年而罢。后贬郴州司户参军，制云：“不为自审之谋，苟窃相援之力，实因奸幸，潜致显荣。亦谓术可弭兵，学能活国，冒半岁容身之赞，无一朝辅政之功。唯辱中台，颇兴群论。”呜呼！昭宗当王室艰危之际，无知人之明，拔朴于庶僚中，位诸公衮，以今观之，适足诒后人讥笑。《新史》赞谓：“捭豚彘而拒 牙，趣亡而已。”悲夫！

【译文】 唐昭宗李晔为叛将李茂贞的兵势所迫，仓皇出京投奔华州（治今陕西华县）。当时藩镇割据，处处作梗，他一心想求得绝世奇才委以重任，从而成就中兴大业。这时，水部郎中何迎上表举荐国子博士朱朴才能优异，可与东晋名相谢安相比。朱朴所结交的方士许岩士深得昭宗宠信，他出入宫中时也向皇帝说朱朴颇有经邦济世之才。昭宗接连数天召见朱朴，与之谈话，发现朱朴口才伶俐，非常欣赏，说道：“我虽然不能与太宗皇帝相比，但得到你也如同太宗得到魏征一样。”昭宗对天下动乱不休感到极为忧虑、痛恨，朱朴便自报奋勇地说，如果自己能够做宰相，一个月后就可以使天下太平。唐昭宗深信不疑，马上拜朱朴为相，诏命下达之时，中外震惊。《唐制诏》一书中收录有这次拜相的制词，是学士韩仪所写的，内容是：“商王武丁梦见傅岩而得到了良相傅说，结果使得商朝中兴；周文王在渭滨狩猎而得到了奇才姜尚，结果使得周朝建立了八百年的基业。我遭逢多灾多难的乱世，渴望得到大量的济世英才，因而暗祷鬼神，明祈日月，祈求上苍保佑。现在果真得到了杰出的相才，实现了我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愿望。朱朴学识渊博，见解深刻，反应敏捷，却长期被埋没难以发挥才能，他就趁此机会更加勤奋地攻读以充实、提高自己。我知道他有才能，于是就召他来谈话。他对国家的兴盛和败亡之道都了若指掌，其见解是我从未听说过的；他对富国和强兵之道都有一套独特的办法，使我学到了许多从未学过的知识。我被他的学识所倾倒，不知不觉中探身倾听，以至为之而改容，失去了常态，所以决心委之以大权，以期重振朝纲，挽救大唐帝国正在衰落的命运。我为国家重用出类拔萃的人才，哪里能拘泥于品级，论资排辈呢？大胆地干吧，亿万民众正翘首以待，等待您前去解救！”诏书竟把朱朴说得如此优秀。韩仪是韩琳的哥哥，制词中所说的“暗祷鬼神，明祈日月”之句，必定是当时皇帝所授的旨意。朱朴任宰相仅半年就被罢免，后来被贬为郴州（今属湖南）司户参军，皇帝所下的制词说：“朱朴不客观地估量自己的才学，只是假借同伙相互勾结引荐之力，实际上是通过奸邪的手段骗取信任，以至被任命为百官之长的宰相，名显一时。他自称有消除战乱的妙术，挽救国家的才干，身居相位沽名钓誉达半年之久，却无一日辅政之功。朱朴白白地沾污了神圣的相位，引得各方面议论纷纷，颇有怨言。”唉！在唐王朝危机重重、处境极为艰难的形势下，唐昭宗没有知人之明，竟将朱朴由一名普通的官员破格提拔为宰相，今天看来，正好是给后人留下了千古笑柄。《新唐书·朱朴传》后的“赞”说：“任命朱朴为相，无异于拿着猪腿去抵挡饿狼的利齿，只不过是自取速亡而已。”实在是可悲啊！

杨国忠诸使

【原文】 杨国忠为度支郎，领十五余使。至宰相，凡领四十余使。第署一字不能尽，胥吏因是恣为奸欺。新、旧《唐史》皆不详载其职。按其拜相制前衔云：“御史大夫判度支，权知太府卿事，兼蜀郡长史，剑南节度支度、营田等副大使，本道兼山南西道采访处置使，两京太府、司农、出纳、监仓、祠祭、米炭、宫市、长春九成宫等使，关内道及京畿采访处置使，拜右相兼吏部尚书、集贤殿崇文馆学士、修国史、太清太微宫使。”自余所领，又有管当租庸、铸钱等使。以是观之，概可见矣。宫市之事，咸谓起于德宗贞元，不知天宝中已有此名，且用宰臣充使也。韩文公作《顺宗实录》，但云：“旧事，宫中有要市外物，令官吏主之，与人为市，随给其直，贞元末以宦者为使。”亦不及天宝时已有之也。

【译文】 杨国忠做度支郎，领十五个其他使职。到做了宰相，一共兼领四十多个使职。他光签署一个字也不能把公文批完，小胥们因此任意作奸恶欺骗的事，《新》、《旧唐书》都不详载他的职务。按他的被任为宰相时制书所列他以前官衔说：“御史大夫兼管度支，临时兼管太府卿事务，兼蜀郡长史、剑南节度支度、营田等副大使，本道兼山南西道采访处置使，两京太府、司农、出纳、监仓、祠祭、米炭、宫市、长春九成宫等使”，“关内道及京畿采访处置使，拜右相兼吏部尚书，集贤殿崇文馆学士，修国史，太清太微宫使。”其余所兼管的，又有管当租庸、铸钱等使。以这些来看，大概可以想见了。宫市的事，人们都说起于德宗贞元年间。不知天宝年间已有这名称，而且用宰相充当使者。韩父公（韩愈）作《顺宗实录》，只说：“过去的惯例，宫中需要买外边的东西，命令官吏去主办，和百姓交易，随东西的价值付给，贞元末年用宦官充任使者。”也没有讲到天宝时已有这事了。

祖宗朝宰辅

【原文】 祖宗朝，宰辅名为礼绝百僚，虽枢密副使，亦在太师一品之上。然至其罢免归班，则与庶位等。李崇矩自枢密使罢为镇国军节度使，旋改左卫大将军，遂为广南西道都巡检使，未几遣使赉诏徙海南四州都巡检使，皆非降

黜。在南累年，入判金吾街仗司而卒，犹赠太尉。赵安仁尝参知政事，而判登闻鼓院。张礪尝知枢密院，而监诸司库务。曾孝宽以签书枢密，服阕，而判司农寺。张宏、李惟清皆自见任枢密副使徙御史中丞。其他以前执政而为三司使、中丞者数人。官制既行，犹多除六曹尚书。自崇宁以来，乃始不然。

【译文】 在祖宗朝，宰相名义上是百官中地位最高的，即使是枢密副使（副使相），其地位也在一品太师以上。但是，到他们被免相归班后，其地位又与一般官员无异了。李崇矩由枢密副使被罢为镇国军节度使，不久又改任左卫大将军、广南西道都巡检使，没有过多长时间，朝廷又遣使持诏调任他为海南四州都巡检使。这几次调动无一属于降职使用。李崇矩在南方任职多年后，被调回京城任判金吾街仗司，直至死于此任上。李崇矩死后，朝廷追赠他太尉之职。赵安仁曾任参知政事（即副宰相），后来改任判登闻鼓院。张 曾任知枢密院，而后来又改任监诸司库务。曾孝宽本是签书枢密院事，待亲人的丧服期满后改任判司农寺。张宏和李惟清都是由现任枢密副使改任御史中丞的。其他以前任执政而后来改为三司使、中丞的还有数人。神宗元丰年间改制后，还有不少宰执大臣改任六曹尚书的。从徽宗崇宁年间以后，才改变了这种做法。

百官避宰相

【原文】 刘器之以待制为枢密都承旨，道遇执政出尚书省，相从归府第，刘去席帽凉衫，敛马遣人传语，相揖而过。左相吕汲公归，呼门下省法吏，问：“从官道逢宰相如何？”吏检条，但有尚书省官避令仆，两省官各避其官长，而无两制避宰相之法，汲公乃止，而心甚不乐。刘以此语人，以为有所据。然以事体揆之，侍从不避宰相，恐为不然，亦无所谓只避官长法，刘公盖饰说耳。按《天圣编敕》，诸文武官与宰相相遇于路皆退避，见枢密使、副参知政事，避路同宰相，其文甚明，不应元璽时不行用也。

【译文】 哲宗皇帝时，刘器之以待制的身份任枢密都承旨。有一天外出时，他路遇几位宰相从尚书省办完公事出来，正结伴回家，便脱去斗笠凉衫，勒马避到路边，然后派人前去问候，双方相互打揖而过。左相吕汲公（即吕大防）回到家中后，马上叫来门下省的司法官员，询问：“下级官员如果在半道上碰见宰相应怎么办？”官吏查阅律条后发现，只有尚书省官员回避尚书令与仆射，和其他两省的官员各自回避本省长官的规定，却没有内外两制官员回避宰相的条文，吕大防这才作罢，只是心中仍然十分不悦。刘器之把此事告诉别人，认为

自己的做法是有根据的。然而从事体上揆度，侍从官员不回避宰相恐怕是不合适的，而且也不存在所谓只回避本省长官的规定，刘器之大概是在掩饰什么。按照《天圣编敕》的有关规定，各文武官员在路上遇到宰相都必须退避，如果碰上枢密使、副参知政事，也同样必须退避。这些规定是非常明确的，在元奩年间不应当不施行。

百官见宰相

【原文】 《天圣编敕》载文武百官见宰相仪。文明殿学士至龙图阁直学士，列班于都堂阶上，堂吏赞云：“请，不拜，班首前致词，讫，退，归位，列拜。宰相答拜。”两省官相次同学士之仪。上将军、大将军、将军、御史台官，及南班文武百僚，序班于中书门外，应节度使至刺史，并缀本班，中丞揖讫，入。宰相降阶，南向立于位，乃称班，文东武西，并北上，台官南行，北向东上。赞云：“百僚拜，宰相答拜，讫，退。”内客省使至鞞门使见宰相、枢密使，并阶上列行拜，不答拜；见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宣徽使，客礼展拜；皇城使以下诸司使、横行副使见宰相、枢密使，并阶下连姓称职展拜，不答拜；见参政副枢，并列行拜。若诸司副使、鞞门祗候见参枢，亦不答拜。国朝上下等威，其严如此。已而浸废。文潞公、富韩公至和中自外镇拜相，诏百官班迎于门，言者乃谓隆之以虚礼。元丰定官制，王禹玉、蔡持正为仆射，上日，始用此礼。其后复不行。乾道初，魏仲昌以枢密吏寅缘得副承旨，每谒公府，与侍从同席升车而去。叶子昂为相，独抑之，使与卿监旅进，送之于右序，不索马。及王以国信所典仪吏为都承旨，且正任观察使，礼遂均从官矣。

【译文】 《天圣编敕》一书中记载了文武百官拜见宰相的礼仪。在拜见时，文明殿学士至龙图阁直学士列班于都堂（宰相办公处）的台阶上，司礼的堂吏高声喊道：“请安，不拜。班首上前致词。致词完毕，退归原位。诸位列拜。宰相答礼。”两省官员拜见的礼仪与学士相同。上将军、大将军、将军、御史台官，以及南班文武百官，都序班于中书门外，节度使至刺史，也缀于本班之列，待中丞打揖完毕后，众人依次进门。宰相走下台阶，面向南方站在自己的位置上，众官员开始对称地分为东西两班，文官在东，武官在西，全都面向北方而立，台官南行，面向北方从东边上。司礼的官员喊道：“百官拜。宰相答拜。诸位退下。”内客省使至鞞门使见宰相、枢密使，都是在台阶下列队而拜，被拜者无须答拜；见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宣徽使，皆以客礼恭拜。皇城使以下诸司使、横行副

使见宰相、枢密使，都是在阶下连姓称职恭拜，被拜者不答拜；见参知政事和枢密副使，皆列队而拜。如果是诸司副使、盍门鳌候见参知政事和枢密使，受拜者也不答拜。大宋朝上下等级森严，由此就可见一斑了。后来，这种制度逐渐废弃不用了。宋仁宗至和年间，文潞公（即文彦博）和富韩公（即富弼）从外地被调入京师任宰相，皇帝下诏命百官列班到城门外迎接，有人竟说这是临时用虚礼来表明朝廷对文、富二人的格外尊重。元丰年间确定新的官制后，王禹玉（即王獐）和蔡确（字持正）任仆射（即宰相），就职之日，重新开始使用这种礼仪。此后又停止执行。孝宗乾道初年，魏仲昌以枢密吏一跃而成为枢密副承旨，每当赴公府拜谒时，总是要与诸侍从官同席，然后一起乘车而去。叶子昂任宰相时，单单抑制魏仲昌，使他列入右班，与诸卿监们同进同退，不得骑马。到王 由国信所典仪吏被提升为都承旨，并且正任观察使时，其礼仪才与诸侍从官等同。

东坡自引所为文

【原文】 东坡为文潞公作《德威堂铭》，云：“元璽之初，起公以平章军国重事，期年，乃求去，诏曰：‘昔西伯善养老，而太公自至。鲁穆公无人子思之侧，则长者去之。公自为谋则善矣，独不为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尚能起李靖于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际，不能用裴度于未病。治乱之效，于斯可见。’公读诏耸然，不敢言去。”按此二诏，盖元璽二年三月潞公乞致仕不允批答，皆坡所行也。又，《缴还乞罢青苗状》云：“近日谪降吕惠卿告词云：‘首建青苗，次行助役。’”亦坡所作。《张文定公墓志》载尝论次其文凡三百二十字，结之云：“世以轼为知言。”又述谏用兵云：“老臣且死，见先帝地下，有以借口矣。”亦其所作也。并引责吕惠卿词亦然。乾道中，迈直翰苑，答陈敏步帅诏云：“亚夫持重，小棘门、霸上之将军；不识将屯，冠长乐、未央之卫尉。”后为敏作神道碑，亦引之，正以公为法也。

【译文】 苏东坡为文彦博所作的《德威堂铭》说：“元璽初年，先生被起用为平章军国重事，一年后就请求离职，皇帝下诏说：‘昔日周文王善于养老，而姜太公主动来投奔。鲁穆公没有派人到学者子思身边侍奉，于是老人们纷纷离他而去。您辞去职务对自己当然是很有利的，可是难道您就不为朝廷和国家着想吗？’诏书还说：‘唐太宗为了战争之事，尚能起用已经年迈体衰的名将李靖，而唐穆宗与文宗在和平安定的时期，也不能重用身体还很健康的良相裴度。

国家治理得好与坏，从这里就可以看出端倪了。’潞国公读诏以后深受感动，从此不敢再提辞职之事。”按：这两封诏书大约是元盍二年（1087年）三月，朝廷拒绝文彦博辞职请求的批语，都是苏东坡所撰写的。苏东坡的《缴还乞罢青苗状》中有“不久前贬斥吕惠卿的诰词说：‘吕首先倡议青苗法，接着又推行助役法’。”这篇诰词也是苏东坡撰写的。《张文定公墓志铭》中载有他曾论述其文章，共有三百二十字，结尾说：“世人认为苏轼能够听其言而知其真实想法。”在记述其劝谏用兵时又说：“老臣我已不久于人世了，将来如果在地下见到先帝，就能够有话可说了。”这些也都是苏轼自己所写的。他所引用的斥责吕惠卿的话也同样是自己写的。孝宗乾道年间，我任翰林院直学士，在答步帅陈敏的诏书中说：“周亚夫老成持重，使得棘门和霸上的众将相形见绌；程不识率兵屯戍，在长乐、未央诸卫尉中为第一。”后来，我为陈敏撰写神道碑时，也引用了这两句话，此举正是学习苏东坡的。

卷十二

妇人英烈

【原文】 妇人女子，婉娈闺房，以柔顺静专为德，其遇哀而悲，临事而惑，蹈死而惧，盖所当然尔。至于能以义断恩，以智决策，斡旋大事，视死如归，则几于烈丈夫矣。齐碭王失国，王孙贾从王，失王之处。其母曰：“汝朝出而晚来，则吾倚门而望；汝暮出而不还，则吾倚闾而望。汝今事王，不知王处，汝尚何归？”贾乃入市，呼市人攻杀淖齿，而齐亡臣相与求王子立之，卒以复国。马超叛汉，杀刺史、太守。凉州参军杨阜出见姜叙于历城，与议讨贼。叙母曰：“韦使君遇难，亦汝之负，但当速发，勿复顾我。”叙乃与赵昂合谋。超取昂子月为质，昂谓妻异曰：“当奈月何？”异曰：“雪君父之大耻，丧元不足为重，况一子哉！”超袭历城，得叙母，母骂之曰：“汝背父杀君，天地岂久容汝，敢以面目视人乎？”超杀之，月亦死。晋卞壶拒苏峻，战死，二子随父后，亦赴敌而亡。其母拊尸哭曰：“父为忠臣，子为孝子，夫何恨乎！”秦苻坚将伐晋，所幸张夫人引禹、稷、汤、武事以谏曰：“朝野之人，皆言晋不可伐，陛下独决意行之？”坚不听，曰：“军旅之事，非妇人所当预也。”刘裕起兵讨逆，同谋孟昶谓妻周氏曰：“我决当作贼，幸早离绝。”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谋，岂妇人所能谏。事之不成，当于奚官中奉养大家，义无归志也。”昶起，周氏追昶坐，曰：“观君举措，非谋及妇人者，不过欲得财物耳。”指怀中儿示之曰：“此儿可卖，亦当不惜！”遂倾货以给之。何无忌夜草檄文，其母，刘牢之姊也，登凳密窥之，泣曰：“汝能如此，吾复何恨！”问所与同谋者，曰：“刘裕。”母尤喜，因为言举事必有成之理以劝之。窦建德救王世充，唐拒之于虎牢。建德妻曹氏劝使乘唐国之虚，西抄关中，唐必还师自救。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李克用困于上源驿，左右先脱归者，以汴人为变告其妻刘氏，刘神色不动，立斩之，阴召大将约束，谋保军以还。克用归，欲勒兵攻汴，刘氏曰：“公当诉之于朝廷，若擅举兵相攻，天下孰能辨其曲直？”克用乃止。黄巢死，时溥献其姬妾。僖宗宣问曰：“汝曹皆勋贵子女，何为从贼？”其居首者对曰：“狂贼凶逆，国家以百万之众，失守宗祧。今陛下以不能拒贼，责一女子，置公卿将帅于何地乎？”上

不复问，戮之于市。余人皆悲怖昏醉，独不饮不泣，至于就刑，神色肃然。唐庄宗临斩刘守光，守光悲泣哀祈不已，其二妻李氏、祝氏谏之曰：“事已如此，生复何益？妾请先死。”即伸颈就戮。刘仁贍守寿春，幼子崇谏夜泛舟渡淮北，仁贍命斩之。监军使求救于夫人，夫人曰：“妾于崇谏，非不爱也，然军法不可私，若贷之，则刘氏为不忠之门矣。”趣命斩之，然后成丧。王师围金陵，李后主以刘澄为润州节度使，澄开门降越。后主诛其家，澄女许嫁未适，欲活之。女曰：“叛逆之余，义不求生。”遂就死。此十余人者，义风英气，尚凛凛有生意也。虽载于史策，聊表出之。至于唐高祖起兵太原，女平阳公主在长安，其夫柴绍曰：“尊公将以兵清京师，我欲往，恐不能偕，奈何？”主曰：“公往矣！我自为计。”即奔，发家赀招南山亡命，谕降群盗，申法誓众，勒兵七万，威振关中，与秦王会渭北，分定京师。此其伟烈，又非他人比也。

【译文】一般的妇女，大抵处于闺房之中，性格温顺，以柔顺娴静与专一为德行，她们遇到哀伤的事就悲泣，在出现突然发生的事就惶惑。临到死亡就害怕，这是当然的。至于能以道义斩断恩爱，用智谋来决定策略，调解和考虑重大事件，视死如归，那就近于忠烈的男子了。战国时齐鸢王丧失了国家，王孙贾随从鸢王，找不到鸢王的下落。他母亲说：“平时你早上出去而回来晚了，那我就靠着家门望你；你傍晚出去而不回来，那我就靠着里巷的门而望你。你现在侍从国王，竟不知国王在哪里，你还回来干吗？”王孙贾就跑到市集上，召唤市人一起进攻和杀掉淖齿，而齐国逃亡的臣子们一起找到鸢王的儿子而拥立他，终于恢复了齐国。马超反叛汉朝，杀死了刺史、太守。凉州参军杨阜出州城并在历城会见姜叙，和他商议讨伐叛贼。姜叙的母亲说：“韦使君（凉州刺史韦康）遇到残害，这也是你有负于他，只应赶快发兵，不要再管我！”姜叙就和赵昂合计。马超抓了赵昂的儿子赵月做人质，赵昂对妻子异说：“怎么对待赵月呢？”异说：“报君上的大耻，丢了头颅也不足为重，何况一个儿子呢？”马超袭击历城，抓住了姜叙的母亲，姜母骂马超说：“你背叛父亲杀害长官，天地难道能长期容忍你，你还敢有面目来看人呢？”马超杀了她，赵月也被杀。晋朝的卞壶抵抗苏峻，战死，两个儿子跟在父亲背后，也向敌人而战死。两个儿子的母亲（裴氏）摸着他们的尸体哭道：“父亲是忠臣，儿子是孝子，这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前秦苻坚将要讨伐东晋，他所宠幸的张夫人称引禹、稷、商汤、周武王的事来谏止说：“在朝和在野的人们，都说晋朝不可讨伐，只有陛下一个决心要这样做。”苻坚不听，说：“用兵打仗的事，不是妇女所应干预的。”刘裕起兵征讨逆贼桓玄，原在桓玄部下和刘裕同谋的孟昶对妻子周氏说：“我已决定起兵反对桓玄，情愿早些分手，以免连累。”周氏说：“你父母都在堂上，想建立

不寻常的计谋，这难道是妇女所能谏止的。事情如果不成功，我应当在没入官府作奴婢的人中奉养婆婆，从道义上没有回家之心。”孟昶站起来，周氏追他叫他坐下，说：“看你的举动，不是来和女人家商量这事的，你不过想得到财物而已。”指着怀抱中的孩子给孟昶看着说：“如果这孩子可以出卖，亦应当不爱惜！”就把全部财物都给了他。何无忌夜间草写檄文，他母亲是刘牢之的姐姐，站在凳子上暗中看他，哭着说：“你能这样，我还有什么遗憾！”她问何无忌和谁同谋，回答说：“刘裕。”母亲尤其高兴，因此给他讲起兵一定能够成功的道理来鼓励他。窦建德救王世充，唐兵在虎牢抗击他。窦建德的妻子曹氏劝窦建德乘唐朝兵力外出空虚时，向西抄掠关中，唐兵一定还兵自救。窦建德说：“这不是女子所知道的。”李克用在上源驿被困，他左右的人有先得脱逃的，把汴州人变乱的事去告诉李克用的妻子刘氏，刘氏神色不变，立刻把那人斩杀，暗中召集大将加以部勒，计划保全军力撤还。李克用回到军中，想率兵攻打汴州，刘氏说：“您应当向朝廷控告，如果擅自发兵相攻击，天下人谁能够分辨此事的是非曲直？”李克用就作罢。黄巢死后，时溥献上黄巢的姬妾。唐僖宗把她们召来责问说：“你们都是功臣贵官的子女，怎么能顺从逆贼？”她们中为首的回答说：“狂暴的贼人凶恶叛逆，国家用百万的军队，连京城宗庙都失守了。现在陛下以不能抗拒贼人之故，来责备一个妇女，那将把公卿和将帅置于什么地步呢？”皇上不再盘问，就在市上把她们杀掉。其余的人都悲伤害怕喝得烂醉，只有她不喝酒也不哭，直到受刑，神色很严整。五代后唐庄宗临到杀刘守光时，刘守光悲哭哀求不停，他的两个妻子李氏、祝氏骂他说：“事情已经如此，活着还有什么好处？我愿意先死。”就伸着头颈去受斩杀。刘仁贍守卫寿春，他的小儿子刘崇谏夜间划着船渡过淮河到北岸，刘仁贍命令杀了他。监军派人求救于刘仁贍的夫人，夫人说：“我对于刘崇谏，不是不慈爱，但军法不能顾私情，如果饶了他，那刘家就成了不忠的门户了。”催促斩杀他，然后为刘崇谏办丧事。宋朝的军队围困金陵，李后主（李煜）任刘澄为润州节度使，刘澄开了城门迎降吴越国军队。李后主就斩杀刘澄的家人，刘澄的女儿已许配人家还未成婚，想保全她。女儿说：“叛逆人家的后代，从道义上不求存活。”就受死刑。这十几个人，忠义之风英烈之气，至今还凛凛地有生意。虽然记载在史籍中，我这里在聊加表彰。至于唐高祖在太原起兵，女儿平阳公主在长安，她的丈夫柴绍说：“你父亲将要用兵力来廓清京城，我想去参加，恐怕不能和你同去，怎么办？”公主说：“你去吧！我自己想办法。”她就逃亡到潞县，拿出家中资财招募南山中逃亡的人，告谕和收降许多盗贼，申明军法率众发誓，领兵七万人，威风振动关中，和秦王（太宗李世民）在渭北会师，分兵平定京城。她这种伟大的功业，又不是

其他人所能比的。

无用之用

【原文】 庄子云：“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又云：“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夫地非不广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则厠足而垫之致黄泉，所谓无用之为用也亦明矣。”此义本起于《老子》“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一章。《学记》：“鼓无当于五声，五声弗得不备；水无当于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其理一也。今夫飞者以翼为用，絜其足，则不能飞。走者以足为用，缚其手，则不能走。举场较艺，所务者才也，而拙钝者亦为之用。战陈角胜，所先者勇也，而老怯者亦为之用。则有用、无用，若之何而可分别哉？故为国者，其勿以无用待天之下士，则善矣！

【译文】 《庄子》说：“人们都知道有用之物的用途，而没有人知道无用之物的用途。”又说：“知道无用之物的用途，那才可以跟他讲事物的作用了。那大地不是不宽广的，但人所使用的，只要容纳双脚就够了。然而沿着脚边使土地陷下去直到有水流之处，谁还敢站在那儿？所谓无用之物的作用也就明白了。”这意思本来起于《老子》中“三十个车辐合在一个车轴所贯串的轮子上，在它的空虚之处，才能发挥车辆的作用”一章。《礼记·学记》：“鼓本身不合于五声，但五声没有它就不完备；水不属于五色，而五色没有它就无法鲜明。”这道理是一样的。像那些会飞的动物使用翅膀飞翔，但捆绑了它的脚，它就不能飞。善走的人用脚走路，但捆绑了他的手，他就走不快。科举的考场中所比的是技艺，所求的是才能，而拙笨的人也有其用处。战场上比试胜负，所注重的是勇敢，而年老怯弱的人也有其用处。那么有用、无用，怎么能加以分别呢？所以如果治理国家的人，能不以无用的看法来对待天下的士人，这就好了。

龙筋凤髓判

【原文】 唐史称张 早慧绝伦，以文章瑞朝廷，属文下笔辄成，八应制举，皆甲科。今其书传于世者，《朝野僉载》、《龙筋凤髓判》也。《僉载》纪事，皆琐尾 裂，且多 语。百判纯是当时文格，全类俳体，但知堆垛故事，而于蔽罪议法处不能深切，殆是无一篇可读，一联可味。如白乐天《甲乙判》则读之

愈多，使人不厌。聊载数端于此：“甲去妻，后妻犯罪，请用子荫赎罪，甲不许。判云：‘不安尔室，尽孝犹慰母心；薄送我畿，赎罪宁辞子荫？纵下山之有怨，曷陟岵之无情？’”“辛夫遇盗而死，求杀盗者，而为之妻。或责其失节，不伏。判云：‘夫仇不报，未足为非；妇道有亏，诚宜自耻。《诗》著靡他之誓，百代可知；《礼》垂不嫁之文，一言以蔽。’”“丙居丧，年老毁瘠，或非其过礼，曰：‘哀情所钟。’判云：‘况血气之既衰，老夫耄矣；纵哀情之罔极，吾子忍之。’”“丙妻有丧，丙于妻侧奏乐，妻责之，不伏。判云：‘俨衰麻之在躬，是吾忧也；调丝竹以盈耳，于汝安乎？’”“甲夜行，所由执之，辞云：‘有公事，欲早趋朝。’所由以犯禁不听。判云：‘非巫马为政，焉用出以戴星？同宣子俟朝，胡不退而假寐？’”“乙贵达，有故人至，坐之堂下，进以仆妾之食，曰：‘故辱而激之。’判云：‘安实败名，重耳竟惭于舅犯；感而成事，张仪终谢于苏秦。’”“丙娶妻，无子，父母将出之，辞曰：‘归无所从。’判云：‘虽配无生育，诚合比于断弦；而归靡适从，度可同于束。’”“乙为三品，见本州刺史不拜，或非之，称：‘品同。’判云：‘或商、周不敌，敢不尽礼事君？今晋、郑同侪，安得降阶卑我？’”若此之类，不背人情，合于法意，援经引史，比喻甚明，非“青钱学士”所能及也。元微之有百余判，亦不能工。余襄公集中，亦有判两卷，粲然可观。张，字文成，史云：“调露中，登进士第，考功员外郎骞味道见所对，称天下无双。”按《登科记》，乃上元二年，去调露尚六岁。是年，进士四十五人，一名在二十九，既以为无双，而不列高第？神龙元年，中才膺管乐科，于九人中为第五。景云二年，中贤良方正科，于二十人中为第三。所谓制举八中甲科者，亦不然也。

【译文】 《唐书》称张碯自幼聪慧绝伦，凭文章名显朝廷。他写作速度奇快，落笔即成，倚马可待，八次应科举考试，都得甲科。现在，他的著作仍然流传于世的，有《朝野佥载》和《龙筋凤髓判》等。《朝野佥载》一书所记的都是唐代轶事，琐碎零乱，而且多有猥亵之词。《龙筋凤髓判》一书所记的全是当时判决书的格式，文风戏谑诙谐。不过，该书只是一味地堆砌过去的案例，而对案情隐晦、真象难明，需要仔细斟酌用刑尸寸的地方却不能深究，因而几乎没有一篇可读，没有一联值得玩味，根本无法与白居易（号乐天）的《甲乙判》相比。《甲乙判》越读越有味，令人百读不厌，这里随意举几个例子为证：

“某甲抛弃了自己的妻子，后来妻子犯了罪，请求用子荫（功臣子孙做官或读书的特权）赎罪，甲坚决不答应。判决词说：‘你的家庭不和睦，如果是为了尽孝尚可慰藉母心；强行赶她出大门，为了替她赎罪难道还舍不得子荫？为何对儿子如此照顾，而对妻子如此无情？’”

“辛的丈夫在遇上强盗时惨遭杀害，她为了报仇，就公开宣称：无论是什么人，只要能够杀死那个凶手，我就嫁给他。有人指责她失节，她不服。判决词说：‘丈夫的仇不报，不算是你的过错；而不守妇道，才是真正应当感到耻辱的事。《诗经》中强调靡他之誓，百代可知；《仪礼》中留下了好女不再嫁的话，足可一言以蔽之。’”

“丙在居丧期间，因年老，又过于悲伤，以致身体极度虚弱，有人责难他守礼太过，他说：‘这是我的哀情所钟。’判决词说：‘你的年纪太大了，何况精力也已经严重衰减；即使你无限哀伤，也应该努力忍耐，尽量节哀。’”

“丙在有丧服在身的妻子旁边奏乐，妻子责备他，他不服。判决词说：‘妻子有丧服在身，这是她的伤心事；而你兴高采烈地在她身旁弹奏音乐，于心何忍？’”

“甲深夜尚在外行走，被当地的所由官捉住后，他解释说：‘我有公事，想早点上朝。’所由官坚持说他违犯了宵禁令，根本不听他的解释。判决词说：‘现在又不是巫马执掌政权，你哪里用得着披星戴月去上朝？如果像晋国的赵盾那样等候上朝，为什么不坐在家中假寐片刻？’”

“乙飞黄腾达后，有位老朋友前来探望。他让朋友坐在堂下，进献的是仆妾的饭菜，并且说这是为了用‘故意羞辱他的办法来激励他。’。判决词说：‘贪图安佚的确会败坏名声，影响建功立业，所以晋文公重耳最终愧对强迫他流亡的舅舅狐偃（字子犯）；受到强烈刺激以后下定决心成大事，战国纵横家张仪最终感激自己的对手苏秦。’”

“丙的妻子婚后一直不育，公婆准备休掉她，她哀求说：‘回娘家后没有人会再娶我，我无法生活下去。’判决词说：‘虽然婚后不育，确实可以比作是断弦，而被休后无所适从，则可等同于一大堆乱麻，实在值得同情。’”

“乙的级别是三品，见本州刺史时不拜，有人指责他失礼，他声称‘我之所以不拜，是因为我与他的品级相同’。判决词说：‘即使是在商与周力量极为悬殊的时候，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周敢不尽礼侍奉商王？当晋、郑地位等同的时候，谁肯降低身份待我？’”

诸如此类的判例，既不背人情，又合乎法律，而且援经引史，比喻甚明，绝非“青钱学士”所能及。唐朝著名诗人元稹有百余判例，也不够严谨。余襄公的文集中也有判例两卷，文采与法理都很可观。张碯，字文成，史书说他“在唐高宗调露年间考中进士，考功员外郎骞味道看到他的策文后，连称天下无双。”据《登科记》记载，张碯乃是唐高宗上元二年（675年）进士及第的，距调露年间还有六年。这一年，共取进士四十五名，张碯名列第二十九，既然其诗文天

下无双，为什么不名列前茅？武则天神龙元年（705年），张碯考中“才膺管（管仲）、乐（乐毅）科”，在考中的九人中排名第五。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张碯考中贤良方正科，在上榜的二十人中位居第三。所谓的应制举八次皆中甲科，看来也并非事实。

唐制举科目

【原文】 唐世制举，科目猥多，徒异其名尔，其实与诸科等也。张九龄以道侔伊、吕策高第，以《登科记》及《会要》考之，盖先天元年九月，明皇初即位，宣劳使所举诸科九人，经邦治国、材可经国、才堪刺史、贤良方正与此科各一人，藻思清华、兴化变俗科各二人。其道侔伊、吕策问殊平平，但云：“兴化致理，必俟得人；求贤审官，莫先任举。欲远循汉、魏之规，复存州郡之选，虑牧守之明，不能必鉴。”次及“趋骑 飞，皆出畿甸，欲均井田于要服，遵丘赋于革车”，并安人重谷，编户农桑之事，殊不及为天下国家之要道。则其所以待伊、吕者亦狭矣。九龄于神龙二年中材堪经邦科，本传不书，计亦此类耳。

【译文】 在唐代的科举中，临时开考的科目名目繁多，其实质与其它各科并没有多大区别，只不过是名称不同罢了。名相张九龄以“道侔伊（指伊尹）、吕（指吕尚，也即姜尚、姜太公）科”高中，参阅《登科记》和《唐会要》可知，这大概是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年）九月的事。当时，唐明皇刚即位一个月，宣劳使所举诸科共取九人，其中经邦治国、材可经国、才堪刺史、贤良方正以及道侔伊、吕等科各一人，藻思清华、兴化变俗科各二人。实际上，道侔伊、吕科皇帝策问所提出的问题十分平常，只是说：“兴邦治国，必须得到人才；求贤审官，莫先于任子、察举。要想远循汉、魏之制，恢复州、郡选拔官吏的做法，又恐怕州牧、郡守的能力无法明鉴一切。”又说到“趋骑、鹞飞等禁军，都出京师很远活动，准备在全国各主要地区平均井田，使兵农合一”，以及安民重农，百姓农桑之事，根本称不上是治国平天下的要旨。由此看来，政府等待伊尹、姜尚这样的贤才去做的，也是很狭隘的。张九龄于唐中宗神龙二年（706年）考中材堪经邦科，而正史的本传中没有记载，估计也与此相似。

渊有九名

【原文】 《庄子》载壶子见季咸事云：“齔旋之潘为渊，止水之潘为渊，流水之潘为渊，渊有九名，此处三焉。”其详见于《列子·黄帝篇》，尽载其目，曰：“齔旋之潘为渊，止水之潘为渊，流水之潘为渊，滥水之潘为渊，沃水之潘为渊，水之潘为渊，雍水之潘为渊，汧水之潘为渊，肥水之潘为渊，是为九渊。”按《尔雅》云：“滥水正出，即槛泉也。”沃泉下出，泉穴出，者反入，者出不流。”又“水决之泽为汧，肥者出同而归异。”皆禹所名也。《尔雅》之书，非周公所作，盖是训释三百《诗》篇所用字，不知列子之时，已有此书否？细碎虫鱼之文，列子决不肯留意，得非偶相同邪？《淮南子》有九璇之渊，许叔重云：“至深也。”贾谊《吊屈赋》：“袭九渊之神龙。”颜师古曰：“九渊，九旋之川，言至深也。”与此不同。

【译文】 《庄子》记载壶丘子见季咸的事说：“大鱼在水中盘旋所引起的回流为渊，不流动之水的回流为渊，流动之水的回流也为渊，渊有九名，这里所说的只是其中的三种。”此事详见于《列子·黄帝篇》，其中详尽地记述了渊的九种名目。该篇记壶子说：“大鱼在水中盘旋所引起的回流为渊，不流动之水的回流为渊，流动之水的回流为渊，滥水（即涌出之水）的回流为渊，沃水（即自上冲下之水）的回流为渊，浚水（即傍出之水）的回流为渊，雍水（即雍塞之水）的回流为渊，汧水（即决入沼泽之水）的回流为渊，肥水（即同出异归或异出同归）之水的回流为渊，这就是所谓的九渊。”按：《尔雅》说：“滥水正出”，即槛泉；“沃泉下出，浚泉穴出，磳水决出复归，汧水决出而不流。”又说：“水决入沼泽为汧，同源而异归为肥。”这些都是大禹所定的名称。《尔雅》一书并非周公所作，而是为了训释《诗经》三百篇中所用的字才编写的，不知在列子之时，是否已经有了此书？为什么两书所说的渊名完全相同呢？细碎的鸟兽虫鱼名称，列子绝不会留意，莫非是偶然相同吗？《淮南子》中提到九璇之渊，许慎解释说：“最深的渊”。贾谊的《吊屈原赋》中有“袭九渊之神龙。”颜师古注释说：“九渊，即九旋之川，也就是说是最深的。”许、颜的说法与《列子》、《庄子》不同。

东坡论庄子

【原文】 东坡先生作《庄子祠堂记》，辩其不诋訾孔子。“尝疑《盗跖》、《渔父》则真若诋孔子者，至于《让王》、《说剑》，皆浅陋不入于道。反复观之，得其《寓言》之终曰：‘阳子居西游于秦，遇老子。其往也，舍者将迎其家，公执席，妻执巾栉，舍者避席，炆者避灶。其反也，与之争席矣。’去其《让王》、《说剑》、《渔父》、《盗跖》四篇，以合于《列御寇》之篇，曰：‘列御寇之齐，中道而反，曰：‘吾惊焉，吾食于十浆，而五浆先馈。’”然后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庄子之言未终，而昧者剿之，以入其言尔。”东坡之识见至矣、尽矣。故其《祭徐君猷文》云：“争席满前，无复十浆而五馈。”用为一事。今之庄周书《寓言》第二十七，继之以《让王》、《盗跖》、《说剑》、《渔父》，乃至《列御寇》为第三十二篇，读之者可以涣然冰释也。予按《列子》书第二篇内首载御寇馈浆事数百言，即缀以杨朱争席一节，正与东坡之旨异世同符，而坡公记不及此，岂非作文时偶忘之乎？陆德明释文：“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妄窜奇说，若《阙弈》、《意修》之首，《危言》、《游凫》、《子胥》之篇，凡诸巧杂，十分有三。《汉·艺文志》《庄子》五十二篇，即司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诡诞，或似《山海经》，或类占梦书，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内篇众家并同。”予参以此说，坡公所谓昧者，其然乎？《阙弈》、《游凫》诸篇，今无复存矣。

【译文】 苏东坡先生曾写过一篇《庄子祠堂记》，极力论证庄子并不诋毁孔子。他说：“我曾怀疑《盗跖》与《渔父》二篇的确像是诋毁孔子的，至于《让王》、《说剑》二篇则结构松散，文辞浅陋，其思想与庄子的道家思想格格不入，显系伪作。我经过反复的阅读、揣摩，发现《寓言》篇的结尾说：‘阳子居（即杨朱，字子居）向西游历秦国，半道上遇见老子。当他到达沛城的时候，馆舍的客人出来迎接他到客舍，男主人拿着席子侍候他坐下休息，女主人则送来梳洗用品，毕恭毕敬；有的客人连忙离席而去，烤火的人也急忙离开灶台悄悄溜走。当阳子居从沛地反回时，馆舍的客人们都同他随意争席而坐，不分彼此了。’下面如果去掉《让王》、《说剑》、《渔父》、《盗跖》四篇，直接与《列御寇》的首段相接，文意是非常通顺的。《列御寇》的第一段说：‘列御寇前往齐国，半道就返回来了，说：‘我碰到了令人感到惊奇的事情，我曾在十家茶馆喝饮料，竟有五家争先把饮品送上来。’”经过揣摩，我恍然大悟，不禁说道：这本来就是同一篇的内容。庄子的话还没有说完，愚昧无知的人就将它强行割裂

开来，以便插入自己的作品。”苏东坡的见解实在是太高明、太周全了。所以，他的《祭徐君猷文》说：“人人争先恐后地抢占座位，不再有到十家吃饭而五家抢先上菜的情景。”将杨朱和列御寇的事视为一件事。今天看到的《庄子》中，《寓言》为第二十七篇，接着是《让王》、《盗跖》、《说剑》、《渔父》四篇，《列御寇》被列为第三十二篇，阅读时隔过中间四篇，将《寓言》与《列御寇》两篇直接连在一起读，就会感到许多疑点都涣然冰释，不复存在。

在《列子》第二篇中，先记载了列御寇被店家先行馈饷饮品的事，竟用了数百字，紧接着便记述杨朱争席一事，正好与苏东坡的意思完全相同，尽管两人的时代相差一千余年。不过，在苏东坡的文章中只字未提《列子》的记载，莫非是写文章时偶然忘记了吗？

陆德明的《经典释文》载：“郭子玄说：个别有点歪才的学者，不知天高地厚，竟然在《庄子》中大量掺假，如《阙奔》、《意修》二篇的开头，和《危言》、《游鳧》、《子胥》等篇中，被巧妙地掺入的伪作，竟占十分之三以上。《汉书·艺文志》说《庄子》有五十二篇，也就是司马彪和孟氏所注的那个本子，语言多有诡诞之处，有些像是《山海经》，有些像是占梦书，因此，作注的人根据自己的见解随意取舍，只有《庄子》的内篇，各家都是一样的。”我参考了这种说法，苏东坡先生所说的愚昧无知之人，莫非指的就是这些人？《阙奔》、《游鳧》等篇，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了。

列子书事

【原文】 《列子》书事，简劲宏妙，多出《庄子》之右，其言惠盎见宋康王，王曰：“寡人之所说者，勇有力也，客将何以教寡人？”盎曰：“臣有道于此，使人虽勇，刺之不入，虽有力，击之弗中。”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闻也。”盎曰：“夫刺之不入，击之不中，此犹辱也。臣有道于此，使人虽有勇弗敢刺，虽有力弗敢击。夫弗敢，非无其志也。臣有道于此，使人本无其志也。夫无其志也，未有爱利之心也。臣有道于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欢然皆欲爱利之，此其贤于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观此一段语，宛转四反，非数百言曲而畅之不能了，而洁净粹白如此，后人笔力，渠复可到耶！三不欺之义，正与此合：不入不中者，不能欺也；弗敢刺击者，不敢欺也；无其志者，不忍欺也。魏文帝论三者优劣，斯言足以蔽之。

【译文】 《列子》记事，简洁明快，气势磅礴，结构宏妙，大多数胜过

《庄子》。它记载惠盎见宋康王，宋康王说：“我所喜欢的是勇而有力的人，不喜欢仁义道德，你准备教导我什么呢？”惠盎回答说：“我这里有‘道’，使人虽勇，刺他不进；虽有力，击他不中。”康王说：“好，这才是我想听的。”惠盎说：“虽然刺他不进，击他不中，但是这仍然是一件耻辱。我这里有道，可以使人虽有勇却不敢刺，虽有力却不敢击。然而，不敢，并非没有那份心思。我这里有道，可以使人原本就没有想刺想击的意思。但是，没有那份心思，并不等于有助他一臂之力的愿望。我这里有道，可以使天下的男女老幼无不渴望早日为他效力。这显然要比大王所说的勇而有力之人强得多，也在前面所说的四个层次（即勇而有力；刺不中、击不中；不敢刺、不敢击；本无击刺之心）之上。”这段话辗转递进四层，层层深入，常人没有数百字是无法将它说清楚的，但《列子》论得干脆利落，言简意赅，绝无拖泥带水之感，后人谁的笔力能够达到如此境界呢？《列子》的这段论述，正巧与三不欺之义相合：刺不进、击不中，乃不能欺；不敢击不敢刺，乃不敢欺；本无击刺之心，乃不忍心欺。魏文帝曹丕曾论证三者的优劣，这段话足以概括了。

天生对偶

【原文】 旧说以红生白熟、脚色手纹、宽焦薄脆之属，为天生偶对。触类而索之，得相传名句数端，亦有经前人纪载者，聊疏于此，以广多闻。如“三川太守，四目老翁”，“相公公相子，人主主人翁”，“泥肥禾尚瘦，晷短夜差长”，“断送一生惟有，破除万事无过”，“北斗七星三四点，南山万寿十千年”，“迅雷风烈风雷雨，绝地天通天地人”，“筵上枇杷，本是无声之乐；草间蚱蜢，还同不系之舟”，皆绝工者。又有用书语两句而证以俗谚者，如“尧之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谚曰“外甥多似舅”，“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谚曰“便重不便轻”之类是也。

【译文】 旧说以为“红生白熟”、“脚色手纹”、“宽焦薄脆”一类语是天生的巧对。连类而引伸，可以得到相传的名句几段，也有业经前人记载过的，随手记在这里，来增广见闻。如“三川太守，四目老翁”；“相公公相子，人主主人翁”；“泥肥禾尚瘦，晷短夜差长”；“断送一生惟有，破除万事无过”；“北斗七星三四点，南山万寿十千年”；“筵上枇杷，本是无声之乐；草间蚱蜢，还同不系之舟”（“枇杷”与“琵琶”，“蚱蜢”与“舢舨”同音），都极工整。又有用书中语言两句而以俗语来证明的，如：“尧之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俗语

说：“外甥多似舅”（尧的二个女儿为舜妻）；“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百钧”，三千斤）。俗语说：“便重不便轻”之类就是。

铜雀灌砚

【原文】 相州，古邺都，魏太祖铜雀台在其处，今遗址仿佛尚存。瓦绝大，艾城王文叔得其一，以为砚，饷黄鲁直，东坡所为作铭者也。其后复归王氏。砚之长几三尺，阔半之。先公自燕还，亦得二砚，大者长尺半寸，阔八寸，中为瓢形，背有隐起六隶字，甚清劲，曰“建安十五年造”。魏祖以建安九年领冀州牧，治邺，始作此台云。小者规范全不逮，而其腹亦有六篆字，曰“大魏兴和年造”，中皆作小簇花团。兴和乃东魏孝静帝纪年，是时，正都邺，与建安相距三百年，其至于今，亦六百余年矣。二者皆藏侄孙 处。予为铭建安者曰：“邺瓦所范，嘻其是邪？几九百年，来随汉槎。淬尔笔锋，肆其滂葩。实宝此，以昌我家。”铭兴和者曰：“魏元之东，狗脚于邺。吁其瓦存，亦禅千劫。上林得雁，获贖归茆。玩而铭之，哀泪栖睫。”赣州雩都县，故有灌婴庙，今不复存。相传左地尝为池，耕人往往于其中耕出古瓦，可 为砚。予向来守郡日所得者，缺两角，犹重十斤，沈墨如发硎，其光沛然，色正黄，考德仪年，又非铜雀比，亦尝刻铭于上曰：“范土作瓦，既埴既已。何断制于火，而卒以圉水？庙于汉侯，今千几年？何址蹶祀歇，而此独也存？县赣之雩，曰若灌池。研为我得，而铭以章之。”盖纪实也。

【译文】 相州（治今河南安阳），也就是古代的邺都，乃是魏太祖曹操铜雀台的所在地，其遗址至今仍然依稀可辨。这里出土的古瓦极大，艾城的王文叔曾得到一块，制成砚台后赠送给了黄鲁直（即黄庭坚），也就是苏东坡曾为之作铭的那块。后来，这块砚又重归王文叔。砚长近三尺，宽一尺半。我已故的父亲从燕京（今北京西南）回来时，也得到两块砚，大的长一尺半寸，宽八寸，中为瓢形，背面有六个苍劲有力的隶体字：“建安十五年造”。魏太祖于汉献帝建安九年（204年）任冀州牧，治所设在邺城，随之便开始建造铜雀台。那块小砚的规格无法与大的相比，其腹部也有六个篆体字：“大魏兴和年造”，中部都是小簇的花团。兴和乃是东魏孝静帝的年号，当时的确建都于邺，上距建安时代已有三百余年，下迄今日（南宋），也有六百余年了。现在这两块砚都收藏在我的侄孙洪晷处。我为建安年间的那块作铭说：“烧制这块瓦，难道是为了做砚台吗？从汉末修建铜雀台至今已将近九百年了，铜雀台早已毁灭而这块古瓦又

重见天日，为人所用。它供你研墨、淬笔锋，然后任意挥毫，尽情书写。洪晷一定要把这块砚台视为至宝，以便使咱们洪家兴旺昌盛。”

我为兴和年间的那块砚所作的铭文是：“元魏东迁后，又在邺城苟延残喘十几年。可叹东魏时期的屋瓦尚可见到，而东魏灭亡已经六、七百年了。上林得雁，获贖归笈。我仔细地反复观看这块砚台，并为它作铭，禁不住浮想连翩，老泪横流。”

赣州（今属江西）雩都县过去有座灌婴庙，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相传庙的左边以前曾是个水池，农夫们在这里耕种时经常发现古瓦，可以制成砚。我当初在江西做地方官时所得的一块，被削去两角，还有十几斤重。研墨如在磨刀石上磨刀，砚台颜色正黄，富有光泽，在考证时代、弄清史实方面，它根本无法与铜雀台的古瓦相比。我曾在此砚上刻写铭文说：“把泥土装进模具做瓦，利用粘土很快就可以制成。何故以火烧制而成，最终却用以圈水？此庙建于汉初颍阴侯灌婴之时，至今已有一千数百年，为什么庙塌祀绝而此瓦独存呢？这是因为赣州雩都县的灌池保存了它。此瓦制成砚台后为我所得，因而特意作铭文以记之。”这里所记的都是事实。

崔斯立

【原文】 崔立之，字斯立，在唐不登显仕，他亦无传，而韩文公推奖之备至。其《蓝田丞壁记》云：“种学绩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其《赠崔评事》诗云：“崔侯文章苦捷敏，高浪驾天输不尽。顷从关外来上都，随身卷轴车连轸。朝为百赋犹郁怒，暮作千诗转遒紧。才豪气猛易语言，往往蛟螭杂蝼蚓。”其《寄崔二十六》诗云：“西城员外丞，心迹两崛奇。往岁战词赋，不将势力随。傲兀坐试席，深丛见孤罨。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为。四坐各低面，不敢捩眼窥。佳句喧众口，考官敢瑕疵？连年收科第，若摘颌底髭。”其美之如是。但记云“贞元初，挟其能，战艺于京师，再进再屈于人”，而诗以为“连年收科第”，何其自为异也？予按杭本韩文，作“再屈千人”，蜀本作“再进屈千人”，《文苑》亦然。盖他本误以千字为于也。又《登科记》“立之以贞元三年第进士，七年，中宏词科”，正与诗合。观韩公所言，崔作诗之多可知矣，而无一篇传于今，岂非蝼蚓之杂，惟敏速而不能工邪？

【译文】 崔立之，字斯立，在唐朝没有做大官，其他书中也没有他的传记，而韩文公（韩愈）推崇奖励他很高。韩愈的《蓝田丞壁记》说他：“积累了学术

和文才，以蓄积其所有的知识，作文广大渊博，一天天趋于宏伟奔放。”韩愈的《赠崔评事》诗说：“崔侯文章苦捷敏，高浪驾天输不尽。顷从关外来上都，随身卷轴车连轸。朝为百赋犹郁怒，暮作千诗转遒紧。才豪气猛易语言，往往蛟螭杂蝼蚓（崔君写文章十分敏捷，像漫天的高浪一样奔流不完。最近从函谷关外来到京城，随身带着他的文章一车连一车。早上作了百篇赋尚未将心中郁怒发泄完，晚上写了千首诗越见遒劲有力。才力大志气猛对语言的使用不甚重视，往往在蛟龙式的语言中夹杂蝼蛄蚯蚓）。”韩愈《寄崔二十六》诗说：“西城员外丞，心亦两崛奇。往岁战词赋，不将势力随。傲兀坐试席，深丛见孤黑。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为。四坐各低面，不敢汨眼窥。佳句喧众口，考官敢瑕疵？连年收科第，若摘颌底髭（西城蓝田的员外丞崔立之，心思和行迹都很奇特。去年以词赋与人比胜败，不依靠任何人的势力。高傲地坐在应试的席位上，在许多人中如同熊黑之在貉群里。文章如同翻江倒海似的完成，他并非用心写作。旁边许多人都低下头来，不敢转眼偷看。其中好句在众口中传诵，考官哪里敢非议？连年考中科举，好比摘去颌下胡子一样容易）。”但《蓝田丞壁记》说：“贞元初年，依仗他的才能，在京城与人比试技艺，两次应试两次被屈居下第，而诗却说“连年考中科举”，为什么自己说得不同呢？按：杭州刊本韩文作“再次被人屈居下第”，四川刊本却作“再次应举使千人屈服”，《文苑英华》也这样。大约是杭州本和其他版本误以“干”字为“于”字。又《登科记》：“崔立之以贞元三年（787年）中进士，七年（791年），中博学宏词科”，正和诗中所说相合。看韩愈所说，崔立之作诗的数量很多就可知了，但没有一篇流传至今，岂非杂有蝼蛄蚯蚓一类的语言，只求敏捷快速而不能精工吗？

古迹不可考

【原文】 郡县山川之古迹，朝代变更，陵谷推迁，盖已不可复识。如尧山、历山，所在多有之，皆指为尧、舜时事，编之图经。会稽禹墓，尚云居高丘之颠，至于禹穴，则强名一罅，不能容指，不知司马子长若之何可探也？舜都蒲坂，实今之河中所谓舜城者，宜历世奉之唯谨。按张芸叟《河中五废记》云：“蒲之西门所由而出者，两门之间，即舜城也，庙居其中，唐张宏靖守蒲，尝修饰之。至熙宁之初，垣墉尚固。曾不五年，而为埏陶者尽矣。舜城自是遂废。又河之中泠一洲岛，名曰中，所以限桥。不知其所起，或云汾阳王所为。以铁为基，上有河伯祠，水环四周，乔木蔚然。嘉靖八年秋，大水冯襄，了无遗迹。

中 自此遂废。”显显者若此，他可知矣。东坡在凤翔，作《凌虚台记》云：“尝试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之祈年、橐泉，其南则汉武帝之长杨、五柞，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记其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坚固而不可动。然数世之后，欲求其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谓物之废兴成毁，皆不可得而知，则区区泥于陈迹，而必欲求其是，盖无此理也。《汉书·地理志》，扶风雍县有橐泉宫，秦孝公起。祈年宫，惠公起，不以为穆公。

【译文】 全国各地的名胜古迹，由于朝代更替，地形地貌巨变，以致很大一部分已遭到破坏，无法见其梗概。如尧山、历山，许多地方都有，都说是在尧、舜曾活动过的地方，而且无一不编入地理书中。会稽的禹墓，据说尚在高丘之顶，至于禹穴，则是胡乱命名一个裂缝，这个裂缝小得连手指也容不下，不知司马迁当年是如何下探禹穴的？舜的都城蒲坂，实际上就是今天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所谓的舜城，本应当世世代代毕恭毕敬地奉祀，然而据张芸叟的《河中五废记》记载：“蒲州城两个西门之间的地方，就是古舜城的遗址，舜庙位居中间，唐朝的张宏靖在这里做官时，曾对它进行了修葺。到神宗熙宁初年，城墙还相当坚固。可是还不到五年时间，就被烧制陶器的工人们挖光了。舜城从此消失。另外，在黄河之中矗立着一个小岛，名叫中砥，是用来固定桥梁的。不知道从何时开始有，有人说是唐代名将、汾阳王郭子仪主持建造的。小岛以铁柱为基，上有河神庙，四面环水，还有一些茂盛的树木花草。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年）秋，黄河泛滥，中砥被冲得无影无踪。从此以后，谁也没有再看到过。”著名的古迹命运如此，其他的也就可想而知了。

苏东坡在凤翔府（今属陕西）时，曾作《凌虚台记》说：“我登台向东眺望，看到的是秦穆公祈年宫、橐泉宫的旧址，其南则是汉武帝长杨宫、五柞宫的遗址，其北则是隋朝仁寿宫、唐朝九成宫的旧址。这些建筑在当初都是盛极一时的，规模宏伟，结构精巧，而且坚不可摧。但是，在数代之后，别说想看其轮廓，就是破瓦残垣，也难得一见。”人们对事物兴衰成败的规律尚知之甚少，而要拘泥于区区的古迹，非要精确地求得其真实面貌不可，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汉书·地理志》说扶风郡雍县（今陕西凤翔）有橐泉宫，是秦孝公所建的。又有祈年宫，是秦惠公所建的。可见，班固并不认为这两个宫殿是秦穆公时修建的。

卷十三

科举恩数

【原文】 国朝科举取士，自太平兴国以来，恩典始重。然各出一时制旨，未尝辄同，士子随所得而受之，初不以官之大小有所祈诉也。太平之二年，进士一百九人，吕蒙正以下四人得将作丞，余皆大理评事，充诸州通判。三年，七十四人，胡旦以下四人得将作丞，余并为评事，充通判及监当。五年，一百二十一人，苏易简以下二十三人皆得将作丞、通判。八年，二百三十九人，自王世则以下十八人，以评事知县，余授判司簿尉。未几，世则等移通判，簿尉改知令录。明年，并迁守评事。雍熙二年，二百五十八人，自梁颢以下二十一人，才得节察推官。端拱元年，二十八人，自程宿以下，但权知诸县簿尉。二年，一百八十六人，陈尧叟、曾会至得光禄丞直史馆，而第三人姚揆，但防御推官。淳化三年，三百五十三人，孙何以下，二人得将作丞，二人评事，第五人以下，皆吏部注拟。咸平元年，孙仅但得防推。二年，孙暨以下，但免选注官。盖此两榜，真宗在谅，礼部所放，故杀其礼。及三年，陈尧咨登第，然后六人得将作丞，四十二人评事；第二甲一百三十四人，节度推官、军事判官，第三甲八十人，防团军事推官。

【译文】 本朝用科举选拔士人，自从太平兴国年间以来，恩典才开始优厚。然而都是出于一时的圣旨诏命，并不是每次相同，士人也是恩典多少收领得多少；并不因为封官的大小而有所祈请上诉。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录取进士一百另九人，吕蒙正以下前四名被封为将作丞，余下的都封为大理评事，任各州的通判。三年（978年），录取七十四人，胡旦以下前四名封为将作丞，余下的都封为大理评事，任各州通判和监当。五年（980年），录取一百二十一人，苏易简以下前二十三名都封为将作丞任通判。八年（983年），录取二百三十九人，从王世则以下前十八名，封评事任知县，其余的授为判司主簿县尉。没有多久，王世则等迁为通判，原任主簿县尉的改任知县和录事。第二年，都迁为代理评事。雍熙二年（986年），录取二百五十八人，从梁颢以下前二十一名，才被授为节察推官。端拱元年（988年），录取二十八人，从程宿以下，仅仅授为代理

各县的主簿县尉。二年（999年），录取一百八十六人，陈尧叟、曾会只被授为光禄丞直史馆，而第三名姚揆，仅仅授为防御推官。淳化三年（992年），录取三百五十三人，孙何以下前二名授为将作丞，其余二名授为评事，第五名以下，都由吏部拟定。咸平二年（998年），孙仅只被授为防御推官。二年（999年），孙暨以下，只是免于考选拟定官职。这是因为这两次科举，真宗正在服丧期间，由礼部来放榜公布，所以降低了规格。等到三年（1000年），陈尧咨被录取，然后前六名授为将作丞，其余四十二名任为评事；第二甲一百三十四人，授为节度推官、军事判官；第三甲八十人，授为防团军事推官。

下第再试

【原文】 太宗雍熙二年，已放进士百七十九人，或云：“下第中甚有可取者。”乃令复试，又得洪湛等七十六人，而以湛文采迢丽，特升正榜第三。端拱元年，礼部所放程宿等二十八人，进士叶齐打鼓论榜，遂再试，复放三十一人，而诸科因此得官者至于七百。一时待士可谓至矣。然太平兴国末，孟州进士张两光，以试不合格，纵酒大骂于街衢中，言涉指斥，上怒斩之，同保九辈永不得赴举。恩威并行，至于如此。（“张两”，馆本作“张雨”）

【译文】 太宗雍熙二年（985年），已放榜公布新科进士一百七十九人，有人说：“在落选的士人中还有很多有用之才。”于是，太宗下令再考一次，结果又得到洪湛等七十六人。由于洪湛文采迢丽，皇帝特意将他升为正榜第三名。端拱元年（988年），礼部已放榜公布程宿等二十八人为进士，可进士叶齐又击鼓论榜，于是朝廷下令再考一场，结果又得到三十一人，而诸科因此而得官的有七百余人。朝廷对士人的重视可谓登峰造极、鼎盛一时了。然而在太平兴国末年，孟州（今河南孟县）进士张两光（“两光”馆本作“雨光”）因为没有通过复试，在闹市区纵酒大骂，指责朝廷，太宗一怒之下将他处斩，同保之人九代永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太宗皇帝对士人恩威并用，竟达到这种程度。

试赋用韵

【原文】 唐以赋取士，而韵数多寡，平侧次叙，元无定格。故有三韵者，《花萼楼赋》以题为韵是也。有四韵者，《英赋》以“呈瑞圣朝”，《舞马赋》以

“奏之天廷”，《丹甑赋》以“国有丰年”，《泰阶六符赋》以“元亨利贞”为韵是也。有五韵者，《金茎赋》以“日华川上动”为韵是也。有六韵者，《止水》、《魍魎》、《人镜》、《三统指归》、《信及豚鱼》、《洪钟待撞》、《君子听音》、《东郊朝日》、《蜡日祈天》、《宗乐德》、《训胄子》诸篇是也。有七韵者，《日再中》、《射己之鹄》、《观紫极舞》、《五声听政》诸篇是也。八韵有二平六侧者，《六瑞赋》以“俭故能广，被褐怀玉”，《日五色赋》以“日丽九华，圣符土德”，《径寸珠赋》以“泽浸四荒，非宝远物”为韵是也。有三平五侧者，《宣耀门观试举人》以“君圣臣肃，谨择多士”，《县法象魏》以“正月之吉，悬法象魏”，《玄酒》以“荐天明德，有古遗味”，《五色土》以“王子毕封，依以建社”，《通天台》以“洪台独出，浮景在下”，《幽兰》以“远芳袭人，悠久不绝”，《日月合璧》以“两曜相合，候之不差”，《金 》以“直而能一，斯可制动”为韵是也。有五平三侧者，《金用砺》以“商高宗命传说之官”为韵是也。有六平二侧者，《旗赋》以“风日云舒，军容清肃”为韵是也。自大和以后，始以八韵为常。唐庄宗时尝覆试进士，翰林学士承旨卢质，以《后从谏则圣》为赋题，以“尧、舜、禹、汤倾心求过”为韵。旧例，赋韵四平四侧，质所出韵乃五平三侧，大为识者所诮，岂非是时已有定格乎？国朝太平兴国三年九月，始诏自今广文馆及诸州府、礼部试进士律赋，并以平侧次用韵，其后又有不依次者，至今循之。

【译文】 唐朝以赋取士，而对韵数的多少，平仄的次序，最初并没有明确规定。所以有三韵的，如《花萼楼赋》以题为韵。有四韵的，例如《碣英赋》以“呈瑞圣朝”为韵，《舞马赋》以“奏之天廷”为韵，《丹甑赋》以“国有丰年”为韵，《泰阶六符赋》以“元亨利贞”为韵等。有五韵的，例如《金茎赋》以“日华川上动”为韵。有六韵的，例如《止水》、《魍魎》、《人镜》、《三统指归》、《信及豚鱼》、《洪钟待撞》、《君子听音》、《东郊朝日》、《蜡日祈天》、《宗乐德》、《训胄子》等篇都是。有七韵的，例如《日再中》、《射己之鹄》、《观紫极舞》、《五声听政》等篇都是。八韵有二平六仄的，例如《六瑞赋》以“俭故能广，被褐怀玉”为韵，《日五色赋》以“日丽九华，圣符土德”为韵，《径寸珠赋》以“泽浸四荒，非宝远物”为韵等。有三平五仄的，例如《宣耀门观试举人》以“君圣臣肃，谨择多士”为韵，《悬法象魏》以“正月之吉，悬法象魏”为韵，《玄酒》以“荐天明德，有古遗味”为韵，《五色土》以“王子毕封，依以建社”为韵，《通天台》以“洪台独出，浮景在下”为韵，《幽兰》以“远芳袭人，悠久不绝”为韵，《日月合璧》以“两曜相合，候之不差”为韵，《金碯》以“直而能一，斯可制动”为韵等。有五平三仄的，例如《金用砺》以“商高宗命传说之官”为韵等。有六平二仄的，例如《旗赋》以“风日云舒，军容清肃”为

韵等。自从唐文宗大和年间以后，才开始以八韵为常。后唐庄宗时曾复试进士，翰林学士承旨卢质以《后从谏则圣》为赋题，以“尧、舜、禹、汤倾心求过”为韵。依照旧例，赋韵为四平四仄，卢质所出的韵乃是五平三仄，因此颇受行家们的讥笑，莫非那时候已经有了固定的格式？大宋朝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九月，太宗皇帝才下诏规定：从今以后，广文馆及诸州府、礼部考试进士律赋，都以平仄的次序用韵。后来又出现了不依平仄次序的情形，至今仍然沿袭这种做法。

贞元制科

【原文】 唐德宗贞元十年，贤良方正科十六人，裴膺为举首，王播次之，隔一名而裴度、崔群、皇甫 继之。六名之中，连得五相，可谓盛矣！而邪正簪不侔。度、群同为元和宰相，而 以聚敛贿赂亦居之，度、群极陈其不可，度耻其同列，表求自退，两人竟为 所毁而去。且三相同同时登科，不可谓无事分，而玉石杂糅，薰莸同器，若默默充位，则是固宠患失，以私妨公，裴、崔之贤，谊难以处也。本朝韩康公、王岐公、王荆公亦同年联名，熙宁间，康公、荆公为相，岐公参政，故有“一时同榜用三人”之语，颇类此云。

【译文】 唐德宗贞元十年，贤良方正科录取十六个人，裴膺是第一名，王播是第二名，隔一名是裴度、崔群、皇甫 三人相继。前六名中间，连接着得到五位宰相，可以说是一时的盛事了。但他们中间，邪人正人完全不能相比。裴度、崔群同时担任元和年间的宰相，而皇甫 大量受贿也居然在宰相之列，裴度、崔群竭力陈奏说这个人不能用，裴度还耻于和他共事，上表请求自己引退，这两个人最终被皇甫 所毁谤而离去。而且三位宰相同同时考中，不能说不是命中注定，但美玉和石头混合，香草和臭草在同一器皿中，如果默不作声地居于其位，那就是想巩固恩宠害怕丢官，以私害公，裴度、崔群的贤明，按道理来说是不能这样做的。本朝韩康公（韩绛），王岐公（王溥）、王荆公（王公石）也是同年考中而且名次相联，康公、荆公做宰相，岐公做参知政事，所以有“一时同榜用三人”的话，和这情况很相类似。

贻子录

【原文】 先公自燕归，得龙图阁书一策，曰《贻子录》，有“御书”两印存，不言撰人姓名，而序云：“愚叟受知南平王，政宽事简。”意必高从诲擅荆渚时，宾僚如孙光宪辈者所编，皆训儆童蒙。其《修进》一章云，咸通年中，卢子期著《初举子》一卷，细大无遗。就试三场，避国讳、宰相讳、主文讳。士人家小子弟，忌用熨斗时把帛，虑有拽白之嫌。烛下写试无误笔，即题其后云“并无揩改涂乙注”，如有，即言字数，其下小书名。同年小录是双只先辈各一人分写。宴上长少分双只相向而坐，元以东为上，僚以西为首，给、舍、员外、遗、补，多来突宴，东先辈不迁，而西先辈避位。及吏部给春关牒，便称前乡贡进士，大略有与今制同者，独避宰相、主文讳，不复讲双只，先辈之名，他无所见。其《林园》一章谓茄为酪酥，亦甚新。

【译文】 先父洪皓从金国的燕京（今北京）回来时，得到一本龙图阁藏书，名叫《贻子录》，“御书”二字的印迹尚清晰可辨，却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只是在序言中说：“愚叟受知于南平王，政宽事简。”估计必定是五代南平王高从诲占据荆南（治今湖北江陵）时，其幕僚如孙光宪之流的人所编写的，内容都是训诫、教育儿童方面的。该书的《修进》一章说：唐懿宗咸通年间，卢子期著《初举子》一卷，事无巨细，没有不涉及的。如士人参加三场科举考试时，要避国讳、宰相讳和主考官的名讳。士人家在用熨斗熨帛时，忌讳小孩抓扯帛，以免有“拽白”（即交白卷）之嫌。士人夜间在灯下练习应试的诗文时，如果没有误笔，就在后面批道：“并无揩、改、涂、乙（做记号）、注”，如果有误笔，要说明字数，然后在下面用小字写上名字。同年小录是双只先辈各一人分写。在皇帝为新进所举办的宴会上，长幼分双只相向而坐，元以东为上，双亲以西为首，给事中、舍人、员外郎、拾遗、补阙等官员，时常不请而自来参加宴会。这时，东座的先辈不动，而西座的先辈让位。及至吏部颁发春关牒（唐宋时考中进士，登记入选，称为春关。朝廷发给的凭证，也称春关，又叫春关牒），则称前乡贡进士，大略与现在的制度有相同之处，只有避宰相、主考官的名讳，如今已不再讲双只先辈之名，其他书中未见记载。该书的《林园》一章中把茄子称为酪酥，也很新奇。

金花帖子

【原文】 唐进士登科，有金花帖子，相传已久，而世不多见。予家藏咸平元年孙仅榜盛京所得小录，犹用唐制，以素绫为轴，贴以金花，先列主司四人衔，曰：翰林学士给事中杨，兵部郎中知制诰李，右司谏直史馆梁，秘书丞直史馆朱，皆押字。次书四人甲子，年若干，某月某日生，祖讳某，父讳某，私忌某日。然后书状元孙仅，其所纪与今正同。别用高四寸绫，阔二寸，书“盛京”二字，四主司花书于下，粘于卷首，其规范如此，不知以何年而废也。但此榜五十人，自第一至十四人，惟第九名刘烨为河南人，余皆贯开封府，其下又二十五人亦然。不应都人士中选若是之多，疑亦外方人寄名托籍，以为进取之便耳。四主司乃杨励、李若拙、梁颙、朱台符，皆只为同知举。

【译文】 在唐朝，进士登科后都要得到一本精美的金花帖子，此制相传已久，而当今世上却很少能够看到原件。我家收藏有真宗咸平（998年）元年，孙仅在盛京（指北宋东京开封）考中时所得的小录，它仍然使用唐制，以白绫为轴，上贴金花，先列四位主考官的头衔，即：翰林学士给事中杨，兵部郎中知制诰李，右司谏直史馆梁，秘书丞直史馆朱，每个人都签署自己的名字。接着写的是四位主考官的年龄，某年某月某日生，祖父名字，父亲名字，私忌某日（此处指亲人死亡的纪念日）。然后写状元孙仅，所记的内容与现在的完全相同。另外，又用一张长四寸，宽二寸的绫子，上写“盛京”两个大字，下面是四位主考的花书，然后将它粘贴在帖子的卷首。金花帖子的规制就是这样，不知从哪一年开始被废除了。但是，此榜的五十个人中，从第一到第十四名，除第九名刘烨是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人之外，其余的籍贯都是东京开封府。从第十五名以后，又有二十五人的籍贯是开封府。京师士人考中的竟如此之多，显而易见是不合情理的，估计有不少外地士人寄名托籍，假称是京城人，以便在仕途上发展更为顺利。帖子上的四位主考官是：杨励、李若拙、梁颙、朱台符，当时都任同知举。

物之小大

【原文】 列御寇、庄周大言小言，皆出于物理之外。《列子》所载：“夏革

曰：渤海之东，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中有五山，高下周旋三万里，山之中间相去七万里，而五山之根无所连著。帝使巨鳌十五举首而戴之，叠为三番，六万岁一交焉。而龙伯之国有大人，举足不盈数千而暨山所，一钓而连六鳌，合负而趣归其国。于是岱舆、员峤二山，沈于大海。”张湛注云：“以高下周围三万里山，而一鳌头之所戴，而六鳌复为一钓之所引，龙伯之人能并而负之。计此人之形当百余万里，鲲鹏方之，犹蚊蚋蚤虱耳。太虚之所受，亦奚所不容哉！”《庄子·逍遥游》，首著鲲鹏事云：“北溟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徙于南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二子之语大若此，至于小言，则《庄子》谓：“有国于蜗之左角，曰触氏，右角曰蛮氏，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列子》曰：“江浦之间生么虫，其名曰焦螟。群飞而集于蚊睫，弗相触也，栖宿去来，蚊弗觉也。黄帝与容成子同斋三月，徐以神视，块然见之，若蒿山之阿，徐以气听，砰然闻之，若雷霆之声。”二子之语小如此。释氏维摩诘长者居丈室而容九百万菩萨并师子座，一芥子之细而能纳须弥。皆一理也。张湛不悟其寓言，而窃窃然以太虚无所不容为说，亦隘矣！若吾儒《中庸》之书，但云：“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则明白洞达，归于至当，非二氏之学一偏所及也。

【译文】 列御寇和庄子所说的“大”与“小”，都出于事物的常理之外。《列之》载夏革对商汤说：“渤海之东不知其几亿里的地方，有个大沟，实际上就是一个无底之谷。谷中有五座山，高低方圆各有三万里，每座山之间相距七万里，这五座大山的根基都无处依托。天帝派十五只巨龟举首顶戴五山。这些龟分为三班轮流托山，每六年一换班。而龙伯之国有个巨人，抬脚不到数十步就来到五座大山的所在地，下一次钩竟钓起六只巨龟，然后将它们拢在一起扛回本国。于是五大山中的岱舆、员峤二山从此沉入大海。”张湛注释说：“一座高低方圆达三万里的大山，竟被一只巨龟用头轻而易举地顶托着，而力能托山的六只巨龟却又被一钩钓出，然后并在一起扛走。由此估算，龙伯国巨人的身材当有一百余万里，鲲鹏与之相比，简直就像蚊蚋蚤虱一样。看来太虚（指深玄之理）之所受，也可谓是无所不容啦！”《庄子·逍遥游》记述鲲鹏的事说：“北方的海中有一种大鱼，它的名字叫鲲。鲲之大，不知道有几千里；变为鸟后，名叫鹏。当鹏向南海迁徙时，翅膀扇动，击水达三千余里，然后盘旋而上，离地达九万里。”列子和庄子所说的“大”，竟有如此之大。

至于说“小”，则《庄子》称：“在蜗牛壳的左角有个小国，名叫触氏，在右角也有个小国名叫蛮氏，两国为了争夺地盘而爆发战争，以致伏尸数万。得

胜的一方穷追猛打，长驱直入，深入敌境半个月后才撤兵返回。”《列子》说：“江浦之间有一种小虫，它的名子叫焦螟。大群的焦螟落脚于蚊子的一根眼睫毛上，谁也不会碰着谁。它们飞来飞去，在蚊子的睫毛上休息、过夜，蚊子也丝毫没有感觉。黄帝和容成子一起斋戒三个月，然后平心静气地凝神观瞧，清晰地看见了焦螟，就像是嵩山下的大丘陵一样；他们又平心静气地凝神倾听，听到了焦螟发出的‘砰、砰’之声，就像是震耳欲聋的霹雷一样。”庄子和列子所说的“小”，竟小到这种程度。佛教徒维摩诘长者自居斗室却可容纳九百万尊菩萨及其狮子座，一粒芥子那样小的地方竟能容纳须弥山，其道理都是一样的。张湛不明白列子的寓言中所包含的深刻哲理，却喋喋不休地说什么太虚无所不容，真是太狭隘、太没有见识了！至于我们儒家经典《中庸》一书中只是说：“天地是最为广阔的，但是人们还是感到不满意，因此君子所谈论的‘大’，大得天下根本无法容纳；君子所谈论的‘小’，小得天下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进得去。”这话说得明白透彻，恰如其分，绝不是列子和庄子的偏颇学说所能比拟的。

郭令公

【原文】 唐人功名富贵之盛，未有出郭汾阳之右者。然至其女孙为宪宗正妃，历五朝，母天下，终以不得志于宣宗而死，自是支胄不复振。及本朝庆历四年，访求厥后，仅得裔孙元亨于布衣中，以为永兴军助教。欧阳公知制诰，行其词曰：“继绝世，褒有功，非惟推恩以及远，所以劝天下之为人臣者焉。况尔先王，名载旧史，勋德之厚，宜其流泽于无穷，而其后裔不可以废。往服新命，以荣厥家！”且以二十四考中书令之门，而需一助教以为荣，吁，亦浅矣！乃知世禄不朽，如春秋诸国，至数百年者，后代不易得也。

【译文】 在唐朝，功名富贵之盛，没有能超过汾阳郡王郭子仪的。然而，到了第三代，他的孙女虽然贵为唐宪宗的正妃，而且亲历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五朝，最终却在宣宗时因为郁郁不得志而死，郭家从此一蹶不振。到了大宋朝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政府访求郭子仪的后代，费了好长时间才找到一个已沦为普通平民的郭元亨，便把他任命为永兴军（治今陕西西安）助教。当时，欧阳修任知制诰，他所撰写的制词说：“使濒于断绝的家族得以延续，使有功之人的后代得到褒奖，并非只是为了广布恩泽以及远，而是为了以此勉励天下那些做人臣的人。况且你的祖上名垂青史，功德盖世，本应当流泽于无穷，所以他的后代是不可被埋没不用的。为了荣耀郭氏家族，你赶快奉命上任去吧！”

曾任中书令（其地位高于宰相）达二十四年，并被唐德宗尊为“尚父”的名将郭子仪，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后代竟需要用一个小小的助教职务来荣耀门庭，唉，这也实在是太可笑了！由此可知，世袭爵禄，要想像春秋时代各国那样延续数百年，在后代是非常困难的。

纪年兆祥

【原文】 自汉武建元以来，千余年间，改元数百，其附会离合为之辞者，不可胜书，固亦有晓然而易见者。如晋元帝永昌，郭璞以为有二日之象，果至冬而亡。桓灵宝大亨，识者以为一人二月了，果以仲春败。萧栋、武陵王纪，同岁窃位，皆为天正，以为二人一年而止，其后皆然。齐文宣天保，为一大人只十，果十年而终。然梁明帝萧岿亦用此，而尽二十三年。或又云，岿蕞尔一邦，故非眡祥所系。齐后主隆化，为降死；安德王延宗德昌，为得二日。周武帝宣政，为宇文亡日；宣帝大象，为天子冢。萧琮、晋出帝广运，为军走。隋炀帝大业，为大苦末。唐僖宗广明，为唐去丑口而著黄家日月，以兆巢贼之祸。钦宗靖康，为立十二月康，果在位满岁，而高宗由康邸建中兴之业。熙宁之末将改元，近臣撰三名以进，曰“平成”，曰“美成”，曰“丰亨”，神宗曰：“成字负戈，美成者，犬羊负戈。亨字为子不成，不若去亨而加元。”遂为元丰。若隆兴则取建隆、绍兴各一字，与唐贞元取贞观、开元之义同。已而嫌与颜亮贞隆相近，故二年即改乾道。及甲午改纯熙，既已布告天下，予时守赣，贺表云：“天永命而开中兴，方茂卜年之统；时纯熙而用大介，载新纪号之文。”迨诏至，乃为淳熙，盖以出处有“告成《大武》”之语，故不欲用。

【译文】 自从汉武帝开始用“建元”年号以来，一千多年之间，改变年号几百次，其中用牵强附会拆开合并去加以解释的，不能一一记载，但本来也有明白易见的。例如晋元帝改年号为永昌，郭璞认为“昌”字是两个日字，而天无二日，元帝果然到冬天就死了。桓灵宝（桓玄）篡位，年号大亨，有识之士认为大亨二字拆开是“一人二月了（終了）”，桓玄果然在仲春二月失败。萧栋和武陵王萧纪，同一年窃据帝位，都定年号为天正，人们认为这拆开是“二人一止”也就是“二人一年而止”，后来果然都是这样。北齐文宣帝年号天保，拆开是“一大人只十”，果然十年就死了。然而梁朝明帝萧岿也用天保年号，但到了二十三年才死，有人又说萧岿小小的一个附属国，所以牵涉不到上天降下的吉凶。北齐后主年号隆化，合并拆开就是“降死”；安德王高延宗年号

德昌，谐音和拆开来是“得二日”。北周武帝年号宣政，是“宇文亡日”，即北周宇文氏的宇字中丢掉了日字；北周宣帝会号大象，连起来看像是“天子冢”三个字。萧琮和晋出帝年号广运，运字是“军走”。隋炀帝大来，看上去像“大苦末”。唐僖宗广明，是“唐”字去掉“丑口”而换上“黄家日月”，以预示黄巢之乱。本朝钦宗“靖康”，拆开来就是“立十二月康”，钦宗果然在位满一年被掳入金，高宗以康王的身份建立了中兴的事业。熙宁末年将要改换年号，接近皇上的臣子提出三个名字进呈，叫做“平成”、“美成”、“丰亨”，神宗说：“成字背着戈，美成就是犬和羊背着戈。亨字下半是‘子’字没有完成，不如去掉亨字加上元字。”于是就改为元丰。像隆兴就是在建隆和绍兴两个年号中各取一字，和唐代贞元年号在贞观、开元中各取一字相同。不久又嫌隆兴和金国完颜亮的年号贞隆相近，所以两年后就改为乾道。等到甲午年（1174）改为纯熙，已经通告天下了，我当时做赣州太守，贺表中说：“天命长久而开创中兴，占卜享国之年正在兴旺；时代纯熙（完全兴盛）而光大，改换新的年号名称。”等到正式诏书下达，乃是淳熙，这是因为纯熙二字的出处有“告成大武”的话，所以不想用这两个字。

民俗火葬

【原文】 自释氏火化之说起，于是死而焚尸者，所在皆然。固有炎暑之际，畏其秽泄，敛不终日，肉尚未寒而就熬者矣。鲁夏父弗忌献逆祀之议，展禽曰：“必有殃，虽寿而没，不为无殃。”既其葬也，焚烟彻于上，谓已葬而火焚其棺槨也。吴伐楚，其师居麋，楚司马子期将焚之，令尹子西曰：“父兄亲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谓前年楚人与吴战，多死麋中，不可并焚也。卫人掘褚师定子之墓，焚之于平庄之上。燕骑劫围齐即墨，掘人冢墓，烧死人，齐人望见涕泣，怒自十倍。王莽作焚如之刑，烧陈良等。则是古人以焚尸为大礻也。列子曰：“楚之南有炎人之国，其亲戚死，其肉而弃之，然后埋其骨；秦之西有仪渠之国，且亲戚死，聚柴积而焚之，熏则烟上，谓之登遐，然后成为孝子。此上以为政，下以为俗，而未足为异也。”盖是时其风未行于中国，故列子以仪渠为异，至与肉者同言之。 音寡。

【译文】 自从佛教火化之俗传入中国后，于是死后焚尸的，到处都是。这其中固然有暑热之时，恐怕尸体腐败，因而装殓还不到一天，尸骨未寒就付之一炬的。春秋时期，鲁国的夏父弗忌献颠倒祭祀次序之议，展禽（即柳下惠）说：

“肯定会有灾祸的，即使寿终正寝，也不会无灾祸。” 到其下葬之后，墓穴中有浓烟直冲霄汉，显然下葬之后其棺槨又被大火所焚。吴国攻打楚国时，驻军于麇（河边的有水草处），楚国的司马（掌管军队的官员）子期准备火烧麇地，令尹（相当于宰相）子西说：“我们父老兄弟的尸骨也丢弃在那里，无法收殓，现在再将他们同吴军一起烧掉，这是不合适的。” 子西指的是，前年楚国与吴国交战，楚军士兵多死于麇中，不可把他们同吴军一并付之一炬。卫国人掘了褚师定子的坟墓，并且在平庄将他的骸骨烧掉。燕国的骑劫围攻齐国的即墨城（今山东平度东南）时，在城外掘了齐国人的许多坟墓，并且放火焚烧死人的骨骸，齐国人在城墙上远远地望见，无不痛哭流涕，同时对燕军的仇恨也陡增十倍，甚至百倍。王莽制订了烧人的刑罚，烧死了陈良等。由此看来，古人把焚尸看作是一种大戮之刑。列子说：“在楚国之南有个炎人之国，该国人死后，他们的亲戚便把死者的肉剔下来扔掉，然后把骨骼埋入地下。在秦国的西边有个仪渠国，该国人死后，其亲属便把死者放在一大堆木柴上烧掉，当火烧到尸体时黑烟直上，这就是所谓的‘登遐’，只有这样，死者的子女们才能成为孝子。由此可知，火葬在上已被统治者作为治国的手段，在下已被老百姓视为风俗习惯，丝毫没有有什么值得惊奇的。” 大概当时火化的习俗尚未风行于中国，所以列子觉得仪渠国的风俗十分奇异，以至于将它同剔肉埋骨的炎人之国相提并论。

太史日官

【原文】 《周礼》春官之属曰：“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正岁年以序事，颁之于官府及都鄙，颁告朔于邦国。” “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 郑氏注云：“太史，日官也。” 引《左传》“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为说。志，谓记也。史官主书，《国语》所谓《郑书》及《帝系》、《世本》之属是也，小史主定之。然则周之史官、日官，同一职耳。故司马谈为汉太史令，而子长以为“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 今太史局正星历卜祝辈所聚，其长曰太史局令，而隶秘书省，有太史案主之，盖其源流有自来矣。

【译文】 《周礼》春官之属说：“太史主管建立国家的各种典章制度，以满足治理国家的需要。还要负责调整历法以便安排各项事务，其结果要公布于官府及京师内外，每个月还要向全国预告下月的朔日（即初一）。” “小史掌管国家的史志，确定王侯的世系和宗庙的次序。” 郑玄的注说：“太史，即日官。” 他还

引用《左传》“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的话为证。志，即记。史官负责编写史书，《国语》所说的《郑书》及《帝系》、《世本》之类都是，小史则负责审定工作。由此看来，周代的史官和日官乃是同一职务。所以，司马谈任汉朝的太史令，而他的儿子司马迁（字子长）认为“文史星历与卜祝之人身份接近，本来就受君主们的戏弄，君主们视他们就如同使用供自己取乐的艺人一样，整个社会对他们也相当轻视。”现在的太史局正是星、历、卜、祝之人的荟萃之地，其长官叫太史局令，隶属于秘书省，由该省的太史案具体负责，这种做法是有历史渊源的。

汲冢周书

【原文】 《汲冢周书》今七十篇，殊与《尚书》体不相类，所载事物亦多过实。其《克商解》云：“武王先入，适纣所在，射之三发，而后下车，击之以轻吕（剑名），斩之以黄钺，县诸大白。商二女既缢，又射之三发，击之以轻吕，斩之以玄钺，县诸小白。”越六日，朝至于周，以三首先，入燎于周庙，又用纣于南郊。夫武王之伐纣，应天顺人，不过杀之而已。纣既死，何至臯戮俘，且用之以祭乎？其不然者也。又言武王狩事，尤为淫侈，至于擒虎二十有二，猫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三，牦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一，黑百十八，豕三百五十有二，十有八，麀十有六，麕五十，鹿三千五百有二。遂征四方，凡憼国九十有九国，磨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其多如是，虽注家亦云武王以不杀为仁，无缘所如此，盖大言也。《王会篇》皆大会诸侯及四夷事，云：“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在右。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商公、夏公立焉。”四公者，尧、舜、禹、汤后，商、夏即杞、宋也。又言：俘商宝玉亿有百万。所纪四夷国名，颇古奥，兽畜亦奇崛，以肃真为稷真，人为稷人，乐浪之夷为良夷，姑蔑为姑妹，东瓠为且瓠，渠搜为渠叟，高句丽为高夷。所叙：“稷人前儿，若弥猴，立行，声似小儿。良夷在子（兽名），弊身人首，脂其腹，炙之藿则鸣。扬州禺禺鱼、人鹿。青丘狐九尾。东南夷白民乘黄，乘黄者似骐，背有两角。东越海、海阳、盈车、大蟹。西南戎曰央林，以酋耳，酋耳者，身若虎豹。渠叟以犬，犬者，露犬也，能飞，食虎豹。区阳戎以鳖封，鳖封者，若鼉，前后有首。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皋鸡。康民以稗苡，其实如李，食之宜子。北狄州靡，其形人身枝踵，自笑，笑则上唇翕其目，食人。都郭（亦北狄）生生，若黄狗，人面，能言。奇干（亦

北狄）善芳，头若雄鸡，佩之令人不眯。正东高夷 羊， 羊者，羊而四角。西方之戎曰独鹿，邛邛距虚。犬戎文马，而赤 缟身，目若黄金，名古皇之乘。白州北闾，北闾者，其华若羽，以其木为车，终行不败。”篇末引伊尹《朝献商书》云：“汤问伊尹，使为四方献令。伊尹请令正东以鱼皮之 ， 酱、蛟 、 利剑；正南以珠玕、玳瑁、象齿、文犀；正西以丹青、白旄、江历（珠名）、龙角；正北以橐驼、 、 眈眈、良弓为献。汤曰：善。”凡此皆无所质信，姑录之以贻博雅者。唐太宗时，远方诸国来朝贡者甚众，服装诡异，颜师古请图以示后，作《王会图》，盖取诸此。《汉书》所引：“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毋为权首，将受其咎。”以为《逸周书》，此亦无之，然则非全书也。

【译文】 《汲冢周书》现存七十篇，和《尚书》的体裁很不相同，所记载的事情也大多夸张超过实际。其中的《克商解》说：“武王先进入，到纣王自焚的地方，向他的尸体射了三箭，用轻吕敲击他（原注：轻吕，剑名），用黄金装饰的大斧子砍下他的脑袋，悬挂在大白旗杆上。纣王的两个妃子已经自缢身死，又向她们的尸体射了三箭，用轻吕敲击她们，用黑色的大斧子砍下她们的脑袋，悬挂在小白旗杆上。”过了六天，回到周朝京城，把三个脑袋割下左耳朵，在宗庙中举行焚柴祭天的典礼，又把纣王的脑袋在南郊祭祀。武王的伐纣，应天命顺人心，不过是为了杀死纣王而已。纣王已死何至于戮尸把脑袋悬挂割下左耳，而且用来祭祀呢？这是不会这样的。又记载武王狩猎的事，尤其过分奢侈，甚至于猎到老虎二十二头，猫二头，麋五千二百三十五头，犀十三头，牦牛七百二十一头，熊一百五十一头，大熊一百十八头，猪三百五十二头，碓十八头，麂十六头，麝五十头，鹿三千五百二十头。于是就征伐四方，总计征伐罪恶动乱的国家九十九个，割下敌人的左耳一亿十万七千七百七十九只，多到这样，即使注释家也说武王把不杀人作为仁德，没有理由割下那么多耳朵，这是夸大的说法。《王会篇》都是记载大会诸侯以及四夷之事，说：“唐叔、荀叔、周公在左边，姜太公在右边。堂下的右边，唐公、虞公面向南而立，堂下的左边，商公、夏公面向南而立。”这四公，是尧、舜、禹、汤的后人，商和夏就是宋国和杞国。又说：俘虏商朝的宝玉一亿一百万。所记载的四夷的国名，颇为古奥，野兽和家畜也很奇特，把肃真写成稷真，殛人写成稷人，乐浪的夷人写成良夷，姑蔑写成姑妹，东瓯写成且瓯，渠搜写成渠叟，高句丽写成高夷。所记叙的稷人进奉前儿，形状像猴子，站着走路，声音像小孩子。良夷进奉在子（原注：兽名），弊身人头，腹部都是脂肪，用藿草去熏它就鸣叫。扬州进奉禺禺鱼、人鹿。青丘进奉九条尾巴的狐狸。东夷的白民进奉乘黄，乘黄长得像骐，背上有两只角。东越进奉海碯、海阳、盈车、大蟹。西南戎名叫央林的，用酋耳进奉，酋

耳这种东西，身体如同虎豹。渠叟用礲犬进奉，礲犬这种东西，就是露犬，能飞行吃虎豹。区阳戎用磻封进奉，磻封这种东西，像野猪，前后都有脑袋。蜀人用文翰进奉，文翰这种东西，像皋鸡。康民用稊苡进奉，它的果子像李子，吃了它对生儿子有好处。北狄的州靡进奉狒狒，它的形状是身体像人，脚跟一分为二，自己会发笑，一笑时上唇就会掩盖住眼睛，吃人。都郭（原注：亦北狄）进奉生生，像黄狗，人的面孔，能说话。奇暗（原注：亦北狄）进奉善芳，头像公鸡，实际上就是一种四只角的羊。西戎的独鹿国有一种动物名叫邛邛距虚（一说邛邛与距虚为两种野兽，形体相近），非常善于奔跑。犬戎（今陕西彬县、岐山一带）的文马，红鬃白身，眼睛闪闪发光，如同黄金，据说是古时帝王所乘骑的。白州有一种树木名叫北閼，它光彩斑斓就如鸟类的羽毛，用这种木材做车，可保永不腐朽。”篇末又引用伊尹的《朝献商书》说：“商汤王命伊尹担任四方献令，负责各地向商王朝的进贡工作。伊尹请求商王下令让正东方贡献鱼皮刀鞘、鲋酱、蛟礲、利剑；正南方贡献珠玕、玳瑁、象牙、文犀；正西方贡献丹青、白旄、江历珠、龙角；正北方贡献骆驼、名马良弓。商汤王说：好。”所有这些都无法确证，姑且抄录下来以待知识渊博的专家。唐太宗时，前来朝贡的远方国家甚多，各国人员服饰怪异，各不相同，著名学者颜师古请求画下这种场面以便留给后人，于是获准作《王会图》，其动机大概起源于此。《汉书》中所引用的“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毋为权首，将受其咎。”一句，作者认为是引自于《逸周书》，而《汲冢周书》中却找不到，可见《汲冢周书》并不完全。

曹子建论文

【原文】 曹子建《与杨德祖书》云：“世人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应时改定。昔丁敬礼常作小文，使仆润饰之，仆自以才不过若人，辞不为也。敬礼谓仆：‘卿何所疑难，文之佳丽，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叹此达言，以为美谈。”子建之论善矣。任 为王俭主簿，俭出自作文，令 点正， 因定数字，俭叹曰：“后世谁知子定吾文？”正用此语。今世俗相承，所作文或为人诋诃，虽未形之于辞色，及退而怫然者，皆是也。欧阳公作《尹师鲁铭》文，不深辩其获罪之冤，但称其为文章简而有法。或以为不尽，公怒，至诒书他人，深数责之曰：“简而有法，惟《春秋》可当之，修于师鲁之文不薄矣。又述其学曰‘通知古今’，此语若必求其可当者，惟孔、孟也。

而世之无识者乃云云。此文所以慰吾亡友尔，岂恤小子辈哉！”王荆公为钱公辅铭母夫人蒋氏墓，不称公辅甲科，但云：“子官于朝，丰显矣，里巷之士以为太君荣。”后云：“孙七人皆幼。”不书其名。公辅意不满，以书言之，公复书曰：“比蒙以铭文见属，辄为之而不辞。不图乃犹未副所欲，欲有所增损。鄙文自有意义，不可改也。宜以见还，而求能如足下意者为之。如得甲科为通判，何足以为太夫人之荣？一甲科通判，苟粗知为辞赋，虽市井小人，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故铭以谓闾巷之士，以为太夫人荣，明天下有识者不以置荣辱也。至于诸孙，亦不足列，孰有五子而无七孙者乎？”二公不喜人之议其文亦如此。

【译文】 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曹植在致杨德祖的信中说：“世人写作，不可能没有毛病，我向来喜欢听人们对我的作品评头论足，如果有不好的地方，我立即改正。过去丁敬礼曾写了一篇小文章，让我加以润色，我自知才能不及他，因而极力推辞。敬礼对我说：‘您有什么可以为难的，文章改得好，是我受益，人们都以为我写得好；万一改得不好也没关系，后世又有谁会知道究竟是哪一位替我改定了文稿？’我时常感慨丁敬礼这番虚怀若谷、通达事理的话语，以为美谈。”曹植的论述真是太好了。南朝梁时期，著名学者任昉担任王俭的主簿，有一天，王俭拿出自己所写的文章让任昉修改，任昉便改动了几个字，王俭感叹说：“后人谁会知道我的文章是您修改的？”用的正这是个典故。

当今的文人，早已形成了一种老传统，所作的文章如果受到了别人的指责，即使他当时没有怒形于色，反唇相讥，而到退回家中后怒气冲天的人，比比皆是。欧阳修撰写《尹师鲁铭》，不深辩其无辜获罪的冤屈，只是称赞他写文章简而有法。有人认为写得不够全面，欧阳修勃然大怒，以至于给别人写信，严厉地责备说他坏话的人：“简而有法，只有儒家经典《春秋》可以当之无愧，我以此称赞尹师鲁的文章，评价可谓不低了。我又称他的学问‘通知古今’，如果要找一个真正符合此要求的人，那只有孔子和孟子两位圣人才行。然而，世间的无知狂徒却还要说三道四，妄加评论。我写这篇铭文是为了告慰亡友的在天之灵，岂恤无知小子辈？”荆国公王安石为钱公辅的母亲蒋老夫人撰写墓志铭，铭文中不提公辅参加科举高中甲科，只是说：“她的儿子在朝中做官，地位尊贵，家资殷实，里巷之人都认为这是老夫人的光荣。”结尾又说：“她的七个孙子年龄都很小。”却没有列举他们的名字。钱公辅心中不满意，因而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的想法，王安石复信说：“前不久承蒙厚爱，嘱托我为老夫人撰写墓志铭，我慨然应允，毫不推辞。没想到我写的铭文竟然不合你的心意，因而你想有所增减。拙文自有其道理，是不可更改的。希望你将它送还，然后另求能合你心意的人重新撰写。至于强调你高中甲科得任通判，又何足为老夫人的

荣耀？一个区区的甲科通判，如果略知作辞赋之道，即使是一个市井小人，也可以轻易得到，何足挂齿？所以，我的铭文中说你在朝中做大官，乡里之士都认为这乃是老夫人的光荣，以此表明天下的有识之士不会以一个小小的甲科通判为荣辱。至于诸孙，也没有必要罗列其名字，谁有五个儿子却没有七个孙子呢？”由此看来，欧阳修和王安石二人也很不喜欢别人对自己的作品提出异议。

雨水清明

【原文】 历家以雨水为正月中气，惊蛰为二月节，清明为三月节，谷雨为三月中气。而汉世之初，仍周、秦所用，惊蛰在雨水之前，谷雨在清明之前，至于太初，始正之云。

【译文】 历学家把雨水作为正月的中气，以惊蛰为二月的节气，清明为三月的节气，谷雨为三月的中气。但是在西汉初年，仍然沿用周朝和秦朝所使用的历法，惊蛰被定在雨水之前，谷雨被定在清明之前，到了汉武帝太初年间才更正过来。

卷十四

尹文子

【原文】 《汉·艺文志》名家内有《尹文子》一篇，云：“说齐宣王。先公孙龙。”刘歆云：“其学本于黄、老，居稷下，与宋 、彭蒙、田骈等同学于公孙龙。”今其书分为上下两卷，盖汉末仲长统所铨次也。其文仅五千言，议论亦非纯本黄、老者。《大道篇》曰：“道不足以治则用法；法不足以治则用术；术不足以治则用权；权不足以治则用势；势不足则反权。权用则反术；术用则反法；法用则反道；道用则无为而自治。”又曰：“为善使人不能得从，此独善也；为巧使人不能得为，此独巧也，未尽善巧之理。为善与众行之，为巧与众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故所贵圣人之治，不贵其独治，贵其能与众共治；贵工之巧，不贵其独巧，贵其能与众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独贤，事欲独能，辩欲出群，勇欲绝众。独行之贤，不足以成化；独能之事，不足以周务；出群之辩，不可为户说；绝众之勇，不可与正陈。凡此四者，乱之所由生。圣人任道、立法，使贤愚不相弃，能鄙不相遗，此至治之术也。”详味其言，颇流而入于兼爱。《庄子》末章，叙天下之治方术者，曰：“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忤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宋 、尹文闻其风而悦之，作为华山之冠以自表。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其为人太多，其自为太少。”盖亦尽其学云。荀卿《非十二子》有宋 ，而文不预。又别一书曰《尹子》，五卷，共十九篇，其言论肤浅，多及释氏，盖晋、宋时衲人所作，非此之谓也。

【译文】 班固《汉书·艺文志》名家类中著录有《尹文子》一篇，并且说他曾游说齐宣王，生活时代早于公孙龙。西汉末年的著名学者刘歆说：“尹文子的学说渊源于黄、老之道，他居住在稷下（今山东淄博市东北临淄北），与宋 、彭蒙、田骈等共同拜公孙龙为师。”现在他的书分为上下两卷，大概是东汉末年仲长统所编排的。全书仅五千余字，所发的议论也并非完全本着黄、老之言。其《大道篇》说：“道不足以治则用法；法不足以治则用术；术不足以治则用权；权不足以治则用势；势不足则转向权。权用则转向术；术用则转向法；法用则转

向道；道用则无为而国自治。”又说：“所做的善事使得别人无法仿效，这叫独善；所做的巧活使得别人无法学会，这叫独巧。这些都是因为不精通善巧之道的缘故。做善事与别人同做，做巧活让别人也能做，这才是美善中的美善，工巧中的工巧。所以圣人治理的可贵，不在于他独自治理的可贵，而在于能和大家一起治理；工碁工巧的可贵，不在于他独自工巧的可贵，而在于能和大家一起工巧。现在世界上的人，行为要独自贤明，办事情要独自逞能，辩论要超群勇敢要出众。单独行动的贤明，不足以完成教化；单独呈能的办事，不足以把事情都办完；超群的辩论，不能每家每户去游说；出众的勇敢，不能排阵作战。凡是这四项，动乱就从此而生。圣人顺道、立法，让贤明和愚鲁不互相丢开，能干的和粗俗的不互相遗弃，这是达到治理最高境界的道路。”详细体会这些话，很有点近于墨子的兼爱主张。《庄子》的最后一篇，叙述天下治学术的，说：“对世俗没有牵累，对万物没有矫饰，对人不苟且随便，对大众不猜忌嫉妒，希望天下安宁，以养活百姓，奉养别人和自己只要求足够就可以了，用这样的话来表白内心，古代的治国之道和术就有存在于其中的。宋碣、尹文听到这种主张而喜爱，制作戴上形状像华山的上下一般平的帽子用来自我表白。虽然不为天下所用，偏要反覆阐说而不肯放弃。他们为别人的太多，为自己的太少。”这段话也能表达了《尹文子》的学说了。荀卿的《非十二子》中说到宋碣，但没有说到尹文。又另外有一部书名为《尹子》，五卷，共有十九篇，其中的言论肤浅，很多地方涉及佛家，这是晋、宋之间和尚的著作，不是指的这部书。

帝王训俭

【原文】 帝王创业垂统，规以节俭，贻训子孙，必其继世象贤，而后可以循其教，不然，正足取侮笑耳。宋孝武大治宫室，坏高祖所居阴室，于其处起玉烛殿，与群臣观之，床头有土障，上挂葛灯笼、麻蝇拂。侍中袁纘因盛称高祖俭素之德，上不答，独曰：“田舍翁得此，已为过矣！”唐高力士于太宗陵寝宫，见梳箱一、柞木梳一、黑角篦一、草根刷子一，叹曰：“先帝亲正皇极，以致升平，随身服用，唯留此物。将欲传示子孙，永存节俭。”具以奏闻。明皇诣陵，至寝宫，问所留示者何在？力士捧跪上，上跪奉，肃敬如不可胜，曰：“夜光之珍，垂棘之璧，将何以愈此？”即命史官书之典册。是时，明皇履位未久，励精为治，故见太宗故物而惕然有感。及侈心一动，穷天下之力不足以副其求，尚何有于此哉？宋孝武不足责也，若齐高帝、周武帝、陈高祖、隋文帝，皆有

俭德，而东昏、天元、叔宝、炀帝之淫侈，浮于桀、纣，又不可以语此云。

【译文】 帝王创业代代相传，用节俭作为规范，留给子孙作为教训，但必须要有继承和效法他们的子孙，遵循他们的教诲。如果不是这样，正好足以自己招来侮辱和讥笑罢了。宋孝武帝大建宫室，拆毁宋武帝临终的那间卧室，在那块地上建造玉烛殿。孝武帝和群臣观看那间卧室，床头有一个土台，上面挂着葛做的灯笼、麻做的蝇拂。侍中袁 因而大大称颂宋武帝节俭朴素的美德，孝武帝不回答，只说：“乡下老头儿有这些，已经是过分了！”唐代高力士在唐太宗陵墓的寝宫中，见到一只梳头箱子，一个柞木梳子，一个黑牛角篦子，一个草根刷子，慨叹说：“先帝亲自树立了帝王的准则，导致天下繁荣安定，随身应用的器物，只留下这些东西。这是打算传留给子孙观看，永远保存节俭的美德。”一一上奏。唐明皇去到昭陵，到了寝宫，询问所留存给子孙观看的在哪里。高力士跪着捧给皇上，皇上跪着接受，肃穆尊敬似乎不能承受，说：“夜光的珍珠，垂棘的美玉，怎么能超过这些？”立即命令史官写在典册上。那时候，唐明皇即位不久，励精图治。所以见到太宗的遗物而感到戒惧。等到奢侈之心一动，穷尽天下的民力财力不足以满足他的要求，对太宗的遗物还能有什么感想呢？宋孝武帝不值得责备，像齐高帝、北周武帝、陈武帝、隋文帝，都有节俭的美德，而东昏侯、北周天元帝、陈叔宝、隋炀帝的淫乐奢侈，超过桀纣，又不能对他们讲说这些了。

用计臣为相

【原文】 唐自贞观定制，以省台寺监理天下之务，官修其方，未之或改。明皇因时极盛，好大喜功，于财利之事尤切，故宇文融、韦坚、杨慎矜、王礎，皆以聚敛刻剥进，然其职不出户部也。杨国忠得志，乃以御史大夫判度支，权知太府卿及两京司农太府出纳，是时，犹未立判使之名也。肃宗以后，兵兴费广，第五琦、刘晏始以户部侍郎判诸使，因之拜相，于是盐铁有使，度支有判。元 、班宏、裴延龄、李巽之徒踵相蹑，遂浸浸以他官主之，权任益重。宪宗季年，皇甫 由判度支，程异由卫尉卿盐铁使，并命为相，公论沸腾，不恤也。逮于宣宗，率由此途大用，马植、裴休、夏侯孜以盐铁，卢商、崔元式、周墀、崔龟从、萧邺、刘礪以度支，魏扶、魏谟、崔慎由、蒋伸以户部，自是计相不可胜书矣。惟裴度判度支，上言调兵食非宰相事，请以归有司，其识量宏正，不可同日语也。

【译文】 唐朝从太宗贞观年间确定官制，以省、台、寺、监等机构处理天下的各项事务，政府制订了具体方案，此后没有修改过。唐玄宗时期国家极盛，他自己又好大喜功，因而对钱财之事尤为关切，于是，宇文融、韦坚、杨慎矜、王璣等都因为敛财苛薄而得以重用，然而其职责范围都没有超出户部。杨国忠得志，乃以御史大夫的身份担任判度支、权知太府卿及两京司农太府出纳，不过当时还没有立判、使之名。唐肃宗以后，由于战争连绵，费用浩繁，第五琦、刘晏才开始以户部侍郎判诸使，接着又被拜为宰相，从此盐铁有使，度支有判。元 、班宏、裴延龄、李巽等人又相继步其后尘，于是逐渐用其他的官员来主管财赋之事，权势越来越重。宪宗末年，皇甫镈由判度支、程异由卫尉卿盐铁使，同时被任命为宰相，引起舆论大哗，但皇帝不予理会，一意孤行。到了唐宣宗时期，宰相全由此途而得，马植、裴休、夏侯孜是以盐铁使，卢商、崔元式、周墀、崔龟从、萧邺、刘 是以判度支，魏扶、魏谟、崔慎由、蒋伸是以户部长官，从此以后计相不可胜数。只有裴度判度支时，对皇帝说调军粮并非宰相的份内事，请求把职权归还给有关部门。裴度的正直与远见卓识，是其余几位宰相所无法比拟的，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州县牌额

【原文】 州县牌额，率系于吉凶，以故不敢轻为改易。严州分水县故额，草书“分”字，县令有作聪明者，谓字体非宜，自真书三字，刻而立之。是年，邑境恶民持刃杀人者众，盖“分”字为“八刀”也。徽州之山水清远，素无火灾，绍熙元年，添差通判卢磔，悉以所作隶字，换郡下扁榜，自谯楼、仪门，凡亭榭、台观之类，一切趋新，郡人以为字多燥笔，而于州牌尤为不严重，私切忧之。次年四月，火起于郡库，经一日两夕乃止，官舍民庐一空。

【译文】 各州县的牌额，都关系到吉凶，因而不敢轻率更改。严州（今浙江建德东北）分水县的旧匾额上是个草体的“分”字，有个自作聪明的县令认为字体不合适，便亲自动手写了三个楷体字，经镌刻后挂起来。不料，当年县内的持刀杀人案件就急剧增加，这时人们才明白过来，原来正楷体“分”字乃是由“八刀”二字组成的。徽州（今安徽歙县）地区山青水秀，向没有火灾，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添差通判卢磔用自己手书的隶体字，更换本州所有的牌匾，诸如城门上的谯楼，仪门，以及亭榭、台观之类，无不改用新匾额。徽州的士人们认为卢磔的字多燥笔，所写的州牌尤其不庄重，因而私下里都很忧

虑。次年四月，州里的仓库发生大火，而且迅速蔓延开来，经两夜一天才扑灭，被烧为灰烬的官舍和民居不计其数。

卢知猷

【原文】 唐之末世，王纲绝纽，学士大夫逃难解散，畏死之不暇。非有扶颠持危之计，能支大厦于将倾者，出力以佐时，则当委身山栖，往而不反，为门户性命虑可也。白马之祸，岂李振、柳璨数凶子所能害哉？亦裴、崔、独孤诸公有以自取耳。偶读《司空表圣集·太子太师卢知猷神道碑》，见其仕于僖、昭，更历荣级，至尚书右仆射，以一品致仕，可以归矣。然由间关跋履，从昭宗播迁，自华幸洛，天璽二年九月乃终，享年八十有六，其得没于牖下，亦云幸也。《新唐书》有传，附于父后，甚略，云：“昭宗为刘季述所幽，感愤而卒。”按昭宗以光化三年遭季述之祸，天复元年反正，至知猷亡时，相去五年。《传》云：“子文度，亦贵显。”而碑载嗣子刑部侍郎膺，亦不同。表圣乃卢幕客，当时作志，必不误矣。《昭宗实录》：“光化四年三月，华州奏，太子太师卢知猷卒。以刘季述之变，感愤成疾，卒年七十五。”正与《新唐·传》同。盖唐武、宣以后诸录，乃宋敏求补撰，简牘当有散脱者，皆当以司空之碑为正。又按是年四月改元天复，《旧唐·纪》：“十一月，车驾幸凤翔。朱全忠趋长安，文武百寮太子太师卢知猷已下出迎。”又为可证。《宰相世系表》：“知猷生文度，而同族曰渥，渥之子膺，刑部侍郎。”二者矛盾如此。

【译文】 唐代的末年，朝廷的纲纪败坏无存，学士大夫为逃避祸难四散怕死都来不及。如果不是有匡扶国势的计策，能够支撑将要倾倒的大厦，出来尽力辅佐时局，就应当在山中隐居，去了不要回来，为全家和自身的性命打算。白马驿几任大臣遭到朱全宗的毒手，岂是李振、柳璨几个凶恶的人起杀害他们的作用呢？这也是裴枢、崔远、独孤损诸位自己找的。偶然读到《司空表圣（司空图）集》中的《太子太师卢和猷神道碑》，见到他在僖宗、昭宗朝出仕，一再升迁，直到尚书右仆射，以一品官的身份退休，可以回老家了。然而崎岖跋涉，跟随昭宗逃亡，从华州迁移到洛阳，天璽二年（905）九月才去世，享年八十六岁，他能够终其天年，也可以说是幸运了。《新唐书》，有传，附于他父亲之后，很简略，说：“昭宗为刘季述所幽禁，感慨愤怒而死。”查昭宗在光化三年（900）遭到宦官刘季述的幽禁，天复元年（901）复辟，到卢知猷去世时，相距五年。传中说：“卢知猷的儿子卢文度，也做宦显赫。”而碑文上记载他的嗣子

刑部侍郎名叫卢膺，也和传中不同。司空表圣是卢知猷幕中宾客，当时写作墓碑，必定不会有错误的。《昭宗实录》记载：“光化四年三月，华州报告太子太师卢知猷死。他是因为刘季述之变悲愤交加，以致发病而死，终年七十五岁。”与《新唐书》卢知猷的传中所载相同。唐武宗、宣宗以后的各朝实录，乃是我大宋朝的宋敏求补写的，当时的简牍资料难免有散脱遗失的，因此应当以司空表圣的碑文为准。又按：光化四年四月改元为天复，《旧唐书·昭宗纪》中说：“十一月，皇帝的车驾来到凤翔（今属陕西）。朱全忠（即朱温）率兵直奔京师保驾，文武百官从太子太师卢知猷以下都出城迎接。”也可证明碑文是正确的。《宰相世系表》说：“卢知猷的儿子文度，被同族人叫做渥，卢渥的儿子卢膺，官任刑部侍郎。”与碑文和传记的说法就是这样不同。

忌讳讳恶

【原文】 《周礼·春官》：“小史诏王之忌讳。”郑氏曰：“先王死日为忌，名为讳。”《礼记·王制》：“太史典礼，执简记，奉讳恶。”注云：“讳者先王名，恶者忌日，若子卯。恶，乌路反。”《左传》：“叔弓如滕，子服椒为介。及郊，遇懿伯之忌，叔弓不入。”懿伯，椒之叔父；忌，怨也。椒曰：“公事有公利无私忌，椒请先入。”观此乃知忌讳之明文。汉人表疏，如东方朔有“不知忌讳”之类，皆戾本旨。今世俗语言多云“无忌讳”及“不识忌讳”，盖非也。

【译文】 《周礼·春官》说：“小史诏告周王的忌讳。”郑玄注释说：“先王的死日为忌，名字为讳。”《礼记·王制》说：“太史主掌礼仪，编写史书，奉行讳恶。”注释说：“讳是先王的名号，恶是先王的忌日，如同子卯这样的不吉利日子。恶，音为乌路反（即 wù）。”《左传》载：“叔公赴滕国（今山东滕县），子服椒为其副手。到了滕城郊区，正遇懿伯的忌日，叔弓因而不入城。”懿伯是子服椒的叔父，“忌”是怨恨的意思。子服椒说：“公事只讲公利而不论私忌，我请求先入城。”由此看来，显然当时已懂得忌讳。汉代人，如东方朔等人所写的表疏中常有“不知忌讳”之类的说法，都与该词的本意不符。今天的世俗语言中经常说“无忌讳”及“不识忌讳”，也是不正确的。

陈涉不可轻

【原文】 扬子《法言》：“或问陈胜吴广，曰：‘乱。’曰：‘不若是则秦不亡。’曰：‘亡秦乎？恐秦未亡而先亡矣。’”李轨以为：“轻用其身，而要乎非命之运，不足为福先，适足以为祸始。”予谓不然。秦以无道毒天下，六王皆万乘之国，相踵灭亡，岂无孝子慈孙、故家遗俗？皆奉头鼠伏。自张良狙击之外，更无一人敢西向窥其锋者。陈胜出于戍卒，一旦奋发不顾，海内豪杰之士，乃始云合响应，并起而诛之。数月之间，一战失利，不幸陨命于御者之手，身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项氏之起江东，亦矫称陈王之令而度江。秦之社稷为墟，谁之力也？且其称王之初，万事草创，能从陈馀之言，迎孔子之孙鮒为博士，至尊为太师，所与谋议，皆非庸人崛起者可及，此其志岂小小者哉！汉高帝为之置守冢于碭，血食二百年乃绝。子云指以为乱，何邪？若乃杀吴亡，诛故人，寡恩忘旧，无帝王之度，此其所以败也。

【译文】 扬雄的《法言》说：“有人问陈胜吴广怎么样，回答说：‘造反作乱’说：‘不这样秦朝就不会灭亡。’回答说：‘灭亡秦朝吗？恐怕秦朝没有灭亡而自己先灭亡了。’”李轨以为：“轻易地献出自己，而去求取不合于天命的运气，这不足以成为福的先导，恰恰足以成为祸的开始。”我认为不是这样。秦朝以暴虐无道毒害天下，韩赵等六王都是拥有一万辆战车的大国，相继灭亡，难道就没有想复仇继承祖业的后代？然而都抱头鼠窜，自从张良曾经狙击秦始皇之外，更没有一个人敢于往西窥伺秦朝的锋芒的。陈胜出身于戍守的士卒，一旦奋发不顾自己的安危，海内的豪杰之士，这才开始集合响应，一起奋起而诛灭秦朝。几个月之间，在一次战役中失利，不幸在驾车的人手中丧命，自身虽然已经死去，他所安排分封的侯王将相终于灭亡了秦朝。项氏在江东起事，也假称奉了陈王的命令而渡过江去。秦朝的社稷变成废墟，请问是谁的力量？而且他刚刚称王的时候，万事都在草创，能够听从陈馀的话，迎来孔子的后代孔鮒为博士，甚至尊奉为太师，他和孔鮒所商量计划的，都不是平庸之辈忽然崛起的人可以赶得上的，这志向难道是小小的吗？汉高祖为他在碭地设置守坟的人，祭祀了二百年才断绝。扬子云（扬雄）认为他是造反作乱，这是为什么呢？至于像杀吴广，杀老朋友，少恩忘旧，没有帝王的气度，这是他所以失败的原因。

孔墨

【原文】 墨翟以兼爱无父之故，孟子辞而辟之，至比于禽兽，然一时之论。迨于汉世，往往以配孔子。《列子》载惠盎见宋康王曰：“孔丘、墨翟，无地而为君，无官而为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颈举踵而愿安利之。”邹阳上书于梁孝王曰：“鲁听季孙之说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计囚墨翟，以孔、墨之辩，不能自免于谗谀。”贾谊《过秦》云：“非有仲尼、墨翟之知。”徐乐云：“非有孔、曾、墨子之贤。”是皆以孔、墨为一等，列、邹之书不足议，而谊亦如此。韩文公最为发明孟子之学，以为功不在禹下者，正以辟杨、墨耳。而著《读墨子》一篇云：“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国家，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此又何也？魏郑公《南史·梁论》，亦有“抑扬孔、墨”之语。

【译文】 因为墨翟提倡兼爱，主张爱无差等，不分厚薄亲疏，所以孟子拒绝见到墨子的门徒，并且有意识地回避他们，甚至还把墨子比作禽兽，不过，这种观点只是一时之论。到了汉代，人们往往以墨子配圣人孔子。《列子》中记载惠盎见宋康王说：“孔丘和墨翟，虽然没有国土但是却与国君无异，虽然没有官职但是却与官员无异，天下的男女老少，无不翘首以待，时刻准备着为他们贡献自己的力量。”邹阳给梁孝王上书说：“鲁国听从季孙氏的建议驱逐了孔子，宋国按照子冉的计策囚禁了墨子，以孔子和墨子的超群辩才，尚不能使自己免受谗谀之人的陷害。”贾谊的《过秦论》中说：“并没有像孔丘、墨翟那样的智慧。”徐乐说：“没有孔子、曾子、墨子那样的贤德。”这些都是把孔子和墨子视为同一等级的人物，即使列子和邹阳的书不足为凭，而著名的政论家、文学家贾谊也是这样说的。唐朝的韩愈对孟子的学说造诣最深，往往能阐幽发微，见人之所未见。他认为孟子的功绩之所以不在大禹之下，正是因为他不赞同杨朱和墨子的主张。然而，韩愈在自己所写的《读墨子》一文中说道：“儒家和墨家都称赞唐尧、虞舜，都指责夏桀、商纣，都主张修身正心以治国平天下。如果真有治理国家的那一天，那么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如果双方不能相互重用，那就称不上是孔子和墨子了。”这又是为什么呢？郑国公魏征的《南史·梁论》中也有“抑扬孔、墨”的话。

玉川月蚀诗

【原文】 卢全《月蚀》诗，唐史以谓讥切元和逆党，考韩文公效全所作，云元和庚寅岁十一月。是年为元和五年，去宪宗遇害时尚十载。全云：“岁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说者谓“董秦”即李忠臣，尝为将相而臣朱僞，至于亡身，故全鄙之。东坡以为：“当秦之镇淮西日，代宗避吐蕃之难出狩，追诸道兵，莫有至者。秦方在鞠场，趣命治行，诸将请择日，秦曰：‘父母有急难，而欲择日乎？’即倍道以进。虽末节不终，似非无功而食禄者。”近世有严有翼者，著《艺苑雌黄》，谓坡之言非也，秦守节不终，受僞伪官，为贼居守，何功之足云？诗讥刺当时，故言及此。坡乃谓非无功而食禄，谬矣！有翼之论，一何轻发至诋坡公为非为谬哉！予按是时秦之死二十七年矣，何为而追刺之？使全欲讥逆党，则应首及禄山与僞矣。窃意元和之世，吐突承璀用事，全以为嬖幸擅位，故用董贤、秦宫辈喻之，本无预李忠臣事也。记前人似亦有此说，而不能省忆其详。

【译文】 卢全《月蚀》诗，唐史记它是讥刺元和年间叛乱朝廷的一帮人。查考韩文公（韩愈）摹仿卢全所作的这首诗，说是作于元和庚寅年十一月，这年是元和五年（810年），下距唐宪宗被暗杀时还有十年。卢全说：“岁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天上的太岁星主司福德，官爵前奉董贤秦宫）。”议论的人认为“董秦”就是李忠臣，曾官居将相而向背叛朝廷自称为帝的朱 称臣，以至于丧命，所以卢全鄙视他。东坡（苏轼）认为：“当董秦镇守淮西的时候，代宗为躲避吐蕃的入侵离开长安，催促各道的将士勤王救援，没有来到的。董秦得到诏书的时候正在球场上踢球，立刻下令装备行装，部下将领请求挑选一个黄道吉日，董秦说：‘父母视有急难，还想要挑好日子吗？’就一天赶两天的路程前进。虽然最终没有能保持大节，似乎还不是无功受禄的人。”近世有一个叫严有翼的人，写了一部《艺苑雌黄》，认为东坡的话不对，因为董秦不能最终保持大节，有什么功劳值得说的？卢全的诗讥讽当时的情况，所以提到这点，东坡却说是并非无功受禄，这是错了。严有翼的议论，为什么轻率地发表，以至于诋毁坡公是不对是错误呢？我查卢全写诗的时候已经离当时二十七年了，为什么要去讥刺死人呢？如果卢全要讥刺叛逆，就应当首先提到安禄山和朱 了。我猜想元和年间，吐突承璀专权，卢全认为小人窃据高位，所以用董贤、秦宫之流来比喻，本来和李忠臣和事情并无关系。记得以前人也有这一说法，但不能详细

回忆起来了。

诗要点检

【原文】 作诗至百韵，词意既多，故有失于点检者。如杜老《夔府咏怀》，前云“满坐涕潺湲”，后又云“伏腊涕涟涟”。白公《寄元微之》，既云“无杯不共持”，又云“笑劝迂辛酒”，“华樽逐胜移”，“觥飞白玉卮”，“饮讶《卷波》迟”，“归鞍酩酊驰，酡颜乌帽侧，醉袖玉鞭垂”，“白醪充夜酌”，“嫌醒自啜醢”，“不饮长如醉”，一篇之中，说酒者十一句。东坡赋中隐堂五诗各四韵，亦有“坡垂似伏鳌”，“崩崖露伏龟”之语，近于意重。

【译文】 作诗的韵部有一百余种，再加上字词的意项又极多，因而经常有人失于检点。如杜甫的《夔府咏怀》，前边说“满坐涕潺湲”，后面又说“伏腊涕涟涟”。白居易的《寄元微之》，既说“无杯不共持”，又说“笑劝迂辛酒”，“华樽逐胜移”，“觥飞白玉卮”，“饮讶《卷波》迟”，“归鞍酩酊驰，酡颜乌帽侧，醉袖玉鞭垂”，“白醪充夜酌”，“嫌醒自啜醢”，“不饮长如醉”，在一首诗中说酒的竟有十一句。苏东坡为中隐堂所题写的五诗各有四韵，其中也有“坡垂似伏鳌”，“崩崖露伏龟”之句，在意义上几乎是重复的。

周蜀九经

【原文】 唐贞观中，魏征、虞世南、颜师古继为秘书监，请募天下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缮写。予家有旧监本《周礼》，其末云，大周广顺三年癸丑五月，雕造九经书毕，前乡贡三礼郭礪书。列宰相李谷、范质、判监田敏等衔于后。《经典释文》末云，显德六年己未三月，太庙室长朱延熙书，宰相范质、王溥如前，而田敏以工部尚书为详勘官。此书字画端严有楷法，更无舛误。《旧五代史》：汉隐帝时，国子监奏《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四经未有印板，欲集学官考校雕造。从之。正尚武之时，而能如是，盖至此年而成也。成都石本诸经，《毛诗》、《仪礼》、《礼记》，皆秘书省秘书郎张绍文书。《周礼》者，秘书省校书郎孙朋古书。《周易》者，国子博士孙逢吉书。《尚书》者，校书郎周德政书。《尔雅》者，简州平泉令张德昭书。题云，广政十四年，盖孟昶时所镌，其字体亦皆精谨。两者并用士人笔札，犹有贞观遗风，故不庸

俗，可以传远。唯《三传》至皇璽元年方毕工，殊不逮前。绍兴中，分命两淮、江东转运司刻“三史”板，其两《汉书》内，凡钦宗讳，并小书四字，曰“渊圣御名”，或径易为“威”字，而他庙讳皆祇缺画，愚而自用，为可笑也。蜀《三传》后，列知益州、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田况衔，大书为三行，而转运使直史馆曹颖叔，提点刑狱、屯田员外郎孙长卿，各细字一行，又差低于况。今虽执政作牧，监司亦与之雁行也。

【译文】 唐代贞观年间，魏征、虞世南、颜师古接着担任秘书监，请求募集天下的书籍，选择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工于书法的，作为抄写者抄写。我家有旧藏的国子监本《周礼》，书的最后说：“大周广顺三年（953年）癸丑五月，雕刻九经完毕，前乡贡三礼郭颙书写。”又排列宰相李确、范质、判监田敏等的官衔在后边。《经典释文》的最后说：“显德六年（959年）己未三月，太庙室长朱延熙书。”宰相范质、王溥的官衔排列如《周礼》一样，而田敏以工部尚书的身分作为详勘官。这部书笔划端庄具有楷书的法度，更没有错字。《旧五代史》记载，后汉隐帝时期，国子监上奏说《周礼》、《仪礼》、《公羊传》、《谷梁传》四部经书还没有刻板，要集合学官雕板刷印。隐帝批准。当时正当用武作战的时候，而能这样做，这是到这一年才雕成刷印的。成都的石本各经，《毛诗》、《仪礼》、《礼记》，都是秘书省秘书郎张绍文所手写的；《周礼》，是秘书省校书郎孙朋古所手写的；《周易》是国子博士孙逢吉所手写的；《尚书》，是校书郎周德政所手写的；《尔雅》，是简州平泉令张德昭所手写的。写明广政十四年（951年），这是孟昶时期所镌刻的，它的字体也都精工端正。这两部书都用士人的书法，还有贞观年间的遗风，所以不庸俗，可以传下去。但三传直到本朝皇璽元年（1049年）才完工，质量赶不上从前。绍兴年间，分别命令两淮、江东转运司刻《史记》和两《汉书》的书板，在两《汉书》中间，凡是钦宗的御名“桓”，都用小字注明“渊圣御名”四个字，或者直接改为“威”字，而对其他皇帝的御名都只是缺笔划，愚蠢而自信，是很可笑的事。蜀刻三传之后开列知益州、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田况的官衔，大字书写分为三行，而转运使、直史馆曹颖叔，提点刑狱、屯田员外郎孙长卿，都只有小字书写一行，还稍稍比田况低一点。在今天虽然执政作为地方长官，转运使一类的监司官员，也和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

冢宰治内

【原文】 《周礼·天官·冢宰》，其属有宫正，实掌王宫之戒令纠禁。内宰以阴礼教六宫，以阴礼教九嫔。盖宫中官之长也。故自后、夫人之外，九嫔、世妇、女御以下，无不列于属中。后世宫掖之事，非上宰可得而闻也。《礼记·内则》篇记男女事父母、舅姑，细琐毕载，而首句云：“后王命冢宰，降德于众兆民。”则以其治内故也。

【译文】 《周礼·天官·冢宰》载其属官有宫正，实掌王宫的禁令和纠察。内宰以妇人之礼教化六宫，以妇人之礼教育九嫔，大约相当于宫中官的首脑。所以在后宫，除了王后、夫人之外，九嫔、世妇、女御以下，没有不列入内宰属下的。后代的宫内之事，都不是宰相所能过问的。《礼记·内则篇》记载子女侍奉父母、儿媳侍奉公婆的条文，包罗万象，即使最细微处也不漏掉，而该篇的第一句说：“王和王后命冢宰降德于亿万民众。”因为当时以宰相治理后宫，所以此处才这样说。

宰相爵邑

【原文】 国朝宰相初不用爵邑为轻重，然亦尝以代升黜。王文康曾任司空，后为太子太师，经太宗登极恩，但封祁国公。吕文穆自司徒谢事为太子太师，经东封西祀恩，不复再得三公，但封徐国、许国公而已。寇忠愍罢相，学士钱惟演以太子太傅处之，真宗令更与些恩数，惟演但乞封国公。王冀公钦若食邑已过万户，及谪为司农卿，于衔内尽除去，后再拜相，乃悉还之。汤岐公以大观文免相，因御史言落职镌爵。赵卫公坐举官犯赃，见为使相，但降封益川郡公，削二千户。今周益公亦然，皆故实所无也。王嫔相元封冀，嫌其与钦若同，屡欲改，适有进国史赏，予为拟进韩国制词，用“有此冀方，莫如韩乐”。既播告矣，而删定官冯震武以为真宗故封，不许用，遂贴麻为鲁，虽著于司封格，冯盖不知富韩公已用之矣。是时，嫔相以食邑过二万户为辞，寿皇遣中使至迈所居宣示，令具前此有无体例，及合如何施行事理，拟定闻奏。遂以邑户无止法复命，乃竟行下。

【译文】 大宋朝的宰相起初并不以爵位的高低和食邑的多少为轻重，但是

也曾以此来显示升降。王文康曾任司空，后任太子太师，经过太宗登极恩典，只是被封为祁国公而已。吕蒙正（谥文穆）辞去司徒职务后任太子太师，经东封泰山、西祀后土等恩典，不能再任三公，只是被封为徐国公、许国公而已。寇准被免去宰相职务后，学士钱惟演以太子太傅充任宰相，宋真宗下令多给些恩惠，但钱惟演只请求封为国公。冀国公王钦若的食邑已超过一万户，到被贬为司农卿时，国家依其新品级将食邑全部收回。后来，王钦若又重新担任宰相职务，国家又将食邑尽数归还给他。岐国公汤思退以观文殿大学士的身份从宰相位上退下来，他是因为御史的弹劾而被免职削爵的。赵卫公因为所荐举的官员贪赃枉法而获罪，但所受的惩罚只是由使相枢密使降为益州郡公，削减食邑二千户而已。现在的益国公周必大也是如此，所有这些，都是史无前例的。

王懿相原来被封为冀国公，自嫌封号与王钦若相同，多次想重换一个，正巧因为进献国史有赏，我草拟了进封他为韩国公的制词，其中有“有此冀方，莫如韩乐”的句子。制词已经公布了，而删定官冯震武认为宋真宗曾被封为韩国公，其他人再用此封号是不合适的，于是改为鲁国公，虽然著于司封格，但冯震武大约不知道韩国公富弼已经用过这一封号了。当时，王懿相以食邑已超过二万户为由进行推辞，孝宗派遣宦官为使者到我所住的地方说明原委，指令我查找以前有无这种例子，然后拟出应当如何处理的方案上报朝廷。于是，我以食邑户数无止法复命，这样，封王懿相为鲁国公的制书终于颁布了。

杨子一毛

【原文】 孟子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杨朱之书，不传于今，其语无所考。惟《列子》所载：“杨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国而隐耕。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人人不损一毫，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问杨朱曰：“去子体之一毛以济一世，汝为之乎？”杨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济。”禽子曰：“假济，为之乎？”杨子弗应。禽子出语孟孙阳，阳曰：“有侵若肌肤获万金者，若为之乎？”曰：“为之。”曰：“有断若一节得一国，子为之乎？”禽子默然。阳曰：“积一毛以成肌肤，积肌肤以成一节，一毛固一体万分中之一物，奈何轻之？””观此，则孟氏之言可证矣。

【译文】 孟子说：“杨朱主张利己，即使拔一根毫毛而利及天下也不愿做。”杨朱的著作，没有留传到今天，因而无从考证孟子的说法是否正确。只有《列子》记载：“杨朱说：‘伯成子高不愿拔一根毫毛以造福万事万物，因此舍国而

隐耕。古代的人损失一个毫毛以利天下也不干，如果每个人都不损一毫，不造福天下，天下也就大治了。’ 禽子问杨朱说：‘从你身上拔一根毫毛以救助全体世人，你愿意做吗？’ 杨朱说：‘世界本来就不是一根毫毛所能救的。’ 禽子说：‘假如能救，你干吗？’ 杨朱沉默不答。禽子出来后将此事说给孟孙阳听，孟孙阳说：‘如果有人愿以一万两黄金的代价摸一下你的肌肤，你干吗？’ 禽子回答说：‘干。’ 孟孙阳又问：‘如果有人要斩断你一节，然后送给你一个国家，你干吗？’ 禽子沉默不语。孟孙阳说：‘一根根毛发积累起来就构成了肌肤，一块块肌肤积累起来就构成了身体的一节，一根毛发本来就是整个人体万分之一的组成部分，怎么能够轻视它呢？’ 看到《列子》的这段记载，孟子的话就可以得到证实了。

李长吉诗

【原文】 李长吉有《罗浮山人诗》云：“欲剪湘中一尺天，吴娥莫道吴刀涩。” 正用杜老《题王宰画山水图歌》“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松半江水”之句。长吉非蹈袭人后者，疑亦偶同，不失自为好语也。

【译文】 李长吉（李贺）有《罗浮山人诗》说：“欲剪湘中一尺天，吴娥莫道吴刀涩（要剪下潇湘地区一尺天空，吴地的少女不要说吴刀生锈发涩）。 ” 正是用杜老（杜甫）《题王宰画山水图歌》中的“写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松半江水（哪里去找到并州的快剪刀，剪下吴淞的半江江水）之句。李长吉不是袭用别人诗句的人，我怀疑也是偶然相同，不愧是独立无所依傍的好诗句。

子夏经学

【原文】 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诸经独有书，虽传记杂言未可尽信，然要为与他人不同矣。于《易》则有传，于《诗》则有序。而《毛诗》之学，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传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传曾申，五传而至大毛公。于《礼》则有《仪礼·丧服》一篇，马融、王肃诸儒多为之训说。于《春秋》，所云“不能赞一辞”，盖亦尝从事于斯矣。公羊高实受之于子夏；谷梁赤者，《风俗通》亦云子夏门人。于《论语》，则郑康成以为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后汉徐防上疏曰：“《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

斯其证云。

【译文】 孔子的众多弟子中，只有子夏在诸经中有自己的作品，即使传记杂言不可尽信，但是也至少可以说明他与其他弟子不同。对于《易经》，他作有易传；对于《诗经》，他作有诗序。而《毛诗》这门学问，一说是子夏传给高行子，又经四传而至于小毛公；还有一种说法是子夏传给曾申，再经五传而至大毛公。对于《礼》，则子夏作有《仪礼·丧服》一篇，马融、王肃等著名学者都为它作注释、训诂。对于《春秋》，子夏说自己“不能赞一辞”，可见他也曾从事于此书的研究。《春秋公羊传》的作者公羊高实际上是受业于子夏；《谷梁传》的作者谷梁赤，《风俗通》一书说他也是子夏的门徒。对于《论语》，东汉大学者郑玄认为它乃是仲弓、子夏等人所撰定的。东汉的徐防给皇帝上疏说：“《诗经》、《尚书》、《周礼》、《乐经》等书，定于孔子，而阐发章句则始于子夏。”这也是证据之一。

卷十五

紫阁山村诗

【原文】 宣和间，朱礪挟花石进奉之名，以固宠规利。东南部使者郡守多出其门，如徐铸、应安道、王仲闾辈济其恶，豪夺渔取，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玩，即领健卒直入其家，用黄封表志，而未即取，护视微不谨，则被以大不恭罪，及发行，必撤屋决墙而出。人有一物小异，共指为不祥，唯恐芟夷之不速。杨戩、李彦创汝州西城所，任辉彦、李士涣、王汧、毛孝立之徒，亦助之发物供奉，大抵类礪，而又有甚焉者。徽宗患其扰，屡禁止之，然覆出为恶，不能绝也。偶读白乐天《紫阁山北村》诗，乃知唐世固有是事。漫录于此：“晨游紫阁峰，暮宿山下村。村老见予喜，为予开一樽。举杯未及饮，暴卒来入门。紫衣挟刀斧，草草十余人。夺我席上酒，掣我盘中飧。主人退后立，敛手反如宾。中庭有奇树，种来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断其根。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主人切勿语，中尉正承恩。”盖贞元、元和间也。

【译文】 徽宗宣和年间，朱礪以向皇帝进奉花石为名，巩固自己的恩宠，谋取血腥的暴利。东南地区的使者与郡守大多数出于朱礪之门，如徐铸、应安道、王仲闾之流。他们助桀为虐，巧取豪夺，不择手段，只要看到士民家中有一石一木稍微能玩，马上就率领如狼似虎的士兵直扑其家，贴上黄纸封条作为标记。因为不能及时运走，主人必须尽心看护，稍有不慎，就会被加上对皇帝大不敬的罪名；等到装运时必定要拆房破墙而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谁家里有一件东西略为与众不同，大家就会异口同声地说它是不祥之物，唯恐毁之不急。杨戩、李彦创设汝州（今属河南）西城所，任辉彦、李士涣、王汧、毛孝立之流也帮助他们搜集珍异之物供奉朝廷，其所作所为基本上与朱礪差不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徽宗担心他们扰民太甚，屡次下令禁止，但是他们仍然变着法子作恶，朝廷根本无法禁绝。我偶然阅读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的《紫阁山北村》诗，才知道唐代早已有这种事情。白居易诗的内容是：

“晨游紫阁峰，暮宿山下村。村老见予喜，为予开一樽。举杯未及饮，暴卒来入门。紫衣挟刀斧，草草十余人。夺我席上酒，掣我盘中飧。主人退后立，敛

手反如宾。中庭有奇树，种来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断其根。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主人切勿语，中尉正承恩。”大概是唐德宗贞元、唐宪宗元和年间所发生的事情。

李林甫 秦桧

【原文】 李林甫为宰相，妒贤嫉能，以裴耀卿、张九龄在己上，以李适之争权，设诡计去之。若其所引用，如牛仙客至终于位，陈希烈及见其死，皆共政六七年。虽两人伴食谄事，所以能久，然林甫以伎心贼害，亦不朝愠暮喜，尚能容之。秦桧则不然，其始也，见其能助我，自冗散小官，不三二年至执政。史才由御史检法官超右正言，迁谏议大夫，遂签书枢密。施钜由中书检正、郑仲熊由正言，同除权吏部侍郎。方受告正谢，施即参知政事，郑为签枢。宋朴为殿中侍御史，欲骤用之，令台中声称本台缺检法主簿，须长贰乃可辟。即就状奏除侍御史，许荐举，遽拜中丞，谢日除签枢，其捷如此。然数人者不能数月而罢。杨愿最善佞，至饮食动作悉效之。秦尝因食，喷嚏失笑，愿于仓卒间，亦阳喷饭而笑，左右侍者哂焉。秦察其奉己，愈喜。既历岁亦厌之，讽御史排击而预告之，愿涕泪交颐。秦曰：“士大夫出处常事耳，何至是？”愿对曰：“愿起贱微，致身此地，已不啻足，但受太师生成恩，过于父母，一旦别去，何时复望车尘马足邪？是所以悲也。”秦益怜之，使以本职奉祠，仅三月起知宣州。李若谷罢参政，或曰：“胡不效杨原仲之泣？”李河北人，有直气，笑曰：“便打杀我，亦撰眼泪不出。”秦闻而大怒，遂有江州居住之命。秦尝以病谒告，政府独有余尧弼，因奏对，高宗访以机务，一二不能答。秦病愈入见，上曰：“余尧弼既参大政，朝廷事亦宜使之与闻。”秦退，扣余曰：“比日榻前所询何事？”余具以告。秦呼省吏取公牋阅视，皆已书押。责之曰：“君既书押了，安得言弗知？是故欲相卖耳！”余离席辩析，不复应。明日台评交章。段拂为人愤愤，一日，秦在前开陈颇久，遂俯首瞌睡，秦退始觉，殊窘怖，上犹慰拊之，且询其乡里。少顷，还殿廊幕中。秦闭目诵佛，典客赞揖至三，乃答。归政事堂，穷诘其语，无以对，旋遭劾，至于责居。汤思退在枢府，上偶回顾，有所问。秦是日所奏，微不合。即云：“陛下不以臣言为然，乞问汤思退。”上曰：“此事朕岂不晓，何用问他汤思退？”秦还省见汤，已不乐，谋去之。会其病，迫于亡，遂免。考其所为，盖出偃月堂之上也。

【译文】 唐朝的李林甫任宰相，妒贤嫉能，口蜜腹剑，因为宰相裴耀卿和

张九龄的资历在他之上，左相李适之与他争权，他就设诡计把这些人挤离相位。至于李林甫自己所荐用的官员，像牛仙客直到在任上死去，陈希烈见到了李林甫死去，都共同执政六七年。虽然牛、陈两个人并无实权只能谄媚，凭这样才得以长久，然而李林甫尽管猜忌狠毒，也不是早晨恼怒晚上喜欢的那种人，还能够容得下他们。秦桧就不是这样。他在开始的时候，看到有人能帮助自己，就可以把那个人越级提拔，从一个多闲散的小官，不到三两年就升为执政大臣。史才从御史检法官越过右正言，升为谏议大夫，就任命为签书枢密。施钜从中书检正、郑仲熊从正言，一起授为代理吏部侍郎。正当接受任命谢恩的时候，施钜就升为参知政事，郑仲熊就升为签书枢密。宋朴任殿中侍御史，秦桧想一下子提拔任用他，就命令御史台声称本台中缺少检法主簿，必须要长贰才可以选拔担任。于是凭御史台的文书秦请任命宋朴为侍御史，批准他的推荐，很快又任命为御史中丞，谢恩的日子就任命为签书枢密，快得就是这样。然而这几个人没能到几个月就被罢免。杨愿最善于谄佞，甚至于饮食和动作全部摹仿秦桧。秦桧曾经因为吃饭打喷嚏而失笑，杨愿在仓卒之间，也故意喷出饭来而笑，当时在旁边侍候的人都讥笑他。秦桧觉察到他在奉承自己，更加高兴。过了一年多也感到讨厌，暗示御史加以参劾但又事先告诉他，杨愿伤心得大哭，鼻涕眼泪都流在下巴颏上。秦桧说：“士大夫出仕和居家，都是通常的事，哪里至于这样？”杨愿回答说：“我杨愿出身贫贱低微，自己能到这个地位，已经不止是满足而已。但是受到太师抚育我的恩情，超过了父母，一旦离别而去，什么时候再能望见您车子的尘土和马脚呢？这就是我所以悲伤的缘故。”秦桧更加喜欢他，让他带着本职再兼一个闲职，仅仅三个月就任命他为宣州知州。李若谷被罢免参知政事，有人说：“为什么不学杨原仲（杨愿）的哭泣？”李若谷是河北人，笑着说：“就是打死我，也骗不出眼泪来。”秦桧听到了大为生气，于是就命令李若谷在江州居住。秦桧曾经因病请假，政府中仅有余尧弼一个人，因为在奏对时，高宗向他询问机要事务，余尧弼有的不能回答。秦桧病愈以后进见高宗，皇上说：“余尧弼既然参与了重要政务，朝廷中这些事也应当让他知道。”秦桧退出以后，问余尧弼说：“前些天皇上在御榻上问的是什么事？”余尧弼一一告诉秦桧。秦桧叫办事人员取来公文查看，看到余尧弼都已签字画押，就责备他说：“您既然已经画押完毕，哪里能说不知道？这不过是要出卖我罢了！”余尧弼离开座位辩解，秦桧不再回答。第二天，参劾的本章纷纷呈上。段拂平时就糊里糊涂，一天，秦桧在皇上面前讲了很久，他就低头打瞌睡。秦桧退下以后他才明白，很窘困害怕，皇上还是安慰他，而且问他是哪里人。过一回儿，退回到殿外的廊幕中。秦桧闭上眼睛在念佛，司仪的人高唱作揖直至三次，才答礼。回

到政事堂，一再追问段拂听到了哪些话，段拂不能回答，过两天就遭到弹劾，以至于责令罢官家居。汤思退在中央政府，皇上偶然回顾，有所询问。秦桧这一天的回答稍稍有点不合适，就说：“陛下如果认为臣的话不对，请陛下问汤思退。”皇上说：“这件事朕难道不明白，哪里用得着问他汤思退？”秦桧回到办公机关里见到汤思退，心里已经不乐意，就阴谋要排挤走他。正当汤思退生病，等到死去，就算幸免。考查秦桧的所作所为，还要在李林甫之上。

注书难

【原文】 注书至难，虽孔安国、马融、郑康成、王弼之解经，杜元凯之解《左传》，颜师古之注《汉书》，亦不能无失。王荆公《诗新经》，“八月剥枣”解云：“剥者，剥其皮而进之，所以养老也。”毛公本注云：“剥，击也。”陆德明音普卜反。公皆不用。后从蒋山郊步至民家，问其翁安在？曰：“去扑枣。”始悟前非。即具奏乞除去十三字，故今本无之。洪庆善注《楚辞·九歌·东君》篇：“礚瑟兮交鼓，箫钟兮瑶虞。”引《仪礼·乡饮酒》章“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为比，云：“箫钟者，取二乐声之相应者互奏之。”既镂板，置于坟庵，一蜀客过而见之，曰：“一本箫作礚，《广韵》训为击也。盖是击钟，正与礚瑟为对耳。”庆善谢而亟改之。政和初，蔡京禁苏氏学，蕲春一士独杜门注其诗，不与人往还。钱仲仲为黄冈尉，因考校上舍，往来其乡，三进谒然后得见。首请借阅其书，士人指案侧巨编数十，使随意抽读，适得《和杨公济梅花》十绝：“月地云阶漫一尊，玉奴终不负东昏。临春结绮荒荆棘，谁信幽香是返魂。”注云：“玉奴，齐东昏侯潘妃小字。临春、结绮者，陈后主三阁之名也。”仲仲曰：“所引止于此耳？”曰：“然。”仲仲曰：“唐牛僧孺所作《周秦行纪》，记入薄太后庙，见古后妃辈，所谓月地云阶见洞仙，东昏以玉儿故，身死国除，不拟负他，乃是此篇所用。先生何为没而不书？”士人恍然失色，不复一语，顾其子然纸炬悉焚之。仲仲劝使姑留之，竟不可。曰：“吾枉用工夫十年，非君几貽士林嗤笑。”仲仲每谈其事，以戒后生。但玉奴乃杨贵妃自称，潘妃则名玉儿也。剥枣之说，得于吴说、傅朋，箫钟则庆善自言也。绍兴初，又有傅洪秀才注坡词，镂板钱塘，至于“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不能引“共道人间惆怅事，不知今夕是何年”之句。“笑怕蔷薇殢”，“学画鸦黄未就”，不能引《南部烟花录》，如此甚多。

【译文】 为前人的书籍作注释是很难的事，即使是像孔安国、马融、郑玄、

王弼这样的巨儒解释经书，杜预（字元凯）解《左传》，颜师古注释《汉书》，也不能避免差错。在荆国公王安石所作的《诗新经》中，“八月剥枣”一句中的“剥”字被解释为：“剥，就是剥掉枣皮然后进献，其目的是为了敬养老人。”而毛公本《诗经》的注释说：“剥，即击打。”陆德明的《经典释文》说：“剥，音普卜反。”但是，王安石对这些说法都弃之不用。后来有一天，他随蒋山到郊外散步时，路过一户民家，见男主人不在家，便询问他到哪儿去了？家人回答说：“去扑枣了。”王安石这才意识到此前自己搞错了，于是上奏朝廷，请求删去自己所解释的那十三个字，所以现在的版本没有这句话。

洪庆善为《楚辞·九歌·东君》篇“磬瑟兮交鼓，萧钟兮瑶”一句作注时，引用《仪礼·乡饮酒》一章中“其间歌唱《鱼丽》，笙奏《由庚》。演唱《南有嘉鱼》，笙奏《崇丘》。”两句作比，说：“箫钟，就是从这两种乐器中选取两件声音和谐的，合作演奏乐曲。”版刻好后，放置在坟庵，有一位路过的蜀地客人看见后说：“有一种版本‘箫’字作‘碰’，《广韵》解释此字的意思是击。‘碰钟’也就是击钟，正好与‘碰瑟’对仗。”洪庆善非常感激，当即更正过来。

徽宗政和初年，奸臣蔡京下令禁绝苏轼的著作，不许人们传习，可是蕲春却有一位学者闭门谢客，专心致志地注释苏轼的诗，几乎不与任何人往来。钱伸仲任黄冈县尉时，因为考试上舍生，多次往来于其乡，先后拜访了三次才见到那位学者。钱伸仲首先请求借阅其所注的书，学者指着案边的数十大本书稿，让他随意抽读，钱伸仲正好抽得《和杨公济梅花》十绝，其中“月地云阶漫一尊，玉奴终不负东昏。临春结绮荒荆棘，谁信幽香是返魂。”几句的注释说：“玉奴，乃南朝齐东昏侯萧宝卷潘妃的小名。临春和结绮，是南朝陈后主三阁的名称。”钱伸仲问：“您所引用的资料只有这些吗？”学者回答说：“是的。”钱伸仲说：“唐朝宰相牛僧孺所著的《周秦行记》记载他进入西汉的薄太后庙，看到了古代后妃们栩栩如生的形象，也就是所谓‘月地云阶（指天上）拜洞仙’，东昏侯因玉儿的缘故，身死国灭，玉儿由此暗下决心绝不背叛他，这才是此诗所用的典故。先生为什么埋没不写呢？”学者闻听恍然失色，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回头示意儿子将书稿付之一炬。钱伸仲极力劝说将书稿暂且留下，但学者坚决不听，并且说：“我白下了十年功夫，如果不是遇见你，我几乎要给天下的读书人留下笑柄。”钱伸仲经常提起此事，以教育后人。但是，或许他也不知道，玉奴乃是唐朝杨贵妃的自称，玉儿则是东昏侯潘妃的名字。剥枣的说法，得于吴说、傅朋，箫钟则是洪庆善自己的“创见”。高宗绍兴初年，又有一位名叫傅洪的秀才为苏东坡的词作注，最后在钱塘（今浙江杭州）刻版印刷，注释者甚至在“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两句之下，不能引用“共道人间惆怅事，不

知今夕是何年”两句；在“笑怕蔷薇礪”，“学画鸦黄未就”下，不知引用《南部烟花录》，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举不胜举。

书易脱误

【原文】 经典遭秦火之余，脱亡散落，其仅存于今者，相传千岁，虽有错误，无由复改。《汉·艺文志》载：“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以《尚书》校欧阳、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今世所存者，独孔氏古文，故不见二篇脱处。《周易·杂卦》自《乾》、《坤》以至《需》、《讼》，皆以两两相从，而明相反之义，若《大过》至《夬》八卦则否。盖传者之失也。东坡始正之。元本云：“《大过》，颠也。《睽》，遇也，柔遇刚也。《渐》，女归待男行也。《颐》，养正也。《既济》，定也。《归妹》，女之终也。《未济》，男之穷也。《夬》，决也，刚决柔也，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也。”坡改云：“《颐》，养正也。《大过》，颠也。《睽》，遇也，柔遇刚也。《夬》，决也，刚决柔也，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也。《渐》，女归待男行也。《归妹》，女之终也。《既济》，定也。《未济》，男之穷也。”谓如此而相从之次，相反之义，焕然若合符节矣。《尚书·洪范》“四，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便合继之以“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至于“月之从星，则以风雨”一章，乃接“五，皇极”，亦以简编脱误，故失其先后之次。“五，皇极”之中，盖亦有杂“九，五福”之文者。如“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凡厥正人，既富方谷，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时人斯其辜，于其无好德，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及上文“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是也。《康诰》自“惟三月，哉生魄”至“乃洪《大诰》治”四十八字，乃是《洛诰》，合在篇首“周公拜手”之前。《武成》一篇，王荆公始正之。自“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即继以“礪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至“一戎衣，天下大定”，乃继以“厥四月，哉生明”至“予小子其承厥志”，然后及“乃反商政”，以讫终篇，则首尾亦粲然不紊。

【译文】 经典著作经历了秦始皇的焚书之灾后，侥幸保存下来的也多有散落脱漏，又经过一千多年的风风雨雨，至今仍然幸存的即使有错误，也无法改正。《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末年，刘向以皇室所藏的古文《易经》校施氏、孟氏和梁丘氏所传的《易经》，发现有不少地方漏掉‘无咎’、‘悔亡’等字，

只有费氏所传的与古文经相同。又用《尚书》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所传的经文，发现《酒诰》篇脱漏竹简一片，《召诰》篇脱漏两片。大致简上有二十五个字的，漏掉的也是二十五个字；简上有二十二个字的，漏掉的也是二十二个字。”今天所流传的，只有孔氏的《尚书》古文，因而看不到这两篇的脱漏之处。

《周易·杂卦》中所排列的六十四卦卦序，从《乾》、《坤》以至《需》、《讼》，都是两两相随，以显示正反相互转化之义，可是从《大过》至《睽》的八卦就不是这样，大概是传授的人搞错了。直到本朝苏东坡才将它纠正过来。原来的本子说：“《大过》，即过头。《旼》，即遭遇，柔遇上刚。《渐》，即女子将要出嫁，正等候男方来迎接。《颐》，即养正，守正道。《既济》，即安定。《归妹》，即出嫁的女子被休回娘家，这乃是女子的末日。《未济》，即男子处于困境。《睽》，即决断，以刚决断柔，君子道长，小人道忧。”苏东坡将其次序改为：“《颐》，即养正，守正道。《大过》，即过头。《睽》，即决断，以刚决断柔，君子道长，小人道忧。《渐》，即女子出嫁，正等候男方来迎接。《归妹》，即出嫁的女子被休回娘家，这乃是女子的末日。《既济》，即安定。《未济》，即男子处于困境。”这种两两相随的排列次序，使得正反两方面相互转化之理一目了然，其珠联璧合正如符节两半吻合那样天衣无缝。《尚书·洪范》说：“第四，五种记时的方法：一是年，二是月，三是日，四是星辰，五是历法。”其下应当接“天子有了过失，就会影响一年；卿士有了过失，就会影响一月；官吏有了过失，就会影响一天。”至于“假如月亮离开太阳而追随星辰，就会出现多风或多雨的天气”一章，应当接在“五，皇极”一段之后，现在因为简编脱误而搞乱了先后的次序。而在“五，皇极”一章中，大约也混杂有“九，五福”一章中的内容。如“把这五种幸福集中起来，一并赏给臣民”，“凡是做官的人，都应当给他们以丰厚的待遇，使他们既富且贵。如果你不能让你的臣民为王室做出贡献，这样就会使臣民走上邪路。对于那些不尊重道德规范的人，你即使赏赐给他许多好处，他也会反过来给你造成危害”，以及上文中的“如果有人和颜悦色，态度谦恭地对你说：‘我特别喜爱你所建立的道德规范’，那么你就应当赏赐给他一些好处”等等都是。在《康诰》篇中，从“惟三月，哉生魄”至“乃洪《大诰》治”的四十八个字，乃是《洛诰》篇的内容，应放在篇首“周公拜手（即行礼）”之前。《武成》篇的错误，是王安石首先纠正过来的。从“武王一大早就从周出发，去讨伐商纣王”一句开始，下面直接连接“殛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至“一戎衣，天下大定”，下面再接以“厥四月，哉生明”至“予小子其承厥志”，然后再接“乃反商政”，直至结束。这种新排定的次序，首尾呼应，语气连贯，丝毫没有紊乱之感。

南陔六诗

【原文】 《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邱》、《由仪》六诗，毛公为《诗诂训传》，各置其名，述其义，而亡其辞。《乡饮酒》、《燕礼》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乐奏《南陔》、《白华》、《华黍》”，“乃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乃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芣》、《采芣》。”窃详文意，所谓歌者，有其辞所以可歌，如《鱼丽》、《嘉鱼》、《关雎》以下是也；亡其辞者不可歌，故以笙吹之，《南陔》至于《由仪》是也。有其义者，谓“孝子相戒以养”、“万物得由其道”之义；亡其辞者，元未尝有辞也。郑康成始以为及秦之世而亡之。又引《燕礼》“升歌《鹿鸣》，下管《新宫》”为比，谓《新宫》之诗亦亡。按《左传》宋公享叔孙昭子，赋《新宫》。杜注为逸诗，则亦有辞，非诸篇比也。陆德明《音义》云：“此六篇盖武王之诗，周公制礼，用为乐章，吹笙以播其曲。孔子删定在三百一十一篇内。及秦而亡。”盖祖郑说耳。且古《诗》经删及逸不存者多矣，何独列此六名于大序中乎？束瓊《补亡》六篇，不作可也。《左传》叔孙豹如晋，晋侯享之，金奏《肆夏》、《韶夏》、《纳夏》，工歌《文王》、《大明》、《绵》、《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夏》者乐曲名，击钟而奏，亦以乐曲无辞，故以金奏，若六诗则工歌之矣，尤可证也。

【译文】 《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邱》、《由仪》等六首诗，在毛公所作的《诗诂训传》一书中，只列其名，述其义，却没有记载具体的内容。《仪礼·乡饮酒》、《燕礼》说：“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所奏的乐曲是《南陔》、《白华》、《华黍》”，“于是其间演唱《鱼丽》，笙奏《由庚》；演唱《南有嘉鱼》，笙奏《崇丘》，演唱《南山有台》，笙奏《由仪》；然后声乐和器乐联合演奏《诗·周南》中的《关雎》、《葛覃》、《卷耳》，《召南》中的《鹊巢》、《采芣》、《采芣》等。”我仔细地揣摩这段话的意思，觉得所谓的“歌”，必定是本来有词可供歌唱，如《鱼丽》、《嘉鱼》、《关雎》以下都是；没有歌词的自然无法演唱，因而只得用笙吹奏，如《南陔》、《白华》以至《由仪》的六篇都是。其中有含义的，指的是“孝子相互鼓励以赡养老人”、“万事万物都按自己的规律存在、发展”等；没有歌词的，原本不曾有过。郑玄首先提出这些诗的具体内容是在秦朝时失传亡佚的，又引《燕礼》“升歌《鹿鸣》，下管《新宫》”作比较，认为《新宫》一诗的内容也失传了。按：《左传》记载：宋公招待叔孙昭子

时，命人诵《新宫》助兴。杜预的注释说《新宫》是一首已经失传的诗，可见《新宫》原来也有词，与《南陔》、《白华》等篇是不同的。唐代陆德明的《毛诗音义》说：“这六首诗大约是周武王时期的诗歌，周公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并以这六首诗为乐章，用笙吹奏以使其广为传播。孔子删定《诗》时，这六首诗保留在三百一十一篇之内，直到秦朝时才亡佚。”这大概是沿袭郑玄的说法。况且，古代的诗歌被孔子删掉及亡佚失传的太多了，为什么只有这六首的篇名保留在《诗》的大序中呢？束 所作的《补亡》六篇，是毫无必要的。《左传》记载叔孙豹到晋国，晋国的国君设宴招待，其间有金属乐器演奏《肆夏》、《韶夏》、《纳夏》，有乐工演唱《文王》、《大明》、《绵》、《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等。《肆夏》、《韶夏》等“三夏”乃是乐曲名，击钟而奏，这也是因为只有乐曲而没有词，所以用金属乐器演奏。至于《文王》、《大明》等六首诗则因为有词，当然可供乐工演唱，这是显而易见的，足以作为更有力的证据。

绍圣废春秋

【原文】 五声本于五行，而徵音废。四渎源于四方，而济水绝。《周官》六典所以布治，而司空之书亡。是固出于无可奈何，非人力所能为也。乃若《六经》载道，而王安石欲废《春秋》。绍圣中，章子厚作相，蔡卞执政，遂明下诏罢此经，诚万世之罪人也。

【译文】 宫、商、角、徵、羽“五声”源本于金、木、水、火、土“五行”，而徵音已被废弃。长江、黄河、淮河、济水等“四渎”发源于四方，而济水早已枯竭。《周礼》所记的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等六官都是为了治理国家而设置的，但有关司空的内容早已亡佚。这些固然都是出于无可奈何，非人力所能改变。至于《诗》、《书》、《乐》、《易》、《春秋》等“六经”是记载为人处世及治国安邦之道的，可是王安石却想废掉《春秋》。宋哲宗绍圣年间，章 任宰相，蔡卞任执政，于是促成朝廷正式下诏罢除《春秋》经，实在是千古罪人。

王韶熙河

【原文】 王韶取熙河，国史以为尝游陕西，采访边事，遂诣阙上书。偶读

《晁以道集·与熙河钱经略书》，云：“熙河一道，曹南院弃而不城者也。其后夏英公喜功名，欲城之，其如韩、范之论何？又其后有一王长官韶者，薄游阳翟，偶见《英公神道碑》所载云云，遂窃以为策以干丞相。时丞相是谓韩公，视王长官者稚而狂之。若河外数州，则又王长官弃而不城者也。彼木征之志不浅，鬼章之睥睨尤近而著也，陇拶似若无能，颇闻有子存，实有不可不惧者。”此书盖是元璽初年，然则韶之本指乃如此。予修史时未得其说也。《英公碑》，王岐公所作，但云尝上十策。若通甌厮罗之属羌，当时施用之，余皆不书，不知晁公所指为何为？

【译文】 王韶在神宗时期攻取熙州（今甘肃临洮）、河州（今甘肃临夏西南）一带，国史说他曾游历陕西，进行实地考察，了解边事后才入京上书，提出取西夏必先复河湟的策略。我偶然读到《晁以道集·与熙河钱经略书》，文中说：“熙河一带，是南院使曹玮弃而不守的地方。后来，英国公夏竦急功近利，沽名钓誉，一心想在此处筑城坚守，但是他又将怎样对待韩琦和范仲淹的不同意见呢？此后，有一个名叫王韶的官员在阳翟（今河南禹州）游览时，无意中见到了《夏英公神道碑》，知道夏竦曾有攻取熙河以抵御西夏之意，于是将它抄下来写成时事策呈送给当时的宰相韩琦，韩琦认为王韶过于幼稚而又狂妄。至于黄河以西的几州，则又是王韶弃而不守的。羌人的部族首领木征志向远大，鬼章更是虎视眈眈，陇拶似乎没有什么才能，但是听说他有不少儿子，不能不令人感到十分忧虑。”这封书信大概是写于哲宗元祐初年，从中可以看出王韶的本意原来如此。我编写史书时没有看到这个材料。《夏英公神道碑》是王岐公所作，只提到他曾向朝廷献十条计策，其中联合羌族的厮罗一策，当时就施行了，其余几策的详情没有记载，不知晁以道所指的是什么？

书籍之厄

【原文】 梁元帝在江陵，蓄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将亡之夕尽焚之。隋嘉则殿有书三十七万卷，唐平王世充，得其旧书于东都，浮舟溯河，尽覆于砥柱。贞观、开元募借缮写，两都各聚书四部。禄山之乱，尺简不藏。代宗、文宗时，复行搜采，分藏于十二库。黄巢之乱，存者盖甚少。昭宗又于诸道求访，及徙洛阳，荡然无遗。今人观汉、隋、唐《经籍》《艺文志》，未尝不茫然太息也。晁以道记本朝王文康初相周世宗，多有唐旧书，今其子孙不知何在。李文正所藏既富，而且辟学馆以延学士大夫，不待见主人，而下马直入读书。供牢饩以给

其日力，与众共利之。今其家仅有败屋数楹，而书不知何在也！宋宣献家兼有毕文简、杨文庄二家之书，其富盖有王府不及者。元符中，一夕灾为灰烬。以道自谓家五世于兹，虽不敢与宋氏争多，而校讎是正，未肯自逊。政和甲午之冬，火亦告谴。唯刘壮與家于庐山之阳，自其祖凝之以来，遗子孙者唯图书也，其书与七泽俱富矣。于是为作记。今刘氏之在庐山者不闻其人，则所谓藏书殆亦羽化。乃知自古到今，神物亦于斯文为靳靳也。宣和殿、太清楼、龙图阁御府所储，靖康荡析之余，尽归于燕，置之秘书省，乃有幸而得存者焉。

【译文】 梁元帝在江陵，储藏了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在亡国的前夕全部加以烧毁。隋朝嘉则殿中有书三十七万卷，唐朝平定王世充，在洛阳得到他所原有的书，用船装载溯黄河而上，在砥柱翻船全部沉没。贞观、开元年间四处征集借抄，西京长安、东京洛阳每地藏有经、史、子、集四部分书。安禄山之乱，全部被毁，一卷不剩。代宗、文宗的时候，重新寻访采集，分藏在十二个书库中。黄巢之乱以后，留存下来的也很少了。昭宗又在各地寻访，等到迁都洛阳，又全部被毁。今天的人看到《汉书》、《隋书》、《唐书》中的《经籍志》、《艺文志》，未尝不茫茫然慨叹的。晁以道记载到本朝王文康（王溥）起初在周世宗那里做宰相，藏有不少唐朝时代的旧书，现在他的子孙不知道在哪里。李文正（李昉）所藏的书既然很多，而且开辟出学馆用来邀请士大夫，不需要等见到主人，下马就直接进去读书，供给伙食，和大家一起享有其利。现在他家里只剩了破屋子几间，而藏书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宋宣献（宋绶）家里兼有杨文简（杨叵）、杨徵之两家的书，数量之多大约连有的王府也赶不上的。元符年间，一夜之间被火烧成灰烬。晁以道自己说家里五代藏书，虽然不敢和宋家去比数量多少，但校勘纠正，就不肯自己谦让了。政和甲午年（1114年）冬天，也被火烧了。只有刘壮與（刘义仲）的家在庐山南边，自从他的祖宗刘凝之以来，遗留给子孙的只有图书，他家里的书和云梦等七个大湖一样富有了，因此为他写了“记”。现在刘氏在庐山的没有听说有什么人，那么所谓藏书大约也已经不存在了。于是而知道从古到今，对于文人来说，神奇灵异之物也是不肯轻易赐予的。宣和殿、太清楼、龙图阁等皇家府库中所储藏的，靖康之乱被损毁散落所剩下的，全部归于金人，放在秘书省中，这是有幸而能保存下来的。

逐贫赋

【原文】 韩文公《送穷文》，柳子厚《乞巧文》，皆拟扬子云《逐贫赋》。韩

公《进学解》拟东方朔《客难》，柳子《晋问》篇拟枚乘《七发》、《贞府》拟《剧秦美新》，黄鲁直《跋奚移文》拟王子渊《僮约》，皆极文章之妙。《逐贫》一赋凡五百言，《文选》不收，《初学记》所载才百余字，今人盖有未之见者，辄录于此，云：“扬子遁世，离俗独处。左邻崇山，右接旷野。邻垣乞儿，终贫且窶。礼薄义弊，相与群聚。惆怅失志，呼贫与语：‘汝在六极，投弃荒遐。好为庸卒，刑戮是加。匪惟幼稚，嬉戏土沙。居非近邻，接屋连家。恩轻毛羽，义薄轻罗。进不由德，退不受诃。久为滞客，其意若何？人皆文绣，余褐不全。人皆稻粱，我独藜藿。贫无宝玩，何以接欢。宗室之宴，为乐不殚。徒行负赁，出处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耔，沾体露肌。朋友道绝，进官凌迟。厥咎安在，职女之为。舍女远窜，昆仑之颠。尔复我随，翰飞戾天。舍尔登山，岩穴隐藏。尔复我随，陟彼高冈。舍尔入海，泛彼柏舟。尔复我随，载沉载浮。我行尔动，我静尔休。岂无他人，从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复久留！’贫曰：‘唯唯，主人见逐，多言益嗤。心有所怀，愿得尽辞，昔我乃祖，崇其明德。克佐帝尧，誓为典则。土阶茅茨，匪雕匪饰。爰及季世，纵其昏惑。饕餮之群，贪富苟得。鄙我先人，乃傲乃骄。瑶台琼室，华屋崇高。流酒为池，积肉为崿。是用鹄逝，不践其朝。三省吾身，谓予无愆。处君之家，福禄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寒能暑，少而习焉。寒暑不忒，等寿神仙。桀跖不顾，贪类不干。人皆重蔽，子独露居。人皆怵惕，子独无虞。’言辞既罄，色厉目张。摄齐而兴，降阶下堂。誓将去汝，适彼首阳。孤竹之子，与我连行。’余乃避席，辞谢不直：‘请不贰过，闻义则服。长与尔居，终无厌极。’贫遂不去，与我游息。”唐宣宗时，有文士王振自称“紫罗山人”，有《送穷辞》一篇，引韩吏部为说，其文意亦工。

【译文】 韩愈的《送穷文》，柳宗元的《乞巧文》，皆是仿照西汉扬雄的《逐贫赋》而作。韩愈仿东方朔的《客难》作《进学解》，柳宗元仿枚乘的《七发》作《晋问》，仿《剧秦美新》作《贞符》，黄庭坚仿王子渊的《僮约》作《跋奚移文》，都是精妙绝伦的好文章。扬雄的《逐贫赋》全文将近五百字，《昭明文选》没有收入，《初学记》所载的才一百余字，估计今天有很多人从未见过这篇赋的原文，所以此处全文抄录如下：

“扬雄遁世，离俗独居。左邻高山，右接旷野。隔墙乞丐，又贫又穷。摒弃礼义，和平共处。我心郁闷，呼贫人问道：‘你生活在人世间悠闲自在，为何来此荒无人烟的僻壤？你本可做一个好的奴仆，为何来此冒刑戮加身的危险？你不仅幼稚在泥土沙堆上游戏。咱们本非近邻，却又连着我家房舍。恩轻如羽，义薄如纱。你来不是因为我有德，去不会受到谁指责。然而却长期滞留，究竟是

为什么？别人都穿绫罗与绸缎，我却连粗布衣也不全。别人都吃美味与佳肴，我却唯有野菜来裹腹。我家穷得叮当响，哪有财宝讨人心欢！宗室宴虽盛，有人早已腻。我则安步以代车，举债强度日。家门内与外，衣着迥相异。无奈做苦力，手脚落手茧。整年耕又锄，挥汗体外露。朋友断来往，仕途绝希望。穷人有何错，原因就在你。我舍你远行，登上那巍峨的昆仑极顶。你又随我而来，出没于云雾缭绕的半空里。我舍你登山，隐居岩穴。你又随我而来，登上那高高的山冈。我舍你入海，驾舟远航。你又随我而来，载沉载浮。我行你动，你停你止。岂无他人，从我何求？你快点走吧，不要再逗留！’贫人说：‘好，好。主人撵我，多说无益。我心中有话，一吐为快。我家祖先，德高望重。曾佐帝尧，立志成为典范。时君朴素，宫室简陋。及至后世，昏庸无道。贪婪之徒，见利忘义。辱我先人，既骄且傲。亭台楼阁，高大豪华。流酒成池，积肉成山。荒淫奢侈，无以复加。高飞远去，不再返回。三省吾身，我自无错。处君之家，福祿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抗寒耐暑，自幼习惯。寒暑不差，寿等神仙。昏君不理，强盗不顾。人皆深居，唯你露处。人皆惶恐，唯你无忧。’贫人说完，愤然作色。提襟而起，走出台阶下堂。‘发誓离开，前往首阳（在今河南洛阳东）。伯夷叔齐，乃我同伴。’我赶忙离开坐席，致歉不止，说道：‘自知有罪，今后必改。听君高论，心悦诚服。愿与你处，永不厌倦。’于是贫人留下，与我游处止息。”

在唐宣宗时期，有个名叫王振的文人自称“紫逻山人”，曾作了一篇《送穷辞》，对韩愈的文章，加以阐述，写得相当出色。

涧松山苗

【原文】 诗文当有所本，若用古人语意，别出机杼，曲而畅之，自足以传示来世。左太冲《咏史》诗曰：“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躋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白乐天《续古》一篇，全用之，曰：“雨露长纤草，山苗高入云。风雪折劲木，涧松摧为薪。风摧此何意，雨长彼何因？百尺涧底死，寸茎山上春。”语意皆出太冲，然其含蓄顿挫，则不逮也。

【译文】 作诗写文章应当有所依据，如果借用古人的说法，别出心裁，阐幽发微，自然能够流传后世。左思（字太冲）的《咏史》诗说：“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躋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

然，由来非一朝。”白居易的《续古》诗完全仿效这首诗，诗的内容是：“雨露长纤草，山苗高入云。风雪折劲木，涧松摧为薪。风摧此何意，雨长彼何因？百尺涧底死，寸茎山上春。”语言和意境都超过左太冲，然而其含蓄顿挫，却比不上左太冲。

男子运起寅

【原文】 今之五行家学，凡男子小运起于寅，女子小运起于申，莫知何书所载？《淮南子·泛论训》篇云：“礼三十而娶。”许叔重注曰：“三十而娶者，阴阳未分时俱生于子，男从子数左行三十年立于巳，女从子数右行二十年亦立于巳，合夫妇，故圣人因是制礼，使男子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其男子自己数左行十得寅，故人十月而生于寅，故男子数从寅起；女自己数右行得申，亦十月而生于申，故女子数从申起。”此说正为起运也。

【译文】 按照现在五行家的说法，男子的小运流年（即一年的吉凶）起于寅，女子的小运流年起于申，不知是什么书所载的？《淮南子·泛论训》篇说：“遵照礼制，男子三十岁娶妻。”东汉许慎注释说：“三十岁娶妻是指在阴阳未分的时候，男女一同生于子年，男子从子年向左数三十年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巳年，女子从子年向右数二十年也到了巳年，即二十岁，这时正宜夫妇合婚，所以，圣人据此制订礼制，让男子三十岁娶妻，女子二十岁出嫁。男子从巳向左数十即到寅，因此人经过十个月怀胎便生于寅月，也正由于此，男子的运数应从寅起；女子从巳向右数十为申，因而也是经十个月而生于申月，所以女子的运数应从申起。”许慎此话正是针对男女小运流年的起始而言的。

宰我作难

【原文】 《史记》称宰我为齐临淄大夫，与田常作难，以夷其族，孔子耻之。苏子由作《古史》，精为辩之，以为子我者阍止也，与田常争齐政，为常所杀，以其字亦曰子我，故《战国》之书误以为宰予。此论既出，圣门高第，得免非义之谤。东坡又引李斯《谏书》，谓“田常阴取齐国，杀宰予以庭。”是不从田常，故为所杀也。予又考之，子路之死，孔子曰：“由也死矣。”又曰：“天祝予！”哭于中庭，使人覆醢，其悲之如是，不应宰我遇祸，略无一言。《孟

子》所载三子论圣人贤于尧、舜等语，疑是夫子没后所谈，不然，师在而各出意见议之，无复质正，恐非也。然则宰我不死于田常，更可证矣。而《淮南子》又有一说云：“将相摄威擅势，私门成党，而使道不行。故使陈成、田常、鸱夷子皮得成其难，使吕氏绝祀。”子皮谓范蠡也，蠡浮海变姓名游齐，时简公之难已十余年矣。《说苑》亦云：“田常与宰我争，宰我将攻之，鸱夷子皮告田常，遂残宰我。”此说尤为无稽，是以蠡为助田氏为齐祸，其不分贤逆如此。

【译文】 《史记》说宰我为齐国临淄大夫，因为与擅权的田常为难，被夷灭家族，孔子深以为耻。苏辙所写的《古史》对这件事作了深刻、透彻的辨析，认为子我乃是阍止，因为与田常争夺齐国的政权，而被田常所杀。由于他的字也叫子我，因而《战国策》等书误以为是孔子的弟子宰予。这种观点出来后，孔门的高徒才不再蒙受不义的恶名。苏东坡又引证李斯的《谏书》说：“田常阴谋夺取齐国的政权，为此在庭院中杀害了碍手碍脚的宰予。”这是由于他不顺从田常，因而被杀害。我对这件事情也进行了考证，发现子路死时，孔子说：“仲由死了！”又说：“老天要断送我的性命！”孔子悲从心起，不禁在中庭痛哭失声，并且命人把肉汤倒掉，以免联想到被卫国人剁成肉酱的子路。孔子对子路的死伤心到这种程度，不应当对宰我遇害一事无动于衷，一言不发。然而，在《论语》等书中找不到孔子对宰我之死看法。《孟子》记载宰我等三人议论说自己的老师孔子比尧、舜更贤能，我怀疑这些话是他们在孔子死后所谈的，否则的话，老师健在而弟子们各抒己见，纷纷对他进行评论，并且没有人出来为他们判定是非曲直，恐怕是不大可能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宰我并未死于田常之手，就更加可以证实了。

《淮南子》一书又有一种不同的说法：“将相专擅朝政，作威作福，私门成党，以致大道不行。所以，陈成、田常、鸱夷子皮等人篡权成功，最终使得吕氏齐国寿终正寝，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鸱夷子皮即范蠡，帮助越王句践灭吴后，功成身退，驾一叶小舟浮海出走，隐姓埋名，来到齐国，这时距齐简公被田常所杀已经十几年了。《说苑》也说：“田常与宰我争权，宰我准备进攻对手，而鸱夷子皮将消息透露给田常，于是田常先下手处死了宰我。”这种说法尤其荒诞不稽，聪明的范蠡怎么能如此不辨忠奸、帮助田氏祸乱齐国呢？

古人占梦

【原文】 《汉·艺文志》、《七略》杂占十八家，以《黄帝长柳占梦》十一

卷，《甘德长柳占梦》二十卷为首，其说曰：“杂占者，纪百家之象，候善恶之证。众占非一，而梦为大，故周有其官。”《周礼》：“太卜，掌三梦之法，一曰致梦，二曰噩梦，三曰咸陟。”郑氏以为致梦夏后氏所作，噩梦商人所作，咸陟者言梦之皆得，周人作焉。而占梦专为一官，以日月星辰占六梦之吉凶，其别：曰正、曰噩、曰思、曰寤、曰喜、曰惧。季冬，聘王梦，献吉梦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于四方，以赠恶梦。舍萌者，犹释采也。赠者，送之也。《诗》、《书》、《礼》经所载，高宗梦得说；周文王梦帝与九龄；武王伐纣，梦叶朕卜；宣王考牧，牧人有熊黑虺蛇之梦，召彼故老，询之占梦。《左传》所书尤多。孔子梦坐奠于楹。然则古之圣贤，未尝不以梦为大，是以见于《七略》者如此。魏、晋方技，犹时时或有之。今人不复留意此卜，虽市井妄术，所在如林，亦无一个以占梦自名者，其学殆绝矣。

【译文】 《汉书·艺文志》和《七略》都著录杂占类十八家，以《黄帝长柳占梦》十一卷，《甘德长柳占梦》二十卷两书为首。作者还解释说：“杂占，即记录各种各样的现象，观测善恶吉凶的验证。占卜的种类有很多，而占梦最重要，因此周代有专职的占梦官。”《周礼》说：“太卜，掌管三梦之法，即：致梦，噩梦，咸陟三梦。”郑玄认为致梦乃是夏代人所作，噩梦乃是商代人所作，咸陟的意思是梦的集大成者，乃是周代人所作。占梦有专职的官员，以日月星辰占六梦的吉凶，这六梦是：正梦，噩梦，思梦，寤梦，喜梦，惧梦。季冬之时，聘王（天子）梦，向周王献吉梦，周王恭拜后予以接受，然后舍萌于四方，以赠恶梦。“舍萌”的意思与“释采”差不多，释采，即在开学之初，用蔬菜祭祀先师或送给老师。赠，即送出去。《诗经》、《尚书》、《周礼》等经书记载：商高宗武丁梦得贤相傅说；周文王梦见上帝给九龄；周武王伐纣，梦叶朕卜；周宣王考问牧人，牧人说自己梦见了许多蝗虫、鱼类和旗帜，这与梦见熊黑虺蛇一样是吉祥的梦。宣王于是召来元老们，询问占梦方面的事情。《左传》所记的梦例特别多。如孔子梦见自己坐在堂屋前部两根柱子之间祭奠。可见，古代的圣贤也从来不曾轻视过梦。因此，刘歆《七略》中著录了几本占梦专著。魏晋时期的医卜星相之士，还常常有精于此道的。今天，人们不再重视占梦，虽然在城乡集镇上相面算卦的人随处可见，数不胜数，但是却没有一个挂牌占梦的，占梦这门学问差不多已经绝灭了。

卷十六

高德儒

【原文】 唐高祖起兵太原，使子建成、世民将兵击西河郡，执郡丞高德儒，世民数之曰：“汝指野鸟为鸾，以欺人主取高官，吾兴义兵，正为诛佞人耳。”遂斩之，自余不戮一人。读史不熟者，但以为史氏虚设此语，以与指鹿为马作对耳。按隋大业十一年，有二孔雀飞集宝城朝堂前，亲卫校尉高德儒等十余人见之，奏以为鸾，时孔雀已飞去，无可得验。诏以德儒诚心冥会，肇见嘉祥，擢拜朝散大夫，余人皆赐束帛；仍于其地造仪鸾殿，距此时才二年余。盖唐温大雅所著《创业起居注》载之，不追书前事故也。《新唐书·太宗纪》但书云：“率兵徇西河，斩其郡丞高德儒。”尤为简略，赖《通鉴》尽纪其详。范氏《唐鉴》只论其被诛一节云。

【译文】 唐高祖在太原起兵，派儿子李建成、李世民领兵攻打西河郡，抓获郡臣高德儒。李世民责备他说：“你指着野鸟说是鸾鸟，用以欺骗人君取得高官，我兴起义兵，正是为了诛杀谄妄小人而已。”就杀了他，除他以外不杀罚一人。读史不熟的人，只认为史官想象记录了这句话，把它和指鹿为马相对而已。查考隋炀帝大业十一年，有两只孔雀飞来停在宝城朝堂前，亲卫校尉高德儒等十几个人见到过，上奏说是鸾鸟，当时孔雀已经飞离宝城，没有办法查验。诏书说高德儒的诚心与自然相合，开始见到祥瑞，升迁为朝散大夫，其余的人都赐给一束五疋帛；仍然在孔雀停过的地方造一座仪鸾殿。这事距离高德儒被杀才两年多。因为唐代温大雅所著的《创业起居注》记载高德儒被杀，不追记以前的事情的缘故。《新唐书·太宗纪》仅仅记载说：“领兵夺取西河，斩杀西河郡丞高德儒。”尤其简略，只靠着《通鉴》全部详细加以记录。范祖禹的《唐鉴》只论到他被杀的一节。

唐朝士俸微

【原文】 唐世朝士俸钱至微，除一项之外，更无所谓料券、添给之类者。白乐天为校书郎，作诗曰：“幸逢太平代，天子好文儒。小才难大用，典校在秘书。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遂使少年心，日日常晏如。”及为翰林学士，当迁官，援姜公辅故事，但乞兼京兆府户曹参军，既除此职，喜而言志，至云：“诏授户曹掾，捧诏感君恩。弟兄俱簪笏，新妇俨衣巾。罗列高堂下，拜庆正纷纷。喧喧车马来，贺客满我门。置酒延宾客，不复忧空樽。”而其所得者，亦俸钱四五万，廩禄二百石而已。今之主簿、尉，占优饫处，固有倍蓰于此者矣，亦未尝以为足，古今异宜，不可一概论也。杨文公在真宗朝为翰林学士，而云：“虚忝甘泉之从臣，终作若敖之馁鬼。”盖是时尚为鲜薄，非后来比也。

【译文】 唐代朝官的俸钱非常低微，除固定的俸钱外，根本没有所谓的料券、添给之类的额外收入。白居易担任校书郎时，曾作诗说：“幸逢太平代，天子好文儒。小才难大用，典校在秘书。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遂使少年心，日日常晏如。”到他担任翰林学士之职时，在升此官前，援引姜公辅以朝官兼任外官的故事，只向皇上请求兼任京兆府（今陕西西安）户曹参军一职，以增加自己的收入。皇帝任命他担任此职后，他非常高兴，写诗言志道：“诏授户曹掾，捧诏感君恩。弟兄俱簪笏，新妇俨衣巾。罗列高堂下，拜庆正纷纷。喧喧车马来，贺客满我门。置酒延宾客，不复忧空樽。”然而，他每年增加的收入，也不过四五万俸钱，二百石禄米而已。今天的小官主簿、县尉，只要是在富庶之地为官，其收入都会三倍、五倍于白居易的俸禄，但他们仍然不满足。可见，古今官吏俸禄制度有很大的不同，不可一概而论。真宗时，杨亿曾担任翰林学士之职，他说：“虚忝甘泉之从臣，终作若敖之馁鬼。”大概当时官员的俸禄还相当微薄，与后来是无法相比的。

计然意林

【原文】 《汉书·货殖传》：“越王勾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遂报强吴。”孟康注曰：“姓计名然，越臣也。”蔡谟曰：“‘计然’者，范蠡所著书篇名耳，非人也。谓之计然者，所计而然也。群书所称勾践之贤佐，种、蠡

为首，岂复闻有姓计名然者乎？若有此人，越但用半策，便以致霸，是功重于范蠡，而书籍不见其名，史迁不述其传乎？”颜师古曰：“蔡说谬矣。《古今人表》，计然列在第四等，一名计研。班固《宾戏》：‘研、桑心计于无垠。’即谓此耳。计然者，濮上人也，尝南游越，范蠡卑身事之，其书则有《万物录》，事见《皇览》及《晋中经簿》。又《吴越春秋》及《越绝书》，并作计倪。此则倪、研及然，声皆相近，实一人耳。何云书籍不见哉？”

予按唐贞元中，马总所述《意林》一书，抄类诸子百余家，有《范子》十二卷，云：“计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字文子，其先晋国之公子也，为人有内无外，状貌似不及人，少而明，学阴阳，见微知著，其志沉沉，不肯自显，天下莫知，故称曰‘计然’。时遨游海泽，号曰‘渔父’。范蠡请其见越王，计然曰：‘越王为人鸟喙，不可与同利也。’”据此则计然姓名出处，皎然可见，裴注《史记》，亦知引《范子》。《北史》萧大圜云：“留侯追踪于松子，陶朱成术于辛文。”正用此事。曹子建表引《文子》，李善注，以为计然，师古盖未能尽也。而《文子》十二卷，李暹注，其序以谓《范子》所称计然。但其书一切以老子为宗，略无与范蠡谋议之事，《意林》所编《文子》正与此同，所谓《范子》，乃别是一书，亦十二卷。马总只载其叙计然及他三事，云：“余并阴阳历数，故不取。”则与《文子》了不同，李暹之说误也。《唐·艺文志》《范子计然》十五卷，注云：“范蠡问，计然答。”列于农家，其是矣，而今不存。唐世未知尊孟氏，故《意林》亦列其书，而有差不同者，如伊尹不以一介与人，亦不取一介于人之类。其他所引书。如《胡非子》、《随巢子》、《缠子》、《王孙子》、《公孙尼子》、阮子《正部》、姚信《士纬》、殷兴《通语》、《牟子》、《周生烈子》、《秦菁子》、《梅子》、《任弈子》、《魏朗子》、《唐滂子》、《邹子》、孙氏《成败志》、《蒋子》、《谯子》、《钟子》、张俨《默记》、《裴氏新言》、袁准《正书》、袁子《正论》、《苏子》、《陆子》、张显《析言》、《于子》、《顾子》、《诸葛子》、《陈子要言》、《符子》诸书今皆不传于世，亦有不知其名者。

【译文】《汉书·货殖传》：“粤（越）王勾践被困在会稽，就任用范蠡、计然，于是就报了强大的吴国之仇。”孟康注说：“姓计名然，越国的臣子。”蔡谟说：“‘计然’，是范蠡所著书中的篇名而已，不是指人。称之为‘计然’的原因，是因为所策划的后来果然如此。许多书上所提到勾践的贤能辅佐，以文种、范蠡为首，难道又听说有姓计名然的人吗？如果有这个人，越国只要用他一半的策略就能称霸，这是功劳重于范蠡，而书上见不到他的名字，司马迁也不为他立传吗？”颜师古说：“蔡谟的说法错了。《汉书·古今人表》中，计然列在第四等，另外一个名字是计研。班固《答宾戏》‘研、桑（桑弘羊）的计谋无边无

限’，说的就是这个人。计然，是濮上人。曾经往南到了越国，范蠡卑躬折节地事奉他，他所著的书则有《万物录》、见于《皇览》和《晋中经簿》。又《吴越春秋》和《越绝书》都写成‘计倪’，这是‘倪’、‘研’和‘然’字的声音都相近，其实是一个人。怎么说书中见不到呢？”我查考唐代贞元年间，马总所记述的《意林》一书，按类抄录诸子一百多家，有《范子》十二卷，说：“计然，是葵丘濮上人，姓辛字文子，他的上代是晋国的公子。他的为人内秀外拙，形状相貌似乎不如一般人，年少时就能洞察事理，学习阴阳家的学问，见到隐蔽的迹象就能知道明显的后果，他的志向深沉，不肯自我显耀，天下没有人了解，所以称之为‘计然’。当时在海上湖中遨游，号为‘渔父’。范蠡请他去见越王勾践，他说：‘越王的嘴巴尖得像鸟，只能和他共患难，不能和他共欢乐的。’根据这一记载，计然的姓名和来历，明白可见。裴真注《史记》，也知道引用《范子》。《北史》中记载萧大圜说：“留侯张良追踪于赤松子，陶朱公范蠡的计谋成就于辛文。”正是用的这一记载。曹子建（曹植）上表引用《文子》，李善注以为就是计然，颜师古的注释还是没有完备。《文子》十二卷，李暹注，书的序言认为就是《范子》中所说的计然。但是这部书里一切都把老子之学作为归向，一点都没有和范蠡计划议论的记载，《意林》所编录的《文子》正和这部《文子》中的文字相同，所谓《范子》，乃是另外一种书，也是十二卷。马总只记载书中叙述计然的和其他的三件事，说：“余下的都是阴阳历法占卜，所以不加引录。”那就是和《文子》明显不一样，李暹的说法是错误的。《新唐书·艺文志》记录《范子》计然十五卷，注释说：“范蠡问，计然答。”列在农家类，恐怕是对的，而现在已经散失不存了。唐代还没有知道推尊孟氏，所以《意林》也收入了这部书，而有差异不同的，像伊尹如果认为不合于道义，就“一介（一点点）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之于）人”，写成“不以一介与人，亦不取一介于人”之类。其他所引用的书，像《胡非子》、《随巢子》、《缠子》、《王孙子》、《公孙尼子》、阮子《政部》、姚信《士纬》、殷兴《通语》、《牟子》、《周生烈子》、《秦菁子》、《梅子》、《任弈子》、《魏朗子》、《唐滂子》、《邹子》、孙氏《成败志》、《蒋子》、《谯子》、《钟子》、张俨《默记》、《裴氏新言》、袁淮《正书》、袁子《正论》、《苏子》、《陆子》、张显《析言》、《于子》、《顾子》、《诸葛子》、《陈子要言》、《符子》这些书，现在都已亡佚不传，也有连作者名字都不知道的。

思颖诗

【原文】 士大夫发迹垄亩，贵为公卿，谓父祖旧庐为不可居，而更新其宅者多矣。复以医药弗便，饮膳难得，自村疃而迁于邑，自邑而迁于郡者亦多矣。唯翩然委而去之，或远在数百千里之外，自非有大不得已，则举动为不宜轻。若夫以为得计，又从而咏歌夸诩之，著于诗文，是其一时思虑，诚为不审，虽名公巨人，未能或之免也。欧阳公，吉州庐陵人，其父崇公，葬于其里之泂冈，公自为《阡表》，纪其平生。而公中年乃欲居颖，其《思颖诗序》云：“予自广陵得请来颖，爱其民淳讼简，土厚水甘，慨然有终焉之志。尔来思颖之念，未尝少忘于心，而意之所存，亦时时见于文字。乃发旧稿，得南京以后诗十余篇，皆思颖之作，以见予拳拳于颖者，非一日也。”又《续诗序》云：“自丁家难，服除，入翰林为学士，忽忽八年间，归颖之志虽未遂，然未尝一日少忘焉。至于今，年六十有四，免并得蔡，蔡、颖连疆，因得以为归老之渐。又得在毫及青十有七篇，附之，时熙宁三年也。”公次年致仕，又一年而薨，其逍遥于颖，盖无几时，惜无一语及于松楸之思。崇公惟一子耳，公生四子，皆为颖人，泂冈之上，遂无复有子孙临之，是因一代贵达，而坟墓乃隔为他壤。予每读二序，辄为太息。嗟乎！此文不作可也。若东坡之居宜兴，乃因免汝州居住而至，其后自海外北还，无以为归，复暂至常州，已而捐馆。文定公虽居许，而治命反葬于眉山云。

【译文】 发迹于垄亩的士大夫一旦飞黄腾达，贵为公卿之后，总认为祖辈的旧房已不能居住，于是重新建造新宅的人很多。又因为居于乡里看病吃药不太方便，生活饮食难以满足需要，因而从乡里迁到小镇，从小镇迁到城市的人也很多。这些人毫不留恋地把旧家园抛弃，有的人远在数百里甚至上千里之外做官，如果不是万不得已，是不应当轻举妄动的。至于说那些自以为得计的人，又是写诗，又是作文，对此夸耀一番。其实，这都是他们一时头脑发热，实在是不够慎重。这样的事，即使是很有地位、很有名望的人，也难免会重蹈这种覆辙。欧阳修先生是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县）人，他的父亲欧阳崇先生去世以后，被埋葬在故乡的泂冈，欧阳修亲自为他的父亲写了一篇《阡表》，记述他的生平事迹。而欧阳修先生中年以后不思返归故里，却一心想迁居颖州（治今安徽阜阳），他在《思颖诗序》中写道：“我从广陵（今江苏江都县）来颖州做官以后，非常喜爱这里人民的淳朴、正直、不爱争讼，这里的土壤肥沃，水质

甘美，所以我不由自主地又有了在这里安度晚年的想法。从那时起，对颖州的思念之情，每每萦绕于心，而这种心情，也时常流露在我的诗文里。我就翻阅以前的文稿，找到离开南京（今河南商丘县）以后所作的十余首诗，发现都是为思念颖州而作。可见我对颖州的深深思念，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另外，他在其《续诗序》中写道：“自从家父去世，服丧期满，入朝任翰林学士以来，一晃已有八年了。八年间，重回颖州的愿望虽然没能实现，但是我对颖州却一天也不曾忘怀。今年，我已经六十四岁了，近来从并州（今山西太原）转到蔡州（今河南汝南县）任职，而蔡州和颖州地界相连，因此我觉得这是向告老返回颖州又走近了一步。近来我又将在亳州（今属安徽）和青州（今属山东）所作的十七首诗，附在《思颖诗》之后。这一年是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第二年，欧阳修先生就退休了，又过了一年便去世了。他在颖州逍遥自在的生活，大概也没有多长时间。可惜，在他的所有诗文中却从未提及对故乡的思念。欧阳崇先生只有欧阳修一个儿子，欧阳修先生有四个儿子，他们都住在颖州，是颖州人。而欧阳崇先生坟茔的所在地泷冈，自此之后却再无子孙光临。这确实是只因为一代人作官显贵，而祖坟便被抛弃在故乡。我每次读到上面两篇序言，就会长叹不已。唉！像欧阳修先生的这种诗文实在可以不写。至于苏轼居住在宜兴（今属江苏），乃是因为他被罢知汝州（今属河南）的职务后才去的，后来他从琼州（今海南海口）被赦免北还大陆后，无处安身，只得暂时到常州（今属江苏）居住，不久就病死于此。他的弟弟文定公苏辙虽然居住在许州（今河南许昌），但临终前他遗命子孙将自己归葬于故乡眉山（今属四川）。

刘礪下第

【原文】 唐文宗大和二年三月，亲策制举人贤良方正，刘礪对策，极言宦官之祸。既而裴休、李礪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考官左散骑常侍冯宿、太常少卿贾磁、库部郎中庞严，见礪策，皆叹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诏下，物论嚣然称屈。谏官、御史欲论奏，执政抑之。李礪曰：“刘礪下第，我辈登科，能无厚颜！”乃上疏，以为礪所对策，汉、魏以来无与为比。今有司以礪指切左右，不敢以闻，恐忠良道穷，纲纪遂绝。臣所对不及礪远甚，乞回臣所授以旌礪直。”不报。予按是时宰相乃裴度、韦处厚、窦易直，易直不足言，裴、韦之贤，顾独失此，至于抑言者使勿论奏，岂不有愧于心乎？礪既由此不得仕于朝，而李礪亦不显，盖无敢用之也。令狐楚、牛僧孺，乃能表礪入幕府，待以师礼，

竟为宦人所嫉诬，贬柳州司户。李商隐赠以诗曰：“汉廷急诏谁先入，楚路高歌自欲翻。万里相逢欢复泣，凤巢西隔九重门。”及殤卒，复以二诗器之，曰：“一叫千回首，天高不为闻。”又曰：“已为秦逐客，复作楚冤魂。并将添恨泪，一洒问乾坤！”其悲之至矣。甘露之事，相去才七年，未知殤及见之否乎？

【译文】 唐文宗大和二年（828年）三月，皇帝亲自策问制举，选拔贤良方正之人，刘礪针对皇帝的策问提出了对策，在对策中，他直言不讳地论述宦官对国家的危害。不久，裴休、李璣等二十二人在制举中中第，并都被授予一定的官职。当时的考官左散骑常侍冯宿、太常寺少卿贾谿、库部郎中庞严三人，看了刘礪的对策后，非常敬佩他的勇气，但是由于他们害怕宦官的势力，因而不敢录取刘礪。诏书下达，舆论哗然，人们都为刘礪打抱不平。谏官、御史也准备就此事上书皇帝，弹劾考官失职，但宰相却阻止了他们。李璣愤愤不平地说：“刘礪落第，我辈登科，能不感到惭愧吗！”于是，他上疏皇帝，认为：“刘礪所作的对策，汉魏以来没有人可以相比，现在主考官因为刘礪指责了陛下身边的宦官，就不敢把此事告知陛下，我担心将来朝中的忠良直言之臣会越来越少，国家的纲纪也会不复存在。我的对策远不如刘的好，恳请把授予我的功名收回，改授给刘礪，以表彰刘礪的正直无私。”然而这份奏疏并没有得到皇帝的答复。我查考，当时的宰相乃是裴度、韦处厚、窦易直三人，窦易直其人不足一提，可是像裴度、韦处厚这样的贤相，竟然在此事上也不能主持公道，而且还制止谏官、御史上书皇帝，他们这样做，难道于心无愧吗？刘礪既因此而不能在朝中做官，而李璣也因此不被重用，这大概是因为没有人敢任用他。只有令狐楚、牛僧孺敢于上表皇帝要求将刘礪聘请到自己幕府中，并以师礼待之。后来，刘礪竟被宦官嫉恨诬陷，被贬为柳州（今属广西）司户。诗人李商隐写了一首诗赠给刘礪，诗中写道：“汉廷急诏谁先入，楚路高歌自欲翻。万里相逢欢复泣，凤巢西隔九重门。”刘礪死时，李商隐又写了二首诗哭吊他，诗中写道：“一叫千回首，天高不为闻。”又说：“已为秦逐客，复作楚冤魂。并将添恨泪，一洒问乾坤！”其悲伤已达到极点。七年以后，发生了朝官欲诛灭宦官而反被宦官所诛的“甘露之变”，不知刘礪在世时是否看到了此事？

酒肆旗望

【原文】 今都城与郡县酒务，及凡鬻酒之肆，皆揭大帘于外，以青白布数幅为之，微者随其高卑小大，村店或挂瓶瓢，标帚杆，唐人多咏于诗。然其制

盖自古以然矣，《韩非子》云：“宋人有酤酒者，斗概甚平，遇客甚谨，为酒甚美，悬帜甚高，而酒不售，遂至于酸。”所谓悬帜者此也。

【译文】 现今在都城和郡县的酒务，以及所有卖酒的店铺，都在门外挂一幅大帘，大帘由数幅青布或白布做成，小店的幌子高低大小随意，乡村小酒店有挂酒瓶的、有挂酒瓢的，还有用扫帚秆作标志的，唐代人的诗文对此多有反映。然而，这种规矩大概自古以来就有，《韩非子》中说：“宋国（今河南商丘一带）有个卖酒的人，酒具中盛得很满，对待客人也很殷勤，所造的酒非常香醇，门外的旗帜挂得也很高，可是他的酒却卖不出去，以至于腐败变酸。”其中所说的悬挂旗帜，正是酒幌子。

贤宰相遭谗

【原文】 一代宗臣，当代天理物之任，君上委国而听之，固为社稷之福，然必不使邪人参其间乃可，不然必为所胜，姑以唐世及本朝之事显显者言之，若褚遂良、长孙无忌之遭李义府、许敬宗，张九龄之遭李林甫是已。裴晋公相宪宗，立淮、蔡、青、郢之功，唐之威令纪纲，既坏而复振，可谓名宰矣。皇甫一共政，则去不旋踵，迨穆、敬、文三宗，主既不明，而元稹、李逢吉、李宗闵更撼之，使不得一日安厥位。赵韩王以佐命元勋，而为卢多逊所胜，寇莱公为丁谓所胜，杜祁公、韩、范为陈执中、贾昌朝所胜，富韩公为王介甫所胜，范忠宣为章子厚所胜，赵忠简为秦会之所胜，大抵皆然也。

【译文】 作为一代有名望的大臣，肩负着辅佐皇帝治理天下的重任，君主也把国家委托给他并给予充分的信任，这固然是国家的福份，但是同时还必须严禁奸佞小人参与朝政才行，否则的话，忠臣必然会被奸佞之人所排挤，有才能也无法施展。这里姑且以唐朝和我大宋朝的几个典型事件为例来说明。如唐代的名臣褚遂良、长孙无忌曾遭到奸臣李义府、许敬宗的陷害；张九龄曾遭到口蜜腹剑的李林甫的陷害也是如此。晋国公裴度，曾是唐宪宗时的宰相，对收复被藩镇势力控制的淮、蔡、青、郢等地，立下了汗马功劳，使安史之乱后遭到破坏的政令纲纪得以重振，真可以称得上是一代名相。但皇甫湜参议朝政后，裴度很快就被排挤出朝廷。到了穆宗、敬宗和文宗时，君主昏庸，元稹、李逢吉、李宗闵等人又屡进谗言，使得裴度一日也不得安宁。我朝这类事情也不少，如开国元勋韩王赵普曾遭到卢多逊陷害；寇准曾遭到丁谓的陷害，杜衍、韩琦、范仲淹曾遭到陈执中、贾昌朝的谗言，富弼曾遭到王安石的排挤，范纯正曾遭

到章 的排挤，赵鼎曾遭到秦桧的陷害等等，基本上都是如此。

宋齐丘

【原文】 自用兵以来，令民间以见钱纽纳税直，既为不堪，然于其中所谓和买折帛，尤为名不正而敛最重。偶阅大中祥符间，太常博士许载著《吴唐拾遗录》，所载多诸书未有者。其《劝农桑》一篇正云：“吴顺义年中，差官兴版簿，定租税，厥田上上者，每一顷税钱二贯一百文，中田一顷税钱一贯八百，下田一顷千五百，皆足陌见钱，如见钱不足，许依市价折以金银。算计丁口课调，亦科钱，宋齐丘时为员外郎，上策乞虚抬时价，而折绢、绵、绢本色，曰：‘江淮之地，唐季已来，战争之所。今兵革乍息，黎氓始安，而必率以见钱，折以金银，此非民耕凿可得也，无兴贩以求之，是为教民弃本逐末耳。’是时，绢每匹市价五百文，绢六百文，绵每两十五文，齐丘请绢每匹抬为一贯七百，绢为二贯四百，绵为四十文，皆足钱，丁口课调，亦请蠲除，朝议喧然沮之，谓亏损官钱，万数不少。齐丘致书于徐知诰曰：‘明公总百官，理大国，督民见钱与金银，求国富庶，所谓拥彗救火，挠水求清，欲火灭水清可得乎？’知诰得书，曰：‘此劝农上策也。’即行之。自是不十年间，野无闲田，桑无隙地，自吴变唐，自唐归宋，民到于今受其赐。”齐丘之事美矣。徐知诰亟听而行之，可谓贤辅相。而《九国志·齐丘传》中略不书，《资治通鉴》亦佚此事。今之君子为国，唯知浚民以益利，岂不有缺于偏闰之臣乎？齐丘平生，在所不论也。

【译文】 自从国家用兵以来，命令老百姓以现钱来交纳税收，老百姓对此已经难以负担，然而，在征收赋税时又有所谓和买（宋制，在春季青黄不接之时，官府向百姓发放贷款，夏秋时令其输绢于官，偿还贷款，称为和买）和折帛（由和买发展而来，官府不贷钱，而责令百姓按每匹帛的价钱纳钱若干），这更是变着法子加重百姓的负担。近来，我偶尔翻阅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太常寺博士许载所著的《吴唐拾遗录》一书，其中的许多内容都是其他书所不曾记载的。其中的一篇《劝农桑》写道：“五代十国时期，吴王杨溥于顺义年间派遣官员整理户口，编定户口册，又根据每户土地的多少厚薄，规定租税的征收标准：上上田，每顷纳税钱二贯一百文；中等田，每顷纳税钱一贯八百；下等田，每顷纳税一千五百文，都是足陌现钱（古代制钱每贯十足为一百枚，称为足陌钱），如果现钱不足，允许依照市场价格折合金银，根据成丁之数征收的调（一种征收绢绵等丝织品的户税），也折合现钱征收。当时任员外郎的宋齐丘，上书

请求虚抬当时的市场价格，从而折合绢、绵、绢本色（唐以后称交纳实物为本色）。他在上奏文中写道：‘江淮地区，从唐末以来，战争连绵不断。现在战争刚刚平息，老百姓刚刚过上安定的日子，可是征收赋税一定要用现钱，或折合成金银，这不是百姓耕田种地所能得到的，不通过买卖交易是难以将实物换成现钱金银的，假如让百姓都这样去做，实际上就是唆使百姓弃本逐末，弃农经商。’当时，绢每匹市场价五百文，绢每匹六百文，绵每两市场价十五文，宋齐丘请求把绢的价格抬高到每匹一贯七百元，绢的价格抬高到每匹二贯四百文，绵的价格抬高到每两四十文，都以足钱征收，成丁应交纳的调，也请求予以免除。宋齐丘的建议提出后，朝廷议论哗然，大臣纷纷指责他，说他这样做会减少国家财政收入数以亿万计。齐丘看到这种情况就写信给宰相徐知诰说：‘明公您总领百官，治理国家，想向百姓征收现钱和金银，认为这样国家就富裕了，这种政策可以说是拿着扫帚去救火，搅着水以求其清澈，想使火灭水清，能行吗？’徐知诰看完信后说：‘这是鼓励发展农业的上策。’于是就采纳了宋齐丘的建议，立即在全国推行新的政策。不到十年，荒芜的田地开垦了，空隙的地上种了桑树，从吴到南唐，从南唐又到大宋，当地百姓至今仍然受惠于此项政策。”宋齐丘的建议真是太好了。而徐知诰能很快接受宋齐丘的建议，并予以实施，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位贤明宰相。然而，《九国志·宋齐丘传》中，将此事略而不提。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时也将此事略去。现在一些官员治国，只知道榨取民脂民膏以增加国家财富，他们面对偏安一隅的小国之臣宋齐丘，难道不感到惭愧吗？宋齐丘的平生之事，在这里就不必说了。

咸磴子

【原文】 《玉篇》、《唐韵》释磴字云：“木名，出豫章，煎汁，藏果及卵不坏。”《异物志》云：“磴子，音元，盐鸭子也。”以其用磴木皮汁和盐渍之。今吾乡处处有此，乃如苍耳、益母，茎杆不纯是木。小人争斗者，取其叶磴擦皮肤，辄作赤肿，如被伤，以诬赖其敌。至藏鸭卵，则又以染其外，使若赭色云。

【译文】 《玉篇》、《唐韵》解释“磴”字说：“树名，生长在豫章（今江西南昌）一带，熬汁，用来收藏水果和各种禽蛋时不会坏。”《异物志》中说：“磴子，磴音读元，就是咸鸭蛋。”其做法是取磴木皮，斫碎煮汁，趁热加盐，冷却后，用以浸鸭蛋，过一段时间后可以食用了。现在我的家乡处处都有这种树木，就像苍耳、益母一样多，其茎杆不纯粹是木。小人争吵打架的，摘其叶子

揉皱后揉擦在皮肤上，皮肤马上就会红肿，就像被打伤一样，以此来诬陷对方。到收藏鸭蛋时，又用它染蛋壳，使之变成红褐色。

月中桂兔

【原文】 《酉阳杂俎·天咫篇》，载月星神异数事。其命名之义，取《国语》楚灵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则”之说。其纪月中蟾桂，引释氏书，言须弥山南面有阎扶树，月过树，影入月中。或言月中蟾桂，地影也；空处，水影也。予记东坡公《鉴空阁诗》云：“明月本自明，无心孰为境。挂空如水鉴，写此山河影。我观大瀛海，巨浸与天永。九州居其间，无异蛇盘镜。空水两无质，相照但耿耿。妄云桂兔蟆，俗说皆可屏。”正用此说。其诗在集中，题为《和黄秀才》。顷予游南海，西归之日，泊舟金利山下，登崇福寺，有阁枕江流，标曰“鉴空”，正见诗牌揭其上，盖当时临赋处也。

【译文】 《酉阳杂俎·天咫篇》中记载了几件有关日月星辰的神话故事。“天咫”一词的出处，是采用《国语》中楚灵王的话：“是知天咫，安知民则”。《天咫篇》中所记载的月亮中的蟾蜍和桂树，是引用佛经的说法，说须弥山南边有棵阎扶树，月亮从这棵树上空经过时，树影映入月中。有的人认为，月中的蟾蜍和桂树，是陆地的影子；空白的地方，是水的影子。我记得苏轼先生在其《鉴空阁诗》中写道：“明月本自明，无心孰为境。挂空如水鉴，写此山河影。我观大瀛海，巨浸与天永。九州居其间，无异蛇盘镜。空水两无质，相照但耿耿。妄云桂兔蟆，俗说皆可屏。”这首诗正是采用这种说法。这首诗在他的文集中，题为《和黄秀才》。不久前，我到南海（今广东番禺）游览，返回的时候，把船停泊在金利山下，登上崇福寺游览，发现有一阁凌空架在江流之上，阁名为“鉴空”，并且看到阁中有一石碑上正刻着东坡先生的这首诗，大概这里就是他当年登临赋诗的地方。

唐二帝好名

【原文】 唐贞观中，忽有白鹊营巢于寝殿前槐树上，其巢合欢如腰鼓。左右拜舞称贺，太宗曰：“我常笑隋炀帝好祥瑞，瑞在得贤，此何足贺？”乃命毁其巢，放鹊于野外。明皇初即位，以风俗奢靡，制乘舆服御金银器玩，令有司

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天下毋得复采织，罢两京织锦坊。予谓二帝，皆唐之明主，所言所行，足以垂训于后，然大要出于好名。鹊巢之异，左右从而献谀，叱而去之可也，何必毁其巢？珠玉锦绣，勿珍而尚之可也，何必梦之殿前，明以示外，使家至户晓哉！治道贵于执中，是二者俱不可以为法。其后杨贵妃有宠，织绣之工，专供妃院者七百人，中外争献器服珍玩。岭南经略使张九皋、广陵长史王翼，以所献精靡，九皋加三品，翼入为户部侍郎，天下从风而靡，明皇之始终，一何不同如此哉！

【译文】 唐代贞观年间，忽然有白鹊在寝宫首槐树上筑巢，它的巢两个连结在一起形状像腰鼓。左右随从朝拜舞蹈欢呼祝贺，唐太宗说：“我常常笑隋炀帝喜欢祥瑞。其实祥瑞在于得到贤人，这有什么值得庆贺的？”就命令拆毁鹊巢，把白鹊放到野外。唐明皇刚刚即位，因为风俗奢侈华靡，下诏说凡是坐车服饰金银器玩，命令有关官署销毁，以供军务国政之用。其中的珠玉锦绣在殿前烧毁，天下不得再行采集织造，废止长安和洛阳的织锦坊。我以为这两位皇帝都是唐代的英明君主，所言所行，都足以给后世留下训示，但大体上还是出于好名。白鹊筑巢的奇异，左右随从因此而阿谀奉承，把他们叱责一番就可以了，何必毁掉鹊巢？珠玉锦绣，不把它们当成宝贝而提倡这种风气就可以了，何必在殿前焚烧，明白地向外宣布，而使家喻户晓呢！治国之道贵在掌握不偏不倚，所以这两件事恐怕不可以效法。后来杨贵妃受到宠爱，织锦刺绣的工人，专供杨贵妃一院使用的有七百人，京城内外争着进献器物服饰珍宝玩物。岭南经略使张九皋、广陵长史王翼，由于所进贡的物品精工华丽，张九皋加三品，王翼进京当了户部侍郎，天下人像随风草一样倒伏，唐明皇的开始和终了，为什么不同到这样呢！

周礼非周公书

【原文】 《周礼》一书，世谓周公所作，而非也，昔贤以为战国阴谋之书，考其实，盖出于刘歆之手。《汉书·儒林传》，尽载诸经专门师授，此独无传。至王莽时，歆为国师，始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且置博士。而河南杜子春受业于歆，还家以教门徒，好学之士郑兴，及其子众往师之，此书遂行。歆之处心积虑，用以济莽之恶，莽据以毒殒四海，如五均、六磬、市官、赊贷，诸所兴为，皆是也。故当其时，公孙禄既已斥歆颠倒《六经》毁师法矣。历代以来，唯宇文周依六典以建官，至于治民发政，亦未尝循故辙。王安石欲变乱祖

宗法度，乃尊崇其言，至与《诗》、《书》均匹，以作《三经新义》，其序略曰：“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时；其法要可于后世，其文有见于载籍，莫具乎《周官》之书。自周之衰，以至于今，太平之遗迹，扫荡几尽，学者所见无复全经。于是时也，乃欲训而发之，臣知其难也。以训而发之之难，则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复之之为难。”则安石所学所行实于此乎出。遂谓：“一部之书，理财居其半。”又谓：“泉府，凡国之财用取具焉，岁终，则会其出入而纳其余，则非特摧兼并，救贫厄，因以足国事之财用。夫然故虽有不庭不虞，民不加赋，而国无乏事。”其后吕嘉问法之而置市易，由中及外，害遍生灵。呜呼！二王托《周官》之名以为政，其归于祸民一也。

【译文】 《周礼》一书，世人都认为是周公旦所作，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先贤认为它是战国时期专论阴谋之书，我经过详细的考证后发现，它很可能是出自于西汉末年刘歆之手。《汉书·儒林传》中，详尽地记载了各种儒家经典师承传授的情况，唯独没有记载《周礼》的传授情况。到了王莽统治时期，刘歆身为国师，才开始建议立《周官经》以为《周礼》，并且在太常寺所属的太学中设置《周礼》博士。当时，河南郡（治今河南洛阳）人杜子春跟从刘歆专学《周礼》，学成回家以后，又以《周礼》教授门徒，有好学之士郑兴和他的儿子郑众前去拜他为师，学习《周礼》，这本书于是流行于世。刘歆处心积虑地以《周礼》来帮助王莽为非作歹，王莽则根据《周礼》的一些内容祸害天下，比如当时王莽实行的五均、六榷、市官、赊贷等政策，以及其它的改制措施，都是根据这本书而制定的。所以，当时公孙禄就已经斥责刘歆颠倒了《六经》（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儒家经典）的主次关系，打乱师法关系。历代以来，只有宇文氏建立的北周政权按照《周礼》中的六典（即治典、礼典、教典、政典、刑典、事典）来建官设职，至于说施政治民，也并非完全按六典去做。王安石想变乱祖宗所立的法度，就尊崇《周礼》的理论，甚至于将它和《诗》、《书》相提并论，作了一本《三经新义》，以宣扬其主张。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写道：“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没有哪个朝代能超过西周；其法度可以施行于后代，其文章可以见诸史籍，没有哪本书能比《周官》更全面了。自周朝衰亡以来，直到今天，天下一直动荡不安，太平盛世成了可望不可及的幻想，学者们再也见不到全部的儒家经典。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解释它，阐幽发微，我清楚地知道这是很困难的。由解释和阐幽发微很困难，又进一步知道施政管理要恢复到它所讲的制度就更困难。”由此可见，王安石的所作所为完全依据《周礼》。所以他又说：“一部《周礼》，仅理财方面的内容就占了一半。”又说：“泉府（《周礼》地官的属官，掌管国家税收、收购市场上

的滞销货物等）之官，凡是国家的财政收支全部由它来管理，每到年底，就计算出收入和支出数目，把节余的财物纳入国库，这不仅可以抑制兼并、救助贫困，而且还可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这样，即使出现有的地方不服从统治，或其它难以预料的事情，不用加重百姓的负担，就可以解决问题，同时国家财政也不会感到困难。”后来，吕嘉问就效法它而制定市场交易的措施，并且由京师推广到地方，坑害了全国的百姓。唉！王莽、王安石二人都是假托《周官》之名来推行政事，其结果都是以祸害百姓而告终。

醉尉亭长

【原文】 李广免将军为庶人，屏居蓝田，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后广拜右北平太守，请尉与俱，至军而斩之，上书自陈谢罪，武帝报曰：“报忿除害，朕之所图于将军也。”王莽窃位，尤备大臣抑夺下权，大司空士夜过奉常亭，亭长呵之，告以官名，亭长醉曰：“宁有符传邪！”士以马蹶击亭长，亭长斩士，亡，郡县逐之。家上书，莽曰：“亭长奉公，勿逐。”大司空王邑斥士以谢。予观此两亭尉长，其醉等耳。霸陵尉但呵止李广，而广杀之，武帝不问，奉常亭长杀宰士，而王莽反以奉公免之，亦可笑也。

【译文】 李广被免去将军作为庶民百姓，隐居在蓝田。曾经在夜里带一个随从，跟人在田野里喝酒，回到亭上，霸陵尉喝令李广停下。后来李广被任命为右北平太守，请求让霸陵尉随行，到了军中就把他杀了。给汉武帝上书自己陈述请罪，汉武帝批复说：“报复怨忿为民除害，这本来是朕所希望将军这样做的。”王莽篡位，尤其防止大臣压制和夺取下面官吏的权力。大司空王邑的属官夜里经过奉常亭，亭长呵叱他，他就自报官名，亭长喝醉了，说：“难道你有朝廷的凭证吗？”那个属官用马鞭鞭打亭长，亭长把他杀了，自己逃亡在外，各郡县追捕缉拿。亭长的家属上书请罪，王莽说：“亭长执行公务，不要再追捕。”大司空王邑把其他属官驱逐表示谢罪。我看这两个亭尉、亭长，同样是喝醉了酒，霸陵尉仅仅喝令李广停下，而李广却把他杀了，汉武帝置之不问，奉常亭长杀死宰相的属官，而王莽反而说是执行公务而赦免他，这也很可笑了。

三易之名

【原文】 《三易》之名，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皆以两字为义。今人但称《周易》曰《易》，非也。夏曰《连山》，其卦以纯《艮》为首，《艮》为山，山上山下，是名《连山》。云气出内于山，故名《易》为《连山》。商曰《归藏》，以纯《坤》为首，《坤》为地，万物莫不归而藏于中，故名为《归藏》。周曰《周易》，以纯《乾》为首，《乾》为天，天能周匝于四时，故名《易》为周也。太簇为人统，寅为人正。夏以十三月为正，人统，人无为卦首之理，《艮》渐正月，故以《艮》为首。林钟为地统，未之冲丑，故为地正，商以十二月为正，地统，故以《坤》为首。黄钟为天统，子为天正，周以十一月为正，天统，故以《乾》为首。此本出唐贾公彦《周礼正义》之说，予整齐而纪之。所谓十三月者，承十二月而言，即正月耳。后汉陈宠论之甚详，本出《尚书大传》。

【译文】 《三易》，是指《连山》、《归藏》和《周易》，他们都是以两个字命名的。今人只把《周易》称作《易》，这是错误的。夏代的《易》名叫《连山》，其卦序是以纯《艮》卦为开头，《艮》为山，纯《艮》卦的上卦（外卦）、下卦（内卦）都是山，所以叫做《连山》。云气又出纳于山中，所以夏朝人称《易》为《连山》。商代的《易》名叫《归藏》，是以纯《坤》卦为开头，《坤》为地，天下万物没有不归藏于地的，所以商朝人称《易》为《归藏》。周代的《易》名叫《周易》，是以纯《乾》卦为开始，《乾》为天，天体周而复始的变化演绎出四季来，所以周代人称《易》为《周易》。太簇为人统，寅为人正。夏朝以十三月为正月，是人统，因为没有以人为卦首之理，而《艮》接近正月，所以就以《艮》为首。林钟为地统，未之冲丑，所以是地正，商朝以十二月为正月，是地统，所以就以《坤》为卦首。黄钟为天统，子为天正，周朝以每年十一月为正月，是天统，所以就以《乾》为首卦。这些都是出自于唐人贾公彦所著的《周礼正义》，我把它们整理后记录下来。所谓十三月，乃是上承十二月而言，实际上就是正月。东汉人陈宠对此事论述得很详细，他的依据是《尚书大传》。

忠臣名不传

【原文】 古今忠臣义士，其名载于史策者，万世不朽，然有不幸而泯没无传者。南唐后主，淫于浮图氏，二人继踵而谏，一获徒，一获流。歙人汪焕为第三谏，极言请死，云：“梁武事佛，刺血写佛经，散发与僧践，舍身为佛奴，屈膝礼和尚，及其终也，饿死于台城。今陛下事佛，未见刺血、践发、舍身、屈膝，臣恐他日犹不得如梁武之事。”后主览书，赦而官之。又有淮人李雄，当王师吊伐，出守西偏，不遇其敌。雄以国城重围，不忍端坐，遂东下以救之，阵于溧阳，与王师遇，父子俱没，诸子不从行者亦死他所，死者凡八人。李氏讫亡，不沾褒赠，其事仅见于《吴唐拾遗录》。顷尝有旨合九朝国史为一书，他日史官为列之于《李煜传》，庶足以慰二人于泉下。欧阳公作《吴某墓志》云：“李煜时，为彭泽主簿，曹彬破池阳，遣使者招降郡县，其令欲以城降，某曰：‘吾能为李氏死尔。’乃杀使者，为煜守。煜已降，某为游兵执送军中，主将责以杀使者，曰：‘固当如是。’主将义而释之。”其事虽粗见，而集中只云“讳某”，为可惜也。如靖康之难，朱昭等数人死于震武城之类，予得朱弁所作《忠义录》于其子礪，乃为作传于四朝史中，盖惜其无传也。

【译文】 古今以来的忠臣义士，他们的名字记载在史册上的，就经历万世而不朽，然而还有不幸而消失不传下来的。南唐李后主，迷信佛教，有两个人一个接一个地劝谏，结果是一人被监禁，一人被流放。歙地人汪焕上书作第三次劝谏，坦率地说请求死罪，说：“梁武帝事奉佛教，刺出血来写佛经，披散发给和尚践踏，甘心于苦行成为佛的奴才，屈膝向和尚下跪，等到临终，还是饿死在台城。现在陛下事奉佛教，没有见到您有刺出血来，让和尚践踏头发，甘心于苦行，屈膝向和尚下跪，臣恐怕陛下将来还不能像梁武帝那样的下场。”李后主看了上书，赦免了他并且封官。又有淮上人李雄，当本朝大军进攻南唐，他正在西边驻守，没有遇上大军。李雄由于南唐的京城被重重围困，不忍心坐视不救，于是就领兵东下救援，在溧阳摆开阵势，和大军作战，父子都战死在沙场，没有跟随作战的其他几个儿子也死在别处，死去的一共有八个人。李氏一直到亡国，没有恩赐赠官，这件事只见于《吴唐拾遗录》。最近曾有圣旨要把九朝国史合成一部书，将来史官应当把他们附进《李煜传》中，这才差不多可以在地下安慰这两个人。欧阳公（欧阳修）写作《吴某墓志》说：“李煜的时代，任为彭泽主簿。曹彬攻破池阳，派遣使者招降各郡各县，彭泽令要献城投降，这

个人说：‘我只能为李氏效忠而死。’就杀了使者，为李煜死守。李煜已经投降，这个人被流动的士兵抓住送到大军中，主将责备他杀死使者这件事，他说：‘本来应该这样。’主将认为他忠义就释放了他。”事实经过虽然粗粗可以见到，但欧阳公的文集中只说：“吴某”是很可惜的。例如清康年间金朝人南下的祸难，朱昭等四个人死在震武城这类事，我就是在朱弁的儿子朱璉那里得到了朱弁所作的《忠义录》，这才为他们在四朝国史中写作了传记，这是因为感到事迹不流传是可惜的。

唐人酒令

【原文】 白居易诗：“鞍马呼教住，骰盘喝遣输。长驱波卷白，连掷采成卢。”注云：骰盘、卷白波、莫走鞍马，皆当时酒令。予按皇甫松所著《醉乡日月》三卷，载骰子令云：聚十只骰子齐掷，自出手六人，依采饮焉。堂印，本采人劝合席，碧油，劝掷外三人。骰子聚于一处，谓之酒星，依采取散。骰子令中，改易不过三章，次改鞍马令，不过一章。又有旗幡令、闪囂令、抛打令。今人不复晓其法矣，唯优伶家，犹用手打令以为戏云。

【译文】 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一首诗写道：“鞍马呼教住，骰盘喝遣输。长驱波卷白，连掷采成卢。”注释说：骰盘、卷白波、莫走鞍马，都是当时的酒令。我查阅皇甫松所著的《醉乡日月》三卷，记载骰子令说：拿十只骰子一齐掷出，自出手六人，依照点数饮酒。当骰子掷出堂印（骰子掷出双重四）时，本采人劝合席；掷出碧油时，劝掷外三人。骰子全聚集一处时，称之为酒星，依采聚散。骰子令中，改易不得超过三次，接着改为鞍马令，改易不得超过一次。还有旗幡令、闪碇令、抛打令。现在的人对这些酒令已完全不了解，只有优伶（古代的演员）家，还有用手打令饮酒游戏的。

容斋三笔

作者自序

王右将军逸少，晋、宋间第一流人也，逸情轩昂，摆落世故，盖其生平雅怀。自去会稽内史，遂不肯复出。自誓于父母墓下，词致确苦，予味其言而深悲之。又读所与谢万石书云：“坐而获逸，遂其宿心。比尝与安石东游山海，颐养闲暇之余，欲与亲知时共欢宴，衔杯引满，语田里所行，故以为抚掌之资，其为得意，可胜言邪！常依依陆贾、班嗣之处世，老夫志愿尽于此也。”按是时逸少春秋才五十余耳，史氏不能赏取其高，乃屑屑以为坐王怀祖之故，待之浅矣。予亦从会稽解组还里，于今六年，仰瞻昔贤，犹駑蹇之视天骥，本非伦拟，而年龄之运，逾七望八，法当挂神虎之衣冠，无假于誓墓也。幸方寸未渠昏，于宽闲寂寞之滨，穷胜乐时之暇，时时捉笔据几，随所趣而志之。虽无甚奇论，然意到即就，亦殊自喜。于是《容斋三笔》成累月矣，稚子云“不可无序引”，因抒写所怀，并发逸少之孤标，破《晋史》之妄，以诏儿孙，冀为《四笔》他日嘉话。庆元二年六月晦日序。

卷一

晁景迂经说

【原文】 景迂子晁以道留意六经之学，各著一书，发明其旨，故有《易规》、《书传》、《诗序论》、《中庸》、《洪范传》、《三传说》。其说多与世儒异。

谓《易》之学者所谓应、所谓位、所谓承乘、所谓主，皆非是。大抵云，《系辞》言卦爻象数刚柔变通之类非一，未尝及初应四、二应五、三应六也。以阳居阳、以阴居阴为得位，得位者吉。以阳居阴、以阴居阳为失位，失位者凶。然则九五、九三、六二、六四俱善乎？六五、六三、九二、九四俱不善乎？既为有应无应、得位不得位之说，而求之或不通，则又为承乘之说。谓阴承阳则顺，阳承阴则逆，阳乘柔则吉，阴乘刚则凶，其不思亦甚矣。又必以位而论中正，如六二、九五为中且正，则六五、九二俱不善乎？初、上、三、四永不得用中乎？卦各有主，而一概主之于五，亦非也。

其论《书》曰：予于《尧典》，见天文矣，而言四时者不知中星。《禹贡》敷土治水，而言九州者不知经水。《洪范》性命之原，而言九畴者不知数。舜于四凶，以尧庭之旧而流放窜殛之。穆王将善其祥刑，而先丑其毫荒。汤之伐桀，出不意而夺农时。文王受命为僭王，召公之不说，类乎无上。太甲以不顺伊尹而放，群叔才有流言而诛，启行挈戮之刑以誓不用命，盘庚行剕殄之刑而迁国，周人饮酒而死，鲁人不板干而屋诛。先时不及时而杀无赦。威不可讫，老不足敬，祸不足畏，凶德不足忌之类。惟此经遭秦火煨烬之后，孔壁朽折之余，孔安国初以隶篆推科斗。既而古今文字错出东京，乃取正于杜林。传至唐，弥不能一，明皇帝诏卫包悉以今文易之，其去本几何其远矣！今之学者尽信不疑，殆如手授于洙、泗间，不亦惑乎？论《尧典》中星云，于春分日而南方井、鬼七宿合，昏毕见者，孔氏之误也。岂有七宿百九度，而于一夕间毕见者哉？此实春分之一时正位之中星，非常夜昏见之中星也。于夏至而东方角、亢七宿合，昏毕见者，孔氏之误也。岂有七宿七十七度，而于一夕间毕见者哉？此夏至一时之中星，非常夜昏见者也。秋分、冬至之说皆然。凡此以上，皆晁氏之说。所辩圣典，非所敢知。但验之天文，不以四时，其同在天者常有十余宿。自昏至旦，除

太阳所舍外，余出者过三之二，安得言七宿不能于一夕间毕见哉？盖晁不识星故云尔。

其论《诗序》云，作诗者不必有序。今之说者曰，《序》与《诗》同作，无乃惑欤！且逸诗之传者，岐下之石鼓也，又安睹《序》邪？谓晋武公盗立，秦仲者石勒之流，秦襄公取周地，皆不应美。《文王有声》为继伐，是文王以伐纣为志，武王以伐纣为功。《庭燎》、《沔水》、《鹤鸣》、《白驹》，箴、规、诲、刺于宣王，则《云汉》、《韩奕》、《崧高》、《民》之作妄也。未有《小雅》之恶如此，而《大雅》之善如彼者也。谓《子衿》、《候人》、《采芣》之《序》骈蔓无益，《磻木》、《日月》之《序》为自戾，《定之方中》、《木瓜》之《序》为不纯。孟子、荀卿、左氏、贾谊、刘向汉诸儒，论说及《诗》多矣，未尝有一言以《诗序》为议者，则《序》之所作晚矣。晁所论是否，亦未敢辄言。但其中有云，秦康公暄穆公之业，日称兵于母家，自丧服以寻干戈，终身战不知已，而序《渭阳》，称其“我见舅氏，如母存焉”，是果纯孝欤？陈厉公弑佗代立，而序《墓门》责佗“无良师傅”，失其类矣。予谓康公《渭阳》之诗，乃赠送晋文公入晋时所作，去其即位十六年。衰服用兵，盖晋襄公耳，《传》云“子墨衰至”者也。康公送公子雍于晋，盖徇其请。晋背约而与之战，康公何罪哉？责其称兵于母家，则不可。陈佗杀威公太子而代之，故蔡人杀佗而立厉公，非厉公罪也。晁诋厉以申佗，亦为不可。

其论《三传》，谓杜预以左氏之耳目，夺夫子之笔削。公羊家失之舛杂，而何休者，又特负于公羊。惟《谷梁》晚出，监二氏之违畔而正之，然或与之同恶，至其精深远大者，真得子夏之所传。范宁又因诸儒而博辩之，申《谷梁》之志，其于是非亦少公矣，非若杜征南一切申《传》，决然不敢异同也。此论最善。

然则晁公之于群经，可谓自信笃而不诡随者矣。

【译文】 晁景迂的儿子晁以道留心研习六经的学问，针对六经各著一部书，阐发六经的宗旨，所以有《易规》、《书传》、《诗序论》、《中庸》、《洪范传》、《三传说》问世。他的学说多与当代学者不同。

他说《易经》学者所说的应、位、承乘、主等卦象都不对。大意是说，《系辞》上所谓的卦、爻、象、数、刚柔、变通之类不止一种，未曾涉及初应四、二应五、三应六等内容。以阳居阳、以阴居阴算作得位，得位则吉利。以阳居阴、以阴居阳算失位，失位则不吉利。然而九五、九三、六二、六四等卦象都好吗？六五、六三、九二、九四的卦象都不好吗？既然持有应无应、得位不得位之说，而以此说验卦则讲不通，就又造出承乘之说，说阴承接阳则顺利，阳承接阴则不顺利，阳乘柔则吉利，阴乘刚则不吉利。这种说法也太欠考虑了。谈《易

经》又一定要以位来论中正，如六二、九五为中而且正，那么六五、九二都不好？初、上、三、四爻永远不得用中吗？卦各有主，而一概以五为主卦，也是不对的。

晁以道论《尚书》说：我对于《尧典》，看到天象部分，而认为其中谈论四时的部分不知道中星。《禹贡》是讲施土治水的，可是谈论九州的部分不知道经水。《洪范》是阐述生命本原的，而谈论治理天下大法——九畴的部分不懂气数。因鲧、共工、欢兜、三苗等四害是尧宫中的旧臣，所以被舜放逐或诛戮了。周穆王准备完善刑法，先羞辱他的老臣。商汤讨伐夏桀，违背常理且耽误农时。周文王称王是僭越，召公不高兴，这和目中无上是一类。商王太甲因不顺从伊尹而被放逐，管叔、蔡叔、霍叔因稍有不满意而被杀害。夏启用推行一人犯罪累杀子孙的酷刑来警告不服从命令的人，盘庚用施行割鼻灭绝的酷刑来强迫臣民搬迁国都。周人饮酒则处死刑，鲁国人不用板干造房就杀头。执行公务比规定的时间提前或晚于规定的时间都诛杀不赦免。威严不能放弃，老臣不值得敬重，灾祸不值得害怕，落个凶残无德的名声也不值得顾忌。只是《尚书》这部经典在遭受了秦始皇的大火焚烧和在孔子住宅的墙壁中腐朽折损以后，孔安国才用隶书写定蝌蚪文字。这以后古文今文两种文字的《尚书》相继出现在东汉时代，于是杜林进行了统一订正。传到唐代以后，内容更加难以统一了，唐玄宗便令卫包全部用今文取代了，至此，这部书距它本来的面目已不知相差多远。可是现在研习六经的人，竟对《尚书》尽信不疑，好像是孔子亲手传授给自己似的，这不是受了蒙骗吗？晁以道论《尧典》中星说，在春分这一天南方的井、鬼等七颗星宿相会合，傍晚全部出现，是孔安国搞错了。哪有七颗星宿一百零九度在一夜之间全部出现的呢？这实际是指春分的一个时辰处在正位上的那颗中星，并不是平常傍晚出现的中星。在夏至这一天，东方的角星、亢星等七颗星宿会合，傍晚全部出现的说法，也是孔氏搞错了。哪有七颗星宿七十七度而在一夜之间全部出现的道理呢？这是夏至一个时辰的中星，不是平常傍晚时出现的中星。秋分、冬至的说法也是这样。以上都是晁氏的说法。他所辩析的圣典，不是笔者所敢说的，但是把他的观点用天文现象来验证，不论哪个季节，同在天上的星宿常常有十余颗。从傍晚到天亮，除了太阳所占居的位置以外，其余出现的超过了三分之二，怎么能说七颗星宿不能在同一个晚上全部出现呢？这是因为晁以道不认识星宿才这样说的。

晁以道论《毛诗序》说：作诗的人不一定非要作序，而现在谈诗的人却说，《毛诗序》和《诗经》是同时作的，岂不令人迷惑不解吗？就拿逸诗来说，它的流传，是因岐山下刻有石鼓文的缘故，又哪里见到过序文呢？晁以道认为，晋

武公是窃取权位而立国，秦仲是石勒一流的人物，秦襄公掠取周朝地盘，这些人都不应当赞美。《文王有声》的诗篇是宣扬征伐的，这表明周文王以讨伐殷纣王为志向，周武王以讨伐殷纣王显示功德。《庭燎》、《沔水》、《鹤鸣》、《白驹》等诗篇，对周宣王箴贬、规劝、训诲、讽刺，而《云汉》、《韩奕》、《崧高》、《盥民》却是妄作之篇。还没有人像《小雅》的诗篇描写坏到这种程度，而在《大雅》中却好到那种程度的。他认为《子衿》、《候人》、《采芣》等篇的序文骈丽散蔓而且毫无益处，《磻木》、《日月》等篇的序文为自罪之作，《定之方中》、《木瓜》等篇的序文则不纯正。孟子、荀卿、左丘明、贾谊、刘向以及汉朝诸儒，谈及《诗经》的地方很多，却不曾有一句话以《毛诗序》为议题，说明《毛诗序》出现的时间是很晚的。晁以道议论得对不对，笔者不敢肆意妄言。但其中说到秦康公葬送了秦穆公的霸业，整天向他母亲的娘家（晋国）发动战争，在守丧期间仍在大动干戈，终身打仗不知道停止，而《渭阳篇》的序文却称他“看见舅父，就好像看见母亲还活着一样，”这果真是表达纯正的孝情吗？陈厉公弑陈佗而自立，但《墓门》诗序却责怪陈佗“没有好师傅”，乱了笔法。笔者认为，秦康公所作的《渭阳》诗篇，是赠送晋文公重耳入晋时所作，离他即位已过了十六年时间。穿丧服发动战争的是晋襄公，就是《左传》上所说的“他穿着黑色丧服披着麻绳”那件事。秦康公送公子雍到晋国，正是满足晋国的请求，而晋国却违背盟约和秦国打仗，秦康公有什么罪过呢？责备他向母亲的娘家发动战争，是不应该的。陈佗杀陈威公太子而自立，所以蔡国人杀陈佗而拥立了厉公，这并不是厉公的罪过。晁以道诋毁陈厉公来为陈佗申诉，也是不应该的。

晁以道论《春秋三传》，认为杜预将《左传》和《春秋经》合编在一起，是以左丘明的耳目扰乱孔夫子对《春秋》的修订。《公羊传》舛讹繁杂，而何休的注文又特别有伤《公羊传》的意义。只有《谷梁传》产生较晚，是作者谷梁赤有见于《左传》、《公羊传》的错谬而有所订正，然而仍存在和这二传共同的毛病，至于这部书的精深远大，是得到子夏的真传。范宁借助诸儒的研究成果对它进行广泛的辨析，申明阐发《谷梁传》的意旨，他对是非的评价也就稍稍公允一些。不像杜预一味地为《左传》申辨，绝对不敢提出不同意见。笔者以为，晁以道这段议论最好。

尽管晁以道的议论有很多错误的地方，然而他对群经的研习，可以算得上自信笃诚而又不随意盲从的了。

邳彤 酈商

【原文】 汉光武讨王郎时，河北皆叛，独钜鹿、信都坚守，议者谓可因二郡兵自送，还长安。惟邳彤不可，以为若行此策，岂徒空失河北，必更惊动三辅。公既西，则邯郸之兵，不肯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离散逃亡可必也。光武感其言而止。东坡曰：“此东汉兴亡之决，邳彤亦可谓汉之元臣也。”彤在云台诸将之中，不为人所标异，至此论出，识者始知其然。汉高祖没，吕后与审食其谋曰：“诸将故与帝为编户民，今乃事少主，非尽族是，天下不安。”以故不发丧。酈商见食其曰：“诚如此，天下危矣。陈平、灌婴将十万守荥阳，樊哙、周勃将二十万定燕、代，比闻帝崩，诸将皆诛，必连兵还向以攻关中，亡可翘足待也。”食其入言之，乃发丧。然则是时汉室之危，几于不保，酈商笑谈间，廓廓无事，其功岂不大哉？然无有表而出之者。迨吕后之亡，吕禄据北军，商子寄给之出游，使周勃得入。则酈氏父子之于汉，谓之社稷臣可也。寄与刘揖同说吕禄解将印，及文帝论功，揭封侯赐金，而寄不禄，平、勃亦不为之一言，此又不可晓者。其后寄嗣父为侯，又以罪免，惜哉！

【译文】 汉光武帝讨伐王郎的时候，河北都叛变了，只有钜鹿、信都坚持守卫，参议的臣僚说可以依靠这两郡的兵自我护送回长安。只有邳彤不赞同，认为假如施行这一计策，岂止白白地失掉河北，必然更进一步惊动京畿三辅地区。您既西行，则邯郸的兵不肯背离城主而千里去送您，他们离散和逃亡是可以肯定的。光武帝有感于他的话而停止了这一计划。苏东坡说：“这是东汉兴亡的关键，邳彤也可以说是汉的元老大臣了。”邳彤在云台的各将领中不为大家所特别标榜，到这个议论一出，有见识的人才知道他如此。汉高祖去世，吕后与审食其谋划说：“各将领过去跟皇帝为编入户籍的平民，现今却事奉年少的皇帝，非全部杀了他们，天下不能安定。”因此不发布皇帝去世的消息。酈商会见审食其说：“真的这样做，天下就危险了。陈平、灌婴统领着十万大军驻守在荥阳，樊哙、周勃统领着二十万大军平定燕、代，等到听说皇帝驾崩，各将领都要被杀，必将合兵调过头来以攻打关中，朝廷灭亡可在举足之间就到了。”审食其入朝转述了酈商的话，于是朝廷发布皇帝去世的消息。然而当时汉朝的危亡，几乎不可确保，酈商在笑谈之间，天下就空空无事了，他的功劳难道不大吗！然而没有表彰而突出他的人。等到吕后去世，吕禄据有北军，酈商的儿子酈寄哄骗吕禄出游，使周勃得以入朝。则酈氏父子对于汉朝，说他们是社稷之臣是可以了。

酈寄与刘揭共同劝说吕禄放弃将印，等到文帝论功行赏，刘揭封侯赐金，而酈寄不予录用，陈平、周勃也不为他说一句话，这又是不可明了的一件事。以后酈寄继承父亲为侯，又因犯罪被免除，可惜呀！

《武成》之书

【原文】 孔子言：“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所谓服事者，美其能于纣之世尽臣道也。而《史记·周本纪》云：“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其后改法度，制正朔，追尊古公、公季为王。”是说之非，自唐梁肃至于欧阳、东坡公、孙明复皆尝著论，然其失自《武成》始也。孟子曰：“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今考其书，云“大王肇基王迹，文王诞膺天命，以抚方夏”，及武王自称曰“周王发”，皆纣尚在位之辞。且大王居，犹为狄所迫逐，安有“肇基王迹”之事？文王但称西伯，焉得言“诞膺天命”乎？武王未代商，已称周王，可乎？则《武成》之书不可尽信，非止“血流漂杵”一端也。至编简舛误，特其小小者云。

【译文】 孔子说：“周朝的道德，真可说到了最高的境界了。三分天下拥有了其中的两份，还来服事殷朝。”这里所谓的“服事”，是赞美周人能在殷纣王统治时期尽力履行臣子的道义。而《史记·周本纪》却说：“西伯在禀受天命那年称王，接着裁决虞国和芮国的争执，接着修改法律、制度，制定历法，追尊古公亶父、公季为先王。”这种说法的错误，从唐朝梁肃到本朝欧阳修、苏东坡、孙明复都曾著文指出过。然而它的失实是从《武成》这部书开始的。孟子说：“我对于《武成》这部书，只取用其中的十分之二三罢了。”现在考察这部书，其中说“大王开始奠定王业的根基，文王诞生禀受天命，来安抚华夏”，以及武王自称说“周武王姬发”等，这些都是殷纣王尚且在位时的话。而且大王古公亶父当时居于邠地，还常常被戎狄胁迫，哪有“奠定王业根基”的事呢？周文王当时只称西伯，怎么能说“诞生禀受天命”呢？周武王还没有取代商朝就已经称王，这可以吗？所以《武成篇》的不可信，还不只是“血流漂杵”这种失真记载一个地方。至于该书编纂的错乱，倒是属于小问题了。

象载瑜

【原文】 《汉郊祀歌·象载瑜》章云：“象载瑜，白集西。”颜师古曰：“象载，象舆也。山出象舆，瑞应车也。”《赤蛟》章云“象舆礪”即此也。而《景星》章云：“象载昭庭。”师古曰：“象谓悬象也。悬象秘事，昭显于庭也。”二字同出一处，而自为两说。按乐章词意，正指瑞应车，言昭列于庭下耳。三刘《汉》释之说亦得之，而谓“白集西”为西雍之麟，此则不然。盖歌诗凡十九章，皆书其名于后，《象载瑜》前一行云“行幸雍获白麟作，”自为前篇“朝陇首，览西垠”之章，不应又于下篇赘出之也。

【译文】 《汉书·礼乐志》载有十九章《郊祀歌》，其《象载瑜》一章说：“象载瑜，白集西（吉祥美玉似的象车出现，白色焕然呈现在西方）。”颜师古解释说：“象载，就是象舆，山中出象舆，是一种与祥瑞相应的车。”《郊祀歌》的《赤蛟》一章所说的“象舆礪”，就是这种车。而《郊祀歌》的《景星》一章有名句说“象载昭庭”，颜师古则解释：“象，说的是天空中出现的现象。天空出现的现象是一种神秘的事，却明白地显示于广庭。”“象舆”这两个字同时出现在《郊祀歌》一处，而颜师古却作两种解释。按着乐章歌词的大意，所指正是一种与祥瑞相应的车，说这种车昭然列在庭下罢了。三刘（指点刘敞、刘歆、刘奉世）对《汉书》的解释（指其所撰《汉书标注》六卷）也是与此相符合的，而他们说“白集西”为西雍的麟，这则是不对的。因为《郊祀歌》的歌诗共十九章，都在歌诗的后面题写篇名，《象载瑜》的前一行说：“行幸雍，获白麟作（皇帝到雍地巡幸，获得白色麒麟而作）。”自然是前一篇歌诗“朝陇首，览西垠（朝拜于陇坻之首，览视西方广阔的土地）”的篇章，不应又于下一篇歌诗多余地出现。

管晏之言

【原文】 《孟子》所书：“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吾欲观于转附、朝礪，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观也？’晏子对曰：‘天子诸侯，无非事者。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今也不然。师行而粮食。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从流上而忘反谓之连。从兽无厌谓之荒。乐酒无厌谓之亡。先

王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景公说，大戒于国。”《管子·内言·戒》篇曰：“威公将东游，问于管仲曰：‘我游犹轴转斛，南至琅邪。司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谓也？’对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农事之不本者，谓之游。秋出补人之不足者，谓之夕。夫师行而粮食其民者，谓之亡。从乐而不反者，谓之荒。先王有游夕之业于民，无荒亡之行于身。’威公退再拜，命曰宝法。”观管、晏二子之语，一何相似，岂非传记所载容有相犯乎？管氏既自为一书，必不误，当更考之《晏子春秋》也。

【译文】 《孟子》一书所写“齐景公问晏子说：‘我想到转附、朝谿两座山上去游游，然后沿着海岸向南行，一直到琅邪。我该怎么办才能够和过去的圣贤之君的巡游相比拟呢？’晏子回答说：“天子和诸侯巡游没有不和办事结合在一起的，春天巡视耕种情况对穷户予以补助，秋天考察收获情况对缺粮户予以补给。现今则不是这样了。国王一出行便兴师动众到处筹运食粮，从上游到下游的游玩乐而忘归叫做流，从下游到上游的游玩乐而忘归叫做连，无厌倦地追着野兽打猎叫做荒，不节制地喝酒叫做亡。过去的圣贤之君没有这种流、连的游乐和荒、亡的行为。’景公听了很高兴，在京城大作巡游办事的准备。”《管子·内言·戒》篇说：“齐桓公将要到东方出游，问管仲说：‘我的出游就好像车轴运载着斛石转动（对人有所帮助），向南要到琅邪。司马说，这也是古代圣贤之君的巡游啊，这是什么意思呢？’管仲回答说：‘古代圣贤之君的巡幸，春天出巡察视农耕不依本务的叫做游、秋天出巡补助粮食不足的人户叫做夕，兴师动众耗费百姓米粮的叫做亡，追逐游乐而不归的叫做荒。古代的圣贤之君有对百姓的游、夕之事，没有对於自身的荒、亡之行。’威公退下再次拜谢，命它为宝法。”看了管仲、晏婴二位的话，何其相似！难道不是传记所载容有相触犯的情况吗？管氏既然独立为一书，必然不会有误，应当再考核一下《晏子春秋》。

共工氏

【原文】 《礼记·祭法》、《汉书·郊祀志》，皆言共工氏霸九州，以其无录而王，故谓之霸。《历志》则云：“虽有水德，在火木之间，非其序也。任知刑以强，故伯而不王。周人迁其行序，故《易》不载。”注言：“以其非次，故去之。”《史记·律书》：“颡帝有共工之陈，以平水害。”文颖曰：“共工，主水官也。少昊氏衰，秉政作虐，故颡帝伐之。本主水官，因为水行也。”然《左传》郯子所叙黄帝、炎帝五代所名官，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杜预云：

“共工氏以诸侯伯有九州者，在神农之前，太昊之后，亦受水瑞，以水名官。”盖其与炎、黄诸帝，均受五行之瑞，无所低昂，是亦为王明矣。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至今祀以为社。前所纪谓“周人去其行序”，恐非也。至于怒触不周之山，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此说尤为诞罔。洪氏出于此，本曰“共”，《左传》所书晋左行共华、鲁共刘，皆其裔也。后又推本水德之绪加水于左而为“洪”云。《尧典》所称“共工方鸠殛功”，即舜所流者，非此也。时以名官，故舜命垂为之。

【译文】 《礼记·祭法》和《汉书·郊祀志》都说共工氏占有了九州大地，因为他没有禀受天命而自称为王统治九州，所以称他为“霸”。《历志》则说：“共工虽然有水德，但他的水德在火德和木德之间，不符合五行的正常次序。共工靠耍小聪明和严酷的刑法而强大，所以他只能为伯而不能为王。因周朝人变动了共工在五行中的次序，所以《周易》所载诸帝中没有他的名字。”《历志》的注文说：“因为共工不符合五行的次序，所以《周易》去掉了他。”《史记·律书》说：“颛顼帝因为有了水官共工的陈述，才去治理水害的。”文颖则说：“共工是主管水利的官职。少昊氏衰败以后，他掌握政权作恶肆虐，所以颛顼帝便兴师讨伐他。他本来是掌管水利的，因此居五行中的水德。”然而《左传》郑子所叙述的黄帝、炎帝等五帝时代所任命的职官，共工氏是因以水记，所以被任命为水师并以水名做官名。杜预说：“共工氏是以诸侯中伯位的身份拥有九州的，次序在神农之前，太昊之后，他也禀受了五行中水德的祥瑞吉兆，所以用水的名子做他的官职名。”可见，共工和炎帝、黄帝都禀受过五行的吉兆，没有高下之分，这说明他做过王。他的儿子叫后土，曾平定过九州，到现在人们还把他作为社神来供奉祭祀。前面《历志》上所说的“周朝人去掉了共工在五行中的排列次序”，恐怕是不对的。至于说共工怒撞不周山，使天向西北倾斜，大地覆盖不住东南方，这种说法更是荒诞无稽。“洪”这个姓氏就来源于共工氏，这个姓本来叫做“共”，《左传》中所记载的晋国左行共华、鲁国的共刘，都是共工氏的后裔。后来人们推演出“共”字的水德本源，便在共字左边添了个“水”字而成为“洪”了。《尚书·尧典》所谓的“共工防治水灾，已具功绩”，也就是虞舜时所流放的共工，指的不是前面所谈的共工氏。当时用“共工”作官名，所以舜任命垂担任这个职务。

汉志之误

【原文】 昔人谓颜师古为班氏忠臣，以其注释纪传，虽有舛误，必委曲为之辨故也。如《五行志》中最多，其最显显者，与《尚书》及《春秋》乖戾为甚。桑谷共生于朝。刘向以为商道既衰，高宗乘敝而起，既获显荣，怠于政事，国将危亡，故桑谷之异见。武丁恐骇，谋于忠贤。颜注曰：“桑谷自太戊时生，而此云高宗时，其说与《尚书大传》不同，未详其义，或者伏生差谬。”按《艺文志》自云：“桑谷共生，太戊以兴，鸣雉登鼎，武丁为宗。”乃是本书所言，岂不可为明证，而翻以伏生为谬，何也？僖公二十九年，大雨雹。刘向以为信用公子遂，遂专权自恣，僖公不寤，后二年，杀子赤立宣公。又载文公十六年，蛇自泉宫出。刘向以为其后公子遂杀二子而立宣公。此是文公末年事，而刘向既书之，又误以为僖。颜无所辨。隐公三年，日有食之。刘向以为其后郑获鲁隐。注引“狐壤之战，隐公获焉。”此自是隐为公子时事耳，《左传》记之甚明。宣公十五年，王札子杀召伯、毛伯。董仲舒以为成公时。其他如言楚庄始称王，晋灭江之类，颜虽随事敷衍，皆云未详其说，终不肯正诋其疵也。《地理志》中沛郡公丘县曰：“故滕国，周懿王子叔绣所封。”颜引《左传》“郕、雍、曹、滕，文之昭也”为证，亦云未详其义。真定之肥累、淄川之剧，泰山之肥城，皆以为肥子国，而辽西之肥如，又云“肥子奔燕，燕封于此。”魏郡元城县云“魏公子元食邑于此，因而遂氏焉。”常山元氏县云：“赵公子元之封邑，故曰元氏。”不应两邑命名相似如此。正文及《志》五引滹沱河，皆注云：“滹音呼，沱音徒河反。”又“五伯迭兴”注云：“此五伯谓齐威、宋襄、晋文、秦穆、楚庄也。”而《诸侯王表》“五伯扶其弱”注云：“谓齐威、宋襄、晋文、秦穆、吴夫差也。”《异姓诸侯王表》“适戍强于五伯”注云：“谓昆吾、大彭、豕韦、齐威、晋文也。”均出一书，皆师古注辞，而异同如此。

【译文】 过去的人说颜师古是班固的忠臣，固为他注释《汉书》，虽发现有讹误，一定勉强为班氏辩解的缘故。如《五行志》中讹误最多，其中最明显的，与《尚书》及《春秋》的记载特别矛盾。桑树和谷类共同生于一朝之中，刘向以为是商朝的政道既已衰微，高宗乘着衰败而振起，既已获得了显赫的荣耀，怠慢於理政大事，国家面临危亡，所以桑谷的怪异出现。武丁感到恐惧，他向忠良的大臣谋议。颜师古注释说：“桑谷是生自太戊之时，而这里说生在殷高宗时，这种说法与《尚书大传》的说法不同，没详考它的含义，或者是伏生弄错

了。”按《汉书·艺文志》已自写道：“桑和谷共同出生，太戊因之盛兴；鸣叫的雉鸟登上宝鼎，武丁为之受人宗仰。”这是本书所说，难道不可为明证吗？而反以为伏生错谬是什么呢？僖公二十九年，大下冰雹，刘向以为是僖公信用公子遂，遂擅权放肆，僖公不醒悟，过了两年，遂杀了子赤而立宣公为君。又记载文公十六年，有蛇从泉台宫爬出，刘向以为以后公子遂杀了子赤和视两人而立宣公为君。这是文公末年的事，而刘向既已记录了这件事，却又误以为是僖公时事，颜师古对这些错误没有辨正。隐公三年，发生日食，刘向以为这是预示以后郑人俘获了鲁隐公。颜师古注引用《公羊传》“狐壤之战，隐公获焉”（在狐壤的一战，鲁隐公被郑人俘获了）的话。这自当是鲁隐公为公子时的事罢了，《左传》记载的特别明白。宣公十五年，王札子杀了召后和毛伯，董仲舒以为这是成公时侯的事。其他如说楚庄开始称王、晋国灭掉江国之类，颜师古虽然随事将就应付，都说“未详其说”，终是不肯正面诋诃班氏的失误。《汉书·地理志》中沛郡的公丘县条说：“过去的滕国，是周懿王的儿子叔绣所封的地方。”颜师古注引用《左传》“郕国、雍国、曹国、滕国，文王的子孙所封”这段话为佐证，也说“未详其义”。真定郡的肥累县、淄川国的剧县、泰山郡的肥城县，都以为是肥子的封国，而辽西郡的肥如县，又说是“肥子逃奔于燕，燕封肥子于这个地方”。魏郡的元城县，说：“魏公子元的食邑在这个地方，因而就成了姓氏。”常山郡的元氏县注说：“这是赵公子元的封地，所以叫元氏。”不应该两个地方的命名如此相似。注的正文和《志》本身五次引到滹沱水，颜师古都注释说：“滹的读音是呼，沱的读音是徒河的反切”。又“五伯迭兴”（五霸更迭兴盛）一句，注释说：“这五霸是说齐威王、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而《诸侯王表》中“五伯扶助那些弱小的国家”一句后面，颜氏则注释为：“五霸是指齐威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吴王夫差。”《异姓诸侯王表》：“发配的匹夫百姓比五霸强大”，颜师古却又注为：“五伯指昆吾、大彭、豕韦、齐威王、晋文公。”这几句话出于同一部《汉书》，又都是颜师古的注释，差别却如此之大。

汉将军在御史上

【原文】 《汉书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掌副丞相，位上卿，银印青绶，前、后、左、右将军亦位上卿，而金印紫绶。故《霍光传》所载群臣连名奏曰，丞相敞、大将军光、车骑将军安世、度辽将军明友、前将军增、后将军充国、御

史大夫谊。且云群臣以次上殿。然则凡杂将军，皆在御史大夫上，不必前、后、左、右也。

【译文】 班固的《汉书·百官公卿表》称，御史大夫执掌副丞相职权，品位为上卿，持银印，绶带为青色，前、后、左、右各将军品位也是上卿，但持金印且绶带为紫色。所以《汉书·霍光传》记载群臣联名折的名字排序为，丞相杨敞、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张安世、度辽将军范明友、前将军韩增、后将军赵充国、御史大夫蔡谊。而且说各位大臣按品第高低依次上朝。然而凡是有将军职衔的，都排在御史大夫的前面，不仅仅前将军、后将军、左将军、右将军。

上元张灯

【原文】 上元张灯，《太平御览》所载《史记·乐书》曰：“汉家祀太一，以昏时祠到明。”今人正月望日夜游观灯，是其遗事，而今《史记》无此文。唐韦述《两京新记》曰：“正月十五日夜，敕金吾弛禁，前后各一日以看灯。”本朝京师增为五夜，俗言钱忠懿纳土，进钱买两夜，如前史所谓买宴之比。初用十二、十三夜，至崇宁初，以两日皆国忌，遂展至十七、十八夜。予按国史，乾德五年正月，诏以朝廷无事，区寓安，令开封府更增十七、十八两夕。然则俗云因钱氏及崇宁之展日，皆非也。太平兴国五年十月下元，京城始张灯如上元之夕，至淳化元年六月，始罢中元、下元张灯。

【译文】 正月十五是上元节，《太平御览》所引的《史记·乐书》说：“汉朝祭祀东皇太——太阳神，从白天傍晚祭祀到第二天天亮。”现在每年正月十五日夜晚漫游观彩灯，就是汉代祭祀太阳神的遗风，而今天存世《史记》版本中已经见不到那段文字了。唐朝韦述的《两京新记》说：“每年正月十五晚上，圣旨令京城督察治安的长官——执金吾放宽禁令，前后各一天让人们看灯。”宋朝京城增加为五个晚上，民间流行的说法这是吴越钱鏐归顺大宋，捐钱买下的两夜灯展，和前史上所说的花钱买酒宴相类似。最初在正月十二、十三两晚上，至徽宗崇宁初年，因这两天都是国忌日，于是就换到十七、十八两个晚上。我核对国史，太祖乾德五年正月，皇上下诏由于朝廷无事，国内平安，令开封府再增加正月十七、十八两天为观灯日。显然民间所传因钱氏捐钱买来以及徽宗崇宁初年改变灯展时间的说法都是不对的。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十月十五日夜下元日，京城开封开始和上元节的晚上一样悬挂花灯，到太宗淳化元年六月，才取消了

中元（七月十五日）、下元悬挂灯笼的作法。

七夕用六日

【原文】 太平兴国三年七月，诏：“七夕嘉辰，著于甲令。今之习俗，多用六日，非旧制也，宜复用七日。”且名为七夕而用六，不知自何时始。然唐世无此说，必出于五代耳。

【译文】 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七月，太宗皇帝下诏说：“每年的七月初七，是美好的时辰，应作为法定的节日。现在的习俗，多在七月初六过，这不符合原来的礼制，应当恢复为七月初七。”名义上是七夕却在初六过，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然而唐朝没有这种说法，这肯定是从五代开始的。

宰相参政员数

【原文】 太祖登极，仍用周朝范质、王溥、魏仁浦三宰相，四年，皆罢，赵普独相。越三月，始创参知政事之名，而以命薛居正、吕余庆，后益以刘熙古，是为一相三参。及普罢去，以居正及沈义伦为相，卢多逊参政。太宗即位，多逊亦拜相。凡六年，三相而无一参。自后颇以二相二参为率。至和二年，文彦博为昭文相，刘沆为史馆相，富弼为集贤相，但用程戡一参。惟至道三年吕端以右仆射独相，而户部侍郎温仲舒、礼部侍郎王化基、工部尚书李至、礼部侍郎李沆四参政，前后未之有也。

【译文】 太祖做了皇帝，仍然用后周朝的范质、王溥、魏仁浦三位为宰相。任用了四年，全都罢免，只以赵普为宰相。过了三个月，开始创设参知政事这个官名，而任命薛居正、吕余庆为这个官职，后来又增加了刘熙古，这就是“一相三参”。等到赵普罢离宰相，用薛居正和沈义伦为宰相，以卢多逊为参知政事。太宗即位以后，卢多逊也拜为宰相，三位宰相而没有一个参知政事。自此以后大都以两位宰相两位参知政事为标准。至和二年（1055年），文彦博以昭文馆大学士为宰相，刘沆以史馆监修国史为宰相，富弼以集贤殿大学士为宰相，只用程戡一人为参知政事。只有至道三年（997年）吕端以右仆射单独为宰相，而任用户部侍郎温仲舒、礼部侍郎王化基、工部尚书李至、礼部侍郎李沆四人为参知政事，在这以前和以后都没有这样做过。吕端以右仆射的身份单独任宰

相，而户部侍郎温仲舒、礼部侍郎王化基、工部尚书李至、礼部侍郎李沆四人任参知政事，在这前后这是从未有过的现象。

朱崖迁客

【原文】 唐韦执谊自宰相贬崖州司户，刺史命摄军事衙推，牒词云：“前件官久在朝廷，颇谙公事，幸期佐理，勿惮縻贤。”当时传以为笑，然犹未至于挫抑也。卢多逊罢相流崖州，知州乃牙校，为子求昏，多逊不许，遂侵辱之，将加害，不得已，卒与为昏。绍兴中，胡邦衡铨窜新州，再徙吉阳，吉阳即朱崖也。军守张生，亦一右列指使，遇之亡状，每旬呈，必令囚首诣廷下。邦衡尽礼事之，至作五十韵诗，为其生日寿，性命之忧，朝不谋夕。是时，黎酋闻邦衡名，遣子就学，其居去城三十里，尝邀致入山，见军守者，荷枷礮西庑下，酋指而语曰：“此人贪虐已甚，吾将杀之，先生以为何如？”邦衡曰：“其死有余罪，果若此，足以洗一邦怨心。然既蒙垂问，切有献焉。贤郎所以相从者，为何事哉？当先知君臣上下之名分。此人固亡状，要之为一州主，所谓邦君也。欲诉其过，合以告海南安抚司，次至广西经略司，俟其不行，然后讼于枢密院，今不应擅杀人也。”酋悟，遽释之，令自书一纸引咎，乃再拜而出。明日，邦衡归，张诣门悔谢，殊感再生之恩，自此待为上客。邦衡以隆兴初在侍从，录所作《生日诗》示仲兄文安公，且备言昔日事。乃知去天万里，身陷九渊，日与死迫，古今一辙也。

【译文】 唐朝韦执谊从宰相的职位上被贬为崖州（治今海南琼山县）司户，崖州刺史命他为暂代军事衙推，任命的公文说：“前面这位长官长期在朝廷里作事，颇熟悉公事，希望辅佐本刺史处理事务，不要抱怨委屈自己的才能。”这份任命书当时曾被传为笑谈，然而还未发展到侮辱压制韦氏的地步。我朝卢多逊罢相后也被流放到崖州，当时的知州是下层军官出身，他替自己的儿子向卢多逊的女儿求婚，卢多逊不答应，这个知州于是就侵扰侮辱他，并要加害于他，卢多逊不得已，最终还是将女儿嫁给了知州的儿子。高宗绍兴年间，胡邦衡被流放到新州，又从新州移到吉阳，吉阳就是朱崖。当时的军守叫张生，也是一位右列指使，对待胡邦衡很是无礼，每旬向他呈报情况时，必定命令胡邦衡像囚犯一样恭敬地立在廷堂下接受训斥。胡邦衡尽全力以礼待他，甚至作五十韵诗歌为他的生日祝寿，生命危险，简直朝不保夕。这时候，当地一个黎族首领，久闻胡邦衡的大名，就让自己的儿子向胡拜师求学，这个首领的家离朱崖城三十

里路，一天他邀请胡邦衡来到山里，胡氏发现那个张军守，正身带木枷被绳子捆着立在院内的廊庑下。首领指着他对胡邦衡说：“这个人贪婪暴虐实在太过分，我准备杀掉他，胡先生您以为怎么样？”胡邦衡说：“他死有余辜，如果真能把他杀掉的话，足以快慰这一方百姓的怨愤之心。但既然承蒙征求我的意见，我确实有点想法想对你讲。你的儿子之所以要从我学习，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弄明白君臣上下的名分。这个人固然无礼，但他毕竟是一州之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一方君主。如果想控诉他的罪行，应当先告到海南安抚司，再告到广西经略司，等到这两个地方都不处理时，再告到中央枢密院，今天不应该擅自作主杀人。”那个首领醒悟了，立即释放了张军守，命他写了一张告示责备自己的罪责，军守对胡氏拜了又拜后才离去。第二天，胡邦衡回到城里，张军守亲自登门悔罪谢恩，特别感激胡邦衡的再生之恩，从此以后待胡氏为上等嘉宾。孝宗隆兴初年胡邦衡任侍从官，录下自己在流放朱崖时所作的《生日诗》拿给我二哥文安公看，并细述过去的磨难。人们才知道遭流放的人离京万里，身家性命陷于九渊，每天与死亡为邻，古往今来是一样的。

张士贵 宋

【原文】 唐太宗自临治兵，以部陈不整，命大将军张士贵杖中郎将等，怒其杖轻，下士贵吏。魏征谏曰：“将军之职，为国爪牙，使之执杖，已非后法，况以杖轻下吏乎？”上亟释之。明皇开元三年，御史大夫宋暉坐监朝堂杖人杖轻，贬睦州刺史，姚崇为宰相，弗能止，卢怀慎亦为相，疾亟，表言暉明时重器，所坐者小，望垂矜录，上深纳之。太宗、明皇，有唐贤君也，而以杖人轻之故，加罪大将军、御史大夫，可谓失政刑矣。

【译文】 唐太宗李世民亲自驾临部队营地视察练兵情况，因部队阵列不够整齐，他便命令大将军张士贵杖打中郎将等人，因嫌张士贵打得太轻而发怒，便把张士贵投进了监狱。魏征进谏说：“将军的职责，是充当国家的爪牙，让他拿着木棒去打人，本来就已经不是后人所应效法的了，更何况因为打人打得轻而被投进监狱呢？”皇上听了之后立即把张士贵释放了。唐明皇开元三年，御史大夫宋 因监督朝堂行刑打得轻受到处罚，被贬为睦州（治今浙江建德县）刺史，当时姚崇任宰相，没能阻止住唐明皇对宋 的处治，卢怀慎当时也任宰相，急忙为宋 求情，他上表称宋 能明察时势是大器之才，对他治罪的事由太小，希望能够慎重对待，皇上认真考虑后采纳了他的建议。唐太宗、唐明皇，都是有

唐一代的贤明君主，但因为打人打得轻的缘故，而加罪于大将军、御史大夫，可算得上是失政的刑法了。

韩欧文语

【原文】 《盘谷序》云：“坐茂林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采于山，美可茹；钓于水，鲜可食。”《醉翁亭记》云：“野花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欧公文势，大抵化韩语也。然“钓于水，鲜可食”与“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采于山”与“山肴前陈”之句，烦简工夫，则有不侔矣。

【译文】 韩愈的《送李愿归盘谷序》写道：“坐茂林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采于山，美可茹；钓于水，鲜可食（坐在繁茂的林间直到晚上，用清澈的泉水洗涤以自我洁身。采于山上的，美味可餐；钓于水中的，新鲜可食）。”欧阳修《醉翁亭记》写道：“野花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野花开放而幽远传香，佳树秀丽而繁茂阴凉。来到溪水捕鱼，溪水深而鱼儿肥；用酿泉作酒，泉水香而酒冽。山中的野味与田间的蔬菜，交杂陈列在面前）。”基本都是改化的韩文的语言。然而“钓于水，鲜可食”与“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采于山”与“山肴前陈”的语句，它们在烦简上的工夫，则有所不同了。

卷 二

汉宣帝不用儒

【原文】 汉宣帝不好儒，至云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匡衡为平原文学，学者多上书荐衡经明，当世少双，不宜在远方。事下萧望之、梁丘贺。望之奏衡经学精习，说有师道，可观览。宣帝不甚用儒，遣衡归故官。司马温公谓俗儒诚不可与为治，独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且是古非今之说，秦始皇、李斯所禁也，何为而效之邪？既不用儒生而专委中书宦官，宏恭、石显因以擅政事，卒为后世之祸，人主心术，可不戒哉！

【译文】 汉宣帝不喜欢儒学，以至于说出俗儒不达人情事理，喜欢颂古非今，使人们在虚名与务实问题上造成迷乱，不知道信守什么，怎配委以重任等话。匡衡当时是平原郡的教官，学者们多上书推荐他，称其通晓经学，在当世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不应滞留在远离首都的山东。宣帝把这件事交给萧望之、梁丘贺去讨论。萧望之上奏称匡衡对经学很精通，其学说有师承来历，值得参阅。因宣帝不大采用儒学，最终还是将匡衡放回平原郡担任原来的职务。司马光先生曾说俗儒确实不可以和他谈论治理天下的道理，难道不可以寻求真正的儒者而任用他们吗？况且颂古非今的提法，是秦始皇、李斯严厉禁止的，为什么要效法他们呢？既然不任用儒生而专门委任中书宦官，所以宏恭、石显因此擅权参与国事，最终为汉朝酿成大祸，做为皇帝，在考虑治国方针时，不应该以此为鉴戒吗？

国家府库

【原文】 真宗嗣位之初，有司所上天下每岁赋入大数，是时，至道三年也，凡收谷二千一百七十万硕，钱四百六十五万贯，绢、绸一百九十万匹，丝、绵六百五十八万两，茶四十九万斤，黄蜡三十万斤。自后多寡不常，然大略具此。方国家全盛，民力充足，故于征输未能为害。今之事力，与昔者不可同日而语，

所谓缗钱之入，殆过十倍。民日削月朘，未知救弊之术，为可虑耳。黄蜡一项，今不闻有此数。

【译文】 真宗继位之初，有关部门上报全国每年赋税收入的大概数字，我记录下的这一年，是太宗至道三年（997年）的数字。共收谷子二千一百七十万硕，钱四百六十五万贯，绢、绸一百九十万匹，丝、棉六百五十八万两，茶四十九万斤，黄蜡三十万斤。从这年后多少没有定数，但大略具有这个数目。当时正是国家全盛时期，人民财力充足，所以在征收赋税方面还没有造成祸害。如今百姓的劳役赋税负担，和过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通常所说国库缗钱的收入，恐怕要超过那时的十倍。民力每月每日都在削弱减少，而统治者还不知道采取一些救弊措施，实在令人忧虑。黄蜡一项的征收，现在早已没有听说过三十万斤这个数目了。

刘项成败

【原文】 汉高帝、项羽起兵之始，相与北面共事怀王。及入关破秦，子婴出降，诸将或言诛秦王。高帝曰：“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服降，杀之不祥。”乃以属吏。至羽则不然，既杀子婴，屠咸阳，使人致命于怀王。王使如初约，先入关者王其地。羽乃曰：“怀王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颍主约？今定天下，皆将相诸君与籍力也，怀王亡功，固当分其地而王之。”于是阳尊王为义帝，卒至杀之。观此二事，高帝既成功，犹敬佩王之戒，羽背主约，其末至于如此，成败之端，不待智者而后知也。高帝微时，尝繇咸阳，纵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大丈夫当如此矣！”至羽观始皇，则曰：“彼可取而代之。”虽史家所载，容有文饰，然其大旨，固可见云。

【译文】 汉高帝、项羽起兵之初，两人相从为臣同事奉怀王。到入关大破秦军，子婴出城投降，众将中有人说诛杀秦王子婴。高帝说：“当初怀王派遣我，本是因我能够宽容，况且子婴已经服从我们，投降了，再杀他是不吉祥的。”于是把子婴交给官吏。到项羽就不这样做，他杀了子婴，屠咸阳城，派人致辞怀王。怀王令按照当初的约定，先入关的人统治关内。项羽就说：“怀王这个王，是我家武信君所拥立的，不是有功绩，怎么能擅自主持约定？现在平定天下，都是将相各位和我项籍的力量，怀王没有功劳，本来就应当分关内地域而统治它。”于是表面上尊怀王为义帝，最后终至把他杀掉。观这两件事，高帝已经成功，还敬佩怀王的戒令，项羽违背怀王约定，其最后到如此地步，成功、失败的端倪，

无须睿智的人事后知晓。高帝微贱的时候，曾在咸阳服役，纵观秦始皇帝，感慨叹息说：“大丈就应当这样啊。”至于项羽观始皇帝，就说：“他可以取而代之。”虽然史家所载内容，或许有修饰，然而它的主旨，却已经可以见到了。

占术致祸

【原文】 吉凶祸福之事，盖未尝不先见其祥。然固有知之信之，而翻取杀身亡族之害者。汉昭帝时，昌邑石自立，上林僵柳复起，虫食叶曰：“公孙病已立”。眭孟上书言，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劝帝索贤人而禅位，孟坐妖诛，而其应乃在孝宣，正名病已。哀帝时，夏贺良以为汉历中衰，当更受命，遂有陈圣刘太平皇帝之事，贺良坐不道诛。及王莽篡窃，自谓陈后，而光武实应之。宋文帝时，孔熙先以天文图讖，知帝必以非道晏驾，由骨肉相残，江州当出天子，遂谋大逆，欲奉江州刺史、彭城王义康。熙先既诛，义康亦被害，而帝竟有子祸，孝武帝乃以江州起兵而即尊位。薄姬在魏王豹宫，许负相之当生天子，豹闻言心喜，因背汉，致夷灭，而其应乃在汉文帝。唐李璣据润州反，有相者言，丹阳郑氏女当生天子，璣闻之，纳为侍人。璣败，没入掖庭，得幸宪宗而生宣宗。五代李守贞为河中节度使，有术者善听人声，闻其子妇符氏声，惊曰：“此天下之母也。”守贞曰：“吾妇犹为天下母，吾取天下，复何疑哉？”于是决反，已而覆亡，而符氏乃为周世宗后。

【译文】 吉凶祸福一类的事情，大凡开始的时候未尝不先呈出征兆来。然而就有懂得这种吉兆又相信它，最终反而招致杀身亡族之祸的人。西汉昭帝在位的时候，昌邑县（今山东巨野）的一块大石头自己立了起来，皇上游猎的上林苑中一棵枯柳树起死回生，虫吃树叶发出“王公的后代病已应当立为天子”的声音。眭孟上书说，从平民百姓中当有天子出现，他劝昭帝到民间去搜寻贤人而将皇位禅让给他，眭孟被以妖言惑众的罪名除死了，而这件事却应验在宣帝刘询身上，他的名字正叫病已。汉哀帝刘欣时，夏贺良推算认为汉朝国运已经中衰，要有新的人物出现禀受天命，于是有陈圣刘太平皇帝的宣传出现，夏贺良以大逆不道的罪名被处死。等到王莽篡位，他自称是陈姓的后代，而实际上东汉光武帝刘秀应验了这个讖言。南朝宋文帝刘义隆的时候，孔熙先因分析天文图讖，知道文帝必定要非正常死亡，而是死于骨肉相残，江州（治今江西九江市）应当出天子，于是就谋划私自拥立，想奉江州刺史、彭城王刘义康为帝。孔熙先被杀以后，义康也被杀害，而宋文帝最终真的遭受子祸而死，孝武帝刘

骏却从江州起兵登上皇帝宝座。西汉初年，薄姬在西魏王魏豹宫中，许负看相后说她当生一个天子，魏豹听了这话心里很高兴，因此背叛汉朝而自立，最终招致了夷灭九族的灾祸，这个预言却在汉文帝身上应验了，薄姬生了汉文帝刘恒。唐朝的李璣割据润州（治今江苏镇江市）而反唐，有看相的人对他说，丹阳（治今安徽当涂县）的郑氏女应当生天子，李璣听了这话，便把丹阳郑氏女子纳为侍人。李璣失败后，郑氏女被收入唐朝皇宫，受到唐宪宗的宠爱而生下了宣宗李忱。五代时李守贞任河中节度使，有人善于听人的声音，听到李守贞儿媳符氏的声音后，惊奇地说：“这个人是天子的母亲。”李守贞说：“我的儿媳是天子的母亲，我夺取天下还有什么可疑的呢？”于是他决心反叛，不久全军覆灭，而符氏却做了周世宗的皇后。

绛侯莱公

【原文】 汉周勃诛诸吕，立文帝以安刘氏，及为丞相，朝罢趋出，意得甚。上礼之恭，常目送之。爰盎进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绛侯所谓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与在，主亡与亡。方吕后时，诸吕用事，擅相王，绛侯为太尉，本兵柄，弗能正。吕后崩，大臣相与共诛诸吕，太尉主兵，适会其成功，所谓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骄主色，陛下谦逊，臣主失礼，窃为陛下弗取也。”后朝，上益庄，丞相益畏。久之，勃遂有逮系廷尉之祸，几于不免。寇莱公决澶渊之策，真宗待之极厚，王钦若深害之。一日会朝，准先退，钦若进曰：“陛下敬畏寇准，为其有社稷功邪？”上曰：“然。”钦若曰：“臣不意陛下出此言！澶渊之役，不以为耻，而谓准有社稷功，何也？”上愕然曰：“何故？”对曰：“城下之盟，虽春秋时小国犹耻之。今以万乘之贵，而为此举，是盟于城下也，其何耻如之！”上愀然，不能答。由是顾准稍衰，旋罢相，终海康之贬。呜呼！绛侯、莱公之功，揭若日月，而盎与钦若以从容一言，移两明主意，讫致二人于罪斥，谗言罔极，吁可畏哉！

【译文】 西汉时周勃铲除吕氏一党，迎立汉文帝而使刘氏统治得以安稳，等到他出任宰相，上朝完毕退出去的时候，表现出一幅很得意的样子。文帝对他很尊敬，常目送他出朝。爰盎进言说：“丞相是什么人？”文帝说：“是保卫国家的重臣。”爰盎说：“绛侯（周勃爵位）可称为功臣，而不是国家重臣。保卫国家的重臣，君主在则和君主同在，君主不在了则和君主一起去死。吕后执政的时候，吕氏家族控制朝政，擅自专断封王的大权，而周勃身为太尉，掌握兵

权，不能整饬这种局面。吕后驾崩，大臣相互一起诛灭诸吕氏，太尉主管军队，碰上完成了这一功业，是所谓的功臣，不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大臣。丞相如果有傲视君主的表现，陛下对他谦逊，就有失君臣之礼，我私下以为陛下不应当这样做。”以后朝会，文帝愈加严肃，丞相愈加敬畏。时间长了，周勃就有被廷尉逮捕的祸事，几乎不免于治罪。寇莱公（寇准）决断澶渊的计策，真宗待他很优厚，王钦若对此极为忧虎。有一天朝会，寇准先退朝，王钦若进言说：“陛下敬畏寇准，是因为他有安定国家的功劳吗？”真宗说：“是这样。”王钦若说：“臣没想到陛下说出这样的话，对澶渊的战事，不以为是耻辱，反而说寇准有安定国家的功劳，为什么呢？”真宗惊愕地问：“什么原因？”王钦若回答说：“兵临城下而签盟约，即便春秋时的小国也耻于此事。现在我朝以万乘大国的尊贵，而有此举，这签盟约于被围之城下，什么样的耻辱能如此！”真宗忧惧地不能作答。从此对寇准的眷顾稍有减退，不久寇准被免去宰相职务，在被贬斥的海康死去。啊！绛侯、寇莱公的功劳，明若日月，而爱盎和王钦若用不慌不忙的一次进言，改变了两位明君的看法，终使二人遭到罪罚和贬斥，谗言无所不用其极。唉，令人畏惧啊！

无名杀臣下

【原文】 《传》曰：“欲加之罪，其无辞乎？”古者置人于死地，必求其所以死。然固有无罪杀之，而必为之名者。张汤为汉武造白鹿皮币，大农颜异以为本末不相称，天子不悦。汤又与异有隙。异与客语初令下有不便者，异不应，微反唇。汤奏当异九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论死。自是后有腹非之法。曹操始用崔琰，后为人所谮，罚为徒隶，使人视人，词色不挠。操令曰：“琰虽见刑，而对宾客，虬须直视，若有所讦。”遂赐琰死。隋炀帝杀高颉之后，议新令，久不决。薛道衡谓朝士曰：“向使高颉不死，令决当久行。”有人奏之，帝怒，付执法者推之。裴蕴奏：“道衡有无君之心，推恶于国，妄造祸端。论其罪名，似如隐昧，原其情意，深为悖逆。”帝曰：“公论其逆，妙体本心。”遂令自尽。冤哉此三臣之死也！

【译文】 《左传》说：“想要给人加罪，哪会没有理由吗？”古时候置人于死地，必定寻求其所以该死的原因。然而一定有无罪被杀的，而必须给制造一个罪名的。张汤为汉武帝造白鹿皮币，大司农颜异认为这样本末不相称，天子不高兴。张汤又和颜异有怨隙。颜异和客人谈话，〔客人说〕新的命令颁下有不

方便的地方，颜异没有答话，嘴唇微微向上翻。张汤上奏按颜异身为九卿，见到新命令不方便，不向朝廷进言，而心中非议，应论处死罪。从这以后就有心中非议的刑法。曹操开始任用崔琰，后来崔琰被人所诬陷，判成服劳役的罪犯，派人去看他，言词态度不屈服。曹操下令说：“崔琰虽受刑，而面对宾客，卷曲的胡须直视前方，好像有所愤怒。”于是赐崔琰死。隋炀帝杀了高鑫之后，议论新令，长时间没有决断。薛道衡对朝中官员说：“以前使高鑫不死，新令早就有了决断实行了。”有人把他的话上奏，炀帝发怒，把薛道衡交给执法者审讯。裴蕴上奏说：“薛道衡有目无君主的心，把罪恶推给国家，非分地制造祸事。定他的罪名，好似隐匿不明，追究他情感意愿的根源，则是深深的悖乱和叛逆。”炀帝说：“你论述薛道衡的忤逆，能精妙地体察其本心。”于是下令薛道衡自尽。冤枉啊，这三位大臣的死！

平天冠

【原文】 祭服之冕，自天子至于下士执事者皆服之，特以梁数及旒之多少为别。俗呼为平天冠，盖指言至尊乃得用。范纯礼知开封府，中旨鞠淳泽村民谋逆事。审其故，乃尝入戏场观优，归涂见匠者作桶，取而戴于首，曰：“与刘先主如何？”遂为匠擒。明日入对，徽宗问何以处。对曰：“愚人村野无所知，若以叛逆蔽罪，恐辜好生之德，以不应为杖之，足矣。”按《后汉·舆服志》蔡邕注冕冠曰：“鄙人不识，谓之平天冠。”然则其名之传久矣。

【译文】 祭祀礼服中的冠冕，从天子到下面主持祭祀的人都戴，只是从冠梁和冠冕前后悬挂的玉串多少区别等级。通常称为平天冠，意指天子才能戴。范纯礼任开封府尹时，奉旨审讯淳泽村民谋逆造反的事。审问事情缘故，原来是这个村民到戏场去看戏，回家的路上看见一个工匠造水桶，他便拿起水桶戴在头上，问道：“我与刘先主相比怎么样？”于是就被工匠抓住了。第二天范纯礼上朝向皇上禀报审理情况，徽宗问怎么处理。范纯礼回答说：“山村野夫什么都不懂，如果以叛逆定罪的话，恐怕有损于皇上珍惜生命的美德，按做事莽撞越轨的罪名打他几下，足够了。”按：《后汉书·舆服志》蔡邕注冕冠道：“鄙人不认识，称它做平天冠。”可见平天冠的名字流传很久了。

介推寒食

【原文】 《左传》晋文公反国，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推遂与母偕隐而死。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曰：“以志吾过。”绵上者，西河介休县地也。其事始末只如此。《史记》则曰：“子推从者书宫门，有‘一蛇独怨’之语。文公见其书，使人召之，则亡。闻其人绵上山中，于是环山封之，名曰介山。”虽与《左传》稍异，而大略亦同。至刘向《新序》始云：“子推怨于无爵齿，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待之，不肯出。以谓焚其山宜出，遂不出而焚死。”是后杂传记，如《汝南先贤传》则云：“太原旧俗，以介子推焚骸，一月寒食。”《邨中记》云：“并州俗，冬至后一百五日，为子推断火冷食三日。魏武帝以太原、上党、西河、雁门皆沍寒之地，令人不得寒食，亦为冬至后百有五日也。”按《后汉·周举传》云：“太原一郡，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灵不乐举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辄一月寒食，莫敢烟火。举为并州刺史，乃作吊书置子推庙，言盛冬去火，残损民命，非贤者之意，宣示愚民，使还温食。于是众惑稍解，风俗颇革。”然则所谓寒食，乃是冬中，非今节令二三月间也。

【译文】 《左传》上记载，晋文公重耳流亡返回国内以后，封赏跟从他流亡的人，介之推没要求俸禄，禄位也就没他的份，介之推便和老母亲一起隐居而死了。晋文公寻求他而没有找到，便把绵上这个地方做为介之推的封田，说：“用来表示我的过错。”绵上就是西河介休县（今属山西）的地盘。这件事的前后经过仅仅如此。《史记》则说：“介子推的随从写在宫门上，其中有‘只有一条蛇怨恨’的话。晋文公看见这些文字，便派人召介子推，他就逃走了。听说他到了绵上的山中，晋文公于是下令把山围着封起来，起名叫做介山。”《史记》虽然与《左传》的记载稍有不同，大略也是一致的。到了汉朝刘向的《新序》中则开始说：“介子推怨恨没有封到爵邑，便离开文公来到介山，晋文公等他出来，他不肯出来。晋文公以为放火烧山可能就会出来，于是介之推没出来而被烧死了。”这之后杂乱的记载很多，如《汝南先贤传》说：“太原的风俗，因为介子推被焚烧了尸体，一月份吃冷食。”《邨中记》说：“并州风俗，冬至一百零五天后，为介子推断火吃三天冷食。魏武帝因为太原、上党、西河、雁门全是严寒冰冻之地，命令人们不得吃冷食，时间也是指冬至后一百零五天。”按《后汉书·周举传》的记载：“太原一郡，旧风俗因介子推焚烧了尸骸，有龙忌

之禁。每到介子推死的一月份，都说神灵不喜欢点火，因此百姓每年冬天吃一个月的冷食，没有人敢生火做饭。周举任并州刺史后，就作吊介子推的祭文贴在子推庙前，称严寒天气不生火，残害老百姓的性命，这不是介子推这个贤人的本意，向老百姓宣布，让他们恢复吃温食的习惯。从此，当地民众的迷乱稍有缓解，寒食的风俗颇有革除。”可见所谓寒食节，是在严冬中，不像现在的寒食节在二三月间。

进士诉黜落

【原文】 天禧三年，京西转运使胡则言，滑州进士杨世质等诉本州黜落，即取元试卷，付许州通判崔立看详，立以为世质等所试，不至纰缪，已牒滑州依例解发。诏转运司具析不先奏裁直令解发缘由以闻，其试卷仰本州缴进。世质等仍未得解发。及取到试卷，诏贡院定夺，乃言词理低次，不合充荐，复黜之，而劾胡则、崔立之罪。盖是时贡举条制犹未坚定，故有被黜而来诉其枉者。至于省试亦然，如叶齐之类，由此登第。后来无此风矣。

【译文】 天禧三年，京西转运使胡则说滑州进士杨世质等人控告被本州弃落，就取原试卷，交付许州通判崔立审定。崔立认为杨世质等人所交试卷，不至于有纰缪，已发公文让滑州按条例解送。朝廷下诏转运司详列不先上奏裁定径直解送的原因奏闻朝廷，那些试卷仰靠本州缴进，杨世质等人仍未能解送进京。待得到他们的试卷，诏令由贡院定夺。贡院则说这些试卷文理低下，不应勉强举荐，又重新摈而不取。而且弹劾胡则、崔立有罪。大概这时候贡举条例制度尚不固定，所以有被摈弃而来控告他们的冤枉的。以至于省试也如此，如叶齐之类的人，因此而登第。后来就没有这种风气了。

后汉书载班固文

【原文】 班固著《汉书》，制作之工，如《英》、《莖》、《咸》、《音》，音节超诣，后之为史者，莫能及其仿佛，可谓尽善矣。然至《后汉》中所载固之文章，断然如出两手。观《谢夷吾传》云，第五伦为司徒，使固作奏荐之，其辞至有“才兼四科，行包九德”之语。其他比喻，引稷、契、咎繇、傅说、伊、吕、周、召、管、晏，以为一人之身，而唐、虞、商、周圣贤之盛者，皆无以过。而

夷吾乃在《方术传》中，所学者风角占候而已，固之言，一何太过欤？

【译文】 班固修撰的《汉书》，其制作的工整，就好像《英》、《茎》、《咸》、《韶》等音乐一样，音节达到了造诣高超的境界，后代撰修史书的人，没有能够与他相比拟的，可算得上是尽善了。然而《后汉书》中所载班固的文章，干脆就像是出自两个人的手笔。观《谢夷吾传》记载，第五伦担任司徒，让班固作篇奏文推荐谢夷吾，班固这篇奏文的句子中竟然有“才能兼通四科，品行包容九德”的话。其他地方的比喻，竟然引后稷、契、咎繇、傅说、伊尹、吕尚、周公、召公、管仲、晏婴等十位先贤的德行，来美化谢夷吾一人之身，而唐、虞、商、周几个朝代圣贤中的最优秀者，全都没有一个能超过他的。实际上谢夷吾被列在《方术传》中，他所学的只不过是观看风水占卜征侯罢了，班固对他的赞美，不是太过分了吗？

赵充国 马援

【原文】 前汉先零羌犯塞，赵充国平之，初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西边遂定。成帝命扬雄颂其图画，至比周之方、虎。后汉光武时，西羌人居塞内，来歙奏言，陇西侵残，非马援莫能定。乃拜援太守，追讨之。羌来和亲，于是陇右清静。而自永平以后，讫于灵帝，十世之间，羌患未尝少息。故范晔著论，以为：“二汉御戎之方，为失其本。先零侵境，赵充国迁之内地；当煎作寇，马文渊徙之三辅。贪其暂安之势，信其驯服之情，计日用之权宜，忘经世之远略，岂夫识微者之为乎？”援徙当煎于三辅，不见其事。《西羌传》云，援破降先零，徙置天水、陇西、扶风三郡，事已具《援传》。然援本传，盖无其语，唯段纪明与张奂争讨东羌奏疏，正谓赵、马之失，至今为梗。充国、文渊，为汉名臣，段贬之如此，故晔据而用之，岂其然乎？

【译文】 西汉时先零羌进犯汉朝的西部边塞，赵充国讨伐平定了他们，开始在金城（治今甘肃永靖）设置属国，以便安置那里的西羌降人，西部边疆遂安定下来。汉成帝命扬雄作赋歌颂赵充国的这一安边策略，以至于把他比作周朝方叔、召伯虎。东汉光武帝时，西羌侵入到边塞以内，来歙上奏称，陇西（治今甘肃临洮）被羌人侵扰摧残，没有马援出兵就不能平定。于是拜马援为陇西太守，追逐讨伐西羌。西羌前来和亲，从此陇右（泛指今六盘山以西黄河以东地区）平安无事。但自从明帝永平年间以后，一至到灵帝时期，十代皇帝中间，羌族的侵扰之患从未有过稍微的平息。所以南朝范晔在《后汉书》中发表

评论，认为：“两汉抵御西部少数民族的策略，失误在于没有治本。先零侵扰边境，赵充国把他们迁到了内地；当煎作乱，马援又把他们迁到了三辅。贪图暂时的安宁，轻信他们的表面归顺，只计较日用耗费的小事，却忘记经世安邦的长远谋略。治国安边这样的大事难道是从小处看问题的人所能胜任的吗？”马援把当煎迁到三辅大地，史书上不见记载。《西羌传》说：“马援击破并招降了先零，把他们迁到了天水（治今甘肃通渭）、陇西、扶风（治今陕西兴平东南）三郡，其事已全部在《马援传》中。然而读《马援传》没有这些话，只有段纪明和张奐争抢讨伐东羌的奏疏时，明说赵充国、马援安抚西羌的过失，至今仍是国家的祸害。赵充国、马援是汉朝的名臣，段纪明对他们贬抑到这种地步，范曄把它作为依据而采用，难道这符合实际情况吗？

汉人希姓

【原文】 两《汉书》所载人姓氏，有后世不著见者甚多，漫纪于此，以助氏族书之脱遗。复姓如公上不害、合傅胡害、室中同、昭涉掉尾、单父右军、阳城延、息夫躬、游水发根、吾丘寿王、落下闳、梁丘贺、五鹿充宗、公户满意、堂溪惠、申章昌、浩星赐、阙门庆忌、安国少季、马适建、都尉朝、毋将隆、红阳长仲、乌氏羝、周阳由、胜屠公、毋盐氏、欧侯氏、士孙喜、索卢恢、屠门少、瓜田仪、工师喜、驳马少伯、公乘歆、鲑阳鸿、弓里游、公沙穆、胡毋班、周生丰、友通期、公绪恭、公族进阶、水丘岑、叔先雄。单姓如缙贺、虫达、灵常、赅赫、其石、旅卿、秘鼓祖、革朱、礪乐、冷丰、冥都、礪中翁、蒯彻、直不疑、闾孺、使乐成、杯育、制氏、猗顿、义纵、隽不疑、疏广、云敞、枚乘、终军、鹵公孺、食子公、礪臂、初宗、衡胡、乘宏、简卿、快钦、所忠、假仓、眭孟、礪恽、涂恽、射姓、后仓、姓伟、如氏、苴氏、百政、免公、发福、质氏、浊贤、稽发、礪章、礪氏、佗羽、绣君宾、漕中叔、栩丹、帛敞、迟昭平、汝臣、驹几、称忠、逮普、台崇、沐茂、礪氏、劳丙、抗徐、阙宣、沮俊、卑整、编杓、宣诵、寻穆、夜龙、弓林、行巡、礪讽、角闳、芳丹、坚鐔、锡光、衺伟、重异、力子都、维汜、诗索、繇延、夷长公、防广、鐔显、移良、缙玉、蕃向、渠穆、临孝存、脂习、笮融、茨充、处兴、兴渠、具瑗、谅辅、腾是、卿仲辽、谒焕、矫慎、晃华、洼丹、祢衡。

【译文】 《汉书》和《后汉书》上记载的人物的姓氏，有很多后世都不怎么见到了，我随手记录在这里，以便对氏族一类书的脱遗有所补益。复姓如公

上不害、合傳胡害、室中同、昭涉掉尾、单父右军、阳城延、息夫躬、游水发根、吾丘寿王、落下闳、梁丘贺、五鹿充宗、公户满意、堂溪惠、申章昌、浩星赐、阙门庆忌、安国少季、马适建、都尉朝、毋将隆、红阳长仲、乌氏羸、周阳由、胜屠公、毋盐氏、欧侯氏、士孙喜、索卢恢、屠门少、瓜田仪、工师喜、驳马少伯、公乘歙、鲑阳鸿、弓里游、公沙穆、胡毋班、周生丰、友通期、公绪恭、公族进阶、水丘岑、叔先雄。单姓如繒贺、虫达、灵常、赅赫、其石、旅卿、秘鼓祖、革朱、磳乐、冷丰、冥都、中翁、蒯彻、直不疑、闾孺、使乐成、杯育、制氏、猗顿、义纵、隽不疑、疏广、云敞、枚乘、终军、卤公孺、食子公、臂、礪宗、衡胡、乘宏、简卿、炔钦、所忠、假仓、眭孟、礪恽、涂恽、射姓、后仓、姓伟、如氏、苴氏、百政、免公、发福、质氏、浊贤、稽发、章、氏、佗羽、绣君宾、漕中叔、栩丹、帛敞、迟昭平、汝臣、驹几、称忠、逮普、台崇、沐茂、礪氏、劳丙、抗徐、阙宣、沮俊、卑整、编、宣诵、寻穆、夜龙、弓林、行巡、礪讽、角闳、芳丹、坚鐔、锡光、礪伟、重异、力子都、维汜、诗索、繇延、夷长公、防广、鐔显、移良、缙玉、蕃向、渠穆、临孝存、脂习、笱融、茨充、处兴、兴渠、具瑗、谅辅、腾是、卿仲辽、谒焕、矫慎、晃华、注丹、祢衡。

绛灌

【原文】 《汉书·陈平传》：“绛、灌等谗平。”颜师古注云：“旧说云，绛，绛侯周勃也，灌，灌婴也。而《楚汉春秋》，高祖之臣，别有绛灌，疑昧之文，不可据也。”《贾谊传》：“绛、灌、东阳侯之属尽害之。”注亦以为勃、婴。按《史记·陈平世家》曰：“绛侯、灌婴等咸谗平”，则其为两人明甚。师古不必为疑辞也。《楚汉春秋》陆贾所作，皆书当时事，而所言多与史不合，师古盖屡辨之矣。《史》、《汉》、《外戚》、《窦皇后传》，实书绛侯、灌将军，此最的证也。夏侯婴为滕令，故称滕公。而《史》并灌婴书为滕、灌，《贾谊》所称亦然，甚与绛、灌相类。《楚汉春秋》一书，今不复见，李善注《文选》刘歆《移博士书》云：“《楚汉春秋》曰，汉已定天下，论群臣破敌禽将，活死不衰，绛灌、樊哙是也。功成名立，臣为爪牙，世世相属，百出无邪，绛侯周勃是也。然则绛灌自一人，非绛侯与灌婴。”师古所谓疑昧之文者此耳。张耳归汉，即立为赵王，子敖废为侯，敖子偃尝为鲁王，文帝封为南宫侯，而《楚汉春秋》有“南宫侯张耳”。淮阴舍人告韩信反，《史记·表》云桀说，《汉·表》云乐说，而《楚

汉》以为谢公。其误可见。

【译文】 《汉书·陈平传》说，“绛、灌等人说陈平的坏话。”颜师古注说：“以前的说法说，绛，是绛侯周勃；灌，是灌婴。而《楚汉春秋》则说，高祖的大臣，另有绛灌，疑惑不明的文字，不能作为根据。”《贾谊传》有“绛、灌、东阳侯之流忌妒他。”注也认为是周勃、灌婴。按《史记·陈平世家》说：“绛侯、灌婴等人都说陈平的坏话。”那么绛、灌是两个人这件事是很明白的。颜师古不必引有疑问的文辞。《楚汉春秋》是陆贾所作，都写的是当时的事，然而所记很多与史书不合，颜师古因此多次加以辨证。《史记》和《汉书》的《外戚·窦皇后传》，明白写作绛侯、灌将军，这是最确凿的证据。夏侯婴作滕县令，所以称滕公。而《史记》和灌婴一起写成滕、灌，《贾谊传》所写的称谓也如此，与绛、灌并称非常相似。《楚汉春秋》一书，现在不再看到，李善注《文选》中刘歆的《移博士书》说：《楚汉春秋》说，汉朝已平定天下，议论群臣破敌阵虏敌将，活死都不衰败，是绛灌、樊哙。功成名就，为爪牙之臣，代代相接续，一百代人中无一邪恶之人，是绛侯周勃。如此看出绛灌自为一人，不是绛侯和灌婴。”颜师古所谓疑惑不明的文字即是指此。张耳归附汉室，就立为赵王，其子张敖废为宣平侯，张敖子张偃曾为鲁王，文帝时封为南宫侯，而《楚汉春秋》有“南宫侯张耳”的记载。淮阴侯韩信的舍人上告韩信谋反，《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说舍人是桀说，《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说舍人是乐说，而《楚汉春秋》以为是谢公，足见它的谬误。

题咏绝唱

【原文】 钱仲仲大夫于锡山所居漆塘村作四亭，自其先人，已有卜筑之意而不克就，故名曰“遂初”；先塋在其上，名曰‘望云’；种桃数百千株，名曰‘芳美’；凿地涌泉，或以为与惠山泉同味，名曰‘通惠’。求诗于一时名流，自葛鲁卿、汪彦章、孙仲益既各极其妙，而母舅蔡戟天任上绝独擅场。《遂初亭》曰：“结庐傍林泉，偶与初心期。佳处时自领，未应鱼鸟知。”《望云亭》曰：“白云来何时，英英冠山椒。西风莫吹去，使我心摇摇。”《芳美亭》曰：“高人不惜地，自种无边春。莫随流水去，恐污世间尘。”《通惠亭》曰：“水行天地间，万派同一指。胡为穿石来？要洗巢由耳。”四篇既出，诸公皆自以为弗及也。吴傅朋游丝书，赋诗者以百数，汪彦章五言数十句，多用翰墨故事，固已超拔，而刘子曠彦冲古风一篇，盖为绝唱。其辞云：“圆清无暇二三月，时见游丝转空阔。

谁人写此一段奇，著纸春风吹不脱。纷纭纠结疑非书，安得龙蛇如许莫。神踪政喜萦不断，老眼只愁看若无。定知苗裔出飞白，古人妙处君潜得。勿轻漠漠一缕浮，力遒可挂千钧石。眷予弟兄情不忘，轴之远寄悠然堂。谢公遗髯凛若活，卫后落髻摇人光。翻思长安夜飞盖，醉哦声落南山外。乱离契阔四十秋，笔意与人具老大。政成著脚明河津，外家风流今绝伦。文章固自有机杼，戏事岂足劳心神？”此章尤为驰骋痛快，且卒章含讥讽，正中傅朋之癖。予少时见二公所作，殊敬爱之，至今五十年尚能记忆，惧其益久而不传，故纪于此。

【译文】 钱伸仲大夫在锡山他所居住的漆塘村附近建造了四座亭子，自从他父亲，就有在这里居住的念头，但未能如愿，所以就为这座亭子起名“遂初”；钱氏先辈的墓葬在另一座亭子上方，他便给这座亭子起名为“望云”；因亭子旁栽种有上千棵桃树，所以为第三座亭子起名叫“芳美”；凿开土层便有清澈的泉水涌出，有人以为这里的水与惠山的泉水一样甘甜，他便为这第四座亭子起名为“通惠”。四座亭子命名后，钱大夫便向当时的名流觅求题诗，从葛鲁卿、汪彦章到孙仲益等人的题诗都各极其妙，然而笔者舅父蔡天任先生的四首绝句则独占鳌头。他题《遂初亭》说：“结庐傍林泉，偶与初心期。佳处时自领，未应鱼鸟知。”题《望云亭》说：“白云来何时，英英冠山椒。西风莫吹去，使我心摇摇。”题《芳美亭》说：“高人不惜地，自种无边春，莫随流水去，恐污世间尘。”题《通惠亭》说：“水行天地间，万派同一指。胡为穿石来？要洗巢由耳。”这四篇题诗出来以后，各位先生都自认为赶不上。吴傅朋用游丝制作了书法挂轴，赋诗吟诵的人数以百计，汪彦章先生的五言诗数十句，多化用翰墨故事，本来已经超群拔萃，而刘子盼的古风一篇，更为绝唱。他的诗句是：“圆清无瑕二三月，时见游丝转空阔。谁人写此一段奇，著纸春风吹不脱。纷纭纠结疑非书，安得龙蛇如许。神踪政喜萦不断，老眼只愁看若无。定知苗裔出飞白，古人妙处君潜得。勿轻漠漠一缕浮，力遒可挂千钧石。眷予弟兄情不忘，轴之远寄悠然堂。谢公遗髯凛若活，卫后落髻摇人光。翻思长安夜飞盖，醉哦声落南山外。乱离契阔四十秋，笔意与人具老大。政成著脚明河津，外家风流今绝伦。文章固自有机杼，戏事岂足劳心神？”这一章尤其驰骋痛快，而且最后一句蕴含讥讽之意，正切中吴傅朋的癖病。我小时候看到蔡、刘二位的这几首诗，特别敬仰喜爱，到现在已经五十年了，还能够记忆吟诵出来，我怕时间更久不能流传下去，所以把这些诗记录在这里。

秀才之名

【原文】 秀才之名，自宋、魏以后，实为贡举科目之最，而今人恬于习玩，每闻以此称之，辄指为轻己。因阅《北史·杜正玄传》载一事云：“隋开皇十五年，举秀才，试策高第，曹司以策过左仆射杨素，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为秀才，刺史何忽妄举此人！’乃以策抵地不视。时海内唯正玄一人应秀才，曹司重以启素，素志在试退正玄，乃使拟相如《上林赋》、王褒《圣主得贤臣颂》、班固《燕然山铭》、张载《剑阁铭》、《白鹦鹉赋》，曰：‘我不能为君住宿，可至未时令就。’正玄及时并了。素读数遍，大惊曰：‘诚好秀才！’命曹司录奏。”盖其重如此。又正玄弟正藏，次年举秀才，时苏威监选试，拟贾谊《过秦论》、《尚书·汤誓》、《匠人箴》、《连理树赋》、《几赋》、《弓铭》，亦应时并就，文无点窜。然则可谓难矣。《唐书·杜正伦传》云：“隋世重举秀才，天下不十人，而正伦一门三秀才，皆高第。”乃此也。

【译文】 秀才这个名称，自打南朝的刘宋、北朝的拓跋魏以后，实际是贡举科目中的最高品级，而现在的人却对这个称呼习以为常，每当听到有人用这个词称呼自己时，便指责对方轻视自己。因为阅读《北史·杜正玄传》记载的一件事，上面写道：“隋文帝开皇十五年（595年），由地方推举秀才人选，朝廷经过考试策问方能登高第，主管考试的曹司把考题拿给左仆射杨素看，杨素发怒说：‘即便是周公旦、孔老夫子重新出生，还尚且不能成为秀才，刺史不知为何妄加推荐这个人！’便把试策扔在地上不予理睬。当时全国只有杜正玄一个人应考秀才，曹司只好再次向杨素反映，杨素目的在于刷掉正玄，便让他分别模拟司马相如的《上林赋》、王褒的《圣主得贤臣颂》、班固的《燕然山铭》、张载的《剑阁铭》、《白鹦鹉赋》写出五篇赋来，并说：‘我不能为你安排住宿，可到未时（下午三时）前写毕。’正玄及时都完成了。杨素一连读了好几遍，大为吃惊地说：‘确实是一个好秀才！’命曹司马上录取上奏。”那时对秀才重视到像这种程度。再者，杜正玄的弟弟杜正藏，第二年应考秀才，当时苏威监督选试，模拟贾谊的《过秦论》、《尚书·汤誓》、《匠人箴》、《连理树赋》、《几赋》、《弓铭》出题，正藏也及时一并完成了，文章没有一点毛病。由此来看，选秀才可真不容易啊！《唐书·杜正伦传》说：“隋朝重视秀才选拔，全国录取不到十人，而杜正伦一家却出了三位秀才，全都登上了高第。”指的就是这事。

魏收作史

【原文】 魏收作元魏一朝史，修史诸人，多被书录，饰以美言，夙有怨者，多没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故众口喧然，称为“秽史”。诸家子孙，前后投诉，云遗其家世职位，或云不见记录，或云妄有非毁，至于坐谤史而获罪编配，因以致死者。其书今存，视南北八史中，最为冗谬。其自序云：“汉初，魏无知封高良侯，子均，均子恢，恢子彦，彦子歆，歆子悦，悦子子建，子建子收。”无知于收，为七代祖，而世之相去七百余年。其妄如是，则其述他人世系与夫事业，可知矣！

【译文】 魏收修撰北魏一朝的历史，参与修史的人，多被录进书中，并多方修饰美化，对和他有旧怨的人，则多在书中埋没他们的善行。他时常说：“什么东西，敢与我魏收作对，抬举你则可以让你上天，贬低你就会让你入地。”所以众人对魏收这种卑劣做法议论纷纷，称《魏书》是一部“秽史”。各家子孙，前后不断有人投诉，有的说书中遗漏了他们的家世职位，有的说他们先辈的事迹不见记录，有的说书中对他们的家人妄加诽谤诋毁，以至于不少人因诽谤国史而获罪遭发配，甚至有因此而致死的。这部书现在还存世，观南北朝八史当中，它最为杂乱荒谬。魏收在《魏书》自序中说：“汉朝初年，魏无知被封为高良侯，他的儿子叫魏均，魏均的儿子叫魏恢，魏恢的儿子叫魏彦，魏彦的儿子叫魏歆，魏歆的儿子叫魏悦，魏悦的儿子叫魏子建，魏子建的儿子叫魏收。”魏无知对于魏收来说，是他的七世祖，但时间却相差了七百多年。对自己的家世尚且胡乱撰写到这种地步，那么叙述其他人的世系和事业乱到什么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卷 三

北狄俘虏之苦

【原文】 元魏破江陵，尽以所俘士民为奴，无问贵贱，盖北方夷俗皆然也。自靖康之后，陷于金虏者，帝子王孙，宦门仕族之家，尽没为奴婢，使供作务。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为米，得一斗八升，用为祆粮。岁支麻五把，令缉为裘，此外更无一钱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缉者，则终岁裸体，虏或哀之，则使执爨，虽时负火得暖气，然才出外取柴，归再坐火边，皮肉即脱落，不日辄死。惟喜有手艺，如医人、绣工之类，寻常只团坐地上，以败席或芦苇衬之。遇客至开筵，引能乐者使奏技，酒阑客散，各复其初，依旧环坐刺绣，任其生死，视如草芥。先公在英州，为摄守蔡衮言之，蔡书于《甲戌日记》，后其子大器录以相示，此《松漠记闻》所遗也。

【译文】 元魏攻破江陵，把所俘获的士人百姓全部作为奴隶，不理睬其人高贵还是卑贱，大概北方夷人的习俗都是这样。自靖康年间之后，陷于金人的，帝子王孙，官宦人家，全部沦落为奴婢，使他们供职于劳务。每个人每月支給稗子五斗，命令他们自己舂成米，可得一斗八升，用作于粮，每年支給麻五把，命令他们把麻接制成缕作衣，此外再没有一个钱一寸帛的收入。男子不能接麻作衣的，则终年赤裸着身体，金人有人可怜他们，则让他们烧火，虽然时时靠火得些暖气，然而刚出外取柴，回来再坐在火边，皮肉就相脱落，不几天就死。金人只喜欢有手艺，如医人、绣工之类的人，平常只让他们团团坐在地上，用破席子或芦苇编的垫衬托着他们。遇有客人到开筵时，叫来能歌舞音乐的让他们演奏，酒席完毕客人散去，他们又恢复原来的样子，依旧环坐在一起刺绣，任其生其死，视同草芥一样。先父在英州，为兼知州蔡 说过这些事，蔡把这些话写入了他的《甲戌日记》，后来他的儿子蔡大器拿来给我看，这是《松漠纪闻》所遗漏的。

太守刺史赠吏民官

【原文】 汉薛宣为左冯翊，池阳令举廉吏狱掾王立，未及召，立妻受囚家钱，慚恐自杀。宣移书池阳曰：“其以府决曹掾书立之柩，以显其魂。”颜师古注云：“以此职追赠也。”后魏并州刺史以部民吴悉达兄弟行著乡里，板赠其父渤海太守。此二者皆以太守、刺史而擅赠吏民官职，不以为过，后世不敢然也。

【译文】 汉朝薛宣任左冯翊时，池阳太守举荐廉吏狱掾王立，还未来得及召见，王立的妻子收受囚犯家属的钱财，王立因羞惭恐惧而自杀。薛宣向池阳发出公文说：“把府决曹掾这个官职书写在王立的灵柩上，以显扬他的灵魂。”颜师古注释说：“这是用府决曹掾这个官职追赠王立。”南北朝时北魏并州刺史因为属下百姓吴悉达兄弟几人品行显著于乡里，便追赠他们死去的父亲为渤海太守。这两件事都是以太守、刺史的身份擅自追赠官吏平民官职，不能算是过错，但后世不敢这样做。

李元亮诗启

【原文】 建昌县士人李元亮，山房公择尚书族子也，抱材尚气，不以辞色假人。崇宁中在大学，蔡祜为学录，元亮恶其人，不以所事前廊之礼事之。蔡擢第魁多士，元亮失意归乡。大观二年冬，复诣学，道过和州。蔡解褐即超用，才二年，至给事中，出补外，正临此邦。元亮不肯入谒。蔡自到官，即戒津吏门卒，凡士大夫往来，无问官高卑，必飞报，虽布衣亦然。既知其来，便命驾先造所馆。元亮惊喜出迎，谢曰：“所以来，颦为门下之故。方修贄见之礼，须明旦扣典客，不意给事先生卑躬下贱如此，前贄不可复用，当别撰一通，然后敬谒。”蔡退，元亮旋营一启，旦而往焉，其警策曰：“定馆而见长者，古所不然；轻身以先匹夫，今无此事。”蔡摘读嗟激，留宴连夕，赠以五十万钱，且致书延誉于诸公间，遂登三年贡士科。元亮亦工诗，如“人闲知昼永，花落见春深”，“朝雨未休还暮雨，腊寒才过又春寒”，皆佳句也。

【译文】 建昌县的士人李元亮，是李氏山房公择尚书的同族子弟，怀有才能崇尚气节，不以辞色宽容人。崇宁年间在太学，蔡 为学录，李元亮讨厌这个人，不以他所奉事的前郎学录之礼奉事蔡 。蔡 考试得中第一名，李元亮

不得意回到乡里。大观二年（1108年）冬天，他再前往太学，路途经和州。当时蔡 中第之后即超格任用，才两年，就任给事中，出朝补外郡，正治此州。李元亮不肯入官府拜见。蔡 自从到官，就告诫渡口官吏和门卫，凡是士大夫往来，无论官职高下，必须飞速报告，虽然是布衣之士也一样。蔡 既知道李元亮的到来，便命驾车先到他所住的馆舍中去拜访。李元亮惊喜出迎，称谢说：“我所以来这里，是专因门下弟子的缘故。刚治办初见长者之礼，须等到明天早晨扣迎客官署的门，没想到给事先生如此卑躬礼敬贱人，以前的见面礼不可再用，应当另行撰写一个，然后恭敬地前往拜见。蔡 退离，李元亮随即写了一封书札，天亮就前往了，其中动人的文句说：“定馆而见长者，古所不然；轻身以先匹夫，今无此事（在居住的馆舍而迎见长者，古所不应该；轻贱自身以先礼匹夫，当今没有这样的事）。”蔡 摘读嗟叹激动，留他饮宴接连到晚上，赠给他五十万钱，并且给各位大官写信为他扬名，终于在大观三年（1109年）贡士科登第。李元亮也工于作诗，如“人闲知昼永，花落见春深（人闲的时候才知白天长，花落的时候才见春已深）”；“朝雨未休还暮雨，腊寒才过又春寒（早晨的雨还未停歇晚上的雨又下，腊月的寒冷刚过又来了春天的寒冷）”，都是好诗句。

元魏改功臣姓氏

【原文】 魏孝文自代迁洛，欲大革胡俗，既自改拓跋为元氏，而诸功臣旧族自代来者，以姓或重复，皆改之。于是拔拔氏为长孙氏，达奚氏为奚氏，乙旃氏为叔孙氏，丘穆陵氏为穆氏，步六孤氏为陆氏，贺赖氏为贺氏，独孤氏为刘氏，贺楼氏为楼氏，勿忸于氏为于氏，尉迟氏为尉氏，其用夏变夷之意如此。然至于其孙恭帝，翻以中原故家，易赐蕃姓，如李弼为徒河氏，赵肃、赵贵为乙弗氏，刘亮为侯莫陈氏，杨忠为普六茹氏，王雄为可频氏，李虎、阎庆为大野氏，辛威为普毛氏，田宏为纥干氏，耿豪为和稽氏，王勇为库汗氏，杨绍为叱利氏，侯植为侯伏侯氏，奚炽为纥豆陵氏，李穆为祗拔氏，陆通为步六孤氏，杨纂为莫胡卢氏，寇俊为若口引氏，段永为尔绵氏，韩褒为侯品陵氏，裴文举为贺兰氏，王轨为乌丸氏，陈忻为尉迟氏，樊深为万纽于氏，一何其不循乃祖彝宪也！是时盖宇文泰颍国，此事皆出其手，遂复国姓为拓跋，而九十九姓改为单者，皆复其旧。泰方以时俗文敝，命苏绰仿《周书》作大诰，又悉改官名，复周六卿之制，顾乃如是，殆不可晓也。

【译文】 北魏孝文帝把首都从代迁到洛阳后，想大力革除胡人风俗，他把自己的国姓拓跋氏改为元氏，各个功臣旧族凡从代迁到洛阳的，只要是复姓，全改动。于是拔拔氏改为长孙氏，达奚氏改为奚氏，乙旃氏改为叔孙氏，丘穆陵氏改为穆氏，步六孤氏改为陆氏，贺赖氏改为贺氏，独孤氏改为刘氏，贺楼氏改为楼氏，勿忸于氏改为于氏，尉迟氏改为尉氏，他用汉族风俗改变少数民族风俗的决心是这样的坚决。然而到了他的孙子恭帝时，反而把居住在中原的汉族世家赐给少数民族的姓，如李弼赐给徒河氏，赵肃、赵贵赐给乙弗氏，刘亮赐给侯莫陈氏，杨忠赐给普六茹氏，王雄赐给可频氏，李虎、净庆赐给大野氏，辛威赐给普毛氏，田宏赐给纥干氏，耿豪赐给和稽氏，王勇赐给库汗氏，杨绍赐给叱利氏，侯植赐给侯伏侯氏，窦炽赐给纥豆陵氏，李穆赐给拔氏，陆通赐给步六孤氏，杨纂赐给莫胡卢氏，寇俊赐给若口引氏，段永赐给尔绵氏，韩褒赐给侯吕陵氏，裴文举赐给贺兰氏，王轨赐给乌丸氏，陈忻赐给尉迟氏，樊深赐给万纽于氏，这是多么违背他祖宗的遗则呀！这个时候是宇文泰把持朝政，这种赐姓的事全出于他的主意，随即恢复国姓为拓跋氏，而且原来九十九个改为单姓的复姓，也全部恢复了旧姓。宇文泰还因当时流行的骈体文有流弊，命令苏绰模仿《周书》作大诰，又全部更改官名，恢复周朝的六卿制。像宇文泰这样乱改一通，实在令人费解。

东坡和陶诗

【原文】 《陶渊明集·归园田居》六诗，其末“种苗在东皋”一篇，乃江文通杂体三十篇之一，明言学陶征君《田居》，盖陶之三章云：“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故文通云：“虽有荷锄倦，浊酒卿自适。”正拟其意也。今陶集误编入，东坡据而和之。又“东方有一士”诗十六句，复重载于《拟古》九篇中，坡公遂亦两和之，皆随意即成，不复细考耳。陶之首章云：“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初与君别时，不谓行当久。出门万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先醉，不在接杯酒。兰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负。”坡和云：“有客扣我门，系马庭前柳。庭空鸟雀噪，门闭客立久。主人枕书卧，梦我平生友。忽闻剥啄声，惊散一杯酒。倒裳起谢客，梦觉两愧负。”二者金石合奏，如出一手，何止子由所谓遂与比辙者哉！

【译文】 《陶渊明集》中《归园田居》共六首诗，其中最后“种苗在东皋”一篇，是江淹的杂体诗三十篇中的一篇，江淹明确地说这首诗是学陶征君

《归园田居》的，陶渊明这组诗第三章说：“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所以江淹诗说：“虽有荷锄倦，浊酒聊自适。”正是模拟陶诗诗意。现在的《陶渊明集》把这首诗误编进去了，而苏东坡以陶集为依据和了这首诗。又如“东方有一士”诗十六句，又重复载在《拟古》诗九篇当中，苏东坡也就在两个地方写了和诗，全是随意写成，没有细心考订。陶渊明《归园田居》首章写道：“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初与君别时，不谓行当久。出门万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先醉，不在接杯酒。兰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负。”东坡和道：“有客扣我门，系马庭前柳。庭空鸟雀噪，门闭客立久。主人枕书卧，梦我平生友。忽闻剥啄声，惊散一杯酒。倒裳起谢客，梦觉两愧负。”这两首诗可算得上是金石合奏，好像出自一个人的手笔，岂止是东坡之弟苏子由所说的仅仅和辙同韵而已呢！

陈季常

【原文】 陈季常字季常，公弼之子，居于黄州之岐亭，自称“龙丘先生”，又曰“方山子”。好宾客，喜畜声妓，然其妻柳氏绝凶妒，故东坡有诗云：“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师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河东师子，指柳氏也。坡又尝醉中与季常书云：“一绝乞秀英君。”想是其妾小字。黄鲁直元盦中有与季常简曰：“审柳夫人时须医药，今已安平否？公暮年来想渐求清净之乐，姬媵无新进矣，柳夫人比何所念以致疾邪？”又一贴云：“承谕老境情味，法当如此，所苦既不妨游观山川，自可损药石，调护起居饮食而已。河东夫人亦能哀怜老大，一任放不解事邪？”则柳氏之妒名，固彰著于外，是以二公皆言之云。

【译文】 陈季常字季常，陈公弼的儿子，居住在黄州的岐亭，自称“龙丘先生”，又叫“方山子”。喜好宾客，喜欢收养声色艺妓，然而他的妻子柳氏特别凶悍忌妒，所以苏东坡有诗说：“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师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龙丘居士也是可怜，谈论空辩论有夜里不成眠。忽听到河东狮子吼叫，拐杖脱手心中茫然若失）。”河东狮子，指的就是柳氏。苏东坡又曾在酒醉中给陈季常写了封信说：“一绝乞秀英君（一首绝句求秀英君）。”秀英想来是他妾的小字。黄鲁直（黄庭坚）在元盦年间给陈季常的书简说：“知道柳夫人时时须用医药，现今已安平了没有？您暮年以来打算逐渐求得清净的乐趣，姬妾没有新进来的了，柳夫人近来有什么所系念以致成疾呀？”又有书简

说：“承蒙您告诉我老年境况的情味，养生的方法应当如此，所痛苦既然不妨碍游览山川，自然可以减少服用药石，调整护理生活起居和饮食罢了。河东夫人也能哀怜年纪大的人，还是依旧任性放纵不懂事呀？”则是柳氏的忌妒之名，本来昭彰显露在外，所以二位先生都谈到了他。

文用谥字

【原文】 先王谥以尊名，节以壹惠，故谓为易名。然则谥之为义，正训名也。司马长卿《谕蜀文》曰：“身死无名，谥为至愚。”颜注云：“终以愚死，后叶传称，故谓之谥。”柳子厚《招海贾文》曰：“君不返兮谥为愚。”二人所用，其意则同。唯王子渊《箫赋》曰：“幸得谥为洞箫兮，蒙圣主之渥恩。”李善谓：“谥者号也，言得谥为箫而常施用之。”以器物名为谥，其语可谓奇矣。

【译文】 先王死后谥一个尊贵的名字，节以壹惠，所以叫作换名。可见谥的本义，是为了端正名实。汉司马相如的《谕蜀文》说：“到死也没有出名，死后求谥的行为叫做‘至愚’。”颜师古注释说：“终于愚蠢而死，后世便这样称呼他，所以叫作谥”。唐代柳宗元《招海贾文》说：“君一去不返死在那里，给你起名叫作愚。”这里两个人所用“谥”字的意思相同。只有王子渊的《箫赋》说：“有幸起名叫‘洞箫’，承蒙圣主优渥的恩泽。”李善说：“谥，就是号的意思，是说得以谥为洞箫而经常使用它。”用器物的名子做“谥号”，这话可算是离奇了。

高唐神女赋

【原文】 宋玉《高唐》、《神女》二赋，其为寓言托兴甚明。予尝即其词而味其旨，盖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真得诗人风化之本。前赋云：“楚襄王望高唐之上有云气，问玉曰：‘此何气也？’对曰：‘所谓朝云者也。昔者先生尝游高唐，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后赋云：“襄王既使玉赋高唐之事，其夜王寝，梦与神女遇，复命玉赋之。”若如所言，则是王父子皆与此女荒淫，殆近于聚衿之丑矣。然其赋虽篇首极道神女之美丽，至其中则云：“淡清静其悃神兮，性沉详而不烦。意似近而若远兮，若将来而复旋。褰余帟而请御兮，愿尽心之役役。怀贞亮之洁清兮，卒与我乎相难。枉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欢情未接，将辞而去。迁延引身，不可亲附。愿假须

與，神女稱遽。暗然而冥，忽不知處。”然則神女但與懷王交御，雖見夢于襄，而未嘗及亂也。玉之意可謂正矣。今人詩詞，顧以襄王藉口，考其實則非是。衽音疋零反，斂容怒色也。柳子厚《謫龍說》有“奇女衽爾怒”之語，正用此也。

【譯文】 宋玉的《高唐》、《神女》二賦，它們作為寓言借之以抒發情懷特別明白。我曾就它們的文辭而体味它們的主旨，可以說是發于真情，而止于禮義，真正得到了詩人風上化下的根本。前一篇賦說：“楚襄王望見高唐之上有雲氣，問宋玉說：‘這是什麼氣呀？’宋玉回答說：‘這就是聽說叫朝雲的呀。過去先王曾經游幸高唐，夢見了一位婦人，告訴先王說，妾是巫山的女兒，願意親進于枕席。先王因而與她交歡。’”後一篇賦說：“襄王既已使宋玉作賦寫了高唐之事，這天夜里襄王睡覺，夢見與神女相遇，又命宋玉作賦。”如果這樣說，則是襄王父子都與這位神女淫亂，幾乎近于禽獸的亂倫之丑了。然而這篇賦雖然開篇極力稱道神女的美麗，到了篇中則說：“澹清靜其情兮，性沉詳而不煩。意似近而若遠兮，若將來而復旋。褰余幃而請御兮，愿尽心之。懷貞亮之潔清兮，卒與我乎相難。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歡情未接，將辭而去。迂延引身，不可親附。愿假須臾，神女稱遽。暗然而冥，忽不知處（儀態安詳而和淑啊，性情沉靜而不煩不躁。她有意親近又像是疏遠啊，好像將要前來而又返回。拉開我的床帳而請求歡愛啊，愿意盡拳拳之心。懷有貞操的潔清啊，终于與我相為難，她收斂笑容微微發怒以自持啊，不曾允觸犯。未能接續歡情，將要辭別而去。她引身退却，不可以親近。希望寬延片刻，而神女稱急。昏然而晦暗，忽然不知所在）。”這就是說神女只與楚懷王交歡，雖然被楚襄王所夢遇，而未曾到亂倫。宋玉的用意可以說是純正了。今人的詩詞，不過用襄王作借口，考核其事實則不對。 這個字，讀音為疋零的反切，就是收斂笑容發怒的樣子。柳宗元的《謫龍說》中有“奇女 爾怒（奇女收斂笑容而發怒）”的話，正用的是這個字。

其言明且清

【原文】 《禮記·緇衣》篇：“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鄭氏注不言何詩。今《毛詩·節南山》章但有下三句而微不同。《經典釋文》云：“從第一句至庶民以生五句，今詩皆無此語，或皆逸詩也。”予按《文選》張華《答何劭》詩曰：“周任有遺規，其言明且清。”然則周任所作也。而李善注曰：“子思子詩云，昔

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世之所存《子思子》亦无之，不知善何所据？意当时或有此书，善必不妄也，特不及周任遗规之义，又不可晓。

【译文】 《礼记·缙衣》篇说：“有一首诗说：‘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国家以宁，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谁能秉国成？不自为正，卒劳百姓。’”汉代郑玄的注释没说这是一首什么诗。现在的《毛诗·节南山》中有上面那首诗的最后三句且稍微不同。《经典释文》说：“从第一句到庶民以生五句，现在《诗经》中全没有这些话，很可能是一段逸诗。”《昭明文选》中张华《答何劭》诗说：“周任有遗规，其言明且清。”可见上面那首诗是古代史官周任作的。而李善注释张华这首诗说：“子思子诗说：‘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现在存世的《子思子》也没有李善说的这两句诗，不知道李善根据的是什么？我想当时也许有这本书，李善肯定不会胡乱注释，他唯独没有涉及“周任遗规”的意思，我们又不能明白。

侍从转官

【原文】 元丰未改官制以前，用职事官寄禄。自谏议大夫转给事中，学士转中书舍人。历三侍郎、学士转左曹礼、户、吏部，余人转右曹工、刑、兵部。左右丞，吏侍转左，兵侍转右。然后转六尚书，各为一官。尚书转仆射，非曾任宰相者不许转，今之特进是也。故侍从止于吏书，由谏议至此凡十一转。其庶僚久于卿列者，则自光禄卿转秘书监，继历太子宾客，遂得工部侍郎。盖以不带待制以上职，不许入两省给、谏耳。元丰改谏议为太中大夫，给、舍为通议，六侍郎同为正议，左右丞为光禄。兵、户、刑、礼、工书同为银青，吏书金紫。但六转，视旧法损其五。元璽中以为太简，增正议、光禄、银青为左右，然亦才九资。大观二年，置通奉以易右正议，正奉以易右光禄，宣奉以易左光禄，以右银青为光禄，而至银青者去其左字，今皆仍之。比仿旧制，今之通奉，乃工、礼侍郎、正议乃刑、户，正奉乃兵、吏，宣奉乃左右丞，三光禄乃六尚书也。凡侍从序迁至金紫无止法，建炎以前多有之。绍兴以来，阶官到此绝少，唯梁杨祖、葛胜仲致仕得之。近岁有司不能探蹟典故，予以宣奉当磨勘，又该覃霈，颜师鲁在天官，径给回授一据，而不明言其所由。比程叔达由宣奉纳禄不迁官，而于待制阁名升二等。程大昌亦然，以龙图直学士径升本学士，尤非也。予任中书舍人日，已阶太中，及以集英修撰出外，吏部不复为理年劳，凡十八年，始以待制得通议，殊可笑。盖台省之中，无复有老吏矣。

【译文】 元丰年间没有改革官制以前，用职事官为寄禄官。从谏议大夫转为给事中，（原注：学士转为中书舍人。）历经三部侍郎、（原注：学士转为左曹礼、户、吏部，其他人转为右曹工、刑、兵部。）左丞和右丞，（原注：吏部侍郎转左丞，兵部侍郎转右丞。）然后转为六部尚书，各为其中的一官。尚书转为仆射，除非曾经任过宰相的人不允许转官，这就是今天的特进。所以侍从官直到吏部尚书，从谏议大夫到吏部尚书共十一次转官。那些一般僚属为官较久的，则从光禄卿转为秘书监，接着为太子宾客，才能得到工部侍郎。这是因为不带待制以上的职位，不许进入两省为给事中、谏议大夫罢了。元丰年间改谏议大夫为太中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为通议大夫，六部侍郎同为正议大夫，左右丞为光禄大夫。兵、户、刑、礼、工部尚书同为银青光禄大夫，吏部尚书为金紫光禄大夫。只有六次转官，对此旧法减损了五次转官。元盩年间，认为这样太简单，增加正议、光禄、银青为左右，然而也是才九种官资。大观二年（1108年），设置通奉大夫以易换右正议大夫，正奉大夫以易换左光禄大夫，宣奉大夫以易换右光禄大夫，以右银青光禄大夫为光禄大夫，而到左银青光禄大夫的去掉原来的左字，现今都依旧这样做。与旧制比较，现今的通奉大夫，就是过去的工部、礼部侍郎，正议大夫就是过去的刑部、户部侍郎，正奉大夫为过去的兵部、吏部侍郎，宣奉大夫为过去的左右丞，三种光禄大夫为过去的六部尚书。凡是侍从官按程序迁转到金紫光禄大夫没有止法。建炎年间以前则大多有止法。绍兴年间以来，官阶能转到这一阶的绝少，只有梁杨祖、葛胜仲因退休得到了这一官阶。近年有关官吏不能考知过去典章旧事，我以宣奉大夫应当考核升迁，又包括皇上的恩赏，颜师鲁在吏部，直接给了回授的一纸契据，而不明白陈述他所根据。等到程叔达由宣奉大夫取俸不转官，而于待制诸阁的名下升两等。程大昌也是这样，以龙图阁直学士直接升为本阁学士，尤其不对。我任中书舍人时，官阶已为太中大夫，等到以集英殿修撰出京为外官，吏部不再整理我每年的劳绩，共十八年，才以待制得到通议大夫，特别可笑。大概是台省之中，不再有老官吏了吧。

曹子建七启

【原文】 “原头火烧净兀兀，野雉畏鹰出复没。将军欲以巧伏人，盘马弯弓惜不发。地形渐窄观者多，雉惊弓满劲箭加。冲人决起百余尺，红翎白镞随倾斜。将军仰笑军吏贺，五色离披马前堕。”此韩昌黎《雉带箭》诗，东坡尝大

字书之，以为绝妙。予读曹子建《七启》论羽猎之美云：“人稠网密，地逼势胁。”乃知韩公用意所来处。《七启》又云：“名秽我身，位累我躬。”与佛氏《八大人觉经》所书“心是恶源，形为罪藪”，皆修己正心之要语也。

【译文】 “原头火烧净兀兀，野雉畏鹰出复没。将军欲以巧伏人，盘马弯弓惜不发。地形渐窄观者多，雉惊弓满劲箭加。冲人决起百余尺，红翎白镞随倾斜。将军仰笑军吏贺，五色离披马前堕。”这是唐代诗人韩愈的《雉带箭》诗，苏东坡曾经用大字把它写出来，以为它是绝妙的诗篇。我读三国曹植的《七启》赋，上面形容射猎场面的壮观道：“围观的人越聚越多，捕捉的网越拉越密；地形越逼越窄，地势渐渐敛缩。”才知道韩公诗意的出处。《七启》又说：“名誉玷污了我的身体，地位拖累了我的身体。”这和佛教的《八大人觉经》所写的“心是罪恶的根源，形体是罪恶的渊藪”一样，都是修己正心的名言。

奸鬼为人祸

【原文】 晋景公疾病，求医于秦，秦伯使医缓为之，未至，公梦疾为二孺子，曰：“彼良医也，惧伤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医至，曰：“疾不可为也。”隋文帝以子秦孝王俊有疾，驰召名医许智藏，俊梦亡妃崔氏泣曰：“本来相迎，如闻许智藏将至，其人当必相苦，奈何！”明夜复梦，曰：“吾得计矣，当入灵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诊俊脉，曰：“疾已入心，不可救也。”二奸鬼之害人，如出一辙。近世许叔微家一妇人，梦二苍头，前者云：“到也未？”后者应云：“到也。”以手中物击一下，遂魇。觉后心痛不可忍，叔微以神精丹饵之，痛止而愈。此事迹与上二者相似。

【译文】 春秋时晋景公得了重病，向秦国求医，秦伯便派名医缓为他医治，还未赶到，晋景公梦见疾病是两个小孩，一个说：“那缓是名医，害怕他伤害了咱们，怎么逃避他呢？”其中一个说：“藏在晋景公肓的上面，膏的下面，他还能把我们怎么样？”缓赶到后，诊治说：“病已经无法治了。”隋文帝杨坚的儿子秦孝王杨俊生病，急忙召名医许智藏诊治，杨俊梦见亡妃崔氏哭着对他说：“本来我是来迎接你的，如今听说许智藏将要到来，这个人必定要摧残我，怎么办呢！”第二天杨俊又梦见崔氏，她说：“我想出办法了，应当藏到你的心脏中来逃避他。”等到智藏赶到，诊断杨俊的脉相，说：“病已进入内心，没有办法救了。”两个奸鬼的害人方法，如出一辙。近世许叔微家中的一个妇女，梦见两个奴仆，走在前面的那个问：“到了没有？”后面那个答道：“到了。”他们使用手

中拿的东西向这位女人心窝刺了一下，这女人立刻在恶梦中惊叫。醒来后心脏疼痛无法忍受，许叔微用神精丹让她服用，疼痛于是止住且痊愈了。这件事也和上面的两件事相似。

监司待巡检

【原文】 今监司巡历郡邑，巡检、尉必迎于本界首，公裳危立，使者从车内遣谒吏谢之，即揖而退，未尝以客礼延之也。至有倨横之人，责桥道不整，驱之车前，使徒步与卒伍齿者。予记张文定公所著《缙绅旧闻》中一事云：“余为江西转运使，往虔州，巡检殿直令保义成忠郎康怀琪，乘舟于三十里相接，又欲送至大庾县，遂于偕行。及至县驿，驿正厅东西各有一房，予居其左，康处于右。日晚，命之同食，起行数百步，逼暮而退。夜闻康暴得疾，余亟趋至康所，康已具舟将归虔，须臾数人扶翼而下，余策杖随之。”观此，则是使者与巡检同驿而处，同席而食，至于步行送之登舟，今代未之见也。

【译文】 现在的监司到各郡邑去巡视，当地的巡检、尉必定要到本郡邑的边界上去迎候，穿戴整齐肃立两旁，监司从车内叫属吏致谢，此后地方官便作揖而退回，从没有以招待客人的礼节来对待地方官的。更有高傲专横的监司，因责怪桥梁道路不平整，便把地方官吏驱赶到车子前，让他们步行加入到卒兵公差的队列当中以示惩罚。我记得张文定公所著的《缙绅旧闻》中有一件事说：“我任江西转运使时，曾巡视虔州，巡检殿直保义成忠郎康怀琪，乘船赶到三十里外迎接，离虔时，他又想把我送到大庾县，于是我们就一同出发。等来到大庾县的驿馆，见驿馆的正厅东西两侧各有一栋客房，我就住进左面那一栋里，康怀琪住在右面。天晚了，我就让他和我同席进餐，吃过饭我们一起散步，走了数百步，天快黑了才返回。半夜听说康怀琪突然得了急病，我急忙起床来到康的住室，他们已准备好了船要返回虔州去，一会儿几个人就搀扶着康怀琪上到船里，我拄着拐杖把他们送到船上。”观看这段记载，可见使者和巡检同在一个驿馆住宿，同在一张桌上吃饭，至于使者步行送巡检上船，现在更是没有这种事了。

十二分野

【原文】 十二国分野，上属二十八宿，其为义多不然，前辈固有论之者矣。其甚不可晓者，莫如《晋·天文志》谓：“自危至奎为訾，于辰在亥，卫之分野也，属并州。”且卫本受封于河内商虚，后徙楚丘。河内乃冀州所部，汉属司隶，其他邑皆在东郡，属兖州，于并州了不相干，而并州之下所列郡名，乃安定、天水、陇西、酒泉、张掖诸郡，自系凉州耳。又谓：“自毕至东井为实沈，于辰在申，魏之分野也，属益州。”且魏分晋地，得河内，河东数十县，于益州亦不相干，而雍州为秦，其下乃列云中、定襄、雁门、代、太原、上党诸郡，盖又自属并州及幽州耳。谬乱如此，而出于李淳风之手，岂非蔽于天而不知地乎！

【译文】 周朝时十二个国家的分界，在天上配属于二十八座星宿，但星名和地名表述的意思多有不相吻合之处，以前本来就有人对这一问题有过讨论。最不能让人明白的，莫过于《晋书·天文志》中的一段记载了，书上说：“从危星到奎星叫做訾，这些星宿在辰时处在亥时的位置上，配属卫，卫国属于并州。但卫国本来被周朝分封在河内的殷墟，后来迁到了楚丘。河内则是冀州的辖区，汉朝时属于司隶校尉管辖，河内的其它城邑在东郡，属于兖州，和并州毫不相干。而书中并州名下所列的郡名，却是安定、天水、陇西、酒泉、张掖各郡，而这些地方实际是凉州的地盘。书中又说：“从毕星到东井星称为实沈，这些星宿在辰时处在申的位置上，配属魏国，魏国属于益州。战国时魏国瓜分了晋国的地盘，得到了河内、河东数十个县，和益州也没有任何关系，而书中又说雍州是秦国地盘，在雍州名下列了云中、定襄、雁门、代、太原、上党各郡，实际以上各郡又都属于并州及幽州。史书记载错谬混乱到这种地步，却出自唐朝李淳风的手笔，难道不是对天文地理蒙蔽混沌一无所知吗？

公孙五楼

【原文】 南燕慕容超嗣位之后，悉以国事付公孙五楼，燕业为衰。晋刘裕伐之，或曰：“燕人若塞大岷之险，坚壁清野，大军深入，将不能自归。”裕曰：“鲜卑贪婪，不知远计，谓我不能持久，不过近据临朐，退守广固，必不能守险清野。”超闻有晋师，引群臣会议，五楼曰：“吴兵轻果，利在速战，不可争锋，

宜据大岷，使不得入。各命守宰，依险自固，焚荡资储，芟除禾苗，使敌无所资。彼侨军无食，可以坐制。若纵使入岷，出城逆战，此下策也。”超不听，裕过大岷，燕兵不出，喜形于色，遂一举灭燕。观五楼之计，正裕之所惮也。超平生信用五楼，独于此不然，盖天意也。五楼亦可谓智士，足与李左车比肩。后世奸妄擅国，以误大事者多矣，无所谓五楼之智也。

【译文】 南燕慕容超继位之后，把国家大事全部交给了公孙五楼处理，南燕的事业已为衰落，晋刘裕讨伐南燕，有人说：“燕人若是堵塞了大岷之险，坚壁清野，大军深入以后，将不能从那里回归。”刘裕说：“鲜卑人贪婪，不知道从长远考虑，他们认为我不能在那里持久为战，不过前进占领临朐，后退镇守广固，一定不能扼守险要和坚壁清野。”慕容超听说有晋兵，召集群臣聚会议论，公孙五楼说：“南方的士兵轻捷果敢，有利于速战，我们不可和他们交战，应该据守大岷，使他们不得深入。命令各个守宰，依凭险要自我固守，烧光物资粮储，割除禾苗，使敌人无资可掠。他们在外驻兵没有吃食，我们可以安坐而制服他们。若是放纵使他们进入大岷，我们出城迎战，这是下策。”慕容超不听。刘裕过大岷，燕兵不出，刘裕喜形于色，于是一举灭掉了燕。观察公孙五楼的计谋，正是刘裕所害怕的。慕容超一生信用公孙五楼，独在这件事上不信用，大概是天意吧。公孙五楼也可以说是智谋之士，足可与李左车相并列。后世的奸臣狂妄之徒独揽国政，因则贻误国家大事的多了，没有这里所说的公孙五楼的智谋。

荐士称字著年

【原文】 汉、魏以来诸公上表荐士，必首及本郡名，次著其年，又称其字。如汉孔融《荐祢衡表》云：“处士平原祢衡，年二十四，字正平”，齐任昉为萧扬州作荐士表云：“秘书丞琅邪王 ，年二十一，字思晦”，“前侯官令东海王僧孺，年三十五，字僧孺”是也。唐以来乃无此式。

【译文】 汉、魏以来各位王公大臣上表举荐士人时，必定先提及此人所在的郡名，其次写明他的年龄，接着再称呼他的字。如东汉末年孔融作的《荐祢衡表》说：“处士平原人祢衡，年龄二十四岁，字正平”，南朝齐代任昉替萧扬州作的荐士表说：“秘书丞琅邪人王 ，年龄二十一岁，字思晦”，“前任侯官县令东海人王僧孺，年龄三十五岁，字僧孺”，都是这种格式。唐朝以后这种格式就没有了。

兄弟邪正

【原文】 王安石引用小人，造作新法，而弟安国力非之。韩绛附会安石制置三司条例以得宰相，而弟维力争之。曾布当元符、靖国之间，阴祸善类，而弟肇移书力劝之。兄弟邪正之不同如此。

【译文】 北宋王安石任用小人，编造新法，而他的弟弟王安国却极力反对他的这种做法。韩绛附和王安石制置三司条例而得到了宰相的职位，但他的弟弟韩维却极力反对。曾布在哲宗元符和徽宗靖国年间，阴谋陷害忠良，而他的弟弟曾肇却写信极力劝阻他。哥哥与弟弟一邪一正的不同，差别竟然这样大。

卷 四

三竖子

【原文】 赵为秦所围，使平原君求救于楚，楚王未肯定从。毛遂曰：“白起，小竖子耳！兴师以与楚战，举鄢、郢，烧夷陵，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也。”是时，起已数立大功，且胜于长平矣。人告韩信反，汉祖以问诸将，皆曰：“亟发兵坑竖子耳！”帝默然。唯陈平以为兵不如楚精，诸将用兵不能及信。英布反，书闻，上召诸将问计，又曰：“发兵击之，坑竖子耳！”夫白起、信、布之为人，材能不可掩，以此三人为竖子，是天下无复有壮士也。毛遂之言，只欲激怒楚王，使之知合纵之利害，故不得不以起为懦夫。至如高帝诸将，不过周勃、樊哙之俦。韩信因执而归，栖栖然处长安为列侯，盖一匹夫也，而哂喜其过己，趋拜送迎，言称臣，况于据有全楚万乘之地，事力强弱，安可同日而语！英布固尝言：“诸将独患淮阴、彭越，今皆已死，余不足畏。”则竖子之对，可谓勇而无谋，殆与张仪诋苏秦为反覆之人相似。高帝默然，顾深知其非也。至于陈平，则不然矣。若乃韩信谓魏将柏直为竖子，则诚然。柏直庸庸无所知名，汉王亦称其口尚乳臭，真一竖子也。阮籍登广武，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盖叹是时无英雄如昔人者。俗士不达，以为籍讥汉祖，虽李太白亦有是言，失之矣。

【译文】 赵国为秦国所包围，使平原君向楚国请求救助，楚王没有肯决定答应。毛遂说：“白起，是个小竖子（小孩子）罢了！他起兵以与楚国交战，占领了鄢、郢，火烧了夷陵，污辱大王的先人，这是百世不忘的怨恨。”这个时候，白起已经数次立大功，并且在长平打了胜仗。有人告发韩信反叛，汉高祖问计于各位将领，都说：“赶紧发兵坑杀这竖子罢了。”高祖默默无言。只有陈平认为军队不如楚兵精良，各将领用兵不能赶得上韩信。英布反叛，报书奏闻，皇上召各将领问计，诸将又说：“发兵打他，坑杀这竖子罢了！”白起、韩信、英布的为人，才能不能掩盖，以这三个人为竖子，则天下就再没有壮士了。毛遂的话，只是想激怒楚王，使他知道合纵的利害，所以不得不把白起当成懦夫。至于如汉高祖的各将领，不过周勃、樊哙之类。韩信因为被捉拿而回，不安地居

处在长安为列侯，大概是一个独夫了，而樊哙喜欢他探访自己，樊哙恭敬地跪拜迎送，说话称臣，况且对于据有全楚万乘兵车之地的韩信，办事力量的强弱，怎么可以同日而语？英布本来曾说：“各将领独独担心淮阴侯和彭越，现在都已死了，其余的不足以畏惧了。”则关于竖子的回答，可以说是有勇而无谋，大概与张仪诋毁苏秦为反复无常的人相类似。汉高祖的默默无言，看来是深知他们建议的不妥当了。至于陈平，则就不是这样了。如果说韩信称魏将柏直为竖子，则的确是。柏直庸庸碌碌没有什么名气，汉王也说他嘴里还有奶气，真是一个竖子啊。阮籍登广武城楼，感叹说：“现时没有英雄，使竖子成了名。”这是感叹当时没有英雄和过去的英雄一样。平凡的读书人不能理解，以为阮籍在讥刺汉高祖，虽然是李太白也有这样的话，说错了。

枢密称呼

【原文】 枢密使之名起于唐，本以宦者为之，盖内诸司之贵者耳。五代始以士大夫居其职，遂与宰相等。自此接于本朝，又有副使、知院事、同知院事、签书、同签书之别，虽品秩有高下，然均称为枢密。明道中，王沂公自故相召为检校太师、枢密使，李文定公为集贤相，以书迎之于国门，称曰“枢密太师相公”，予家藏此帖。绍兴五年，高宗车驾幸平江，过秀州，执政从行者四人，在前者传呼“宰相”，赵忠简也，次呼“枢密”，张魏公也，时为知院事，次呼“参政”，沈必先也，最后又呼“枢密”，则签书权朝美云。予为检详时，叶审言、黄继道为长贰，亦同一称。而二三十年以来，遂有知院、同知之目，初出于典谒、街卒之口，久而朝士亦然，名不雅古，莫此为甚。

【译文】 枢密使的名称起源于唐代，本来由宦官充任，为宫内各部门中的尊贵者。五代开始由士大夫担任这一官职，其地位于是和宰相相等。从五代直到宋代，又有了枢密副使、知院事、同知院事、签书、同签书的区别，虽然品秩有高下之分，然而都称为枢密。仁宗明道年间，王沂公从前任宰相被召出任检校太师、枢密使，李文定公任集贤相，招贴贴到衙门外迎接他上任，称呼“枢密太师相公”，我家珍藏着这份书帖。绍兴五年，高宗皇帝巡幸平江，路过秀州，随从巡行的有执政四人，走在最前面的传呼“宰相”，指赵忠简，下一个呼“枢密”，指张魏公，当时他担任知院事，第三个呼“参政”，是沈必先，最后一个又呼“枢密”，是指枢密签书权朝美。我任检详的时候，叶审言、黄继道一任长官一任副职，也是同一个称呼——枢密。但近二三十年以来，逐渐对

“枢密”有了知院、同知的别名，最初出现在迎宾者、街巷平民口中，时间长了朝中士大夫也这样叫，名称鄙俗，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从官事体

【原文】 国朝优待侍从，故事体名分多与庶僚不同，然有处之合宜及肆意者。如任知州申发诸司公状不系衔，与安抚监司序官往还用大状不书年，引接用朱衣，通判入都厅之类，皆杂著于令式。其明载国史者尚可考。大中祥符五年六月，诏：“尚书丞郎、两省给谏知州府，而本部郎中、员外郎及两省六品以下官充本路转运使副者，承前例须申报。虽职当统摄，方委于事权，而官有等差，宜明于品级。自今知制诰、观察使以上知州府处所申转运司状，并止签案检，令通判以下具衔供申。”张咏以礼部尚书知升州，上言：“臣官忝六曹，祠部乃本行司局，而例申公状，似未合宜。望自今尚书丞郎知州者，除申省外，其本行曹局，止签案检。”从之。绍兴中，范同以前执政知太平州，官系中大夫不带职，申诸司状系衔。提刑张绚封还之，范竟不改。次年转太中，再任，始去之。刘祐为江西运判，移牒属郡知、通云：“请联衔具报”。迈时以太中守赣，以于式不可，乃作公祿，同通判签书。刘邦翰曾任权侍郎，以朝议大夫、集英修撰知饶州。赵焯以承议郎提点刑狱，欲居其上，刘不校，赵又畏人议己，于是遇朝拜国忌日，先后行香。王十朋自侍御史徙权吏部侍郎，不拜，除集撰。知饶州，自处如庶官。林大中亦自侍御史改吏侍，不曾供职，除直宝文阁，知赣州，全衔犹带权知兼劝农事借紫，而尽用从官礼数。黄涣为通判，入都厅，为之不平。郑汝谐除权侍郎，为东省所缴，不得供职，而以秘撰知池州，公状至提刑司，不系衔，为邓礪牒问。唐诏以司农少卿，王佐以中书检正，皆暂兼权户侍，及出知湖、饶二州，悉用朱衣双引。此数君皆失于讨问典章，非故为尊大也。陈居仁以大中、集撰知鄂州，只用一朱衣，盖在法，学士乃双引，人以为得体。迈顷守赣、建，官职与居仁等，而误用两朱，殊以自悔。又如监司见前执政，虽本路，并客位下马。伯氏以故相带观文学士帅越，提举宋藻穿戟门诃殿，云浙东监司如何不得穿绍兴府门，将至厅事，始若勉就客位者。主人亟令掖以还。

【译文】 我朝优待侍从官，所以有关他们的事体和名分则和一般官员不同，然而有的处理得当，有的则不合适。如委任知州下发到各有关部门的委任状不写明官衔，与安抚监司序官公文来往过程中用大状却不写年份，侍从到外

地赴任用穿朱衣的引马，通判进入议事厅等等，这一类事情都零散杂存在一些诏令公文中。其中明确记载到国史中的还可考见。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六月，诏书说：“尚书左右丞及侍郎，尚书、中书两省的给事中及谏议大夫，出任知州知府，而这两省的郎中、员外郎以及六品以下的官员要充任本路转运使或转运副使的，依照先例必须向中央申报。即使有能力应当委任的，也要暂时委任代理职务，官职有等级差别，也应在品级上明确体现。从现在开始，知制诰、观察使以上的人出任知州知府他们所申报转运使状纸，一律停止签字画押，令通判以下的人签名申报。”张咏以礼部尚书的身份出任升州知州，他上书说：“我的官职在六部，祠部是吏部所属的部门，若按常例申报状纸，似不大合适。希望现在以尚书左右丞、侍郎身份任知州的人申报转运使，除了向尚书省申报外，有各自所在的部门签字就行了。”中央答应了他。高宗绍兴年间，范同以前任宰相的身份出任太平州知州，品级是太中大夫不带官职，他向有关部门报告时写上了官衔，提刑点狱张绚退还了他，范同竟没纠正过来，第二年便让他转任太中大夫，再次赴任知州时，才把官衔去掉了。刘 任江西转运判官，他发文给所属各郡的知州、通判说：“请你们把官衔全称报上。”我当时以太中大夫的身份出任赣州知州，认为这种公文形式不合规定，写了公札，和通判联名发出。刘邦翰曾任代理侍郎，以朝议大夫、集英殿修撰的身份出任饶州知州。赵焯以承议郎任饶州提点刑狱，想处在刘邦翰之上，刘不计较，赵又怕别人议论自己，于是遇到朝拜或国忌日，两人便分开烧香行礼。王十朋从侍御史调任代理吏部侍郎，还没上任，又拜为集英殿修撰，出任饶州知州，他始终像一个一般官吏一样自处。林大中也是从侍御史改任吏部侍郎，不曾上任，又拜为宝文阁直学士，出任赣州知州后，官衔全称还为代理赣州知州兼任劝农事使暂借紫光禄大夫，他全用从官礼数。黄涣任赣州通判，走进议事厅，替林大中抱不平。郑汝谐任代理侍郎，被中书省收回了委任书，没能在尚书省任职，他以秘书阁修撰的身份出任池州知州，公文发到提刑司，上面没有写明他的官衔，竟受到提刑点狱邓 的审问。唐 以司农少卿的身份，王佐以中书省检正官的身份，同时二人以暂时兼任代理户部侍郎的身份，分别到湖州和饶州赴任知州时，两人全用朱衣引马。这几位都是因为对典章制度缺乏研究，不是故意自我尊大。陈居仁以太中大夫、集英殿修撰的身份出任鄂州知州，只用了一个朱衣引马，在法定条例上，大学士应用两人朱衣引马，人们以为他这样做很得体。我前不久出任赣州、建州知州时，官职和陈居仁相等，却误用了两个朱衣引接，很感到后悔。又如监司，见到前任宰相，虽然是在本路地盘上，也应居于客位向宰相下马行礼。我伯父曾以前任宰相并观文殿学士的身份出任越州，提举宋藻竟穿过府门在殿堂

上大叫大嚷，并说，他身为浙东监刑狱司怎么不可以穿过绍兴府的府门，将来到厅中议事时，才勉强不情愿地坐在客人的位置上。我伯父急忙令随从把他送走了。

九朝国史

【原文】 本朝国史凡三书，太祖、太宗、真宗曰《三朝》，仁宗、英宗曰《两朝》，神宗、哲宗、徽宗、钦宗曰《四朝》。虽各自纪事，至于诸志若天文、地理、五行之类，不免烦复。元丰中，《三朝》已就，《两朝》且成，神宗专以付曾巩使合之。巩奏言：“五朝旧史，皆累世公卿、道德文学、朝廷宗工所共准裁，既已勒成大典，岂宜辄议损益。”诏不许，始谋纂定，会以忧去，不克成。其后神、哲，各自为一史，绍兴初，以其是非褒贬皆失实，废不用。淳熙乙巳，迈承乏修史，丙午之冬，成书进御，遂请合九朝为一，寿皇即以见属。尝奏云：“臣所为区区有请者，盖以二百年间典章文物之盛，分见三书，仓卒讨论，不相贯属。及累代臣僚，名声相继，当如前史以子系父之体，类聚归一。若夫制作之事，则已经先正名臣之手，是非褒贬，皆有据依，不容妄加笔削。乞以此奏下之史院，俾后来史官，知所以编缀之意，无或辄将成书擅行删改。”上曰：“如有未稳处，改削无害。”迈既奉诏开院，亦修成三十余卷矣，而有永思攢官才役，才归即去国，尤袤以《高宗皇帝实录》为辞，请权罢史院，于是遂已。祥符中，王旦亦曾修撰两朝史，今不传。

【译文】 本朝的国史共有三部书，太祖、太宗、真宗称《三朝国史》，仁宗、英宗称《四朝国史》。虽然每书各自纪事，至于各志如《天文》、《地理》、《五行》之类，不免烦琐重复。元丰年间，《三朝国史》已经修撰完成，《两朝国史》将要完成，神宗专门将其事交付曾巩令他将二书合而为一。曾巩上奏说：“五朝的旧史，都是累世的公卿，被朝廷视为宗匠的道德文学之士所共同核准裁订，既然已编成了大典，怎么能擅议减损和增益。”朝廷下诏不许这个奏议，才开始策划编订，恰因父母之丧离任，没有完成。以后神宗，哲宗各朝自为一史，绍兴初年，因为这两部史书对是非的褒贬都失实，废弃而不用。淳熙乙巳（1185年）我洪迈任职修史，两午（1186年）的冬天，书成进呈皇帝，于是请求将九朝的国史合而为一，至尊寿皇圣帝即以其事交付给我。曾经上奏说：“臣所作的事小有请求的原因，是因为二百年间典章文物的盛况，分见于三书，匆促讨论研究，前后不相贯通连接。关涉到历代的臣僚，名声相接，应当像以前史书以

儿子系于父亲之下的体例，归类划一。至于说到编写之事，则其书已经经过先代的贤臣名臣之手，是非褒贬，都有依据，不容许胡乱加以笔削。请求将这份奏章颁降到国史院，使以后的史官，知道所以要这样编写接续之意，不要有人总是将编成的书擅自进行删改。”皇上说：“如有未稳妥处，改削也没有害处。”我洪迈既已奉诏开设史院，也修成了三十多卷，而有高宗皇帝永思殡宫的工役，才归朝就离开了京城。尤袤因以修《高宗皇帝实录》为借口，请求暂且停罢国史院，于是此事才终止。大中祥符年间，王旦也曾撰修过《两朝国史》，今已不流传。

银牌使者

【原文】 金国每遣使出外，贵者佩金牌，次佩银牌，俗呼为金牌、银牌郎君。北人以为契丹时如此，牌上若篆字六七，或云阿骨打花押也。殊不知此本中国之制，五代以来，庶事草创，凡乘置奉使于外，但给枢密院牒。国朝太平兴国三年，因李飞雄矫乘厩马，诈称使者，欲作乱，既捕诛之，乃诏自今乘驿者，皆给银牌，国史云始复旧制，然则非起于虏也。端拱二年复诏：“先是驰驿使臣给篆书银牌，自今宜罢之，复给枢密院牒。”

【译文】 金朝每次派遣使者出使国外，尊贵的佩带金牌，次一等的佩带银牌，通常被人们称呼为金牌郎君、银牌郎君。北方人以为契丹统治时期是这样，金银牌上好像篆刻有六七个字，有人说可能是他们的先君阿骨打的花押。殊不知这本是承袭我们汉人的典制，五代以来，大宋国万事都刚刚开始，凡是要派遣出使国外的使者，只给枢密院的公文。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因为李飞雄骗取了车辆马匹，诈称是使者，想入宫作乱，他被捕获诛杀以后，宫廷就下诏说，从现在开始凡是出使在外的使节，全部发给银牌，国史上称这是恢复前代的旧典制。可见金牌、银牌使者的规定不是起源于少数民族。太宗端拱二年（989年）又下诏说：“以前规定出外使节发给刻有篆书的银牌，从现在开始应取消不用，恢复给枢密院的公文。”

省钱百陌

【原文】 用钱为币，本皆足陌。梁武帝时，以铁钱之故，商贾浸以奸诈自

破，岭以东，八十为百，名曰“东钱”；江、郢以上，七十为百，名曰“西钱”；京师以九十为百，名曰“长钱”。大同元年，诏通用足陌，诏下而人不从，钱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为百。唐之盛际，纯用足钱。天监中，以兵乱窘乏，始令以八十五为百。后唐天成，又减其五。汉乾监中，王章为三司使，复减三。皇朝因汉制，其输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然诸州私用，犹有随俗至于四十八钱。太平兴国二年，始诏民间缙钱，定以七十七为百。自是以来，天下承用，公私出纳皆然，故名“省钱”。但数十年来，有所谓“头子钱”，每贯五十六，除中都及军兵俸料外，自余州县官民所当得，其出省每百才得七十一钱四分，其入者每百为八十二钱四分，元无所谓七十七矣。民间所用，多寡又益不均云。

【译文】 用铜钱做货币流通，本来都足够一百文。南朝梁武帝的时候，因铜钱改为铁钱的缘故，商贾便私下作奸行诈自行破坏了一百文的规矩，在萌渚岭以东，以八十文为一百文，起名叫“东钱”；长江、郢以西，以七十文为一百文，起名叫“西钱”；京师以九十文为一百文，起名叫“长钱”。梁武帝大同元年，下诏统一用足数的百文流通，诏书虽然下达，而人们并不实行，钱陌越来越少，到了梁朝末年，最终以三十五文为一百。唐朝兴盛时期，全部通行足一百文的钱。唐哀帝天监年间因战乱而经济困顿，国家开始允许以八十五文为一百文。后唐天成年间又减去了其中五文，后汉高祖刘嵩乾德年间，王章任三司使，又减去了三文。我大宋朝沿袭后汉的制度，向官府交纳的钱，也以八十或八十五文为一百文，然而各州私下使用，还有随当地习俗以四十八文为一百文的。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开始下诏书规定民间流通的货币，全部以七十七文为百文。从这以后，全国承袭沿用，国家和个人支出或收回都使用这个数，所以起名叫“省钱”。但几十年来，有所谓的“头子钱”，每贯五十六文，除了首都以及军队的军饷以外，其余各州县的官吏和百姓应当得到，支出的每百文才得七十一钱四分，收回的每百文得八十二钱四分，本来就没有所谓的七十七文为一百文。民间所用的数目，多少就更不均匀了。

旧官衔冗赘

【原文】 国朝官制，沿晚唐、五代余习，故阶衔失之冗赘，予固已数书之。比得皇监中李端愿所书“雪窦山”三大字，其左云：“镇潼军节度观察留后、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刑部尚书、使持节华州诸军事、华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

柱国。”凡四十一字。自元丰以后，更使名，罢文散阶、检校官、持节、宪衔、勋官，只云“镇潼军承宣使”六字，比旧省去三十五，可谓简要。会稽禹庙有唐天复年越王钱俶所立碑，其全衔九十五字，尤为冗也。

【译文】 本朝的官制，沿用晚唐与五代时期遗留的习惯，所以官阶的名衔失之于烦杂礚礚，我已经写过了。近来得到皇暨年间李端愿所写的“雪窦山”三个大字，三个大字的左侧写道：“镇潼军节度观察留后、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刑部尚书、使持节华州诸军事、华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共四十一个字。自元丰年间以后，更改了使名，停罢了文散官官阶、检校官、持节、宪衔、勋官，只称“镇潼军承宣使”六字。比旧称省去了三十五个字，可以说是简明扼要。会稽庙有后唐天复年间越王钱璘所立的碑，他的官衔全称九十五个字，尤其烦杂。

吏胥侮洗文书

【原文】 郡县胥吏，揩易簿案，乡司尤甚。民已输租税，朱批于户下矣，有所求不遂，复洗去之，邑官不能察，而又督理。比其持赤钞为证，则追逮横费，为害已深。此特小小者耳，台省亦然。予除韩林日，所被告命后拟云：“可特授依前正奉大夫充翰林学士”，盖初书黄时全文，故官告院据以为式，其制当尔。而告身全衔亦云“告正奉大夫充翰林学士”，予以语吏部萧照邻尚书曰：“如此则学士系衔在官下，于故事有戾，今欲书谢表，当如何？”萧悚然。旋遣部主事与告院书吏至，乞借元告以去，明日持来，则已改正，移职居官上，但减一“充”字，于行内微觉疏，其外印文浓淡了无异，其妙至此。

【译文】 郡县里办理文书的小吏，涂改簿册案卷，乡间尤其严重。老百姓本来已经缴纳了租税，在户主名下也用朱笔勾划过了，如果小吏对户主有什么要求没能如愿，便会将朱批的颜色洗掉，地方官看不出来，又要督促这户人家缴租。等到户主持赤钞为证，要求追回被横加多收的资费时，小吏造成的危害已经严重。这还是很小的事，中央六部居然也成了个这样子。我升为翰林学士的时候，被告知的委任状后面写有“可特授依前正奉充翰林学士”字样，委任状最初写在黄纸上的是全文，所以官告院依据最初的状纸签发，这样格式是对的。但在告知我的全部官衔时也写为“告正奉大夫充翰林学士”，我把这个情况讲给吏部尚书萧照邻：“若按这种写法，学士的职衔就到了官衔的下面，这与有关条例是相违背的，现在我想上奏一份谢恩表，您看表上怎样签署我的官衔

呢？”萧照邻听后很害怕，立即派吏部主事和官告院书吏到我这里，乞求把原来的状纸借了回去，第二天又拿了回来，委任状则已改正过了，把学士职衔移到了官衔上面只减去了一个“充”字，字行稍微感到稀疏了一点，其余封面上的印文字迹颜色的浓淡没有一点差别，涂改的巧妙竟到了这种程度。

宣告错误

【原文】 士大夫告命，间有错误，如文官，则犹能自言，书铺亦不敢大有邀索。独右列为可怜，而军伍中出身者尤甚。予检详密院诸房日，有泾原副都军头乞换授，而所持宣内添注“副”字，为房吏所沮，都头者不能自明。两枢密以事见付，予视所添字与正文一体，以白两枢曰：“使诉者为奸，当妄增品级，不应肯以都头而自降为副，其为写宣房之失，无可疑也。”枢以为然，乃为改正。武翼郎李青当磨勘，尚左验其文书，其始为“大李青”，吏以为罔冒，青无词以答。周茂振权尚书，阅其告命十余通，其一告前云“大李青”，而告身误去“大”字，故后者相承，只云“李青”，即日放行迁秩，且给公据付之。两人者几困于吏手，幸而获直。用是以知枉郁不伸者多矣！

【译文】 士大夫的请求报告中，时常出现一些错误，如果是文官，则还能自我辨明，中书省、吏部的房吏也还不敢与他有大为难。唯独武官可怜，下层武夫出身的武官尤其可怜。我任职于检详密院诸房的时候，有一个泾原副都军头请求调换官职，而他的请求报告中添注了一个“副”字，被详密院的房吏卡住了，都头自己解释不明白。两位枢密使把这件事交给我，我看到添加的字与正文是同一种字体，就对两位枢密使说：“如果是申请人做弊，应该是乱增加品级，不可能自己把都头降为副都头，这是起草报告的办公室人员的失误，没什么可怀疑的。”枢密使认为我的判断正确，便为都头纠正调换了官职。武翼郎李青应当考核升级，尚书左丞验收他的请求文书时，发现文书开始称“大李青”，房吏认为李青是冒名顶替，李青回答不上来。周茂振代理吏部尚书，阅读他的请求报告十多篇，其中一篇前面称“大李青”，而报告正文笔误丢掉了“大”字，所以以后各篇都沿袭下来，只称“李青”，当天就放行为李青升迁了俸禄，而且把证明交给他。泾原都头和李青两人都差一点困在房吏手中，侥幸获得了公正解决。由此可见有冤不能伸的该有多少。

军中抵名为官

【原文】 绍兴以来，兵革务烦，军中将校除官者，大帅尽藏其告命，只语以所居官，其有事故亡没者，亦不关申省部除籍，或径以付他人，至或从白身便为郎、大夫者。杨和王为殿帅，罢一统领使归部，而申枢密院云：“此人元姓名曰许超，只是校尉，偶有修武郎李立告，使之鼎名，因得冒转，续以战功积累，今为武显大夫，既已离军，自合依本姓名及元职位。”超诣院诉，而不能为之词。予检详兵房，为言曰：“一时冒与，自是主将之命。修武以前，固非此人当得。若武翼之后，皆用军功，使其战死于阵，则性命须要超承当。今但当克除不应得九官，而理还其余资，庶合人情，于理为顺。”两枢密甚然予说，即奏行之。

【译文】 高宗绍兴年间以来，军事事务烦杂，军队中将校升迁军职，大帅全部把委任状扣压下来，只告诉当事人被委任的官职，因各种事故死亡的，也不向中书省申报除掉死者官籍，有的直接把死者的官职转给别人，甚至出现从一个无功的平民便成为郎、大夫的现象。杨和王做军中殿帅时，罢免一位统领让其回归旧部，向枢密院申报说：“这个人原来的姓名叫许超，只是一个校尉，偶而有一位修武郎名叫李立的请求，让许超顶替他的名字，因此许超得以冒名由校尉转为修武郎，后来因为积累战功屡屡升迁，现任武显大夫，既然已经离开军职，自然应该恢复原来的姓名和职位。”许超到枢密院申诉，院方又不能讲明道理。我任枢密院检详，替许超申张说：“许超一时冒名顶替，这是主将的命令。修武郎以前的官职，本不是他应该得到的。而修武郎以后所升迁的官职，都是因为他立了军功，假如战死在阵地上，那么性命须要许超承当而不是原修武郎李立去死。现在应当扣除他不应得的九种官职，而按理应归还他其余的官职，这才合乎人情，顺乎道理。”两位枢密使很赞同我的说法，立即奏请执行了。

祸福有命

【原文】 秦氏颍国得志，益厉刑辟，以箝制士大夫，一言语之过差，一文词之可议，必起大狱，窜之岭海，于是恶子之无俚者，恃告讦以进。赵超然以“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责汀州，吴仲宝以《夏二子传》流容州，张渊道以《张

和公生日诗》几责柳而幸脱，皆是也。予教授福州日，因访何大圭，忽问：“君识天星乎？”答曰：“未之学。”曰：“岂不能认南方中夏所见列宿乎？”曰：“此却粗识一二。”大圭曰：“君今夕试仰观荧惑何在？”是时正见于南斗之西。后月余再相见，时连旬多阴，所谓火曜，已至斗魁之东矣。大圭曰：“使此星入南斗，自有故事。”予闻其语，固已竦然，明日来相访，曰：“吾曹元不洞晓天文，昨晚叶子廉见顾，言及于此，蹙衲云：‘是名魏星，无人能识，非灾惑也。’”予曰：“十二国星，只在牛、女之下，经星不动，安得转移？”圭曰：“乾象欲示变，何所不可？子廉云，‘后汉建安二十五年亦曾出。’”盖秦正封魏国公，圭意比之曹操。予大骇，不复敢酬应。他日，与谢景思、叶晦叔言之，且曰：“使迈为小人告讦之举，有所不能，万一此段彰露，为之奈何？”谢、叶曰：“可以言命矣！与是人相识，便是不幸，不如静以待之。”时岁在乙巳，又六年，秦亡，予知免祸，乃始不恐。

【译文】 秦桧专权得志，刑法更加严厉，用以箝制士大夫。一句话的差错，一个文词的可议，必定要掀起大的官司，贬窜到两粤之地，于是厌恶君子的无赖之徒，仰仗告发人的阴私得以进用。赵超然因为“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君子的影响，五世而绝）一句话被贬谪汀州，吴仲宝因《夏二子传》被流放到容州，张渊道因《张和公生日诗》几乎被贬谪柳州幸而脱免，都是这方面的例子。我在福州为教授时，因拜访何大圭，他忽然问：“您认识天星吗？”回答说：“没有学过。”他说：“难道不能认识南方仲夏时所出现的各星宿吗？”回答说：“这个却粗略认识一两个。”何大圭说：“您今天晚上试着仰观火星在什么地方？”这时火星正出现在南斗的西侧。一个多月后再次相见，当时连旬多阴天，所谓的火星，已移到斗魁的东侧了。何大圭说：“假使此星进入南斗，自当有先例。”我听了他的话，本来已感恐惧。第二天何大圭来相访，说：“我辈原来不通晓天文，昨晚叶子廉来探访，谈到了这一点，他皱着眉头说：‘那星名叫魏星，没有人能识别它，那不是火星。’”我回答说：“十二国星，仅在牛、女星宿之下，是恒星不移动，怎么能够转移？”何大圭说：“天象打算显示异变，有什么不可以的呢？顾子廉说，‘后汉建安二十五年（220年）也曾出过这种变异’。”大概秦桧正被封为魏国公。何大圭的意思是他比作曹操。我大为惊骇，不再敢酬应回答。过了些日子，与谢景思、叶晦叔谈到了这件事，并且说：“让我洪迈作小人告发他人阴私的举动，是不可能的，万一这段话被张扬出去，该怎么办！”谢和叶说：“可以说天命了。与这样的人相结识，便是不幸，不如静静的等待这件事吧。”当时为乙巳年（1149），又过了六年，秦桧死去，我知道免于祸患了，才开始不恐惧。

真宗北征

【原文】 真宗亲征契丹，幸澶渊，以成却敌之功，是时景德元年甲辰，决此计者，寇莱公也。然前五岁，当咸平二年己亥，契丹寇北边，上自将御之，至澶州、大名府，闻范廷召破虏于莫州北，乃还京。时张文定公、李文靖公为相，不知何人赞此决，而后来不传。用是以知真宗非宴安鸩毒而有所畏者，故寇公易以进言。

【译文】 真宗亲自征伐契丹，来到澶渊，以促成击退敌人的大功，这一年是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甲辰，定下这一策略的是寇准。然而五年前，即咸平二年（999年）己亥，契丹进犯我国北部边疆，真宗亲自帅军征讨，来到澶州、大名府，听说范廷召在莫州击破了敌人，于是就返回京城开封了。那时候张文定公、李文靖公任宰相，不知道是谁定下让真宗御驾亲征的计策，后来没流传下来。由此可知真宗并不是贪图一时安乐而害怕敌人的人，所以寇准才容易向他进关于御驾亲征的衷言。

宰相不次补

【原文】 景德元年七月，宰相李沆薨，时无他相，中书有参知政事王旦、王钦若，不次补。寇准为三司使，真宗欲相之，患其素刚，难独任，乃先以翰林侍读学士毕士安为参政，才一月，并命士安、准为相，而士安居上。旦、钦若各迁官而已。准在太宗朝已两为执政，今士安乃由侍从超用，惟辟作福，图任大臣，盖不应循循历阶而升也。

【译文】 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七月，宰相李沆去世，当时没有其他宰相，中书省有参知政事王旦、王钦若，不按官位次序增补。寇准当时任三司使，宋真宗想任他为宰相，又担心他性情刚直，难以独自胜任，就先以翰林侍读学士毕士安为参知政事，才过一个月，同时任命毕士安、寇准为宰相，且毕士安在寇准之上。王旦、王钦若各自升迁调换了一下职务而已。寇准在太宗时期已两次任宰相，现在毕士安却由侍从的身份被破格任用，只有君主可以作福，任用大臣，不必遵循一层一层的官阶而逐步升迁。

外制之难

【原文】 中书舍人所承受词头，自唐至本朝，皆只就省中起草付吏，逮于告命之成，皆未尝越日，故其职为难。其以敏捷称者，如韦承庆下笔辄成，未尝起草，陆祜初无思虑，挥翰如飞，颜荛草制数十，无妨谈笑，郑畋动无滞思，同僚阁笔，刘敞临出局，倚马一挥九制，皆见书于史策。其迟钝窘扰者，如陆余庆至晚不能裁一言，和祜闭户精思，遍讨群籍，与夫“斫窗舍人”、“紫微失却张君房”之类，盖以必欲速成故也。周广顺初，中书舍人刘涛责授少府少监，分司西京，坐遣男頊代草制词也。頊时为监察御史，亦责复州司户。自南渡以来，典故散失，每除书之下，先以省袂授之，而续给告，以是迁延稽滞。段拂居官时，才还家即掩关谢客，畏其趣词命也。先公使虜归，除徽猷阁直学士，时刘才邵当制，日于漏舍嘱之，至先公出知饶州，几将一月，犹未受告。其他倩诱朋旧，俾之假手者多矣。故膺此选者，不觉其难，殊与昔异。

【译文】 中书舍人所承接的告命词头，从唐代到本朝，都只在省中起草交付有关官吏，及至告命的完成，都未曾超过一天，所以这个职务很难担任。中书舍人以敏捷著称的，如韦承庆下笔立刻完成，未曾起过草稿；陆 开始并没有思索考虑，挥笔像飞一样；颜荛草拟制书数十通，不妨碍言谈说笑；郑畋动笔就没有滞碍思路，使同僚为之搁笔；刘敞临要出局回家，靠着马一挥而写成九道制书，都见记载于史书。中书舍人迟钝窘迫纷乱的，如陆余庆从早到晚都不能裁决一句话；和祜闭门精思，编索群书，“与斫窗舍人杨滔”，“紫微失却张君房”（皇帝失去了张君房）之类的文句，大概是因为一定想迅速完成的缘故。后周广顺初年，中书舍人刘涛贬授为少府少监，分管西京，就是犯有派儿子刘頊代为拟制词的罪。刘頊当时为监察御史，也贬授为复州司户。自南渡长江以来，典章故事散失，每次有任命书下达，首先用中书省殓子授给他，而接着给官告，这样便迁延停滞。段拂为官之时，才回家就关起门来谢绝会见客人，怕他们催促词头和告命。先父出使北方归来，授予徽猷阁直学士，当时是刘才邵当值草制，先父每天在漏舍叮嘱他早点撰写，但到先父出为饶州知州，几乎将近一个月，仍未得到告命。其他雇用或推托给亲朋故旧，使他们帮忙的多了。所以荣膺这一选官的，不觉得它难，与过去大不一样了。

文臣换武使

【原文】 祖宗之世，文臣换授武使，皆不越级。钱若水自枢密副使罢守工部侍郎，后除帅并州，乃换邓州观察使。王嗣宗以中丞、侍郎，李士衡以三司使，李维以尚书，王素以端明左丞，亦皆观察。庆历初，以陕西四帅方御夏、羌，欲优其俸赐，故韩琦、范仲淹、王沿、庞籍皆以枢密、龙图直学士换为廉车。自南渡以来，始大不然。张澄以端明学士，杨炎以敷文学士，便为节度。近者赵师夔、吴玕以待制而换承宣使，不数月间遇恩，即建节钺。师揆、师垂以秘阁修撰换观察使，皆度越彝宪，诚异恩也。

【译文】 北宋各朝，文臣调任武官时，一般都不提升级别。钱若水从枢密副使调任工部侍郎，后来出任并州知州，改换武官为邓州观察使。王嗣宗以中书省右丞、侍郎的身份，李士衡以三司使的身份，李维以尚书身份，王素以端明殿左丞身份，也都调任武官为观察使。仁宗庆历初年，因为陕西四位将帅正在防御西夏和羌人，皇上想赐给他们优厚的俸禄，所以韩琦、范仲淹、王沿、庞籍都以枢密使、龙图阁直学士的身份改为廉车。自从南渡以来，开始大不一样了。张澄以端明殿学士的身份，杨炎以敷文学士的身份，调任武官为节度使。近来像赵师夔、吴玕从待制改任承宣使，没过几个月遇到皇恩，荣建节钺。师揆、师垂以秘书阁修撰调为观察使，全都是超越正常规定，确实是承蒙了特殊恩泽。

卷 五

舜事瞽叟

【原文】 《孟子》之书，上配《论语》，唯记舜事多误，故自国朝以来，司马公、李泰伯及吕南公皆有疑非之说。其最大者，证万章涂凜、浚井、象入舜官之问以为然也。《孟子》既云尧使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仓廩备，以事舜于畎亩之中。则井、廩贱役，岂不能使一夫任其事？尧为天子，象一民耳，处心积虑杀兄而据其妻，是为公朝无复有纪纲法制矣！六艺折中于天子，四岳之荐舜，固曰：“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 义，不格奸。”然则尧毋试舜之时，顽傲者皆已格义矣。舜履位之后，命禹征有苗，益曰：“帝初于历山，往于田，日号泣于柴天，于父母，负罪引慝，祇载见瞽叟，夔夔齐栗，瞽亦允若。”既言允若，岂得复有杀之之意乎？司马公亦引九男、百官之语，之对，而不及益赞禹之辞，故详叙之以示子侄辈。若司马迁《史记》、刘向《列女传》所载，盖相承而不察耳。至于桃应有瞽叟杀人之问，虽曰设疑似而请，然亦可谓无稽之言。孟子拒而不答可也，顾再三为之辞，宜其起后学之感。

【译文】 《孟子》一书，上可以和《论语》相匹配，只是记载虞舜的事情多有错误，因此自我朝以来，司马光、李觏以及吕南公都有怀疑非难的说法。其中最主要的是，孟子证明他的弟子万章疑问舜曾经修理过粮仓、挖过井、舜的异母弟弟象曾占据舜的后宫等真有其事。《孟子》既然亲自说过尧曾经使自己的九个儿子来服事舜，把二个女儿嫁给舜，百官牛羊仓廩也都具备了，用来服事舜于田地之间。那么挖井、修理粮仓这样下贱的劳动，怎么就不能让一个位农夫去做呢？尧当天子时，象不过是一个平民百姓，他千方百计要杀死哥哥舜而占据他的妻子，真是公庭之上没有纲纪法制了！《诗》、《书》、《礼》、《乐》、《春秋》六艺的道义由孔子确立，四方部落首领推荐舜，本来就说过：“舜是瞽叟的儿子。他的父亲很愚蠢，母亲很奸诈，弟弟象很傲狠，舜能克制自己调和矛盾以尽孝道，家庭内部十分安定和睦，又能限制邪恶。”那么尧试用舜的时候，舜的父亲和弟弟象已经变好了。舜即帝位以后，命令禹去征伐有苗，益说：“帝舜当初在历山时，到田地里去，每日对天号啕痛哭，求救于父母，他父母负罪隐

藏起来，舜恭敬地再去见他父亲瞽叟，对此表示非常恐惧敬谨，瞽叟也表示平和。”既然说平和，怎么还会有再杀舜的意思呢？司马光也引用了九男、百官的话头，以及和睦的回答，只是不提益赞美禹的话，所以详细加以叙述以给子侄这辈人看。如司马迁的《史记》、刘向的《列女传》所记载舜的事，大概都是承袭《孟子》的话而没有详审吧。至于桃应问瞽叟杀人的话，虽然说是疑似之辞，也可以说是无稽之谈。孟子拒绝回答他的问题是可以的，却再三为他辩解，这样就会引起后辈学生的感触了。

孔子正名

【原文】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子之迂也！奚其正？”夫子责数之以为“野”。盖是时夫子在卫，当辄为君之际，留连最久，以其拒父而窃位，故欲正之，此意明白。然子欲适晋，闻其杀鸣犊，临河而还，谓其无罪而杀士也。里名胜母，曾子不入，邑称朝歌，墨子回车，邑里之名不善，两贤去之，安有命世圣人，而肯居无父之国，事不孝之君哉？是可知已！夫子所过者化，不令而行，不言而信，卫、辄待以为政，当非下愚而不移者。苟其用我，必将导之以天理，而趣反其真，所谓命驾虚左而迎其父不难也。则其有补于名义，岂不大哉！为是故不忍亟去以须之。既不吾用，于是慨然反鲁，则辄之冥顽悖乱，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矣！子路曾不能详味圣言，执迷不悟，竟于身死其难。惜哉！

【译文】 子路对孔子说：“假如卫出公辄等待您去治理国政，您准备首先干什么事情？”孔子道：“那一定是纠正名分上不当的现象啦！”子路道：“您竟迂阔到如此地步了！这有什么纠正的必要呢？”孔夫子责备数落子路认为他太“卤莽”。那时孔夫子在卫国，当辄为卫国国君之时，留恋在卫国最久，因为辄拒纳其父蒯聩回国而占据君位，所以孔夫子想纠正这种名分不当的现象，这里的意思是很明白的。但孔子想到晋国去，听说晋国的赵简子杀死了鸣犊，到了黄河边就返回来了，声称晋国杀死了无罪的贤大夫。里名有叫胜母的，因其名不顺，曾参拒不进入该里，邑名叫作朝歌，因为不合时宜，墨翟坐着车又回来了。因为邑里的名字不美，两位贤人都不去那里，为什么闻名于世的圣人孔子，竟肯居住在不要父亲的国家里，服事不孝的国君呢？这是可以知道的了！孔夫子所过之处，百姓都得到了感化，没有命令就可以执行，不用言语就可以得到信任，卫出公辄等待孔子执政，应该不是不可改变的下愚之辈。假如卫出公辄

用我的话，我必将用天理启发他，用行动反其本真，命人驾车空着左边的位置前往迎接他父亲蒯聩并不是难事。如果这样做就可以挽回道义，岂不是一件伟大的事业吗？为此不忍心急切离去等待着。既然不用我，于是再慷慨离开卫国返回鲁国。而卫出公辄的愚昧无知狂悖忤逆，就不能逃脱于天地之间了！子路不能详细玩味孔夫子的圣言，执迷不悟，最终在卫国以身殉难。可惜呀！

永兴天书

【原文】 大中祥符天书之事，起于佞臣，固无足言。而寇莱公在永兴军，信朱能之诈，亦为此举，以得召入，再登相位，驯致雷州之祸，凤德之衰，实为可惜！而《天禧实录》所载云：“周怀政与妖人朱能辈伪造灵命，冀图恩宠，且日进药饵。宰相王钦若屡言其妄，复密陈规谏。怀政惧得罪，因共诬譖，言：‘捕获道士谯文易，蓄禁书，有神术，钦若素识之。’故罢相也。”朱能之事，钦若欲以沮寇公之入则有之，谓其陈规谏，当大不然。倘非出于寇，则钦若已攘臂其间矣。《实录》盖钦若提举日所进，是以溢美，岂能弭后人公议哉！

【译文】 真宗大中祥符年间，所谓的天书事件，起始于花言巧语谄媚的臣子，本来不足以称道。而寇准在永兴军做官时，听信朱能的欺骗，也参加了此事，因此得以被召入京师，进而登上宰相的位置，逐渐导致被贬雷州的灾祸，德行名望的损失，实在可惜！而《天禧实录》记载说：“周怀政与邪恶之人朱能辈伪造了这个灵命，希图得到皇上的恩宠，并且每天向皇上进献药物。宰相王钦若屡次向皇上进言指出其虚假，又秘密陈述自己的劝诫。周怀政害怕因此而获罪，所以和朱能共同进献谗言，说：‘捕获道士谯文易，蓄藏禁书，有灵验法术，王钦若素来与他相识。’因此王钦若被罢去相位。”朱能的事，王钦若想借此阻止寇准入相则是有的，说他向皇上陈述劝诫，就肯定不是这样。如果不是出于寇准的原因，那么王钦若肯定也跃跃欲试加入其中了。《天禧实录》是王钦若担任提举时所进献的，是为溢美之词，怎能消除后人的公议呢！

王哀嵇绍

【原文】 舜之罪也殛鲧，其举也兴禹。鲧之罪足以死，舜徇天下之公议以诛之，故禹不敢怨，而终治水之功，以盖父之恶。魏王哀、嵇绍，其父死于非

命。袁之父仪，犹以为司马昭安东司马之故，因语言受害，袁为之终身不西向而坐。绍之父康以魏臣，钟会谮之于昭，昭方谋篡魏，阴忌之，以故而及诛。绍乃仕于晋武之世，至为惠帝尽节而死。绍之事亲，视王袁远矣！温公《通鉴》，犹取其荡阴之忠，盖不足道也。

【译文】 舜因鲧有罪而杀了他，进而却举荐了鲧的儿子禹。鲧的罪行足够构成死罪，舜顺从天下的公议而杀鲧，所以禹不敢怨恨，终因治水有功，来掩盖他父亲的罪恶。魏国的王袁、嵇绍，他们的父亲都死于意外的灾祸。王袁的父亲王仪，就因为做了司马昭安东司马的缘故，因为言语而受到杀害，王袁为此终身不向西坐以示不臣于晋朝。嵇绍的父亲嵇康为魏国的臣子，钟会进谗言于司马昭，司马昭当时正谋划篡夺魏国，暗地里忌恨他，因此借故杀了他。嵇绍却在晋武帝的时候做了官，甚至为晋惠帝尽臣子的节操而死。嵇绍侍奉他父亲，比王袁差远了！司马光作《通鉴》时，只取嵇绍在汤阴的忠节，是不足称道的。

张咏传

【原文】 张忠定公咏，为一代伟人，而治蜀之绩尤为超卓，然《实录》所载，了不及之，但云“出知益州，就加兵部郎中，入为户部。后马知节自益徙延，难其代。朝廷以咏前在蜀，寇攘之后，安集有劳，为政明肃，远民便之，故特命再任”而已。国史本传略同，而增书促招安使上官正出兵一事。皆诋其知陈州营产业，且与周渭、梁鼎辈五人同传，殊失之也。韩魏公作公神道碑云：“公以魁奇豪杰之才，逢时自奋，智略神出，勋业赫赫，震暴当世，诚一世伟人。”道州所刻帖，有公与潭牧书一纸，王荆公跋其后云：“忠定公歿久矣，而士大夫至今称之，岂不以刚毅正直有劳于世若公者少欤？”文潞公云：“予尝守蜀，睹忠定之像，遗爱在民，钦服已甚。”黄诰云：“公风烈如此，而不至于宰相，然有忠定之才，而无宰相之位，于公何损？有宰相之位，而无忠定之才，于宰相何益？公虽老死，安肯以此易彼哉！”观四人之言，史氏发潜德之幽光，为有负矣。

【译文】 张忠定公张咏，是一代称颂的伟大人物，而他治理蜀地的成绩尤其卓绝超群。然而《实录》所记载，却一点也没有谈到，只是说“出京为益州知州，即加官兵部郎中，入朝为户部使。后来马知节从益州迁官延州，难找可接替他的人，朝廷因为张咏以前在蜀地，攻劫抢掠之后，张咏安集百姓有劳绩，

为政清明端严，边远的百姓感到便利，所以特别令他再任”罢了。国史的张咏本传所记与此大略相同，而增写了督促招安使上官正出兵一件事。都诋毁他为陈州知州时营建家产的事，并且让他与周谓、梁鼎之类五个人同在一传，是很大的失误。韩魏公（韩琦）所作张咏的神道碑说：“张公的杰出卓越的才干，遇到时机就自己振奋，机智的谋略神奇而出，功业赫然，震动显示于当代，真是一代之中的伟大人物。道州所刊刻的法贴，有张咏给潭牧写的一张纸，王荆公（安石）在其后题跋说：“张忠定公去世已很久了，而士大夫到今天仍称道他，难道不是因为像他那样刚毅正直有功劳于当世的人太少了吗？”文潞公（文彦博）说：“我曾在蜀地为州郡长官，目睹张忠定公的像，仁爱的恩德仍在民间，甚为钦佩。”黄诰说：“张公的遗风余烈如此，而没有官至宰相，然而有忠定公的才干，而没有宰相的地位，于他又有什么损失呢？有宰相的地位，而没有忠定公的才干，于宰相又有什么好处呢？张公虽老死乡里，又怎么肯以此易彼呢！”看这四个人的言论，史家发扬潜在美德的幽深之光，是有欠缺的。

绯紫假服

【原文】 唐宣宗重惜服章，牛丛自司勋员外郎为睦州刺史，上赐之紫，丛既谢，前言曰：“臣所服绯，刺史所借也。”上遽曰：“且赐绯。”然则唐制借服色得于君前服之，国朝之制，到阙则不许。乾道二年，予以起居舍人侍立，见浙西提刑姚宪入对，紫袍金鱼。既退，一辇门吏踵其后囁嚅。后两日，宪辞归平江，乃绯袍。予疑焉，以问知辇曾祫曰：“闻临安守与本路监司皆许服所借，而宪昨紫今绯，何也？”祫曰：“监司惟置局在辇下则许服，漕臣是也；若外郡则否，前日姚误紫，而谒吏不告，已申其罚，且备牒使知之，故今日只本色以入。”姚盖失于审也，然考功格令既不颁于外，亦自难晓。文惠公知徽州日，借紫，及除江东提举常平，告身不借。予闻尝借者当如旧，与郎官薛良朋言之，于是给公据改借。后于江西见转运判官张坚衣绯，张尝知泉州，紫袍矣，予举前说，张欣然即以申考功，已而部符下不许，扣其故，曰：“唯知州借紫而就除本路，虽运判、提举皆得如初，若他路则不可。”竟不知法如何该说也。若曾因知州府借紫，而后知军州，其服亦借，不以本路他路也。近吴镒以知郴州除提举湖南茶盐，遂仍借紫，正用前比云。

【译文】 唐宣宗珍视按身份等级来着装的服饰制度，牛丛自司勋员外郎调为睦州刺史时，皇上赐给他一套紫服，牛丛已经谢过恩了，又上前对皇上说：

“臣所穿的大红色朝服，是刺史官可以暂穿的。”皇上急忙说：“姑且把这件大红色朝服赐给你。”那么按照唐代服饰制度，借服色可以在皇上面前穿，我朝的服制，在朝堂上则不许穿。孝宗乾道二年（1166年），我任起居舍人侍立在朝堂上，看见浙西路提点刑狱姚宪入朝问对，穿着绣有金鱼的紫袍朝服。退朝之后，官署门吏跟着他窃窃私语。过了两天，姚宪辞别皇上回归平江，却穿着大红色朝服。我产生了疑问，就问主持官署的曾觌说：“听说临安知府和本路监司都允许穿所借色的朝服，而姚宪昨天穿紫袍今天穿大红袍子，是什么原因呢？”曾回答说：“监司仅在京都设置的机关允许穿，转运使就是这样；如果在外郡就不能穿。前天姚宪误穿紫服，而引见谒吏没有告诉他，已经决定要处罚他，并且已备好公文使他知道，所以今天姚宪只穿他本来的大红色朝服进入朝堂。”姚宪大概有点欠考虑，然而考察官吏功过的标准既不颁布于外面，自己也难以知晓。先兄文惠公出任徽州知州时，穿借紫朝服，到了任江东提举常平时，告身不借。我听说曾经借服色的人当和以往一样，我与郎官薛良朋谈过这件事，于是给他凭据改借。后来我在江西路看见转运判官张坚穿着大红色朝服，张坚曾经做过泉州知州，那时他穿的是紫袍，我与他列举以前的说法，张坚欣然同意立即申报他的功绩，旋即主管部门下了命令不加批准，推敲其原因，说：“除知州借紫服而在本路任职的，虽然是转运判官、提举官都得和以前一样，如果任命为其他路官员就不行了。”这样竟然不知道服制该怎么说才算对了。如果曾经因为知州、知府借紫服，而后知军、州时，他的朝服也可以借，就不应该分本路他路了。近来吴镒以郴州知州被任命为提举湖南茶盐，于是仍然可以借紫服，正是按以前旧例办的。

枢密名称更易

【原文】 国朝枢密之名，其长为使，则其贰为副使；其长为知院，则其贰为同知院。如柴禹锡知院，向敏中同知，及曹彬为使，则敏中改副使。王继英知院，王旦同知，继冯拯、陈尧叟亦同知、及继英为使，拯、尧叟乃改签书院事，而恩例同副使。王钦若、陈尧叟知院，马知节签书，及王、陈为使，知节迁副使，其后知节知院，则任中正、周起同知。惟熙宁初，文彦博、吕公弼已为使，陈升之过阙，留，王安石以升之曾再入枢府，遂除知院。知院与使并置，非故事也，安石之意以沮彦博耳。绍兴以来，唯韩世忠、张俊为使，岳飞为副使。此后除使固多，而其贰只为同知，亦非故事也。又使班视宰相，而乾道职

制杂压，令副使反在同知院之下，尤为未然。

【译文】 本朝枢密官的名称，其正职为枢密使，其副职则为枢密副使；其正职为枢密知院，其副职则为枢密同知院。如柴禹锡为知院，向敏中为同知院，到曹彬为枢密使，向敏中则改为枢密副使。王继英为知院，王旦为同知院，继而冯拯、陈尧叟也为同知院，到王继英为枢密使，冯拯、陈尧叟就改为签书院事，而所享恩惠之例与枢密副使相同。王钦若、陈尧叟为知院，马知节为签书院事，到王钦若、陈尧叟为枢密使，马知节迁任枢密副使，这以后马知节为知院，任中正、周起就为同知院，只有熙宁初年，文彦博、吕公弼己为枢密使，而陈升之路过京城，留在朝庭，王安石因陈升之曾再次进入枢密院，于是除拜知院。枢密知院和枢密使同时设置，不是旧有的制度，王安石的用意在于牵制文彦博。绍兴年间以来，唯有韩世忠、张俊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这以后拜除枢密使固然多，而其副职只为同知，这也不是旧有的制度。还有枢密使班次视同宰相，而乾道年间职官制度杂乱重叠，让枢密副使反在同知院之下，尤其是不能这样。

过称官品

【原文】 士大夫僭妄相尊，日以益甚。予向昔所记文官学士、武官大夫之谚，今又不然。《天圣》职制：内外文武官不得容人过称官品，诸节度、观察，虽检校官未至太傅者许称太傅；防御使至横行使，许称太保；诸司使许称司徒；幕职官等称本官；录事参军称都曹；县令称长官；判司、簿、尉许称评事。其太傅、太保、司徒皆一时本等检校所带之官也。自后法令不复有此一项，以是其风愈炽，不容整革矣。

【译文】 士大夫超越本分妄自相尊、日益过分。我过去所记文官学士、武官大夫的谚语，今天又不是这样了。仁宗《天圣格》关于官职的制度是：内外文武官员不得容人夸张称呼官品，诸如节度使、观察使，虽然是察核官员未到太傅的人，允许称为太傅；防御使到横行使，允许称为太保；诸司使的官员允许称为司徒；地方军政大吏幕府中的官员等可称本官；录事参军可称都曹；县令可称长官；判司、簿、尉允许称评事。其中太傅、太保、司徒都是一时本等级检校官员所带的荣衔。自此以后，不再有此项制度。所以此风愈来愈盛，难以整改。

仁宗立嗣

【原文】 东坡作《范蜀公墓志》，云：“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继嗣，嘉盥初得疾，中外危恐。公独上疏乞择宗室贤者，异其礼物，以系天下心。”凡章十九上。至元盥初，韩维上言，谓其首开建储之议，其后大臣乃继有论奏。《司马温公行状》云：“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国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惟谏官范镇首发其议，光时为并州通判，闻而继之。”按至和三年九月，改为嘉盥元年，岁在丁酉。而前此皇盥五年甲午，有建州人太常博士张述者，以继嗣未立，上疏曰：“陛下春秋四十四，宗庙社稷之继，未有托焉。以嫌疑而不决，非孝也；群臣以讳避而不言，非忠也。愿择宗亲才而贤者，异其礼秩，试以职务，俾内外知圣心有所属。”至和二年丙申，复言之。前后凡七疏，最后语尤激切。盖述所论乃在两公之前，而当时及后来莫有知之者，为可惜也！

【译文】 苏东坡所作《范蜀公墓志》说：“仁宗即位三十五年以来，没有子嗣继位，嘉盥初年得了疾病，朝廷内外惊恐不安。先生独自上疏皇上乞请选择宗室中的贤人，用特殊的礼仪物品来扶助他，以此来联结天下人心。”他先后共上了十九次奏章。到哲宗元盥初年，韩维向皇上进言，说他首先提出置立储君的建议，此后大臣才继续有所论奏。《司马温公行状》说：“仁宗至和三年（1056年），仁宗皇帝开始感到身体不适，当时储君没有确立，天下恐惧而又不肯言语，仅有谏官范镇首先倡议，司马光当时为并州通判，听到范镇的建议后起而响应，也奏请置立储君。”按仁宗至和三年九月，改为嘉盥元年了，这一年为丁酉年。而以前仁宗皇盥五年（1053年）甲午，就有建州人太常博士张述，因皇嗣没有确立，就上疏说：“陛下年纪四十四岁了。国家继承人的问题，尚未有寄托。因嫌疑而犹豫不决，这不是孝道；群臣因忌讳避而不谈这个问题，这不是忠臣。请在皇室宗亲中选择有才能和贤良的人，特殊给以礼仪品秩，给以职务来试用他，使内外士人知道皇上的心思有所归属。”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丙申，张述就立储君问题再次上言。前后共七次上疏。最后一次上疏言词尤其尖锐激烈。推究张述的议论却在范镇、司马光二人之前，而当时以及后来都没有人知道他的上疏，很可惜呀！

郎官员数

【原文】 绍熙四年冬，客从中都来，持所抄《班朝录》一编相示，盖朝士官职姓名也。读至尚书郎，才有正员四人，其他权摄者亦只六七人耳。因记绍兴二十九年，予为吏、礼部时，同舍郎二十人，皆正官。今既限以曾历监司、郡守，故任馆职及寺监、丞者不可进步，其自外召用者，资级已高，曾不数月，必序迁卿、少，以是居之者益少。政和末，郎员冗溢，至于五十有五，侍御史张朴上殿，徽宗谕使论列，退而奏疏，劾十有六人，大略云：“才品甚下，趋操卑污，有如汪师心者；性资茸，柔佞取容，有如黄愿、汪希旦者；浅浮躁妄，为胥辈所轻，有如李庄者；轻喧嚣，漫不省职，有如李扬者；粗冗不才，褊忿轻发，有如成者；人才碌碌，初无可取，有如张高者；志气衰落，难与任事，有如常环者；大言无当，诞诡不情，有如梁子诲者；资望太轻，士论不厌，有如叶椿、唐作求、吴直夫、章芹、李与权、王良钦、强休甫者。乞行罢斥。”从之。考一时标榜，未必尽当，然十六人者后皆不显，视今日员数，多寡不侔如是。秦桧居相位久，不欲士大夫在朝，末年尤甚。二十四司独刑部有孙敏修一员，余皆兼摄，吏部七司至全付主管告院张云，兵、工八司，并于一寺主簿。又可怪也！

【译文】 绍熙四年（1193年）冬天，有客人从都中来，手持所钞《班朝录》一书给我看，那是在朝士大夫的官职和姓名。读到尚书郎，才有正式官员四人，其他权摄的也只有六七个人而已。因而记起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我为吏部郎中兼礼部郎中时，同官舍的郎官二十人，都是正式官员。现在既限制以曾历官监司、郡守，所以任馆职和寺监、丞的不可能进阶一步，那些从外地召来任用的人，官资级别已高，用不了几个月，必然按顺次迁官为卿或少卿，因此居于郎官的人更加减少。政和末年，郎官的人数过分冗乱，甚至有五十五人之多。侍御史张朴上殿，徽宗谕旨使他论列其事，他退朝后上疏，奏劾十六人，大略说：“人才品格甚为低下，操守卑鄙肮脏，有如汪师心这样的人；生性资质微贱，柔媚巧语取悦于人，有如黄愿、汪希旦这样的人；浅薄轻佻狂妄，为胥吏之辈所轻视，有如李庄这样的人，轻脱张狂，散漫不懂得职守，有如李扬这样的人；粗俗没有才干，心地狭小轻举妄动，有如成玘这样的人；人才凡庸，本来就没有可取之处，有如张高这样的人；志气衰落，难以任职，有如常环这样的人；好说大话并不感到不恰当，荒诞欺诈并不感到难为情，有如梁子诲这样

的人；资历人望太轻，士大夫舆论大为不满，有如叶椿、唐作求、吴直夫、章芹、李与权、王良钦，强休甫这样的人。请求罢免贬斥他们。”朝廷听从。考核一时所表彰的，未必都妥当，然而这十六个人后来全都没有显达，对比今天的郎官员数，多少就是如此的不相等。秦桧长久居于宰相之位，他不希望士大夫在朝廷，晚年尤其严重。在尚书省所属的二十四个机构中只有刑部有孙敏修一员正职，其他官员都是兼摄，吏部所属七个机构全交由官告院的张云主管，兵部、工部所属八个机构，合并于一个寺的主簿。又是可怪之事。

东坡慕乐天

【原文】 苏公责居黄州，始自称东坡居士。详考其意，盖专慕白乐天而然。白公有《东坡种花》二诗云：“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又云：“东坡春向暮，树木今何如？”又有《步东坡》诗云：“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又有《别东坡花树》诗云：“何处殷勤重回首？东坡桃李种新成。”皆为忠州刺史时所作也。苏公在黄，正与白公忠州相似，因忆苏诗，如《赠写真李道士》云：“他时要指集贤人，知是香山老居士。”《赠善相程杰》云：“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送程懿叔》云：“我甚似乐天，但无素与蛮。”《入侍迓英》云：“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而跋曰：“乐天自江州司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诰，遂拜中书舍人。某虽不敢自比，然谪居黄州，起知文登，召为仪曹，遂忝侍从。出处老少，大略相似，庶几复享晚节闲适之乐。”《去杭州》云：“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较前贤。”序曰：“平生自觉老少粗似乐天。”则公之所以景仰者，不止一再言之，非东坡之名偶尔暗合也。

【译文】 苏轼贬居黄州，开始自称为东坡居士。详细考察他的意思，则是专门仰慕白乐天（白居易）而如此的。白乐天有《东坡种花》两首诗说：“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拿着钱买花草树木，往城东坡上栽种）。”又说：“东坡春向暮，树木今何如（城东坡上的春天已接近暮春，那里的花草树木如今怎样了呢）？”又有《步东坡》一诗说：“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早上在东坡漫步，晚上在东坡漫步。东坡有什么可爱的呢？爱这里新长成的树）。”又有《别东坡花树》一诗说：“何处殷勤重回首？东坡桃李种新成（什么地方情绪高涨频频回首？东坡栽种的桃李新长成）。”这些诗都是白乐天为忠州刺史时所作。苏公在黄州，正与白乐天在忠州时的境况相似。于是回忆苏

公的诗，如《赠写真李道士》说：“他时要指集贤人，知是香山老居士（以后要是指说集贤殿的人，知道是香山老居士）。 ”《赠善相程洁》一诗说：“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我好像白乐天您要记住，满头白发赏遍洛阳的春色）。 ”《送程懿叔》一诗说：“我甚似乐天，但无素与蛮（我特别像白乐天，但没有歌伎樊素和小蛮）。 ”《入侍迓英》一诗说：“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肯定像白香山老居士，与人世的缘分终究是浅而为佛道的根子却很深）。 ”而他写的跋语说：“白乐天从江州司马授官为忠州刺史，不久以主客郎中知制诰，于是拜授为中书舍人。我苏某虽不敢与白乐天自比，然而贬居黄州，起用为登州知州，召入朝为礼部郎中，于是忝列为侍从官。进退的大小，大略相似，期望再享晚节安闲适逸之乐。 ”《去杭州》一诗说：“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较前贤（进退仿佛像白乐天，岂敢将我的衰朽之身与前贤比较）。 ”这首诗的序说：“平生自觉进退的情况粗略似白乐天。 ”则苏轼之所以景仰白乐天，不止是一再谈到，并不是东坡的名字偶然与白乐天的事暗中相合。

缚鸡行

【原文】 老杜《缚鸡行》一篇云：“小奴缚鸡向市卖，鸡被缚急相喧争。家中厌鸡食虫蚁，不知鸡卖还遭烹。虫鸡于人何厚薄？吾叱奴儿解其缚。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此诗自是一段好议论，至结句之妙，非他人所能及也。予友李德远尝赋《东西船行》，全拟其意。举以相示云：“东船得风帆席高，千里瞬息轻鸿毛。西船见笑苦迟钝，汗流撑折百张篙。明日风翻波浪异，西笑东船却如此。东西相笑无已时，我但行藏任天理。”是时，德远诵至三过，颇自喜，予曰：“语意绝工。几于得夺胎法，只恐行藏任理与注目寒江之句，似不可同日语。”德远以为知言，锐欲易之，终不能满意也。

【译文】 杜甫先生《缚鸡行》一篇诗说：“小奴缚鸡向市卖，鸡被缚急相喧争。家中厌鸡食虫蚁，不知鸡卖还遭烹。虫鸡于人何厚薄？吾叱奴儿解其缚。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这首诗自然是一段很好的议论，在结构上的巧妙，是他人所不能达到的。我的朋友李德远曾经写过《东西船行》的诗，完全模仿《缚鸡行》的意思而作。拿出来给人看，诗为：“东船得风帆席高，千里瞬息轻鸿毛。西船见笑苦迟钝，汗流撑折百张篙。明日风翻波浪异，西笑东船却如此。东西相笑无已时，我但行藏任天理。”当时，李德远朗诵了三遍，颇为自得，我说：“语意绝对工巧，几乎达到脱胎换骨的境地，只是行藏任理之句与

注目寒江之句，似不能相提并论。”李德远认为这话很有见识。一心想改换这句话，终究不能满意。

油污衣诗

【原文】 予甫十岁时，过衢州白沙渡，见岸上酒店败壁间，有题诗两绝，其名曰《犬落水》、《油污衣》。《犬》诗太俗不足传，独后一篇殊有理致。其词云：“一点清油污白衣，斑斑驳驳使人疑。纵饶洗遍千江水，争似当初不污时。”是时甚爱其语，今六十余年，尚历历不忘，漫志于此。

【译文】 我刚十岁的时候，经过衢州的白沙渡，看到岸上酒店破败的墙壁间，有题写的两首绝句，它们的题名叫《犬落水》和《油污衣》。《犬落水》一诗太俚俗不足以传抄，独后面一首很有理致。这首诗写道：“一点清油污白衣，斑斑驳驳使人疑。纵饶洗遍千江水，争似当初不污时（一滴清油弄污了白衣，斑点相杂使人虑疑。纵使凭你洗遍了千江之水，怎能像当初未弄污之时）。”当时，特别喜爱其诗中的话，到现在六十多年，尚清楚不忘，随便记在这里。

北虜诛宗王

【原文】 绍兴庚申，虜主蠡诛宗室七十二王，韩 作诏，略云：“周行管叔之诛，汉致燕王之辟，兹惟无赦，古不为非。不图骨肉之间，有怀蜂蚕之毒。皇伯太师宋国王宗磐谓为先帝之元子，常蓄无君之祸心；皇叔太傅兗国王宗俊、虞王宗英、滕王宗伟等，逞躁欲以无厌，助逆谋之妄作。欲申三宥，公议岂容？不烦一兵，群凶悉殄。已各伏辜，并除属籍讫。”绍熙癸丑，今虜主诛其叔郑王，诏曰：“朕早以嫡孙，钦承先绪。皇叔定武军节度使郑王允蹈，属处诸父，任当重藩，潜引凶徒，共为反计，自以元妃之长子，异于他母之诸王，冀幸国灾，窥伺神器。其妹泽国公主长乐牵同产之爱，驸马都尉唐括蒲刺睹徂连姻之私，预闻其谋，相济以恶。欲宽燕邸之戮，姑致郭邻之囚，询诸群言，用示大戒。允蹈及其妻卞玉与男按春、阿辛并公主皆赐自尽，令有司以礼收葬，仍为辍朝。”二事甚相类，盖其视宗族至亲与涂之人无异也。是年冬，倪正父奉使，馆于中山，正其诛戮处，相去一月，犹血腥触人，枯骸塞井，为之终夕不安寝云。

【译文】 绍兴庚申年（1140年），金主完颜珣诛杀宗室七十二个王，韩侂

作诏书，大略说：“周朝执行对管叔的诛杀，汉朝致有燕王的死刑，像这样的人不予赦免，自古以来不以为不妥。没想到骨肉之间，有的怀有蜂蜜的毒计。皇伯太师宋国王宗磐，说自己是先帝的长子，常常蓄有瞧不起君上的祸心。皇叔太傅颺国王宗俊、虞王宗英、滕王宗伟等人，轻狂的欲望不知满足，助长反叛阴谋的狂妄兴作。打算申说宽恕到三次，公众舆论岂能容忍？不烦用一兵，群凶全部消灭。已各伏罪。并已从宗族属籍中除名完毕。”绍熙癸丑年（1193年），现在的金主诛杀他的叔父郑王，诏书说：“朕早就以嫡孙的身份，恭敬地继承了先帝的遗业。皇叔定武军节度使郑王允蹈，从亲属说处于叔伯的地位，从责任说承当重要藩国，暗中引结凶暴之徒，共同进行反叛之计，自以为是元妃的长子，与其他母亲所生诸王不同，希望侥幸于国家灾祸，偷视盘算着帝位。他的妹妹泽国公主长乐牵连于同母的爱怜，驸马都尉唐括蒲刺睹司惯于连姻的私情，事先听到了这一阴谋，相助为恶，打算宽恕对郑王的诛戮，姑且送到靠近外城的地方囚禁，询察公众舆论，以示大的惩戒。允蹈以及他的妻子卞玉与儿子按春、阿辛连同公主都赐自尽而死，令有关官吏按礼收尸埋葬，皇帝仍然为此事不临朝以志哀悼。”这两件事特别相像，大概他们视宗族至亲与视路人是没有差别的。这年冬天，倪正父奉使金朝，停宿于中山府，正是他们诛戮郑王之处，相隔一个月，仍然血腥逼人，枯骨填塞井中，因为整个晚上都不能安然入睡。

州郡书院

【原文】 太平兴国五年，以江州白鹿洞主明起为褒信主簿。洞在庐山之阳，尝聚生徒数百人。李煜有国时，割善田数十顷，取其租廩给之；选太学之通经者，俾领洞事，日为诸生讲诵。于是起建议以其田入官，故爵命之。白鹿洞由是渐废。大中祥符二年，应天府民曹诚，即楚丘戚同文旧居造舍百五十间，聚书数千卷，博延生徒，讲习甚盛。府奏其事，诏赐额曰应天府书院，命奉礼部郎戚舜宾主之，仍令本府幕职官提举，以诚为府助教。宋兴，天下州府有学自此始。其后潭州又有岳麓书院。及庆历中，诏诸路州郡皆立学，设官教授，则所谓书院者当合而为一。今岳麓、白鹿复营之，各自养士，其所廩给礼貌乃过于郡庠。近者巴州亦创置，是为一邦而两学矣。大学、辟雍并置，尚且不可，是于义为不然也。

【译文】 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任命江州白鹿洞主明起为褒信县主簿。洞在庐山的南面，曾聚集学生数百人。南唐李煜在位的时候，曾取好田

数十顷，以其田租仓米供给书院生员；从太学中挑选精通经书的人，让他掌管白鹿洞事，天天为生员讲诵经书。于是明起建议把这些田地交给官府，所以赏给他官职。白鹿洞由此逐渐衰废。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应天府百姓曹诚，在楚丘百姓戚同文旧居的基础上建造校舍一百五十间，聚集图书数千卷，广泛延请生员，讲习经书很盛。江州官府将曹诚的事迹上奏皇上，皇上下诏赐给匾额叫应天府书院，命礼部司郎戚舜宾主持其事，同时命令江州州幕僚管理此事，用曹诚为洞学助教。大宋朝兴起以来，天下州府有学校从此开始。在这以后潭州又有了岳麓书院。到了仁宗庆历年间，下诏各路州郡都设立学校，设置官员教授生员，所谓书院往往合而为一了。现在岳麓、白鹿书院重新营建，各自招收学生，他们的待遇超过州郡学校。近来巴州也创置书院，这样一个地方就有两所学校。大学与辟雍同时设置，尚且不可，因为这与义理不合。

何韩同姓

【原文】 韩文公《送何坚序》云：“何与韩同姓为近。”尝疑其说无所从出，后读《史记·周本纪》，应劭曰：“《氏姓注》云，以何姓为韩后。”邓名世《姓氏书辩证》云：“何氏出自姬姓，食采韩原，为韩氏。韩王建为秦所灭，子孙散居陈、楚、江、淮间以韩为何，随声变为何氏，然不能详所出也。”韩王之失国者名安，此云建，乃齐王之名，邓笔误耳。予后读孙《唐韵》云：“韩灭，子孙分散江、淮间，音以韩为何，字随音变，遂为何氏。”乃知名世用此。

【译文】 韩愈在《送何坚序》中说：“何与韩同姓为近。”我曾怀疑这个说法没有出处，后来读《史记·周本纪》，发现应劭的注释说：“《氏姓注》说，把何姓作为韩国的后代。”邓名世《姓氏书辩证》中说：“何氏出自姬姓，其采邑为韩原，氏为韩。韩国国王建被秦国所灭，他的子孙散居在陈国、楚国一带，长江、淮河之间念韩为何音，随着声音的变化而为何氏，然而已不能详细考察它的来源了。”韩国的亡国之君是韩王安，邓名世说韩王建，建乃是齐王的名字，这是邓名世的笔误。后来我读到孙礪《唐韵》说：“韩国灭亡以后，子孙分散到长江、淮河之间，那里的声音以韩为何，字随音而变，于是称为何氏。”这才知道邓名世的说法出于《唐韵》。

卷 六

蕨萁养人

【原文】 自古凶年饥岁，民无以食，往往随所值以为命，如范蠡谓吴人就蒲赢于东海之滨；苏子卿掘野鼠所去草实，及啮雪与旃毛并咽之；王莽教民煮木为酪；南方人饥饿，群入野泽掘鳬茈；邓禹军士食藻菜；建安中，咸阳人拔取酸枣、藜藿以给食；晋郗鉴在邹山，兖州百姓掘野鼠、蛰燕；幽州人以桑椹为粮，魏道武亦以供军；岷蜀食芋。如此而已。吾州外邑，山在乐平、德兴境，李罗万斛山在浮梁、乐平、鄱阳境，皆绵亘百余里，山出蕨萁。乾道辛卯，绍熙癸丑岁旱，村民无食，争往取其根。率以昧旦荷锄往掘，深至四五尺，壮者日可得六十斤。持归捣取粉，水澄细者煮食之，如稊状，每根二斤可充一夫一日之食。冬晴且暖，田野间无不出者，或不远数十里，多至数千人。自九月至二年终，蕨抽拳则根无力，于是始止。盖救饿羸者半年，天之生物，为人世之利至矣！古人不知用之，传记亦不载，岂他邦不产此乎？

【译文】 自古以来荒年饥岁，百姓没有粮食吃，往往随便遇着什么就吃什么以保存生命，如范蠡说吴国人吃蒲草、海螺于东海的边上；汉代苏武在匈奴时掘野鼠去掉的草子，咬雪与毡皮一块咽下去；王莽教给百姓煮木为酪；南方人饥饿时，成群结队进入野泽之中挖掘荸荠吃；邓禹的军士吃藻菜；汉献帝建安时期，咸阳人摘取酸枣、藜藿用作粮食；晋朝将军郗鉴在邹山时，兖州百姓掘野鼠、蛰燕吃；幽州人用桑椹为粮食，北魏道武帝也用它供给军队吃；岷山、蜀地百姓吃芋头。史书的记载仅此而已。本州外的地方，礅礅山在乐平、德兴境内，李罗万斛山在浮梁、乐平、鄱阳境，这两座山都绵延一百多里，山中出蕨萁。孝宗乾道七年（1165年）、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发生旱灾，村民没有粮食吃，争着前往山中挖蕨萁的根。一般情况下未明以前便扛锄去掘，深至四五尺，一个壮劳力一天可掘得六十斤，回去之后捣烂取出粉，用水加以过滤，细粉可以煮吃，形状和细粉条一样，每根二斤可供一个男子一天吃的。冬晴暖和时，田野间到处都是挖蕨萁的人，或远至数十里，多者达到数千人。自九月至二月末，蕨萁发芽上长而根部不再有营养，于是停止挖掘。大概可以救人半

年饥饿，天地所生的东西，为世人之利太大了！古人不知道利用它，传记也没有记载，难道别的地方不出产蕨萁吗？

贤士隐居者

【原文】 士子修己笃学，独善其身，不求知于人，人亦莫能知者，所至或有之，予每惜其无传。比得上虞李孟传录示四事，故谨书之。其一曰，慈溪蒋季庄，当宣和间，鄙王氏之学，不事科举，闭门穷经，不妄与人接。高抑崇居明州城中，率一岁四五访其庐。季庄闻其至，必倒屣出迎，相对小室，极意讲论，自昼竟夜，殆忘寝食。告去则送之数里，相得欢甚。或问抑崇曰：“蒋君不多与人周旋，而独厚于公，公亦役役于彼，愿闻其故。”抑崇曰：“阅终岁读书，凡有疑而未判，与所缺而未知者，每积至数十，辄一扣之，无不迎刃而解。”而蒋之所长，他人未必能知之。世之所谓知己，其是乎？其二曰，王茂刚，居明之林村，在岩壑深处，有弟不甚学问，使专治生以糊口，而刻意读书，足迹未尝妄出，尤邃于《周易》。沈焕通判州事，尝访之。其见趣绝出于传注之外云。气象严重，窥其所得，盖进而未已也。其三曰，顾主簿，不知何许人，南渡后寓于慈溪。廉介有常，安于贫贱，不靳人之知。至于践履间，虽细事不苟也。平旦起，俟卖菜者过门，问菜把直几何，随所言酬之。他饮食布帛亦然。久之人皆信服，不忍欺。苟一日之用足，则玩心坟典，不事交游。里中有不安其分、武断强伎者，相与讥之，曰：“汝岂顾主簿耶？”其四曰，周日章，信州永丰人。操行介洁，为邑人所敬。开门授徒，仅有以自给，非其义一毫不取。家至贫，常终日绝食，邻里或以薄少致馈。时时不继，宁与妻子忍饿，卒不以求人。隆寒披纸裘，客有就访，亦欣然延纳。望其容貌，听其论议，莫不耸然。县尉谢生遗以裘衣，曰：“无生未尝有求，吾自欲致其勤耳，受之无伤也。”日章笑答曰：“一衣与万钟等耳，傥无名受之，是不辨礼仪也。”卒辞之。汪圣锡亦知其贤，以为近于古之所谓独行者。是四君子，真可书史策云。

【译文】 读书人修治自己笃于学问，独善其身。不求被人知道，人也没有能知道的，所到之处间或有这样的人，我每每可惜他们没有传记。最近得到上虞李孟传抄录给我看的四个人的事，所以恭敬地记录下来。其一说，慈溪蒋季庄，当宣和年间，他鄙薄王安石的王氏之学，不从事科举，闭门穷读经书，不胡乱与人接触。高抑崇（高阅）居住在明州城中，一般一年有四五次拜访蒋季庄的庐舍。蒋季庄听到他来了，一定倒拖着鞋出来迎接，相对坐于小屋，认真

地讲解谈论，从白天到整夜，几乎忘掉睡觉吃饭。告别离去则送他好几里，彼此相处甚为欢洽。有人问高抑崇说：“蒋季庄君很少与人应酬，而独与您交情浓厚，您也对他很诚恳，希望知道这是什么缘故？”高抑崇说：“我高阅终年读书，凡是有疑问而不能判别，和我所缺乏而未知晓的，每每积存到数十条，一并请教他，没有不迎刃而解的。”而蒋季庄君的所长，别的人未必能够知道。世上所谓的知己就是这样吧？其二说，王茂刚，居住在明州的林村，在山涧深处，他有个弟弟不喜欢读书，茂刚就让他经商以糊口，而自己则潜心读书，脚步未曾乱出，对于《周易》一书的造诣尤其深邃。沈焕为明州通判时，曾拜访过他，说他的见识旨趣大大超出经传之外。气质谨严持重，看他所得的知识，大概是进而不止了。其三说，顾主簿，不知道是那里人，高宗建国之后他也南渡寓居于慈溪。保持廉洁的操行，安于贫贱，不祈求别人知道他。甚至于所过之处，虽是小事也一丝不苟。天明起床，等卖菜的过门时，问了菜价多少钱，随他所说而付给菜钱。其他吃的穿的也是这样。时间一长人们都信服他了，不忍心欺骗他。假如东西够一天用了，他就专心研究典籍，不好交游。里中有不安分守己、武断刚愎的人，相互讥笑他，说：“你难道是顾主簿吗？”其四说，周日章是信州永丰县人。操行廉洁耿直，为县里的人所尊敬。他开门教授生徒，收入仅仅够自给，不义之财一毫不取。家中很贫穷，经常一天天断粮，邻里有时用微薄的东西相馈赠。家中时常上顿不接下顿，宁愿和妻子忍饥挨饿，也终不求人。隆冬寒天披着纸一样的薄裘，有客人来访，也高兴地延请接纳。观察他的容貌，聆听他的论议，无不使人尊敬。县尉谢生送给他一套衣服，说：“先生未曾有求于我，是我自己的一片敬意，接受它没有什么妨害。”周日章笑着回答说：“一套衣服和万钟粮食一样，如果不明不白地接受，是不能分辨礼仪了。”最终还是推辞掉。汪圣锡也知道他贤能，认为他的行为接近古代的独行君子。这四位先生，真应该写进史书里。

张籍陈无己诗

【原文】 张籍在他镇幕府，郢帅李师古又以书币辟之，籍却而不纳，而作《节妇吟》一章寄之，曰：“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何不相逢未嫁时？”陈无己为颍州教授，东坡领郡，而陈赋《妾薄命》篇，言为曾南丰作，其首章云：“主家十二楼，一身当三千。古来妾薄命，

事主不尽年。起舞为主寿，相送南阳阡。忍著主衣裳，为人作春妍？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死者恐无知，妾身长自怜。”全用籍意。或谓无己轻坡公，是不然。前此无己官于彭城，坡公由翰林出守杭，无己越境见之于宋都，坐是免归，故其诗云：“一代不数人，百年能几见？昔为马首衔，今为禁门键。一雨五月凉，中宵大江满。风帆目力短，江空岁年晚。”其尊敬之尽矣。薄命拟况，盖不忍师死而遂倍之，忠厚之至也！

【译文】 张籍在他方军镇幕府时，郢州知州李师古用书信币帛征辟他到自己这里作幕僚，张籍将书信币帛退回而不收，并作了《节妇吟》一章寄给他，说：“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何不相逢未嫁时？”陈无己为颍州教授时，苏东坡先生是知州，而陈无己作诗《妾薄命》篇，说是为曾巩作的，其第一章说：“主家十二楼，一身当三千。古来妾薄命，事主不尽年。起舞为主寿，相送南阳阡。忍著主衣裳，为人作春妍？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死者恐无知，妾身常自怜。”这首诗完全用张籍诗中的意思。有人说陈无己轻视苏东坡，不是这样。在此之前陈无己在彭城为官，苏东坡由翰林学士出任杭州知州，陈无己曾越过自己的辖境到京城去见苏东坡，因此获罪而被免官还乡，所以他的诗说：“一代不数人，百年能几见？昔为马首衔，今为禁门键。一雨五月凉，中宵大江满。风帆目力短，江空岁晚年。”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对苏东坡尊敬到极点了。薄命是陈无己比拟自己的状况，大概是不忍心老师死了就背叛他，可见陈无己忠厚到了极点。

杜诗误字

【原文】 李适之在明皇朝为左相，为李林甫所挤去位，作诗曰：“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故杜子美《饮中八仙歌》云：“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正咏适之也。而今所行本误以“避贤”为“世贤”，绝无意义，兼“世”字是太宗讳，岂敢用哉？《秦州雨晴》诗云：“天永秋云薄，从西万里风。”谓秋天辽永，风从万里而来，可谓广大。而集中作“天水”，此乃秦州郡名，若用之入此篇，其致思浅矣。《和李表丈早春作》云：“力疾坐清晓，来诗悲早春。”正答其意。而集中作“来时”，殊失所谓和篇本旨。

【译文】 李适之在明皇朝为左相，为李林甫所排挤去位，作诗说：“避贤

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避让贤人刚刚罢相，性嗜喝酒姑且衔杯。请问门前的客人，今天有几位到来）？”所以杜子美（杜甫）的《饮中八仙歌》写道：“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左相每天起来要费一万钱，饮酒就好像大鲸鱼吸引百川之水，口衔酒杯口称避贤）。 ”正是为李适之而作。而现今所流行的本子都误以“避贤”为“世贤”，毫无意义，同时“世”字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讳，难道唐人敢用吗！《秦州雨晴》这首诗说：“天永秋云薄，从西万里风（天空辽远秋季的云气淡薄，从西方吹来万里的风）。 ”说的是秋天辽远，风从万里而来，可以说是广大。而杜甫的诗集中却作“天水”，“天水”这是秦州郡的名字，若是用到这一篇里，它的思想意境就太浅薄了。《和李表丈早春作》这首诗写道：“力疾坐清晓，来诗悲早春（勉强支病体坐清晨，思来诗篇悲早春）。 ”正是回答李表丈关于早春诗作的意思。而杜甫诗集中却作“来时”，特别有失所谓和诗的本来意义了。

东坡诗用老字

【原文】 东坡赋诗，用人姓名，多以老字足成句。如《寿州龙潭》云：“观鱼并记老庄周”，《病不赴会》云：“空对亲春老孟光”，《看湖》云：“犹似浮江老阿童”，《赠黄山人》云：“说禅长笑老浮屠”，《元长老衲裙》云：“乞与佯狂老万回”，《东轩》云：“挂冠知有老萧郎”，《侍立迎英》云：“定似香山老居士”，《赠李道士》云：“知是香山老居士”，《蒜山亭》云：“奇逸多闻老敬通”，《汶公东堂》云：“一贴空存老遂良”，《次韵韶守》云：“华发萧萧老遂良”，《游罗浮》云：“还须略报老同叔”。《赠辩才》云：“中有老法师”，《寄子由》云：“青山老从事”，《赠眼医》云：“忘言老尊宿”，“妙高台中老比丘”，《谢惠酒》云：“青州老从事”，《谢饷鱼》云：“谁似老方朔”，《赠吴子野扇》云：“得之老月师”，《次韵李端叔》云：“此是老牛馐”。是皆以为助语，非真谓其老也，大抵七言则于第五字用之，五言则于第三字用之。若其他错出，如“再说走老瞒”，“故人余老庞”，“老鼻官妆传父祖”，“便腹从人笑老韶”，“老可能为竹写真”，“不知老桡几时归”之类，皆随语势而然。白乐天云：“每被老元偷格律”，盖亦有自来矣。

【译文】 苏东坡作诗，用别人的姓名，多以老字补足成句。如《寿州龙潭》诗说：“观鱼并记老庄周”，《病不赴会》诗说：“空对亲春老孟光”，《看湖》诗说：“犹似浮江老阿童”，《赠黄山人》诗说：“说禅长笑老浮屠”，《元长

老衲裙》说：“乞与佯狂老万回”，《东轩》诗说：“挂冠知有老萧郎”，《侍立迎英》诗说：“定似香山老居士”，《赠李道士》诗说：“知是香山老居士”，《蒜山亭》诗说：“奇逸多闻老敬通”，《汶公东堂》诗说：“一贴空存老遂良”，《次韵韶守》诗说：“华发萧萧老遂良”，《游罗浮》诗说：“还须略报老同叔”，《赠辩才》诗说：“中有老法师”，《寄子由》诗说：“青山老从事”，《赠眼医》诗说：“忘言老尊宿”，“妙高台中老比丘”，《谢惠酒》诗说：“青州老从事”，《谢饷鱼》诗说：“谁似老方朔”，《赠吴子野扇》诗说：“得之老月师”，《次韵李端叔》诗说：“此是老牛馐”。这些老字都作语气助词用，并不是真的说他们年老，大概七言诗则于第五字用“老”字，五言诗则于第三字用“老”字。如其他诗也有杂错出现的，如“再说走老瞒”，“故人余老庞”，“老滟宫妆传父祖”，“便腹从人笑老韶”，“老可能为竹写真”，“不知老桡几时归”之类的诗，都随着气势而用“老”字。白居易诗说：“每被老元偷格律”，大概也有自己的来源了。

杜诗命意

【原文】 杜公诗命意用事，旨趣深远，若随口一读，往往不能晓解，姑记一二篇以示好事者。如：“能画毛延寿，投壶郭舍人。每蒙天一笑，复似物皆春。政化平如水，皇恩断若神。时时用抵戏，亦未杂风尘。”第三联意味颇与前语不相联贯，读者或以为疑。按杜之旨，本谓技艺倡优，不应蒙人主顾眄赏接，然使政化如水，皇恩若神，为治大要既无可损，则时时用此辈，亦亡害也。又如：“乱后碧井废，时清瑶殿深。铜瓶未失水，百丈有哀音。侧想美人意，应悲寒硃沉。蛟龙半缺落，犹得折黄金。”此篇盖见故宫井内汲者得铜瓶而作，然首句便说废井，下文翻覆铺叙为难，而曲折宛转如是，他人毕一生模写不能到也。又一篇云：“斗鸡初赐锦，舞马既登床，帘下宫人出，楼前御柳长。仙游终一瞬，女乐久无香。寂寞骊山道，清秋草木黄。”先忠宣公在北方，得唐人画《骊山宫殿图》一轴，华清宫居山颠，殿外垂帘，宫人无数，穴帘隙而窥，一时伶官戏剧，品类杂沓，皆列于下。杜一诗真所谓亲见之也。

【译文】 杜甫的诗所赋的含意和所用的事典，意义深远，倘若随口一读，往往不能理解，姑且记录一两篇以展示给有兴趣的人。如：“能画毛延寿，投壶郭舍人。每蒙天一笑，复似物皆春。政化平如水，皇恩断若神。时时用抵戏，亦未杂风尘（善绘画的是毛延寿，能投壶的是郭舍人。每每蒙天颜一笑，又好像似物色皆春。政治平静教化风行如流水，皇恩的决断英明若神。时常用来解解

闷，也未必流离播迁于风尘)。”第三联“政化”与“皇恩”句的意味很与前面两联的语意不相联贯，读者有的感到疑惑。按杜诗的主旨，本来是说技艺倡优之流，不应该蒙受人君的眷恋和恩赏，然而倘若使政治教化清明如水，皇恩明断如神，作为治理国家的大的方面既已无可损伤，则时常用用这类人，也没有害处。又如：“乱后碧井废，时清瑶殿深。铜瓶未失水，百丈有哀音。侧想美人意，应悲寒髻沉。蛟龙半缺落，犹得折黄金（乱离以后琉璃井废弃，时下清明玉饰的宫殿深邃。铜瓶还没有失水，百丈的长绳发出哀伤之声。从旁想到汲水宫女的心情，应该悲叹铜瓶在寒井中的沉溺。瓶上刻铸的蛟龙大半已经脱落，仍可以当得黄金）。”这一篇是因见到在故宫井内汲水的人得到铜瓶而作，然而第一句便说废井，则下文反复的铺叙就较为困难，而此诗是如此的曲折宛转，别人一辈子摹仿也不能到达这种程度。又有一篇说：“斗鸡初赐锦，舞马既登床。帘下宫人出，楼前御柳长。仙游终一，女乐久无香。寂寞骊山道，清秋草木黄（斗鸡的开始赐给锦绣，舞马已经登上板床。户帘垂下宫人走出，楼殿前的御柳修长。明皇的仙游终于完结，女乐流散已久无芳香。沉寂索寞的骊山大道，清凉的秋天草木变黄）。先父忠宣公（洪适）在北方，得到了唐人所画的《骊山宫殿图》一轴，华清宫的山顶，殿外垂挂着户帘，宫人无其数，侧在帘子的空隙处偷偷地看，一时表演歌舞的人和戏剧，品类很多，都列在下面。杜甫这一首诗真可以说是亲眼见了。

择福莫若重

【原文】 《国语》载范文子曰：“择福莫若重，择祸莫若轻。”且士君子乐天知命，全身远害，避祸就福，安有迨于祸至择而处之之理哉？韦昭注云：“有两福择取其重，有两祸择取其轻。”盖以不幸而与祸会，势不容但已，则权其轻重，顺受其一焉。《庄子·养生主》篇云：“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夫孳孳为善，君子之所固然，何至于纵意为恶，而特以不罹于刑为得计哉？是又有说矣，其所谓恶者，盖与善相对之辞，虽于德为愆义，非若小人以身试祸自速百殃之比也。故下文云：“可以全生，可以保身，可以尽年。”其旨昭矣。

【译文】 《国语》记载范文子士燮的话说：“选择福不如重，选择祸不如轻。”士大夫君子们都能顺应天道的安排，懂得命运的限制，保全自己的身体，远离祸害之地，避免灾祸归之福地，怎么会等到灾祸降临时再选择轻重而承受的道理呢？韦昭在注解《国语》时说：“同时有两种福祉，要选择其中的大者，而同

时有两种灾祸，要选择其中的轻者。”推究起来因不幸而与灾祸相遇，形势不容许选择，就应该权衡轻重，顺受其一种。《庄子·养生主》篇说：“作善事但不要有求名之心，作坏事但求别受惩罚。”努力不懈地做好事，这是君子应当做的，何必恣意作恶，而又特别以逃脱惩罚为得计呢？这又有其他的说法了，这里所谓的坏事，是与善相对而言的，虽然对德来说是过失，但决不是像小人拿性命去触犯刑罚自招遭殃可以相比的。所以《庄子·养生主》下文说：“可以保全生命，可以保全自身，可以享其天年。”这里的宗旨是很明白的。

用人文字之失

【原文】 士人为文，或采已用语言，当深究其旨意，苟失之不考，则必诒论议。绍兴七年，赵忠简公重修《哲录》，书成，转特进，制词云：“惟宣仁之诬谤未明，致哲庙之忧勤不显。”此盖用范忠宣遗表中语，两句但易两字，而甚不然，范之辞云：“致保佑之忧勤不显。”专指母后以言，正得其实。今以保佑为哲庙，则了非本意矣。绍兴十九年，予为福州教授，为府作《谢历日表》，颂德一联云：“神祇祖考，既安乐于太平，岁月日時，又明章于庶证。”至乾道中，有外郡亦上表谢历，蒙其采取用之，读者以为骈丽精切，予笑谓之曰：“此大有利害，今光尧在德寿，所谓‘考’者何哉？”坐客皆缩颈，信乎不可不审也。

【译文】 读书人作文章，有人采用已用的词句，应当深入研究它的含义，如果因不考证而有失误，就一定招人议论。绍兴七年（1137年），赵鼎重修《哲宗实录》，书撰成，转官为特进，制书说：“惟宣仁之诬谤未明，致哲庙之夏忧勤不显（只是对宣仁皇后的诬谤未昭明，致使哲宗的忧愁劳苦不得彰显）。”这大概用的是范忠宣（范）纯仁遗表中的话，两句话只改了两个字，然而很不一样，范纯仁的话说：“致保佑之忧勤不显（致使保佑的忧愁劳苦不彰显）。”这里专指母后而言，正合乎其事实。现在以保佑改为哲宗，就完全不是本来的意思了。绍兴十九年（1149年）我做福州教授，为府衙作《谢历日表》，颂扬德行的一联说：“神祇祖考，既安乐于太平；岁月日時，又明章于庶证（神祇祖考，已经安乐于太平；时间岁月，又明显于众多的证验）。”到乾道年间，有外郡也上表谢历，承蒙他采用我这一联，读的人认为此联对仗精妙贴切，我笑着对他说：“这其中有很严重的问题，现在光尧皇帝住在德寿宫，所谓‘考（已死去的父亲）’是什么意思呢？”在坐的客人都吓得缩脖子，的确不能不审慎啊。

李卫公辋川图跋

【原文】 《辋川图》一轴，李赵公题其末云：“蓝田县鹿苑寺主僧子良贻于予，且曰：‘鹿苑即王右丞辋川之第也。右丞笃志奉佛，妻死不再娶，洁居逾三十载。母夫人卒，表宅为寺。今冢墓在寺之西南隅，其图实右丞之亲笔。’予阅玩珍重，永为家藏。”弘宪题其前一行云：“元和四年八月十三日弘宪题。”弘宪者，吉甫字也。其后卫公又跋云：“乘闲阅篋书中，得先公相国所收王右丞画《辋川图》，实家世之宝也。先公凡更三十六镇，故所藏书画多用方镇印记。太和二年戊申正月四日，浙江西道观察等使、检校礼部尚书兼润州刺史李德裕恭题。”又一行云：“开成二年秋七月望日，文饶记。”前后五印：曰淮南节度使印、浙江西道观察处置等使之印、剑南西川节度使印、山南西道节度使印、郑滑节度使印，并赞皇二字。又内合同印，建业文房之印，集贤院藏书印，此三者南唐李氏所用，故后一行曰：“升元二年十一月三日。”虽今所传为临本，然正自超妙。但卫公所志，殊为可疑。《唐书·李吉甫传》云：“德宗以来，姑息藩镇，有终身不易地者。吉甫为相岁余，凡易三十六镇。”吉甫平生只为淮南节度耳，今乃言身更三十六镇，诚大不然。所用印记，如浙西、西川、山西、郑滑，皆卫公所历也；且书其父手泽，不言第几子，而有李字；又自标其字，皆非是，盖好事者妄为之。白乐天诗所说清源寺，即辋川云。洪庆善作《丹阳洪氏家谱序》云：“丹阳之洪本姓弘，避唐讳改。有弘宪者，元和四年跋《辋川图》。”亦大错也。

【译文】 《辋川图》一轴，李赵公（李吉甫）在图末题词说：“蓝田县鹿苑寺主僧人子良赠送给我，并且说：‘鹿苑寺就是王右丞（王维的辋川宅第）。王右丞专心致志地奉佛，妻子死后不再续娶，独居超过三十年。母亲死后，上表请以此宅为寺庙。现在王家的冢墓在本寺的西南角，引图实属王右丞的亲笔。我观览欣赏对其十分珍爱，永远作为家藏宝物。’弘宪题词在画的前一行，说：“元和四年（809年）八月十三日弘宪题。”弘宪，这是李吉甫的字。在这以后李德裕又作跋语说：“乘闲暇翻阅篋中书，从中得到先父相国所收藏的王右丞画的《辋川图》，实在是家中的珍宝。先父共历官三十六镇，所以藏书画大多用方镇的印记。太和二年（828年）年戊申正月四日，浙江西道观察等使、检校礼部尚书润州刺史李德裕敬题。”还有一行题辞说：“开成二年（837年）秋七月十五日，文饶记。”前后有五个印，分别是淮南节度使印、浙江西道观察处置等使之印、

剑南西川节度使印、山南西道节度使印、郑滑节度使印，以及赞皇二字。又有内合同印、建业文房之印、集贤院藏书印，这三印是南唐李氏所用的印，所以后一行辞佯说：“升元二年（938年）十一月三日。虽然现在所流传的只是临摹的本子，然而自有其超凡的精妙。”只是李德裕所记，极为可疑。《唐书·李吉甫传》说：“德宗即位以来，姑息藩镇，有的节度使终身不调换地方。李吉甫任相国一年多，共换了三十六镇。”本吉甫平生只做过淮南节度使，现在则说他一人更换了三十六镇，实在太不对了。所用的印记，如浙西、西川、山西、郑滑，都是李德裕任职所经历的地方的印；况且李德裕书写他父亲的遗物，不说是第几个儿子，而且还写上李字；又标上自己的字，都不对，这大概是好事之徒胡乱做的事。白居易诗中所说的清源寺，就是指王维的辋川宅第。洪庆善（洪兴祖）作《丹阳洪氏家谱序》说：“丹阳的洪氏本姓弘，因避唐讳而改。有个叫弘宪的人，元和四年（809年）为《辋川图》作跋。”这也是大错了。

白公夜闻歌者

【原文】 白乐天《琵琶行》，盖在浔阳江上为商人妇所作。而商乃买茶于浮梁，妇对客奏曲，乐天移船，夜登其舟与饮，了无所忌，岂非以其长安故倡女，不以为嫌耶？集中又有一篇题云《夜闻歌》者，时自京城谪浔阳，宿于鄂州，又在《琵琶》之前。其词曰：“夜泊鹦鹉洲，秋江月澄澈。邻船有歌者，发调堪愁绝！歌罢继以泣，泣声通复咽。寻声见其人，有妇颜如雪。独倚帆樯立，娉婷十七八。夜泪似真珠，双双堕明月。借问谁家妇，歌泣何凄切？一问一沾襟，低眉终不说。”陈鸿《长恨传序》云：“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故所遇必寄之吟咏，非有意于渔色。”然鄂州所见，亦一女子独处，夫不在焉，瓜田李下之疑，唐人不讥也。今诗人罕谈此章。聊复表出。

【译文】 白居易《琵琶行》，推究起来是在浔阳江上为商人妻所作的。商人买茶于浮梁，他的妻子对着客人弹曲子，白居易就移动小船，夜登妇舟与她饮酒，全然没有什么忌讳，难道因为她在长安是白居易所熟悉的倡妓，就不用避嫌疑吗？他的诗集中又有一篇题为《夜闻歌》的诗，当时白居易自京城长安贬谪于浔阳，途中夜宿鄂州，作于《琵琶行》之前。这首诗说：“夜泊鹦鹉洲，秋江月澄澈。邻船有歌者，发调堪愁绝！歌罢继以泣，泣声通复咽。寻声见其人，有妇颜如雪。独倚帆樯立，娉婷十七八。夜泪似真珠，双双堕明月。借问谁家妇，歌泣何凄切？一问一沾襟，低眉终不说。”陈鸿在《长恨传序》中说：

“白居易精于诗，多用情感所写，所以他遇到的事情必然寄以情感加以吟咏，并非有意猎取美色。”但他在鄂州所见的，也是一个女子独自处在那里，丈夫又不在家，未免会使人产生瓜田弯腰李下提鞋的嫌疑，而唐代人并不讥笑他。现在诗人很少谈到这首诗，所以我重新把它抄录出来。

谢礪志节

【原文】 荀彧佐魏武帝，刘穆之佐宋高祖，高德政佐齐文宣，高敞佐隋文帝，刘文静佐唐高祖，终之篡汉、晋、魏、周及取隋，其功不细矣。彧以不言伏后事与劝止九锡，饮鸩而死。穆之居守丹阳，宋祖北伐，而九锡之旨从北来，愧惧而卒。德政以精神凌逼，为杨瓖所谮，敞以为相蓄妾，为独孤后所谮，文静以妾弟告变，为裴寂所谮，皆不免于诛。萧道成谋篡宋，欲引谢 参赞大业，屏人与之语， 无言。道成必欲引参佐命，以为左长史，从容间道石苞事讽之， 讫不顺指。及受宋禅，方为侍中，不肯解玺绶，引枕而卧，步出府门，道成之子劼欲杀之，道成畏得罪于公议，曰：“杀之适成其名，正当容之度外耳！”遂废于家。海陵王之世复为侍中，宣城王鸾谋继大统，多引朝廷名士， 心不愿，乃求出为吴兴太守。其弟瀹为吏部尚书， 致酒与之，曰：“可力饮此，无预人事！”其心盖恶鸾而未如之何也。 之志节行义，凛凛如此，司马温公犹以为讥，斯亦可恕也已！《二笔》于士 、韩厥下略及之，故复详论于此。

【译文】 荀彧辅佐魏武帝，刘穆之辅佐宋高祖，高德政辅佐北齐文宣帝，高敞辅佐隋文帝，刘文静辅佐唐高祖，最终使他们篡夺了东汉、东晋、北魏、北周以及隋朝的天下，他们的功劳不小啊，荀彧因为不说伏皇后的事以及阻止用九锡表彰曹操，服毒酒而死。刘穆之留守丹阳，宋高祖北伐，而赐九锡的命令从北而来，惭愧畏惧而死。高德政因为以精神凌逼人，被杨瓖所诬陷；高敞因为身为相国而娶妾，被独孤皇后所谮毁；刘文静因他的妾弟上告他谋反，被裴寂所诋毁，都不免于被诛杀。萧道成谋划篡夺刘宋的天下，想招谢礪参与协助他建大业，屏退礪人和谢礪谈此事，谢礪不说话。萧道成一定要招谢礪参与辅佐建立新王朝，以他为左长史，不慌不忙地讲西晋石苞的事讽谕谢礪，谢礪始终不顺从萧道成的旨意。到萧道成接宋帝的禅位，这时谢礪为侍中，不肯解下印玺，拉过来枕着躺下，走出东门。萧道成的儿子萧劼想杀谢礪，萧道成害怕得罪于公众舆论，说：“杀了他正好成全他的名声，正应当容许他于法度之外。”于是谢礪被免黜在家中。海陵王在位时又任侍中，宣城王萧鸾谋求继帝位，广

求朝廷名士，谢礪心中不愿意，就请求出任吴兴太守，他的弟弟谢澹任吏部尚书，谢礪送酒给他，说：“你可努力饮这酒，不要参预人世间的。”他心中大概厌恶萧鸾然而又拿他没有办法。谢礪的志向节操道义，如此令人敬畏！司马温公（司马光）还以此讥讽谢礪，但这也是可以宽恕的。《容斋二笔》在士礪、韩厥之后对谢礪略有所及，所以又在此详细论述。

琵琶亭诗

【原文】 江州琵琶亭，下临江津，国朝以来，往来者多题咏，其工者辄为人所传。淳熙己亥岁，蜀士郭明复以中元日至亭，赋《古风》一章，其前云：“白乐天流落浦湓，作《琵琶行》，其放怀适意。视忧患死生祸福得丧为何物，非深于道者能之乎？贾傅谪长沙，抑郁致死；陆相窜南宾，屏绝人事，至从狗窦中度食饮。两公犹有累乎世，未能如乐天逍遥自得也。予过九江，维舟琵琶亭下，为赋此章。”“香山居士头欲白，秋风吹作湓城客。眼看世事等虚空，云梦胸中无一物。举觞独醉天为家，诗成万象遭梳爬。不管时人皆欲杀，夜深江上听琵琶。贾胡老妇儿女语，泪湿青衫如著雨。此公岂作少狂梦？与世浮沉聊尔汝。我来后公三百年，浔阳至今无管弦。公诗有“浔阳地僻无音乐”之句长安不见遗音寂，依旧匡庐翠扫天。”郭君，成都人，隆兴癸未登科，仕不甚达。但贾谊自长沙召还，后为梁王傅乃卒，前所云少误矣。吾州余干县东干越亭有琵琶洲在下，唐刘长卿、张祜辈，皆留题。绍兴中，王洋元勃一绝句云：“塞外烽烟能记否，天涯沦落自心知。眼中风物参差是，只欠江州司马诗。”真佳句也！

【译文】 江州琵琶亭，下面紧临大江，自我大宋朝建立以来，往来这里的游客多有题咏琵琶亭的，其中的巧妙之作即被人们所传诵。孝宗淳熙六年，蜀地人士郭明复于七月十五日到达琵琶亭，作《古风》一章，在诗前的序中说：“白居易流落浦、湓时，曾作《琵琶行》一诗，他的思想表达得淋漓尽致。不把忧患生死祸福得失当回事，不是深刻领会人生道理的人能作得到吗？贾谊贬谪长沙后，因压抑自己郁闷而死；陆相被流放于南宾，隔绝人事，甚至从狗洞中爬出来寻找饮食。这两位尚且牵累于世，不能和白居易一样逍遥自在。我过九江时，系舟于琵琶亭下，因作这篇《古风》。”诗中说：“香山居士头欲白，秋风吹作湓城客。眼看事世等虚空，云梦胸中无一物。举觞独醉天为家，诗成万象遭梳爬。不管时人皆欲杀，夜深江上听琵琶。贾胡老妇儿女语，泪湿青衫如著雨。此公岂作少狂梦？与世浮沉聊尔汝。我来后公三百年，浔阳至今无管弦。白

居易《琵琶行》有“浔阳地僻无音乐”之句长安不见遗音寂，依旧匡庐翠扫天。”郭明，是成都人士，孝宗隆兴元年考中进士，做官不很顺到。但贾谊自长沙被召回以后，又为梁怀王刘楫的太傅而死，与他的序言所说稍有出入。我所居住饶州余干县东干越亭的琵琶洲在其下面，唐人刘长卿、张祜辈，都有留字。高宗绍兴时期，王洋元勃有一绝句说：“塞外烽烟能记否，天涯沦落自心知。眼中风物参差是，只欠江州司马诗。”真是好诗呀！

减损入官人

【原文】 唐开元十七年，国子祭酒杨 上言：“省司奏限天下明经、进士及第，每年不过百人，窃见流外出身，每岁二千余人，而明经、进士，不能居其什一，则是服勤道业之士，不如胥吏之得仕也。若以出身人太多，则应诸色裁损，不应独抑明经、进士。”当时以其言为然。淳熙九年，大减任子员数，是时，吏部四选开具以三年为率，文班进士大约三四百人，任子文武亦如之。而恩幸流外，盖过二千之数，甚与开元类也。

【译文】 唐朝开元十七年，国子祭酒杨 上言说：“省司上奏限制全国的明经、进士及第的人数，每年不超过一百人。私下看到九品以下的官任官职，每年有二千余人，然而明经、进士任官职的人数，不能占它的十分之一，这样就是勤劳道德的士人，不如掌管文书的小吏能作官。如果认为作官的人太多，就应该从各类人员中裁减，不应当只压抑明经、进士。”当时人们认为这些话是对的。淳熙九年（1182）大幅度减少因父兄功绩任官人的人数。这时，吏部施行四选法开始都以三年为准，文班进士大约有三四百人，因父兄功绩任文武官的人数也与此相同。而因恩泽所及，不在此数的大概超过二千这个数字，与开元年间的情况非常相似。

韩苏文章譬喻

【原文】 韩、苏两公为文章，用譬喻处，重复联贯，至有七八转者。韩公《送石洪序》云：“论人高下，事后当成败，若河决下流东注，若驷马驾轻车就熟路，而王良、造父为之先后也，若烛照数计而龟卜也。”《盛山诗序》云：“儒者之于患难，其拒而不受于怀也，若筑河堤以障屋溜；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

于海，冰之于夏日；其玩而忘之以文辞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鸣、虫飞之声。”苏公《百步洪》诗云：“长洪斗落生跳波，轻舟南下如投梭。水师绝叫鳧雁起，乱石一线争磋磨。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之类，是也。

【译文】 韩愈、苏东坡两位写文章，需要用比喻的地方，重复联贯，甚至有七八次转换。韩愈《送石洪序》说：“评价他人能力的高低，事后考实其成败，就像黄河决下流而东淌，就像驷马驾着轻车走熟路，而善驾车的王良、造父在马前车后，就和察看计算然后再占卜一样。”《盛山诗序》说：“儒家对于患难，当拒绝而不接受，如修筑河堤用来阻塞屋檐下的水流一样；当容纳而化解它，如水流于大海，冰放到夏天一样；用读书作文章来将忧患忘怀，就像敲击金石用以撤除蟋蟀的叫声、虫飞的鸣声一样。”苏东坡《百步洪》诗说：“长洪斗落生跳波，轻舟南下如投梭。水师绝叫鳧雁起，乱石一线争磋磨。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之类，就是这样的比喻。

唐昭宗赠谏臣官

【原文】 唐僖宗幸蜀，政事悉出内侍田令孜之手。左拾遗孟昭图、右补缺常浚上疏论事，昭图坐贬，令孜遣人沉之于蟆碭津，赐浚死。《资治通鉴》记其事。予读《昭宗实录》，即位之初，赠昭图起居郎，浚礼部员外郎，以其直谏被戮，故褒之。方时艰危，救亡不暇，而初政及此，《通鉴》失书之，亦可惜也！

【译文】 唐僖宗亲临蜀地，朝廷政事都出于内侍田令孜之后。左拾遗孟昭图、右补缺常浚上疏议论政事，孟昭图获罪被贬，田令孜派人将他溺死于蟆碭津，常浚被赐死。《资治通鉴》记载了此事。我读《昭宗实录》，记载昭宗即位不久，赠孟昭图为起居郎，常浚为礼部员外郎，因为他们直言进谏被杀，所以褒奖他们。昭宗当时正处艰难危险之际，挽救危亡没有闲暇，而能在执政之初就顾及于此，《通鉴》失载此事，也是可惜啊。

卷七

执政辞转官

【原文】 真宗天禧元年，合祭天地，礼毕，推恩百僚，宰相以下迁官一等。时参知政事三人，陈彭年自刑部侍郎迁兵部，王曾自左谏议大夫迁给事中，张知白自给事中迁工部侍郎。而知白独恳辞数四，上敷谕，终不能夺。王曾闻之，亦乞寝恩命。上曰：“知白无他意，但以卿为谏议大夫，班在上，己为给事中，在下，所以固辞，欲品秩有序尔。”于是从知白所请，而优加名数，进阶紫金光禄大夫，并赐功臣爵邑。元暨三年四月，宰执七人，自文彦博仍前太师外，右仆射吕公著除司空、同平章军国事，中书侍郎吕大防除左仆射，同知枢密院范纯仁除右仆射，尚书左丞刘摯除中书侍郎，右丞王存除左丞，唯知枢密院安燾不迁，乃自正议大夫特转右光禄。燾上章辞，令学士院降诏不允。学士苏轼以为：“朝廷岂以执政六人，五人进用，故加迁秩以慰其心？既无授受之名，仅似姑息之政，欲奉命草诏，不知所以为词，伏望从其所请。”御宝批：“可且用一意度作不许诏书进入。”燾竟辞，始免。绍兴三十一年，陈康伯自右相拜左相，朱倬自参政拜右相，时叶义问知枢密院，元居倬上，不得迁，朝论谓宜进为使。学士何溥面受草制之旨，曾以为言，高宗不许。绍熙五年七月，主上登极，拜知枢密院赵汝愚为右相，参政陈瓘除知院，同知院事余端礼除参政，而左丞相留正以少保进少傅，乃系特迁，且非覃恩，正固辞，乃止。

【译文】 真宗天禧元年，合祭天地，礼毕以后，皇上将恩典推及百官，自宰相以下每人迁官一等。当时宰相三人，陈彭年自刑部侍郎迁兵部侍郎，王曾自左谏议大夫迁给事中，张知白自给事中迁工部侍郎。张知白独自恳请辞谢数次，皇上颁布谕旨，但终究不能改变他的主意。王曾听说后，也乞求停止恩命。皇上说：“张知白没有其他的意思，但因为你是谏议大夫，地位要高一点，张知白为给事中，在你之下，所以他推辞，想品级有所区分。”于是听从张知白的请求，又优加数额，晋升他为金紫光禄大夫，并赐给爵位封地。哲宗元祐三年（1087年）四月，宰相七人，除文彦博仍是以前的太师外，右仆射吕公著任司空、同平章军国事，中书侍郎吕大防任左仆射，同知枢密院范纯仁任右仆射，

尚书左丞刘摯任中书侍郎，右丞王存任左丞。唯有知枢密院事安燾没有升迁，于是自正议大夫特转为右光禄。安燾上奏章辞谢，皇上令学士院下诏书不许。学士苏轼认为：“朝廷岂能以执政的六人，五个人升官，所以就给他升级来安慰他呢？既然没有授给和接受的道理，那就像是姑息迁就的政令，想奉命起草诏书，不知如何用词，希望听从他的请求。”皇上批示道：“可专心制作不许诏书进上。”安燾始终推辞，才免于转官。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陈康伯自右丞相官拜左丞相，朱倬自参知政事任右丞相，当时叶义问知枢密院，原居于朱倬之上，不得升官，朝中议论应该晋升为枢密使。学士何溥当皇上的面接受起草诏书的旨意，他曾为叶义问讲情，高宗不允许。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七月，皇上驾崩，任知枢密院赵汝愚为右丞相，参政陈瓘任知院，同知院事余端礼任参政，而左丞相留正以少保进为少傅，也是特升，况且不是广布恩泽，留正坚辞不受，于是停止他进转少傅的事。

宗室补官

【原文】 寿皇圣帝登极赦恩，凡宗子不以服属远近，人数多少，其曾获文解两次者，并直赴殿试；略通文墨者，所在州量试，即补承信郎。由是入仕者过千人以上。淳熙十六年二月、绍熙五年七月，二赦皆然，故皇族得官不可以数计。偶阅《唐昭宗实录》载一事云：“宗正少卿李克助奏：‘准去年十一月赦书，皇三等以上亲无官者，每父下放一人出身；皇五等以上亲未有出身陪位者，与出身。寺司起请承前旧例，九庙子孙陪位者，每父下放一人出身，共放三百八十人。其诸房宗室等，各赴陪位纳到文状，共一千二十七人。除元不赴陪位，及不纳到状，及违寺司条疏，不取宗室充系落下外，系三百八十人，合放出身。’敕准赦书处分。”予按昭宗以文德元年即位，次年十一月南郊礼毕肆赦，其文略云：“皇三等以上亲，委中书门下各择有才行者量与改官，无官者，每父下放一人出身；皇五等以上亲未有出身陪位者，与出身。”然则亦有三等五等亲、陪位与不陪位之差别也。

【译文】 高宗登上皇位大赦施恩，凡是宗室子弟不因血缘远近，人数多少，曾经两次参加乡试合格者，都直接参加殿试。略微通晓文墨的，由他所在州的州县学予以小试，就补任承信郎。从此宗子入仕为官者超过千人以上。淳熙十六年（1189年）二月、绍熙五年（1194年）七月，两次大赦推恩都如此，所以皇族得官职的人不能用数字计算。我偶然看到《唐昭宗实录》记载一件事说：

“宗正少卿李克助上奏说：‘按照去年十一月的敕书，皇室三等以上的亲戚没有官职的，每一房下放一人为官；皇室五等以上亲戚没有官职陪席的人，给官职。寺司请求按照以前的旧例，九庙子孙陪席的，每一房下放一人为官，共放三百八十人为官。各房宗室等，各前往陪席交纳到文状，共一千零二十七人。除去原来不前往陪席，以及不交纳到文状的，还有违背寺司条例上疏，不取宗室充当继嗣之外，共三百八十人，应给官职。’皇帝敕准依敕书处置。”按：昭宗在文德元年（888年）即位，第二年十一月在南郊举行郊祀礼，仪式结束大赦推恩，敕书大略说：“皇室三等以上亲戚，委托中书门下各自挑选有才能品行的人酌量改任官职，没有官职的，每一房下给一人官职。皇室五等以上亲戚，没有官职陪席的人，给官职。”如此看来，也有三等和五等、陪席和不陪席的区别。

孙宣公谏封禅等

【原文】 景德、祥符之间，北戎结好，宇内 宁，一时邪谀之臣，唱为瑞应祺祥，以罔明主，王钦若、陈彭年辈实主张之。天书既降，于是东封、西祀、太清之行，以次丕讲，满朝耆老方正之士，鲜有肯启昌言以遏其奸焰，虽寇莱公亦为之。而孙宣公独上疏争救，于再于三，《真录》出于钦若提纲，故不能尽载，以故后人罕称之。予略摘其大概记于此。

一章论西祀，曰：“汾阴后土，事不经见。汉都雍，去汾阴至近；河东者，唐王业所起之地，且又都雍，故武帝、明皇行之。今陛下经重关，越险阻，远离京师根本之固，其为不可甚矣。古者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今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作 灾，饥馑居多，乃欲劳民事神，神其享之乎！明皇嬖宠害政，奸佞当涂，以至身播国屯。今议者引开元故事以为盛烈，臣窃不取。今之奸臣，以先帝诏停封禅，故赞陛下，以为继承先志。且先帝欲北平幽朔，西取继迁，则未尝献一谋、画一策，以佐陛下。而乃卑辞重币，求和于契丹，蹙国糜爵，姑息于保吉。谓主辱臣死为空言，以诬下罔上为己任，撰造祥瑞，假托鬼神，才毕东封，便议西幸。以祖宗艰难之业，为佞邪侥幸之资，臣所以长叹而痛哭也！”

二章论争言符瑞，曰：“今野雕山鹿，并形奏简，秋旱冬雷，率皆称贺。将以欺上天，则上天不可欺；将以愚下民，则下民不可愚；将以惑后世，则后世必不信。腹非窃笑，有识尽然。”

三章论将幸亳州，曰：“国家近日多效唐明皇所为。且明皇非令德之君，观其祸败，足为深戒，而陛下反希慕之！近臣知而不谏，得非奸佞乎？明皇奔至

马嵬，杨国忠既诛，乃谕军士曰：‘朕识理不明，寄任失所，近已觉寤，’然则已晚矣，陛下宜早觉寤，斥远邪佞，不袭危乱之迹，社稷之福也！”

四章论朱能天书，曰：“奸小人，妄言符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归秘殿以奉安。百僚黎庶，痛心疾首，反唇腹非，不敢直言。臣不避死亡之诛，听之罪之，惟在圣断。昔汉文成、五利，妄言不讎，汉武诛之。先帝时，侯莫陈利用方术奸发，诛于郑州。唐明皇得灵符宝券，皆王珙、田同秀等所为，不能显戮，今日见老君于阁上，明日见老君于山中，大臣尸禄以将迎，瑞士畏威而缄默。及禄山兆乱，辅国劫迁，大命既倾，前功并弃。今朱能所为是已。愿远思汉武之雄材，近法先帝之英断，中鉴明皇之召祸，庶几灾害不生，祸乱不作。”

缺之论谏，虽魏郑公、陆宣公不能过也。

【译文】 景德与大中祥符年间，与北方契丹结盟和好，天下承平无事，一时间奸邪谀媚的臣僚，倡导说吉祥之兆，以欺骗贤明的人主，王钦若，陈彭年之辈实际主张这一做法。于是东封泰山，西祀汾阴，亳州太清宫之行，朝臣以次大讲吉祥之兆，满朝的老臣和端方正直的士大夫，很少有肯于发起正直的言论以遏止他们奸邪气焰的，虽然是寇莱公（寇准）也跟着他们这么作。而孙宣公愈独独上疏力争匡救，一而再再而三地奏陈，《真宗实录》出于王钦若的总纂，故未能详载这些奏疏，因此后人很少有提起它。我粗略地摘其奏疏的梗概记在这里。第一个奏章是谈论西祀汾阴的，奏章说：“汾阴的后土，其事不见于经传。汉代的都城在雍州，离汾阴很近。河东这个地方，是唐朝王业所兴起的地方，况且其都城也在雍州，所以汉武帝、唐明皇祭祀后土。现今陛下经过重重关口，越度险阻，远离京城根本的坚固之地，这是特别不可以的。古代的贤圣君王先成就百姓而后才致力于祀神，现今兴建的功业，累积多年没有停息，水旱作恶，百姓缺粮挨饿的居于多数，却要劳费百姓事奉神明，神会享用吗！唐明皇宠幸女色和佞臣损害了治国，奸幸佞臣把持朝政，以至自身播迁国家陷于灾难。现今参议的人引证开元旧事以为显赫盛典，臣私下不能同意。现今的奸臣，因先帝下诏停罢封禅，所以赞成陛下封禅，以为这是继承先帝遗志。况且先帝打算向北平定幽朔地区，向西攻取李继迁，则他们未曾献过一个计谋，筹画一项策略以辅佐陛下。而却用低下的言辞和厚给币帛，向契丹求和，迫促国家耗费爵赏，姑息于辽主。称君主受辱臣下当死为空话，以下欺百姓上骗君主为己任，杜撰编造祥瑞应，假托鬼神，刚刚东封完毕，便拟议西幸汾阴。以祖宗艰难创下的大业，为奸佞邪臣侥幸的资本，臣所以长叹息而痛哭啊！”第二个奏章是谈论争奏吉祥之兆的，奏章说：“现今出现个野雕山鹿，一并会出现在奏牒之中，秋

天的旱冬天的雷，一般都要称颂祝贺。用以欺骗上天，则上天不可以欺骗；用以愚弄下民，则下民不可以愚弄；用以迷惑后世，则后世的人必然不会相信。肚里非难偷偷讥笑，有识之士全部如此。”第三个奏章是谈论皇帝将要巡幸亳州的，奏章说：“国家近来多效法唐明皇的所作所为。况且唐明皇并不是有美德的君主，看他的以祸取败，足以成为深深的警戒，而陛下反而仰慕他！近侍大臣知道此事而不劝谏，是不是奸佞的人呢？唐明皇奔逃到马嵬坡，已杀了杨国忠，就告谕军士们说：‘朕洞察事物判别是非不明，委任的大臣不当，近来也有觉醒。’然而已经晚了，陛下应该及早觉醒，贬斥远离奸人佞臣，不蹈唐明皇导致危亡离乱的复辙，这是国家之福啊。”第四个奏章谈论朱能的天书，奏章说：“奸邪不正的小人，胡乱言说吉祥之兆，而陛下尊崇相信他们的胡言，委曲最尊重的圣体以迎取接拜，回来将这些东西奉安于秘殿。百官和百姓，痛心疾首，不同意只在心中非难，不敢明白直说。臣下不避死亡之诛，采纳还是治罪，只在皇上明断。过去汉文成侯刘光、五利将军栾大的妄言不应验，汉武帝杀了他们。先帝之时，侯莫陈利用方术的狡诈暴露，杀于郑州。唐明皇得到的灵符宝券都是王礪、田同秀等人所制造，不能对他们施以公开的杀戮。今天在阁上见太上老君，明天在山中见太上老君，大臣白拿俸禄因而送迎，正直之士畏惧皇威而沉默。等到安禄山开始作乱，李辅国劫持迁居，天命既已倾倒，以前的功业全部废弃。现在朱能的所作所为就是这样。希望陛下远思汉武帝的雄才大略，近学先帝的英明果断，中间借鉴唐明皇所招来的祸患，差不多灾害就不会发生，祸乱就不会兴作。”孙奭的论说劝谏，虽是唐代的魏郑公（魏征）、陆宣公（陆贽）都不能超过。

赦恩为害

【原文】 赦过宥罪，自古不废，然行之太频，则惠奸长恶，引小人于大谴之域，其为害固不胜言矣。唐庄宗同光二年大赦，前云：“罪无轻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而又曰：“十恶、五逆、屠牛、铸钱、故杀人、合造毒药、持仗行劫、官典犯赃，不在此限。”此制正得其中。当乱离之朝，乃能如是，亦可取也，而今时或不然。

【译文】 赦免过错宽宥罪行，自古没有废除过，但实行太频繁，就会仁慈奸人助长邪恶，引导小人陷于犯罪之地，这种危害本来就不能一个一个地说出来。唐庄宗同光二年大赦，前面说：“罪过不论轻重，常赦允许不加追究的，都

予赦免。而又说：“十恶、五逆、屠杀耕牛、私自铸钱、故意杀人、合造毒药、持仗抢劫、官吏贪赃犯法，不在大赦之内。”这一诏书正适合大赦的宗旨。唐庄宗在紊乱离散的朝代，尚且能够如此，也有可取之处，而现在有时就不是这样了。

代宗崇尚释氏

【原文】 唐代宗好祠祀，未甚重佛。元载、王缙、杜鸿渐为相，三人皆好佛。上尝问以“佛言极应，果为有无”？载等奏：“国家运祚灵长，非宿植福业，何以致之？福业已定，虽时有小灾，终不能为害，所以安、史有子祸，仆固病死，回纥、吐蕃不战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上由是深信之，常于宫中饭僧，有寇至则令僧讲《仁王经》以禳之，寇去则厚加赏赐。胡僧不空，官至卿、监，爵为国公，出入禁闕，势移权贵，此唐史所载也。予家有严郢撰《三藏和尚碑》，徐季海书，乃不空也，云：“西域人，氏族不闻于中夏，玄、肃、代三朝皆为国师。代守初以特进、大鸿胪褒表之。及示疾，又就卧内加开府仪同三司、肃国公。既亡，废朝三日，赠司空。”其恩礼之宠如此。同时又有僧大济，为帝常修功德，至殿中监。赠其父惠恭兖州刺史，官为营办葬事，有敕葬碑，今存。时兵革未尽息，元勋宿将，赏功赋职，不过以此处之，顾施之一僧，缪滥甚矣！

【译文】 唐代宗喜好祭神，不太看重奉佛。元载、王缙、杜鸿渐为宰相，三人都喜好奉佛。皇上曾问以“佛说因果报应，究竟是有还是没有”？元载等回奏说：“国家的气数威灵长久，不是素来培植福德功业，怎么能够得以这样？福德功业已经固定，虽然有些小灾祸，终究不能构成大害，所以安禄山、史思明都有被儿子杀身的灾祸，仆固怀恩病死，回纥、吐蕃没有交战就退了，这些都不是人力所能办得到的。”皇上于是深深信佛，常常在宫中请僧徒们吃饭，有寇盗来到则令僧徒讲《仁王经》以驱除灾祸，寇盗离去则优厚地予以赏赐。有一位胡人僧徒名叫不空，官封到卿、监，封爵为国公，出入于宫廷，他的势力可以左右有权的显贵，这是《唐书》所记载的。我家藏有严郢写的《三藏和尚碑》，徐季海书写上石，碑主就是不空。碑文说：“和尚是西域人，他的氏族在中国没有听闻，于玄宗、肃宗、代宗三朝都为国师。代宗初年，以特进、大鸿胪等官衔褒赏他。等看到他有病，又到他卧室内加官为开府仪同三司、封为肃国公。不空去世，罢朝三天，赠他为司空。”代宗对他恩泽礼遇的优宠就是如此。与不空同时又有一名僧徒叫大济，常为皇帝修治善事，官至殿中监，赠他父亲

惠恭为兖州刺史。官家为他营办了丧葬之事，刻有敕命的墓碑，今天还存在。当时战事并未完全停息，有大功勋的臣僚和老将，赏功而赐给官职。不过就是按这样办理，但施之于一个僧徒，荒谬不当就太严重了。

光武 苻坚

【原文】 汉光武建武三十年，群臣请封禅泰山。诏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吾谁欺，欺天乎？若郡县远遣吏上寿，盛称虚美，必髡，令屯田。”于是群臣不敢复言，其英断如此。然财二年间，乃因读《河图会昌符》，诏索《河洛》讖文言九世当封禅者，遂为东封之举，可谓自相矛盾矣。苻坚禁图讖之学，尚书郎王佩读讖，坚杀之，学讖者遂绝。及季年，为慕容氏所困，于长安自读讖书，云：“帝出五将久长得。”乃出奔五将山，甫至而为姚萇所执。始禁人为讖学，终乃以此丧身亡国。“久长得”之兆，岂非言久当为姚萇所得乎？又姚与遥同，亦久也。光武与坚非可同日语，特其事偶可议云。

【译文】 汉光武帝建武三十年（54年），群臣请光武帝在泰山封禅。光武帝下诏书说：“我即位三十年来，百姓怨气满腹，我欺骗谁呢，欺骗上天吗？如果郡县从远方派遣官吏前来为我上寿，我必然要处之以髡刑，罚他到边地去屯田。”于是群臣不敢再说封禅的事了，光武帝英明决断到这种程度。然而才过二年的时间，只因读《河图会昌符》，下诏索要《河图》、《洛书》关于吉凶应验的文字所说九世应当封禅的话，于是进行东封的举动，可算是自相矛盾了。前秦皇帝苻坚禁止研习迷信的讖书，尚书郎王佩读讖书，苻坚将他处死，学习讖书的风气就断绝了。到苻坚晚年，被慕容充国困于长安，他自己也读起讖书来，讖书说：“帝出五将久长得。”就出奔五将山，刚到就被羌族首领姚萇拿获。开始时禁止别人学讖书，最后就因此丧身亡国。“久长得”的预兆，难道是说久当为姚萇所得吗？又姚与遥同音，遥也是久的意思。苻坚本不能与光武帝相提并论，只是在这件事上偶尔可以说一说。

周武帝宣帝

【原文】 周武帝平齐，中原尽入舆地，陈国不足平也，而雅志节俭，至是愈笃。后宫唯置妃二人，世妇三人，御妻三人，则其下保林、良使辈，度不过

数十耳。一传而至宣帝，奢侈酣纵，自比于天，广搜美女，以实后宫，仪同以上女不许辄嫁，遂同时立五皇后。父子之贤否不同，一至于此！

【译文】 北周武帝宇文邕灭掉北齐后，中原地区都成了他的领土，地处江南的陈国就容易平定了，而他素志节俭，到这时更加专一。后宫仅设置妃子二人，世妇三人，御妻三人，则其下的保林、良使等女官，估计也不过几十人而已。传到他儿子宣帝时，就奢侈荒淫醉酒放纵，自比于天，广泛搜索美女，用来充实后宫，仪同三司官员以上的女儿不许出嫁，同时立有五个皇后。他们父子贤恶的不同，竟达到这种程度呢！

唐观察使

【原文】 唐世于诸道置按察使，后改为采访处置使，治于所部之大郡。既又改为观察，其有戎旅之地，即置节度使。分天下为四十余道，大者十余州，小者二、三州，但令访察善恶，举其大纲。然兵甲、财赋、民俗之事，无所不领，谓之都府，权势不胜其重，能生杀人，或专私其所领州，而虐视支郡。元结为道州刺史，作《舂陵行》，以为“诸使诛求符牒二百余通，”又作《贼退示官吏》一篇，以为“忍苦哀敛”。阳城守道州，赋税不时，观察使数诮责，又遣判官督赋，城自囚于狱。判官去，复遣官来按举。韩愈《送许郢州序》云：“为刺史者常私于其民，不以实应乎府，为观察使者常急于其赋，不以情信乎州，财已竭而敛不休，人已穷而赋愈急。”韩皋为浙西观察使，封杖决安吉令孙 至死。一时所行大抵类此，然每道不过一使临之耳。今之州郡控制按刺者，率五六人，而台省不预，毁誉善否，随其意好，又非唐日一观察使比也。

【译文】 唐代在各道设置按察使，后来改为采访处置使，治所设在所辖道的大郡。不久又改为观察使。在有军队的地方，就设置节度使。将全国分为四十多道，大道有十几个州，小道有两三个州，只让观察使访察善恶，总领道中之大事。然而军事、财赋、民俗之类的事，观察使无所不管，称之为都府，他的权势大得不能节制，有可以生杀人的权力，有的一意偏爱所管辖的州，而虐待其它的郡。元结任道州刺史，作《舂陵行》说“接到各使征税的公文二百多份”，又作《贼退示官吏》一篇，认为“忍受痛苦聚敛”，阳城任道州刺史，赋税交纳不及时，观察使屡次责备其失职，还派判官来监督交纳赋税，阳城将自己关进监狱。判官离去，又派官员来进行审查。韩愈《送许郢州序》云“任刺史的人常常偏护于所辖百姓，不用实情应对于都府，任观察使的人常常迫切地

敛赋税，不以情义取信于州。财力已枯竭而聚敛不止，百姓已贫穷而敛赋越急迫。”韩皋任浙西观察使，封好一根土林处置安吉令孙懈，使其至死。这一时期所做的大抵都与此类似，然而每道不过有一位观察使临任。现在的控制按察州郡的人，大概有五六人，而且台省不干预，诽谤称誉善恶，随这些人的意向好恶，又不是唐代一位观察使可比的了。

冗滥除官

【原文】 自汉以来，官曹冗滥之极者，如更始“灶下养，中郎将，烂羊头，关内侯”，晋赵王伦“貂不足，狗尾续”，北史周世“员外常侍，道上比肩”，唐武后“补阙连车，拾遗平斗”之谚，皆显显著见者。中叶以后，尤为泛滥，张巡在雍丘，才领一县千兵，而大将六人，官皆开府特进，然则大将军告身博一醉，诚有之矣。德宗避难奉天，浑瑊之童奴曰黄芩，力战，即封渤海郡王。至于僖、昭之世，遂有“捉船郭使君”、“看马李仆射”。周行逢据湖湘，境内有“漫天司空、遍地太保”之讥。李茂贞在凤翔，内外持管龠者，亦呼为司空、太保。韦庄《浣花集》有《赠仆者杨金》诗云：“半年勤苦蕘荒居，不独单寒腹亦虚。努力且为田舍客，他年为尔觅金鱼。”是时，人奴腰金曳紫者，盖不难致也。

【译文】 自汉朝以来，官员设置繁杂泛滥最为突出的，如更始皇帝刘玄时，有“灶下养，中郎将，烂羊头，关内侯”的谚语；西晋赵王伦专权时有“貂尾不够，用狗尾来续”的谚语；北周时有“员外常侍，道路上肩挨着肩”的谚语；唐武则天时“补阙连车，拾遗平斗”的谚语，都是最为突出的例子。唐中期以后官员就更加枉滥，张巡守雍丘时，率领一县一千多兵马，而大将就有六人，官阶都是开府特进之类，但是大将军的凭证只能换取一次醉酒的钱，显然是有的。唐德宗避难奉天，浑瑊的家奴叫黄芩，因为努力战斗，立即被封为渤海郡王。至于僖宗、昭宗时，有“捉船郭使君，看马李仆射”的话头。周行逢占据湖湘一带时，他的境内有“漫天司空，遍地太保”的谚语。李茂贞在凤翔时，内外掌握钥匙的人，也都为司空、太保。韦庄《浣花集》有《赠仆者杨金》诗说：“半年勤苦蕘荒居，不独单寒腹亦虚。努力且为田舍客，他年为尔觅金鱼。”这时，大户人家的家奴为达官显宦，并不难办。

节度使称太尉

【原文】 唐节度使带检校官，其初只左右散骑常侍，如李 在唐、邓时所称者也。后乃转尚书及仆射、司空、司徒，能至此者盖少。僖、昭以降，藩镇盛强，武夫得志，才建节钺，其资级已高，于是复升太保、太傅、太尉，其上惟有太师，故将帅悉称太尉。元丰定官制，尚如旧贯。崇宁中，改三公为少师、少傅、少保，而以太尉为武阶之冠，以是凡管军者，犹悉称之。绍兴间，叶梦得自观文殿学士，张澄自端明殿学士，皆拜节度。叶尝任执政，以暮年拥旄，为儒者之荣，自称叶太尉。张微时用邓洵武给使恩出身，羞为武职，但称尚书如故，其相反如此。

【译文】 唐朝的节度使加检校官，开始时只加左右散骑常侍，如李璣为唐邓节度使时称左散骑常侍，后来就转为加尚书和仆射、司空、司徒，能达到加这些检校官的人可能还少。僖宗、昭宗二朝以来，藩镇力量强盛，武夫得到重用，才被授予符节和斧钺，他的官资品级就已提高，于是又升任太保、太傅、太尉，这些官职的上面只有太师了，所以将帅都称为太尉。元丰年间制定官制，还依旧例。崇宁年间，改三公为少师、少傅、少保，而且将太尉作为武官品阶之首，因此凡是掌管军队的人，还都这样称谓。绍兴年间，叶梦得从观文殿学士，张澄由端明殿学士，都拜授为节度使，叶梦得曾经任宰相，因晚年拥有军权，成为儒者的荣耀，自称叶太尉。张澄地位微贱时因邓洵武给使恩为官，羞于任武职，像以前一样只称尚书，二者如此不相同。

五代滥刑

【原文】 五代之际，时君以杀为嬉，视人命如草芥，唐明宗颇有仁心，独能斟酌援救。天成三年，京师巡检军使浑公儿口奏：有百姓二人，以竹竿习战斗之事。帝即传宣令付石敬瑭处置，敬瑭杀之。次日枢密使安重诲敷奏，方知悉是幼童为戏。下诏自咎，以为失刑，减常膳十日，以谢幽冤，罚敬瑭一月俸，浑公儿削官、杖脊、配流登州；小儿骨肉，赐绢五十匹，粟麦各百硕，便令如法埋葬。仍戒诸道州府，凡有极刑，并须仔细裁遣。此事见《旧五代史》，《新书》去之。

【译文】 五代时期，在位君主视杀人为儿戏，看待人命和草芥一样轻微，后唐明宗李嗣源很有仁爱之心，唯独他能考虑援救他人。天成三年（928年），京城巡检军使浑公儿向皇上亲口奏说，有百姓二人，用竹竿演习战斗的事。皇上立即传令让石敬瑭处理这件事，石敬瑭将二人杀死。第二天枢密使安重诲陈述奏言，才知道是小孩在一起玩耍游戏。明宗下诏谴责自己的罪过，因为有失于刑罚，减少自己膳食十天，用来谢罪于阴间冤魂；扣罚石敬瑭一个月的俸禄；浑公儿被削去官职，用棍子打他的脊背，流配到登州去；对这两个小孩的亲属，赐绢五十匹，粟米和麦各一百石，即令遵照法律埋葬。同时告诫各道州府，凡有死刑，并须仔细裁决。这件事见于《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则删去了。

太一推算

【原文】 熙宁六年，司天中官正周琮言：“据《太一经》推算，熙宁七年甲寅岁，太一阳九、百六之数，至是年复元之初，故经言太岁有阳九之灾，太一有百六之厄，皆在入元之终或复元之初。阳九、百六当癸丑、甲寅之岁，为灾厄之会，而得五福太一移入中都，可以消灾为祥。窃详五福太一自雍熙甲申岁入东南巽宫，故修东太一宫于苏村，天圣己巳岁入西南坤位，故修西太一宫于八角镇。望稽详故事，崇建宫宇。”诏度地于集禧观之东，于是为中太一宫。时王安石擅国，尽变乱祖宗法度，为宗社之祸，盖自此始，虽太一照临，亦不能救也。绍熙四年癸丑、五年甲寅，朝廷之间殊为多事，寿皇圣帝厌代，泰安以久疾退处，人情业业，皆有忧葵恤纬之虑。时无星官历翁考步推躔，庸讎知非入元、复元之际乎？

【译文】 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司天中官正周琮说：“根据《太一经》推算，明年甲寅年，是太一阳九、百六之数，到这年复元之初，所以《太一经》说太岁有阳九的灾难，太一有百六的灾难，都有入元最后一年或复元的初年。灾难应当在癸丑、甲寅这两年，为灾难交会之年，而得到寿、富、康宁、德、善终五种福气，元气就移入中都，可以消灾为吉祥。我私自详查五福元气自太宗雍熙元年就进入东南巽宫，所以修东太一宫于京城东南的苏村，仁宗天圣七年（1029年）进入西南坤位，所以修西太一宫于京城西部的八角镇。希望陛下考查以往旧例，高建宫宇。”皇上下诏丈量土地于集禧观以东，于是为中太一宫。当时王安石掌握国家大权，完全变乱祖宗法制，为宗庙社稷的祸害，基本是从这开始，虽然元气照临，也不能得到挽救。光宗绍熙四年、五年，朝廷

之间特别多事，寿皇圣帝驾崩，泰安因久病退处，人情危惧，都有忧国忘家的考虑，当时并没有星官历翁考究星体的运行和推算那些幽深玄妙的元气，怎么知道入元、复元之间的界限呢？

赵丞相除拜

【原文】 绍熙五年七月十六日宣麻制，以太中大夫、知枢密院事赵汝愚为特进、右丞相，议者或谓国朝无宗室宰相，且转官九级非故事。赵上章力辞，不肯入都堂莅职。越六日，诏改除枢密使，依宰臣超三官。又二日，制除正议大夫、枢密使，迈考按故实，宣和二年，王黼自通议大夫、中书侍郎拜特进、少宰，凡迁八官，黼受之。靖康元年，吴敏自中大夫、知枢密院，拜银青光禄大夫、少宰，亦迁八官，敏辞之，但以通议就职。秦桧当国，以其子 为中大夫、知枢密院，已而除观文殿学士，恩数如右仆射，遂暗转通奉大夫，逾年，加大学士，径超七秩为特进， 处之不疑。舍此三人外，盖未之有。若自宰相改枢密使，唯夏竦一人。是时以陈执中为昭文相，竦为集贤相，御史言：“竦向在陕西，与执中议论不协，不可同寅政地。”于是贴麻改命，而初制不出。今汝愚先报相麻，后报枢制，乃是经日已久，因固辞以然。又按国史，明道二年，宰臣张士逊、枢密使杨崇勋同日罢，士逊以左仆射判河南府，崇勋以节度使、平章事判许州，明日入谢，崇勋班居上。仁宗问之，士逊奏曰：“崇勋系使相，臣官只仆射，当在下。”即再锁院，以士逊为使相。是时，学士盛度当制，犹用士逊作相衔，论者非之，谓应用仆射、河南为前衔也。乾道二年，叶 以前参知政事召还为知枢密院，未受告而拜左相，迈当制，以新除知枢密院结衔。今汝愚拜相宣麻，已阅八日，故称新除特进、右丞相。二者皆是也。

【译文】 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七月十六日宣读皇上用黄白麻纸下的诏书，以太中大夫、知枢密院事赵汝愚任特进、右丞相，议政官员认为我大宋朝还没有宗室贵族任宰相的，况且又转官九级都不符合以前的惯例。赵汝愚上奏章竭力辞去，不肯进入尚书省总办公处任职。过了六天，又下诏改任枢密使，仍依宰臣超过太尉、司徒、司空三官。又经过两日，下诏任正议大夫、枢密使。我考按以往实情，徽宗宣和二年（1120年），王黼自通议大夫、中书侍郎任特进、少宰，共升迁八级，王黼接受了。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吴敏自中大夫、知枢密院，任银青光禄大夫、少宰，也升迁八级，吴敏辞去，仅以通议就职。秦桧当权时，用他的儿子秦晫为中大夫、知枢密院，不久任观文殿学士，恩惠和

右仆射一样，于是暗中转任通奉大夫，超过一年，又加大学士，直越七级为特进，秦曩恬然接受。除这三人外，大概没有了。如自宰相改任枢密使，只夏竦一人。当时因陈执中为昭文相，竦为集贤相，御史说：“夏竦以往在陕西时，与陈执中意见不合，不可同日主管一地。”于是加以更改，而最初的诏书没有出来。现在赵汝愚先接到任命宰相的诏书，后接到任命枢密院的诏书，如此已经时间很久了，因而坚辞如此。又按照国史，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宰相张士逊、枢密使杨崇勋同日改任，士逊以左仆射判河南府，杨崇勋以节度使、平章事判许州，第二天入宫谢恩时，杨崇勋班次居上，仁宗问张士逊，张士逊奏说：“杨崇勋是出使的宰相，臣的官只是仆射，应当在下。”即再锁院，用张士逊为使相。当时，学士盛度当起草制书还用张士逊作相衔，议论的人都认为不应该这样，应该称用仆射、河南为以前官衔。孝宗乾道二年（1166年），叶喻以前参知政事召还回京，任知枢密院，还没有授给凭证而就任命为左相，当时我应起草制书，用新任知枢密院来总结他的官衔。现在赵汝愚任相宣告黄白麻纸诏书，已过了八日，所以应该称新任特进、右丞相。二者都应该是这样。

唐昭宗恤录儒士

【原文】 唐昭宗光化三年十二月，左补阙韦庄奏：“词人才子，时有遗贤，不沾一命于圣明，没作千年之恨骨。据臣所知，则有李贺、皇甫松、李群玉、陆龟蒙、赵光远、温庭筠、刘德仁、陆逵、傅锡、平曾、贾岛、刘稚、罗邺、方干，俱无显遇，皆有奇才，丽句清词，遍在词人之口，衔冤报恨，竟为冥路之尘。伏望追赐进士及第，各赠补阙、拾遗。见存唯罗隐一人，亦乞特赐科名，录升三署。”敕奖庄而令中书门下详酌处分。次年天复元年赦文，又令中书门下选择新及第进士中，有久在名场，才沾科级，年齿已高者，不拘常例，各授一官。于是礼部侍郎杜德祥奏：拣到新及第进士陈光问年六十九，曹松年五十四，王希羽年七十三，刘象年七十，柯崇年六十四，郑希颜年五十九。诏光问、松、希羽可秘书省正字；象、崇、希颜可太子校书。按《登科记》，是年进士二十六人，光问第四，松第八，希羽第十二，崇、象、希颜居末级。昭宗当斯时离乱极矣，尚能眷眷于寒儒，其可书也。《摭言》云：“上新平内难，闻放新进士，喜甚，特敕受官，制词曰：‘念尔登科之际，当予反正之年，宜降异恩，各膺宠命。’时谓此举为五老榜。”

【译文】 唐昭宗光化三年（900年）十二月，左补阙韦庄上奏说：“词人

才子，时常有遗漏的贤材，没有得到皇帝授于一级官职的恩泽，死后成为千年遗恨的枯骨。据臣所知，就有李贺、皇甫松、李群玉、陆龟蒙、赵光远、温庭筠、刘德仁、陆逵、傅锡、平曾、贾岛、刘稚癯、罗邺、方干，都没有荣显的际遇，均有奇才，华美的词句清新的文词，普遍地传诵于词人之口，含冤抱恨，竟成为阴间路上的尘埃。恭敬地希望追赐他们进士及第，分别赠官为补阙、拾遗。现在存活的只有罗隐一个人，也乞求特别赐予科举名目，次第升任三署。昭宗褒奖韦庄而且命令中书门下认真酌情处理。第二年天复元年（901）朝廷下赦文，又命令中书门下在新考中的进士中挑选，有长期参加考试，才能达到科举名目级别，年事已高的人，不拘于通常的条例，各人授予一官。于是礼部侍郎杜德祥上奏：挑选到新考中的进士陈光问六十九岁，曹松五十四岁，王希羽七十三岁，刘象七十岁，柯崇六十四岁，郑希颜五十九岁。诏令陈光问、曹松、王希羽可任秘书省正字；刘象、柯崇、郑希颜可任太子校书。查《登科记》，这一年进士二十六人，陈光问第四，王希羽第十二，柯崇、刘象、郑希颜则处末等。昭宗正处在战乱流离十分严重的时刻，还能依恋向往寒微的儒生，这应该记载。《摭言》说：“皇上新平息内乱，开科放新进士，非常高兴，诏书说：‘想到你们登科的时候，正当我由乱转治的年代，应该颁降特有的恩泽，各自接受加恩特赐的任命。’当时称这一举动是‘五老榜’。”

卷八

徽宗荐严疏文

【原文】 徽宗以绍兴乙卯岁升遐。时忠宣公奉使未反命，滞留冷山，遣使臣沈珍往燕山，建道场于开泰寺，作功德疏曰：“千岁厌世，莫遂乘云之仙，四海遏音，同深丧考之戚。况故宫为禾黍，改馆徒馈于秦牢，新庙游衣冠，招魂漫歌于楚些。虽置河东之赋，莫止江南之哀，遗民失望而痛心，孤臣久縻惟呕血。伏愿盛德之祀，传百世以弥昌，在天之灵，继三后而不朽。”北人读之亦堕泪，争相传诵。其后梓宫南还，公已徙燕，率故臣之不忘国恩者，出迎于城北，搏膺大恸，虏俗最重忠义，不以为罪也。

【译文】 徽宗被金国俘虏后于绍兴五年（1135年）驾崩。当时我父亲忠宣公正奉命出使金国被扣押不能返回，停留在冷山，派遣使臣沈珍前往燕山，修建诵经的道场于开泰寺，作功德疏说：“千年之后离开了尘世，不能顺利地登上仙路，天下停止音乐，和死去自己父亲一样哀痛。再加上旧宫已成为禾黍生长的地方，改变住地徒步求食到金国的牢狱，新庙中到处是缓行的大臣，招魂漫歌于江南。虽设置有河东地方的赋税，也止不住江南的哀痛，遗民失望而痛心，我们久被拘囚，只有吐血而已。惟愿盛德的祭礼，能传至百代更加昌盛，在天之灵，继续夏、商、周三代而不朽。”金国的人读后也都为之流泪，争着互相传诵。后来徽宗的灵柩南还，忠宣公这时也已经迁到燕地，就率领不忘国家恩惠的旧臣，出城迎接徽宗灵柩，捶胸恸哭，金国风俗最重视忠义，也不认为是犯罪。

忠宣公谢表

【原文】 建炎三年，先忠宣公衔命使北方，以淮甸贼蜂起，除兼淮南、京东等路抚谕使，俾李成以兵护至南京。公遣书抵成，成方与耿坚围楚州，答书曰：“汴涸，虹有红巾，非五千骑不可往。军食绝，不克唯命。”公阴遣客说坚，

坚强成斂兵。公行未至泗，谍云：“有迎骑甲而来。”副使龚 懔之，送兵亦不肯前，遂反旆。即上疏言：“李成以馈饷稽缓，有引众纳命建康之语。今靳赛、薛庆方横，万一三叛连衡，何以待之？方含垢养晦之时，宜选辩士谕意，优加抚纳。”疏奏，高宗即遣使抚谕成，给米五万斛。初，公戒所遣持奏吏，须疏从中出，乃诣政事堂白副封。时方禁直达，忤宰辅意，以托事滞留为罪，特贬两秩，而许出滁阳路。绍兴十三年使回，始复元官。时已出知饶州，命予作谢表，直叙其故，曰：“论事见从，犹获稽留之戾。出疆滋久，屡沾旷荡之恩。始拜明纶，得仍旧秩。伏念臣顷繇乏使，不敢辞难。值三盗之连衡，阻两淮而荐食，深虞猖獗之患，或起呼吸之间，辄露便宜，冀加勤恤。虽玺书赐报，乐闻充国之建言，而吏议不容，见谓陈汤之生事。亏除官簿，绵历岁时，敢自意于来归，遂悉还于所夺。兹盖忘人之过，与天同功。念臣昔丽于微文，蔽罪本无于他意，故从数赦，俾获自新。”书印既毕，父兄复共议，秦桧方擅国，见此表语言，未必不怒，乃别草一通引咎曰：“使指稽留，宜速亏除之戾。圣恩深厚，卒从 拭之科。仰服矜怜，唯知感戴。伏念臣早繇乏使，遂俾行成，值巨寇之临冲，欲搏人而肆毒，仗节宜图于报称，引车何事于逡巡。徐偃出疆，既失受辞之体，申舟假道，初无必死之心。虽蒙贬秩以小愆，尚许立功而自赎。徒行万里，无补一毫，敢妄冀于隆宽，乃悉还于旧贯。兹盖忘人之过，抚下以仁。阳为德而阴为刑，未尝私意，赏有功而赦有罪，皆本好生，坐使孤臣，尽湔宿负”云云。前后奉使，无有不转官者。先公以朝散郎被命，不沾恩凡十五年，而归仅复所贬，而合磨勘，五官刑部，皆不引用，秦志也。遂终于此阶。

【译文】 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先父忠宣公奉命出使金国，因淮河一带盗贼蜂起，被任命兼淮南、京都等路抚谕使，让李成用兵护卫到南京（今河南商丘）。先父先发信到李成那里，当时李成与耿坚正围攻楚州，答书说：“汴河已经干涸，虹县有红巾军，除非有五千兵马不可往那里去。军队绝粮，不能胜任此命。”先父暗中派遣说客说服耿坚，耿坚强迫李成收兵。当先父还没有走到泗州时，刺探敌情的人员报告说：“有骑兵往这迎面而来。”副使龚懔很害怕，护送的士兵也不肯前进，于是返回。先父即上书高宗说：“李成因军饷迟缓，有领军回建康交差的话，现在靳赛、薛庆正横行一时，万一他们三股叛军联合起来，如何对待他们？正当忍受耻辱隐藏待起之时，应选择舌辩之士以晓喻皇上的意思，给以优厚待遇抚慰收纳他们。”高宗接到奏疏后，即派遣使臣安抚李成，给米五万斛。当初，先父命令所派遣的送书官吏，奏疏必须从朝中出，才能前往政事堂交出副件。当时正禁止奏疏直达皇上，违背宰相心意，宰相就以办事拖拉的罪名，特此贬官两级，才许出任滁阳路官员。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

年)出使金国后回国,先父才恢复原来的官职。当时先父已经出任饶州知州,命我作感谢的表章,我直叙其中的原因,说:“建议已被采纳,仍然得个办事拖拉的罪名。出使金国日久,屡次获得宏大的恩惠。开始任显官时,得到的仍然是旧俸禄。考虑我被任命为使节,又不敢推辞畏难。当时正值三股盗贼联合之时,阻隔淮北、淮南而不断侵略土地,深感忧虑猖狂的祸患,或起于一瞬间之间。依靠道路方便,希望勤加抚恤。虽然皇上下诏书加以赏赐,乐于听从像汉代赵充国平定武都氏人反叛那样的建议,而官吏议论不允许,说我象西汉陈汤那样多事。枉任朝臣,延续岁月,不敢寄奢望于归来,于是全部归还所夺去的官秩。这大概是朝廷忘记了别人的过错,和天有同样的功德。想想过去因为一篇小文章获罪,遮盖自己的罪过本来没有其他的意,所以听从数次赦免,使我改过自新。”书写盖印既已完毕,父兄共同商议,担心秦桧正专擅国政,见此上表中的语言会发怒,就另外起草一通引罪自责的上表,说:“命令指责停留,应该加以重罚。皇恩深厚,终于从轻发落。敬服怜悯之心,只知感恩戴德。念臣早年被任命为使节,使我能够出使求和,当时正值贼寇攻城掠地,想杀人而残害无辜,拿着凭证应图报于朝廷,既已出行,怎敢迟疑不决?徐偃王走出自己的疆土,大损国格,楚国的申舟借道于宋,最初并没有必死的决心。虽然承蒙朝廷贬官给以小的惩处,却还允许立功赎罪。徒步行程万里,对国家没有丝毫补益,怎敢妄自希望于宽恕,可朝廷还是复了我原官。这是忘记别人过错,安抚下面以仁德。阳是德阴是刑,不曾有私心,奖赏有功者赦免有罪者,全是为了给人以活路,将使我尽洗先前的过失”等等。前后奉使的人,没有不提升官职的。先父以朝散郎被任命为使臣以来,被羁押十五年受尽辛苦,回来后却仅仅恢复所贬的官职,而又应当磨勘,五官于刑部,都不引用,这是秦桧的意志。于是死在这个任上。

四六名对

【原文】 四六骈俪,于文章家为至浅,然上自朝廷命令、诏册,下而缙绅之间笺书、祝疏,无所不用。则属辞比事,固宜警策精切,使人读之激聩,韵味不厌,乃为得体。姑摭前辈及近时缀缉工致者十数联,以诒同志。

王元之《拟李靖平突厥露布》,其叙颉利求降且复谋窜曰:“阱中饿虎,暂为掉尾之求;砲上饥鹰,终有背人之意。”《蕲州谢上表》曰:“宣室鬼神之问,敢望生还;茂陵封禅之书,已期身后。”

范文正公微时，尝冒姓朱，及后归本宗，作启曰：“志在逃秦，入境遂称于张禄；名非霸越，乘舟偶效于陶朱。”用范雎、范蠡，皆当家故事。

邓润甫行《贵妃制》曰：“《关雎》之得淑女，无险私谒之心；《鸡鸣》之思贤妃，有警戒相成之道。”

绍圣中，《百僚请御正殿表》曰：“皇矣上帝，必临下而观四方；大哉乾元，当统天而始万物。”

东坡《坤成节疏》曰：“至哉坤元，德既超于载籍；养以天下，福宜冠于古今。”《慰国哀表》曰：“大哉孔子之仁，泫然流涕；至矣显宗之孝，梦若平生。”《谢赐带马表》曰：“枯羸之质，匪伊垂之而带有余；敛退之心，非敢后也而马不进。”

王履道《大燕乐语》曰：“五百里采，五百里卫，外包有截之区；八千岁春，八千岁秋，上祝无疆之寿。”《除少宰余深制》曰：“盖四方其训，以无竞维人；必三后协心，而同底于道。”时并蔡京为三相也。《执政以边功转官词》曰：“惟皇天付予，庶其在此；率宁人有指，敢弗于从。”

翟公巽行《外国王加恩制》曰：“宗祀明堂，所以教诸侯之孝；大赉四海，不敢遗小国之臣。”知越州日，以擅发常平仓米救荒降官，谢表曰：“敢效秦人，坐视越人之瘠；既安刘氏，理知晁氏之危。”

孙仲益试词科日，《代高丽国王谢赐燕乐表》曰：“玉帛万国，干舞已格于七旬；箫韵九成，肉味遽忘于三月。”又曰：“荡荡乎无能名，虽莫见宫墙之美；欣欣然有喜色，咸豫闻管龠之音。”自中书舍人知和州，既压境，见任者拒不纳，以启答郡僚曰：“虽文书衔袖，大人不以为疑；然君命在门，将军为之不受。”邻郡不发上供钱米，受旨推究，为平亭其事，邻守驰启来谢，答之曰：“包茅不入，敢加问楚之师；辅车相依，自作全虞之计。”

汪彦章作《靖康册康王文》曰：“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为中书舍人试潭州，进士何烈卷子内称臣及圣，问不举觉，坐罢职，谢表曰：“谓子路使门人为臣，虽诚悖理；而徐邈云酒中有圣，初亦何心？”又曰：“书马者与尾而五，常负谴忧；网禽而去面之三，永衍生赐。”宋齐愈坐于金虎立诸臣状中，辄书“张邦昌”字，送御史台，责词曰：“义重于生，虽匹夫不可夺志；士失其守，或一言几于丧邦。”又曰：“睦孟五行之说，岂所宜言？袁宏九锡之文，兹焉安忍？”责张邦昌词曰：“虽天夺其衷，坐愚至此；然君异于器，代匮可乎？”知徽州，其乡郡也，谢启曰：“城郭重来，疑千载去家之鹤；交游半在，或一时同队之鱼。”

何抡除秘书少监，未几，以口语出守邛，谢启曰：“云外三山，风引舟而莫

近；海滨八月，槎犯斗以空还。”

杨政除太尉，汤岐公草制曰：“远览汉京，传杨氏者四世；近稽唐室，书系表者七人。”谓杨震子秉、秉子赐、赐子彪，四世为太尉。李德裕辞太尉云：“国朝重惜此官，二百年间才七人。”其用事精确如此。

蒋子礼拜右相，王 贺启曰：“早登黄阁，独见明公之妙年；今得旧儒，何忧左辅之虚位？”皆用杜诗语“扈圣登黄阁，明公独少年”，“左辖频虚位，今年得旧儒”，亦可称。

【译文】 四六对偶，对于文章家来说是很浅易的事，但上自朝廷命令、诏书册封，下至官宦之间书信、祝颂之词，没有不用它的。撰文记事，固然应当扼要精切，使人读后振奋昂扬，讽诵玩味不厌，就称得上得体。姑且摘取前辈以及近时编缀工整的数联，用来赠送给志同道合的人。

王元之《拟李靖平突厥露布》，在叙述突厥首领颉利求降于唐朝后又谋划逃窜的事说：“阱中饿虎，暂为掉尾之求；磔上饥鹰，终有背人之意。”他在《蕲州谢上表》说：“宣室鬼神之间，敢望生还；茂陵封禅之书，已期身后。”

范仲淹先生少年贫穷的时候，曾冒姓朱，后来回归本族，作书札说：“志在逃秦，入境遂称于张禄；名非霸越，乘舟偶效于陶朱。”他用范雎、范蠡改姓的典故，的确是恰当的范例。

邓润甫做《贵妃制》说：“《关雎》之得淑女，无险礫私谒之心；《鸡鸣》之思贤妃，有警戒相成之道。”

哲宗绍圣年间，《百僚请御正殿表》说：“皇矣上帝，必临下而观四方；大哉乾元，当统天而始万物。”

苏东坡《坤成节疏》说：“至哉坤元，德既超于载籍；养以天下，福宜冠于古今。”《慰国哀表》说：“大哉孔子之仁，泫然流涕；至矣显宗之孝，梦若平生。”《谢赐带马表》说：“枯羸之质，匪伊垂之而带有余；敛退之心，非敢后也而马不进。”

王履道《大燕乐语》说：“五百里采，五百里卫，外包有截之区；八千岁春，八千岁秋，上祝无疆之寿。”《除少宰余深制》说：“盖四方其训，以无竞维人；必三后协心，而同底于道。”当时连蔡京在内共有三相，所以称三后。《执政以边功转官词》说：“惟皇天付予，庶其在此，率宁人有指，敢弗于从”。

翟公巽作《外国王加恩制》说：“宗祀明堂，所以教诸侯之孝；大赉四海，不敢遗小国之臣。”他做越州知州时，以擅自发放常平仓的米来救荒而被降官，他在谢表中说：“敢效秦人，坐视越人之瘠；既安刘氏，理知晁氏之危。”

孙仲益在应试词科时，做《代高丽国王谢赐燕乐表》说：“玉帛万国，干舞

已格于七旬；箫韶九成，肉味遽忘于三月。”又说：“荡荡乎无能名，虽莫见宫墙之美；欣欣然有喜色，咸豫闻管龠之音。”孙仲益自中书舍人到和州任知州，当他走近和州边界，现任的官员拒绝他入境，他就用书函答郡僚说：“虽文书衔袖，大人不以为疑；然君命在门，将军为之不受。”邻郡不发给上供的钱米，孙仲益受命追究，他尽力平息了这件事，邻郡长官很快送来谢罪信，孙仲益回答说：“包茅不入，敢加问楚之师；辅车相依，自作全虞之计。”

汪彦章作《靖康册康王文》说：“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他由中书舍人在潭州主持考试时，进士何烈卷子中称臣达到圣人的水平，追究他没发觉治罪的过错，坐罪罢去官职，他在谢表说：“谓子路使门人为臣，虽诚悖理；而徐邈云酒中有圣，初亦何心？”又说：“书马者与尾而五，常负谴忧；网禽而去面之三，记衔生赐。”宋齐愈因为金人所立诸臣状中，总写有“张邦昌”字样，送给御史台官员时，谴责说：“义重于生，虽匹夫不可夺志；士失其守，或一言几于丧邦。”又说：“眭孟五行之说，岂所宜言？袁宏九锡之文，兹焉安忍？”斥责张邦昌词说：“虽天夺其衷，坐愚至此；然君异于器，代匱可乎？”出任徽州知州，这是他的家乡，谢书说：“城郭重来，疑千载去家之鹤；交游半在，或一时同队之鱼。”

何抡任秘书少监，不久，因遭受谗言陷害而出任邛州知州，谢书说：“云外三山，风引舟而莫近；海滨八月，槎犯斗以空还。”

杨政任太尉，汤思退先生起草制书说：“远览汉京，传杨氏者四世；近稽唐室，写世表者七人。”指杨震的儿子杨秉、杨秉的儿子杨赐、杨赐的儿子杨彪，四代都做东汉的太尉。李德裕辞让太尉衔时说：“我大唐重视珍惜太尉的官职，二百年期间只有七人担任过这一官职。”汤岐公写制书时用典精确到这种程度。

蒋子礼官拜右相，王鞞写贺书说：“早登黄阁，独见明公之妙年；今得旧儒，何忧左辅之虚位？”都是用杜甫诗中的语言，他的诗有“扈圣登黄阁，明公独少年”，“左辖频虚位，今年得旧儒”，也可以称道。

吾家四六

【原文】 乾道初年，张魏公以右相都督江淮。议者谓两淮保障不可恃，公亲往视之。会诏归朝，未至而免相。文惠公当制，其词曰：“棘门如儿戏耳，庸谨秋防；衮衣以公归兮，庶闻辰告。”所谓儿戏者、指边将也，而读者乃以为诋魏公。其尾句曰：“《春秋》责备贤者，慨功业之惟艰；天子加礼大臣，固始终

之不替。”所以怅惜之意至矣。《王大宝致仕词》曰：“闵劳以事，圣王隆待下之仁；归挈其身，君子尽遗荣之美。”大宝有遗泄之疾，或又谓有所讥，而实不然。罢相后，起帅浙东，谢表曰：“上丞相之印，方事退藏；怀会稽之章，遽叨进用。”《谢生日诗词启》曰：“五十当贵，适买臣治越之年；八千为秋，辱庄子大椿之誉。”时正五十岁也。

绍兴壬戌词科《代枢密使谢赐玉带表》，文安公曰：“有璞于此必使琢，恍惊制作之工；匪伊垂之则有余，允谓便蕃之赐。”主司喜焉，擢为第一。

乙丑年，《代谢赐御书周易尚书表》，予曰：“八卦之说谓之索，奉以周旋；百篇之义莫得闻，坦然明白。”尾句曰：“但惊奎壁之辉，从天而下；莫测龟龙之秘，行地无疆。”亦忝此选。《代福州谢历日表》曰：“神祇祖考，既安乐于太平；岁月日時，又明章于庶征。”正用《诗·岛序》“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乐之也”，《洪范》庶征“岁月日时无易，百谷用成，义用明，俊民用章”，皆上下朕文，未尝辄增一字。《渊圣乾龙节疏》曰：“应天而行，早得尊于《大有》；象日之动，偶蒙难于《明夷》。”《易·大有》卦“柔得尊位”、“应乎天而时行”，《左传》叔孙豹筮遇《明夷》，“象日之动，故曰君子于行”，《彖辞》云“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亦纯用本文。乾道丁亥《南郊赦文》曰：“皇天后土，监于成命之诗，艺祖太宗，昭我《思文》之配。”读者以为壮。后语曰：“天地设位而圣人成能，既扑纷之况；雷雨作解而君子赦过，式流汪濊之恩。”此文先三日锁院所作，冬至日适有雷雪之异，殆成讖云。叶子昂参知政事，为谏议大夫林安宅所击罢去，林遂副枢密。已而置狱治其言，皆无实，林责居筠，叶召拜左揆。予草制曰：“既从有北之投，亟下居东之召。有欲为王留者，孰明去就之忠？无以我公归兮，太慰瞻仪之望。”本意用“公归”之句，指邦人而言也，故云“瞻仪”。而御史单时疑之，谓人君而称臣为我公，彼盖不详味词理耳。子昂坐冬雷罢相，予又当制，曰：“调阴阳而遂万物，所嗟论道之非；因灾异而劾三公，实负应天之愧。”盖固有讽谏也。《嗣濮王加恩制》曰：“天神明而照知四方，既下临于精意；王孙子而本支百世，兹载锡于蕃厘。”又曰：“春秋享祀，独冠周家之宗盟；老成典刑，蔚为刘氏之祭酒。”《土制》曰：“克羞馈祀，事其先而万国欢心；肃倡和声，行于郊而百神受职。”《赐宰臣辞免提举圣政书成转官诏》曰：“为天子父尊之至，永惟传序之恩；问圣人德何以加，莫越重华之孝。”《赐叶资政辞召命诏》曰：“见日消，顾何伤于日月；得时则驾，宜亟会于风云。”《赐史大观文以新蜀帅改越辞免诏》曰：“王阳为孝子，敢烦益部之行；庄助留侍中，姑奉会稽之计。”吴在兴元、修塞两县决坏渠为田，奖谕诏曰：“刻石立作三犀牛，重见离堆之利；复陂谁云两

黄鹄，詎烦鸿 之谣。”用老杜《石犀行》云“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及瞿方进坏鸿 陂，童谣云“反乎覆，陂当复。谁云者？两黄鹄”等语也。刘共甫自潭帅除翰林学士，答诏曰：“不见贾生，兹趣长沙之召；既还陆贄，宜膺内相之除。”《批执政辞经修哲宗宝训转官》曰：“念叠矩重规，当贤圣之君七作；而立经陈纪，在谏训之文百篇。”哲庙正为第七主，而《宝训》百卷也。《答蒋丞相辞免》曰：“永惟万事之统，知非艰而行惟艰；有不二心之臣，帅以正则罔不正。”礼部为宰臣以显仁皇后小祥请吉服，奏曰：“练而慨然，礼应顺变；期可已矣，惧或过中。”又曰：“汉中天二百而兴，益隆大业；舜至孝五十而慕，独耀前徽。”时高宗圣寿五十四也。《辛巳亲征诏》曰：“惟天惟祖宗，方共扶于基绪；有民有社稷，敢自佚于宴安。”又曰：“岁星临于吴分，定成肥水之勋；斗士倍于晋师，可决韩原之胜。”是时，岁星在楚，故云。檄书曰：“为刘氏左袒，饱闻思汉之忠； 汤后东征，必慰戴商之望。”又曰：“侯王宁有种乎？人皆可致；富贵是所欲也，时不再来。”《紫宸大宴致语》曰：“庙谟先定，百官修辅而厥后惟明；黼坐端临，五帝神圣而其臣莫及。”《修圣政转官词》曰：“念五马浮江之后，光启中兴；述六龙御天以来，式时猷训。”又曰：“荐于天而天是受，永言覆焘之恩；问诸朝而朝不知，詎测形容之妙。”《汪观文复官词》曰：“作雷雨之解而宥罪，在法当原；如日月之食而及更，于明何损？”《步帅陈敏制》曰：“亚夫持重，小棘门、霸上之将军；不识将屯，冠长乐、未央之卫尉。”《吴挺兴州制》曰：“能得士心，吴起固西河之守；差强人意，广平开东汉之兴。”《起复知金州制》曰：“惟天不吊，坏万里之长城；有子而贤，作三军之元帅。”《萧鹳巴词》曰：“随会在秦，晋国起六卿之惧；日磔仕汉， 侯传七叶之芳。”《姚仲复官制》曰：“李广数奇，应恨封侯之相；孟明一眚，终酬拜赐之师。”《追封皇第四子邵王词》曰：“举汉武三王之策，方茂徽章；念周文十子之宗，独留遗恨。”时已封建三王也。《赵忠简谥制》曰：“见夷吾于江左，共知晋室之何忧；还德裕于崖州，岂待令孤之复梦？”《王颜赠官词》曰：“申带砺以丹书之誓，方休甲第之功臣；挂衣冠于神虎之门，竟失戍营之校尉。”《向起赠官词》曰：“驰至金城郡，方思充国之忠；生入玉门关，竟负班超之望。”《李师颜赠官制》曰：“青天上蜀道，久严分阃之权；黑水惟梁州，怵失安边之杰。”《襄帅王宣赠官词》曰：“黄河如带，莫申刘氏之盟；汉水为池，空堕羊公之泪。”王淪以太常少卿朔祭太庙，忘设象尊、牺尊，降官词曰：“牺象不设，已废司彝之供；饩羊空存，殊乖告朔之礼。”《潼川神加封词》曰：“驾飞龙兮灵之 ，具严涣命；驱厉鬼兮山之左，终相此邦。”《青城山蚕丛氏封侯词》曰：“想青神侯国之封，自今以始；虽白帝公孙之盛，于我何加？”《阳山龙母词》曰：“居然生子，乘云气以为龙；

惟尔有神，时雨 而利物。”《魏丞相赠父词》曰：“大名之后必大，非此其身；和戎如乐之和，幸哉有子。”魏盖以使虏定和议，旋致大用。《赠母词》曰：“藏盟府之国功，不殊魏绛；成外家之宅相，重见阳元。”《封妻姜氏词》曰：“筮仕于晋曰魏，方开门户之祥；取妻必齐之姜，孰盛闺闱之美？”《虞丞相赠父词》曰：“活千人有封，非其身者在其子；德百世必祀，畸于人者侔于天。”又《周仁赠父词》曰：“有子能贤，高举而集吴地；受予显服，会同而朝汉京。”用东方朔《非有先生传》“高举远引，来集吴地”，及《两京赋》“春王三朝，会同汉京”也。《奖谕吴挺诏》曰：“外制将军，方有成于东乡；舟中皆敌国，应无虑于西河。”《梁丞相醴泉使兼侍读制》曰：“珍台闲馆，独冠臬、伊之伦魁；广厦细旃，尚论唐、虞之盛际。”又答诏曰：“一言可以兴邦，念为臣之不易；三宿而后出昼，勉为王而留行。”《王丞相进玉牒加恩制》曰：“载籍之传五三，壮太祖、太宗之立极；圣贤之君六七，耀永昭、永厚之诒谋。”《批以旱得雨请御殿》曰：“念七月之间则旱，咎征已深；虽三日已往为霖，忧端未贯。”

余不胜书。唯记从兄在泉幕，淮东使者，其友婿也，发京状荐之。为作谢启曰：“襟袂相连，夙愧末亲之孤陋；云泥悬望，分无通贵之哀怜。”皆用杜诗，其下句人人知之，上句乃《赠李十五丈》云：“孤陋忝末亲，等级敢比肩。人生意义气合，相与襟袂连。”此事适著题，而与前《送韦书记》诗句，偶可整齐用之，故并记于此。但以传示子孙甥侄而已，不足为外人道也。

【译文】 乾道初年，张魏公（张浚）以右相的身分都督江淮，参议的官员说两淮的设防不可依靠，张魏公亲自前往察看。恰恰朝廷诏令他回朝，还没有到达朝廷就被免了右相之职。文惠公（洪适）当值草拟制书，制书写道：“棘门如儿戏耳，庸谨秋防；袞衣以公归兮，庶闻辰告（戟门的官员如同儿戏罢了，例行严格秋天的防卫；三公的礼服因您而归朝，有幸知闻择辰相告）。”所谓的儿戏，指的是守边将帅，而读的人却以为是诋毁张魏公。制书的结尾有几句说：“《春秋》责备贤者，慨功业之惟艰；天子加礼大臣，固始终之不替（《春秋》对贤者的责备，是感慨建功立业的艰难；天子优礼大臣，本来始终是不变的）。”极尽了对张魏公的怅叹惋惜之意。王大宝的《致仕词》写道：“闵劳以事，圣生隆待下之仁；归确其身，君子尽遗荣之美（怜闵以事相劳，这是贤圣的君主对待臣宽厚之仁；回去让自身干干净净，君子尽是抛弃荣耀之美）。”王大宝有遗泄的疾病，有人又说 he 有所讥刺，而其实不是那样。罢相之后，起用为浙东帅臣，上谢表说：“上丞相之印，方事退藏；怀会稽之章，遽叨进用（上交了丞相的官印，正从事隐退；怀抱会稽帅司的印章，急遽贪于进用）。”他的《谢生日诗词启》说：“五十当贵，适买臣治越之年；八千为秋，辱庄子大椿之誉（五十

岁应当显贵，正是朱买臣治理吴越的年龄；八千岁为春秋，辱没了庄周大椿树的称誉。”当时王大宝正好五十岁。绍兴壬戌（1142）词科考试《代枢密使谢赐玉带表》，文安公（洪遵）说：“有璞于此必使琢，恍惊制作之工；匪伊垂之则有余，允谓便蕃之赐（有璞在这里必须使其雕琢，恍然掠异制作的精巧；不是有意要垂下带子使他有富余侧垂此带遵从礼仪，应该说是出于对臣僚的贵赐）。”主考官很高兴，提他为第一名。乙丑年（1145年），词科考试为《代谢赐御书〈周易〉〈尚书〉表》，我写道：“八封之说谓之索，奉以周旋；百篇之义莫得闻，坦然明白（关于八卦的书叫作索，敬持以应酬；《尚书》百篇的大义不得而闻，但自然明白）。”结尾的文句说：“但惊奎壁之辉，从天而下；莫测龟龙之秘，行地无疆（但惊文昌星的光辉，从天而降，不能猜测内府的秘籍，在地上广行没有界限）。”也惭愧地被这次考试所择取。《代福州谢日历表》中写道：“神祇祖考，既安乐于太平；岁月时日，又明章于庶征（天地神明和祖宗，既已安乐于天下太平；岁月时日的不变，又明白彰显于庶民的征验）。”正用的是《诗经·鳧癡序》“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乐之也（太平时日的君子，能够掌握天下的丰足而守护它的成功，则天地神明及祖宗便都安宁快乐了）”，以及《尚书·洪范》篇关于“庶征”“岁月日时无易，百谷用成，义用明，俊民用章（岁月日时没有变化，则百谷丰收，国家治理得清明，则贤臣得以显用而国家安宁）”的意思，都是上下联缀成文，未曾擅自增加一个字。《渊圣乾龙节疏》写道：“应天而行，早得尊于《大有》；象日之动，偶蒙难于《明夷》（与天相呼应而行，得《大有》卦而早获尊位；象征太阳的运动，遇《明夷》卦而蒙受苦难）。”《周易》的《大有》卦有“柔得尊位”、“应乎天而时行”（“柔得到尊位”、与“天相呼应而按时推行”）的话，《左传》中说为叔孙豹用《周易》占筮遇到《明夷》卦“象日之动，故曰君子于行（象征太阳的运动，所以说君子在路上）”，《周易》的《彖》辞说“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内在文明而外在柔顺，因而遭受大难）”，也是纯粹用的这段文字的意思。乾道丁亥（1167年）举行南郊祭祀大礼，颁布《赦文》说：“皇天后土，监于《成命》之诗；艺祖太宗，昭我《思文》之配（皇天和后土，根据于《昊天成命》的诗篇；太祖和太宗，昭显我《思文》的配享）。”读的人认为豪壮。后面还写道：“天地设位而圣人成能，既扑礲纷之况；雷雨作《解》而君子赦过，式流汪礲之恩（天地设立贵贱之位而圣人能令各得其所，尽倾覆了杂乱的情况；雷雨大作为《解》卦而君子赦人之过，用流深广的恩泽）。”这篇赦文是前三天锁闭院门所作，这年冬至恰有雷声下雪的异象，“雷雨”之说几乎成了讖语。叶子昂为参知政事，为谏议大夫林安宅所抨击罢官离去，林安宅于是为枢密副使。不久设案处理他

的上言，都没有实据，林安宅被贬居筠州，叶子昂拜授为尚书左仆射。我起草制词说：“既从有北之投，亟下居东之召，有欲为王留者，孰明去就之忠？无以我公归兮，大慰瞻仰之望（既听从投弃到北方，又急下居于东省的召令，有打算为君王留下的人，谁明白去朝与就位的忠诚；不要因为我公归去，大大慰藉瞻仰威仪的渴望）。”本来用《诗经》中公归句子的意思，是指邦国之人而言，所以有“瞻仰”的话。而御史单时对这句话表示疑虑，说皇帝称臣下为“我公”，他大概还没有详细品味文词的条理罢了。叶子昂因冬季打雷而罢相，我又当值草制，写道：“调阴阳而遂万物，所嗟论道之非；因灾异而劾三公，实负应天之愧（调理阴阳而协和万物，所嗟叹是谈论大道的非理；因灾异而弹劾三公，实在有负上应天象的惭愧）。”这样写是因为叶公有所讽喻和劝谏。《嗣濮王加恩制》写道：“天神明而照知四方，既下临于精意；王孙子而本支百世，兹载锡于蕃厘（上天神明而照鉴四方，既已专心致意地临视天下；君王的孙子而本支有百世，开始赐予蕃衍的福德）。”又写道：“春秋享祀，独冠周家之宗盟；老成典刑，蔚为刘氏之祭酒（春秋时代的上供祭祀，独以周家的宗盟为首；老成持重作为典型，蔚然是汉代的祭酒）。”《土礶制》中写道：“克羞馈祀，事其先而万国欢心；肃倡和声，行于郊而百神受职（用精美的食品祭祀，事奉其先人而万国欢心；端严和唱，行于郊祀而神各受其职）。”《赐宰臣辞免提举圣政书成转官诏》中写道：“为天子父尊之至，永惟传序之恩；问圣人德何以加，莫越重华之孝（作为天子是父尊的至极，永为传序相授之恩；问圣人的道德何以复加，没有超越虞舜的孝道）。”《赐叶资政辞召命诏》写道：“见霽日消，顾何伤于日月；得时则驾，宜亟会于风云（见日出而雨雪消释，但与日月有何损伤；得到时机则命驾，应该迅速与风云际遇相会）。”《赐史大观文以新蜀帅改越辞免诏》说：“王阳为孝子，敢烦益部之行；庄助留侍中，姑奉行会稽之计（王阳为孝子，敢烦化益州中刺史之行；庄助留朝为待中，姑且奉行会稽却敌之计）。”吴璠在兴元，修补堵塞两县决坏的水渠为田，奖谕的诏书写道：“刻石立作三犀牛，重见离堆之利；复陂谁云两黄鹄，讵烦鸿礶之谣（刻石立作三头犀牛，重见离堆带来的好处；恢复鸿隙陂谁说是两黄鹄所说，岂敢烦鸿隙陂的童谣）。”这里用的是杜甫《石犀行》中所说“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秦代蜀地的太守，刻石立作了三头犀牛）”，以及翟方进毁坏了鸿礶陂，当时的童谣说：“反乎覆，陂当复。谁云者？两黄鹄（反了又回覆，鸿礶陂应当恢复。谁说的？两只黄鹄）”等话语。刘共甫（刘珙）从潭州帅司授为翰林学士，回报的诏书说：“不见贾生，兹趣长沙之召；既还陆贽，宜膺内相之除（久不见贾谊，今催促从长沙和召还；陵贽既已回还，理应荣受内相的除授）。”《批执政辞经修〈哲宗宝训〉转官》写

道：“念叠矩重规，当贤圣之君七作；而立经陈纪，在谏训之文百篇（想先人规矩重重，正当贤圣的君主第七次兴作；而立经纬陈纲纪，在典谏训示之文共有一百篇）。”哲宗正是第七代君主，而《哲宗宝训》又正是一百卷。《答蒋丞相辞免》写道：“永惟万事之统，知非艰而行惟艰；有不二心之臣，帅以正则罔不正（永远是万物的纲领，知之并不困难行之则很艰难；有忠贞不二的臣子，带头走正道则就没有不正的了）。”礼部为了宰臣们在显仁皇后周年祭祀之后请换穿吉服，上奏说：“练而慨然，礼应顺变；期可已矣，惧或过中（服练冠而感叹，按礼应该顺次变化；周年已可以了，恐有过当之处）。”又说：“汉中天二百而兴，益隆大业；舜至孝五十而慕，独耀前徽（汉世过半二百年而中兴，更加隆兴了帝王大业；舜尽孝到五十岁而令人仰慕，独自辉耀了，前人的美好）。”当时高宗皇帝的年龄是五十四岁。《辛巳亲征诏》中写道：“惟天惟祖宗，方共扶于基绪；有民有社稷，敢自佚于宴安（是上天是祖宗，正共同扶持于基业的延续；有百姓百国家，怎敢自己放纵于安乐）？”又写道：“岁星临于吴分，定成肥水之勋；斗士倍于晋师，可决韩原之胜（岁星将到吴的分野，定能成就大败前秦的肥水战功；敢死之士是晋国军队的一倍，可以决定韩原擒获晋侯的胜利）。”当时，岁星正在楚的分野，所以这样说。檄书中写道：“为刘氏左袒，饱闻思汉之忠；礪汤后东征，必慰戴商之望（为了刘氏天下的袒露左胸，充分听闻了思汉的忠诚；等待汤王的东征，必将慰藉拥戴商朝的渴望）。”又说：“侯王宁有种乎？人皆可致；富贵是所欲也，时不再来（侯王将相难道世代相传吗？人人都可获得；富与贵是所希望的，时机不可重来）。”《紫宸大宴致语》中写道：“庙谟先定，百官修辅而厥后惟明；黼坐端临，五帝神圣而其臣莫及（朝廷的谋略先行制定，百官辅助修改而后为清楚明白；章服而坐端临天下，五帝神圣而他的臣子赶不上）。”《修圣政转官词》中写道：“念五马浮江之后，光启中兴；述六龙御天以来，式时猷训（回忆司马氏五王渡过长江之后，光辉的开启了中兴大业；记述六龙行天以来，其时的谋略和训词）。”又写道：“荐于天而天是受，永言覆焘之恩；问诸朝而朝不知，诂测形容之妙（推荐于上天而上天接受，永远讲求覆盖的恩德；问之于朝廷而朝廷不知，怎么可猜测形容之妙）。”在《汪观文复官词》中写道：“作雷雨之《解》而宥罪，在法当原；如日月之蚀而及更，于明何损（兴作雷雨是《解》卦而宽恕罪行，在法应当原宥；如日月有蚀而及时更代，何损于光明）？”在《步帅陈敏制》中写道：“亚夫持重，小棘门、霸上之将军；不识将屯，冠长乐、未央之卫尉（周亚夫举动稳重，使棘门、霸上的将军为之渺小；程不识将领屯田军，冠于长乐宫、未央宫的卫尉）。”《吴挺兴州制》写道：“能得士心，吴起因西河之守；差强人意，广平开东汉之兴（能得士卒之心，吴

起稳固西河的守卫；比较令人满意，广平侯吴汉开发东汉的复兴）。”《起复知金州制》写道：“惟天不吊，坏万里之长城；有子而贤，作三军之元帅（天不吊恤，损坏了万里长城；有子而有贤才，作了三军的元帅）。”《萧鹋巴词》写道：“随会在秦，晋国起六卿之惧；日磾仕汉，璿侯传七叶之芳（随会在秦国，引起了晋国六卿的恐惧；金日磾在汉为官，璿侯传了七世的美名）。”《姚仲复官制》写道：“李广数奇，应恨封侯之相；孟明一眚，终酬拜赐之师（李广运数不偶，应该痛恨封侯的将相；孟明一目生翳，终于报复了“拜赐之师”败于晋国之仇）。”《追封皇第四子邵王词》写道：“举汉武三王之策，方茂徽章；念周文十子之宗，独留遗恨（施行汉武帝封三王的策略，旌旗正盛；感念周文王十个儿子的宗属，独独留下了遗憾）。”当时已经封建了三王。《赵忠简谥制》中写道：“见夷吾于江左，共知晋室之何忧；还德裕于崖州，岂待令狐之复梦（见管夷吾于江左，大家共知晋国有何忧虑；归还李德裕于崖州，难道等待令狐氏的再梦）？”《王颜赠官词》说：“申带砺心丹书之誓，方休甲第之功臣；挂衣冠于神虎之门，竟失戍营之校尉（申述除非黄河如带泰山如厉石不变丹书的信誓，正褒美受赐甲第的功臣；挂朝服于神虎门，竟然失去了一名戍营的将领）”《向起赠官词》中说：“驰至金城郡，方思充国之忠；生入玉门关，竟负班超之望（亲自驰马到金城郡，才想到赵充国的忠诚；但愿生入玉门关，竟然辜负了班超的期望）。”《李师颜赠官制》中写道：“青天上蜀道，久严分阃之权；黑水惟梁州，怵失安边之杰（青天就在蜀道之上，久已严分统兵之权；黑水是梁州，悲伤地失去了安边的豪杰）。”《襄帅王宣赠官词》说：“黄河如带，莫申刘氏之盟；汉水为池，空堕羊公之泪（黄河变得如衣带，也不重申汉朝刘氏的盟誓；汉水以为池，白白掉落了晋朝羊公的眼泪）。”王澹以太常少卿的官职朔日祭祀太庙，忘了设置象尊和牺尊，降官的告词中说：“牺象不设，已废司彝之供；饩羊空存，殊乖告朔之礼（牺尊象尊的不设置，已废弛了管理酒器的供张；上供的牲羊空空存在，特别不合告朔的礼节）。”《潼川神加封词》说：“驾飞龙兮灵之礪，具严涣命；驱厉鬼兮山之左，终相此邦（驾御着飞龙啊神灵出游，具装严整发布王命；驱赶厉鬼啊到山之左，终究辅助着这个邦国）。”《青城山蚕丛氏封侯词》中说：“想青神侯国之封，自今以始；虽白帝公孙之盛，于我何加（想到青神封为侯国，从今日才开始；虽然白帝公孙氏的繁盛，怎以能超过我）。”《阳山龙母词》写道：“居然生子，乘云气以为龙；惟尔有神，时雨初而利物（居然生儿子，乘着云气的为龙；只有你有神，时而雨过天晴有利万物）。”《魏丞相赠父词》中写道：“大名之后必大，非此其身；和戎如乐之和，幸哉有子（大名气之后必然更大，并不限于一身；与蛮人讲和如音乐的合奏，真有幸呀您有这个儿子）。”魏氏因

为出使全国谈妥和议，回来之后即受到大用。《赠母词》说：“藏盟府之国功，不殊魏绛；成外家之宅相，重见阳元（收藏在盟府的为国家的劳绩，与魏绛没有区别；成就外家相宅人的说法，又出现了一个魏舒）。”《封妻姜氏词》说：“筮仕于晋曰魏，方开门户之祥；娶妻必齐之姜，孰盛闺闱之美（占筮在晋作官的姓魏，正是新宅开设门户的吉祥；娶妻必娶齐的姜姓，谁更盛于闺闱的美德）？”《虞丞相赠父词》中写道：“活千人有封，非其身者在其子；德百世必祀，畸于人者侔于天（救活一千个人的有封赏，不是他自身而在于他的儿子；德泽惠及百世的必受祭祀，奇于人的可与天相比）。”又《周仁赠父词》中说：“有子能贤，高举而集吴地；受予显服，会同而朝汉京（有儿子能贤良，高飞而集于吴地；授予高贵的服装，会同而朝于京城）。”这是采用的东方朔《非有先生传》“高举远引，来集吴地（远走高飞，来集聚于吴地）”，以及班固《两京赋》“春王三朝，会同汉京（春天诸王行三朝之礼，会同来到汉的京城）”的文句而来。《奖谕吴挺诏》写道：“杓外制将军，方有成于东乡；舟中皆敌国，应无虑于西河（门楹之外受制于将军，才有成功于东乡之地；知舟人能成敌国，应该不用担心西河地区的安稳）。”《梁丞相醴泉使兼侍读制》写道：“珍台闲馆，独冠臯、伊之伦魁；广厦细旃，尚论唐、虞之盛际（珍贵的楼台闲适的馆舍，独可冠于臯陶、伊尹而称魁首；宽广的大屋精致的毛毯，尚且谈论唐尧虞舜的兴盛之际）。”又回报他的诏书写道：“一言可以兴邦，念为臣之不易；三宿而后出昼，勉为王而留行（一句话可以振兴邦国，感念做臣子的不容易；三夜而后离开昼县，勉强为君王而留步）。”《王丞相进玉牒加恩制》写道：“载籍之传五三，壮太祖、太宗之立极；贤圣之君六七，耀永昭、永厚之诒谋（典籍记载的五帝三皇之事，壮伟了太祖、太宗的帝业；贤圣的君主有六七位，光耀了仁宗、英宗的遗谋）。”《批以旱得雨请御殿》写道：“念七月之间则旱，咎征已深；虽三日已往为霖，忧端未赏（回想七月之间则旱，天灾的征兆已深远；虽然三天以来下了雨，忧国的端绪尚未解除）。”其余的写不胜写。只记得从兄在泉州幕府，淮东的使者，是他朋友的女婿，向京城送发行状推荐他。他作谢启说：“襟袂相连，夙愧末亲之孤陋；云泥悬望，分无通贵之哀怜（揜裳连袂，早就惭愧末亲的孤陋寡闻；云和泥天地悬隔相望，料想没有达官贵人的哀怜）。”都是用的杜甫诗句。其下句所用人人知道，上句所用的则是《赠李十五丈》一诗所说的：“孤陋忝末亲，等级敢比肩？人生意气合，相与襟袂连（孤陋寡闻的我忝列末亲，等级岂敢相比肩？人生意气投合，互相接近襟袂相连）。”此事恰与题目切合，而与前述《送韦书记》的诗句，恰可整齐使用，所以一并纪在这里。只是把它们传示给子孙甥侄罢了，不足以为外人称述。

唐贤启状

【原文】 故书中有《唐贤启状》一册，皆泛泛辄题。其间标为独孤常州及、刘信州太真、陆中丞长源、吕衡州温者，各数十篇，亦无可传诵。时人以其名士，故流行至今。独孤有《与第五相公书》云：“垂示《送丘郎中》两诗，词清兴深，常情所不及。‘阴天闻断雁，夜浦送归人。’浓丽闲远之外，文句窈窕凄惻，比顷来所示者，才又加等。但吟诵叹咏，大谈于吴中文人耳。”又云：“昨见《送梁侍御》六韵，清丽妍雅，妙绝今时，掩映风骚，吟讽不足。”按第五琦乃聚敛之臣，不以文称，而独孤奖重之如此。观表出十字，诚为佳句，乃知唐人工诗者多，不必专门名家而后可称也。

【译文】 家藏旧书中有《唐贤启状》一册，都是泛泛而论的题记。其中标有常州独孤及、信州刘太真、长源陆中丞、衡州吕温所作的，各数十篇，也不怎么值得传诵。当时人认为他们是名士，所以流传到今天。独孤及有《与第五相公书》说：“承蒙让看您《送丘郎中》两首大作，文词清新比兴深刻，一般常情是不能达到的。‘阴天闻断雁，夜浦送归人。’除了醇浓艳丽闲情逸致之外，文句凄惨哀婉，比以前所让我看的，更加显示才华。特吟诵叹咏，与吴地文人大谈起这首诗来。”又说：“昨天见到《送梁侍御》六韵，清新艳丽美雅，妙语绝伦今时，隐约映衬其雅致，吟诵不厌。”按唐人第五琦乃是搜刮民脂民膏的贪官，在文坛上本不足称道，而独孤及却如此褒奖他。看独孤及所特别提出的十个字，的确是佳句，由此可知唐人善于作诗的人太多了，不必是专门名家才值得称道。

卷 九

枢密两长官

【原文】 赵汝愚初拜相，陈旼自参知政事除知枢密院，赵辞不受相印，乃改枢密使，而陈已供职累日，朝论谓两枢长，又名称不同，为无典故。熙宁元年观文殿学士新知大名府陈升之过阙，留知枢密院。故事，枢密使与知院事不并置。时文彦博、吕公弼既为使，神宗以升之三辅政，欲稍异其礼，且王安石意在抑彦博，故特命之，然则自有故事也。

【译文】 赵汝愚开始拜授宰相，陈旼从参知政事升知枢密院事，赵汝愚推辞任命不接受相印，于是改任枢密使，而陈旼已到任数日，朝廷议论说这是两位枢密院长官，还名称不同，这没有先例。按考熙宁元年（1068年）观文殿学士新任大名府知府陈升之过京城，留他任知枢密院。旧例，枢密使和知枢密院事不同时设置。当时文彦博、吕公弼已为枢密使，神宗因为陈升之曾三为辅政大臣，打算对他稍加特异的恩礼，抑或王安石的用意在于压制文彦博，所以特别任命陈升之。由此看来，两枢密长官自有旧例。

赦放债负

【原文】 淳熙十六年二月《登极赦》：“凡民间所欠债负，不以久近多少，一切除放。”遂有方出钱旬日，未得一息，而并本尽失之者，人不以为便。何澹为谏大夫，尝论其事，遂令只偿本钱，小人无义，几至喧噪。绍熙五年七月覃赦，乃只为蠲三年以前者。按晋高祖天福六年八月，赦云：“私下债负取利及一倍者并放。”此最为得。又云：“天福五年终以前，残税并放。”而今时所放官物，常是以前二年为断，则民已输纳，无及于惠矣。唯民间房赁欠负，则从一年以前皆免。比之区区五代，翻有所不若也。

【译文】 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年）二月《登极赦》规定：“凡是民间所欠债务，不因年代远近数量多少，一刀切加以免除。”于是有刚借出去的钱还不

到十天，没得到一点利息，就连本都失去了的，人们认为这样的规定不合适。何澹任谏大夫，曾经议论过这件事，于是又下令只偿还本钱，一些小入贪利无义，几乎达到喧闹的地步。光宗绍熙五年（1178年）七月覃赦，只赦免三年以前所欠的债务。按后晋高祖天福六年（941年）八月的赦令说：“私人欠债已经收取利息一倍的都加以免除。”此赦令颇为得体。又说：“天福五年（940年）十二月底以前，过去残留的赋税一并免除。”而今天所放官物，常是把前二年作为断限，而百姓已经交纳给官府，百姓没有得到实惠。仅民间租赁房子所欠债，则以一年以前为期都加以赦免，今天和小小的五代相比，反而有所不如。

冯道 王溥

【原文】 冯道为宰相历数朝，当汉隐帝时，著《长乐老自叙》，云：“余先自燕亡归河东，事庄宗、明宗、愍帝、清泰帝、晋高祖、少帝、契丹主、汉高祖、今上，三世赠至师傅，阶自将仕郎至开府仪同三司，职职幽州巡官至武胜军节度使，官自试大理评事至兼中书令，正官自中书舍人至戎太傅、汉太师，爵自开国男至齐国公，孝于家，忠于国，口无不道之言，门无不义之货，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其不足者，不能为大君致一统，定八方，诚有愧于历官，何以答乾坤之施？老而自乐，何乐如之？”道此文载于范质《五代通录》，欧阳公、司马温公尝诋诮之，以为无廉耻矣。王溥自周太祖之末为相，至国朝乾德二年罢，尝作《自问诗》，述其践历，其序云：“予年二十有五，举进士甲科，从周祖征河中，改太常丞，登朝时同年生尚未释褐，不日作相。在郎庙凡十有一年，历事四朝，去春恩制改太子太保。每思菲陋，当此荣遇，十五年间遂跻极品，儒者之幸，殆无以过。今行年四十三岁，自朝请之暇，但宴居读佛书，歌咏承平，因作《自问诗》十五章，以志本末。”此序见《三朝史》本传，而诗不传，颇与《长乐叙》相类，亦可议也。

【译文】 冯道任宰相历经几个朝代，在后汉隐帝时，他撰写《长乐老自叙》，说：“我以前从燕逃归到河东，事奉唐庄宗、明宗、愍帝、清泰帝、晋高祖、少帝、契丹国主、汉高祖、当今皇上，三代赠予的官职至太师、太傅，官阶从将仕郎至开府仪同三司，职务从幽州巡官至武胜军节度使，官从试大理评事至兼中书令，正官从中书舍人至契丹太傅、汉朝太师，爵位从开国男至齐国公。尽孝于家，尽忠于国，口中没有不合道理的话，门内没有不义之财，在下不欺骗大地，在中不欺骗他人，在上不欺骗苍天。其所不足的是，不能为天子

完成大一统，平定八方，实在有愧于历任的官职，用什么回报天地的施与？年纪大了自得其乐，什么欢乐能如此？”冯道这篇文章载录在范质的《五代通录》中，欧阳公（欧阳修）、司马温公（司马光）曾诋毁谴责他，认为他没有廉耻。王溥从周太祖末年为宰相，到本朝乾德二年（964年）罢相，曾作《自问诗》，叙述他的经历，诗序说：“我二十五岁，得中进士甲科，跟随周太祖征伐河中，改任太常丞，登上朝堂时同年生的人还未脱掉平民的装束，不久作宰相。在朝廷共十一年，历事四代皇帝，去年春天皇帝施恩改太子保。每每想到自己微薄鄙陋，受到这样荣显的际遇，十五年间就身跻人臣的高位，这是儒者的幸运，几乎无过于此。现在我四十三岁，自从奉朝请的间暇，只是安居阅读佛家书籍，歌颂太平时世，因此作《自问诗》十五章，以此记识原委。”这篇序见于《三朝史》王溥本传，而诗没有流传下来，与《长乐叙》很相似，也有可议论之处。

周玄豹相

【原文】 唐庄宗时，术士周玄豹以相法言人事，多中。时明宗为内衙指挥使，安重诲使他人易服而坐，召玄豹相之。玄豹曰：“内衙贵将也，此不足当之。”乃指明宗于下坐，曰：“此是也。”因为明宗言其后贵不可言。明宗即位，思玄豹以为神。将召至京师，宰相赵凤谏，乃止。观此事，则玄豹之方术可知。然冯道初自燕归太原，监军使张承业辟为本院巡官，甚重之。玄豹谓承业曰：“冯生无前程，不可过用。”书记卢质曰：“我曾见杜黄裳写真图，道之状貌酷类焉，将来必副大用，玄豹之言不足信也。”承业于是荐道为霸府从事。其后位极人臣，考终牖下，五代诸臣皆莫能及，则玄豹未得擅唐、许之誉也。道在晋天福中为上相，诏赐生辰器币。道以幼属乱离，早丧父母，不记生日，恳辞不受。然则道终身不可问命，独有形状可相，而善工亦失之如此。

【译文】 后唐庄宗时期，术士周玄豹用相面的方法来预言人事，很多被猜中的。当时明宗还是内衙指挥使，安重诲使他人改换服装而坐在那里，召周玄豹来为他相面。周玄豹说：“内衙是贵将，此人不能当此重任。”于是指着下位的明宗说：“这个人可当此重任。”于是向明宗讲他后来有说不完的富贵。明宗即位后，认为周玄豹相面如神，想把他召到京师来，宰相赵凤加以谏阻，就停止召他。观察此事，可知周玄豹相面是多么准确。但冯道当初自幽州投奔太原时，监军使张承业辟任他本院巡官。很重视他。周玄豹对张承业说：“冯道没有什么前程，不可过于信用。”书记卢质说：“我曾经见过唐人杜黄裳的画像，冯

道的像貌和他十分相似，将来必能挑起重任，周玄豹的话不值得相信。”张承业于是推荐冯道任幕府从事。其后冯道位居宰相，寿老于家中，五代时期各位大臣都不能超过他，则周玄豹不得专擅术士名誉。冯道在后晋天福年间任上相，皇上下诏赐给他生辰器物币帛。冯道因幼年遭丧乱，父母早死，不记得自己生日，诚恳推辞不受。那么冯道终身不可寻问命运，只有形状可以观察，而最善相面的人也可能出这么大的遗漏。

钴鉏沧浪

【原文】 柳子厚《钴 潭西小丘记》云：“丘之小不能一亩。问其主，曰：‘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问其价，曰：‘止四百。’予怜而售之。以兹丘之胜，致之沔水鄆、杜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夫渔夫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苏子美《沧浪亭记》云：“予游吴中，过郡学东，顾草树郁然，崇阜广水，不类乎城中。并水得微径于杂花修竹之间，东趋数百步，有弃地，三向皆水，旁无民居，左右皆林木相亏蔽。予爱而裴回，遂以钱四万得之。”予谓二境之胜绝如此，至于人弃不售，安知其后卒为名人赏践？如沧浪亭者，今为韩蕲王家所有，价值数百万矣，但钴 复埋没不可识。士之处世，遇与不遇，其亦如是哉！

【译文】 柳子厚（柳宗元）《钴 潭西小丘记》说：“小丘小得不足一亩。问它的主人，回答说：‘这是唐氏抛弃的土地，要卖而卖不出去。’问这小丘的价钱，说：‘只四百钱。’我怜爱这小丘而买下它。以小丘的美好，放在长安附近的沔水、鄆县、杜陵这样的地方，则崇尚交游的士人会竞相购买此丘，每天增价千金而更加不能得到。现在抛弃在这州，农夫渔夫过此小丘，以它为偏僻之地，价钱只有四百钱，连年卖不出去。”苏子美（苏舜卿）《沧浪亭记》说：“我游历吴中，走过郡学的东侧，环顾周围草木郁郁葱葱，高山大水，不同于城中。傍溪有小路处在各种花草和修长的青竹之间，向东走数百步，有一块荒地，三面环水，附近没有百姓居住，左右都由林木或隐或露地遮蔽着。我爱这个地方而徘徊不返，于是用四万钱得到这地方。”我认为这两处环境如此美好绝伦，至于人们舍弃卖不出去，怎么能知道以后终于被名人欣赏受用呢？如沧浪亭这地方，现在归韩蕲王（韩世忠）家所有，它的价值是好几百万钱了。但是钴 潭的小丘又被埋没无人能赏识。士人生活在世间，知遇与不知遇，也是如此啊。

司封失典故

【原文】 南渡之后，台省胥吏旧人多不存，后生习学，加以省记，不复谙悉典章。而司封以闲曹之故，尤为不谨。旧法，大卿、监以上赠父至太尉止，余官至吏部尚书止。今司封法，余官至金紫光禄大夫，盖昔之吏书也，而中散以上赠父至少师止。按政和以前，太尉在太傅上，其上唯有太师，故凡称摄太尉者，皆为摄太傅，则赠者亦应如此。不应但许至少师也。生为执政，其身后但有子升朝，则累赠可至极品大国公。欧阳公位参知政事、太子少师，后以诸子恩至太师、兖国公，而其子裒亦不过朝大夫耳，见于苏公祭文及黄门所撰神道碑。比年汪庄敏公任枢密使，以子赠太师，当封国公，而司封以为须一子为侍从乃可，竟不肯施行，不知其说载于何法也？朱汉章却以子赠至大国公。旧少卿、监遇恩，封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自后再该加封，则每次增百户，无止法。今一封即止。旧学士待制，食邑千五百户以上，每遇恩则加实封，若虚邑五百者，其实封加二百，虚邑三百、二百者，实封加一百。今复不然。虽前执政亦只加虚邑三百耳，故侍从官多至实封百户即止，尤可笑也。

【译文】 宋朝南渡过江以后，台省小吏老人很多已经不存在了。后辈们学习，加以省记，也不再熟悉这些典章制度。而主管封爵、赠官的吏部司封官员因闲职的缘故，更加不像话。旧有的规定，大卿、监以上官员赠封他的父亲最高官职至太尉而止，其余官吏可赠至吏部尚书而止。现在司封规定，其余官吏赠至金紫光禄大夫，这是过去吏书的待遇，而中散以上就可以至少师而止。按徽宗政和年间以前，太尉在太傅之上，其上仅有太师，所以凡是称代理太尉的，都是代理太傅，则赠封时也应该是这样，不应该仅许赠至少师。生前为执政的，死后只要有儿子升朝，便可以接连赠封到最高的官品大国公。欧阳修官位参加政事、太子少师，后来因为诸子恩至太师、兖国公，而他的儿子裒也不过是朝大夫。这件事见于苏轼的祭文以及官署所撰写的记载死者事迹的石碑。近年汪澈正任职枢密使，因为儿子赠官太师、当封国公，而主管赠封的官员以为须要他一个儿子为侍从才可以，竟不肯封为国公，不知这一说法记载于那一条律令？朱汉章却以其子赠封到大国公。旧少卿、监官员遇有恩典，封为开国男，食禄的封邑一千五百户以上。每次遇到恩典再加实封，按所封的户数，如果虚邑五百户，其实封二百户，虚邑是三百户、二百户的，再实封一百户。现在就不是这样了，虽然以前执政官员也只加虚邑三百户，所以侍从官员最多达到实封百

户就停止加封了，更是可笑。

老人该恩官封

【原文】 提无咎作《积善堂记》云：“大观元年大赦天下，民百岁男子官，妇人封；仕而父母年九十，官封如民百岁。于是故漳州军事判官提仲康之母黄氏年九十一矣，其第四子仲询走京师状其事，省中为漳州请，漳州虽没，赦令初不异往者，丞相以为可而上之，封寿光县太君。”今自乾道以来，庆典屡下，仕者之父母年七十、八十即得官封，而子已没者，其家未尝陈理，为可惜也。

【译文】 祇无咎作《积善堂记》说：“徽宗大观元年大赦天下，百姓一百岁的男子给官，妇人给以封赏；做官的父母年九十岁，官封和百姓百岁一样。于是原漳州军事判官祇仲康的母亲黄氏年纪九十一岁，她的第四个儿子祇仲询去京师报告他母亲的事，省中为漳州请求此事，漳州虽没，赦令本来规定不加区别，丞相认为可以而加以上报，封为寿光县太君。”现在自孝宗乾道年间以来，庆典屡下，官员的父母年七十、八十岁即能得到封赏，而儿子已经死去，他的家人不曾陈述理由，就可惜了。

学士中丞

【原文】 淳熙十四年九月，予以杂学士除翰林学士，蒋世修以谏议大夫除御史中丞，时施圣与在政府，语同列云：“此二官不常置，今咄咄逼人，吾辈当自检点。”盖谓其必大用也，已而皆不然。因考绍兴中所除者，不暇缕述，姑从寿皇圣帝以后，至于绍熙五年，枚数之，为学士者九人，仲兄文安公、史魏公、伯兄文惠公、刘忠肃、王日严、王鲁公、周益公及予，其后李献之也。二兄、史、刘、王、周皆擢执政，日严以耆老拜端明致仕，唯予出补郡，献之遂踵武。为中丞者六人，辛企李、姚令则、黄德润、蒋世修、谢昌国、何自然也。辛、姚、黄皆执政，唯蒋补郡，昌国徒权尚书，即去国，自然以本生母忧持服云。

【译文】 淳熙十四年（1187年）九月，我由杂学士升任翰林学士，蒋世修由谏议大夫升任御史中丞。当时施圣与在政府，对他的同僚说：“这两种官不经常设置，现在咄咄逼人，我们应当各自检点些。”大概说这两种官一定要被重用，不久就都不如此了。因而考查绍兴年间所授这两个官职的人，无暇一一列

举，姑且从高宗以后，一直到绍熙五年（1194年），一个个地算，任学士的有九人，我的二哥文安公（洪遵）、史魏公（史浩）、大哥文惠公（洪适）、刘忠肃（刘摯）、王日严、王鲁公（王淮）、周益公（周必大）和我，这以后还有李献之。两位哥哥、史、刘、王、周都提升为执政大臣，王日严因年迈拜为端明殿学士退休，只有我出京城补为郡守，李献之接着继我之后出任郡守。任中丞的人有六人，辛企李、姚令则、黄德润、蒋世修、谢昌国、何自然。辛企李、姚令则、黄德润都是执政大臣，只有蒋世修补为郡守，谢昌国调任权尚书，就离开京城，何自然因亲生母去世服丧。

汉高祖父母姓名

【原文】 汉高祖父曰太公，母曰媪，见于史者如是而已。皇甫谧、王符始撰为奇语，云太公名执嘉，又名祊，媪姓王氏。唐弘文馆学士司马贞作《史记索隐》云：“母温氏。是时，打得班固泗水亭长古石碑文，其字分明作‘温’，云‘母温氏’。与贾膺复、徐彦伯、魏奉古等执对反复，深叹古人未闻，聊记异见。”予窃谓固果有此明证，何不载之于《汉纪》，疑亦后世好事者，如皇甫之徒所增加耳。又尝在岭外，见康州龙媪庙碑，亦云姓温氏，则指媪为温者不一也。唐小说《纂异记》载三史王生醉入高祖庙，见高祖云：“朕之中外，《泗州亭长碑》昭然具载外族温氏。”盖不根诞妄之说。

【译文】 汉高祖刘邦的父亲叫太公，母亲叫刘老太太，见于史书的仅此而已。皇甫谧、王符开始撰写奇文，说太公名字叫执嘉，又名祊，媪姓王氏。唐弘文馆学士司马贞作《史记索隐》说：“刘邦的母亲温氏。当时，得到班固泗水亭长古石碑文，其字分明作‘温’，说‘母温氏’。与贾膺复、徐彦伯、魏奉古等反复质对，深深感叹古人没有听说过，姑且记载这一不同说法。”我私下认为班固如果真有这一证明，为什么不记载于《汉纪》，我怀疑也是后代好事者所作，为皇甫谧之徒所增加的。我又曾在岭南，看见康州龙媪庙碑，也说姓温氏，则指媪为温的事不止一处。唐代小说《纂异记》记载三史科王生喝醉酒进入汉高祖庙，见高祖说：“我的中外亲族中，有《泗州亭长碑》明白记载外家温氏。”推究起来也是无根据的荒诞之谈。

君臣事迹屏风

【原文】 唐宪宗元和二年，制《君臣事迹》。上以天下无事，留意典坟，每览前代兴亡得失之事，皆三复其言。遂采《尚书》、《春秋后传》、《史记》、《汉书》、《三国志》、《晏子春秋》、《吴越春秋》、《新序》、《说苑》等书君臣行事可为龟鉴者，集成十四篇，自制其序，写于屏风，列之御座之右，书屏风六扇于中，宣示宰臣。李藩等皆进表称贺，白居易翰林制诏有批李夷简及百僚严绶等贺表，其略去：“取而作鉴，书以为屏。与其散在图书，心存而景慕，不若列之绘素，目睹而躬行，庶将为后事之师，不独观古人之象。”又云：“森然在目，如见其人。论列是非，既庶几为坐隅之戒；发挥献纳，亦足以开臣下之心。”居易代言，可谓详尽。又以见唐世人主作一事而中外至于表贺，又答诏勤渠如此，亦几于坐胜矣。宪宗此书，有《辨邪正》、《去奢泰》两篇，而末年用皇甫 而去裴度，荒于游宴，死于宦待之手，屏风本意，果安在哉？

【译文】 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年），撰制《君臣事迹》。皇上由于天下安定无事，有心留意古代典籍，每当读到有关前代王朝兴亡得失的事，都多次重复阅读这些内容。于是采择《尚书》、《春秋后传》、《史记》、《汉书》、《三国志》、《晏子春秋》、《吴越春秋》、《新序》、《说苑》等书中的有关君臣行为而且可作为借鉴的内容，纂集成十四篇，亲自为其作序，写在屏风上，排列在皇帝宝座的右侧，在当中写六扇屏风，用以显示给宰臣。李藩等人都上奏表颂扬祝贺，白居易翰林学士草诏，有批李夷简和百官严绶等人的贺表，诏书大致内容说：“取来而作借鉴，书写出为屏风。与其让它散在图书中，心里想着而且仰慕，不如将其罗列天素绢之上，看着它而且亲自去实行，或许将成为后事的师表，不只是观览古人的形象。”又说：“其事迹纷纷列于眼前，好像见到他们本人。条列议论前朝的是非，既希望成为座旁的鉴戒；发扬群臣进言以供采用的风气，也足以开启臣下的忠心。”白居易代皇上说的话，可以说详尽。又从此可见唐代皇帝做一件事而朝廷内外上表予以祝贺，还有回答的诏书又如此勤而及时，也差不多到了琐碎的程度。唐宪宗的这本书，有《辨邪正》、《去奢泰》两篇，而到了末年起用皇甫 而罢去裴度，沉湎于游乐饮宴，最终死在宦官内侍手中，将《君臣事迹》写在屏风上的本意，哪里还真的存在呢？

僧道科目

【原文】 唐末帝清泰二年二月，功德使奏：“每年诞节，诸州府奏荐僧道，其僧尼欲立讲论科、讲经科、表白科、文章应制科、持念科、禅科、声赞科，道士经法科、讲论科、文章应制科、表白科、声赞科、焚修科，以试其能否。”从之，此事见《旧五代史记》，不知曾行与否，至何时而罢也。盖是时犹未鬻卖祠部度牒耳。周世宗废并寺院，有诏约束云：“男年十五以上，念得经文一百纸，或读得五百纸，女年十三以上，念得经文七十纸，或读得三百纸者，经本府陈状，乞剃头，委录事参军、本判官试验。两京、大名、京兆府、青州各起置戒坛，候受戒时，两京委祠部差官引试，其三处祇委判官，逐处闻奏。候敕下委祠部给付凭由，方得剃头受戒。”其防禁之详如此，非若今时只纳钱于官，便可出家也。念经、读经之异，疑为背诵与对本云。

【译文】 后唐末帝李从珂清泰二年（935年）二月，功德使奏道：“每年佛道节日，各州府奏报推荐僧道徒，僧尼想设立讲论科、讲经科、表白科、文章应制科、持念科、禅科、声赞科，道士经法科、讲论科、文章应制科、表白科、声赞科、焚修科，以考试他们的能与不能。”皇上表示批准这道奏书。这件事见于《旧五代史记》，不知道实行没有实行，到什么时候又停止了。这是因为当时还没有出卖祠部所制的准许出家的证明文件吧。后周世宗柴荣废掉合并一些寺院，有诏书加以约束说：“男子十五岁以上，能背诵经文一百张，或对本能读五百张，女的十三岁以上，能背诵经文七十张，或对本能读五百张的，经过当地官府陈状，可求剃头，委托录事参军、本州判官试用。两京、大名、京兆府、青州各处建造受戒的坛台，到受戒的时候，两京委托祠部派遣官吏主持考试，其他三处只委派判官，详细奏报。等皇上敕书下达后委托祠部给以凭证，才得剃头受戒。”诏书条文对防止一般人进入僧道行列如此详细，并不像今天只要交纳钱财于官府，就可以出家了。念经、读经的区别，我怀疑是背诵和本读经而已。

射佃逃田

【原文】 汉之法制，大抵因秦，而随宜损益，不害其为炎汉。唐之法制，

大抵因隋，而小加振饰，不害其为盛唐。国家当五季衰乱之后，其究不下秦、隋，然一时设施，固亦有可采取。按周世宗显德二年，诏：“应逃户庄田，并许人请射承佃，供纳税租。如三周年内本户来归者，其桑田不计荒熟，并交还一半。五周年内归业者，三分交还一分。如五周年外，除本户坟茔外，不在交付之限。其近北诸州陷蕃人户来归业者，五周年内三分交还二分，十周年内还一半，十五周年内三分还一。此外者，不在交还之限。”其旨明白，人人可晓，非若今之令式文书，盈于几阁，为猾吏舞文之具，故有舍去物业三五十年，妄人诈称逃户子孙，以钱买吏而夺见佃者，为可叹也。

【译文】 汉朝的法制大都因袭秦朝，而按照实际情况略加更改，这样并没有损害它为大汉。唐代的法制，都因袭隋朝而稍加整顿，也不损害它称为盛唐。我大宋朝在五代衰乱以后，情况和秦隋之后差不多，但一时的措施，却也有可取之处。按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年），曾下诏书说：“凡是逃亡户的庄田，统统允许别人承继佃种，给国家供交税租。如果三年内本田主归来，他种的桑田不论丰歉，都必须将果食交还一半给本田主户。五年内回来的，三份交还一份，如五年以上归来的，除了本户坟地之外，一律不在交还范围内。邻近北部边境各州陷入少数民族的人户归来时，五年内三份交还归来户二份，十年内归来的还给一半，十五年内归来的三份归还一份，除此之外，不在归还的界限之内。”这个诏书很明白，人人都可知晓，并非像现在的格式文书，堆满几案楼阁，成为狡猾的官吏舞弄文墨的用具，所以出现舍去房屋土地三五十年，一些无知妄作的人诈骗自称逃户子孙，用钱买通官吏而夺去现耕人的土地，实在可叹。

周世宗好杀

【原文】 史称周世宗用法太严，群臣职事，小有不举，往往置之极刑，予既书于《续笔》矣。薛居正《旧史》记载其事甚备，而欧阳公多芟去。今略记于此。樊爱能、何徽以用兵先溃，军法当诛，无可言者。其他如宋州巡检供奉官竹奉以捕盗不获，左羽林大将军孟汉卿以监纳取耗，刑部员外郎陈渥以检田失实，济州马军都指挥使康俨以桥道不谨，内供奉官孙延希以督修永福殿而役夫有就瓦中谋饭者，密州防御副使侯希进以不奉使者命检视夏苗，左藏库使符令光以造军士袍襦不办，楚州防御使张顺以隐落税钱，皆抵极刑，而其罪有不至死者。

【译文】 史籍称周世宗用法太严厉，群臣官吏，举动稍有不慎，往往处以

死刑，我既已写在《续笔》中了。薛居正的《旧五代史》记载这些事很完备。而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则大都将这些内容删掉了。现在简略记载在这里。樊爱能、何徽因用兵首先溃退下来，按军法当斩，没有什么可说的。其他如宋州巡检供奉官竹奉礮因为没有捕捉住盗贼，左羽林大将军孟汉卿因为监督纳税而领取损耗，刑部员外郎陈渥因丈量田地失实，济州马军都指挥使康俨因为修理桥道不完备，内供奉官孙延希因为督修永福殿而工人有用瓦吃饭的，密州防御副使侯希进因不听从使者命令去检查夏苗生长情况，左藏库使符令光因为没有完成制造军士长袍短袄的任务，楚州防御使张顺因为隐瞒税钱，都处以死刑，而他们所犯的罪有的不应至于死刑。

孟字义训

【原文】 一字数义，固有之矣。若孟字，只是最长最先之称，如所谓孟侯、孟孙、元妃孟子、孟春、孟夏之类是也。《国语》：“优施谓里克妻曰：‘主孟啖我’。”注云：“大夫之妻称主，从夫称也。”而谓孟为里克妻字则非矣。又云：“孟一作盍。”《史记·吕后本纪》注中引此句，而司马贞《索隐》乃云：“孟者，且也，言且啖我物。”其说无所据。班固《幽通赋》：“盍孟晋以迨群。”李善乃注孟为勉。蜀王衍书其臣徐延琰宅壁为孟言，蜀语谓孟为弱，故以戏之。其后孟知祥得蜀，馆于徐第，以为已讖，此意又为无稽也。东坡与欧阳叔弼诗云：“主孟当啖我，玉鳞金鲤鱼。”正用优施语。鲁之宝刀曰孟劳。不详其义。

【译文】 一个字有几个意思，本来就有的。如孟字，只是最长最先的称谓，如所说的孟侯就是大侯、孟孙就是长孙、元妃孟子就是长妃、孟春就是初春、孟夏就是初夏之类。《国语》说：“优施谓里克妻曰：‘主孟啖我。’”韦昭在注释中说：“大夫的妻子称为主，那是随她丈夫的称谓。”而称孟是里克妻子的字就错了。又说：“孟，另一个版本写作盍。”《史记·吕后本纪》注释中曾引用这句话，而司马贞《索隐》却说：“孟是且的意思，说是尚且吃我的东西。”这种说法没有根据。班固《幽通赋》说：“什么原因初次提升而就赶上朋辈。”李善却注释孟是勉的意思。前蜀王衍在他的臣子徐延琰的墙壁上写了“孟言”二字，蜀地语言称孟是弱的意思，所以用来给他开个玩笑。后来孟知祥取得蜀国政权后，住宿于徐延琰的家里，认为这是自己的预言，这又是无稽之谈。苏东坡给欧阳叔弼的诗说：“主孟当啖我，玉鳞金鲤鱼。”正是用的《国语》上优施的话。鲁地的宝刀叫孟劳，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向世原诗

【原文】 亡友向巨原，自少时能作诗。予初识之于梁宏夫坐上，夫深知之也。是日，偕二友从吴傅朋游芝山，登五老亭，以“驾言出游”分韵赋诗。巨原得驾字，其语云：“兹山何巍巍，气欲等嵩华。从公二三子，胜日饱闲暇。跻攀谢车舆，自办两不借。扪萝觅幽裋，行椒得孤榭。侧送夕阳移，俯视高鸟下。登临记曩昔，岁月惊代谢。却数一周星，复命千里驾。身从泛梗流，事与浮云化。褫来共一尊，似为天所赦。明发还问涂，离合足悲咤。”诗成，观者皆服。傅朋游丝诗卷数百篇，巨原独不深叹美之，颇记其数句曰：“先生著名节，百世追延陵。我评先生贤，不以能书称。功成磨苍崖，盛德颂日升。勿书陵云榜，华颠踏高层。”句格超峻，其旨皆有规讽，与前所纪刘彦冲古风相类也。后哀其平生所作数千篇，目为《葵斋杂稿》，倩予为序。时予在章贡，及序成持寄之，则已卧病，仅能于枕上一读而已。巨原初见韩子苍，得一诗，曰：“老子真祠地，居来觅纸题。文如士衡俊，年与正平齐。闻说钟陵郡，官居章水西。涪翁诗律在，佳处可时携。”而韩集佚不收，但见序中耳。

【译文】 我的亡友向巨原（向戩）从少年时就能作诗。我当初认识他是在梁宏夫的客坐上，没能够深知。这一天，偕同两个朋友跟从吴傅朋游览芝山，登到五老亭，以“驾言出游”四个字分韵写诗，向巨原得到了“驾”字韵，他写道：“兹山何巍巍，气欲等嵩华。从公二三子，胜日饱闲暇。跻攀谢车舆，自办两不借。扪萝觅幽神，行椒得孤榭。侧送夕阳移，俯视高鸟下。登临记曩昔，岁月惊代谢。却数一周星，复命千里驾。身从泛梗流，事与浮云化。衽来共一尊，似为天所赦。明发还问涂，离合足悲咤（这座山何其高大，气势欲与嵩山华山相等。跟从您的几个朋友，一天十足的闲适。登攀谢绝车和轿，自想办法两相不借。扶持着萝藤寻找幽静的石级，走到山顶得到了一个孤零的亭榭。侧身目送夕阳转移，俯身看着高空的鸟飞下。登临绝顶记起了往昔，岁月的代谢令人惊异。计算着十二年前，重新命令行千里的车驾。身体跟着浮梗飘流，事情与浮云相消散。车马归来共尽一樽酒，好像为老天所宽赦。早晨归去问路，离合足以令人悲叹）。”诗写成，看了的人都叹服。吴傅朋用游丝字体书写了自己的诗卷几百篇，向巨原独不深加赞美它们，稍稍记得其中几句话，说：“先生著名节，百世追延陵。我评先生贤，不以能书称。功成磨苍崖，盛德颂日升。勿书陵云榜，华颠踏高层（先生的名节著闻，是百代以下上追延陵季子。我评说

先生的贤德，并不以您能书法相称。功成当磨苍翠的山崖，颂扬盛德如同太阳升起。不要像曹魏时的韦诞那样去写凌云的榜书，从高处下来头发都变白)。”语句风格超迈峻峭，其主旨都有规劝讽谕的意思，与以前所记刘彦冲的古风相类似。后来聚辑他一生所作数千篇诗，定名为《葵斋杂稿》，请我为之作序。当时我正在章贡台，等到序写成寄给他，他则已卧病在床，仅能在枕头上一读罢了。向巨原最初见到韩子苍（韩驹），得到韩写的一首诗，其诗写道：“老子其祠地，君来觅纸题。文如士衡俊，年与正平齐。闻说钟陵郡，官居章水西。涪翁诗律在，佳处可时携（老子的真祠之地，您来觅纸题写。文章像陆机一样写得漂亮，年龄正与祢衡相齐。听说钟陵郡，官居于章水之西。黄庭坚的诗律在手，佳处可时时采取）。”而韩子苍的诗集漏掉了未收，只是见之于序中提及罢了。

叶晦叔诗

【原文】 亡友叶黯晦叔，尝除敕令所删定官。绍兴十九年，为福建帅属，予尝因春补诸生，白于府主，邀与同考校，锁宿贡院两旬。予作长句云：“沉沉广厦清如水，市声人声不到耳。一闲十日岂天赐？惭愧纷纷白袍子。相逢更得金玉人，久矣眼中无此士。连床夜语不成寐，往往鸡声忽惊起。是中差乐真难名，昔者相过安得此？但怜时节不相谋，正堕清明寒食里。梨花已空海棠谢，外间物色知余几。只恐雨风摧折之，负此一春吾过矣。谢公寻山饱闲暇，应笑腐儒粘故纸。锦囊得句应已多，万一相思频寄似。”时谢景思为参议官，故卒章简之。晦叔和篇云：“文章万言抵杯水，世上虚名徒尔耳。我常自笑一生痴，那更将痴笑群子。大屋沉沉余百年，到今所阅知几士？看渠得失自偶然，其间悲喜从何起？君闻我言亦大笑，为说乃事总如此。缺两句。急须了却公家事，门外不知春有几？缺三句。飞雨时闻打窗纸。他年万一复相从，未必从容今日似。”其语意超新，惜不能尽忆。又尝云：“五十六言，大抵多引韵起，若以侧句入，尤峻健。如老杜‘幽栖地僻经多少，老病人扶再拜难’是也。然此犹是作对，若以散句起又佳。如‘苦忆荆州醉司马，谪官樽俎定常开’是也。故予自福禧满归，晦叔以二诗送别，正用此体。一章云：“一门伯仲知谁似？四海文章正数君。何事与予如旧识，由来于世两相闻。闲官各喜光阴剩，胜地空多物色分。忽复翩然从此去，便应变化上青云。”二章云：“此地相从惊岁晚，登临况是客归时。却将襟抱向谁可？正尔艰难唯子知。情到中年工作恶，别于生世易为悲。梅花尽醉清江上，黯澹西风冻雨垂。”可谓奇作。然相别不两年即下世，每诵味其语，

辄为凄然。因刻所作《容斋记》，尝识于末。

【译文】 已故的朋友叶黯字晦叔，曾任敕令所删定官。高宗绍兴十九年（1149年），他为福建帅府属官，我曾因为春天补考太学子弟，告知府帅，邀叶黯与我同去考试，锁住在贡院二十天。我作一首文长句说：“沉沉广厦清如水，市声人声不到耳。一闲十日岂天赐？惭愧纷纷白袍子。相逢更得金玉人，久矣眼中无此士。连床夜语不成寐，往往鸡声忽惊起。是中差乐真难名，昔者相过安得此？但怜时节不相谋，正堕清明寒食里。梨花已空海棠谢，外间物色知余几。只恐雨风摧折之，负此一春吾过矣。谢公寻山饱闲暇，应笑腐儒粘故纸。锦囊得句应已多，万一相思频寄似。”当时谢景思是参议官，所以写好后给他抄了一通。叶黯唱和篇说：“文章万言抵杯水，世上虚名徒尔耳。我常自笑一生痴，那更将痴笑群子。大屋沉沉余百年，到今所阅知几士？看渠得失自偶然，其间悲喜从何起？君闻我言亦大笑，为说万事总如此。缺两句。急须了却公家事，门外不知春有几。缺三句。飞雨时闻打窗纸。他年万一复相从，未必从容今日似。”诗中语意超然新颖，可惜的是我不能全部回忆起来。又曾经说：“五十六言诗，大概多是从序开始，如果用旁句入韵，就更高大强健。如杜甫‘幽栖地僻经多少，老病人扶再拜难’就是这样。但这尚且可以配对，如用散句起韵就更好。如‘苦忆荆州醉司马，谪官樽俎定常开’就是这样。所以我从福州任职期满回来时，叶黯就有两首诗与我送别，正是这样的体裁。一章说：“一门伯仲知谁似？四海文章正数君。何事与予如旧识，由来于世两相闻。闲官各喜光阴剩，胜地空多物色分。忽复翩然从此去，便应变化上青云。”二章说：“此地相从惊岁晚，登临况是客归时。却将襟抱向谁可？正尔艰难惟子知。情到中年工作恶，别于生世易为悲。梅花尽醉清江上，黯澹西风冻雨垂。”可以称得上奇妙的作品了。但相离别不到两年叶黯就去世了，每次诵读玩味他诗中语言，即为他悲伤。因此刻版我的作品《容斋记》，记于本书之后。

卷十

词学科目

【原文】熙宁罢诗赋，元盥复之，至绍圣又罢，于是学者不复习为应用之文。绍圣二年，始立宏词科，除诏、诰、制、敕不试外，其章表、露布、檄书、颂、箴、铭、序、记、诫谕凡九种，以四题作两场引试，唯进士得预，而专用国朝及时事为题，每取不得过五人。大观四年，改立词学兼茂科，增试制诰，内二篇以历代史故事，每岁一试，所取不得过三人。绍兴三年，工部侍郎李擢又乞取两科裁订，别立一科，遂增为十二体：曰制、曰诰、曰诏、曰表、曰露布、曰檄、曰箴、曰铭、曰记、曰赞、曰颂、曰序。凡三场，试六篇，每场一古一今，而许卿大夫之任子亦就试，为博学宏词科，所取不得过五人。任子中选者，赐进士第。虽用唐时科目，而所试文则非也。自乙卯至于绍熙癸丑，二十榜，或三人，或二人，或一人，并之三十三人，而绍熙庚戌阙不取。其以任子进者，汤岐公至宰相，王日严至翰林承旨，李献之学士，陈子象兵部侍郎，汤朝美右史，陈岷方进用，而予兄弟居其间，文惠公至宰相，文安公至执政，予冒处翰苑。此外皆系已登科人，然擢用者，唯周益公至宰相，周茂振执政，沈德和、莫子齐、倪正父、莫仲谦、赵大本、傅景仁至侍从，叶伯益、季元衡至左右史，余多碌碌。而见存未显者，陈宗召也。然则吾家所蒙亦云过矣。

【译文】本朝神宗熙宁年间科举考试中取消了诗赋，哲宗元盥年间又恢复了。到哲宗绍圣年间又取消了。于是学子们不再学习训练诗赋这类应用文体了。哲宗绍圣二年（1095年），开始设立宏词科考试。除诏、诰、制、敕等几种文体不考试外，其余章表、露布、檄书、颂、箴、铭、序、记、诫谕共九种文体，以四个题目分作两场正式考试，只有进士能参加考试，而且专门用本朝和当时的时事为题目，每次录取不能超过五个人。大观四年（1110），改设词学兼茂才科，增试制诰，其中两篇以历代史故事为题，每年考一次，所录取的人数不能超过三人。绍兴三年（1133年），工部侍郎李擢又请求用两科裁断，另设一科，于是考试文体增加为十二种：称制、称诰、称诏、称表、称露布、称檄、称箴、称铭、称记、称赞、称颂、称序。共考三场，考六篇文章，每场考一古一今两题，

而且准许卿大夫的因其父兄之任而保任官职的子弟也参加考试，考试科目为博学宏词科，所录取的人数不能超五人。因其父兄之任保任官职的子弟考中的人，赐给进士及第。虽然用的是唐代的科目，然而所考试的文章则是不一样的。自乙卯至绍熙癸丑（1193年）共二十榜，每榜或取三人，或取二人，或取一人，共取三十三人，而且绍熙庚戌（1190年）年阙，未取。那些因以其父兄之任保任官职的子弟考中的人，汤岐公（杨思退）官至宰相，王日严（王祐）官至翰林承旨，李献之（李祐）为学士，陈子象（陈岩肖）为兵部侍郎，汤朝美（汤邦彦）为右史，陈岷刚被任用。而我们兄弟位居其间，文惠公（洪适）官至宰相，文安公（洪遵）官至执政大臣，我也厕身于翰林院。除此之外都属于已登科的人，然而被提拔任用的人，只有周益公（周必大）官至宰相，周茂振（周麟之）为执政大臣，沈德和（沈介）、莫子齐（莫济）、倪正父（倪思）、莫仲谦（莫叔光）、赵大本（赵彦中）、傅景仁（傅伯寿）官至侍从官，叶伯益（叶谦亨）、季元衡（季元寿）官至左右史，其余的人大多碌碌无为。而今健在没能显扬的人，是陈宗召。如此看来，我家所蒙受的圣恩也可说很盛了。

唐夜试进士

【原文】 唐进士入举场得用烛，故或者以为自平旦至通宵。刘虚白有“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灯烛一般风”之句，及三条烛尽之说。按《旧五代史·选举志》云：“长兴二年，礼部贡院奏当司奉堂帖夜试进士，有何条格者。敕旨：‘秋来赴举，备有常程，夜后为文，曾无旧制。王道以明规是设，公事须白昼显行，其进士并令排门齐入就试，至闭门时试毕，内有先了者，上历画时，旋令先出，其入策亦须昼试，应诸科对策，并依此例。’”则昼试进士，非前例也。清泰二年，贡院又请进士试杂文，并点门入省，经宿就试。至晋开运元年，又因礼部尚书知贡举窦贞固奏，自前考试进士，皆以三条烛为限，并诸色举人有怀藏书册不令就试。未知于何时复有更革。白乐天集中奏状云：“进士许用书册，兼得通宵。”但不明言入试朝暮也。

【译文】 唐朝进士入考场得用蜡烛，因而有人以为要从天刚亮考到第二天通宵。刘虚白有“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灯烛一般风”的诗句，又有三只蜡烛燃尽为限之说。《旧五代史·选举志》中说：“后唐明宗长兴二年（931年），礼部贡院奏当司奉宰相下的文件（堂贴）夜间考试进士，有什么条款等事。皇帝的诏令说：‘秋天来参加考试，设有一般规程，入夜后才写文章，不曾有旧的制

度。王道都是按明显的常规设立的，公事必须在白昼公开进行，参加考试的人都要服从命令在门外排好次序一齐进入考场，到关门时考试结束，其中如有先考完的人，在签上记好他的时间，允许先退场，他们的策问也须要白天考试，应试各科对策，亦一律依照此例。’”据此，白天考试进士，不是以前的惯例。后唐末帝清泰二年（935年），贡院又请示进士考试杂文，并且按照指定的门进入，过一夜晚就参加考试。到了后晋出帝开运元年（944年），又因为礼部尚书知贡举窦贞固上奏，以前考试进士，都以三只蜡烛的时间为限，并且各种举人凡有怀藏书本的就不许参加考试。不知道到什么时候又有变更。白居易集中奏状说：“进士允许参考书册，并且可以通宵达旦作文。”但没有说明白入试的时间是清早还是晚上。

纳 绢尺度

【原文】 周显德三年。敕，旧制织造褙褙、绢布、绫罗、锦绮、沙縠等，幅阔二尺起，来年后并须及二尺五分。宜令诸道州府，来年所纳官绢，每匹须及一十二两，其褙褙只要夹密停匀，不定斤两。其纳官褙绢，依旧长四十二尺。乃知今之税绢，尺度长短阔狭，斤两轻重，颇本于此。

【译文】 后周太祖显德三年（956年），皇帝下诏，按旧方法织造的粗绢、绢布、绫罗、锦缎、绉纱等，幅宽二尺以上，明年后都一定要达到宽二尺五分。命令各道、州、府，明年缴纳给官府的绢，每匹必须达到十二两重，粗绢只要稀密均匀，不规定斤两。缴纳给官府的绢，仍旧长四十二尺。由此可知，现在纳税的绢，尺寸长短宽窄，斤两轻重，多是源于此。

朱梁轻赋

【原文】 朱梁之恶，最为欧阳公《五代史记》所斥詈。然轻赋一事，旧史取之，而新书不为拈出。其语云：“梁祖之开国也，属黄巢大乱之余，以夷门一镇，外严烽候，内辟污莱，厉以耕桑，薄其租赋，士虽苦战，民则乐输，二纪之间，俄成霸业。及末帝与庄宗对垒于河上，河南之民，虽困于辇运，亦未至流亡。其义无他，盖赋敛轻而丘园可恋故也。及庄宗平定梁室，任吏人孔谦为租庸使，峻法以剥下，厚敛以奉上，民产虽竭，军食尚亏，加之以兵革，因之

以饥馑，不四三年，以致颠陨。其义无他，盖赋役重而寰区失望故也。”予以事考之，此论诚然，有国有家者之龟鉴也。《资治通鉴》亦不载此一节。

【译文】 朱温建立的梁朝的罪恶，最为欧阳修先生在《五代史记》中所斥责。然而朱梁主张减轻赋税一事，《旧五代史》中有记载，《新五代史》却没有注意这一点。《旧五代史》里记载：“梁朝的先祖开国的时候，正是黄巢起义大乱将要结束之时，先祖凭借夷门一个城镇，对外严密注视烽火台防止外敌入侵，对内要避免自然灾害和盗贼，严格要求农民努力耕种，而减少他们的赋税，士兵虽然饱尝战争之苦，百姓们却乐于为之输送给养，二十四年间，很快就成就了霸业。到了末帝与后唐庄宗两军对垒于黄河上时，黄河以南的民众，虽然被运送军队粮饷搞得疲惫不堪，也没有逃亡的。这里没有别的原因，大概是因为赋税轻而且家乡故土值得留恋的缘故。到了庄宗平定梁朝王室时，任用吏人出身的孔谦为租庸使，严格法度来盘剥民众，厚征暴敛来奉献皇上，民众的物产虽被榨取干净，军队的粮饷还不够用，再加上战事频繁，饥荒严重，不到三四年，国家就面临崩溃的边缘。造成这种局面没有别的原因，全是赋税劳役惨重而广大民众失望的缘故。”我考察了这段历史事实之后，认为这一论点真实可信，这是拥有国家的人应当借鉴的。《资治通鉴》里也没记载这一点。

坎离阴阳

【原文】 坎位正北，当幽阴肃杀之地，其象于《易》为水为月。董仲舒所谓“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然而谓之阳。离位正南，当文明赫赫之地，于《易》为日为火。仲舒所谓“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长养为事”，然而谓之阴。岂非以阴生于午，阳生于子故邪？司马贞云：“天是阳，而南是阳位，故木亦是阳，所以木正为南正也。火是地正，亦称北正者，火数二，二地数，地阴，主北方，故火正亦称北正。”究其极挚，颇似难晓，圣人无所云，古先名儒以至于今，亦未有论之者。

【译文】 八卦中的坎位在正北，正好是幽阴肃杀的地方，卦象在《易经》中代表水和月。汉代董仲舒曾说“阴常处于严冬，积聚在空虚不用的地方”，然而称之为阳。离位在正南，正好是光明炎热的地方，在《易经》中代表日和火。董仲舒所说“阳常处于盛夏，而且以生育长养为主要内容”，然而称之为阴。难道认为是阴生于十二地支中的午，阳生于子的缘故吗？司马贞说：“天是阳，而南方是阳的位置，木也是阳，所以木正就是南正。火是地正，也可叫北正，火

在五行中居第二，二为地数，地是阴，主要指北方，所以火正也称北正。”仔细考究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似乎很难弄明白，圣人们也没有谈及过，先前的著名学者以至当今的名儒，对此也没有作过什么论述。

前执政为尚书

【原文】 祖宗朝，曾为执政，其后入朝为他官者甚多。自元丰改官制后，但为尚书。曾孝宽自签书枢密去位，复拜吏部尚书。韩忠彦自知枢密院出藩，以吏书召。李清臣、蒲宗孟、王存，皆尝为左丞，而清臣、存复拜吏书，宗孟兵书。先是元盥六年，清臣除目下，为给事中范祖禹封还，朝廷未决，继又进拟宗孟兵部右丞。苏辙言：“不如且止。”左仆射吕大防于帘前奏：“诸部久阙尚书，见在人皆资浅，未可用，又不可阙官，须至用前执政。”辙曰：“尚书阙官已数年，何尝阙事？”遂已。胡宗愈尝为右丞，召拜礼书、吏书。自崇宁已来，乃不复然。

【译文】 大宋开国之初，曾经设立执政这一官职，后来入朝做别的官的人很多。自宋神宗元丰年间改革官职制度以后，只设尚书之职。曾孝宽从签书枢密的职务上离开，又官拜吏部尚书。韩忠彦从知枢密院的位置上离开任藩镇之职，又以吏部尚书之职召回。李清臣、蒲宗孟、王存等人，都曾任左丞相之职，而李清臣、王存又官拜吏部尚书，蒲宗孟官拜兵部尚书。先是在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李清臣授任官职的文书刚下达，被给事中范祖禹封还，朝廷尚未决定，接着又提出想让蒲宗孟任兵部右丞相。右丞苏辙进言：“不如暂且停下”。左仆射吕大防在皇上面前启奏说：“各部长长期空缺尚书，现在有关的人都资历很浅，不可用，但又不可缺官职，以任用前执政为好。”苏辙说：“尚书之职空缺已有数年，何曾耽误了大事？”于是，这件事就搁了下来。胡宗愈曾任右丞相，后召拜礼部尚书、吏部尚书。自宋徽宗崇宁年间以来，就不再是这样了。

河伯娶妇

【原文】 《史记》褚先生所书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问民所疾苦。长老曰：“吾为河伯娶妇，以故贫。”豹问其故，对曰：“邺三老、廷掾常岁赋敛百姓钱，得数百万，用其二三十万为河伯娶妇，与祝巫分其余钱持归。巫行视小家

女好者，即聘娶，为治斋宫河上，粉饰女，浮之河中而没。其人家有好女者，多持女远逃亡，以故城中益空无人。”豹曰：“至娶妇时，吾亦往送。”遂投大巫姬及三弟子并三老于河，乃罢去。从是以后，不敢复言为河伯娶妇。予按此事，概出于一时杂传记，疑未必有实。而《六国表》秦灵公八年，“初以君主妻河。”言初者，自此年而始，不知止于何时，注家无说。司马贞《史记索隐》乃云，初以君主妻河“谓初以此年取他女为君主，君主犹公主也。妻河，谓嫁之河伯，故魏俗犹为河伯娶妇，盖其遗风。”然则此事秦、魏皆有之矣。

【译文】 《史记》中褚先生所补记的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县令，访问民间疾苦。年长的老人说：“我们为河伯娶妻，因此而贫穷。”西门豹问这其中的原因，回答说：“邺县的三老、廷掾常年向百姓敛收税钱，获得钱数百万，用其中的二三十万作为河伯娶妻的开支，和祝巫把其余的钱分了归自己。巫巡视乡里发现小户人家女孩生得好的，立即聘娶，为她在黄河上修建斋宫，梳妆打扮，把她浮在河上然后没于水中。那有生得好的女孩的人家，大都带着女儿远走他乡，因此城中更是空旷无人。”西门豹说：“到河伯娶妻的时候，我也前往送亲。”于是将大巫姬以及她的三个弟子还有三老都扔到河中，就都离开了。从此以后，不敢再说为河伯娶妻的事。我考查此事，大概出于一时的杂传记，怀疑这未必有事实根据。而《六国表》记载秦灵公八年以君主妻河”（开始以君主为河伯之妻）。既然说初，就可知道是从秦灵八年开始的，但不知道废止于什么时候，注家没有说明。司马贞《史记索隐》则说：“初以君主妻河”说的是从这年取别人的女儿为君主，君主类似公主。妻河，是说嫁给河伯，所以魏国习俗尚且为河伯娶妻，大概是其国的遗风。如此看来这样的事秦国、魏国都有。

鄂州兴唐寺钟

【原文】 鄂州城北凤凰山之阴，有佛刹，曰兴唐寺。其小阁有钟，题志云：“大唐天监二年三月十五日新铸。”勒官阶姓名者两人，一曰金紫光禄大、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御史大陈知新；一曰银青光禄大、检校尚书右仆射、兼御史大杨琮。大字之下，皆当有夫字，而悉削去，观者莫能晓。五代《新旧史》、《九国志》并无其说，唯刘道原《十国纪年》，载杨行密之父名禕，禕与夫同音。是时，行密据淮南，方破杜洪于鄂，而有其地，故将佐为讳之。行密之子渭，建国之后，改文散诸大夫为大卿，御史大夫为御史大宪，更可证也。鄱阳浮洲寺有吴武义二年铜钟，安国寺有顺义三年钟，皆刺史吕师造。题官称曰：“光禄大

卿、检校太保、兼御史大卿。”然则亦非大宪也。王得臣《麈史》尝辨此事，而云：“行密遣刘存破鄂州，知新、琮不预。志传皆略而不书。”予又按杨溥时，刘存以鄂岳观察使为都招讨使，知新以岳州刺史为团练使，同将兵击楚，为所执杀，则知新乃存偏裨，非不预也。

【译文】 鄂州城北凤凰山的北面，有一座古刹，名叫兴唐寺。寺的小阁里有一座钟，上面题着：“大唐天僖二年（905年）三月十五日新铸。”还刻有两个人的官阶姓名，一个是金紫光禄大、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御史大陈知新，一个银青光禄大、检校尚书右仆射、兼御史大杨琮。大字下面，都应当有“夫”字，可是全都削去，观看的人都不大明白。《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九国志》中都没有记载这件事，只有刘道原在《十国纪年》中，记载杨行密的父亲名祚，祚与夫读音相同。这时候，杨行密占据淮南，刚刚在鄂州打败了杜洪，占据了他的地盘，他的将领为他避父亲名讳，便命人将钟上的“夫”字删去。杨行密的儿子杨渥，于吴国建国之后，把文散官各大夫改为大卿，把御史大夫改为御史大宪，更可以证明这一事实。鄱阳浮洲寺有一座吴国武义二年（920年）铸的铜钟，安国寺有吴国顺义三年（923年）的钟，都是刺史吕师制造的。上面题写的官称是：“光禄大卿、检校太保、兼御史大卿。”但是也不是大宪。王得臣在《麈史》中曾考辨这件事，他说：“杨行密派刘存去攻破鄂州，陈知新、杨琮都未参预。志传书中都略而不记。”我通过查核考证，得知杨溥的时候，刘存以鄂岳观察使的身份任都招讨使，陈知新以岳州刺史的身份任团练使，共同率兵攻打鄂州，被将杀死，而陈知新是刘存的副手，并不是没有参预。

祢衡轻曹操

【原文】 孔融荐祢衡，以为“淑质贞亮，英才卓犖，志怀霜雪，疾恶若仇，任座、史鱼，殆无以过，若衡等辈，不可多得”。数称述于曹操。操欲见之，衡素相轻疾，不肯往，而数有恣言，操怀忿，因召之击鼓，裸身辱之。融为见操，说其狂疾，求得自谢。操喜，敕门者有客便通，待之极宴，衡乃坐于营门，言语悖逆，操怒，送与刘表。衡为融所荐，东坡谓融视操，特鬼蜮之雄，其势决不两立，非融诛操，则操害融。而衡平生唯善融及杨修，常称曰：“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融、修皆死于操手，衡无由得全。汉史言其尚气刚傲，矫时慢物，此盖不知其鄙贱曹操，故陷身危机，所谓语言狂悖者，必通斥其有僭篡之志耳。刘表复不能容，以与黄祖。观其所著《鹦鹉赋》，专以自况，一篇之中，三致意

焉。如云：“嬉游高峻，栖峙幽深。飞不妄集，翔必择林。虽周旋于羽毛，固殊智而异心。配鸾皇而等美，焉比翼于众禽？”又云：“彼贤哲之逢患，犹栖迟以羁旅。矧禽鸟之微物，能驯扰以安处。”又云：“嗟禄命之衰薄，奚遭时以禡褐。岂言语以阶乱，将不密以致危。”又云：“顾六翩之残毁，虽奋迅其焉如。心怀归而弗果，徒怒毒于一隅。”卒章云：“苟竭心于所事，敢背惠以忘初。期守死以报德，甘尽辞以效愚。”予每三复其文，而悲伤之。李太白诗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黄祖斗筭人，杀之受恶名。吴江赋鹦鹉，落笔超众英。锵锵振金石，句句欲飞鸣。挚鹯啄孤凤，千春伤我情！”此论最为精当也。

【译文】 孔融向曹操举荐祢衡，说他“品质光明磊落，英才超绝，志怀纯洁，疾恶如仇，比任座、史鱼有过之而无不及，像祢衡这样的人才，实不可多得”。由于孔融这样数次在曹操面前称赞祢衡。曹操打算见祢衡。祢衡平常就轻视厌恶曹操，不肯前往，并且数次说些不恭敬的话。曹操非常气愤，就命令他去击鼓，祢衡则脱去衣服赤身裸体向曹操表示抗议。为此，孔融再次拜见曹操，说祢衡有精神病，现在愿登门谢罪。曹操高兴了，就告诉守门人有来客就让进，用上等宴席招待。祢衡来后就坐在营门口，说话极不礼貌，曹操大怒，就将祢衡送给了刘表。祢衡为孔融所举荐，苏东坡说孔融视曹操只是阴险作恶的奸雄，其势决不两立，不是孔融诛杀曹操，就是曹操加害孔融。而祢衡一生，与孔融和杨修相友善，常常宣称说：“大儿孔文举（孔融）、小儿杨德祖（杨修）。”孔融和杨修都死在了曹操之手，祢衡无由得以保全。《后汉书》说他崇尚气节刚强骄傲，矫正时弊怠慢于待人接物，这大概是不知道他鄙视轻贱曹操，所以隐身于危机之中，所谓语言猖狂悖逆，一定是述说斥责曹操有僭越篡夺天下的异志罢了。刘表又不能相容，将祢衡送到黄祖那里。观看祢衡所写的《鹦鹉赋》，专门用以自我比况，一篇之中，多次表过了这个意思。如说：“嬉游高峻，栖峙（当作“招”，据《文选》）幽深。飞不妄集，翔必择林。虽周旋于羽毛，固殊智而异心。配鸾皇而等美，焉比翼于众禽？”（东游于高山峻岭，栖立于深谷之中。飞行不随便聚在一起，盘旋必择树林。虽然同处于鸟类之中，本来有特殊的智慧和与众不同的心怀，配以凤凰和它一样美，怎能和一般的飞禽相比？）又说“彼贤哲之逢患，犹祢迟以羁旅。矧禽鸟之微物，能驯扰以安处。”（那些圣贤先哲们遇到灾患，仍淹留于异地寄居为客，况且禽鸟这种微小的东西，能够逐渐驯导它安然相处。）又说：“嗟禄命之衰薄，奚遭时以祢祿？岂言语以阶乱，将不密以致危。”（感叹禄命的衰弱微薄，为什么又遭逢时运的颠危？难道言语是致乱的阶梯，且不缜密导致了危险。）又说：“顾六翩之残毁，虽奋迅其焉如。心怀归而弗果，徒怒毒于一隅。”（不过六根羽柱的残毁，虽然是奋力迅飞又能如

何。怀有归心而没有实现，白白在一个角落里怨恨。）结束一章写道：“苟竭心于所事，敢背惠以忘初？期守死以报德，甘尽辞以效愚。”（只要竭心尽力于所做的事，岂敢背弃恩惠而忘掉当初的厚德？期望守候到死的回报恩德，就甘愿竭尽言辞以效愚忠。）我每每再三读他的文章，而为他悲伤。李太白（李白）的诗说：“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黄祖斗筭人，杀之受恶名。吴江赋鹦鹉，落笔超众英。锵锵振金石，句句欲飞鸣。挚鹯啄孤凤，千春伤我情。”（魏帝经营四言八极，小瞧一个祢衡。黄祖是个才短量浅的人，杀了祢衡而承受了恶名。在吴江赋写鹦鹉，下笔就超过了众英。锵锵之声如震动金石，每一句都似要起而飞鸣。凶猛的鹯鸟啄吃孤单的凤凰，过一千年仍令我伤情。）这种评论最为精确至当。

禁中文书

【原文】 韩魏公为相，密与仁宗议定立嗣，公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断自不疑。乞内中批出。”帝意不欲宫人知，曰：“只中书行足矣。”淳熙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寿皇圣帝自德寿持丧还宫，二十五日有旨召对，与吏部尚书萧燧同引。中使先谕旨曰：“教内翰留身。”既对，乃旋于东华门内行廊下夹一素幄御榻后出一纸，录唐贞观中太子承乾监国事以相示。萧先退，上与迈言，欲令皇太子参决万几，使条具合行事宜。仍戒云：“进入文字须是密。”迈奏言：“当亲自书写实封，诣通进司。”上曰：“也只剪开，不如吩咐近上一个内臣。”迈又言：“臣无由可与内臣相闻知，惟御药是学士院承受文字，寻常只是公家文书传达，今则不可，欲俟检索典故了日，却再乞对面纳。”上曰：“极好。”于是七日间三得从容。乃知禁廷机事，深畏漏泄如此。（其详见于所记见闻事实）。

【译文】 韩魏公任丞相时，秘密地与仁宗商议确定立太子的事。韩丞相说：“此事如果开始进行，不可中途停止，陛下应决断不疑。请求暗中批文。”仁宗的意思不想让宫中的人知道，说：“只让中书省去办就可以了。”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十月二十二日，寿皇圣帝即孝宗从德寿殿持丧回到宫中，二十五日皇帝传旨召见大臣，与吏部尚书萧燧一同引见。中使首先宣读圣旨说：“退朝后教翰林学士暂时留下。”策对已毕，就立即从东华门的内走廊下夹一白色帷帐，从御榻后拿出来一张纸，上面写着唐代贞观年间中太子承乾监理国事，给我们看。萧燧先退下去了，皇上同臣谈话，想让皇太子参预决策事情，要臣等作好有关的准备工作。还告诫说：“时呈的文件必须是密件。”我当即启奏说：“臣当

亲自书写并密封，送到通进司。”皇上说：“到那儿也得剪开，不如吩咐给一个内臣。”我又说：“臣没有理由可以和内臣接触，只有御药是从学士院承受文字，平常只是公文书信传达，如今则不可，我想等检索典故完了之日，再请当面交纳。”皇上说：“这样做很好。”于是，在七天内，三次周旋，才知道禁宫中的机密大事，非常害怕泄漏出去。（其具体情况，详见于所记见闻事实）。

老子之言

【原文】 老子之言，大抵以无为，无名为本，至于绝圣弃智。然所云：“将欲歛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乃似于用机械而有心者。微言渊奥，固莫探其旨也。

【译文】 老子的言论，大多以无为，无名为其宗旨，以至于绝圣弃智。但是他所说的：“想要收缩它，必先扩张它；想要削弱它，必先加强它；想要废除它，必先振兴它；想要夺取它，必先给予它。”就好像是用机械和用心机相结合的方法谈君主如何控制臣下。精微的语言深奥难懂，根本无法探明其真意。

孔丛子

【原文】 前汉枚乘与吴王濞书曰：“夫以一缕之任，系千钧之重，上悬无极之高，下垂不测之渊，虽甚愚之人犹知哀其将绝也。马方骇，鼓而惊之；系方绝，又重镇之。系绝于天，不可复结。坠入深渊，难以复出。”《孔丛子嘉言》篇，载子贡之言曰：“夫以一缕之任，系千钧之重，上悬之于无极之高，下垂之于不测之深，旁人皆哀其绝，而造之者不知其危。马方骇，鼓而惊之；系方绝，重而镇之。系绝于高，坠入于深，其危必矣。”枚叔全用此语。《汉书》注诸家皆不引证，唯李善注《文选》有之。予按《孔丛子》一书，《汉艺文志》不载，盖刘向父子所未见。但于儒家有《太常蓼侯孔臧》十篇，今此书之末，有《连丛子》上下二卷，云孔臧著书十篇，疑即是已。然所谓《丛子》者，本陈涉博士孔鲋、子鱼所论集，凡二十一篇，为六卷。唐以前不为人所称，至嘉靖四年，宋咸始为注释以进，遂传于世。今读其文，略无楚、汉间气骨，岂非齐、梁以来好事者所作乎？《孔子家语》著录于《汉志》，二十七卷，颜师古云：“非今所有《家语》也。”

【译文】 西汉枚乘给吴王刘濞的信中说：“以一缕丝的负荷，系以三万斤的重物，上悬于没有极限的高处，下垂于不能测量的深渊，即便是非常愚钝的人也能懂得哀痛它将要断绝。马刚惊，又击鼓惊扰它；丝绳刚断，又用重物压它。丝绳断在天上，不能再结好。丝绳坠入深渊，难得再拉上来。”《孔丛子·嘉言》篇，记载子贡的话说：“以一缕丝负荷，系以三万斤的重物，上悬之于没有极限的高处，下垂之于不能测量的深底，旁人都哀痛丝绳断绝，而制作者不知道它的危机。马刚惊，又击鼓惊扰它；丝绳刚断，又用重物压它，丝绳断于高处，坠入于深渊，它的危机是必然的。”枚乘全部引用了这些话。《汉书》注各家都不引证子贡的话，只有李善注《文选》有子贡这段话。我考查《孔丛子》这本书，《汉书·艺文志》不著录，大概刘向父子未见过此书。但在儒家类有《太常蓼侯孔臧》十篇，现在这书的最后，有《连丛子》上下两卷，说孔臧著书十篇，怀疑就是这本书。然而所谓《丛子》这本书，本来是陈涉的博士孔鲋、子鱼的论文集，共二十一篇，编成六卷。唐朝以前不被人所称道，至嘉祐四年（1059），宋咸开始为《孔丛子》做注释并以此上进朝廷，于是流传于世。现在读《孔丛子》这篇文章，一点都没有楚、汉间风格骨力，难道不是齐、梁以来好事之徒所作的吗？《孔子家语》著录于《汉书·艺文志》，二十七卷，颜师古说：“不是现在所存的《孔子家语》。”

小星诗

【原文】 《诗序》不知何人所作，或是或非，前人论之多矣。唯《小星》一篇，显为可议。《大序》云：“惠及下也。”而继之曰：“夫人惠及贱妾，进御于君。”故毛、郑从而为之辞，而郑笺为甚，其释“肃肃宵征，抱衾与褥”两句，谓“诸妾肃肃然而行，或早或夜，在于君所，以次序进御。”又云：“褥者床帐也，谓诸妾夜行，抱被与床帐待进御。”且诸侯有一国，其宫中嫔妾虽云至下，固非閭阎贱微之比，何至于抱衾而行？况于床帐，势非一己之力所能致者，其说可谓陋矣。此诗本是咏使者远适，夙夜征行，不敢慢君命之意，与《殷其雷》之指同。

【译文】 《诗序》不知道是谁写的，或是或非，前人对此多有论述。只有《小星》一篇，明显地值得议论。《诗经·大序》中说：“恩惠及于臣下。”而接着又说：“夫人惠及贱妾，让她们陪侍君王。”所以毛萸、郑玄都为它作解说，而郑玄的校笺尤为显然，他解释“肃肃宵征，抱衾与褥”两句，说意思是“诸位

妃妾诚惶诚恐地行走，有的是早上有的是夜间，在君主居住的处所，按次序受君主的宠幸。”又说：“裯就是床帐，说的是诸妃妾间行走时，抱着被子和床帐去见君主。”况且身为一国诸侯，他的宫中的嫔妾虽说地位低下，怎么能让她们抱着被子与床帐去见君主？况且那些被子床帐，也不是一个女人的力量所能抱动的。这种解释可以说非常浅陋。我认为这首诗本来是吟咏出使的人到远方去，日夜兼程，不敢耽误君主的命令，与《诗经》中另一篇名叫《殷其雷》的主旨相同。

桃源行

【原文】 陶渊明作《桃源记》云：“源中人自言，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系之以诗曰：“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自是之后，诗人多赋《桃源行》，不过称赞仙家之乐。唯韩公云：“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之说诚荒唐。世俗那知伪为真，至今传者武陵人。”亦不及渊明所以作记之意。按《宋书》本传云：“潜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宋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故五臣注《文选》用其语。又继之云：“意者耻事二姓，故以异之。”此说虽经前辈所诋，然予窃意《桃源》之事，以避秦为言。至云“无论魏、晋”，乃寓意于刘裕，托之于秦，借以为喻耳。近时胡宏仁仲一诗，屈折有奇味。大略云：“靖节先生绝世人，奈何记伪不考真？先生高步窘末代，雅志不肯为秦民。故作斯文写幽意，要似寰海离风尘。”其说得之矣。

【译文】 陶渊明作《桃花源记》，说：“源中的人自己说，祖宗为了躲避秦时的祸乱，率领着妻子儿女及邑中的人来到了这个与世隔绝的境地，没有再出去，所以不知道有汉朝，更谈不到魏和晋了。”他接续的诗说：“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秦皇嬴氏扰乱了天道纲常，贤人纷纷逃避乱世而隐居。夏黄公、绮里季等四贤到商山的时候，源中的人也逃离了人世。我愿意驾着轻风，高飞去寻找与我志同道合的人）。”从此以后，诗人大多写有《桃源行》之类的诗，不过是称赏仙家的快乐。只有韩愈写道：“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之说诚荒唐。世俗那知伪为真，至今传者武陵人（神仙的有无何其渺茫，桃花源的说话的确荒唐。世俗人哪里知道将伪作真，至今还传颂着武陵人）。”也没有涉及陶渊明所以要作《桃花源记》的

志趣。按《宋书》的《陶渊明传》说：“陶渊明自以为曾祖父是晋朝的宰辅大臣，对自己屈身于后来替代晋朝的王朝感到羞耻。自从宋高祖的帝王大业渐渐兴隆，不再肯做官。他所写的文章，都题写了写作年月。义熙年间以前的，则题写晋朝的年号，从永初元年（420年）以后，只题写干支罢了。”所以五臣所注《文选》采用了这些话，又接着说：“意思是对服事二姓感到羞耻，所以前后加以区别。”这种说法虽经前辈所诋毁，然而我私下想桃花源的事，是以躲避秦朝的乱世立言，至说到“无论魏晋”，则是寄意于刘裕，托名为秦，借以作为比喻罢了。近来胡宏仁仲有一首诗，写得曲折有奇特的味道，其大略说：“靖节先生绝世人，奈何记伪不考真；先生高步窘末代，雅志不肯为秦民。故作斯文写幽意，要以寰海离风尘（陶靖节先生是位冠绝当代的人物，怎么会记伪事不考核其真？先生的高行窘迫于末世，高尚的志向不肯为暴秦的顺民。所以写了这篇文章以表深意，好像要宇内都脱离战乱风尘）。”他的说法是正确的。

司封赠典之失

【原文】 前所书司封失典故，偶复忆一事，尤为可笑。绍兴二十八年，郊祀赦恩，资政殿学士楼照，父已赠少师，乞加赠，司封以资政殿学士系只封赠一代，父既至少师，不合加赠，独改封其母范氏、欧阳氏为秦国、魏国夫人。盖楼公虽尝为执政，而见居官职须大学士，乃恩及二代，故但用侍从常格。资政殿学士施钜父仲说，已赠太子太保，加为宫傅，亦不及祖也。乾道六年，仲兄以端明殿学士知太平州。是年郊赦，伯兄已赠祖为太保，而转运司移牒太平州，云准吏部牒，取会本路曾任执政官合封赠二代者。仲兄既具以报，又再行下时，祖母及父母已至极品，于是以祖为言，遂复赠太傅，命词给告，殊非端殿所当得。不知省部一时何所据也？

【译文】 前边所写的司封不合典故，偶然又使我想起一件事，特别可笑。宋高宗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在郊外祭祀赦恩，资政殿学士楼照的父亲已赠少师之职，又请求加赠。司封依据资政殿学士只能封赠一代官职的规定，认为其父既然已经是少师，不能再加赠，只改封他的母亲范氏、欧阳氏分别为秦国夫人和魏国夫人。大概楼照虽然曾是执政，而现居官职必须是大学士才能恩及父、祖两代人，所以只好按侍从之常规对待。资政殿学士施钜的父亲施仲说，已被封为太子太保，又加封为宫傅，也不恩及其祖父。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年），我二哥洪遵以端明殿学士身份任太平州知州。这一年郊祀大赦，我大哥洪

适已请求封赠祖父为太保，而转运司把文件转给太平州，说已批准吏部的文件，因其曾任执政官合应加封二代。二哥已经把情况报上，又准备再行下赐臣下，祖母及父母的官职已经达到最高品，于是以祖父未赠为理由，就再赠祖父太傅，写成命词给予公告，这绝不是端明殿学士所应得到的恩遇。不知道省部在当时根据什么这样去做？

辰巳之巳

【原文】 《律书》释十母十二子之义，大略与今所言同，唯至四月，云其于十二子为巳，巳者，言阳气之已尽也。据此，则辰巳之巳，乃为矣音。其他引二十八宿，谓柳为注，毕为浊，昴为留，亦见于《毛诗》注及《左氏传》，如《诗》谓营室为定星也。

【译文】 《史记·律书》上解释天干十母地支十二子的意义，大概和今天的语言相同，只有到了四月，说地支中为巳，所谓巳，就是说阳气已经枯竭了。根据这一点，那么辰巳中的巳，就是读“矣”的声音。其他人引用二十八宿，说柳是注，毕是浊，昴是留，也都见于《毛诗》注以及《左氏传》，如《诗经》中说营室为定星一样。

卷十一

碑志不书名

【原文】 碑志之作，本孝子慈孙欲以称扬其父祖之功德，播之当时，而垂之后世，当直存其名字，无所避隐。然东汉诸铭，载其先代，多只书官。如《淳于长夏承碑》云，“东莱府君之孙，太尉掾之中子，右中郎将之弟”，《李翊碑》云，“襁褓太守曾孙，谒者孙，从事君元子”之类是也。自唐及本朝，名人文集所志，往往只称君讳某字某，至于记序之文，亦然，王荆公为多，殆与求文扬名之旨为不相契。东坡先生《送路都曹》诗，首言：“乖崖公在蜀，有录事参军老病废事，公责之，遂求去，以诗留别，所谓‘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归意浓’者。公惊谢之曰：‘吾过矣。同僚有诗人而吾不知。’因留而慰荐之。坡幼时闻父老言，恨不问其姓名。及守颖州，而都曹路君，以小疾求致仕，诵此语，留之不可，乃采前人意作诗送之。”其诗大略云：“结发空百战，市人看先封。谁能搔白首，抱关望夕烽。”则路君之贤而不遇可知矣。然亦不书其名，使之少获表见，又为可惜也！

【译文】 墓志铭之类的文章，本来是孝子慈孙为了称扬他们的父辈祖辈功德，以便传播于当时，流传于后世，应当直接写上名字，不需要有什么避讳。但是东汉的各种墓志铭，记载他们的先代人，大都是只写官职。例如《淳于长夏承碑》说夏承是：“东莱府君的孙子，太尉掾的第二个儿子，右中郎将的弟弟”，《李翊碑》说李翊：“紫衣太守的曾孙，从事君的长子”之类等等。从唐朝到宋朝，名人的文集所记载的，往往只称呼君讳某字某，至于记序之类的文章，也是如此。在这方面，王安石写的文章很多，这与求文扬名的意图不相符合。苏东坡先生有《送路都曹》诗，诗前的序言就说：“乖崖公张咏在蜀地时，有一个录事参军年老体弱耽误公事，乖崖公批评他，于是就请求辞职，写了首诗留作告别，所谓‘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归意浓’就是。乖崖公吃惊地道歉说：‘我错了。同事中有诗人我竟然不知道。’因而就挽留并举荐他。我在小时候听父老说起这件事，后悔没问那老者的姓名。后来我做了颖州太守，都曹路君，因小病请求辞官，诵读了上面的两句诗，我挽留他不成，就采用前人笔意作诗送

给他。”其诗大概是：“结发空百战，市人看先封。谁能搔白首，抱关望夕烽。”从这里可以看出路君的贤良而怀才不遇的情景。但是这首诗中也没有写出路君的姓名，使之不能得到显现，又是多么可惜呀！

汉文帝不用兵

【原文】 《史记·律书》云：“高祖厌苦军事，偃武休息。孝文即位，将军陈武等议曰：‘南越、朝鲜，拥兵阻扼，选蠕观望。宜及士民乐用，征讨逆党，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会吕氏之乱，误居正位，常战战栗栗，恐事之不终。且兵凶器，虽克所愿，动亦耗病，谓百姓远方何？今匈奴内侵，边吏无功，边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为动心伤痛，无日忘之。愿且坚边设侯，结和通使，休宁北陲，为功多矣。且无议军。’故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富盛，粟至十余钱。”予谓孝文之仁德如此，与武帝黷武穷兵，为霄壤不侔矣。然班史略不及此事。《资治通鉴》亦不编入，使其事不甚暴白，惜哉！

【译文】 《史记·律书》中说：“汉高祖（刘邦）厌倦用兵之苦，就停止武备，休养生息。孝文帝（刘恒）即位后，将军陈武等议论说：‘南越、朝鲜，拥重兵，仗险阻，伺机欲动。如今趁着士兵、民众乐于为用的时候，来征讨逆党，借以统一疆界。’孝文帝说：‘我能任文明礼教的事，还考虑不到用兵。当年吕氏作乱，我谬居帝位，常心怀畏惧，怕事情不能有个好结果。而且武器是凶器，虽然打仗或许能达到预期的愿望，但一动兵戈，也要亏损国库，更不要说老百姓和远方的人叫他们怎么办呢？现在匈奴在向内地进犯，边防的官吏没有退敌的功劳，而边地的民众们，父子都扛着武器守卫边疆已经很长时间了，我常常为他们感到伤心痛苦，没有一天能够忘记他们。我愿意暂且巩固边防，设立守候，缔结和约，互派使者，使北部边疆得到平和安宁，为这件事立功的机会很多。请暂时不要再谈论用兵打仗的事了。’所以这时老百姓没有对内对外的徭役，能够在土地上耕作栖身，天下达到殷实富足，谷子降到十多钱。”我说孝文帝有这样仁爱的心地，和汉武帝（刘彻）的穷兵黷武比起来，真有天地之别，不能等同起来了。然而，班固的《汉书》省略了，不提到这件事，《资治通鉴》也没有把这件事编进去，使这件事不太显露，真是可惜呀！

帝王讳名

【原文】 帝王讳名，自周世始有此制，然只避之于本庙中耳。“克昌厥后，骏发尔私。”成王时所作诗。昌、发不为文、武讳也。宣王名诵而“吉甫作诵”之句，正在其时。厉王名胡，而“胡为虺蜴”、“胡然厉矣”之句，在其孙幽王时。小国曰胡，亦自若也。襄王名郑，而郑不改封。至于出居其国，使者告于秦、晋曰：“鄙在郑地。”受晋文公朝，而郑伯僂王。唯秦始皇以父庄襄王名楚，称楚曰荆，其名曰政，自避其嫌，以正月为一月。盖已非周礼矣。汉代所谓邦之字曰国，盈之字曰满，彻之字曰通，虽但讳本字，而吏民犯者有刑。唐太宗名世民，在位之日不偏讳。故戴胄、唐俭为民部尚书，虞世南、李世勣在朝。至于高宗、始改民部为户部，世勣但为勣。韩公《讳辨》云：“今上书及诏，不闻讳浒、势、秉、机，惟宦官宫妾，乃不敢言喻及机，以为触犯。”此数者皆其先世嫌名也。本朝尚文之习大盛，故礼官讨论，每欲其多，庙讳遂有五十字者。举场试卷，小涉疑似，士人辄不敢用，一或犯之，往往暗行黜落。方州科举尤甚，此风殆不可革。然太祖讳下字内有从木从匀者，《广韵》于进字中亦收。张魏公以名其子，而音为进。太宗讳字内有从耳从火者，又有梗音，今为人姓如故。高宗讳内从冂从口者亦然。真宗讳从心从亘，音胡登切。若缺其一画，则为襍，遂并襍字不敢用，而易为常矣。

【译文】 对帝王的名字要避讳，从周朝开始出现这一制度，这时只是在本宗庙中避讳。“克昌厥后，骏发尔私。”这是周成王时作的诗。昌、发二字并不因为文王（名姬昌）、武王（名姬发）而避讳。周宣王名字叫诵，而当时就有“吉甫作诵”的诗句，正是在宣王在位的时候。周厉王名字叫胡，然而“胡为虺蜴”、“胡然厉矣”的句子，都是出现在周厉王的孙子周幽王的时代。小国叫胡，仍然保持着原来的称呼。周襄王名字叫郑，而郑地不改封号。至于周襄王外出，使者对秦国、晋国说：“鄙人在郑地。”周王接受了晋文公朝拜，郑伯是周王的辅佐。只有到了秦始皇时因其父庄襄王名字叫楚，才称楚地为荆。秦始皇自己的名字叫政，为了自避其嫌，才改正月为一月。这大概已经不是周朝的礼节了。

汉代将邦字改为国，是为了避高祖刘邦名讳，盈字改作满，是为了避惠帝刘盈名讳，彻字改用通，是为了避武帝刘彻名讳。虽然只是避讳本字而不是同音字，但是，官吏百姓违犯了就要受到刑法的制裁。

唐太宗名叫世民，他在位期间不搞避讳。所以戴胄、唐俭为民部尚书不避

民字，虞世南、李世 在朝做官不避世字。到了唐高宗时，开始把民部改为户部，把李世 改为李 。韩愈在《讳辨》中说：“如今下级官员上书以及皇上诏书，没有听说有对浒、势、秉、机的避讳。只有宦官宫妾，因为唐代宗名豫，玄宗名隆基才不敢说喻和机等字，以免犯了避讳。”因为，这几个字都是唐代皇室先辈的名字中的字或同音。

宋朝崇尚文章的习俗很盛，所以礼官讨论避讳，往往不厌其多，遂使避庙讳的字就有五十个。科举考场的试卷，只要有稍微涉及避讳的字，士人们就不敢用，一旦有人触犯，往往会被偷偷取消资格。国内科举制度更为加强了，这种避讳风气恐怕不可能革掉。然而宋太祖名字赵匡胤内有从木从匀的字需要避讳，《广韵》中在进字中收入了。张魏公（浚）给儿子起名，音为进。宋太宗赵炅，又名光义，讳字内有从耳从火的字，又有梗音，现在成为人的姓氏仍然照旧。宋高宗赵构的名字讳从门从口的字也是这样。宋真宗赵恒的名字讳从心从亘的字，读为胡登切。恒字如少一画就成了 ，于是 字也不敢再用，而改为常字。

家讳中字

【原文】 士大夫除官，于官称及州府曹局名犯家讳者听回避，此常行之法也。李焘仁甫之父名中，当赠中奉大夫，仁甫请于朝，谓当告家庙，与自身不同，乞用元丰以前官制，赠光禄卿。丞相颇欲许之。予在西垣闻其说，为诸公言，今一变成式，则他日赠中大夫，必为秘书监，赠太中大夫，必为谏议矣，决不可行。遂止。李愿为江东提刑，以父名中，所部遂呼为通议，盖近世率妄称太中也。李自称只以本秩曰朝散。黄通老资政之子为临安通判，府中亦称为通议，而受之自如。

【译文】 士大夫被封了官，凡是在官称以及州、府、曹、局名字中有触犯家讳的都要回避，这是常用的法规。李焘字仁甫，他父亲的名叫中，应当封李焘为中奉大夫，李仁甫请求朝廷，说应当告慰家庙，与自身名讳有所不同，请求用宋神宗元丰年代以前的官制，赠为光禄卿。丞相很想答应这件事。我当时在西垣听说此事，对诸位同僚说，制度不可变，如果今天一下改变了已定的制度，那么他日封中大夫，必须是秘书监，赠太中大夫，一定是谏议了，此事决不可行。于是就制止了这件事。李愿任江东提刑，因他父亲名叫中，他的部下就称他为通议，大概因为近世把提刑称为太中了。李愿自称只按本秩原来的品

级称为朝散。黄通老资政的儿子任临安通判，府中的人也称他为通议，而黄通老的儿子却接受自如，并不避讳。

记张元事

【原文】 自古夷狄之臣来入中国者，必为人用。由余入秦，穆公以霸，金日鞮仕汉，脱武帝五柞之厄。唐世尤多，执失思力、阿史那社尔、李临淮、高仙芝、浑瑊、李怀光、禿跌光颜、朱邪克用，皆立大功名，不可殫纪。然亦在朝廷所以御之，否则为郭乐师矣。倘使中国英俊，翻致力于异域，忌壮士以资敌国者，固亦多有。贾季在狄，晋六卿以为难日至；桓温不能留王猛，使为苻坚用；唐庄宗不能知韩延徽，使为阿保机用；皆是也。西夏曩霄之叛，其谋皆出于华州士人张元与吴昊，而其事本末，国史不书。比得田昼承君集，实纪其事云：“张元、吴昊、姚嗣宗，皆关中人，负气倜傥，有纵横才，相与友善。尝蒲游塞上，观觐山川风俗，有经略西鄙意。姚题诗崆峒山寺壁，在两界间，云：‘南粤干戈未息肩，五原金鼓又轰天。崆峒山叟笑无语，饱听松声春昼眠。’范文正公巡边。见之大惊。又有‘踏破贺兰石，扫清西海尘’之句。张为《鹦鹉诗》，卒章曰：‘好著金笼收拾取，莫教飞去别人家。’吴亦有诗。将谒韩、范二帅，耻自屈，不肯往，乃簪大石，刻诗其上，使壮夫拽之于通衢，三人从后哭之，欲以鼓动二帅。既而果召与相见，踌躇未用间，张、吴径走西夏。范公以急骑追之，不及，乃表姚入幕府。张、吴既至夏国，夏人倚为谋主，以抗朝廷，连兵十余年，西方至为疲弊，职此二人为之。时二人家属羁縻随州，间使谍者矫中国诏释之，人未有知者。后乃闻西人临境，作乐迎此二家而去，自是边帅始待士矣。姚又有《述怀》诗曰：‘大开双白眼，只见一青天。’张有《雪》诗曰：‘五丁仗剑决云霓，直取银河下帝畿。战死玉龙三十万，败鳞风卷满天飞。’吴诗独不传。观此数联，可想见其人非池中物也。”承君所记如此。予谓张、吴在夏国，然后举事，不应韩、范作帅日尚犹在关中，岂非记其岁时先后不审乎？姚、张时，笔谈诸书，颇亦记载。张、吴之名，正与羌酋二字同，盖非偶然也。

【译文】 自古以来北方外族的大臣投奔中国的，一定会被皇上任用。由余进入秦国，秦穆公因之而称霸；金日旃在汉朝当官，帮助汉武帝解脱了五柞的危险，唐朝这种事特别多，执失思力、阿史那社尔、李临淮、高仙芝、浑瑊、李怀光、禿跌光颜、朱邪克用等人，都立下了卓著的功名，不可磨灭。然而也在于朝廷能够恰当任用他们，否则就会成为郭药师之类的人了。倘若使中国的英

才俊杰，反过来为异国效力，帮助敌国建功立业的，也大有人在。贾季在北方，晋国六卿认为大难不久将至；桓温不能挽留王猛，使之被苻坚所用；唐庄宗未能任用韩延徽，结果使之被阿保机重用，这都是明证。西夏国曩霄背叛一事，完全是由于华州士人张元和吴昊的计谋，而这件事的始末，国史上没有记载。在田昼（字承君）的文集中，有对此事的真实记载：“张元、吴昊、姚嗣宗三人，都是关中人，志高倜傥，有纵横游说之才，相互间关系很好。他们曾经游历塞上，观赏山川风俗，便产生了经略西夏的意图。姚嗣宗曾题诗于崆峒山寺的墙壁上，而此山正在两国边界上，其诗为：‘南粤干戈未息肩，五原金鼓又轰天。崆峒山叟笑无语，饱听松声春昼眠。’范仲淹在巡视边疆时，见了大为惊奇。姚嗣宗在诗中还说‘踏破贺兰石，扫清西海尘’的。张元写了《鸚鵡诗》，结尾两句是：‘好著金笼收拾取，莫教飞去别人家。’吴昊也有诗。他们准备拜见韩琦、范仲淹二位大帅，又觉得这是一种自我屈服的行为，不肯前往，于是就削平一块大石头，把诗刻在上面，让强壮的人拉到交通要道上，三人跟在后面大哭，想用这种办法激励二位大帅，不久二位大帅果然要召见他们，但还在犹豫，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张元、吴昊逃往西夏。范仲淹得知后使用快马追赶，未能赶上，就任用了姚嗣宗。张元、吴昊二人来到西夏国之后，受到夏人重用，成为出谋划策的主要人物，以用来对抗朝廷，连续用兵打仗十几年，致使西部边防极为疲惫，主要是由这两个人为西夏谋划造成的。当时二人的家属被扣留在随州，西夏曾派间谍用计谋使中国释放了他们，人们都不知道。后来才听说西夏军队靠近边境，鸣炮奏乐把他二人的家属接走了，从这件事之后，边塞的元帅开始重视好好对待下属了。姚嗣宗又有《述怀》诗说‘大开双白眼，只见一青天。’张元有《雪》诗说：‘五丁仗剑决云霓，直取银河下帝畿。战死玉龙三十万，败鳞风卷满天飞。’吴昊的诗却没有传下来。看了这几联诗，可以想到这些人不是蛰居池中、没有远大抱负的人。”田承君在他的集中所记的就是这样。我说张元、吴昊在夏国，然后再起事，不应该在韩琦、范仲淹作主帅时尚在关中，岂不是记载年月先后的不审慎吗？姚、张的诗，《梦溪笔谈》等书中也有些记载。张、吴的名字，正和羌酋李曩霄的原名元昊二字相同，大概不是偶然的。

宫室土木

【原文】 秦始皇作阿房宫，写蜀、荆地材至关中，役徒七十万人。隋炀帝营宫室，近山无大木，皆致之远方，二千人曳一柱，以木为轮，则戛摩火出，乃

铸铁为轂，行一二里，轂辄破，别使数百人赍轂，随而易之，尽日不过行二三十里，计一柱之费，已用数十万功。大中祥符间，奸佞之臣，罔真宗以符瑞，大兴土木之役，以为道宫。玉清昭应之建，丁谓为修宫使，凡役工日至三四万，所用有秦、陇、岐、同之松，岚、石、汾、阴之柏，潭，衡、道、永、鼎、吉之榿，温、台、衢、吉之榿，永、澧、处之榿，樟，潭、柳、明、越之杉，郑、淄之青石，衡州之碧石，莱州之白石，绛州之斑石，吴越之奇石，洛水之石卵，宜圣库之银朱，桂州之丹砂，河南之赭土，衢州之朱土，梓、信之石青、石绿，磁、相之黛，秦、阶之雌黄，广州之藤黄，孟、泽之槐华，虢州之铅丹，信州之土黄，河南之胡粉，卫州之白堊，郢州之蚌粉、兗、泽之墨，归、歙之漆，莱芜、兴国之铁。其木石皆遣所在官部兵民入山谷伐取。又于京师置局化铜为礼、冶金薄、锻铁以给用。凡东西三百一十步，南北百四十三步。地多黑土疏恶，于京东北取良土易之，自三尺至一丈有六等。起二年四月，至七年十一月宫成，总二千六百一十区。不及二十年，天火一夕焚礼，但存一殿。是时，役遍天下，而至尊无穷兵黷武、声色苑囿、严刑峻法之举，故民间乐从，无一违命，视秦、隋二代，万万不侔矣。然一时贤识之士，犹为盛世惜之。国史志载其事，欲以为夸，然不若掩之之为愈也。沈括《笔谈》云：“温州雁荡山，前世人所不见。故谢灵运为太守，未尝游历。因昭应宫采木，深入穷山，此境始露于外。”他可知矣。（卫州，一作衡州）。

【译文】 秦始皇建造阿房宫，倾尽四川地方的各种建材，运到关中，服劳役的人有七十万。隋炀帝营造宫室时，附近山上没有大木，都是从远方运来，二千人才拉一根大木头，以木头为轮子，一摩擦就生火，于是就铸铁造成轂，走一二里，轂就破裂了，只好另派数百人抱着备用的铁轂，随时更换，一天也不过走二三十里，合计一根柱子的费用，就要用几十万个工。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大臣中的奸佞之臣，用符瑞来欺骗真宗，因而大兴土木，来建造道宫。玉清昭应宫的修建，丁谓是修宫使，凡役使工匠每日达三四万人，所用的建筑材料，有秦、陇、岐、同等州的松树，岚、石、汾、阴等地的柏树，潭、衡、道、永、鼎、吉等州的枫树、楠木、榿木，温、台、衢、吉等州的 木，永、澧、处等州的 木、樟木，潭、柳、明、越等州的杉木，郑州、淄州的青石，衡州的碧石，莱州的白石，绛州的斑石，吴越的奇石，洛水的石卵，宜圣库的银朱，桂州的丹砂，河南的赭土，衢州的朱土，樟州、信州的石青、石绿，磁州、相州的黛，秦州、阶州的雌黄，广州的藤黄，孟州、泽州的槐华，虢州的铅丹，信州的土黄，河南的胡粉，卫州的白堊，郢州的蚌粉，兗州、泽州的墨，归州、歙州的漆，莱芜、兴国的铁。它的木料、石料，都派所在地的兵民到山谷中去采

伐。又在京城设置专局，专管熔炼铜或黄铜，冶铸金的薄片，以及打铁以供建造之用。道宫面积凡东西三百一十步，南北一百四十三步。建筑工地上多黑土，土质疏松，不宜建造，就在京城东北取好土换上，从三尺深到一丈六尺不等。工程在真宗（赵恒）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四月开工，到大中祥符七年十一月道宫修建成功，总共有二千六百一十个小室。不到二十年，被天火一夜之间焚烧，只剩了一殿。在那时，工役遍布天下，而皇上没有穷兵黩武、声色苑囿、严刑峻法的举动，所以民间乐于从命，没有一个违抗命令的，比照起秦、隋两代来，万万不相同了。然而一时有才能有识见的人士，还为盛世的这一举措可惜。国史的志中记载了这件事，想用来夸耀，但不如把这件事遮盖起来更好一点。沈括《梦溪笔谈》上说：“温州的雁荡山，前代人没有发现。所以谢灵运为太守时没有游历过。因为昭应宫采木材，深入穷山，这一境区才被外人所知。”从这一点看，其他也就可以推想而知了。（卫州，一作衡州）

岁月日风雷雄雌

【原文】 虞喜天文论汉《太初历》十一月甲子夜半冬至云：“岁雄在阏逢，雌在摄提格，月雄在毕，雌在觜，日雄在子。”又云：“甲岁雄也，毕月雄也，阏月雌也。”大抵以十干为岁阳，故谓之雄，十二支为岁阴，故谓之雌，但毕、觜为月雄雌不可晓。今之言阴阳者，未尝用雄雌二字也。《郎孺传》引《易雌雄秘历》，今亡此书。宋玉《风赋》有雄风雌风之说。沈约有“雌霓连蜷”之句。《春秋元命包》曰：“阴阳合而为雷。”《师旷占》曰：“春雷始起，其音格格，其霹雳者，所谓雄雷，旱气也。其鸣依依，音不大霹雳者，所谓雌雷，水气也。”见《法苑珠林》。予家有故书一种，曰《孝经雌雄图》，云出京房《易传》，亦日星占相书也。

【译文】 晋人虞喜在谈到汉代《太初历》十一月甲子夜半冬至说：“岁之雄在阏逢天干甲的位置，岁之雌在摄提格地支寅的位置，月雄在二十八宿的毕，月雌在二十八宿的觜，日雄在子时。”又说：“甲岁是雄，毕月是雄，阏月是雌。”大概是以十个天干为岁阳，所以叫做雄岁，十二地支为岁阴，所以叫做雌岁，但以毕、觜叫月的雄雌却搞不明白。现在谈论阴阳的人们，未曾用雄雌两个字。《郎孺传》中引用过《易雌雄秘历》，可此书如今已经亡佚了。宋玉在《风赋》中有雄风雌风的说法。沈约也有“雌霓连蜷”的句子。《春秋元命包》中说：“阴阳相结合而形成雷。”《师旷占》中说：“春雷开始响的时候，声音格格，并有霹

雳闪电，就是所说的雄雷，这是干旱之气。如果声音依依，声音不大而有霹雳闪电的，就是所说的雌雷，这是水湿之气。”这段话见于《法苑珠林》。我家有旧书一本，叫《孝经雌雄图》，说是出自京房的《易传》，也是日星占相一类的书。

东坡三诗

【原文】 东坡初赴惠州，过峡山寺，不值主人，故其诗云：“山僧本幽独，乞食况未还。云碓水自舂，松门风为关。石泉解娱客，琴筑鸣空山。”既至惠州，残腊独出，至栖禅寺，亦不逢一僧，故其诗云：“江边有微行，诘曲背城市。平湖春草合，步到栖禅寺。堂空不见人，老稚掩关睡。所营在一食，食已宁复事。客行岂无得？施子净扫地。风松独不静，送我作鼓吹。”后在儋耳作《观棋》诗，记游庐山白鹤观，观中人皆阖户昼寝，独闻棋声，云：“五老峰前，白鹤遗址。长松荫庭，风日清美。我时独游，不逢一士。谁欤棋者？户外屨二。不闻人声，时闻落子。”其寂寞冷落之味，可以想见，句语之妙，一至于此。

【译文】 东坡（苏轼）初次赴惠州，经过峡山寺，没有见到寺中主人，所以他的诗说：“山僧本幽独，乞食况未还。云碓水自舂，松门风为关。石泉解娱客，琴筑鸣空山（山僧原本幽居独处，何况化斋还没有回来。云深处水碓无人自舂，松枝门风吹自关。山石中流泉也懂得娱乐客人，像琴筑唱奏在空山）。 ”已到惠州，残冬日独自出门，来到栖禅寺，也没有遇到一位寺僧，所以他的诗说：“江边有微行，诘曲背城市。平湖春草合，步到栖禅寺。堂空不见人，老稚掩关睡。所营在一食，食已宁复事。客行岂无得？施子净扫地。风松独不静，送我作鼓吹（江边有条小径，曲折背离城市。平静的湖面春草环抱，慢慢地步行来到栖禅寺。禅堂空空不见一人，老的少的都关门睡了。人生营营在求一饱，吃饱了难道还有所求。作客微行难道没有得到什么吗？施舍给你的是扫得干净的庭院。风吹松树独不肯安静，像送我作起了鼓吹）。 ”后来在儋耳写了一首《观棋》诗，记载了游览庐山白鹤观，观中人在大白天都闭着门睡大觉，只听到下棋的声音，诗说：“五老峰前，白鹤遗址。长松荫庭，风日清美。我时独游，不逢一士。谁欤棋者？户外屨二。不闻人声，时闻落子（在五老峰前，有白鹤的遗址。松荫遮掩庭院，风和日丽环境清静幽美。我独自漫游，没有遇到一士。下棋的人是谁啊？门外有鞋二双。听不到下棋人的说话，不时传出落子的棋声）。 ”诗中传出诗人寂寞冷落的心境，可以想见，语句的精妙，竟达到这一地步。

天文七政

【原文】 《尚书·舜典》：“以齐七政。”孔安国本注，谓“日月五星也。”而马融云：“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主日；第二主月；第三曰命火，谓荧惑也；第四曰煞土，谓填星也；第五曰代水，谓辰星也；第六曰危木，谓岁星也；第七曰剽金，谓太白也。日月五星各异，故曰七政。”《尚书大传》一说，又以为：“七政者，谓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为政也，人道正而万事顺成。”三说不同，然不若孔氏之明白也。

【译文】 《尚书·舜典》中说：“以齐七政。”孔安国注本说，七政是指“日月五星（金、木、水、火、土）。”而马融则认为：“七政就是指的北斗七星，它们各有自己所主管的。第一个主管日，第二个主管月；第三个是命火，叫做荧惑；第四个是煞土，叫做填星；第五个是代水，叫做辰星；第六个是危木，叫做岁星；第七个是剽金，叫做太白。日月五星各有不同，所以叫做七政。”《尚书大传》又有一种说法，认为：“七政，就是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之所以叫做政，是说人道正确就万事顺利成功。”三种说法各有不同，我看孔安国的说法甚为明白。

符读书城南

【原文】 《符读书城南》一章，韩文公以训其子，使之腹有《诗》、《书》，致力于学，其意美矣。然所谓“一为公与相，潭潭府中居，不见公与相，起身自犁锄”等语，乃是觊觎富贵，为可议也。杜牧之《寄小侄阿宜》诗亦云：“朝廷用文治，大开官职场。愿尔出门去，取官如驱羊。”其意与韩类也。予向为陈铸作《城南堂记》亦及此意云。

【译文】 《符读书城南》这首诗，唐朝韩愈先生为教训儿子朝符而作，让他饱读《诗》、《书》，致力于学问，其意图是美好的。但是所谓“一为公与相，潭潭府中居，不见公与相，起身自犁锄”等句，则具有觊觎富贵的意思，似乎值得商讨。杜牧的《寄小侄阿宜》诗也说：“朝廷用文治，大开官职场，愿尔出门去，取官如驱羊。”其意思和韩愈的相似。我以前曾经为陈铸写过《城南堂记》，也说到这个意思。

致仕官上寿

【原文】 范蜀公自翰林学士，以本官户部侍郎致仕，仍居京师，同天节乞随班上寿，许之，遂著为令。韩康公，元璽二年以司空致仕，太皇太后受册，乞随班称贺，而降诏免赴，二者不同如此。

【译文】 范蜀公（镇）从翰林学士，以原任官户部侍郎的身份辞官退居，仍然住在京师，宋神宗皇帝寿辰这天请求随众臣一起上朝拜寿，皇上答应了。马上就写了文件。韩康公（绛），在宋哲宗元璽二年（1087年）时以司空之职退居，太皇太后接受册封时，他请求随众臣前去称贺，而皇上下诏书免于前往。二人恩遇的不同及至于此。

五经字义相反

【原文】 治之与乱，顺之与扰，定之与荒，香之与臭，遂之与溃，皆美恶相对之字。然《五经》用之或相反，如乱臣十人，乱越我家，惟以乱民，乱为四方新辟，乱为四辅，厥乱明我新造邦，丕乃俾乱之类，以乱训治也。安扰邦国，扰而毅，扰龙，六扰之类，以扰训顺也。荒度土功，遂荒大东，大王荒之，葛 荒之之类，以荒训定也。无声无臭，胡臭蠢时，其臭膺，臭阴达于渊泉之类，以臭训香也。是用不溃于成，草不溃茂之类，以溃训遂也。郑康成笺《毛诗》溃成，与毛公皆释为遂，至于溃茂，则以为溃当作汇，汇，茂貌也。自为异同如此。

【译文】 治和乱，顺与扰，定与荒，香与臭，遂与溃，都是和美与恶相对的字。然而《五经》中的用法有的则相反。如乱臣十人，乱越我家，惟以乱民，乱为四方新辟，乱为四辅，厥乱明我新造邦，丕乃俾乱之类的话，乱字都是治的意思。安扰邦国，扰而毅，扰龙，六扰之类的话，扰字都是顺的意思。荒度土功，遂荒大东，大王荒之，葛 荒之之类的话，荒字都安定的意思。无声无臭，胡臭昧时，其臭膺，臭阴达于渊泉之类的话，臭字都是香的意思。是用不溃于成，草不溃茂之类，溃字都是遂的意思。郑康成注解《毛诗》中的溃成，和毛公一样都解释为遂（成功）。至于溃茂，认为溃字应当是汇，汇，就是茂盛的意思。自己的解释竟然有如此的不同。

镇星为福

【原文】 世之伎术，以五星论命者，大率以火、土为恶，故有昼忌火星夜忌土之语。土，镇星也，行迟，每至一宫，则二岁四月乃去，以故为灾最久。然以国家论之则不然，苻坚欲南伐，岁镇守斗，识者以为不利。《史记·天官书》云：“五潢，五帝车舍。火入，旱；金，兵；水，水。”宋均曰：“不言木、土者，德星不为害也。”又云：“五星犯北落，军起。火、金、水尤甚。木、土，军吉。”又云：“镇星所居国吉。未当居而居，已去而复，还居之，其国得土。若当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西东去，其国失土。其居久，其国福厚；其居易（轻速也），福薄。”如此则镇星乃为大福德，与木亡异，岂非国家休祥所系，非民庶可得侔邪？

【译文】 世上的方术，用金、木、水、火、土五星论定命运的人，大概以火星、土星为恶星，所以有“昼忌火星夜忌土”的话。土星，就是镇星，走得很慢，每到一个宫（古代历法以周天三百六十度的十二分之一，即三十度为一宫），要走二年零四个月才能离去，所以为害最长久。然而以国家来论便不是这样，十六国前秦苻坚想南征东晋，木星、土星守着南斗星，这对东晋有利，所以懂得天象的人以为南征不利。《史记·天官书》中说：“五潢星，是五帝车舍，火星入犯，旱灾；金星入犯，起兵戈；水星入犯，有水灾。”宋均解释说：“不说木星、土星，是因为木星、土星是德星，不会造成灾害。”《天官书》又说：“五星入犯北落星，兵戈就要起来。火星、金星、水星尤其厉害。木星、土星入北落，则对军队有利。”又说：“土星所在国的分野，则所在国吉。不应当在而在，已经离开了又回来，还守着，所守着的国能得到土地。倘若土星当在而不在，或者已经在，又向西东离去，这个国家就要失去土地。土星留居的时间长，这个国家的福就厚；土星留居的时间短暂，这个国家的福就薄。”这样看来，土星乃是大福大德，和木星没有两样，难道它不是关系着国家的吉祥，并非民众能够和它相等的吗？

东坡引用史传

【原文】 东坡先生作文，引用史传，必详述本末，有至百余字者，盖欲使

读者一览而得之，不待复寻绎书策也。如《勤上人诗集叙》引翟公罢廷尉宾客反覆事，《晁君成诗集叙》引李礪汉中以星知二使者事，《上富丞相书》引左史倚相美卫武公事，《答李琮书》引李固论发兵讨交趾事，《与朱鄂州书》引王浚活巴人生子事，《盖公堂记》引曹参治齐事，《滕县公堂记》引徐公事，《温公碑》引慕容绍宗、李 事，《密州通判题名记》引羊叔子、邹湛事，《荔枝叹》诗引唐羌言荔枝事是也。

【译文】 苏东坡先生写文章，引用史传时，一定是详细叙述本末，有的引文长达一百多字，大概是为了使读者一目了然，免得再去查找核对原书原文。如《勤上人诗集叙》引用翟公辞去廷尉之职宾客反覆的事，《晁君成诗集叙》引用李礪在汉中因星象而知道二位使者事，《上富丞相书》引用左史倚相赞美卫武公的事，《答李琮书》引李固论发兵讨伐交趾的事，《与朱鄂州书》引王浚使巴人活下来并生子的事情，《盖公堂记》引曹参治理齐国的事，《滕县公堂记》引徐公的事，《温公碑》引慕容绍宗、李昫的事，《密州通判题名记》引羊叔子、邹湛的事，《荔枝叹》诗引唐羌谈荔枝的事，便是如此。

两莫愁

【原文】 莫愁者郢州石城人，今郢有莫愁村。画工传其貌，好事者多写寄四远。《唐书·乐志》曰：“莫愁乐者，出于石城乐，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谣。” 古词曰“莫愁在何处？莫愁石城西，艇子打两桨，催送莫愁来”者是也。李义山诗曰：“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传虎旅鸣宵柝，无复鸡人送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他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此莫愁者洛阳人。梁武帝《河中之歌》曰“河东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织绮，十四采桑南陌头，十五嫁为卢家妇，十六生儿似阿侯。卢家兰室桂为梁，中有郁金香，头上金钗十二行，足下丝履五文章，珊瑚挂镜烂生光，平头奴子擎履箱，人生富贵何所望？恨不早嫁东家王”者是也。卢氏之盛如此，所云“不早嫁东家王”，莫详其义。近世周美成乐府《西河》一阕，专咏金陵，所云“莫愁艇子曾系”之语，岂非误指石头城为石城乎？

【译文】 莫愁是郢州石城人，现在郢州有莫愁村。画工流布她的面貌，好事的人照画下来寄到四方边远的地方。《唐书·乐志》说：“《莫愁乐》，出自《石城乐》，石城有个女子叫莫愁，善于歌唱。”《莫愁乐》的古词说，“莫愁在何处？莫愁石城西，艇子打两桨，催送莫愁来（莫愁住在什么地方？莫愁住在石

城两头，小艇划着两桨，催送莫愁过来)”的就是。李义山（李商隐）的《马嵬》诗说：“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传虎旅鸣宵柝，无复鸡人送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他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白白听到海外还有个九州，下辈子不可知这辈子结束了。空听到军旅中传来报更的梆子，不再像宫中那样有报晓的专官。这一天六军一道停马不前，想以前七夕日笑牵牛织女一年只能相会一次。为什么当了四十多年的天子，还不及卢家有一个莫愁）。这一莫愁是洛阳人。梁武帝（萧衍）《河中之歌》说“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织绮，十四采桑南陌头，十五嫁为卢家妇，十六生儿似阿侯。卢家兰室桂为梁，中有郁金苏合香。头上金钗十二行，足下丝履五文章，珊瑚挂镜烂生光，平头奴子擎履箱。人生富贵何所望？恨不早嫁东家王（黄河的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织绮，十四采桑城南路旁，十五嫁作卢家妇，十六生儿像阿侯。卢家芳香的居室以桂为梁，当中有郁金和苏合香。头上金钗排成十二行，脚下的丝履闪着五色文彩，珊瑚的挂镜灿烂生光，光头的小仆高举着鞋箱。人生富贵还有什么怨恨呢？可恨的是不能早些嫁给东家王）”的就是。卢氏家族竟如此兴盛，诗中所说的“不早嫁东家王”，不详它的意义。近代周美成（周邦彦）的词《西河》一首，专门歌唱金陵，词中所说的“莫愁艇子曾系”的话，难道不是错误地把金陵石头城当作郢州的石城了吗？

何公桥诗

【原文】 英州小市，江水贯其中，旧架木作桥，每不过数年，辄为湍潦所坏。郡守建安何智甫，始叠石为之，方成而东坡还自海外，何求文以纪。坡作四言诗一首，凡五十六句。今载于后集第八卷，所谓“天壤之间，水居其多。人之往来，如鹈在河”是也。予侍亲居英，与僧希赐游南山，步过桥上，读诗碑，希赐云：“真本藏于何氏，此有石刻，经党禁亦不存。”今以板刻之，乃希赐所书也。赐因言何公初请记，坡为赋此诗，既大书矣。而未遣送，郡侯兵执役者见之，以告何，何又来谒，坡曰：“轼未到桥所，难以想象落笔。”何即命具食，拉坡偕往。坡曰：“使君是地主，宜先升车。”何谢不敢，乃并轿而行。既至，坡曰：“正堪作诗，晚当奉戒。”抵暮送与之。盖诗中云：“我来与公，同载而出。欢呼填道，抱其马足。”故欲同行，以印此语耳。坡公作诗时，建中靖国元年辛巳。予闻希赐语时，绍兴十七年丁卯，相去四十六年。今追忆前事，乃绍熙五

年甲寅，又四十七年矣。

【译文】 英州是个小城市，江水穿过城中，以前架木作桥，每次不过几年，总是被湍急的大水冲坏。郡守建安人何智甫，才叠石建成何公桥。桥始建成，东坡（苏轼）刚从海外回来，何智甫求他写一篇文章记述这件事。东坡写了一首四言诗，一共五十六句。这诗现在收在《东坡后集》第八卷，所谓“天壤之间，水居其多。人之往来，如鹈在河（天地之间，以水为多。人的来来往往，如同鹈鹕在河中）”就是。我侍奉父母住在英州，和僧人希赐游南山，步行经过桥上，读到东坡的诗碑。希赐说：“东坡的真本收藏在何智甫处，这里有石刻，经过党禁，石刻也不在了。”现今用木板刻的诗，乃是希赐所书写的。希赐因而又说：“何公开始请东坡作记，东坡为他写了这首诗，已经郑重地写好了，但还没有派人送给何公。郡中派去问候并服侍的人看到了，就把这事告诉了何智甫，何又来谒见请诗，东坡说：‘我还没有到桥那儿，难以想像下笔。’何智甫就命令手下准备酒食，拉着东坡一起去。东坡说：‘您是地方的主人，应当先上车。’何推辞不敢，才让两轿并排着走。已到了桥边，东坡就说：‘正可作诗，晚上当奉教。’到了傍晚，把写上的诗送给了何智甫。大概因为诗中说：‘我来与公，同载而出。欢呼填道，抱其马足（我来跟着何公，同载而出，百姓欢呼满路，抱住他的马足）。’所以东坡想要和何智甫同行，好用来印证这诗句。”东坡公写这首诗时，是在建中靖国元年辛巳（1101年），我听到希赐告诉我时，是在绍兴十七年丁卯（1147年），相隔了四十六年。现在追忆前事时，乃是绍熙五年甲寅（1194年），又过了四十七年了。

卷十二

眇眇秋娘三女

【原文】 白乐天《燕子楼诗序》云：“徐州故张尚书，有爱妓曰眇眇，善歌舞，雅多风态。尚书既歿，彭城有旧第，第中有小楼名燕子。眇眇念旧爱而不嫁，居是楼十余年，幽独块然。”白公赏识之，感旧游，作二绝句，首章云：“满窗明月满帘霜，被冷灯残拂卧床。燕子楼中霜月苦，秋来只为一入长。”末章云：“今春有客洛阳回，曾到尚书冢上来。见说白杨堪作柱，争教红粉不成灰。”读者伤恻。刘梦得《泰娘歌》云：“泰娘本韦尚书家主讴者，尚书为吴郡，得之，诲以琵琶，使之歌且舞，携归京师。尚书薨，出居民间，为蕲州刺史张颉所得。颉谪居武陵而卒，泰娘无所归。地荒且远，无有能知其容与艺者，故日抱乐器而哭。”刘公为歌其事云：“繁华一旦有消歇，题剑无光履声绝。蕲州刺史张公子，白马新到铜驼里。自言买笑掷黄金，月堕云中从此始。山城少人江水碧，断雁哀弦风雨夕。朱弦已绝为知音，云鬓未秋私自惜。举目风烟非旧时，梦寻归路多参差。如何将此千行泪，更洒湘江斑竹枝！”杜牧之《张好好诗》云：“牧佐故吏部沈公在江西幕，好好年十三，以善歌来乐籍中，随公移置宣城，后为沈著作所纳。见之于洛阳东城，感旧伤怀，题诗以赠曰：君为豫章姝，十三才有余。主公再三叹，谓言天下无。自此每相见，三日已为疏。身外任尘土，尊前极欢娱。飘然集仙客，载以紫云车。尔来未几岁，散尽高阳徒。洛城重相见，绰绰为当垆。朋游今在否，落拓更能无？门馆恸哭后，水云秋景初。洒尽满襟泪，短歌聊一书。”予谓妇人女子，华落色衰，至于失主无依，如此多矣。是三人者，特见纪于英辞鸿笔，故名传到今。况于士君子终，身不遇而与草木俱腐者，可胜叹哉！然眇眇节义，非泰娘、好好可及也。（眇眇馆本作盼盼，与《香山集》合）。

【译文】 白居易的《燕子楼诗序》说：“徐州府已故的张尚书，原来有个爱妓名叫眇眇，能歌善舞，风态高雅。张尚书死了以后，在徐州有座旧宅，宅中有小楼名叫燕子楼。眇眇怀念旧日恩爱而不改嫁，在这个楼里住了十多年，受尽孤独忧伤。”白居易曾经认识眇眇，感怀旧日游历，写了二首绝句。第一首是：

“满窗明月满帘霜，被冷灯残拂卧床。燕子楼中霜月苦，秋来只为一入长。”第二首是：“今春有客洛阳回，曾到尚书冢上来。见说白杨堪作柱，争教红粉不成灰。”读了这二首诗，无不为之悲伤。刘禹锡在《泰娘歌》中说：“泰娘本是韦尚书家中的主管歌唱的人，尚书在吴郡当官时得到了她，教会了她弹琵琶，使她能歌善舞，带回了京师。尚书死了以后，泰娘从尚书家出来住到了民间，后被蕲州（今湖北蕲春县一带）刺史张 收留。后来张 被贬到武陵（今湖南常德一带）死去，泰娘就无家可归。田地荒芜而且偏远，没有人能知道她的容貌和艺技，所以每日抱琵琶而哭。”刘禹锡为此作诗道：“繁华一旦有消歇，题剑无光履声绝。蕲州刺史张公子，白马新到铜驼里。自言买笑掷黄金，月堕云中从此始。山城少人江水碧，断雁哀弦风雨夕。朱弦已绝为知音，云鬓未秋私自惜。举目风烟非旧时，梦寻归路多参差。如何将此千行泪，更洒湘江斑竹枝！”杜牧的《张好好诗》序说：“我辅佐已故吏部沈传师在江西任职，张好好年刚十三岁，因能歌善舞来到府中，后随沈公迁移到宣城（今属安徽），后来又被沈著作（沈述师）纳为妾。再后，我在洛阳东城见过她，感旧伤怀，写诗赠给她。诗中写道：‘君为豫章姝，十三才有余。主公再三叹，谓言天下无。自此每相见，三日已为疏。身外任尘土，尊前极欢娱。飘然集仙客，载以紫云车。尔来未几岁，散尽高阳徒。洛城重相见，绰绰为当垆。朋游今在否，落拓更能无？门馆恸哭后，水云秋景初。洒尽满襟泪，短歌聊一书。’我觉得妇人女子，华减色衰，再加上失去主人的宠爱，无依无靠，这种情况很多。以上这三个女人，都被记载于文豪的英辞鸿笔之中，所以才名传至今。再加上士君子终身不遇知音而与草木俱腐的情况，真是太多，太可叹了！然而眇眇的节义，却是泰娘、好好所比不上的。（眇眇，馆本作盼盼，与《香山集》本所集相同）。

颜鲁公祠堂诗

【原文】 予家藏《云林绘监》册，有颜鲁公画像，徐师川题诗曰：“公生开元间，壮及天宝乱。捐躯范阳胡，竟死蔡州叛。其贤似魏征，天下非贞观。四帝数十年，一身逢百难。少时读书史，此事心已断。老来鬓发衰，慨叹功名晚。嗟哉忠义途，捷去不可缓。初无当年悲，只令后世叹。一朝绝霖雨，南亩常亢旱。小夫计虽得，斯民盖涂炭。长歌咏君节，千载勇夫旻。敬书子张绅，庶几古人半。”师川以诗鸣江西，然此篇不为工。尝记李德远举似童敏德游湖州题公祠堂长句曰：“挂帆一纵疾于鸟，长兴夜发吴兴晓。杖藜上访鲁公祠，一见目明

心皎皎。未说邦人怀使君，且为前古惜忠臣。德宗更用卢杞相，出当斯位诚艰辛。生逆龙鳞死虎口，要与乃兄同不朽。狂童希烈何足罪，奸邪嫉忠假渠手。乃知成人或杀身，保身不必皆哲人。此公安得世复有，洗空凡马须骐麟。”童之诗，语意皆超拔，亦临川人，而终身不得仕，为可惜也！

【译文】 我家收藏有《云林绘监》的册子，上有颜鲁公（颜真卿）画像，徐师川（徐府）题诗说：“公生开元间，壮及天宝乱。捐躯范阳胡，竟死蔡州叛。其贤似魏征，天下非贞观。四帝数十年，一身逢百难。少时读书史，此事心已断。老来鬓发衰，慨叹功名晚。嗟哉忠义途，捷去不可缓。初无当年悲，只令后世叹。一朝绝霖雨，南亩常亢旱。小夫计虽得，斯民盖涂炭。长歌咏君节，千载勇夫。敬书子张绅，庶几古人半（公生活在开元年间，壮年赶上天宝之乱。愿为平定范阳胡人安禄山的叛乱而捐躯，谁想到竟死在蔡州李希烈的叛军中。他的人品贤似魏征，但天下已非贞观年间了。几十年中历经四帝，一身遭遇百般艰难。少年时熟读书史，为国献身的决心已经定了。老来鬓发已显出衰老，慨叹功名来得太晚。那忠义之途啊，快去追攀不可迟缓。开初没有当年的悲愤，只让后世的人感叹。一朝断绝了霖雨，南亩常常干旱。小人的计谋虽然得逞，这人遭涂炭。长歌一曲称颂您的节操，千载勇夫显得软弱。恭敬地写在衣带上，或许能赶上古人的一半）。”师川以诗著称于江西诗派，然而这篇不能说精工。曾记得李德远称引过似乎是童敏德在游湖州时题颜鲁公祠堂的一首长句说：“挂帆一纵疾于鸟，长兴夜发吴兴晓。杖藜上访鲁公祠，一见目明心皎皎。未说邦人怀使君，且为前古惜忠臣。德宗更用卢杞相，出当斯位诚艰辛。生逆龙鳞死虎口，要与乃兄同不朽。狂童希烈何足罪，奸邪嫉忠假渠手。乃知成仁或杀身，保身不必皆哲人。此公安得世复有，洗空凡马须骐麟（布帆一挂快似鸟，夜里在长兴开船，早上已到达吴兴。手扶藜杖上访鲁公祠，一见眼明心也亮。不说国人怀念长官，且为古人惜忠臣，德宗改用卢杞为相，派往晓喻叛将李希烈的工作确实艰辛。活着逆龙鳞死在虎口，要和他兄长颜杲卿同垂不朽。狂童李希烈何足论罪，奸邪的小人妒忌忠良借他的手。才知道成仁的或者被杀身，保身的不必都是圣哲的人。安得颜公再出世，洗空凡马的须要麒麟）。童敏德的诗，用语和用意都很高超。童敏德也是临川人，但终身没有得到官位，是很可惜的。

闵子不名

【原文】 《论语》所记孔子与人语及门弟子并对其人问答，皆斥其名，未

有称字者，虽颜、冉高第，亦曰回，曰雍，唯至闵子，独云子骞，终此书无损名。昔贤谓《论语》出于曾子、有子之门人，予意亦出于闵氏。观所言闵子侍侧之辞，与冉有、子贡、子路不同，则可见矣。

【译文】 《论语》中所记载的孔子和人们的谈话以及门下弟子对他提出问题的回答，凡是提到人的名字时，都是直称其名，没有称字的，即使是颜回、冉雍这样的得意门生，也称之为回，叫雍。只有到了闵损，才称为子骞，直到这部书结束都没有称他为损的。昔时的贤士说《论语》是曾子（参）、有子（若）的门徒所作，我觉得也有出自闵子的弟子的。在阅读《论语》时，比较一下闵子侍侧时说的话，和冉有、子贡、子路不同，就可以看出来了。

曾皙待子不慈

【原文】 传记所载曾皙待其子参不慈，至云因锄菜误伤瓜，以大杖击之仆地。孔子谓参不能如虞舜小杖则受，大杖则避，以为陷父于不义，戒门人曰：“参来勿内。”予窃疑无此事，殆战国时学者妄为之词。且曾皙与子路、冉有、公西华侍坐，有“浴乎沂，风乎舞雩”之言，涵泳圣教，有超然独见之妙，于四人之中，独蒙“吾与”之褒，则其为人之贤可知矣。有子如此，而几置之死地，庸人且犹不忍，而谓皙为之乎？孟子称曾子养曾皙酒肉养志，未尝有此等语也。

【译文】 传记中记载，曾皙对待儿子曾参很不慈爱，甚至于说曾参锄菜地误把瓜给碰伤了，曾皙就用大杖子打得他爬在地上不能动。孔子听说后说，曾参怎么不像虞舜那样，小杖就忍受，大杖打就躲避，结果使得他父亲落了个无情无义的名声。于是，孔子告戒守门人说：“曾参来了，不要让他进来。”我怀疑没有这样的事，很可能是战国时代的学者胡编乱造的。《论语》中有关于曾皙和子路、冉有、公西华侍坐的记载，还有“沐浴于沂，在风中跳祈雨的舞姿”的话，可见曾皙受过良好教育，涵养很深，有卓然不群，见解独到之才华。在这四个人中，只有曾皙受到孔夫子的褒奖，那么他的为人的贤德就可知了。能有曾参这样好的儿子，几乎把他置于死地，普通的人尚且不忍心，何况曾皙呢？孟子讲曾参养曾皙是以酒肉养志，我认为不会有这样的话。

具圆复诗

【原文】 吴僧法具，字圆复，有能诗声，予乃纪之于《夷坚志》中，殊为不类。比于福州僧知恢处，见其诗稿一纸，字体效王荆公。其送僧一篇云：“滩声嘈嘈杂雨声，舍北舍南春水平。拄杖穿花出门去，五湖风浪白鸥轻。”《送翁士特》云：“朝入羊肠暮鹿头，十三官驿是荆州。具车秣马晓将发，寒烛烧残语未休。”《竹轩》云：“老竹排檐谁手种，山日未斜寒翠重。六月散发叶底眠，冷雨斜风频入梦。冬雕峰木雪缟庐，落眼青青却笑渠。花时吹笋排林上，吴州还见《竹溪图》。”《和子苍三马图》云：“从来画马称神妙，至今只说江都王。将军曹霸实季仲，沙苑丞相犹诸郎。龙眠居士善画马，独与二子遥相望。两马骈立真禰禱，一马脱去仍腾骧。浣花老人今已亡，呜呼三马谁平章！饱知画肉亦画骨，妙处不减黄无双。”又一篇云：“烧灯过了客思家，独立衡门数暝鸦。燕子未归梅落尽，小窗明月属梨花。”皆可咀嚼也。吴门僧惟茂，住天台山一禅刹，喜其旦暮见山，作绝句曰：“四面峰峦翠入云，一溪流水漱山根。老僧只恐山移去，日午先教掩寺门。”甚有诗家风旨，而或者谓山若欲去，岂容人掩住？盖吴人痴呆习气也，其说可谓不知音。

【译文】 吴地有个僧叫法具，字圆复，有点诗乐才能，我把他记载于《夷坚志》中，与《夷坚志》书中内容所记相比，显得不伦不类。正好在福州僧智恢的处所，见到具圆复的一些诗稿，字体仿效王安石的。其中《送僧》一篇内容是：“滩声嘈嘈杂雨声，舍北舍南春水平。拄杖穿花出门去，五湖风浪白鸥轻。”《送翁士特》诗中说：“朝入羊肠暮鹿头，十三官驿是荆州。具车 马晓将发，寒烛烧残语未休。”《竹轩》诗中说：“老竹排檐谁手种，山日未斜寒翠重。六月散发叶底眠，冷雨斜风频入梦。冬雕峰木雪缟庐，落眼青青却笑渠。花时吹笋排林上，吴州还见《竹溪图》。”《和子苍三马图》诗说：“从来画马称神妙，至今只说江都王。将军曹霸实季仲，沙苑丞相犹诸郎。龙眠居士善画马，独与二子遥相望。两马骈立真 ，一马脱去仍腾骧。浣花老人今已亡，呜呼三马谁平章！饱知画肉亦画骨，妙处不减黄无双。”又一篇中说：“烧灯过了客思家，独立衡门数暝鸦。燕子未归梅落尽，小窗明月避梨花。”这些诗都是很有滋味的。吴门僧惟茂，住在天台山的一座禅寺里，喜好早晚看山，作了一首绝句：“四面峰峦翠入云，一溪流不漱山根。老僧只恐山移去，日午先教掩寺门。”这首诗很有诗家风趣，而有人却说山若想移去，难到能掩得住吗？这大概是吴人痴愚的

习气。这种理解可以说是不知音。

人当知足

【原文】 予年过七十，法当致仕，绍熙之末，以新天子临御，未敢遽有请，故玉隆满秩，只以本官职居里。乡衮赵子直不忍使绝禄粟，俾之因任，方用赘食太仓为愧，而亲朋谓予爵位不逮二兄，以为耿耿。予诵白乐天《初授拾遗诗》以语之曰：“奉诏登左掖，束带参朝议。何言初命卑，且脱风尘吏。杜甫、陈子昂，才名括天地。当时非不遇，尚无过斯位。”其安分知足之意，终身不渝。因略考国朝以来，名卿伟人负一时重望而不跻大用者，如王黄州禹禩，杨文公亿，李章武宗谔，张乖崖咏，孙宣公奭，晁少保迥，刘子仪筠，宋景文祁，范蜀公镇，郑毅夫獬，滕元发甫，东坡先生，范淳父祖禹，曾子开肇，彭器资汝砺，刘原甫敞，蔡君谟襄，孙莘老觉，近世汪彦章藻，孙仲益觐，诸公皆不过尚书学士，或中年即世，或迁谪留落，或无田以食，或无宅以居，况若我忠宣公者，尚忍言之！则予之黍窃亦已多矣。

【译文】 我年过七十，按理应当辞官归里，光宗（赵 昀）绍熙末年，因为新天子（宋宁宗赵扩）君临天下，没有敢急于请求，所以玉隆任满，只以原来官职，住在乡里。同乡位居右相的赵子直（赵汝愚）不忍断绝我的禄米，使我继续任职，正为附食太仓之粟为愧，而亲戚朋友们说我的爵位不及二位兄长，为我耿耿于怀。我诵读白乐天（白居易）的《初授拾遗诗》来告诉他们说：“奉诏登左掖，束带参朝议。何言初命卑，且脱风尘吏。杜甫、陈子昂，才名括天地。当时非不遇，尚无过斯位（奉诏书登上门下省左拾遗的官署，整衣束带参议朝政大事。怎能说开始的任命官位低微，暂且能摆脱风尘中奔走的小吏。杜甫、陈子昂他们，才名包容于天地之间。当时他们并不是不遇于时，尚且还没有超过拾遗这个官位）。”他的安分知足的心意，终身不变。因而约略考察本朝开国以来，有名的、伟大的人物，身负一时重望，而不能升任大用的，像王黄州禹禩，杨文公亿，李章武宗谔，张乖崖咏，孙宣公奭，晁少保迥，刘子仪筠，宋景文祁，范蜀公镇，郑毅夫獬，滕元发甫，东坡先生，范淳父祖禹，曾子开肇，彭器资汝砺，刘原甫敞，蔡君谟襄，孙莘老觉，近世汪彦章藻，孙仲益觐，这么多的先生们，都不超过尚书学士，或者中年去世，或被贬官远地，久不得提拔，或者没有田地自食，或没有住宅居住，况且像我家忠宣公（洪皓）的遭遇，还能忍心去说他！那么，我的叨居官位，也已多了。

渊明孤松

【原文】 渊明诗文率皆纪实，虽寓兴花竹间亦然。《归去来辞》云：“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旋。”其《饮酒诗》二十首中一篇云：“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所谓孤松者是已，此意盖以自况也。

【译文】 陶渊明的诗文大都是纪实之作，即使寄寓于花竹之中也不例外。如《归去来辞》中说：“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旋。”《饮酒诗》二十首中有一首说：“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这些都是写孤松的，也都是用孤松来比喻自己的。

饶州刺史

【原文】 饶州良牧守，自吴至今，以政绩著者有九贤，郡圃立祠以事，此外知名者盖鲜。《白乐天集》有《吴府君碑》云：“君讳丹，字真存，以进士第入官。读书数千卷，著文数万言。生四五岁，所作戏辄像道家法事。既冠，喜道书，奉直褊，每专气入静，不粒食者数岁，飘然有出世心。既壮，在家为长属，有三幼弟、八稚侄，不忍见其饥寒，慨然有干禄意。求名得名，家无长物，淡乎自处，与天和始终。享寿命八十二岁，无室家累，无子孙忧，终于饶州。”官次大略如此。吴君在饶，虽无遗事可纪，以其邦君之故，姑志于书。吴为人清静恬寂，所谓达士，然年过八十尚领郡符，又非为妻子计者，良不可晓。唐之治不播弃黎老，故其居职不自以为过云。

【译文】 饶州的清正廉洁郡守，自三国时吴国至今，因政绩突出而著名的有九位，在郡的圃园立祠堂记录下来了，此外知名的就很少了。《白乐天集》中有一篇《吴府君碑》中说：“吴府君名讳丹，字叫真存，考取进士后做官。他饱读诗书数千卷，撰写文章几万字。四五岁的时候，所做的游戏就像道家作法事。长大以后，喜欢看道家著作，信奉道士为驱鬼神所画的符，能专心静气地入静打坐，可以几年不吃一粒粮食，有飘然世外之愿望。壮年以后，由于在家是长子，有三个弟弟，八个小侄，不忍心看到他们饥寒交迫，就产生了入世做官的念头。于是求名得名，但家里没有什么财产，淡泊自处，从始到终与自然和谐

相处。吴府君享年八十二岁，没有家室的拖累，也没有子孙的忧扰，死于饶州（今江西波阳）。”吴府君的情况大致如此。吴府君在饶州时，虽然没有遗事可以记载，但由于是一邦之官的缘故，就姑且记在书中。吴府君为人清静恬寂，可以说是所谓的通达之士，但年已过八十还领郡守的职务，又不是为自己的什么妻子儿女考虑，实在不知道是为什么。唐代的统治制度是不抛弃老人，所以，他高龄为官在这个职位上并不认为自己有过错。

紫极观钟

【原文】 饶州紫极观有唐钟一口，形制清坚，非近世工铸可比。刻铭其上曰：“天宝九载，岁次庚寅，二月庚申朔，十五日癸酉造，通直郎、前监察御史贬乐平员外尉李逢年铭，前乡贡进士薛彦伟述序，给事郎、行参军赵从一书，中大夫、使持节鄱阳郡诸军事、检校鄱阳郡太守、天水郡开国公上官经野妻扶风郡君韦氏奉为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敬造洪钟一口。”其后列录事参军、司功、司法、司士参军各一人，司户参军二人，参军二人，录事一人，鄱阳县令一人、尉二人，又专检校官、鄱阳县丞宋守静，专检校内供奉道士王朝隐，又道士七人。铭文亦雅洁，字画不俗，但月朔庚申，则癸酉日当是十四日，镌之金石而误如此。浮洲开福院亦有吴武义年一钟，然非此比也。

【译文】 饶州紫极观有一口唐代的古钟，形体简明有力，不是近代工匠的铸作可以相比的。在上面刻的的铭文说：“天宝九载（750年），岁星在庚寅，二月初一日是庚申，二月十五日癸酉制造，通直郎、前监察御史贬乐平员外尉李逢年作铭文，前乡贡进士薛彦伟写序，给事郎、行参军直赵从一书写，中大夫、使持节鄱阳郡诸军事、检校鄱阳郡太守、天水郡开国公上官经野妻扶风郡君韦氏奉为开之天地天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敬造洪钟一口。”它的后面列有录事参军、司功、司法、司士参军各一人，司户参军二人，参军二人，录事一人，鄱阳县令一个，尉二人又专检校官、鄱阳县丞宋守静，专检校内供奉道士王朝隐，又道士七人，铭文也写得典雅洁净，字画也不俗，但是二月初既然是庚申，则癸酉日应当是十四日，镌刻在金石上还出现这样的错误。浮洲开福院也有王氏时吴高祖（杨隆演）武义年间的一口钟，但不能和这口钟相比。

兼中书令

【原文】 绍熙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宣麻制除嗣秀王伯圭兼中书令。此官久不除，学士、大夫多不知本末，至或疑为当入都堂治事。邸报至外郡，尤所不晓。迈考之典故，侍中、中书令为两省长官，自唐以来，居真宰相之位，而中令在侍中上。肃宗以后，始以处大将，故郭子仪、仆固怀恩、朱熹、李晟、韩弘皆为之，其在京则入政事堂，然不预国事。懿、僖、昭之时，员浸多，率由平章事迁兼侍中，继兼中书令，又迁守中书令，三者均称使相，皆大敕系衔而下书使字。五代尤多。国朝创业之初，尚仍旧贯，于是吴越国王钱鏐、天雄节度符彦卿、雄武王景、武宁郭从义、保大武行德、成德郭崇、昭义李筠、淮南李重进、永兴李洪义、凤翔王彦超、定难李彝兴、荆南高保融、武平周行逢、武宁王晏、武胜侯章、归义曹元忠十五人同时兼中书令。太宗朝，唯除石守信，而赵普以故相拜。真宗但以处亲王。嘉禧末，除宗室东平王允弼、襄阳王允良；元丰中，除曹佺，与允弼、允良相去十七八年，爵秩固存。沈括《笔谈》谓有司以佺新命，言自来不曾有活中书令请俸则例。盖妄也。官制行，改三使相并为开府仪同三司。元禧以后不复有之，虽崇、观、政、宣轻用名器，且改为左辅、右弼，然蔡京三为公相，亦不敢居。乾道中，诏于录黄及告命内除去侍中、中书令，遂废此官。今当先降指挥复置，则于事体尤愜当也。嗣王终不敢当，于是寝前命，而赐赞拜不名。

【译文】 宋光宗绍熙五年（1195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皇上宣布封嗣秀王伯圭兼任中书令。这个官职好久没有委任了，学士、大夫们大多不知道其来龙去脉，甚至有人怀疑这一官职是应当进入都堂治事的官。特别是用邸报传送到外地州郡，下边的人更不清楚。我考证了过去的典章制度，侍中、中书令是门下省、中书省两省长官，从唐代以来，相当于真宰相之职位，而中书令在侍中之上。唐肃宗以后，开始用以安置大将，所以郭子仪、仆固怀恩、朱、李晟、韩弘等人都任过中书令，中书令如在京就可入政事堂，但不参预国事的商议。唐懿宗、僖宗、昭宗的时候，官员很多，大概由平章事升为侍中，继而兼中书令，又升为守中书令，这三种官职都称使相，都是大敕系衔而且下边写上使字。五代时更多。宋朝创业初期，仍然保持旧的惯例，于是吴越国王钱鏐、天雄节度使符彦卿、雄武节度使王景、武宁节度使郭从义、保大节度使武行德、成德节度使郭崇、昭义节度使李筠、淮南节度使李重进，永兴节度使李洪义、凤

翔节度使王彦超、定难节度使李彝兴、荆南节度使高保融、武平节度使周行逢、武宁节度使王晏、武胜节度使侯章、归义节度使曹元忠等十五人同时兼中书令。宋太宗时，仅授给石守信为中书令，而赵普是因为原来为相才拜封为中书令的。宋真宗只把此职封给亲王。宋仁宗嘉祐末年，封宗室东平王允弼、襄阳王允良为中书令。神宗元丰年间，又封曹佺，与允弼、允良相距十七八年，可见那个爵位一直保留着。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官吏因曹佺任新职，说从来不曾有活中书令请俸的例子，这大概是沈括搞错了。亲官制实行后，把三使相一起改为开府仪同三司。哲宗元祐以后不再有中书令了，虽然徽宗崇宁、大观、政和、宣和年间比较轻用等级制度的一些规定，就改侍中为左辅、改中书令为右弼，即使蔡京三次任公相之职，也不敢居中书令。宋孝宗乾道年间，下诏在录黄和告命内除去侍中、中书令，于是这一官职就此废除。如今要授任嗣秀王伯圭为兼中书令，应当先发布文件声明重新设置，就比较合情合理了。嗣王终究不敢当此任，于是就中止原来的任命，而又赐他先拜不名。

作文字要点检

【原文】 作文字不问工拙小大，要之不可不著意点检，若一失事体，虽遣词超卓，亦云未然。前辈宗工，亦有所不免。欧阳公作《仁宗御书飞白记》云：“予将赴亳，假道于汝阴，因得阅书于子履之室。而云章烂然，辉映日月，为之正冠肃容再拜而后敢仰视，盖仁宗皇帝之御飞白也。曰：‘此宝文阁之所藏也，胡为乎子之室乎？’曰，‘曩者天子燕从臣于群玉，而赐以飞白，予幸得预赐焉。’”乌有记君上宸翰而彼此称“予”，且呼陆经之字？又《登贞观御书阁记》，言太宗飞白，亦自称“予”。《外制集序》，历道庆历更用大臣，称吕夷简、夏竦、韩琦、范仲淹、富弼，皆斥姓名，而曰“顾予何人，亦与其选”，又曰“予时掌诰命”，又曰“予方与修祖宗故事”，凡称“予”者七。东坡则不然，为王诜亦作此记，其语云“故太子少傅、安简王公讳举正，臣不及见其人矣”云云，是之谓知体。

【译文】 写文章不问工致、拙劣、短制、长篇，要紧的地方在于不可不看意查核，若一失事情的体统，则虽然遣词高超，也可说它不对。前辈中作文的宗匠，也不免有欠查核的。像欧阳公（欧阳修）作《仁宗御书飞白记》说：“我将要赴亳州，借道汝阴，因此得在子履（陆经）的书房中阅读书籍。而那幅笔墨闪亮，光辉映照日月，特为它端正了帽子，严肃了容色，再拜而后敢仰视的，

便是仁宗皇帝的御笔飞白体书。我说：‘这是宝文阁所藏的，为什么在您的书房中了？’子履说：‘从前天子在群玉殿宴请从臣，而赐给飞白书，我有幸得参与被赐之列。’”怎么有记皇上的书迹而彼此称“我”，而且称呼陆经用字？又有《登贞观御书阁记》，说到太宗的飞白，也自称“我”。在《外制集序》中，依次说庆历年间改用大臣，称吕夷简、夏竦、韩琦、范仲淹、富弼，都指出姓名，而说“回顾我是什么人，也参与其选”，又说：“我当时主管朝廷颁布命令”，又说“我刚参与编修祖宗的旧事”，总计称“我”的有七处。东坡（苏轼）则不这样，为王诜也写了这记，他的话说：“已故世的太子少傅、安简王公讳举正的，臣来不及看到他的人了”，如此等等，是为知道体统。

侍从两制

【原文】 国朝官称，谓大学士至待制为“侍从”，谓翰林学士、中书舍人为“两制”，言其掌行内、外制也。舍人官未至者，则云“知制诰”，故称美之为三字。谓尚书侍郎为“六部长贰”，谓散骑常侍，给事谏议为“大两省”。其名称如此。今尽以在京职事官自尚书至权侍郎及学士、待制均为“侍从”，盖相承不深考耳。予家藏王襦《春秋通义》一书，至和元年，邓州缴进，二年有旨送两制看详，于是具奏者十二人皆列名衔：学士七人，曰学士承旨、礼部侍郎杨察，翰林学士、中书舍人赵概、杨伟，刑部郎中胡宿，吏部郎中欧阳修，起居舍人吕溱，礼部郎中王洙；知制诰五人，曰起居舍人王 ，右司谏贾黯，兵部员外郎韩絳，起居舍人吴奎，右正言刘敞。而他官弗预，此可见也。翰林本以六员为额，刘沆作相，典领温成后丧事，以王洙同其越礼建明，于是员外用之，尝为一时言者所论，正此时云。

【译文】 宋朝的官职称呼，把大学士至待制叫做“侍从”，把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叫做“两制”，是说他们掌握执行内、外两方面的制度。舍人官还没有达到高位的，就称为“知制诰”，所以用三个字来美称。把尚书侍郎称为“六部长贰”，把散骑常侍、给事谏议称为“大两省”。官职名称大概如此。现在把在京的职事官从尚书到权侍郎及学士、待制都统统称为“侍从”，可能是承袭了旧制并未认真考究。我家藏有一本王 著的《春秋通义》，其中记载：宋仁宗至和元年（1254年），邓州（今属河南）向朝廷缴纳进贡，至和二年（1255年）皇上有旨让送两制审定，于是参奏的十二人都列着名衔：学士七人，他们是学士承旨、礼部侍郎杨察，翰林学士，中书舍人赵概、杨伟，刑部郎中胡宿，吏部郎

中欧阳修，起居舍人吕溱，礼部郎中王洙；知制诰五人，他们是起居舍人王瘡，右司谏贾黯，兵部员外郎韩絳，起居舍人吴奎，右正言刘敞。其他官没有参预，从这里可以看出。翰林本来应有六个名额，刘沆作丞相时，主持操办温成后的丧事，因王洙与他共同越礼建员，就额外以翰林的身份用他，这件事一时曾为人们所议论，正好是在这个时候。

片言解祸

【原文】 自古将相大臣，遭罹譖毁，触君之怒，坠身于危棘将死之域，而以一人片言，转祸为福，盖投机中的，使闻之者晓然易寤，然而遭值明主，不能也。萧何为民请上林苑中空地，高祖大怒，以为多受贾人财物，下何廷尉，械系之。王卫尉曰：“陛下距楚数岁，陈霸、黥布反，时相国守关中，不以此时为利，乃利贾人之金乎？”上不怪，即日赦出何。绛侯周勃免相就国，人上书告勃欲反，廷尉逮捕勃治之。薄太后谓文帝曰：“绛侯绾皇帝玺，将兵于北军，不以此时反，今居一小县，顾欲反邪？”帝即赦勃。此二者，可谓至危不容救，而于立谈间见效如此。萧望之受遗辅政，为许、史、恭、显所嫉，奏望之与周堪、刘更生朋党，请“召致廷尉”，元帝不省为下狱也，可其奏。已而悟其非，令出视事。史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闻于天下，而先验师傅，既下九卿大夫狱，宜因决免。”于是免为庶人。高祖、文帝之明而受言，元帝之昏而遂非，于是可见。

【译文】 自古将相大臣，遭遇诬陷诋毁，触犯君主的怒火，陷身于危急将死的境地，然而因为一个人的一句话，就可能转祸为福，这大概是因为迎合时机而中的，使听的人清楚明白，因而容易醒悟，然而不是遇到英明的君主，就不能够了。萧何为老百姓请上林苑中空地用来种田，汉高祖（刘邦）大怒，认为萧何多受了商人的钱财货物，就把萧何下到廷尉狱，上了脚镣手铐。王卫尉说：“皇上和楚相拒几年，以后陈霸、黥布反，这时相国萧何守关中，他不在这个时候谋大利，却去贪商人的区区金钱小利吗？”皇上心里不高兴，但当日还把萧何赦了出来。绛侯周勃被免去相国去了他的封国，有人上书告周勃想要造反，廷尉就逮捕了周勃，并将治他的罪。薄太后对文帝（刘恒）说：“绛侯诛诸吕，立文帝，掌握着御玺，又带兵在北军，他不在这时造反，现今居住在一个小县里，反而想造反吗？”文帝马上赦免了周勃。这二个人的事，可以说处境最为危险，不容你救援，但在倾刻之间就见到了赦免的效果。萧望之受遗诏辅政，为

许章、史高、弘恭、石显所妒嫉，诬奏萧望之和周堪、刘更生结为朋党，请“召致廷尉”，元帝不明白“召致廷尉”就是下狱，同意了他们的奏章。但旋即明白了这样做的不对，让萧望之继续出来任职。史高说：“皇上新近即位，还没有来得及让天下百姓听到您的以德教化，而先在师傅萧望之身上取得应验，如今已经下在九卿大夫狱中，应该就此判决免官。”于是萧望之被免官，成为普通老百姓。高祖、文帝的明断而能接受谏劝，元帝的昏庸就不是这样，在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来。

忠言嘉谏

【原文】 《扬子法言》：“或问忠言嘉谏，曰言合稷、契谓之忠，谏合皋陶谓之嘉。”如子云之说，则言之与谏，忠之与嘉，分而为二，传注者皆未尝为之辞，然则稷、契不能嘉谏、皋陶不能忠言乎？三圣贤遗语可传于后世者，唯《虞书》存，五篇之中，皋陶矢谏多矣，稷与契初无一话一言可考，不知子云何以立此论乎？不若魏郑公但云“良臣稷、契、皋陶”，乃为通论。

【译文】 《扬子法言》中说：“有人问什么是忠言嘉谏，可以说言符合稷、契就叫做忠，谏（谋略）符合皋陶就叫做嘉。”按照扬雄的说法，那么言论与谋划、忠与嘉，就分为两种事物了。后世解释《扬子》的学者都没有对此提出疑问。按照这种说法，稷、契不能嘉谏，皋陶不能忠言，真的如此吗？上古三位圣贤所说的话能够流传于后世的，只有《虞书》还存在，在这本书的五篇文章中，皋陶矢谏的地方很多，而稷与契就没有一字一句可以考证的，不知道扬雄是根据什么来确立自己的论点的。我看他说的不如唐朝的魏征只说“良臣稷、契、皋陶”（也就是说稷、契、皋陶是指的三位良臣的言论和谋略可称为忠言嘉谏），这才是能说得通啊！

免直学士院

【原文】 庆元元年正月一日，郑 以起居郎直学士院。二月二十三日，赵汝愚罢相，制乃 所草，议者指为褒词太过。二十五日，有旨免兼直院，或以为故事所无。按照宁初，王益柔以知制诰兼直学士院，尝奏中书熟状加董毡阶官之误，宰相怒其不申堂，用他事罢其兼直，已而迁龙图阁直学士。 亦以罢

直求去，不许，越三月而迁权刑部侍郎，甚相类也。

【译文】 庆元元年（1195年）正月一日，郑 以起居郎入直学士院。二月二十三日，赵汝愚罢去宰相，诏令就是郑 所起的草，评论的人指出它用的褒词太过分了。二十五日，有旨免去郑 的兼直学士院，有人认为这是往日典制中所没有的。按：神宗（赵顼）熙宁初，王益柔以知制诰兼直学士院，曾经在奏中书的书面奏请中，加董毡阶官的错误，宰相怒他不能申述堂意，用别的事罢免了他的兼直学士院，旋即迁为龙图阁直学士。郑 也因为罢他的直学士院而请求离职，没有答应他的请求，过了三个月，迁为权刑部侍郎，这和王益柔事很相似。

大贤之后

【原文】 杜诗云：“大贤之后竟凌迟，荡荡古今同一体。”乃赠狄梁公曾孙者，至云“飘泊岷汉，干谒王侯”，则其衰微可知矣。近见余干寓客李氏子云，本朝三李相，文正公 、文靖公沆、文定公迪皆一时名宰，子孙亦相继达宦。然数世之后益为萧条，又经南渡之厄，今三裔并居余干，无一人在仕版。文定濮洲之族，今有居越者，虽曰不显，犹簪纓仅传，而文正、文靖无闻，可为太息！

【译文】 杜甫的诗说：“大贤之后竟凌迟，荡荡古今同一体（大贤的后代竟然衰落，广大辽阔的古今同一个样）。”是赠给狄梁公（狄仁杰）曾孙的，至于说到“飘泊岷汉，干谒王侯（飘泊在岷山汉水，求请王侯帮助）。”则他的衰微可知了。近日见到客居余干的李氏之子说，本朝有三位姓李的宰相，即文正公李昉、文靖公李沆、文定公李迪，都是一时有名的宰相，子孙也相继当了达官。然而几代以后就更为萧条，又经过了南渡的危难，如今三人的后裔都住在余干，没有一人在官吏的名册中。文定公在濮州的一族，现在有住在越地的，虽然说不是显宦，还能插簪戴纓，是仅传的一族。而文正公、文靖公的后代就没有听说过了，真可使人叹息！

卷十三

钟鼎铭识

【原文】 三代钟鼎彝器存于今者，其间款识，唯“眉寿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之语，差可辨认，余皆茫昧不可读，读者以为古文质朴固如此，予窃有疑焉。商、周文章、见于《诗》、《书》，三《盘》五《诰》，虽诘曲聱牙，尚可精求其义，他皆坦然明白，如与人言。自武王《丹书》诸铭外，其见于经传者，如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谗鼎之铭曰：“昧旦丕显，后世犹怠。”正考父鼎铭曰：“一命而偻，再命而伋，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繄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内氏量铭曰：“时文思索，允臻其极。嘉量既成，以观四国。永启厥后，兹器维则。”祭射侯辞曰：“惟若宁侯，毋或若女不宁侯，不属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卫礼至铭曰：“余掖杀国子，莫余敢止。”孔惺鼎铭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太庙。公曰叔舅，乃祖庄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庄叔，随难于汉阳，既宫于宗周，奔走无射，启右献公，献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兴旧嗜欲，作率庆士，躬恤卫国，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铭，若纂乃考服。惺拜稽首曰：对扬以辟之勤大命，施于 彝鼎。”扶风美阳鼎铭曰：“王命尸臣，官此离邑，赐尔旗鸾，黼黻秃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对扬天子丕显休命。”此诸铭未尝不粲然，何为传于今者，艰涩无绪乃尔。汉去周末远，武、宣以来，郡国每获一鼎，至于荐告宗庙，群臣上寿。窦宪出征，南单于遗以古鼎，容五斗，其铭曰：“仲山甫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宪乃上之，盖以其难得故也。今世去汉千年，而器宝之出不可胜计，又为不可晓已。武帝获汾阴雋上鼎，无款识，而备礼迎享，宣帝获美阳鼎，下群臣议，张敞乃以有款识之故绌之，又何也？

【译文】 夏、商、周三代的钟鼎彝器保存至今的，上面落款文字，只有“眉寿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之类的话，还大致可以辨认出来，其余的都字形模糊无法辨认了，有人认为古文质朴本来就是如此，我心中却有些怀疑。商、周代的文章，从《诗经》、《尚书》中见到的，像三篇《盘庚》、五篇《诰》，虽然文字艰涩聱牙，细心探讨还可以捉摸其意义，其他文章大都通畅明白，就像

与一般人谈话一样。除周武王的《丹书》诸篇铭文外，见于经传的铭文，如汤代的盘铭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如果每天有新的，就会日日新，又日新）。”谗鼎上的铭文说：“日夜有大的显贵，后世还会懈怠。”正考文的鼎铭说：“听一命令就低头，两道命令就弯腰，三道命令爬在地上，然后顺着墙走，也就没有人敢侮辱我了。吃的靠这，卖的也靠这，以此来养家糊口。”氏量铭说：“经常慎重思索，就会达到中正的准则。美好的心胸已经养成，就可以观察周围国家。永远启迪后代，只有采用这样的准则。”祭射侯辞说：“只有像宁侯那样，不要像你而不像宁侯，不属于王的处所，所以抵抗你攻击你。”卫国礼至铭说：“我想杀国子，没人敢制止。”孔悝鼎铭曰：“六月丁亥这天，卫庄公在太庙举行祭祀。庄公说叔舅孔悝，其祖宗是庄叔孔达，追随成公，成公就命令庄叔，跟他避难到汉阳，后来就居住在周的京城。庄叔不知疲倦地奔走。这件事启发了成公的曾孙献公，献公就命令成叔孔盟，继承祖宗的事业。您的父亲文叔孔圉推行先祖的德政，以身作则，表率全国。为卫国鞠躬尽瘁，为公家勤劳，昼夜不停，民众都对他赞不绝口！庄公又说叔舅，我要为你作铭，你继承了先父的事业。孔悝叩头再拜说：“为了发扬光大先祖的精神，特制成盟彝鼎”。扶风县的美阳鼎铭说：“君王命令臣下，在此 邑做官，赐给你画有龙的旗，还有雕刻着黼矛的戈。臣下叩头至地说：敢于发扬天子的精神不断宏大显贵。”以上各种铭文未尝不明白，为什么传到今天，不过是因为它们艰涩杂乱罢了。汉代离周朝不远，汉武帝、宣帝以来，各郡国每获得一鼎，都要推荐告慰于宗庙，群臣祝寿。汉朝的窦宪出征时，南单于国送给一口古鼎，有五斗大的容量，上面有铭文说：“仲山甫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窦宪就把它献给皇上，大概是因为它不易得到的缘故。如今离汉代已有千年，而宝器收藏的不可计数，这也是很多铭文不可知晓的原因。汉武帝获得一口汾阴脍上鼎，上面没有款识，却用大礼迎享。汉宣帝获得美阳鼎，让下边群臣进行评议，张敞就因为上面有落款文字的原因提议把它扔掉，这又是为什么呢？

牺尊象尊

【原文】 《周礼》司尊彝：“裸用鸡彝、鸟彝，其朝献用两献尊，其再献用两象尊。”汉儒注曰：“鸡彝，鸟彝，谓刻而画之为鸡、凤凰之形。献读为牺，牺尊饰以翡翠，象尊以象凤凰。或曰：以象骨饰尊。又云：献音娑，有婆娑之义。”惟王肃云：“牺、象二尊，并全牛、象之形，而啗背为尊。”陆德明释《周礼》献

尊之献，音素何反。而于《左氏传》“牺象不出门”，释牺为许宜反，又素何反。予按今世所存故物，《宣和博古图》所写，牺尊纯为牛形，象尊纯为象形，而尊在背，正合王肃之说。然则牺字只当读如本音，郑司农诸人所云，殊与古制不类。则知目所未睹而臆为之说者，何止此哉！又今所用爵，除太常礼器之外，郡县至以木刻一雀，别置杯子背以承酒，不复有两柱、三足、只耳、侈口之状，向在福州见之，尤为可笑也。

【译文】 《周礼·司尊彝》说：“以酒祭奠祖先用鸡彝、鸟彝，其朝献用两献尊，其再献用两象尊。”汉代儒者注说：“鸡彝、鸟彝，是说雕刻后彩绘成鸡、凤凰的形状。献读作牺，牺尊，用翡翠装饰，象尊，像凤凰。或者说：‘用象骨来装饰酒尊。’又说：‘献音娑，有娑娑的意思。’”只有王肃说：“牺、象二酒尊，一并是全牛、全象的形状，而在它们的背部凿成酒尊。”陆德明解释《周礼》献尊的献，音素何反。然而在《左氏传》“牺象不出门”句中，释牺为许宜反，又素何反。我查验现今世上所保存的故物，以及《宣和博古图》所画的，牺尊纯粹是牛的形状，象尊纯粹是象的形状，而尊就在背部，正和王肃的说法相同。那么牺字只应当读本音，郑司农（郑众）等人所说，和古制极不相类。就可以知道没有亲眼看到而靠猜想立说的，何止这件事呀！又有现在所用的盛酒器爵，除了太常寺所用的礼器之外，郡县中甚至于用木雕刻成一雀，另外放一只杯子在它背上来接酒，不再有两柱、三脚、一耳、大口的形状，以前在福州见到过，更加可笑了。

再书博古图

【原文】 予昔年因得汉研，读《博古图》，尝载其序述可笑者数事于《随笔》，近复尽观之，其谬妄不可殫举。当政和、宣和间，蔡京为政，禁士大夫不得读史，而《春秋三传》，真束高阁，故其所引用，绝为乖盾。今一切记之于下，以示好事君子与我同志者。商之癸鼎，只一“癸”字，释之曰：“汤之父主癸也。”父癸尊之说亦然。至父癸研，则又以为齐癸公之子。乙鼎铭有“乙毛”两字，释之曰：“商有天乙，祖乙、小乙，武乙，太丁之子乙，今铭‘乙’，则太丁之子也。”父己鼎曰：“父己者，雍己也。继雍己者乃其弟太戊，岂非继其后者乃为之子邪？”至父己尊，则直云，“雍己之子太戊为其父作。”予按以十干为名，商人无贵贱皆同，而必以为君，所谓“癸”即父癸，“己”即雍己，是六七百年中更无一人同之者矣。商公非鼎铭只一字曰“非”，释之曰：“据《史记》有非子

者，为周孝王主马，其去商远甚。惟公刘五世孙曰公非，考其时当为公非也。”夫以一“非”字。而必强推古人以证之，可谓无理。周益鼎曰：“《春秋》文公六年有梁氏益，昭公六年有文公益，未知孰是？”予按《左传》文八年所纪，乃梁益耳，而杞文公名益姑。周丝驹父鼎曰：“《左传》有驹伯，为克军佐，驹其姓也。此曰驹父，其同驹伯为姓邪？”予按《左传》，驹伯者礪也，礪乃克之子。是时氏三卿，礪曰驹伯，矜曰苦成叔，至曰温季，皆其食采邑名耳，岂得以为姓哉？叔液鼎曰：“考诸前代，叔液之名不见于经传，惟周八士有叔夜，岂其族欤？”夫伯仲叔季，为兄弟之称，古人皆然，而必指为叔夜之族，是以“叔”为氏也。周州耗曰：“‘州’出于来国，后以‘州’为氏。在晋则大夫州绰，在卫则大夫州吁，其为氏则一耳。”予按来国之名无所著见，而州吁乃卫公子，正不读《春秋》，岂不知《卫诗》《国风》乎？遂以为氏，尤为可哂也。周高克尊曰：“高克者，不见于他传，惟周末卫文公时，有高克将兵，疑克者乃斯人，盖卫物也。”予按元铭文但云“伯克”，初无“高”字，高克《郑·清人》之诗，儿童能诵之，乃以为卫文公时，又言周末，此书局学士，盖不曾读《毛诗》也。周毁敦曰：“铭云伯和父，和者卫武公也。武公平戎有功，故周平王命之为公。”予按一时列国，虽子男之微，未有不称公者，安得平王独命卫武之事？周慧季鬲曰：“慧与惠通，《春秋》有惠伯、惠叔，虢姜敦有惠仲，而此鬲名之为惠季，岂非惠为氏，而伯仲叔季者乃其序邪？”予按惠伯、惠叔，正与庄伯、戴伯、平仲、敬仲、武叔、穆叔、成季相类，皆上为谥而下为字，乌得以为氏哉？齐侯钟铭云：“咸有九州，处禹之都。”释之曰：“齐之封域，有临淄、东莱、北海、高密、胶东、泰山、乐安、济南、平原、盖九州也。”予按铭语正谓禹九州耳，今所指言郡名，周世未有，岂得便以为州乎？宋公秬钟铭曰：“宋公成之秬钟。”释之曰：“宋自微子有国二十世，而有共公固成，又一世而有平公成，又七世而有剔公成，未知孰是？”予按宋共公名，《史记》以为瑕，《春秋》以为固，初无曰“固成”者。且父既名“成”，而其子复名之可乎？剔成君为弟偃所逐，亦非名“成”也。周云雷磬曰：“《春秋》鲁饥，臧文仲以玉磬告余于齐。”按经所书，但云“臧孙辰告余于齐”，《左传》亦无玉磬之说。汉定陶鼎曰：“汉初有天下，以定陶之地封彭越为梁王，越既叛命，乃以封高祖之子恢，是为定陶共王。”予按恢正封梁王，后徙赵。所谓定陶共王者，元帝之子、哀帝之父名康者也。

【译文】 我前些年因为得到一只汉代舀水器具，就去阅读《博古图》，曾经把其叙述中的几件可笑事记载于《随笔》之中，最近又全部读了这本书，发现其中的错误之处不可胜数。当时正是宋徽宗政和、宣和年间，蔡京执政，禁

止士大夫读史书，因而《春秋三传》，真的就被束之高阁了，因而在《博古图》中所引用的材料，大多数都有错误。现在且记之于下，以便于有兴趣的先生和我有同一志向的人共同记取。

在商代的癸鼎上，只有一个“癸”字，《博古图》解释说：“汤的父叫主癸。”父癸尊的说法也是这样的。至于父癸賸，就又认为是齐癸公的儿子。乙鼎铭上有“乙毛”二字，解释说“商代有天乙、祖乙、小乙、武乙、太丁的儿子乙，如今铭文中的‘乙’，就是太丁的儿子。”但在解释父己鼎时却说：“父己，就是雍己。继承雍己的是他的弟弟太戊，难道继承的人不该是他儿子吗？”在解释父己尊时则直接说：“是雍己的儿子太戊为纪念他的父亲所制作的。”我详细考察过用十天干的字起名，商代的人不论贵贱都是一样，而一定认为是君主，说所谓的“癸”就是父癸，“己”就是雍己，这六七百年中再也无人相同。商代公非铭上只有一字就是“非”，解释说：“据《史记》所记有个人叫非子，是周孝王的主马官，这离商代已很远了。只有公刘的五世孙叫公非，考证他生活的时代应当是公非”。一个“非”字，而一定要勉强推出古人来证明，这是没有道理的。《博古图》中对周朝的益鼎解释说：“《春秋》中文公六年记载，有个姓梁的人名益，昭公六年中有个文公益，不知是哪一个？”我根据《左传》文公八年的记载，认为益鼎益就是梁益耳，而杞文公的名字叫益姑。书中在解释周代丝驹父鼎时说：“《左传》上有个叫驹伯的人，是礪克的军佐，驹就是他的姓。这里说的驹父，其姓与驹伯相同，也许是一个人吧？”我考证了《左传》，上面的驹伯就是礪，礪是礪克的儿子。当时礪氏家族有三个卿，叫驹伯，叫苦成叔，至叫温季，都是他们地的名字，难道会是姓吗？在解释叔液鼎时说：“考查前代，史书上没有叔液这个人名，只有周代八士中有个叫叔夜的，难道他们是同一宗族吗？”大家都知道，伯仲叔季，是兄弟按大小的称呼，古代人都是这样，而一定要说叔液是叔夜的族人，那就把“叔”当作姓氏了。对周代州（酒器）的解释是：“‘州’产生于来国，后来以‘州’为姓氏。在晋国就有大夫州绰，在卫国有大夫州吁，他们所在国不同，看来都是姓氏是一个。”我考查来国的名称，在书上没有找到，而州吁就是卫公子，这正是因为不读《春秋》才不知道，难道就不知道《诗经·国风》中有《卫诗》吗？而把“州”作为姓氏，特别可笑。对周代高克尊的解释：“高克这个人，在其他传记中找不到，只有周末卫文公时，有个叫高克的领兵将军，高克尊上的克是不是就是这个人，那么这个尊也就是卫国的产物了。”我发现原来的铭文上只说伯克，开始没有高字，高克见于《诗经·郑风·清人》这首诗的序中，连儿童都能背诵，竟认为是卫文公时的人。又说是周代末年，这位博学先生，大概没有读过《毛诗》吧！关于

周代毁敦（盛黍稷的器具），书中解释说：“上面的铭文说到伯和父，和就是卫武公。卫武公平敌有功，所以周平王赐封为公。”我考查了春秋列国，虽然子、男的爵位比较低，但没有不称公的，哪有平王单单任命卫武这样的事？对周代的慧季鬲（象鼎的炊具）的解释说：“慧字和惠字通用，《春秋》上有惠伯、惠叔，虢姜敦有惠仲，而这个鬲中称名字叫作惠季，难道惠就是姓氏，而伯仲叔季就是排行顺序吗？”我认为惠伯、惠叔，正好和庄伯、戴伯、平仲、敬仲、武叔、穆叔、成季之类的名字相似，都是上一个字是谥号，下一个字是字号，这里哪会有什么姓氏呢？齐侯的磬（古代乐器）钟铭说：“共有九州，处在禹州之都。”书中解释为：“齐侯的封地，有临淄、东莱、北海、高密、胶东、泰山、乐安、济南、平原，这大概就是所说的九州。”我认为铭文中正是说的包括禹州在内的九州，现在所指的郡名，周朝末年还没有，怎么会成为州名吗？宋公钟铭说：“宋成公的钟。”解释为：“宋国从微子以来已经有二十代了，前面有共公固成，又一代就是平公成，又过了七代又有剔公成，不知道是指的哪一位公成？”我考证了宋共公的名字，《史记》上写作瑕，《春秋》上说是固，开始没有叫“固成”的。况且既然父亲名叫“成”，那么他的儿子再叫这个名字还行吗？剔成君为他的弟弟偃所驱逐，亦不是名字叫“成”。对周代云雷磬的解释是：“春秋时鲁国饥荒，臧文仲用敲击玉磬的办法告诉人们到齐国余粮食。”按《春秋经》上所说，只说“臧孙辰到齐国请求买粮”，《左传》上也没有玉磬的说法。对汉代定陶鼎的解释说：“汉朝刚立国时，把定陶这个地方封给彭越称为梁王，彭越不接受以后，就把它封给了汉高祖的儿子刘恢，这就是定陶共王。”我考证发现刘恢正式封为梁王，后来迁到赵地。所说的定陶共王实际上是汉元帝的儿子，汉哀帝的父亲，名字叫刘康。

碌碌七字

【原文】 今人用碌碌字，本出《老子》云：“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孙《唐韵》引此句及王弼别本以为杻杻，然又为录录、季季、鹿鹿、陆陆、禄禄凡七字。《史记》：“毛遂云：‘公等录录，因人成事。’”《唐韵》以季季。《汉书·萧何赞》云：“录录未有奇节。”颜师古注：“录录犹鹿鹿，言在凡庶之中也。”《马援传》：“今更共陆陆。”《庄子·渔父篇》：“禄禄而受变于俗。”后生或不尽知。

【译文】 现在人们所用的碌碌二字，本来出自《老子》中的话：“不欲碌

碌如玉，落落如石。”孙礪在《唐韵》中引这句话以及王弼和别的版本分别作为 ，又写作录录、 、鹿鹿、陆陆、禄禄共七种写法。《史记》中说：“毛遂说：‘公等录录，因人成事。’”《唐韵》中把录录写成 。《汉书·萧何赞》中说：“录录未有奇节。”颜师古注释说：“录录犹如鹿鹿，说的是在平凡之中。”《后汉书·马援传》说：“今更共陆陆。”意思是如今改变态度和他一样陆陆。《庄子·渔父篇》说：“禄禄而受变于俗。”后来的学者有的并不全知道。

占测天星

【原文】 国朝星官历翁之伎，殊愧汉、唐，故其占测荒茫，几于可笑。偶读《四朝史·天文志》云：“元祐八年十月戊申，星出东壁西，慢流至羽林军没。主擢用文士，贤臣在位。”“绍圣元年二月丙午，星出壁东，慢流入浊没。主天下文章士登用，贤臣在位。”“元符元年六月癸巳，星出室，至壁东没。主文士入国，贤臣用。”“二年二月癸卯，星出灵台，北行至轩辕没。主贤臣在位，天子有子孙之喜。”按是时宣仁上仙，国是丕变，一时正人以次窜斥，章子厚在相位，蔡卞辅之，所谓四星之占，岂不可笑也！子孙之说，盖阴谄刘后云。

【译文】 宋朝掌管星象和日历的官员的技术水平，与汉代、唐代差得太远了，所以占卜测算的吉凶祸福，几乎到了可笑的程度。偶然阅读《四朝史·天文志》中说：“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十月戊申，星从东壁之西出来，慢慢地运行到羽林军所在地方就消失了。预示着要提拔文士，贤臣在位。”“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二月丙午，星从壁宿东边出来，慢慢地运行到湿宿的地方就消失了。预示着文士入国，贤臣被用。”“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二月癸巳，星从灵台方向出来，向北行到轩辕星座就消失了。预示着贤臣在位，皇上有子孙之喜。”实际上这时国事大变，一时间正人君子相继遭到排斥，章子厚在相位，蔡卞辅佐，所谓四星的占卜，难道不是很可笑吗？所谓皇上有子孙之喜的谈法，大概是为了迎合刘后编造出来的。

政和宫室

【原文】 自汉以来，宫室土木之盛，如汉武之甘泉、建章，陈后主之临春、结绮，隋炀帝之洛阳、江都，唐明皇之华清、连昌，已载史册。国朝祥符中，奸

臣导谏，为玉清昭应、会灵、祥源诸宫，议者固以崇侈劳费为戒，然未有若政和蔡京所为也。京既固位，窃国政，招大童贯、杨戩、贾详、兰从熙、何欣五人，分任其事。于是始作延福宫，有穆清、成平、会宁、睿谟、凝和、昆玉、群玉七殿，东边有蕙馥、报琼、蟠桃、春锦、叠琼、芬芳、丽玉、寒香、拂云、偃盖、翠葆、铅英、云锦、兰薰、摘金十五阁、西边有繁英、雪香、披芳、铅华、琼华、文绮、绛萼、烁华、绿绮、瑶碧、清音、秋香、丛玉、扶玉、绛云，亦十五阁。又垒石为山，建明春阁，其高十一丈，宴春阁广十二丈。凿圆池为海，横百尺，纵二百六十七尺，鹤庄、鹿砦、孔翠诸栅、蹄尾以数千计。五人者各自为制度，不相沿袭，争以华靡相夸胜，故名“延福五位”。其后复营万岁山、艮岳山，周十余里，最高一峰九十尺，亭堂楼馆不可殚记。徽宗初亦喜之，已而悟其过，有厌恶语，由是力役稍息。靖康遭变，诏取山禽水鸟十余万投诸汴渠，拆屋为薪，剪石为炮，伐竹为粉篱，大鹿数千头，悉杀之以啖卫士。

【译文】 自汉代以来，皇帝就大兴土木造宫殿，屡盛不衰，如汉武帝有甘泉宫、建章宫，陈后主临春宫、结绮宫，隋炀帝有洛阳宫、江都宫，唐明皇有华清宫、连昌宫，这些宫殿都已载入史册。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奸臣当道，阿谀奉承，修建了玉清昭应、会灵、祥源等宫殿，不少人提议要以奢侈浪费为戒，但是还是挡不住政和年间蔡京的所作所为。蔡京既然巩固了他的地位，窃取了国家政权，招来宦官童贯、杨戩、贾详、兰从熙、何欣五人，让他们分头负责。于是开始修建延福宫，还有穆清、成平、会宁、睿谟、凝和、昆玉、群玉七殿，东边修有蕙馥、报琼、蟠桃、春锦、叠琼、芬芳、丽玉、寒香、拂云、偃盖、翠葆、铅英、云锦、兰薰、摘金等十五阁、西修有繁英、雪香、披芳、铅华、琼华、文绮、绛萼、秾华、绿绮、瑶碧、清音、秋香、丛玉、扶玉、绛云等，也十五阁，又堆砌石头为山，修建了明春阁。高十一丈，宴春阁宽十二丈。又凿圆池为湖，横四百尺，纵二百六十七尺。还有鹤庄、鹿砦、孔翠等栅栏，其中的动物蹄尾有数千个。这五个人在督修过程中，各行其事，各有自己的制度，不互相沿袭，争着以繁华奢侈相夸耀，所以人们称他们为“延福五位。”然后又修造万岁山、艮岳山，周围有十多里长，最高峰有九十尺，山上建造的亭、堂、楼、馆，不可尽记。宋徽宗开始时也很喜欢这些，后来省悟到这是一种错过，说了些厌恶的话，从此修造的人们稍有收敛。钦宗靖康年间外敌入侵，皇上下诏捕猎山禽水鸟十多万投入汴渠，拆掉房屋当柴烧，碎石造炮火，砍伐竹子修篱笆，有几千头大鹿，全被杀掉犒劳卫士了。

僧官试卿

【原文】 唐代宗以胡僧不空为鸿胪卿、开府仪同三司，予已论之矣。自其后习以为常，至本朝尚尔。元丰三年，详定官制所言，译经僧官，有授试光禄鸿胪卿、少卿者，请自今试卿者，改赐三藏大法师，试少卿者，赐三藏法师。诏试卿改赐六字法师，少卿四字，并冠以译经三藏。久之复罢。

【译文】 唐代宗（李豫）用外国僧人不空为鸿胪卿、开府仪同三司，我已经论及这件事了。从此以后就习以为常，到本朝还这样。元丰三年（1080年），详细制定的官制说，翻译佛经的僧官，有授官考试为光禄鸿胪卿、少卿的，请从今以后，试鸿胪卿的，改赐三藏大法师，试少卿的，赐三藏法师。下诏试鸿胪卿的改赐六个字的法师，少卿赐四个字的法师，并在名称前加上“译经三藏”几个字。过了一段时间，又停止执行了。

大观算学

【原文】 大观中，置算学如庠序之制，三年三月，诏以文宣王为先师，兗、邹、荆三国公配飨，十哲从祀，而列自昔著名算数之人，绘像于两廊，加赐五等之爵。于是中书舍人张邦昌定其名，风后、大桡、隶首、容成、箕子、商高、常仆、鬼臾区、巫咸九人封公，史苏、卜徒父、卜偃、梓慎、卜楚丘、史超、史墨、裨灶、荣方、甘德、石申、鲜于妄人、耿寿昌、夏侯胜、京房、翼奉、李寻、张衡、周兴、单耗、樊英、郭璞、何承天、宋景业、萧吉、临孝恭、张曾元、王朴二十八人封伯，邓平、刘洪、管辂、赵达、祖冲之、殷绍、信都芳、许遵、耿询、刘焯、刘炫、傅仁均、王孝通、瞿曇罗、李淳风、王希明、李鼎祚、边冈、郎攸、襄楷二十人封子，司马季主、洛下閎，严君平，刘徽、姜岌、张立建、夏侯阳、甄鸾、卢太翼九人封男。考其所条具，固有于传记无闻者，而高下等差，殊为乖谬。如司马季主、严君平止于男爵，鲜于妄人、洛下閎同定《太初历》，而妄人封伯，下閎封男，尤可笑也。十一月又改以黄帝为先师云。

【译文】 宋徽宗大观年间，把数学列入学校的制度里，大观三年（1109年）三月，皇上下诏把文宣王孔子当作先师，兗、邹、荆三国公为配享，以孔子弟子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宰我、子贡、冉有、季路、子路、子夏

十个哲人随从祭祀，而把古代以来的著名术数学家罗列出来，绘出画像挂在两边走廊上，再加赐五等爵位。于是中书舍人张邦昌确定风后、大桡、隶首、容成、箕子、商高、常仆、鬼臾区、巫咸等九人封为公爵，史苏、卜徒父、卜偃、梓慎、卜楚丘、史超、史墨、裨灶、荣方、甘德、石申、鲜于妄人、耿寿昌、夏侯胜、京房、翼奉、李寻、张衡、周兴、单 、樊英、郭璞、何承天、宋景业、萧吉、临孝恭、张曾元、王朴等二十八人封为伯爵，邓平、刘洪、管辂、赵达、祖冲之、殷绍、信都芳、许遵、耿询、刘焯、刘炫、傅仁均、王孝通、瞿昙罗、李淳风、王希明、李鼎祚、边冈、郎 、襄楷等二十人封为子爵，司马季主、洛下閤、严君平、刘徽、姜岌、张立建、夏侯阳、甄鸾、卢太翼等九人封为男爵。考查以上诸位，有的只在传记中才能找到并不出名，而且所定的等级高低更是荒谬悖理。如司马季主、严君平只封为男爵，鲜于妄人和洛下閤两人共同制定了《太初历》，可鲜于妄人封了伯爵，而洛下閤才封为男爵，特别可笑。到十一月时，又改为以黄帝为先师了。

十八鼎

【原文】 夏禹铸九鼎，唯见于《左传》王孙满对楚子，及灵王欲求鼎之言，其后《史记》乃有鼎震及沦入于泗水之说。且以秦之强暴，视衰周如机上肉，何所畏而不取？周亦何辞以却？赧王之亡，尽以宝器入秦，而独遗此，以神器如是之重，决无沦没之理。泗水不在周境内，使何人般舁而往，宁无一人知之以告秦邪？始皇使人没水求之不获，盖亦为传闻所误。《三礼》经所载钟彝名数详矣，独未尝一及之。《诗》、《易》所书，固亦可考，以予揣之，未必有是物也。唐武后始复置于通天宫，不知何时而毁。国朝崇宁三年，用方士魏汉津言铸鼎，四年三月成，于中太一宫之南为殿，名曰九成宫。中央曰帝鼎，北方曰宝鼎，东北曰牡鼎，东方曰苍鼎，东南曰罔鼎，南方曰彤鼎，西南曰阜鼎，西方曰晶鼎，西北曰魁鼎。奉安之日，以蔡京为定鼎礼仪使。大观三年，又以铸鼎之地作宝成宫。政和六年，复用方士王仔昔议，建阁于天章阁西，徙鼎奉安。改帝鼎为隆鼎，余八鼎皆改焉，名阁曰圆象徽调阁。七年，又铸神霄九鼎，一曰太极飞云洞劫之鼎，二曰苍壶祀天贮醇之鼎，三曰山岳五神之鼎，四曰精明洞渊之鼎，五曰天地阴阳之鼎，六曰混沌之鼎，七曰浮光洞天之鼎，八曰灵光晃曜炼神之鼎，九曰苍龟大蛇虫鱼金轮之鼎。明年鼎成，置于上清宝箓宫神霄殿，遂为十八鼎。继又诏罢九鼎新名，悉复其旧。今人但知有九鼎，而十八之数，唯朱忠

靖公《秀水闲居录》略纪之，故详载于此。

【译文】 夏朝时禹铸九鼎的传说，只能从《左传》中王孙满对楚子一文看到，涉及到灵王想得到鼎的问题，在这之后的《史记》中才有了鼎落入泗水河的说法。况且以秦国的强大暴虐，可把衰弱的周王朝看作像小桌子上的肉，它有所惧怕而不取？周王朝又用什么话来推却？周赧王的灭亡，周的传国重器都到了秦国，而独遗漏了九鼎，因为九鼎这种神器那样的沉重，决没有沉没的道理。而且泗水不在周王朝境内，让什么人搬抬去的，难道没有一人知道这件事而向秦王告发吗？秦始皇让人潜入水中去找寻而没有得到，大概也是误听了传闻。《三礼》经中所载的钟鼎彝器的名目数量很详细了，唯独没有一处提到它。《诗经》、《易经》所记的，原本也可考证，但也没有提到它。据我揣测，未必有九鼎这个器物。唐代武后开始在通天宫中再置放九鼎，又不知什么时候毁掉了。本朝崇宁三年（1104年），徽宗听了方士魏汉津的话铸起鼎来，到四年三月铸成，在中太一宫的南面造了殿，名叫九成宫。安放在中央的鼎叫帝鼎，北方的叫宝鼎，东北的叫牡鼎，东方的叫卷鼎，东南的叫罔鼎，南方的叫彤鼎，西南的叫阜鼎，西方的叫晶鼎，西北方的叫魁鼎。在恭敬地安放九鼎的那一天，以蔡京为定鼎礼仪使。徽宗大观三年（1109年），又在铸鼎的地方修建了宝成宫。徽宗政和六年（1116年），又用方士王仔昔建议，在天章阁西建阁，把鼎迁过去安放在那儿。并且把帝鼎改名隆鼎，其余八鼎也都改了名，把阁叫作圆象徽调阁。政和七年（1117年），又铸造了神霄九鼎，第一鼎叫太极飞云洞劫之鼎，第二鼎叫卷壶祀天贮醇之鼎，第三鼎叫山岳五神之鼎，第四鼎叫精明洞渊之鼎，第五鼎叫天地阴阳之鼎，第六鼎叫混沌之鼎，第七鼎叫浮光洞天之鼎，第八鼎叫灵光晃曜炼神之鼎，第九鼎叫苍龟大蛇虫鱼金轮之鼎。第二年鼎铸成，安放在上清宝 宫神霄殿，因而成了十八鼎。继而又下诏免去了九鼎的新名，全都恢复了它们的旧名。现在的人只知道有九鼎，而十八鼎的数字，只有朱忠靖公（朱胜非）的《秀水闲居录》中简略记载了，所以在这里详细地记了下来。

四朝史志

【原文】 《四朝国史》本纪，皆迈为编修官日所作，至于淳熙乙巳、丙午，又成列传百三十五卷。惟志二百卷，多出李焘之手，其汇次整理，殊为有功，然亦时有失点检处。盖文书广博，于理固然。《职官志》云：“使相以待勋贤故老，及宰相久次罢政者，惟赵普得之。明道末，吕夷简罢，始复加使相，其后王钦

若罢日亦除，遂以为例。”按赵普之后，寇准、陈尧叟、王钦若，皆详符间自枢密使罢而得之。钦若以天圣初再入相，终于位，夷简乃在其后十余年。今言钦若用夷简故事，则非也。因记《新唐书》所载：“李泌相德宗，加崇文馆大学士。泌建言，学士加大，始中宗时，及张说为之，固辞。乃以学士知院事。至崔圆复为大学士，亦引泌为让而止。”按崔圆乃肃宗朝宰相，泌之相也，相去三十年，反以为圆引泌为让，甚类前失也。

【译文】 《四朝国史》的本纪，都是我洪迈在任编修官时所写的，到了孝宗淳熙十二、十三年（1185年—1186年），又写成列传一百三十五卷。只有志二百卷，大多是出于李焘之手，他在汇集整理方面，有很大功劳，但也难免有校点失误之处。大概由于图书广博，从情理上说是难以避免的。《职官志》中说：“使相一衔，只给有功勋的贤相故老，以及免去宰相职务的人，只有赵普一人得到过它。仁宗明道末年，吕夷简免去了宰相，才给加上使相之衔，后来王钦若离职时也加以使相之衔，于是就成了惯例。”据我考证，赵普以后，寇准，陈尧叟、王钦若，都是在真宗大中祥符年间从枢密使职位上离开而又得到使相。王钦若于仁宗天圣初年再次入相，直到去世，吕夷简是在王钦若之后的十几年。如今说王钦若在吕夷简之后，是不对的。因而我想起《新唐书》中的记载：“李泌在唐德宗时为相，德宗加封他为崇文馆大学士。李泌建议说，学士前加上大，从唐中宗时开始，到张说时加了，所以坚决请求去掉大字。于是就封为学士负责院事。到了崔圆又任大学士，也以李泌为例辞让而止。”据考，崔圆是唐肃宗时的宰相，李泌任宰相时，比他晚三十年，反而说崔圆以李泌为榜样，这种失误与前边很相似。

宗室参选

【原文】 吏部员多阙少，今为益甚，而选人当注职官簿尉，辄为宗室所夺，盖以尽压已到部人之故。按宣和七年八月，臣僚论：“祖宗时宗室无参选法，至崇宁初，大启侥幸，遂使任意出官，又优为之法，参选一日，即在阖选名次之上。以天支之贵，其间不为无人，而膏粱之习，贪淫纵恣，出为民害者不少。议者颇欲惩革，罢百十人之私恩，为亿万人之公利，诚为至当。若以亲爱未忍，姑乞与在部人通理名次。”从之。靖康元年八月，又奏云：“祖宗时，未有宗室参部之法，神宗时，始选择差注一二。崇宁初，立法太优，宗室参选之日，在本部名次之上，既压年月深远、劳效显著之人，复占名州大县，优便丰厚之处。议

者颇欲惩革，不注郡守、县令，与在部人通理名次。”有旨从之。此二段元未尝冲改，不知何时复紊也。

【译文】 吏部候选的官员多，实缺的职位又少，如今更加厉害，而候选的官员当登记主簿县尉这样的初级职位，也每每为宗室夺去，大概是因为全部压下了已经到部的候选人，没有再高职位的缘故。按：宣和七年（1125年）八月，群臣百官议论说：“先世开国时，没有制订宗室参与选举官吏的办法，到了崇宁初年，大开侥幸之门，于是乎让宗室任意出来做官，又办法很优惠，参加选举一天，就排在全部参选名单的前面。贵为天子支派，这中间不能说没有人才，然而富贵习气，贪淫放肆，出来成为老百姓祸害的也不在少数。议论的人很想对这种情况加以惩罚变革，免去对百十来人的私恩，为了亿万人的公利，确实是最合适的。倘若因为亲族之爱而不忍这样做，姑且请求把宗室和在部人员全部统一理顺名次。”皇上有旨准行。靖康元年（1126年）八月，又上奏说：“先世开国时，没有宗室参与部选的办法，神宗时，开始有选择地登记一二少量人员。崇宁初年，制定的办法太优惠，从宗室参与选举之日开始，排在吏部参选人员名次的前面，既压制了时间久远、劳效显著的候选人，又占有了名州大县、地理位置好、物产丰厚的地方。议论的人很想惩治变革，不让登记选择郡守、县令，和在部人员全部统一理顺名次。”有旨准从。这二段原本没有违反和抵触原来决定，不知什么时候又乱了。

元丰库

【原文】 神宗常愤北狄倔强，慨然有恢复幽燕之志，于内帑置库，自制四言诗曰：“五季失图，猥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凡三十二库，每库以一字揭之，储积皆满。又别置库，赋诗二十字，分揭于上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资，何日成戎捷。”其用志如此，国家帑藏之富可知。熙宁元年，以奉宸库珠子付河北缘边，于四榷场鬻钱银，准备买马，其数至于二千三百四十三万颗。乾道以来，有封桩，南库所贮金银楮券，合为四千万缗，孝宗尤所垂意。入绍熙以来，颇供好赐之用，似闻日减于旧云。

【译文】 我朝神宗经常愤恨入侵的北方狄族，怀有光复北方幽燕领土的志气，于是积蓄国库的资财，自己写了一首四言诗说：“五季失图，猥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共设三十二

个仓库，每个仓库上贴上一个字作为标识，库内储积都满了。于是另外建了仓库，写了一首二十字的诗，分别贴在上面。诗中说道：“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资，何日成戎捷。”有了这样的雄心大志，国库的资财储藏之富就不难知道了。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皇上下令把奉宸库藏的珍珠付给河北边地，让他们换成银钱，准备买马，总数达到二千三百四十三万颗。孝宗乾道以来，共有库存银四千万缗，孝宗特别关心。进入光宗绍熙年以来，全用来恩赐和享受了，库银听说一天比一天减少。

五俗字

【原文】 书字有俗体，一律不可复改者，如𣎵、𣎵、𣎵、𣎵、𣎵五字，悉以水为𣎵，（笔陵切，与“冰”同。）虽士人札翰亦然。《玉篇》正收入于水部中，而𣎵部之末亦存之，而皆注云“俗”，乃知由来久矣。唐张参《五经文字》，亦以为讹。

【译文】 写字有俗写体，一律不可再改，如𣎵、𣎵、𣎵、𣎵、𣎵五字，都把三点水（水部）写为二点水（冫部）。即使是文人信札也不例外。《玉篇》都把它们收入水部中，而𣎵部末尾也存有，而且都注上“俗”，看来这种俗写由来已久了。唐代张参的《五经文字》一书，也弄错了。

卷十四

三教论衡

【原文】 唐德宗以诞日岁岁诏佛、老者大论麟德殿，并召给事中徐岱及赵需、许孟容、韦渠牟讲说。始三家若矛盾，然卒同归于善，帝大悦，赉予有差。此《新书》列传所载也。白乐天集有《三教论衡》一篇云：“太和元年十月，皇帝降诞日，奉敕召入麟德殿内道场对御三教谈论，略录大端。第一座：秘书监白居易，安国寺引驾沙门义林，太清宫道士杨弘元。”其序曰：“谈论之先，多陈三教，赞扬演说，以启谈端。臣学浅才微，猥登讲座。窃以义林法师明大小乘，通内外学，于大众中能狮子吼。臣稽先王典籍，假陛下威灵，发问既来，敢不响答。”然予观义林所问，首以《毛诗》称六义，《论语》列四科，请备陈名数而已。居易对以孔门之徒三千，其贤者列为四科。《毛诗》之篇三百，其要者分为六义。然后言六义之数，四科之目，十哲之名。复引佛法比方，以六义可比十二部经，四科可比六度，以十哲可比十大弟子。僧难云：“曾参至孝，百行之先，何故不列于四科？”居易又为辨析，乃曰：“儒书奥义，既已讨论，释典微言，亦宜发问。”然所问者不过芥子纳须弥山一节而已。后问道士《黄庭经》中养气存神长生久视之道，道士却问敬一人而千万人悦。观其问答旨意，初非幽深微妙，不可测知，唐帝岁以此为诞日上仪，殊为可省。国朝命僧升座祝圣，盖本于此。

【译文】 唐德宗每年的诞辰日的时候，都要诏佛教徒、道家在麟德殿展开辩论，并召来给事中徐岱以及赵需、许孟容、韦渠牟参加。开始时三家有些矛盾，但最终同归和好，皇帝十分高兴，赏赐各有不同。见于《新唐书》列传中的记载。在白居易文集中有一篇文章叫《三教论衡》，内容说：“唐文宗太和元年（827年）十月，皇帝誕生日，奉皇帝旨意召入麟德殿内道场对着皇帝三教进行辩论。这里大记其略。第一座秘书监白居易，安国寺引驾沙门义林，太清宫道士杨弘元。”这篇文章在序中说：“在谈论之前，大多先陈述三教，赞扬阐述，用来启发谈话开始。白居易我才疏学浅，不自量地登上讲座。我自认为义林法师能阐明大小乘，精通内外学，在大众中能发生像狮子吼一样的响亮声音震惊

世界。于是，我就考证先王典籍，借助于陛下的威灵，面对提出的问题，认真回答。”然而我观察义林提出的问题，开始从《毛诗》里引出六义，又从《论语》列出四科，让对方把它们一一陈述出来。白居易回答是孔门有学生三千，其中的贤者可分为四科；《毛诗》有三百篇，其中主要的分为六义。接着说六义都是什么，四科都是什么，还有十位哲人的名字。然后又引用佛法做比方，说六义可比为十二部经书，四科可比为六度，十哲可相当于十大弟子。老僧又提问发难说：“孔子的学生曾参最孝顺，各种品行也最优，为什么却不被列入四科之中？”白居易又进行了辨析。他说：“儒家著作的深刻意义，已经讨论过了，佛学经典的一些精微地方，也可以提出问题。”然而所问的不过是芥子纳须弥山一节罢了。后来又问道士《黄庭经》中养气存神的长生久视之道如何？道士问起《孝经》中尊敬一人就会使千万人高兴。综观他们问答的情况，原本不在幽深微妙，不可测知，唐德宗皇帝每年把这当做诞辰庆典上的重要仪式，特别能引起人们的思考。本朝皇上生日时让僧人上朝祝圣颂安，大概也是从这里学来的。

夫兄为公

【原文】 妇人呼夫之兄为伯，于书无所载。予顷使金国时，辟景孙弟辅行，弟妇在家，许斋醮及还家赛愿。予为作青词云：“顷因兄伯出使，夫婿从行。”虽借用《陈平传》“兄伯”之语，而自不以为然。偶忆《尔雅·释亲篇》曰：“妇称夫之兄为兄公，夫之弟为叔。”于是改兄伯字为兄公，视前所用，大为不侔矣。《玉篇》祜字音钟，注云：“夫之兄也。”然于义训不若前语。

【译文】 妇人称自己丈夫的兄长为伯，这在史书上并无记载。我当初刚刚要出使金国时，景孙弟随行，弟媳在家，答应请僧道设斋坛祈祷，等到返回家里后再还。我为此写青词说：“近因兄伯出使，夫婿从行。”虽然是借用《陈平传》中“兄伯”一词，而自己却不以为然。偶然又回忆起《尔雅·释亲篇》中说：“妇人称自己丈夫的兄为兄公，称丈夫的弟为叔。”于是又把兄伯的伯字改为公，这与前面的用词相比，是大不相同的。《玉篇》 祜字读音为钟，注释说：“ 祜，指的是丈夫的兄。”然从义训上看，不如前面《尔雅·释亲篇》的解释确切。

政和文忌

【原文】 蔡京颺国，以学校科举箝制多士，而为之鹰犬者，又从而羽翼之。士子程文，一言一字，稍涉疑忌，必暗黜之。有鲍辉卿者言：“今州县学考试，未校文学精弱，先问时忌有无，苟语涉时忌，虽甚工不敢取。若曰：‘休兵以息民，节用以丰财，罢不急之役，清入仕之流。’诸如此语，熙、丰、绍圣间，试者共用不以为忌，今悉绌之，所宜禁止。”诏可。政和三年，臣僚又言：“比者试文，有以圣经之言辄为时忌而避之者，如曰‘大哉尧之为君’，‘君哉舜也’，与夫‘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吉凶悔吝生乎动’，‘吉凶与民同患’。以为‘哉’音与‘灾’同，而危乱凶悔非人乐闻，皆避。今当不讳之朝，岂宜有此？”诏禁之。以二者之言考之，知当时试文无辜而坐黜者多矣，其事载于《四朝志》。

【译文】 蔡京把持国家大权时，通过学校科举制度来箝制众多士人，而那些当了他鹰犬的人，又必须服从他并在他们的羽翼之下。参加考试的士子们在考试时写文章，一字一句都不敢大意，如果稍涉疑忌，就必定会被暗中废除录用资格。有一个叫鲍辉卿的上书说：“现在州县学考试，还没有考察文章水平的精弱高下，就要先看有没有触犯时忌，如果文章言词涉及时下忌讳，即使文章写得非常好也不敢录取。如果在文章中说：‘休兵以息民，节用以丰财，罢不急之役，清入仕之流。’诸如这样的话，在熙宁、元丰和绍圣年间，参加考试的人可以使用不必忌讳，而今却全都禁止使用。”皇上下诏认可了他的意见。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群臣们又上书说：“近来参加考试的人写文章，有用圣人经典之言而触犯时下忌讳，如说‘大哉尧之为君’，‘君哉舜也’，以及‘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吉凶悔吝生乎动’，‘吉凶与民同患。’认为这里的‘哉’字读音和‘灾’字相同，而危机混乱凶残侮辱都不是人们乐于听到的，都避讳了。如今遇到的是不忌讳的朝代，难道还应有这些吗？”皇上下诏禁止这种避讳。根据这两段话考证，知道当时考试文章无辜而被取消录取资格的人多了，这些事记载在《四朝志》中。

瞬息须臾

【原文】 瞬息、须臾、顷刻，皆不久之词，与释氏“一弹指间”，“一刹那顷”之义同，而释书分别甚备。《新婆沙论》云：“百二十刹那，成一怛刹那，六十怛刹那，成一腊缚，二十腊缚，成一牟呼麦多，三十牟呼麦多，成一昼夜。”又《毗昙论》云：“一刹那者翻为一念，一怛刹那翻为一瞬，六十怛刹那为一息，一息为一罗婆，三十罗婆为一摩耨罗，翻为一须臾。”又《僧祇律》云：“二十念为一瞬，二十瞬名一弹指，二十弹指名一罗预，二十罗预名一须臾，一日一夜有三十须臾。”

【译文】 瞬息、须臾、顷刻，都是用来表示不久的词，与佛家的“一弹指间”、“一刹那顷”的意思相同，但是，在佛教典籍中对不久一词的区分尤为详细。《新婆沙论》中说：“一百二十个刹那组成一怛刹那，六十怛刹那组成一腊缚，二十腊缚组成一牟乎麦多，三十个牟乎麦多组成一昼夜。”还有《毗昙论》中说：“一刹那就是一念，一怛刹那就是一瞬，六十怛刹那就是一息，一息就是一罗婆，三十罗婆就是一摩 罗，也就一须臾。”另外《僧祇律》中说：“二十念是一瞬，二十瞬叫一弹指，二十弹指叫一罗预，二十罗预叫一须臾，一日一夜有三十须臾。”

神宗待文武臣

【原文】 元丰三年，诏知州军不应举京官职官者，许通判举之。盖诸州守臣有以小使臣为之，而通判官入京朝，故许之荐举。今以小使臣守沿边小郡，而公然荐人改官，盖有司不举行故事也。神宗初即位，以刑部郎中刘述（今朝散大夫），久不磨勘，特命为吏部郎中（今朝请大夫）。枢密院言：“左藏库副使陈恬静，久应磨勘，不肯自言。”帝曰：“右职若效朝士养名，而奖进之，则将习以为高，非便也。”翌日以兵部员外郎张问（今朝请郎），十年不磨勘，特迁礼部郎中（今朝奉大夫）。其旌赏驾御，各自有宜，此所以为综核名实之善政。（见《四朝志》）

【译文】 神宗（赵顼）元丰三年（1080年），下诏知州、知军不应试京官职官的，允许通判举荐。大概因为诸州的守臣有用小使臣充当的，而通判由京

官充任，可入京朝见，所以允许他们举荐。现在有用小使臣掌管沿着边疆的小郡，而他们能公然荐人改官，大概是有关主管部门不实行旧日的先例了。神宗初即位，因刑部郎中刘述（原注：今朝散大夫）好久没有勘验政绩以定升迁，特地让他为吏部郎中（原注：今朝请大夫）。枢密院说：“左藏库副使陈砮为人恬静，早就该勘验他的政绩以定升迁，但他不肯自己说。”神宗说：“左藏库副使若效法朝廷官吏那样，培养名声，却去奖励升迁他，就将以为高尚而去效法，不是适宜的办法。”第二天，因为兵部员外郎张问（原注：今朝请郎）十年没有勘验政绩升迁，特升迁他为礼部郎中（原注：今朝奉大夫）。神宗的控制表彰奖赏，各自有相称的，这所以是综合人物的名望和实际加以考核的善政。（原注：见《四朝志》）

绿竹王刍

【原文】 《随笔》中载：“毛公释绿竹王刍，以为北人不见竹，故分绿竹为二物，以绿为王刍。”熙宁初，右赞善大夫吴安度试舍人院，已入等。有司以安度所赋《绿竹诗》，背王刍古说，而直以为竹，遂黜不取。富韩公为相，言：“《史记》叙载淇园之竹，正卫产也，安度语有据。”遂赐进士出身。予又记前贤所纪，仁宗时，贾边试《当仁不避于师论》，以师为众，谓其背先儒训释，特黜之。盖是时士风淳厚，论者皆不喜新奇之说，非若王氏之学也。

【译文】 我在《随笔》中记载：“毛公解释绿竹王刍，认为北方人看不见竹子，所以把绿竹分为两种东西，以为绿就是王刍。”神宗熙宁初年，右赞善大夫吴安度在舍人院考试，因文理优长拟录取。主管人员以为吴安度所赋的《绿竹诗》，和王刍的古说法相矛盾，而直接认为王刍就是竹，于是就取消其录取资格。富韩公任宰相，向皇上进言说：“《史记》中记载淇园之竹，产于卫国，所以说吴安度言之有据。”于是就赐给吴安度进士出身。我又想起前代圣贤的记载，宋仁宗时，贾边考试，文章题目是《当仁不避于师论》，贾边把师字解释为众，有人说这有背于先代儒者的训释，就取消其录取资格。大概当时士风淳厚，论者都不喜欢新奇的学说，并不像王安石的学说。

亲除谏官

【原文】 仁宗庆历三年，用欧阳修、余靖、王素为谏官，当时名士作诗，有“御笔新除三谏官”之句。元丰八年，诏范纯仁为谏议大夫，唐淑问、苏辙为司谏，朱光庭、范祖禹为正言。宣仁后问宰执，此五人者如何？佖曰：“外望惟允。”章子厚独曰：“故事，谏官皆荐诸侍从，然后大臣稟奏。今诏除出中，得无有近习援引乎？此门浸不可启。”后曰：“大臣实皆言之，非左右也。”子厚曰：“大臣当明扬，何为密荐？”由是有以亲嫌自言者，吕公著以范祖禹，韩缜、司马光以范纯仁。子厚曰：“台谏所以纠大臣之越法者，故事，执政初除，苟有亲戚及尝被荐引者，见为台臣，则皆他徙。今天子右冲、太皇同听万几，故事不可违。”光曰：“纯仁、祖禹实宜在谏列，不可以臣故妨贤，宁臣避位。”子厚曰：“缜、光、公著必不私，他日有怀奸当国者，例此而引其亲党，恐非国之福。”后改除纯仁待制，祖禹著作佐郎，然此制亦不能常常恪守也。

【译文】 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皇上任用欧阳修、余靖、王素三人为谏官，当时名士所作的诗中，有“御笔新除三谏官”的句子。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皇上又下诏任命范纯仁为谏议大夫，唐淑问、苏辙为司谏，朱光庭、范祖禹为正言。宣仁后问执宰们这五个人怎么样？都回答说：“外面的威望还可以。”惟独章子厚却说：“从前，谏官都由翰林学士给事中等侍从官推荐，然后再由大臣稟奏。如今下诏提拔，难道是有近习之人援引吗？这种风气不可开。”宣仁后说：“大臣们确实都说了，不是左右近习主人引见的。”章子厚又说：“大臣们应当公开提出，为什么要秘密举荐？”从此便有自己举荐亲戚的大臣，吕公著举荐了范祖禹，韩缜、司马光举荐了范纯仁。章子厚说：“台谏是用来纠正大臣们的越轨行为的，从前，执政官初步提议，如果其中有亲戚或曾被引荐的人，便公开评议，然后再改任其他官职。如今天子年幼，太皇太后与之同听万机，以前的制度不可违背。”司马光说：“范纯仁、范祖禹实在适合出任谏官，不应该因我的原因影响贤人，否则我宁可避位。”章子厚说：“韩缜、司马光、吕公著三位肯定没有私心，但他日如果有怀奸把持国政的人，人们就会以这事来说举荐亲戚的害处，这恐怕不是国家福气。”后来把范纯仁改任命为待制，范祖禹任著作佐郎，然而这种制度也不能常常恪守不变。

检放灾伤

【原文】 水旱灾伤，农民陈诉，郡县不能体朝廷德意。或虑减放苗米，则额外加耗之入为之有亏，故往往从窄。比年以来，但有因赈济虚数而冒赏者，至于蠲租失实，于民不便者，未尝小愆。宣和之世，执政不能尽贤，而其所施行，盖犹慰人心。京西运判李祐奏：“房州民数百人，陈言灾伤。知州李愬取其为首者，杖而徇之城市，以戒妄诉，用此其州蠲税不及一厘。”诏：“李愬除名，签书官皆勒停。”祐又奏：“唐、邓州蠲灾赈乏，悉如法令，均、房州不尽减税，致有盗贼。”诏：“均、房州守令悉罢，唐、邓守贰各增一官秩。”百姓见忧，出于徽宗圣意，而大臣能将顺也。

【译文】 一遇水旱灾害，农民总要向上陈诉，郡县官多不能领会朝廷的恩德意图。有的考虑减报收成，发放赈米，就会额外增加耗费造成国库有亏损，于是往往从严掌握。近年以来，就有因赈济虚数而冒领奖赏的人，以至于所减免的租额失实，对民众不便的，未曾受到小的惩罚。徽宗宣和时期，执政的人不能尽力显示贤德，而他们所施行的政策，大概还有安定民心。京西运判李祐上奏：“房州民众数百人，陈述他们所受灾害。知州李愬抓住其中为首的，毒打之后在城中游行示众，以警告那些随便上诉的人，因此这个州的免税额还不及百分之一。”皇上下诏说：“把李愬除去名籍，他的属下签书官也都除名遣送外地。”李祐又启奏说：“唐州、邓州减灾赈济，全按法令，而均州、房州都不减免税收，结果导致盗贼四起。”皇上又下诏：“均州、房州守令全部罢官，唐州、邓州的郡守和他们的副职各增加一级官爵和俸禄。”百姓们出现忧虑，出于对皇上的圣意，大臣能将们都顺从了。

檀弓注文

【原文】 《檀弓》上下篇，皆孔门高第弟子在战国之前所论次。其文章雄健精工，虽楚、汉间诸人不能及也。而郑康成所注，又特为简当，旨意出于言外，今载其两章以示同志。“卫司徒惠子之丧，子游为之麻衰，牡麻晶。”注云：“惠子废嫡立庶，为之重服以讥之。”“文子辞曰：子辱与弥牟之弟游，又辱为之服，敢辞。子游曰：礼也。文子退反哭。”注：“子游名习礼，文子亦以为当然，

未觉其所讥。”“子游趋而就诸臣之位。”注：“深讥之。”“文子又辞曰：子辱与弥牟之弟游，又辱为之服，又辱临其丧，敢辞。子游曰：固以请。文子退，扶适子南面而立曰：子辱与弥牟之弟游，又辱为之服，又辱临其丧，虎也敢不复位。”注：“觉所讥也。”“子游趋而就客位。”注：“所讥行。”按此一事，倘非注文明言，殆不可晓。今用五“讥”字，词意涣然，至最后“觉所讥”、“所讥行”六字，尤为透彻也。“季孙之母死，哀公吊焉。曾子与子贡吊焉，阍人为君在，弗内也。曾子与子贡入于其阼而修容焉。子贡先入，阍人曰：乡者已告矣。”注：既不敢止，以言下之。”“曾子后入，阍人辟之。”注：“见两贤相随，弥益恭也。”今人读此段，真如亲立季氏之庭，亲见当时之事，注文尤得其要领云。

【译文】 《礼记》中的《檀弓》有上下篇，都是孔门官职比较高的弟子在战国之前所写的。这些文章雄健精工，即使是楚、汉时的文人也赶不上。郑康成在注释时，又特别简练精当，能够做到旨意出自言外，现摘其中两章示于同仁。“卫国司寇惠子叔兰死时，子游给他披麻带孝，丧服上的带子是牡麻。”郑玄注释说“惠子废了嫡子而立了庶子，为他重孝是为了讥讽他。”“文子推辞说：‘承蒙您屈辱地和我的弟弟同游，又屈辱地为他服丧，冒昧辞谢。’子游说：‘这是出于礼节。’文子退下来就哭了。”注释说：“子游说是为了礼节，文子也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并没感觉到是讥讽。”“子游快步走向诸臣的位置。”注释说：“这是更深刻的讥讽。”“文子又劝说道：‘您不顾屈辱和我的弟弟交友，又屈辱地为惠子服丧，又屈居臣位，您应当辞退。子游说：您还是请回吧！文子退下，扶着嫡子面南而立说：您不顾屈辱与弥牟之弟同游，又不顾屈辱穿上丧服，还不顾屈辱临下位而发丧，我哪里敢不回到原位上。”注释说：“这是发觉他的讥讽之意了。”“子游快步走向客人的位置。”注释说：“这是讥讽的行为。”考察这件事，假若不是注文明白，大概就无法理解。这里用了五个“讥”字，词义明确，到最后“觉所讥”、“所讥行”六个字，特别透彻。

还有一段说：“季孙的母亲死了，哀公前去吊丧。曾子与子贡也去吊唁，看门人因为君主在，不敢让他们进去。曾子和子贡进入马棚去化装。然后子贡先进，看门说：乡下人已经报告过了。”注释说：“既然不敢阻止，就用语言应付。”“曾子后来进，看门人就避开了。”注释说：“看见两位贤相随，更加恭敬了。”现在的人读这段文字，真的就像亲自立在季氏的庭院里，亲眼看见当时的情景，注释的文字特别要得其要领。

左传有害理处

【原文】 《左传》议论遣辞，颇有害理者，以文章富艳之故，后人一切不复言，今略疏数端，以箴其失。《传》云：“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杜氏谓：“不复专任郑伯也。”“周公阍与王孙苏争政，王叛王孙苏。”杜氏曰：“叛者，不与也。”夫以君之于臣，而言贰于叛，岂理也哉！“晋平戎于王，单襄公如晋拜成。刘康公徼戎，将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国，不义。”晋范吉射、赵鞅交兵。“刘氏，范氏世为婚姻，莒弘事刘文公，故周与范氏。赵鞅以为讨。”夫以天子之使出聘侯国，而言拜成。谓周于晋为欺大国。诸侯之卿跋扈于天子，而言讨。皆于名分为不正。其他如晋邢侯杀叔鱼，叔鱼兄叔向数其恶而尸诸市。其于兄弟之谊为弗笃矣，而托仲尼之语云：“杀亲益荣。”杜氏又谓：“荣名益已。”以弟陈尸为兄荣，尤为失也。

【译文】 《左传》中有关议论的谴责之辞，有很多不合常理的地方，因为文章写得富丽明艳，后人一切都不再说了，现在大略指出几处，以改正其过失。

《左传》中说：“郑武公、庄公，都是周平王的卿士，但平王却有贰心和虢国交好。”杜预说：“说的是平王不再专门任用郑武公了。”《左传》中又说：“周公阍和王孙苏争权夺利，国王背叛了王孙苏。”杜氏说：“叛，就是不友好了。”拿君主和大臣，却说什么贰和叛，这难道符合常理吗？

《左传》中说：“晋国为周王朝平定了军事战乱，单襄公去晋国拜谢。刘康公又挑起军事，将率兵讨伐。叔服说：背叛联盟而欺负大国，这是不讲仁义。”晋国的范吉射和赵鞅率兵迎战。

《左传》中说：“刘、范两氏几代都有婚姻，莒弘给刘文公做事，所以周朝和范氏友好。赵鞅认为这是讨伐。”以天子的使者的身份出访诸侯国，却说是去拜谢。说对周和晋是欺负大国。诸侯卿相在天子面前飞扬跋扈，而说是讨伐。这些从名分上都说不通。其他像晋邢侯杀了叔鱼，叔鱼的哥哥叔向罗列弟弟的罪恶而暴尸于街头。这不是不讲兄弟情意了吗？而且还借孔子的话说：“杀亲益荣”（杀害自己的亲人更光荣）。杜预又说：“光荣的名声对自己有好处。”用把弟弟陈尸街头的方法使兄长光荣，这更是失误。

夫人宗女请受

【原文】 戚里宗妇封郡国夫人，宗女封郡县主，皆有月俸钱米，春冬绢绵，其数甚多，《嘉熙禄令》所不备载。顷见张抡娶仲偃女，封遂安县主，月入近百千，内人请给，除粮料院帮勘、左藏库所支之外，内帑又有添给，外庭不复得知。因记熙宁初，神宗与王安石言，今财赋非不多，但用不节，何由给足？宫中一私身之奉，有及八十贯者，嫁一公主，至用七十万缗，沈贵妃料钱月八百贯。闻太宗时，宫人唯系皂绢帔，元德皇后尝以金线缘帔而怒其奢。仁宗初定公主俸料，以问献穆大主，再三始言，其初仅得五贯耳。异时，中官月有止七百钱者。礼与其奢宁俭，自是美事也。一时旨意如此，不闻奉行。以今度之，何止十百倍也。

【译文】 皇帝亲戚的宗妇被封为郡国夫人，宗女封郡县主，都有月俸钱米，春冬绢绵，数量很多，《嘉熙禄令》记载的不够完备详尽。不久前看到张抡娶了赵仲偃的女儿，封为遂安县主，每月收入近十万，内人的供给，除粮料院帮助审核、左藏库所支付之外，国家内库还有添给，其数额多少外庭就不知道了。因而想起神宗熙宁初年，神宗曾对王安石说，如今财富并不是不丰富，但不能节制使用，这样怎么能供给充足呢？宫中一个私人的俸禄，有达八十贯的，嫁一个公主，费用就达七十万贯，沈贵妃的食料钱每月有八百贯。听说太宗时，宫中的人只穿皂色粗绢短便衣，即使如此元德皇后还常因为有人穿金线的衣服而怒斥其奢侈。仁宗初定了公主的俸禄，开始问献穆大公主，问了几遍才说了个数，当时仅有五贯。过去，宦官的月俸只有七百钱。从礼节上说与其奢侈毋宁俭朴，这是美德好事。一时皇上旨意如此，但没有多少人遵照执行。拿今天相比，超过从前何止十倍百倍啊！

蜀茶法

【原文】 蜀道诸司，唯茶马一台，最为富盛，茶之课利多寡，与夫民间利疚，他邦无由可知。予记《东坡集》有《送周朝义守汉州》诗云：“茶为西南病，氓俗记二李、何人折其锋，矫矫六君子。”注：“二李，杞与稷也。六君子，谓思道与侄正孺、张永徽、吴醇翁、吕元钧、宋文辅也。”初，熙宁七年，遣三司

干当公事李杞经画买茶，以蒲宗闵同领其事。蜀之茶园不殖五谷，唯宜种茶，赋税一例折输，钱三百折绢一匹，三百二十折襖一匹，十钱折绵一两，二钱折草一围，凡税额总三十万。杞创设官场，岁增息为四十万。其输受之际，往往压其斤重，侵其加直。杞以疾去，都官郎中刘佐体量，多其条画。于是宗闵乃议民茶息收十之三，尽卖于官场，蜀茶尽榷，民始病矣。知彭州吕陶言：“天下茶法既通，蜀中独行禁榷。况川峡四路所出茶货，比方东南诸处，十不及一。诸路既许通商，两川却为禁地，亏损治体，莫甚于斯。且尽榷民茶，随买随卖，或今日买十千，明日即作十三千卖之，比至岁终，不可胜算，岂止三分而已。佐、杞、宗闵作为敝法，以困西南生聚。”佐坐罢去，以国子博士李稷代之，陶亦得罪。侍御史周尹复极论榷茶为害，罢为湖北提点刑狱。利路漕臣张宗谔、张升卿，复建议废茶场司，依旧通商。稷劾其疏谬，皆坐贬秩。茶场司行札子督绵州彰明县，知县宋大章缴奏，以为非所当用。稷又诋其卖直钓奇，坐冲替。一岁之间，通课利及息耗至七十六万缗有奇，诏录李杞前劳而官其子。后稷死于永乐城，其代陆师闵言其治茶五年，获净息四百二十八万缗，诏赐田十顷。凡上所书，皆见于国史。坡公所称思道乃周尹，永徽乃二张之一，元钧乃吕陶，文辅乃大章也，正孺、醇翁之事不著。

【译文】 管理蜀地的各种机关，唯有茶马一台负责茶叶收购，最为富盛，茶叶方面得利多寡，和民众的利害密切相关，其内情外地大都不知道。我记得《东坡集》中有《送周朝义守汉州》诗一首，诗中说：“茶为西南病，氓俗记二李。何人折其锋，矫矫六君子。”下面的注解是：“二李，指的是李杞和李稷。六君子，指的是思道与其侄正孺，还有张永徽、吴醇翁、吕元钧、宋文辅等六人。”开始时，在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派遣三司干当公事李杞负责买茶事宜，并让蒲宗闵共同负责。蜀地的茶园不生长五谷，只适宜种茶，赋税一律折合成钱，三百钱折合一匹绢，三百二十钱折绢一匹，十钱折绵一两，二钱折草一捆，税额总共达三十万。李杞创设了官场，每年增加收入四十万。在收购税赋时，往往压斤两，从中渔利。李杞因疾病离任，都官郎中刘佐假装体量下情，定了许多具体措施。于是蒲宗闵就提议民间茶叶收取利息十分之三，全部卖给官场，蜀地产的茶叶全部由官场专卖，老百姓更为难以承受。彭州知州吕陶进言：“国家的茶法已经通行，只有蜀中单独实行专卖。川峡四路所产的茶叶，与东南各地相比，还不及十分之一。其他地方已经允许通商，两川之地却仍为禁地，伤害国家和民众，没有比这再严重的了。况且全部专卖民众的茶叶，随买随卖，有的今天以一万买进，明天就以一万三千的价格卖出，到了年终，赢利就算不清，岂止是三分利。刘佐、李杞，蒲宗闵的制定的是有害于民众的做法，严重困扰

了西南民众的生计。”于是刘佐被罢免了职务，让国子博士李稷接替其职，但吕陶也被治罪。侍御史周尹又大力论述专卖茶叶的害处，被贬为湖北提点刑狱。利路漕臣张宗谔和张升卿二人，又建议废除专门管茶的部门，依旧恢复茶叶通商。李稷弹劾他们疏忽荒谬，结果二人都被贬官。茶场司发出公文督促绵州彰明县，知县宋大章启奏，认为实行专卖不当。李稷又诬蔑陷害宋大章言辞猎奇，因此获罪受到惩处。一岁之间，在专卖茶叶方面获利七十六万串，李稷可谓有奇功，皇上下诏记录李杞的前功并为他儿子封官。后来李稷死在永乐城，代替他的陆师闵上奏说他管理茶叶专卖五年，共上缴净利四百二十八万串，皇上下诏赐田地十顷。以上所写的事实，在国史中都可以看到。东坡先生所说的思道是指周尹，永徽是指二张之一，元钧就是吕陶，文辅就是宋大章，正孺、醇翁二人的事情未见于记载。

判府知府

【原文】 国朝著令，仆射、宣徽使，使相知州、府者为判，其后改仆射为特进，官称如昔时。唯章子厚罢相守越，制词结尾云：“依前特进知越州。”虽曰黜典，亦学士院之误。同时执政蒋颖叔以手简与之，犹呼云判府，而章质夫只云知府，盖从其实，予所藏名公法书册有之。吾乡彭公器资有遗墨一贴，不知与何人？其辞曰：“某顿首，知郡相公阁下。”是必知州者，故亦不以府字借称。今世蕞尔小垒，区区一朝官承乏作守，吏民称为判府，彼固偃然居之不疑。风俗淳浇之异，一至于此！

【译文】 宋朝的法令规定，仆射、宣徽使、使相出任知州知府的官同称为判，后来把仆射改为特进，官称与以前相同。唯有章子厚罢去相职到越地任郡守，任命书的结尾说：“依照旧的办法特进越州知州。”虽然说是黜免之典，也是学士院的失误。同时的执政蒋颖叔写信给他，还是称呼判府，而章质夫只说知府，大概根据实际需要，我所保存的名公法书册上有这些书信。我的同乡彭器资有遗留的墨宝一帖，不知是写给谁的。上边写道：“某顿首，知郡相公阁下。”这一定是写给知州，所以也不用府字借称。如今很小的一个地方，区区一个朝官承命来做知府，官吏和民众要称为判府，他们也就心安理得地接受。世风日下，与以前相比的差异，竟到了这等地步！

歌扇舞衣

【原文】 唐李义山诗云：“镂月为歌扇，裁云作舞衣。”同时人张怀庆窃为己作，各增两字云：“生情镂月为歌扇，出性裁云作舞衣。”致有生吞活剥之诮。予又见刘希夷《代闺人春日》一联云：“池月怜歌扇，山云爱舞衣。”绝相似。杜老亦云：“江清歌扇底，野旷舞衣前。”储光羲云：“竹吹留歌扇，莲香入舞衣。”然则唐诗人好以歌扇、舞衣为对也。

【译文】 唐代李义山（李商隐）诗说：“镂月为歌扇，裁云作舞衣（雕刻明月成为唱歌遮脸用的扇子，剪裁云彩作为跳舞的衣裳）。”同时人张怀庆窃为自己的作品，各增了两个字说：“生情镂月为歌扇，出性裁云作舞衣。”招来了生吞活剥的讥诮。我又见到刘希夷《代闺人春日》一联说：“池月怜歌扇，山云爱舞衣（看到池中的月亮让人爱上歌扇，看到山上的云彩让人爱惜舞衣）。”这和李义山的诗绝对相似。杜老（杜甫）也说：“江清歌扇底，野旷舞衣前（清澈的江水在歌扇底下，宽旷的田野在舞衣之前）。”储光羲说：“竹吹留歌扇，莲香入舞衣（笛声留在歌扇中，莲香进入舞衣中）。”那么，唐代人喜欢歌扇、舞衣为对了。

官会折阅

【原文】 官会子之作，始于绍兴三十年，钱端礼为户部侍郎，委徽州创样撩造纸五十万，边幅皆不剪裁。初以分数给朝士俸，而于市肆要闹处置五场，辇见钱收换，每一千别输钱十，以为吏卒用。商贾入纳，外郡纲运，悉同见钱。无欠数赔偿及脚乘之费，公私便之。既而印造益多，而实钱浸少，至于十而损一，未及十年，不胜其弊。寿皇念其弗便，出内库银二百万两售于市，以钱易楮焚弃之，仅解一时之急，时乾道三年也。淳熙十二年，迈自婺召还，见临安人揭小贴，以七百五十钱兑一楮，因入对言之，喜其复行。天语云：“此事唯卿知之，朕以会子之故，几乎十年睡不着。”然是后曩弊又生，且伪造者所在有之。及其败获，又未尝正治其诛，故行用愈轻。迨庆元乙卯，多换六百二十，朝廷以为忧，诏江、浙诸道必以七百七十钱买楮币一道。此意固善，而不深思，用钱易纸，非有微利，谁肯为之？因记崇宁四年有旨，在京市户市商人交子，凡一千

许损至九百五十，外路九百七十，得贸鬻如法，毋得辄损，愿增价者听。盖有所赢缩，则可通行，此理固易晓也。

【译文】 官方纸币的印制，开始于宋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年）。钱端礼任户部侍郎，委托徽州设计样式并造纸币五十万，边幅都不剪裁。开始以一定数额发给朝中官吏作为俸禄，而且在市内热闹处设置五个场所，把纸币装在官方车上，见钱就收换，每一千钱另加十钱，作为吏卒费用。商人们的收入，外地郡的纲运，会子钱和现钱一样。没有拖欠加倍偿还及搬运的费用，公私都很方便。接着印造的越来越多，而实际的钱就少了，以至于损失十分之一，不到十年，各种弊端都来了。孝宗皇帝考虑到不便，就从内库拨出二百万两银子销售给市场，将钱换来的纸币焚烧掉，这也只能缓解一时危机，这是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的事。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年），我洪迈从婺州（今浙江金华）召回京城，看到杭州贴有小告示，用七百五十钱兑换一张纸币，于是，就入朝廷禀报给了皇上，为纸币再用感到高兴。皇上对我说：“这件事只有你知道，朕因纸币的缘故，几乎十年睡不着觉。”但是，此后旧的弊端又出现了，而且伪造纸币的人的处所都有。等到被抓获后，也没有严厉惩处，所以法律的威慑作用更小了。到了宁宗庆元元年（1195年），最多六百二十钱就可换一道纸币，朝廷更为担忧，下诏命令江浙道一定要用七百七十钱才买一道纸币。这样做用心是好的，但没有深思，用钱换纸，又没有多大利息，有谁肯去换呢？因此，想起崇宁四年（1105年）徽宗曾经下令，在京城市场上商人可以交换纸币，一千可减少为九百五十，外地可九百七十，可以依照法令进行交易，不可任意减少，愿意增加价格的听便。大概只要有所赢利，就可实行，这个道理本来是不难明白的。

飞邻望邻

【原文】 自古所谓四邻，盖指东西南北四者而言耳。然贪虐害民者，一切肆其私心。元丰以后，州县榷卖坊场，而收净息以牧役，行之浸久，弊从而生。往往鬻其抵产，抑配四邻，四邻贫乏，则散及飞邻、望邻之家，不复问远近，必得偿乃止。飞邻、望邻之说，诚所未闻。元璽元年，殿中侍御史吕陶奏疏论之，虽尝暂革，至绍圣又复然。

【译文】 自古以来所谓四邻，都是指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邻居。但是那些残忍贪心为害百姓的人，所作所为都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心。神宗元丰以后，州

县都设立专卖坊场，靠长取利息来招募兵役，这个办法实行时间一长，弊端也就产生了。贪官污吏往往卖自己的固定资产，又强迫四邻给自己钱财，如果四邻贫穷，就扩散到飞邻、望邻，不再问远近，一定得到补偿才罢休。飞邻、望邻的说法，实在是闻所未闻。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殿中侍御史吕陶在奏疏中有过论述，虽然曾经在短时间内被整顿了一下，但到了绍圣年间又死灰复燃。

衙参之礼

【原文】 今监司、郡守初上事，既受官吏参谒，至晡时，僚属复伺于客次，胥吏列立庭下通刺曰衙，以听进退之命，如是者三日。如主人免此礼，则翌旦又通谢刺。此礼之起，不知何时。唐岑参为虢州上佐，有一诗，题为《衙郡守还》，其辞曰：“世事何反复，一身难可料。头白翻折腰，还家私自笑。听嗟无产业，妻子嫌不调。五斗米留人，东溪忆垂钓。”然则由来久矣。韩诗曰：“如今便别官长去，直到新年衙日来。”疑是谓月二日也。

【译文】 现在的监司、郡守们初上任当政时，总是先接受地方官吏的参拜谒见，到了午后三时，属僚们才在下榻的宾馆伺候，胥吏们列队站立在庭下按次序拜访，由门人通报，进退完全听从命令，这样要持续三天。如果主人要免去这种礼节，那么第二天一早还要送来谢贴。这种礼节不知兴于什么时候。唐代岑参任虢州上佐时，有一首诗题为《衙郡守还》，诗中写道：“世事何反复，一身难可料。头白翻折腰，还家私自笑。所嗟无产业，妻子嫌不调。五斗米留人，东溪忆垂钓。”可见这种礼节由来已久。韩愈也有诗说：“如今便别官长去，直到新年衙日来。”疑为是指的正月初二。

卷十五

内职命词

【原文】 内庭妇职迁叙，皆出中旨，至中书命词。如尚书内省官，固知其为长年习事，如司字、典字、掌字，知其为主守之微者。至于红紫霞帔郡国夫人，则其年龄之长少，爵列之崇卑，无由可以测度。绍兴二十八年九月，仲兄以佐史直前奏事，时兼权中书舍人，高宗圣训云：“有一事待与卿说，昨有宫人宫正者封夫人，乃宫中管事人，六十余岁，非是嫔御，恐卿不知。”兄奏云：“系王刚中行词，刚中除蜀帅，系臣书黄，容臣别撰入。”上颌首。后四日，经宴留身奏事，奏言：“前日面蒙宣谕，永嘉郡张夫人告词，既得圣旨，即时传旨三省，欲别撰进。昨日宰臣传圣旨，令不须别撰。”上曰：“乃皇后辇中老管事人，今六十六岁，宫正乃执事者，昨日宰执奏欲换告，亦无妨碍，不须别进。今已年老多病，但欲得称呼耳。”盖昨训词中称其容色云。

【译文】 宫廷内部女官的迁升，都是出于皇上的旨意，到中书写成文字。如尚书内省官，本来就知道他是长年办事，如司字、典字、掌字，就知道他是为皇上保守精妙的。至于说到红紫霞帔的郡国夫人，那么她们年龄的长少、爵位的崇卑，没有办法可以测度出来。宋高宗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九月，我二哥洪遵以左史的身份向皇上奏事，当时他也兼任中书舍人之职，高宗圣训说：“有一件事我和卿说一下，昨天有个宫正封为夫人，她在宫中管事，六十多岁，不是嫔妃，恐怕卿不一定知道。”我二哥启奏说：“这件事原本由王刚中起草诰命，刚中被封为蜀帅，便由臣抄写在黄纸上，请容臣再撰写进呈。”皇上点了点头。四天后，留下我二哥议事，他又启奏：“前几天臣当面蒙皇上宣谕，永嘉郡张夫人的告词，得到圣旨以后，马上就传旨给三省，打算另外撰进去。昨天宰臣传下圣旨，令不须再另外撰写了。”皇上说：“这人是皇后宫中的老管事人，今年六十六岁，宫正就是宫中办事的人，昨天宰执奏打算换告词，也没什么妨碍，不必再特别撰进了。她现在已是年老多病，仅仅是想得一个称呼而已。”大概昨天是因为训词中提到了她的容貌姿色。

蔡京除吏

【原文】 唐天宝之季，杨国忠以右相兼吏部尚书，大集选人注拟于私第。故事，注官讫，过门下侍中、给事中，国忠呼左相陈希烈于座隅（时改侍中为左相）。给事中有列，曰：“既对注矣，过门下了矣。”吏部侍郎二人与郎官同咨事，趋走于前，国忠夸谓诸妹妹曰：“两个紫袍主事何如？”史策书此，以见国忠颺政舞权也。然犹令侍中、给事同坐，以明非矫。若蔡京之盗弄威柄，则又过之。政和中，以太师领三省事，得治事于家。弟卞以开府在经筵，尝挟所亲将仕郎吴说往见，坐于便室，设一桌，陈笔砚，置玉版纸阔三寸者数十片于上。卞言常州教授某人之淹滞，曰：“自初登科作教官，今已朝奉郎，尚未脱故职。”京问：“何以处之？”卞曰：“须与一提学。”京取一纸，书其姓名及提举学事字而缺其路分，顾曰：“要何地？”卞曰：“其家极贫，非得俸入优厚处不可。”于是书“河北西路”字，付老兵持出。俄别有一兵赍一双絨及紫匣来，乃福建转运判官直龙图阁郑可简，以新茶献，即就可漏上书“秘撰运副”四字授之。卞方语及吴说曰：“是安中司谏之子，颇能自立。且王逢原外孙，与舒王夫人姻眷，其母老，欲求一见阙省局。”京问：“吴曾踏逐得未？”对曰：“打套局适阙。”又书一纸付出。少顷，卞目吴使先退。吴之从姊嫁门下侍郎薛昂，因馆其家，才还舍，具以告昂，叹所见除目之迅速。昂曰：“此三者已节次书黄矣。”始知国忠犹落第二义也。

【译文】 唐代天宝末年，杨国忠以右相兼吏部尚书，盛大地聚集应试获选的人在他私人住宅中考询并拟定官职。依过去事例，授官职完了，不要经过门下省侍中、给事中审定，杨国忠就唤左相陈希烈在座角（那时改侍中为左相），给事中也在列，说：“已经面对着拟定官职了，也就是经过门下省审定完了。”吏部侍郎二人和郎官同处在被咨询事件的地位，在他们面前奔走，杨国忠夸耀着对各位妹妹说：“两个紫袍主事怎么样？”史书中写这件事，为了显示杨国忠的专政弄权。然而杨国忠尚且令侍中、给事中一同在坐，也为了显示他的拟定官职并非假托。至于说到蔡京的盗弄权柄，则又超过了杨国忠。徽宗（赵佶）政和中，以蔡京为太师统领三省事，可以在家办理公事。他的弟弟蔡卞以开府在经筵官任，曾经挟持所亲近的将仕郎吴说去见蔡京，蔡京坐在供休息的房间里，里面放着一张桌子，陈列着笔砚，在桌上放置着阔三寸的洁白的精良宣纸几十张。蔡卞说及常州教授某某人的沉抑下僚而不得升迁时说：“从初次登科作教官，

如今已为朝奉郎，但还没有脱去旧职。”蔡京问道：“用什么官来安置他？”蔡卞说：“须要给他一个提学。”蔡京拿过一张纸，写了他的姓名及提举学事几个字，空下了他所分的路名，回头看着蔡卞说：“要什么地方？”蔡卞说：“他家里极穷，非得俸禄收入优厚的地方不可。”于是又写了“河北西路”几个字，交付给老兵拿了出去。一会儿另有一兵带着一封书信及紫色匣子走进来，乃是福建转运判官直龙图阁郑可的书信，以新茶献上，蔡京马上就在郑可书信的空隙处写上“秘撰运副”（秘阁修撰充转运副使）四个字交给他。这时蔡卞才说到吴说，他介绍说：“他是安中司谏的儿子，颇能自立。而且是王逢原的外孙，和舒王（王安石）夫人是姻亲，他的母亲年老，想求得一个现缺的省局官员。”蔡京问道：“吴曾经寻访得有空缺的吗？”回答说：“打套局刚好有缺。”蔡京又写了一纸交付出去。过了一会儿，蔡卞用眼看了一下吴说，让他先出去。吴说的本家姊姊嫁给门下侍郎薛昂，因此吴说住在他家里，才回到住处，就详细地告诉了薛昂，并感叹所见开具任免名单的迅速。薛昂说：“这三个人已经按着次序写在黄纸上准备下诏了。”这才知道杨国忠还是第二等。

题先圣庙诗

【原文】 兖州先圣庙壁，尝有题诗者云：“灵光殿古生秋草，曲阜城荒散晚鸦。惟有孔林残照日，至今犹属仲尼家。”不显姓名，颇为士大夫传诵。予顷在福州，于吕虚己处，见邵武上官校书诗一册，内一篇题为《州西行》，州西者，蔡京所居处也。注云：“靖康元年作。时京谪湖湘，子孙分窜外郡，所居第摧毁，索寞殆无人迹，故为古调以伤之。”凡三十余韵，今但记其末联云：“君不见乔木参天独乐园，至今仍是温公宅。”其意甚与前相类。绍兴二十五年冬，秦桧死，空其赐宅，明年，开河，役夫犂泥土堆于墙下。天台士人左君作诗曰：“格天阁在人何在？偃月堂深恨亦深。不见洛阳图白发，但知鄱坞积黄金。直言动便遭罗织，举目宁知有照临。炙手附炎俱不见，可怜泥滓满墙阴。”语虽纪实，然太露筋骨，不若前两章浑成也。左颇有才，最善谗，二十八年，杨和王之子被，除权工部侍郎，时张循王之子子颜、子正，皆带集英修撰，且进待制矣。会叶审言自侍御史、杨元老自给事中，徙为吏、兵侍郎，盖以缴论之故。左用歇后语作绝句曰：“木易已为工部侍，弓长肯作集英修。如今台省无杨、叶，豚犬超升卒未休。”左居西湖上，好事请谒，人或畏其口，后竟终于布衣。

【译文】 兖州先圣庙的墙壁上，曾经有人题诗说：“灵光殿古生秋草，曲

阜城荒散晚鸦。惟有孔林残照日，至今犹属仲尼家。”这首诗的作者没有署其姓名，却为文人士大夫所传诵。我不久前在福州的吕虚己家里，见到有邵武人上官校书的一本诗，其中有一篇题目是《州西行》，所谓州西，就是蔡京居住的地方。在这里作者自注说：“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作。此时蔡京被贬到湖湘，子孙分别逃窜到外郡，他原来居住的房子被拆毁，冷冷清清，无人问津，所以写一首古调抒发哀伤之情。”这首诗共有三十多韵，如今只记得最后一联是：“君不见乔木参天独乐园，至今仍是温公宅。”其表达的意思和前面的那首诗很相似。高宗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冬天，秦桧死去，他住的地方变成了空宅，第二年挖河时，民工把泥土用车子推到秦宅墙下。天台文人左君为此作诗说：“格天阁在人何在？偃月堂深恨亦深。不见洛阳图白发，但知鄱坞积黄金。直言动便遭罗织，举目宁知有照临。炙手附炎俱不见，可怜泥滓满墙阴。”语言虽然侧重纪实，但太露骨，不如前面提到的两首寓意深刻。左君颇有才气，最擅长戏谑，绍兴二十八年（1258年），杨存中的儿子杨楊，被提拔为权工部侍郎，这时循王张俊的儿子张子颜、张子正，都带集英修撰的头衔，而且进升为待制。正好叶审言从侍御史、杨元老从给事中，升迁为吏部和兵部侍郎，大盖都是由于被非议的缘故。左君用歇后语作了一首绝句：“木易已为工部侍，弓长肯作集英修。如今台省无杨叶，豚犬超升卒未休。”左君居住在西湖上，好事者请他谒见，有人畏惧他的言辞，其人竟终生都是平民布衣。

季文子魏献子

【原文】 拟人必于其伦，后世之说也，古人则不然。鲁季文子出一莒仆，而历引舜举十六相去四凶，曰：“舜有大功二十而为天子，今行父虽未获一吉人，去一凶矣，于舜之功二十之一也。”晋魏献子为政，以其子戊为梗阳大夫，谓成坭曰：“吾与戊也，县人其以我为党乎？”坭诵《大雅》文王克明克类、克长克君、克顺克比、比于文王之句，而以为九德不愆。勤施无私曰类，择善而从之曰比。言：“主之举也，近文德矣。”且季孙行父之视舜，魏舒之视文王，何啻天壤之不侔！而行父以自比，舒受人之谗不以为嫌，乃知孟子所谓：“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非过论也。

【译文】 与人相比一定要有可以比的地方，这是后代人的说法，古代人则不然。鲁国的季文子季孙行父除掉一个为害的莒地仆人，就引舜举荐十六相而除去四凶，他说：“舜立了二十件大功而当了天子，而今我行父虽然没有获得一

个贤人，却去掉一个恶人，但也是舜的功劳的二十分之一。”晋国魏献子当政，让他的儿子魏戊当梗阳大夫，魏献子对成睢说：“我给儿子戊一个县大夫官，县里人不会认为我在结党营私吧？”睢朗诵了《诗经·大雅·皇矣》中所载“文王克明克类、克长克君、克顺克比、比于文王”的记述，认为于九种德行没有违背之处。勤奋无私叫做类，择善而从叫作比。又说：“主人的举动，接近文王的德行。”季文子与舜、魏献子与文王，何止是天壤之别！但季文子以舜自比，魏献子受人阿谀奉称而不自谦，由此可知孟子所说：“颜渊说：‘舜是何等的人？我又是何等的人？有作为的人也应当这样比。’”这种论述是正确的。

尊崇圣字

【原文】 自孔子赞《易》、孟子论善信之前，未甚以圣为尊崇，虽《诗》、《书》、《礼》经所载亦然也。《书》称尧、舜之德，但曰：“聪明文思”、“钦明文思”、“浚哲文明”、“温恭允塞。”至益之对舜，始有“乃圣乃神”之语。《洪范》“睿作圣”与“恭作肃，从作，明作哲，聪作谋”，同列于五事，其究但曰“圣时风若”，咎征至以蒙为对。“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则之狂与圣为善恶之对也。《诗》曰：“国虽靡止，或圣或否。”则以圣与否为对也。下文“或哲或谋，或肃或”盖与五事略同。人之齐圣，不过“饮酒温克”而已。《左传》八恺，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周官》六德，知、仁、圣、义、忠、和，皆混于诸字中，了无所异。以故鲁以臧武仲为圣人，伯夷、伊尹、柳下惠皆曰圣，而孟子以为否。

【译文】 在孔子赞扬《易经》、孟子论善信之前，还不太以圣人为尊崇的对象，即使是《诗经》、《尚书》、《周礼》诸经中所记载的也是如此。《尚书》中称赞尧、舜的德行，只说“聪明文思”、“钦明文思”、“浚哲文明”、“温恭允塞”。到了益对舜时，才有了“乃圣乃神”之类的物扬。《洪范》中“睿作圣”和“恭作肃、从作、明作哲、聪作谋”，同列为五事，其考究只说“圣时风若”，过失的迹象用蒙为对。“只有圣不能读作狂，只有狂不能读作圣”，这就是把狂和圣分别作为与善和恶相对立的。《诗经》中说：“国虽靡止，或圣或否”。这是用圣和否相对。下文的“或哲或谋，或肃或”，大概与前面的五事差不多。人和圣人相比较，不过是“饮酒温克”罢了。《左传》中的八恺（八种快乐）指的是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周官》中的六德，指的是知、仁、圣、义、忠、和，都是混在各种字之中，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以鲁国人把臧武仲当作圣人，不少

人把伯夷、伊尹、柳下惠都当作圣人，可孟子认为不对。

滕字训

【原文】 滕之义为送，《春秋》所书，晋人卫人来滕，皆送女也。《楚辞·九章》云：“波滔滔兮来迎，鱼鳞鳞兮滕予。”其义亦同。《周易·咸》卦象曰：“咸其辅颊舌，滕口说也。”《释文》云：“滕，达也。九家皆作乘。”而郑康成、虞翻作滕，而亦训为送云。

【译文】 滕字的意义为送，《春秋》一书中所写的：晋人、卫人来滕，都是指送女。《楚辞·九章》说：“波滔滔兮来迎，鱼鳞鳞兮滕予。”（波浪滔滔来迎接，鱼儿挨着个儿来送我。按这两句见《九歌·河伯》，洪氏误记）它的意义也相同。《周易·咸》卦象说：“咸其辅颊舌，滕口说也。”（动他的面颊和舌，是为了使他张口放言。）《经典释文》说：“滕，通达。九家都作乘。”而郑康成（郑玄）、虞翻认为是滕字，而也训释为送。

大禹之书

【原文】 《夏书·五子之歌》，述大禹之戒，其前三章是也。禹之谟训，舍《虞》、《夏》二书外，他无所载。《汉·艺文志》杂家者流，有《大桾》三十七篇，云：“传言禹所作，其文似后世语。”桾，古禹字也，意必依仿而作之者，然亦周、汉间人所为，今寂而无传，亦可惜也。

【译文】 《夏书·五子之歌》，记述大禹的戒，它的前三章就是。禹的谟、训，除了《虞书》、《夏书》外，其他书没有记载。《汉书·艺文志》“杂家者流”中，有《大 》三十七篇，注说：“传说禹所作，但它的文字像后代的话。”，古禹字，猜想它一定是摹仿的作品，但也是周、汉间人所作，如今寂寞无传，也很可惜。

随巢胡非子

【原文】 《汉书·艺文志》，墨家者流，有《随巢子》六篇，《胡非子》三

篇，皆云墨翟弟子也。二书今不复存，马总《意林》所述，各有一卷，随巢之言曰：“大圣之行，兼爱万民，疏而不绝，贤者欣之，不肖者怜之。贤而不欣，是贱德也，不肖不怜，是忍人也。”又有“鬼神贤于圣人”之论，其于兼爱、明鬼，为墨之徒可知。胡非之言曰：“勇有五等：负长剑，赴榛薄，折兕豹，搏熊羆，此猎徒之勇也；负长剑，赴深渊、折蛟龙，搏鼉鼉，此渔人之勇也；登高危之上，鹄立四望，颜色不变，此陶岳之勇也；剡必刺，视必杀，此五刑之勇也；齐威公以鲁为南境，鲁忧之。曹刿匹夫之士，一怒而劫万乘之师，存千乘之国，此君子之勇也。”其说亦卑陋无过人处。

【译文】 《汉书·艺文志》中，记载墨家的著作有《随巢子》六篇，《胡非子》三篇，都说是为墨翟的弟子所作。这两部书现在都不存在了，马总在《意林》中记载说各有一卷，随巢说：“圣人的行为，兼爱万民，即使稀疏也不会断绝，贤人欣喜，不肖之人也会产生怜悯之心。贤人若不欣喜，这就是低贱的品德，不肖之人也不起怜悯之心，这是残忍的人。”还说“鬼神贤于圣人”，这里说有兼爱、明鬼，可见是为墨家弟子所作。胡非说：“勇敢有五个等级：手持长剑，奔赴草丛，斩虎豹，与熊羆搏斗，这是猎人的勇敢；背负长剑，奔赴深渊，斩蛟龙，斗鼉鼉，这是渔人的勇敢；登上高峰危崖，极目四望，面不改色心不跳，这是游山人的勇敢；攻击就一定拼刺，看见就一定杀害，这是五刑人的勇敢；齐威公以鲁国为齐国南边的边境，鲁国对此担忧。曹刿作为一个士兵，一怒而劫持大国万乘之师，而保存了自己的千乘小国，这是君子的勇敢。”这种说法，并没有什么高明过人之处。

别国方言

【原文】 今世所传扬子云《蜀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凡十三卷，郭璞序而解之。其末又有汉成帝时刘子骏与雄书，从取《方言》，及雄答书。以予考之，殆非也。雄自序所为文，《汉史》本传但云：“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苍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雄平生所为文尽于是矣，初无所谓《方言》。《汉·艺文志》小学有《训纂》一篇。儒家有雄所序三十八篇，注云：“《太玄》十九，《法言》十三，乐四，箴二。”杂赋有雄赋十二篇，亦不载《方言》。观其答刘子骏书，称“蜀人严君平”，按君平本姓庄，汉显帝讳庄，始改曰“严”。《法言》所称“蜀庄沈冥，蜀

庄之才之珍，吾珍庄也”，皆是本字，何独至此书而曰“严”。又子骏只从之求书，而答云：“必欲胁之以威，陵之以武，则缢死以从命也！”何至是哉？既云成帝时子骏与雄书，而其中乃云孝成皇帝，反复抵牾。又书称“汝、颍之间”，先汉人无此语也，必汉、魏之际，好事者为之云。

【译文】 如今世上所流传的扬子云（扬雄）的《谏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共十三卷，郭璞写了序并作了注解。书末又有汉成帝（刘骘）时刘子骏（刘歆）给扬雄的信，跟他求取《方言》，以及扬雄的回信。依照我的考证，恐怕是不对的。扬雄自序他所作的文字，《汉书》本传只说：“经书没有大于《易》。所以写了《太玄》；传没有大于《论语》，所以写了《法言》；史篇没有善于《仓颉》，所以写了《训纂》；箴莫善于《虞箴》，所以写了《州箴》；赋没有深于《离骚》，反其意而广之，所以写了《反离骚》、《广骚》；辞没有丽于司马相如，所以学他作了四篇赋。”扬雄平生所作的文字都在这里了，原本没有所谓《方言》一书。《汉书·艺文志》小学类有《训纂》一篇。儒家类有雄所序三十八篇，注说：“《太玄》十九篇，《法言》十三篇，乐四篇，箴二篇。”杂赋类有雄赋十二篇，也不载《方言》。观扬雄回答刘子骏书中，称“蜀人严君平”，按君平本来姓庄，汉显帝（即明帝刘庄）讳庄，才改庄为“严”。《法言》所称“蜀庄沈冥，蜀庄之才之珍，吾珍庄也”（蜀人庄遵隐晦不仕，他的才能极为珍贵，我珍重庄遵。）庄遵字君平，也就是“蜀人严君平”，《法言》中都用的本字“庄”，为什么独在这封回答刘子骏的信中说“严”。又刘歆只跟他求取《方言》，而在扬雄的回信中说：“一定要用威势来胁迫我，用武力来凌辱我，我就只有吊死了来从命！”何至于这样呢？既然说成帝时刘歆给扬雄的信，而信中乃说孝成皇帝，又用了刘骘死后的谥号，反覆 牾竟至如此。又书信中说“汝、颍之间”，汉代以前的人没有这种语言，所以这封信也必然是汉、魏之间，喜欢多事的人写的。

纵臾

【原文】 《史记·衡山王传》：“日夜从容王密谋反事。”《汉书》传云：“日夜纵臾王谋反事。”如淳曰：“臾读曰勇，纵臾，犹言勉强也。”颜师古曰：“纵，音子勇反。纵臾，谓奖劝也。”扬雄《方言》云：“食閤、怱慝（音与上同），劝也。南楚凡己不欲喜，而旁人说之，不欲怒，而旁人怒之，谓之食閤，亦谓之怱慝。”今《礼部韵略》收入，《汉》注皆不引用。

【译文】 《史记·衡山王传》说：“日夜从容王密谋反事。”（日日夜夜怂恿衡山王密谋造反的事）《汉书》传中说：“日夜纵臾王谋反事。”如淳注说：“臾，读作勇，纵臾，犹如说勉强。”颜师古注说：“纵，音子勇反。纵臾，谓奖劝。”扬雄《方言》说：“食阎、怂勇（原注：音与上同），劝也。南楚地方凡是自己不想喜欢，而别人让你喜欢，自己不想发怒，而别人让你发怒，这种现象叫食阎，也叫怂恿。”现在的《礼部韵略》收入，而《汉书》各家的注都不引用。

总持寺唐敕牒

【原文】 唐世符贴文书，今存者亦少，隆兴府城内总持寺有一碑，其前一纸，乾符三年，洪州都督府牒僧仲暹；次一纸，中和五年，监军使贴僧神遇；第三纸，光启三年十一月，中书门下牒江西观察使。其后列衔者二十四人，曰：中书侍郎兼兵部尚书平章事杜逊能，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平章事孔纬，此后检校左仆射一人，检校司空二人，检校司徒八人，检校太保三人，检校太傅一人，检校太尉三人，检校太师一人，皆带平章事著姓，太保兼侍中昭度不书韦字，检校太师兼侍中一人，太师兼中书令一人，皆不著姓，舍杜、孔、韦三正相之外，余皆小书使字，盖使相也。后又有节度使钟传两牒，字画端劲有法，如士人札翰，今时台省吏文不能及也。嘉懿二年，洛阳人职方员外郎李上交来豫章东湖，见所藏真迹，为辨之云：二十一人者，乃张浚、朱玫、李福、李可举、李罕之、陈敬瑄、王处存、王徽、曹诚、李匡威、李茂贞、王重荣、杨守亮、王璠、乐彦祯、朱全忠、张全义、拓跋思恭、时溥、王铎、高骈也。而注云：“见《僖宗纪》及《实录》。”以予考之，自三相及拓跋、乐颜祯、时溥、张浚、朱全忠、李茂贞诸人外，如李克用、朱瑄、王行瑜皆是时使相，不应缺，而朱玫、王铎、王重荣、李福皆已死，所谓太师中书令者，史策不载，唯陈敬瑄检院此官而兼中令，最后者其是欤？他皆不复可究质矣。

【译文】 唐代的各种符贴文件，保存至今的也很少，隆兴府（今江西南昌）城内的总持寺里有一座碑，碑前有一张纸，是唐僖宗乾符三年（876年）洪州（今江西南昌）都督府写给仲暹僧人的牒子；另一张纸，是僖宗中和五年（885年），监军使写给神遇僧人的贴子；还有一张纸，是僖宗光启三年（887年）十一月，中书门下写给江西观察使的牒子。后面列着官衔的人有二十四个，他们是：中书侍郎兼兵部尚书平章事杜逊能，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平章事孔纬，这后面是检校左仆射一人，检校司空二人，检校司徒八人，检校太保三人，检

校太傅一人，检校太尉三人，检校太师一人，都带着平章事三字并写着姓，太保兼侍中昭度不写韦字，检校太师兼侍中一人，太师兼中书令一人，都没有写姓，除了杜逊能、孔纬、韦昭度三位正相之外，其他人的官衔名字都用小字写着“使”字，大概是指的使相。后边又有节度使钟传的两张书札，字体端正有力，书法娴熟，很像文人的信札，是当今台省官吏的文书比不上的。宋仁宗嘉祐二年（1027年），有个名叫李上交的洛阳人，官职是职方员外郎，他来到豫章东湖，看到了所珍藏的唐代文书真迹，就考辨了一番。他认为，这二十一人应该是：张浚、朱玫、李福、李可举、李罕之、陈敬瑄、王处存、王徽、曹诚、李匡威、李茂贞、王重荣、杨守亮、王硕、乐彦祯、朱全忠、张全义、拓跋思恭、时溥、王铎、高骈。而且还注明出处说：“见《僖宗纪》及《实录》。根据我的考证，除杜逊能、孔纬、韦昭度三位正相以及拓跋思恭、乐彦祯、时溥、张浚、朱全忠、李茂贞等人以外，如李克用、朱勔、王行瑜等都是当时的使相，不应当空缺，而朱玫、王铎、王重荣、李福等人都已经死了，所说的太师中书令，史书上没有记载，只有陈敬瑄是检校兼中书令，难道最后一个人就是他吗？其他人都不能再搞清楚了。

禁旅迁补

【原文】 国朝宿卫禁旅迁补之制，以岁月功次而递进者，谓之排连。大礼后，次年殿庭较艺，乘舆临轩，曰“推垛子”。其岁满当去者，随其本资，高者以正任团练使、刺史补外州总管、钤辖，小者得州都监，当留者于军职内升补，谓之转员，唯推垛之日，以疾不赶赴者，为害甚重。绍兴三十二年四月，予以右史午对时将有所事，与上介张才甫同饭于皇城司。有一老兵，幞头执黑杖子，拜辞皇城干办官刘知羣，泣涕哽噎，刘亦为恻然。予问其故，兵以杖相示，满其上皆揭记士卒姓名营屯事件。云身是天武第一军都指挥使，曾立战功，积官至遥郡团练使，今年满当出职，若御前呈试了，便得正任使名，而为近郡总管、不幸小疾，遂遭拣汰，只可降移外藩将校，在身官位一切除落，方伏事州都监听管营部辖。三十年勤劳，一旦如扫，薄命不偶，至于如是。坐者同叹息怜之。按崇宁四年有诏，诸班直尝备宿卫，病告满尚可疗者，殿前指挥使补外牢城指挥使，盖旧法也。

【译文】 宋朝内宫警卫、禁旅的提升补官制度，主要根据时间长短和功劳大小而决定递进，这就是所说的排连。举行了大的典礼之后，第二年就要在殿

庭比试武艺，皇上亲自考试，这叫做“推垛子”。其男年限已满应当离开的，依据他本身的条件，武艺高超的任命为正使团练使、刺史补外州总管、钤辖，武艺低的任命为州都监，应当留下的在军职内升补，这叫做转员。只有在“推垛子”那天，因疾病不能参加的人，可就倒霉了。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四月，我因为右史在午对时将任务，与皇上派的张才甫在皇城司一起吃饭。有一个老兵，裹着头巾手持黑色杖子，前来向皇城干办官刘知盍辞谢，说话时痛哭流涕，刘知盍也深为悲痛。我询问其中的原因，那老兵把手中黑杖拿给我看，上面都是刻的士卒的姓名和兵营里的事情。他说自己曾是天武第一军都指挥使，屡立战功，因此而当上了遥郡团练使。今年本来年限已满该出去任职，如果在御前比试了，就会得到正任使的职位，从而做近郡总管。不幸的是因为生了一场小病，误了“推垛子”，于是就被淘汰了，只能降职转为外藩将校，而且现在身上的一切官职全部免去，归州都监听管营部管辖。三十年的辛勤苦，一日之间一扫而光，真是命薄倒霉，以至于走到这等地步。在坐的人听了无不为之同情叹息。按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皇上有诏，说各班直尝备宿卫，若因病告假期满还可以治疗的，殿前指挥使可补为外牢城指挥使，这大概是旧的制度和办法。

六言诗难工

【原文】 唐张继诗，今人所传者唯《枫桥夜泊》一篇，荆公《诗选》亦但别诗两首，乐府有《塞孤》一篇。而《皇甫冉集》中，载其所寄六言曰：“京口情人别久，扬州估客来疏。潮至浔阳回去，相思无处通书。”冉酬之，而序言：“懿孙，予之旧好，只役武昌，有六言诗见忆，今以七言裁答，盖拙于事者繁而费。”冉之意，以六言为难工，故衍六为七，然自有三章曰：“江上年年春早，津头日日人行。借问山阴远近，犹闻薄暮钟声。”“水流绝涧终日，草长深山暮云。犬吠鸡鸣几处，条桑种杏何人？”“门外水流何处，天边树绕谁家。山绝东西多少，朝朝几度云遮。”皆清绝可画，非拙而不能也。予编唐人绝句，得七言七千五百首，五言二千五百首，合为万首。而六言不满四十，信乎其难也。

【译文】 唐代张继的诗，令人所传诵的只有《枫桥夜泊》一篇，荆公（王安石）《诗选》也只是加选了另外两首，乐府还有《塞孤》一篇。而在《皇甫冉集》中，载了他寄给皇甫冉的一首六言诗，诗说：“京口情人别久，扬州估客来疏。潮至浔阳回去，相思无处通书（在京口的故人已分别好久，扬州的客商往

来已经稀疏。潮到浔阳回去，相思却无处通信)。”皇甫冉作了酬答，序言说：“懿孙（张继），我的故友，往役于武昌，有六言诗回忆到我，今用七言诗裁笺作答，大概是做事笨拙的人既繁且费。”皇甫冉的意思，是因为六言诗难于工巧，所以推衍六言为七言，然而他自己也写了三篇，诗说：“江上年年春早，津头日日人行。借问山阴远近，犹闻薄暮钟声（江上每年春天早到，渡头每天有人来往。请问去山阴的路程远近，还听到傍晚的钟声）。”“水流绝涧终日，草长深山暮云。犬吠鸡鸣几处，条桑种杏何人（绝涧终日流水不断，草长深山笼罩着暮云。几处传来鸡鸣狗叫，采桑种杏的是什么人）？”“门外水流何处，天边树绕谁家。山绝东西多少，朝朝几度云遮（门外流水流向何处，天边树木缠绕是哪一家。山尽处东西方向还有多少里程，天天有几次被云遮挡）。”都写得清绝可以入画，不是笨而不能写。我编唐人绝句，得到七言绝句七千五百首，五言绝句二千五百首，合为一万首。而六言绝句不到四十首，六言绝句的确难写。

杯水救车薪

【原文】 孟子曰：“仁之胜不仁也，如水胜火，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不熄，则谓之水不胜火。”予读《文子》，其书有云：“水之势胜火，一勺不能救一车之薪；金之势胜木，一刃不能残一林；土之势胜水，一块不能塞一河。”文子周平王时人，孟氏之言盖本于此。

【译文】 孟子说过：“仁义战胜不仁不义，就像水战胜火，现在的人讲仁义，好比拿一杯水去浇一车柴禾所燃的火，浇不灭，就说水不能胜火。”我读《文子》时，其中有一段说：“虽然水能战胜火，但一勺水无论如何不能扑灭一车柴禾燃烧的火；金可以战胜木，但一把刀无法砍掉一片树林；土可以战胜水，但一块土无法堵塞一条河。”文子是周朝平王时期的人，孟子的话大概是从文子那里来的。

拙一人之下

【原文】 萧何谏高祖受汉王之封，曰：“夫能拙于一人之下，而信于万乘之上者，汤、武是也。”《六韬》云：“文王在岐，召太公曰：‘吾地小。’太公曰：‘天下有粟，贤者食之，天下有民，贤者牧之。屈于一人之下，则申于万人之上，

唯圣人能为之。’”然则萧何之言，其出于此，而《汉书》注释诸家，皆不曾引证。

【译文】 萧何劝谏汉高祖刘邦接受被封为汉王时说：“能够屈居一个人之下，而威信在万乘之国之上的人，只有商汤、周武王。”《六韬》中也说：“文王在岐地（今陕西岐山）时，召来姜太公说：‘我们的地盘太小了。’姜太公说：‘天下有粮食，贤德的人就可以吃；天下有老百姓，贤德的人可以统治他们。屈服就于一人之下，就能高居于万人之上，这一点只有圣人能够做到。’”可见萧何的话，是从这里引出的，而注释《汉书》的各家，都没有引证。

秦汉重县令客

【原文】 秦、汉之时，郡守县令之权极重，虽一令之微，能生死人；故为之宾客者，邑人不敢不敬。单父人吕公善沛令，辟仇从之客，沛中豪杰吏闻令有重客，皆往贺。谓以礼物相庆也。司马相如游梁归蜀，素与临邛令王吉相善，来过之，舍于都亭。临邛富人卓王孙、程郑相谓曰：“令有贵客，为具召之，并召令。”相如窃王孙女归成都，以贫困复如临邛，王孙杜门不出。昆弟诸公更谓王孙曰：“长卿人才足依，且又令客，奈何相辱如此！”注云：“言县令之客，不可以辱也。”是时为令客者如此。今士大夫为守令故人，往见者虽未必皆贤，岂复蒙此礼敬。稍或戾于法制，微有干托，其累主人必矣！

【译文】 秦、汉的时候，郡守、县令的权力极重，虽然一个小小的县令，能够让人活也能够让人死，所以作为县令的宾客，县里人不敢不敬重。单父人吕公和沛令相友好，为了避开仇家就随沛令作客，沛县中才智出众的人和官吏们听说县令有重要的客人，都去道贺。说用礼物相庆贺。司马相如游梁后回到蜀郡，他平素和临邛令王吉相友好，特来拜访他，住在都亭。临邛的富人卓王孙、程郑互相说：“县令有贵客，为他准备酒食，请他赴宴，并请县令。”司马相如偷娶了卓王孙的女儿回到了成都，因为贫困再到临邛，卓王孙闭门不出。卓王孙的兄弟及众门客轮流对卓王孙说：“长卿（司马相如）的人材足可依赖，而且又是县令的客人，为什么这样相羞辱！”注说：“说县令的客人，不可以羞辱。”那时作为县令的客人受到这样的待遇。如今士大夫作为郡守、县令的故人，去见郡守、县令的，虽然未必都是贤者，难道能再受到这等礼敬。这些故人们稍微有违反法制，或者稍微有所请求，他的连累主人也是一定的了。

之字训变

【原文】 汉高祖讳邦，荀悦云：“之字曰国。惠帝讳盈，之字曰满。”谓臣下所避以相代也。盖“之”字之义训变。《左传》：“周史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谓《观》六四变而为《否》也。他皆仿此。

【译文】 汉高祖的名叫邦，荀悦说：“之字叫做国。汉惠帝的名叫盈，之字就叫满。”这里的“之”字，就是臣下为避讳“邦”字、“盈”字所用的代替字。大概是“之”字的意思是变化。《左传》中说：“周史把《周易》献给陈侯时，陈侯让人占卜，遇到《观》之《否》。”大概是说《观》六四变而成为《否》。其他都仿效此说。

卷十六

蹇氏父子

【原文】 蹇周辅立江西、福建茶法，以害两路。其子序辰，在绍圣中，乞编类《元盥章疏案牒》，人为一帙，置在二府。由是缙绅之祸，无一得脱。此犹未足言，及居元符遏密中，肆音乐自娱。后守苏州，以天宁节与其父忌日同，辄于前一日设宴，及节日不张乐。其无人臣之义如是，盖举世未闻也。

【译文】 蹇周辅设立了江西、福建的茶法，给这两个地方带来了危害。他的儿子蹇序辰，在哲宗绍圣年间，请求编纂《元盥章疏案牒》，每个人编一帙，放置在中书省和枢密院中，从此官吏和乡绅的祸害，就没有一个能够逃脱。然而，他还不够满足，到了哲宗元符年间当上遏密中时，更是纵情用音乐来自我欢娱。后来又到处作长官，因为天宁节和他父亲的忌日是同一天，就在前一天大摆宴席，到了节日那天就不再奏乐庆贺。这个人是多么没有做人臣的仁义，大概世界上再也不会听说有这类事。

神臂弓

【原文】 神臂弓出于弩遗法，古未有也。熙宁元年，民李宏始献之入内，副都知张若水方受旨料简弓弩，取以进。其法以桑木为身，檀为矜，铁为蹬子枪头，铜为马面牙发，麻绳札丝为弦，弓之身三尺有二寸，弦长二尺有五寸，箭木羽长数寸，射二百四十余步，入榆木半粘。神宗阅试，甚善之。于是行用，而他弓矢弗能及。绍兴五年，韩世忠又侈大其制，更名“克敌弓”，以与虜金战，大获胜捷。十二年词科试日，主司出《克敌弓铭》为题云。

【译文】 神臂弓出自弩遗法，古代是没有的。熙宁元年（1068年），百姓李宏才开始献给内廷，副都知张若水刚好接受皇上旨意评选弓弩，就取来神臂弓进呈。制作的方法是用山桑木为弩身，檀木为弓的末端，铁的脚踏的蹬子和枪头，铜为马面形的弩牙，麻绳札上丝为弦，弓身三尺二寸，弦长二尺五寸，箭

木羽长数寸，能射二百四十余步，射入榆木半箭杆。神宗（赵顼）检阅试验，很喜好它。于是推行应用，而其他的弓箭赶不上它。绍兴五年（1135年），韩世忠又广大它的制作，改名为“克敌弓”，用来和金人作战，大获胜利的捷报。绍兴十二年（1142年），在词科考试日，主考官又出了《克敌弓铭》的试题。

敕令格式

【原文】 法令之书，其别有四，敕、令、格、式是也。神宗圣训曰：“禁于未然之谓敕；禁于已然之谓令；设于此以待彼之至，谓之格；设于此使彼效之，谓之式。”凡入笞杖徒流死，自例以下至断狱十有二门，丽刑名轻重者，皆为敕；自品官以下至断狱三十五门，约束禁止者，皆为令；命官庶人之等，倍全分厘之给，有等级高下者，皆为格；表奏、帐籍、关牒、符檄之类，有体制模楷者，皆为式。《元丰编敕》用此，后来虽数有修定，然大体悉循用之。今假宁一门，实载于格，而公私文书行移，并名为式假，则非也。

【译文】 法令方面的文章书写格式，共有四类，这就是常说的敕、令、格、式四种文体。宋神宗有圣训说：“禁止那些违法乱纪行为在未发生之前的文章叫做敕；对已经发生的坏行为进行制裁的文章叫做令；制定一些具体规定以防止类似事情发生的文章叫做格；设制一些做法让人们仿效的文章叫做式。”凡是属于笞、杖、徒、流、死五刑的，从例以下到断狱共有十二种，不管刑名轻重的，都属于敕；从品官以下到断狱有三十五种，凡是约束禁止的，都是令；命令官吏和平民划清等级，分清哪怕一分一厘的不同供给，凡有等级高下的，都属于格；表奏、帐籍、关牒、符檄之类的文章，凡是有体制模楷的，都叫作式。《元丰编敕》一书就是根据以上标准要求分类的，后来虽然有几次修订，但主要部分还是尚袭了下来。如现在官吏休息回家探亲的假宁一类，实际上本来是属于格的，由于公私文书太多了，并命名为式假，这是错误的。

颜鲁公戏吟

【原文】 陶渊明作《闲情赋》，寄意女色。萧统以为白玉微瑕。宋广平作《梅花赋》，皮日休以为铁心石肠人，而亦风流艳冶如此。《颜鲁公集》有七言联句四绝，其目曰：《大言》、《乐语》、《馋语》、《醉语》。于《乐语》云：“苦河既

济真僧喜，新知满座笑相视。戍客归来见妻子，学生放假偷向市。”《馋语》云：“拈抵舐指不知休，欲炙侍立涎交流。过屠大嚼肯知羞，食店门外强淹留。”《醉语》云：“逢糟遇曲便酩酊，覆车坠马皆不醒。倒著接 发垂领，狂心乱语无人并。”以公之刚介守正，而作是诗，岂非以文滑稽乎？然语意平常，无可咀嚼，予疑非公诗也。

【译文】 陶渊明写了篇《闲情赋》，寄托深意于女色。萧统认为是白玉上的微小斑点。宋广平（宋 ）写了篇《梅花赋》，皮日休认为铁石心肠人宋 ，也写得这样风流艳丽。《颜鲁公集》有七言联句四绝，它的题目是：《大言》、《乐语》、《馋语》、《醉语》。在《乐语》说：“苦河既济真僧喜，新知满座笑相视。戍客归来见妻子，学生放假偷向市。”《馋语》说：“拈襍舐指不知休，欲炙侍立涎交流。过屠大嚼肯知羞，食店门外强淹留。”《醉语》一首是：“逢糟遇曲便酩酊，覆车坠马皆不醒。倒著接梢发垂领，狂心乱语无人并。”颜真卿刚介守正，却作出这种诗，难道不是用作诗的方式来开玩笑吗？而且语意平常，没有多少韵味，我怀疑不是颜真卿的诗。

纪年用先代名

【原文】 唐德宗以建中，兴元之乱，思太宗贞观、明皇开元为不可曠及，故改年为贞元，各取一字以法象之。高宗建炎之元，欲法建隆而下字无所本。孝宗以来，始一切用贞元故事。隆兴以建隆、绍兴，乾道以乾德、至道，淳熙以淳化、雍熙，绍熙以绍兴、淳熙，庆元以庆历，元璽也。

【译文】 唐德宗因为建中、兴元年间发生了内乱，想到唐太宗贞观和明皇开元年间繁荣兴旺是不可企及的，但还是要努力追求，于是把年号又改为贞元，各取贞观、开元年号中末一个字以表示效法。宋高宗建炎的年号，是想效法宋太祖建隆年号所以用了一个建字，但下面这个炎字却没有出处。宋孝宗以来，才都效法贞元的制度和做法。所以，孝宗隆兴的年号取之于宋太祖的建隆和宋高宗的绍兴年号，孝宗的乾道年号取之于宋太祖的乾德和太宗的至道年号，孝宗的淳熙年号取之于太宗的淳化和雍熙年号，光宗的绍熙年号取之于高宗的绍兴和孝宗的淳熙年号，宁宗的庆元年号取之于仁宗的庆历和哲宗的元祐年号。

中舍

【原文】 官制未改之前，初升朝官，有出身人为太子中允，无出身人为太子中舍，皆今通直郎也。近时士大夫或不能晓，乃称中书舍人曰为中舍，殊可笑云。苏子美在进奏院，会馆职，有中舍者，欲预席。子美曰：“乐中既无箏、琶、篳、笛，坐上安有国、舍、虞、比。”国谓国子博士，舍谓中舍，虞谓虞部，比谓比部员外、郎中，皆任子官也。

【译文】 官制没有更改以前，开始升为一品以下定时入朝参见的官，试殿中举的人为太子中允，殿试没有中举的人为太子中舍，都是如今所称的通直郎。近时的士大夫有不知这一点的，就称中书舍人叫中舍，甚为可笑。苏子美（苏舜钦）在进奏院，会见馆中官员，有一中舍，想参与会见。苏子美说：“乐中既然没有箏、琵琶、篳篥、笛，坐上哪里有国、舍、虞、比。”国指国子博士，舍指中舍，虞指虞部，比指比部员外、郎中，都是因父兄功绩而授予的官员。

多赦长恶

【原文】 熙宁七年旱，神宗欲降赦，时已两赦矣。王安石曰：“汤旱，以六事自责，曰政不节与？若一岁三赦，是政不节，非所以弭灾也。”乃止。安石平生持论务与众异，独此说为至公。近者六年之间，再行覃霈。婺州富人卢助教，以刻核起家，因至田仆之居，为仆父子四人所执，投置杙臼内，捣碎其躯为肉泥，既鞠治成狱，而遇己酉赦恩获免。至复登卢氏之门，笑侮之曰：“助教何不下庄收谷？”兹事可为冤愤，而州郡失于奏论。绍熙甲寅岁至于四赦，凶盗杀人一切不死，惠奸长恶，何补于治哉？

【译文】 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天遇大旱，神宗打算颁布大赦，这一年里已经有两次大赦了。王安石建议：“商汤时遇到旱灾，汤王用六件事情没办好而自责，不是说执政不够得当吗？现在如果一年三次大赦也是执政不够得当，这不是用来消灭或减少灾害的办法。”于是神宗就放弃了这种打算。王安石平生主张的理论和观点都是力求与众不同，只有这一观点特别公允。最近六年之间，两次遇到大雨。婺州有个富人叫卢助教，靠刻核搜刮起家，因为到了佃户的家里，被父子四人捉住，投进大的石臼内，捣成了肉泥，经过审讯，已经

把父子四人定罪下狱。因遇到己酉年的大赦而获得释放。于是他们再次登卢家之门，嘲笑侮辱说：“卢助教为什么不到村庄里去收谷子呢？”这件事实在是太可恶了，州郡的官员没有人向朝廷奏报。光宗绍熙甲寅年（五年，1194年），一年内连续四次大赦，凶恶的盗贼和杀人犯全都没有判死罪，这只能是对奸贼和凶恶之徒有好处对治理国家有什么好处呢？

奏谏疑狱

【原文】 州郡疑狱许奏谏，盖朝廷之深恩。然不问所犯重轻及情理蠹害，一切纵之，则为坏法。耿延年提点江东刑狱，专务全活死囚，其用心固善。然南康妇人，谋杀其夫甚明，曲贷其命，累勘官翻以失入被罪。予守赣，一将兵逃至外邑，杀村民于深林，民兄后知之，畏申官之费，即焚其尸，事发系狱，以杀时无证，尸不经验，奏裁刑寺辄定为断配。予持敕不下，复奏论之，未下而此兵死于狱。因记元丰中，宣州民叶元，以同居兄乱其妻而杀之，又杀兄子，面强其父与嫂约契，不讼于官。邻里发其事，州以情理可悯，为上请。审刑院奏欲贷，神宗曰：“罪人已前死，奸乱之事，特出于叶元之口，不足以定罪，且下民虽为无知，抵冒法禁，固宜哀矜。然以妻子之爱、既杀其兄，仍戕其侄，又罔其父，背逆天理，伤败人伦，宜以殴兄至死律论。”此旨可谓至明矣。

【译文】 州郡的疑狱允许上奏议罪，乃是朝廷的深恩。然而不问所犯罪的轻重以及是否伤情害理，一律放纵不究，就是破坏法纪。耿延年作提点江东刑狱，专门致力于保全死囚使之活命，他的用心固然善良，然而像南康一个妇人，谋杀他的丈夫非常清楚，却曲加宽免她的性命，连累审问官反因判案错误而受罪。我守赣州时，部下一兵逃到外县，在深林中杀了村民，村民的兄长后来知道了，怕向官府告发的费用多，就焚烧了他弟弟的尸体，事发后囚禁在狱中，因为被杀时没有证明，尸体又没有经过检验上奏裁定，刑事部门就定为发配充军。我手持敕命没有下达，再上奏论述这件事请重新议刑，敕命还没有下来，兵已死在狱中。因记起在元丰年间，宣州百姓叶元。因为同住的哥哥奸污他的妻子，就把哥哥杀了，又杀了哥哥的儿子，又强迫他的父亲和嫂子订立契约，不到官府去上诉。邻居揭发了这件事，州官因情理可怜，为他上请减刑。审刑院上奏想要宽免，神宗（赵顼）说：“罪人已先死，奸乱的事情，只从叶元的口中说出来，不足以用来定罪，而且下面的小民虽然无知，触犯法禁，固然应该哀怜，然而因为妻子的爱，既杀了他的兄长，还戕害了他的侄子，又欺他的父亲，违背

天理，败坏人伦，应该用殴兄至死律论处。”这一圣旨可以说最为明察了。

医职冗滥

【原文】 神宗董正治官，立医官，额止于四员。及宣和中，自和安大夫至翰林医官，凡一百十七人，直局至祗候，凡九百七十九人，冗滥如此。三年五月始诏大夫以二十员，郎以三十员，医效至祗候，以三百人为额，而额外人免改正，但不许作官户，见带遥郡人并依元丰旧制，然竟不能循守也。乾道三年正月，随龙医官、平和大夫、阶州团练使潘攸差判太医局，请给依能诚例支破。迈时在西掖，取会能诚全支本色，因依诚系和安大夫、潭州观察使，月请米麦百余硕，钱数百千，春冬绵绢之属，比他人十倍，因上章极论之，乞将攸合得请给，令户部照条支破。孝宗圣谕云：“岂惟潘攸不合得，并能诚亦合住了。”即日御笔批依，仍改正能诚已得真俸之旨，旋又罢医官局。

【译文】 我朝神宗很注意建立健全监督管理官职制度，专门设立了医官一职，名额定为四个。到了徽宗宣和年间，从和安大夫到翰林医官一共有一百一十七人，从直局到髡候，共有九百七十九人，真可谓庞大繁多。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五月才下诏定大夫二十名，郎官三十名，医效到髡候，共三百名为限额，额外的人员一律裁去，不允许留作官户，而现在的带远郡的医职人员仍然根据元丰年间的旧制度处置，然而，这一制度竟然不能付诸实行。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正月，跟随皇上的医官、平和大夫、阶州团练使潘攸指示太医局，请求按能诚的惯例支付金额。洪迈我当时正在西掖，正好了解能诚全部支出的情况，就按能诚的情况及和安大夫、潭州观察使的情况，每月请给米麦一百多石，钱额几十万，春冬丝绸绢绵之类的东西，更是比其他人多十倍，于是就上奏朝廷，请求将潘攸的要求给予满足，命令户部照章支付。孝宗皇帝指示说：“岂只潘攸不应得到，能诚也应该停止这样的供应。”当天孝宗亲笔批复照此办理，仍然改正能诚已经得到的真实俸禄，随即又下令撤销了医官局。

切脚语

【原文】 世人语音有以切脚而称者，亦间见之于书史中，如以蓬为勃笼，磻为勃阑，铎为突落，叵为不可，团为突栾，钲为丁宁，顶为滴，角为落，

蒲为勃卢，精为即零，螳为突郎、诸为之乎，旁为步廊，茨为蒺藜，圈为屈挛，镗为骨露，窠为窟驼是也。

【译文】 人们的语音方法中有一种叫切脚（反切）的很流行，这种情形，在史书中也偶然可以见到，例如蓬的发音为勃笼，稿的读音为勃阑，铎的读音为突落，叵的读音为不可，团的读音为突栾，钲的读音为丁宁，顶的读音为滴縻，角的读音为稊落，蒲的读音为勃卢，精的读音为即零，螳的读音为突郎，诸的读音为之乎，旁的读音为步廊，茨的读音为蒺藜，圈的读音为屈挛，镗的读音为骨露，窠的读音为窟驼，即是例证。

唐世辟寮佐有词

【原文】 唐世节度、观察诸使，辟置寮佐以至州郡差掾属，牒语皆用四六，大略如告词。李商隐《樊南甲乙集》、顾云《编稿》、罗隐《湘南杂稿》，皆有之。故韩文公《送石洪赴河阳幕府序》云：“撰书辞，具马币。”李肇《国史补》，载崖州差故相韦执谊摄军事衙推，亦有其文，非若今时只以吏牒行遣也。钱武肃在镇牒钟廷翰摄安吉主簿云：“敕淮南、镇海、镇东等军节度使，牒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钟廷翰，牒奉处分，前件官儒素修身，早升官绪，寓居 水，累历星霜，克循廉谨之规，备显温恭之道。今者愿求录用，特议抡材，安吉属城印曹阙吏，俾期差摄，勉效公方，倘闻佐理之能，岂吝超升之奖？事须差摄安吉县主簿牒举者，故牒。贞明二年三月日。”牒后衔云：“使、尚父、守尚书令、吴越王押。”此牒今藏于王顺伯家，其字画端严有法，其文则掌书记所撰，殊为不工，但印记不存矣。谓主簿为印曹，亦佳。

【译文】 唐代的节度、观察诸使，从辟置寮佐以至于州郡属吏，委任的官方文书语言上都是用四六句，大概和告词差不多。李商隐的《樊南甲乙集》、顾云的《编稿》和罗隐的《湘南杂稿》，其中都有不少四六文。所以，韩愈在《送石洪赴河阳幕府序》中说：“撰写文书所用的文辞，都是用汉代的四六之句。”李肇的《国史补》中，记载崖州派遣故相韦执谊统摄军事事务时，也有这样的文章，并不是象现在这样只以吏牒的方式行文遣词。镇海镇东军节度使钱勣在委任钟廷翰代行安吉主簿的委任状中说：“敕准淮南、镇海、镇东等军节度使，现有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钟廷翰，从前以文官素养涵养自身，早就有了升官的想法，但寓居糖水之畔，经历了岁月的风霜，严格遵循廉洁谨慎的行为规范，充分显示出追求温良恭俭的愿望。现在想请求录用，特请诸位考虑量才任能，安

吉县下属的城印曹缺官吏，希望能让他补此差使，全力为公方效劳，倘若能听到他在辅佐料理方面的才能，难道还会吝嗇超拔提升的奖励吗？这件事须麻烦安吉县主簿由文件推举，所以特写此牒。贞明二年（916年）三月某日。”文章后面还写有官衔署名：“使、尚父、守尚书令、吴越王押。”字画写得端严有法，文章由掌书记撰写，极不精炼，印记已经不存在了。把主簿说成印曹，也算不错。

高子允谒刺

【原文】 王顺伯藏昔贤墨帖至多，其一曰高子允诸公谒刺，凡十六人，时公美、徐振甫、余中、龚深父、元耆宁、秦少游、黄鲁直、张文潜、晁无咎、司马公休、李成季、叶致远、黄道夫、廖明略、彭器资、陈祥道，皆元璽四年朝士，唯器资为中书舍人，余皆馆职。其刺字或书官职，或书郡里，或称姓名，或只称名，既手书之，又斥主人之字，且有同舍，尊兄之目，风流气味，宛然可端拜，非若后之士大夫一付笔吏也。蔡忠惠公帖亦有其二：一曰：“襄奉候子石兄起居，朔旦谨谒”；一曰：“襄别洪州少卿学士。”盖又在前帖三十年之先也。

【译文】 王顺伯所珍藏的先代贤人墨客的墨帖很多，其中有一幅说是高子允诸位先贤的拜谒签名，一共十六个人，他们是时公美、徐振甫、余中、龚深父、元耆宁、秦少游、黄鲁直、张文潜、晁无咎、司马公休、李成季、叶致远、黄道夫、廖明略、彭器资、陈祥道，他们都是哲宗元璽四年（1089年）的中央官员，只有彭器资一人是中书舍人，其余都是馆职。他们的签名有的写的是官职，有的写的是家乡故里的名字，有的是姓名，有的只写名字而无姓，各人手书完以后，还有主人的签字，而且有同学、尊兄等名目，才子风流的气味，跃然纸上，令人肃然起敬，与后代的士大夫们一律写上官吏职务等大为不同。蔡忠惠公襄的墨帖也有两张，一张帖子上写着：“襄奉候子石兄起居，朔旦谨谒”；另一张帖子上写着：“襄别洪州少卿学士。”大概时间在前帖的三十年之前。

蔡君谟书碑

【原文】 欧阳公作《蔡君谟墓志》云：“公工于书画，颇自惜，不妄与人书。仁宗尤爱称之，御制《元舅陇西王碑文》，诏公书之。其后命学士撰《温成

皇后碑文》，又敕公书，则辞不肯，曰：‘此待诏职也。’”国史传所载，盖用其语。比见蔡与欧阳一帖云：“曩者得侍陛下清光，时有天旨，令写御撰碑文，宫寺题榜。至有勋德之家，干请朝廷出敕令书。襄谓近世书写碑志，则有资利，若朝廷之命，则有司存焉，待诏其职也。今与待诏争利其可乎？力辞乃已。”盖辞其可辞，其不可辞者不辞也。然后知蔡公之旨意如此。虽勋德之家，请于朝出敕令书者，亦辞之，不止一《温成碑》而已。其清介有守，后世或未知之，故载于此。

【译文】 欧阳修先生所作的《蔡君谟墓志》中说：“蔡襄在书画方面颇为见长，但从随便给人写字画画。宋仁宗皇帝特别喜欢他的书画，御制的《元舅陇西王碑文》，专门指示让蔡襄书写。不久以后又命令学士撰写了《温成皇后碑文》，又指示请蔡襄书写，可他坚辞不肯，说：‘这是待诏的职责。’”国史传中所记载的，大概用的就是欧阳修先生的话。不久前看到蔡君谟给欧阳修先生的一副帖子中说：“从前得以受到皇帝陛下垂爱，经常有圣旨，命令我写御撰碑文、宫寺题榜，甚至有功勋和仁德之家，也请求朝廷下令让我写字。蔡襄我感到近来书写碑志，就会有财物的收益；若奉朝廷之命写，就有专门机关保存，那是待诏的职责。如今让我和待诏争名夺利能这样做吗？所以我就坚决谢绝。”大概蔡襄所推辞的都是可以推辞的，而那些无法推辞的他也就不推辞了。从这里可以得知蔡先生的想法。虽然是有功劳有仁德的大家族，请求朝廷下指令让蔡先生写的，也可以拒绝，不仅仅是《温成皇后碑文》。蔡襄其人的清正耿介，刚直不阿，后代的人不一定知道，所以书之于此。

杨涉父子

【原文】 唐杨涉为人和厚恭谨。哀帝时，自吏部侍郎拜相。时朱全忠擅国，涉闻当为相，与家人相泣，谓其子凝式曰：“此吾家之不幸也，必为汝累。”后二年全忠篡逆，涉为押传国宝使，凝式曰：“大人为唐宰相，而国家至此，不可谓之无过，况手持天子玺绶与人，虽保富贵，奈千载何，盍辞之？”涉大骇，曰：“汝灭吾族！”神色为之不宁者数日。此一杨涉也，方其且相，则对其子有不幸之语，及持国宝与逆贼，则骇其子劝止之请，一何前后之不相侔也？鄙夫患失，又惩白马之祸，丧其良心，甘入“六臣”之列，其可羞也甚矣！凝式病其父失节，托于心疾，历五代十二君，佯狂不仕，亦贤乎哉！

【译文】 唐代杨涉为人温和厚道，恭敬谨慎。哀帝（李禖）时，从吏部侍

郎拜相。当时朱全忠专国政，杨涉听到自己将为宰相，就与家人相泣，对他的儿子凝式说：“这是我家的不幸，一定会连累你。”过了二年，朱全忠篡位，杨涉为掌管传国宝使，杨凝式说：“大人为唐朝宰相，而国家到这地步，不能说没有过错，况且手拿天子印玺送给别人，虽然能保住富贵，怎样对付千载的议论，何不推辞掉？”杨涉大惊，说：“你要灭我的家族了！”为这件事，神色不宁了几天。这一个杨涉呀，当他将要作宰相时，就对他的儿子说有不幸的话，等到手拿国宝送给逆贼时，就怕他儿子劝他推辞的请求，为什么前后这么不相同？鄙陋的人怕损失，又戒于白马的灾祸，丧失了他的良心，甘愿入于“六臣”的行列，他行为的可耻呀，是很厉害的了！杨凝式为他父亲的失节而感到耻辱，托言有精神病，经历了五代十二个君主，装疯不做官，也可说贤德罢！

佛胸裼字

【原文】 《法苑珠林》叙佛之初生云：“开 字于胸前，蹠千轮于足下。”又《占相部》云：“如来至真，常于胸前自然 字，大人相者乃往古世蠲除秽浊不善行故。”予于《夷坚丁志》中载蔡京胸字，言“京死后四十二年迁葬，皮肉消化已尽，独心胸上隐起一 字，高二分许，如镌刻所就。”正与此同。以大奸误国之人，而有此祥，诚不可晓也。岂非天崩地坼，造化定数，故产此异物，以为宗社之祸邪！

【译文】 《法苑珠林》里叙述佛的初生时说：“在胸开个裼字，脚下就像踩着千只车轮。”《占相部》中又说：“如来佛是至高真人，常在胸前自然而然地画上裼字，如果是大人物胸前画上裼就意味着消除污秽邪恶等不善良的行为。”我在《夷坚丁志》中记载蔡京胸前的字，说“蔡京死后四十二年，他的墓被迁徙，皮肉早就消化得无踪影了，只有心胸上肉未消化并隐约显现出一个裼字，高二分多，就像用刀刻成的一样。”这正好与《占相部》中所说相同。以蔡京这样一个大奸贼，一个祸国殃民的人，却有这样的吉祥之兆，实在是让人无法理解。难道说是天崩地裂，造化定数，才产生了这样一个异物，用来为宗社国家制造灾祸的吗？

苏涣诗

【原文】 杜子美赠苏涣诗，序云：“苏大侍御涣，静者也，旅寓江侧，凡是不交州府之客，人事都绝久矣。肩輿江浦，忽访老夫，请诵近诗，肯吟数首，才力素壮，词句动人，涌思雷出，书篋几杖之外，殷殷留金石声。赋八韵记异，亦记老夫倾倒于苏至矣，”诗有“再闻诵新作，突过黄初时”之语。又有一篇《寄裴道州并呈苏涣侍御》云：“附书与裴因示苏，此生已愧须人扶。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其褒重之如此。《唐·艺文志》，有涣诗一卷，云：“涣少喜剽盗，善用白弩，巴蜀商人苦之，称‘白跖’，以比庄映。后折节读书，进士及第。湖南崔臧辟从事，继走交、广，与哥舒晃反，伏诛。”然则非所谓静隐者也。涣在广州作变律诗十九首，上广府帅，其一曰：“养蚕为素丝，叶尽蚕不老。顷筐对空床，此意向谁道。一女不得织，万夫受其寒。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难。祸亦不在大，祸亦不在先。世路险孟门，吾徒当勉旃。”其二曰：“毒蜂一巢成，高挂恶木枝。行人百步外，目断魂为飞。长安大道边，挟弹谁家儿？手持黄金丸，引满无所疑。一中纷下来，势若风雨随。身如万箭攒，宛转送所之。徒有疾恶心，奈何不知几！”读此二诗，可以知其人矣。杜赠涣诗，名为记异，语意不与他等，厥有旨哉！

【译文】 杜甫有一首赠给苏涣的诗，诗前的小序说：“苏大侍御涣，是个爱清静的人，他在旅居江畔时，不接交州府的客人，长期断绝与官府打交道。一次偶然坐轿过江，忽然访问老夫，我请求他朗诵近来的诗作，他答应为我吟诵了几首，他的诗才华洋溢，词句动人，思路敏捷，且声音洪亮有力，除书籍、几案和手杖之外，留下有殷殷金石之声。现特赋八韵记载意外收获，也表达老夫对苏涣的倾倒敬慕之情。”诗中有“再闻诵新作，突过黄初时”的句子。杜甫还有一篇题目是《寄裴道州并呈苏涣侍御》，诗中说：“附书与裴因示苏，此生已愧须人扶。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附一封书信给裴道州因而告诉苏涣，我的这一生已感到羞愧，现在须要人扶持了。致君尧舜的心愿交付给您等人了，及早占据要路思想到为国捐躯）。”他的赞美看重他们达到如此地步。《唐书·艺文志》中载有苏涣诗一卷，说：“涣少年时喜欢劫盗，善用白色弩箭，巴蜀商人叫苦连天，称他为‘白跖’，把他比作庄褚。后来强自克制读起书来，考中进士及第。湖南崔癭征辟他为从事，继而跑到交州、广州，和哥舒晃一起造反，判死刑。”那么，苏涣不是所说的安静的隐士了。苏涣在广州作了变律诗

十九首，呈给广州府统帅，第一首说：“养蚕为素丝，叶尽蚕不老。顷筐对空床，此意向谁道。一女不得织，万夫受其寒。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难。祸亦不在大，祸亦不在先。世路险孟门，吾徒当勉旃（养蚕为了收获白色的丝，桑叶吃光了蚕还不老。斜口的筐面对着空床，这个意思向谁去说道。一女不得织布，万人受到寒冷，一夫不能得意，四海之内就要行路难了。灾祸也不在大，灾祸也不在先。世路像孟门那样险恶，吾辈当勉励）。”第二首说：“毒蜂一巢成，高挂恶木枝。行人百步外，目断魂为飞。长安大道边，挟弹谁家儿？手持黄金丸，引满无所疑。一中纷下来，势若风雨随。身如万箭攒，宛转送所之。徒有疾恶心，奈何不知几（毒蜂一巢筑成，高高挂在恶木的枝头。行人在百步外，绝远处看到后就失魂丧魄。长安的大道边，挟着弹弓的是谁家的孩子？手中拿着黄金的弹丸，拉满了弓弦心中没有什么迟疑。一弹打中了，纷纷掉下来，势像风雨一样跟随着。身像万箭聚集，展转送到它所去的地方。空有疾恶的心理，怎奈不知事情的细微）！”读了这二首诗，可以知道他的为人了。杜甫赠苏涣诗，名为记异，语意不和他的为人相同，他有他的主旨呀！

岁后八日

【原文】 《东方朔占书》，岁后八日，一为鸡，二为犬，三为豕，四为羊，五为牛，六为马，七为人，八为谷，谓其日晴，则所主之物育，阴则灾。杜诗云：“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阴时。”用此也。八日为谷，所系尤重，而人罕知者，故书之。

【译文】 《东方朔占书》中说，新年后的八天，第一天是代表鸡，第二天是犬，第三天是猪，第四天是羊，第五天是牛，第六天是马，第七天是人，第八天是谷。还说哪一天天气晴朗，那么它所代表的生物就会繁荣兴旺，那一天天气阴暗，它所代表的生物就会遇到灾难。杜甫的诗歌中说：“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阴时。”大概就是采用了这一说法。第八天是代表谷物的，它与人的生存关系尤为密切，但人们很少知道，所以写在这里。

门焉闺焉

【原文】 《左氏传》好用“门焉”字，如“晋侯围曹，门焉”，“齐侯围龙，

卢蒲就魁门焉”，“吴伐巢，吴子门焉”，“ 阳人启门，诸侯之士门焉。”及“蔡公孙翩以两矢门之，”“门于师之梁，”“门于阳州”之类，皆奇葩之语也。然《公羊传》云：“入其大门，则无人门焉者；入其闺，则无人闺焉者；上其堂，则无人焉。”又杰出有味。何休注“堂无人焉”之下曰：“但言焉，绝语辞，堂不设守视人，故不言焉者。”休之学可谓精切，能尽立言之深意。

【译文】 《左传》好用“门焉”二字，如“晋侯率兵围曹国，门焉，”“齐侯率兵包围龙地，卢蒲就魁门焉，”“吴军讨伐巢地，吴子门焉”，“潯阳人攻打城门，诸侯的兵士们门焉。”这里的“门焉”都是“围住城门”、“守住城门”的意思。至于“蔡国的公孙翩用两支箭门之”，“门于师之梁”，“门于阳州”之类，“门”的意思是“射门”，“围困”，属于“门”字的奇特用法，可以说是语言中的奇葩。然而《公羊传》中说：“进入他们的大门，可是没有人门焉者；进入他们的闺门，也没有人闺焉者；登上他们的殿堂，却设守堂的人了。”这里的“门焉者”相当于“夺门”或“守在门边”；而“闺焉者”的意思是“守闺门”，对“门”字的用法可以说特出有味。何休在“堂无人焉”下面加注说：“如只说‘焉’字是结语词，堂前没有安排看护人，所以不说焉。”何休的学问可以说得精密确切，把语言表达的深刻含义全部揭示了出来。

郡县主婿官

【原文】 本朝宗室袒免亲女出嫁，如婿系白身人，得文解者为将仕郎，否则承节，承信郎，妻虽死，夫为官如故。按唐贞元中，故怀泽县主婿检校赞善大夫窦克绍状言：“臣顷以国亲，超授宠禄，及县主薨逝，臣官遂停。臣陪位出身，未授检校官，自有本官，伏乞宣付所司，许取前衔婺州司户参军随例调集。”诏：“许赴集，仍委所司比类前任正员官依资注拟。自今已后，郡县主婿除丁忧外，有曾任正员官停检校官俸料后者，准此处分。”乃知婿官不停者，恩厚于唐世多矣。绍兴中，高士轰尚伪福国长公主，至观察使。及公主事发诛死，犹得故官，可谓优渥。

【译文】 凡赠宋朝宗室同一高祖的兄弟的亲女儿出嫁，如女婿是没有官职出身的人，有较高文化的可以任命为将仕郎，否则就是承节郎，承信郎，即使妻子死了，丈夫的官职也依然如故。据考证在唐代贞元年间，已故的怀泽县主婿检校赞善大夫窦克绍有状子说：“臣我不久前才成为国戚，受到皇上的恩宠并有俸禄，到了县公主去世以后，我的官职马上就被停了。我是陪位出身，在没

有授于检校官以前，只有一个官位，还请有关部门，答应我按原来的官衔婺州司户参军随时调集。”皇上诏说：“允许赴集，仍然委托原来的主管部门比照前任官员依照资历拟定官职。从今以后，郡县主婿除了父母已经双亡者之外，有曾经担任正员官而停了他们的检校官俸禄的，按此办理。”因此才知道婿官在郡县主死而不被中止，比在唐代享受皇上厚恩要多。高宗绍兴年间，高士轰娶了假的福国长公主，他官至观察使。到了公主事情败露被诛死后，他仍然官居原职，真可以说待遇丰厚了。

乐府诗引喻

【原文】 自齐、梁以来，诗人作乐府《子夜四时歌》之类，每以前句比兴引喻，而后句实言以证之。至唐张祜、李商隐、温庭筠、陆龟蒙，亦多此体，或四句皆然。今略书十数联于策。其四句者，如“高山种芙蓉，复经黄檗坞。未得一莲时，流离婴辛苦。”“窗外山魑立，知渠脚不多。三更机底下，摸着是谁梭。”“淮上能无雨，回头总是情。薄帆浑未织，争得一欢成。”其两句者，如“风吹荷叶动，无夜不摇莲。”“空织无经纬，求匹理自难。”“围棋烧败袄，著子故依然。”“理丝入残机，何悟不成匹。”“门不安横，无复相关意。”“黄檗向春生，苦心日日长。”“明灯照空局，悠然未有期。”“玉作弹棋局，中心最不平。”“剪刀横眼底，方觉泪难裁。”“中劈庭前枣，教郎见赤心。”“千寻葶苈枝，争奈长长苦。”“愁见蜘蛛织，寻思直到明。”“双灯俱暗尽，奈许两无由。”“三更书石阙，忆子夜啼悲。”“芙蓉腹里萎，怜汝从心起。”“朝看暮牛迹，知是宿啼痕。”“梳头入黄泉，分作两死计。”“石阙生口中，衔悲不能语。”“桑蚕不作茧，昼夜长悬丝。”皆是也。龟蒙又有《风人诗》四首云：“十万全师出，遥知正忆君。一心如瑞麦，长作两歧分。”“破檍供朝爨，须知是苦辛。晓天窥落宿，谁识独醒人。”“旦日思双屦，明时愿早谐。丹青传四读，难写是秋怀。”“闻道更新帟，多应废旧期。征衣无伴捣，独处自然悲。”皮日休和其三章云：“刻石书离恨，因成别后悲。莫言春茧薄，犹有万重思。”“镂出容刀饰，亲逢巧笑难。目中骚客佩，争奈即阑干。”“江上秋声起，从来浪得名。逆风犹挂席，苦不会凡情。”刘采春所唱云：“不是厨中串，争知炙里心。井边银钏落，展转恨还深。”“蜡为红烛，情知不自由。细丝斜结网，争奈眼相钩。”尤为明白。七言亦间有之，如“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又有情。”“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也无？”“合欢桃核真堪恨，里许元来别有人。”是也。近世鄙词，如《一落索》数阙，盖

效此格，语意亦新工，恨太俗耳，然非才士不能为。世传东坡一绝句云：“莲子劈开须见薏，楸枰著尽更无棋。破衫却有重缝处，一饭何曾忘却匙。”盖是文与意并见一句中，又非前比也。集中不载。

【译文】 从齐、梁以来，诗人所作乐府诗《子夜四时歌》之类的很多，大都是用前句来比兴或引喻，而用后句言实而证明。一直到唐代的张祜、李商隐、温庭筠、陆龟蒙，也都多有这种体式，或者四句都是这样。今略写十几联在书册上。其中四句的，如“高山种芙蓉，复经黄檗坞。未得一莲时，流离婴辛苦（在高山上种荷花，又经过了种满苦味的黄檗的山坞。没有得到一莲的时候，却已遭遇到流离的苦辛）。”“窗外山魑立，知渠脚不多。三更机底下，摸着是谁梭。（窗外立着山魑，知道它脚不多。三更天织布机底下，摸着的是谁的梭子）。”“淮上能无雨，回头总是情。薄帆浑未织，争得一欢成（淮水上能没有雨，回头看总是情。薄草织成的船帆几乎没有织，怎得一位心上人来帮我织成）。”其中两句的，如：“风吹荷叶动，无夜不摇莲（风吹荷叶摇动，没有一夜不摇动莲花）。”“空织无经纬，求匹理自难（没有经线纬线的空织，要术得到布匹道理上讲自然困难）。”“围棋烧败袄，著子故依然（下着围棋烧着破袄，棋子依然下着）。”“理丝入残机，何悟不成匹。（整治蚕丝送入残机，悟到了什么不能织成布匹）。”“褰门不安横，无复相关意（张开着门不放门闩，再没有相关的意思）。”“黄檗向春生，苦心日日长（黄檗向着春天生长着，苦心天天长长）。”“明灯照空局，悠然未有期（明亮的灯光照着空空的棋局，悠悠然没有约定的时间）。”“玉作弹棋局，中心最不平（用白玉做成弹棋局，心中最为不平）。”“剪刀横眼底，方觉泪难裁（剪刀横放在眼睛底下，才感到眼泪难于剪裁）。”“中劈庭前枣，教郎见赤心（中间劈开庭前枣，教郎见到赤红的心）。”“千寻萼苕枝，争奈长长苦（千寻长的萼苕枝，怎奈长长苦）。”“愁见蜘蛛织，寻思直到明。（愁着蜘蛛织网，寻思直到天明）。”“双灯俱暗尽，奈许两无由（双灯都暗尽了，奈何两无由）。”“三更书石阙，忆子夜啼悲（三更天书写石阙，想念你夜里悲哭）。”“芙蓉腹里萎，怜汝从心起（荷花在腹中枯萎，爱怜你从心头升起）。”“朝看暮牛迹，知是宿啼痕（早晨看到昨晚的牛蹄痕迹，知道是昨晚啼泣的泪痕）。”“梳头入黄泉，分作两死计（梳头进入黄泉路，自料当作两人都死的计算）。”“石阙生口中，衔悲不能语（石阙生在口中，含悲不能说话）。”“桑蚕不作茧，昼夜长悬丝（桑蚕不做茧，昼夜长挂丝）。”这些都是这方面的例子。陆龟蒙又有《风人诗》四首说：“十万全师出，遥知正忆君。一心如瑞麦，长作两歧分（全师十万出征去，远方的人儿知道我正想念你。一颗心像祥瑞的麦子，长长作两歧分开）。”“破檍供朝爨，须知是苦辛。晓天窥落宿，谁识独醒人（劈开黄檍供早上烧火做饭，须

知是苦辛。晓天看着下落的星宿，哪一位认识独醒的人)。”“旦日思双屐，明时愿早谐。丹青传四渚，难写是秋怀(天亮是想着双屐，圣明时节愿意早些谐和。丹青能传布四渚，难画的却是秋天的怀念)。”“闻道更新帙，多应废旧期。征衣无伴捣，独处自然悲(听说换了新旗，大概是废弃了旧旗。征衣没有伴随捣声，独居自然悲伤)。”皮日休和了陆龟蒙的三章说：“刻石书离恨，因成别后悲。莫言春茧薄，犹有万重思(刻石书写别离的怨恨，因而成为别后的悲伤。不要说春茧太薄，尚有万重的相思)。”“镂出容刀饰，亲逢巧笑难。目中骚客佩，争奈即阑干(刻出作仪仗用的佩刀花饰，亲自遇到巧笑却难。眼中见到骚人墨客的玉，怎奈就是纵横交错的眼泪)。”“江上秋声起，从来浪得名。逆风犹挂席，苦不会凡情(江上秋声起来，从来浪得名声。逆风不挂风帆，苦于不会凡情)。”刘采春所歌唱的说：“不是厨中串，争知炙里心。井边银钏落，展转恨还深(不是厨房里串肉的串，怎能知道烧烤里边的心。井边银钏掉下来，反反复复的怨恨还深)。”“禦蜡为红烛，情知不自由。细丝斜结网，争奈眼相钩(擗蜡成为红烛，情知不能自由。细丝斜着结网，怎奈眼目相钩)。”尤其明白。七言也偶然有这种情况，如：“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又有情”、“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也无(玲珑的骰子中间放着红豆，入骨的相思知也不知)”、“合欢桃核真堪恨，里许元来别有人(合欢桃核真可恨，里面原来另有人)。”就是这样。近代庸俗浅薄的词，如《一落索》数曲，大概效仿这一格式。语意也清新工巧，恨它太俗，然而不是有才能的士子不能写出来。世上流传着东坡(苏轼)一首绝句说：“莲子擘开须见薏，楸枰著尽更无棋。破衫却有重缝处，一饭何曾忘却匙(掰开莲子须见到心，棋盘着完更无棋。破衫还有重缝处，一饭何尝忘了匙)。”大概是文和意都在一句中出现，又不是前面举的例子可比的。这首诗在苏东坡集中没有收入。

容斋四笔

作者自序

始予作《容斋随笔》，首尾十八年，《二笔》十三年，《三笔》五年，而《四笔》之成，不费一岁。身益老而著书益速，盖有其说。曩自越府归，谢绝外事，独弄笔纪述之习不可扫除。故采异闻，但绪《夷坚志》，于议论雌黄，不复关抱。而稚子，每见《夷坚》满纸辄曰：“《随笔》、《夷坚》皆大人素所游戏，今《随笔》不加益，不应厚于彼而薄于此也。”日日立案劳，必俟草一则乃退。重进其意，则哀所忆而书之。嗜读书，虽就寝犹置一编枕畔，旦则与之俱兴。而天啬其付，年且弱冠，聪明殊未开，以彼其勤，殆必有日。丈夫爱怜少子，此乎见之。于是占抒为序，并奖其志云。庆元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序。

卷一

孔庙位次

【原文】 自唐以来，相传以孔门高弟颜渊至子夏为十哲，故坐祀于庙堂上。其后升颜子配享，则进曾子于堂，居子夏之次以补其缺。然颜子之父路、曾子之父点，乃在庑下从祀之列，子处父上，神灵有知，何以自安？所谓子虽齐圣，不先父食，正谓是也。又孟子配食与颜子并，而其师子思、子思之师曾子亦在下。此两者于礼、于义，实为未然，特相承既久，莫之敢议耳。

【译文】 自唐朝以来，相传孔子的高徒从颜渊到子夏共十人称为十哲，所以在祭祀于孔庙的正堂上排列有他们的像。后来升颜渊到孔子身边陪同孔子享受祭祀，于是又增补曾子坐祀正堂，位居子夏之下。然而颜子之父颜路、曾子之父曾点，却排列在正堂周围的廊房从祀，儿子位居父亲之上，若神灵有知，怎么可以心安理得呢？所说的儿子虽在圣人之列，不先于父用食，就是这个道理。再者，孟子在孔庙的位置与颜子并列，而孟子的老师子思、子思的老师曾子的位置也排在颜子之下。以上两种情况，无论从礼上讲，还是从义上讲都是不妥当的，只不过是出于相传因袭时间已久，没有人敢提出异议而已。

周三公不特置

【原文】 周成王董正治官，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而云：“官不必备，惟其人。”以书传考之，皆兼领六卿，未尝特置也。周公既为师，然犹位冢宰。《尚书》所载召公以太保领冢宰，芮伯为司徒，彤伯为宗伯，毕公以太师领司马，卫侯为司寇，毛公以太傅领司空是已。其所次第惟以六卿为先后，而师傅之尊乃居太保下也。

【译文】 周成王修正官职制度，设立太师、太傅、太保，这就是三公。而又讲官职不一定齐备，关键在于官员的品德与才能。从经书和注释文字考察，三公都兼任六卿职务，从没有单独设置委任的。周公担任太师以后，却仍兼任冢

宰。《尚书·顾命》所记载的，召公以太保兼任冢宰，芮伯任司徒，彤伯任宗伯，毕公以太师兼任司马，卫侯以太傅兼任司空便是这样。他们的排列顺序，只按六卿的顺序排先后，而太师毕公、太傅卫侯虽地位高贵，却排在太保召公的后面。

周公作金縢

【原文】 《尚书》孔氏所传五十九篇皆有序，其出于史官者不言某人作，如《虞书》五篇，纪一时君臣吁 都兪及识其政事。如《说命》、《武成》、《顾命》、《康王之诰》、《召诰》自“惟二月既望”至“越自乃御事”，《洛诰》自“戊辰王在新邑”至篇终，《蔡仲之命》自“惟周公位冢宰”至“邦之蔡”皆然。如指言某人所作，则伊尹作《伊训》、《太甲》、《咸有一德》，《盘庚》三篇，周公作《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是也。惟《金縢》之篇，首尾皆叙事，而直以为周公作。按此篇除册祝三王外，余皆《周史》之词，如“公乃自以为功”、“公归纳册”、“公将不利于孺子”、“公乃为诗以贻王”、“王亦未敢诮公”、“公命我勿敢言”、“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公勤劳王家”之语。“出郊”、“反风”之异，决非周公所自为，今不复可质究矣。

【译文】 由孔安国献给汉武帝而传之于世的《尚书》五十九篇文章都有序言，其中为史官撰写的篇目不讲是哪个人所撰。如《虞书》五篇的序文中说，记述当时的君臣对话辩论及政治事务。《说命》、《武成》、《顾命》、《康王之诰》、《召诰》自“惟二月既望”至“越自乃御事”；《洛诰》自“戊辰王在新邑”至篇末；《蔡仲之命》中自“惟周公位冢宰”至“邦之蔡”，都是这样。有些篇明确指出为某人所作，有伊尹作《伊训》、《太甲》、《咸有一德》，《盘庚》中三篇，周公作《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之类。只有《縢》一篇，首尾都叙述史事，而直接标明为周公所作。按此篇中除了册命祝告三王的文书外，其余都是周朝史官的话，如“周公请求把疾病降到自己身上”，“周公回来后把祝文收藏起来”、“周公要做不利成王的事”，“周公写诗献给成王”，“成王也不敢指责周公”，“周公有命令我不敢讲”，“上天显示威力表彰周公的德行”，“周公殷勤地效忠王室”等语。其中有“出郊”、“反风”的异常的记述，决非周公自己所作，现在已不可能再细究了。

云梦泽

【原文】 云梦，楚泽薮也，列于《周礼·职方氏》。郑氏曰：“在华容”。《汉志》有云梦官。然其实云也、梦也，各为一处。《禹贡》所书：“云土梦作义。”注云：“在江南。”惟《左传》得其详，如 夫人弃子文于梦中。注云：“梦，泽名，在江夏安陆县城东南。”楚子田江南之梦。注云：“楚之云、梦跨江南北。”楚子济江入于云中。注：“入云泽中，所谓江南之梦。”然则，云在江之北，梦在其南也。《上林赋》：“楚有七泽，尝见其一，名曰云梦，特其小小者耳，方九百里。”此乃司马长卿夸言。今为县，隶德安。询诸彼人，已不能的指疆域。《职方氏》以“梦”为“薮”。《前汉·叙传》：子文投于梦中，音皆同。

【译文】 云梦（大致包括今湖北江汉平原及附近部分丘陵山峦地区），是楚国一处低洼的沼泽地，在《周礼·职方氏》中有记载。郑玄注释说：“在华容（今湖北潜江县西南）境内”。《汉书·地理志》中记有云梦地区的官。其实“云”和“梦”各为一处。《禹贡》记载“云土梦作义。”其注释说“在长江以南。”只有《左传》记载详细，如邲夫人遗弃子文于梦地。注释说“梦，沼泽名，位于江夏安陆县（今属湖北）城的东南。”又记楚王在江南的梦地打猎。注释说：“楚国的云、梦两地，横跨长江南北。”楚子渡江才到云地。注释说：“进入云地沼泽中。这就是所谓江南的梦地。”然而，云地在长江以北，梦地在长江以南。《上林赋》中记载：“楚地有七处沼泽地，曾经见到一处，称为云梦，方圆九百里，不过是小小的一处而已。”这是司马长卿的虚夸之说。现在云梦为县，隶属于德安（治今湖北安陆县）。我询访当地的人，他们已不能明确说出当时云梦的范围。《职方氏》中将“梦”写作“薮”，《汉书·叙传》中有子文（班固的先世）被丢弃在梦中，薮、梦两字读音相同。

关雎不同

【原文】 《关雎》为《国风》首，毛氏列之于三百篇之前。《大序》云：“后妃之德也。”而《鲁诗》云：“后夫人鸡鸣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诗人叹而伤之。”《后汉·皇后纪序》：“康王晏朝，《关雎》作讽。”盖用此也。显宗永平八年诏云：“昔应门失守，《关雎》刺世。”注引《春秋说题辞》曰：“人

主不正，应门失守，故歌《关雎》以感之。”宋均云：“应门，听政之处也。言不以政事为务，则有宣淫之心。《关雎》乐而不淫，思得贤人与之共化，修应门之政者也。”薛氏《韩诗章句》曰：“诗人言雎鸠贞洁敬匹，以声相求，隐蔽于无人之处。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宫，后妃御见有度。应门击柝，鼓人上堂，退反燕处，体安志明。今时大人内倾于色，贤人见其萌，故咏《关雎》之说淑女正容仪以刺时。”三说不同如此。《黍离》之诗列于王国风之首，周大夫所作也，而《齐诗》以为卫宣公之子寿，闵其兄眚之且见害，作忧思之诗，《黍离》之诗是也。此说尤为可议。

【译文】 《关雎》为《国风》的首篇，毛亨将它排在《诗经》于三百篇之前。《大序》中说这首诗是讲“后妃的德行。”然而《鲁诗》中则说：“后妃夫人鸡鸣而起，佩带玉器前往周康王住所，康王的王后心怀不满，因而诗人叹息而伤感，就作了这篇诗文。”《后汉书·皇后纪序》中说：“周康王好色晚起，就作《关雎》以讽刺他。”大概是由于这个原因。东汉明帝永平八年（65年）的诏书中说：“过去宫门失于守护，曾有作《关雎》以讥时政。”注释引用《春秋说题辞》说：“国家的君主不正，导致宫门守卫不严，所以咏作《关雎》以抒发感慨。”宋均说：“应门，是处理国家政事的地方。这里是说君主不精心处理政事，而有好色纵欲之心。《关雎》之作，有乐意而无邪淫，期望能有贤才辅佐君主共同教化百姓，整治宫廷之政。”薛氏《韩诗章句》中说：“诗人诗中是说，雎鸠这种鸟贞洁而敬肃孤独，往往以叫声相求偶，隐蔽在无人的地方。所以国家的君主退下朝堂之后，进入自己的居室，后妃与君主的会面有一定节制。守卫应门的人打击梆子，鼓人敲响上朝的鼓，从休息处返回朝廷，身体安泰，神志清醒。而当时的人君内倾于女色，贤能的人得不到举用，因而吟作诗词《关雎》以淑女端正容貌仪举事来讥刺当时君王的荒淫。”以上三种说法竟然如此不同。《黍离》诗被列为王国风的首篇，为东周大夫官所作，而《齐诗》中认为，是卫宣公的儿子寿伤感他的哥哥 被人陷害，于是，便写出表示忧思的诗句，这就是《黍离》诗。这种说法很值得商榷。

三馆秘阁

【原文】 国朝儒馆仍唐制，有四：曰昭文馆，曰史馆，曰集贤院，曰秘阁。率以上相领昭文大学士，其次监修国史，其次领集贤。若只两相，则首厅兼国史。唯秘阁最低，故但以两制判之。四局各置直官，均谓之“馆职”，皆称学士。

其下则为校理、检讨、校勘，地望清切，非名流不得处。范景仁为馆阁校勘，当迁校理，宰相庞籍言：“范镇有异才，恬于进取。”乃除直秘阁。司马公作诗贺之曰：“延阁屹中天，积书云汉连。神宗重其选，谓太宗也。国士比为仙。玉槛钩陈上，丹梯北斗边。帝容瞻日角，宸翰照星躔。职秩曾无贵，光华在得贤。”其重如此。自熙宁以来，或颇用赏劳。元丰官制行，不置昭文、集贤，以史馆入著作局，而直秘阁只为贴职。至崇宁、政、宣以处大臣子弟姻戚，其滥及于钱谷文俗吏，士大夫不复贵重。然除此职者必诣馆下拜阁，乃具盛筵，邀见在三馆者宴集。秋日暴书宴，皆得预席，若余日则不许至。《随笔》有《馆职名存》一则云。

【译文】 宋代馆阁制度仍沿用唐制，设立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和秘阁四局机构。大概以宰相兼领昭文大学士，次相监修国史，再次领集贤官。若只有两相，则以首相兼国史官。四者中秘阁地位最低，因而仅以两制官担任他的长官。以上四局，各设直昭文馆、直史馆、直集贤院、直秘阁馆，通称为“馆职”，都称学士。其下还有校理、检讨、校勘，职位清贵，非名流人物不得充任。范镇（字景仁）曾为馆阁校勘，应当晋升为校理时，宰相庞籍说：“范镇有与众不同的才能，把官位的升迁看得很淡薄。”于是破格晋升他直秘阁官。司马光为此作诗称贺道：“延阁屹中天，积书云汉连。神宗重其选（神宗指宋太宗），国士比为仙。玉槛钩陈上，丹梯北斗边。帝容瞻日角，宸翰照星躔。职秩曾无贵，光华在得贤。”达到了如此重要的程度。自神宗熙宁以来，这些官也经常用来奖励授给有劳绩的人。元丰年间实行新官制，不再设昭文、集贤两局，将史馆并入著作局，而直秘阁官只作为文官的附加官衔。到徽宗崇宁、政和、宣和时期，秘阁官用来安排大臣子弟及亲戚。后来泛滥以至安排给掌管钱谷文书杂事的小吏，士大夫们不再以这些官为清贵崇重之职。然而，被委任为这些官职的人，一定要到秘阁去拜谒长官，秘阁也一定要举行盛大的酒席宴会，并邀请当时在三馆的人参加。每年秋天举行一次晒书宴会，带秘阁官衔的人都能参加，其他时间的宴会则不许进入馆舍。我在《随笔》中设有《馆阁名存》一目。

亭榭立名

【原文】 立亭榭名最易蹈袭，既不可近俗，而务为奇涩亦非是。东坡见一客云近看《晋书》，问之曰：“曾寻得好亭子名否？”盖谓其难也。秦楚材在宣城，于城外并江作亭，目之曰“知有”。用杜诗“已知出郭少尘事，更有澄江消客

愁”之句也。王仲衡在会稽，于后山作亭，目之曰“白凉”。亦用杜诗“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之句。二者可谓甚新，然要为未当。庐山一寺中有亭颇幽胜，或标之曰：“不更归”，取韩诗末句，亦可笑也。

【译文】 给亭榭起名最容易雷同沿袭，既然不可以混同流俗，如果一味地追求奇险晦涩，也不好。苏轼一次听见一位客人说，他最近在读《晋书》，就问他：“曾经找到好的亭子名没有？”大抵是讲找个好的亭子名很难。秦楚才在宣城，在城外江边建亭子，给它起名叫“知有”，用杜甫诗“已知出郭少尘事，更有澄江消客愁（已经知道出了城人间琐事就少了，更加上有清彻的江水可以洗掉游客的忧愁）”一句的典故。王仲衡在会稽（越州绍兴府），在后山上建亭子，起名叫“白凉”，也用杜甫诗“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越女是天下最白腻的，鉴湖中虽是盛夏五月也充满凉意）”一句的意思。两个名字可算是很新奇，然而总起来讲并不恰当。庐山有一寺院，里面有亭子，相当幽静令人神往，有人给它起名叫“不更归”，取韩愈一首诗最后一句中的三个字，也很可笑。

十十钱

【原文】 市肆间交易论钱陌者，云十十钱。言其足数满百无跷减也。其语至俗，然亦有所本。《后汉书·襄楷传》引宫崇所献神书，其《太平经·兴帝王篇》云：“开其玉户，施种于中，比若春种于地也，十十相应和而生。其施不以其时，比若十月种物于地也，十十尽死，固无生者。”其书不传于今，唐章怀太子注释之时，尚犹存也。此所谓十十，盖言十种十生无一失耳，其尽死之义亦然，与钱陌之事殊，然其字则同也。

【译文】 市中店铺间相互交易谈到满百钱时，往往称十十钱。就是说每贯钱十足支付一千文，不多也不少。这种说法很通俗，然而也有它的来历。《后汉书·襄楷传》中引录有宫崇所献纳的神书，其中《太平经·兴帝王篇》记载：“开其玉户，施种放种子好比春天在地里下种，下十枚种子，十枚种子都能顺应气候发芽生长；如果下种时间不当，好比在十月间向地里播种，下十枚种子十枚种子全部都死掉，没有一枚发芽生长。”这部书现在已看不到了。唐代章怀太子李贤作注时，还曾存有这本书。这里所说的十十，即指种十生十，没有一枚不发芽生长的。十十尽死也是这个意思。虽与钱陌所说的内容不同，但“十十”两字都一样。

犀舟

【原文】 张衡《应间》云：“犀舟劲楫。”《后汉》注引《前书》：“羌戎弓矛之兵，器不犀利。”《音义》曰：“今俗谓刀兵利为犀。犀，坚也。”犀舟，甚新奇，然为文者，未尝用，亦虑予所见之不博也。

【译文】 张衡在《应间》中说：“犀舟劲楫。”意思是犀利的船，强劲的楫。《后汉书》注释中引录《前汉书》有：“羌戎有弓矛之类的兵器，并不犀利的记载。”《汉书音义》中注释说：“今习惯称兵器锋利为犀。犀，是坚利的意思。”“犀舟”一词，十分新奇，然而作文章者未尝采用，这或许也是我的见闻不广博的缘故吧！

毕仲游二书

【原文】 元盭初，司马温公当国，尽改王荆公所行政事。士大夫言利害者以千百数，闻朝廷更化，莫不欢然相贺，唯毕仲游一书，究尽本末。其略云：“昔安石以兴作之说动先帝，而患财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财者无不用。盖散青苗、置市易、敛役钱、变盐法者，事也。而欲兴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兴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敛变置之事，是以百说而百不行。今遂欲废青苗、罢市易、蠲役钱、去盐法，凡号为财利而伤民者，一扫而更之，则向来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废，市易不可罢，役钱不可蠲，盐法不可去，必探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动上意，虽致石人而使听之，犹将动也。如是则废者可复散，罢者可复置，蠲者可复敛，去者可复存矣。则不足之情可不预治哉！为今之策，当大举天下之计，深明出入之数，以诸路所积之钱粟，一归地官，使经费可支二十年之用。数年之间，又将十倍于今日。使天子晓然知天下之余于财也，则不足之论不得陈于前，然后所谓新法者，始可永罢而不复行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敝，而左右侍从职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虽起二三旧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数，乌在其势之可为也！势未可为而欲为之，则青苗虽废将复散，况未废乎！市易虽罢且复置，况未罢乎！役钱，盐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敝，如人久病而少间，其父兄子弟喜见颜色，而未敢贺者，意

其病之在也。”

先是东坡公在馆阁，颇因言语文章规切时政，仲游忧其及祸，贻书戒之曰：“孟轲不得已而后辩，孔子欲无言。古人所以精谋极虑，固功业而养寿命者，未尝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来，祸福利害系身者未尝言，顾直惜其言尔。夫言语之累，不特出口者为言，其形于诗歌、赞于赋颂、托于碑铭、著于序记者，亦言也。今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是，则见是者喜。非其所非，则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济君之谋，而怨者或已败君之事矣！天下论君之文，如孙臆之用兵、扁鹊之医疾，固所指名者矣，虽无是非之言，犹有是非之疑。又况其有耶？官非谏臣，职非御史，而非人所未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触讳以游其间，殆由抱石而救溺也。”

二公得书耸然，竟如其虑。予顷修史时，因得其集，读二书思欲为之表见，故官虽不显，亦为之立传云。

【译文】 宋哲宗元祐初年，司马光执政，将王安石所实行的新法全部废除。士大夫们讨论新法利害关系的人，数以千计，当听说朝廷更改法度时，无不喜庆祝贺。唯有毕仲游在其上书中，对新法提出及实施的利弊作了详尽地分析。他在上书中大致说：“过去王安石，用国家振兴的主张说服了神宗皇帝，而顾虑国家财政不足。所以，凡是可以获取钱财的措施，无不采用。散发青苗钱、建立市易法、收敛役钱、变更盐法，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要国家振兴，担心财政之不足，是出于他个人的忧国之情。如果不能消除朝廷振兴国家的情欲，而一味地要禁止推行青苗、市易、役钱、盐法等方面的做法，即使用一百种说法劝说一百次也是不能收效的。现在要马上废除青苗法，罢去市易法，蠲免役钱法，变更盐法，把过去聚敛财利而有害于民的新法，一概废除，那些向来倾心于推行新法而受到重用的人一定心怀不满。这些反对者，不仅要说青苗不可废，市易不可罢，役钱不可蠲，盐法不可变，而且还要探讨财政不足的情况，申辩财政不足的事实，以此来动摇皇上的心，即使石头人倾听了这些论说，也会为之感动。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废去的也可以再实行，罢除的可以再设置，蠲免的可以再收敛，被丢去的可以再恢复保存。这样看来，怎么能够不考虑预先消除他们的财政不足之顾虑呢？作为当今的策略，应当做好国家的财政统计，深入详细地了解财政收入和支出情况，清理各路所剩余积压的钱粮之帐目，所有财物归由负责土地和人民的官府掌管，以保证国家经费可以支付二十年之用。这样几年之后，财政增长又将十倍于今日。假使天子能确切知道天下财物有大量余剩，那么，财政不足的议论就不会再纷纷上奏朝廷，这样过去所制定并实行的新法才能永久废除而不再反复。王安石执政时，朝野上下没有不是他的支持

者，所以他所制定的新法能够推行。现在要革除前日的弊端，而皇帝左右的侍从、职司使之类的官，十有七八是王安石的党徒，即使起用二三个旧日大臣，录用六七个德高的君子，在数百官僚之中也才仅有这十几人，在这种形势下怎么可以废除新法呢！在形势不允许的情况下执意要这样做，那么青苗法虽废去也可再实行，何况现在还没有废除呢！市易机构虽然撤销将来还会再设，何况现在还没有撤销呢？免役法和新盐法也是同样。用这样的办法去救治新法造成的弊端，就像一个人病了很久稍有好转，他的父兄子弟虽可以喜形于色，但并不敢为此祝贺，因为觉得他的病仍然在身。”

在这之前，苏东坡在馆阁任职时，经常利用言语文章规诫、陈述时政得失。毕仲游担心他会因此惹祸烧身，就写信告诫他说：“孟轲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争辩，孔子想说而没有说。古人之所以精心谋划、细致考虑，以保证功业成就，延长寿命，未尝不是采取这种明哲保身的做法。您自入朝做官以来，关系到你自己的祸福利害未曾说过，不过一直是吝惜你的语言而已。大凡由于语言而受牵累的，不只是出于口的语言，其他表现于诗歌、赋颂、碑铭、序记的也是语言。现在你只知道担心出自于口的语言，而忽视形诸于文的语言。你对赞扬自己的人就认为是对的，就高兴；而对批评自己的人就认为是错误的，就怨恨。实际上，能让你高兴的人未必能对你的事业有什么帮助，而使你怨恨的人则可能使你的事业遭到挫折。天下人评论你的文章，就像孙臆用兵，扁鹊行医一样，必定要有的放矢。尽管没有赞扬和批评的话，也有述说是非的嫌疑，何况有的确是在直接评论是非呢！你官非谏臣，职非御史，而非议别人未曾非议的东西，赞同别人未曾赞同的东西。你使自己处于危险境地，去触犯忌讳的问题，这样下去，大概就像抱着石头去营救溺水的人一样。

司马光、苏东坡分别接到以上两封信后，不禁有惊恐之感。其结果也最终应验了毕仲游的预见。我不久前编修国史时，看到了毕仲游的文集，读到这两封信时，想着要把它在国史中表现出来。尽管，毕仲游官位并不显贵，也为他单独写了传记。

列子与佛经相参

【原文】 张湛序《列子》云：“其书大略明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丧，生觉与梦化等情。所明往往与佛经相参。”予读《天瑞篇》载林类答子贡之言曰：“死之与生，一往一反。故死于

是者，安知不生于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此一节所谓与佛经相参者也。又云：“商太宰问孔子：‘三王、五帝、三皇圣者欤？’孔子皆曰：‘弗知。’太宰曰：‘然则孰者为圣？’孔子曰：‘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丘疑其为圣。弗知真为圣欤？真不圣欤？’”其后论者以为《列子》所言，乃佛也，寄于孔子云。

【译文】 张湛为《列子》一书作序说：“这部书大致是说明众人都要以至高无上的虚幻崇拜为尊奉的对象，任何事物都要以终究灭亡为应验，神灵惠爱都要以凝结寂静的形式而长期存在，思念之情都要因牵累于某种事情而自行消失。活着时的感觉与死了之后梦幻中的感觉是一样的。这部书中所讲述的道理往往与佛经中的内容相类似。”我阅读《列子·天瑞篇》，其中记载林类回答子贡的话说：“死和生之间，往返轮回。所以死在这个地方，怎么能知道不生于那个地方呢？尽管我知道不一定就是这样，但我又怎么能够知道我今天的死不胜过改日的再生呢？”这段记述与佛经里所说可相参证。他的书中又说：“宋国太宰官询问孔子：‘三王、五帝、三皇是圣人吗？’孔子都回答说：‘不知道。’太宰又问：‘那么谁可以称得上圣人呢？’孔子答道：‘西方的人中有圣人，这些地方不治而不乱，不劝言而自守信用，不教化而自行教化，宽阔广大的世界里，人民不能说出这个国家的名称，孔丘我怀疑这就是圣人的作为。却不知道真的是圣人呢，还是真的不是圣人。’”后来人们认为《列子》中所论述的，即是指神佛，不过是借助于孔子名下而已。

韦孟诗乖疏

【原文】 《汉书·韦贤传》载韦孟诗二篇及其孙玄成诗一篇，皆深有三百篇风致，但韦孟讽谏云：“肃肃我祖，国自豕韦。总齐群邦，以翼大商。至于有周，历世会同。王赧听谮，实绝我邦。我邦既绝，厥政斯逸。赏罚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群后，靡扶靡卫。五服崩离，宗周以队。”应劭曰：“王赧听谗受谮，绝豕韦氏。自是政教逸漏，不由王者。”观孟之自叙乃祖，而乖疏如是，周至赧王仅存七邑，救亡不暇，岂能绝侯邦乎？周之积微久矣，非因绝豕韦一国，然后五服崩离也。其妄固不待攻，而应劭又从而实之，尤为可笑。《左传》书范宣子之言曰：“之祖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杜预曰：“豕韦国于东郡白马县，殷末国于唐，周成王灭之。”此最可证，惜颜师古之不引用也。

【译文】 《汉书·韦贤传》记载，韦孟写的两篇诗和他的孙子玄成写的一篇诗，其风致精深的程度可达到《诗经》三百篇诗文的水平。然而韦孟的劝谏诗中说：“肃肃我祖，国自豕韦。总齐群邦，以翼大商。至于有周，历世会同。王赧周赧王听谗，实绝我邦。我邦既绝，厥政斯逸。赏罚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群后，靡扶靡卫。五服崩离，宗周以队。”应劭解释说：“周赧王听信谗言，罢黜豕韦氏，自此以后周室政教废弛，王命得不到执行。”这里韦孟诉说他祖宗的事情，竟然如此乖违粗陋。东周到赧王时只剩下七处城邑，挽救灭亡还来不及，怎么可能与侯邦国家绝交呢？导致周朝灭亡因素的出现已经很长时间了，并不是因为取消了豕韦的官爵与封地，才导致五服范围内分崩离析。其荒诞之论本来就不攻自破，而应劭却沿用这种说法又加以补充说明，尤为可笑。《左传》记载范宣子的话说：“我范礪部的祖宗在商代为豕韦氏，在周代为唐杜氏。”杜预解释说：“豕韦建国都于东郡的白马县（今河南滑县旧城东），商朝末期建国都于唐（今山西境内）地，周成王时派兵消灭了它。”这一记载，最可以证明豕韦氏的兴亡情况，可惜颜师古没有引用。

匡衡守正

【原文】 汉元帝时，贡禹奏言：“天子七庙，亲尽之庙宜毁，及郡国庙不应古礼，宜正定。”天子下其议，未及施行而禹卒。后乃下诏先罢郡国庙，其亲尽寝园，皆无复修。已而上寝疾，梦祖宗谴罢郡国庙。诏问丞相匡衡，议欲复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惶恐，祷高祖、孝文、孝武庙曰：“亲庙宜一居京师，今皇帝有疾不豫，乃梦祖宗见戒以庙，皇帝悼惧，即诏臣衡复修立。如诚非礼义之中，违祖宗之心，咎尽在臣衡，当受其殃”。又告谢毁庙曰：“迁庙合祭，久长之策。今皇帝乃有疾，愿复修立承祀。臣衡等咸以为礼不得，如不合诸帝后之意，罪尽在臣衡等，当受其咎。今诏中朝臣具复毁庙之文，臣衡以为天子之祀，义有所断，无所依缘，以作其文。事如失措，罪乃在臣衡。”

予按衡平生佞谀，专附石显以取大位，而此一节独据经守礼，其祷庙之文，殆与《金縢》之册祝相似，而不为后世所称述，《汉史》又不书于本传，憎而知其善可也。《郊祀志》：南山巫祠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也。以其强死，魂魄为厉，故祠之。成帝时，匡衡奏罢之，亦可书。

【译文】 汉元帝时，大臣贡禹上奏说：“皇帝供奉七代祖先的庙，比七代更远的祖先的庙应当撤除，另外地方各郡各封国内的供奉祖先的庙与古代礼法

不符的，应当改正重定。”皇帝把他的建议下发，没来得及实行贡禹便去世了。后来便下诏命令先撤除地方各郡各封国远祖的庙，那些比七代以前的祖先陵园，都不再修整。事后皇帝患了重病，梦见祖宗谴责撤除各郡各封国祖先庙的事，汉元帝下诏向丞相匡（原作“康”，避宋太祖赵匡胤名讳）衡询问，商议要恢复撤除的庙。匡衡竭力说明不能恢复。汉元帝的病很长时间不愈，匡衡惶恐，向汉高祖、汉文帝、汉武帝的庙祈祷，说：“皇上祖先的庙应当统一放在京师。现在皇帝有病不愈，梦见祖宗告诫祠庙的事，皇帝很是惶恐，立即下诏命令臣子匡衡重新建立。如果此事确实不合礼义，违背了祖宗的心愿，过错全在我匡衡身上，我应当承受处罚。”又对撤除祠庙的事谢罪说：“迁移祠庙合并祭祀，这是长久之策。现在皇帝却患了病，愿意重新修建献祭，臣子匡衡等都认为不合礼法。如果不符合各先帝先皇后的意思，罪过全在臣子匡衡等人身上，应当承受惩罚。现在下诏命令朝中大臣草拟恢复被毁祠庙的文件。臣子匡衡认为皇帝的祭礼，按礼义是有界限的，找不到依据，用以撰写恢复祠庙的文件。事情如果违背您们的旨意，罪过全在臣子匡衡。”我考察匡衡平生喜欢阿谀奉承，专靠投靠石显取得高官，而在这一件事上唯独能引经据典坚守礼法。他向汉朝祖庙祈祷的话，几乎与《尚书·金縢》中记载的周公祈祷的话相似，然而却不被后人称赞记述，《汉书》也没有把此事写进《匡衡传》。憎恨一个人同时又知道他的长处是可以的。《汉书·郊祀志》记载，南山用巫士祭祀秦中，秦中就是秦朝二世皇帝。因为他是被害死的，灵魂变成厉鬼，所以祭祀他。汉成帝时匡衡上奏请求停止祭祀，也可以写入史书。

西极化人

【原文】 《列子》载周穆王时，西极之国有化人来，王敬之若神。化人谒王同游，王执化人之袂，腾而上者中天乃止，暨及化人之宫，自以居数十年，不思其国。复谒王同游，意迷精丧，请化人求还。既寤，所坐犹 者之处，侍御犹 者之人。视其前，则酒未清，肴未 。王问所从来，左右曰：“王默存耳。”穆王自失者三月。后问化人，化人曰：“吾与王神游也，形奚动哉？”予然后知唐人所著《南柯太守》、《黄粱梦》、《樱桃》、《青衣》之类，皆本乎此。

【译文】 《列子》中记载，西周穆王时，西边国有个会幻术的化人来到这里，穆王对他像神一样尊敬他。会幻术的人邀请穆王同他一起出游，当穆王拉着他的袖口时，化人猛然向上飞腾，一直到半空才停止，之后到了化人的宫殿，

自己觉得已经在这里停留居住了几十年，而不想着返回他的国家。后来这位化人又请穆王一起出游，穆王神志迷乱，不知所在，就请求化人让他返回故地。穆王苏醒之后，发现自己仍然坐在原来所坐的地方，在他身边陪伴伺候的人也还是原来侍候他的那些人。再看面前的桌上，摆的酒和鱼肉之类的菜肴也还没有收拾。穆王问旁边的人他们从何而来，左右的人说：“穆王您默默不语地坐在这里。”穆王默默不语等待了三个月之后，又问化人出游是怎么回事，化人回答说：“我与穆王您一起在神游，我们的形体怎么能会动呢？”我读了这则记载，才知道唐朝人所著的《南柯太守》、《黄粱梦》、《樱桃》、《青衣》之类的东西，原来都是来源于这里。

诏令不可轻出

【原文】 人君一话一言不宜轻发，况于诏令形播告者哉！汉光武初即位，既立郭氏为皇后矣，时阴丽华为贵人，帝欲崇以尊位。后固辞，以郭氏有子，终不肯当。建武九年，遂下诏曰：“吾以贵人有母仪之美，宜立为后，而固辞不敢当，列于媵妾。朕嘉其义让，许封诸弟。”乃追爵其父及弟为侯，皆前世妃嫔所未有。至十七年，竟废郭后及太子强，而立贵人为后。盖九年之诏既行，主意移夺，已见之矣。郭后岂得安其位乎？

【译文】 君主的每一句话都不应该轻易说出，何况以诏书命令形式下达于四方的呢！东汉光武帝刚即位时，已册立郭氏为皇后。当时阴丽华为贵人，光武帝想让她做皇后。阴氏坚决推辞。又由于郭氏已有了儿子，阴氏终究也不肯做皇后。建武九年（33年），光武帝下诏说：“我认为贵人阴丽华有作为天下女子表率的美德，作母的典范，应该立她为皇后，但她坚决推辞，不敢升居皇后位，而安于姬妾之列。我奖赏她的谦让，准许册封她的所有弟弟为官。”于是追赠她的父亲和弟弟为侯爵，这在以前嫔妃亲属中是不曾有过的。但到了建武十七年（41年），竟然废去了郭皇后和太子强，而册立贵人阴丽华为皇后。那么，建武九年诏令既已实行，而光武帝又立贵人为后，他的主意的改变，从这里可以看清楚了。郭皇后怎么能够安居于皇后之位呢？

战国策

【原文】 刘向序《战国策》，言其书错乱相揉，莒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 ”为“肖”，以“齐”为“立”，如此类者多。予按今传于世者，大抵不可读，其《韩非子》、《新序》、《说苑》、《韩诗外传》、《高士传》、《史记索隐》、《太平御览》、《北堂书钞》、《艺文类聚》诸书所引用者，多今本所无。向博极群书，但择焉不精，不止于文字脱误而已。惟太史公《史记》所采之事九十有三，则明白光艳，悉可稽考，视向为有间矣！

【译文】 刘向在为《战国策》所作的序中说，这部书错乱甚多，莒本《战国策》中许多字误脱成了半个字，如以“禪”为“肖”，以“齐”为“立”等，如此之类不胜枚举。我认为，现今传世的《战国策》本子，大多都不可阅读。其他《韩非子》、《新序》、《说苑》、《韩诗外传》、《高士传》、《史记索隐》、《太平御览》、《北堂书钞》、《艺文类聚》诸书所引用的《战国策》内容，有不少是现今流行本中没有。刘向博览群书，但校证《战国策》并不细致，这部书中不仅仅存在文字脱误问题。仅以司马迁《史记》所载为例，他的书中采用《战国策》的记载九十三条，语言流畅，意思明白，且都有据可查。刘向的学问与司马迁相比，差的远了。

范晔汉志

【原文】 沈约作《宋书·谢俨传》曰：“范晔所撰十志，一皆托俨。搜撰垂毕，遇晔败，悉蜡以覆车。宋文帝令丹阳尹徐湛之就俨寻求，已不复得，一代以为恨。其志今阙。”晔本传载晔在《狱中与诸生侄书》曰：“既造《后汉》，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不果。”此说与俨传不同，然俨传所云乃《范纪》第十卷公主注中引之，今《宋书》却无，殊不可晓。刘昭注《补志》三十卷，至本朝乾兴元年，判国子监孙奭始奏以备前史之阙。故淳化五年监中所刊《后汉书》凡九十卷，惟帝后纪十卷，列传八十卷，而无志云。《新唐书·艺文志》：“刘昭补注《后汉书》五十八卷。”不知昭为何代人。所谓《志》三十卷，当在其中也。

【译文】 沈约写的《宋书·谢俨传》说：“范晔把撰写《后汉书》十篇《志》书的任务，全都托付给谢俨。搜集史料撰写接近完成，遇到范晔谋反事败露，就把文稿纸制成蜡纸糊贴在车棚上。宋文帝命令丹阳尹徐湛之到李俨处寻求，已经不再能得到，一代人都因此事而遗憾。《后汉书》现在便没有《志》书。”《宋书·范晔传》记载范晔在狱中写的《与诸生侄书》中说：“既然写《后汉书》，就想把各种《志》书全写齐，《前汉书》所有的《志》都让《后汉书》也完备。虽然记述的事不一定多，但要使读了它们了解事情全貌。又想在书中每卷后面就事发议论，用以说明一代朝政的得失，这些打算都没能实现。”这里讲的同《谢俨传》记载的不同。然而《谢俨传》的那些文字，乃是范晔《后汉书》《纪》的第十卷《公主》一篇的注文征引的，现在《宋书》却没有《谢俨传》，很令人费解。刘昭《注补志》三十卷，到我宋朝乾兴元年（1022年），才由判国子监孙奭向朝廷提出加以采用以便补充《后汉书》的不足。所以淳化五年（994年）国子监所刊印的《后汉书》，一共九十卷，只有皇帝皇后的《纪》十卷，《列传》八十卷，而没有《志》。《新唐书·艺文志》载：“刘昭《补注后汉书》五十八卷。”不知刘昭是哪个朝代的人，所讲的《志》书三十卷，应当包含在这《补注后汉书》里面。

缮修犯土

【原文】 今世俗营建宅舍，或小遭疾厄，皆云犯土。故道家有谢土司章之文。按《后汉书·来历传》所载：“安帝时皇太子惊病不安，避幸乳母野王君王圣舍。太子厨监邴吉以为圣舍新缮修，犯土禁，不可久御。”然则古有其说矣。

【译文】 现今世间习俗，凡是营建宅舍，如果多少遇到一点挫折，都认为是冒犯了土神。所以，道学家祭祀时有告谢土司章禳的文章。根据《后汉书·来历传》记载：“东汉安帝时，有一次皇太子受惊心神不安，就逃避到他的乳母野王君王圣的宿舍里。当时太子厨监邴吉认为，王圣的宿舍是新近修缮而成，冒犯了土神的禁制，皇太子不可久留。”由此看来，在古代也有这种说法。

卷 二

诸家经学兴废

【原文】 稚子问汉儒所传授诸经，各名其家，而今或存或不存，请书其本末为《四笔》一则。乃为采摭班史及陆德明《经典释文》并他书，删取纲要，详载于此。

《周易》传自商瞿始。至汉初，田何以之颍门。其后为施仇、孟喜、梁丘贺之学，又有京房、费直、高相三家。至后汉，高氏已微。晋永嘉之乱，梁丘之《易》亡。孟、京、费氏人无传者，唯郑康成、王弼所注行于世。江左中兴，欲置郑《易》博士，不果立，而弼犹为也所重。韩康伯等十人并注《系辞》，今唯韩传。

《尚书》自汉文帝时伏生得二十九篇，其后为大小夏侯之学。古文者，武帝时出于孔壁，凡五十九篇，诏孔安国作传，遭巫蛊事，不获以闻，遂不列于学官，其本殆绝，是以马、郑、杜预之徒皆谓之《逸书》。王肃尝为注解。至晋元帝时，《孔传》始出，而亡《舜典》一篇，乃取肃所注《尧典》，分以续之，学徒遂盛。及唐以来，马、郑、王注遂废，今以孔氏为正云。

《诗》自子夏之后，至汉兴，分而为四，鲁申公曰《鲁诗》，齐轅固生曰《齐诗》，燕韩婴曰《韩诗》，皆列博士。《毛诗》者出于河间人大毛公，为之故训，以授小毛公，为献王博士，以不在汉朝，不列于学。郑众、贾逵、马融皆作《诗》注，及郑康成作笺，三家遂废。《齐诗》久亡，《鲁诗》不过江东，《韩诗》虽在，人无传者，唯《毛诗》郑笺独立国学，今所遵用。

汉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即今之《仪礼》也。《古礼经》五十六篇，后苍传十七篇，曰《后氏曲台记》，所余三十九篇名为《逸礼》。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戴圣又删为四十九篇，谓之《小戴礼》。马融、卢植考诸家异同，附戴圣篇章，去其烦重及所省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也。王莽时，刘歆始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在《三礼》中最为晚出。

左氏为《春秋传》，又有公羊、谷梁、邹氏、夹氏。邹氏无师，夹氏无书。

《公羊》兴于景帝时，《谷梁》盛于宣帝时，而《左氏》终西汉不显。迨章帝乃令贾逵作训诂。自是《左氏》大兴，二传渐微矣。

《古文孝经》二十二章，世不复行，只用郑注十八章本。

《论语》三家：《鲁论语》者，鲁人所传，即今所行篇次是也；《齐论语》者，齐人所传，凡二十二篇；《古论语》者，出自孔壁，凡二十一篇，各有章句。魏何晏集诸家之说为《集解》，今盛行于世。

【译文】 我的幼子向我询问说，汉代儒家所传授的诸多经籍，每家都有每家的名称，而现在有的保留下来，有的却已散失，他建议我叙述其源流本末，作为《四笔》中的一则。于是，我采择班固《汉书》、陆德明《经典释文》以及其他的史书，提纲挈领，在此作一具体叙述。

《周易》始传于春秋时鲁国人商瞿。至汉初，田何因单独传授而成为一家。其后习学的有施仇、孟喜、梁丘贺，又有京房、费直、高相三家。到了东汉，高氏一家已衰微。晋代永嘉之乱时，梁丘贺所传《周易》散失。孟、京、费氏三家的主张也无人下传，只有郑玄，王弼所作的注释行于世。东晋中兴，准备设置郑玄注释的《易》学博士官，但未能实现，而王弼的注释特别为当时世人所重。韩康伯等十人曾注释《系辞》，今唯有韩注传于世。

《今文尚书》二十九篇，汉文帝时的优生是最早传授者。其后有夏侯胜开创的“大夏侯学”和夏侯建开创的“小夏侯学”。《古文尚书》是汉武帝时从孔子住宅壁中发现的，共五十九篇。汉武帝曾下令让孔安国进行注释，由于遇上“巫蛊之狱”事件出现，其注释未能进呈，因而也未能列于官学。这个注本已经失传。列于官学，他的注本大概已经绝传，所以马融、郑玄、杜预等人都称《古文尚书》为《逸书》。王肃也曾为之作过注解。到晋元帝时，孔安国注释的《孔传》开始出现，而散失一篇《舜典》。《舜典》是由《尧典》的下半篇分出，并附加了二十八字，于是又摘取王肃所注《尧典》中的部分作补。这样，传习的人逐渐多起来。自唐以来，马融、郑玄、王肃所注废而不用，现在以孔氏本为正宗。

《诗经》从子夏以后，到汉朝建立，传者分为四家：鲁国申公传的称《鲁诗》，齐国轅固生传的称《齐诗》，燕国韩婴传的称《韩诗》，西汉时都设立博士官。《毛诗》出于河间人大毛公相传为毛亨所传，他对其中的词句作了解释，传授给小毛公相传为毛萇，曾为河间献王博士，因时间不在汉朝，故不列于官学。郑众、贾逵，马融都曾作《诗经》注解，到郑康成作了笺注了之后，他们三家之注废而不用。《齐诗》早已散失，《鲁诗》没有流传到江东地区，《韩诗》虽流于世，但无人传授，只有《毛诗》郑康成笺注独自为京师国学采用，作为定本，

沿用至今。

汉代高堂生传下来的《士礼》十七篇，就是今天的《仪礼》。《古礼经》共五十六篇，后苍传下来的十七篇，称为《后氏曲台记》，其余的三十九篇，名为《逸礼》。汉代戴德曾将二百零四篇《古礼》删繁就简，改编为八十五篇，称为《大戴礼》。戴圣又删编为四十九篇，称为《小戴礼》。而后马融、卢植又考证诸家的不同说法，附入戴圣所作的篇章之后，删去烦琐、重复并补入缺略的部分，流行于世间，这就是现今的《礼记》。西汉王莽执政时，刘歆向朝廷建议创立《周官经》学，作为《周礼》，它在《仪礼》、《礼记》、《周礼》三部书中出现最晚。

左丘明作《春秋传》，又有公羊、谷梁、邹氏、夹氏几家。邹氏的学说在汉代无人传习，夹氏的学说没有书籍留世。《公羊》学兴起于汉景帝时期，《谷梁》学盛行于汉宣帝时期，而《左氏》学一直到西汉末也没有显扬于世。到东汉章帝时，才令贾逵为之作注解，从此以后《左氏》学大兴，而《公羊》、《谷梁》之学逐渐衰落下去。

《古文孝经》二十二章本，世间不复流行，只有郑玄注释的十八章本传习。

《论语》共三家：《鲁论语》是鲁人所传授的，就是现在所通行的本子；《齐论语》是齐人所传授的，共二十二篇；《古论语》从孔子住宅的墙壁中发现的，共二十一篇。以上三家各有分章析句的解释，三国魏时何晏汇集诸家注释编成《集解》，现今盛行于世。

汉人姓名

【原文】 西汉名人如公孙弘、董仲舒、朱买臣、丙吉、王褒、贡禹，皆有异世与之同姓名者。《战国策》及《吕氏春秋》：齐有公孙弘，与秦王、孟尝君言者。明帝时，又有幽州从事公孙弘，交通楚王英，见于《虞延传》。高祖时，又有谒者贡禹。梁元帝时，有武昌太守朱买臣、尚书左仆射王褒。后汉安帝时，有太子厨监邴吉。南齐武帝之子巴东王子响为荆州刺史，要直阁将军董蛮与同行，蛮曰：“殿下癫如雷，敢相随耶？”子响曰：“君敢出此语，亦复奇癫。”上闻而不悦曰：“人名‘蛮’，复何容得酝酿。”乃改为“仲舒”。谓曰：“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答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先帝。以此言之，胜昔远矣”然此人后不复见。

【译文】 西汉的著名人物如公孙弘、董仲舒、朱买臣、丙吉、王褒、贡禹，

其他时代都有与这些人同姓名的人。《战国策》和《吕氏春秋》所记齐国有个人叫公孙弘，曾与秦王、孟尝君谈过话。东汉明帝时，又有个幽州（今北京城西南）从事官叫公孙弘，曾与楚王刘英来往，事见《后汉书·虞延传》。汉高祖时，有个谒者名叫贡禹。南梁元帝时，有武昌（今属湖北）太守朱买臣、尚书左仆射王褒。东汉安帝时，有太子厨监官邴吉。南齐武帝之子巴东王萧子响上任荆州（今湖北江陵）刺史时，邀请直阁将军董蛮伴其同行，董蛮说：“殿下您疯癫如雷，我怎么敢同你一起而行吗？”子响回答说：“你敢说出这样的话，也说明你也是一个特别疯癫的人。”武帝听说后，颇不高兴，便说：“人的名字叫蛮，又怎么能够含蓄文雅呢？”于是，就将他的名字改为仲舒。有人问：“今日仲舒与昔日仲舒相比如何呢？”回答说：“昔日仲舒之名，是自己给自己起的名字，今日的仲舒是由先帝下令而定的。由此说来，今日的仲舒为昔日仲舒所不能比拟的。”然而，今日仲舒其人，后来诸书中再没有提及他。

轻浮称谓

【原文】 南齐陆慧晓立身清肃，为诸王长史行事，僚佐以下造诣，必起迎之。或曰：“长史贵重，不宜妄自谦屈。”答曰：“我性恶人无礼，不容不以礼处人。”未尝卿士大夫，或问其故，慧晓曰：“贵人不可卿，而贱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轻重于怀抱！”终身常呼人位。今世俗浮薄少年，或身为卑官，而与尊者言话，称其侪流，必曰“某丈”。谈其所事牧伯监司亦然。至于当他人父兄尊长之前，语及其子孙甥婿，亦云“某丈”。或妄称宰相执政贵人之字。皆大不识事分者，习惯以然，元非简傲也。予常以戒儿辈云。

【译文】 南齐陆慧晓为人处世清廉恭敬，在任诸王长史时，遇有僚佐下人来找，必定起身接迎。有人说：“长史官地位清贵崇重，不应该随便自谦自屈去接待下人。”他回答说：“我的性格厌恶人不讲礼貌也不容许自己无礼对待别人。”他没有任过卿士大夫官，有人问其原因，慧晓说：“清贵的人不可以担任卿官，而卑贱的人才可充任，人生在世上何必要把位居轻重高低作为自己的追求抱负呢？”他一生在与人交往中，总是称呼别人的官爵。现在世俗轻浮的年轻人，有的只作了很小的官，而同长辈师长谈话时，说起同辈人，必称“某丈”。谈到他们所事奉的知州、监司时也这样称呼。甚至于在他人父兄尊长面前提起对方的孙子、外甥、女婿时，也称“某丈”。还有的妄自直呼宰相执政这些显官贵人的名字。这些都是不懂事体名分的做法。由于习惯而成了自然，其实这些称谓原

本并没有怠慢、轻蔑之意。我常常以此来告诫儿子们。

鬼谷子书

【原文】 鬼谷子与苏秦、张仪书曰：“二足下功名赫赫，但春华至秋，不得久茂。今二子好朝露之荣，忽长久之功。轻乔、松之永延，贵一旦之浮爵。夫女爱不极席，男欢不毕轮。痛哉夫君”《战国策》楚江乙谓安陵君曰：“以财交者，财尽而交绝；以色交者，华落而爱渝。是以嬖女不敝席，宠臣不敝轩”。吕不韦说华阳夫人曰：“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诗·氓》之序曰：“华落色衰，复相弃背。”是诸说大抵意同，皆以色而而喻。士之嗜进而不知自反者，尚监此哉！

【译文】 鬼谷子在给苏秦、张仪的信中说：“你们两位有赫赫功名，但春花到了秋天，不可能久盛不衰。现在你们两位喜欢早晨露水一样的荣誉，忽略了建立长久功业的打算。轻视乔松声名之永垂，崇尚一时之虚位。大凡女子对男子的爱情不等席子磨损就消逝，男子对女子的爱情不等车轮磨损就会丧失。我为你们真感到悲伤啊！”《战国策》中记载楚国江乙曾对安陵君说：“友情建立在钱财的基础上，钱财没有了友情也就断绝了。友情建立在美色的基础上，容貌衰败了宠爱也就失了。所以受宠的女子不破坏席宴乘车的规定，得宠的臣僚不破坏等级高下的规定。”吕不韦也劝华阳夫人说“以美色事奉人者，容貌衰退则宠爱消失。”《诗经·氓》的序中又说：“女子容貌衰退，就会心相背而遭遗弃。”这诸多说法的意思大抵相同，都是以女人的美色事作比喻来告诫人们该怎样去做。士大夫们只知道追求晋升高位而不知道反省自己，还没有以此为鉴啊！

有美堂诗

【原文】 东坡在杭州作《有美堂会客诗》，颌联云：“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读者疑海不能立，黄鲁直曰：盖是为老杜所误，因举《三大礼赋朝献太清宫》云：“九天之云下垂，四海之水皆立”以告之。二者皆句语雄峻，前无古人。坡和陶《停云》诗有“云屯九河，雪立三江”之句，亦用此也。

【译文】 苏轼在杭州，写了《有美堂会客诗》。第三、四句是：“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天外刮来的黑风吹起狂涛，整个大海像似站立起来；

浙江东面的雨像似飞过浙江西面来)。”读这首诗的人怀疑海不能站立，黄庭坚说：“大概是上了杜甫的当。”随后他便举《三大礼赋朝献太清宫》诗的例子，把此诗中“九天之云下垂，四海之水皆立（九重天的云都下垂，四海的水都站立起来）”告诉那位读诗人。我认为这两联诗辞语都很雄伟奇峻，前无古人。苏轼和陶渊明诗中的《亭云》有“云屯九河，雪立三江（云彩笼罩无数大河，白雪充塞了江河上空像一堵直立的墙）”也用的这种描写手法。

张天觉小简

【原文】 张天觉熙宁中为渝州南川宰。章子厚经制夔夷，狎侮州县吏，无人敢与共语。部使者念独张可亢之，檄至夔。子厚询人才，使者以告，即呼入同食，张著道士服，长揖就坐。子厚肆意大言，张随机折之，落落出其上，子厚大喜，延为上客。归而荐诸王介甫，遂得召用。政和六年，张在荆南，与子厚之子致平一贴云：“老夫行年七十有四，日阅佛书四五卷，早晚食米一升、面五两、肉八两，鱼、酒佐之，以此为常，亦不服暖药，唯以呼吸气昼夜合天度而已。数数梦见先相公，语论如平生，岂其人在天仙间，而老夫定中神游或遇之乎？嗟乎，安得奇男子如先相公者，一块吾胸中哉！”此贴藏致平家，其曾孙简刻诸石。予今年亦七十四岁，侄孙 于长兴得墨本以相示，聊记之云。

【译文】 张商英字天觉，在神宗熙宁年间任渝州（今四川重庆市）南川县县令。当时章惇（字子厚）负责经划夔州（今四川奉节）边区民族事务，轻蔑、欺侮州县官吏，没有人敢去同他谈话。本路的长官想到唯有张天觉可以与章子厚抗言说劝，于是下文召张天觉到夔州。章子厚寻求有才能的人，使者引荐了张天觉。章子厚喊他进入一起用餐。张天觉身穿道士服，拱手作揖后就座。章子厚大发议论，张天觉随机应变，思辨能力明显高出一筹。章子厚非常高兴，把他作为宾宴上客招待。回京后就把他引荐给王安石。于是张天觉便调到京师受到重用。政和六年（1116年），张天觉在荆南（今湖北江陵）时，在给章子厚儿子章致平的一封信中说：“老夫我已经是将近七十四岁的人了，每天阅读佛教经典四五卷，早晚吃饭用米一升、面五两、肉八两，另外还配以鱼和酒，习以为常，也不服药养身，只以这样平平常常地渡过日日夜夜。我晚上经常梦见您已故的宰相父亲，他言谈笑语如同活着一样，难道他在阴间的天仙世界里，而老夫我一定要神游那里与他会面不可？唉，从哪里可以找得到像您父亲那样的奇伟男子而能使我心中得到愉快呢！”这封书信藏在章致平的家中，章子厚的曾

孙章简把它刻在石碑上。我今年也已七十四岁了，我侄子的孙子洪禮在长兴（今属浙江）得到了这封书信碑文的拓片，拿来让我看，这里姑且记之于此。

城狐社鼠

【原文】 “城狐不灌，社鼠不熏。”谓其所栖穴者得所凭依。此古语也，故议论者率指人君左右近习为城狐社鼠。予读《说苑》所载孟尝君之客曰：“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熏也。臣未尝见稷狐见攻，社鼠见熏，何则？所托者然也。“稷狐”之字，甚奇且新。

【译文】 “城狐不灌，社鼠不熏。”就是说狐、鼠它们栖居的穴室有所依靠凭借。这是远古语句。所以议论得失的人们大率指君王左右的亲信为城狐社鼠。我读《说苑》时，看到当中记载孟尝君的门客说：“狐是人们所攻打的东西，鼠是人们所讨厌的东西。而臣我未尝见到过稷狐被围攻，（“稷”，以及下文“社鼠”的“社”，原指古代祭祀的谷种和土神。“社稷”合称，旧时用作国家的代称，这里即暗指这个意思。稷狐社鼠比喻依势为奸的人。）社鼠被讨打，为什么呢？就在于它们各自有所倚恃的原因。”“稷狐”的“稷”字，用得十分奇特、新颖。

用兵为臣下利

【原文】 富公奉使契丹，虏主言欲举兵。公曰：“北朝与中国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故北朝群臣争劝举兵者，此皆其自谋，非国计也。胜负未可知，就使其胜，所亡士马，群臣当之欤？抑人主当之欤？”是时，语录传于四方，苏明允读至此，曰：“此一段议论，古人有之否？”东坡年未十岁，在旁对曰：“记得严安上书云：‘今徇南夷，朝夜郎，略 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龙城，议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长策也。’正是此意。”明允以为然。予又记魏太武时，南边诸将表称宋人大严，将入寇，请先其未发逆击之。魏公卿皆以为当。崔伯深曰：“朝廷群臣及西北守将，从陛下征伐，西平赫连，北破蠕蠕，多获美女珍宝。南边诸将闻而慕之，亦欲南钞以取资财。皆营私计，为国生事，不可从也。”魏主乃止。其论亦然。

【译文】 富弼奉命出使契丹（辽朝），辽朝皇帝声称要发兵南下攻宋。富弼说：“你们辽朝与我宋朝相互通好，君王可以独享由此所带来的利益好处，而大臣们则得不到什么。若对宋用兵则好处归臣下所有，而君王要承担战争的责任。所以贵朝大臣们纷纷要求出兵，都是他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并非为你们国家着想。现在双方胜负还未可预知，即使你们胜了，那么战争损失士兵、马匹的责任，是臣下承担呢？还是君王承担呢？”当时，富弼的话被记录下来传到四方各地。苏洵（字明允）看到这段话时说：“这段议论，过去有没有人说过？”不到十岁的苏东坡在旁边回答道：“我记得西汉严安曾上书说：‘今日带兵巡行占领南夷地区，强迫夜朗朝见，攻掠襁州，建置城邑，军队深入匈奴地区，焚烧其龙城（匈奴祭天，大会诸部的地方。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人们以此为自豪，这能给臣下带来好处，却并不是治理天下的长久之策。’这里所说正是这个意思。”苏洵以为他说得对。我又记得北魏太武帝时，南部边防的将领们上表声称刘宋人严阵以待，准备入侵，请求先发制人，主动发动攻击。北魏的公卿大臣都认为这个意见可行。只有崔伯深上言道：“朝廷群臣和西北边区的镇守将领，曾跟随陛下向外征伐，西边占领赫连，北边攻破柔然，他们由此掠战了许多美女和珍宝。南边诸将听到后十分羡慕，也要向南进攻以掠取资财。这些都是为了贪图私利，给国家制造事端，不可听从他们的意见。”于是，北魏太武帝便放弃了出兵攻宋的打算。他的这番议论也同前面一样。

志文不可冗

【原文】 东坡为张文定公作墓志铭，有答其子厚之一书云：“志文路中已作得大半，到此百冗未绝笔，计得十日半月乃成。然书大事略小节，已有六千余字。若纤悉尽书，万字不了，古无此例也。知之知之。”盖当时恕之意但欲务多耳。又一贴云：“志文谒告数日方写得了，谨遣持纳。衰病眼眩，辞翰皆不佳，不知可用否？”今志文正本凡七千一百字，铭诗百六十字云。予乡土作一列大夫小郡守行状九千言，衢州士人诣阙上书二万言，使读之者岂不厌倦，作文者宜戒之。坡贴藏梁氏竹斋，赵晋臣镌石于湖南宪司楚观。

【译文】 东坡（苏轼）为张方平写墓志铭，有答复张方平的儿子厚之（张恕）的一封信，信中说：“墓志铭在路途上已写了一多半，到现在杂事太多没能写完，估计再有十天半个月就写成。然而记述大事忽略细节，已有六千余字，如果每件事都细致记述，一万字也打不住，自古没有先例，请你务必察知。”大概

张恕的意思只希望多写而已。又一封信说：“墓志铭请了几天假才写成，现派人将它送上。身体衰弱多病眼花目眩，措辞文采都不够好，不知能用不能？现在墓志铭正文共七千一百字，铭诗一百六十字。”我们乡里士人写一普通大夫或小州知州的形状也要写九千字，衢州有位士人到京师上书长达二万字，难道不会使读它们的人感到厌倦？写文章的人应引以为戒。苏轼的信收藏在梁氏竹斋。赵晋臣把它刻成碑，立在湖南提刑司的楚观内。

赵杀鸣犊

【原文】 《汉书·刘辅传》：“谷永等上书曰：‘赵简子杀其大夫鸣犊，孔子临河而还。’”张晏注曰：“简子欲分晋国，故先杀鸣犊，又聘孔子。孔子闻其死，至河而还也。”颜师古曰：“《战国策》说二人姓名云：鸣犊、铎矜。而《史记》及《古今人表》并以为鸣犊、窦矜。盖‘铎’、‘犊’及‘窦’，其声相近，故有不同耳。今永等指鸣犊一人，不论窦矜也。”韩退之《将归操》亦云：“孔子之赵，闻杀鸣犊作。”予按今本《史记·孔子世家》，乃以为窦鸣犊、舜华。《说苑·权谋篇》云：“晋有泽鸣、犊矜”。其不同如此。

【译文】 《汉书·刘辅传》载：“谷永等人上书说：‘赵简子杀了他的大夫官鸣犊，孔子从卫国出发去投奔赵简子，走到黄河边听到这个消息，又返回来了。’”张晏注释说“简子想要分割晋国，所以先杀了鸣犊，又聘请孔子。孔子听到鸣犊已死，走到黄河边又回来了。”颜师古说：“《战国策》记载鸣犊、铎两个人的姓名，而《史记》和《古今人表》两书都作鸣犊、窦。大概‘铎’、‘犊’和‘窦’三字读音相近，所以过去的记载出现差异。这里谷永等人上书只提到鸣犊一人，而没有说到窦。”韩愈在《将归操》中也说这首曲是因孔子前往赵国，路途中听说杀鸣犊的事情发生而作。我查现今本《史记·孔子世家》，书作窦鸣犊、舜华。《说苑·权谋篇》记载为：“晋有泽鸣、犊二人。”几种说法，竟然如此不同。

五帝官天下

【原文】 汉盖宽饶奏封事，引《韩氏易传》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成功者去。”坐指意欲求禅而死。故或

云自后称天子为“官家”，盖出于此。今世无《韩氏易》，诸家注释《汉书》，皆无一语。惟《说苑·至公篇》云：“秦始皇帝既吞天下，召群臣议：五帝禅贤，三王世继，孰是？博士鲍令之对曰：‘天下官，则选贤是也；天下家，则世继是也。故五帝以天下为官，三王以天下为家。’始皇帝叹曰：‘吾德出于五帝，吾将官天下，谁可使代我后者！’”此说可以为证，辄记之以补《汉》注之缺。蒋济《万机论》亦有官天下、家天下之语。

【译文】 汉代盖宽饶在密封上书中，引用《韩氏易传》的话说：“五帝把天下作为公共的，三王把天下作为自己一家的私产。把天下看成是自家的就传位给儿子，把天下看成是公共的就传位给贤人，就像四季运转一样，前代良好的制度一去不复返了。”由于他极力主张实行禅让制度而被判处死罪。所以有人认为从此以后称天子为“官家”，大概就是出自这里。现今《韩氏易传》已看不到了，诸家对《汉书》的注释中，都无一句提及其事。只有《说苑·至公篇》记载：“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召集群臣商议：五帝任贤统治，三王世袭统治，哪种做法可取！博士官鲍令之回答说：‘以天下为官，就是选用贤能的人为官；以天下为家，于是家族世代相承为官。所以，五帝把天下视为公共的，三王以天下作为自己的私产，’秦始皇感叹说：‘我的圣德源于五帝，我将选用天下的贤人来统治国家，那么有谁可以代替我而继承后业呢！’”有关于官天下、家天下的说诗，由此可得到证明，这里姑且记录下来以补《汉书》注释之缺。蒋济《万机论》中也有官天下、家天下的说法。

黄帝李法

【原文】 《汉书·胡建传》：“《黄帝李法》。”苏林曰：“狱官名也。《天文志》：‘左角，李；左角，将。’”颜师古曰：“李者，法官之号也，其书曰《李法》”唐《世系表》：“李氏自皋陶为尧大理，历虞、夏、商，世世作此官，以官命族为理氏。至纣之时，逃难于伊侯之墟，食木子得全，遂改‘理’为李氏。”予按今本《汉书·天文志》骑官：“左角，理。”乃用“理”字，而《史记·天官书》则为“李”，《说苑》载胡建事亦为“理法”。然则“理”、“李”一也。故《左传》数云“行李往来”。杜预注曰：“行李，使人也。”至郑子产与晋盟于平丘，则曰：“行理之命。”注亦云：“行理，使人通聘问者。”其义益明。皋陶作大理，传子孙不改，迨商之季几千二百年，世官久任，仓氏、库氏不足道矣。表系疑不可信。

【译文】 《汉书·胡建传》中载有《黄帝李法》一书。苏林解释说：“这是用管刑狱的官名定的书名。《天文志》中载：‘左角，李，右角，将。’”颜师古注释说：“李是法官的名称，故称其书为《李法》。”《唐书·世系表》中说：“东夷族的李氏自传说中的首领皋陶时起，就担任了尧帝的大理官，以后经过虞舜、夏朝、商朝，李氏世代都担任大理官，于是后来用官名来称本族姓氏为理氏。至商纣王时，理氏外逃避难于伊侯的废墟地，靠吃树上的果子才得以活下来，于是又改“理”为李氏。”我据今本《汉书·天文志》骑官条记载：“左角，理。”是用“理”字，而《史记·天官书》中的同一记载则作“李”。《说苑》记载胡建事情时也称“理法”。可见，无论用“理”还是“李”，意思都一样。所以《左传》中多次提到“行李往来”。杜预为此作注说：“行李，就是使者。”《左传》中记载郑子产同晋国在平丘会盟时，又提到“行理之命”。杜预也注释说：“行理，是担负外交使命的使者。”这里所讲的就更明确了。李氏自皋陶时就任大理官，以后子孙世代相承不变，一直到商朝末期，前后时间延续将近一千二百年。如果真有这样父子相继、世代长久担任大理官的情况，那么仓氏和库氏跟理氏相比也就不值得称道了。《唐世系表》中所记，我怀疑并不可信。

抄传文书之误

【原文】 今代所传文书，笔吏不谨，至于成行脱漏。予在三馆假庾自直《类文》，先以正本点检，中有数卷皆以后板为前，予令书库整顿，然后录之。他多类此。周益公以《苏魏公集》付太平州镂板，亦先为勘校。其所作《东山长老语录序》云：“侧定政宗，无用所以为用；因蹄得兔，忘言而后可言。”以上一句不明白，又与下不对，折简来问。予忆《庄子》曰：“地非不广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尔。然而厠足而垫之致黄泉，知无用而后可以言用矣。”始验“侧定政宗”当是“厠足致泉”，正与下文相应，四字皆误也。因记曾鵬所书陶渊明《读山海经》诗云：“形夭无千岁，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义若不贯，遂取《山海经》参校，则云：“刑天，兽名也，口中好衔干戚而舞。”乃知是“刑天舞干戚”，故与下句相应，五字皆讹。以语友人岑公休、晁之道，皆抚掌惊叹，亟取所藏本是正之。此一节甚类苏集云。

【译文】 当今所传抄的文献书籍，由于书写刊刻的人不用心仔细，以致造成成行脱漏。我在三馆任职时，借来庾自直的《类文》一书，先用正本点校，结果发现其中有几卷都是把后面的内容移到了前面，我让书库官整理然后才录用。

其他的书也大多与此相类。周益公将《苏魏公集》交付太平州制版印刷，也是先作校勘。其中《东山长老语录序》一文中有说：“侧定政宗，无用所以为用；因蹄得兔，忘言而后可言。”前一句意思不明白，又与下句文意不通，于是周益公写信问我。我记得《庄子》里说：“世间的土地并不是不广大，人站立所使用的不过是两脚脚掌那么小的一块土地。然而如果人不生存在世上而被土埋入黄泉，这个时候方知有了无用的土地，而后才可以谈到那些有用的土地。”由此可以证明上文中所说的：“侧定政宗”应为“厠足致泉”。这样正好与下文相对应，原文中四个字都是错的。于是我又想起曾昀所抄写的陶渊明《读山海经》诗中有：“形矢无千岁，猛志固常在。”我怀疑这句诗上下文意不相连贯，于是就取来《山海经》对校，原书中说：“刑天是一种野兽的名字，口中好衔着矛和盾跳舞。”因而才知道是“刑天舞干戚”，这样才可与下句相对应，原诗中五字均错。我把这事对友人岑公休、晁之道说了，他们都拍手惊叹，马上取出他们所藏的本子进行校正。这一错误，与《苏魏公集》中的错误很相似。

二十八宿

【原文】 二十八宿，宿音秀。若考其义，则止当读如本音。尝记前人有说如此。《说苑·辩物篇》曰：“天之五星，运气于五行，所谓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其义昭然。

【译文】 二十八宿，“宿”读“秀”字音。如若考求它的本意，则只应读作“宿”字的本音。曾记得前人就有这样的说法。《说苑·辩物篇》中记载：“天上的金、木、水、火、土五星，运气于五行，所谓宿，就是太阳、月亮和五星归宿之地。”这里“宿”的意思是一清二楚的。

大观元夕诗

【原文】 大观初年，京师以元夕张灯开宴。时再复湟、鄯，徽宗赋诗赐群臣，其颌联云：“午夜笙歌连海峤，春风灯火过湟中。”席上和者皆莫及。开封尹宋乔年不能诗，密走介求援于其客周子雍，得句云：“风生阖闾春来早，月到蓬莱夜未中。”为时辈所称。子雍，汝阴人，曾受学于陈无已，故有句法。则作文为诗者，可无师承乎？

【译文】 我朝徽宗大观初年的除夕之夜，京城里张灯结彩，举行宴会。当时再度收复西边的湟州（今青海乐都县南湟水南岸）和鄯州（今青海乐都），徽宗赋诗赐给当时的大臣们。他曾点头联句道：“午夜笙歌连海峤，春风灯火过湟中。”宴席上应和的诗都比不上。当时在座的开封府（今河南开封）尹宋乔年不会作诗，于是他就偷偷地让靠近他的人转告客友周子雍，请他帮助，因而得以赋诗道：“风生闾阖春来早，月到蓬莱夜未中。”当即受到客友们的称赞。周子雍是汝阴（今安徽阜阳）人，曾跟陈无已学习，所以善于作诗。由此看来，能够作文章、赋诗句的人，怎么可以没有名师传授的因素呢！

颜鲁公帖

【原文】 颜鲁公忠义气节，史策略尽。偶阅临汝石刻，见一帖云：“政可守不可不守，吾去岁中言事得罪，又不能逆道苟时，为千古罪人也，虽贬居远方，终身不耻。汝曹当须谓吾之志不可不守也。”此是独赴谪地，而与其子孙者，无由考其岁月。千载之下，使人读之，尚可畏而仰也。

【译文】 颜鲁公（颜真卿）的忠义有气节，史书上记述几乎是很详尽了。偶尔看临汝石刻，看到一张拓片上他的手迹：“政事可以坚持的不能不坚持。我去年里上奏议论政事得罪，又不能违背正道投合时尚成为千古罪人。虽然遭贬居住远方，终生也不以不耻，你们必须知道我的志向是不能放弃的。”这些话是他单独前往被贬谪地点，而写给他的儿孙们的，无法考定写作的年月。事隔数百年，让人读了它，仍然觉得敬畏而仰慕。

文潞公奏除改官制

【原文】 自熙宁以来，士大夫资历之法，日趋于坏，岁甚一岁，久而不可复清。近年愈甚，综核之制，未尝能守。偶见文潞公在元盥中任平章军国重事，宣仁面谕，令具自来除授官职次序一本进呈。公遂具除改旧制节目以奏，其一云：“吏部选两任亲民，有举主，升通判。通判两任满，有举主，升知州、军，谓之‘常调’。知州、军有绩效，或有举荐，名实相副者，特擢升转运使、副、判官，或提点刑狱、府推、判官，谓之‘出常调’。转运使有路分轻重远近之差。河北、陕西、河东三路为重路，岁满多任三司使、副，或发运使。发运任满，亦

充三司副使。成都路次三路，京东西、淮南又其次，江东西、荆湖、两浙又次之。二广、福建、梓、利、夔路为远小。已上三等路分，转运任满，或就移近上次等路分，或归任省府判官，渐次擢充三路重任。内提点刑狱，则不拘路分轻重除授。”潞公所奏乃是治平以前常行，今一切荡然矣。京朝官未尝肯两任亲民。才为通判，便望州郡。至于监司，既无轻重远近之间，不复以序升擢云。

【译文】 自宋神宗熙宁以来，士大夫们凭资历论辈制度日趋破坏，这种破坏的程度，一年比一年严重，久而久之，已经不可能再度理清。尤其是近些年来，其破坏的程度更加厉害，官吏的综合考察制度，未尝能够遵守。我偶尔一次看到，文潞公彦博于哲宗元祐年间任平章军国重事（宰相）时，宣仁太后面谕他，令他吧宋朝以来选任官职的规定写成一个文本进呈。文彦博于是就把历来官职选任、变化的旧制度写明上奏宣仁皇后。其中的一段说：“吏部诠选两任的亲民官，有举主推荐，可升任通判。通判年满两任，有举主推荐，可升任知州、知军，称为‘常调’。知州、知军政绩突出，或者为其他官员举荐的，若查实所说的情况与他的表现相符合，可以特别提升为转运使、转运副使、转运判官，或提点刑狱、各府推官和判官，称为‘出常调’。转运使官有所处路望轻重、距离远近的差别。河北、陕西、河东三路为要的路，任满后大多改任三司使、三司副使，或者发运使。发运使任满，也改任三司副使。其次由重到轻又分为成都府路，京东西、淮南路，江东西、荆湖、两浙路。其他两广、福建、梓州、利州、夔州路为边远的小路。以上这三等小路的转运使任满，有的就近改任上一个等级的转运使，有的返回原地担任三司判官，逐渐依次提升为河北等重要路的转运使。提点刑狱官的选任，则不受路的等级限制。”文彦博在给朝廷的上书所说的，是我朝英宗治平年以前经常实行的官制，现在这一切已经荡然无存。京官和朝官中，未尝有人愿意经历两任亲民官，刚任通判，就期望知州郡官。至于转运司、提刑司等地方监司的官员，既没有轻重远近的等级划分，也没有按资历依次升迁的制度。

待制知制诰

【原文】 庆历七年，曾鲁公公亮，自修起居注除天章阁待制。时陈恭公独为相，其弟妇王氏，冀公孙女，曾出也。当月旦出拜，恭公迎语之曰：“六新妇，曾三做从官，想甚喜。”应声对曰：“三舅荷伯伯提挈极欢喜，只是外婆不乐。”恭公问故，曰：“外婆见三舅来谢，责之曰：汝第五人及第，当过词掖，想是全

废学，故朝廷如此处汝。”恭公默然自失，后竟改知制诰。盖恭公不由科第，不谙典故，致受讥于女子。而此女对答之时，元未尝往外家也，其警慧如此。国家故事，修注官次补必知制诰，惟赵康靖公以欧阳公位在下，而欲先迁，司马公以力辞，三人皆除待制，其杂压先后可见云。

【译文】 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年），曾鲁公公亮，官位自修起居注晋升为天章阁待制。当时陈恭公执中一人为宰相，他的弟媳王氏，是冀公王钦若的孙女，是曾夫人生出的。出嫁时曾公亮也前来祝贺。当月初一王氏出来行问安礼的时候，陈恭公迎上向她：“六媳妇（下文有恭公第五人及第，故这里称其弟弟为六），有曾老三做侍从官，想来十分高兴吧！”冀公孙女应声对答说：“三舅承蒙你提携高兴，只是外婆不高兴。”恭公问她外婆为什么不高兴？她回答道“外婆看见三舅来致谢，就责备说：‘你参加科举考试考取名排第五位，按照惯例应当晋升为替皇帝起草文书的官。而现在想必是完全荒废了学业，所以朝廷才安排你去干这样的事。’”陈恭公听后默不作声，自觉有失落感，后来还是让曾公亮改任知制诰。由于陈恭公不是正规科举出身，不熟悉国家典章制度及事例，所以受到女子的讥笑。而这位王氏与他对答时，还未尝到娘家去，她的机敏聪慧竟达到如此高的程度。按国家旧制度，修起居注官升必为知制诰，只有赵康靖公自己认为欧阳修官位居他之下，要让欧阳修先晋升，司马光坚持不同意，于是当时三人都被任命为待制。这从他们上朝时排列的先后顺序就可以明显看出了。

裴行俭 景阳

【原文】 裴行俭为定襄道大总管，讨突厥。大军次单于北，暮已立营，堑壕既周，更命徙营高冈。吏白：“土安堵不可扰。”不听，促徙之。比夜风雨暴至，前占营所，水深丈余，众莫不骇叹。问何以知之，行俭曰：“自今第如我节制，毋问我所以知也。”按《战国策》云：“齐、韩、魏共攻燕，楚王使景阳将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马各营壁地，已植表，景阳怒曰：‘女所营者水皆至灭表，此焉可以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营者水皆灭表，军吏乃服。”二事正同，而景阳之事不传。

【译文】 裴行俭任唐朝定襄道大总管，讨伐突厥，大军到了突厥单于驻地的北面，天色已黑，已立起营帐，堑壕也挖好了，裴行俭却又下令将军营迁徙到高冈上。有关官员说：“战士已经安歇，不能搅扰。”裴行俭不听，督促部下

移营。等到夜间，突然刮起风下起大雨，以前扎营的地方，水有一丈多深，众人没有不惊讶感叹的。人们问裴行俭怎么知道会这样？裴行俭说：“从今以后你们只按我指挥行动便是了，不要问我怎样知道的。”按《战国策》载：“齐国、韩国、魏国联合出兵攻打燕国，楚国派景阳作将军率兵救燕国。傍晚扎营，景阳让左右司马各自选择扎营地点。已经立起了军营四角的木柱，景阳生气地说：“你们扎营的地方将来水都要把木柱淹没，这些地方哪能扎营！”便下令改换营地。第二天下起大雨，山水汹涌奔来，过去扎营的地方水深都可淹没木柱，军官们才服气。”两件事正好相同，而景阳的事没有流传。

北人重甘蔗

【原文】 甘蔗只生于南方，北人嗜之，而不可得。魏太武至彭城，遣人于武陵王处求酒及甘蔗。郭汾阳在汾上，代宗赐甘蔗二十条。《子虚赋》所云：“诸柘巴且。”诸柘者，甘柘也。盖相如指言楚云梦之物。汉《郊祀歌》“泰尊柘浆”，亦谓取甘蔗汁以为饮。

【译文】 甘蔗只生于南方，北方人喜欢食用，却难以得到。北魏太武帝抵达彭城（今江苏徐州市）后，派人到武陵王那里索要酒和甘蔗。唐代郭子仪在山西汾水河畔，代宗皇帝赐给他甘蔗二十根。汉代文学家司马相如在《子虚赋》中记：“诸柘巴且。”诸柘就是甘柘。司马相如大概是说甘蔗是楚国云梦地区的产物。《汉书·礼乐志》载《郊祀歌》内有“泰尊柘浆”之语，意思是“大杯的甘蔗浆液”，也说取甘蔗汁做饮料。

卷 三

韩退之张籍书

【原文】 韩公集中有《答张籍》二书，其前篇曰：“吾子所论，排释、老不若著书。若仆之见，则有异乎此，请待五六十然后为之。吾子又讥吾与人为无实驳杂之说，此吾所以为戏耳。若商论不能下气，或似有之。博塞之讥，敢不承教！”后篇曰：“二氏行乎中土，盖六百年，非可以朝令而夕禁，俟五六十为之未失也。谓吾与人商论不能下气，若好胜者。虽诚有之，抑非好己胜也，好己之道胜也。驳杂之讥，前书尽之。昔者夫子犹有所戏，乌害于道哉？”大略籍所论四事：乞著书、讥驳杂、谏商论好胜及博塞也。今得籍所与书，前篇曰：“汉之衰，浮图之法入中国，黄、老之术，相沿而炽。盍为一书，以兴存圣人之道？执事多尚驳杂无实之说，使人陈之前以为欢，此有累于盛德。又商论之际，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胜者，亦有所累也。况为博塞之戏与人竞财乎？废弃日时，不识其然。愿绝博塞之好，弃无实之谈，宏虑以接士，嗣孟轲、扬雄之作，使圣人之道，复见于唐。”后篇曰：“老、释惑于生人久矣，执事可以任著书之事。君子汲汲于所欲为，若皆待五六十而后有所为，则或有遗恨矣。君子发言举足，不远于礼，未闻以驳杂无实之说以为戏也。执事每见其说，则拊呼笑，是挠气害性，不得其正矣。”籍之二书，甚劲而直。但称韩公为“执事”，不曰“先生”。考其时，乃云“执事参于戎府。”按韩公以贞元十二年为汴州推官，时年二十有九。十五年为徐州推官，时年三十有二，年位未盛，籍未以师礼事之云。

【译文】 韩愈文集中有《答张籍》的两封书信，前一篇中说：“您所论述的观点，认为排斥佛教、道教之说，不如自己去著书立说。卑人我的观点，与您的认识有所不同，认为等到五六十岁之后再著述也为时不晚。您又讥讽我给人传授无实际内容而驳杂不精的学问，这是我经常用来开玩笑取乐的事。您还指出我商讨问题时不能心平气和，这种情况是有过的。至于你讥刺我玩弄博塞之戏，我怎敢不接受你的赐教！”后一篇中说：“佛、道二教在中国流行，大约有六百年之久，并不是早上下令而晚上就能制止的，待我五六十岁以后著书立

说以弃绝佛道也并不会有什么妨碍。你认为我与别人讨论问题不能平心静气，好象我是要强好胜。如果真是这样，我也并不是喜好自己取胜，而是希望我所讲的道理取胜。关于你对我学问驳杂不精的讥刺，我的观点在上次信中已说的十分明确。关于这一点，过去的老师们也曾把它作为平素戏玩的常事，这对探讨问题的道理有什么害处呢！”大致张籍所论述的有四个问题：建议著书立说，讥讽驳杂之学，劝谏商讨好胜以及玩弄博塞之戏。现在我查到张籍写给韩愈的两封书信，其前篇中说：“汉代衰亡之后，佛教之法传入中国。黄帝、老子的学说，由于代代沿习而日益盛行。您为何不撰著一部书去振兴和发扬圣人的学说呢！您更多的是崇尚驳杂不精的学问，这些东西使人读起来感到某种快乐，但有损于您的高尚品德。另外，在与别人相互商讨问题时，有时您对别人的短处不能宽容，好象是固执己见争强好胜，也有损于你的形象。更何况玩弄博塞游戏与别人争夺钱财呢？丢弃大德之学的时间长了，也就不知道这些是有损于大德的行为。希望您能改掉玩博塞游戏的嗜好，舍弃驳杂无实的言论，宽宏大量地结交士人，继承孟轲、扬雄的学术传统，著书立说，使得圣人的道德思想在唐代发扬广大。”

后一篇中说：“佛、道之学蛊惑人们思想的时间长了，您可以著书立说，宣传圣德，批判佛道。道德高尚的君子们迫切希望杜绝这些邪说，如果都等到五十、六十岁之后再做此事，那么或许就会只有遗憾和后悔。高尚君子的一言一行，都不远离礼义的范围，没有听说过把驳杂不实的学问作为自己习玩为常的研究内容。您每每看到这类说教，就会击胸拍掌又喊又笑，所以这种学问影响了您的气质、本性，使您不能从事于圣贤道德的研究。”张籍这两封书信，态度十分中肯也很坦率。这里只称韩愈为“执事”，而不称“先生”。据查张籍致书韩愈的时间，乃是“执事（韩愈）参于戎府”的时候。韩愈于唐德宗贞元十二年（796年）任汴州（今河南开封县）推官，当时是二十九岁。贞元十五年（799年）任徐州（今属江苏）推官，当时三十二岁。因为他年岁还不算大，所以，张籍在信中没有以老师的礼节对待他。

韩公称李杜

【原文】 《新唐书·杜甫传赞》曰：“昌黎韩愈于文章重许可，至歌诗，独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诚可信云。”予读韩诗，其称李、杜者数端，聊疏于此：《石鼓歌》曰：“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酬卢云夫》曰：

“高揖群公谢名誉，远追甫白感至矜。”《荐士》曰：“勃兴得李杜，万类困凌暴。”《醉留东野》曰：“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感春》曰：“近怜李杜无检束，烂漫长醉多文辞。”并唐《志》所引，盖六用之。

【译文】 《新唐书·杜甫传》后面的赞语说：“祖籍昌黎的韩愈在评价文章方面不轻易赞许人，在诗歌方面，唯独推崇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李白杜甫的诗文常在，光芒万丈长）’，确实是可信的。”我读韩愈的诗，看到几处称颂李白杜甫的文字，姑且抄录在此。《石鼓歌》说：“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少陵原空了杜甫号称谪仙的李白也已死去，才学浅薄又怎能把石鼓文破译）？”《酬卢云夫》说：“高揖群公谢名誉，远追甫白感至诚（向各位高朋深深行礼致谢请大家不要夸奖我，想起去世多年的李白杜甫我为他们的真诚友谊而感动，让我们来效法他们）。”《荐士》说：“勃兴得李杜，万类困凌暴（李白、杜甫像耀眼的明星突然升起，所有的事物都被他们描写得原形毕现）。”《醉留东野》说：“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过去阅读李白、杜甫的诗，常常遗憾不能和他们生在当时、彼此相随）。”《感春》说：“近怜李杜无检束，烂漫长醉多文辞（近来很喜爱李白、杜甫无拘无束，虽然喝酒喝得酩酊大醉，却因此留下许多华美诗篇）。”连同《新唐书》所引的，大概六次引用。

此日足可惜

【原文】 韩退之《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凡百四十句，杂用东、冬、江、阳、庚、青六韵。及其亡也，籍作诗祭之，凡百六十六句，用阳、庚二韵，其语铿锵震厉，全仿韩体。所谓“乃出二侍女，合弹琵琶箏”者是也。

【译文】 韩愈所作的《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诗，共一百四十句，诗中穿插用了东、冬、江、阳、庚、青六字韵。到他去世时，张籍作诗祭悼他，共一百六十六句，使用阳、庚二字韵，其语句铿锵有力，完全仿照韩愈诗的文体风格。所谓“乃出二侍女，合弹琵琶箏”之句，即是出之于此。

粉白黛黑

【原文】 韩退之为文章，不肯蹈袭前人一言一句。故其语曰：“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独“粉白黛绿”四字，似有所因。《列子》：“周穆王筑

中天之台，简郑、卫之处于娥 靡曼者，粉白黛黑以满之。”《战国策》张仪谓楚王曰：“郑、周之女，粉白黛黑，立于衢间，见者以为神。”屈原《大招》：“粉白黛黑，施芳泽只。”司马相如：“靓庄刻饰。”郭璞曰：“粉白黛黑也。”《淮南子》：“毛嫱、西施，施芳泽，正蛾眉，设笄珥，衣阿锡，粉白黛黑，笑目流眇。”韩公以“黑”为“绿”，其旨则同。

【译文】 韩愈作文章，不喜欢蹈袭前人文章中的一言一句。所以，他曾说过：“作文章务必要达到不沿习别人的陈词滥调，可真是难啊！”而他的文章中，唯有“粉白黛绿”四个字，似乎是对前人的东西有所沿用。《列子》中记载：“周穆王建筑中天的高台，选择郑国、卫国未婚女子中年轻貌美者，用粉白黛黑擦饰后集中在这里充实高台。”《战国策》中张仪对楚王说：“郑国、周室附近的女子，用粉白黛黑擦饰后，站在大街上，看见的人都以为是神仙。”屈原《大招》中也记：“粉白黛黑，施用香水香脂。”司马相如《上林赋》也有“美丽细致地化妆”之语。郭璞对此解释说：“是用粉白黛黑化妆的意思。”《淮南子》中载：“毛嫱、西施二人，用芳露粉饰面容，描画长而美的眉毛，头带簪子耳带环，身着轻细的丝织布衣。用粉白黛黑化妆后，面带笑容目光流露出柔情。”韩愈在文章中把“黑”字改作“绿”字使用，其意思与前人是一致的。

李杜往来诗

【原文】 李太白、杜子美在布衣时，同游梁、宋，为诗酒会心之友。以杜集考之，其称太白及怀赠之篇其多。如“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南寻禹穴见李白，道甫问讯今何如”，“李白一斗诗百篇，自称臣是酒中仙”，“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昔者与高李，晚登单父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寂寞书斋里，终朝独尔思”，“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凡十四五篇。至于太白与子美诗略不见一句。或谓《尧祠亭别杜补阙》者是已。乃殊不然，杜但为右拾遗，不曾任补阙，兼自谏省出为华州司功，迤逦避难入蜀，未尝复至东州，所谓“饭颗山头”之嘲，亦好事者所撰耳。

【译文】 李太白（李白）、杜子美（杜甫）在没作官的时候，一起到梁州、宋州旅游，是一块饮酒作诗的知心朋友。就杜甫诗集考察，其中称赞或提到李

白以及怀念李白和寄赠李白的诗篇很多。例如：“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南寻禹穴见李白，道甫问讯今何如”，“李白一斗诗百篇，自称臣是酒中仙”，“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昔者与高李，晚登单父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寂寞书斋里，终朝独尔思”，“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等等，共有十四五篇。至于李白写给杜甫的诗，几乎一句也看不到。有人说《尧祠亭别杜补阙》就是他赠给杜甫的诗。实际上不是。杜甫只做过右拾遗，没有担任补阙。再者，他从解除右拾遗职务后出外担任华州（今陕西华县）司功官，以后又辗转避难于四川，就没有再到过东边的州郡，这首诗中“饭颗山头”之类的嘲语，是李白取笑杜甫作诗太拘谨的说法，恐怕也是好事之人杜撰出来的。

李太白怖州佐

【原文】 李太白《上安州裴长史书》云：“白窃慕高义，得趋末尘，何图谤言忽生，众口攒毁，将恐投杼下客，震于严威。若使事得其实，罪当其身，则将浴兰沐芳，自屏于烹鲜之地，惟君侯死生之。愿君侯惠以大遇，洞开心颜，终乎前恩。再辱英眄，必能使精诚动天，长虹贯日。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即膝行面前，再拜而去耳。”裴君不知何如人，至誉其贵而且贤，名“飞天京”，天才超然，度越作者，棱威雄雄，下慑群物。予谓白以白衣入翰林，其盖世英姿，能使高力士脱靴于殿上，岂拘拘然怖一州佐者邪！盖时有屈伸，正自不得不尔。大贤不偶，神龙困于蝼蚁，可胜叹哉！白此书自叙其平生云：“昔与蜀中友人吴指南，同游于楚，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服恸哭，炎月伏尸，猛虎前临，坚守不动，遂权殡于湖侧。数年来，观筋骨尚在，雪泣持刃，躬申洗削，裹骨徒步，负之而趋，寝兴携持，无辍身手，遂丐贷营葬于鄂城。”其存交重义如此。“又与逸人东岩子隐于岷山，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其养高忘机如此。而史传不为书之，亦为未尽。

【译文】 李太白（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讲：“李白倾慕您的高尚品行，有幸能追随您的后边，哪里想到流言蜚语忽然产生，不少人一诋毁我，我恐怕您会听信诽谤，生气显示威严驱逐我。假如事情确实，罪行发生在我身上，我就将用香水洗身，自动地离开管理政事的州府，全凭官长您决断。希望您宽宏

大量施予恩惠，解颜息怒，使以前的恩德有始有终，再次给予关照，必定能使精诚感动天地，出现长虹冲向太阳的奇观。如果您赫然显示神威，同时勃然大怒，我使用双膝跪行向前，向您行礼然后离去罢了。”这位裴长史不知是怎样的人，以致李白称赞他高贵而且贤明，名声飞到都城，天才超乎寻常，甚至超过李白，威风凛凛，居高临下地使众人畏惧。我觉得李白以没有官位的白衣人身份进入翰林院，他有超乎世人的气概，能让高力士在宫殿上脱靴子，难道会可怜地惧怕一名州长官的副手吗？因为情况有顺境逆境，正赶上某种情况不得不这样，大贤人没遇到好机会，神奇的巨龙被蝼蛄蚂蚁所围困，不胜令人感叹！李白在这封书信中自己叙述自己以往的经历说：“过去和四川友人吴指南一块到楚地旅行，吴指南死在洞庭湖上，李白我穿上丧服痛哭，夏天伏在尸体上，猛虎来了，我坚守不动，便将吴指南临时葬在湖边。几年以后又来寻找，看到吴指南遗骸还在，流着泪手持工具，亲自洗涤整理，把他的尸骨裹好背着徒步跋涉，白天黑夜都携带身边，从不离身离手，便沿路乞讨把他安葬在鄂城。”李白是如此地注重友谊和作人准则。其中又讲到“又和隐士东岩子在岷山隐居，搭窝棚住了数年，不到城市去。养珍奇飞禽数以千计，一招呼就全都飞到手掌上啄取食物，对人完全不畏惧。”他培养高尚情操遗忘俗事竟是这样。而新旧《唐书·李白传》不记载这些事，也可说是不够完备。

祝不胜诅

【原文】 齐景公有疾，梁丘据请诛祝史。晏子曰：“祝有益也，诅亦有损。聊、摄以东，姑、尤为西，其为人也多矣。虽其善祝，岂能胜亿兆人之诅？”晋中行寅将亡，召其太祝欲加罪。曰：“子为我祝，斋戒不敬，使吾国亡。”祝简对曰：“今舟车饰，赋敛厚，民怨谤诅多矣。苟以为祝有益于国，则诅亦将为损。一人祝之，一国诅之，一祝不胜万诅，国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此二说若出一口，真药石之言也。

【译文】 齐景公患病时，梁丘据请求处死负责祈祷的祝史官。晏子就说：“祝福如果对人有帮助，那么诅咒也会有坏处。在聊、摄以东，姑水、尤水以西地区，诅咒的人也多。即使这里的祝史善于祝福，又怎么能够胜过亿万人之诅咒呢？”晋国中行寅行将死去的时候，召见他的太祝官祝简，要治他的罪。中行寅说：“你身为我负责祝福的官员，斋戒心不清敬，致使我的国家面临灭亡的危险。”太祝官祝简回答说：“现在的战车战船造得多装饰豪华，赋税繁重，百姓

怨恨的诽谤咒语很多。如果说祝福有益于国家，那么诅咒也将有害于国家。一个人祝福，而一国人诅咒，一人祝福不可能胜过万人诅咒，这样国家的灭亡也就是自然的了，负责祝福的人又有何罪？”以上两段话就像出自于一人之口，这真是像用于治病的药物和砭石一样的言论。

吕子论学

【原文】 《吕子》曰：“天生人而使其耳可以闻，不学，其闻则不若聋；使其目可以见，不学，其见则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学，其言则不若喑；使其心可以智，不学，其智则不若狂。故凡学，非能益之也，达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败之，可谓善学者矣。”此说甚美，而罕为学者所称，故书以自戒。

【译文】 《吕氏春秋·劝学》说：“天造就人而让人的耳朵可以听，不学习，人的听力就不如聋子；让人的眼睛可以看见东西，不学习，人的视力就不如瞎子；让人的嘴可以讲话，不学习，人讲话的能力就不如哑巴；让人的心可以思考，不学习，人的智力就不如疯子傻子。所以学习的功用归结起来，并非能使人的天赋增加，却可以使人的天赋能充分发挥作用。能全面地发挥人的天生潜能，而不荒废人的天赋，就可以称作是善于学习的了。”这种说法很好，而很少见到有学者称引，所以写下来告诫自己。

曾太皇太后

【原文】 唐德宗即位，访求其母沈太后，历顺宗，及宪宗时为曾祖母，故称为曾太皇太后，盖别于祖母也。旧、新二《唐书·纪》皆载之。今慈福太皇太后在寿康太上时，已加尊称，若于主上则为曾祖母，当用唐故事加曾字。向者尝以告宰相，而省吏以为典故所无，天子逮事三世，安得有前比，亦可谓不知礼矣。又嗣濮王士歆在隆兴为从叔祖，在绍熙为曾叔祖，庆元为高叔祖矣，而仍称皇叔祖如故。士歆视嗣秀王伯圭为从祖，今圭称皇伯祖，而歆但为皇叔祖，乃是弟尔。礼寺亦以为国朝以来无称曾高者，彼盖不知累朝尊属，元末之有也。

【译文】 唐德宗即位后，到处访求他的母亲沈太后。以后经过顺宗，到宪宗时沈太后已成为皇帝的曾祖母，所以称曾太皇太后，这是为了同祖母相区别。《旧唐书》和《新唐书》的《本纪》中，都记载有这件事。现今的慈福太皇太后

吴氏，在为寿康太上皇（宋孝宗）时已加封了皇太后尊号，对当今皇上孝宗而言，她应该是曾祖母，应按唐朝旧例加一“曾”字。过去曾经有人把这个建议告诉了宰相，而相府的官员认为，宋朝过去没有这样的例子，皇上族系为政已相继经历了三世，怎么能有前代与此相比，这也可以说是不懂礼义的表现。另外，嗣濮王赵士歆，在隆兴年间为孝宗的从叔祖，在绍熙时为光宗的曾叔祖，在绍熙年间为宁宗的高叔祖，而仍然称之为皇叔祖，没有变化。赵士歆是嗣秀王赵伯圭的从祖父，现在赵伯圭称皇伯祖，而赵士歆则为皇叔祖，成了赵伯圭的弟弟。大礼寺也认为宋朝自建立以来没有称曾或高的例子，他们大概不知道多少朝代以来，皇上亲族的称谓，原本没有这种称法。

中天之台

【原文】 中天之台有二：其一，《列子》曰：“西极化人见周穆王，王为之改筑宫室，土木之功，赅埒之色，无遗巧焉。五府为虚，而台始成。其高千仞，临终南之上，名曰‘中天之台’。”其一，《新序》曰：“魏王将起中天台，许绾负操锺入，曰：‘臣能商台？’王曰：‘若何？’曰：‘天与地相去万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当起七千五百里之台。高既如是，其趾须方八千里，尽王之地不足以为台趾。必起此台，先以兵伐诸侯，尽有其地，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为台趾。度八千里之外，当定农田之地，足以奉给王之台者。台具以备，乃可以作。’王默然无以应，乃罢起台。”

【译文】 所谓“中天之台”有两个：其中一个，见于《列子》的记载：“西方极远的地方来的会幻术的人进见周穆王，为周穆王改建宫室，大兴土木工程，涂饰红白颜料，竭尽奇巧。国库的储存全用光了，而台才建成。台高千仞（每仞八尺），高居终南山上面，名叫中天之台。”其中另一个，见于《新序》的记载：“魏王要建中天之台，许绾背负铁铲等工具进入王宫，说：‘臣子我能规划这座台。’魏王说：‘怎样建？’回答说：‘天与地相距一万五千里，现在大王想让台高达到天地距离的一半，应当建高七千五百里的台，高度既然这样，它的基础必须有八千里见方，大王您的领地全算上还不够建台基的。一定要建此台，要先派军队进攻各诸侯国，把他们的土地全夺过来，再进攻四方夷人聚居区域，才能凑够八千里见方的土地，便够建造台基了。算计八千里见方的土地以外，还应当确定耕种务农的土地，数额足够供给大王的台基的饮食需要，建台的条件齐备，才可以动工。’魏王沉默没有反驳他的话，便放弃建台的

想法。”

实年官年

【原文】 士大夫叙官阙，有所谓实年、官年两说，前此未尝见于官文书。大抵布衣应举，必减岁数，盖少壮者欲藉此为求昏地；不幸潦倒场屋，勉从特恩，则年未六十始许入仕，不得不豫为之图。至公卿任子，欲其早列仕籍，或正在童孺，故率增抬庚甲有至数岁者。然守义之士，犹曰儿曹甫策名委质，而父祖先导之以挟诈欺君，不可也。比者以朝臣屡言，年及七十者不许任监司、郡守，缙绅多不自安，争引年以决去就。江东提刑李信甫，虽春秋过七十，而官年损其五，坚乞致仕，有旨官年未及，与之外祠。知房州章 六十八岁，而官年增其三，亦求罢去。诸司以其精力未衰，援实为请，有旨听终任。知严州秦 乞祠之疏曰：“实年六十五，而官年已逾七十。”遂得去。齐庆胄宁国乞归，亦曰：“实年七十，而官年六十七。”于是实年、官年之字，形于制书，播告中处，是君臣上下公相为欺也。掌故之野甚矣，此岂可纪于史录哉？

【译文】 宋代士大夫叙官履历，有所谓“实年”、“官年”两种说法。这种制度以前未曾在官方文书中见到过。大致是这样：平民参加科举考试，一定要少报岁数，以期及第后凭少壮年岁的条件向富室人家求婚；如果不幸潦倒场屋，不得已走特奏名的路子，年龄在六十岁以下的人才可以委任官职。所以，他们不得不预先考虑年龄问题。位居公卿品官的子孙通过恩荫做官，因有年龄限制，想让他们尽早登入仕途，有的还处于幼童时期，这样一般多虚增年龄，有的多至好几岁的。然而恪守信义的士大夫仍认为，儿子们初次应举的情况，要与他们的年龄相符合，而祖父父亲首先教导他们心怀鬼诈欺骗朝廷。这是不适宜的。不久前，因为朝臣屡次上言请求，才规定年满七十者不准再担任监司、郡守官。而做官的人大多对此心怀不安，他们争相以少报或多报年龄的办法来确定自己是否留任。江东提点刑狱使李信甫，虽已年过七十，而官年却只六十五岁，坚持要求退休。朝廷下令因为他官年不够七十，安排他到外地去担任祠禄官（宫观官）。房州（今湖北房县）知州章禔实际年龄六十八岁，而官年却虚增三岁，也请求退休。有关官司认为他精力尚好，根据实际情况，极力要求他留任，所以，朝廷下令准许他等到本届任期终了再议。严州（今浙江建德县东北）知州秦禔请求辞任祠禄官的上疏中说：“我实际年龄六十五岁，而官年已超过了七十岁。”于是，准许他离职了。齐庆胄（字宁国）请求退职时也说：“我实年七十

岁，而官年方六十七岁。”所以，实年、官年之语便出现在皇帝的诏令和其他文书中，传播于朝野内外，这是君臣上下公开地相互欺骗。这种情况发展蔓延十分广泛，难道能将这些记录在史册上吗？

雷公炮炙论

【原文】 《雷公炮炙论》，载一药而能治重疾者，今医家罕用之，聊志于此。其说云：“发眉堕落，涂半夏而立生。目辟眼，有五花而自正。脚生肉，系若根。囊皱漩多，夜煎竹木。体寒腹大，全赖鸬鹚。血泛经过，饮调瓜子。咳逆数数，酒服熟雄。遍体疹风，冷调生侧。肠虚泄利，须假草零。久渴心烦，宜投竹沥。除症去块，全仗硝、硃。益食加觔，须煎芦、朴。强筋健骨，须是苁、。驻色延年，精蒸神锦。知疮所在，口点阴胶。产后肌浮，甘皮酒服。脑痛，鼻投硝末。心痛，速觅延胡。”凡十八项。谓眉发堕落者，炼生半夏茎，取涎涂发落处，立生。五花者，五加皮也，叶有雄雌，三叶为雄，五叶为雌，须使五叶者作末，酒浸用之，目者正。脚有肉者，取莨菪根，系带上，永痊。多小便者，煎葶服之，永不夜起。若患腹大如鼓，米饮调鸬鹚末服，立枯如故。血泛行者，捣甜瓜子仁作末去油，饮调服之，立绝。咳逆者，天雄炮过，以酒调一钱，匕服。疹风者，侧子附子旁生者。作末，冷酒服。虚泄者，捣五倍子末，熟水下之。症块者，以硃砂、硝石二味，乳钵中研作粉，同锻了，酒服、神效。不饮者并饮酒少者，煎逆水芦根并厚朴二味，汤服之。苁蓉并鱼作末，以黄精汁圆服之，可力倍常日也。黄精自然汁拌细研神锦，于柳木甑中，蒸七日了，以蜜圆服，颜貌可如少女之容色。阴胶即是甑中气垢，点少许于口中，即知脏腑所起，直彻至住处知痛，足可医也。产后肌浮，酒服甘皮立枯。头痛者，以硝石作末，内鼻中，立止。心痛者，以延胡索作散，酒服之。

【译文】 《雷公炮炙论》一书中，记载有一种药物能治好一种病的办法，现在行医者已很少使用，姑且抄寻于此。其中有：“头发眉毛脱落，涂半夏汁而生。眼睛歪斜，服用五花自正。脚生鸡眼，裤子上系若根而愈。腹中翻腾而尿频，晚上煎熬竹杆服用即好。身寒腹胀，要吃水老鸦。经血过量，要调和服用瓜子。打嗝不止，配酒服用熟雄。全身出现班疹，调配生侧冷服。肠虚肚泄，须用草零。口渴心烦，宜喝竹子汁。要治腹中结硬块的病，全靠服用硝石和硃砂。增加食欲并想要多喝酒，须煎熬芦、朴汤服用。强筋健骨，要用苁和鳊。润面长寿，蒸煮神锦服用。要知道症疮位于何处并治好它，就把阴胶点入口中。产后肌皮松

弛，酒服甘皮。头痛，要往鼻子里洒入硝末。心痛，速找延胡服用。”以上共十八种治病秘方。其中说毛发脱落的病，榨取生的半夏茎汁涂于脱落处，毛发很快就可以再生。五花就是五加皮，它的叶有雄雌两种，三片叶为雄叶，五片叶为雌叶，必须用五片的雌叶拈碎成末，泡在酒里服用，可以治好眼斜。脚上长鸡眼的病人，取来莨菪根，把它用带子捆在脚上，这样以后永久就不会再长了。小便多的人，煎熬萆薢服用，就会永不夜间起来小便。如果患腹大如鼓的病，用米汤调配水老鸦碎末服用，腹部很快恢复原状。经血过多的人，把甜瓜的子仁捣碎成末，再除去子油，调入水中服用，即可止绝。患咳嗽的人，将天雄炒过后，用酒调配一钱，用勺子一点一点地服用。患斑疹的人，把侧生的附子即侧子捣成碎末，与酒冷一起吞服。肠虚泄肚的人，将五倍子研成碎末，用开水冲服。腹中结硬块的人，把硃砂、硝石两种东西放在乳钵中研成粉末，放在一块边炒边捣，配酒服用，有神奇功效。不能喝酒以及饮酒量少的人，煎熬水芦根和厚朴两味药物的汤水服用。把苡蓉和鳝鱼两味药研成末状，再用黄精汁作成圆团服用，体力乃比平常倍增。天然的黄精汁调拌研成细末的神锦，放在柳木的甑器中蒸上七天以后，用蜂蜜圆成团服用，面部容色可像少女一样美丽。阴胶就是甑器中的气垢，在口中稍微点一些，就会知道五脏六腑发病的地方，这种东西会一直深透到患处使你感觉疼痛，其病足可医治。产后身上浮肿，用酒和甘皮一起服用便可即时得到恢复。头痛的人，把硝石研成碎末，滴入鼻子中，头立即不痛。有心痛病的人，用延胡索研成粉末，配酒服用便可治愈。

治药捷法

【原文】 药有至贱易得，人所常用，而难于修制者，如香附子、菟丝子、艾叶之类。医家昧其节度，或终日疲劳而不能成。《本草》云：“凡菟丝子，暖汤淘汰去沙土，漉乾，暖酒渍，经一宿，漉出，暴微白，捣之。不尽者，更以酒渍，经三五日乃出，更晒微乾，捣之须臾悉尽，极易碎。”盖以其颗细难施工，其说亦殊劳费。然自有捷法，但捻纸条数枚置其间，则驯帖成粉。香附子洗去皮毛，炒之焦熟，然后举投水钵内，候浸渍透彻，漉出，暴日中微燥，乃入捣臼，悉应手糜碎。艾叶柔软不可著力，若入白茯苓三五片同碾，则即时可作细末。（驯帖，馆本作顷刻）。

【译文】 药物中有的非常便宜而且容易得到，又为人们治病所常用，但是却难以进行加工制作，如香附子、菟丝子、艾叶之类的药物，就是如此。行医

者不了解这些药物的特性和研制方法，有的终日疲劳用心也没有制成可服用的药。《本草》中记载：“菟丝子的加工方法，是用热水淘去沙土，滤干后用温酒浸泡，停一晚上，再捞出凉晒呈微白色，然后捣碎。捣不碎的再次用酒浸泡，停三五天后捞出，再凉晒到稍微干，这时再捣它马上就烂，很容易碎。”大概由于菟丝子颗粒细小，不容易加工，不过这里所说的加工方法也确实麻烦。然而，也有其简便的加工方法，只要点捻几根纸条放在菟丝子上，它就会很快变软成粉。香附子的加工方法是先洗去皮毛，再放锅里炒焦，然后放进水里，等到泡透了以后，再捞出在日光下暴晒微干，放入盛器中捣烂，全都一捣即碎。艾叶柔软不好用力弄碎，如果加入三五片白茯苓一起碾磨，就可立时成为细末。（驯贴二字，馆本写作顷刻）。

陈翠说燕后

【原文】 赵左师触龙说太后，使长安君出质，用爱怜少子之说以感动之。予尝论之于《随笔》中。其事载于《战国策》、《史记》、《资治通鉴》，而《燕语》中又有陈翠一段，甚相似。云：“陈翠合齐、燕，将令燕王之弟为质于齐，太后大怒曰：‘陈公不能为人之国，则亦已矣，焉有离人子母者！’翠遂入见后曰：‘人主之爱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爱子也，又不爱丈夫子独甚。’太后曰：‘何也？’对曰：‘太后嫁女诸侯，奉以千金。今王愿封公子，群臣曰，公子无功不当封。今以公子为质，且以为功而封之也。太后弗听。是以知人主之不爱丈夫子独甚也。且太后与王幸而在，故公子贵。太后千秋之后，王弃国家，而太子即位，公子贱于布衣。故非及太后与王封公子，则终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妇不知长者之计。’乃命为行具。”此语与触龙无异，而《史记》不书，《通鉴》不取，学者亦未尝言。

【译文】 赵国左师触龙规劝皇太后，让长安君出外作人质，他当时采用疼爱幼子的说法感动了太后。我在《随笔》中曾论述了这个事。此事记载于《战国策》、《史记》和《资治通鉴》中。然而《战国策·燕策》中又有关于陈翠的一段记载，所说的内容与此事很相似。《燕策》中载：“陈翠在齐国与燕国之间说合，准备让燕王的弟弟到齐国去作人质，燕国太后听说后大怒说：‘陈翠不能为我们国家想出好的谋略，也就罢了，怎么能想出让我们母子分离的主意呢？’于是陈翠便入宫面见太后。说：‘太后您疼爱自己的儿子，还没有一般百姓爱子爱地那样深。您不爱自己年幼的儿子，更不爱自己已成年的儿子。’太后问道：

‘你为什么这样讲？’陈翠回答说：‘太后您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诸侯，陪送她黄金千两。现在国王愿意册封您的儿子，而大臣们却说，他无功不当受封。今让您的儿子去作人质，并将以此为功册封他，太后您又不同意。因此，我说太后您更不爱自己已成年的儿子。再者，现在幸运的是太后您和国王都健在，所以您的这个儿子能处于高贵的地位。一旦您们下世之后，长子即帝位，那么您的这个儿子会贫贱的如老百姓。所以，如果不趁太后您和王在世时册封您的这个儿子，那么他一辈子也不会受封得到采邑。’太后听罢说：‘老妇我原本不知道长老您的长远考虑。’于是，下令为公子准备前往齐国的行李。”这段话与触龙所讲的没有什么差别，然而《史记》没有记载，《资治通鉴》也没有采用，学者们也未见有人述及。

燕非强国

【原文】 北燕在春秋时最为僻小，能自见于中国者，不过三四，大率制命于齐。七雄之际，为齐所取，后赖五国之力，乐毅为将，然后胜齐，然卒于得七十城不能守也。故苏秦说赵王曰：“赵北有燕，燕固弱国，不足畏也。”燕王曰：“寡人国小，西迫强秦，南近齐，赵，齐、赵强国也。”又曰：“天下之战国七，而燕处弱焉，独战则不能，有所附则无不重。”昭王谓郭隗曰：“孤极知燕弱小，不足以报齐。”苏代曰：“一齐之强，燕犹不能支。”奉阳君曰：“燕弱国也，东不如齐，西不如赵。”赵长平之败，壮者皆死，燕以二千乘攻之，为赵所败。太子丹谓荆轲曰：“燕小弱，数困于兵，何足以当秦？”楚、汉之初，赵王武臣为燕军所得，赵厮养卒谓其将曰：“一赵尚易燕，况以两贤王，灭燕易矣。”彭宠以渔阳叛，即时夷灭。十六国之起，戎狄乱华，称燕称赵者多矣，未尝有只据幽、蓟之地者也。独安禄山以三十年节制之威，又兼领河东，乘天宝政乱，出不意而举兵，史思明继之，虽为天下之祸，旋亦殄灭。至于藩镇擅地，所谓范阳、卢龙，固常受制于天雄、成德也。刘仁恭、守光父子，僭窃一方，唐庄宗遣周德威攻之，克取巡属十余州，如拾地芥。石晋割赂契丹，仍其旧国，恃以为强，然晋开运阳城之战，德光几不免。周世宗小振之，立下三关。但太平兴国，失于轻举，又不治败将丧师之罪，至令披猖以迄于今。若以谓幽燕为用武之地，则不然也。

【译文】 北边的燕国在春秋时期是最偏僻最小的，能够在中原各国面前显示自己力量的机会不过才三四次，大抵受齐国左右。七国争雄时期，被齐国攻

打，后来依赖五国的力量，乐毅作主将，然后才战胜齐国，然而虽攻占七十一个城邑终于还是不能守住。所以苏秦劝说赵王说：“赵国北面有燕国，燕国原本是弱国，不值得畏惧。”燕王也说：“我的国家小，西面有强大秦国的威胁，南面邻近齐国、赵国，齐国、赵国都是强国。”又说：“天下能作战的国家有七个，而燕国是其中最弱的，独自作战则不行，如果依附某一国则那一国的实力没有不强大的。”燕昭王对郭隗说：“我非常了解燕国弱小，不足以对抗齐国。”苏代说：“一个齐国的强大力量，燕国尚且不能抵挡”。奉阳君说：“燕国，是弱国，东面不如齐国，西面不如赵国。”赵国长平之战，强壮的人都死了，燕国派战车二千乘攻打它，却被赵国击败。燕太子丹对荆轲说：“燕国又小又弱，屡次被战争困扰，怎么足以抵抗秦国？”楚王项羽与汉王刘邦争天下的初年，赵王武臣被燕军俘虏，赵国一位地位卑贱的士兵对燕国将军说：“一个赵国尚且轻视燕国，更何况张耳、陈馥二位贤人作了王，消灭燕国是很容易的。”彭宠占据渔阳发动叛乱，立刻就被消灭。十六国兴起，戎狄外族扰乱中华，自称燕国自称赵国的多了，却不曾有只占据幽州、蓟州的地域的。唯独安禄山靠着当了三十年军政长官的威信，又兼任河东节度使，乘天宝年间政局的混乱，出人意料地发动武装叛乱，史思明继他之后成为叛军首领，虽然成为天下的祸害，不久也就被消灭了。至于说藩镇割据，所谓范阳军、卢龙军，实际常常受天雄军、成德军的控制。刘仁恭、刘守光父子，割据一方，唐庄宗派周德威进攻他们，夺取属下十余个州，就像从地上拾起一枚草棍一样容易。石敬瑭的后晋把燕地当作礼物献给契丹，契丹依仗自己建国历史较长，加上燕地自认为强大，然后晋开运元年（944年）的阳城之战，辽太宗耶律德光几乎成为晋军俘虏。周世宗稍微震动燕地，短时间内攻下三道关隘。但是宋朝太平兴国年间，不适当地轻率发动进攻，又不惩办打败仗的将军、追查打败仗的责任，致使辽、金至今猖獗。如果说幽州燕地是适合发动战争的地区，则是不对的。

水旱祈祷

【原文】 海内雨 之数，郡异而县不同，为守为令，能以民事介心，必自知以时祷祈，不待上命也。而省部循案故例，但视天府为节，下之诸道转运司，使巡内州县，各诣名山灵祠，精洁致祷，然固难以一概论。乾道九年秋，赣、吉连雨暴涨。予守赣，方多备土囊，壅诸城门，以杜水入，凡二日乃退。而台符令祷雨，予格之不下，但据实报之。已而闻吉州于小厅设祈晴道场，大厅祈雨。

问其故，郡守曰：“请霁者，本郡以淫潦为灾，而请雨者，朝旨也。”其不知变如此，殆为侮惑神天，幽冥之下，将何所据凭哉？俚语笑林谓：“两商人入神庙，其一陆行欲晴，许赛以猪头。其一水行欲雨，许赛羊头。神顾小鬼言：‘晴乾吃猪头，雨落吃羊头，有何不可。’”正谓此耳。坡诗云：“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若使人人祷辄遂，造物应须日千变。”此意未易为庸俗道也。

【译文】 天下旱涝情况，各州各县都不相同，作知州或县令的，能把百姓的事放在心上的，必定自然会知道按照当时情况祈祷，不必等待上司命令。而三省六部遵循惯例，只以都城的情况为准，下命令给各路转运司，让管内州县，各前往名山和灵验的寺庙等处，认真诚心祈祷。然而实在难以一概而论。乾道九年（1173年）秋天，赣州、吉州接连下雨，河水暴涨。我任知赣州，正多方设法置备土袋，堵塞各个城门，以防止洪水进入，整整两天以后洪水才退。而朝廷命令求雨，我压下命令不下发，只把实情上报。不久听说吉州在一所小房子内设祈求晴天的道场，在一所大房子内设祈求下雨的道场，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做，知州说：“请求天晴，是本州因为雨涝成灾；而请求下雨，是朝廷的旨意。”他们不懂得变通竟到这种程度，简直可以说是侮辱迷惑上天。天上人间相隔很远情况不明，现在又祈雨又祈晴该听信哪一个呢？《俚语笑林》说：“两个商人进入神庙，其中一位走陆路希望晴天，许诺用猪头酬谢，其中一位走水路希望下雨，许诺用羊头酬谢。大神对小鬼说：‘晴天吃猪头，下雨吃羊头，怎么不行！’”苏轼的诗说：“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若使人人祷辄遂，造物应须日千变。”（“耕田的人希望下雨，收获的人希望晴天，去的人求得顺风与他逆行的人就会抱怨。假如人人祈祷便灵验，造物主必须一天变化一千次。”）这一层意思不容易对平庸的人说清楚。

卷四

今日官冗

【原文】 元丰中，曾巩判三班院，今侍右也。上疏言：“国朝景德恩田百七十万顷，官万员。皇盍二百二十五万顷，官二万员。治平四百三十万顷，官二万四千员。田日加辟，官日加多，而后之郊费视前一倍。以三班三年之籍较之，其入籍者几七百人，而死亡免退不能二百，是年增岁溢，未见其止，则用财之端，入官之门，当令有司讲求其故，使天下之入如治平，而财之用官之数同景德，以三十年之通，可以余十年之蓄矣。”是时，海内全盛，仓库多有桩积，犹有此惧。庆元二年四月，有朝臣奏对，极言云：“曩在乾道间，京朝官三四千员，选人七八千员。绍熙二年，四选名籍，尚左，京官四千一百五十九员；尚右，大使臣五千一百七十三员；侍左，选人一万二千八百六十九员；侍右，小使臣一万一千三百十五员。合四选之数，共三万三千五百十六员，冗倍于国朝全盛之际。近者四年之间，京官未至增添，外选人增至一万三千六百七十员，比绍熙增八百一员。大使臣六千五百二十五员，比绍熙增一千三百四十八员。小使臣一万八千七百五员，比绍熙增七千四百员。而今年科举、明年奏荐不在焉。通无虑四万三千员，比四年之数增万员矣，可不为之寒心哉！”盖连有覃霈，庆典屡行，而宗室推恩，不以服派近远为间断。特奏名三举，皆值异恩，虽助教亦出官归正，人每州以数十百，病在膏肓，正使俞跗，扁鹊持上池良药以救之，亦无及已。

【译文】 宋神宗元丰年间，曾巩任判三班院，三班院就是现在吏部侍郎右选。上给皇帝的奏议说：“我们宋朝在真宗景德时恩田面积一百七十万顷，有官员万人。仁宗皇盍时，恩田二百二十五万顷，有官员二万。英宗治平时垦田四百三十万顷，有官员二万四千。恩田面积日益扩大，官员人数日益增加，并且后来的南郊祭祀费用也比前高出一倍。以三班院这三年来的在册人数相比较，其中登入仕籍的将近七百人，而死亡和免退者不足二百人，可见入官的人数每年都在增长，没有终止的时候。那么，使用钱财的项目，没有做官的人入官的途径，就应当令有关方面的官吏进行讨论，探求其利害关系，使天下财赋收入达

到治平时水平，而用于官员消费的财政支出降低到景德时的水平。这样通过三十年时间的平衡调配，就可以节省出十年的财物积蓄了。”当时，天下统治尚处于全盛时期，仓库财物多有封桩余积，然而仍有这样的担忧。宁宗庆元二年（1198年）四月，在朝臣奏对中，有臣下陈词激昂地指出：“过去在孝宗乾道年间，京朝官有三四千人，选人有七八千人。光宗绍熙二年（1191年），吏部四选司所铨注的官员名籍中，尚书左选有京官四千一百五十九员，尚书右选有大使臣五千一百七十三员，侍郎左选有选人一万二千八百六十九员，侍郎右选有小使臣一万一千三百一十五员。总计四选司注册的官员数，共计三万三千五百一十六员，其冗多的程度已大大超过国家全盛时期的人数。最近的四年中，京官数量尚未增加，而地方的选人数增至一万三千六百七十员，比绍熙二年增加八百零一员，大使臣增至六千五百二十五员，比绍熙二年增加一千三百四十人，小使臣增至一万八千七百零五员，比绍熙二年增加七千四百员，而今年的科举人数、明年的举荐人数尚不在其列。总共算起来当不少于四万三千员，对比前四年的官数已增长了一万员，可以不为此而担忧吗！”大概由于连续大赦施恩泽，举行庆典，而宗室的亲属推恩予以录用，不分亲缘关系远近，凡是参加过三次省试考试未被录取的一律通过特奏名的方式受到特殊的优待，予以录用。即使原为没有具体职责的助教也晋升为正官。从金朝归顺我朝的归正人每州有几十个、几百个，国家已病入膏肓，就是让俞跗、扁鹊那样的名医拿来上等好药来医治，也无济于事。

栾城和张安道诗

【原文】 张文定公在蜀，一见苏公父子，即以国士许之。熙宁中，张守陈州南都，辟子由幕府。元丰初，东坡谪齐安，子由贬监筠酒税，与张别，张凄然不乐，酌酒相命，手写一诗曰：“可怜萍梗飘蓬客，自叹匏瓜老病身。从此空斋挂尘榻，不知重扫待何人？”后七年，子由召还，犹复见之于南都。及元符末，自龙川还许昌，因侄叔党出坡遗墨，再读张所赠诗，其薨已十年，泣下不能已，乃追和之曰：“少年便识成都尹，中岁仍为幕下宾。待我江西徐孺子，一生知己有斯人。”两诗皆哀而不怨，使人至今有感于斯文。今世薄夫受人异恩，转眼若不相识，况于一死一生，拳拳如此，忠厚之至，殆可端拜也。

【译文】 张文定公（张方平）在成都，一见到苏公（苏洵）洵父子，就赞许他们是国家栋梁之材。熙宁年间，张方平任知陈州、判应天府，辟举子由

（苏辙）在州府官署内任职。元丰初年，东坡（苏轼）被贬官到黄州，子由受连累降任监筠州酒税，与张方平告别。张方平郁郁不乐很伤心，设酒饯别，亲手写下一首诗道：“可怜萍梗飘蓬客，自叹匏瓜老病身。从此空斋挂尘榻，不知重扫待何时（“可怜你的处境就像水中的浮萍、风中的蓬草一样忽东忽西身不由己，自己感叹我自己年老多病已像匏瓜那样中看不中用。你走后我要像陈蕃那样把专门用来招待你的那个房间的床悬挂起来，不知何时你才能回来让我重新把这个房间打扫）。”七年以后，子由奉召回京，仍在途中同张方平再见面。等到元符末年，自循州回许州，因为侄子苏叔党拿出东坡遗留文稿手迹，再次读到张方平所赠的诗，而张方平已去世十年，泪流不能停止，便写诗追和说：“少年便识成都尹，中岁仍为幕下宾。待我江西徐孺子，一生知己有斯人（少年时期便认识您成都长官，中年时再次作了您的幕僚和门下客。您像陈蕃对待徐禰那样赏识我，我为平生有您这样的知己而自豪）。”两首诗都符合古人“哀而不怨”的标准，使人今天读了它们仍然倍受感动。现今世俗浅薄的人接受了别人特殊的恩惠，转眼之间就像不认识一样了，何况一个人死了一个人还活着，活着的人还这样依恋死者，他的忠厚到了极点，简直应该整衣向他郑重行礼以示敬意。

和范杜苏四公

【原文】 晋相和凝，以唐长兴四年知贡举，取范质为第十三人。唐故事，知贡举者，所放进士，以己及第时名次为重，谓之“传衣钵”。盖凝在梁贞明中居此级，故以处质，且云：“他日当如我。”后皆至宰相，封鲁国公，官至太子太傅，当时以为荣。凝寿止五十八，质止五十四。《三朝史》质本传亦书之，而《新五代史·和凝传》误为第五，以《登科记》考之而非也。杜祁公罢相，以太子少师致仕，后以南郊免陪位恩，连进至太子太师，年八十而薨。苏子容初筮仕为南京判官，杜公方里居，告以平生出处本末，曰：“子异日所至，亦如老夫。”及苏更践中外，名德殊与之相似。集中有《谢杜公书》，正叙此事。其罢相也，亦为太子少师致仕，进太保，年八十二而薨。昔贤谓贵人往往善相人，以所闻多之故也。此二者并官爵年寿皆前知，异矣。

【译文】 五代后晋宰相和凝，在后唐明帝长兴四年（933年）担任主持科举考试的知贡举官，当时录取范质为进士第十三名。按后唐旧有制度，知贡举官举拔进士，以他及第时所排列的名次为准，称为“传衣钵”。大概是由于和凝

在后梁末帝贞明年间及第排行为第十三，所以取第十三名的范质为进士，并且对他说：“你以后会像我一样。”后来范质也晋升到了宰相，封为鲁国公，官品至太子太傅，当时的人都以此为荣耀。和凝享年五十八岁，范质活了五十四岁。《三朝史·范质传》中已记载了这件事，而《新五代史·和凝传》中把范质及第名次误写为第五名，按《登科记》的记载，可以订正这一说法的讹误。宋代杜祁公衍罢相以后，以太子少师身份退休。后来在举行南郊祭礼时，因他年高，特许免于随从官员出席，同时加恩连续晋升他为太子太师，八十岁去世。苏颂（子容）当初在家占卜入仕方为南京判官。当时杜衍在南京家乡居住，苏颂告诉他一生经历的前前后后。杜衍说：“你以后的经历，也和老夫我一样。”等到苏颂进入仕途以后，他的名声、德操非常和杜衍相似。苏颂的《文集》中有一篇《谢杜公书》，就是叙述这件事。苏颂罢相后，以太子少师身份退休，然后晋升太子太保，活至八十二岁去世。过去的贤人说高贵的人往往善于预测人的一生，这是由于他们社会阅历丰富的缘故。以上和凝、杜衍二人对范质、苏颂的官爵、年龄都预测到了，的确与众不同啊！

外台秘要

【原文】 《外台秘要》载制虎方云：“到山下先闭气三十五息，所在山神将虎来到吾前，乃存吾肺中，有白帝出，收取虎两目，塞吾下部中，乃吐肺气，上自通冠一山林之上。于是良久，又闭气三十五息，两手捻都监目作三步，步皆以右足在前，乃止，祝曰：‘李耳，李耳，图汝非李耳邪。汝盗黄帝之犬，黄帝教我问汝云何。’毕，便行，一山虎不可得见。若卒逢之者，因正面立，大张左手五指侧之，极势跳，手上下三度，于跳中大唤，咄曰：‘虎，北斗君使汝去！’虎即走。”予谓人卒逢虎，魂魄惊怖，窜伏之不暇，岂能雍容步趋，仗咒语七字而脱邪？因读此方，聊书之以发一笑。此书乃唐王之孙焘所作，本传云：“焘视母疾，数从高医游，遂穷其术，因以所学作书，讨绎精明，世宝焉。”盖不深考也。

【译文】 《外台秘要》一书记载的制伏老虎的方法说：“走到山下面，自己先闭住气呼吸三十五次，那么所在的山神就会让老虎来到你跟前，于是就想着从我肺中有白帝出来，收取老虎的两只眼睛，又把它塞到我的腹中，这时再吐出肺气，然后自然上升到山林的上方。这样停了一段时间，再闭住气呼吸三十五次，双手向前并拢睁大眼睛前进三步，每步都先抬右脚，三步后停住，口念

咒语说：‘李耳，李耳，你不就是李耳吗！你偷走了黄帝的犬，黄帝让我来问你这是为什么。’说毕便向前走，一个山虎就立时看不见了。若仓猝间遇上了老虎，它就正面立在眼前，你应尽力张开左手的五指斜指着它，用尽力气跳跃，手上下摆动三回，并在跳跃中大声呼叫，呵叱说：‘老虎，北斗君让你离开！’这样虎就离开了你。”我想人们仓猝遇见老虎，惊恐万状，逃避还来不及，怎么能够镇定自若地靠近它，并凭着呵叱的七个字就可以脱身呢！因为读到这一制伏老虎怪法，姑且记录下来，作为一个笑话。这本书为唐代王襴的孙子王焘所作，《新唐书·王焘传》中说：“王焘探视母病的时候，多次向名医请教，于是探讨研究了法术，并把自己所学到的东西写成了书，论述精到明确，视为世宝。”这是没有深入考究而得出的结论。

六枳关

【原文】 盘洲种枳六本，以为藩篱之限。立小门，名曰“六枳关”。每为人问其所出，倦于酬应。今取冯衍《显志赋》中语书于此。衍云：“櫜六枳而为篱。”按《东观汉记》作八枳。《逸周书·小开》篇云：“呜呼！汝何敬非时，何择非德！德枳维大人，大人枳维公，公枳维卿，卿枳维大夫，大夫枳维士。登登皇皇，维在国枳，国枳维都，都枳维邑，邑枳维家，家枳维欲无疆。”言上下相维，递为藩蔽也。其数有八，与《东观记》同。予详考之，乃九枳也。宋景文公《贺宰相启》“式维公枳”盖用此云。

【译文】 我的二哥洪适曾种植六株枳子，作为院子里篱笆隔墙。中间开了一个小门，名为“六枳关”。每每有人问起这个名称的由来，懒得一一回答。现在，我将冯衍《显志赋》中的话抄录于此。冯衍说：“植六株枳树作为篱笆。”《东观汉记》中书作八株枳子。《逸周书·小开》篇中说：“真的是啊！你什么时候表示对上的尊仰不是时候，干什么事不表现出高尚的德操！德枳维护大人，大人之枳维护公，公枳维护卿，卿枳维护大夫，大夫枳维护士。明明白白，关键在于维护国枳，而国枳又维护都，都枳维护邑，邑枳维护家，家枳维护的范围没有边际。”这里就是指君臣上下之间相互维系、互为屏障的意思。此书中所说的枳子有八株，与《东观汉记》所载相同。我仔细查证后，才知道实际上是九株枳子。宋景文公祁在《贺宰相启》一文中所说“式维公枳”，即我是您的屏障，就取用的是这个典故。

王荆公上书并诗

【原文】 王荆公议论高奇，果于自用。嘉熙初，为度支判官，上《万言书》，以为“今天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而固已合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闾巷草野之间，亦少可用之材，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愿监苟且因循之敝，明诏大臣，为之以渐，期为合于当世之变。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议者以为迂阔而熟烂者也。”当时富、韩二公在相位，读之不乐，知其得志必生事。后安石当国，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书。又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以惠贫。尝赋《兼并》诗一篇，曰：“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后世始倒持，黔首遂难裁。秦王不知此，更筑怀清台。礼义日已偷，圣经久堙埃。法尚有存者，欲言时所瘕。俗吏不知方，掊克乃为才。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利孔至百出，小人司阖开。有司与之争，民愈可怜哉！”其语绝不工。迨其得政，设青苗法以夺富民之利，民无贫富，两税之外，皆重出息十二。吕惠卿复作“手实”之法，民遂大病。其祸源于此诗。苏子由以为昔之诗病未有若此其酷也。痛哉！

【译文】 王荆公安石议论问题的见解高深而新奇，他的政策在他执政后终于得到了实施。宋仁宗嘉熙初年，他任三司度支判官，在上奏仁宗的《万言书》中指出：“现在天下的财力一天比一天困竭，风俗一天比一天败坏。这种患难的根源在于没有具体的法令制度，没有效法先王的政令。所谓效法先王政令，就是要效法其根本的东西。只有效法其根本的东西，我们现在所实行的改革政策和措施对天下人来说才不至于是危言耸听，而是顺乎自然，与当今的形势相适应。根据天下所具有的能力，创造天下的财物。利用天下的财物，供应天下的消费。自古以来对天下的治理，未曾有过因财力不足而酿成整个国家患难的情况，真正的问题在于没有正确的理财制度。如果居于统治地位的缺乏才能，而各地方也很少有可利用的人才，那么要支撑一个国家、守卫统治的区域，陛下您能依靠天意凭侥幸长期统治，而不遇到万一的意外事故吗？我希望您能认识到苟且因循的弊病，明确诏令大臣们，从一点一滴做起，以此来适应当前社会

形势的变化。臣在这里所讲的，是一般人都不愿说的问題，也正是被那些议论是非的人看作是迂阔和腐烂不堪的东西。”这时候，富弼、韩琦二人任宰相，读到王安石这篇上书后心情不愉快，知道一旦王安石执政后必定会变法生事。事实也正是这样。后来王安石当了宰相，他所实行的改革，大体上都是根据这篇上书中所表述的内容。他又怜悯贫民，而非常憎恨富民，决心要让富人破财，以便使贫民得到好处。他在所写的题为《兼并》这首诗中说：“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后世始倒持，黔首遂难裁。秦王不知此，更筑怀清台。礼义日已偷，圣经久堙埃。法尚有存者，欲言时所。俗吏不知方，掊克乃为才。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利孔至百出，小人司阖开。有司与之争，民愈可怜哉！”这首诗句的语言并不精致。到他为政的时候，实行青苗法以夺取富人的利益，平民无论贫富，除了缴纳两税以外，都要缴纳青苗借贷的利息钱十分之二。吕惠卿又实行自报丁产实况的“手实法”，于是地方出现了更严重的社会问题。实行“手实法”产生混乱的根源应归咎于王安石的这首诗。苏辙认为过去的诗作从来没有像这首诗一样产生如此恶劣的后果。我也为此而感到悲伤啊！

左黄州表

【原文】 唐肃宗时，王 以祠祷见宠，骤得宰相。帝尝不豫， 遣女巫乘传，分祷天下名山大川。巫皆盛服，中人护领，所至干托州县，赂遗狼藉。时有一巫美而艳，以恶少年数十自随，尤 狡不法。驰入黄州，刺史左震晨至馆请事，门 不启，震怒，破 入，取巫斩廷下，悉诛所从少年，籍其赃得十余万，因遣还中人。 不能诘，帝亦不加罪。震刚决如此，而史不记其他事。予读《元次山集》，有《左黄州表》一篇云：“乾元己亥，赞善大夫左振，出为黄州刺史，下车，黄人歌曰：‘我欲逃乡里，我欲去坟墓；左公今既来，谁忍弃之去。’后一岁，又歌曰：‘吾乡有鬼巫，惑人人不知；天子正尊信，左公能杀之。’盖此巫黄人也。振在州三迁侍御史，判金州刺史，将去，黄人多去思，故为作表。”予谓振即震也。为政宜民，见于歌颂，史官当特书之于循吏中，而仅能不没其实，故为标显于此。己亥者，乾元二年。 以元年五月，自太常少卿拜中书相，二年三月罢，《本纪》及《宰相表》同。而《新史》本传，以为三年自太常卿拜相，明日罢，失之矣。乃承《旧史》之误也。

【译文】 唐肃宗时，王 因为善于祭祀祈祷受到宠信，很快地升任了宰相。

唐肃宗曾患重病，王夔派女巫乘驿车，分别到天下名山大川祈祷。女巫都穿着很华丽的衣服，由宦官护卫陪同，所到之处干预州县政事，收受贿赂声名狼藉。当时有一个女巫美貌又艳丽，让品行不好的青年男子几十人跟随自己，尤其奸猾不守法纪，乘车奔驰进入黄州。黄州刺史左震早晨到驿馆接洽公事，驿馆大门插着打不开，左震大怒，撞开门冲进去，抓住女巫杀死在庭院里，把跟随来的青年男子也全都杀死，查抄获得女巫等人收受贿赂所得赃物价值十余万，接着就把宦官也打发回京了。王夔不敢查问，唐肃宗也没有怪罪他。左震如此果敢，而正史没有记载他别的事迹。我读《元次山集》，其中有《左黄州表》一篇讲：“乾元己亥（乾元二年，759年），赞善大夫左振，出任黄州刺史，下车伊始，黄州人便歌唱道：‘我欲进乡里，我欲去坟墓。左公今既来，谁忍弃之去（我想离开家乡逃走，我想离开祖先坟墓；左振大人今天既然来了，谁还忍心舍弃家乡、祖坟）！’”一年以后，又歌唱道：‘吾乡有鬼巫，惑人人不知，天子正尊信，左公能杀之（我的家乡有鬼一样的女巫，迷惑别人别人却不知道；天子正在尊崇信任，左振大人却敢于杀死她）。’”因为这个女巫是黄州人。左振在黄州升官三次，最后担任殿中侍御史、判金州刺史。将要离任时，黄州人多有依恋心情，所以他写了这篇表文。”我觉得左振（原注：即左震）处理政事使百姓感到适宜，通过歌咏表达出来，史官应当专门把他写入《循吏传》里，才接近不淹没他的实际功绩，所以在此表彰他。乾元己亥，就是乾元二年。王夔在乾元元年五月，从太常少卿晋升中书令、宰相，乾元二年三月被罢免，《新唐书·肃宗本纪》及《宰相表》记载相同。而《新唐书·王夔传》记为乾元三年从太常卿或升宰相，第二天被罢免，失实了。这是沿袭了《旧唐书》的错误。

李郭诏书

【原文】 唐代宗即位，郭汾阳为近昵所摇，惧祸之及，表上自灵武、河北至于降州，两朝所诒诏书一千余卷。家传载其表语，其多如是。又读韦端符所撰《李卫公故物记》云：“三原令座中有客曰李丞者，卫公之胄，藏文帝赐书二十通，多言征讨事，厚劳苦，‘其兵事节度皆付公，吾不从中治也。’暨公疾，亲诏者数四，其一曰：‘有昼夜视公病大老姬令一人来，吾欲熟知公起居状。’权文公视此诏，常泣曰：‘君臣之际乃如是耶！’”《新史》载其事云：“靖五代孙彦芳，大和中，为凤翔司录参军，以高祖、太宗赐靖诏书数函上之，天子悉留禁中。又敕摹诏本还赐彦芳。”即二事观之，唐世之所以眷礼名将相者，绸缪熟复

至此，汉、晋以来所不及也。

【译文】 唐代宗即位作了皇帝，郭汾阳（郭子仪）被唐代宗亲信的人离间，怕大祸临头，上奏缴还从在灵武、河北以至在绛州时，唐玄宗、唐肃宗所赐给的诏书一千余卷。郭子仪的家传中载有上奏中讲的话，那些诏书数量竟这样大。又读韦端符撰写的《李卫公故物记》中有这样的话：“三原县令宴会的客人中有一位名叫李丞的，是李卫公（李靖）的后代，藏有唐文帝（唐太宗李世民）赐给的书信二十份，多是讲打仗的事，慰问李靖作战辛苦，其中讲：‘指挥打仗的事全交付给您了，我决不在皇宫中乱干预’。等到李卫公病重，亲自下诏书多次，其中一份诏书中说：‘如果有昼夜看护您的老妇人请打发一位前来，我想全面了解您的生活状况。’权文公（权德舆）看到这份诏书，曾流着泪说：‘君臣之间的关系竟是这样密切！’”《新唐书》记载这件事说：“李靖五代孙李彦芳，太和年间，任凤翔府司录参军，把唐高祖、唐太宗赐给李靖的诏书数函上缴，皇帝都留在皇宫内。又下令摹写诏书副本赐给李彦芳。”从这二件事看，唐朝爱护尊重著名将军宰相的许多作法，情意殷勤不厌其烦到这种程度，汉朝、晋朝以后各朝都是比不上的。

两道出师

【原文】 国家用兵行师，异道并出，其胜败功罪，当随其实而处之，则赏信罚明，人知劝戒。汉武帝遣卫青、霍去病伐匈奴，去病以功益封，又封部将四人为列侯，而青不得益封，军吏卒皆无封侯者。宣帝遣田广明等五将军击匈奴，又以常惠护乌孙兵共出，五将皆无功，而广明及田顺以罪诛，独常惠奉使克获封侯。宋文帝伐魏，雍州诸将柳元景等，既拔弘农陕城，戍潼关矣，而上以东军王玄谟败退，皆召还。其后玄谟贬黜，元景受赏。绍兴七年淮西大帅刘少师罢，湖北岳少保以母忧去，累辞起复之命。朝廷以兵部尚书吕安老、侍郎张渊道分使两部。已而正除宣抚，遂掌其军。岳在九江，忧兵柄一失，不容再得，亟兼程至鄂，有旨复故任，而召渊道为枢密都承旨。安老在庐遭变，言者论罢张魏公，渊道亦继坐斥。隆兴中，北虏再动兵，张公为督帅，遣李显忠、邵宏渊攻符离，失利而退，一府皆贬秩。是时，汪庄敏以参加政事督视荆、襄，东西不相为谋，乃亦坐谴。古今不侔如此。

【译文】 国家举兵出战，各路同时并进，其胜败功罪的裁决，要根据各路的具体情况而定，采取这样赏罚分明的政策，才能使人们知道如何去发扬优点，

纠正错误。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率兵讨伐匈奴，霍去病因功加封，又册封他的部将四人为列侯。而卫青却没有加封，他的官兵吏卒中也没有封侯的人。汉宣帝派遣田广明等五位将军率兵进攻匈奴，同时又令常惠统率乌孙兵力一同出击，最后田广明等五位将军没有立功，田广明和田顺还因此被判罪被杀。只有常惠因此完成了联合乌孙的任务，而被封为侯爵。南朝宋文帝派兵讨伐北魏，雍州的诸将领柳元景等，率兵攻克了弘农的陕城（今河南陕县）之后，已进驻到潼关（今属陕西）一带。宋文帝因为东路军王玄谟部已经败退，下令把他们都召回。后来王玄谟被贬黜，而柳元景则因功受赏。南宋高宗绍兴七年（1137年），淮西边区的大将刘少师广世被罢职，驻军湖北的岳少保飞因母亲去世回归故里，多次拒绝朝廷要他停止服丧而上任军职的命令。于是，朝廷任命兵部尚书吕安老（吕祉）、兵部侍郎张渊道二人分往淮西、湖北两部去统领。接着正式任命二人为宣抚使，掌握了军权。岳飞当时在九江（今属江西），担心兵权一旦失去，就不能再得到，于是急忙兼程赶赴鄂州（今湖北武昌），这时朝廷下令恢复他的原职，并召还张渊道，任命他为枢密都承旨。吕安老在庐州（今安徽合肥市）因郿琼叛降而遇害。言官弹劾张浚，张浚因此被撤职。张道渊接着也因此事而受到处罚。孝宗隆兴年间，金军再次发动进攻，张浚担任督帅，派李显忠、邵宏渊进攻符离（今安徽宿县北符离集），遭到阻击，兵败撤退，所有将官都受到贬斥或降秩的处分。当时汪庄敏以参知政事身份督察荆、襄战务，东部张道渊与西部汪庄敏没有相互配合，也因符离战败被治罪贬谪。古代和现代在军事方面所采取的奖惩办法竟然如此不同。

杜韩用歇后语

【原文】 杜、韩二公作诗，或用歇后语。如“凄其望吕葛”，“仙鸟仙花吾友于”，“友于皆挺拔”，“再接再砺乃”，“僮仆诚自提”，“为尔惜居诸”，“谁谓贻厥无基趾”之类是已。

【译文】 杜甫、韩愈二人作诗，有时使用歇后语。例如“伤心时想起吕尚、诸葛亮”，“仙鸟仙花是我的好兄弟”，“兄弟们都身材高大”，“再接再励更加凶猛”，“奴仆们不值得一提”，“为你可惜时间流逝”，“谁说没有留给子孙基业”一类的句子，即是如此。

唐明皇赐二相物

【原文】 唐明皇以李林甫为右相，颀付大政，而左相牛仙客、李适之、陈希烈前后同列，皆拱手备员。林甫死，杨国忠代之，其宠遇愈甚。天宝十三载，上御跃龙殿门，张乐宴群臣，赐右相绢一千五百匹，彩罗三百匹，彩綾五百匹，而赐左相绢三百，罗、綾各五十而已。其多寡不侔，至于五倍。如希烈庸才，知上恩意，安得不奴事之乎？宜其甘心臣于禄山也。

【译文】 唐明皇任命李林甫为右相，托付给他重大政事的决策权，而左相牛仙客、李适之、陈希烈先后与他同任宰相，都束手充数不能发挥作用。李林甫死后，杨国忠代替了他，受唐明皇的宠信愈加厉害。天宝十三载（754年），唐明皇亲临跃龙殿门，奏乐设宴招待群臣，赐给右相绢一千五百匹，彩罗三百匹，彩綾五百匹，而赐给左相只有绢三百匹，罗、綾各五十匹罢了。二者数量多少相差悬殊，竟达到五倍。例如陈希烈这样的庸才，知道皇帝宠信右相的心意，怎能不像奴才事奉主子那样事奉右相呢？难怪陈希烈会甘心向安禄山称臣为他效力呀。

一百五日

【原文】 今人谓寒食为一百五者，以其自冬至之后至清明，历节气六，凡为一百七日，而先两日为寒食故云，他节皆不然也。杜老有砧州《一百五日夜对月》一篇，江西宗派诗云：“一百五日足风雨，三十六峰劳梦魂”，“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风”之类是也。吾州城北芝山寺，为禁烟游赏之地，寺僧欲建华严阁，请予作《劝缘疏》，其末一联云：“大善知识五十三，永壮人天之仰；寒食清明一百六，鼎来道俗之观。”或问“一百六”所出，应之曰：“元微之《连昌宫词》：‘初过寒食一百六，店舍无烟宫树绿。’是以用之。”

【译文】 今人之所以称寒食节为一百五，是因为自冬至以后一直到清明节，经过六个节气，共计一百零七天，而清明的前二天即第一百零五天便是寒食节，其他的节气都不这样称呼。杜甫曾有一篇诗为砧州《一百五日夜对月》。江西诗派的著作中，有“一百五日足风雨，三十六峰劳梦魂”，“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风”之类，也是这样称的。本州城北边有个芝山寺，是禁止

百姓居住专供游览观赏之地，寺里的和尚准备建造华严阁，请我给他们作篇《劝缘疏》。我在这里最后一联写道：“大善知识五十三，永壮人天之仰；寒食清明一百六，鼎来道俗之观。”有人问我“一百六”源自何处，我回答说：“元微之《连昌宫词》中有‘初过寒食一百六，店舍无烟宫树绿’之句，所以，我采用了“一百六”的说法。”

老杜寒山诗

【原文】 老杜《春日忆李白》诗云：“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尝有武弁议其失曰：“既是无敌，又却似庾、鲍。”或折之曰：“庾清新而不能俊逸，鲍俊逸而不能清新，太白兼之，所以为无敌也。”今集别本一作“无数”，殆好事者更之乎。寒山子诗云：“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洁。无物堪比伦，教我如何说？”人亦有言，既似秋月、碧潭，乃以为无物堪比，何也？盖其意谓若无二物比伦，当如何说耳！读者当以是求之。

【译文】 杜甫在《春日忆李白》诗中说：“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曾经有位武官评论这句诗的不妥之处说：“李白的诗作既然无敌于天下，却又怎么与庾信、鲍照二人的诗相似。”有人就驳斥他说：“庾信的诗清新却不能做到俊逸，鲍照的诗俊逸却不能做到清新。而李白诗此二者兼而有之，所以可谓无敌于天下。”此作“无敌”，而在现今杜甫集子的别本中作“无数”，大概是好事的人更改了。唐代僧人寒山子的诗中写道：“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洁。无物堪比伦，教我如何说？”也有人说：“既然与秋月、碧绿潭水相似，却又说没有什么东西能同它相比，这是为什么呢？”在我看来，寒山子的意思是说如果不用外界的秋月、碧绿潭水来比喻自己的内心世界，自己该如何述说好呢？读诗的人应当从诗人的心境中去理解诗的含意。

櫛石之毒

【原文】 读黄伯思《东观余论》，内评王大令书一节，曰：“《静息贴》云：‘石深是可疑事，兄熏患散辄发病。’散者，寒食散之类。散中盖用 石，是性极热有毒，故云深可疑也。刘表在荆州，与王粲登障山，见一冈不生百草，粲曰：‘此必古冢，其人在世服生 石，热蒸出外，故草木焦灭。’凿看果墓，

石满莖。又今洛水冬月不冰，古人谓之温洛，下亦有 石。今取此石置瓮水中，水亦不冰。又鸛伏卵以助暖气。其烈酷如此，固不宜饵服。子敬之语实然。”《淮南子》曰：“人食 石死，蚕食之而不饥。”予仲兄文安公镇金陵，因秋暑减食，当涂医汤三益教以服 石圆，已而饮啖日进，遂加意服之，越十月而毒作，鼻衄血斗余，自是数数不止，竟至精液皆竭，迨于捐馆。偶见其语，使人追痛，因书之以戒未来者。

【译文】 读黄伯思的《东观馀论》，其中评论王大令书法一段内，谈到：“《静息帖》上说：‘𤑔石实在是一种可疑的事物，哥哥王襁每服用散药就长毒疮。’散药，应是寒食散一类的药。散药中大概放了𤑔石，它药性极热有毒，所以说它实在可疑。刘表在荆州，与王粲攀登障山，看到一土冈什么植物都不生长，王粲说：这一定是古坟，它的主人生前服用生𤑔石，热量蒸腾到外面，所以草木都被烧死了。’刨开一看果然坟茔中满是𤑔石。再有现在洛水冬季不结冰，古人叫温洛，它下面也有𤑔石。现在把𤑔石放水缸的水中，缸里的水冬天也不结冰。另鸛孵卵时用𤑔石来提高温度。它的药性这样暴烈，确实不宜服用。王大令的话讲得很实在。”《淮南子》说：“人吃了𤑔石会死，蚕吃了𤑔石不饿。”我二哥洪遵担任建康知府，因为秋天暑热饭量减小，当涂的医生汤三益教他服用𤑔石圆这种药，服后饮食一天天增加，便愈加乐意服用，十个月以后毒性发作，鼻子流血一斗多，从这以后屡次流血不止，最后体内精华都耗尽了，终于去世。偶尔见到这段记载，使人回想起往事而痛心，所以写出来以使后来人警戒。

卷 五

土木偶人

【原文】 赵德甫作《金石录》，其跋汉居摄坟坛二刻石云：“其一上谷府卿坟坛，其一祝其卿坟坛。曰坟坛者，古未有土木像，故为坛以祀之。两汉时皆如此。”予案《战国策》所载，苏秦谓孟尝君曰：“有土偶人与桃梗相语。桃梗曰：‘子西岸之土也，埏子以为人，雨下水至，则汝残矣。’土偶曰：‘子东国之桃梗也，刻削子以为人，雨降水至，流子而去矣。’”所谓土木为偶人，非像而何？汉至寓龙、寓车马，皆谓以木为之，像其真形。谓之两汉未有，则不可也。

【译文】 赵德甫的《金石录》里，有《跋汉居摄坟坛二刻石》一文。在这篇文章说：“坟坛有二。一为上谷姓府的人的坟坛，一为名叫祝其的人的坟坛。所以叫坟坛，是因为古时候没有用泥土或木头制成的人像。那时，人们为了祭祀，因而设坟坛。在汉朝时候，就是这样。”然而，我根据《战国策》里的记载，苏秦曾对孟尝君说：“人泥塑与木雕人的互相对话。木雕人说：‘你本是西边的泥土，经过搅和手捏才成为人形的，每当天下雨，雨水流到这个地方，你就会残毁无存。’泥塑人接着说：‘你本是东边的一根桃木，经过刻削成为人形的。每当天下雨，雨水流到这个地方，你就被冲得无影无踪’”。这里所说的泥塑人与木雕人，不是土木偶像是什么？汉代寓龙、寓车、寓马，都说是用木头作成的，形象逼真。由此可见，那种认为两汉时未有泥塑人与木雕人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

饶州风俗

【原文】 嘉祐中，吴孝宗子经者，作《余干县学记》，云：“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江南既为天下甲，而饶人喜事，又甲于江南。盖饶之为州，壤土肥而养生之物多，其民家富而户羨，蓄百金者不在富人之列。又当

宽平无事之际，而天性好善，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其美如此。”予观今之饶民，所谓家富户美，了非昔时，而高甍巨栋连阡亘陌者，又皆数十年来寓公所擅，而好善为学，亦不尽如吴记所言。故录其语以寄一叹。

【译文】 北宋仁宗嘉祐年间，吴孝宗字子经曾撰《余干县学记》。在这篇文章中说：“古时候，江南地区在国内经济文化中的地位，不能与中原地区相比。宋朝建国以后，七闽（今福建）、二浙（浙东、浙西，今浙江），及大江东西（今长江西下游南、北两岸的地区），读书的风气很盛；人才辈出，数量之多，居于国内首位。江南已居国内首位，而饶州（今江西波阳）作为一个州。由于土壤肥沃，适宜于多种动植物及农作物的生长，百姓生活富余而有积蓄，有着白银百两的人家不能算作富人。处于天下安宁太平无事的时候，饶州人乐于行善。做父亲兄长的，往往为自己的儿子、兄弟不读书学习文化而感到内疚。做母亲妻子的，往往为自己的儿子、丈夫不学习文化而感到羞愧。这是多么好的社会风尚啊！”经过我的仔细观察，现在饶州的百姓，虽然家里富裕而有积蓄，可也非昔日之所比。高楼巨栋拔地而起田地连在一起的，往往是近几十年来，从外地迁来的人家。那种乐于助人，好作善事，勤奋好学的社会风尚，也不像吴孝宗所说的那样美好。兹将吴孝宗所说录之于此，以寄托我的惋惜！

禽畜菜茄色不同

【原文】 禽畜、菜茄之色，所在不同，如江、浙间，猪黑而羊白，至江、广、吉州以西，二者则反是。苏、秀间，鹅皆白，或有一班褐者，则呼为雁鹅，颇异而畜之。若吾乡，凡鹅皆雁也。小儿至取浙中白者饲养，以为湖沼观美。浙西常茄皆皮紫，其皮白者为水茄。吾乡常茄皮白，而水茄则紫。其异如是。

【译文】 家禽、牲畜、蔬菜的颜色，各地不同，如江、浙地区，猪是黑的羊是白的，到了江州、广州、吉州以西的地区，两种家畜的颜色正好相反。苏州、秀州一带，鹅都是白色的，偶尔有一只带褐色花斑的，就称为雁鹅，往往把它们与一般的鹅分开单独畜养。至于说我们家乡，凡是鹅都是带褐斑的雁鹅。年轻人甚至到两浙地区找来白鹅饲养，作为湖泊池塘的装点物。浙西地区一般的茄子都是紫皮的，白皮的是水茄。我们家乡一般茄子都是白皮的，而水茄子却是紫色的。其差异竟这么大。

伏龙肝

【原文】 《本草》伏龙肝，陶隐居云：“此灶中对釜月下黄土也。以灶有神，故呼为伏龙肝。并以透隐为名尔。”雷公云：“凡使勿误用灶下土，其伏龙肝，是十年已来灶额内火气积，自结如赤色石，中黄，其形貌八棱。”予尝见临安医官陈舆大夫，言当以砌灶时，纳猪肝一具于土中，俟其积久，与土为一，然后用之，则稍与名相应。比读《后汉书·阴识传》云：“其先阴子方，腊日晨炊而灶神形见。”注引《杂五行书》曰：“宜市买猪肝泥灶，令妇孝。”然则舆之说亦有所本云。《广济历》亦有此说。又列作灶忌日，云：“伏龙在不可移作。”所谓伏龙者，灶之神也。

【译文】 《本草》一书中载有一种名叫伏龙肝的药。南朝药物学家陶弘景说：“这是做饭用的锅灶里正对锅底的黄土。人们以为灶有神灵，所以称它为伏龙肝。人们又叫它为透隐。”雷公说：“凡是使用它的人，切记不要误用锅灶下的土，其伏龙肝，是十年以来灶壁内柴火燃烧热气聚集，自然形成的赤色石，中间是黄色，它的形状是不规则的八棱形。”我曾见临安（今浙江杭州）医官陈舆大夫，说在砌锅灶时，将一副猪肝放入泥土中，烧火做饭，时间长了，猪肝与泥土混合在一起，然后变成伏龙肝，才能使用，这样才可与它的名字相应。近来读到《后汉书·阴识传》，这里说：“他的先人阴子方，十二月初八日早晨烧火做饭时，见到灶神。”在这一记载下，注文引《杂五行书》说：“这是命孝妇在市上买猪肝泥锅灶。”这一说法，与陈舆大夫所说不同。然而，陈舆所说亦是有根据的。《广济历》中，亦有类似说法的记载。并且定为灶忌日，说：“伏龙在此，不可以变更灶的位置。”据此，人们所说的伏龙，就是灶神。

勇怯无常

【原文】 “民无常勇，亦无常怯，有气则实，实则勇，无气则虚，虚则怯，怯勇虚实，其由甚微，不可不知。勇则战，怯则北，战而胜者，战其勇者也，战而北者，战其怯者也。怯勇无常，倏忽往来，而莫知其方，惟圣人独见其所由然。”此《吕氏春秋·决胜》篇之语，予爱而书之。

【译文】 “人无永远持久的勇敢，亦没有永远持久的胆怯。神气饱满则内

心充实，内心充实则勇敢；神气不饱满则内心空虚，内心空虚则胆怯。胆怯勇敢，空虚充实，其由来十分精妙，不可不知道。勇敢的人战则必胜，胆怯的人战则必败。战而获胜的人，是由于他作战时勇敢，战而败北的人，是由于作战时胆怯。胆怯与勇敢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时变化的，忽然这样忽然那样。人们往往不知道它的变化的方法。只有圣人才能发现这一变化的原因和方法。”这是《吕氏春秋·决胜》里所说的一段话。我喜爱这段话，就将它抄之于此。

赵德甫金石录

【原文】 东武赵明诚德甫，清宪丞相中子也。著《金石录》三十篇，上自三代，下迄五季，鼎、钟、砮、鬲、磬、研、尊、爵之款识，丰碑大碣显人晦士之事迹，见于石刻者，皆是正讹谬，去取褒贬，凡为卷二千。其妻易安李居士，平生与之同志，赵没后，愍悼旧物之不存，乃作后序，极道遭罹变故本末。今龙舒郡库刻其书，而此序不见取，比获见元稿于王顺伯，因为撮述大概云：“予以建中辛巳归赵氏，时丞相作吏部侍郎，家素贫俭，德甫在太学，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后二年，从宦，便有穷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传写未见书，买名人书画、古奇器。有持徐熙《牡丹图》求钱二十万，留信宿，计无所得，卷还之，夫妇相向惋怅者数日。

“及连守两郡，竭俸入以事铅槧，每获一书，即日勘校装缉，得名画彝器，亦摩玩舒卷，摘指疵病，尽一烛为率。故纸札精致，字画全整，冠于诸家。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则举杯大笑，或至茶覆怀中，不得饮而起。凡书史百家字不 缺、本不误者，辄市之，储作副本。

“靖康丙午，德甫守淄川，闻虏犯京师，盈箱溢篋，恋恋怅怅，知其必不为己物。建炎丁未，奔太夫人丧南来，既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印本重大者，画之多幅者，器之无款识者，已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所载尚十五车，连舫渡淮、江。其青州故第所锁十间屋，期以明年具舟载之，又化为煨烬。

“己酉岁六月，德甫驻家池阳，独赴行都，自岸上望舟中告别。予意甚恶，呼曰：‘如传闻城中缓急，奈何？’遥应曰：‘从众，必不得已，先弃輜重，次衣衾，次书册，次卷轴，次古器。独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之！’径驰马去。秋八月，德甫以病不起。时六宫往江西，予遣二吏，部所存书二万卷，

金石刻二千本，先往洪州，至冬，虜陷洪，遂尽委弃。所谓连舫渡江者，又散为云烟矣！独馀轻小卷轴，写本李、杜、韩、柳集、《世说》、《盐铁论》、石刻数十副轴，鼎彝十数，及南唐书数篋，偶在卧内，岿然独存。上江既不可往，乃之台、温，之衢，之越，之杭，寄物于嵊县。庚戌春，官军收叛卒，悉取去，入故李将军家。岿然者十失五六，犹有五七篋，挈家寓越城，一夕为盗穴壁，负五篋去，尽为吴说运使贱价得之。仅存不成部帙残书策数种。

“忽阅此书，如见故人，因忆德甫在东莱静治堂，装裱初就，芸签缥带，束十卷作一帙，日校二卷，跋一卷，此二千卷，有题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泽如新，墓木已拱！乃知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亦理之常，又胡足道？所以区区记其终始者，亦欲为后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

时绍兴四年也，易安年五十二矣，自叙如此。予读其文而悲之，为识于是书。

【译文】 东武（今山东诸城）人赵明诚，字德甫，是丞相赵挺之（谥清宪）的第二个儿子。著有《金石录》一书，共三十篇。取材上自夏、商、周三代，下止五代末年。凡是鼎、钟、鬲、槁、罍、尊、爵等器物上的款识，丰碑大碣的名人事迹，见于石刻上的记载，都一一考订，纠正其中的伪讹谬误，选优去劣，并且加以评论，共计二千卷。他的妻子李清照，号易安居士。一生与他的志向相同，喜爱金石文物的收藏与鉴赏。赵明诚去世后，她痛惜与丈夫共同收集来的珍贵书籍字画及碑刻器物在战乱中丢失，于是为《金石录》一书写了后序，详细陈述了不幸惨遭浩劫的经过。现在龙舒郡库将赵明诚的《金石录》刻板印刷，李清照为该书所写的后序未见收录。

不久前，我在王顺伯那里见到后序原稿，读后很有感慨。因而摘要述其梗概如下。

我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与赵明诚结为夫妇。当时赵明诚的父亲，丞相赵清宪还在吏部作侍郎，家中历来贫穷，生活俭朴。明诚在太学读书，每月初一、十五两天，放假回来，将衣服作为抵押，换取五百文钱，步行到京城开封相国寺，在市上买些碑文、水果回来，我们二人相对而坐，一边吃水果，一边观赏古物书画，心情十分舒畅。两年以后，明诚做了官，有了薪俸，因而产生了尽收各地古书字画的念头。凡是遇到未有见过的传抄本就抄写，并且购买名人字画及古奇古器物。一天，见人拿着徐熙的《牡丹图》出售，要价二十万文钱。我们很想买，留那个人住了一宿，由于未能凑足二十万钱，只好将《牡丹图》卷起来还给了人家。我们夫妻二人为这件事，惋惜了好几天。

后来，赵明诚连续在两郡任太守。我们每月将薪俸收入几乎全都用来购买

书籍字画。每当购得一部书时，当天就校勘、装订，购得名人字画及古代彝器，我们就反复审视，摸玩展卷，进行评论，指出其中的弊病，大概要到一支蜡烛燃完的时间。所以，经过我们装表的书画，紧张精致，字画完整，其他各家都比不上我们。我们每天每次饭后无事时，就到归来堂坐下，冲上一壶茶，一边饮茶，一边谈论收集来的书籍，以某一件事在某种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为话题，进行猜测。以猜中与不中定谁胜谁负及饮茶先后。胜者先饮，负了后饮。胜者往往举杯大笑，有时不知不觉将茶泼在自己怀中，不能再喝了，只好起身而去。凡是经书史书及百家之书，只要书中字没有磨损残缺，板本不错的，我们都买下，留下作副本。

高宗靖康元年（1126年），明诚调到淄川（今山东淄博）去做太守。金兵进犯都城开封的消息传来，人们惊慌不安。我们对于收集而来满箱盈柜的书画器物，十分留恋，已经料想到会在战乱中丢失。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明诚的母亲不幸病故，我们奔丧来到南方。由于太大太重的古器古物携带不便，于是决定先丢弃那些又重又大的刻印本书及篇幅多的画卷、没有款识的古器物，由于余下的还多，进而决定再丢弃那些国子监印的监本书、一般的画及又重又大的器物。最后决定带走的，仍有十五车。我们乘船过了淮河，又渡过了长江，继续南行。而留在青州故宅十间屋里边的尽是古器字画，把门上落锁，想于明年用船运到南方。不幸在兵火中全都化为灰烬。

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我们就在池阳（今安徽贵池）安家住下。明诚接到任命通知，独自一人前往行都。他在河岸上与我分手告别。当时，我的心情很不好。就大声问他“如果听到城将被金人攻占时，我该怎么办？”明诚遥相呼应回答说：“随着众人行动。实在不得已，先扔掉行李，然后是衣服，再次是书简、画卷、古器物。只有祭祀用的礼器不要丢弃，要随身携带，与你共存亡。”说罢，挥鞭奔驰而去。这年秋天八月，不料明诚患病，医治无效，离开了人世。这时候，形势一天比一天紧急。孟大后宫已流亡到了江西。我派了两个小吏，带着存书两万卷，金石碑刻二千本，先到洪州（今江西南昌）。到了这年冬天，金兵攻占了洪州，运去的书籍器物，全都被毁。那些用船运到南方的书籍、字画、古器古物，也都化为云烟而无存。这时候，剩下的只有又轻又小的名人字画，手抄本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的文集，《世说新语》、《盐铁论》，以及石刻几十件，鼎器鬲器十几个，以及《南唐书》数箱。这是由于这些东西放在我的卧室里，所以才有幸保存下来。因为江西已为金兵所占，我就不再前往，于是决定继续南下，先到台州（今浙江临海），后到衢州（今江西衢县），越州（今浙江绍兴），再到杭州，将随身携带的东西，寄存于嵊县。

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春天，宋朝官军收降叛卒，我带去存留在嵊县的东西全都被抢走，落入前李将军家里。由我随身带去的東西，这时又丢失了十分之五六。剩下的，只有七竹箱，我随身携带，就暂时住在越州（今浙江绍兴）城内。一天晚上，盗贼趁夜深人静，在我住的屋墙上挖了一个洞，将我带去的五竹箱东西盗走，后来听说被转运使吴说用低价买去。留在我手中的只不过是成套的残书数种而已。

这天，我翻阅存留下来的东西，忽然见到《金录》一书，就好像见到了故人一样，使我浮想联翩。我回忆起当年和明诚的东莱（今山东掖县）静治堂时的情景，我们把书籍装订成册后，用芸香去薰淡黄色的绸带，把书十卷作为一帙捆起来。每天校勘两卷，为一卷写个题跋。在所存两千卷书中，写有题跋的有五百零二卷。而今明诚的书法手迹尚存犹新，他坟墓上的树木已长大可用两手围抱。我从自身的经历中深知，什么都是在变化的，有的时候，也必有无的时候，有聚的时候，也必有散的时候。这是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不必多加论述。我之所以详细地记述事情的始末，只不过是让后世喜受古书字画文物的人，引为鉴戒。

李清照这篇文章，写于高宗绍兴四年（1134年）。这一年，她五十二岁。我读完这篇文章后，很为她悲伤。因此，将它收于本书。

韩文公荐士

【原文】 唐世科举之柄，颛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为之助，谓之通榜，故其取人也畏于讥议，多公而审。亦有胁于权势，或挠于亲故，或累于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者。若贤者临之则不然，未引试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于胸中矣。韩文公《与祠部陆员外书》云：“执事与司贡士者相知识，彼之所望于执事者，至而无间，彼之职在乎得人，执事之职在乎进贤，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谓两得矣。愈之知者，有侯喜、侯云长、刘述古、韦群玉（《摭言》作纾）。此四子者，可以当首荐而极论，期于成而后止可也。沈杞、张（《科记》又作弘）、尉迟汾、李绅、张后馥、李翊，皆出群之才，与之足以收人望，而得才实，主司广求焉，则以告之可也。往者陆相公司贡士，愈时幸在得中，所与及第者，皆赫然有声。原其所以，亦有梁补阙肃、王郎中础佐之。梁举八人无有失者，其余则王皆与谋焉。陆相于王与梁如此不疑也，至今以为美谈。”此书在集中不注岁月。案《摭言》云：“贞元十八年，权德舆主文，陆

员外通榜，韩文公荐十人于 ，权公凡三榜，共放六人，余不出五年内皆捷。”以《登科记》考之，贞元十八年，德舆以中书舍人知举，放进士二十三人，尉迟汾、侯云长、韦纾、沈杞、李翊登第。十九年，以礼部侍郎放二十人，侯喜登第。永贞元年，放二十九人，刘述古登第。通三榜，共七十二人，而韩所荐者预其七。元和元年，崔 下放李绅，二年，又放张后余，张弘。皆与《摭言》合。陆 在贞元间，时名最著，韩公敬重之。其《行难》一篇为 作也，曰：“陆先生之贤闻于天下，是是而非非。自越州召拜祠部，京师之人日造焉。先生曰：‘今之用人也不详，位于朝者，吾取某与某而已，在下者多于朝，凡吾与者若干人。’”又送其刺歙州序曰：“君出刺歙州，朝廷耆旧之贤，都邑游居之良，斋咨涕颺，咸以为不当去。”则祗之以人物为已任久矣。其刺歙以十八年二月，权公放榜时，既以去国，而用其言不替，其不负公议而采人望，盖与陆宣公同。韩公与书时，方为四门博士，居百僚底，殊不以其荐为犯分。故公作《权公碑》云：“典贡士，荐士于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即不可信，虽大官势人交言，一不以缀意。”又云“前后考第进士，及庭所策试士，踊相蹶为宰相达官，其余布处台阁外府，凡百余人。”梁肃及 ，皆为后进领袖，一时龙门，惜其位不通显也，岂非汲引善士为当国者所忌乎？韩公又有《答刘正夫书》云：“举进士者，于先进之门，何所不往？先进之于后辈，苟见其至，宁可以不答其意邪？来者则接之，举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独有接后进名。”以是观之，韩之留意人士可见矣。

【译文】 唐代科举取士的大权，完全交给了主持的考试的主考官，仍然没有实行考试糊名的办法。那些交往密切、关系深厚的亲朋往往想方设法予以周旋，使其能够得中，当时人们称这种做法为通榜。所以，每次考试录取之后，主考官害怕众人的讥讽议论，就责令有关考官，严格考选，秉公审核。也有迫于权贵势要的压力，或受亲朋故友的干扰，或为子孙门生所连累，这些都是一般情理所不能避免的。如果是贤明的人作主考官则不会这样，没召集考生参加考试以前，哪些该录取，哪些不该，哪些人好，哪些人不好，实际已是胸中有数了。韩文公（韩愈）的《与祠部陆员外书》说：“阁下与主管科举考试的官员彼此了解信任，他寄希望于阁下的，是毫无顾虑，他的职责就在于获得人材，阁下您的责任在于推荐贤人，如果找到合适的人选告诉他，就是所讲的两全其美了。我所知道的，有侯喜、侯云长、刘述古、韦群玉（原注：《唐摭言》作韦纾），这四个人，可以作为最先推荐的而尽全力推举，一定要成功然后再说。沈杞、张翊（原注：《登科记》又作张弘）、尉迟汾、李绅、张后余、李翊，都是杰出的人材，推荐他们足以获得人们拥护，而得到实在人材，主考官广泛寻求

人材，则可以把这几位告诉他。往日陆相公（陆贽）主持科举考试，我当时有幸在被录取的人当中，那些授予进士及第称号的，都是颇有名望的。考察为什么会这样的原因，也是由于补阙梁肃、郎中王础协助他。梁肃举荐八个人没有不适当的，其他的则王础都参预了决策。陆贽对于王础与梁肃这样信任不疑，至今人们当作美谈。”这封书信在韩愈文集中没有注明写作的年月。查《唐摭言》记载：“贞元十八年（802年），权德舆作主考官，陆内员外郎是‘通榜’，韩文公（韩愈）向陆内推荐十个人，权德舆前后三次公布录取名单，共录取了其中的六个人，其余四人不出五年都也被录取。”用《登科记》来比照，贞元十八年，权德舆以中书舍人的身份担任知贡举，录取进士二十三人，尉迟汾、侯云长、韦纾、沈杞、李翊被录取。贞元十九年（803年），权德舆以礼部侍郎的身份担任知贡举，录取二十人，侯喜被录取。永贞元年（805年），又录取二十九人，刘述古被录取。这三次录取总计，一共七十二人，而其中韩愈所推荐的有七人。元和元年（806年），崔 任知贡举录取李绅，元和二年（807年），又录取张后余、张弘。这些都与《唐摭言》记载相符合。陆内在贞元年间，名声最大，韩愈很敬重他。韩愈的《行难》一篇作品就是为陆内写的，其中说：“陆先生的贤德名闻天下，都讲您能肯定正确的批评错误的。您从越州被朝廷召回京师在祠部任职，京师的人每天登门求见。先生您说：现在任用人材不周密，在朝廷里任职的，我只佩服某人和某人，在下面的人材比在朝廷里的多，总共我佩服的一共有若干人。”另外陆内改任歙州刺史，韩愈写序文送别他说：“你离京出外担任歙州刺史，朝廷内德高望重的贤人，京师里旅居的有识之士，哀叹落泪，都认为不应当让您离去。”可见陆内以举荐选拔人材作为自己的责任很久了。他担任歙州刺史是贞元十八年（802年）二月，权德舆公布录取名单时，他已经离开京师，而他的建议被采纳而毫无改变，权德舆不违背公众舆论而体察民情，大体与陆宣公（陆贽）相同。韩愈写书信给陆内时，才任四门博士，地位是百官中最低下的，全然不认为韩愈举荐人是超越名分。所以韩愈撰写的《权公碑》说：“主管科举考试，向您推荐士人的，讲的话可信，不因为他是普通百姓就不采纳；如果讲的不可信，即使大官权贵一起来讲，一点也不放在心上。”又说：“前后录取的进士，以及在廷试中考察过的士人，陆续担任了宰相高官，其余的分布在御史台、馆阁、外地官府，一共一百余人。”梁肃及陆内，都是后进者的引导人，是当时的龙门，可惜他们作官作得不太大，是不是因为他们提携优秀士人被当权者忌恨呢？韩愈又有《答刘正夫书》，其中讲：“想考取进士的人，对于已经作了官的前辈人的家，怎么能不前去求助？已经作了官的前辈人对于后辈人，假如看到他们来了，怎么可以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呢？来求助就要接待，全

城的士大夫，没有不这样做的，而韩愈我不幸独自愿接待帮助后进者的名声。”由此看来，韩愈的注重举荐人材是很明显的。

王勃文章

【原文】 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本原。其用骈俪作记序碑碣，盖一时体格如此，而后来颇议之。杜诗云：“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正为此耳。身名俱灭，以责轻薄子。江河万古流，指四子也。韩公《滕王阁记》云：“江南多游观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及得三王所为序、赋、记等。壮其文辞。”注谓：“王勃作游阁序。”又云：“中丞命为记，窃喜则名其上，词列三王之次，有荣耀焉。”则韩之所以推勃，亦不为浅矣。勃之文今存者二十七卷云。

【译文】 唐初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等四杰的诗文，所用典故都精确恰当，而且都有它的来历。他们用骈体文的形式作记、作序，以及撰写碑铭，这是因为当时流行的文体和格式是这样。后人不了解这个情况，对此颇多议论。杜甫在他的《戏为六绝》这首诗中写道：“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就是针对唐初四杰所用文体而言的。这里所说的，“身与名俱灭”，是用来谴责那些轻薄文人的。而“江河万古流”，则是指王、杨、卢、骆唐初四杰。韩愈在《滕王阁记》一文中说：“江南风景秀丽异人，有许多景点可以供人游览观赏。而在众多的游览景点中，滕王阁居于首位。后来见到王勃、王绪、王仲舒三人所写序、赋、记等诗文，很敬佩他们写得很好。在这一段下面，加注说：“王勃作《游滕王阁序》。”韩愈又说：“御史中丞王仲舒命我为洪州滕王阁写篇记文，我自己也为将韩愈的名字留在滕王阁上，文章排在王勃、王绪、王仲舒三王记文之后，也是一种荣幸。”由此来看，韩愈推崇王勃，由来久矣。王勃一生所写的诗文，现在有存的，为二十七卷。

吕览引诗书

【原文】 《吕氏春秋·有始览·谕大》篇，引《夏书》曰：“天子之德，广运乃神，乃武乃文。”又引《商书》曰：“五世之庙，可以观怪；万夫之长，可以生谋。”高诱注皆曰：“《逸书》也。庙者，鬼神之所在，五世久远，故于其

所观魅物之怪异也。”予谓吕不韦作书时，秦未有《诗》、《书》之禁，何因所引讹谬如此？高诱注文怪异之说，一何不典之甚邪？又《孝行览》，亦引《尚书》曰：“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今安得有此文，亦与《孝经》不合。又引《周书》曰：“若临深渊，若履薄冰。”注云：“《周书》，周文公所作。”尤妄也。又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为舜自作诗；“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岂无他土？”为子产答叔向之诗。不知是时《国风》、《雅》、《颂》何所定也。宁戚《饭牛歌》，高诱全引《硕鼠》三章，又为可笑。

【译文】《吕氏春秋》中有一篇题为《有始览·谕大》的文章，文中引用《夏书》的一段记载：“天子之德，广运乃神，乃武乃文。”意思是帝王的德行，威力大而又神奇，既有文治又有武功。又引用《尚书》里的记载：“五世之庙，可以观怪；万夫之长，可以生谋。”意思是五代有庙，可以看到鬼怪；一万人的长官，可以生出计谋。”东汉高诱在注释时说：“这是散失的《逸书》上的记载。庙是鬼神所在的地方。人死之后，相隔五世，时间长了，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种种鬼怪奇异的令人莫测的现象。按吕不韦在撰《吕氏春秋》时，秦国还没有严禁《诗经》、《书经》等儒家著作的禁令，为什么书中引文会有如此的谬误？高诱在注文中关于鬼怪奇异的说法，为什么如此的荒诞无稽？另外，在《吕氏春秋·孝行览》中亦引用《尚书》说：“天子刑罚多种，最重的莫重于不孝。”而今已见不到此书原文，同时这里所说，亦与今所见《孝经》里的记载不合。又引用《周书》说：“若临深渊，若履薄冰。”在这一段话后加注说：“《周书》为周文公所作”，这更是无稽之谈。该书中又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舜自己作的一首诗。且说：“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岂无他土”是郑国子产答叔向所作的一首诗。不知当时《诗经》中《国风》、《雅》、《颂》的划分是根据什么确定的。《饭牛歌》为宁戚所作，高诱在作注时，竟然将与此毫无关系的《诗经》中《硕鼠》三章全部引出，这是非常可笑的。

蓝田丞壁记

【原文】韩退之作《蓝田县丞厅壁记》，柳子厚作《武功县丞厅壁记》，二县皆京兆属城，在唐为畿甸，事体正同，而韩文雄拔超峻，光前绝后，以柳视之，殆犹粹稟之与美玉也。莆田方崧卿得蜀本，数处与今文小异，其“破崖岸而为文”一句，继以“丞厅故有记”，蜀本无而字。考其语脉，乃“破崖岸为文

丞”是句绝。文丞者，犹言文具备员而已，语尤奇崛，若以丞字属下句，则既是丞厅记矣，而又云“丞厅故有记”，虽初学为文者不肯尔也。此篇之外，不复容后人出手。侄孙倬，顷丞宣城，后生颇有意斯道，自作《题名记》示予。予晓之曰：“他文尚可随力工掘下笔，至如此记，岂宜犯不韪哉！”倬时已勒石，深悔之。近日亦见有为之者，吾家孙侄多京官调选，再转必为丞，虑其复有效尤者，故书以戒之。

【译文】 韩退之（韩愈）与《蓝田县丞厅壁记》，柳子厚（柳宗元）写《武功县丞厅壁记》，二县都是京兆府的属县，在唐代属于京师附近的地区，地位正好相同，而韩愈的文章雄壮有气魄，空前绝后，与柳宗元的文章相比，差不多像是美玉与普通石头放在一起。莆田人方崧卿得到四川刻印的版本，有几个地方与现在流行的版本的文字有小的差异，现流行版本中“破崖岸而为文”一句，接着便是“丞厅故有记”，四川版本没有“而”字。考察这句话的前后语义关系，则“破崖岸为文丞”是意思完整的一句话。文丞，就如同讲是摆设、滥竽充数的人罢了，用辞尤其新奇。如果把“丞”字放在下一句中读，则前文已讲到写丞厅记了，现在又说：“丞厅故有记”，即使是初学写文章的人也不肯这样写的。韩愈这一篇写了以后，不再容许后人再写同一题裁的记文了。我的侄孙洪倬，不久前提任宣城县丞，这个年轻人颇有意写篇记文，自己写了《题名记》给我看。我告诉他说：“别种文章还可以随能力大小巧拙下笔写，至于说这类记文，怎能犯这样的过错呢！”洪倬当时已令人把自己写的文章刻在石碑上了，很后悔。近些天也见到有人写这类记文的，我们家孙子、侄子有不少以京官身份任职，转二次官必然要作县丞，我担心他们中还有人走洪倬的老路，所以写这些话告诫他们。

钱武肃三改元

【原文】 欧阳公《五代史》叙《列国年谱》云：“闻于故老，谓吴越亦尝称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颇疑吴越后自讳之。及旁采诸国书，与吴越往来者多矣，皆无称帝之事。独得其封落星石为宝石山制书，称宝正六年辛卯耳。”王顺伯收碑，有《临安府石屋崇化寺尊胜幢》云：“时天宝四年岁次辛未四月某日，元帅府府库使王某。”又《明庆寺白伞盖陀罗尼幢》云：“吴越国女弟子吴氏十五娘建。其发愿文序曰：‘十五娘生黍霸朝，贵彰国懿。天宝五年太岁壬申月日题。’顺伯考其岁年，知非唐天宝，而辛未乃梁开平五年，其五月改乾化，

壬申乃二年。梁以丁卯篡唐，武肃是岁犹用唐天璽，次年自建元也。《钱唐湖广润龙王庙碑》云：“钱祔贞明二年丙子正月建。”《新功臣坛院碑》、《封睦州墙下神庙敕》，皆贞明中登圣寺磨崖，梁龙德元年，岁次辛巳，钱祔建。又有龙德三年《上宫诗》，是岁梁亡。《九里松观音尊胜幢》：“宝大二年岁次乙酉建。”《衢州司马墓志》云：“宝大二年八月歿。”顺伯案，乙酉乃唐庄宗同光三年，其元年当在甲申。盖自壬申以后用梁纪元，至后唐革命，复自立正朔也。又《水月寺幢》云：“宝正元年丙戌十月，具位钱祔建。”是年为明宗天成。《招贤寺幢》云：“丁亥宝正二年。”又小昭庆金牛、玛瑙等九幢，皆二年至五年所刻。贡院前桥注，刻宝正六年岁在辛卯造。然则宝大止二年，而改宝正。宝正尽六年，次年壬辰，有天竺《日观庵》经幢，复称长兴三年八月，用唐正朔，其年三月，武肃薨。方寝疾，语其子元膺曰：“子孙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于是以遗命去国仪，用藩镇法，然则有天宝、宝大、宝正三名，欧阳公但知其一耳。《通鉴》亦然。自是历晋、汉、周及本朝，不复建元。今犹有清泰、天福、开运、会同（系契丹年）、乾璽、广顺、显德石刻，存者三四十种，固未尝称帝也。

【译文】 欧阳修在他撰写的《五代史》中《列国年谱》的叙论中说：“听老一代人说，吴越也曾经称帝改元，而寻找有关的资料却没有找到，颇怀疑是吴越后来自己销毁了。等到查阅南唐、南汉等国史书，它们与吴越的往来是很多的，都没有记载吴越称帝的事。唯独找到吴越封落星石为宝石山的制书，末尾题写宝正六年（931年）辛卯而已。”王顺伯收集的碑文，有《临安府石屋崇化寺尊胜幢》，内载：“时间是天宝四年（911年）辛未年四月某日，元帅府府库使王某。”又有《明庆寺白伞盖陀罗尼幢》内载：“吴越国女弟子吴氏十五娘修建。”其中《发愿文》的序言说：“十五娘有幸生在霸主的王朝，要使国家的美德发扬光大。天宝五年（912年）壬申年某月某日题。”王顺伯考察立幢的时间，知道不是唐朝天宝年间，而辛未年乃是后梁开平五年（911年），此年五月改年号为乾化，壬申年乃是乾化二年（912年）。后梁君主在丁卯年（907年）篡夺了唐朝的政权，钱镠此年仍然用唐朝的年号“天璽”，第二年自己改元用自己的年号。《钱唐湖广润龙王庙碑》载：“钱镠贞明二年（916年）丙子正月建。”《新功臣坛院碑》、《封睦州墙下神庙敕》，都是贞明年间登圣寺磨崖石刻，后梁龙德元年（921年），辛巳年，钱镠建。又有龙德三年（932年）的《上宫诗》石刻，这一年后梁灭亡。《九里松观音尊胜幢》载：“宝大二年八月去世。”王顺伯的按语说，乙酉年乃是后唐庄宗同光三年（925年），宝大元年应当是甲申年。大约从壬申（912年）年以后用后梁的年号，到了后梁被后唐取代，又自己建立年号。又《水月寺幢》载：“宝正元年（926年）丙戌年十月，某官钱离建。”此年是后

唐明宗天成元年。《招贤寺幢》载：“丁亥年宝正二年（927年）。”又有小昭庆寺的《金牛》、《玛瑙》等九座石幢的刻文，都题写是宝正二年到宝正五年（930年）所刻。贡院前桥柱石刻，刻写宝正六年（931年）辛卯年建造。这样看来宋用宝大年号只有二年，就改年号为宝正。宝正年号用了六年，下一年是壬辰年，有天竺寺《日观庵经幢》，又题写长兴三年（923年）八月，用了后唐的年号，此年三月，钱俶去世。在病重期间，对他的儿子钱元瓘说：“子孙后代要好好事奉中原王朝，不要因为改朝换代忘掉以小事大的礼法。”于是他死以后根据他的遗命吴越去除了作为一个国家的礼仪，自己把自己放在藩镇位置上处理各种事务。不过吴越先后曾使用过天宝、宝大、宝正三个年号，欧阳修只知道其中一个而已。《通鉴》也是这样。吴越从此以后经历后晋、后汉、后周直到本朝，不再自立年号。现在仍有写有清泰、天福、开运、会同（是契丹辽朝年号）、乾蠡、广顺、显德等年号的石刻，存留三四十种，都表明吴越在此期间没有自称皇帝。

黄庭换鹅

【原文】 李太白诗云：“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盖用王逸少事也。前贤或议之曰：“逸少写《道德经》，道士举鹅群以赠之。”元非《黄庭》，以为太白之误。予为太白眼高四海，冲口成章，必不规规然，旋检阅《晋史》，看逸少传，然后落笔，正使误以《道德》为《黄庭》，于理正自无害，议之过矣。东坡雪堂既毁，绍光初，黄州一道士自捐钱粟再营建，士人何颙斯举作上梁文，其一联云：“前身化鹤，曾陪赤壁之游；故事换鹅，无复黄庭之字。”乃用太白诗为出处。可谓奇语。案张彦远《法书要录》，载褚遂良右军书目，正书有《黄庭经》云。注：六十行。与山阴道士真迹故在。又武平一《徐氏法书记》云：“武后曝太宗时法书六十余函，有《黄庭》。”又徐季海《古迹记》：“玄宗时，大王正书三卷，以《黄庭》为第一。”皆不云有《道德经》，则知乃《晋传》误也。

【译文】 李白在一首诗中写道：“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这是采用王羲之遗事的典故。以前有些学者议论说：“王羲之写《道德经》，道士们把一群鹅全部赠给了他。原本写的不是《黄庭经》。”以为这是李白误述。

李白学识渊博，眼界开阔，出口成章，必然不是那么拘拘束束。不久，我翻阅《晋书》，读王羲之传，然后落笔，即使真的是误将《道德经》说成是《黄庭经》。按道理上说，也没有什么妨害，议论的人不免有些言过其实。苏东坡在黄州（今湖北黄冈）修建的雪堂已被废毁。高宗绍兴初年，黄州有一道士自己

捐钱捐粮食再次建造，士人何斯举曾作上梁文。其中一联说：“前身化鹤，曾陪赤壁之游；故事换鹅，无复《黄庭》之字。”就是采用了李白诗中的说法。真可以说是奇语。据张彦远《法书要录》所载褚遂良的《右军书目》，在楷书一类中，内有《黄庭经》一书，下面加注：共六十行。是写给山阴道士的，真迹尚在。此外，武平一在所撰《徐氏法书记》中载：“武则天将唐太宗时的书法著作十余函拿出来晒，内有《黄庭经》一书。”还有徐季海的《古迹记》内记：“唐玄宗时，《大王正书》即王羲之的楷书，三卷，以《黄庭经》为第一帖。”在这些著作里都不记有《道德经》，由此可知《晋书·王羲之传》中所记有误。

宋桑林

【原文】 《左传》：“宋公享晋侯于楚丘，请以《桑林》。”注，《桑林》者，殷天子之乐名。“舞师题以《旌夏》。晋侯惧而退，及著雍疾，卜桑林见。荀偃、士 欲奔请祷焉，荀彘不可。”予案《吕氏春秋》云：“武王胜殷，立成汤之后于宋，以奉桑林。”高诱注曰：“桑山之林，汤所祷也。故使奉之。”《淮南子》云：“汤旱，以身祷于桑山之林。”许叔重注曰：“桑山之林，能兴云致雨，故祷之。”“桑林”二说不同。杜预注《左传》不曾引用，岂非是时未见其书乎？

【译文】 《左传》中记载：“宋襄公在楚丘（今山东曹县东）设宴款待晋侯，请求使用《桑林》之舞。”这里注释说：《桑林》是殷天子乐曲的名称。接着又说：“舞蹈开始，乐师举《旌夏》之旗，率领乐队进来。晋侯害怕，急忙退下，到达著雍，晋侯生病，占卜，从卜兆里见到桑林之神。荀偃和士 穰想返回宋国请求祈祷，荀彘不同意”。据《吕氏春秋》所载：“周武王灭殷之后，封成汤的后人于宋（今河南商丘一带），以他们世代代事奉桑林。”高诱在这里作注说：“桑山之林，是成汤祈祷的地方。所以让他的后裔供奉。”《淮南子》中说：“成汤遇到旱灾，便以自作担保亲自前往桑山之林祈祷。”许叔重在这句话的后面，加注说：“桑山之林，能够兴云致雨，所以天子要到这里祈祷。”可见，关于桑林的本意，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是乐曲的名字，一说是地名，祈祷的地方。杜预在注释《左传》时，没有引用《吕氏春秋》及《淮南子》中的材料，莫非是他在当年没有见到其书？

冯夷姓字

【原文】 张衡《思玄赋》：“号冯夷俾清津兮，棹龙舟以济予。”李善注《文选》引《青令传》曰：“河伯姓冯氏，名夷，浴于河中而溺死，是为河伯。”《太公金匮》曰：“河伯姓冯名修。”《裴氏新语》谓为冯夷。《庄子》曰：冯夷得之以游大川。《淮南子》曰：“冯夷服夷石而水仙。”《后汉张衡传》注，引《圣贤冢墓记》曰：“冯夷者，弘农华阴潼乡堤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为河伯。”又《龙鱼河图》曰：“河伯姓吕名公子，夫人姓冯名夷。”唐碑有《河侯新祠颂》，秦宗撰，文曰：“河伯姓冯名夷，字公子。”数说不同，然皆不经之传也。盖本于屈原《远游》篇，所谓“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前此未有用者。《淮南子·原道训》又曰：“冯夷、大丙之御也，乘云车，入云霓。”许叔重云：“皆古之得道能御阴阳者。”此自别一冯夷也。

【译文】 东汉张衡在《思玄赋》一文中写道：“号冯夷俾清津兮，棹龙舟以济予。”李善在注释《文选》时，引用了《青令传》一段记载。说“河伯姓冯，名夷，在河中洗澡时被溺死，因此叫河伯。”《太公金匮》一书中则说：“河伯姓冯名修。”《裴氏新语》里说，应当是冯夷。《庄子》里载：冯夷得之以游大川。《淮南子》中记：冯夷服用巨石变成为水仙。《后汉书·张衡传》的注文中，引用《圣贤冢墓记》关于河伯的记载，说“冯夷是弘农华阴潼乡堤首里人，服用了朱砂、雄黄、云母、空青、硫黄、戎盐、硝石、雌黄八种药石，成了水仙，人称河伯。”此外，《龙鱼河图》里记载：“河伯姓吕，名公子，他的夫人姓冯名叫夷。”唐代碑刻有《河阴新祠颂》一方，为秦宗撰文。碑文中说：“河伯姓冯，名夷，字公子。”凡此等等，说法不一，都是没有确凿可靠的根据的。究其原因，大概都是本于屈原《远游》篇中“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的记载。在这之前，未见有人用冯夷的。

《淮南子·原道训》里又记：“冯夷、大丙能够腾云驾雾，乘云车，直入云霄。”许叔重说：“这些都是古时候得道成仙能够驾驭阴阳的人。这里所说的冯夷，当与上面所说的河伯冯夷不是一人，自然是另一个冯夷！”

卷 六

韩文公逸诗

【原文】 唐五窦《联珠集》载，窦牟为东都判官，陪韩院长、韦河南同寻刘师，不遇，分韵赋诗。都官员外郎韩愈得寻字，其语云：“秦客何年驻，仙源此地深。还随蹑舄骑，来访驭云襟。院闭青霞入，松高老鹤寻。犹疑隐形坐，敢起窃桃心。”今诸本韩集皆不载。近者莆田方崧卿考证访蹟甚至，犹取《联珠》中窦庠《酬退之登岳阳楼》一大篇，顾独遗此，何也？

【译文】 唐代人的《五窦联珠集》记载，窦牟担任东都判官，陪同韩院长（韩愈）、韦河南县令（韦执中）一起去拜访刘尊老师，刘尊不在家因而没遇到，分韵脚作诗。都官员外郎韩愈得到“寻”字，这首诗原文是：“秦客何年驻，仙源此地深（秦朝那位躲避战乱的人是哪年迁居这里的？这里像桃花源一样隐藏得很深）。还随蹑舄骑，来访驭云襟（我们想要追随脚踏野鸭飞行的王乔，来拜访驾云乘风而行的仙人）。院闭青霞入，松高老鹤寻（院子大门紧闭只见青云飘入，高高的松树上白鹤飞来飞去）。犹疑隐形坐，敢起窃桃心（尚且怀疑刘尊老师学会了隐身术在家中安坐，我们怎敢像东方朔那样有想偷西王母仙桃之心）。”现在各种版本的韩愈文集都没有收入。近些时莆田人方崧卿考证、搜集很到家，连《五窦联珠集》中窦庠的《酬退之登岳阳楼》一大篇都收了，反而唯独把这一首漏了，为什么呢？

窦叔向诗不存

【原文】 窦氏《联珠序》云，五窦之父叔向，当代宗朝，善五言诗，名冠流辈。时属贞懿皇后山陵，上注意哀挽，即时进三章，内考首出，传诸人口。有“命妇羞苹叶，都人插柰花”，“禁兵环素襦，宫女哭寒云”之句。可谓佳唱，而略无一首存于今。荆公《百家诗选》亦无之，是可惜也。予尝得故吴良嗣家所抄唐诗，仅有叔向六篇，皆奇作。念其不传于世，今悉录之。《夏夜宿表兄话

旧》云：“夜合花开香满庭，夜深微雨醉初醒。远书珍重何时达，旧事凄凉不可听。去日儿童皆长大，昔年亲友半凋零。明朝又是孤舟别，愁见河桥酒幔青。”《秋砧送包大夫》云：“断续长门夜，清冷逆旅秋。征夫应待信，寒女不胜愁。带月飞城上，因风散陌头。离居偏入听，况复送归舟。”《春日早朝应制》云：“紫殿俯千官，春松应合欢。御炉香焰暖，驰道玉声寒。乳燕翻珠缀，祥鸟集露盘。宫花一万树，不敢举头看。”《过檐石湖》云：“晓发鱼门埭，晴看檐石湖。日衔高浪出，天入四空无。咫尺分洲岛，纤毫指舳舻。渺然从此去，谁念客帆孤。”《贞懿挽歌》二首云：“二陵恭妇道，六寝盛皇情。礼逊生前贵，恩追歿后荣。幼王亲捧土，爱女复连茕。东望长如在，谁云向玉京。”“后庭攀画柳，上陌咽清笳。命发羞苹叶，都人插柰花。寿宫星月异，仙路往来赊。纵有迎神术，终悲隔绛纱。”第三篇亡。叔向字遗直，仕至左拾遗，出为溧水令。《唐书》亦称其以诗自名云。

【译文】 窦氏《联珠集序》中说，窦氏兄弟五人，父亲是窦叔向。在唐代宗朝时，窦叔向擅长写五言诗，在当时同辈人中富有盛名。那时候，正值贞懿皇后丧葬，代宗皇帝对贞懿皇后的去世十分悲痛，曾下令让群臣进呈挽辞。窦叔向即时写贞懿挽歌三章致哀。进呈之后，老宫人首先将它传了出来，使它能够通过传之于世人。诗中有“命妇羞苹叶，都人插柰花”，“禁兵环素紵，宫女哭寒云”等句，真可以说是优美的绝唱，可惜而今没有一首存世。王安石选编的《百家诗选》，选有不少家诗人的作品，也没有将窦叔向的诗作辑入，实在可惜。我在已故的吴良嗣家中见到所抄的唐诗，仅见有窦叔向的诗六首，都为新奇的佳作。念其诗作未能传之于世，今将所见六首，录之于后。

窦叔向在《夏夜宿表兄话旧》中写道：

夜合花开香满庭，夜深微雨醉初醒。

远书珍重何时达，旧事凄凉不可听。

去日儿童皆长大，昔年亲友半凋零。

明朝又是孤舟别。愁见河桥酒幔青。

在《秋砧送包大夫云》中写道：

断续长门夜，清冷逆旅秋。

征夫应待信，寒女不胜愁。

带月飞城上，因风散陌头。

离居偏入听，况复送归舟。

在《春日早朝应制》中写道：

紫殿俯千官，春松应合欢。

御炉香焰暖，驰道玉声寒。
乳燕翻珠缀，祥鸟集露盘，
宫花一万树，不敢举头看。

在《过檐石湖》中写道：

晓发鱼门埭，晴看檐石湖。
日衔高浪出，天入四空无。
咫尺分洲岛，纤毫指舳舻。
渺然从此去，谁念客帆孤。

他所撰写的《贞懿挽歌》三首，其中二首是：

二陵恭妇道，六寝盛皇情。
礼逊生前贵，恩追殁后荣。
幼王亲捧上，爱女复连茔。
东望长如在，谁云向玉京。

后庭攀画柳，上陌咽清笳。
命妇羞苹叶，都人插柰花。
寿宫星月异，仙路往来赊。
纵有迎神术，终悲隔绡纱。
第三首散佚。

窦叔向字遗直，官至左拾遗，被贬外调出任溧水县（今属江苏）县令。《新唐书》里评论，亦说他以善于作诗而著名。

用柰花事

【原文】 窦叔向所用柰花事，出《晋史》。云成帝时，三吴女子相与簪白花，望之如素柰，传言天公织女死，为之著服。已而杜皇后崩，其言遂验。绍兴五年，宁德皇后卜音从北庭来，知徽州唐辉使休宁尉陈之茂撰疏文，有语云：“十年罹难，终弗返于苍梧。万国衔冤，徒尽簪于白柰。”是时，正从徽庙蒙尘，其对偶精确如此。

【译文】 窦叔向诗中所用的关于柰花的典故，出自《晋书》。是说晋成帝时，三吴地区的妇女纷纷头上插白花，看上去像素色的柰花，传说天帝的织女死了，为她带孝。不久杜皇后便去世了，这话就得到验证了。绍兴五年（1135

年），宁德皇后的死讯从金朝境内传来，知徽州唐辉让休宁县县尉陈之茂撰写佛教道场用的祭文，其中有一段话说：“十年罹难，终弗返于苍梧（遭受了十年灾难，舜妃最终未能从苍梧返回）；万国衔冤，徒尽簪于白柰（天下人都认为冤枉，无奈只能一齐插上白色柰花为皇后致哀）。”当时，宁德皇后正随宋徽宗被金朝软禁，这两句话对仗和用典是这样地精妙恰当。

王廖儿良

【原文】 贾谊《过秦论》曰：“六国之士，吴起、孙臆、带佗、儿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朋制其兵。”《汉书》注家皆无所释，颜师古但音儿为五奚反，廖为聊而已。此八人者，带佗，儿良、王廖不知其何国人，独《吕氏春秋》云：“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列子贵虚，陈骈贵齐，杨朱贵己，孙臆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而注云：“王廖谋兵事，贵先，建茅也。儿良作《兵谋》，贵后。”虽仅见二人之名，然亦莫能详也。廖、良列于孔、老之末，而汉四种兵书，有良《权谋》一篇。又贾谊首称宁越、杜赫为之谋。《汉书》亦不注。吕氏云孔、墨、宁越，皆布衣之士也。越中牟人也，周威公师之。又称杜赫以安天下说周昭文君。则越、赫善谋，可以概见。漫书之以补《汉书》之缺。

【译文】 贾谊在他的《过秦论》中说：“六国时候的士人，吴起、孙臆、带佗、儿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等人，都统率过军队。”注释《汉书》的各家，对此都没有作出过解释。颜师古在注中，在儿字下，仅注读音，为五奚反出。在廖字下注，读音为聊。上面说的这八个人，带佗、儿良、王廖，不知他们为何地何国人。只在《吕氏春秋》中见有这样的记载：“老聃以柔和为贵，孔子以仁爱为贵，墨翟以廉正为贵，关尹以清白为贵、列子以空虚为贵，陈骈以齐整为贵，杨朱以自己为贵，孙臆以形势为贵，王廖以先为贵，儿良以后为贵。”文中加注说：“王廖谋划出兵打仗，注重先发制人，是为了建功立业，克敌制胜。儿良著《兵谋》一书，注重后发制人，总结作战的经验教训，以利再战。”这里仅仅提到这两个人的名字，亦未能具体述及他们的生平事略。但从《吕氏春秋》书中对这八人排列的名次来看，王廖、儿良排在孔子、老聃之后，而汉代的四种军事著作，其中一种是张良的《权谋》。另外，贾谊在记事时，首行提出有宁越、杜赫为之出谋划策。关于这一点，《汉书》中亦未注释与说明。《吕氏春秋》中说，孔子、墨子、宁越都是平民出身的士人。宁越是中牟人，周威公

曾拜他为师。又说杜赫曾用平定天下的主张游说于周昭文君。据此可知，宁越、杜赫都是善于谋划的人物。以上几则，随便写出，以补《汉书》所记的遗缺。

徙木僨表

【原文】 商鞅变秦法，恐民不信，乃募民徙三丈之木而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金，乃下令。吴起治西河，欲谕其信于民，夜置表于南门之外，令于邑中曰：“有人能僨表者，仕之长大夫。”民相谓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试往僨表，不得赏而已，何伤？”往僨表，来谒吴起，起仕之长大夫。自是之后，民信起之赏罚。予谓鞅本魏人，其徙木示信，盖以效起，而起之事不传。

【译文】 商鞅改变秦国的法律，怕百姓不相信，便向百姓宣布谁移走三丈高的木杆就给予他黄金五十斤。有一个人移走了木杆，便把黄金给了他，然后下令变法。吴起管理西河地区，想向百姓表明他有信用，夜间在南门外设置一根测时间的标杆，在城中下令说：“有谁能把标杆放倒的，就让谁担任长大夫的官职。”百姓们彼此议论说：“这项命令必定不能兑现。”有一个人说：“试试去把标杆放倒，顶多是得不到奖赏罢了，有什么损失？”就去把标杆放倒了，来拜见吴起，吴起便让他任长大夫。从此以后，百姓相信吴起的赏罚分明。我认为商鞅原是魏国人，他的用移动木杆表示讲信用的方法，大概是效法吴起，而吴起的事却没有流传。

建武中元续书

【原文】 《随笔》所书《建武中元》一则，文惠公作《隶释》，于蜀郡守何君《阁道碑》一篇中，以为不然。比得蜀士袁梦麒应祥《汉制丛录》，亦以纪、志、传不同为惑，而云近岁雅州荣经县治之西，有得《蜀郡治道记》于崖壁间者，记末云：“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于是千戴之疑，涣然冰释。予观何君《阁道》正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袁君所言荣经崖壁之记，盖是此耳。但以出于近岁，恨不得质之文惠，为之恻然。

【译文】 《容斋随笔》中有《建武中元》一则，我曾对这一记载谈了自己的看法。我的哥哥文惠公洪适在所著《隶释》中，对于成都所存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中的建武中元亦有考释，认为不是这样。近来看到蜀人袁应祥《汉制

丛录》，也为《后汉书》中纪、志、传所记不同而感到困惑。近年在雅州荣经县城西部山区的崖壁上，发现有《蜀郡治道记》石刻，在这篇记最后，书作建武中元二年（57年）六月刻完。这一发现，使得一千多年来的疑虑，应刃而解。依据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所记，阁道正式建成是在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六月。袁应祥所说荣经县西崖壁石刻的《蜀郡治道记》，也就是这块石碑。但是，由于它是近年来才被人们发现的，不能用它与文惠公质异商榷，非常遗憾！

革驹聋虫

【原文】 今人谓野牧马为草马，《淮南子·修务训》，曰：“马之为草驹之时，跳跃扬蹄，翘尾而走，人不能制。”注云：“马五尺以下为驹，放在草中，故曰草驹”。盖今之所称者是也。下文曰：“形之于马，马不可化，其可驾御，教之所为也。马，聋虫也，而可以通气志，犹待教而成，又况人乎？”注曰：“虫，喻无知也。”聋虫之名甚奇。

【译文】 现在人们都称在野外放牧的马为草马。《淮南子·修务训》里说：“马在幼年为草驹时，乱蹄乱跳，翘起尾巴，四处奔跑，人们难以制服它。”在这一条后面加注说：“马，五尺以下为驹，因为在草地上放牧，所以叫它草驹。”这和现在人们的叫法是一样的。这篇文章中接着又说：“马是有形体的，它不能变成别的东西。它之所以可以供人驾御，是经过驯化的结果。马，又叫聋虫。马通人性，可以理解人意，仍然有待于人们驯化，只有经过驯化，它才能供人使用。何况人呢？”在这一条后面加注说：“虫，比喻无知的意思。”马又叫聋虫，聋虫这个名字非常奇怪。

记李履中二事

【原文】 崇宁中，蔡京当国，欲洗邢恕诬谤宗庙之罪，既拭用之，又欲令立边功以进身，于是以为经原经略使，遂谋用车战法，及造舟五百艘，将直抵兴、灵，以空夏国。诏以付熙河漕臣李复。复长安人，久居兵间，习熟戎事，力上疏诋切之。予顷书之于国史恕列传中。比得上饶所刊《香水集》，正复所为文，得此两奏，叹其能以区区外官而排斥上相之客如此。恨史传为不详尽，乃录于此。其《乞罢造战车疏》云：“奉圣旨，令本司制造战车三百两。臣尝览载

籍，古者师行，固尝用车，盖兵不妄动，征战有礼，不为诡遇，多在平原广野，故车可以行。今尽在极边，戎狄乘势而来，虽鸷鸟飞翥，不如势之迅捷，下寨驻军，各以保险为利。其往也，车不及朝，居而保险，车不能登，归则虏多袭逐，争先奔赴，不暇回顾，车安能收？非若古昔于中国为用。臣闻此议，出于许彦圭，彦圭因姚麟而献说，朝廷遂然之，不知彦圭剧为轻妄。唐之房琯，尝用车战，大败于陈涛斜，十万义军，无有脱者。畿邑平地且如此，况今欲用于峻阪沟谷之间乎？又战车比常车阔六七寸，运不合辙，牵拽不行。昨来兵夫，典卖衣物，自赁牛具，终日方进五七里，遂致兵夫逃亡，弃车于道，大为诸路之患。今乞便行罢造，如别路已有造者，乞更不牵拽前来。”其《乞罢造船奏》云：“邢恕乞打造船五百只，于黄河顺流放下，至会州西小河南藏放。有旨专委臣监督，限一年了当契勘。本路只有船匠一人，须乞于荆、江、淮、浙和雇。又丁线物料，亦非本路所出。观恕奏请，实是儿戏。且造船五百只，若自今工料并备，亦须数年。自兰州驾放至会州，约三百里，北岸是敌境，岂可容易？会州之西，小河咸水，其阔不及一丈，深止于一二尺，岂能藏船？黄河过会州入韦精山，石峡险窄，自上垂流直下，高数十尺，船岂可过？至西安州之东，大河分为七道，水浅滩碛，不胜舟载，一船所载，不过五马二十人，虽到兴州，又何能为？又不至几月得至？此声若出，必为夏国侮笑，臣未敢便依旨挥擘画，恐虚费钱物，终误大事。”疏既上，徽宗察其言忠，遂罢二役。复字履中，为关内名儒，官至中大夫、集英殿修撰。李昭稹赠诗云：“结交赖有紫髯翁，鹤骨嶙嶙烂修目。五言长城屹千丈，万卷书楼聊一读。”可知其人矣。

【译文】 崇宁年间，蔡京当权，想洗刷邢恕诬蔑诽谤宣仁太后和宋仁宗的罪过，在为他辩解及任用他以后，又想让他边疆立功以作为提拔的理由，于是任命他为经原经略使。邢恕便出主意运用车战方法，另外造船五百艘，准备一直进兵到光州、灵州，把夏国的军队全消灭。朝廷下令把他的建议转发熙河路转运使李复。李复是长安人。长期生活在战争环境中，熟悉军事，上书朝廷极力批评邢恕的意见。我不久前把这件事写进了国史的邢恕传里。最近又获得上饶刊刻的《秋水集》，正是李复的文章汇编，见到关于此事的两篇奏疏，感叹他能以地位不高的地方官员的身份而如此坚决地反对宰相的门客。我悔恨写国史传记时写的不详细完备，便抄录在此。李复的《乞罢造战车疏》说：“接到圣旨，令本司制造战车三百辆。我曾经查阅文献记载，古代军队出动，固然曾经使用战车，这是军队不随便出动，打仗讲究礼法，不搞阴谋诡计突然袭击，打仗大多在平原旷野，所以车可以行走。现在打仗全在偏远的边疆，戎狄外族人抓住有利时机前来，即使是凶猛的雄鹰，也没有他们行动那样迅捷，扎寨驻军，

都是占据险要作为有利地形。敌军来了，我方战车不能如期赶到，停下来占据险要，战车又不能登高，撤退时敌兵往往追击，我军兵士争先恐后地逃跑，连回头看一眼的功夫都没有，战车怎能收回？根本不能像古代那样战车能应用于战争。我听说这项建议，是许彦圭最先提出的，许彦圭通过姚麟提交朝廷，朝廷便肯定了它，却不知道许彦圭所讲的完全是轻浮荒谬的意见。唐代的房琯，曾经使用战车，在陈涛斜被敌军打得大败，十万义军，没有逃脱的。都城附近的平地尚且这样，何况现在想应用于高山深谷之间呢？另外战车比普通车宽六七寸，走起来车轮与车道沟不吻合，拉起来拉不动。以前的士兵和民夫，典当出卖衣服杂物，自己租赁牛车，一整天才前进六七里，便有士兵民夫逃亡，把车子扔在路上，成为各路州县的大祸患。现在我请求立即停止制造战车，如别的路已经有造好的，请求不要牵拉来我们这里。”他写的《乞罢造船奏》说：“邢恕请求制造船五百艘，从黄河顺流放行，到会州西小河中收藏停泊。朝廷命令我监督实施，限一年完成。据了解本路只有船匠一个人，必须申请到荆湖、江南、淮南、两浙地区用钱雇佣。另外造船用的铁钉、铁丝皮线和木料等，也不是本路出产的。看邢恕的奏章，实在是儿童游戏。而且造船五百艘，如果从今天开始，工人原料齐备，也必须几年时间才能完工。从兰州放到河中驾船到会州，大约三百里，北岸是敌占区，哪里是容易事？会州的西面，小河的水是咸的，河宽不到一丈，深只有一二尺，怎能藏船？黄河经过会州进入韦精山，峡谷狭窄危险两岸都是石山，从上面垂直流下，水位差有几十尺，船怎么能通过？到了西安州以东，黄河分为六七个支流，水浅河底多有石块，不能行船，一艘船所载，不过五匹马二十个人，即使到了兴州，又能有什么作为？又不知几个月才能到达？这消息如果传出，必定会被夏国人耻笑，我不敢马上就按朝廷命令规划执行，恐怕白白地浪费钱物，最终耽误国家大事。”奏疏呈上以后，宋徽宗察知他的话出于忠心，便下令停止了这两项工程。李复字履中，是函谷关以西地区的著名儒生，作官作到中大夫，集英殿修撰。李昭玘曾写诗赠他说：“结交赖有紫髯翁，鹤骨嶙嶙烂修目（结交的人中有幸有您这位有孙权一样英雄气质的紫胡子长者，您身体消瘦硬骨铮铮眼睛炯炯有神）。五言长城屹千丈，万卷书楼聊一读（您的诗就像唐代诗人‘五言长城’，刘长卿屹立千丈；您的藏有万卷书的书楼我倒不妨去参观阅读）。从这句诗我们可以粗略了解李复这个人。

乾宁复试进士

【原文】 唐昭宗乾宁二年试进士，刑部尚书崔凝下二十五人。放榜后，宣诏翰林学士陆、秘书监冯渥入内，各赠衣一副，及毡被，于武德殿前复试，但放十五人。自状头张贻范以下重落，其六人许再入举场，四人所试最下，不许再入，苏楷其一也。故挟此憾，至于驳昭宗“圣文”之谥。崔凝坐贬合州刺史。是时，国祚如赘疣，悍镇强藩，请遂问鼎之不暇，顾稷稷若此。其再试也，诗赋各两篇，内《良弓献问赋》，以“太宗问工人木心不正，脉理皆邪，若何道理”十七字皆取五声字，以轮次以双周隔句为韵，限三百二十字成。贻范等六人，讫唐末不复缀榜。盖是时不糊名，一黜之后，主司不敢再收拾也。有黄滔者，是年及第，闽人也，九世孙沃为吉州永丰宰，刊其遗文，初试复试凡三赋皆在焉。《曲直不相入赋》，以题中曲直两字为韵。释云：邪正殊途，各有好恶。终篇只押两韵。《良弓献问赋》，取五声字次第用各随声为赋格。于是第一韵尾句云：“资国祚之崇崇”，上平声也。第二韵：“垂宝祚于绵绵”，下平声也。第三韵：“曾非唯唯”，上声也。第四韵：“露其言而粲粲”，去声也。而阙入声一韵。赋韵如是，前所未有的。国将亡，必多制，亦云可笑矣。信州永丰人王正白，时再试中选，郡守为改所居坊名曰“进贤”，且减户税，亦后来所无。

【译文】 唐昭宗乾宁二年（895年），在京举行进士科考试，主考官为刑部尚书崔凝，录取二十五人。考试完毕，将考试结果张榜公布之后，传命翰林学士陆内、秘书监冯渥入宫进见。每人各赠给衣服一套，还有毡被等物。接着进行复试。复试在武德殿举行。复试完毕，正式宣布只取十五人。前次录取的自第一名张贻范以下十人落榜。在这十人中，有六人考试成绩还算可以，准许再下考场应试。另外四人，考试成绩很差，不许再入考场应试，苏楷便是这四人中的一个。他怀着胸中怒火，著文批驳唐昭宗“圣文”的谥号。因而为朝廷所恼恨。刑部尚书崔凝也因此事被贬调离京城去任合州（今四川合川）刺史。这时候，政局动荡不安。唐朝天子犹如多余的废物，强横有力的镇将和藩镇势力，为着谋取后位，纷争不已，无暇顾及他事。而他却如此眷念着进士科的考试。

这次复试，考试内容为诗赋各两篇。其中一题为《良弓献问赋》，要求用“太宗问工人术心不正，脉理皆邪，若何道理”十七字，都取上平、下平、上、去、入五声字，依轮次每两句用一个字押一次韵，全篇字数以三百二十字为限。张贻范等六人，屡次应试，直至唐朝末年仍然榜上无名。这是由于当时考试，还

没有实行糊名制度，一旦考试落选，再参加考试，考官在阅卷时可以直接看到他的真实姓名、籍贯，也就没有谁敢录取他了。有一个名叫黄滔的人，这一年考中进士。他是闽（今福建）人。他的第九代孙子黄沃为吉州永丰县知县，曾将他的遗文搜集汇编刻印，他在应试时，初试、复试所作的三篇赋文都辑在书中。一篇题目是《曲直不相入赋》，要求用题目中的曲、直二字为韵。并且加注说，邪正殊途，各有好恶。终篇只押两韵。另一篇题目是《良弓献问赋》，要求取五声字次第用各随声为赋的格式。按照这一要求撰文，第一韵末句是“资国祚之崇崇”，崇字，上平声。第二韵“垂宝祚于绵绵”，绵字，下平声。第三韵末句是“曾非唯唯”，唯字，上声。第四韵末句是“露其言而粲粲”，粲字，去声。这里缺入声一韵。像这样的赋韵，是前所未有的。在唐王朝行将覆亡之际，定出这样复杂的制度，亦是十分可笑的。

信州永丰（今属江西）人王正白，于这一年再试时被录取，州刺史将他家所在地的坊名改为“进贤”，并且决定免去他家里每年向官府交纳的户税。这是后来所没有的。

临海蟹图

【原文】 文登吕亢，多识草木虫鱼。守官台州临海，命工作《蟹图》，凡十有二种。一曰螭蟬。乃蟹之巨者，两螯大而有细毛如苔，八足亦皆有微毛。二曰拨棹子。状如螭蟬，螯足无毛，后两小足薄而微阔，类人之所食者，然亦颇异，其大如升，南人皆呼为蟹，八月间盛出，人采之，与人斗，其螯甚巨，往往能害人。三曰拥剑。状如蟹而色黄，其一螯偏长三寸余，有光。四曰彭螭。螯微毛，足无毛，以盐藏而货于市，《尔雅》曰：“彭螭，小者馐。”云小蟹也。稍音泽，馐音劳。吴人呼为彭越。《搜神记》言，此物尝通人梦，自称长卿。今临海人多以长卿呼之。五曰竭朴。大于彭螭，壳黑斑，有文章，螯正赤，常以大螯障目，小螯取食。六曰沙狗。似彭螭，壤沙为穴，见人则走，屈折易道不可得。七曰望潮。壳白色，居则背坎外向，潮欲来，皆出坎举螯如望，不失常期。八曰倚望。亦大如彭螭，居常东西顾睨，行不四五，又举两螯，以足起望，惟入穴乃止。九曰石福。大于常蟹，八足，壳通赤，状若鹅卵。十曰蜂江。如蟹，两螯足极小，坚如石，不可食。十一曰芦虎。似彭螭，正赤，不可食。十二曰彭螭。大于螭，小于常蟹。吕君云：“此皆常所见者，北人罕见，故绘以为图。又海商言，海中稊稽岛之东，一岛多蟹，种类甚异。有虎头者，有翅能飞者，有

能捕鱼者，有壳大兼尺者，以非亲见，故不画。”李履中得其一本，为作记。予家楚，宦游二浙、闽、广，所识蟹属多矣。亦不悉与前说同。而所谓黄甲，白蟹、種、稷诸种，吕图不载，岂名谓或殊乎？故纪其详以示博雅者。

【译文】 文登人吕亢，认识很多草木虫鱼。在台州临海作官，命令画工画了《蟹图》，共画了十二种蟹。第一种叫蝤蛸。是蟹中较大的，两支螯较大而长有像苔藓一样的细毛，八支腿也都有微毛。第二种叫拨棹子，形状像蝤蛸，螯和腿都没有毛，后面两条小腿较薄而稍宽，和人们食用的那种类似，然而也有相当差异，它的大小像量器升一样，南方人都称它们为蟹，八月里出现很多，人们捕捉它们，它们与人争斗，它们的螯很大，往往能伤人。第三种叫拥剑。形状像蟹而颜色发黄。它们的一支螯比另一支螯长三寸多，有光泽。第四种叫彭季。螯有微小的毛，腿上没有毛，人们用盐腌制耗藏到市上去卖。《尔雅》记载：“彭，小的叫烁。”讲是小蟹，粉读音同泽，烁读音同劳，吴郡（苏州平江府）人称它为彭越。《搜神记》讲，这种动物曾进入人的梦里，自称“长卿”，现在海边的人往往用“长卿”称乎它。第五种名叫竭朴。比彭季大，壳上有黑斑，有花纹，螯是正红色的，常常用大螯挡住眼睛，用小螯攫取食物。第六种叫沙狗。形状与彭季相似，在沙土中造洞穴，见人就跑，转弯抹角变换方向不能抓到。第七种叫望潮。壳是白色的，平常就背靠土坎面向外，潮水要来了，都爬出土坎举起螯像是张望，每次都这样。第八种叫倚望，也像彭季逢那么大，平常总是东张西望，走不了四五步，又举起两支螯，用腿撑起身体季望，只有进入洞穴时才停止，第九种叫石。比一般的蟹都大，八条腿，壳是通红的，形状像鹅卵。第十种叫蜂江。形状像蟹，两支螯和腿很小，坚硬如石头，不能食用。第十一种叫芦虎。形状像彭蜞，正红色，不能食用。第十二种叫彭蜞，比彭季大，比一般的蟹小。吕君说：“这些都是平常所见到的，北方人很少见到，所以绘成图。另外海商讲，大海中嵎嵎岛的东面，有一个岛上蟹很多，种类很奇异。有虎头的，有长有翅膀能飞的，有能捕捉鱼的，有壳大直径二尺以上的，因为不是亲眼见到，所以没画。”李履中（李复）得到一幅蟹图，为它写了记文。我家乡在楚地，作官游历了浙东浙西、福建、广南，认识的蟹一类的动物多了，也与上述说法不全相同。有被人称为黄甲、白蟹、杭、祗等的，吕亢的图上没有画，是不是名称叫法不一样呢？所以详细叙述用来给兴趣广泛知识广博的人看。

东坡作碑铭

【原文】 东坡《祭张文定文》云：“轼于天下，未尝铭墓，独铭五人，皆盛德故。”以文集考之，凡七篇。若富韩公、司马温公、赵清献公、范蜀公并张公，坡所自作。此外赵康靖、滕元发二志，乃代张公者，故不列于五人之数。《眉州小集》有元盥中奏稿云：“臣近准敕差撰故同知枢密院事赵瞻神道碑并书者，臣平生本不为人撰行状、埋铭、墓碑，士大夫所共知。只因近日撰《司马光行状》，盖为光曾为臣亡母程氏撰埋铭，又为范缜撰墓志，盖为镇与先臣某平生交契至深，不可不撰。及奉诏撰司马光、富弼等墓碑，不可固辞，然终非本志，况臣老病废学，文词鄙陋，不称人子所欲显扬其亲之意，伏望圣慈别择能者，特许辞免。”观此一奏，可印公心。而杭本奏议十五卷中不载。

【译文】 苏轼号东坡居士，在其所撰《祭张文定公文》中说：“我从来就不愿意为人写墓志铭。在我的一生中，只给五人写过，这是因为他们确实有大功大德。”仔细查考他的文集，墓志铭共有七篇。即富韩公弼、司马温公光、赵清献公、范蜀公镇及张文定公方平的墓志，是他自己撰写的。此外两篇，即赵康敬、滕元发二人墓志铭，是他替张文定撰写的。虽然也出之于他手笔，可以不列入五人之数中。《眉州小集》是苏东坡的一部著作。书中有他在哲宗元祐年间写的一篇奏稿。文中说：“臣近日遵依敕书所遣，去为已故的同知枢密院事赵瞻撰写神道碑并把撰文写在碑石上。臣一生本来不愿意为人撰写行状、墓铭、墓碑，这是士大夫们尽人皆知的事。只是近来臣为司马光写了行状，这是由于司马光曾为臣已故的母亲程氏撰写了墓铭。臣又为范镇撰写了墓志，这是由于范镇与臣的父亲苏洵生前交情很深。这是不能不写的。至于奉诏为司马光、富弼等人撰写墓碑，亦是不能推辞的。然而，终究不是为臣本人的心愿。况且，而今臣年老，体弱多病，学业荒废，文词低下浅薄，不能满足作为子孙希望宣扬他的亲人功德恩泽的夙愿。因此，恳请陛下另选贤能之人去撰写，以免去臣的这个差使。”

根据此奏，为人撰写墓志碑铭并不是苏东坡的心愿。而今所见，杭州刻本苏东坡奏议十五卷里没有收录其文。

洗儿金钱

【原文】 车驾都钱塘以来，皇子在邸生男及女，则戚里、三衙、浙漕、京尹，皆有饷献，随即致答，自金币之外，洗儿钱果，动以数十合，极其珍巧，若总而言之，殆不可胜算，莫知其事例之所起。刘原甫在嘉盥中，因论无故疏决云：“在外群情，皆云圣意以皇女生，故施此庆，恐非王者之令典也。又闻多作金银、犀象、玉石、琥珀、玳瑁；檀香等钱，及铸金银为花果，赐予臣下，自宰相、台谏、皆受此赐。无益之费，无名之赏，殆无甚于此。若欲夸示奢丽，为世俗之观则可矣，非所以轨物训俭也。宰相、台谏，以道德辅主，奈何空受此赐，曾无一言，遂事不谏！臣愿深执恭俭，以答上天之祝，不宜行姑息之恩，以损政体。”伟哉刘公之论，其劲切如此。欧阳公铭墓，略而不书。予为国史亦不知载于本传，比方读其奏章，故敬纪之。韩琦《金銮密记》云：“天复二年，大驾在岐，皇女生三日，赐洗儿果子、金银钱、银叶坐子、金银钗子。”予谓唐昭宗于是时尚复讲此，而在庭无一言，盖宫掖相承，欲罢不能也。

【译文】 自从宋高宗南迁定都钱塘（今浙江杭州）以来，每遇皇子在王府中生男孩或女孩，皇亲国戚，三衙的长官、浙江漕司官、知临安府等，都要进献礼品表示祝贺。皇子随即进行答谢。答谢礼物，除金币之外，还有洗儿钱果，往往回赠几十盒。这些洗儿钱果，做得十分精致奇巧。如果把金币和洗儿钱果加在一起计算，数目很大，所用的花费难以数计。这种送礼及回赠制度，不知起于何时。

在仁宗嘉盥年间，刘原甫在批评无故下令清理遗留问题时说：“在外面的人都说，凡是朝廷生了皇女，就要举行这样的庆典。恐怕这不是朝廷应该继承下来的好的典章制度。臣又听说在举行这种庆典时，要制作大量的金银、犀象、玉石、琥珀、玳瑁、檀香等钱币，还要将金银铸造成为各种各色样式的花果，赏赐给臣下，从宰相到御史台谏官，每人都能得到一份赏赐。所谓无益的花费，无名的赏赐，没有比这更厉害了。如果想用这种方式来炫耀皇家的富有豪奢，让一般人羡慕还是可以的。但是要借此来引导人们勤俭持家则是不行的。众所周知，宰相、台谏都是国家官吏中的要员，应当用良好的道德来辅佐朝廷，怎么能使自己无功而受赏呢！没有一言上奏奉劝朝廷不要如此浪费，怎么能使这种庆典而得到遏止呢？臣恳切地希望朝廷恭行节俭，以答谢上天的恩赐。不应再继续施行那些姑息之恩赏，以免伤害国家政体。”刘原甫的这些议论是很有远见

卓识的，它中肯地揭示了问题的要害。欧阳修在为他撰写的墓志铭中，没有提及这件事。我在撰写国史时，由于当时不知道此事，因而也没有将此事写入他的传记之中。近来，读到他的奏章，见到此事的记述材料，便将此事记之于此。

除此之外，唐人韩琬在他的《金銮密记》中说：“唐昭宗天复二年（902年），皇上的车驾停留在岐州（今陕西凤翔），生了个皇女，三天之后，就大行赏赐，赐给臣下的礼物有洗儿果子，金银钱、银叶坐子、金银钗子。”这时候，唐昭宗正处在颠沛流离之中，他还如此讲究，而朝中文武官员，亦没有一人出来上书进行规劝，这大概是宫中早有定制，代代沿袭，即使有谁觉察到它的弊端，想把它废除，也是大势所趋无能为力了。

告命失故事

【原文】 祖宗时知制诰六员，故朝廷除授，虽京官磨勘，选人改秩，奏荐门客、恩科助教，率皆命词，然有官列已崇而有司不举者，多出时相之意。刘原甫掌外制，以任颢落职，不降诰词，曾奏陈以为非故事，得旨即实行之。已而刘元瑜、王琪降官，直以敕牒。刘又言非朝廷赏罚训诰愆重之意。今观刘集，有《太平州文学袁嗣立改江州文学制》云：“昔先王简不帅教而不变者，屏之裔土，终身不齿，若尔之行，岂足顾哉！然犹假以仕版，徙之善郡，不赉之恩也。勉思自新，无重其咎。”未几，嗣立又徙洪州，制云：“尔顷冒宪典，迁之寻阳，复以亲嫌，于法当避。夫薄志节、寡廉耻者，固不可使处有嫌之地，益徙豫章，思自湔涤。”嗣立之事微矣，乃费两诰，读此命书，可知其人。漫书之以发一笑。

【译文】 我祖宗朝设立掌管起草机要诏令的知制诰官六名，朝廷在选拔、委任知制诰时，非常慎重，虽是在京任职的京官也要进行认真地考察。所选人才，改派进级，奏荐门客、皇帝特恩授给的助教，为抵都让知制订起草文诰。然而，也有官居高位而不被长官推荐的。这种推荐，大都是按照宰相的意图去办的。

刘原甫负责外制（中书省、门下省拟定诏敕的正规机构）。由于任颢被罢免时，朝廷没有给他免官的诰词，于是他便上奏陈述这种做法不符合制度的规定。皇上采纳了他的建议，随即颁布了关于任颢免官的敕令。后来，刘元瑜、王琪降官，直接给予他们非正敕牒。刘原甫看到这种情形后，再次上奏指出这一做法，与朝廷赏罚训诰惩前毖后的意图不合。而今见到刘原甫的文集，内有《太平州文学袁嗣立改江州文学制》一文。文中说：“以前先王注意挑选那些不遵照

教导而又坚持不改的人，将他们发落到边远荒芜的地方，使他们终身不再录用，像你这样所作所为，怎么能够予以顾全呢？如果现在仍让你做，安置到一个相当好的地方，这是朝廷对你天高地厚的恩情，希望你进行反省，悔过自新，不要再加重你的过错。”没有多久，袁嗣立又被调任洪州（今江西南昌）文学。在朝廷颁布的制书中说：“你不久前触犯国家法典，被贬到寻阳（今江西九江），由于那里有你的亲戚，依据法典规定应当回避。你志气薄弱，又少廉耻，因此，不应当让你在有亲戚嫌疑的地方。所以将你改派到豫章以便你反思悔过，痛改前非。”袁嗣立的事，不过是区区小事，先后两次颁布诰词。而今，读到这些诰词，可知其人的品德。顺手写下，以博他人之一笑。

扁字二义

【原文】 扁音薄典切，《唐韵》二义：其一曰扁署门户，其一曰姓也，此外无他说。案《稱冠子》云：“五家为伍，十伍为里。四里为扁，扁为之长，十扁为乡。其上为县为郡。其不奉上令者，以告扁长。”盖如遂、党、都、保之称。诸书皆不载。

【译文】 扁字，读音薄典反切。《唐韵》里说，扁字有两个意思。一说以大字书写，悬挂在门头上；另一说扁为姓。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解释。然而，据《冠子》一书的记载，“五家为一伍，十伍为一里，四里为一扁，扁设扁长，十扁为一乡。在乡之上为县、为郡。如果有人不执行上级的政令，准许人们报告给扁长。”由此可知，这里所说的扁，与遂、党、都、保的名字一样，都是县以下乡村基层行政组织的名称。诸书失载，今书于此。

娑罗树

【原文】 世俗多指言月中桂为娑罗树，不知所起。案《酉阳杂俎》云：“巴陵有寺，僧房床下，忽生一木，随伐而长，外国僧见曰，此娑罗也。元嘉中，出一花如莲。唐天宝初，安西进娑罗枝，状言：‘臣所管四镇拔汗国，有娑罗树，特为奇绝，不比凡草，不止恶禽，近采得树枝二百茎以进’。”予比得楚州淮阴县唐开元十一年海州刺史李邕所作《娑罗树碑》云：“非中夏物土所宜有者，婆娑十亩，蔚映千人。恶禽翔而不集，好鸟止而不巢。深识者虽徘徊仰止而莫

知冥植，博物者虽沈吟称引而莫辨嘉名。随所方面，颇证灵应，东瘁则青郊苦而岁不稔，西茂则白藏泰而秋有成。尝有三藏义净，还自西域，斋戒瞻叹。于是邑宰张松质请邕述文建碑。”观邕所言，恶禽不集，正与上说同。又有松质一书答邕云：“此土玉像，爰及石龟，一离淮阴，百有余载，前后抗表，尚不能称，赖公威德备闻，所以还归故里，谨遣僧三人，父老七人，齐状拜谢。”宣和中，向子稹过淮阴，见此树，今有二本，方广丈余，盖非故物。蒋颖叔云：“玉像石龟，不知今安在？”然则娑罗之异，世间无别种也。吴兴芮烨国器有《从沈文伯乞娑罗树碑》古风一首云：“楚州淮阴娑罗树，霜露荣悴今何如？能令草木死不朽，当时为有北海书。荒碑雨侵涩苔鲜，尚想墨本传东吴。”正赋此也。欧阳公有《定力院七叶木》诗云“伊洛多佳木，娑罗旧得名。常于佛家见，宜在月宫生。磁砌阴铺静，虚堂子落生。”亦此树耳，所谓七叶者未详。

【译文】 世俗人往往指着月亮里的桂花树说它是娑罗树，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酉阳杂俎》记载：“巴陵郡有一寺院，僧房的床下面，忽然长出一棵树，随砍伐随生长，外国僧人见了说，这是娑罗树。南朝宋元嘉年间，长出一朵花像莲花一样。唐代天宝初年，安西都护府进献娑罗树枝，奏状上说：‘我所管辖的四镇都督府属下的拔汗拈国，有娑罗树，特别神奇不同一般，与一般植物都不一样，丑恶的飞禽都不落在它上面，近来采集到它的树枝二百根献上。’”我不久前得到楚州淮阴县，看到唐朝开元十一年（723）海州刺史李邕写的《娑罗树碑》碑文，上面说：“娑罗树不是中原气候土壤所适宜存在的，十亩地上的娑婆树影，映照着上千人的面孔。丑恶的飞禽飞过不落下，好的鸟落下而不搭窝。见识很深的人虽然徘徊仰望而不知道这树是怎样长成的，博物家们虽然苦思冥想引经据典却讲不出它的名字。树的方方面面，都说明它的灵验，东侧枯萎则春天苦旱而收成不好，西侧繁茂则秋天安泰而获得丰收。曾经有三藏大师义净，从西域返回，斋戒以后前去瞻仰感叹。于是县令张松质请我写文章以便建碑。”看李邕所讲的，丑恶的飞禽不落在树上，正与前面讲的相同。又有张松质回复李邕的一封信说：“本地的玉像，连同石龟，自从离开淮阴，一百多年了，前后申请强烈要求，还是不能如愿，依赖您的威望品德卓著，所以才能回归故土，现派遣僧人三人、本乡德高望重的人七位，携带公文拜谢。”宣和年间，向子稹经过淮阴，看见这树。现在有二棵，长宽各一丈多，大概不是原先的树了。蒋颖叔（蒋子奇）：“玉像和石龟，不知现在哪里？”这样看来娑罗树的奇异，世间没有别的品种。吴兴人芮烨字国器写有《从沈文伯乞娑罗树碑》古风体诗一首，其中说“楚州淮阴娑罗树，霜露荣悴今何如？（楚州淮阴县的娑罗树，经过风吹雨打岁月消磨现在怎么了？）能令草木死不朽，当时为有北海书。

（能让娑罗树即使死了也会永垂不朽的，是因为当时有北海李邕的碑文。）荒碑雨侵涩苔藓，尚想墨本传东吴。（被人遗忘的石碑经过雨水冲洗想必长满青苔，哪里想到它的拓片却流传到遥远的东吴地区。’”正是讲这件事。欧修公（欧阳修）写有《定力院七叶木》诗，其中说：“伊洛多佳木，娑罗旧得名。（伊水洛水之间有很多优良的树木，娑罗的名字是过去得到的。）常于佛家见，宜在月宫中。（常常在佛经中见到，又似乎应当在月宫里面。）被砌阴铺静，虚堂子落声。（精美的花砖地上不知不觉铺满了七叶木的阴影，空寂的大堂上可以听到七叶木的子被风吹落掉在地上的响声。）也写的是这种树，为什么称它为七叶木却不清楚。

卷七

天咫

【原文】 黄鲁直和王定国诗《闻苏子由病卧绩溪》云：“湔袂瘴雾姿，朝趋去天咫。”蜀士任渊注引“天威不违颜咫尺”。予按《国语》，楚灵筑三城，使子皙问范无宇，无宇不可。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则？”韦昭曰：“咫者少也，言少知天道耳。”《酉阳杂俎》有《天咫篇》。黄诗盖用此。徐师川《喜王秀才见过小酌玩月》四言曰：“君家近市，所见天咫。庭户之间，容光能几？菰蒲之中，江湖之穢。一碧万顷，长空千里。”正祖术黄所用云。

【译文】 黄庭坚有和王定国诗一首，题目为《闻苏子由病卧绩溪》。诗中有：“湔袂瘴雾姿，朝趋去天咫。”一句话。在这里，蜀人任渊加注，引用“天威不违颜咫尺”这句话。据《国语》中所记，楚灵王在修筑三城时，派子皙去征求范无宇的意见。范无宇认为不能这样做。楚灵王说：“是知天咫，安知民则？”就是说既然天道知道的很少，怎么能知治民的大道理呢？韦昭注释说：“咫，是少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对于天道知道的很少。”《酉阳杂俎》中有《天咫篇》一文。黄庭坚的诗，便是采用这一说法。徐师川有《喜王秀才见过小酌玩月》四言诗一首。诗中写道：“君家近市，所见天咫。庭户之间，容光能几？菰蒲之中，江湖之穢。一碧万顷，长空千里。”正是效法前人黄庭坚所用天咫而作的陈述。

县尉为少仙

【原文】 《随笔》载县尉为少公，予后得晏几道叔原一帖《与通叟少公》者，正用此也。杜诗有《野望因过常少仙》一篇，所谓“落尽高天日，幽人未遣回”者，蜀士注曰：“少仙应是言县尉也。”县尉谓之少府，而梅福为尉，有神仙之称。少仙二字，尤为清雅，与今俗呼为仙尉不侔矣。

【译文】 《容斋随笔》记载县尉又称少公，我此后又得到晏几道字叔原亲

笔写的书信《与通叟少公》字帖，少公正是用这个典故。杜甫诗有《野望因过常少仙》一篇，就是诗中有“落尽高天日，幽人未遣回（原先高悬天空的太阳此时已经完全落下看不到踪影，幽栖隐居的人还不见回来。）”一句的，四川士人注释说：“少仙应当是指县尉。”县尉叫作少府，而汉代梅福作县尉，有神仙的称号。少仙两个字，特别清新雅致，与现在世俗把县尉叫作仙尉有不小差距了。

杜诗用受觉二字

【原文】 杜诗所用受觉二字皆绝奇，今摭其受字云：“修竹不受暑”，“勿受外嫌猜”，“莫受二毛侵”，“监河受贷粟”，“轻燕受风斜”，“能事不受相促迫”，“野航恰受两三人”，“一双白鱼不受钓”，“雄姿未受伏枥恩”。其觉字云：“已觉糟床注”，“身觉省郎在”，“自觉成老丑”，“更觉松竹幽”，“日觉死生忙”，“最觉润龙鳞”，“喜觉都城动”，“更觉老随人”，“每觉升元辅”，“觉而行步奔”，“尚觉王孙贵”，“含凄觉汝贤”，“厨烟觉远庖”，“诗成觉有神”，“已觉披衣惯”，“自觉酒须赊”，“早觉仲容贤”，“城池未觉喧”，“无人觉来往”，“人才觉弟优”，“直觉巫山暮”，“重觉在天边”，“行迟更觉仙”，“深觉负平生”，“秋觉追随尽”，“追随不觉晚”，“熊羆觉自肥”，“自觉坐能坚”，“已觉良宵永”，“更觉彩衣春”，“已觉气与嵩华敌”，“未觉千金满高价”，“梅花欲开不自觉”，“胡来不觉潼关隘”，“自得隋珠觉夜明”，“放筋未觉金盘空”，“东归贪路自觉难”，“更觉良工心独苦”，“始觉屏障生光辉”，“不觉前贤畏后生”，“吏情更觉沧洲远”，“我独觉子神充实”，“习池未觉风流尽”。用之虽多，然每字命意不同，又杂于千五百篇中，学者读之，唯见其新工也。若陈简斋亦好用此二字，未免频复者，盖只在数百篇内，所以见其多，如“未受风作恶”，“不受珠玑络”，“不受折简呼”，“不受人招麾”，“不受安危侵”，“饱受今日闲”，“却扇受景风”，“语闻受远响”，“坐受世故驱”，“庭柏不受寒”，“可复受忧戚”，“宁受此酸辛”，“滔滔江受风”，“坐受世褊迫”，“清池不受暑”，“平池受细雨”，“穷村受春晚”，“不受急景催”，“肯受元规尘”，“了不受荣悴”，“意闲不受荣与辱”，“独自人间不受寒”，“枯木无枝不受寒”，“天马何妨略受稽”，“来禽花高不受折”，“不受阴晴与寒暑”，“长林巨木受轩轻”。“未觉懒相先”，“未觉壮心休”，“未觉身淹留”，“未觉墉阴迟”，“未觉欠孟嘉”，“未觉有等伦”，“未觉风来迟”，“未觉经旬久”，“欲往还觉非”，“独觉赋诗难”，“稍觉夜月添”，“菰蒲觉风入”，“未觉此计非”，“高处

觉眼新”，“意定觉景多”，“未觉徐娘老”，“未觉有荣辱”，“未觉饥肠虚”，“未觉平生与愿违”，“村空更觉水潺潺”，“眼中微觉欠扁舟”，“居夷更觉中原好”，“便觉杯觞耐薄寒”，“墙头花定觉风阑”，可谓多矣。盖喜用其字，自不知下笔所著也。

【译文】 杜甫在诗中爱用“受”、“觉”二字，而且每次都用得绝妙新奇。现将他在诗中所用“受”字的诗句摘出：“修竹不受暑”，“勿受外嫌猜”，“莫受二毛侵”，“监河受贷粟”，“轻燕受风斜”，“能事不受相促迫”，“野航恰受两三人”，“一双白鱼不受钓”，“雄姿未受伏枥恩”。在杜甫诗中所用觉字的诗句，有说：“已觉糟床注”，“身觉省郎在”，“自觉成老丑”，“更觉松竹幽”，“日觉死生忙”，“最觉润龙鳞”，“喜觉都城动”，“更觉老随人”，“每觉升元辅”，“觉而行步奔”，“尚觉王孙贵”，“含凄觉汝贤”，“厨烟觉远庖”，“诗成觉有神”，“已觉披衣惯”，“自觉酒须赊”，“早觉仲容贤”，“城池未觉喧”，“无人觉来往”，“人才觉弟优”，“直觉巫山暮”，“重觉在天边”，“行迟更觉仙”，“深觉负平生”，“秋觉追随尽”，“追随不觉晚”，“熊羆觉自肥”，“自觉坐能坚”，“已觉良宵永”，“更觉彩衣春”，“已觉气与嵩华敌”，“未觉千金满高价”，“梅花欲开不自觉”，“胡来不觉潼关隘”，“自得隋珠觉夜明”，“放筋未觉金盘空”，“东归贪路自觉难”，“更觉良工心独苦”，“始觉屏障生光辉”，“不觉前贤畏后生”，“吏情更觉沧洲远”，“我独觉子神充实”，“习池未觉风流尽”。杜甫在他写的诗中，虽然多次使用“受”字和“觉”字，然而每次使用这两个字时的用意各不相同。而且它分散在一千五百首诗中，学习它的人读后，没有重复的感受，从中可以体察到杜甫用字的新颖巧妙。像陈简斋，在诗中也好用“受”字和“觉”字。可是读了他的诗作之后，不免给人有重复的印象，这是由于陈简斋的诗，只有几百首。所以一看到他在诗中多次使用，就给人以重复用之过多的感觉。现举例表出：“未受风作恶”，“不受珠玑络”，“不受折简呼”，“不受人招麾”，“不受安危侵”，“饱受今日闲”，“却扇受景风”，“语闻受远乡”，“坐受世故驱”，“庭柏不受寒”，“可复受忧戚”，“宁受此酸辛”，“滔滔江受风”，“坐受世褊迫”，“清池不受暑”，“平池受细雨”，“穷村受春晚”，“不受急景催”，“肯受元规尘”，“了不受荣悴”，“意闲不受荣与辱”，“独自人间不受寒”，“枯木无枝不受寒”，“天马何妨略受柅”，“来禽花高不受折”，“不受阴晴与寒暑”，“长林巨木受轩轻”。“未觉懒相先”，“未觉壮心休”，“未觉身淹留”，“未觉墉阴迟”，“未觉欠孟嘉”，“未觉有等伦”，“未觉风来迟”，“未觉经旬久”，“欲往还觉非”，“独觉赋诗难”，“稍觉夜月添”，“菰蒲觉风入”，“未觉此计非”，“高处觉眼新”，“意定觉景多”，“未觉徐娘老”，“未觉有荣辱”，“未觉饥肠虚”，“未觉平生与愿违”，“村空更觉

水潺湲”，“眼中微觉欠扁舟”，“居夷更觉中原好”，“便觉杯觞耐薄寒”，“墙头花定觉风阑”，真可以说不少。这是因为他喜用“受”字和“觉”字，所以在下笔时不觉就用上了。

西太一宫六言

【原文】 “杨柳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荆公《题西太一宫》六言首篇也。今临川刻本以“杨柳”为“柳叶”，其意欲与荷花为切对，而语句遂不佳。此犹未足问，至改“三十六陂春水”为“三十六宫烟水”，则极可笑。公本意以在京华中，故想见江南景物，何预于宫禁哉？不学者妄意涂窜，殊为害也。彼盖以太一宫为禁廷离宫尔。

【译文】 “杨柳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杨树柳树上的蝉鸣叫不停树叶颜色已是深绿，荷花在落日映照下颜色红得令人陶醉）。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三十六池春天的碧水，头发发白的我想起了故乡江南的景色）”这是荆公（王安石）《题西太一宫》六言诗的第一篇。现在《临川集》的刻本中把“杨柳”改为“柳叶”，其用意想与“荷花”对应得更切当，而语句便不美了。这还不值得提出，至于把“三十六陂春水”改为“三十六宫烟水”，则非常可笑。荆公的本意是因为自己在京城里，所想到江南景物，和皇宫有什么关系呢？没有学问的人凭胡乱猜想乱改诗文，实在害人不浅。他大概把太一宫当成皇室的离宫了。

由与犹同

【原文】 《新唐书·藩镇传序》云：“其人自视由羌狄然。”据字义“由”当为“犹”，故吴缜作《唐书音训》有《纠谬》一篇，正指其失，彼元不深究《孟子》也。文惠公顷与予作《唐书补过》，尝驳其说。予作文每用之，辄为人所疑问，今为详载于此。如“以齐王，由反手也”，“由弓人而耻为弓”，“王由足用为善”，“是由恶醉而强酒”，“由己溺之，由己饥之”，“由射于百步之外”，“见且由不得亟”，其义皆然，盖由与犹通用也。

【译文】 《新唐书·藩镇传序》载：“自己认为自己由羌狄然。”按照字义，这句话里的由字应当使用犹字，是如同的意思。所以吴缜著《唐书音训》里有

《纠谬》一篇，专门指出唐书中用字上的失误，并予以辩正。但他并没有进一步探究《孟子》一书在用字上存在的问题。近来，我的哥哥洪适与我合撰《唐书补过》，曾对这一说法进行驳斥。我在写文章时，每当使用由字时，往往遭到别人的质疑，今在这里，作一详细的考述。比如写作：“以齐王，由反手也”，意思是对齐王来说，如同把手掌翻过来一样容易。“由弓人而耻为弓”，意思是就像制造弓的工匠以造弓为耻，“王由足用为善”，意思是大王仍然足以用它行善。“是由恶醉而强酒”，意思是好比厌恶醉酒而又强去喝酒。“由己溺之，由己铠之”，意思是如同自己淹死了他，如同自己使他挨饿。“由射于百步之外”，意思是好像在百步以外射箭。“见且由不得亟”，意思是只见一面尚且还不能立即办到。在这些句子中，都使用有由字，其含义都是一样的，是相同的意思。与犹字同。究其原因，就是由字与犹字可以通用。

人焉 哉

【原文】 孔子论人之善恶，始之曰：“视其所以。”继之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然后重言之曰：“人焉廋哉，人焉廋哉！”盖以上之三语详察之也。而孟氏一断以眸子，其言曰：“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了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廋哉”说者谓：“人与物接之时，其神在目。故胸中正，则神精而明。不正，则神散而昏。心之所发，并此而观，则人之邪正不可匿矣。言犹可以伪为，眸子则有不容伪者。孔圣既已发之于前，孟子知言之要，续为之说，故简亮如此。”旧见王季明云，太学士子尝戏作一论，其略云：“知人焉廋哉之义，然后知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之义。知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之义，然后知人焉廋哉之义。孔子所云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者，详言之也。孟子所云人焉廋哉者，略言之也。孔子之所谓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即孟子之所谓人焉廋哉也。孟子之所谓人焉廋哉，即孔子之所谓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也。”继又叠三语为一云：“夫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虽曰不同，而其所以为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未始不同。”演而成数百字，可资一笑，亦几于侮圣言矣！

【译文】 孔子在谈到如何判断一个人的善恶时，开始说要观察他所交接的朋友，接着说要观察他为达到目的所采用的手段，了解他的心情安于什么，不安于什么，最后重复说：一个人的善恶怎么能隐藏得住呢，一个人的善恶怎么能隐藏得住呢，以上这三句话，是孔子通过详细观察所得出的结论。而孟子在

谈到这个问题时提出以眼睛来判断。他说：“观察一个人的善恶，再没有比观察他的眼睛更好了。因为眼睛不能掩盖一个人的丑恶。心正，眼睛就明亮。心不正，眼睛就昏暗。听一个人说话时，注意观察他的眼睛。这个人的善恶，又能往哪里隐藏呢？”讲解的人说：“人在与物接触的时候，他的神情集中表现在眼睛上。心正，注意力集中，眼睛就明亮。心不正，注意力分散，眼睛就昏暗。正与不正，出之内心。由此看来，一个人的心邪与心正是隐藏不住的。说话可以弄虚作假，但是眼睛是不能弄虚作假的。关于这一点，孔子早已提出，孟子亦深知孔子所说的宗旨，进一步阐发，所以简洁明确。”过去听王季明说，太学的士子曾经戏作一篇文章。大意是说：“明白一个人的善恶又能往那里隐藏呢这句话的意思，然后就会明白一个人的善恶怎么能隐藏得住呢，一个人的善恶怎么能隐藏得住呢这句话的意思。明白了后一句话的意思，然后也会明白前一句话的意思。孔子所说的一个人的善恶怎么能隐藏得住呢，一个人的善恶怎么能隐藏得住呢？是详细而言的。孟子所说一个人的善恶又能往那里隐藏呢，是粗略而言。孔子连用一个人的善恶怎么能隐藏得住呢，一个人的善恶怎么能隐藏得住呢，即是孟子所说的一个人的善恶怎么能隐藏得住呢。反过来说，孟子所说的也就是孔子所说。不仅如此，继之而来的，还有三次重复一个人的善恶怎么能隐藏得住呢这句话为一句话，虽然与单独使用与重复使用有所不同，而其所以三次重复写作一个人的善恶怎么能隐藏得住呢、一个人的善恶怎么能隐藏得住呢，一个人的善恶怎么能隐藏得住呢的原因，与单独使用、重复使用并没有什么不同。”就这么一句话，甚至反复重述成好几百字，只可供人发笑，这亦几乎是对圣人言论的侮辱。

久而俱化

【原文】 天生万物，久而与之俱化，固其理焉，无间于有情无情，有知无知也。予得双雁于衢人郑伯鹰，纯白色，极驯扰可玩，置之云壑，不远飞翔。未几，殒其一，其一块独无俦，因念白鹅正同色，又性亦相类，乃取一只与同处。始也，两下不相宾接，见则东西分背，虽一盆饲谷，不肯并啜。如是五日，渐复相就，逾旬之后，怡然同群，但形体有大小，而色泽飞鸣则一。久之，雁不自知其为雁，鹅不自知其为鹅，宛如同巢而生者，与之俱化，于是验焉。今人呼鹅为舒雁，或称家雁，其褐色者为雁鹅，雁之最大者曰天鹅。唐太宗时，吐蕃禄东赞上书，以谓圣功远被，虽雁飞于天，无是之速，鹅犹雁也，遂铸金为

鹅以献。盖二禽一种也。

【译文】 天造就万物，时间久了就使它们朝和协或同一的方向转化，固然是一个规律，不管是有情的还是无情的，有知觉的还是无知觉的都是如此。我从衢州人郑伯鹰那里得到一对大雁，纯白色，很驯顺好玩，放养在云壑园内，不往远处飞翔。不久，死了一只，其中一只孤独没有伴侣，于是想到白鹅的颜色正好和它相同，而且习性相类似，便找来一只和它放在一块。开始，两个动物互相不和睦，见面就一只向东一只向西分开了，虽然在一个食盆吃食物，却不肯一起吃食。这样持续了五天，逐渐又互相接近，十天以后，愉快地成为伙伴，只是形体有大小的分别，而颜色飞翔鸣叫则是一样的。时间长了，雁忘记了自己是雁，鹅忘记了自己是鹅，全然像同巢出生的，天使万物朝和协或同一方向转化，在这里得到验证。现在的人把鹅叫作舒雁，或称作家雁，其中褐色的是雁鹅，最大的一种雁叫天鹅，唐太宗时，吐蕃禄东赞上书，认为圣时的功德传得很远，即使是雁在天空中飞，也没有它传播的速度快，鹅与雁差不多，便用黄金铸成鹅进献。大概两种飞禽是由一种变成的。

黄文江赋

【原文】 晚唐士人作律赋，多以古事为题，寓悲伤之旨，如吴融、徐寅诸人是也。黄滔字文江，亦以此擅名，有《明皇回驾经马嵬坡》隔句云：“日惨风悲，到玉颜之死处；花愁露泣，认朱脸之啼痕。”“褰云万叠，断肠新出于啼猿；秦树千层，比翼不如于飞鸟。”“羽卫参差，拥翠华而不发；天颜怆恨，觉红袖以难留。”“神仙表态，忽零落以无归；雨露成波，已沾濡而不及。”“六马归秦，却经过于此地；九泉隔越，几凄恻于平生。”？《景阳井》云：“理昧纳隍，处穷泉而讵得；诚乖馭朽，攀素纆以胡颜！”“青铜有恨，也从零落于秋风；碧浪无情，宁解流传于夜壑。”“荒凉四面，花朝而不见朱颜；滴沥千寻，雨夜而空啼碧溜。”“莫可追寻，《玉树》之歌声邈矣；最堪惆怅，金瓶之咽处依然。”《馆娃宫》云：“花颜缥缈，欺树裹之春风；银焰荧煌，却城头之晓色。”“恨留山鸟，啼百草之春红；愁寄龙云，藉四天之暮碧。”“遗堵尘空，几践群游之鹿；沧洲月在，宁销怒触之涛？”《陈皇后因赋复宠》云：“已为无雨之期，空悬梦寐；终自凌云之制，能致烟霄。”《秋色》云：“空三楚之暮天，楼中历历；满六朝之故地，草际悠悠。”《白日上升》云：“较美古今，列子之乘风固劣；论功昼夜，桓娥之奔月非优。”凡此数十联，皆研确有情致，若夫格律之卑，则自当时体如此

耳。

【译文】 晚唐文人写诗作赋，多以古时候的历史事件为题，借以表达自己悲伤的思想感情。如吴融、徐寅等人，即是如此。黄滔字文江，亦以此而著名于世。他在所撰《明皇回驾经马嵬坡》中说：

“日惨风悲，到玉颜之死处；花愁露泣，认朱脸之啼痕。”

褒云万叠，断肠新出于啼猿；秦树千层，比翼不如于飞鸟。

羽卫参差，拥翠华而不发；天颜怆恨，觉红袖以难留。

神仙表态，忽零落以无归；雨落成波，已沾濡而不及。

六马归秦，却经过于此地；九泉隔越，几凄恻于平生。

《景阳井》篇为：

理昧纳隍，处穷泉而诤得；诚乖馭朽，攀素纆以胡颜！

青铜有恨，也从零落于秋风；碧浪无情，宁解流传于夜壑。

荒凉四面，花朝而不见朱颜；滴沥千寻，雨夜而空啼碧溜。

莫可追寻，《玉树》之歌声邈矣；最堪惆怅，金瓶之咽处依然。

《馆娃宫》篇说：

花颜缥缈，欺树裏之春风；银焰荧煌，却城头之晓色。

恨留山鸟，啼百草之春花；愁寄龙云，袖四天之暮碧。

遗堵尘空，几践群游之鹿；沧州月在，宁销怒触之涛？

《陈皇后因赋复宠》篇说：

已为无雨之期，空悬梦寐；终自凌云之制，能致烟霄。

《秋色》篇说：

空三楚之暮天，楼中历历；满六朝之故也，草际悠悠。

《白日上升》篇说：

较美古今，列子之乘风固劣；论功昼夜，桓娥之奔月非优。黄文江所作的律赋类似于此的，总计有数十联，都是精心构思，富于情趣。若从格律上看，并不高明，这是受时代条件的制约。当时的文体即是如此。

沈季长进言

【原文】 沈季长元丰中为崇政殿说书，考开封进士，既罢，入见，神宗曰：“《论不以智治国》谁为此者？”对曰：“李定所为。”上曰：“闻定意讥朕。”季长曰：“定事陛下有年，顷者御史言定乃人伦所弃，陛下力排群议，而定始得为

人如初，继又擢用不次，定虽怀利，尚当知恩，臣以此敢谓无讥陛下意。《诗序》曰：‘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书》曰：‘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陛下自视岂任智者，不知何自嫌疑，乃信此为讥也？”上曰：“卿言甚善，朕今已释然矣，卿长者，乃喜为人辩谤。”对曰：“臣非为人辩谤，乃为陛下辩讐耳。”他日，上语及前代君臣，因曰：“汉武帝学神仙不死之术，卿晓其意否？此乃贪生以固位耳。故其晚年举措谬戾，祸貽骨肉，几覆宗社。且人主固位，其祸犹尔，则为人臣而固位者，其患亦何所不至，故朕每患天下之士能轻爵禄者少。”季长曰：“士而轻爵禄，为士言之，则可，为国言之，则非福也。人主有尊德乐道之志，士皆以不得爵禄为耻，宁有轻爵禄者哉？至于言违谏拂，士有去志，故以爵禄为轻。”上曰：“诚如卿言。”按季长虽尝至修起居注，其后但终于庶僚，史不立传。王和甫铭其墓，载此两论，予在史院时未之见也。其子铢为侍从，恨不获附见之，故表出于是。

【译文】 沈季长元丰年间担任崇政殿说书，主持开封府科举解试，考试结束，入宫见皇帝，宋神宗说：“《论不以智治国》，谁写的？”回答：“李定写的。”宋神宗说：“听说李定的用意是讥讽我。”沈季长说：“李定事奉陛下不少年了，不久前御史批评李定道德败坏不齿于人，陛下力排众议，而李定才能像以前那样没被人们遗弃，随后又被破格提拔，李定虽然心怀私利，毕竟会知道您的大恩大德，我因此敢说他没有讥讽陛下的用意。《诗序》说：‘讲这话的人没有罪，听到这话的人足应该引以为戒。’《尚书》说：‘小人怨恨你骂你，则赶忙自己认真检查自己的品行。’陛下自己看自己难道是专靠心智治理国家的吗，不知为什么自己怀疑自己，便相信这篇文章是讥讽自己？”宋神宗说：“你讲得很好，我现在已经不生气了，你是位忠厚长者，喜欢替别人辩解诽谤。”回答说：“我不是替别人辩解诽谤，乃是为陛下辩解中伤别人的话罢了。”又一天，宋神宗说到前代君臣关系，说：“汉武帝学习变成神仙长生不死的道术，你知道他的用意吗？这样作乃是贪生怕死舍不得丢弃皇位罢了，所以他的晚年举措荒谬错误，连亲骨肉都蒙受灾祸，几乎使国家灭亡。而且君主舍不得丢弃皇位，造成的祸害尚且这样，则作臣下的要舍不得丢弃官位，造成的危害也会无所不至的，所以我常常担心天下的士人能看轻爵禄的太少。”沈季长说：“士人看轻爵禄，从士人的角度讲，是可以的；从国家的角度讲，却不是好事。君主有尊敬高尚品德、乐于遵循正道的志愿，士人都会以得不到爵禄为耻辱，怎么能有看轻爵禄的呢？至于君主听不进臣下劝谏，士人都有想离去的想法，所以才会看轻爵禄。”宋神宗说：“确实如爱卿讲的。”查沈季长虽然作官曾作到修起居注，此后却始终作普通官员，国史没有给他立传。王和甫（王安石之弟王安礼）为他写墓志铭，记

载了他的这两则议论，我在史院时没能看到。他的儿子沈铎是侍从大臣，我后悔没能在为沈铎写传记时把沈季长的事附录，所以在这里写出来。

繁遏渠

【原文】 《国语》鲁叔孙穆子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飨元侯也。”韦昭注曰：“《繁》、《遏》、《渠》，《肆夏》之三也，《礼》有《九夏》，皆篇名。”昭虽晓其义，而不详释。按《周礼·春官》：“钟师掌金奏，以钟鼓奏《九夏》。”郑氏注引吕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颂》也。《肆夏》，《时迈》也。《繁遏》，《执竞》也。《渠》，《思文》也。”又曰：“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祿止于周之多也。故《执竞》曰：‘降福穰穰；降福简简。’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予谓此说亦近于凿。

【译文】 《国语》中记载鲁国叔孙穆子说：“用金属乐器演奏《肆夏》乐曲中的《繁》、《遏》、《渠》三曲，这是天子犒赏诸侯之长时所使用的一种礼仪制度。”韦昭在作注时：“《繁》、《遏》、《渠》乐曲，是《肆夏》乐曲中的三章。《周礼·春官》中载有《九夏》，这些都是乐曲的名称。”韦昭虽然明白这个意思，但未能详细说明。据《周礼·春官》所载，“钟师掌管击鼓奏乐，在演奏《九夏》乐曲时配以钟鼓。”郑玄在作注时，引用吕叔玉的话说：“《肆夏》、《繁遏》、《渠》，都是《周颂》中的篇名。演奏《肆夏》乐曲，歌唱《时迈》。演奏《繁遏》乐曲，歌唱《执竞》。演奏《渠》乐曲，歌唱《思文》。”又说：“繁是多的意思，遏是止的意思。就是说福运福气汇集在周代的很多。所以《执竞》篇中说，‘赐福赐得多又多，赐福赐得大又大。’所谓渠是大的意思。就是说在祭天的时候，以后稷配祭，这是王道中的一件大事。所以，在《诗经·思文》中说：‘大有文德是后稷，功德能和那天齐。’”我认为这种说法接近于实际。

替戾冈

【原文】 坡公游鹤林、招隐，有冈字韵诗，凡作七首，最后云：“背城借一吾何敢，切勿穗前替戾冈。”小儿问三字所出，按《晋书·佛图澄传》，澄能听铃音以知吉凶，往投石勒。及刘曜攻洛阳，勒将救之，其群下咸谏，以为不

可。勒以访澄，澄曰：“相轮铃音云：‘秀支替戾冈，仆谷劬秃当。’此羯语也。秀支，军也。替戾冈，出也。仆谷，刘曜胡位也。劬秃当，捉也。此言军出捉得曜也。”勒遂擒曜。坡公正用此云。

【译文】 苏东坡在游览鹤林、招隐的时候，赋诗，用冈字韵，共写了七首，诗的最后一句是“背城借一吾何敢，切勿秣前替戾冈。”孩子们问替戾冈三字出自何处。据《晋书·佛图澄传》所载，佛图澄能听铃的声音，就可以测知吉凶祸福，于是就去投依石勒。等到刘曜攻占洛阳，石勒想带兵前去救援，他的部下都出来劝阻，认为不可这样做。为此，石勒访问了佛图澄。佛图澄告诉石勒说：“相轮的铃音说，‘秀支替戾冈，仆谷劬秃当’。这是羯族的语言。这里所说的秀支，即军队。替戾冈，是出动的意思。仆谷，是指刘曜的名号。劬秃当，是捉拿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出动军队可以将刘曜捉拿。”石勒得知，立即率军出战，擒获了刘曜。苏东坡在诗里所采用的，就是这一典故。

文潞公平章重事

【原文】 文潞公元丰六年以太师致仕，时七十八岁矣。后二年，哲宗即位，太皇太后垂帘同听政，用司马公为门下侍郎，公奏乞召潞公置之百僚之首，以镇安四海，后遣中使梁惟简宣谕曰：“彦博名位已重，又得人心，今天子幼冲，恐其有震主之威。且于辅相中无处安排，又已致仕，难为复起。”公当时以新入，不敢复言。元祐元年三月，公拜左仆射，乃再上奏曰：“《书》曰：‘人惟求旧。’盖以其历年之多也。彦博沉敏有谋略，知国家治体，能断大事，自仁宗以来，出将入相，攻效显著，天下所共知，年逾八十，精力尚强。臣初曾奏陈，寻蒙宣谕。切惟彦博一书生尔，年逼桑榆，富贵已极，夫复何求？非有兵权死党可畏惧也。假使为相，一旦欲罢之，止烦召一学士，授以词头，白麻既出，则一匹夫尔，何难制之？有震主之威，防虑大过。若依今官制用之为相，以太师兼侍中，行左仆射，有何不可？倘不欲以剧务烦老臣，则凡常程文书，只委右仆射以下签书发遣，惟事有难决者，方就彦博咨禀。自古致仕复起，盖非一人，彦博今年八十一，不过得其数年之力，愿急用之，臣但以门下侍郎助彦博，恐亦时有小补。今不以彦博首相，而以臣处之，是犹舍骐驎而策驽骀也，切为朝廷惜之。若以除臣左仆射，难为无故以他人易之，则臣欲露表举其自代。”奏入，不许。给事中范纯仁亦劝乞召致，留为师臣。未几，右仆射韩缜求去，后始赐司马公密诏，欲除彦博兼侍中，行右仆射事，其合行恩礼，令相度条具。公以

名体未正，不敢居其上，乞以行左仆射，自守右仆射。诏曰：“使彦博居卿上，非予所以待卿之意，卿更思之。”公执奏言：“臣为京官时，彦博已为宰相，今使彦博列位在下，非所以正大伦也。”于是召赴阙。既而御史中丞刘摯、左正言朱光庭、右正言王觐俱上言：“彦博春秋高，不可为三省长官。”司马公又言：“若令以正太师平章军国重事，亦足以尊老成矣。”四月，遂下制如公言，诏一月两赴经筵，六日一入朝，因至都堂与执政商量事，朝廷有大政令，即与辅臣共议。潞公此命，可谓郑重费力，盖本不出于主意也。然居位越五年，屡谢病，乃得归，竟坐此贻绍圣之贬。

【译文】 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文彦博以太师官衔离职退休，当时七十八岁了。二年以后，宋哲宗即位，太皇太后垂帘和皇帝一起处理政事，任用司马公（司马光）作门下侍郎，司马公上奏请求召回文潞公放在全体官员之首的位置上，以便稳定天下。太皇太后派宦官梁惟简传达旨意说：“文彦博官阶高名声大，又得人心，现在皇帝年幼，恐怕他有威胁皇帝的力量。而且在宰相里面没有地方安排，又已经退休了，难以再起用。”司马公当时因为刚被召回朝廷，不敢再讲。元熹元年（1086）三月，司马公被任命为左仆射，便再次上奏说：“《尚书》上说‘人惟求旧。’大抵是因为旧臣经历年月多。文彦博沉着机敏而有谋略，知道管理国家的大道理，能决断大事，自仁宗时以来，出外作统帅，回京作宰相，功绩成效明显，天下人都知道，年岁超过八十，精力却还充沛。臣子我当初已曾上奏陈述理由，不久承蒙派人传达旨意。我认为文彦博不过是一个书生罢了，临近晚年，富贵已达到极点，又会还有什么企求？并非有兵权或有死党可以畏惧。如果担任宰相，一旦想罢免他，只需要召来一位翰林学士，告诉他基本想法，写在白麻纸上的命令一颁布，他就变成了一个普通人，控制他有什么困难？讲他有威胁皇帝的潜力，是防范的心过分了。如果按照现在的官制任命他作宰相，以太师兼侍中的官阶，担任左仆射，有什么不行？如果不想把繁重的事务麻烦年纪已高的大臣，则凡是常规性的文书，只委托右仆射以下的官员签字处理，只在遇到重大难决断的事，才向文彦博请示报告。自古致仕退休以后重新起用，并非一位二位，文彦博今年八十一岁，不过只能利用他有数几年的力量，希望赶紧任用他，我只以门下侍郎的身份协助文彦博，恐怕也时时能起点作用。现在不任命文彦博作第一宰相，而让我担任，这就好比舍弃骏马而骑劣马，私自替朝廷可惜。如果认为已任命我作左仆射，难以无故用别人马上替换，则我想公开地上奏章荐举他代替自己。”奏章送入宫内，答复是不同意。给事中范纯仁也请求和劝说太皇太后把文彦博召回朝廷，留下来作为皇帝老师那样的大臣。不久，右仆射韩缜请求免职，太皇太后才秘密地下诏给司

马公，说想任命文彦博兼任侍中，担任右仆射职务，按什么规格礼仪召回文彦博，让司马公提出具体方案。司马公认为名份体制不妥当，不敢让自己排在文彦博之上，请求让文彦博担任左仆射，自己担任右仆射。太皇太后下诏说：“让文彦博的官位在你上面，与我要重用你的本意不符，请你再考虑一下。”司马公坚持上奏说：“我作京官时，文彦博已经是宰相，现在让文彦博排位在我下面，不是端正各种重要关系的作法。”于是把文彦博召回朝廷。事后御史中丞刘摯、左正言朱光庭、右正言王觐部上奏说：“文彦博年纪太大，不能担任三省的长官。”司马公又说：“如果让文彦博以正太师的身份带上‘平章军国重事’参预国家和军队重大事务的决策，也足以尊崇德高望重的人了。”当年四月，便按照司马公的这一建议颁下了制书，诏书又规定文潞公每月两次出席给皇帝讲课的经筵，每六天上一次朝，上朝时到政事堂与执政大臣商量事情。朝廷有大的政令要颁布，即让文彦博与执政大臣共同议定。文彦博的这项任命，可算是郑重而又费力了，原因大约是原先不是君主的意思。然而文彦博在这个职位上呆了五年多，屡次讲身体有病请求辞职，才得到批准退休，最后竟因为担任平章军国重事这件事在绍圣年间被贬官。

考课之法废

【原文】 唐制，尚书考功掌内外文武官吏之考课，凡应考之官，家具录当年功过行能，本司及本州长官对众读议其优劣，定为九等考第，然后送省。别敕定京官位望高者二人，一校京官考，一校外官考。又定给事中、中书舍人各一人，一监京官考，一监外官考；郎中判京官考，员外郎判外官考。凡考课之法，有四善、二十七最。一最以上有四善，为上上。有三善，或无最而有四善，为上中。有二善，或无最而有三善，为上下。其末至于居官谄诈、贪浊有状为下下。外州则司录、录事参军之人，各据之以为黜陟。国朝此法尚存，庆历、皇祐中，黄亚夫庶佐一府、三州幕，其集所载考词十四篇，《黄司理》者曰：“治狂狱，岁再周矣，论其罪弃市者五十四，流若徒三百十有四，杖百八十六，皆得其情，无有冤隐不伸，非才也其孰能？其考可书中。”《舞阳尉》者曰：“舞阳大约地广，它盗往往囊橐于其间，居一岁，为窃与强者凡十一，前件官捕得之，其亡者一而已矣。非才焉固不能，可书中。”《法曹刘昭远》者曰：“法者，礼之防也。其用之以当人情为得，刻者为之，则拘而少恩。前件官以通经举进士，始掾于此，若老于为法者，每抱具狱，必傅之经义然后处，故无一不当其情，其

考可书中。”它皆类此。不知其制废于何时。今但付之士按吏据定式书于印纸，比者又令郡守定县令臧否高下，人亦不知所从出。若使稍复旧贯，似为得宜，虽未必人人尽公得实，然思过半矣。

【译文】 唐代制定规定，由尚书省考功司专门负责内外文武官吏的考核。凡是被考核的官吏，都要详细呈报当年的功过、所行事迹及其能力。本司及本州的长官要对众宣读评议优劣意见。官吏的考核，定为九个等次。然后报送尚书省。另外，又规定选派京官职位高又有威望的二人，一个复审京官考核，一个复审外官考核。又规定选派给事中、中书舍人各一人，一个监督京官的考核，一个监督外官的考核。郎中负责京官考核，员外郎负责外官考核。考课的具体办法，是以四善、二十七最的规定作为标准。凡是具备一最以上、四善的官吏，都列入上上等。具备三善，或无最而有四善的官吏，列入上中等。具备二善，或无最而有三善的官吏，列入上下等。最末一等，是居官谄媚且贪污确有实据的官吏，列入下下等。京城以外的州官吏的考核，由州衙门中的司录、录事参军主持，按照考核所定的等级来确定官吏的升降。

唐代官吏的这种考核办法，在我朝建国之后继续实行。仁宗庆历、皇极年间，黄亚夫曾在一个府里任通判，在三个州里任幕职。在他的文集中，辑有考核评语十四篇。其中：

《黄司理》篇中说：“治理牢狱中案犯，两年一次。按照其罪恶大小，处以弃市（死刑并将尸体暴露街头）的五十四人，处以徒刑、流放的三百一十四人，处以杖刑的一百八十六人。每一案犯的处理，都查明真相，取到确凿证据。凡有冤屈的无不给予伸冤。如无才能魄力谁能这样？其考语可定为合格。”

《舞阳尉》篇中说“舞阳县（今属河南）地土宽广，别处的盗贼往往在这里藏身，在职一年，出现强行为盗行窃的共十一起。前述事件已为官府捕获，其中逃亡者只有一人。没有才能魄力是绝对办不到的。其考语可定为合格。

《法曹刘昭远》篇中说：所谓法，是礼制的保证。在执法用法的时候，如能符合人情，处理得当，就能得到众人拥护。那些刻薄的人执法，则往往拘于条文而少情义，为众人所怨。法曹刘昭远通过学习经书考取进士，先在本州从低级掾吏开始，就像做了多年的法官，每次处理狱中案件，总是从经义中找到根据，然后才去处理。所以无有一事处理不合实情的。其考语可定为合格。

书中所载其他考核评语，也大致如此。但是不知道这一制度何时被废除了。现在的只是责成士按吏依照定式填写于印纸上，近来又令郡守评定县令的好坏高下，人们都不清楚这种做法出自何处。如能逐渐地复用旧制，似乎更为方便合适。虽然未必人人都能做到秉公据实，想来过半人会是这样。

小官受俸

【原文】 沈存中《笔谈》书国初时州县之小官俸入至薄，故有“五贯九百六十俸，省钱且作足钱用”之语。黄亚夫皇祐间自序其所为《伐檀集》云：“历佐一府、三州，皆为从事，逾十年，郡之政，巨细无不与，大抵止于簿书狱讼而已，其心之所存，可以效于君、补于国、资于民者，曾未有一事可以自见。然月廩于官，粟麦常两斛，钱常七千，问其所为，乃一常人皆可不勉而能，兹素餐昭昭矣，遂以“伐檀”名其集，且识其愧。”予谓今之仕宦，虽主簿、尉，盖或七八倍于此，然常有不足之叹。若两斛、七千，只可录一书吏小校耳！岂非风俗日趋于浮靡，人用日以汰，物价日以滋，至于不能贍足乎？亚夫之立志如此，真可重也。山谷先生乃其子云。

【译文】 沈括在《梦溪笔谈》说，本朝建国初朝，州县衙门里小官的俸禄很低，所以社会上流传着“每月俸禄五贯九百六十文，每贯只给七百七十文，却要当作一千文来用”的说法。仁宗皇祐年间，黄庶在为自己所撰文集《伐檀集》写的序文中说：“我作过一个府、三个州的属官，时间超过十年，州郡的政务，无论事大事小，都要过问，大体上着重于管理文书册簿，审理诉讼案件。一天到晚，心里所想的，都是如何效忠皇上，有益于国家，有利于百姓的一些事。认真回忆一下，还不曾有一件事能够实行。然而，我每月向官府领取的俸禄，粟、麦通常是两斛，钱是七千文。一问起我做了些什么事时，我就觉得惭愧，我所做的，是一个普通人都能做到的。可以说我是一个不劳而食的人。我用《伐檀》来作为自己的文集的名字，也正是借此来表示自己心中惭愧。”

在我看来，而今国家官吏的俸禄，即使是主簿、县尉这样的小官，也比开国之初增加了七八倍。然而他们仍然不时地发出入不敷出的感叹。所谓两斛粮食，七千钱，只够发给一个书吏，小校的俸禄。这岂不是因为社会风气日趋奢侈，人们日常用费增多，市场物价日渐上涨，从而导致费用不足的紧张状况吗？在这种社会环境中生活的黄庶，能有这样高尚的志向和认识，真是值得敬重。黄山谷先生，是黄庶的儿子。

卷八

库路真

【原文】 《新唐书·地理志》：“襄州，土贡漆器库路真二品：‘十乘花文’五乘。”库路真者，漆器名也，然其义不可晓。《元丰九域志》云：“贡漆器二十事”是已。《于稔传》，稔为襄阳节度，襄有髹器，天下以为法。至稔骄蹇，故方帅不法者，称为“襄样节度”。《旧唐书·职官志》，武德七年，改秦王、齐王下领三卫及库真、驱檫真，并为统军。疑是周、隋间西边方言也。记白乐天集曾有一说，而未之见。

【译文】 《新唐书·地理志》咏载：“襄州（今湖北襄樊）进献给朝廷的贡品，有漆器库路真两种：带有花文的十车，带有碎石的五车。”所谓库路真，是漆器的一种。至于说为什么名叫库路真，人们不大清楚。《元丰九域志》所记：“贡品漆器二十件”，亦是指此而言的。《新唐书·于稔传》说，于稔任襄阳节度使，襄阳所产赤黑色的漆器很有名，为各地所仿效。于稔其人非常傲慢，不守国家法度，人们称他为“襄样节度”。《旧唐书·职官志》载，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下令改秦王、齐王管辖三卫及库真、驱稜真，都改为统军。我怀疑这是北周、隋朝西部边境地区的方言。据记载，白居易集中曾有此说法，但我未能找见。

得意失意诗

【原文】 旧传有诗四句夸世人得意者云：“久旱逢甘雨，他乡见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好事者续以失意四句曰：“寡妇携儿泣，将军被敌擒。失恩宫女面，下第举人心。”此二诗，可喜可悲之状极矣。

【译文】 过去社会上流传一首四句诗，称道人的得意。说“久旱逢甘雨，他乡见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有些多事的人，又仿照这首诗，续得四句，描写人的失意。说“寡妇携儿泣，将军被敌擒。失恩宫女面，下第举人

心。”这两首诗，将人得意时的喜悦，失意时的悲伤，描绘得淋漓尽致。

狄监卢尹

【原文】 文潞公留守西京，年七十七，为耆英会，凡十有二人。时富韩公年七十九，最长，至于太中大夫张问，年七十，唯司马公方六十四岁，用狄监、卢尹故事，亦预于会。或问狄、卢之说，乃见唐白乐天集，今所谓九老图者。怀州司马胡杲年八十九，卫尉卿吉皎年八十六，龙武长史郑据八十四，慈州刺史刘嘉、侍御史卢贞皆八十二，其年皆在元丰诸公之上。永州刺史张浑、刑部尚书白居易皆七十四。时会昌五年。白公序云：“六贤皆多年寿，予亦次焉。秘书监狄兼祜，河南尹卢贞，以年未七十，虽与会而不及列。”故温公纪韩公至张昌言，而自不书。今士大夫皆熟知此事，姑志狄、卢二贤，以示儿辈。但唐两卢贞，而又同会，疑文字或误云。

【译文】 文潞公（文彦博）任西京留守，已七十七岁，举行耆英会，参加的共有十二人。当时富韩公（富弼）七十九岁，最年长，至于太中大夫张问，七十岁，唯独司马公（司马光）才六十四岁，引用狄兼祜、卢贞的先例，也参加了耆英会。有人问狄兼祜、卢贞的事，此事见于唐代《白乐天集》中，现在所谓九老图画的也是此事。参加那次会的有怀州司马胡杲八十九岁，卫尉卿吉皎八十六岁，龙武长史郑据八十四岁，慈州刺史刘嘉、侍御史卢贞都是八十二岁，他们的年龄都比元丰年间参加耆英会的诸人的年龄大。永州刺史张浑、刑部尚书白居易都是七十四岁。当时是会昌五年（845年）。白居易写序文说：“六位贤人都是年事很高的，我也稍次于他们。秘书监狄兼祜、河南尹卢贞，因为不到七十岁，虽参与会而不作为正式成员。”所以温公（司马光）记述这次会记了韩公以下到张昌方，而没有写自己的名字。现在的士大夫都熟知此事，暂且说明狄兼祜、卢贞二位贤人的情况，用来给儿辈人看。但是唐代的两位卢贞，而又出席了同一次会，我怀疑文字有错误。

项韩兵书

【原文】 汉成帝时，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其《权谋》中有《韩信》三篇，《形势》中有《项王》一篇，前后《艺文志》载之，且云：“汉兴，张良、韩信

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诸吕用事而盗取之。”项、韩虽不得其死；而遗书可传于后者，汉世不废，今不复可见矣。

【译文】 西汉成帝时，任宏谈到的军事著作有四种。在其《权谋》一书中，有《韩信》三篇。《形势》中有《项王》一篇。这些著述《汉书》、《后汉书》的《艺文志》里都有记载。并且说：“汉朝建国后，张良、韩信整理编次了春秋战国以来的军事著作，共有一百八十二家，经过删节选择，取了三十五家。刘邦死后，吕后把持朝政，将这些军事著作窃为己有。”项羽、韩信虽然死于非命，不得善终，但是他们所编著的军事著作却传之于世，在两汉四百二十多年间还流传于世，现在已失传不能见到了。

承天塔记

【原文】 黄鲁直初谪戎、涪，既得归，而湖北转运判官陈举，以时相赵清宪与之有小怨，讪其所作《荆南承天塔记》，以为幸灾，遂除名羁管宜州，竟卒于彼。今《豫章集》不载其文，盖谓因之兆祸，故不忍著录。其曾孙穆续编别集，始得见之。大略云：“余得罪窜黔中，道出江陵，寓承天禅院，住持僧智珠方彻旧浮图于地，而属曰：‘余成功之后，愿乞文记之。’后六年，蒙恩东归，则七级岿然已立，于是作记。”其后云：“儒者尝论一佛寺之费，盖中民万家之产，实生民谷帛之蠹，虽余亦谓之然。然自省事以来，观天下财力屈竭之端，国家无大军旅勤民丁赋之政，则蝗旱水溢或疾疫连数十州，此盖生人之共业，盈虚有数，非人力所能胜者邪！”其语不过如是，初无幸灾讽刺之意，乃至于远斥以死，冤哉！

【译文】 黄鲁直（黄庭坚）开始被贬官到戎州、涪州，已经被允许回内地，而湖北路转运判官陈举，因为当时宰相赵清宪（赵挺之）与黄鲁直之间有些怨恨，就攻击他写的《荆南承天塔记》，说是有对朝廷幸灾乐祸的意思，于是朝廷便将黄鲁直吏部除名、羁管宜州，最终死在那里。现在的《豫章集》没有收这篇文章，大概认为由于它招来灾祸，所以不忍心收录。他的曾孙黄 续编黄庭坚的文集，才能见到这篇文章。其中大略说：“余因罪被贬到黔贵，途经江陵，寄住在承天禅院里，住持和尚智珠正把旧塔完全拆除成为平地，而嘱咐我说：‘我把塔重新修好后，想请您写一篇记文。’六年以后，蒙受朝廷恩惠向东回内地，则承天禅院内七级宝塔已是巍然屹立，于是便写了记文。”这以后又说：“儒家学者曾讲一座佛寺的费用，大约是中等百姓一百家的财产，实在像百姓粮

食衣料中的蠹虫，即使是我也认为讲得对。然而自从懂事以来，考察天下财力困竭的原因，国家如果没有重大军事行动要百姓服役缴税的举措，则就出现蝗虫天旱、雨涝洪水或几十州范围内的瘟疫流行，这大概是百姓的共同财产，增减是有一定数额的，不是人的力量所能决定的吧！”他的话不过就讲了这些意思，原本没有幸灾乐祸讽刺时政的意思，却导致被贬到边远地区以致死在那里。冤枉啊！

穆护歌

【原文】 郭茂倩编次《乐府》诗《穆护歌》一篇，引《历代歌辞》曰：“曲犯角。”其语曰：“玉管朝朝弄，清歌日日新。折花当驿路，寄与陇头人。”黄鲁直题《牧护歌》后云：“予尝问人此歌，皆莫能说牧护之义。昔在巴、瞿间六年，问诸道人，亦莫能说。他日，船宿云安野次，会其人祭神罢而饮福，坐客更起舞，而歌《木瓠》，其词有云：‘听说商人木瓠，四海五湖曾去。’中有数十句，皆叙贾人之乐，末云：‘一言为报诸人，倒尽百瓶归去。’继有数人起舞，皆陈述已事，而始末略同。问其所以为木瓠，盖剡曲木状如瓠，吉之以为歌舞之节耳。乃悟穆护盖木瓠也。”据此说，则茂倩所序，为不知本原云。且四句律诗，如何便差排为犯角曲，殊无意义。

【译文】 在郭茂倩编辑的《乐府集》中，收录有《穆护歌》一首，诗中引用《历代歌辞》里所说的“它的典调是曲犯角。”其歌辞是：“玉管朝朝弄，清歌日日新。折花当驿路，寄与陇头人。”黄庭坚读后，写了《题牧护歌后》，说：“关于这首歌，我曾经问过一些人，为什么叫牧护歌，人们都不明白它的含义。以前，我在巴州（今四川奉节）、阆州（今四川宜宾）呆过六年，向当地人进行询问，牧护是什么意思，也无人知道。有一天，我乘船在云安县（今四川云阳）乡间住下。正好遇到当地人祭神完毕而后，举行酒宴，共同分享祭祀的食物，座中的客人们也纷纷起来翩翩起舞，并且同声高唱《木瓠歌》。这首歌的歌词中说：“听说商人木瓠，四海五湖曾去”，中间有几句，都是描述商人经商的欢乐的。它的最后一句是：“一言为报诸人，倒尽百瓶归去。”接着又有数人起来跳舞。一边跳舞，一边陈述往事。开头与结尾的情景，与上面说的大致一样。我曾问为什么叫木瓠歌，这是因为要将木材剡去成为瓠形的曲木，当作乐器，进行敲打，作为跳舞蹈的节拍。由此得到启发，所谓穆护即是木瓠，是一种木制乐器。”据此，郭茂倩在序中所说，表明他还没有弄清它的由来。况且所引录的四

句律诗，对于解释为什么叫犯角的曲调，也毫无意义。

省试取人额

【原文】 累举省试，锁院至开院，限以一月。如未讫事，则申展亦不过十日，所奏名以十四人取一为定数，不知此制起于何年。黄鲁直以元盥三年为贡院参详官，有书贴一纸云：“正月乙丑锁太学，试礼部进士四千七百三十二人。三月戊申具奏进士五百人。”乃是在院四十四日，而九人半取一人，视今日为不侔也。此帖载于别集。

【译文】 累次参加省试，从锁院到开院，期限是一个月。如事情没完，则延长也不过十天，所录取上报的有十四人取一人的固定数额，不知道这项制度起始于哪一年。黄鲁直（黄庭坚）在元盥三年（1088年）任贡院参详官，有书信一封说：“正月乙丑日锁闭太学，参加礼部科举考试的士人有四千七百三十二人。三月戊申日上奏申报录取士人五百人。”乃是考官在院内共四十四天，而每九个半人录取一人，和今天的制度规定相比有不小的差异。此书信收入黄庭坚文集中。

通印子鱼

【原文】 鱼通印之语，本出于王荆公《送张兵部知福州》诗：“长鱼俎上通三印”之句。盖以福州濒海多鱼，其大如此，初不指言为子鱼也。东坡始以“通印子鱼”对“披绵黄雀”，乃借“子”字与“黄”字为假对耳。山谷所云“子鱼通印糜破山”，盖承而用之。陈正敏《遁斋闲览》云：“其地有通应庙，庙前港中子鱼最佳。王初寮诗‘通应子鱼盐透白’，正采其说。”郡人黄处权云：“兴化子鱼，去城五十里地名迎仙者为上，所产之处，土人谓之子鱼潭而已，初无通应港之名。”有大神祠，赐额曰：“显应”，乃《遁斋》所指之庙者，亦非“通应”也。潭傍又有小祠一间，卑陋之甚，农家以祀田神，好事欲实《遁斋》之说，遂粉刷一扁，妄标曰“通应庙”，侧题五小字曰“元盥某年立”，此尤可笑。且用神庙封额以名土物，它处未尝有也。

【译文】 关于鱼通印的说法，出自王安石《送张兵部知福州》诗。这首诗中有：“长鱼俎上通三印”一句。这是因为福州临海，鱼产丰富，而且有的鱼长

得很大，起初，并不是指鱼而言的，从苏东坡开始，以“通印子鱼”对“披绵黄雀”，是借子字与黄字作为假对。黄庭贤在他的诗中说：“子鱼通印抵破山”，亦是沿用了这一用法。陈正敏在《遁斋闲览》里说：“福州有通应庙，庙前河溪中所产子鱼品种最好。王初寮的诗中有‘通应子鱼盐透白’一句，亦是采取了这一说法。”当地人黄处权曾说：“兴化产子鱼，在离城五十里名叫迎仙地方的鱼最佳，可列为上等。所产子鱼的地点，当地人称为子鱼潭。当初，还没有通应港的名称。这里有一座祠庙，里边的神像很大，朝廷赐给这座祠庙的匾额，上书显应二字。这座祠庙，也就是陈正敏在《遁斋闲览》中所说的那一座庙，是叫“显应”而不是“通应”。在子鱼潭旁边，又有一座小祠庙，只有一间房子，年久失修，又低又简陋。当地农家供奉田神，予以祭祀。那些多事的人，为了证实《遁斋闲览》中的说法，于是就将这座小祠庙整修粉饰一新，并制作一块匾额，竟然擅自写上“通应庙”三字，又在侧面题写“元螽某年立”五个小字。这种做法，更是荒唐令人耻笑。然而，以敕封神庙的名称来命名当地土特产，在其他地方还未尝见到。

寿亭侯印

【原文】 荆门玉泉关将军庙中，有寿亭侯印一钮，其上大环，径四寸，下连四环，皆系于印上。相传云：绍兴中，洞庭渔者得之，入于潭府，以为关云长封汉寿亭侯，此其故物也，故以归之庙中。南雄守黄兑见临川兴圣院僧惠通印图形，为作记。而复州宝相院又以建炎二年，因伐木，于三门大树下土中深四尺余，得此印，其环并背俱有文云：“汉建安二十年寿亭侯印。”今留于左藏库。邵州守黄沃叔启庆元二年复买一钮于郡人张氏，其文正同，只欠五系环耳。予以谓皆非真汉物，且汉寿乃亭名，既以封云长，不应去汉字，又其大比它汉印几倍之。闻嘉兴王仲言亦有其一。侯印一而已，安得有四？云长以四年受封，当即刻印，不应在二十年，尤非也。是特后人为之以奉庙祭，其数必多。今流落人间者，尚如此也。予以黄叔启作辨跋一篇，见《赘稿》。

【译文】 荆门军玉泉县关将军（关羽）庙中，有寿亭侯印一顆，它上面的大环，直径四寸，下面连着四个小环，又都与印相连。互相传说：“绍兴年中，洞庭湖的渔民得到它，送到了潭州官府，认为关云长被封为汉寿亭侯，这就是当时留下的旧物，所以把它归还给庙中。知南雄州黄兑看到临川县兴圣院僧人惠通所藏印的图像，为它写了记文。而复州宝相院又在建炎二年（1128年），因

为砍伐树木，在第三道门的大树下面距地面四尺多深的地方，发现了这颗印，它的环上和印背上都有文字说：“汉建安二十年（215 年）寿亭侯印。”现在这颗印收藏在藏库（国库）。知邵州黄沃字叔启庆元二年（1196 年）又从本州人张某处买得一颗，上面的文字与前面讲的完全相同，只缺少五个系环罢了。我因此认为它们都不是真正汉代的文物，而且“汉寿”是亭名，既然封给关云长，不当去除“汉”字，另外它们的大小比其他汉代的印几乎大一倍。听说嘉兴的王仲言也有一颗。给封侯的人的印一颗而已，怎么会有四颗？关云长在建安四年（199 年）被封为汉寿亭侯，应当立即刻印，不当拖到建安二十年，尤其不对。它们只不过是后人制造了用来在庙里祭祀的，数量必定较多。现在流落民间的，尚且有这么多。我为黄叔启写了辨伪的跋文一篇，收在《赘稿》中。

茸附治疽漏

【原文】 时康祖病心痔二十年，用《圣惠方》治腰痛者鹿茸、附子服之，月余而愈，《夷坚己志》书其事。予每与医言，辄云：“痈疽之发，蕴热之极也，乌有翻使热药之理？”福州医郭晋卿云：“脉陷则害漏，陷者冷也，若气血温暖，则漏自止，正用得茸、附。”按《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曰：“陷脉为痿，留连肉腠。”注云：“陷脉谓寒气陷缺其脉也，积寒留舍，经血稽凝，久瘀内攻，结于肉理，故发为痈痿，肉腠相连。”此说可谓明白，故复记于此，庶几或有助于痈医云。

【译文】 时康祖患心痔病已二十年了。他使用《圣惠方》里治腰痛病所用的鹿茸、附子，连续服用一个多月就痊愈了。我在《夷坚己志》里曾记述这件事。我每次与医生们交谈，他们便说：“恶性脓疮病的发作，是人体内蕴热达到了极点，怎么还会有使用热药治疗的道理！”福州一位医生叫郭晋卿的曾说：“脉弱则会患漏病，脉弱就是冷的意思。如果一个人的气血温暖，则漏病自然就会去除，所患漏病也就痊愈，这正好得使用热药鹿茸和附子。按《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中述称：“陷脉为痿，留连肉腠。”在这一条后面加注说：“陷脉是寒气陷缺其脉，久而久之，寒气聚积，经脉血液停滞不通，日子长了，就在体内淤积，结成肉文，因而形成溃烂病变，分泌物由痿管向外流出，使得肌肤上的纹理相连。”此说清楚明白，故复记于此。或许有助于痈医对溃疡病的医治。

莆田荔枝

【原文】 莆田荔枝，名品皆出天成，虽以其核种之，终于其本不相类。宋香之后无宋香，所存者孙枝尔。陈紫之后无陈紫，过墙则谓小陈紫矣。《笔谈》谓焦核荔子，土人能为之，取本木，去其大根，火燔令焦，复植于土，以石压之，令勿生旁根，其核自小。里人谓不然，此果形状，变态百出，不可以理求，或似龙牙，或类凤爪，钗头红之可簪，绿珠子之旁缀，是岂人力所能加哉？初，方氏有树，结实数千颗，欲重其名，以二百颗送蔡忠惠公，给以常岁所产止此。公为目之曰“方家红”，著之于谱，印证其妄。自后华实虽极繁茂，逮至成熟，所存者未尝越二百，遂成语讖。此段已载《遁斋闲览》中，郡士黄处权复志其详如此。

【译文】 莆田荔枝有些著名的品种，都不是借人工之力而是自然长成的。虽然是用它的核作为种子种下，但是最终与其母树有很大不同。用宋诚家的宋香之后没有宋香，培养出来的都是它的变种。用陈琦家的陈紫之后没有陈紫，过了陈琦家院墙的，就叫小陈紫。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有一种名叫焦核的荔枝，当地人能够培植，取其树枝，去掉树根，用火将它的底部烧焦，再植于土中，用石头压在上面，不使它生出旁根，长出的荔枝核自然会小。村里人则说不是这样。荔枝果的形状，多种多样，不可用常规来说明它的。有的像龙爪，有的像凤爪，钗头红可以插在头上作簪子，绿珠子成行成串可作旁缀，这岂能是人力所能做到的？起初，方氏家有荔枝树，每年结果多达数千个。方氏为了提高它的知名度，就拿出二百个送给了蔡忠惠公襄，并欺骗蔡襄说我家荔枝每年结果就是这么多。蔡襄将方氏送来的荔枝定名为“方家红”。并在《荔枝谱》中予以著录，以印证方氏所说的不实。自此而后，方氏家的荔枝，虽然枝叶茂盛，待到成熟的时候，所存的不尝超过二百个。于是，这成为一种讖语。这件事已载入《遁斋闲览》一书之中，本郡人黄处权又详细记录了它。

双陆不胜

【原文】 《新唐书·狄仁杰传》，武后召问：“梦双陆不胜，何也？”仁杰与王方庆俱在，二人同辞对曰：“双陆不胜，无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于

是召还卢陵王。《旧史》不载，《资治通鉴》但书鸛折翼一事。而《考异》云：“双陆之说，世传《狄梁公传》有之，以为李邕所作，而其辞多鄙诞，疑非本书，故黜不取。”《艺文志》有李繁《大唐说纂》四卷，今罕得其书，予家有之，凡所纪事，率不过数十字，极为简要，《新史》大抵采用之。其《忠节》一门曰：“武后问石泉公王方庆曰：‘朕夜梦双陆不胜，何也？’曰：‘盖谓宫中无子，意者恐有神灵僭夫陛下。’因陈人心在唐之意，后大悟，召卢陵王，复其储位，俾石泉公为宫相以辅翊之。”然则《新史》兼采二李之说，而为狄为王莫能辨也。《通鉴》去之，似为可惜。

【译文】 《新唐书·狄仁杰传》记载，武则天后召见狄仁杰问他自己梦见参加双陆这种赌博游戏没有取胜，为什么？狄仁杰与王方庆都在，两人异口同声地回答：“玩双陆不赢，是没有‘子’的缘故。上天的意思是不是提醒陛下呀？”于是武则天便把庐陵王召回京城。《旧唐书》没有记载此事，《资治通鉴》只记述了狄仁杰讲鸛折断两翼的事。而《通鉴》说：“关于双陆的说法，世人传说《狄梁公传》记载了，认为这书是李邕写的，然而书中词语大多浅陋荒诞，怀疑不是李邕的原书，所以删去不取。”《新唐书·艺文志》有李繁《大唐说纂》四卷，现在很少见到这部书，我家有这书，凡是此书记述史事，大多不过几十个字，极为简明扼要，《新唐书》大抵是采用了它的记载。其中《忠节》一书记载：“武则天问石泉公王方庆道：‘我夜间梦到参加双陆游戏没能取胜，为什么？’回答说：‘大概是讲宫内没有“子”（儿子），我猜想恐怕是神灵在提醒陛下。’又借机陈述了人心朝向李唐的意思，武则天深深地醒悟，召回庐陵王，恢复了他太子的地位，让石泉公担任宫相辅导他。”这样看来，《新唐书》同时采纳了李邕、李繁的说法，至于话是狄仁杰说的还是王方庆说的则没能分辨清楚。《资治通鉴》删去此事，似乎可惜。

华元入楚师

【原文】 《左传》，楚庄王围宋，宋华元夜入楚师，登子反之床，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子反惧，与之盟，而退三十里。杜注曰：“兵法，因其乡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之姓名，因而利道之。华元盖用此术，得以自通。”予按前三年晋、楚殽之战，随武子称楚之善曰：“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军政不戒而备。”大抵言其备豫之固。今使敌人能入上将之幕而登其床，则刺客奸人，何施不得？虽至于王所可也，岂所谓军制乎？

疑不然也。《公羊传》云：“楚使子反乘堙而窥宋城，宋华元亦乘堙而出见之。”其说，比《左氏》为有理。

【译文】 《左传》记载：楚庄王派兵进攻宋国的都城。宋国遭到突然袭击。急忙派华元连夜潜入楚营。登上楚将司马子反的床，将他拉起来，对他说：“我国国君派我来把困难告诉你。”司马子反害怕了，就与宋国签定了盟约，下令楚军撤围，退兵三十里。杜预在这里作注说：兵法上说，选将用人在选用其乡人时，一定要先知道对方守将的侍从左右谒者、守门人的姓名，以便因势利导。华元巧妙地使用了这一方法，因而取得了成功。”按在此前三年，晋、楚两国的军队，在（今河南荥阳北）会战。随武子称赞楚国治军有方：军队出行，右军跟着主将的车辕，左军寻找草作为宿营的准备，前军以旌旗为路以防意外，中军斟酌谋划，后军以精兵作为后盾。军中管理不必等待命令而已做好准备，处于战备状态。”这则记述，大致是说楚军戒备严密牢不可破。现在让敌人进入上将军的行营帐篷并登上上将军的床，那么使用刺客、间谍，又有什么做不到的呢？虽然来到王所是可以的，这难道是军中的制度吗？我怀疑情况不是这样。《公羊传》里记述这件事时说：“楚国让司马子反登上构筑的土堆工事而窥视围都城的情况。宋国华元亦登上构筑的土堆工事而在野外见到司马子反。”在我看来，后面这一种说法，与《左传》所述相比，更为合乎情理。

公羊用叠语

【原文】 《公羊传》书楚子围宋，宋人及楚人平事，几四百字。其称“司马子反”者八，又再曰“将去而归尔”，“然后而归尔”，“然后归尔”，“臣请归尔”，“吾亦从子而归尔”。又三书“军有七日之粮尔”。凡九用“尔”字，然不觉其烦。

【译文】 《公羊传》记述楚国国君率兵包围宋国都城，宋国人和楚国人议和立盟，一共不到四百字。其中出现“司马子反”八次，又两次讲“将去而归尔”，又讲“然后而归尔”、“然后归尔”、“臣请归尔”、“吾亦从子而归尔”，又三次写“军有七日之粮尔”，一共九次用“尔”字，然而不让人觉得它用得过多。

文书误一字

【原文】 文书一字之误，有绝系利害者，予亲经其三焉，至今思之，犹为汗下。乾道二年冬，蒙恩召还，过三衢，郡守何德辅问奏对用几札，因出草稿示之，其一乞蠲减鄱阳岁贡诞节金千两事，言此贡不知其于何时，或云艺祖初下江南，郡库适有金，守臣取以献长春节，遂为故事。误书“长春”为“万春”，乃金主褒节名也。德辅读之，指以相告，予悚然面发赤，亟改之。三年，以侍进讲《毛诗》，作发题，引孔子于《论语》中说《诗》处云：“不学《诗》，无以言。”误书“言”为“立”，已写进读正本，经筵吏袁显忠曰：“恐是言字。”予愧谢之。淳熙十三年在翰苑，作《赐安南国历日诏》云：“兹履夏正，载颁汉朔。”书“夏正”为“周正”，院吏以呈宰执，周益公见而摘其误，吏还以告，盖语顺意同，一时不自觉也。

【译文】 在正式公文中，出现一字之误，往往关系重大。我亲身经历过三件这样的事，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不免浑身直冒冷汗。

第一次是在孝宗乾道二年（1166年）的冬天。承蒙朝廷恩典诏我回京，路过衢州（今浙江衢县）。衢州知州何德辅问我奏对时用几个札子。这时，我拿出草稿给他看。其中一个札子是请求蠲免鄱阳地区岁贡朝廷生日黄金千两的事。札子中说这项岁贡不知道起于哪一年。有人说是我朝太祖皇帝初下江南时，郡中的仓库正好存有黄金，管理仓库的官吏就将这些黄金取出，作为皇上生日长春节的贺礼献上。从此开始，世代沿袭，遂成为一项制度。在这里，我把长春误写成万春。而万春节则是金朝皇帝完颜褒生日的名称。何德辅读到这里，就用手指着万春二字对我说是长春而不是万春。我大为吃惊，顿时面红耳赤，急忙改了过来。

第二次是在乾道三年（1167年）。我担任侍讲，给皇上讲解《毛诗》。在我的讲稿中，说到学习《诗经》的重要性时，引用了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不学《诗》，无以言”这句话。我把“言”字误写成“立”字。并且在进读的正本中也是这样写的。经筵吏袁显忠看到后对我说：立字恐怕是言字之误。我觉得很惭愧，对他表示了谢意。

第三次是在淳熙十三年（1186年）。这时候，我在翰林院任职，起草《赐安南国历日诏》。在这篇诏书中说：“兹履夏正，载颁汉朝。”我把“夏正”误写成“周正”。院吏将诏书呈给宰相。周必大看后，指出这一错误。院吏回来后，就

把这件事告诉了我。造成这一错误的原因，是由于语言通顺、意思类同，一时疏忽而未能觉察。

历代史本末

【原文】 古者世有史官，其著见于今，则自《尧》、《舜》二典。始，周之诸侯各有国史，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左氏为之传，《郑志》、《宋志》、晋、齐太史、南史氏之事皆见焉。更纂异同以为《国语》。汉司马谈自以其先周室之太史，有述作之意，传其子迁，襞金匮石室之书，罔罗天下放失旧闻，述黄帝以来至于元狩，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变编年之体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而十篇有录无书，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列传》，张晏以为言辞鄙陋，今杂于书中。而《艺文志》有冯商续太史公七篇，则泯没不见。司马之书既出，后世虽有作者，不能少紊其規制。班彪、固父子，以为汉绍尧运建帝业，而六世史臣，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侧于秦、项之列。故采纂前纪，缀辑旧闻，以述《汉书》，起于高祖，终于王莽之诛，大抵仍司马氏，第更八书为十志，而无世家，凡百卷。固死，其书未能全，女弟昭续成之，是为《前汉书》。荀悦《汉纪》则续所论著者也。后汉之事，初命儒臣著述于东观，谓之《汉纪》。其后有袁宏纪，张璠、薛宝，谢承、华峤、袁山松、刘义庆、谢沈皆有书。宋范曄删采为十纪、八十列传，是为《后汉书》，而张璠以下诸家尽废，其志则刘昭所补也。三国杂史至多，有王沈《魏书》、元行冲《魏典》、鱼豢《典略》、张勃《吴录》、韦昭《吴书》、孙盛《魏春秋》、司马彪《九州春秋》、丘悦《三国典略》、员半千《三国春秋》、虞溥《江表传》，今唯以陈寿书为定，是为《三国志》。《晋书》则有王隐、虞预、谢灵运、臧荣绪、孙绰，干宝诸家，唐太宗诏房乔、褚遂良等修定为百三十卷，以四论太宗所作，故总名之曰“御撰”，是为《晋书》，至今用之。南北两朝各四代，而僭伪之国十数，其书尤多，如徐爰、孙严、王智深、顾野王、魏澹、张大素、李德林之正史，皆不传。今之存者，沈约《宋书》、萧子显《齐书》，姚思廉《梁陈书》、魏收《魏书》，李百药《北齐书》、令狐德穆《周书》、魏郑公《隋书》。其它国则有和包《汉赵纪》、田融《赵石记》、范亨《燕书》，王景晖《南燕录》、高闾《燕志》、刘勰《凉书》、裴景仁《秦记》、崔鸿《十六国春秋》、萧方、武敏之《三十国春秋》。李太师延寿父子悉取为《南史》八十卷，《北史》百卷。今沈约以下八史虽存，

而李氏之书独行，是为《南北史》。唐自高祖至于武宗，有《实录》，后唐修为书，刘煦所上者是已，而猥杂无统。国朝庆历中，复诏刊修，历十七年而成，欧阳文忠公主纪、表、志，宋景文公主传，今行于世。梁、唐、晋、汉、周谓之五代，国初监修国史薛居正提举上之。其后欧阳芑为《新书》，故唐、五代史各有旧新之目。凡十七代，本末如此，稚儿数以为问，故详记之。

【译文】 古时候，历朝都设有史官，他们纂修的史书现在还可以看到。最早的是《尧典》和《舜典》。周代分封诸侯，从这时候起，各个诸侯国都有自己的国史，记述本国发生的史事。孔子根据鲁国史官的记载，写成《春秋》，左丘明为这部书写了传，称为《左传》。《郑志》、《宋志》、晋国和齐国的史官，南史氏的事迹，在这部史书中都有记载。左丘明又依据各国史官记载的异同，进行整理，写成了《国语》一书。

汉代司马谈自以为其先人是周朝的太史官，曾经立志要写一部史书，但是，他的这一愿望未能实现，他的儿子司马迁继承了父亲未竟的事业，利用汉代国家收藏的图书档案文献，又广泛收集全国各地的旧闻遗事。记事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元狩年间，从古至今，上下数千年。将原有的编年体史书，改为纪传体，计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其中十篇，只有目录，没有具体内容。到了汉元帝、成帝时，褚少孙才将缺文补入。为他所补入的有《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日者列传》。三国曹魏时张晏认为这几篇文辞拙劣，混杂于书中。而《汉书·艺文志》中还载冯商续司马迁《史记》撰文七篇，全都失传不存。自《史记》一书刻印之后，后人虽然也有人为它增补缺文，但都未能改变这部史学著作的体例规制。东汉时期，班彪、班固父子二人，认为汉代是直接承袭尧的体统而建功立业。经过六代，国家史官为了追述先人的功德，往往擅自撰写本纪，将汉代帝王编在百王之末尾，与秦始皇、项羽并列。所以史官们就广泛采集前人的有关著作，进行编辑整理，写成了《汉书》。该书记事始于汉高祖刘邦起事，终于王莽败亡被杀。大致是沿用了司马迁《史记》的体例，略作变动，将原来的八书改为十志，去掉了世家，全书共计一百卷。班固死时，该书还未能全部完稿，他的妹妹班昭继承了他的事业，续补成书。这就是《汉书》。另外，荀悦所著《东观汉记》一书，是为续《汉书》而撰写的一部著作。

后汉即东汉的历史，起初是命一些儒臣在东观进行纂修，成书之后，名叫《汉纪》。自此而后，成书的，还有袁宏的《汉纪》，张 、薛莹、谢承、华峤、袁山松、刘义庆、谢沈都有著述。南朝刘宋范晔根据这些史书的记载，经过精心删改写成本纪十篇，列传八十篇，定名为《后汉书》。而张 、薛莹、谢承、

华峤、袁山松、刘义庆、谢沈等人所撰有关汉代的著述则散失不存。《后汉书》中《志》，是后来刘昭补入的。

关于三国的杂史不少。见于记载的，有王沈的《魏书》，元行冲的《魏典》、鱼豢的《典略》、张勃的《吴录》、韦昭的《吴书》、孙盛的《魏春秋》，司马彪的《九州春秋》、丘悦的《三国典略》、员半千的《三国春秋》、虞溥的《江表传》。现在所存的，只有陈寿的定本《三国志》。

《晋书》当时有王隐、虞预、谢灵运、臧荣绪、孙绰、干宝等家的著述。到了唐代，太宗李世民命房玄龄、褚遂良等参照已有的史书，进行修定，成为一百三十卷的《晋书》。由于书中《宣帝纪》、《武帝纪》、《陆机传》和《王羲之传》四篇评语是唐太宗亲自撰写的，所以此书题名为“御撰”。该书至今仍在世上流传。

南朝北朝各有四个朝代。而那些夺权篡位、建国称帝的小国，又有十几个。有关南北朝的史书甚多。如徐爰、孙严、王智深、顾野王、魏澹、张大素，李德林主持纂修的正史，不知什么时候都散失了，现在也未发现。而今能见到有的：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齐书》、姚思廉的《梁陈书》、魏收的《魏书》、李百药的《北齐书》、令狐德 的《周书》、魏征的《隋书》。其他诸朝的史书有：和包的《汉赵纪》、田融的《赵石记》、范亨的《燕书》、王景晖的《南燕录》、高闾的《燕志》、刘 的《凉书》、裴景仁的《秦记》、崔鸿的《十六国春秋》、萧方、武敏之的《三十国春秋》。李延寿父子依据上述著述，细心采摘，撰成《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现在沈约及萧之显、姚思廉、魏收、李百药、令狐德 、魏征等八家的著述，虽有所存，但流行不广。只有李百药、李延寿父子的《南史》和《北史》传播于世。

唐代从高祖到武宗，历代都有《实录》。五代后唐时组织人力纂修《唐书》，即后人所说的《旧唐书》。由刘煦题名进呈。这部书内容庞杂，没有章法。我朝仁宗庆历年间，下诏重修唐书，花了十七年时间修成。由欧阳修负责撰写本纪、表、志部分，宋祁负责撰列传部分。这就是《新唐书》。现在传播于世。

唐亡之后，北方有梁、唐、晋、汉、周五个政权更迭，史称五代。我朝初年，任命薛居正为监修国史提举官主持纂修，成书后进呈。这就是《旧五代史》。后来，欧阳修依据所见材料，进行修订，成书后，取名为《新五代史》。所以，《唐书》及《五代史》，各自都有新、旧两个本了。

从尧舜至五代，共历十七朝，修史的始末大致是这样。孩子们几次问我，所以，在这里予以详述。

贤者一言解疑讐

【原文】 贤者以单词片言，为人释谤解患，卓卓可书者，予得两事焉。秦氏当国时，先忠宣公、郑亨仲资政、胡明仲侍郎、朱新仲舍人，皆在谪籍，分置广东。方务德为经略帅，待之尽礼。秦对一客言曰：“方滋在广东，凡得罪于朝廷者，必加意护结，得非欲为异日地乎？”客曰：“非公相有云，不敢辄言。方滋之为人，天性长者，凡于人唯以周旋为志，非独于迁客然也。”秦悟曰：“方务德却是个周旋底人。”其疑遂释。当时使一積巧者承其问，微肆一语，方必得罪，而诸公不得安迹矣。言之者可谓大君子，当求之古人中。严陵王大卞赴曲江守，过南安，谒张先生子韶，从容言：“大卞顷在检院，以罗彦济中丞章去国，其后彦济自吏书出守严，遂迁避于兰溪。彦济到郡，遗书相邀曰：‘与君有同年之契，何为尔？’不得已，复还。既见，密语云：‘前此台评，乃朱新仲所作，托造物之意相授，一时失于审思，至今为悔。’此事既往，今适守韶，而朱在彼，邂逅有弗愜，为之奈何？”张揣其必将修怨，即云：“国先为君子为小人，皆在此举。”王悚然曰：“谨受教。”至则降意弥缝，终二年，不见分毫行迹，盖本自相善也。予曩侍张公坐，闻其言，故追纪之。

【译文】 贤人用少数几句话，为别人消除诽谤解除祸患，非常突出可以记述的，我找到了两件事。秦桧当权时，先父忠宣公（洪皓）、资政学士郑亨仲（郑刚中）、侍郎胡明仲（胡寅）、中书舍人朱新仲（朱翌），都在被贬官的名册中，分别安置在广东路境内。方务德（方滋）任经略使，完全按礼法对待他们。秦桧对一位客人说道：“方滋在广东，凡被朝廷定了罪的人，必定注意保护结交，是不是想为别人掌权时作铺垫？”客人说：“不是宰相您提起，也不敢随便讲。方滋的为人，天生是个忠厚长者，凡是接人待物只把不得罪人当目的，不是只对被贬官的人才这样。”秦桧想通了说：“方务德原来是个老好人。”他的怀疑便消除了。当时让一个阴险奸诈的人回答他的问话，稍微放肆地胡说一句，方滋必然被秦桧怨恨定罪，而胡寅等人就不得安宁了。说这话的人可算是大君子，只能从古人中才能找到。严陵人王大卞前往韶州赴任知州，经过南安，拜见张先生张子韶（张九成），认真地说：“我不久前在检院任职，因为御史中丞罗彦济上奏弹劾被迫离开都城，后来罗彦济从吏部尚书调任知严州，我便把家搬到兰溪躲避他。罗彦济到了严州，写信邀请我说：‘我和您有同年科举考试被录取的交情，何必这样？’不得已，我又把家般回严州。既和罗彦济相见，罗彦济秘密

地对我说：“以前在御史台弹劾您的奏章，实际是朱新仲写（朱翌）的，他假托天意交给我，一时没有认真考虑，到今天还在后悔。这事已经过去了，现在恰好担任知韶州，而朱翌正好贬官在那里，碰巧相遇心情不愉快，该怎么办好？”张九成揣度他一定是要报复，便说：“王国先（王大卞）是君子是小人，就全看这次怎么做了。”王大卞吃惊地说：“我一定照您的话去做。”到韶州后不摆架子不记旧怨努力和朱翌搞好关系，前后二年，没有一点有隔阂的表现，大约原本就互相友好。我过去曾经陪侍张九公，听到他讲了这些，所以追记在这里。

卷九

蒋魏公逸史

【原文】 蒋魏公《逸史》二十卷，颖叔所著也，多纪当时典章文物。云旧有数百册，兵火间尽失之，其曾孙芾始颖摭遗稿，而成此书，将以奏御，以其副上之太史，且板行之，传之天下后世。既而不果。蒋公在熙宁、元盭、崇宁时，名为博闻强识，然阅其论述，颇有可议，恨不及丞相在日与之言。其一云：“行、守、试，视其官品之高下，除者必带本官。吕晦叔除守司空而不带金紫光禄大夫者，此翰林之失也，既不带官，不当著‘守’字，故晦叔辨之，遂去‘守’字，为正司空。议者谓超过特进、东宫三太、仪同矣。”予谓行、守、试必带正官，固也。然自改官制以后，既为司空，自不应复带阶官。吕从金紫迁，只是超特进一级耳。东宫三太，何尝以为宰相官？仪同又系使相也，吕亦无自辨之说。其二云：“文潞公既为真太师矣，其罢也，乃加‘守’字，潞公怏怏，诸公欲为去之。议者谓非典故，潞公之意，止欲以真太师致仕耳，诸公曰：‘如此可乎？’曰：‘不可，为真太师则在宰相之上。’竟不去‘守’字，但出札子，令权去之。”案潞公本以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师，河东节度使致仕，入为平章军国重事，故系衔只云太师，及再致仕，悉还旧称，当时有旨于制词内除去‘守’字，以尝正任太师也。所谓札子权去，恐或不然。其三云：“旧制，执政双转，谓自工部侍郎转刑部，刑部转兵部，兵部转工部尚书。惟宰相对转，工部侍郎直转工书，比执政三迁也。”予考旧制，执政转官，与学士等。六侍郎则升两曹，以工、礼、刑、户、兵、吏为叙，至兵侍者，转右丞，至吏侍者，转左丞，皆转工书，然后细迁。今言兵侍即转工书，非也。宰相为侍郎者，升三曹，为尚书者，双转。如工侍转户侍，礼侍转兵侍，若系户侍，当改二丞，而宰相故事不立丞，故直迁尚书。今言工侍对转工书，非也。其四云：“杨察为翰林学士，一夜当三制，刘沆以参知政事，富弼以宣徽使，皆除宰相。宣徽在参政下，则富当在刘下，乃误以居上，人皆不觉其失，惟学士李淑知之，扬言其事，遂贴麻改之。”予考国史，至和元年八月，刘沆以参知政事拜集贤相。二年六月，以忠武军节度使知永兴军文彦博为昭文相，位第一，刘沆迁史馆相，位第二，宣徽

南院使判并州富弼为集贤相，位第三，其夕三制是已。而刘先一年已在相位，初无失误贴改之说。其五云：“有四仪同：一曰开府仪同三司，二曰仪同三司，三曰左仪同三司，四曰右仪同三司。”案自汉邓骘始为仪同三司，魏、晋以降，但有开府仪同三司之目，周、隋又增上字为一阶，又改仪同三司为仪同大将军，又有开府、上开府，仪同、上仪同，班列益卑，未尝有左右之称也。后进不当辄议前辈，因孙偃有问，书以示之。

【译文】 蒋魏公（蒋）《逸史》二十卷，实际是蒋颖叔（蒋子奇）写的，大多是记述当时的典章制度，据说有数百册，战乱中都丧失了，他的曾孙蒋芾才收集整理遗留稿件，而编成这部书。原准备把它献给朝廷，把副本缴给史官，而且刻板发行，传给天下人和后代人，后来没能实现。蒋子奇在熙宁、元丰、崇宁年间，号称听到的多记忆力好，然读他书中的论述，颇有可讨论的地方，遗憾的是不能在蒋公生前的日子里和他讲。其中之一说：“职事官官名前的行、守、试字，根据本人官品的高低，写入任命书时必须带上本人官阶名。吕晦叔（吕公著）被任命为守司空而任命书上没有带上金紫光禄大夫官阶名，这是翰林学士的失误，既然不带官阶名，就不应该在职事官官名前加‘守’字，所以吕晦叔提出异议，朝廷便给他去掉了‘守’字，成为正司空，议论的人认为这样他就跨越了特进、东宫三太（太子太师、太子太保、太子太傅）、仪同了。”我认为职事官的行、守、试必须带阶官官名，这是确实的。然而自从元丰年间改变官制以后，既然是司空，自然不应再带阶官。吕晦叔从金紫光禄大夫升任司空，只是跨越了特进一级罢了，东宫三太，何曾作为宰相的阶官？仪同又相当过去的使相，吕晦叔也没有自己提出异议的事。其中之二说：“文潞公（文彦博）既然作了正式的太师，当他被罢免的时候，在太师官衔前又加了‘守’字，文潞公心中不快，大臣们想替他申奏朝廷去掉‘守’字，议论政事的官员讲没有先例，文潞公的意思，只想以正式太师的身份退休，大臣们问：‘这样行吗？’回答说：‘不行，因为不带守字的太师地位在宰相之上。’最终没有去掉‘守’字，但发布文潞公退休公文时，临时将‘守’字去掉。”按，文潞公原本是以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师、河东节度使的身份退休的，又被召回担任平章军国重事，所以讲官衔只称太师。等到再次退休，一切都依前次退休时的官称，当时皇帝曾下令在制书中除去“守”字，因为曾经担任过正式的太师。所谓临时去掉“守”字，可能不对。其中之三说：“过去的制度，执政大臣两阶两阶地晋升，是说从工部侍郎晋升刑部侍郎，刑部侍郎晋升兵部侍郎，兵部侍郎晋升工部尚书。唯独宰相对应晋升，工部侍郎直接晋升工部尚书，相当执政大臣晋升三次。”我考察过去的制度，执政大臣晋级，与学士相同。六部侍郎则晋升两个部，以工

部、礼部、刑部、户部、兵部、吏部为由低到高的顺序，升到兵部侍郎的，再晋升就升尚书右丞，升到吏部侍郎的，再晋升就升尚书左丞，都是晋升到工部尚书以后，再一阶一阶地晋升。现在讲兵部侍郎就晋或升工部尚书，不对。宰相的阶官是侍郎的，升三个部，是尚书的，升二个部。如工部侍郎晋升户部侍郎，礼部侍郎晋升兵部侍郎，如果是户部侍郎，应当晋升尚书左右丞，而宰相的阶官按惯例不能是尚书左右丞，所以直接晋升尚书。现在讲工部侍郎对应晋升工部尚书，是不对的。其中之四说：“杨察任翰林学士，一夜担任撰写三份制书的任务，刘沆从参知政事，富弼从宣徽使，一起晋升为宰相。宣徽使的品阶比参知政事低，则富弼应当排在刘沆下面，却被错误地排在刘沆上面，人们都没有觉察他的失误，只有翰林学士李淑知道，把这事传扬出去，朝廷便命令在白麻纸制书上粘贴修改。”我考察国史记载，至和元年（1054年）八月，刘沆从参知政事被任命为带集贤殿学士衔的宰相。至和二年（1055年）六月，任命原忠武军节度使、知永兴军文彦博为带昭文馆学士衔的宰相，排在第一位，刘沆晋升带临修国史衔的宰相，排在第二位，原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富弼被任命为带集贤殿学士的宰相，排在第三位，这就是一夜三份制书的内容。而刘沆在一年前已在宰相官位上，原本没有失误粘贴修改的事。其中之五说：“有四种仪司：一是开府仪同三司，二是仪同三司，三是左仪同三司，四是右仪同三司。”按自从汉代邓骘开始担任仪同三司，魏、晋以下，只有开府仪同三司的名目，后周、隋朝又增加“上”字作为一个等阶，又改仪同三司为仪同大将军，又有开府、上开府，仪同、上仪同，品阶更加低下，未曾有左仪同三司、右仪同三司的名称。晚辈不应当随便议论长辈，因为孙子洪偃有疑问，写下来给他看。

沈庆之曹景宗诗

【原文】 宋孝武尝令群臣赋诗，沈庆之手不知书，每恨眼不识字，上逼令作诗，庆之曰：“臣不知书，请口授师伯。”上即令颜师伯执笔，庆之口授之曰：“微生遇多幸，得逢时运昌。朽老筋力尽，徒步还南冈。辞荣此圣世，何愧张子房？”上甚悦，众坐并称其辞意之美。梁曹景宗破魏军还，振旅凯入，武帝宴饮联句，令沈约赋韵，景宗不得韵，意色不平，启求赋诗，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诗！”景宗已醉，求作不已。时韵已尽，唯余竞、病二字，景宗便操笔，其辞曰：“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叹不已，约及朝贤，惊嗟竟日。予谓沈、曹二公，未必能办此，疑好事者为

之，然正可为一佳对，曰：“辞荣圣世，何愧子房？借问路人，何如去病？”若全用后两句，亦自的切。

【译文】 南朝宋孝武帝曾令群臣赋诗。沈庆之自己不会写字，也不认字，看到孝武帝也要他作诗，不免有些焦急。无奈，只好奏明圣上说：“臣自幼不会写字，请允许我口述，让颜师伯记录下来。”孝武帝接受了他的请求，就命颜师伯执笔记录。沈庆之思索之后说道：“微生遇多幸，得逢时运昌。朽老筋力尽，徒步还南冈。辞荣此圣世，何愧张子房？”孝武帝听了十分高兴。在坐的文武大臣也都异口称赞这首诗的语言优美。

南朝梁曹景宗发兵与北魏军队作战，大获战捷，凯旋而归。梁武帝特设盛宴祝贺，并命文武群臣赋诗对句助兴。先让沈约提出赋诗时所用的韵，赋诗的人必须按照自己的韵去作诗。曹景宗没有得到分给他的韵字，不能赋诗，心中很不高兴。于是，就请求武帝允许他赋诗。武帝见此情景，就劝他说：“爱卿武艺超人，人才英俊，何必为一首诗而计较呢？”这时候，曹景宗正在兴头上，饮酒已有醉意，连声请求武帝允许他赋诗。原先拟定的韵字已快分完，只剩竞、病两个字了。曹景宗听罢，立即操笔疾书诗一首。诗中说：“去时女儿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梁武帝惊讶赞叹了一整天，惊叹不已，赞不绝口。沈约及参与赋诗的文武大臣亦为此。

在我看来，沈庆之、曹景宗二人，未必真能作出这样令人叹服的好诗。疑为这是那些多事的人杜撰出来的。然而，这两首诗正好可以合成为这样一篇佳对：“辞荣圣世，何愧子房。借问路人，何如去病？”若全用后两句，亦非常恰当真切。

蓝尾酒

【原文】 白乐天元日对酒诗云：“三杯蓝尾酒，一碟胶牙饴。”又云：“老过占他蓝尾酒，病余收得到头身。”“岁盏后推蓝尾酒，春盘先劝胶牙饴。”《荆楚岁时记》云：“胶牙者，取其坚固如胶也。”而蓝尾之义，殊不可晓。《河东记》载申屠澄与路旁茅舍中老父、姬及处女环火而坐，姬自外挈酒壶至曰：“以君冒寒，且进一杯。”澄因揖，逊曰：“始自主人翁，即巡澄，当婪尾。”盖以蓝为婪，当婪尾者，谓最在后饮也。叶少蕴《石林燕语》云：“唐人言蓝尾多不同，蓝字多作琳，出于侯白《酒律》，谓酒巡匝，未坐者连饮三杯，为蓝尾，盖未坐远，酒行到常迟，故连饮以慰之，以琳为贪婪之意。或谓琳为稳，如铁入火，贵

其出色，此尤无稽。则唐人自不能晓此义。”叶之说如此。予谓不然，白公三杯之句，只为酒之巡数耳，安有连饮者哉？侯白滑稽之语，见于《启颜录》。《唐艺文志》，白有《启颜录》十卷、《杂语》五卷，不闻有《酒律》之书也。苏鹗《演义》亦引其说。

【译文】 唐朝白居易在正月初一元日对酒作诗说：“三杯蓝尾酒，一碟胶牙饧。”又说：“老过占他蓝尾酒，病余收得到头身。”“岁盏后推蓝尾酒，春盘先劝胶牙饧。”《荆楚岁时记》说：“胶牙，是取牢固如粘胶的意思。”至于蓝尾意思是什么，人们则不大明白。《河东记》载：申屠澄与住在路旁茅屋中的老头、老太婆及少女，围着火炉而坐。一个老太婆从外面提着一个酒壶进来，对申屠澄说道：“因为你冒着天寒而来，应当先喝一杯。申屠澄急忙站起身来拱手施礼，辞让说：“礼当先让主人喝上一杯，然后才能轮到我，当婪尾。”这里作婪尾，大概是因为把蓝字写成了婪字。当婪尾的意思，就是说在聚会饮酒时最后一个喝酒。

另外，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述说，唐朝的时候，人们所说蓝尾的意思，多有不同。蓝字大都写成唛，见于侯白所著《酒律》一书。在这里说聚会饮酒，轮流一圈，坐在末座即最后一个人要连喝三杯，称为蓝尾。这大概是因为坐在末座的人离首席较远，最后才喝，轮到他时要经过一段时间，所以让他连喝三杯，以表示安慰。有人认为唛是贪婪的意思，有人说唛即 ，就像把一块铁放进火中，烧得时间愈久颜色就愈红，这纯是无稽之谈。由此可见，唐朝人自己也不大明白蓝尾的真正意思。”叶梦德的看法，即是如此。

在我看来，上述说法，未必就是这样。白居易诗中所说的三杯，只是讲酒的巡数，这里那有连饮的意思呢？侯白这些滑稽有趣的话，见于《启颜录》一书。《唐书·艺文志》著录侯白著《启颜录》十卷，《杂语》五卷，并没有著录他著有《酒律》一书。苏鹗的《演义》里采用的是叶梦德的说法。

欧阳公辞官

【原文】 欧阳公自亳州除兵部尚书知青州，辞免至四，云：“恩典超优，迁转颇数。臣近自去春由吏部侍郎转左丞，未逾两月，又超转三资，除刑部尚书。今才逾岁，又超转两资。尚书六曹，一岁之间，超转其五。”累降诏不从其请。此是熙宁元年未改官制时，今人多不能晓。盖昔者左右丞在尚书下，所谓左丞超三资除刑书者，谓历工、礼乃至刑也。下云又超两资者，谓历户部乃至兵也。

其上唯有吏部。故言尚书六曹，超转其五云。

【译文】 欧阳修从亳州调任兵部尚书、知青州，推辞达四次，说：“恩惠过分优越，晋升得太迅速。我去年春天从吏部侍郎晋升尚书左丞，不到两个月，又破格连升三级，晋升刑部尚书。到今天才过一年，又破格连升二级。尚书省六部，一年之间，经历了其中的五个。”皇帝多次下诏书拒绝他的请求。这是在熙宁元年（1068年）没改官制的时候，现在的人往往看不懂上面引的话。太抵过去尚书左、右丞排在六部尚书下面，所谓尚书左丞连升三级晋升为刑部尚书，是说跳过了工部尚书、礼部尚书到了刑部尚书。下文说又连升二级，是说跳过了户部尚书到了兵部尚书。在兵部的上面只有吏部。所以欧阳修在上疏中说，自己在尚书六曹中，连续破格转资有五。

南北语音不同

【原文】 南北语音之异，至于不能相通，故器物花木之属，虽人所常用，固有不识者。如毛、郑释《诗》，以梅为楠，竹为王刍，萋为翘翘之草是矣。颜师古注《汉书》亦然。淮南王安《谏武帝伐越书》曰：“舆轿而逾领。”服虔曰：“轿音桥，谓隘道舆车也。”臣瓚曰：“今竹舆车也，江表作竹舆以行。”项昭曰：“陵绝水曰轿，音旗庙反。”师古曰：“服音、瓚说是也，项氏谬矣。此直言以轿过领耳，何云陵绝水乎？旗庙之音，无所依据。”又《武帝纪》：“戈船将军。”张晏曰：“越人于水中负人船，又有蛟龙之害，故置戈于船下，因以为名。”瓚曰：“《伍子胥书》有戈船，以载干戈，因谓之戈船也。”师古曰：“以楼船之例言之，则非为载干戈也。此盖船下安戈戟以御蛟鼉水虫之害。张说近之。”二说皆为三刘所破，云：“今南方竹舆，正作旗庙音，项亦未为全非。颜乃西北人，随其方言，遂音桥。”又云：“船下安戈戟，既难厝置，又不可以行。且今造舟船甚多，未尝有置戈者，颜北人，不知行船。瓚说是也。”予为项音轿字是也，而云陵绝水则谬，故刘公以为未可全非。张晏云“越人于水中负船”，尤可笑。

【译文】 南方和北方，地理环境不同，语音也有差异，以至于不能相互通用。因此，有些器具物品花卉草木等，虽然为人们日常使用，往往有些彼此不能互相知晓。比如毛亨，郑玄在注释《诗经》时说：梅即是楠，竹就是王刍，萋就是翘翘草。颜师古在注释《汉书》时，亦是这样说的。汉代淮南王刘安在《谏武帝伐越书》中说：“舆轿而逾领”。服虔解释说：轿音桥，这句话的意思是在狭隘的道路上乘的滑杆。臣瓚解释说：“轿，即今之竹滑杆，江南人制作滑杆

作为交通工具。”而项昭则说：“跨越河流的曰轿，轿读音为旗庙反。”颜师古在注中说：“服虔说轿音桥，臣瓚说轿是滑杆，这些都是对的。项昭说跨越河流的曰轿是错误的。这里直截了当地说是以轿过岭，怎么能说是跨越河水呢？将轿字注音为旗庙反，也是没有根据的。”

另外，《汉书·武帝纪》中有“戈船将军”的记载。关于这一点，人们解释也不一致。张晏的解释是：“越人要在水中背人背船，往往遭到蛟龙的侵害，所以就将安有长柄带刃的兵器藏于船底下，因此人们就称它为戈船。”臣瓚注释说：“《伍子胥书》里有戈船的记载。说由于船上装的是兵器干戈，因而叫它为戈船。”颜师古则认为：按照汉代楼船的情况而言，所谓的戈船，并不是因为这种船上装的是兵器干戈。这大概是由于在船的底下藏有戈、戟等兵器，以防御江河湖海中蛟龙、鳄鱼的侵害。张宴的解释比较接近实际。”

对于上述的两种说法，刘原甫、刘贡甫、刘中甫三人曾经进行过剖析，指出：“现在南方仍有竹制滑杆，轿读音读作旗庙。项昭所说的并不全是错的。颜师古为西北人，按照当时当地方言，遂说轿读音为桥。”又说：“在船底下安装兵器戈、戟，不仅安装困难，而且不便使用。况且现在造船业比过去发达，制造各种船只数量很大，未见有在船底下安装兵器的。颜师古为西北人，对于船的运行不十分了解。臣瓚的解释是对的。”据此，我认为项昭关于轿字的注音是对的，所谓跨越河流的说法是错的。刘邠指出他们的这些解释并不全错。至于张宴所说“越人于水中背船”的说法，更是荒唐可笑。

南舟北帐

【原文】 顷在豫章，遇一辽州僧于上蓝，与之闲谈，曰：“南人不信北方有千人之帐，北人不信南人有万斛之舟，盖土俗然也。”《法苑珠林》云：“山中人不信有鱼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鱼。胡人见锦，不信有虫食树吐丝所成。吴人身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毡帐，及来河北，不信有二万硕船。”辽僧之谈合于此。

【译文】 不久前，我在江西上蓝遇见一个辽州（今山西左权）僧人，同他闲谈。他对我说：“南方人不相信北方有可以容纳一千人的帐篷，北方人也不相信南方有可以装载一万斛粮食的大船。这是当地的自然条件和习俗是这样。在北方就是有可以容纳一千人的大帐篷，在南方就是有可以容纳一万斛粮食的大船。”另外，《法苑珠林》里说：“长期生活在山区的人，不相信有的鱼大的像树

那样大，长期生活在海边的人，不相信有的大树像大鱼那样大。北方的胡人见到丝织的锦，不相信蚕吃了桑树上的叶吐丝能织成锦，吴人身在南方，不相信北方有可以容纳一千人的用羊毛或其它动物毛制成的毡帐篷，等到他们北行来到并长期生活在黄河以北的地区之后，也就不会相信南方有可以容纳二万斛粮食的大船了。”那位辽州僧人所说，与该书中所记载，是一致的。

魏冉罪大

【原文】 自汉以来，议者谓秦之亡，由商鞅、李斯。鞅更变法令，使民不见德，斯焚烧诗书，欲人不知古，其事固然。予观秦所以得罪于天下后世，皆自挟诈失信故耳。其始也，以商於六百里啖楚绝齐，继约楚怀王入武关，辱为藩臣，竟留之至死。及其丧归，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诸侯由是不直秦，未及百年，“三户亡秦”之语遂验。而为此谋者，张仪、魏冉也。仪之恶不待言，而冉之计颇隐，故不为世君子所诛。当秦武王薨，诸弟争立，唯冉力能立昭王。冉者，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昭王少，太皇自治事，任冉为政，威震秦国，才六年而诈留楚王。又怒其立太子，复取十六城。是时，王不过十余岁，为此者必冉也。后再为范雎所间而废逐。司马公以为冉援立昭王，除其灾害，使诸侯稽首而事秦，秦益强大者，冉之功也。盖公不细考之云。又尝请赵王会渑池，处心积虑，亦与诈楚同，赖蔺相如折之，是以无所成，不然，与楚等耳！冉区区匹夫之见，徒能为秦一时之功，而貽秦不义不信之名万世不灭者，冉之罪诚大矣！

【译文】 自汉代以来，评论者们讲秦朝灭亡，是由于商鞅、李斯。商鞅变更法令，使百姓看不到德政，李斯焚烧儒家典籍，想让人们不知道古代的事，他们的罪行是确实有的。我看秦朝之所以得罪了天下人和后代人，都根源于心怀欺诈不讲信用罢了。开始，用商於六百里土地引诱楚国同齐国绝交，随后又约请楚怀王进入武关，侮辱性地把楚怀王作为秦国附庸那样对待，最终扣留他直到去世。等到他的灵柩回到楚国，楚国人都可怜他，像亲戚死了一样地哀伤。各诸侯从此认为秦国不讲道理，不到一百年，“三户亡秦（楚国人即使只剩三户也能灭掉秦国）”的话就得到验证。而出这主意的，是张仪、魏冉。张仪的罪恶就不必讲了，而魏冉的计谋颇为隐蔽，所以没有受到士人君子的口诛笔伐。当秦武王去世时，他的几个弟弟争着要当国王，只有魏冉有力量能立秦昭王。魏冉，是秦昭王母亲宣太后的弟弟。秦昭王年岁小，太后自己处理政事，任用魏冉主

持国务，他的一举一动能使整个秦国震动，他当权才六年就把楚怀王骗来扣留，又不满意楚国立太子，再夺取楚国十六座城池。当时，秦昭王不过十余岁，干这件事的必定是魏冉。后来魏冉被范雎离间而被免去官爵驱逐出都城。司马公（司马迁）认为魏冉出力立了秦昭王，除掉了威胁秦昭王的祸害，使得各诸侯都低下头来事奉秦国，秦国日益强大，是魏冉的功劳。这是他没有仔细考察魏冉的全部功过。又曾邀请赵王在渑池相会，处心积虑想搞阴谋，也和欺骗楚国相同，依赖蔺相如挫败了他们的阴谋，所以没干成事，不然的话，赵王的结局和楚怀王是一样的！魏冉区区庸人的见解，只能为秦国获取一时的成功，而使得秦国背上不讲信义一万代也不能除掉，魏冉的罪确实是太大了！

辩秦少游义倡

【原文】 《夷坚己志》载潭州义倡事，谓秦少游南迁过潭，与之往来，后倡竟为秦死，常州教授钟将之得其说于李结次山，为作传。予反复思之，定无此事，当时失于审订，然悔之不及矣。秦将赴杭穉时，有妾边朝华，既而以妨其学道，割爱去之，未几罹党祸，岂复眷恋一倡女哉？予记国史所书温益知潭州，当绍圣中，逐臣在其巡内，若范忠宣、刘仲冯、韩川原伯、吕希纯子进、吕陶元钧，皆为所侵困。邹公南迁过潭，暮投宿村寺，益即时遣州都监将数卒夜出城，逼使登舟，竟凌风绝江去，几于覆舟。以是观之，岂肯容少游款昵累日？此不待辩而明，《己志》之失著矣！

【译文】 我在《夷坚己志》中记有潭州（今湖南长沙）一位义倡的事略。意思是说秦观在被贬南迁时，途经潭州，遇到一位娼女，并且与她往来，后来，这位娼女竟然为秦观献身而死。常州（今属江苏）教授钟将之从李结（字次山）那里得到这些传闻，因而就为娼女作传以记其义举。我经过反复思考，查阅有关材料，认为绝无此事。我在写《夷坚己志》时，没有作详细的考订，就将娼女之事写入，真是后悔也来不及了。秦观在赴杭州去任副职时，曾有妾边朝华陪同以行，后来以为让边朝华陪同会妨碍修道，于是忍痛割爱让边朝华离去。没有多久，秦观就遭到党祸的迫害，怎么能够再去与一个娼女眷恋不舍呢？我记得国史里记载温益出任潭州知州，是在哲宗绍圣年间。我等被斥逐南迁的官吏，都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如范忠宣纯仁、刘仲冯奉世、韩川字原伯、吕希纯字子进、吕陶字元钧，都遭到了他的迫害刁难。邹浩被贬南迁，途经潭州，一天晚上，在一个村寺中投宿。温益得知后，即刻派州都监带领数人连夜出城，

进行搜查，找到之后，逼迫上船，竟然凌风渡江而去，几乎导致船翻人亡之祸。由此来看，如此凶狠的潭州知州温益岂肯允许秦观终日与娼女呆在一起呢！这是毋须加以辨明的。《夷坚己志》中所言他与潭州义娼之事，是没有根据的。

姓源韵谱

【原文】 姓氏之书，大抵多谬误。如唐《贞观氏族志》，今已亡其本。《元和姓纂》，诞妄最多。国朝所修《姓源韵谱》，尤为可笑。姑以洪氏一项考之，云：“五代时有洪昌、洪杲，皆为参知政事。”予按二人乃五代南汉僭主刘鋹之子，及晟嗣位，用为知政事，其兄弟本连“弘”字，以本朝国讳，故《五代史》追改之，元非姓洪氏也。此与洪庆善序丹阳弘氏云：“有弘宪者，元和四年尝跋《辋川图》。不知弘宪乃李吉甫之字耳。其误正同，《三笔》已载此说。

【译文】 关于姓氏的书，大抵错误很多。例如唐代《贞观氏族志》现在已找不到它的原书了。《元和姓纂》荒诞错误的地方最多。本朝人所编定的《姓源韵谱》，尤其可笑。姑且从洪氏一项考察，书中说：“五代时有洪昌、洪杲，都是参知政事。”我查这两个人乃是五代南国君主刘 的儿子，等到刘晟继承王位，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他们兄弟原先名字中连用“弘”字，因为本朝国讳，所以《五代史》追述时将“弘”改为“洪”，原本并非姓洪。这与洪庆善（洪兴祖）为丹阳弘氏族谱写的序文类似，序文说：“有叫弘宪的，元和四年（809年）曾为《辋川图》写跋文。”洪庆善不知道“弘宪”乃是李吉甫的字。他们的错误是正好相同的，《容斋三笔》已记述了这件事。

誉人过实

【原文】 称誉人过实，最为作文章者之疵病，班孟坚尚不能免。如荐谢夷吾一书，予盖论之于《三笔》矣。柳子厚《复杜温夫书》云：“三辱生书，书皆逾千言，抵吾必曰周、孔，周、孔安可当也？稷人必于其伦。生来柳州，见一刺史即周、孔之，今而去我，道连而谒于潮，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师，京师显人，为文词立声名以千数，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胸中扰扰焉多周、孔哉？”是时，刘梦得在连，韩退之在潮，故子厚云然。此文人人能诵，然今之好为谀者，固自若也。予表出之，以为子孙戒。张说贺魏元忠衣紫曰：“公居伊、

周之任。”即为二张所谗，几于殒命。此但形于语言之间耳。

【译文】 写文章颂扬一个人言过其实，是写文章的人最大的毛病。这一点，就连班固那样著名的学者也难以避免。比如，班固撰写的荐谢夷吾这篇文章，即是如此。我在《容斋三笔》里已有论述。唐代柳宗元在《复杜温夫书》中说：承蒙多次来信，每次写信都长达千余言，把我比作周公、孔子，我怎么敢当周公、孔子呢？评价一个人如何应当与他的同类相比。你来到柳州（今属广西），见到刺史就把他比作是周公、孔子，现在离开我以去，途经连州（今广东连县），到达潮州（今属广东），见到二州刺史，又称颂他们是周公、孔子。来到京师，京师名人汇集，善于写文章并有一定名声的人数以千计，他们个个都是周公、孔子，岂不是又得到千百个周公、孔子。为什么在你心中有这么多的周公、孔子呢？”这时候，刘禹锡正在连州，韩愈正在潮州，所以柳宗元在信中这样说。柳宗元的这篇文章，当时流传很广，人人都熟读。然而，今日那些喜好阿谀奉承的人仍然心安理得，若无其事。我之所以将它录之于此，目的在于让子孙后人引以为戒。另外，张说在祝贺魏元忠官位荣升时说：“魏公您担负着伊尹、周公那样的重任。”这种言过其实地颂扬，立即遭到攻击，几乎使他丧命。这些都仅仅是出现在语言文字中间的事。

作文句法

【原文】 作文旨意句法，固有规仿前人，而音节响亮不嫌于同者。如《前汉书赞》云：“竖牛奔仲叔孙卒，伯毁季昭公逐；费忌纳女楚建走，宰 譖胥夫差丧，李园进妹春申毙，上官诉屈怀王执。赵高败斯二世缢，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蛊太子杀，息夫作奸东平诛。”《新唐书》效之云：“三宰嘯凶牝夺辰，杜甫将蕃黄屋奔；鬼质败谋兴元蹙，崔、柳倒持李宗覆。”刘梦得《因论傲舟》篇云：“越子膝行吴君忽，晋宣尸居魏臣怠，白公厉剑子西晒，李园养士春申易。”亦效班史语也。然其模范，本自《荀子·成相》篇。

【译文】 写文章立意和句法，确实有模仿前人，而节奏铿锵有力明快却不让人觉得有雷同毛病的。例如《汉书·蒯伍江息夫传赞》讲：“叔孙穆子的庶出儿子叔孙牛讲叔孙穆子嫡生儿子叔孙仲的坏话，迫使叔孙仲逃走，以致叔孙穆子被饿死；蒯昭伯向昭公诋毁季平子，昭公发兵进攻季平子失败被迫出逃；楚平王接受费无忌的建议收纳了美女，又听信费无忌的挑拨离间，楚太子建被迫出走；宰 诬陷伍子胥，越王夫差赐伍子胥死，最后兵败丧命；春申君的门客

李园把妹妹献给春申君，怀孕后春申君又把她献给楚王，李园妹妹的儿子后来继承了王位，李园得宠后害死了春申君；上官大夫指控屈原，最终导致楚怀王被秦国拘留；赵高谋害了李斯，最终导致秦二世上吊自杀；伊戾是宋国太子的老师，不得宠，就诬陷太子痤与楚国私下里立有盟约，宋王于是杀死太子痤；汉代的江充诬告太子刘据用巫术、木偶诅咒汉武帝，以致刘据被杀，息夫躬施展奸计东平王被汉哀帝处死。”《新唐书·奸臣传赞》仿效它说：“三个宰相（许敬宗、李义府、傅游艺）大讲歪论造成母鸡报晓（指武则天当皇帝），李林甫任用蕃族大将导致皇帝离京逃亡，有“蓝面鬼脸”称号的卢杞出坏主意造成皇帝在兴元的困境，崔胤、崔昭伟、柳璨把持政权造成李氏唐朝的灭亡。”刘禹锡（字梦得）《因论傲舟》一篇中说：“越王夫差跪着向前使吴王勾践放松警惕，司马懿假装病重曹魏的大臣就懈怠了，白公胜磨剑楚公子子西笑他是小孩子，春申君收养门客李园不当一回事。”也仿效班固的《汉书》的话。然而它们仿效的原始范本，出自《荀子·成相》篇。

书简循习

【原文】 近代士人，相承于书尺语言，浸涉奇狷，虽有贤识，不能自改。如小简问委，自言所在，必求新异之名。予守赣时，属县兴国宰诒书云：“潏水有驱策，乞疏下。潏水者，彼邑一水耳。郡中未尝知此，不足以为工，当言下邑、属邑足矣。为县丞者，无不采《蓝田壁记》语云，“负丞某处”，“哦松无补”，“涉笔承乏”，皆厌烂陈言。至称丞曰“蓝田”，殊为可笑。初赴州郡，与人书，必言“前政颓靡，仓库溃乏，未知所以善后”，沿习一律。正使真如所陈，读者亦不之信。予到当涂日，谢执政书云：“郡虽小而事简，库钱仓粟，自可枝梧，得坐啸道院，诚为至幸。”周益公答云：“从前得外郡太守书，未有不以窘冗为词，独创见来缄如此。”盖觉其与它异也。此两者皆狃熟成俗，故纪述以戒子弟辈。

【译文】 最近一个时期，人们写信好用离奇古怪的套语，相沿成习。即使品德高尚又有才学的人，也不能不这样。比如，写信问侯别人，谈到自己的地址时，不去明言直说，一定要标新立异写个奇奇怪怪的名字。我在赣州（今属江西）任太守时，所属兴国县的县令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说：“如果能让潏水干什么事，请求下令就可以了。”潏水是兴国县境内一条小河，就连当地人也很少有谁知道它的名字。所以不能用潏水作为兴国县的代称。书作下邑、属邑就可

以了。

那些做县丞的人，往往喜欢用《蓝田壁记》中“负丞某处”即在某处担任县丞，“哦松我补”即站在松树下吟诗却管不好县里的事，“涉笔承乏”即拿起笔就想起自己没有尽职尽责等词语，实际上这些词语，全是陈词滥调，令人厌恶。甚至有的人称县丞为“蓝田”，更是令人发笑。

那些初任州郡长官的人，到任之后，在给人写信时，必然把前任长官的所作所为说得一塌糊涂。往往说：“前任政事颓废，奢侈糜烂，仓库空虚，不知用什么方法以善其后”，这也成为套语，相沿成习。即使实际情况真的如所说的那样，也无法使读到此信的人信以为真。

我来到当涂县（今属安徽）后，在写给执政周必大的答谢信中说：“当涂地方虽小，应办的事情也较少，仓库中所存的钱粮，也还勉强够用。所以我才能安静放心地坐在道院中吟诗，这的确是我最大的幸运。”周必大看了我给他的信后，马上回信对我说：“从前收到外郡太守的书信，没有一个不说他们那里的财政是如何的困难。只有你的信独创如此。”这大概是由于周必大觉得我的信与别人不同，所以才这样说。

以上这两种情形，都因循成俗。所以，我在这里予以记述，以期为晚辈们所注意。

健讼之误

【原文】 破句读书之误，根著于人，殆不可复正。在《易·彖》之下，先释卦义，然后承以本名者，凡八卦。《蒙》卦曰“《蒙》，山下有险，险而止，《蒙》”，以“止”字为句绝，乃及于“蒙”，始系以“《蒙》亨，以亨行”。《讼》卦曰“《讼》，上刚下险，险而健，《讼》”，以“健”字为句绝，乃及于《讼》，始系以“《讼》有孚。”《豫》卦“刚应而志行，顺以动，《豫》”。《随》卦“刚来而下柔，动而说，《随》”。《蛊》卦“刚上而柔下，巽而止，《蛊》”。《恒》卦“巽而动，刚柔皆应，《恒》”。《解》卦“《解》，险以动，动而免乎险，《解》”，《井》卦“巽乎水而上水，《井》”，皆是卦名之上为句绝。而童蒙入学之初，其师点句，辄混于上，遂以“健讼”相连，此下“说随”两字，尚为有说，若“止蒙”、“动豫”之类，将如之何？凡谓顽民好讼者，曰“横讼”，曰“终讼”，可也，黄鲁直《江西道院赋》云“细民险而健，以终讼为能。筠独不横于讼”，是已。《同人》卦：“柔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

野，亨。”据其文义，正与诸卦同，但多下一“曰”字。王弼以为“乾之所行，故特曰“《同人》曰”。程伊川以为衍三字。恐不然也。

【译文】 读书断句的错误，根子在于人，几乎不可匡正。《周易》一书，在《彖》下，先解释各卦的卦义，然后述说各卦的卦名。共有八个卦名。《蒙》卦中载：“《蒙》卦的卦形，是山下有危险，险而止（因为有危险而停止不知怎么办），所以取名为蒙。”这句话，在止字后断句，以下接着就是蒙。再以后说：“遇到《蒙》人希望顺利，如果运用正确的方法就可以顺利。”《讼》卦中载：“《讼》卦，上卦是乾卦是刚，下卦是坎卦是险，下卦亦称内卦，上卦亦称外卦，险而健（内险外健），因而争讼，成为讼卦。”这句话，在健字断句。以下接着说：“讼卦有孚信。”《豫》卦中载：“一阳而五阴爻，五阴应一阳，因而能按照自己志向去行，顺以动（能够顺应时机行动），合乎预定目的所以命名为豫。”《随》卦中载：“刚来而下柔，动而说（上动而上说），称为随卦。”《蛊》卦中载：“阳刚在上，而阴柔在下，上卦为巽，巽为止（不能沟通），可以有所作为，所以称蛊。”《恒》卦中载：“上卦是巽卦为雷，下卦是巽卦为风，巽卦为顺，震卦为动，动而顺应，刚柔皆应（是刚柔相应），可以长久，称为恒卦。”《解》卦中载：“《解》卦，由下卦坎为险，与上卦震为动构成，动而免乎险（行动能脱离危险），称为解卦。”《井》卦中载：“巽乎水而上水（下为巽卦，上为坎卦，进入水中，将水汲上），称为井卦。”凡是断句的地方，都在卦名之上。而儿童入学之初，有些蒙师断句，往往把卦名与上一字相连，于是读成“健讼”，此后还有“说随”两字，这还可有其他解说，他如“止蒙”、“动豫”等，又将作何解说呢？现在将那些好打官司的刁民，称为“讼”，或称“终讼”，这是可以的。黄庭坚的《江西道院赋》中说：“细民险而健，以终讼为能。筠独不于讼”，即是如此。《周易·同人卦》说：“同人卦，阴爻得下卦中位，而与上卦乾坤相应。所以曰‘同人’，同人的意思是说众人在旷野中和谐的聚集，万事顺利，所以亨通”。据其文义，正与上引诸卦句法相同。但多用了下一个曰字。王弼认为《乾》之所行，故特意作“《同人》曰”，程伊川认为此句中的“同人曰”三字为衍字，恐怕未必如此。

用史语之失

【原文】 今之牵引史语者，亦未免有失。张释之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论，令今可行也。”遂言秦、汉之间事，帝称善。颜师古云：“令其

议论依附时事。”予谓不欲使为甚高难行之论，故令少卑之尔。而今之语者，直以言议不足采为“无甚高论”。又文帝问上林令禽兽簿，不能对，虎圈啬夫从旁代对，帝曰：“吏不当如此邪？”薛广德谏元帝御楼船，曰：“宜从桥”。且有车污血轮之诮。张猛曰：“乘船危，就桥安。”上曰：“晓人不当如是邪？”师古谓“谏争之言，当如猛之详婉也。”按两帝之语皆是褒嘉之词，犹云“独不当如是乎？”今乃指人引喻非理或直述其私曰“晓人不当如是”。又韩公《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云：“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为人强记览，过眼不再读。伟哉群圣文，磊落载其腹。”邺侯盖谓李繁，时为随州刺史，藏书既多，且记性警敏，故签轴严整如是。今人或指言虽名为收书而未尝过目者，辄曰：“新若手未触。”亦非也。

【译文】 现在人们引用史书的话，亦不免有不当之处。

张释之与汉文帝谈及国家应办的事情时，文帝告诫说，“调子可以低一点，不要把调子定的那么高，要考虑到现在就能办到。”张释之按照文帝的这个想法，谈了对秦、汉之际一些事情的看法，文帝十分高兴，连连点头称赞。颜师古在注释时说：“这是令张释之的议论要结合当时国家的实际。”在我看来，这是不让张释之发表一些调子很高又难以实行的议论。而是要他少谈一些，调子低一点。而今人们引用这句话时，往往把那些见解低下不宜采纳的称为“无甚高论”。

又有一次，汉文帝来到上林苑，问主管禽兽饲养的上林令，禽兽簿上有哪些飞禽走兽？上林令一时回答不上来。在一旁的虎圈啬夫代为回答。汉文帝说：“难道作吏的你不应当这样吗？”

还有一次，汉元帝想乘船渡河，薛广德听说后，立即上书劝阻，提出不要乘坐楼船，应从桥上走过。并且乱七八糟地说到车轮上有血污之事。张猛说：“乘船危险，从桥上走过安全。”汉元帝称赞说：“难道明白人不应当这样吗？”颜师古评论说：“规劝进言，应当像张猛那样详明委婉。”

按上述汉文帝、汉元帝二人的话，都是褒奖之词，犹如所说“难道不应当这样吗”一样。而今在指责那些议论无理或直述其私的人时，说“明白人不应当这样”。这是与汉元帝所说的本意不符的。

此外，韩愈在《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的诗中写道：“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为人强记览，过眼不再读。伟哉群圣文，磊落载其腹。”这里所说的邺侯即李繁，当时任随州刺史，家中藏书很多。而他本人聪明过人，记忆力特别强，一本书看之后，不必再读。所以，所藏卷轴及每册所标牙签都非常严整，如同“新若手未触”那样。这是对李繁的称赞。而今

有人在指责那些名为收书而从不过目的人，往往用“新若手未触”一语。这也是与它的本意不符的。

文字书简谨日

【原文】 作文字纪月日，当以实言，若拘拘然必以节序，则为牵强，乃似麻沙书坊桃源居士辈所跋耳。至于往还书问，不可不系日，而性率者，一切不书。予有婿生子，遣报云：“今日已时得一子。”更不知为何日。或又失之好奇。外姻孙鼎臣，每致书，必题其后曰：“某节”，至云“小暑前一日”、“惊蛰前两日”之类。文惠公常笑云：“看孙鼎臣书，须著置历日于案上。”盖自元正、人日、三元、上巳、中秋、端午、七夕、重九、除夕外，虽寒食、冬至，亦当谨识之，况于小小气候？后生宜戒。

【译文】 写文字东西题写时间，应当按实际时间写，如果死板地一定要写节序，则就是牵强了，就像福建麻沙镇的书坊印的书里面桃源居士一类人所写的跋文那样滑稽。至于书信往来，不可不题写时间，而性格粗率的人，完全不写。我有个女婿生了儿子，派人送信来说：“今日已时得了一个儿子。”却不知“今日”是哪一天。有时又不适当地喜欢令人惊奇。我夫人那边的亲戚孙鼎臣，每次写信，必定在后面题写：“某节”，甚至写“小暑前一日”、“惊蛰前两日”等等。文惠公（洪迈兄洪适）常常笑他说：“看孙鼎臣的信，必须把历书放在桌子上。”除元旦、人日、上中下三元、上巳、中秋节、端午节、七夕、重九、除夕以外，即使是寒食、冬至，也不要随手乱写，何况那些小小的节气？后生们应当引以为戒。

更衣

【原文】 雅志堂后小室，名之曰“更衣”，以为姻宾憩息地。稚子数请所出，因录班史语示之。《灌夫传》：“坐乃起更衣。”颜注：“更，改也。凡久坐者皆起更衣，以其寒暖或变也。”“田延年起，至更衣。”颜注：“古者延宾必有更衣之处”，《卫皇后传》：“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

【译文】 在雅志堂的后面，有一小屋，起名叫更衣。这里是亲戚朋友会客休息的地方。孩子们几次问为什么名叫更衣，因此，我将班固在《汉书》里有

关记载抄出来给他看。《灌夫传》载：“坐着起来时更衣”。颜师古注释说：“更是改的意思。凡是坐的时间长的人，都要起来换衣服，因为气候热冷有变化。”《灌夫传》中又记：“田延年起来去更衣”。颜师古注释说：“古时候宴请宾客必须有换衣服的地方。”此外，在《卫皇后传》里也载：“皇帝起来更衣，由子夫（即卫皇后）服侍，为皇帝选择合适的衣服。”

卷十

过所

【原文】 《刑统·卫禁律》云：“不应度关而给过所，若冒名请过所而度者。”又云：“以过所与人。”又《关津疏议》：“关谓判过所之处，津直度人，不判过所。”《释名》曰：“过所，至关津以示之。”或曰：“传，传转也，转移所在，识以为信。”汉文帝十二年，“除关无用传。”张晏曰：“传，信也，若今过所也。”“两行书缙帛，分持其一，出入关，合之乃得过，谓之传也。”《魏志》，仓慈为敦煌太守，西域杂胡欲诣洛者，为封过所。《廷尉决事》曰：“广平赵礼诣洛治病，门人赍过所诣洛阳，赍礼冒名渡津，受一岁半刑。”徐铉《稽神录》：“道士张谨好符法，客游华阴，得二奴，曰德儿，归宝，谨愿可凭信。张东行，凡书囊、符法、过所、衣服皆付归宝负之，将及关，二奴忽不见，所赍之物，皆失之矣。时秦陇用兵，关禁严急，客行无验，皆见刑戮，既不敢东度，复还，主人乃见二儿，因掷过所还之。”然过所二字，读者多不晓，盖若今时公凭引据之类，故哀其事于此。

【译文】 《宋刑统·卫禁律》中规定：“不应该通过关卡而发给通行证过所，与冒名顶替请求过所而过关的人同罪。”《关津疏议》中记载：“关是管理过所的地方，津只管人通过，不管理过所。”《释名》中说：“过所，到关口、渡口时要出示。”有的人则认为：“传，就是转的意思。由一地去到另一地，就要以传作为凭据。”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曾经下令废除来往行人在关口渡口出示传的规定。张晏注释说得更为具体。他说：“传就是信物，如同现在的过所一样，在一块绢上，写两行字，然后撕开，分为两半，各持其一。进出关卡时，要进行查验，合起来相对应，方准予通过。这就是所说的传。”《三国志·魏志》中载，仓慈在敦煌任太守时，西域一些胡人想去洛阳，仓慈接受了他们的请求，发给了过所。《廷尉决事》说，广平赵礼到洛阳治病，他的门人拿着他的过所来到洛阳。此事被发现后，官府就斥责赵礼冒名渡河，判他一年半的徒刑。徐铉在所著《稽神录》中说，一个叫张谨的道士爱好符法，到华阴游历时，得到两个奴仆，一个名叫德儿，一个名叫归宝，他们谨慎朴实，可以信赖。张谨东行时，

随身携带的书籍、符法、过所、衣服等，都让归室挑着。快到关口时，德儿和归宝忽然都不见了，所带的行李物品，全部被他们拿走了。这时候，秦、陇之间，正在打仗。关禁盘查很严，凡是过关的旅客行人，如果没有携带过路凭据，都要被当作奸细杀掉。张谨没有过路凭证的过所，不敢过关东行，遂返回。后来，这两个奴仆的主人知道这两件事后，让他们把过所还给了张谨。”然而，过所两字的含义，很多人都不明白。大概和如今的公凭、引之类的凭证相似。所以，我将有关过所的材料，辑录于此。

露布

【原文】 用兵获胜，则上其功状于朝，谓之露布。今博学宏词科以为一题，虽自魏、晋以来有之，然竟不知所出，唯刘勰《文心雕龙》云：“露布者，盖露板不封，布诸观听也。”唐庄宗为晋王时，擒灭刘守光，命掌书记王缄草露布，缄不知故事，书之于布，遣人曳之，为议者所笑。然亦有所从来。魏高祖南伐，长史韩显宗与齐戎将力战，斩其裨将。高祖曰：“卿何为不作露布？”对曰：“顷闻将军王肃获贼二、三人，驴马数匹，皆为露布，私每晒之。近虽得摧丑虏，擒斩不多，脱复高曳长缣，虚张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弥甚，臣所以敛毫卷帛，解上而已。”以是而言，则用绢高悬久矣。

【译文】 出兵打仗，取得战捷，向朝廷呈报其战功，称之为露布。现在国家选拔人才举行的博学宏词科中把它作为一个题目。虽然，自魏、晋以来，就出现有露布，但是人们多不知它的来历。只有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露布是公文内容外露不密封，让人们观看传播。”后唐庄宗在作晋王时，俘虏了刘守光，命掌书记官王缄起草露布，表述其战功。王缄不知道露布的制度，就将事情的经过，写在布上，派人拉着布的两端，向众人展示。结果，遭到许多人的讥笑。然而，王缄也不是这一做法的创始人。在他之前，已有人这样做了。北魏高祖举兵南下，讨伐南齐，长史韩显宗与南齐守军展开激战，斩杀了南齐的几个裨将。北魏高祖问韩显宗道：“爱卿作战获胜，为什么不作露布展示战功呢？”韩显宗听了，回答说：“不久前听说将军王肃好作露布，每次出战，擒获贼寇二三人，驴马几匹，都作露布上报朝廷，以表其功。我每次听说后，就暗中讥笑他。而今虽然出战获胜，打击了敌人的气焰，但俘获斩杀数量不多，如果也采取那种派人高拉绢布，虚张声势，炫耀自己的战功，那么臣的罪也就更大了。臣之所以搁笔卷绢，原因也就在于此。”由此来看，用绢高悬作为露布，也已很久

了。

东坡题潭帖

【原文】 《潭州石刻法帖》十卷，盖钱希白所镌，最为善本。吾乡程钦之待制，以元符三年帅桂林，东坡自儋耳移合浦，得观其藏帖，每册各题其末。第二卷云：“唐太宗作诗至多，亦有徐、庾风气，而世不传。独于《初学记》时时见之。”第四卷云：“吴道子始见张僧繇画，曰：‘浪得名耳！’已而坐卧其下，三日不能去。庾征西初不服逸少，有家鸡野鹜之论，后乃以为伯英再生。今观其书，乃不逮子敬远甚，正可比羊欣耳。”第六卷云：“宰相安和，殷生无恙。”宰相当是简文帝，殷生则渊源也邪！”第八卷云：“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风味，故长沙法帖比淳化待诏所摹为胜，世俗不察，争访阁下本，误矣。此逸少一卷，尤妙。庚辰七夕，合浦官舍借观。”第九卷云：“谢安问献之：‘君书何如尊公？’答曰：‘故自不同’。安曰：‘外人不尔。’曰：‘人那得知！’”已上所书，今麻沙所刊《大全集志林》中或有之。案庾亮及弟翼俱为征西将军，坡所引者翼也。坡又有诗曰：“暮年却得庾安西，自厌家鸡题六纸”。盖指翼前所历官云。此帖今藏予家。

【译文】 《潭州石刻法帖》十卷，为钱希白所镌刻，是最好的善本书。我的同乡程钦之在朝做待制，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奉命到桂林任经略使，苏东坡也于这时从儋耳（今海南儋县）来到合浦（今属广东），在这里得以见到他所收藏的石刻法帖，他在每册的末尾都写有跋语。

该书卷二说：“唐太宗写了很多首诗，也颇有徐陵、庾信的气势和风度，但未能流传于世，只在《初学记》一书中，时常见到。”

卷四中说：“吴道子第一次见到张僧繇的画时说：‘空有虚名而已！’不久就为他的画所吸引，坐在画的下面，整整三天，也不愿离开。庾翼初对王羲之的书法很不服气，说他的书法不过是家鸡野鹜，并没有什么奇特之处，后来经过反复比较，改变了看法，认为他是汉代大书法家张芝（字伯英）的再生。现在仔细观察一下庾翼的书法，与王献之相比相差甚远，但与羊欣相比则不分上下。”

卷六中说，“宰相平安无事，殷生无病无灾。这里所说的宰相，应当是简文帝，殷生则是殷渊源。”

卷八中说：“钱希白的书法，自有江左的风度。所以长沙法帖比太宗淳化年间宫内待诏临摹的要好。一般人不大清楚，也不去详细辨别，争先恐后地访求

待诏摹仿的阁下本，这是一个失误。这里所辑王羲之书法一卷，全是精妙佳作。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七月七日，于合浦县官舍中借览。”

卷九中说：谢安问王献之，你的书法跟你父亲相比怎么样？王献之回答说：我们父子二人的书法，各有自己的特点。谢安听后马上说：“外人并不这样认为。”王献之接着说道：“外人哪能知道？”

以上这些，在今沙麻镇所刻《苏东坡大全集·东坡志林》一书中有辑录。按庾亮和他的弟弟庾翼都曾为征西将军。苏东坡在这里所述的庾征西是庾翼。另外，苏东坡又在诗中写道：“暮年却得庾安西，自厌家鸡题六纸。”这里所说的庾安西，是指庾翼前所任官而言的。此帖今藏在我的家中。

山公启事

【原文】 《晋书·山涛传》：“涛再居选职，十有余年，每一官缺，辄启拟数人，诏旨有所向，然后显奏，随帝意所欲为先。故帝之所用，或非举首，众情不察，以涛轻重任意。或譖之于帝，涛行之自若。一年之后，众情乃寢。涛所奏甄拔人物，各为题目，时称《山公启事》。”此语今多引用，然不得其式，法帖中乃有之，云：“侍中、尚书仆射、奉车都尉、新沓伯臣涛言，臣近启崔谅、史曜、陈准可补吏部郎，诏书可尔。此三人皆众所称，谅尤质正少华，可以崇教，虽大化未可仓卒，风尚所劝，为益者多，臣以为宜先用谅。谨随事以闻。”观此一帖，可以概见。然所启三人，后亦无闻，既云皆众所称，当不碌碌也。旧《潭帖》为识者称许，以为贤于他本，然于此奏“未可仓卒”之下，乃云“风笔恻然”，全无意义。今所录者，临江本也。

【译文】 《晋书·山涛传》记载：“山涛二度担任安排官员职务的职务，共十几年，每一次出现官缺，便拟定数人写非正式奏章给皇帝，皇帝表示了意向，然后公开正式上奏，把皇帝中意的人放在前面。所以皇帝选定任用的人，有时并不是山涛首先推荐的，众人不了解情况，认为山涛评价人才。随心所欲。有人在皇帝跟前指责他，山涛仍旧这样做如同不知道。一年以后，众人的批评才平息消失。山涛上奏选拔人才，分别被加上题目编成一书，当时称作《山公启事》（“启事”指奏章）》。山公启事这个成语今天引用很多，然而不知道它的形式，字帖当中却有，上面写：“侍中、尚书仆射、奉军都尉、新沓伯、臣子山涛说：我最近上奏报告崔谅、史曜、陈准可以任命为吏部郎补充官缺，诏书批准。这三个人都是公众所称赞，崔谅尤其质朴端正年少有才华，可以弘扬教化，虽

然伟大的教化不可能短时间实现，提倡什么风尚，关系很重大，我认为应当先任用崔谅。谨把这些情况禀报。”看这份字帖，可以知道山涛奏章的大概。然而所上奏的三个人，后来也默默无闻，既然讲公众所称赞的，应当不是碌碌无为的。过去《潭帖》被有见识的人称赞，认为优于别的版本，然而在此奏“未可仓卒（不可能短时间实现）”的后面，却是“风笔恻然”四个字，完全没法解释。前文引录的，是临江的版本。

亲王回庶官书

【原文】 《随笔》中载亲王与侍从往还礼数，又得钱丕《行年杂纪》云：“升王受恩命，丕是时为将作少监，亦投贺状，王降回书签子启头。继为皇太子，三司判官并通榜子，诣内东门参贺。通入后，中贵出传令旨传语。及受册宝讫，百官班贺，又赴东宫贺，宰相亲王阶下班定，太子降阶，宰相前拜，致词讫，又拜。太子皆答拜，亦致词叙谢。”一时之仪如此。

【译文】 关于宋代亲王与侍从交往的礼仪，我在《容斋随笔》中立有专目记述。又见钱丕《行年杂记》中记述：“太宗第六子赵受益受封为升王时，丕为将作监少监，亦进呈贺状表示祝贺，升王回书答谢时，将回书装在封带里，封带外面贴有一个长纸条。后来，升王受封为皇太子时，三司判官一起先用榜子（公文的一种）进行通报，通过皇宫内东门传递表示祝贺。通报进入后，宫中宦官出来传达皇太子的命令。举行接受册宝仪式完毕，文武百官列班恭贺，接着又到东宫祝贺，宰相及各个亲王在台阶下按照品级，排定班次，皇太子走下台阶，宰相上前向太子拜贺，并致贺词，致词完毕之后，再拜。皇太子俱都一一答谢，亦致词表示谢意。”宋代开国之后，亲王回谢一般官员的礼仪，在一个时期内是这样的。

责降考试官

【原文】 天禧二年九月，敕差屯田员外郎判度支计院任布、著作郎直史馆徐奭、太子中允直集贤院麻温其，并充开封府发解官。十月，差兵部员外郎直集贤院杨侃、太子中允直集贤院丁度，并国子监发解官。十一月，解一百四人，解元郭稹。十六日，宣翰林学士钱惟演、盛度，枢密直学士王晦叔，龙图阁待

制李虚己、李行简，覆考开封举人，为落解举人有讼不平者。及奏名，郭稹依旧，其余覆落，并却考上人数甚多。十二月，发解官并降差遣，任布邓州，徐奭洪州，杨侃江州，丁度齐州，并监税。此事见于钱丕《杂记》。用五侍从覆考解试，前后未之有也。

【译文】 天禧二年（1018年）九月，朝廷下敕令指派屯田员外郎判度支计院任布、著作郎直史馆徐奭、太子中允直集贤院麻温其，一起充当开封府科举考试的发解官。十月，指派兵部员外郎直集贤院杨侃、太子中允直集贤院丁度，一起担任国子监科举考试的发解官。十一月，录取一百零四人，解元是郭稹。十六日，朝廷命令翰林学士钱惟演、盛度，枢密直学士王晦叔，龙图阁待制李虚己、李行简，重新考试开封府举人，因为落选的举人有控诉考试结果不公平的。等到向朝廷申报第二次考试录取名次，郭稹仍旧是解元，其余原先被录取的却都落选了，而且原先落选这次被录取的人很多。十二月，原发解官都被降低职务，任布到邓州，徐奭到洪州，杨侃到江州，丁度到齐州，都是担任监税。这件事钱丕的《杂记》中有记载。任用五名侍从大臣重新进行路一级的解试，这以前和这以后都没有过。

青莲居士

【原文】 李太白《赠玉泉仙人掌茶诗序》云：“荆州玉泉寺近清溪诸山，往往有乳窟。其水边处处有茗草罗生，枝叶如碧玉，唯玉泉真公常采而饮之。余游金陵，见宗僧中孚，示予茶数十片，其状如手，名为“仙人掌茶”，盖新出乎玉泉之山，旷古未覩，因持以见遗，兼赠诗，要予答之，遂有此作。后之高僧大隐，知仙人掌茶发乎中孚禅子及青莲居士李白也。”太白之称，但有“谪仙人”尔，“青莲居士”，独于此见之，文人未尝引用。而仙人掌茶，今池州九华山中亦颇有之，其状略如蕨拳也。

【译文】 唐代诗人李白在《赠玉泉仙人掌茶诗序》中说：“在荆州玉泉寺附近，有清溪诸山并峙，山间有石钟乳丛生的洞穴。在泉水经过的地方，到处长满着名叫茗草的茶草。茗草的枝叶如同碧玉，似乎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只有玉泉寺的真公常常采摘作为茶叶饮用。有一次游历，我来到金陵（今江苏南京），与僧人中孚相见，他拿出一种茶叶数十片给我看，叶片的形状很像人的手掌，所以就把它叫作仙人掌茶。这是才从荆州玉泉山采集而来的，自古以来，从未有人见到过。因此，特意拿出来赠送给我，并且赠诗一首，要我作诗酬答。我

便写下了这首诗。后来的高僧及著名的隐士，都知道仙人掌茶起源于中孚禅子及青莲居士李白。”作为李白名号的太白称号，只有“谪仙人”、“青莲居士”的称号，仅仅在这里见到，还没有见人引用。而仙人掌茶，在现在池州（今安徽贵池）九华山中亦有出产，它的形状与才长出来的拳菜差不多，很像小孩子的手掌。

闽俗诡秘杀人

【原文】 奸凶之民，恃富逞力，处心积虑，果于杀人。然揆之以法，盖有敕律所不曾登载。善治恶者，当原情定罪，必致其诛可也。闽中习俗尤甚，每执缚其仇，穷肆残虐。或以酒调锯屑逼之使饮，欲其黏著肺腑，不能传化，驯致痰渴之疾。或炒沙熔蜡灌注耳中，令其聋聩。或以湿荐束体，布裹卵石痛加殴捶，而外无痕伤。或按擦肩背，使皮肤宽皱，乃施针刺入肩井，不可复出。或以小钓钩藏于鳅鱼之腹，强使吞之，攻钻五脏，久而必死。凡此术者，类非一端，既痕肿不露于外，检验不得而见情犯，巨蠹功意两恶而法所不言。颜度鲁子为转运使，尝揭榜禁约。予守建宁，亦穷治一两事，吴、楚间士大夫宦游于彼者，不可不察也。

【译文】 那些阴险凶残的奸凶，依仗有权有势，想法设法，残害人命，然而，在按照法律治他们罪时，却往往找不出有关的法律条文。而那些善于惩治奸恶的人，应当依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定罪，这样就使他们无法逃脱严厉的惩罚。

关于诡秘杀人的案件，在闽中地区，多有发生，十分严重。他们目无法国法，每每捉到仇人，就极尽其迫害虐待之能事。有的将锯末放入酒中，威逼仇人喝下去，致使肺腑粘连，呼吸受阻，造成痰渴的疾病。有的把砂子炒热，融化到石蜡中，然后灌进仇人的耳朵里，使他丧失听力，成为聋子。有的用湿布敷在仇人身上，用布包卵石痛加捶打，造成内伤，在外面看不到伤痕。有的按肩擦背，使仇人的皮肤放松，然后把铁针刺入肩井，不再拔出。有的用小钓鱼钩暗藏于鱼腹之中，强迫仇人吞下，以便让鱼勾在他的腹内移动穿破五脏六腑，这样时间已长，其人必死无疑。凡此等等。杀人手段凶狠阴毒，多种多样。作案之后，由于外面不露伤痕，检验查证时不容易弄清受伤人的伤情及取得罪犯作案的真凭确据。如何有效地惩治这种诡秘杀人的凶犯，在我朝的法律条文中却找不到明确的规定。颜度字鲁子在任转运使时，曾经发布告示，严禁此类凶杀案件的发生。我在建宁（今福建建瓯）做知州时，也曾经追查过一二起这类案

件。而后，吴、楚一带的士大夫们，如果有人到这里做官，不可不留心查处此类凶杀案件。

富公迁官

【原文】 富韩公庆历二年以右正言知制诰报聘契丹，还，除吏部郎中、枢密直学士，不受。寻除翰林学士，又不受。三年，除右谏议大夫、枢密副使，力辞。乃改资政殿学士，而谏议如初，公受之。又五月，复为副枢。盖昔时除目才下，即时命词给告，及其改命，但不拜执政，而犹得所进官。用今日官制言之，是承议郎（旧为正言）、中书舍人（旧知制诰），而为太中大夫（旧为谏议）、资政殿学士也。

【译文】 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富弼以右正言、知制诰的官衔，作为宋朝的使臣，回访契丹国。回访结束后，返回宋朝京城，授予他吏部郎中、枢密直学士，他辞去了。不久，授予他翰林学士，他又辞去了。庆历三年（1043年），授予他右谏议大夫、枢密副使，他又坚持辞去，于是，改任他为资政殿学士，官阶仍旧为谏议大夫。富弼接受了这一任命。五个月之后，又任命他为枢密副使。依据过去宋朝官制规定，任免官员名单下达之后，凡是官职变动，都要及时发给朝廷签发关于官职升降变动的诰词。如有新的任命，只要不是升为执政，原来所加的官职仍可予以保留。就现行官制来说，富弼的官职晋升的顺序，乃是由承议郎（旧时称正言）、中书舍人（旧时称知制诰）升为太中大夫（旧时称谏议）、资政殿学士的。

唐藩镇行墨敕

【原文】 池州铜陵县孚贶侯庙，有唐中和二年二月一碑，其词云：“敕宣、歙、池等州都团练、观察使牒。当道先准诏旨，许行墨敕授管内诸州有功刺史、大将等，宪官具件如后；晋朝故晋阳太守兼扬州长史张宽牒。奉处分，当道先准诏旨，许行墨敕，奖劝功勋，虽幽显不同，而褒升一致。神久标奇绝，早揖英风，灵揖屡彰，神逵不昧。夫宠赠之典，非列藩宜为，神功既昭，乃军都请，是行权制，用副人心。谨议褒赠游击将军宣州都督。”后云：“使、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裴押。”邑人以为裴休，《秋浦志》亦然，予考之，非也。张

魏公宣抚川、陕，便宜封爵诸神，实本诸此。

【译文】 在池州（今安徽贵池）铜陵县的孚祝侯庙内，有唐僖宗中和二年（882年）二月所立的一块石碑。碑文中记载：“敕给宣州（今属安徽），歙州（今安徽歙县）、池州等州都团练使、观察使的公文，本道得到朝廷的批准，允许本道代表朝廷颁发不加盖玺的敕令，授给本司管辖区域内的有功刺史、大将等人，御史台官拟定的敕令内容如下：给晋朝故晋阳太守兼扬州长史张宽的公文。现奉本道长官决定，本道以前得到朝廷批准，允许朝廷颁发不加盖国玺的敕令。奖赏有功之臣。功勋虽然有明显与不明显的区别，但是褒奖提升是一致的。久闻你奇特卓异，气质风度早为人们所敬重，丰功伟业屡次受到表彰，已为天下人所共知。封赠本系朝廷之大典，不是地方藩镇能够主持执行的。你功勋卓著，又有部下的奏请，因此运用朝廷所给予的临时处置的权力，以副众人之所望。谨决定赠你为游击将军、宣州都督。”最后署名为“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裴押。”当地人以为裴指裴休，《秋浦志》里亦是这样记述的。据我的核查考证，不是这样。张魏公在任四川、陕西地区宣抚使时，凭借朝廷给予的临时权力给诸神封爵，也是根据这一规定。

吏部循资格

【原文】 唐开元十八年四月，以侍中裴光庭兼吏部尚书。先是，选司注官，惟视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迁，或老于下位，有出身二十余年不得禄者。又州县亦无等级，或自大入小，或初近后远，皆无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资格》，各以罢官若干选而集，官高者选少，卑者选多，无问能否，选满则注，限年躋级，毋得逾越，非负遣者皆有升无降。其庸愚沉滞者皆喜，谓之《圣书》，而材俊之士，无不怨叹，宋睥争之，不能得。二十一年，光庭薨，博士孙琬议光庭用《循资格》，失劝奖之道，请谥曰“克”。是年六月制，自今选人有才业操行，委吏部临时擢用。虽有此制，而有司以《循资格》便于己，犹踵行之。盖今日吏部四选，乃其法也。予案元魏肃宗神龟二年，官员既少，应选者多，尚书李韶铨注不行，大致怨嗟。崔亮代之，奏为格制，不问士之贤愚，专以停解月日为断，沉滞者皆称其能。亮甥刘景安与书曰：“商、周以乡塾贡士，两汉由州郡荐材，魏、晋中正，虽未尽美，应什收六七。而朝廷贡材，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论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材行，空辨姓氏。舅属当铨衡，宜须改张易调，反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谁复修厉名行哉？”洛阳令薛稷

上书言：“黎元命系长吏，若选曹惟取年劳，不简能否，义均行雁，次若贯鱼，执簿呼名，一人足矣，数人而用，何谓铨衡？乞令王公贵人荐贤以补郡县。”诏公卿议之。其后甄琛等继亮，利其便己，踵而行之。魏之选举失人，自亮始也。至孝静帝元象二年，以高澄摄吏部尚书，始改亮年劳之制，铨擢贤能，当是自此一变。光庭又祖亮故智云。然后人罕有谈亮、澄事者。

【译文】 唐朝开元十八年（730年）四月，让侍中裴光庭兼任吏部尚书。这以前，吏部安排官员职务，只看本人是否有才能，有的破格越级提升，有的到老还担任下级官职，有的科举或通过其他途径得到官阶后二十多年因没有职务而得不到俸禄。另外州县也没有等级，有的从大州刺史大县县令调任小州刺史小县县令，有的从离都城近的地方调到离都城远的地方，都没有固定的制度。裴光庭上奏得到批准开始使用“循资格”，各个官员都以上次任职结束后参加过的选官次数为准到吏部登记，官阶高的参加选官的次数少，官阶低的参加选官的次数多，不管是否有才能，达到规定的参加选官次数的就安排职务，按作官年限晋级，不许超越，除了犯罪受处分的都有升无降。裴光庭去世，博士孙琬批评裴光庭使用“循资格”，违背了鼓励奖赏有能力、肯干官员的原则，请求用“克”字作为裴光庭的谥号。此年六月朝廷下制令，规定从今以后候选官员有才能政绩和操行的，委托吏部临时根据情况提拔使用。虽然有这个规定，而有关官员认为“循资格”对自己有利，仍然继续沿用。大概现今吏部四选安排官员，仍是用这个办法。我考查北魏肃宗神龟二年（519年），官职既然缺少，要求安排职务的人多，尚书李韶安排不开，引起很多埋怨不满。崔亮代替了他的职务，拟定制度和标准上奏，不问官员的品德才能好坏，只根据失去职务的时间长短为基准。长期不受重用的人都称赞他的办法好。崔亮的外甥刘景安写信给他：“商代、周代靠乡塾推荐士人，两汉从州郡举荐人材，魏、晋实行九品中正制，虽然不是尽善尽美，想必也得到了人材的十分之六七。而朝廷选拔人材，只要求外表，不重视实质，选拔‘孝廉’只讲读经书写文章，不讲究治国方略，实行中正制不考察被举荐者的能力品行，空泛地追究他们的家族。舅舅您担任了选择安排人材的官职，应当改旧图新，反而拟定了‘停年格’以限制有用人材的提拔，天下的士人，谁还再讲究名节操行呢？”洛阳令薛 上书说：“百姓的命运都掌握在长官手里，如果吏部只按照年月资历，不考察是否有能力，像大雁那样把官员彼此没有差异的一列，把官员像用草串鱼那样硬排列次序，拿着花名册来叫名字，一个人就足够了，现在国家安排你们好几个人做这件事，这样做怎么能说是选拔评定人材？请求命令官爵高贵的人举荐贤人用来补充州县官员。”朝廷下诏命令大臣们讨论此事。后来甄琛等接替崔亮的职务，认为‘停

年格’对自己有利，效法崔亮实行。北魏国选拔举荐人材失当，是从崔亮开始的。到了孝静帝元象二年（539年），任用高澄代理吏部尚书，才开始改变崔亮按年月安排职务的制度，吏部选拔贤明有才能的人，大约从此发生一次大的变化。裴光庭又效法了崔亮的作法。然而后代人很少有人谈到崔亮、高澄的事的。

五行纳音

【原文】 六十甲子纳音之说，术家多不能晓。原其所以得名，皆从五音所生，有条不紊，端如贯珠。盖甲子为首，而五音始于宫，宫土生金，故甲子为金，而乙丑以阴从阳。商金生水，故丙子为水，而丁丑从之。角木生火，故戊子为火。徵火生土，故庚子为土。羽水生木，故壬子为木。而已丑、辛丑、癸丑各从之。至于甲寅，则纳音起于商，商金生水，故甲寅为水。角木生火，故丙寅为火。徵火生土，故戊寅为土。羽水生木，故庚寅为木。宫土生金，故壬寅为金。而五卯各从之。至甲辰，则纳音起于角，角木生火，故甲辰为火。徵火生土，故丙辰为土。羽水生木，故戊辰为木。宫土生金，故庚辰为金。商金生水，故壬辰为水。而五巳各从之。宫、商、角既然，惟徵、羽不得居首。于是甲午复如甲子，甲申如甲寅，甲戌如甲辰，而五未、五酉、五亥、亦各从其类。

【译文】 六十甲子“纳音”的说法，学道术的人大多不能通晓。追寻“纳音”得名的原因，都是从五音衍生出来的，有条不紊，简直就像用线串珠子。大抵甲子作开头，而五音从宫开始，宫对应的土能生金，所以甲子就是金，而乙丑属阴随甲子这属阳的也为金。商对应的金能生水，所以丙子就是水，而丁丑像乙丑随甲子一样也随丙子为水。角对应的木能生火，所以戊子是火。徵对应的火能生土，所以庚子是土。羽对应的水能生木，所以壬子是木。而已丑、辛丑、癸丑分别随戊子、庚子、壬子而定。至于说甲寅，则纳音从商开始，商对应的金能生水，所以甲寅是水。角对应的木能生火，所以丙寅是火。徵对应的火能生土，所以戊寅是土。羽对应的水能生木，所以庚寅是木。宫对应的土能生金，所以壬寅是金。而乙卯、丁卯、己卯、辛卯、癸卯分别随甲寅、丙寅、戊寅、庚寅、壬寅而定。到甲辰，则纳音从角开始，角对应的木能生火，所以甲辰为火。徵对应的火能生土，所以丙辰是土。羽对应的水能生木，所以戊辰是水。宫对应的土能生金，所以庚辰是金。商对应的金能生水，所以壬辰是水。而乙巳、丁巳、己巳、辛巳、癸巳分别随上述五者而定。宫、商、角既然都作过

开头，只有徵、羽没能作开头。于是甲午又与甲子一样，甲申又与甲寅一样，甲戌又与甲辰一样，而五种带“未”字的、五种带“酉”字的、五种带“亥”字的干支，也分别随它们对应的阳性干支而确定五行属性。

五行化真

【原文】 五行运化，如甲、乙化真土之类，若推求其义，无从可得，盖祇以五虎元所生命之。如“甲、己之年丙作首”，谓丙寅月建也，丙属火，火生土，故甲、己化真土。“乙、庚之岁戊为头”，谓戊寅月建也，戊属土，土生金，故乙、庚化真金。”“丙、辛寄向庚寅去”，庚属金，金生水、故丙、辛化真水。“丁、壬壬位顺行流”，壬属水，水生木，故丁、壬化真木。“戊、癸但向甲寅求”，甲属木，木生火，故戊、癸化真火。此二说皆得之莆田郑景实。顷在馆中，见魏几道谈五行纳音，亦然。

【译文】 金、木、水、火、土五行的运行变化使万物不断产生、发展和变化。如甲、己化真土等等，即是如此。如果认真推求，问为什么甲、己可以化真土，则无从查考，难以说清。这大概是由于五虎元相生理论的缘故。古时候，人们用干支纪时，十二地支纪月，叫月建。也有用十天纪月的。民间歌诀说，甲、己之年，丙为首，就是说凡是年干为甲、己的年份，正月初一，是庚寅日。丙属火，火生土，所以说甲、己之年可以化真土。乙、庚之年，正月初一，是戊寅日。戊属土，土生金，所以乙、庚之年可以化真金。丙、辛之年正月初一，是庚寅日，庚属金，金属水，所以丙、辛之年可以化真水。丁、壬之年，正月初一，是壬寅日、壬属水，水生木，所以丁、壬之年可以化真木。戊、癸之年，正月初一，是甲寅日，甲属木，木生火，所以戊、癸之年可以化真火。

以上这两种说法，都是从福建莆田人郑景实那里得到的。近来我在馆中供事，见到魏几道，听他谈五行纳音，也是这样说的。

钱忠懿判语

【原文】 王顺伯家有钱忠懿一判语，其状云：“臣赞宁，右臣伏奉宣旨撰文疏，今进呈，乞给下，取设斋日五更前上塔，臣自宣却欲重建，乞于仁政殿前夜间化却，不然便向塔前化，并取圣旨。判曰：便要吾人宣读后，于真身塔

前焚化。二十七日。”而在前花押。予谓钱氏固尝三改元，但或言其称帝，则否也。此状内“进呈”、“圣旨”等语，盖类西河之人疑子夏于夫子，故自貽僭帝之议，想它所施行皆然矣。

【译文】 王顺伯家中收藏有钱忠懿一则判语。其中说：“臣赞宁，右臣奉皇上旨意撰写疏文，现在进呈，请求发下，定于设斋这天五更前上塔。臣自己宣布打算重建新塔，请求在仁政殿前夜间将文稿火化，否则，就去塔前火化。究竟在何处，均由圣旨裁决。判语说：这是要我等宣读圣旨之后，在真身塔前火化。二十二日”。并且在状文前有签名花押。我曾说五代十国时期，吴越钱鏐虽然三次改元，采用过三个年号，有人说他已经称帝，是不对的。今观此状内有“进呈”、“圣旨”等语，这大概是比照西河的人怀疑子夏即是孔夫子，从而自貽为僭位称帝的议论，想来他的别的举措也是如此。

王逸少为艺所累

【原文】 王逸少在东晋时，盖温太真、蔡谟、谢安石一等人也，直以抗怀物外，不为人役，故功名成就，无一可言，而其操履识见，议论闳卓，当世亦少其比。公卿爱其才器，频召不就。殷渊源辅政，劝使应命，遗之书曰：“足下出处，正与隆替对，岂可以一世之存亡，必从足下从容之适？”逸少报曰：“吾素自无廊庙，王丞相欲内吾，誓不许之，手迹犹存，由来尚矣，不于足下参政而方进退。自儿娶女嫁，便怀尚子平之志，数与亲知言之，非一日也。”及殷侯将北伐，以为必败，贻书止之。殷败后，复图再举，又遗书曰：“以区区江左，所营综如此，天下寒心久矣。自寇乱以来，处内外之任者，疲竭根本，各从所志，意无一功可论，一事可纪。任其事者，岂得辞四海之责哉！若犹以前事为未工，故复求之于分外，宇宙虽广，何所自容！”又与会稽王笺曰：“今虽有可欣之会，内求诸己，而所忧乃重于所欣，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愿令诸军皆还保淮，须根立势举，谋之未晚。”其识虑精深，如是其至，恨不见于用耳。而为书名所盖，后世但以翰墨称之。《晋书》本赞，标为唐太宗御撰，专颂其研精篆素，尽善尽美，至有“心慕手追”之语，略无一词论其平生，则一艺之工，为累大矣。献之立志，亦似其父。谢安欲使题太极殿榜，以为万代宝，而难言之，试及韦仲将凌云榜事，即正色曰：“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长。”遂不之逼。观此一节，可以知其为人，而亦以书名之故，没其盛德。二王尚尔，况于他人乎！

【译文】 王羲之字逸少，在东晋时，与温峤字太真、蔡谟、谢安字安石同为一个等次的人。由于不爱钱财，不愿为他人谄媚所用，所以在功名成就上，没有值得一提的。但是，他的品德高尚，识见超群，议论宏博精当，则是同时代人很少有能与他相比的。朝中大臣听说他很有才器，屡次派人请他出来做官，他都谢绝了。殷渊源任宰相，执掌政事，也劝他出来做官，在给王羲之的信中说：“足下是出山还是隐居，应与国家的兴衰相应，岂可以国家的存亡，来适合足下您的愿望呢？”王羲之收到殷渊源的来信之后，立即给他写了回信。信中写道：“我素来没有想在朝廷作官的愿望，王丞相想接纳我，我发誓不去，亲笔写的文件还在，这种想法由来很久了，不是因为足下您主持国政才有这种想法的。自从儿子娶妻女儿出嫁，我便有了效法东汉尚子平（尚长）的归隐想法，多次与亲戚朋友讲过，已不是一天二天了。”等到殷浩准备北伐，王逸少认为必定失败，写信阻止他。殷浩北伐失败后，还谋划再次北伐，王逸少又写信说：“以衰弱的江东，发生的事情这样多，天下人寒心很久了。自从动乱以来，担任负责国政或指挥军队职务的人，使国家的根基空虚，各自按自己的想法采取措施，最后没有一点成效可讲，没有一件事值得记录。担负责任的人，难道可以逃避天下人的指责吗！如果还认为以前的事做得不周全，所以还力图谋求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东西，宇宙虽然广大，哪里有他们自己的容身地方！”又给会稽王写信说：“现在虽然有可以高兴的情况，静心细想，则可忧虑的情况又多于可高兴的情况。以有限的吴越地区，去供应和谋取天下十分之九的地区，不亡国等什么！我希望命令诸军都退回保卫淮河，等到根基稳固形势有利，再谋划北伐也不晚。”他的见识思虑的精深，达到这种程度，遗憾的是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用。但他的这些事迹被他善于书法的名声掩盖，后代人只从擅长书法方面称赞他。《晋书·王羲之传》的赞语，标明是唐太宗亲自撰写的，专门称赞他精通书法，尽善尽美，以致有“心慕手追”的话，竟没有一句话评论他的生平，可见精通一种技艺，造成的拖累太大了。王献之树立的志向，也和他父亲相似。谢安想让他为太极殿写匾榜，作为永久的珍宝，而难于开口，用三国时的人韦仲将（韦诞）题写凌云榜的事试探他的口气，王献之严肃地说：“假如韦仲将真的这样，正是魏国寿命不长的原因。”谢安便不逼他写了。看这一件事，就可以知道王献之的为人，而也因为书法有名的缘故，使得他的其他事迹失传。王羲之，王献之尚且这样，何况别的人呢！

鄂州南楼磨崖

【原文】 庆元元年，鄂州修南楼，剥土有大石露于外，奇崛可观。郡守吴琚见而爱之，命洗剔出圭角，即而谛视，乃磨崖二碑。其一刻两字，上曰“柳”，径二尺四寸，笔势清劲，下若翻书“天”字，唯存人脚，不可复辨，或以为符，或以为花押，邦人至裱饰置神堂，香火供奉。或云道州学侧虞帝庙内亦有之，云柳君名应辰，是唐末五代时湖北人也。其一高丈一尺，阔如其高而加五寸，刻大字八十五，凡为九行，其文曰：“乾正元年，荆襄寇乱，大吴将军出陈武昌，诏太守杨公出镇。”后云：“荆、江、京、汉推忠、辅国、侍卫将军吴居中记。”案杨行密之子溥嗣吴王位，是岁，唐明宗天成二年，溥以十一月僭帝，改元乾贞，宋莒公《纪年通谱》书为“乾正”，云避仁宗嫌名，《通鉴》亦同。而此直以为“乾正”，一时所立，不应有误也。

【译文】 宁宗庆元元年（1195年），鄂州（今湖北武汉）城南修建城楼。破土动工后，发现有一块巨石露出，形状奇特，巍峨壮观。郡守吴琚得知后，前去查看，见到露出地面的石块，形状特殊，非常有兴趣。他让人继续挖掘冲洗露出的圭角，即而仔细审视，才知道这是摩崖石刻两块。其中一块，上面刻有两个大字，上下排列。在上部的是柳字，直径长二尺四寸，笔势清秀有力。在下部的字已残，好象是个倒写的天字，只存人脚，究竟是什么字，已经无法辨认了。对此，人们有种种揣测，有的说是刻有篆书的符（凭证），有的说这是用草书签名的花押。当地人甚至将它整饰一新，放进神庙殿堂，让人供奉，四时香火不绝。听说道州（今湖南道县）州学旁边虞帝庙亦有一块这样的石碑，碑上说柳君名叫应辰，是唐末五代时湖北人。

另一块石刻，高一丈一尺，宽一丈一尺五寸，上面镌刻大字八十五个，共九行。碑文说：“乾正元年，荆州、襄州（今湖北襄樊）地方寇盗作乱，吴国将军已出兵武昌，同时急令太守杨公统兵出战，严加防范。”碑文末尾署作：“荆州、江州（今江西九江）、京、汉（今四川广汉）推忠、辅国、侍卫将军吴居中记。”按杨行密的儿子杨溥是在杨行密死后当即继承吴王位的。这一年，是唐明宗天成二年（927年）。杨溥于这一年十一月宣布称帝，改年号为乾贞。宋莒公祁在《纪年通谱》中，书作乾正，说这是为避宋仁宗赵祯的名讳，将乾贞改为乾正。《资治通鉴》里亦持此说。而此碑上面直书以乾正。该碑为当时人所立，所书年号，不应有误。

赏鱼袋出处

【原文】 《随笔》书衡山《唐碑》别驾赏鱼袋，云“名不可晓”，今按《唐职林·鱼带门》叙金玉银铁带，及金银鱼袋云：“开元敕，非灼然有战功者，余不得辄赏鱼袋。”斯明文也。

【译文】 我在《容斋随笔》中记述衡山唐代《南岳真君碑》内有别驾赏鱼袋时曾说：“赏鱼袋的说法，不知是什么意思”，他处亦未见有记载。今见《唐职林·鱼袋门》记述金带玉带银带铁带及金鱼带银鱼袋事说：“唐玄宗开元间敕令，赏鱼袋只赏给有显著战功的人，除此之外，其他人一律不许赏鱼袋。”为什么名叫赏鱼袋，这里说得十分清楚。

卷十一

京丞相转官

【原文】 庆元二年朝廷奉上三宫徽称册宝，继又进敕令、玉牒、实录，大臣迁秩，于再于三，盖自崇宁至于绍熙，未之有也。于是京右丞相以十月受册宝赏，由正议转宣奉。十二月用敕局赏，当得两官，以一回授、一转光禄。三年二月，用提举玉牒实录院及礼仪使赏，有旨三项各转两官，辞之至四五。诏减为四官，其半回授，其二遂转金紫。四月之间，陟五华资，仍回授三帙。在法宰执转官与除拜同，故得给使恩。百二十年而入流者二十有四。迈记淳熙十四年，王左相进玉牒，并充国史礼仪使；梁右相进《四朝史传》、《国朝会要》，并充玉牒礼仪使。诏各与转两官。所谓各者，指二相也。时梁公误认为三者各两官，已系特进，谓如此则序进太师矣，中批只共为两官，复辞之，诏许回授，又辞，但令加恩，亦辞。适已罢相在经筵，乞于分毫不受，唯王公独加恩。今日之事全相类，而又已有去冬二赏矣。有司不谙练故实，径准昔年中旨行出，闻京公殊不自安，然无说可免，惜乎东阁贤宾客不告以十年内亲的故事，以成其美。迈顷居翰苑，答王、梁诸诏，尝上章开析论列，是以窃识其详。

【译文】 宁宗庆元二年（1196年）的一天，宁宗临朝，向高宗皇后、孝宗皇后、光宗皇后进献加给尊号的宝册。接着，有关官员向朝廷进呈的敕令，编定的玉牒、实录及大臣升职变动等，接连不断。这是宋代从徽宗崇宁到光宗绍熙八十多年来，不曾有过的事。就是在这十年的十月，右丞相京镗得到了朝廷颁布的册宝赏赐。由正四品正议大夫晋升为宣奉大夫。十二月，又因为敕局进献敕令汇编而得到赏赐，应晋升二级官，他把一级转授亲属，一级自己晋升为光禄大夫。庆元三年（1197年）二月，又一次得到提举玉牒实录院及礼仪使的赏赐。这时候，朝廷降旨凡是这三项的赏赐，一律各晋升二级官。京右丞相接连推辞了四、五次，都不接受。后来朝廷降旨提升他四级，他把二级转授给亲属，二级官自己晋升为正三品的金紫光禄大夫。四个月时间内，官升五级，仍转授三级官给亲属。本朝法律上规定，宰相晋升与新被任命的宰相升官相同，所以能够得到朝廷的恩赏。一百二十年来，像他这样情况的人总共有二十四人。

我曾记得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左相王淮进献玉牒，命他充任国史礼仪使。右相梁克家进献《四朝史传》、《国朝会要》、命他充任玉牒礼仪使，并且特意下诏“各与转两官”，所谓各者，就是指王左相、梁右相二人，不包括其他人。当时，梁右相没有细心领会诏书的意思，认为是三者各升二级官，已属于特进，照此按照官员晋升顺序的规定，就可以直接进为太师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朝廷批示总共只能升二级官。梁右相再次辞去。朝廷下诏改作转授给亲属，他又辞去，只令加恩给予高于本职的虚衔，他亦再次辞去。这时候，梁克家已经被免去宰相的职务，在经筵定期为皇上讲解经史，终究什么赏赐都没有接受。唯独左相王淮得到了朝廷加恩的赐予。今日的情况全都与此相似，而在去年冬天，已有过两次赏赐。有些官府的长官，不了解官制沿革，直接比照过去御批去办，听说京镗对这一做法很感不安，但是找不到理由制止这种做法。遗憾的是，东阁中的那些宾客贤能之士不把宫内十年来的遗事如实地告诉他，使他无法成全其美。

不久前，我在翰林院供职，见到批答左相王淮，右相梁克家的一些诏书，我曾上书分析论说，因此了解这件事的详情。

熙宁司农牟利

【原文】 熙宁、元丰中，聚敛之臣，专务以利为国，司农遂粥天下祠庙。官既得钱，听民为贾区，庙中慢侮秽践，无所不至。南京有阙伯、微子两庙，一岁所得不过七八千，张文定公判应天府，上言曰：“宋王业所基也，而以火王。阙伯封于商丘，以主大火，微子为宋始封，此二祠者独不可免乎！乞以公使库钱代其岁入。”神宗震怒，批出曰：“慢神辱国，无甚于斯！”于是天下祠庙皆得不粥。又有议前代帝王陵寝，许民请射耕垦，司农可之，唐之诸陵，因此悉见芟刈。昭陵乔木，剪伐无遗。御史中丞邓润甫言：“熙宁著令，本禁樵采，遇郊祀则敕吏致祭，德意可谓远矣。小人培克，不顾大体，使其所得不赀，犹为不可，况至为浅鲜者哉！愿绌创议之人，而一切如故。”于是未耕之地仅得免。二者可谓前古未有。一日万几，盖无由尽知之也。

【译文】 神宗熙宁、元丰年间，那些平日爱财如命的官员，聚敛钱粮不择手段。掌管国家财政的司农决定租赁全国各地的祠堂庙宇。官府为了得到一些钱，就让百姓在祠堂庙宇内设摊叫卖。祠堂庙宇中的神像及各种设施，任人侮辱践踏，而无人过问。南京（京河南商丘）有阙伯庙和微子庙，租赁之后，一

年所得不过七八千钱。张方平在任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时曾经上疏说：“南京是我朝王业根基重地，我朝是以火德为王的。阍伯是轩辕黄帝曾孙帝喾的儿子，受封到商丘，主管大火。微子是纣王庶兄，周武王灭商丘之后，被封于宋（今河南商丘）。而今就连这两个供奉阍伯和微子的祠庙，也不得幸免。恳请朝廷降旨以国家库存钱粮来代替这两个地方每年的收入。”神宗从这一奏折中得知各地祠庙遭到破坏的严重情况，十分恼火，立即批示说：“侮神辱国，莫甚于此。”自此而后，各地的祠庙一如既往，不许人们在这里设摊叫卖。

此外，又有人提出前代帝王陵园，占地甚广，请准许百姓开垦耕种，司农批准了这一建议。顿时，在前代帝王陵墓所在地的百姓纷纷起来开垦耕种。唐代帝王陵墓上的草木，被铲除一尽，昭陵上高大的树木，亦被砍伐无遗。御史中丞邓润甫得知这种情况后，就给神宗上疏说：“熙宁时的国家法令，本来是禁止在陵园地区乱砍乱伐。每遇在郊外祭祀天地的时候，都要诏令各地官吏前往致祭，朝廷的德意不能说不是深谋远虑、从长计议的。而今那些无耻小人，贪得无厌，不顾大局，即使能够获取大量钱财，尚且不可，何况收入甚微呢？希望贬斥首先提出准许垦耕前代帝王陵墓的人，恢复旧的制度。”神宗见到此奏之后，立即下令禁止。这样才使未被开垦耕种的帝王陵园得到幸免。

以上两事，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皇上日理万机，哪能什么都知道啊！

文与可乐府

【原文】 今人但能知文与可之竹石，惟东坡公称其诗骚，又表出“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之句。予常恨不见其全，比得蜀本石室先生《丹渊集》，盖其遗文也。于乐府杂咏，有《秦王卷衣》篇曰：“咸阳秦王家，宫阙明晓霞。丹文映碧镂，光采相钩加。铜离逐银猊，压屋惊蟠。洞户锁日月，其中光景賒。春风动珠箔，鸾额金窠斜。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闲弄玉指环，轻冰扼红牙。君王顾之笑，为驻七宝车。自卷金缕衣，龙鸾蔚纷葩。持以赠所爱，结欢期无涯。”其语意糅入骚入闾域。又有《王昭君》三绝句云：“绝艳生殊域，芳年入内庭。谁知金屋宠，只是信丹青。”“几岁后宫尘，今朝绝国春。君王重恩信，不欲遣他人。”“极目胡沙满，伤心汉月园。一生埋没恨，长入四条弦。”令人读之，飘飘然感慨无已也！

【译文】 现在不少人都知道文与可是一位善于画竹石的画家，而苏东坡则极力称道他的诗作。并且特意举出他的诗作中“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的

佳句。我常常责怪自己不能见到文与可的全部诗作。近来得到蜀本石室先生《丹渊集》，便是他的诗文的汇集。在该书乐府杂咏中，见有题为《秦王卷衣》的一篇。文中写道：

“咸阳秦王家，宫阙明晓霞。丹文映碧镂，光采相钩加。铜螭逐银猊，压屋惊蟠瞭。洞户锁日月，其中光景賒。春风动珠箔，鸾额金窠斜。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闲弄玉指环，轻冰扼红牙。君王顾之笑，为驻七宝车。自卷金缕衣，龙鸾蔚纷葩。持以赠所爱，结欢期无涯。”其用词立意深入文人的意境。

另外，尚有《王昭君》绝句三首。其词是：

“绝艳生殊域，芳年入内庭。谁知金屋宠，只是信丹青。”

“几岁后宫尘，今朝绝国春。君王重恩信，不欲遗他人。”

“极目胡沙满，伤心汉月园。一生埋没恨，长入四条弦。”

这些诗作，文字优雅，寓于了作者的思想感情，今人读之，仍令人感慨不已！

讥议迁史

【原文】 大儒立言著论，要当使后人无复拟议，乃为至当，如王氏《中说》谓：“陈寿有志于史，依大议而削异端，使寿不美于史，迁、固之罪也。”又曰：“史之失自迁、固始也，记繁而志寡。”王氏之意，直以寿之书过于《汉》、《史》矣，岂其然乎？《元经》续《诗》、《书》，犹有存者，不知能出迁、固之右乎？苏子由作《古史》，谓：“太史公易编年之法，为本纪、世家、列传，后世莫能易之，然其人浅近而不学，疏略而轻信，故因迁之旧，别为《古史》。”今其书固在，若能尽矫前人之失乎？指司马子长为浅近不学，贬之已甚，后之学者不敢谓然。

【译文】 大儒提出著书发议论，应当使后人不再提出异议，才是最妥当。例如王通在《中说》里讲：“陈寿立志研究历史，宏扬正论而排斥异端，使得陈寿不能因撰写史书而美名远扬，是司马迁、班固的罪过。”又说：“史学的失误从司马迁、班固开始，记述史实过繁而表述看法太少。”王通的意思，简直认为陈寿的《三国志》超过《汉书》、《史记》了，这难道正确吗？他写的《元经》是想继承《诗经》《尚书》的，还有存世的，不知是否能超过司马迁、班固？苏子由（苏辙）写《古史》，说：“太史公（司马迁）变更编年史的方法，成分纪、世家、列传，后代人没有能改变的，然而他这个人知识肤浅而不学习，粗心不

细致而轻易相信别人的话，所以在司马迁著作现在基础上，又另外写了《古史》。”现在他写的书固然还在，真的能完全矫正前人的过失吗？指责司马子长（司马迁）知识肤浅不学习，贬低得太过分，后代的学人不敢说他讲得对。

常何

【原文】 唐太宗贞观五年，以旱，诏文武官极言得失。时马周客游长安，舍于中郎将常何之家。何武人，不学，不知所言，周代之陈便宜二十余条。上怪其能，以问何。对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马周为臣具草耳。”上即召周与语，甚悦，以何为知人，赐绢三百匹。常何后亦不显，莫知其所以进。予案《李密传》，密从翟让与张须陁战，率骁勇常何等二十人为游骑，遂杀须陁，常何之名盖见于此。《唐史》亦采于刘仁轨《行年何洛记》也。

【译文】 唐太宗贞观五年（631年），由于天下大旱，诏令朝中文武百官上书陈述国家政策的利弊得失。这时候，马周游历来到了长安（今陕西西安市），住在中郎将常何家里。常何是个武将，没有读过书，在诏令下达之后，他不知说些什么为好，心中暗自着急，马周看到这种情形，就替常何起草了一篇疏文，对于时政提出了二十多条意见。这篇疏文进呈后，太宗看了，大为惊讶。他认为常何是不能够提出这样有见解的意见的，于是就命常何入见。问这篇疏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常何据实回答说：“这篇疏文不是臣起草的，臣也没有这样的能力，而是暂时住在我家的马周替臣起草的。”太宗得知其事，立即传令召见马周。通过交谈，见马周识见非凡，非常兴奋，以为常何善于知人，发现了马周这个人才，就赏给他绢三百匹。后来，常何没有什么明显的作为，亦没有被提拔。另据《唐书·李密传》记载，李密跟随翟让与隋将张须陁作战，率勇士常何等二十人为巡罗哨兵，遂将张须陁杀死。常何的名字见之于此。《唐书》中关于常何的记载，也是取自刘仁轨《行年河洛记》中的记述。

李密诗

【原文】 李密在隋大业中，从杨玄感起兵被获，以计得脱。变姓名为刘智远，教授诸生自给，郁郁不得志，哀吟泣下。《唐史》所书如此。刘仁轨《行年河洛记》专载密事，云：“密往来诸贼帅之间，说以举大计，莫肯从者，因作诗

言志，曰：金风荡初节，玉露垂晚林。此夕穷途士，郁陶伤寸心。平野葭苇合，荒村葵藿深。眺听良多感，徙倚独沾襟。沾襟何所为？怅然怀古意。秦、洛既未平，汉道将何冀？樊哙市井屠，萧何刀笔吏。一朝逢时会，千载传名溢。寄言世上雄，虚生真可愧！’诸将见诗渐敬之。”予意此篇，正其哀吟中所作也。

【译文】 李密在隋朝大业年间，跟随杨玄感起兵被捕，用计谋逃脱。改换姓名为刘智远，给学生教课养活自己，闷闷不乐很失意，悲哀地吟诗流下了眼泪。《唐书》的记载就是这样。刘仁轨写的《行车河洛记》，专门记载李密事迹，说：“李密奔波于各匪盗大帅之间，劝他们起兵成就大事业，没有听从他的，于是作诗表述自己的志向，说：‘像金风荡初节，玉露垂晚林（秋风在初秋的季节吹拂，晶莹的露水在傍晚的树林中悬挂）。此夕穷途士，郁陶伤寸心（在这个夜晚，走投无路的壮士，心情郁闷伤透了心）。平野葭苇合，荒村葵藿深（原野上长满了芦苇，荒凉的村落里蒿草长得很高很密）。眺听良多感，徙倚独沾襟（看看眼前情景听听耳边风声实在是百感交集，无可奈何地徘徊流连让眼泪沾湿衣衫）。沾襟何所为？怅然怀古意（为什么伤心落泪？是因为想到古人联想现在怅然伤心）。秦、洛既未平，汉道将何冀（咸阳、洛阳既然尚未攻克，汉朝的天下希望在哪里）？樊哙市井屠，萧何刀笔吏（樊哙原来是个市上卖肉的屠夫，萧何原本是衙门里替人抄抄写写的小吏）。一朝逢时会，千载传名溢（一旦遇上好时机，千年万代传美名）。寄言世上雄，虚生真可愧（奉劝一句世上的英雄，虚度一生真该惭愧）。’各个将帅看到这首诗逐渐对他产生了敬意。”我猜想这首诗，正是他悲哀地吟诗的时候作的。

寺监主簿

【原文】 自元丰官制行，九寺五监各置主簿专以掌钩考簿书为职，它不得预。绍圣初，韩粹彦为光禄主簿，自言今辄预寺事，非先帝意也，请如元丰诏书。从之。如玉牒修书，主簿不预，见于王定国《旧录》，予犹及见。绍兴中，太府寺公状文移，惟卿丞系衔，后来掌故之吏，昧于典章，遂一切与丞等。今百官庶府，背戾官制，非特此一事也。

【译文】 自宋神宗元丰年间实行新的官制以来，在中央所设太常寺、光禄寺、卫尉寺、宗正寺、太仆寺、大理寺、鸿胪寺、司农寺、太府寺九寺、及少作监、将作监、军器监、都水监、司天监五监机构中，各设主簿，专门负责册簿文书，其它事情一律不再参与。宋哲宗绍圣初年，韩粹彦做光禄寺主簿，他

据自己所见所闻说，现在的主簿往往参与寺中事务，这与我朝先帝的意图是不符合的。为此，请求按照元丰年间颁布的诏书行事。宋神宗采纳了他的这个建议。如掌管纂修皇族谱牒的玉牒所在纂修皇族谱牒时，主簿就没有参与，见于王定国的《闻见旧录》一书，我曾亲自看到过。宋高宗绍兴年间，太府寺与其他官府来往的状文，只签卿、丞官衔姓名，后来管理文书档案的书吏，对宋代典章制度不全部知晓，就以为吏的职责与丞相同。现在国家的文武百官，各级官府，不符合官制之事，并非仅仅是这样一件事。

温大雅兄弟名字

【原文】 《新唐书》，温大雅字彦弘，弟彦博字大临，大有字彦将，《旧史》不载彦博字，它皆同。三温，兄弟也，而两人以大为名，彦为字，一以彦为名，大为字。《宰相世系表》则云彦将字大有。而博、雅与传同，读者往往致疑。欧阳公《集古录》引《颜思鲁制》中书舍人彦将行，证《表》为是，然则惟彦博异耳，故或以为误。予少时因文惠公得欧率更所书《虞恭公志铭》，乃彦博也，其名字实然，后见《大唐创业起居注》，大雅所撰，其中云：“炀帝遣使夜至太原，温彦将宿于城西门楼上，首先见之。报兄彦弘，驰以启帝，帝方卧，闻而惊起，执彦弘手而笑。”据此，则三温之名皆从彦。而此书首题乃云大雅奉敕撰，不应于其间敢自称字。已而详考之，高宗太子弘为武后所鸩，追尊为孝敬皇帝，庙曰义宗，列于太庙，故讳其名。如弘文馆改为昭文，弘农县改为恒农，徐弘敏改为有功，韦弘机但为机，李含光本姓弘，易为李，曲阿弘氏易为洪，则大雅之名，后人追改之也。颜鲁公作《颜勤礼碑》，叙颜、温二家之盛，曰：“思鲁、大雅，愍楚、彦博、游秦、彦将。以雅为名，亦由避讳耳。钱闻诗在太学，以此为策问，而言欧阳作传，戾于闻见，彼盖不察宋子京之作云。”

【译文】 《新唐书》记载，温大雅字彦弘，弟弟温彦博字大临、温大有字彦将，《旧唐书》没有记载温彦博的字，其他都相同。他们三个人，是兄弟，而两个人的名带“大”字，字里有“彦”字，一个人名里有“彦”字，字里有“大”字。《宰相世系表》则记载温彦将字大有，而温彦博、温大雅与传记里记载相同，读《新唐书》的人往往提出疑问。欧阳修《集古录》引录《颜思鲁制》“中书舍人〔温〕彦将行”的话，证明《宰相世系表》的记载正确，这样一来只有温彦博这个名字有问题了，所以有人认为是写错了。我年轻时从文惠公（洪迈之兄洪适）那里得到欧率更（欧阳询）所书写的《虞恭公志铭》，却写的

是温彦博，他的名和字确实是这样的。后来看到《大唐创业起居注》，是温大雅写的，其中说：“隋炀帝派遣使者夜里来到太原，温彦将在太原城西门门楼上住宿，首先看到使者。报告哥哥温彦弘，飞速去报告李渊，李渊正睡觉，听到这消息吃惊地起床，拉着温彦弘的手笑了。根据这一记载，则三个人的名都带“彦”字，而这部书开头题写却作“大雅遵照敕令撰写”。既是遵照皇帝敕令写的，不应该在书中胆敢自己称呼自己的字。事后详细考察，唐高宗的太子李弘被武则天用毒药杀害，追认为孝敬皇帝，庙号为义宗，排列神主牌位在太庙，所以要避讳他的名“弘”字。例如弘文馆改为昭文馆，弘农县改为恒农县，徐弘敏改为徐有功，韦弘机去掉“弘”字只叫韦机，李含光原本姓“弘”，改为姓“李”，曲阿姓弘的改为姓洪，那么大雅的名，就是后人追改的。颜鲁公（颜真卿）撰写《颜勤礼碑》，叙述颜、温二家的兴盛，说到“颜思鲁、温大雅，颜愍楚、温彦博，颜游秦、温颜将”。用大雅作名，也是由于避讳罢了。钱闻诗在太学任职，用这件事作策问的题目，而讲是欧阳修写的传，这是知识不广博，因为他不清楚《新唐书》温大雅的传是宋子京（宋祁）写的。

册府元龟

【原文】 真宗初，命儒臣编修君臣事迹，后谓辅臣曰：“昨见《宴享门》中录唐中宗宴饮，韦庶人等预会和诗，与臣僚马上口摘含桃事，皆非礼也。已令削之。”又曰：“所编事迹，盖欲垂为典法，异端小说，咸所不取，可谓尽善。”而编修官上言：“近代臣僚自述扬历之事，如李德裕《文武两朝献替记》、李石《开成承诏录》、韩瑊《金鸾密记》之类；又有子孙追述先德叙家世，如李繁《邺侯传》、《柳氏序训》、《魏公家传》之类，或隐己之恶，或攘人之善，并多溢美，故匪信书。并僭伪诸国，各有著撰，如伪《吴录》、《孟知祥实录》之类，自矜本国，事或近诬。其上件数，并欲不取。余有《三十国春秋》、《河洛记》、《壶关录》之类，多是正史已有；《秦记》、《燕书》之类，出自伪邦；《殷芸小说》、《谈薮》之类，俱事诙谐小事；《河南志》、《志》、《平剌录》之类，多是故吏宾从述本府戎帅征伐之功，伤于烦碎；《西京杂记》、《明皇杂录》，事多语怪；《奉天录》尤是虚词。尽议采收，恐成芜秽。”并从之。及书成，赐名《册府元龟》，首尾十年，皆王钦若提总，凡一千卷，其所遗弃既多，故亦不能暴白。如《资治通鉴》则不然。以唐朝一代言之，叙王世充、李密事，用《河洛记》；魏郑公谏争，用《谏录》；李绛议奏，用《李司空论事》；睢阳事，用《张中丞

传》；淮西事，用《凉公平蔡录》；李泌事，用《邺侯家传》；李德裕太原、泽、潞、回鹘事，用《两朝献替记》；大中吐蕃尚婢婢等事，用林恩《后史补》；韩瑊凤翔谋画，用《金鸾密记》；平庞勋，用《彭门纪乱》；讨裘甫，用《平剡录》；记毕师铎、吕用之事，用《广陵妖乱志》。皆本末粲然，然而杂史、琐说、家传，岂可尽废也！

【译文】 我朝真宗初年，下诏让儒臣搜集资料，编写君臣事迹。一天，真宗对辅政大臣说：“昨天，朕见《宴享门》书中记载，唐中宗举行宴会与群臣饮酒赋诗。韦庶人即韦皇后也与会和诗。中宗与下臣在一起戏乐，骑在马上，口中含桃并用口去摘桃，非常热闹。但这些都不符合君臣的礼制，于是就下令删去。”又说：“编写君臣事迹是一件大事，是为了给后世效法。因此必须慎之又慎。对于异端小说中的材料，一概不予收录采纳。可以说考虑是很周全的。”这时，负责这项工作的编修官在上书中说：“近些年来，有些官员为宣耀自己，往往自述本人的事略，如李德裕的《文武两朝献替记》、李石的《开成承诏录》、韩昉的《金鸾密记》等等。有些子孙为了光宗耀祖，往往追述其先人的德行和家世，如李繁的《邺侯传》、《柳氏序训》、《魏公家传》等等。在这些著述中，有的蓄意掩盖自己或其先人的劣迹恶行，或则把别人所做的好事善行化为己有，并且多是颂扬溢美之词。因此不能作为真实可信的著述。那些篡夺皇位称帝建国的伪政权，也各有自己的撰著。如《吴录》、《孟知祥实录》一类的著述，都是进行自我炫耀，所言本国事略及功迹，多是歪曲事实，谬误不实之处，比比皆是。以上这些著述，也一律不予收录。除此之外，还有《三十国春秋》、《河洛记》、《壶关录》一类的著述，书中所记，在正史中大都可以找见。《秦纪》、《燕书》这一类著书，都是出自非正统的政权令人编写的。《殷芸小说》、《谈薮》一类的著述，所记都是诙谐的区区小事。《河南志》、《 志》、《平剡录》一类的著述，大都是那些部下门客述说自己长官、主人、将帅讨伐征战建立的功绩，其弊病在于所纪琐碎繁杂。《西京杂记》、《明皇杂录》一类著作，所记多为一些荒诞离奇之事；而《奉天录》书中所记，尤多虚构。如果不加选择，全都兼收并取，恐怕编出的书杂乱不成样子。”真宗采纳了这些建议，并把这些建议作为编修君臣事迹的方针。书成之后，真宗赐名叫《册府元龟》。该书编修，整整花了十年时间，都是由宰相王钦若总负其责的，共一千卷。由于在材料选取上，有很多材料被遗弃不取，所以有些事情真相也不能得到暴露。

而《资治通鉴》则不是这样。以记叙唐朝一代的史事而言，记述王世充、李密的事略，采用的是《河洛记》的记载。记述魏征谏争之事，采用的是《谏录》的记载。记述李绛的奏议，采用的是《李司空论事》的记载。记述睢阳之

事，采用的是《张中丞传》的记载。记述淮西平叛之事，采用的是《凉公平蔡录》的记载。记述李泌之事，采用的是《邺侯家传》的记载。记述李德裕在太原、泽州（今山西晋城）、潞州（今山西长治）、回鹘事略，采用的是《两朝献替记》的记载。记述大中吐蕃尚婢婢等事，采用的是林恩《后史补》的记载。记述韩 在凤翔的谋划，采用的是《金鸾密记》的记载。记述平定庞勋举兵之事，采用的是《彭门纪乱》的记载。记述镇压裘甫起义事，采用的是《平剡录》的记载。记述毕师铎、吕用之事，采用的是《广陵妖乱志》的记载。关于这些史事的记述，始末都十分清楚。由此来看，杂史、琐说、家传这类的著述，岂可一概弃之不取呢？

汉高帝祖称丰公

【原文】 《前汉书·高祖纪赞》云：“刘氏自秦获于魏。秦灭魏，迁大梁，都于丰。故周市说雍齿曰：‘丰，故梁徙也。’是以颂高祖云：‘汉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刘。涉魏而东，遂为丰公。’丰公，盖太上皇父。”案上六句皆韵语，不知何人作此颂，诸家注释，大抵阙如。予自少时读班史，今六七十年，何啻百遍，用朱点句，亦须十本，初不记忆高帝之祖称丰公，比再阅之，恍然若昧平生，聊表见于此。旧书不厌百回读，信哉！

【译文】 《汉书·高祖纪赞》说：“姓刘的从秦国被俘虏到魏国。秦国灭掉魏国，魏国残余部分从大梁迁出，又在丰邑建都城。所以周市劝说雍齿说：‘丰邑，过去是魏国都城大梁迁移过来而建立的。’所以歌颂汉高祖说：‘汉帝本系，出自唐帝（汉朝皇帝的祖先，出自尧的陶唐）。降及于周，在秦作刘（后代到了周朝，在秦国姓了刘）。涉魏而东，遂为丰公（变成魏国人随魏国东迁，便成为丰公）’。丰公，大概就是太上皇的父亲。”按文中六句颂文都押韵的句子，不知什么人写的这些颂辞，各家注释，大抵都没有说。我从少年时期就读班固《汉书》，到现在有六七十年了，何止读了一百遍，用红笔在书上断句，也应该断了十部了，开头不记得汉高祖的祖父称为丰公，等再读《汉书》，恍恍惚惚像从没读过，姑且记述在这里。俗话说旧书读一百遍也读不厌，真是有道理呀！

枢密行香

【原文】 唐世枢密使专以内侍为之，与它使均称内诸司，五代以来始参用士大夫，遂同执政。案实录所载景德二年三月元德皇后忌，中书、枢密院文武百官，并赴相国寺行香。初枢密院言：“旧例国忌行香，惟枢密使、副依内诸司例不赴，恐有亏恭恪。今欲每遇大忌日，与中书门下同赴行香。”从之。枢密使副、翰林、枢密直学士并赴，自兹始也。然则枢密之同内诸司久矣。隆兴以来，定朝臣四参之仪，自宰臣至于郎官、御史，皆班列殿庭拜舞，惟枢密立殿上不预，亦此意云。

【译文】 在唐代，枢密使专从内侍宦官中选任。枢密使与中央其他官署的长官使都称为内诸司。五代以来，枢密使的人选有些变化，除从内侍宦官中选任外，还开始从士大夫中选任，其地位，便与执政大臣相同。按《实录》中的记载，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三月元德皇后忌日（逝世纪念日），中书省、枢密院的文武官员，一齐要到开封相国寺行香。起初，枢密院提出：“我朝旧制规定，凡是忌日，朝中文武官员均应行香。只有枢密使、枢密副使，依内诸司例，不去行香，恐怕有损于恭敬谨慎。现在打算每遇大的忌日，枢密院官要与中书省、门下省官一道前往相国寺行香。”真宗采纳了这一建议。枢密使、枢密副使、翰林院官及枢密直学士一道前往行香，便是从此开始的。然而，枢密使与内诸司地位相同则由来已久了。孝宗隆兴年间以来，所定朝臣每月四次参拜的礼仪，自宰相以至郎官、御史，俱都在殿庭按品级列队进行参拜，惟独枢密使立于殿前不参与这些活动，也是这个意思。

船名三翼

【原文】 《文选》张景阳《七命》曰：“浮三翼，戏中。”其事出《越绝书》，李善注颇言其略，盖战船也。其书云：“阖闾见子胥，问船运之备。对曰：‘船名大翼、小翼、突胃、楼船、桥船。大翼者当陵军之车，小翼者当陵军之轻车。’”又《水战兵法内经》曰：“大翼一艘，广一丈五尺三寸，长十丈；中翼一艘，广一丈三尺五寸，长九丈；小翼一艘，广一丈二尺，长五丈六尺。”大抵皆巨战船，而昔之诗人，乃以为轻舟。梁元帝云：“日华三翼舸”，又云：“三翼自

相追”，张正见云“三翼木兰船”，元微之云“光阴三翼过”。其它亦鲜用之者。

【译文】 《文选》中辑有张景阳所撰《七命》八首。这里说：“浮三翼，到水中岛山游戏。”此说出于《越绝书》。李善在作注时，只是作了概括的说明。所谓三翼，就是战船的名称。《越绝书》中说：“吴王阖闾见到伍子胥就问：运载的船只准备得如何。伍子胥回答说：船只的名字有大翼、小翼、突胃、楼船、桥船。名字叫大翼的船只相当于步兵的重型车。名字叫小翼的船只相当于步兵的轻便的车。另外，《水战兵法内经》里说：“战船大翼一艘，宽一丈五尺三寸，长十丈。中翼一艘，宽一丈三尺五寸，长九丈。小翼一艘，宽一丈二尺，长五丈六尺。”据此所载，大翼、中翼、小翼，长宽各不相同，但大抵都是巨型的战船。过去的一些文人，在他们的诗作中把三翼作为轻便的小船。关于船名三翼，曾为文人所使用。如梁元帝在诗中说“日华三翼舸”，又说“三翼自相追”。张正见诗说“三翼木兰船”，元稹也有“光阴三翼过”的诗句，此外还很少见人用它。

东坡诲葛延之

【原文】 江阴葛延之，元符间，自乡县不远万里省苏公于儋耳，公留之一月。葛请作文之法，诲之曰：“儋州虽数百家之聚，而州人之所须，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钱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经、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钱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葛拜其言，而书诸绅。尝以亲制龟冠为献，公受之，而赠以诗曰：“南海神龟三千岁，兆叶朋从生庆喜。智能周物不周身，未死人钻七十二。谁能用尔作小冠，峋嵝耳孙创其制。今君此去宁复来，欲慰相思时整视。”今集中无此诗。葛常之，延之三从弟也。尝见其亲笔。

【译文】 江阴人葛延之，元符年间，从家乡不远万里到儋州（昌化军）看望苏公（苏轼），苏公留他住了一个月。葛延之向苏公请教写文章的方法，苏公教导他说：“儋州虽然是个有数百家的小镇，而州城里的人的日用品，靠从市上购买满足，然而不能空手取得，一定要有一种东西统摄它们，然后才能使这些东西为己所用。所谓一种东西，就是钱。写文章也是一样。天下的事散在经书、诸子百家、史书当中，不能凭空使用，必须得到一种东西统摄它们，然后它们才能为己所用，所谓一种东西，就是‘意（思想）’。得不到钱不能购物，找不到‘意’就不能利用各种素材，这就是写文章的要领。”葛延之感谢他的教导，

把他的话说在腰间大带子上。曾用亲手制作的龟冠作礼品献给苏轼，苏轼接受了，回赠他一首诗说：“南海神龟三千岁，兆叶朋从生欢喜（南海的神龟三千岁，预言我的朋友将有喜庆事）。智能周物不周身，未死人钻七十二（神龟能对人利物有帮助却不能保全身，还没死就被人用来占卜钻了七十二个洞）。谁能用尔作小冠，峋嵝耳孙创其制（谁能用你神龟制作小帽，大禹的后代发明了制帽的办法）。今君此去宁复来，欲慰相思时整视（今天你离去后难道还能再来吗，每当想念你时我就摸摸看看这龟冠自我安慰）。”现在文集里没有这首诗。葛常之，是葛延之的三堂弟，曾经看到苏公亲笔写的这首诗。

用书云之误

【原文】 今人以冬至日为书云，至用之于表启中，虽前辈或不细考，然皆非也。《左氏传》：“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视朔，遂登观台以望，而书，礼也。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为备故也。”杜预注云：“周正月，今十一月。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启者，立春、立夏；闭者，立秋，立冬；云物者，气色灾变也。”盖四时凡八节，其礼并同。汉明帝永平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毕，登灵台观云物，尤可为证。而但读《左传》前两三句，故遂颀以指冬至云。今太史局官，每至此八日，则为一状，若立春则曰风从艮上位上来，春分则曰风从震位上来，它皆仿此，只是定本，元非摭实。《起居注》随即修入，显为文具，盖古之书云意也。

【译文】 现在人们都把冬至日称为书云。甚至在国家表、启这些正式文件中也有这样的用法。即使学界前辈也未见有人详细考订，实际上书云并不是指冬至日而言的。《左传》里记载：“僖公五年（公元前655年）正月辛亥初一日，冬至。太阳在最南方。僖公于太庙听政之后，就登上观云台观察云气云象。加以记载，这是礼制的规定。凡属分、至、启、闭，必记录云气云色，这是为了解灾害作准备。”杜预在这里作注说：“周朝的正月，即今之十一月。所谓分，即春分、秋分；至，即冬至、夏至；启，即立春、立夏；闭，即立秋、立冬。云物就是天象中云气云色灾异等复杂异常现象。一年有春夏秋冬四时，可以分作八个节气。每个节气都要举行祭祀，节气虽有不同，所用的礼仪则是相同的。

汉明帝永平二年（59年）春季正月辛未十三日，在宗庙祭祀汉光武帝完毕之后，明帝登上国家天文台灵台观察云物，更是有力的证据。然而，只读《左传》前两三句，不继续读下去，不看上下文的意思，就以为云物是专指冬至日

而言的。而今国家掌管天文历法的太史局的官员们，每到此八日，就要写一个报告。如果是立春，就说风从艮位上来，如果是春分，就说风从震位上来。他如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都仿照此法。这是固定的书写格式，本来就不符合实情。《起居注》一书在编修时，将它纳入，显然是徒具空文。这大概是古时候书云的含义。

张碯讥武后滥官

【原文】 武后革命，滥授人官，故张 为谚以讥之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杷推侍御史，稊脱校书郎。”唐《新》、《旧史》亦载其语，但泛言之。案天授二年二月，以十道使所举人石艾县令王山辉等六十一人，并州拾遗、补阙；怀州录事参军霍献可等二十四人，并授侍御史；并州录事参军徐昕等二十四人，授著作郎；内黄县尉崔宣道等二十三人，授卫佐校书。凡百三十二人，同日而命，试官自此始也。其滥如此！

《刘子玄传》：“武后诏九品以上陈得失，子玄言：‘君不虚授，臣不虚受。今群臣无功，遭遇辄迁，至都下有车载、斗量、杷推、稊脱之谚’”“正为此设，然只是自外官便除此四职，非所谓辄迁，子玄之言失之矣。”

【译文】 武则天作了皇帝，不加限制地委任人官职，所以张碯编了歌谣讽刺这一情况说：“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补阙一辆一辆车子装载，拾遗多得可用斗量），杷推侍御史， 脱校书郎。（侍御史像耙子推起的谷粒那样多，校书郎更像用模子造碗一样一个又一个）。”《新唐书》《旧唐书》也记载了他的话，但只是泛泛地讲的。按天授二年（691年）二月，把十道巡抚使所推荐的官员石艾县令王山辉等六十一人，全都任命为拾遗、补阙；怀州录事参军霍献可等二十四人，全都任命为侍御史；并州录事徐昕等二十四人，委任为著作郎；内黄县尉崔宣道等二十三人，委任为卫佐校书。一共一百三十二人，同一天任命，官员试用制度从此时开始。当时不加限制任命官员竟到了这种程度。《新唐书·刘子玄传》记载：“武则天下诏命令九品以上官员陈述对国家施政得失的看法，刘子玄（刘知几）说：‘君主不凭空授予官职，臣子不凭空接受官职。现在官员们没有建立功绩，赶上时机就随便晋升，以致京城里有“用车载”、“用斗量”、“用杷推”、“用模子造碗”的歌谣。’”正是针对这件事讲的。然而被提升的人只不过是从小地方官一下子就被提升担任这四种职务，不是像刘子玄讲的随便提升，刘子玄的话是不恰当的。

唐王府官猥下

【原文】 唐自高宗以后，诸王府官益轻，惟开元二十三年，加荣王以下官爵，悉拜王府官属。浸又减省，仅有一傅一友一长史，亦但备员，至与其府王不相见。宝历中，琼王府长史裴简求具状言：“诸王府本在宣平坊，多年摧毁，后付庄宅使收管，遂为公局。每圣恩除授，无处礼上。王官为众所轻，府既不存，官同虚设，伏乞赐官宅一区。”乃诏赐延康坊宅。予因阅《九经字样》一书，开成中唐玄度所纂，其官阶云朝议郎知沔王友，充翰林待诏。沔王名恂，宪宗之子，而以书吏为友，其余可知。案文、武、宣、昭四宗，皆自藩王登大位，刚明果断，为史所称，盖出于天性，然非资于师友成就也。

【译文】 唐代自高宗以后，在各个亲王府任职的官员日益不为人们所重视。惟独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朝廷下诏给荣王府以下的官员加官进爵。王府的所有官员都得到赏赐。但是，后来渐渐地下诏裁减王府的官员，在一个亲王的王府中，仅设官三人：一个是傅，一个是友，一个是长史，而且还是有名无实以备顾问而已。甚至在同一王府中，属官不得与王相见。唐敬宗宝历年间，琼王府长史裴简求向朝廷上书，陈述各个王府的状况说：“诸王府原设在京城宣平坊，由于年久失修，累经摧毁而无人过问。后来将王府交庄宅使收管，于是就成为公共场所。每遇朝廷开恩降旨升迁赏赐的时候，诸王连行谢恩的地方都没有。既然，王府官员为众人所轻视，王府没有固定的办事地方，因而王府官员虽有任命实际上并没有就任做事，等于虚设。为此，恳求皇上赐给官宅一区，以供王府使用。”敬宗看到这个奏折之后，颇有感慨，于是降旨将京城延康坊的官宅赐给王府。这样才使王府的官员有了办事的地方。

《九经字样》一书，为唐文宗开成年间唐玄度所纂修。我在阅览该书时，见到书中自述其官阶为朝议郎知沔王的友人官翰林院待诏。这里所说的沔王，是李恂，是唐宪宗李纯的儿子，他与一个区区书吏为朋友，就可以看出王府在当时的地位，至于说王以下属官的地位那就不必细说了。

按唐代文宗李昂、武宗李炎、宣宗李忱、昭宗李杰四人，都是由藩王登上帝位的。他们英明果断，为史家所称颂。这些都是出于自己的天资，并不是依赖于师友的教育辅导而取得成就的。

御史风闻

【原文】 御史许风闻论事，相承有此言，而不究所从来，以予考之，盖自晋、宋以下如此。齐沈约为御史中丞，奏弹王源曰：“风闻东海王源。”苏冕《会要》云：“故事，御史台无受词讼之例，有词状在门，御史采状有可弹者，即略其姓名，皆云风闻访知，其后疾恶公文者少，递相推倚，通状人颇雍滞。开元十四年，始定受事御史，人知一日劾状，遂题告事人名，乖自古风闻之义。”然则向之所行，今日之短卷是也。二字本见《尉佗传》。

【译文】 御史许可凭着听来未经察实的情况（“风闻”）批评官员，相传有这种说法，而没有人追究这种说法的来源。根据我的考察，大概从晋朝、刘宋以后就这样了。萧齐沈约担任御史中丞，上奏弹劾王源说：“风闻（听说）东海的王源。唐代苏冕的《会要》记载：“按照惯例，御史台没有受理指控的制度，有指控文状提交御史台，御史摘录其中应当弹劾的罪行，便省略指控人的姓名，都说‘风闻访知（听说和访问得知）’。后来御史当中疾恶如仇公正廉洁的少，互相推委，写状子指控的人受到阻挠。开元十四年（726年），开始规定受理指控的‘受事御史’，御史们每人轮流负责受理一天的指控状子，便写明指控人的姓名，背离了自古以来‘风闻’的用意。”这样说来过去所行用的，就是今天所用的“短券”，“风闻”二字最早见于《汉书·尉佗传》。

唐御史迁转定限

【原文】 唐元和中，御史中丞王播奏：“监察御史，旧例在任二十五月转，准具员不加，今请仍旧；其殿中侍御史，旧十二月转，具员加至十八月，今请减至十五月；侍御史，旧十月转，加至十三月，今请减至十二月。”从之。案唐世台官，虽职在抨弹，然进退从违，皆出宰相，不若今之雄紧，观其迁叙定限可知矣。国朝未改官制之前，任监察满四年而转殿中，又四年转侍御史，又四年解台职，始转司封员外郎。元丰五年以后，升沉迥别矣。

【译文】 唐宪宗元和年间，御史中丞王播上奏说：“监察御史，旧制规定任期二十五个月后晋升，准许没有显著事迹的官员任期不延长时间，现在请求仍按旧制施行。殿中侍御史，旧制规定任期十二月后晋升，其没有显著事迹的

官员任期定为十八个月，现在请求减去三个月，定为十五个月。侍御史，旧制规定任期十月后晋升，没有显著事迹的官员任期定为十三个月，现在请求减去一个月，定为十二个月。”宪宗看后，认为这个办法可行，就采纳了。按唐代监察官员，虽然其职责在于弹劾官吏的失职与不法行为。然而，关于官吏的进退变动，都是出自宰相。不像今天宰相与御史的关系那么紧张，关于这一点，只要看一下有关官吏官位、勋爵升迁叙用期限的规定，就可一目了然了。本朝在没有改革官制之前，监察御史期满四年，升为殿中侍御史，任殿中侍御史期满四年，升为侍御史，任侍御史期满四年，就不许再在御史台监察机构中任职，升转为司封员外郎。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以后，由于改革官制，官吏的升降办法才与此迥然不同。

卷十二

主臣

【原文】 汉文帝问陈平决狱、钱谷，平谢曰：“主臣！”《史记》、《汉书》皆同。张晏曰：“若今人谢曰‘惶恐’也。”文颖曰：“惶恐之辞，犹今言死罪也。”晋灼曰：“主，击也。臣，服也。言其击服，惶恐之辞。”马融《龙虎赋》曰：“勇怯见之，莫不主臣。”正用此意。《文选》载梁任《奏弹曹景宗》，先叙其罪，然后继之曰“景宗即主臣”，仍继之曰“谨案某官臣景宗”，又《弹刘整》亦曰“整即主臣”。齐沈约《弹王源》文亦然。李善舍《汉》、《史》所书，而引王隐《晋书》庾纯自劾以谓然，以主为句，则臣当下读，殊为非是。不知所谓某人即主，有何义哉？

【译文】 汉文帝向陈平询问审理刑事案件及财政上一些事，陈平抱谦地回答道：“主臣！”《史记》、《汉书》都是这样记载的。张晏注释说：“主臣的意思，就像现代人谢罪时说的‘惶恐。’”文颖注释说：“惶恐的说法，就像现在称死罪。”晋灼注释说：“主，是击打的意思，臣，是屈服的意思。称他受打击而屈服，也是种表示惶恐的说法。”马融的《龙虎赋》中说：“勇怯见之，莫不主臣。”正是采用的这个意思。《文选》中载有梁朝任昉的《奏弹曹景宗》，先叙述他罪过，然后接着说“景宗即主臣”，然后在其后又接着说“谨案某官臣景宗”，另外，在《弹刘整》中亦说“整即主臣”。齐朝沈约的《弹王源》文中也是这样记载的。唐人李善在为《文选》作注时舍弃《汉书》、《史记》所记载的内容于不顾，却引用王隐的《晋书》中庾纯自己弹劾自己的一段文字，以为它才是对的，在主字下断句，那么臣字就该属于下一句来读，很是错误。不知道如此断句之后，上句指所谓某人即是主，有什么意思？

景华御苑

【原文】 崔德符坐元符上书邪党，困于崇宁，后监洛南稻田务。尝送客于

会节园，是时冬暮，梅花已开。明年春，监修大内，阉官容佐取以为景华御苑，德符不知也。至春晚，复骑瘦马与老兵游园内，坐梅下赋诗。其词曰：“去年白玉花，结子深枝间。小憩藉清影，低颦啄微酸。故人不可见，春事今已阑。绕树寻履迹，空余土花斑。”次日，佐入园，见地上马粪，知为德符。是时，府官事佐如不及，而德符未尝谒之。佐即具奏，劾以擅入御苑作践。有旨勒停。家素贫，传食于诸贤之舍，久乃归阳翟。德符没于靖康。官卑不应立传，予详考本末，为特书之。颇忆此段事，拟载于传中，以悼君子之不幸。且知马永卿《懒真录》中有之，而求不可得，漫记于此。

【译文】 崔德符因为元符年间上书被列入邪党名单，在崇宁年间受到排斥陷于困境。后来担任监洛南稻田务，曾在会节园送别客人，当时是冬末，梅花已经开了。第二年春天，监管修理皇宫的宦官容佐把会节园要过来作为景华御苑，崔德符不知道这件事。到了晚春，又骑着瘦马和老兵在园内游玩，坐在梅花下吟诗。诗句是：“去年白玉花，结子深枝间（去年白玉般的梅花，在树枝的深处已经结了子）。小憩藉清影，低颦啄微酸（我在梅树清瘦的树影下稍事休息，低头品尝初生的酸梅）。故人不可见，春事今已阑（去冬送走的友人已不能见到，春天却已到了末尾）。绕树寻履迹，空余土花斑（我绕着树寻找友人的足迹，却只见到斑斑点点的苔藓）。”第二天，容佐进入会节园，看到地上的马粪，知道是崔德符来过。当时，河南府的官员事奉容佐唯恐不周，而崔德符从没有去拜谒他。容佐便上奏，指责崔德符擅自进入皇家花园肆意践踏。朝廷下令把崔德符撤职。崔德符平素家里很穷，沿路到各贤士家里找饭吃，很久才回到阳翟（属许州）。崔德符在靖康年间去世，官阶低按规定不应当立传，我详细考察事情的来龙去脉特地给他写了传记，回忆起前面那段事，准备记载在他的传记里，用以表示对君子不幸遭遇的同情。而且知道马永卿写的《懒真录》中有记述，而不能找到，随手记录在这里。

州升府而不为镇

【原文】 州郡之名，莫重于府，虽节镇不及焉，固未有称府而不为节度者。比年以来，升蜀州为崇庆府、剑州为隆庆府、恭州为重庆府、嘉州为嘉定府、秀州为嘉兴府、英州为英德府。蜀、剑既有崇庆、普安军之额，而恭、嘉以下独未然，故幕职官仍云某府军事判官、推官，大与府不相称，皆有司之失也。信阳军一小垒耳，而司户参军衔内带兼节推，尤为可笑。顷在中都时，每为天官

主者言之，云亦不必白朝廷，只本案检举改正申知足矣。乃曰：“久例如此。”竟相承到今。文安公尝为左选侍郎，是时，未知此也。

【译文】 州郡之类地方的名称，没有知府更重要了，即使是节度使驻地也比不上它，从来没有称府而不是节度使驻地的。近年以来，升蜀州（治今四川崇庆）为崇庆府、升剑州（治今四川剑阁）为隆庆府、升恭州（治今四川巴县）为重庆府、升嘉州（治今四川乐山）为嘉定府、升秀州（治今浙江嘉兴）为嘉兴府、升英州（治今广东英德）为英德府。蜀州、剑州已经有了崇庆军、普安军的称号，可是恭州、嘉州以下的州却还没有建置为军，所以它们的属吏仍然称为某府军事判官、某府军事推官，这与知府属员的建制不相符，府官不管军事，这些都是有关主管官员的过错。信阳军（今河南信阳）只不过是一座小小的军事营垒罢了，可是司户参军衔内却带兼节度推官，兼职大于本职，最为可笑。不久前在京都时，每每对吏部主管者谈及此事，说也没有必要告诉朝廷，只要吏部下属有关部门采取措施进行更正然后再奏报朝廷就可以了。吏部的人却说：“长久以来例都如此。”竟然相承沿袭一直到现在。文安公洪遵曾在吏部任左选侍郎，那时，还不了解这些。

汉唐三君知子

【原文】 英明之君，见其子有材者，必爱而称之。汉高祖谓赵王如意类己，欲以易孝惠，以大臣谏而止。宣帝以淮阳王钦壮大，好经书、法律，聪达有材，数嗟叹曰：“真我子也！”常有意欲立为嗣，而用太子起于微细，且早失母，故弗忍。唐太宗以吴王恪英果类我，欲以代雉奴。其后如意为吕母所戕，恪为长孙无忌所害，钦陷张博之事，殆于不免。此三王行事无由表见。然孝惠之仁弱，几遭吕氏之覆宗；孝元之优柔不断，权移于阉寺，汉业遂衰；高宗之庸懦，受制凶后，为李氏祸尤惨。其不能继述固已灼然。高祖、宣帝、太宗盖本三子之材而言之，非专指其容貌也，可谓知子矣。彼明崇俨谓英王哲（即中宗也）貌类太宗，张说谓太宗画像雅类忠王（即肃宗也），此惟取其形似也。若以材言之，中宗之视太宗，天壤相隔矣！汉成帝所幸妾曹宫产子，曰：“我儿额上有壮发，类孝元皇帝。”使其真是孝元，亦何足道？而况于婴孺之状邪！

【译文】 英明的君主，发现自己儿子中有才能的，一定会喜爱并称赞他。汉高祖说赵王如意像自己，想叫他替换孝惠皇帝刘盈作太子，因为大臣们进谏才没有这样作。汉宣帝根据淮阳王刘钦身材魁梧，喜欢研究经书和法律，聪明

畅达富于才华，屡次赞赏道：“真是我的儿子！”曾经有意立他为继承人，可因为太子出生于贫贱之时，并且早年丧母，所以不忍心更换。唐太宗认为吴王李恪英明果断像自己，曾想以他取代雉奴（唐高宗李治乳名）。后来赵王刘如意被吕后残害，吴王李恪被长孙无忌处死，淮阳王刘钦被牵连到张博的事件里，几乎不免于难。这三王建功立业的才能未能得到应有发挥。可是汉孝惠帝仁厚懦弱，几乎被吕氏覆灭宗族；汉孝元帝优柔寡断，大权旁落到宦官手里，汉朝的大业便因此而走向衰落；唐高宗平庸怯懦，为凶狠的武则天控制，给李氏带来的祸患更惨。他们没能力继承先人事业，是显而易见的。汉高祖、汉宣帝、唐太宗大抵是根据三个儿子的才能来说话，并非专指他们的相貌如何，真可说是知子莫若父了。唐人明崇俨说英王李哲（即唐中宗）样子像太宗，张说说唐太宗的画像很像忠王（即唐肃宗），这只是从其形貌而言的。如果从才能上来讲，唐中宗比之唐太宗，真是有天地之别。汉成帝所宠幸的妃子曹宫生了儿子，说：“我儿额上有丛生粗壮的头发，很像汉孝元皇帝。即使他真的像汉孝元帝，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更何况是婴儿的长相有点相似呢！”

当官营缮

【原文】 元丰元年，范纯粹自中书检正官谪知徐州滕县，一新公堂吏舍，凡百一十有六间；而寝室未治，非嫌于奉已也，曰吾力有所未暇而已。是时，新法正行，御史大夫如束湿，虽任二千石之重，而一钱粒粟，不敢辄用，否则必著册书。东坡公叹其廉，适为徐守，故为作记。其略曰：“至于宫室，盖有所从受，而传之无穷，非独以自养也。今日不治，后日之费必倍。而比年以来，所在务为俭陋，尤讳土木营造之功，欹仄腐坏，转以相付，不敢擅易一椽，此何义也！”是记之出，新进趋时之士，媚疾以恶之。恭览国史，开宝二年二月诏曰：“一日必葺，昔贤之能事。如闻诸道藩镇、郡邑公宇及仓库，凡有隳坏，弗即缮修，因循岁时，以至颓毁，及礪工充役，则倍增劳费。自今节度、观察、防御、团练使、刺史、知州、通判等罢任，其治所廨舍，有无隳坏及所增修，著以为籍，迭相符授。幕职州县官受代，则对书于考课之历，损坏不全者，殿一选，修葺、建置而不烦民者，加一选。”太祖创业方十年，而圣意下逮，克勤小物，一至于此！后之当官者不复留意。以兴仆植僵为务，则暗于事体、不好称人之善者，往往翻指为妄作名色，盗隐官钱，至于使之束手讳避，忽视倾陋，逮于无可奈何而后已。殊不思贪墨之吏，欲为奸者，无施不可，何必假于营造一节乎？

【译文】 我朝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范纯粹从中书省检正官贬黜为徐州滕县知县，将本县衙门大堂和官吏住室翻修一新，共一百一十六间；但知县的住室还没有整治，不是避忌别人讲自己追求享受的口实，说只不过是尽力于他事尚没有空暇罢了。这时，新法正在推行，对于官吏的管理像捆束湿柴那样的狠毒严厉，即使担任路或州的长官，也不敢随便动用一文钱一粒米，要用的话就一定记录在簿册之上。苏东坡赞叹他廉洁，刚好出任徐州知州，所以特意著文记述这件事。文中写道：“至于说到地方官府的房屋，大抵是从前任那里接受来的，并且要不断地传给后任，不只是用来独自享受。官府房屋坏了今日不及时整治，以后所用费用定会成倍增加。可是近年以来，到处以因陋就简为时尚，特别避忌土木营造的工程，即使房子墙壁倾斜木料腐坏，转身就把它交给后任，不敢擅自动一根椽子，这是什么道理呢！”这篇杂记写出之后，新近提拔上来趋奉时尚的人，嫉妒并且讨厌他。我用心地披览本朝文献，见太祖开宝二年（969年）二月的诏书上说：“就是在任一天也要修葺损坏了的房舍，这是过去的贤官良宰才能做到的。可是听说各路的路镇和郡县的官房和仓库，大抵是有了破坏，并不及时修缮，拖延岁月，以至于倾塌，等到筹集工料、募民充役进行修复的时候，劳务和费用就要倍增了。从今以后，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刺史、知州、通判等谢任，他治所的廨舍，有没有毁坏以及增修的情况如何，都要记录在案，依次点验移交给后任。地方长官的属吏及州县长官任满去职，就对照着书写考核优劣的记事文书上，廨舍损坏不全的，推迟一个选次授官，有所修葺、建置而且不断烦扰百姓的，提前一个选次授官。”太祖皇帝创立基业才十年，就下达了这样的旨意，勤劳国事密切注意小的事物，居然达到这样的地步。后来的担任官职的人不再留心此类事。如果有人从事于倾颓官舍的修复，那么，不明事理、不喜欢称人之美的人，往往反而指责为巧立名目贪污公款，以至于使得当事者束手不干，为避免嫌疑，无视墙倒屋塌，达到无可奈何的境地才罢手。然而，却不想想那些贪墨的官吏，想作坏事，什么办法都可想出来，哪里一定要假借营造官舍这件事呢？

治历明时

【原文】 《易·革》之《彖》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魏、晋而降，凡及禅代者，必据以为说。案汉辕固与黄生争论汤、武于景帝前，但评受命之是非，不引《易》为证。卦之《象》曰：“君子以治历

明时。”其义了不相涉。偃孙颇留意历学，云按唐一行《大衍历·日度议》曰：“《颛帝历》上元甲寅正月甲寅辰初合朔立春，七曜皆直艮维之首；汤作《殷历》，更以十一月合朔冬至为上元，周人因之。”此谓治历也。至于三统之建，夏以寅为岁首，得人统；殷以丑，为得地统；周武王改从子，为得天统。此谓明时也。其革命之说，刘歆作《三统历》及《谱》，引《革·彖》“汤、武革命”，又曰“治历明时，所以和人道也”，如是而已。其前又引《逸书》曰：“先其革命。”颜师古曰：“言王者统业，先立算数，以命百事也。”推此而伸之，所云革命，盖谓是耳，非论其取天下也。况《大衍》之用四十有九，一行以之起历，而《革》卦之序，在《周易》正当四十九，然则专为历甚明。考其上句，尤极显白，然诸儒赞《易》，皆不及此，王弼亦无一言。

【译文】 《周易·革》之《彖》辞中说：“天地自然界之道，阴阳升降、温暑凉寒等迭相变革，从而形成了四时递相变化之序。人类社会亦在变革，比如商汤、周武革除了夏桀、商纣的统治天下的命运并且取而代之，实属上顺天意、下应人心。”魏、晋以来，凡是言及帝位的禅让和接替，一定要以此为据。据考查，汉代辕固和黄生在景帝面前争论汤、武革命之事，只是评论取代桀、纣之是非，并没有引《周易》中的这些话作证。革卦的《象》辞中说：“卦象为泽上火下，寓有变革之意。有学问的君子观此革象，连系天时改变之事，遂而修正历法明确时令。”它的含义也同人世君主的变换全无关系。孙儿洪偃非常留心历算之学，说根据唐朝一行的《大衍历·日度议》，其中称：“《颛帝历》作为历始的上元是甲寅年正月的甲寅日，其日辰初（上午七时）日月相会，为月初一，又赶上是立春的节气，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星正好运行在天空东北角上；商汤作了《殷历》，改用十一月甲子日作为上元，其日日月相会，为月初一，又是冬至节气；周朝人沿用了这种历法。”这里说的是历法的推算制定。至于夏、商、周三代正朔的建立，夏代以建寅之月为岁首，算是得人统，人统者，意谓人始成立之端也；殷代以建丑之月为岁首，算是得地统，地统者，意谓地始化之端也；周武王改以建子之月为岁首，算是得天统，天统者，意谓天始施之端也。这是说的明时即宣明天时。关于革命的说法，刘歆作了《三统历》和《谱》，引用了《易经》中《革·彖》的“汤、武革命”之语，又称“推算制定历法明确时间，是用来合理安排人事活动的”，如此而已。在这之前还引了《逸书》，其中说：“先其革命。”颜师古注解：“作君王的人统理百业，要首先制订历法计算办法，根据它发布治理各种政令。”由此引申推广，所谓革命，大概说的是王者之起要改正朔罢了，并不是讨论他们应不应该取天下。况且《易经》说大衍占卜术用途有四十九项，唐代著名天文学家一行（即张遂）用《大

衍历》的数术制定历法，并且《革》卦的次序，在《周易》中正好是第四十九位，这都不是偶然的，分明是专为历法而设。再看《彖》辞的上句，“天地革而四时成”，更是说的极其明显清楚，可是后世诸儒称赞《周易》，都未说到这一点，连王弼也没说过一句话。

仕宦捷疾

【原文】 唐傅游艺以期年之中，历衣青、绿、朱、紫，时人谓之“四时仕宦”，言其速也。国朝惟绿、绯、紫三等。而紫袍者，除武臣外，文官之制其别有六：庶僚黑角带，佩金鱼；未至侍从，而特赐带者，为荔枝五子，不佩鱼；中书舍人、谏议、待制、权侍郎，红襦黑犀带，佩鱼；权尚书、御史中丞、资政、端明殿阁学士、直学士、正侍郎、给事中，金御仙花带，不佩鱼，谓之横金；翰林学士以上正尚书，御仙带，佩鱼，谓之重金；执政官宰相，方团球文带，俗谓之笏头者是也。其叙如此。若猛进躐得者则不然。绍兴中，宋朴自侍御史迁中丞，施钜自中书检正、郑仲熊自右正言，并迁权侍郎，三人皆受告日易服，以正谢日拜执政。朴、钜以绯，仲熊以绿，服紫之次日，而赐球文带。盖侍从以下，俟正谢乃易带，而执政命才下，即遣中使赍赐，遂服之而赴都堂供职，可谓捷疾矣。若李纲则又异于是，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自太常少卿除兵部侍郎，未谢间，靖康元年正月四日，胡骑将至京城，纲以边事求见。宰执奏事未退，纲语知阁门事朱孝庄曰：“有急切公事，欲与宰执廷辩。”孝庄曰：“旧例，未有宰执未退而从官求对者。”纲曰：“此何时？而用例邪！”孝庄即具奏。诏引纲立于执政之末。时宰执议欲奉銮舆出狩襄、邓，纲请固守，上曰：“谁可将者？”纲曰：“愿以死报，第人微官卑，恐不足以镇服士卒。”白时中乞以为礼部尚书，纲曰：“亦只是侍从。”即命除尚书右丞。纲曰：“臣未正谢，犹衣绿，非所以示中外。”即面赐袍带并笏。纲服之以谢，且言：“方时艰难，臣不敢辞。”此为不经绯紫而极其服章，未之有也。

【译文】 唐代傅游艺在一整年的时间里，先后穿过青、绿、朱、紫各种官服。在职官等级制度下，这种服色的每次更换，都意味着品级的升迁。当时人称他为“四时仕宦”，言其服色随四季变化，非常的迅速。我们宋朝的官服只有绿、绯、紫三种服色等级。穿紫袍的官员，除了武职之臣，文官的服制其区别有六种：各部一般官员束黑色以角为饰的腰带，佩戴金鱼，金鱼是刻成鲤鱼形的金符；翰林学士、给事中、六尚书、侍郎为侍从，官职尚未达到侍从级别可

是又蒙特别赐给腰带，其带为荔枝五子图案，并不佩戴金鱼；中书舍人、谏议、待制、权侍郎，束以黑色犀牛角为饰的红色皮带，佩带金鱼；权尚书、御史中丞、资政、端明殿阁学士、直学士、正侍郎、给事中，束绣有御仙花的金带，御仙花即荔枝，不佩带金鱼，人称之为横金；翰林学士以上至正尚书，束绣有御仙花的金带，佩带金鱼，人称之为重金；执政官宰相，束绣织有或方或团的球形纹络的腰带，俗称笏头的就是此种腰带。它们的顺序就是这样，标志着官员品级的递升。一般官员逐级升迁。然而像那些提拔得快并不按正常次序而越级擢升的就不是这样了。宋高宗绍兴年间，宋朴从侍御史升御史中丞，施钜从中书检正、郑仲熊从右正言，一起升任权侍郎，三个人都是在接到授官文书的那一天更换官服，在正式上朝谢恩的那一天被除授为执政官。宋朴、施钜从穿红色的官服开始，郑仲熊从穿绿色的官服开始，换穿紫袍的第二天，就赐给了有球形纹络的腰带。因为侍从官以下的官员，要等到正式上朝谢恩时才更换腰带，可是除授执政官的命令刚传下去，皇帝就派遣宦官捧着新的腰带来颁赐，于是他们三人就穿戴整齐跑到执政官的大堂上去履行职责，可算得上快速了。像李纲就又跟这不同，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从太常少卿被任命为兵部侍郎，还未上朝谢恩，到了第二年即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的正月四日，敌人的骑兵将杀到京城，李纲以抗敌事求见皇帝。其时执政官宰相们启奏事情尚未退下来，李纲对知阁门事朱孝庄说：“有紧急公事，想去同执政官们当廷论辨。”朱孝庄说：“按照旧例，从没有出现过执政官尚未退朝而从属官员请求对辩的事。”李纲说：“这是什么时候？还援用旧例！”朱孝庄就具实奏闻皇上。皇上就降诏宣李纲上殿，有关人员就领他站在执政官的末尾。当时执政官们正商议着想护卫皇帝车驾出京到襄阳（今湖北襄樊市）、邓州（今属河南），其实是想逃跑。李纲请求固守京都，皇上问：“谁可为将呢？”李纲道：“我愿意以死报国，但是官低，人微言轻，恐怕不能够服制士卒使之服从。”白时中请求任命李纲作礼部尚书，李纲说：“那也只是侍从之官。”遂即命令除授尚书右丞。李纲又说：“在此之前除授我为兵部侍郎，尚未正式上朝谢恩，也未易服，还穿着绿色袍服，不足以宣示内外，以正视听。”随即当面赏赐给他紫官袍、带连同笏板。李纲穿上谢恩，并且说：“眼下时局艰难，我不敢推托责任。”这是不经过穿红色官服、紫色官服的过渡阶段就骤升大位，穿上最高官阶的官服，以前没有过这种情况。

词臣益轻

【原文】 治平以前，谓翰林学士及知制诰为两制，自翰林罢补外者，得端明殿学士，谓之换职。熙宁之后，乃始为龙图。绍兴以来愈不及矣。修起居注者序迁知制诰，其次及辞不为者，乃为待制，赵康靖、冯文简、曾鲁公、司马公、吕正献公是也。学士阙，则次补；或为宰相所不乐者，犹得侍读学士，刘原甫是也。在职未久而外除者，为枢密直学士，韩魏公是也；亦为龙图直学士，欧阳公是也。后来褒擢者，仅得待制，王时亨是也。余以善去者，集英修撰而止耳。

【译文】 治平年以前，把翰林学士和知制诰称为“两制”，从翰林学士被解除职务担任外地官职的，授予端明殿学士头衔，叫作“换职”。熙宁年以后，才开始改授低于端明殿学士的龙图阁学士头衔，绍兴年以后授给的官愈加低了。担任修起居注的按次序晋升知制诰，比较差的以及推辞不接受的，便担任待制，赵康靖、（赵概）、冯文简、冯京、曾鲁公（曾公亮）司马公（司马光）、吕正献（吕公著）就是这样。翰林学士缺人，则依次递补，有的是宰相所不喜欢的，尚且授予侍读学士职务，刘原甫（刘 ）就是这样。但任知制诰时间不长而调到外地任职的，授予枢密直学士衔，魏国公韩琦就是这样；也有授予龙图阁直学士衔的，欧阳修就是这样。后来因受奖赏而提拔的，仅授予待制，王时亨（王刚中）就是这样。其他没有受处分而离任的，最高只授予集英殿修撰罢了。

夏英公好处

【原文】 夏英公既失时誉，且以《庆历圣德颂》之故，不正之名愈彰，然固自有好处。夏羌之叛，英公为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韩魏公副之。贼犯山外，韩公令大将任福自怀远城趋得胜寨，出贼后，如未可战，即据险置伏，要其归，戒之至再。又移檄申约，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福竟为贼诱，没于好水川，朝论归咎于韩。英公使人收散兵，得韩檄于福衣带间，言罪不在韩，故但夺一官。英公此事贤矣，而后来士大夫未必知也，予是以表出之。

【译文】 夏英公（夏竦）既然在当时名誉不好，而且因为石介写的《庆历圣德颂》诗的缘故，奸邪的名声愈加传扬得广了，然而实际上他自有好的地方。

西夏叛乱入侵，夏竦担任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韩魏公（韩琦）担任副使。夏军侵犯山外，韩琦命令大将任福从怀远城迅速前往得胜寨，从敌军后方出击，如形势不利于出击，便占据险要设置埋伏，在夏军退回时伏击敌军，再三地告诫任福。又下达公文重申这些命令，假如违背命令，即使有功绩也处斩。任福最终被夏军引诱，在好水川全军覆没，朝廷议论认为责任和过错在韩琦身上。夏英公让人收聚打散的败兵，在任福的衣带里找到了韩琦下的公文，就说罪过不在韩琦身上，所以只降了韩琦一级官。夏英公这件事做得对极了，而后来士大夫未必知道，我因此把这件事写出来。

祖宗用人

【原文】 祖宗用人，进退迟速，不执一端，苟其材可任，则超资越级，曾不少靳，不拘拘于爱惜名器也。宋琪自员外郎以正月擢拜谏议大夫，三月参知政事。太宗将用李 ，时 官工部尚书，七月特迁琪刑书，遂并命为相。而琪居 上，自外郎岁中至此。石熙载以太平兴国四年正月，自右补阙（今朝奉郎）为兵部员外郎（今朝请郎）、枢密直学士，才七日，签书院事，四月拜给事中（今通议大夫），为副枢，十月迁刑部侍郎（今正议）；六年迁户部尚书（今银青光禄），为使，八年罢为右仆射（今特进），从初至此五岁，用今时阶秩言之，乃是朝奉郎而为特进也。当日职名，唯有密直多从庶僚得之，旋即大用。张齐贤、王沔皆自补阙、直史馆，迁郎中，充学士，越半岁并迁谏议、签枢。温仲舒、寇准皆自正言（今承议郎）、直馆，迁郎中，充职二年，并为枢密副使。向敏中自工部郎中以本官充职，越三月同知密院。钱若水自同州推官入直史馆，逾年擢知制诰，二年除翰林学士，遂以谏议同知密院，首尾五年。

【译文】 本朝前代皇帝任用人，提升黜降或快或慢，不拘一格。假若他的品格才能可以任用，则超越资格越级委任，从不稍有吝啬，决不斤斤计较地爱惜官职。宋琪正月里从员外郎被提拔担任谏议大夫，三月时就担任参知政事。宋太宗将要任用李 ，当时李 官阶是工部尚书，七月特别晋升宋琪为刑部尚书，接着便把二人一起任命为宰相，而宋琪排在李 前面。一年当中从员外郎晋升到这个位置。石熙载在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正月，从右补阙（原注：相当于现在的朝奉郎）晋升为兵部员外郎（原注：相当于现在的朝请郎）、枢密直学士；才七天，又晋升签书枢密院事；当年四月，晋升给事中（原注：相当于现在的通议大夫），担任枢密副使；十月，晋升刑部侍郎（原注：相当于现在的正议大

夫)；太平兴国六年(981年)，晋升户部尚书(原注：相当于现在的银青光禄大夫)，担任枢密使；太平兴国八年(983年)，罢免枢密使担任右仆射(原注：相当于现在的特进)。从起初晋升兵部员外郎到此时共五年，用今天的官阶品级讲，就是从朝奉郎晋升为特进了。当时的贴职，只有枢密直学士是大多从普通官员中挑选委任，不久就受到重用。张齐贤、王沔都从补阙、直史馆，晋升郎中，担任枢密直学士，半年以后都晋升为谏议大夫、签书枢密院事。温仲舒，寇准都从正言(原注：相当于现在的承议郎)、直史馆，晋升郎中，担任枢密直学士二年，都委任为枢密副使。向敏中从工部郎中以本官阶担任枢密直学士，三个月以后升任同知枢密院。钱若水从同州推官进京担任直史馆，一年以后升任知制诰，二年以后被任命为翰林学士，便以谏议大夫的官阶担任同知枢密院，从头到尾共五年。

至道九老

【原文】 李文正公 罢相后，只居京师，以司空致仕。至道元年，年七十一矣，思白乐天洛中九老之会。适交游中有此数，曰太子中允张好问，年八十五；太常少卿李运，年八十；故相吏部尚书宋琪、庐州节度副使武允成，皆七十九；吴僧赞宁，年七十八；郢州刺史魏丕，年七十六；左谏议大夫杨徽之，年七十五；水部郎中朱昂与 ，皆七十一。欲继其事为宴集，会蜀寇起而罢。其中两宰相乃著一僧，唐世及元丰耆英所无也。次年，李公即世，此事竟不成。耄老康宁，相与燕嬉于升平之世，而雅怀弗遂，造物岂亦吝此耶！

【译文】 李昉(谥文正)解除了宰相职务之后，一直居住在京城里，以司空的官位退休。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年)，七十一岁了，想起白居易(字乐天)曾在洛阳建立洛中九老会。正好这时同他交游的老人中有这么多，他们是太子中允张好问，八十五岁；太常少卿李运，八十岁；前宰相吏部尚书李琪、庐州节度副使武允成，都是七十九岁；吴(今江苏苏州)僧人赞宁，七十八岁；郢州(治今湖北钟祥)刺史魏丕，七十六岁；左谏议大夫杨徽之，七十五岁；水部郎中朱昂和李昉，都是七十一岁。想效法前贤的九老会组织游乐宴饮，不料蜀地出现动乱，只好作罢。这些人中，有两位宰相，一位僧人，是唐代的九老会及宋神宗元丰年间的耆英中所没有的。第二年，李昉下世，这事终究没能办成。一代硕德的老年人健康幸福，在承平之世彼此一起游乐宴饮，确为快事，可是这种美好的心愿没能实现，难道造物主还吝啬这个机会吗？

李文正两罢相

【原文】 宰相拜罢，恩典重轻，词臣受旨者，得以高下其手。李文正公，太平兴国八年，以工部尚书为集贤、史馆相。端拱元年，为布衣翟马周所讼。太宗召学士贾黄中草制，罢为右仆射，令诏书切责。黄中言：“仆射百寮师长，今自工书拜，乃为殊迁，非黜责之义。若以均劳逸为辞，斯为得体。”上然之。其词略云：“端揆崇资，非贤不授。素高闻望，久展谟猷，谦和秉君子之风，纯懿擅吉人之美。辍从三事，总彼六卿，用资镇俗之清规，式表尊贤之茂典。”其美如此。淳化二年，复归旧厅。四年又罢，优加左仆射，学士张洎言：“近者霖霖百余日，职在燮和阴阳，不能决意引退。仆射之重，右减于左，位望不侔，因而授之，何以示劝？”上批洎奏尾，止令罢守本官。洎遂草制峻诋，脑词云：“燮和阴阳，辅相天地，此宰相之任也。苟或依违在位，启沃无闻，虽居廊庙之崇，莫著弥纶之效，宜敷朝旨，用罢鼎司。自处机衡，曾无规画，拥化源而滋久，孤物望以何深！俾长中台，尚为优渥。可依前尚书右仆射，罢知政事。”历考前后制麻，只言可某官，其云罢知政事者，洎创增之也。国史传云：“厚善洎，及罢，洎草制乃如此。”绍兴二十九年，沈该罢制，学士周麟之于结句后，添入可罢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盖用此云。

【译文】 宰相任命罢免，待遇规格的轻重，接受起草制书命令的官员，能够从中抬商或贬低。文正公李昉，太平兴国八年（983年），以工部尚书的官阶担任带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官衔的宰相。端拱元年（988年），被普通百姓翟马周指控。宋太宗叫翰林学士贾黄中起草制书，罢免宰相改任右仆射，命令在制书中严厉斥责他。贾黄中说：“仆射是百官的老师 and 首长，现在他是从工部尚书升任右仆射，乃是破格提升，不是降级受处分的意思。如果用均衡劳逸的意思措辞，才是得体的。”宋太宗同意了，制书措辞大略说：“百官首长品阶崇高，不是贤明的人不授予。李昉平素声望很高，长期以来施展谋略，谦和而有君子风度，纯洁而有正人的美德。离开了三个官职位，担任百官的首长，用以加强引导风俗的力量，更表示朝廷尊重贤明的一惯态度。”制书措辞是这样地美好。淳化二年（991年）重新又担任原先的宰相职务。淳化四年又被罢免，优待晋升左仆射。翰林学士张洎说：“近来雨没完没了地下了一百多天，李昉职责是调和阴阳，出了问题不能下决心辞职。仆射很重要，左仆射不如右仆射重要，李昉的功绩名望都配不上左仆射，就这样授予他，怎么能鼓励人们上进？”宋太宗

在张洎奏书末尾批示，只命令罢免宰相后保留原先的右仆射官。张洎便起草制书，在制书中严厉诋毁李昉，制书开头的话说：“调和阴阳，辅佐天地，这是宰相的职责。假如占着宰相位子遇事既不表示赞成也不表示反对，默默无闻，虽然身居朝廷中崇高的地位，却没有作出显著的成绩。应当颁发命令，罢免宰相职务。李昉自从处在宰相位置，没有给朝廷出谋划策。掌握教化的源头时间很久，辜负众人的期望该是多么厉害！让你作尚书省的长官，尚且是优待。可以仍然担任尚书右仆射，不再参预国事决策。”考察前后历次制书，只讲可以担任某官，而讲不再参预国事决策的，是张洎新创的。国史《李昉传》说：李昉对张洎很好，等李昉被罢免，张洎起草制书竟然这样。绍兴二十九年，沈该罢相的制书，由学士周麟之草拟，在结束语之后添上了可罢免其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内容的话，大抵也是沿用了这个先例。

卷十三

科举之弊不可革

【原文】 法禁益烦，奸伪滋炽，唯科场最然，其尤者莫如铨试。代笔有禁也，禁之愈急，则代之者获贿赂愈多。其不幸而败者百无一二，正使得之，元未尝致法。吏部长贰帘试之制，非不善也，而文具儿戏，抑又甚焉。议论奉公之臣，朝夕建明，然此风如决流偃草，未尝少革。或以谓失于任法而不任人之故。殊不思所任之人，渠肯一意向方，见恶辄取，于事无益，而祸谤先集于厥身矣！开宝中，太子宾客边光范掌选，太庙斋郎李宗讷赴吏部铨，光范见其年少，意未能属辞，语之曰：“苟援笔成六韵，虽不试书判，可入等矣。”宗讷曰：“非唯学诗、亦尝留心词赋。”即试诗赋二首，数刻而就。甚嘉赏之，翌日拟授秘书省正字。今之世，宁复有是哉！

【译文】 法律禁令越来越多，作弊作假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这在科场上看得最清楚，其中尤为突出的是选授官职的考试。找人代笔是被禁止的，但禁令越急，代笔的人得到的贿赂和酬谢就越多。其中不幸败露的，不过是百分一二，即使被查获，开始时也没有按照国家的法律制裁。宋代吏部铨选，凡中选人除同进士出身及恩科人员外，皆须赴吏部由其长官副长官进行帘试，以防代笔之弊。这个规定，不能说不完善，但执行起来，却是一纸具文，如同儿戏，甚至连儿戏也不如。奉公守法、敢于议论的大臣，虽然天天提出改进意见，但这种坏的风气如同河决水溢，风吹草倒一样，一点也没有改变。有人认为，之所以产生这些流弊，是因为太相信法令而不相信执行法令的人。持这种议论的人也不想想，执行法令的官员，谁肯公平正直，一而再，再而三地得罪别人，弄个坏名声，对于事情没有帮助，而祸患诽谤倒先集中在自己身上了。我朝太祖开宝年间，太子宾客边光范主持铨选官员，太庙斋郎李宗讷到吏部应试，边光范见他年轻，认为他写不出好文章，对他说：“如果你能提笔写成六首带韵的诗，即使不考试其他科目，也可以算你合格。”李宗讷说：“我不但学诗，而且也曾留心词赋。”于是当场写诗赋两首，很快便写成了。边光范赞美并奖赏了他。第二天，便打算任命他为秘书省正字。现在还能有这样的事吗？

宰执子弟廷试

【原文】 太宗朝，吕文穆公蒙正之弟蒙亨举进士，礼部高等荐名。既廷试，与李文正公 之子宗谔，并以父兄在中书罢之。国史《许仲宣传》云，仲宣子待问，雍熙二年举进士，与李宗谔、吕蒙亨、王扶并预廷试。宗谔即宰相 之子，蒙亨参知政事蒙正之弟，扶盐铁使明之子。上曰：“斯并势家，与孤寒竞进，纵以艺升，人亦谓朕有私也。”皆下第，正此事也。仲宣时为度支使。仁宗朝，韩忠宪公亿为参知政事，子维以进士奏名礼部，不肯试大廷，受荫入官。唐质肃公介参政，子义问锁厅试礼部，用举者召试秘阁，介引嫌罢之。旧制，严于宰执子弟如此，与夫秦益公柄国，而子 、孙损皆于省殿试辄冠多士者异矣！

【译文】 宋太宗在位时，文穆公吕蒙正的弟弟吕蒙亨参加科举进士科考试，礼部省试排名次排在前面。参加廷试以后，他和文正公李昉的儿子李宗谔，都因为父亲哥哥在政事堂任职而被淘汰。国史《许仲宣传》记载，许仲宣的儿子许待问，雍熙二年（985年）参加科举进士科考试，与李宗谔、吕蒙亨、王扶一起参加廷试。李宗谔就是宰相李昉的儿子，吕蒙亨是参知政事吕蒙正的弟弟，王扶是盐铁使王明的儿子。宋太宗说：“他们都来自有权势的人家，与来自下层人家的人比高低，即使是因为有才能被排名在前面，人们也会说我有私心。”都没录取。讲的正是这件事。许仲宣当时担任度支使。宋仁宗在位时，忠宪公韩亿担任参知政事，儿子韩维科举进士科考试省试顺利通过，不肯参加廷试，按照门荫制度被录取作官，质肃公唐介担任参知政事，儿子唐义问在已有官阶的情况下参加礼部的科举考试，又被推荐参加秘阁的馆职考试，唐介引用避嫌的规定不让儿子参加。过去制度，对于宰相执政大臣子弟是这样严格，这与益公秦桧当权，而儿子秦 、孙子秦埙都在省试、廷试中排在所有参试者的前面该是多么不同。

国初救弊

【原文】 国朝削并僭伪，救民水火之中，然亦有因仍旧弊，未暇更张者，故须赖于贤士大夫昌言之。江左初平，太宗选张齐贤为江南西路转运使，谕以民间不便事，令一条条奏。先是诸州罪人多辄送阙下，缘路非理而死者，常十

五六。齐贤至蕲州，见南剑州吏送罪人者，索得州贴视之，二人皆逢贩私盐者，为荷盐笼得盐二斤，又六人皆尝见贩盐而不告者，并黥决传送，而五人已死于路。江州司理院自正月到二月，经过寄犯罪人，计三百二十四人。建州民二人，本田家客户，尝于主家塘内，以锥刺得鱼一斤半，并杖脊、黥面，送阙下。齐贤上言：“乞俟至京，择官虑问，如显有负屈者，本州官吏量加惩罚。自今只令发遣正身。”及虔州，送三囚，尝市得牛肉，并家属十二人悉诣阙，而杀牛贼不获，齐贤悯之，即遣其妻子还。自是江南送罪人者减大半。是皆相循习所致也，齐贤改为，其利民如此。齐贤以太平兴国二年方登科，六年为使者，八年还朝，由密学拜执政，可谓迅用也。

【译文】 宋朝削平割据对立的王朝，把百姓从水火之中拯救出来，但是也有承袭旧的弊政，未来得及改正的，因此需要依靠贤能的人士提出来予以改正。江南平定之初，宋太宗选派张齐贤任江南西路转运使，嘱咐他凡遇到民间不好解决的事，要逐一上奏。起初，各州获罪之人多数是禁锢之后戴着刑具押往京城，路途上非正常死亡的，常占十之五六。齐贤到了蕲州（今湖北蕲春），见到南剑州派遣官吏押送罪人，便要来罪人名单观看。其中有两个人偶然碰到了卖私盐的人，替他们担盐笼得到二斤盐，因而获罪，还有六人都因为看见有卖私盐的没有上告而获罪，一并受到刺面的刑罚送往京城处理，其中五人已死于路上。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司理院从正月到二月，两个月时间内，从经过本地寄押于此的罪人，就有三百二十四人。建州（今福建建瓯）有两个人，原是地主家的佃户，曾经在主人家的池塘里，用锥子扎得一斤半鱼，却受到杖打脊背、脸上刺字，送往京城的惩罚。齐贤上书说：“请求这些囚犯至京城时，选派官员仔细审问，如果确实有含冤负屈的，应由本州官吏酌情给以适当的惩罚。从现在开始，凡往京城遣送罪犯本人，不要株连其他人。”齐贤到了虔州，那里正要押送三名囚犯，这三个人曾经在集市上买过牛肉，连累家属十二人一块都要押送京城，而杀掉耕牛的贼人却未捉获。齐贤可怜这些人，当下便释放这三人的妻子老小回家。从此之后，江南各州往京城押送的罪人减少了大半。往京城押送罪人的弊端都是各州官吏因循归习形成的，齐贤作了改革，给百姓带来了好处。齐贤在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考中进士，太平兴国六年（981年）担任转运使，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回朝，由枢密直学士升为执政大臣，可以说是迅速得到提拔。

房玄龄名字

【原文】 《旧唐书》目录书房元龄，而本传云房乔字玄龄，《新唐书》列传房玄龄字乔，而《宰相世系表》玄龄字乔松，三者不同。赵明诚《金石录》得其神道碑，褚遂良书，名字与《新史》传同。予记先公自燕还，有房碑一册，于志宁撰，乃玄龄字乔松，本钦宗在东宫时所藏，其后犹有一印，曰“伯志西斋”。今亦不存矣。

【译文】 《旧唐书》目录中有房元龄，而他的传却说房乔字玄龄，《新唐书》列传中说房玄龄字乔，该书《宰相世系表》却说房玄龄字乔松，三处说法不同。赵明诚撰《金石录》一书时，找到房玄龄的神道碑，碑文由褚遂良书写，名和字与《新唐书》列传的记载相同。我记得先父自燕京归来，得到房玄龄碑文一册，是于志宁撰写的，上面说玄龄字乔松。那册碑文是宋钦宗当太子时收藏的，碑文后面还有一颗印，印文是《伯志西斋》，现在已不复存在了。

二朱诗词

【原文】 朱载上，舒州桐城人，为黄州教授，有诗云：“官闲无一事，蝴蝶飞上阶”。东坡公见之，称赏再三，遂为知己。中书舍人新仲翌，其次子也，有家学，十八岁时，戏作小词，所谓“流水泠泠，断桥斜路梅枝亚”者。朱希真见而书诸扇，今人遂以为希真所作。又有折叠扇词云：“宫纱蜂赶梅，宝扇鸾开翅。数折聚清风，一捻生秋意。摇摇云母轻，袅袅琼枝细。莫解玉连环，怕作飞花坠。”公亲书稿固存，亦因张安国书扇，而载于《于湖集》中。其咏五月菊词云：“玉台金盏对炎光。全似去年香。有意庄严端午，不应忘却重阳。菖蒲九节，金英满把，同泛瑶觞。旧日东篱陶令，北窗正傲羲皇。”渊明于五六月高卧北窗之下，清风飒至，自谓羲皇上人。用此事于五月菊，诗家叹其精切云。

【译文】 朱载上是舒州桐城（今属安徽）人，任黄州（今湖北黄冈）教授，他写的诗中有“官闲无一事，蝴蝶飞上阶”的句子。苏东坡见了，再三称道赞赏，便将朱载上作为知心朋友。中书舍人朱翌字新仲，是朱载上的第二个儿子，有家学渊源，十八岁时开始学习填词，有“流水泠泠，断桥斜路梅枝亚”的句子，朱敦儒（字希真）见到后写在扇子上，现在人就以为这是朱希真写的词。朱

载上又有吟咏折叠扇词说：“宫纱蜂赶梅，宝扇鸾开翅。数折聚清风，一捻生秋意。摇摇云母轻，袅袅琼枝细。莫解玉连环，怕作飞花坠。”朱载上亲笔写的手迹尚在，也因为张安国把这首诗写在扇子上，而记录在张安国的著作《于湖集》中。朱载上咏五月菊词说：“玉台金盏对炎光。全似去年香。有意庄严端午，不应忘却重阳。菖蒲九节，金英满把，同泛瑶觞。旧日东篱陶令，北窗正傲羲皇。”陶渊明在五、六月间高卧于北窗之下，清风飒飒吹来，自认为是羲皇时代的人。把陶渊明这件事写进五月菊诗中，诗人们都佩服他用得恰当确切。

金刚经四句偈

【原文】 今世所行《金刚经》，用姚秦鸠摩罗什所译，其四句偈曰：“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又曰：“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予博观它本，颇有不同。元魏天竺三藏菩提流支译云：“一切有为法，如星翳灯幻，露泡梦电云，应作如是观。”而“不能见如来”之下更有四句云：“彼如来妙体，即法身诸佛，法体不可见，彼识不能知。”陈天竺三藏真谛译云：“如如不动，恒有正说，应观有为法，如暗翳灯幻，露泡梦电云。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应得见我。由法应见佛，调御法为身，此法非识境，法如深难见。”唐三藏玄奘译云：“诸和合所为，如星翳灯幻，露泡梦电云，应作如是观。诸以色见我，以音声寻我，彼生履邪断，不能当见我。应观佛法性，即导师法身，法性非所识，故彼不能了。”唐沙门义净译前四句，与魏菩提本同，而后云：“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起邪观，不能当见我。”后四句与玄奘本同。予案今人称六如，东坡以名堂者，谓梦幻泡影露电也。而此四译，乃知有九如。《大般若经》，第八会《世尊颂》，第九会《能断金刚分》二颂，亦与玄奘所译同。

【译文】 现在所流行的《金刚经》，采用了十六国时期姚氏秦国鸠摩罗什的翻译，其中有四句偈语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水亦如闪电，应当这样看。”又说：“从颜色形体来看我，从声音来寻求我，这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到如来。”我广泛地考查了其他版本，有很大的不同。元魏时期天竺僧人三藏菩提流支的翻译说：“一切有为的法，如星、翳、灯、幻、露、泡、梦、电、云，应当这样来看。”而在“不能见如来”之下还有四句说：“彼如来妙体，即法身诸佛，法体不可见，彼识不能知。”南朝陈国天竺三藏大师真谛的翻译是：“如如不动，恒有正说，应观有为法，如暗翳灯幻，露泡梦电云。若以色见我，

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应得见我。由法应见佛，调御法为身，此法非识境，法如深难见。”唐朝三藏大师玄奘的翻译是：“诸和合所为，如星翳灯幻，露泡梦电云，应作如是观。诸以色见我，以音声寻我，彼生履邪断，不能当见我。应观佛法性，即导师法身，法性非所识，故彼不能了。”唐朝僧人义净翻译的前四句，与元魏菩提流支所译相同，后面几句是：“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起邪观，不能当见我。”后四句与玄奘所译相同。我认为今人称六如，就是苏东坡给六如堂起名字用的六如，是指梦、幻、泡、影、露、电。而以上四人的翻译，使我知道六如应该变成九如。《大般若经》第八卷《世尊颂》、第九卷《能断金刚分》中的两段颂，也和玄奘所译的相同。

四莲花之名

【原文】 稽钵摩华，青莲华也；钵特摩华，亦云波头摩，赤莲华也；拘毋鞞华，亦云俱物头，亦云俱牟鞞，红莲也；奔荼利华，亦云芬鞞利，白莲也。堵罗绵，柳絮之类，即兜罗绵也。

【译文】 钵摩华，是青莲花；钵特摩华，也叫波头摩，是赤莲花；拘毋华，也称俱物头，又叫俱牟，是红莲花；奔荼利华，也叫芬利，是白莲花。堵罗绵，是柳絮一类的花絮，也就是兜罗绵。

黑法白法

【原文】 安立黑法，感黑异熟，所谓地狱傍生鬼界。安立白法，感白异熟，所谓人天。安立黑白法，感黑白异熟，所谓一分傍生鬼界及一分人。安立非黑非白法，感非黑非白异熟，所谓预留果，或一来果，或不还果。

【译文】 把自己置于恶法中，感染邪恶就会得到恶报，这就是所说的地狱中的鬼界。把自己置于善法中，感染善良就会得到善报，这就是所说的人间天上。把自己置于恶法与善法之间，长期受到恶法与善法的感染，这就是所说的一半是地狱连着鬼界，一半是人间。把自己置于善法与恶法之外，感染的不是善也不是恶，这就是所说的预留果，或叫作一来果，又叫不还果。

多心经偈

【原文】 《多心经》偈曰：“揭帝揭帝，波罗揭帝，波罗僧揭帝，菩提萨摩诃。”又有《大明咒经》，鸠罗什所译，曰：“竭帝竭帝，波罗竭帝，波罗僧竭帝，菩提僧莎呵。”

【译文】 《多心经》（梵文音译）的颂词说：“揭帝揭帝，波罗揭帝，波罗僧揭帝，菩提萨摩诃。”另外，《大明咒经》（梵文音译），为鸠罗什所译，将这段颂词译作：“竭帝竭帝，波罗竭帝，波罗僧竭帝，菩提僧莎呵。”

天宫宝树

【原文】 “行行相值，茎茎相望。枝枝相准，叶叶相向。华华相顺，实实相当。”此《无量寿经》所言，天宫宝树，非尘世所有也。

【译文】 “每一行树都面对着另一行树，这棵树的树干望着另一棵树的树干，这棵树的树枝与另一棵树的树枝相当，这棵树的树叶与另一棵树的树叶对称，每棵树上的花都顺着同一个方向，每棵树结的果实大小都一样。”这是《无量寿经》上说的话。天宫中的宝树，不是尘世上所能有的。

白分黑分

【原文】 月盈至满，谓之白分；月亏至晦，谓之黑分。白前黑后合为一月。又曰，日随月后行，至十五日覆月都尽，是名黑半；日在月前行，至十五日具足圆满，是名白半。（“都尽”一作“都亏”）。

【译文】 月亮从圆到最圆（农历每月十五夜），称为白分；月亮从欠缺到最细昏暗，称为黑分。白分前黑分后合为一个月。又有一说，太阳跟在月亮后边运行，过十五天之后，把月亮都覆盖起来了，称为黑半；太阳在月亮前边运行，过十五天后月亮非常圆满，称为白半。（都尽，一作都亏）。

月双闰双

【原文】 十五夜为半月，两半月为一月，三月为一时，两时为一行，两行为一年，二年半为一双。此由闰，故以闰月兼本月，此谓月双，非闰双也，以五年再闰为闰双。

【译文】 每月十五日的夜间是半月，两个半月为一月，三个月称做一时（季），两时（季）称为一行，两行称为一年，两年半称为一双。这是因为时间有余数，因此以闰月兼本月，这叫做月双，不叫闰双。这五年之后，再次发生闰月，称为闰双。

逾缮那一由旬

【原文】 数量之称，谓逾缮那，四十里也。《毗昙论》四肘为一弓，五百弓为一拘卢舍，八拘卢舍为一由旬。一弓长八尺，五百弓长四百丈，一拘卢舍有二里，十六里为一由旬。

【译文】 关于计量单位的名称，有叫逾缮那的，长度为四十里。《毗昙论》上说，四肘（每肘长二十四指）称作一弓，五百弓称作一拘卢舍，八拘卢舍称作一由旬。一弓长度是八尺，五百弓长四百丈，一拘卢舍有二里，十六里称作一由旬。

七极微尘

【原文】 七级微尘成一阿耨池上尘，七阿耨尘为铜上尘，七铜上尘为水上尘，七水上尘为兔毫上尘，七兔毫上尘为一羊毛上尘。七羊毛上尘为一牛毛上尘，七牛毛上尘成一向游尘，七向游尘成一虬，七虬成一虱，七虱成一穞麦，七穞麦为一指，二十四指为一肘，四肘为一弓。

【译文】 七粒极小的尘土为一个阿耨池上尘，七个阿耨尘为一铜上尘，七个铜上尘为一水上尘，七个水上尘为一个兔毫上尘，七个兔毫上尘为一个羊毛上尘，七个羊毛上尘为一个牛毛上尘，七个牛毛上尘为一个向游尘，七个向游

尘为一个蚘，七个蚘为一个虱，七个虱为一个 麦，七个 麦为一指，二十四指为一肘，四肘为一弓。

宰相赠本生父母官

【原文】 封贈先世，自晉、宋以來有之，迨唐始備，然率不過一代，其恩延及祖廟者絕鮮，亦未嘗至極品。郭汾陽二十四考中書令，而其父贈止太保；權德輿位宰相，其祖贈止郎中。唐末五季、宰輔貴臣、始追榮三代，國朝因之。李文正公 本工部郎中超之子，出繼从叔紹。 再入相，表其事求贈所生父、祖官封，詔贈祖溫太子太保，祖母權氏莒國太夫人，父超太子太師，母謝氏鄭國太夫人。可謂異數，后不聞繼之者。

【译文】 封赠官员祖先官职，从晋、南朝宋以来就有了这个制度，到了唐代才完备，但一般不超过一代，其恩泽扩大到祖父的极少，即使封赠，官职也不会达到一品。郭子仪从唐肃宗乾元元年到唐德宗建中二年，任中书令期间，前后二十四次主持官吏的考绩，而他的父亲只封赠为太保；权德舆位至宰相，他的祖父只封赠为郎中。到了唐末五代，像宰相这样的尊贵大臣。才开始追赠三代，我朝也继承了这个传统。文正公李昉本来是工部郎中李超的儿子，过继给他的叔父李绍。李昉第二次任宰相时，上表叙述了过继给叔父为子之事，要求追赠生身父亲和祖父官职，天子下诏追赠他的祖父李温为太子太保，祖母权氏为莒国太夫人，他的父亲李超被追赠为太子太师，母亲谢氏为郑国太夫人。这种例子极为罕见，以后就没再听说有这样的封赠。

执政赠三代不同

【原文】 文臣封赠三代，自初除执政外，凡转厅皆不再该，唯知枢密院及拜相乃复得之。然旧法又不如是。欧阳公作程文简公琳父神道碑，历叙恩典曰：“琳参知政事，赠为太子少师。在政事迁左丞（系转一官），又赠太子太师。罢为资政殿学士，又赠太师、中书令。为宣徽北院使，又赠兼尚书令。”则是转官与罢政亦褒赠，而自官师得太师中令，更为超越。它或不然。

【译文】 文职大臣封赠三代官职，从开始任命为执政外，凡变换别的职务，都不再封赠，只有知枢密院事和封为宰相的人，才可以封赠三代。然而过去的

法令又不是这样。欧阳修为文简公程琳的父亲作神道碑铭，一一叙述朝廷的封赠说：“程琳任参知政事，朝廷追赠他的父亲为太子少师。程琳由参知政事改任左丞晋升一级，又封赠他父亲为太子太师。程琳罢为资政殿学士，又封赠他父亲为太师、中书令。后来程琳任宣徽北院使，又追赠其父为兼尚书令。”如此看来，晋升官职与解除职务也都褒赠他的父亲，而从太子太师加封为太师、中书令，更是超越官阶封赠。其他人就没有这种例子了。

唐孙处约事

【原文】 《新唐书·来济传》云：“初，济与高智周、郝处俊、孙处约客宣城石仲览家，仲览衍于财，有器识，待四人甚厚。私相与言志。处俊曰：‘愿宰天下。’济及智周亦然。处约曰：‘宰相或不可冀，愿为通事舍人足矣。’后济领吏部，处约始以瀛州书佐入调，济遽注曰：‘如志。’遂以为通事舍人。后皆至公辅。”《高智周传》云：“智周始与郝处俊、来济、孙处约共依江都石仲览。仲览倾产结四人欢，因请各语所期。处俊曰：‘丈夫惟无仕，仕至宰相乃可。’智周、济如之。处约曰：‘得为舍人，在殿中周旋吐纳可也。’后济居吏部，处约以瀛州参军入调，济曰：‘如志。’拟通事舍人。毕，降阶劳问平生。”案两传相去才一卷，不应重复如此，可谓冗长。本出韩琬所撰《御史台记》，而所载自不实。《处约传》“贞观中，为齐王监记室。监多过失，数上书切谏。王诛，太宗得其书，擢中书舍人。”是岁十七年癸卯。来济次年亦为中书舍人，永徽三年拜相，六年检校吏部尚书，是岁丁巳，去癸卯首尾十五岁。若如两传所书，大为不合，韩琬之说诚谬，史氏又失于不考。仲览乡里，一以为宣城，一以为江都，岂宣城人而家于广陵也？

【译文】 《新唐书·来济传》记载：“起初，来济与高智周、郝处俊、孙处约在宣城人石仲览家作客，石览衍很有钱，有气度有见识，对四个人很热情周到。私下时一块谈志向，郝处俊说：‘希望能作天下的宰相。’来济和高智周也一样。孙处约说：‘宰相或许不敢指望，希望当通事舍人足可以了。’后来来济作了吏部长官，孙处约才以前瀛州书佐的身份到吏部等待安排新职务，来济马上批示说：‘按他的志愿安排。’便被安排担任通事舍人。后来他们都作官作到皇帝身边的辅助处理国事的大官。”《新唐书·高智周传》记载：“高智周起初与郝处俊来济、孙处约一起投靠江都人石仲览。石仲览用全部资财供养四个人让他们高兴，于是请他们各自讲自己的期望。郝处俊说：‘大丈夫不作官则罢了，

作官就要作到宰相才行。’高智周、来济也像他一样讲。孙处约说：‘能够作舍人，在朝廷上办事发表意见就行了。’后来来济在吏部任职，孙处约以前瀛州参军的身份到吏部等待安排新职务，来济说：‘按他的志愿安排。’拟定为通事舍人。手续办完，离开座位慰问孙处约并询问分别后情况。”按两篇传相隔才一卷，不应该这样重复，可算是烦琐。两处记载是根据韩琬所撰写的《御史台记》，而所记载的实际不可靠。《新唐书·孙处约传》：“贞观年间，担任齐王李矗的记室。李矗过失很多，孙处约多次上书恳切劝谏。齐王被处死，唐太宗看到了孙处约的上书，提拔他担任中书舍人。”这一年是贞观十七年（643年）癸卯年。来济第二年也担任了中书舍人，永徽三年（652年）被任命为宰相，永徽六年（655年）担任检校吏部尚书，这一年是丁巳年，（译者按：永徽六年实为乙卯年——译者），距癸卯年从头到尾共十五年（译者按：实为十二三年）。如果像前面两篇传所记载的，就非常不相符合，韩琬的说法确实荒谬，写史书的人又因不考察而犯错误。石仲览的籍贯，一处记为宣城，一处记为江都，莫非他是宣城人而家住广陵呢？

夏侯胜京房两传

【原文】 《汉书·儒林传》，欲详记经学师承，故序列唯谨，然夏侯胜、京房，又自有传。《儒林》云：“胜其先夏侯都尉，以《尚书》传族子始昌。始昌传胜，胜又事同郡简卿。传兄子建，建又事欧阳高。”而本传又云：“从始昌受《尚书》。后事简卿，又从欧阳氏。从子建，师事胜及欧阳高。”《儒林》言：“房受《易》梁人焦延寿。以明灾异得幸，为石显所譖，诛。”凡百余字，而本传又云：“治《易》，事梁人焦延寿。其说长于灾变，房用之尤精。为石显告非谤政治，诛。”此两者近于重复也。若其它张禹、彭宣、王骏、倪宽、龚胜、鲍宣、周堪、孔光、李寻、韦贤、玄成、薛广德、师丹、王吉、蔡谊、董仲舒、眭孟、贡禹、疏广、马宫、翟方进诸人，但志姓名及所师耳。

【译文】 《汉书·儒林传》，打算详细记载经学师承的渊源，因此排列次序非常谨慎，但是夏侯胜、京房又各自有传。《儒林传》说：“夏侯胜的先人夏侯都尉，把《尚书》这门学问传授给同族兄弟的儿子夏侯始昌。夏侯始昌传给夏侯胜，夏侯胜拜同郡人简卿为师，又传授给哥哥的儿子夏侯建，夏侯建又拜欧阳高为师。”而《夏侯胜传》又载：“夏侯胜跟夏侯始昌学习《尚书》，后来向简卿求教，又向欧阳氏求学。侄子夏侯建拜夏侯胜和欧阳高为老师。”另外，《儒

林传》中说：“京房跟着梁这个地方的人焦延寿学《易经》。因为他通晓自然灾害和异常的自然规律而受到皇帝的宠幸，石显从中离间陷害，结果被杀。”而《京房传》又说：“跟随梁这个地方的人焦延寿研究《易经》，这一学说研究自然灾害的变化，京房运用得尤为娴熟。后来石显告发他诽谤政治，因而被杀。”这两条记载近乎重复。其它如张禹、彭宣、王骏、倪宽、龚胜、鲍宣、周堪、孔光、李寻、韦贤、玄成、薛广德、师丹、王吉、蔡谊、董仲舒、眭孟、贡禹、疏广、马宫、翟方进等人，仅只记载了姓名和他的老师。

汉人坐语言获罪

【原文】 汉昭帝时，有大石自立，僵柳复起。眭孟上书，言：“有从匹夫为天子，宜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霍光恶之，论以袄言惑众伏诛。案孟之妄发，其死宜矣。宣帝信任宦官，盖宽饶奏封事，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执金吾议以指意欲求禅，亦坐死。考其所引，亦不为无罪。杨惲之报孙会宗书，初无甚怨怒之语，其诗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张晏释以为言朝廷荒乱，百官谄谀。可谓穿凿。而廷尉当以大逆无道，刑及妻子。予熟味其词，独有所谓“君父至尊亲，送其终也，有时而既。”盖宣帝恶其君丧送终之喻耳。严助论汲黯辅少主守成，武帝不怒，实系于一时祸福云。贾谊、刘向谈说痛切无忌讳，文、成二帝未尝问焉，《随笔》记之矣。

【译文】 汉昭帝时，有一块大石头自己站立起来，有干枯了的柳树又挺直了躯干。眭孟上书说：“有从老百姓成为天子的人，现在应该寻求这位贤人，把帝位让给他，自己去做个百里以内的王侯。”霍光对这一言论甚为恼火，说他是妖言惑众，结果眭孟被杀。我认为眭孟妄发议论，他被杀是罪有应得。汉宣帝信任宦官，盖宽饶在上给天子密封的奏章说：“五帝（指黄帝、颡顓、帝喾、尧、舜）把天下看作是公共的，三王（夏禹、商汤、周文王）把天下看成是自家的就将帝位传给儿子，把天下看成是公共的就将帝位传给贤人。”执金吾（负责京城附近治安）议论时认为，这封密奏的用意是请求天子让位，也犯罪被杀。考查他所引用的典故，也不能说没罪。杨惲写的回报孙会宗的书信，起初也没有埋怨忿怒的语言，他在诗中说：“在南山那里种田，因为没有种好而荒芜了，种了一顷豆子，只落下一堆豆秆。”张晏解释说，这首诗的意思是说朝廷荒淫混乱，文武百官拍马奉承，这是穿凿附会。但廷尉审理此案时，说杨惲大逆不道，连

累老婆孩子跟着受刑。我仔细推敲书信，只有“君王和父亲是极为尊贵的亲人，为他们送终，时间再长也有结束的时候。”宣帝杀死他，是讨厌他用了君王死了去送终的比喻。严助曾经议论汲黯辅佐年少的君王保守国家的大业，汉武帝见了也未动怒，这实在是由一时的情况决定是祸是福啊！贾谊、刘向议论事情痛快淋漓而没有忌讳，汉文帝、汉成帝两人并未责怪他们。关于这些，我在《随笔》中已作了记述。

枢密书史

【原文】 景德四年，命宰臣王旦监修两朝正史；知枢密院王钦若、陈尧叟，参知政事赵安仁并修国史。后来执政入枢府，皆不得提举修书，非故事也。

【译文】 宋国宗景德四年（1007年），天子命宰相王旦监修太祖、太宗两朝国史；知枢密院事王钦若、陈尧叟，参知政事赵安仁一起参与本朝国史纂修。后来执政大臣担任枢密院和中书省官，都不能兼管修史事务，这和过去的做法不同。

知州转运使为通判

【原文】 今世士大夫既贵不可复贱。淳化中，北戎入寇，以殿前都虞候曹璨知定州，时赵安易官宗正少卿，以知州遂就徙通判。同时有罗延吉者，既知彭、祁、绛三州，而除通判广州；滕中正知兴元府而通判河南。袁郭知楚、郢两州，会秦王廷美迁置房州，诏崇义副使阎彦进知州，而以郭通判州事。范正辞既知戎、淄两州，而通判棣、深。又陈若拙历知单州、殿中侍御史、西川转运使，召归，会李至守洛都、表为通判；久之，柴禹锡镇泾州，复表为通判。连下迁而皆非贬降，近不复有矣。

【译文】 现在的士大夫已经高贵了便不能再卑贱。淳化年间，辽兵入侵，任命殿前都虞候曹璨为知定州，当时赵安易官阶是宗正少卿，由知州就地改任通判。同时期还有位名叫罗延吉的，已经先后任知彭州、知祁州、知绛州三处知州，而又被任命为广州通判；滕中正先任知兴元府而后任河南府通判。袁郭先任楚州、郢州二州知州，正赶上秦王赵廷美因罪被安置房州，诏令崇仪副使阎彦进任知房州，而任命袁郭为房州通判。范正辞在担任戎州、淄州二州知州

以后，又担任棣州、深州的通判。另外陈若拙在担任知单州、殿中侍御史、西川转运使以后，奉召回京，正赶上李至出任西京留守，上奏推荐得到批准任命陈若拙为河南府通判；较长时间以后，柴禹锡任知泾州，又上奏推荐得到批准任命陈若拙为泾州通判。职务接连下降而都不是因过失被处罚贬官，这种事近年不再有了。

范正辞治饶州

【原文】 范正辞太平兴国中，以饶州多滞讼，选知州事。至则宿系皆决遣之，胥吏坐淹狱停职者六十三人。会诏令料州兵送京，有王兴者，怀土惮行，以刃故伤其足，正辞斩之。兴妻上诉，太宗诏见正辞，庭辩其事。正辞曰：“东南诸郡，饶实繁盛，人心易动，兴敢扇摇。苟失控驭，则臣无待罪之地矣。”上壮其敢断，特迁官，充江南转运副使。饶州民甘绍者，为群盗所掠，州捕系十四人，狱具将死。正辞案部至，引问之，囚皆泣下。察其非实，命徙他所讯鞫。既而民有告盗所在者，正辞潜召监军掩捕之。盗觉遁去，正辞即单骑出郭二十里追及之。贼控弦持糶来逼，正辞大呼，以鞭击之，中贼双目，仆之。余贼渡江散走。被伤者尚有余息，旁得所弃赃，按其奸状伏法，十四人皆得释。此吾乡里事，而郡人多不闻之。

【译文】 范正辞在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因为饶州（今江西波阳）积压了很多未能解决的案件，派他任饶州知州。他到任后，迅速处理了积压的案件，把关押了很长时间的囚犯都予以释放，管理监狱的官吏因办案拖延被停职者六十三人。适逢天子下诏令安排州兵送往京城事宜，有个叫王兴的人，眷恋家乡，害怕远行，拿刀故意把脚砍伤，范正辞将他斩首。王兴的妻子上诉，太宗召见范正辞，在殿廷上辩论其事。范正辞说：“东南各郡，饶州最繁华兴旺，人心容易浮动，王兴煽动蛊惑别人，如果官府控制驾驭不住局势，那我连等待治罪的地方也找不到了。”太宗很欣赏他敢作敢为，特意升迁他的官职，让他当江南转运副使。饶州有个叫甘绍的百姓，被一群强盗劫掠，州里逮捕了十四人，已经审判完毕，将他们都定为死罪。范正辞巡视下属来到这里，把这些人召来询问，囚犯们都难过得流下了眼泪。范正辞发现案情不实，下令把他们迁往别处审讯。不久，百姓有来报告强盗所在的地方，范正辞暗中派监军突击搜捕。强盗们发觉后都逃跑了，范正辞便单人独骑出城追了二十里才追上了，强盗头子张弓搭箭，拿着长矛向他逼来，范正辞疾声大呼，用鞭击打，打伤了强盗头子的双眼，强

盗头子倒在地上，其余的强盗仓惶渡江四散而去。被击伤的强盗头子还有一口气，又从别处找到了他们丢弃的赃物，审问作案事实都供认，然后宣布判处死刑。被误捕误判定为死罪的十四人都得以释放。这是我家乡的事，但家乡的人知道者不多。

荣王藏书

【原文】 濮安懿王之子宗綽，蓄书七万卷。始与英宗偕学于邸，每得异书，必转以相付。宗綽家本有“岳阳”记者，皆所赐也，此国史本传所载。宣和中，其子淮安郡王仲麋进目录三卷，忠宣公在燕得其中稽，云：“除监本外，写本、印本书籍计二万二千八百三十六卷。”观一稽之目如是，所谓七万卷者为不诬矣。三馆秘府所未有也，盛哉！

【译文】 濮安懿王的儿子赵宗綽，藏书七万卷。开始和宋英宗一起在王宅内读书，宋英宗每次得到奇异的书，必定转回头送给赵宗綽。赵宗綽家的书里盖有“岳阳”印记的，都是宋英宗赐给他的，此事是国史赵宗綽传记载的。宣和年间，赵宗綽的儿子淮安郡王赵仲麋献给宋徽宗目录三卷，忠宣公（洪迈之父洪皓）在燕京得到第二卷，上面说：“除监本以外，写本、印本书籍共计二万二千八百三十六卷。”看一卷的书目这样多，所谓七万卷决不是胡说骗人了。三馆的藏书楼也没有这么多，了不起呀！

秦杜八六子

【原文】 秦少游《八六子》词云：“片片飞花弄晚，蒙蒙残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语句清峭，为名流推激。予家旧有建本《兰畹曲集》，载杜牧之一词，但记其末句云：“正销魂，梧桐又移翠阴。”秦公盖效之，似差不及也。

【译文】 秦少游《八六子》这首词写道：“片片飞花弄晚，蒙蒙残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语句清新峭拔，被名家推崇赞赏。我家过去藏有福建建阳刊印的《兰畹曲集》，内有杜牧之的一首词，只记得最后一句是“正销魂，梧桐又移翠阴。”秦少游的词是摹仿杜牧之的，似乎还差一些。

卷十四

祖宗亲小事

【原文】 太宗朝，吕端自谏议大夫、开封判官左迁卫尉少卿。时群官有负宿谴者，率置散秩，会置考课院，每引对，多泣涕，以不免饥寒为请。至端，即前奏曰：“臣罪大而幸深，苟得颍州副使，臣之愿也。”上曰：“朕自知卿。”无何，复旧官。逾月，拜参知政事。上留意金谷之务，一日尽召三司吏李溥等对于崇政殿，询以计司利害。溥等愿给笔札，于是二十七人共上七十一事。诏以四十四事付有司奉行，十九事下盐铁使陈恕等，议其可否，遣知杂御史监议，赐溥等白金缗钱，悉补侍禁、殿直，领其职。谓宰相曰：“溥等条奏事，亦颇有所长。朕尝语恕等，若文章稽古，此辈固不可望卿，钱谷利病，彼自幼至长寝处其中，必周知根本。卿但假以颜色，引令剖陈，必有所益。”恕不肯降意询问，旋以职事旷废，上召而责之，始顿首谢。王宾以供奉官充亳州监军，妻极妒悍。时监军不许挈家至任所，妻擅至亳州，宾具以白上。上召见其妻诘责，俾卫士交穢之，杖一百，配为忠靖卒妻，一夕死。陈州民张矩，杀里中王裕家两人，知州田锡未尝虑问，又诣阙诉冤。遣二朝士鞫之，皆云：“非矩所杀。”裕家冤甚，其子福应募为军，因得见，曰：“臣非欲隶军，盖家冤求诉耳！”太宗怒，付御史府治之，置矩于法，二朝士皆坐贬，锡洎通判郭渭，谪为海、郢州团练副使。饶州卒妻诉理夫死，至召知州范正辞庭辩。且夫引见散秩庶僚，而容其各有请；三司胥吏而引对正殿，命以官爵，听其所陈；一州都监而得自上奏，至召其妻责辱之；一卒应募，而得入见，遂伸家冤，为贬责吏。万机如是，安得不理？今之言典故者，盖未能尽云。

【译文】 宋太宗在位时，吕端从谏议大夫、开封判官贬为卫尉少卿。当时有很多受过处分的官员，只安排为闲散而无一定实际职守的官职，适逢设置考课院负责考核幕职、州县官功过，引对黜陟的，每逢天子召见臣僚询问时，这些人大都哭泣不已，请求天子怜悯自己，以免全家啼饥号寒之苦。到吕端引对时，却上奏说：“臣罪大但得到陛下的恩惠却很多，能够得到颍州副使的职务，臣已很满意了。”太宗说：“我自己了解你。”不久，恢复了以前的官阶。过了一

个月，任命他为参知政事。宋太宗注意钱粮财计事务，一天，他把三司的吏人李溥等全都召到崇政殿面谈，询问财政部门的利病。李溥等表示希望给他们纸和笔，于是二十七人共写出七十一条建议。宋太宗下诏命令把四十四条建议交有关部门去实行，十九条批转给盐铁使陈恕等，讨论是否可行，派知杂御史监督讨论，赏赐李溥等白银、铜钱，全都晋升为侍禁、殿直，继续担任原先的职务。宋太宗对宰相说：“李溥等人分条提出的建议，也有不少是别人想不到的。我曾经对陈恕等人讲，如果写文章引经据典，这些人固然无法同你相比，至于说到钱粮财计的利病，这些人从小到大长年地同财务打交道，必定完全了解事情的根本。你只要和颜悦色地接待他们，让他们分析问题陈述看法，必定有所收获。”陈恕不肯放下架子虚心询问，不久因为本职事务耽搁荒废，宋太宗召见而责备他，才磕头认错。王宾以供奉官的官阶担任亳州都监，妻子非常蛮横嫉妒。当时都监不许携带家属到任所，他的妻子擅自到了亳州，王宾如实申报宋太宗。宋太宗召见他的妻子质问并斥责她，让卫士你一下我一下地推她，打了一百大板，把她改嫁家忠靖军的士兵做妻子，一天晚上终于死去。陈州百姓张矩，杀死同村的王裕家的两个人，知州田锡不曾过问，王裕家的人又到京师向朝廷申诉冤屈。朝廷委派两员官员审理，都说：“不是张矩杀的。”王裕家的人感到冤枉极了，王裕的儿子王福响应召募当了兵，才有机会见到宋太宗，他说：“臣下我本不想当兵，是因为家里有冤屈寻求申诉罢了！”宋太宗大怒，把案件交御史台审理，对张矩依法处置，曾审理此案的两位官员都因此被贬官，田锡及通判郭渭，贬官改任海州、郢州团练副使。饶州士兵妻子申诉丈夫死得冤枉，竟至召知州范正辞当众辩论。而且引见被贬官担任有职无权职务的普通官员，而容许他们分别提出请求；三司的吏人则在正殿召见面谈，授予官爵，听他们陈述的意见；一个州都监就能自己上书，竟至召见他的妻子责备羞辱她，一个士兵响应召募入伍，而得到机会进宫面见皇帝，便伸雪了家中的冤屈，因此把有关官员处置贬官。国家事务这样处理，怎么能不天下大治？现在讲典章故事的，大约没能讲全。

王居正封驳

【原文】 绍兴五、六年间，王居正为给事中，时王继先方以医进，中旨以其婿添监浙江税务，录黄过门下，居正封还，高宗批三省将上，及二相进呈，圣训云：“卿等亦尝用医者否？”对曰：“皆用之。”曰：“所酬如何？”曰：“或与酒，

或与钱，或与缣帛，随大小效验以答其劳。”上曰：“然则朕宫中用医，反不得酬谢邪？文字未欲再付出，可以喻居正使之书读。”丞相退，即语居正曰：“圣意如此，是事亦甚小，给事不必固执。”居正唯唯，遂请对，上语如前，而玉色颇厉。居正对曰：“臣庶之家，待此辈与朝廷有异，量功随力，各致陈谢之礼。若朝廷则不然，继先之徒，以技术庸流，享官荣，受俸禄，果为何事哉？一或失职，重则有刑，轻则斥逐。使其应奉有效，仅能塞责而已，想金帛之赐，因自不少。至于无故增创员阙，诚为未善，臣不愿陛下辄起此门。”上悟曰：“卿言是也。”即日下其奏，前降指挥更不施行。居正之直谅有守，高宗之听言纳谏，史录中恐不备载，故敬书之。迈顷闻之于张九成。

【译文】 我朝高宗绍兴五、六年（1135年、1136年）间，王居正任给事中，当时王继先正以医术受重用，宫中传旨让他的女婿增添为监察浙江税务。当中书省据天子旨意起草诏令，以黄纸录送门下省，经过给事中衙门时，居正拒绝接受，把圣旨退了回去。高宗批示令三省长官携带有关文件进宫，待两位宰相将有关文件进呈时，高宗说：“你们曾经请过医生吗？”两位宰相回答说：“都请过医生。”高宗说：“你们给医生什么报酬？”二人回答说：“或者给酒，或者给钱，或者给布疋，这要根据看病的效果好坏而定。”高宗说：“难道朕在宫中用医生，反而得不到报酬吗？录黄文字不必再拿出去了，可向王居正说明，让他起草并书写出正式公文。”丞相退朝后，就对居正说：“皇上的意见就是这样。这本是一件小事，给事中不要再固执己见了。”居正点头称是，便请求面见皇上。高宗把以前说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而颜色非常严厉。居正回答说：“一般老百姓的家庭，对待医生这样的人，和朝廷不同，他们根据医生的看病的效果和本人的力量，各自拿出酬谢的礼物。而朝廷就不一样了，像王继先这些人，以平庸的医术，享荣华，拿俸禄，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如果万一失职，重则受到刑罚，轻则受到呵斥贬谪，让他在宫中奔走效劳，仅能做到完成本职工作而已，臣料想金银布疋一类的赏赐，肯定不少了。如果无缘无故增加官员的名额，确实不是好办法，为臣不愿陛下随便开这个口。”高宗省悟说：“你说的对。”当天就批发了他的奏章，以前说要给王继先之婿增官的圣旨不再施行。王居正正直有操守，高宗能够采纳臣下的批评建议，国史实录中恐怕不会有具体记载，因此恭敬地把这件事记下来。这是我不久以前从张九成那里听到的。

王元之论官冗

【原文】 省官之说，昔人论之多矣，唯王元之两疏，最为切当。其一云：“臣旧知苏州长洲县，自钱氏纳土以来，朝廷命官，七年无县尉，使主簿兼领之，未尝阙事。三年增置尉，未尝立一功。以臣详之，天下大率如是。诚能省官三千员，减俸数千万，以供边备，宽民赋，亦大利也。”其二云：“开宝中，设官至少，臣占籍济上，未及第时，止有刺史一人，李谦溥是也，司户一人，孙贲是也。近及一年，朝廷别不除吏。自后有团练推官一人，毕士安是也。太平兴国中，臣及第归乡，有刺史、通判、副使、判官、推官、监军，监酒榷税算又增四员，曹官之外更益司理。问其租税，减于曩日也，问其人民，逃于昔时也，一州既尔，天下可知。冗兵耗于上，冗吏耗于下，此所以尽取山泽之利而不能足也。”观此二说，以今言之，何止于可为长太息哉！

【译文】 减少官员的主张，前人谈论已很多了，只有王元之的两个奏疏，讲得精采确切。其中一个奏疏说：“臣过去曾当过苏州长洲县知县，那里自从钱叔归附宋朝以来，朝廷派去的官员，七年之间没有县尉，让主簿兼领他的职务，一件事也没有延误过，设置了三年县尉，没有立过一次功。臣仔细考虑过，天下的情况大致和长洲县相同。如果能减少三千名官员，减少俸禄支出数千万两，用这些钱供给边防，减轻百姓负担，对国家是大有益处的。”第二个奏疏说：“宋太祖开宝年间，设置的官员很少，臣的籍贯是济州（今山东巨野县南），我没有考中进士时，济州只有刺史一人，就是李谦溥，司户一人，就是孙贲。有将近一年，朝廷没有在济州再安排官吏。以后又增加团练推官一人，就是毕士安。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我考中进士回到家乡，本州有刺史、通判、副使、判官、推官、监军、监酒榷税算，又增加四员官，曹官以外又增加了司理。问本州的税收，比过去反而减少了，问本州户口，比过去逃亡的多了，一州既然这样，天下的情况也可知道。过多的军队耗费得最多，过多的官员耗费的比军队稍差，这就是把山林川泽的潜力都用尽了也不能满足财政需要的根本原因。”看了他的这两段话，拿今天的情况作对照，何止是要长长地叹息呢？

梁状元八十二岁

【原文】 陈正敏《遁斋闲览》：“梁灏八十二岁，雍熙二年状元及第。其谢启云：‘白首穷经，少伏生之八岁；青云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后终秘书监，卒年九十余。”此语既著，士大夫亦以为口实。予以国史考之，梁公字太素，雍熙二年，廷试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学士知开封府，暴疾卒，年四十二。子固亦进士甲科，至直史馆，卒年三十三。史臣谓：“梁方当委遇，中途夭谢。”又云：“梁之秀颖，中道而摧。”明白如此，遁斋之妄不待攻也。

【译文】 陈正敏著的《遁斋闲览》说：“梁灏八十二岁那年，于太宗雍熙二年（985年）考中进士科第一名状元。他在写给朝廷的谢表说：‘头发白了还在研究经典，比秦末汉初人，精通《尚书》的伏生，仅小八岁；在青云中找到仕进的道路，比姜太公还大两岁。’后来梁灏官做到秘书监，死时已九十余岁。”这番话流传很广，士大夫也认为这是事实。我考查本朝历史，梁灏字太素，雍熙二年，殿试时考中甲科，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他以翰林学士的身份任开封府知府，得暴病而死，那年他四十二岁。他的儿子梁固也考中了进士甲科，在史馆，死时三十三岁。写国史的人评论说：“梁灏正当受到信任之际，突然中途死去。”又说：“梁灏聪明敏捷，突然中年去世。”这些记载如此明白，《遁斋闲览》一书的荒谬也就不言自明了。

太宗恤民

【原文】 曾致尧为两浙转运使，尝上言：“去岁所部秋租，惟湖州一郡督纳及期，而苏、常、润三州，悉有逋负，请各按赏罚。”太宗以江、淮频年水灾，苏、常特甚。致尧所言，刻薄不可行，因诏戒之，使倍加安抚，勿得骚扰。是事必已编入《三朝宝训》中，此国史本传所载也。

【译文】 曾致尧任两浙转运使，曾上奏说：“去年管辖地区的秋税，只有湖州一个州按时催征缴纳，而苏州、常州、润州三州，都有拖欠，请求分别按规定奖赏惩罚。”宋太宗认为长江、淮河流域连年水灾，苏州、常州特别厉害。曾致尧所讲的，过于严厉行不通，便下诏书告诫他，让他努力安抚百姓，不准骚扰百姓。此事必定已经编进了《三朝宝训》里面，这是国史中曾致尧传记所

记载的。

潘游洪沈

【原文】 绍兴十三年，敕令所进书删定官五员，皆自选人改秩。潘良能季成、游操存诚、沈介德和伯、兄景伯，皆拜秘书省正字，张表臣正民以无出身，除司农丞，四正字同赴馆供职。少监秦伯阳于会食之次，谓坐客言，一旦增四同舍，而姓皆从水傍，穰有一句，愿诸君为对之，以成三馆异日佳话，即云：“潘游洪沈泛瀛州。”坐客合词赏叹，竟无有能对者。予因记《笔谈》所载，元厚之绛少时，曾梦人告之曰：“异日当为翰林学士，须兄弟数人在禁林。”厚之自思，素无兄弟，疑为不然。及熙宁中除学士，同时相先后入院者，韩维持国、陈绎和叔、邓綰文约、杨绘元素、名皆从系，始悟兄弟之说。欲用“绛绎绘维綰纶穰”为对，然未暇考之史录，岁月果同否也。

【译文】 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年），天子下诏要进用五个书籍删定官，都是从低级文臣寄禄官，即幕职州县官改为京官。潘良能（字季成）、游操（字存诚）、沈介德（字和伯）和他的哥哥洪适（字景伯），都任命为秘书省正字，职掌是订正典籍讹误，张表臣（字正民）因为不是科举出身，被任命为司农丞，四位秘书省正字的官员同一天到馆阁任职。秘书省少监秦伯阳在会餐的时候对在座的人说：“一日之间我增加了四个同伴，而他们的姓都带水字旁，我秦伯阳有一句话，请诸位对出下半联，以便成为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三馆将来一段佳话，随口就说：“潘游洪沈泛瀛州。”这里潘，指潘良能；游，指游操；洪，指洪适；沈指沈介德。瀛州为双关语，一作仙境胜地，一作秘书监。这句话的意思是潘游洪沈四人同在仙境瀛州乘船游览。在座的人一致赞叹不已，但没有人能对出下半联。我记得《梦溪笔谈》中曾记载，元绛（字厚之）年轻时，曾梦见有人告诉他：“将来你可能当翰林学士，但是须要弟兄数人在翰林院。”元绛心想，自己本来就没有弟兄，怎会弟兄几人同在翰林院？怀疑这梦不会应验。到神宗熙宁年间，果真当了翰林学士，同时和他先后进入翰林院的有韩维（字持国）、陈绎（字和叔）、邓綰（字文约）、杨绘（字元素），名字都有系字偏旁，才省悟出都是兄弟这一道理。我打算用“绛绎绘维綰纶”来当下联，这句话的意思是：韩绛、陈绎、杨绘、韩维四人同在一起起草诏书。但没有时间去考证历史记载，这几个人进入翰林院的时间是否相同。

舞鸥游蜻

【原文】 战国时，诸子百家之书，所载绝有同者。《列子·黄帝篇》云：“海上之人有好沕（音鸥）鸟者，每旦之海上从沕鸟游，沕鸟之至者百数而不止。其父曰：‘吾闻沕鸟皆从汝游，汝取来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沕鸟舞而不下也。”《吕览·精喻篇》云：“海上人有好蜻（蜻蜓也）者，每朝居海上从蜻游，蜻之至者百数而不止，前后左右尽蜻也，终日玩之而不去。其父告之曰：‘闻蜻皆从汝居，取而来，吾将玩之。’明日至海上，蜻无至者矣。”此二说如出一手也。

【译文】 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书，所记载的有特别类似的。《列子·黄帝篇》记载：“海边的人有一位喜欢海鸥的，每天早晨到海边和海鸥玩耍，海鸥飞来找他的数以百计而且还陆续增加。他的父亲说：‘我听说海鸥都愿跟你玩耍，你抓一只给我玩。’明天到海边，海鸥飞舞而不落下。”《吕氏春秋·精喻篇》记载：“海边有个人喜欢蜻蜓，每天早晨到海边跟蜻蜓玩耍，蜻蜓飞来找他的数以百计而且还陆续增加，他的前后左右都是蜻蜓，他整天玩蜻蜓而不离开。他父亲对他说：‘我听说蜻蜓都愿和你呆在一起，抓几只回来，我要玩蜻蜓。’第二天他到了海边，蜻蜓没有来找他的了。”这两则记载就像是同一个人写的。

郎中用资序

【原文】 国朝官制既行，除用职事官，不问资序高下，但随阶品，而加行、守、试以赋禄，郎中、员外郎亦自为两等，颇因履历而授之。后来相承，必欲已关升知州资序者为郎中，于是拜员外郎者具改官后实历岁月申吏部，不以若干任，但通理细满八考则升为知州，乃正作郎中，别命词给告。顷尝有旨，初除郎官者，虽资历已高，且为员外，候吏部再申，然后升作郎中。近岁掌故失之，故李大性自浙东提刑除吏部，时佐自大理正除刑部，徐穉自大府丞除都官，岳震自将作少监除度支，其告内即云郎中，与元指挥戾矣。

【译文】 宋朝元丰年间新官制施行以后，任用掌管实事的官员，不问资格高低，只随该官员的阶品高低，在官职前面加上行、守、试等字样分三等以确定俸禄多少，郎中、员外郎也分为两等，根据他任职的履历情况来定官职。后来继承了这种传统，必须把已经具备要升为知州资格的人作为郎中，于是，任

员外郎的都要把升为京官后的实际年月报到吏部，不以干满几任作为考核的根据，而是改为合计各次任职共计通过八次考核的就升为知州，才能正式作郎中，另外撰写制书发给告命。不久前，曾经有旨，初次任命为郎官者，虽然资历已经很高，并且已经担任了员外郎职务者，等吏部再申报时，才能升作郎中。近来，这一传统已经没有了，因而李大性由浙东提刑升为吏部尚书，时佐由大理正卿升为刑部尚书，徐 由太府丞升为都官郎官，岳震由将作少监升为度支使，在发布的任命文告中就称他们是郎中，这和原来郎中的规定是不相同的。

台谏分职

【原文】 台、谏不相见，已书于《续笔》中，其分职不同，各自有故实。元丰中，赵彦若为谏议大夫，论大臣不以道德承圣化，而专任小数，与群有司较计短长，失具瞻体。因言门下侍郎章子厚、左丞王安礼，不宜处位。神宗以彦若侵御史论事，左转秘书监。盖许其论议，而责其弹击为非也。元璽初，孙觉为谏议大夫，是时谏官、御史论事有分限，毋得越职。觉请申《唐六典》及天禧诏书，凡发令造事之未便，皆得奏陈。然国史所载，御史掌纠察官邪，肃正纲纪；谏官掌规谏讽谕，凡朝政阙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失当，皆得谏正。则盖许之矣。唐人朝制，大率重谏官而薄御史。中丞温造道遇左补阙李虞，恚不避，捕从者笞辱。左拾遗舒元褒等建言：“故事，供奉官惟宰相外无屈避，造弃蔑典礼，辱天子侍臣。遗、补虽卑，侍臣也；中丞虽高，法吏也。侍臣见陵，法吏自恣，请得论罪。”乃诏台官、供奉官共道路，听先后行，相值则挥。然则居此二雄职者，在唐日了不相谋云。

【译文】 御史台官和谏官不许互相会见，已记述在《容斋续笔》卷三里了，它们的职责不同，各自有过去的实际事例。元丰年间，赵彦若担任谏议大夫，批评有些大臣不弘扬道德推广皇帝圣明的教化，而专门玩弄小权术，与下属有关官员计较长短，有失身份。接下去就讲门下侍郎章子厚（章 ）、尚书左丞王安礼，不适合再担任原官职。宋神宗认为赵彦若说了应该由御史说的事情，降级调任秘书监。大约是赞成他的说法，而责罚他超越本职的失误。元璽初年，孙觉担任谏议大夫，当时谏官、御史议论政事各有界限，不许超越本职范围。孙觉请求重申《唐六典》和天禧年间诏书中的有关规定，凡是朝廷颁布命令举措设施有不适宜的，都可以上奏陈述。然而国史记载，御史负责纠正检察官员的错误或罪行，严肃端正法纪；谏官负责规劝谏阻和开导皇帝，凡是朝廷施政有疏

漏过错，重要高级官员以至普通官员任用不适当，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以至各级官署，办事不适当，都可以向朝廷提出纠正意见。这样看来孙觉的建议大概是被采纳了。唐朝的制度，大抵重视谏官而轻视御史。御史中丞温造在道路上与左补阙李虞相遇，很气愤李虞不给他让路，抓住李虞的随从人员用鞭子抽打辱骂。左拾遗舒元褒等上奏提出：“按照过去惯例，皇帝身边的侍从官除宰相以外不给其他任何官员让路退避，温造蔑视制度和礼法，侮辱皇帝身边的侍从官。拾遗、补阙品阶虽然低下，是皇帝的侍从官；御史中丞品阶虽然高，是普通的执法官。皇帝侍从官受侮辱，执法官任所欲为，请论定执法官的罪。”便下诏规定御史台官、侍从官同在一条路上同向行走，听任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地走，相遇则作揖行礼。这样看来担任这两种令人生畏的职务的人，在唐朝时完全互不协调的。

贞元朝士

【原文】 刘禹锡《听旧宫人穆氏唱歌》一诗云：“曾陪织女度天河，记得云间第一歌。休唱贞元供奉曲，当时朝士已无多。”刘在贞元任郎官、御史，后二纪方再入朝，故有是语。汪藻始采用之，其《宣州谢上表》云：“新建武之官仪，不图重见；数贞元之朝士，今已无多。”汪在宣和间为馆职符宝郎，是时，绍兴十三、四年中，其用事可谓精切。迈尝四用之，《谢侍讲修史表》云：“下建武之诏书，正尔恢张于治具；数贞元之朝士，独怜流落之孤踪。”以德寿庆典，曾任两省官者迁秩，蒙转通奉大夫，谢表云：“供奉当时，敢齿贞元之朝士；颂歌大业，愿赓至德之中兴。”充永思陵桥道顿递使，转宣奉大夫，谢表云：“武德文阶，愧三品维新之泽；贞元朝士，动一时既往之悲。”主上即位，明堂礼成，谢加恩云：“考皇暨明堂之故，操以举行；念贞元朝士之存，今其余几。”亦各随事引用。近者单夔以知绍兴府进文华阁直学士，谢表云：“数甘泉法从之归，真贞元朝士之余。”夔当淳熙中虽为侍郎，然一朝名臣尚多，又距今才十余岁，似为未稳贴也。

【译文】 刘禹锡的《听旧宫人穆氏唱歌》一诗说：“曾陪织女度天河，记得云间第一歌。休唱贞元供奉曲，当时朝士已无多。”刘禹锡在唐德宗贞元年间任郎官、御史，被贬出朝，过了二十四年，才再次入朝，因此才有当年朝廷上的官员存者已经不多的感叹。汪藻开始采用了刘禹锡说法，他的《宣州谢上表》说：“汉光武帝建武年间制订的新的制度，不料想今日能重新得见；数一数

贞元年间留下的朝中有志之士，现在留下来的已经不多了。”汪藻在宣和年间任馆职符宝郎，掌管宫内符玺，写谢表时是绍兴十三、四年（1143年、1144年）间，用事用典可称得上精确恰当。我曾经四次使用刘禹锡这个典故，《谢侍讲修史表》中说：“天子下了像建武年间那样的诏书，正是恢宏张大治理国家的至治之具；数一数贞元年间朝中的官员，我只可怜那些被贬谪流落的孤独无依的人。”因为德寿宫宋高宗过生日，曾经担任两省（门下省与中书省）官员的都升官，我蒙恩晋升为通奉大夫，谢表中说：“我在当时若侍奉天子左右，敢和贞元年间朝廷上的士子并列；歌颂当今天子的伟大功业，祝愿能和唐肃宗至德年间的中兴再现。”担任永恩陵（宋高宗赵构的陵墓）桥道顿递使，转为宣奉大夫，谢表中说：“我像唐高祖武德年间的文阶官员一样，享受三品官的待遇使人惭愧；想起贞元年间朝中官员的遭遇，又引发了我对那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的悲哀。”孝宗即位，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的明堂建成，我在所上谢加恩表说：“考查宋仁宗皇蠡年间明堂的那些规矩，操练之后再举行；想起像唐德宗贞元年间留存下来的朝中士大夫，今天我朝还有几人呢？”这些都是引用了刘禹锡的这一典故。最近单夔以绍兴府知府的身份升为文华阁直学士，谢表中说：“我好似汉代在甘泉宫跟随车驾的侍从，真像唐德宗贞元年间余留下来的士子。”单夔在孝宗淳熙年间虽然担任侍郎，但当时朝中名臣还有很多，离现在才十几年。在谢表中引用汉、唐时的典故，并不一定妥当。

表章用两臣字对

【原文】 表章自叙以两“臣”字对说，由东坡至汪浮溪多用之。然须要审度君臣之间情义厚薄，及姓名眷顾于君前如何，乃为合宜。坡《湖州谢表》云：“知臣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臣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登州表》云：“于其党而观过，谓臣或出于爱君；就所短以求长，知臣稍习于治郡。”《侍读谢表》云：“谓臣虽无大过人之才，知臣粗有不欺君之实，欲使朝夕与于讨论。”《颖州表》云：“意其忠义许国，故暂召还；察其老病畏人，复许补外。”汪《谢徽州》云：“谓臣不改岁寒，故起之散地；察臣素推月旦，故付以本州。”《为陆藻谢给事中》云：“知臣椎钝无他，故长奉贤王之学；悯臣践扬滋久，故亟升法从之班。”《为汪枢密谢子自虜中归不令人城降诏奖谕表》云：“知臣齿发已凋，常恐邓攸之无后；怜臣肺肝可见，有如去病之辞家。”凡此所言，皆可自表于君前者。刘梦得《代窦群容州表》，有“察臣前任事实，恕臣本性朴愚”之句，坡

公盖本诸此。近年后生假倩作文，不识本体，至有碌碌常流，乍得一垒，亦辄云知臣察臣之类，真可笑也。

【译文】 奏章叙述自己的情况用两个“臣”字对说，从苏东坡（苏轼）到汪浮溪（汪藻）这样用的时候很多。然而必须估量君主和自己之间的情义厚薄，以及自己在君主心目中的地位怎样，才算适当。苏东坡《湖州谢表》说：“知道‘臣（我）’愚蠢不合时宜，难以追随陪同新被提拔的这些人；了解‘臣（我）’年纪大了不生事端，或许能管理百姓。”《登州表》说：“通过交往而考察过失，认为‘臣（我）’的过错原因可能是出于对君主的爱戴；就着短处而寻求长处，知道‘臣（我）’比较适合管理州郡。”《侍读谢表》说：“认为‘臣（我）’虽然没有特别超出常人的才能，知道‘臣（我）’基本具备不欺骗君主的诚实，想让我早晚参加国事的讨论。”《颖州表》说：“皇上想到我忠义献身国家，所以暂时召回朝廷；皇上了解我年老怕人诬陷，又准许我担任外地职务。”汪浮溪《谢徽州》说：“认为‘臣（我）’不改坚贞不屈的本色，所以从闲散的职务上起用担任重要职务；了解‘臣（我）’素来被舆论所推许所以把本州交付给我管理。”《为陆藻谢给事中》说：“知道‘臣（我）’迟钝没有其他坏心，所以长时间地让我事奉贤王学习；怜悯‘臣（我）’科举考中后时间颇久，所以赶快把我提拔进侍从官的行列。”《为汪枢密谢子自虜中（原注：一作“敌境”）归不令入城降诏奖谕表》说：“知道‘臣（我）’牙齿头发已经脱落，常常担心我像晋朝邓攸那样死后没有继承人；爱惜‘臣（我）’内心想的可看清，就像霍去病拒绝汉武帝为他建造府第一样。”这里所列举的言语，都是可以向君主表白自己心愿的。刘梦得（刘禹锡）《代窦群容州表》，里面有“了解‘臣（我）’前任期间的表现，宽恕‘臣（我）’本性的质朴愚钝”的句子，苏东坡大概是效法它。近年来后生们替别人写文章，不懂得事情分寸，甚至有碌碌无为的平庸之辈，初次被任命为某州县长官，也随便地讲“知道臣”、“了解臣”之类的字眼，真是可笑。

刘梦得谢上表

【原文】 郡守谢上表，首必云：“伏奉告命授臣某州，已于某月某日到任上讫。”然后入词。独刘梦得数表不然。《和州》者曰：“伏奉去年六月二十五日制书，授臣使持节和州诸军事，守和州刺史。臣自理巴犢，不闻善最，恩私忽降，庆失容。臣某中谢。伏惟皇帝陛下丕承宝祚，光阐鸿猷，有汉武天人之姿，稟周成睿哲之德。发言合古，举意通神，委用得人，动植咸悦，理平之速，

从古无伦。微臣何幸，获睹昌运。臣业在辞学，早岁策名。德宗尚文，擢为御史。出入中外，历事五朝，累承恩光，三换符竹。分忧之寄，禄秩非轻，而素蓄所长，效用无日。臣闻一物失所，前王轸怀，今逢圣朝，岂患无位。臣即以今月二十六日到所任上讫。伏以地在江、淮，俗参吴、楚，灾旱之后，绥抚诚难。谨当奉宣皇风，慰彼黎庶，久于其道，冀使知方。伏乞圣慈俯赐昭鉴。”首尾叙述皆与他人表不同。其《夔州》、《汝州》、《同州》，《苏州》，诸篇一体。迈长子穉常称颂之。及为太平州，遂拟其体，代作一表。其词云：“臣迈言：伏奉今年九月十七日制书，授臣知太平州者。一麾出守，方切兢危，三命滋共，弗容控避。仰皇天之大造，扣丹地以何言！中谢。恭惟皇帝陛下睿知有临，神武不杀，慕舜之孝，见尧于墙，德冠古今而独尊，仁并清宁而遍覆。明见万里，将大混于车书；子来庶民，更精求于岳牧。臣家本儒素，时无令名，滥竽宏博之科，税驾清华之地，瀛山抱槩，郎省握兰。在绍兴之季年，污记注于右史。龙飞应运，凤历纪祥，不遗细微，兼取愚钝，遂以词赋之职，获侍清闲之欢。虽宿命应仙，许暂来于天上，而尘心未断，旋即堕于人间。一去十八年之中，三叨二千石之寄，未繇金华郡，还褰石室书，从珍台闲馆之游，劝广厦细旃之讲。真拜学士，号名私人，受九重知己之殊，极三入承明之幸，使与大议，不专斯文。而臣弱羽不足以当雄风，蹇步不足以胜重任。上恩惜其终弃，左符宠其余生。李广数奇，徒羨侯于校尉；汲黯妄发，敢叹薄于淮阳。臣即以今月二十八日到任上讫。伏以郡在江东，昔称道院；地邻淮右，今谓壮藩。谨当宣布恩威，奉行宽大，求民之瘼，问俗所宜。缓带轻裘，虽弗贤长城于李禦；清心省事，敢不避正堂于盖公。庶几固结本根，少复报酬知遇。”全规模其步骤，然视昔所作，犹觉语烦。

【译文】 当郡守的到任后在上给朝廷的谢表，开头必说：“臣奉告命任命为某州知州，已于某月某日上任。”然后进入正文。只有刘梦得数次上表不是这样，《和州到任谢表》中说：“去年六月二十五日接到天子的命令，授予臣持符节主持和州军事，守和州刺史。臣自从治理巴州（今四川东部一带）人以来，没有突出政绩而得到表彰，陛下忽然降给了我恩惠，使我高兴得失去了常态。臣某表示由衷感谢。皇帝陛下继承了天子宝位，运用远大的谋略治理国家，有汉武帝这样出类拔萃的风姿，有周成王聪颖贤能的美德。所发表的言论合乎古礼，一举一动，意向都和神明相合，任用的人都很合适，人和自然界都感到高兴，治理国家速度之快，从古到今都没有过。像我这样低级的官员有多么幸运，能够亲眼看到国家太平盛世的变化。为臣的未来是学习辞学的，早年科举得中步入仕途，德宗尊重文人，提拔我为御史，出入朝内朝外，先后侍奉过五个帝王，累

次受到恩宠，三次担任郡守。陛下希望我能为国分忧，给我的俸禄已经很厚，我将把平日所学的知识、全部报效国家。臣听说一人安置不妥当，前朝天子就会痛念不已，如今正逢圣明的天子在位，不用担心没有位置。臣已在这个月二十六日到指定的地点上任报到。臣管辖之地在长江、淮河之间，风俗与吴、楚不同，旱灾之后，抚恤非常困难。我会很恭敬谨慎地执行天子的政策，安慰那些受灾的百姓，时间长了，他们就知道天子的关怀了。这一切都请陛下明察。”此表的首尾叙述都与他人的谢表不同。他的《夔州到任谢表》、《汝州到任谢表》、《同州到任谢表》、《苏州到任谢表》，也都是用的这个格式。我的大儿子洪梓经常称赞背诵这些谢表，我任太平州（今安徽当涂）知州后，他就仿照这种体例，替我作了一个谢表，全文是：“臣洪迈上言：今年九月十七日接到陛下命令，任命我为太平州知州。从京官改为地方官，心中战战兢兢，按臣出生的年、月、日三命推算，该有一次到地方任职的机会，不能回避。蒙皇天给我以大恩，我凭一颗赤诚的心办事，还有什么好说！恭贺皇帝陛下睿知聪明，临朝治理天下，神明威武，从不妄行杀戮。羡慕大舜的孝心、再现尧的风度，德行古今无人能比而独一无二。仁爱而又清正寡欲，天下百姓皆蒙受恩惠。明察万里，使国家制度得于统一。爱护养育百姓，精心选拔地方官吏。为臣家中世代都是读书人，在当世并无美名，滥竽充数考中了宏词博学一科，在清高显贵的衙门找到了归宿之地，在翰林院校勘书籍，在尚书省担任史官。绍兴末年，才有幸跻身于右史的行列。陛下即位是交了好运，隆兴这个年号代表着祥瑞，天子不遗弃有小小才能的人，即使愚笨的也照样收录，我便以词人的身份，得到了修起居注的清闲官职。这虽然是臣命中注定，天帝允许我暂时在天宫一般的朝廷上作事，但因尘凡之心未能消除，不久便又都堕入人间被调到外地任职。在离开都城的十八年之中，三次担任郡守，后来由金华郡守，回到京城后缀集石室金匱之书，因修国史能在国家珍藏的秘籍中随意读书，又因任读讲官能为居住在广厦之下、帷帐之内、旃茵之上为天子讲解历史。天子任命我为龙图阁学士，掌管收藏太宗御书、御制文集等事，成为天子的私臣，受陛下的知遇之恩可说是到了顶点。多次被召进宫内受到个别接见的宠遇，让我议论朝政，不专门修史，真是荣幸之至！但是为臣我好比柔弱的羽毛挡不住雄风的袭击，又好比行走艰难的人不足以担当重任。陛下皇恩浩荡，怕我最后有被抛弃的处境，让我去地方担任太守，使我的余生得到优待。汉代李广晚年遭遇不幸，立有大功未能封侯，只能羡慕校尉的赫赫权势；汲黯好发议论，被汉武帝贬往淮阳任太守，最后死去，其遭遇令人叹息！为臣已在这个月二十八日到达任所。臣所辖之郡地处江东，因为道人众多，过去称为道院；该地邻接淮右，现在是国家比较大的藩郡。臣一定

恭敬地宣传陛下的恩德，执行陛下宽大政策，了解百姓的疾苦，探讨哪些风俗应保留，哪些应去掉。雍容大度，从从容容治理地方，虽然不敢说能像唐代的天子倚为长城的李 那样，但却可以清似省事使百姓自然安定，我敢和汉代曹参避开正室让盖公居住的盖公媲美。这样一来，或许能使国家的根本得到巩固，以此报答陛下的知遇之恩。”此表全部仿效刘梦得所作谢表的格式，然而与刘禹锡的奏章相比，仍然觉得语句烦琐。

陈简斋葆真诗

【原文】 自崇宁以来，时相不许士大夫读史作诗，何清源至于修入令式，本意但欲崇尚经学，痛沮诗赋耳，于是庠序之间以诗为讳。政和后稍复为之，而陈去非遂以《墨梅绝句》擢置馆阁。尝以夏日偕五同舍集葆真宫池上避暑，取“绿阴生昼静”分韵赋诗，陈得“静”字。其词曰：“清池不受暑，幽讨起予病。长安车辙边，有此万荷柄。是身唯可懒，共寄无尽兴。鱼游水底凉，鸟语林间静。谈余日亭午，树影一时正。清风不负客，意重百金赠。聊将两鬓蓬，起照千丈镜。微波喜摇人，小立待其定。梁王今何许，柳色几衰盛。人生行乐耳，诗律已其剩。邂逅一尊酒，它年《五君咏》。重期踏月来，夜半啸烟艇。”诗成出示坐上，皆诧为擅场。朱新仲时亲见之，云京师无人不传写也。

【译文】 自崇宁年以后，当时的宰相不许士大夫读史书、作诗，何清源甚至把这写进了法规，他们的用意只是想崇尚经学，狠狠地压抑诗赋罢了，于是学校里面以作诗为忌讳。政和年以后渐渐又允许作诗了，而陈去非（陈与义）便因为写了《墨梅绝句》一诗被提拔安排在三馆任职。他曾在夏天偕同四位同事到葆真宫内的湖上避暑集会，取“绿阴生画静”一句的五个字作为韵脚分给五个人分别作诗，陈与义得到“静”字。作的诗是：“清池不受暑，幽讨起予病（清彻的湖水不接受暑热，寻幽探胜能治能愈我的疾病）。长安车辙边，有此万荷柄（都城大道旁，有这样长满荷花的大片池塘）。是身唯可懒，共寄无尽兴（我们应当把身体高卧水旁，共同享受这无穷无尽的乐趣）。鱼游水底凉，鸟语林间静（鱼在清凉的水底游动，鸟在幽静的树林中窃窃私语）。谈余日亭午，树影一时正（朋友们畅谈之后已是中午，树的影子已是正中）。清风不负客，意重百金赠（清爽的风没有辜负游客，它款勤的吹拂情意比黄金还贵重）。聊将两鬓蓬，起照千丈镜（姑且将两鬓斑白的脸俯向湖面，在像一面大镜子的湖面中端详自己的面容）。微波喜摇人。小立待其定（微小的波纹使倒映的人像摇动，我

只好稍事等待水面的平定)。梁王今何许，柳色几衰盛(好客的汉代梁孝王今在哪里，梁园的柳树不知绿了多少次)。人生行乐耳，诗律已其剩(人生应当及时行乐罢了，诗词格律已经是多余的了)。邂逅一尊酒，它年《五君咏》(朋友们偶然聚会畅饮，将来有朝一日会有一位南朝颜延之那样的诗人为我们谱写一首新的《五君咏》。重期踏月来，夜半啸烟艇(让我们约定在一个月光明媚的夜晚重新相会，半夜里在游艇上啸傲)。”诗写好后给在座在看，都惊讶地认为是在场的人中写得最好的。朱新仲(朱翌)当时亲眼看到陈与义写的这首诗，说都城的人没有不传抄的。

仙传图志荒唐

【原文】 昔人所作神仙传之类，大抵荒唐谬悠，殊不能略考引史策。如《卫叔卿》事云：“汉仪凤二年，孝武皇帝闲居殿上而见之。”月支使者事云：“延和三年，武帝幸安定，而月支国遣使献香。”案仪凤乃唐高宗纪年名，延和乃魏太武、唐睿宗纪年名，而诞妄若是。自余山经地志，往往皆然。近世士大夫采一方传记及故老谈说，竟为图志，用心甚专，用力甚博，亦不能免抵牾。高夔守襄阳，命僚属作一书，其叙历代沿革云：“在周为楚、邓、穰诸国。”据《左传》，穰乃邓邑，后巴人伐楚围穰，盖楚灭邓，故亦来属，元非列国也。又引《左传》蔓成然事，以蔓为国。据成然乃楚大夫，灵王夺其邑，无所谓“蔓国”也。

【译文】 过去的人写的神仙传一类的东西，大抵荒唐错误没有根据，全然不能稍微参考引用史书的记载。如叙述卫叔卿的事说：“汉朝仪凤二年，孝武皇帝有空闲在大殿上召见叔卿。”公叙述月支使者的事说：“延和三年，武帝到了安定，而月支国派遣使者向武帝献香。”按“仪凤”乃是唐高宗在位时期的年号，“延和”乃是魏太武帝、唐睿宗用的年号，而上引叙述是这样的地荒谬。此外记述山川的书和地方志等，往往也都是这样。近代士大夫采集某一地区的历史资料以及前人传说，纷纷编写地方志，用心很专，下功夫很大，也不能避免有矛盾的地方。高夔任知襄阳府，命令本府官员编撰一部书，其中叙述襄阳府的历代沿革说：“在周代分别从属过楚、邓、 各国。”据《左传》记载， 乃是邓国的一个城邑，后来巴国人进攻楚国包围了 邑，大概楚国灭掉邓国，所以邑也就归属了楚国， 原本并不是一个诸侯国。又引录《左传》上蔓成然的事情，认为蔓是国名。按成然是楚国大夫，楚灵王剥夺了他的采邑蔓地，根本不存在什么“蔓国”。

卷十五

徽庙朝宰辅

【原文】 蔡京擅国命，首尾二十余年，一时士大夫未有不因之以至大用者，其后颇采公议，与为异同。若宰相则赵清宪挺之、张无尽商英、郑华原居中、刘文宪正夫，所行所言，世多知之。其居执政位者，如张康国宾老、温益禹弼、刘逵公路、侯蒙元功者，皆有可录。康国定元璽党籍，看详讲议司编汇奏版，皆深预密议，及后知枢密院，始浸为崖异。徽示察京专悞，阴令狙伺其奸，盖尝许以相。是时，西北边帅，多取部内好官自辟置，以力不以才。康国曰：“并塞当择人以纾忧，顾奈何欲私所善乎？”乃随阙选用，定为格。京使御史中丞吴执中击之，康国先知之，具以奏。益镇潭州，凡元璽逐臣在湖南者，悉遭侵困，因《爱莫助之图》遂为京用。至中书侍郎，乃时有立异。京一日除监司郡守十人，将进画，益判其后曰：“收。”京使益所厚中书舍人郑居中问之，益曰：“君在西掖，每见所论事，舍人得举职，侍郎顾不许邪？今丞相所拟十人，共皆姻党耳，欲不逆其意，得乎？”逵以附京至中书侍郎。京去相，逵首劝上碎元璽党碑，宽上书邪籍之禁，凡京所行悖理殃民事，稍稍厘正之。蒙在政地，上从容问蔡京何如人，对曰：“使京能正其心术，虽古贤相何以加？”上颌首，且使密伺京所为，京闻而衔之。凡此数端，皆见地国史本传。

【译文】 蔡京操纵国家命脉，从头到尾二十多年，当时士大夫没有不依靠他而能受到重用的，这些人得到重用以后也颇能接受公众意见，与蔡京对立。例如宰相清宪公赵挺之、无尽居士张商英、华原郡王郑居中、文宪公刘正夫，他们所做的所说的，世人大多已经知道了。那些位居执政官的，如张康国（字宾老）、温益（字禹弼）、刘逵（字公路）、侯蒙（字元功）等，都有可以记录的事迹。张康国开列元璽党人名单，审阅讲议司汇编的官员奏章，都参预了高层次的密谋，等到后来担任了知枢密院事，才渐渐与蔡京有了分歧。宋徽宗察觉蔡京专横又刚愎自用，暗地里让张康国监视和探察蔡京的恶劣行为，大约曾许诺将来委任他为宰相。当时，西北边境地区的帅臣，往往把自己管辖范围内好的官职自己通过辟举的方式加以委任，根据是否愿为自己效力而不管是否有才能。

张康国说：“边疆地区应当选择人材以解除忧患，为什么却要怀着私心安排自己喜欢的人？”便根据官缺选任官员，定为制度。蔡京唆使御史中丞吴执中弹劾他，张康国预先得知，把情况上奏。温益镇守潭州，凡是元蠹党人被贬官到湖南的，都遭到迫害，因为借《爱莫助之图》吹捧蔡京，便受到蔡京重用。到了担任中书侍郎，便时时提出与蔡京不同的意见。蔡京一天拟定新任命各路监司和各州知州共十名，准备请皇帝批准，温益在蔡京奏章末尾处批写“收”字。蔡京派和温益关系亲密的中书舍人郑居中问他原因，温益说：“你在中书省，常常看到议论政事，中书舍人可以参预，为什么中书侍郎反倒不能呢？现在丞相所拟定的十个人，全都是同他有裙带关系的，想不逆着他的心意，行吗？”刘逵靠投靠蔡京当上了中书侍郎。蔡京离开宰相岗位，刘逵第一个劝宋徽宗毁掉元蠹党碑，放宽对被列入“上书奸邪”名单人的限制性规定，凡是蔡京所推行的违背正理坑害百姓的事，渐渐得到纠正。侯蒙在执政官位置上，宋徽宗郑重地问蔡京是怎样的人，回答说：“假如蔡京能端正他的心术，即使是古代的贤明宰相也不能超过他！”宋徽宗点头称是，而且让他秘密监视蔡京的所作所为，蔡京听说后很怨恨他。凡这里列举的几件事，国史的传记中都有记载。

教官掌笺奏

【原文】 所在州郡，相承以表奏书启委教授，因而饷以钱酒。予官福州，但为撰公家谢表及祈谢晴雨文，至私礼笺启小简皆不作。然遇圣节乐语尝为之，因又作他用者三两篇，每以自愧。邹忠公为颖昌教授，府守范忠宣公属撰兴龙节致语，辞不为。范公曰：“翰林学士亦作此。”忠公曰：“翰林学士则可，祭酒、司业则不可。”范公敬谢之。前辈风节，可畏可仰如此。

【译文】 全国各地州郡，辗转相承把表奏书信一类的事委托给教授去写，用钱酒犒赏他们作为酬谢。我在福州作教授时，只为本州州里公事撰写谢表和祈雨求晴致谢的文章，至于私人之间的礼笺、谢启、小简之类的文字都不代写。但逢天子生日也偶而写些祝贺的话，同时还写了三两篇其他东西，每每感到惭愧。邹浩（忠公）为颖昌（今河南许昌）教授，知府范纯仁（忠宣公）嘱托他为哲宗诞辰的兴龙节写贺辞，邹浩推辞不干。范纯仁说：“翰林学士也写这类文章。”邹浩说：“翰林学士可以写，祭酒、司业则不可写。”范纯仁向他道歉。前辈人的高风亮节，真可使人敬畏仰慕啊！

经句全文对

【原文】 予初登词科，再至临安，寓于三桥西沈亮功主簿之馆，沈以予买饭于外，谓为不便，自取家饌日相供。同年汤丞相来访，扣旅食大概，具为言之。汤公笑曰：“主人亦贤矣！”因戏出一语曰：“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良久，予应之曰：“为长者而折枝，非不能也。”公大激赏而去。汪圣锡为秘书少监，每食罢会茶，一同舍辄就枕不至。及起，亦戏之曰：“宰予昼寝，于予与何诛。”众未有言，汪曰：“有一对，虽于今事不切，然却是一个出处。”云：“子贡方人，夫我则不暇。”同舍皆合词称美。

【译文】 我初次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第二次到临安，寄住在三桥西沈亮功主簿招待客人的房子里，沈亮功认为我到外面买饭，觉得不方便，自己每天从家里给我送饭。同年中进士的汤思退丞相来访问，询问旅途情况和饮食的梗概，我把情况都告诉了他。汤思退笑着说：“你的主人也真是不错了！”于是开玩笑说了一句：“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可怜公子而送饭，难道是希望得到回报吗）？”（见《史记·淮阴侯列传》）我对下联说：“为长者而折枝，非不能也（为长者按摩身体，也不是不能）。”（见《孟子·梁惠王》）汤思退非常赞赏夸奖然后离去。汪圣锡（汪应辰）担任秘书少监，每逢吃完饭在一起喝茶，一位同事便睡觉不来。等到他起床，也跟他开玩笑说：“宰予昼寝，于予与何诛（宰予白天睡觉，在我又有什么责备他的话呢）？”（见《论语·公冶长》）众人没有讲话，汪应辰说：“我给它对一个下联，虽然对今天的事并不贴切，然而出处却是同一部书。”于是说：“子贡方人，夫我则不暇（子贡喜欢以人比人，我却没有时间作这种事）。”（见《论语·宪问》）同事们都齐声叫好。

北郊议论

【原文】 三代之礼，冬至祀天于南郊，夏至祭地于北郊。王莽于元始中改为合祭，自是以来，不可复变。元丰中，下诏欲复北郊，至六年，唯以冬至祀天，而地祇不及事。元璽七年，又使博议，而许将、顾临、范纯礼、王钦臣、孔武仲、杜纯各为一说。逮苏轼之论出，于是群议尽废。当时诸人之说有六：一曰，今之寒暑与古无异，宣王六月出师，则夏至之日，何为不可祭；二曰，夏

至不能行礼，则遣官摄行，亦有故事；三曰，省去繁文末节，则一岁可以再郊；四曰，三年一祀天，又一年一祭地；五曰，当郊之岁，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之方泽，可以免方暑举事之患；六曰，当郊之岁，以夏至祀地祇于方泽，上不亲郊，而通火于禁中望祀。轼皆辟之，以谓无一可行之礼，其文载于奏议，凡三千言。元符中，又诏议合祭，论者不一，唯太常少卿宇文昌龄之议，最为简要。曰：“天地之势，以高卑则异位，以礼制则异宜，以乐则异数。至于衣服之章，器用之具，日至之时，皆有辨而不乱。夫祀者，自有以感于无，自实以通于虚，必以类应类，以气合气，然后可以得而亲，可以冀其格。今祭地于圜丘，以气则非所合，以类则非所应，而求高厚之来享、不亦难乎？”后竟用其议。此两说之至当如此。

【译文】 夏商周三代的礼节，冬至这一天在南郊祭天，夏至在北郊祭地。王莽在元始年间改为合祭，从此之后，不再改变。神宗元丰年间，天子下诏打算恢复北郊祭地的礼仪，到元丰六年（1083年），只在冬至时祭天，而没有祭地神。元熹七年（1092年），天子下诏让人们广泛讨论，而许将、顾临、范纯礼、王钦臣、孔武仲、杜纯等人各持一说。等到苏轼的说法提出来后，其他的议论便都废弃了。当时众人的说法有六种：第一种说，现在的寒暑与古代一样，周宣王能六月出师，那么夏至时，为什么不能祭地神呢？第二种说，夏至皇帝因太热不能亲自祭地神之礼，就派人代行，过去有过这种例子；第三种说，省掉繁琐的礼节，那么一岁之中可以再次举行郊祭；第四种说，三年祭一次天，一年一次再祭地神；第五种说，当郊祭那年，可以十月份在京师举行，更换夏至日祭地神，掘地为方池，贮水以祭，可以避免炎热时祭地神的不便；第六种说，当郊祭那年，因夏至时在方泽祭礼地神，天子不必亲临北郊，而在宫廷中点燃祭礼的火炬遥望祭祀。苏轼都一一驳斥，认为以上六种说法没有一种可以实行的，他的文章收在奏议汇编中，共计三千字。宋哲宗元符年间，天子下诏让郡臣议论合祭，议论的人说法不一，只有太常少卿宇文昌龄的议论最为简明扼要。他说：“按照天地的形势，天高地低位置不同，因此在祭礼的礼节上应不同对待，在奏乐上演奏的曲子数目也不同。至于衣服的花纹，祭礼时的用具，祭礼的时间，都有规矩，不得紊乱。所谓祭礼，是用有去感动无，用实际的礼来使看不见的神灵去了解人的心意，必须以同类去求同类，以相同的气去合相同的气，这样，神才会和你亲近，你才可以寄希望神来接受祭礼。如今在祭天的圜丘（圆形高坛）中祭地，气既不相合，类也不同，无法沟通，这样作还要求天地神灵来享用你的祭礼，不是很难吗？”后来朝廷终于采纳了他的建议。苏轼和宇文昌龄二人的说法，都是很妥当的。

讨论滥赏词

【原文】 东坡公《行香子》小词云：“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浮名浮利，休苦劳神。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虽抱文章，开口谁亲？且陶陶，乐尽天真。不如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绍兴初，范觉民为相，以自崇宁以来，创立法度，例有泛赏。如学校，茶盐，钱币，保伍，农田，居养，安济，寺观，开封，大理狱空，四方边事，御前、内外诸司，编敕会要、学制、礼制、道史等书局，掖庭编译，行幸，曲恩，诸色营缮，河埽功役，采石、木筏、花石等纲，祥瑞，礼乐，两城所公田，伎术，伶优，三山，永桥，明堂，西内，八宝，玄圭，种种滥赏，不可胜述。其曰应奉有劳、献颂可采、职事修举、特授特转者，又皆无名直与，及白身补官，选人改官，职名碍格，非随龙而依随龙人，非战功而依战功人等，每事各为一项，建议议论。又行下吏部，若该载未尽名色，并合取朝廷指挥，临时参酌。追夺事件，遂为画一规式，有至夺十五官者。虽公论当然，而失职者胥动造谤，浮议蜂起。无名子因改坡语云：“清要无因，举选艰辛。系书钱，须要十分。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叹旅中愁，心中闷，部中身。虽抱文章，苦苦推寻。更休说，谁假谁真。不如归去，作个齐民。免一回来，一回讨，一回论。”至大字书写贴于内前墙上，逻者得之以闻。是时，伪齐刘豫方盗据河南，朝论虑或摇人心，亟罢讨论之举。范公用是为台谏所攻，今章且叟奏稿中正载弹疏，竟去相位云。

【译文】 苏东坡《行香子》小词说：“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浮名浮利，休苦劳神。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虽抱文章，开口谁亲？且陶陶，乐尽天真。不如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宋高宗绍兴初年，范觉民担任宰相，查出自宋徽宗崇宁年间以来，凡是创立了一项法令制度，照例广泛赏赐，如学校，茶盐、钱币，保伍，农田，居住赡养，安抚接济，寺庙道观，开封府有事，大理寺狱空，四方边境之事，皇帝座位之前及朝廷内外诸衙门，编纂会要、学校制度、礼乐制度、编写道教史等书局、宫廷中编排恩泽，天子行幸，天子法外施恩，各种建筑物的修缮，治河功役，采石、木筏、花石等纲船、祥瑞，礼乐，掌管公田的两城所，方伎，伶优，三山、永桥、明堂，西内，八宝（宋徽宗时天子八个玉玺），玄圭等等，都要赏赐，赏赐之滥，不能一一叙述。赏赐的名目有为朝廷服务有功劳、献给朝廷的颂词有可采用之处、本职工作做得好、特别授与官职和特别提升官职者，都是直接赐

给的。还有没有官的人授官，当幕职的州县官改授别的官职，因职务名分所限或官受阻者，没有随从朝廷出行而依照随从享受待遇，没立战功而按立战功的人对待的，等等，一件事情列为一项，建议让百官讨论。又行文吏部，以上所举各项如果还有没包括进去的而又应该让天子作决定进行赏赐的，可以临时参考别的办法赏赐。追夺官职事件，朝廷规定了统一的实施办法，有人甚至被夺官十五次。虽然大家都认为应该夺官，但是丢失官职的人全部出动造谣诽谤，议论纷纷不已。有个不知姓名的人于是就改动了苏东坡的话说：“出身平常没有后台的人，中举做官都很难。请求安排职务的文书与贿赂的金钱必须同时付足。浮云一样的名利，白白地让人痛苦劳神。感叹旅居异乡的忧愁，心中闷，在吏部等待安排自身。虽怀抱文才，苦苦寻求。更休说，谁假谁真，不如归去，作个齐民。免得一回又一回地讨论追查。”甚至有人把这首词抄写后贴在京城内的墙上，巡逻的人发现后报告给朝廷。当时，伪齐国王刘豫正窃据河南，朝廷顾虑这会动摇人心，便马上停止了关于赏赐问题的讨论。范觉民因此受到了御史和谏官的攻击，一个叫章宜叟的人，奏稿中收录有弹劾范觉民的奏章，范觉民为此丢了宰相官职。

尺八

【原文】 唐卢肇为歙州刺史，会客于江亭，请目前取一事为酒令，尾有乐器之名。肇令曰：“遥望渔舟，不阔尺八。”有姚岩杰者，饮酒一器，凭栏呕哕，须臾即席，还令曰：“凭栏一吐，已觉空喉。”此语载于《摭言》。又《逸史》云：“开元末，一狂僧往终南回向寺，一老僧令于空房内取尺八来，乃玉笛也。谓曰：‘汝主在寺，以爱吹尺八，谪在人间，此常吹者也。汝当回，可将此付汝主。’僧进于玄宗，特取吹之，宛是先所御者。”孙夷中《仙隐传》：“房介然善吹竹笛，名曰尺八。将死，预将管打破，告诸人曰：‘可以同将就圻。’”亦谓此云。尺八之为乐名，今不复有。《吕才传》云：“贞观时，祖孝孙增损乐律，太宗诏侍臣举善音者，王暇、魏征盛称才制尺八，凡十二枚，长短不同，与律谐契。太宗即召才参论乐事。”尺八之所出，见于此，无由晓其形制也。《尔雅释乐》亦不载。

【译文】 唐朝卢肇任歙州（治今安徽歙县）刺史时，在江亭招待宾客，让众人拿眼前所见器物一件为酒令，末尾得带上乐器的名字。卢肇作酒令说：“遥望渔舟，不阔尺八。”尺八一语双关，即是乐器名称，又可理解为长一尺八寸。

有个叫姚岩杰的人，饮酒一大杯，靠着栏杆呕吐，停了一会回到席上，回报酒令说：“凭栏一吐，即觉空喉。”以上两条记载，见于《唐摭言》。另外，《逸史》里说：“唐玄宗开元末年，一个狂僧来到终南山回向寺，一个老僧人让他在空房内取尺八来，乃是一只玉笛，老僧对他说：‘你的主人在本寺时，因为爱吹尺八，被贬到人间，这只尺八是他经常吹的。你回去后，可把它交给你的主人。’狂僧把玉笛献给玄宗，玄宗试了一下，和先前他用的一模一样。”孙夷中在所著的《仙隐传》中说：“房介然善于吹竹笛，笛子名叫尺八。快要死时，预先把笛管打破，告诉别人说：‘可把此笛埋在我墓中。’也是指的尺八。把乐器称尺八，现在没有了。”《吕才传》说：“唐太宗贞观年间，祖孝孙主持修订乐律，太宗下诏命侍臣中懂乐律的人参与其事，王廙、魏征夸奖吕才会制作尺八，他做了十二枚，长短不同，但都和章律谐和。太宗便叫吕才参与其事。”尺八的出处，见于这里，尺八的形状如何，《尔雅·释乐》里也没有具体记载。

三给事相攻

【原文】 元盥中，王钦臣仲至，自权工部侍郎除给事中，为给事姚礪所驳而止。大观中，陈亨伯自左司员外郎擢给事中，为权官蔡祚所沮而出。正和末，伯祖仲达在东省，以疾暂谒告两日，张天觉复官之命，过门下第四厅，给事方会论为畏缴驳之故，所以托病，遂罢知滁州。

【译文】 宋哲宗元盥年间，王钦臣（字仲至）从权工部侍郎被提升为给事中，被给事姚礪驳回。撤消了任命。宋徽宗大观年间，陈亨伯从左司员外郎升为给事中，被给事中蔡 所阻挠而改任地方官。政和末年，我的本家祖父洪彦升（字仲达）在门下省任给事中，因疾病暂请假两天，到期后，张天觉宰相签发了恢复官职的命令，在经过门下省第四厅时，给事中方会说洪仲达因为不敢驳回这一命令，因此才托病的，于是被罢免了朝中给事中的职务，改任滁州知州。

朱藏一诗

【原文】 政和末，老蔡以太师鲁国公总治三省，年已过七十，与少宰王黼争权相倾。朱藏一在馆阁，和同舍秋夜省宿诗云：“老火未甘退，稚金方力征。

炎凉分胜负，顷刻变阴晴。”两人门下士互兴谗言，以为嘲谤。其后黼独相，馆职多迁擢，朱居官如故，而和人菊花诗云：“纷纷桃李春，过眼成枯萎。晚荣方耐久，造物岂吾欺？”或又谮于黼以为怨愤。是时，士论指三馆为闹蓝。

【译文】 宋徽宗政和末年，蔡京以太师鲁国公的身份负责门下省、中书省、尚书省，年龄已超过七十，与少宰王黼为争权而互相倾轧。朱藏一当时在馆阁任职，酬和同屋人所作秋夜在三省值夜班的诗说：“老火未甘退，稚金方力征。炎凉分胜负，顷刻变阴晴。”二人的门客也互相说对方的坏话，作为嘲笑诽谤对方的资本。以后王黼独任宰相，朱藏一仍在馆阁和过去一样，而馆阁的其他人大都得到提升。他应和别人的菊花诗说：“纷纷桃李春，过眼成枯萎。晚荣方耐久，造物岂吾欺？”另外还有人在王黼跟前说他的坏话，说他这首诗是在抒发自己的怨恨。当时，舆论说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三馆是众鬼大闹佛寺。

蔡京轻用官职

【原文】 蔡京三入相对，除用士大夫，视官职如粪土，盖欲以天爵市私恩。政和六年十月，不因赦令，侍从以上先缘左降同日迁职者二十人。通奉大夫张商英为观文殿学士，中大夫王襄为延康殿学士，显谟阁待制李图南为述古殿学士，宝文阁待制蔡祜、显谟阁待制叶梦得并为龙图阁直学士，宝文阁待制张近、通奉大夫钱即、右文殿修撰王汉之并为显谟阁直学士，中大夫叶祖洽为徽猷阁直学士，朝散大夫曾孝蕴为天章阁待制，朝散郎俞内、朝议大夫曾孝序、中奉大夫范致明、右文殿修撰蔡肇、大中大夫孙 、朝议大夫王觉、右文殿修撰陈 并为显谟阁待制，朝请郎蔡懋、中奉大夫庞恭孙、朝请郎洪彦升并为徽猷阁待制。至十一月冬祀毕，大赦天下，仍复推恩。

【译文】 蔡京第三次被任命为宰相后，任用士大夫，把官职看得像粪土一样轻贱，大约想用国家的官爵换得私人的恩情。政和六年（1116年）十月，不是因为有大赦令，侍从官以上以前曾被降官的一天之间晋升帖职的有二十个人。通奉大夫张商英授予观文殿学士，中大夫王襄授予延康殿学士，显谟阁待制李图南晋升为述古殿学士，宝文阁待制蔡 、显谟阁待制叶梦得都晋升为龙图阁直学士，宝文阁待制张近、通奉大夫钱即、右文殿修撰王汉之都被任命为显谟阁直学士，中大夫叶祖洽被任命为徽猷阁直学士，朝散大夫曾孝蕴被任命为天章阁待制，朝散郎俞 、朝议大夫曾孝序、中奉大夫范致明、右文殿修撰蔡肇、大中大夫孙 、朝议大夫王觉、右文殿修撰陈初都被任命为显谟阁待制，朝请

郎蔡懋、中奉大夫庞恭孙、朝请郎洪彦升都被任命为徽猷阁待制。到十一月冬季礼典完结，向天下发布大赦令，又给有关的人加官晋爵。

节度使改东宫环卫官

【原文】 太祖有天下，将收藩镇威柄，故渐行改革。至于位至侍中、中书令、使相者，其高仅得东宫官，次但居环卫。凤翔王宴为太子太师，安远武行德为太子太傅，护国郭从义为右金吾上将军，凤翔王彦超为左金吾上将军，定国白重赞为左千牛上将军，保太杨廷璋为右千牛上将军，静难刘重进为羽林统军。若符彦卿者，以太师、中书令、天雄节度使直罢归洛，八年不问，亦不别除官。其庙谟雄断如是。靖康初，以戚里冒政、宣恩典，多建节钺，乃稽用此制。钱景臻以少傅安武节度，刘宗元以开府仪同三司、镇安节度，并为左金吾上将军。范讷以平凉、刘敷以保信，刘敏以保成，张 以向德，王舜臣以岳阳，朱孝孙以应道，钱忱以泸州节度，并为右金吾上将军。自后不复举行矣。

【译文】 宋太祖得天下后，打算收回藩镇兵权，因此逐渐对官制进行了改革。对于官至侍中、中书令、使相的人，改革后，官阶高的仅能改任东宫，次等的只能改任天子的环卫官保卫宫廷。凤翔军（陕西凤翔）王晏后来任太子太师，安远军（今湖北安陆）武行德任太子太傅，护国军郭从义任左金吾上将军，凤翔军王彦超为右金吾上将军、定国军白重赞为左千牛上将军，保太军杨廷璋为右千牛上将军，静难军（今陕西彬县）刘重进任羽林统军。至于符彦卿这样的大将，以太师中书令、天雄节度使的身份罢归洛阳，八年时间天子都没过问他，也没任命其他官职。宋太祖的雄才大略就是这样。钦宗靖康初年，皇亲国戚假冒徽宗政和、宣和时的恩典，不少人成为拥有符节与斧钺的大将，那是参考了太祖时的制度。钱景臻以少傅、安武节度使，刘宗元以开府仪同三司、镇安节度使的身份，一起改任左金吾上将军。范讷以平凉（今属甘肃）节度，刘敷以保信（今安徽合肥）节度，刘敏以保成（今河南汝阳）节度，张 以向德节度，王舜臣以岳阳（今属湖南）节度，朱孝孙以应道节度，钱忱以泸州（今四川泸州市）节度的身份，都担任右金吾上将军。以后便不再有这种事了。

宰相任怨

【原文】 宰相欲收士誉，使恩归己，故只以除用为意，而不任职及显有过举者，亦不肯任怨，稍行黜徙。文惠公在相位，尝奏言：“今之监司、郡守，其无大过者，台谏固不论击。但其间实有疲懦庸老之人，依阿留之，转为民害。臣欲皆与祠禄，理作自陈，监司或就移小郡，庶几人有家食之资，国无旷官之失。”孝宗欣然听许。于是湖南转运判官任诏，改知复州，广东提举盐事刘景，改知南雄州。时太常丞阙，监左藏库许子绍欲得之，公以大超越，谕使小缓。子绍宛转愈力，乃白其事，出通判静江府。议者私谓若如此则是庙堂而兼台谏之职。殊不思进贤退不肖，真宰相之事耳。欲拟宫观三四人，未暇而去位，子绍之出，遂织入言章中。近者京丞相以国子录吴仁杰居职未久，便欲求迁，奏罢归吏部注签判，亦此意也。

【译文】 宰相打算沽名钓誉，博取士大夫的欢心，使别人感激他，因此很注意任用人，对于那些不胜任职务和有错误的，宰相也不肯落埋怨，而对他们作贬谪或迁徙的处理。我的哥哥文惠公洪适任宰相时，曾上奏说：“如今监司、知州的官吏、郡守，如果没有大的过错，御史、谏官可以不去弹劾他们。但是，他们中间实在有疲软庸碌之人，如果胸无定见，随声附和，让他们留任，会成为百姓的灾难。为臣我打算改任他们为宫观官，这也是按照他们自己要求改变的。任监司的官员调任到较小的州郡任职，这样一来，他们的衣食可以无忧，国家也不至于有失职的官员。”孝宗欣然采纳了这个意见。于是湖南转运判官任诏改任复州（今湖北沔阳）知州，广东提举盐事刘景改为南雄州（今广东南雄）知州。当时太常丞阙人，监左藏库许子绍想任太常丞，文惠公认为越级太多，晓谕他稍为等待一下。子绍宛转请求，更加迫切，文惠公便上奏天子，任命为静江府（今广西桂林）通判。人们私下议论说文惠公这样干，是政府首脑又兼任了御史和谏官的职务。这些人也不想想，任用贤人，去掉不称职的人，这才是宰相应干的事。文惠公还打算改任三四个宫观官，还未来得及办便离任了，许子绍出任通判，便被言官编入了奏章中。丞相京镗因为国子录吴仁杰任职不久，便要求升迁，京丞相上奏免去他的职务而让吏部重新分配，也是这个用意。

四李杜

【原文】 汉太尉李固、杜乔，皆以为相守正，为梁冀所杀。故掾杨生上书，乞李、杜二公骸骨，使得归葬。梁冀之诛，权势专归宦官，倾动中外，白马令李云露布上书，有帝欲不谏之语。桓帝得奏震怒、逮云下北寺狱。弘农五官掾杜众，伤云以忠谏获罪，上书愿与云同日死。帝愈怒，下廷尉，皆死狱中。其后襄楷上言，亦称为李、杜。灵帝再治钩党，范滂受诛，母就与之诀，曰：“汝今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谓李膺、杜密也。李太白、杜子美同时著名，故韩退之诗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凡四李、杜云。

【译文】 汉朝太尉李固、杜乔，都因为居官守正不阿，被外戚梁冀所杀。他们的部下相府官员杨生上书，请求收敛李、杜二人尸体，运回老家安葬。梁冀被朝廷处死后，权势都转到了宦官手里，朝廷内外受到震动，白马县（今河南滑县）令李云上了一份没有封口的奏章，其中有天子想要丢弃帝位的话，桓帝看到后非常生气，把李云逮捕押入北寺的监狱中。弘农（今河南灵宝）人杜众当时任五官掾，对李云因忠言谏主而获罪感到悲伤，上书天子愿意和李云同一天死。桓帝更加恼怒，交给廷尉处理，结果二人都死在狱中。后来襄楷上书时，称二人为李、杜。汉灵帝再次惩治结为党羽的人，范滂被杀，他的母亲前去与他诀别说：“你今天和李、杜齐名，死也无遗憾了。”这里的李、杜是指李膺、杜密。李白、杜甫同时出名，因此韩退之有诗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以上共有四个李、杜。

浑脱队

【原文】 唐中宗时，清源尉吕元泰上书言时政曰：“比见坊邑相率为浑脱队，骏马胡服，名曰‘苏幕遮’，旗鼓相当，腾逐喧噪。以礼义之朝，法胡虏之俗，非先王之礼乐，而示则于四方。《书》曰：‘谋时寒若’，何必羸形体，欢衢路，鼓舞跳跃而索寒焉！”书闻不报。此盖并论泼寒胡之戏。《唐史》附于《宋务光传》末，元泰竟亦不显。近世风俗相尚，不以公私宴集，皆为耍曲耍舞，如《勃海乐》之类，殆犹此也。

【译文】 唐中宗时，清源县（今属福建）尉吕元泰上书评论当时朝政说：

“近来见城镇街道上相继组织跳舞的队伍，骑骏马，穿胡服，命名为‘苏幕遮’，跳舞的分作几队，旗鼓相当，欢腾追逐，大声喧噪。我朝是礼仪之邦，却效法胡虏的习俗，这不是先王的礼乐，不能作为天下的榜样。《尚书》中说：‘君主能谋善断寒冷适时适度’，何必赤身露体，欢呼于街衢，鼓舞跳跃而去自找寒冷失时失度呢！”奏章递了上去，没有回答。他的上书同时也批评了泼实胡的游戏。《新唐书》把此事附在《宋务光传》的最后，吕元泰最终也没有突出的事迹。近来风俗互相影响，不论是公私宴会和聚会，都要唱曲跳舞，如《勃海乐》一类游戏，也和这近似。

岁阳岁名

【原文】 岁阳、岁名之说，始于《尔雅》。太岁在甲曰阏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强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维，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 扈，在癸曰昭阳，谓之岁阳。在寅曰摄提格，在卯曰单阏，在辰曰执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郭禰，在未曰协洽，在申曰 滩，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阍茂，在亥曰大渊献，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奋若，谓之岁名。自后唯太史公《历书》用之，而或有不同。如阏逢为焉逢，旃蒙为端蒙，柔兆为游兆，强圉为强梧、雍为徒雍，屠维为祝黎，上章为商横，重光为昭阳，玄 扈为横艾，昭阳为尚章，大荒落为大芒落，协洽为汁洽， 滩为 汉，作噩为作鄂，阍茂为淹茂，大渊献、困敦更互，赤奋若乃为赤夺，若此盖年祀久远，传写或讹，不必深辨。但汉武帝太初元年太岁丁丑，而以为甲寅，其失多矣。《尔雅》又有月阳、月名。月在甲曰毕，在乙曰桔，在丙曰修，在丁曰圉，在戊曰厉，在己曰则，在庚曰室，在辛曰塞，在壬曰终，在癸曰极。正月为陬，二月为如，三月为 鶬，四月为余，五月为皋，六月为且，七月为相，八月为壮，九月为玄，十月为阳，十一月为辜，十二月为涂。考之典籍，唯《历书》谓太初十月为毕聚。《离骚》云：“摄提贞于孟陬。”《左氏传》：“十月曰良月。”《国语》：“至于玄月。”它未尝称引。郭景纯注释云：“自岁阳至月名，皆所未详通者，故阙而不论。”盖不可强为之说。非若《律书》所言二十八舍、十母、十二子，犹得穿凿傅致也。《资治通鉴》专取岁阳、岁名以冠年，不可晓解，殊不若甲子至癸亥为明白尔。韩退之诗：“岁在渊献牵牛中”，王介甫《字说》言“疆圉”，自余亦无说。《左传》所书，“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岁在降娄，降娄中而旦”，“岁在 訾之口”，“岁五及鹑火”，“岁在颛帝之虚”，“岁在豕韦”，“岁在大梁”，皆用岁星次

舍言之。司马倬跋温公《潜虚》，其末云：“乾道二年，岁在柔兆阍茂，玄执徐月，极大渊献日。”谓丙戌年、壬辰月、癸亥日，以岁名施于月日，尤为不然。汉章不自为文，殆是僚强解事者所作也。

【译文】 古代以十干记年的岁阳和以十二地支纪年的岁名的说法，开始于《尔雅》。在岁在甲的位置上叫阍逢，在乙的位置上叫旃蒙，在丙的位置上叫柔兆，在丁的位置上叫强圉，在戊的位置上叫著雍，在己的位置上叫屠维，在庚的位置上叫上章，在辛的位置上叫重光，在壬的位置上叫玄，在癸的位置上叫昭阳，这些名称合在一起叫岁阳。太岁在寅的位置上叫摄提格，在卯的位置上叫单阍，在辰的位置上叫执徐，在巳的位置上叫大荒落，在午的位置上叫敦牂，在未的位置上叫协洽，在申的位置上叫滩，在酉的位置上叫作噩，在戌的位置上叫阍茂，在亥的位置上叫大渊献，在子的位置上叫困敦，在丑的位置上叫赤奋若，称为岁名。从《尔雅》记载以后，只有司马迁的《史记·历书》中用过，但稍有不同。如阍逢称焉逢，旃蒙称端蒙，柔兆称游兆，强圉称强梧，著雍称徒雍，屠维称祝黎，上章称商横，重光称昭阳，玄称横艾，昭阳称尚章，大荒落称大芒落，协洽称汁洽，滩称汉，作噩称作鄂，阍茂称淹茂，大渊献、困敦互相替换位置，赤奋若成为赤夺，这些都因为年代久远，传写讹误，不必费力追究。但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太岁星在丁丑，却说成甲寅，错误就大了。《尔雅》还有月阳、月名之说。月在甲的位置上称毕，在乙的位置上称桔，在丙的位置上称修，在丁的位置上称圉，在戊的位置上称厉，在己的位置上称则，在庚的位置上称室，在辛的位置上称塞，在壬的位置上称终，在癸的位置上称极。正月叫陬，二月称如，三月称，四月称余，五月称皋，六月称且，七月称相，八月称壮，九月称玄。十月称阳，十一月称辜，十二月称涂。考查典籍，只有司马迁《史记·历书》篇称太初元年十月为毕聚。《离骚》说：“摄提贞于孟陬。”《左氏传》说：“十月叫良月。”《国语》说：“至于玄月。”其它典籍没有引用的。郭景纯注释说：“从岁阳到月名，没有人能详细知晓，因此阙而不论。”不能强不知以为知。不像《律书》所说二十八舍、十母、十二子一类，可以穿凿附会。《资治通鉴》专门用岁阳、岁名来纪年，让人不明白，真不如用甲子一直到癸亥，让人明白无误。韩退之的诗说：“岁在渊献牵牛中”，王安石的《字说》书上说：“强圉”，其他的就没什么说法了。《左传》记载“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岁在降娄，降娄中而旦”，“岁在癸訾之口”，“岁五及鹑火”，“岁在颛帝之虚”，“岁在豕韦”，“岁在大梁”，都是用岁星止宿的营地来命名的。司马倬（字汉章）在为司马光的《潜虚》写跋语中末句说：“乾道二年（1166年），岁在柔兆、阍茂，玄执徐月，极大渊献日。”是说丙戌年、壬辰月、

癸亥日，把岁名用在月日上，尤为不妥。司马倬不亲自写文章，大概是为他手下喜好卖弄知识的人所撰。

官称别名

【原文】 唐人好以它名标榜官称，今漫疏于此，以示子侄子未能尽知者。太尉为掌武，司徒为五教，司空为空土，侍中为大貂，散骑常侍为小貂，御史大夫为亚台、为亚相、为司宪，中丞为独坐、为中宪，侍御史为端公、南床、横榻、杂端，又曰脆梨，殿中为副端，又曰开口椒，监察为合口椒，谏议为大坡、大谏，补阙（今司谏）为中谏，又曰补衮，拾遗（今正言）为小谏，又曰遗公，给事郎为夕郎、夕拜，知制诰为三字，起居郎为左螭，舍人为右螭，又并为修注，吏部尚书为大天，礼部为大仪，兵部为大戎，刑部为大秋，工部为大起，吏部郎为小选、为省眼，考功、度支为振行，礼部为小仪、为南省舍人，今曰南宫，刑部为小秋，祠部为冰（柄）。厅，比部为比盘，又曰昆脚皆头，屯田为田曹，水部为水曹，诸部郎通曰哀乌、依乌，太常卿为乐卿，少卿为少常、奉常，光禄为饱卿，鸿胪为客卿、睡卿，司农为走卿，大理为棘卿，评事为廷平，将作监为大匠，少监为少匠，秘书监为大蓬，少监为少蓬，左右司为都公，太子庶子为宫相，宰相呼为堂老，两省相呼为阁老，尚书丞郎为曹长，御史、拾遗为院长。下至县令曰明府，丞曰赞府、赞公，尉曰少府、少公、少仙，此已见前《笔》。

【译文】 唐代人喜欢用另外的名字标榜官名，现在随便写在这里，给儿子、侄儿们没能全知道的作提示。太尉称为掌武；司徒称为五教；司空称为空土；侍中称为大貂；散骑常侍称为小貂；御史大夫称为亚台、称为亚相、称为司宪；御史中丞称为独坐、称为中宪；侍御史称为端公、南床、横榻、杂端，又叫脆梨；殿中侍御史称为副端，又叫开口椒；监察御史为合口椒；谏议大夫称为大坡、大谏；补阙（原注：现在的司谏）称为中谏，又叫补；拾遗（原注：现在的正言）称为小谏，又叫遗公；给事郎称为夕郎、夕拜；知制诰称为三字；起居郎称为左螭，中书舍人称为右螭，又都称为修注；吏部尚书称为大王；礼部尚书称为大仪；兵部尚书称为大戎；刑部尚书称为大秋；工部尚书称为大起；吏部郎称为小选、称为省眼；考功郎、度支郎称为振行；礼部郎称为小仪，称为南省舍人，现在叫南宫；刑部郎称为小秋；祠部郎称为冰（柄）厅；比部郎称为比盘，又叫昆脚皆头；屯田郎称为田曹；水部郎称为水曹；诸部郎都叫哀乌、依

乌；太常卿称为乐卿；太常少卿称为少常、奉常；光禄卿称为饱卿；鸿胪卿称为客卿、睡卿；司农卿称为走卿；大理卿称为棘卿；大理评事称为廷平；将作监称为大匠；将作少监称为少匠；秘书监称为大蓬；秘书少监称为少蓬；左右司称为都公；太子庶子称为宫相；宰相叫作堂老；两省长官叫作阁老；尚书省丞郎称为曹长；御史、拾遗称为院长。下到县令也有别名，称作明府；县丞叫赞府、赞公；县尉叫少府、少公、少仙，这些前面各《笔》已讲到。

卷十六

汉重苏子卿

【原文】 汉世待士大夫少恩，而独于苏子卿加优宠，盖以其奉使持节，褒劝忠义也。上官安谋反，武子元与之有谋，坐死。武素与上官桀、桑弘羊有旧，数为燕王所讼，子又在谋中，廷尉奏请逮捕武，霍光寝其奏。宣帝立，录群臣定策功，赐爵关内侯者八人，刘德、苏武食邑。张晏曰：“旧关内侯无邑，以武守节外国，德宗室俊彦，故特令食邑。”帝闵武年老，子坐事死，问左右：“武在匈奴久，岂有子乎？”武曰：“前发匈奴时，胡妇实产一子通国，有声问来，愿因使者赎之。”上许焉。通国至，上以为郎，又以武弟子为右曹，以武著节老臣，令朝朔望，称祭酒，甚优宠之。皇后父、帝舅、丞相、御史、将军皆敬重武。后图画中兴辅佐有功德知名者于麒麟阁，凡十一人，而武得预。武终于典属国，盖以武老不任公卿之故。先公縻留绝漠十五年，能致显仁皇太后音书，蒙高宗皇帝有“苏武不能过”之语。而厄于权臣，归国仅升一职，立朝不满三旬，讫于窜谪南荒恶地，长子停官。追诵汉史，可为痛哭者已！又案武本传云：“奉使初还，拜为典属国，秩中二千石。昭帝时，免武官。后以故二千石与计谋立宣帝，赐爵。张安世荐之，即时召待诏，数进见，复为典属国。”然则豫定策时，但以故二千石耳。而《霍光传》连名奏昌邑王时，直称典属国，宣纪封侯亦然，恐误也。

【译文】 汉朝对待士大夫刻薄寡恩，惟独对苏武倍加优宠，这是因为他持符节出使匈奴保持节操，以此来褒扬勉励他的忠义行为。上官安谋反，苏武的儿子苏元和他有密谋，连坐被杀。苏武平常与上官桀、桑弘羊有交情，几次被燕王告发，他的儿子又参与谋反，廷尉上奏天子，请求逮捕苏武，霍光把奏章压了下来。宣帝即位，奖赏大臣中出力拥戴他的人，封赏关内侯爵位者八人，刘德、苏武都有封地，可收赋税而食的食邑。张晏说：“过去关内侯没有食邑，因为苏武出使在国外保守节操，刘德是天子宗室中比较优秀的，因此破格给他们食邑。”宣帝怜惜苏武年老，儿子又受株连被杀，便问身边的侍从：“苏武在匈奴时间长，有没有儿子？”苏武回答说：“臣从匈奴回来时，我的匈奴籍妻子生

了一个儿子叫通国，曾捎过信来，请求凭借使臣出国的机会，把他赎回来。”天子答应了。通国回汉朝后，天子任命他为郎，又任命苏武弟弟的儿子为右曹，因苏武是坚持气节的老臣，让他每月初一、十五上朝，其他日子免朝，称他为祭酒，甚为优待宠幸。皇后之父、皇太后兄弟、丞相、御史、将军都很尊重苏武。后来在麒麟阁挂中兴辅佐有功知名将帅十一人的画像，苏武也在十一人之中。苏武最后的职务是典属国，是因为年老不能担任公卿的原因。先父洪皓被囚禁在金朝十五年，能从金国带回显仁皇太后的书信，高宗夸奖他“即使苏武也超不过他的功劳”，但是受制于有权势的大臣，回国后仅升了一级官职，在朝中为官不满一月，最后贬谪到南方荒凉偏僻之地，我的长兄被罢官。追读汉朝历史，比较先父与苏武的不同遭遇，怎不使人失声痛哭！又案《汉书·苏武传》说：“出使匈奴回朝，被任命为典属国之职，俸禄是二千石。汉昭帝时，被免官。后来他以原是二千石的身份与别人合谋拥立宣帝，赐关内侯爵位。张安世举荐他，宣宗马上让他等待任命，几次见到天子，恢复了典属国的职务。”可见，他在定策立宣宗时，只是以原二千石的身份进行的，《汉书·霍光传》说他和苏武联名上奏说昌邑王不宜立为天子时，直接称苏武为典属国，《汉书·宣帝本纪》说苏武在这时也已封侯，恐怕都是误记。

昔贤为卒伍

【原文】 三代而上，文武不分，春秋列国军将皆命卿，处则执政，出则将兵，载于《诗》、《书》、《左传》，可考也。然此特谓将帅耳，乃若卒伍之贱，虽贤士亦为之，不以为异。鲁哀公时，吴伐鲁，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属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率三百人，有若与焉。杜预云：“卒，终也，谓于七百人中，终得三百人任行也。”或谓季孙曰：“不足以害吴，而多杀国士，不如已也。”乃止之。此盖后世斫营劫寨之类，而有若亦为之。齐伐鲁，冉求帅左师，樊迟为右，季孙曰：“须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谓虽年少，能用命也。冉有用矛于齐师，故能入其军。杜预云：“言能以义勇也。”皆孔门高弟，而亲卒伍之事，后世岂复有之？

【译文】 夏商周三代以前，官员不分文武，春秋时各个国家军队将领都是受命的大臣，在朝时执政，出外时率兵，这见之于《诗经》、《书经》、《左传》，有据可考。不过以上所指乃是将帅，至于士兵之类下贱的人，即使是很贤能的人也去充当，不认为这是什么怪事。鲁哀公时，吴国攻打鲁国，军队驻扎在泗

上（今江苏西北），微虎打算乘着夜晚进攻吴王，他有私人部属七百人，三次召集到大帐前的庭阶上比试，最后挑选了三百人参加，有个叫有若的人也在其中。杜预注释说：“卒，是最后意思，是说在七百人中，最后选定三百人去攻打王宫。”有人对季孙说：“袭营杀不了吴王，只能使鲁国受到损失，不如停止这次行动。”季孙接受了这个意见。这就是后代所谓砍杀敌人军营或劫寨一类，而有若也想这样干。齐国攻打鲁国，冉求率领左师，樊迟率领右师迎战，季孙说：“樊迟太软弱。”有子说：“但是他能拼命。”意思是说，樊迟虽然年少，但却勇敢拼命。冉求善于用矛进攻齐军，因此能攻入齐军中去。杜预注释说：“冉有因为是正义之军因而勇敢。”以上几人都是孔子的得意学生，但却当了普通的士兵，后代哪里还有这种事呢？

兵家贵于备预

【原文】 晋盗卢循据广州，以其党徐道复为始兴相，循寇建康，以为前锋。初，道复遣人伐船材于南康山，至始兴贱卖之，居人争市之，船材大积，而人不疑。至是悉取以装舰，旬日而办。萧衍镇雍州，以齐室必乱，密修武备，多伐材竹，沈之檀溪，积茅如冈阜，皆不之用。中兵参军吕僧珍觉其意，亦私具橹数百张。衍既起兵，出竹木装舰，葺之以茅，事皆立办。诸将争橹，僧珍出先所具者，每船付二张，争者乃息。魏太武南伐盱眙，太守沈璞以郡当冲要，乃缮城浚隍，积材谷，储矢石，为城守之备。魏攻之，三旬不拔，烧攻具退走。古人如此者甚多，道复虽失所从，为畔涣之归，然其事固可称也。

【译文】 晋代大盗卢循占据广州，让他的党羽徐道复作始兴（今广东始兴县西北）长官，卢循攻打建康（今江苏南京）时，让他担任前锋。起初，徐道复派人在南康山砍伐造船的木材，运到始兴贱价出卖，当地百姓争着购买，造船的木材堆集了很多，但没人怀疑他别有用心。到攻建康时全部取出来装上兵舰，十来天就办好了。萧衍镇守雍州时，预见到南齐必然发生战乱，暗地里准备武装，砍伐了很多成材的竹子，沉到檀溪中去，竹木堆积如山，都没拿出来用。中兵参军吕僧珍觉察出了他的用意，也暗中准备了船桨数百个。萧衍起兵后，取出贮藏的竹木装在战舰上，上面用茅草覆盖，事情很快就办好了。诸位将领争要船桨，吕僧珍拿出先前所预备的，每只船上发给两个，争议才平息了。魏太武帝拓跋焘向南进攻盱眙（今属江苏），盱眙的地方官沈璞因为这个郡是冲要之地，便修缮城池，疏浚城河，聚积财物粮食，储备弓箭，作守城的准备。魏

兵攻打三十天，还没攻下来，烧掉攻城的器材退走了。古人这样作的很多，徐道复虽然跟错了人，成为一个跋扈将领，但他所作的这件事还是值得称道的。

渠阳蛮俗

【原文】 靖州之地，自熙宁九年收复唐溪洞诚州，元丰四年，仍建为诚州，元盍二年，废为渠阳军，又废为寨，五年复之，崇宁二年，改为靖州。始时渠阳县为治所，后改属沅州而治永平，其风俗谿与中州异。蛮酋自称曰官，谓其所部之长曰都，邦人称之曰土官。酋官入郭，则加冠巾，余皆椎髻，能者则以白练布缠之，曾杀人者谓之能。妇人徒跣，不识鞋履，以银、锡或竹为钗，其长尺有咫。通以斑襖布为之裳。纪岁不以建寅为首，随所处无常月。要约以木铁为契。病不谒医，但杀牛祭鬼，率以刀断其咽，视死所向卜，多至十百头。凡昏姻，兄死弟继，姑舅之昏，他人取之，必贿男家，否则争，甚则仇杀。男丁受田于酋长，不输租而服其役，有罪则听其所载，谓之草断。凡贷易之逋，甲不能偿，则掠乙以取直，谓之准。长少相犯，则少者出物，谓之出面。言语相诬，则虚者出物，谓之裹口。田丁之居，峭岩重阜，大率无十家之聚。遇仇杀则立栅布棘以受之。各有门款，门款者，犹言伍籍也，借牛于邻洞者，谓之拽门款。方争时，以首博首，获级一二则溃去，明日复来，必相当乃止。欲解仇，则备财物以和，谓之陪头暖心。战之日，观者立其傍和劝之，官虽居其中，不敢犯也。败则走，谓之上坡。志在于掠，而不在于杀，则震以金鼓，而挺其一隅，纵之逸，谓之。败者屈而归之，掠其财而还其地，谓之入地。兵器有甲冑、标牌、弓弩，而刀之铁尤良。弩则傅矢于弦而偏架之，谓之偏架弩，以利侔中土神臂弓，虽暑湿亦可用。凡仇杀，虽微隙必发，虽昔衅必报，父子兄弟之亲不避也。子弟为士人者，隶于学，仇杀则归，罢则复来。荆湖南、北路，如武冈、桂阳之属瑶民，大略如此。

【译文】 靖州（今湖南靖县）这个地方，自从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收复南唐时的溪洞诚州，元丰四年，仍设诚州，哲宗元盍二年（1087年），废诚州为渠阳军，后来又废为寨，五年之后恢复渠阳军，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改为靖州。开始时靖州治所是渠阳县，后来改属沅州，治所是永平（今湖南靖县），那里的风俗与中原不同。他们的首领自称叫官，他部下的酋长叫都，当地人称他们叫土官。酋长入城时，戴上头巾，其余的人只在脑后挽个椎髻，有财力的人头上缠一条白练布，曾经杀过人者被人称为能人。妇女赤足走路，不

知鞋子为何物，用银、锡或竹子作成首饰，长一尺八寸，所有的人都穿斑布作的下衣。记年岁不以正月作为一年的开始，州内各地没有统一固定的计月方式。订契约用木头或铁东西作为信物。有病不找医生看，只是杀牛祭鬼，常以刀割断牛的咽喉，看牛死时头朝的方向占卜，多时杀牛百十头。凡是结为婚姻的，哥哥死了，弟弟可娶嫂子，如果是姑舅结亲，又被别人娶走，必须送给男家钱财，否则便起争端，甚至发生仇杀。男子丁壮从酋长那里得到田地，不缴地租，仅服劳役，如犯罪便听酋长裁决，称为草断。凡是借贷款，如甲不能偿还，便掠夺乙的财产抵偿，这叫准稂。老年人和少年人发生矛盾，由少年人出东西，称为出面。用谎言骗人，骗人者出财物，称为裹口。种田壮丁居住之处，都是在陡峭的山岩或大土山上，很少有十家住在一起。遇到相互仇杀便树立栅栏或布置荆棘，用来防范。居民各有门款，门款就是户籍，以五户为单位。向邻洞借牛的，称为拽门款。双方争斗时，首领和首领搏斗，杀死对方一二人便溃散跑走，明天再来，一直到双方死的人数相等才住手。如打算与仇敌和解，就准备财物解和，这叫陪头暖心。双方交战那天，旁观者站立在一旁劝解，这时即使有官员在场，也不敢冒犯任何一方。打败了就走，称为上坡。双方斗殴的目的是为了夺取对方钱财，而不在于杀人，争斗时金鼓震天，而放开一角，放纵对方逃跑，这叫做香。失败者向对方屈服，从逃跑的地方归来，战胜者掠取失败者的财物而归还土地，这叫做入地。兵器有甲冑、标牌、弓弩，而铁制的刀尤为精良。弩弓是把箭安放在弦上，放入偏架上，称为偏架弓，它的锋利可和中原的神臂弓相等，即使暑天发湿也可应用。凡是仇杀，即使有小矛盾也要发难，即使过去的仇也报，就是父子兄弟这样的亲属也不回避。蛮人的子弟是读书人，属学校管理，遇到仇杀便回乡去，报了仇再回来上学。荆湖南路、北路，如武冈（今属湖南）、桂阳（今属湖南）一带的瑶族人，其风俗大概就是这样。

寄资官

【原文】 内侍之职，至于干办后苑，则为出常调，流辈称之曰苑使。又进而干办龙图诸阁，曰阁长。其上曰门司，曰御药，曰御带。又其上为省官，谓押班及都知也。在法，内侍转至东头供奉官则止，若干办御药院，不许寄资，当迁官则转归吏部。司马公论高居简云：“旧制，御药院官至内殿崇班以上，即须出外，今独留四人，中外以此窃议。”言之详矣。后乃不然，逮其迁带御器械可

带阶官，然后尽还所寄之资。至于宣政、宣庆诸使，遥郡防、团、观察，其高者为延福宫、景福殿承宣使。顷在枢密行府，有院吏兵房副承旨董球，于绍兴三十二年正月尚未有正官，至四月，予接伴人使回，球通刺字来谒，已转出为武显大夫。问其何以遽得至此，曰：“副承旨比附武显郎，后用赏故尔。”盖亦寄资也。

【译文】 在皇帝宫廷供使唤的内侍宦官官职，如作到干办后苑这个官的，就算是出常调（吏部按正常制度对官员注授差遣窠阙），世人称干办后苑为苑使。苑使再进升就是干办龙图阁和其他阁，称之为阁长。他的上级叫门司、御药、御带，再往上是内侍省官，即押班和都知。按照规定，内侍官晋升到东头供奉官就到顶了，如果担任干办御药院，以后就不允许寄资，再升官时就要调离宦官系统，转归吏部按普通官员对待。司马光在谈到高居简时说：“按照规定，御药院官升到内殿崇班以上，便须要改归外官系列，如今官已至内殿崇班而仍未改归外，又留下四人，因此朝野内外议论纷纷。”说得已很详细了。但后来就不是这样了，等到升为带御器械时就可带高级的武官的官阶，然后把以前寄存的官阶全部归还给本人。甚至升到宣政、宣庆等使，遥远边郡的防御史、团练使、观察使，最高的是延福宫、景福殿承宣使。不久前，我在枢密行府任职，有个院吏兵房副承旨董球，在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正月还没有正式官职，到了四月，我迎接伴随入金使节归来的人，刚回到家，董球便送来名片拜见我，他已晋升为武官官阶武显大夫。我问他怎么会升得这么快，他说：“副承旨相当于武显郎，后来是因为天子奖赏的原故。”这也是通过寄资官的途径取得的。

亲王带将仕郎

【原文】 薛氏《五代史》，梁太祖开平元年五月，皇第五男友雍封贺王。及友篡位，以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贺王友雍为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以亲王而阶将仕郎，仍试衔初品，虽典章扫地之时，恐不应尔也。

【译文】 薛居正的《旧五代史》记载，梁太祖开平元年（907年）五月，皇帝第五个儿子朱友雍被封为贺王。等到朱友篡夺了皇位，任命原将仕郎、试秘书少郎、贺王朱友雍为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以亲王的身份而官阶却是将仕郎，又担任带“试”衔的最低品阶的职务，虽然是典章制度遭受彻底破坏的时期，恐怕也不应该有这样的事。

郡县用阴阳字

【原文】 山南为阳，水北为阳，《谷梁传》之语也。若山北水南则为阴，故郡县及地名多用之，今略叙于此。山之南者，如嵩阳、华阳、恒阳、衡阳、镇阳、岳阳、峯阳、夏阳、城阳、陵阳、岐阳、首阳、营阳、咸阳、栎阳、宜阳、山阳（属河内郡，太行在北）、广阳、辟阳、河阳、鲁阳、黎阳、枞阳、零阳、巫阳、东阳、韶阳、郴阳、揭阳、弋阳（属汝南郡，弋山在西北）、当阳、青阳、黔阳、寿阳、麻阳、云阳、美阳、复阳（南阳复山之阳）、上曲阳（属常山）、下曲阳（属钜鹿）、阳（属五原）、原阳（属云中）。水之北者，冯翔之池阳、频阳、礪阳、沈阳，扶风之杜阳，河东之大阳（大河之阳），平阳（平河之阳），太原之晋阳、汾阳，及河阳，洛阳，荥阳，砥阳，渭阳，淮阳，汶阳，济阳，襄阳，潯阳，渔阳，辽阳，泗阳，伊阳，永阳，滁阳，潮阳，澧阳，灌阳，阳，兆阳，沐阳，东郡之濮阳。东武阳，颍川之颍阳、昆阳、舞阳，汝南之汝阳、舞阳、阳、襍阳、滇阳、新阳、安阳、博阳、成阳，南阳之育阳、涅阳、堵阳、蔡阳、筑阳、棘阳、比阳、朝阳、湖阳、红阳，江夏之西阳，庐江之寻阳，九江之曲阳，济阴之句阳（音钩，句读之丘），沛郡之谷阳、扶阳、漂阳，魏郡之繁阳，钜鹿之堂阳，清河之清阳，涿郡之高阳、饶阳、范阳，勃海之浮阳，济南之般阳、朝阳，泰山之东平阳、东武阳、宁阳，北海之胶阳，东海之开阳、曲阳、都阳，临淮之射阳、兰阳，丹阳之丹阳、陵阳、漂阳，豫章之鄱阳、阳，桂阳之耒阳、桂阳、浚阳，武陵之无阳、辰阳、酉阳、零阳，零陵之洮阳，汉中之旬阳、沔阳、安阳，犍为之江阳、武阳、汉阳，金城之枝阳，天水之略阳、阿阳，安定之泾阳、彭阳，北地之泥阳，上郡之定阳，雁门之沃阳、剧阳，上谷之沮阳，渔阳之要阳，辽西之海阳，右北平之夕阳、聚阳，苍梧之封阳，赵国之易阳，胶东之观阳，长沙之益阳，已上皆见《汉书·地理志》。其水之下，必曰在某水之阳。合山水之称阳者，百有五六十，至阴字则甚少，盖面势在背，自难立国邑耳。山之北者，唯华阴、山阴、龟阴、蒙阴、郛阴、雕阴、襄阴，水之南者，汾阴、荡阴、颍阴、汝阴、舞阴、济阴、汉阴、晋阴、蒲阴、湘阴、潞阴、河阴、湖阴、江阴、淮阴、圉阴，仅三十而已。若乐阳、南阳、合阳、被阳、富阳（属泰山者）、昌阳、建阳（属东海者）、武阳之类，尚多有之，莫能知其为山为水也。

【译文】 山的南边称阳，水的北边称阳，这是《谷梁传》中说的，若山的

北边水的南边则称阴，因此郡县和地名多采用之，现在大略叙述在这里。山的南边以阳字命名的，如嵩阳、华阳、恒阳、衡阳、镇阳、岳阳、峯阳、夏阳、城阳、陵阳、岐阳、首阳、营阳、咸阳、栢阳、宜阳、山阳（属河内郡）、广阳、辟阳、河阳、鲁阳、黎阳、枋阳、零阳、巫阳、东阳、韶阳、郴阳、揭阳、弋阳（山在西北）、当阳、青阳、黔阳、寿阳、麻阳、云阳、美阳、复阳（南阳复山之阳）、上曲阳（属常山）、下曲阳（属钜鹿）、稭阳（属五原）、原阳（属云中）。水之北者，冯翊所属之池阳、频阳、礲阳、沈阳，扶风之杜阳，河东之大阳（大河之阳），平阳（平河之阳），太原之晋阳、汾阳，及河阳，洛阳，荥阳、襍阳，渭阳，淮阳，汶阳，济旧，襄阳，潯阳，渔阳，辽阳，泗阳，伊阳，永阳，滁阳，潮阳，澧阳，灌阳，阳，洮阳，沐阳，东郡之濮阳，东武阳，颍川之颍阳、昆阳、舞阳，汝南郡所属的汝阳、舞阳、阳、阳、滇阳、新阳、安阳、博阳、成阳、南阳郡所属的育阳、涅阳、堵阳、蔡阳、筑阳、棘阳、比阳、朝阳、湖阳、红阳，江夏之西阳，庐江之寻阳，九江之曲阳，济阴之句阳（韵钩，句读之丘），沛郡之谷阳、扶阳、溧阳，魏郡之繁阳，钜鹿所属之堂阳，清河之清阳，涿郡所属之高阳，饶阳、范阳，勃海之浮阳，济南之般阳、朝阳，泰山以南的东平阳、东武阳、宁阳、北海之胶阳，东海的开阳、曲阳、都阳，临淮的射阳、兰阳、丹阳所属的丹阳、零阳、溧阳，豫章郡所属的鄱阳、阳、桂阳之耒阳、桂阳、浚阳、武陵郡的无阳、辰阳、酉阳、零阳、零陵郡的洮阳，汉中郡的旬阳、沔阳、安阳，犍为郡的江阳、武阳、汉阳、金城郡的枝阳，天水郡的略阳、阿阳，安定郡的泾阳、彭阳，北地郡的泥阳，上郡的定阳，雁门郡的沃阳、剧阳，上谷郡的沮阳，渔阳郡的要阳，辽西郡的海阳，右北平郡的夕阳、聚阳，苍梧郡的封阳，赵国郡的易阳，胶东郡的观阳，长沙郡的益阳，以上都见于《汉书·地理志》。在水的北边，一定说在某水之阳。汇合山南水北称阳的地名，有一百五六十个，而带阴字的很少，这是因为山的北边水的南边地势不好，难于建立城池。山的北面以阴字命名的，只有华阴、山阴、龟阴、蒙阴、鹑阴、雕阴、襄阴、水的南面以阴字命名的地名有汾阴、荡阴、颍阴、汝阴、舞阴、济阴、汉阴、晋阴、蒲阴、湘阴、河阴、濩阴、湖阴、江阴、淮阴、圉阴，仅三十个而已。其他和乐阳、南阳、合阳、被阳、富阳（属泰山者）、昌阳、建阳（属东海）、武阳之类，还有很多，不知道这些城池的命名是根据山还是根据水。

杜畿 李泌 董晋

【原文】 汉建安中，河东太守王邑被召，郡掾卫固、范先请留之。固等外以请邑为名，而内实与并州高干通谋。曹操选杜畿为太守，固等使兵绝陕津，数月不得渡。畿曰：“河东有三万户，非皆欲为乱也。吾单车直往，出其不意，固为人多计而无断，必伪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计縻之足矣。”遂诡道从 津度，固遂奉之。畿谓固、先曰：“卫、范，河东之望也，吾仰成而已。”比数十日，诸将斩固等首。

唐贞元初，陕虢兵马使达奚抱晖杀节度使张劝，代总军务，邀求旌节。德宗遣李泌往，欲以神策军送之，泌请以单骑入，上加泌观察使。泌出潼关，硪坊步骑三千布于关外，曰：“奉密诏送公。”泌写宣以却之，疾驱而前。抱晖不使将佐出迎，去城十五里方出谒。泌称其摄事保城壁之功，入城视事。明日，召抱晖至宅，语之曰：“吾非受汝而不诛，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将帅，皆不能入，故丐汝余生。”抱晖遂亡命。

宣武节度使李万荣疾病，其子 为兵马使，欲为乱，都虞侯邓惟恭执送京师。诏以东都留守董晋为节度使。惟恭权军事，自谓当代万荣，不遣人迎晋。晋既受诏，即与仆从十余人赴镇，不用兵卫。至郑州，或劝晋且留观变。有自汴州出者，言不可入，晋不对，遂行。惟恭以晋来之速，不及谋，去城十余里，乃帅诸将出迎。晋入，仍委以军政。久之，惟恭内不自安，潜谋作乱，事觉，晋悉捕斩其党，械惟恭送京师。

观此三者，其危至矣！杜畿、李泌、董晋，皆以单车入逆城，从容妥定，其智勇过人如此。唐史犹讥晋为懦弱苟安，殆不然也。是时，朝议以晋柔仁多可，恐不能集事，用汝州刺史陆长源为行军司马以佐之。长源性刚刻，多更张旧事，晋初皆许之，案成则命且罢，由是军中得安。初，刘玄佐、李万荣、邓惟恭时，士卒骄不能御，乃置腹心之士，幕于公庭庑下，挟弓执剑以备之，时劳赐酒肉。晋至之明日，悉罢之。谓之懦弱，实为失当。晋在汴三年而薨，长源代之，即为军士所杀。向使晋听用其言，汴乱久矣。又《李泌传》但云拜陕虢观察使，开车道至三门，及杀淮西亡兵。于赴镇事略不书，亦失之也。

【译文】 汉朝建安年间，河东太守王邑被朝廷召回，本郡官吏卫固、范先请求朝廷把王邑留下。卫固等人表面上打着请求王邑留下的旗号，而实际暗地与并州高干勾结。曹操选杜畿担任河东太守，卫固等派兵封锁陕山一带东渡黄

河的渡口，几个月不能渡过黄河。杜畿说：“河东有三万户，不都想要叛乱。我乘一辆车直接前往，出其不意，卫固为人计谋很多而优柔寡断，必定假装接受我。我能够在郡里住一个月，用计策控制他足可以了。”便走小路从棚津渡过黄河，卫固便承认了他的身份。杜畿对卫固、范先说：“卫固、范先，你们是河东人的领袖，我治理河东全靠你们罢了。”等到过了几十天，部将们就把卫固等斩首了。唐代贞元初年，陕粹兵马使达奚抱晖杀死了节度使张劝，代替他统管军务，向朝廷要求正式任命。唐德宗派李泌前去，想用神策军护送他，李泌请求自己骑马去，唐德宗任命李泌为观察使。李泌出潼关，鄜坊的步军、骑军共三千人聚集在潼关以外，说：“奉秘密诏令要我们护送您。”李泌写了证明公文把他们打发回去，飞马前进。达奚抱晖不让手下将领出来迎接，离城十五里才出来拜见。李泌称赞了达奚抱晖保护城池军营的功劳。进城处理军务。明天，把达奚抱晖叫到自己的住宅里，对他说：“我不是爱惜你而不杀你，恐怕从今以后出现变故的地方，朝廷所任命的将帅，都不能前去赴任，所以请你自己找一条生路。”达奚抱晖便逃亡去了。宣武节度使李万荣得了病，他的儿子李稟任兵马使，想发动叛乱，都虞侯邓惟恭逮捕了他并把他押送京师。朝廷下诏任命原东都留守董晋为宣武节度使。邓惟恭代理宣武军事务，自认为应当代替李万荣，不派人迎接董晋。董晋接到诏书以后，立即和部下十余人前去赴任，没有用军队护送。到了郑州，有人劝董晋暂时停留观察动静。有从汴州来的人，说不能去，董晋不理，便又往前走。邓惟恭因为董晋来得神速，来不及想对策，董晋离城十余里时，才率领各位将军出城迎接。董晋进了城，仍旧把管理军队的权力交给邓惟恭。过了好一段，邓惟恭心里总不踏实，暗地里阴谋叛乱，事情被发觉，董晋把他和他的同党全逮捕处斩。考察这三件事，真是危险极了。杜畿、李泌、董晋、都是单车匹马地进入叛逆者的城中，从容不迫地安定局势，他们的智谋和勇敢都这样地超过常人。《新唐书》还讥讽董晋是软弱怕事，恐怕是不对的。当时，朝廷议论觉得董晋柔弱仁爱凡事多顺从，恐怕他不能把事办妥当，又任命原汝州刺史陆长源为行军司马以协助他。陆长源性格刚强苛刻，把旧日的制度惯例改革了很多，董晋起初都同意，改革方案制定出董晋又下令暂停执行，因此军中能够安定。起初，刘玄佐、李万荣、邓惟恭掌管宣武军时，士兵骄纵难以控制，便选择可靠的将士，安置在大堂周围的走廊等处用幕布遮住，手执武器以防备万一，不时地慰劳他们赏赐酒肉。董晋来到的第二天，把这些暗地埋伏的将士全撤除了。说他懦弱放纵部下，实在不恰当。董晋在汴州（宣武军驻地）三年后去世，陆长源代替他，便被将士杀死。如果过去董晋采纳他的意见，汴州早就乱了。另外《新唐书·李泌传》只讲李泌被任命为陕虢观察使，开修

行车道路到三门，以及斩杀淮西逃亡的士兵等事，对于如何前往陕虢军赴任的事忽略不写，也是有欠缺的。

严有翼诋坡公

【原文】 严有翼所著《艺苑雌黄》，该洽有识，盖近世博雅之士也。然其立说颇务讥诋东坡公，予尝因论玉川子《月蚀诗》，诮其轻发矣。又有八端，皆近于蚍蜉撼大木，招后人攻击。如《正误篇》中，摭其用五十本葱为“种薤五十本”，发丘中郎将为“校尉解摸金”，扁鹊见长桑君，使饮上池之水，为“仓公饮上池”，郑余庆 胡芦为卢怀慎云，如此甚多。坡诗所谓挾云汉，分天章，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若用葱为薤，用校尉为中郎，用扁鹊为仓公，用余庆为怀慎，不失为名语，于理何害？公岂一一如学究书生，案图索骏，规行矩步者哉！《四凶篇》中，谓坡称太史公多见先秦古书，四族之诛，皆非殊死，为无所考据中《昌蒲赞》，以为信陶隐居之言，以为昌阳，不曾详读《本草》，妄为此说。《苦茶篇》中，谓“《周诗》记苦茶”为误用《尔雅》。《如皋篇》中，谓“不向如皋闲射雉”与《左传》杜注不合，其误与江总“暂往如皋路”之句同。《荔枝篇》中，谓四月食荔枝诗，爱其体物之工，而坡未尝到闽中，不识真荔枝，是特火山耳。此数者或是或非，固未为深失，然皆不必尔也。最后一篇遂名曰《辨坡》，谓雪诗云，“飞花又舞谪仙檐”，李太白本言送酒，即无雪事。“水底笙歌蛙两部”，无笙歌字。殊不知坡借花咏雪，以鼓吹为笙歌，正是妙处。“坐看青丘吞泽芥”，“青丘已吞云梦芥”，用芥字和韵，及以泽芥对溪苹，可谓工新。乃以为出处曾不蒂芥，非草芥之芥，“知白守黑名曰谷”正是老子所言，又以为考子只云为天下谷，非名曰谷也。如此论文章，其意见亦浅矣。

【译文】 严有翼所作《艺苑雌黄》一书，详备广博，很有见地，是近代知识渊博的人。但他立论喜好诋毁东坡，我曾论说玉川子的《月蚀诗》，诮说他轻狂好发议论。还有八条，都近于蚂蚁摇大树，招致后人攻击。如《正误篇》中，拾取东坡用五十棵葱说成“种薤五十本”，摘引东坡把丘中郎将说成“校尉解摸金”，把扁鹊见长桑君，让他饮用上池之水说成“仓公饮上池”，把郑余庆盪胡芦说成卢怀慎蒸胡芦等等，这类的例子很多。苏东坡的诗真可谓拨开云雾，现出天上的日月星辰，又如万斛泉水遍地涌出，好极妙极。如以葱为薤，以校尉为中郎，以扁鹊为仓公，以余庆为怀慎，不失为名，在道理上又有什么说不过去的呢？苏东坡岂能像学究书生，按图索驷，循规导矩，亦步亦趋呢？严有翼

在《四凶篇》中，说苏东坡称道太史公司马迁见了很多先秦古书，四个不服从舜管教的部族首领（即浑敦、穷奇、檮杌、饕餮。一说是共公、欢兜、三苗、齔）被诛，都只是惩罚而不是杀死云云，是没有根据的。《卢桔篇》中说，苏东坡咏枇杷的诗中说“卢桔是乡人”，不知是根据什么写的。《昌阳篇》中有《昌蒲赞》一则，认为苏东坡是相信了陶弘景的话，把昌蒲说成昌阳，是没有详读《本草》，妄发议论。《苦茶篇》中，说“《周诗》记苦茶”是错误地引用《尔雅》记载。《如皋篇》中，说苏东坡的“不向如皋闲射雉”一句与《左传》杜预的注解不合，其错误和江总的诗“暂往如皋路”一句相同。《荔枝篇》中，说东坡所写四月食荔枝的诗，状物虽然很工整，但苏东坡没有到过福建，不认识真荔枝，只是指火山而已。这几条指责或是或非，都无关大局，用不着去纠缠。最后一篇名字叫《辩坡》，关于咏雪的诗苏东坡说，“飞花又舞谪仙檐”，李太白原诗本来说的是送酒，不是说下雪的事。苏东坡的诗句是“水底笙歌蛙两部”，通篇又没有笙歌字样，殊不知苏东坡是借花咏雪，以青蛙鼓吹为笙歌，正是诗的妙处。苏东坡诗说“坐看青丘吞泽芥”，“青丘已吞云梦芥”，用芥字和韵，以及用泽芥对溪苹，可说是恰当清新。严有翼认为诗中所用芥字是蒂芥之芥，也就是心中存有嫌隙，或心中不快，并不是草芥之芥。苏东坡诗句说“知白守黑名曰谷”，正是老子的话，严有翼认为老子只是说谷是天下的山谷，象征空虚，并不是名字叫谷。这样来评论文章，见识也太浅薄了。

曹、马能收人心

【原文】 曹操自击乌桓，诸将皆谏，既破敌而还，科问前谏者，众莫知其故，人人皆惧。操皆厚赏之，曰：“孤前行，乘危以侥幸，虽得之，天所佐也，顾不可以为常。诸君之谏，万安之计，是以相赏，后勿难言之。”魏伐吴，三征各献计，诏问尚书傅嘏，嘏曰：“希赏邀功，先战而后求胜，非全军之长策也。”司马师不从，三道击吴，军大败。朝议欲贬出诸将，师曰：“我不听公休，以至于此，此我过也，诸将何罪？”悉宥之。弟昭时为监军，惟削昭爵。雍州刺史陈泰求敕并州，并力讨胡，师从之。未集，而二郡胡以远役遂惊反，师又谢朝士曰：“此我过也，非陈雍州之责。”是以人皆愧悦。讨诸葛诞于寿春，王基始至，围城未合，司马昭敕基敛军坚壁。基累求进讨，诏引诸军转据北山。基守便宜，上疏言：“若迁移依险，人心摇荡，于势大损。”书奏报听。及寿春平，昭遗基书曰：“初，议者云云，求移者甚众，时未临履，亦谓宜然。将军深算利害，独

秉固心，上违诏命，下拒众议，终于制敌禽贼，虽古人所述，不过是也。”然东关之败，昭问于众曰：“谁任其咎？”司马王仪曰：“责在元帅。”昭怒曰：“司马欲委罪于孤耶？”引出斩之。此为谬矣！操及师、昭之奸逆，固不待言。然用兵之际，以善推人，以恶自与，并谋兼智，其谁不欢然尽心悉力以为之用？袁绍不用田丰之计，败于官渡，宜罪己，谢之不暇，乃曰：“吾不用丰言，卒为所笑。”竟杀之。其失国丧师，非不幸也。

【译文】曹操亲自率军进攻乌桓，将领们都劝阻他，等到打败敌人回来，召见以前劝阻他的人，众人不知其中缘故，人人都很害怕。曹操对这些人给予了很丰厚的奖赏，说：“我率兵前去，冒着危险谋求侥幸的胜利，虽然得到了，是上天的恩赐，决不可以作为经常的办法。各位的劝阻，是万无一失的计策，因此给予奖赏，以后有话只管讲不必为难。”魏国进攻吴国，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将军胡遵、镇南将军毋丘俭分别进献计策，下诏征求尚书傅嘏的意见，傅嘏说：“贪图奖赏企求战功，先决定去打仗而以后才想怎样取胜，不是保全军队的长远策略。”司马师不听从，分三路进攻吴国，军队大败而回。朝廷上的人议论要给各将领降级外调的处分，司马师说：“我没听公休（傅嘏）的意见，才到了这个地步，这是我的过错，将领们有什么罪？”将领们都被免于处分。司马师的弟弟司马昭当时任监军，只降低了司马昭的爵位。雍州刺史陈泰请求下令给并州，合力进攻胡人，司马师同意了。战斗还没开始，而两州的胡人因为行军路程太远便因故逃回去了，司马师又对着朝廷上的官员批评自己说：“这是我的过错，不是雍州刺史陈泰的责任。”所以人们都惭愧而又喜悦。到寿春讨伐诸葛诞，王基刚到，对寿春城的包围圈还没形成，司马昭命令王基收拢军队坚守营地。王基多次请求进攻，诏令却让他率各支军队转移占据北山。王基根据实际情况不服从命令，上奏说：“如果转移依靠险要，人心动摇，对于形势大有损害。”奏章递上后被批准。等到寿春被攻克，司马昭写信给王基说：“当初，议论的人说这说那，请求转移的人很多，当时我没有亲临前线，也认为应该转移。将军您深入地考虑了转移的利弊，独自怀着坚定信心，对上违抗诏命，对下顶住众人议论，终于战胜敌人俘获贼军首领，即使是古人记述的，也没有超过您的。”然而东关战败，司马昭向众人问道：“责任在谁？”司马王仪说：“责任在元帅。”司马昭发怒说：“司马想把罪过加在我头上吗？”把王仪推出斩首。这事就做错了！曹操和司马师、司马昭的奸诈谋求篡位，固然不必讲。然而在用兵打仗的时候，把成绩归于别人，把过失留给自己，智谋成倍地超出常人，有谁不欢快地尽心尽力地为他们效力？袁绍不采纳田丰的计策，在官渡战败，应当归罪自己，批评自己还来不及，却说：“我不采纳田丰的意见，终于被他讥笑。”竟杀死了田

丰。他的亡国败军，不是偶然的。

取蜀将帅不利

【原文】 自巴蜀通中国之后，凡割据擅命者，不过一传再传。而从东方举兵临之者，虽多以得俊，将帅辄不利，至于死贬。汉伐公孙述，大将岑彭、来歙遭刺客之祸，吴汉几不免。魏伐刘禅，大将邓艾、钟会皆至族诛。唐庄宗伐王衍，招讨使魏王继岌、大将郭崇韬、康延孝皆死。国朝伐孟昶，大将王全斌、崔彦进皆不赏而受黜，十年乃复故官。

【译文】 自从巴蜀和中原相交通后，凡是在那里割据一方、不听中央号令的，至多传两代就灭亡了。但是，从中原地区率兵西进四川的，虽然大多能够取胜，但将帅的结局却都不好，有的死，有的贬。汉代讨伐公孙述，大将岑彭、来歙被刺客暗杀，吴汉也差点送命。三国时魏国攻打刘备的儿子刘禅，大将邓艾、钟会都被处死，甚至株连九族。五代时后唐庄宗讨伐王衍，招讨使魏王李继岌、大将郭崇韬、康延孝都被处死。本朝讨伐孟昶，大将王全斌、崔彦进不仅没有受到奖赏，反而受到贬谪，十年之后才恢复了原来的官职。

李峤杨再思

【原文】 李峤、杨再思相唐中宗，皆以谀悦保位，为世所诋，然亦有可称。武后时，峤为给事中，来俊臣陷狄仁杰等狱，将抵死，敕峤与大理少卿张德裕、侍御史刘宪复验。德裕等内知其冤，不敢异，峤曰：“知其枉不申，是谓见义不为者。”卒与二人列其枉。忤后旨，出为润州司马，然仁杰数人竟赖此获脱。峤此举可谓至难，而《资治通鉴》不载。神龙初，要官阙，执政以次用其亲。韦巨源秉笔，当除十人，再思得其一，试问余授，皆诸宰相近属。再思喟然曰：“吾等诚负天下！”巨源曰：“时当尔耳。”再思此言，自状其短，观过知仁，亦足称也。

【译文】 李峤、杨再思在唐中宗统治时期担任宰相，都以阿谀讨好保住官位，被世人指责，然而也有可以称道的事。武则天统治时期，李峤任给事中，来俊臣陷害狄仁杰等案子，狄仁杰将要被判死刑，朝廷下敕，命令李峤与屯大理少卿张德裕、侍御史刘宪覆审验定。张德裕等心里知道狄仁杰等人冤枉却不敢

提出异议，李峤说：“知道人家冤枉不辨白，就是所谓见义不为。”终于与两个人向朝廷说明了狄仁杰的冤情。违背了武则天的旨意，李峤被调到京城以外担任润州司马，然而狄仁杰等数人最后靠他们的辨白得到保护和解脱。李峤这个举动可说是很不容易，而《资治通鉴》没有记载。神龙初年，重要职位缺人，执政大臣轮番委任自己亲近的人。韦巨源负责拟定任命官员名单，应当任命十个人，杨再思得到其中一个名额，询问其他九个人怎样选任，回答说都是宰相的近亲。杨再思叹息说：“我们这些人确实对不起天下人啊！”韦巨源说：“时势造成必然这样而已。”杨再思这里讲的话，自己指出了自己的短处，观过知仁（孔子的话，意为看一个人犯错误也能知道他有没有仁爱心）”，也值得称道。

容斋五笔

卷 一

天庆诸节

【原文】 大中祥符之世，谀佞之臣，造为司命天尊下降及天书等事，于是降圣、天庆、天祺、天贶诸节并兴。始时京师宫观每节斋醮七日，旋减为三日、一日，后不复讲。百官朝谒之礼亦罢。今中都未尝举行，亦无休假，独外郡必诣天庆观朝拜，遂休务，至有前后各一日。此为敬事司命过于上帝矣，其当寝明甚，惜无人能建白者。

【译文】 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一些谄谀奸佞之臣，制造了司命天尊下凡以及天书等事，于是降圣、天庆、天祺、天贶等节日一并兴起。开始的时候，每遇上述诸节京城的宫观都要设斋坛，向神佛祈祷七天。后来就减为三天、一天，后来就不再举行了。百官朝谒之礼也随即而废止。现在京城已不再举行此类活动，遇上上述诸节官员们也不休假。只是有一些地方每遇诸节必到天庆观朝拜，于是他们放下公务，以至有节前节后放假两天的。这是敬事司命超过了上帝。很明显，这类活动早就应当禁止，可惜无人能向皇上提出这一建议。

虢州两刺史

【原文】 唐韩休为虢州刺史，虢于东、西京为近州，乘輿所至，常税厩马。休请均赋它郡，中书令张说曰：“免虢而与它州，此守臣为私惠耳！”休复执论，吏白恐忤宰相意，休曰：“刺史幸知民之弊而不救，岂为政哉？虽得罪所甘心焉。”讫如休请。卢杞为虢州刺史，奏言虢有官豕三千，为民患。德宗曰：“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谓食之便。”帝曰：“守虢而忧它州，宰相材也。”诏以豕赐贫民，遂有意柄任矣。俄召入，逾年拜相。案两人皆以虢州守臣言公家事，而休见疑于名相，杞受知于猜主，遇合有命，信哉！

【译文】 唐代韩休任虢州刺史时，虢州对于东、西两京来说都是离京很近的州，皇帝车驾路过时，经常要交纳马的草料。休请求把这项赋税和其它郡均摊，中书令张说认为：“免掉虢州的负担而转加在其它的州上，这不过是地方官给百姓的私人恩惠罢了。”休再次坚持自己的意见，小吏向他说，这恐怕要违背宰相的意志，休说：“刺史有幸了解老百姓困难而不加以拯救，哪里是为政之道？即使因此获罪，也是甘心的呀！”最后还是同意了韩休的请求。卢杞任虢州刺史时，向皇帝上奏说：虢州有官猪三千头，经常糟蹋庄稼，已成为百姓的一块心病。德宗批复说：“那就把它们迁到沙苑吧！”卢杞又上奏说：“同州（今陕西大荔）百姓也是陛下的臣民，臣认为还是把它们杀吃掉为好！”德宗看完奏章情不自禁地说：“身为虢州刺史却能为它州百姓担忧，真是宰相之材！”于是就下诏将官猪赐与当地的贫苦百姓，并有意让卢杞执掌朝政。不久，卢杞被德宗召入朝廷，第二年就被拜授宰相职务。韩休、卢杞都以虢州刺史的身份谈论国家公事，而韩休却被名相张说怀疑为怀有私心，而卢杞被多疑的德宗发现且委以重任，看来人的机遇都是命中注定的，这还是很可信的！

狐假虎威

【原文】 谚有“狐假虎威”之语，稚子来扣其义，因示以《战国策》、《新序》所载。《战国策》云：“楚宣王问群臣曰：‘吾闻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诚何如？’群臣莫对。江乙对曰：‘虎求百兽而食之，得狐，狐曰：‘子无敢食我矣，天帝使我长百兽，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为不信，吾为子先行，子随我后，观百兽之见我而敢不走乎？’虎以为然，故遂与之行。兽见之皆走，虎不知兽畏己而走也，以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而专属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实畏王之甲兵也，犹百兽之畏虎也。’”《新序》并同。而其后云：“故人臣而见畏者，是见君之威也，君不用，则威亡矣。”俗谚盖本诸此。

【译文】 有句成语叫“狐假虎威”，我的幼子来问它的含义，我就把《战国策》、《新序》两书中的有关记载让他看。《战国策》中记载：“楚宣王曾问群臣：‘我听说北方诸国很害怕昭奚恤将军，果真如此吗？’群臣中无人回答。江乙回答说：“老虎天天捉各种动物以充饥，一天，它捉住一只狐狸，狐狸就对老虎说：“你不敢吃我！上帝让我做百兽之王，今天你要是吃了我，就是违逆上帝命令的。你如果不相信，我可以在前面走，你跟在我的后面，看看百兽之中有

谁见了我不敢不逃跑？”虎信以为真，所以就跟随它一起走。百兽见到它们都慌忙逃窜，老虎不知道百兽是害怕自己而逃跑，还认为它们真的是害怕狐狸！现在大王您的属地方圆五千里，有百万人强大的军队，而把军队委托给昭奚恤指挥，所以北方诸国惧怕奚恤，其实他们真正害怕的是大王强大的军队，就如同百兽害怕老虎一样。”《新序》中记载的也与此相同。而且在前文之后接着写道：“所以说人们害怕那些大臣，主要是害怕君主的权力，君主若不将权力赋予大臣，大臣的权威也就不复存在了。”这句成语大概就是起源于此。

徐章二先生教人

【原文】 徐仲车先生为楚州教授，每升堂，训诸生曰：“诸君欲为君子，而劳己之力，费己之财，如此而不为，犹之可也；不劳己之力，不费己之财，何不为君子？乡人贱之，父母恶之，如此而不为可也；乡人荣之，父母欲之，何不为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为君子者，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为小人者，未之有也。”成都冲退处士章 隐者，其学长于《易》、《太玄》，为范子功解述大旨，再复《 》词曰：“‘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所丑而有余者，恶也。君子能强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余，则《太玄》之道几矣。’此子云仁义之心，予之于《太玄》，述斯而已。或者苦其思，艰其言，迂溺其所以为数，而忘其仁义之大，是恶足以语道哉！”二先生之教人，简易明白，学者或未知之，故表出于此。

【译文】 徐仲车先生任楚州教授时，经常坐在堂上教导学生说：“如果诸位因为期望作正人君子，需要消耗自己的体力，费用自己的钱财，并因此而不作正人君子，还是可以的；如果不必消耗自己的体力，不必费用自己的钱财，又为什么不去作正人君子呢？如果邻居看不起你，父母讨厌你，并因此而不作正人君子，是可以的；如果邻居称赞你，父母期望你，又为什么不去作正人君子呢？”又说：“如果说的都是正当的话，作的都是正当的事，想的都是正当的念头，这样而不成为正人君子的人，是没有的。如果说的都是不正当的话，作的都是不正当的事，想的都是不正当的念头，这样而不成为小人的人，是没有的。”成都的退冲处士章 隐，擅长《易》和《太玄》之学，给范子功讲解《太玄经》的中心思想时，再三重复《 》的词句，说：“‘人所追求的但是又作得不够的，是善；人所厌恶的但是又作得太多的，是恶。高尚的人如果能强迫自己作那些作得不够的，而去掉那些作得太多的，那么《太玄经》的道理也就掌握

得差不多了。’这是杨子云的仁义之心，我对《太玄经》，就只讲这些而已。或者有人认为它思想难于理解，言词艰深，迂腐地沉溺它的术数内容，而忘掉了它在仁义方面的远大，这样的人那里够得上谈论道呢！”两位先生教导人的话，简易明白，学者或者还不知道他们，所以在这里特别提出来。

张吕二公文论

【原文】 张文潜诲人作文，以理为主，尝著论云：“自《六经》以下，至于诸子百氏、骚人、辩士论述，大抵皆将以为寓理之具也。故学文之端，急于明理，如知文而不务理，求文之工，世未尝有是也。夫决水于江、河、淮、海也，顺道而行，滔滔汨汨，日夜不止，冲砥柱，绝吕梁，放于江湖而纳之海，其舒为沦涟，鼓为涛波，激之为风飏，怒之为雷霆，蛟龙鱼鳖，喷薄出没，是水之奇变也。水之初，岂若是哉！顺道而决之，因其所遇而变生焉。沟渎东决而西竭，下满而上虚，日夜激之，欲见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达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沟渎而求水之奇，此无见于理，而欲以言语句读为奇，反复咀嚼，卒亦无有，此最文之陋也。”一时学者仰以为至言。予作史，采其语著于本传中。又吕南公云：“士必不得已于言，则文不可以不工。盖意有余而文不足，则如吃人之辩讼，心未始不虚，理未始不直，然而或屈者，无助于辞而已矣。观书契以来，特立之士未有不善于文者。士无志于立言则已，必有志焉，则文何可以卑浅而为之。故毅然尽心，思欲与古人并。”此南公与人书如此，予亦载之传中。

【译文】 大宋人张耒（字文潜）先生教人写文章时，强调以说理为主，曾著述论证其观点说：“从《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成书，到诸子百家、诗人、辩士的论述，大都把文章作为说明道理的工具。所以说，开始学习作文章，首先要明白道理，作文只知道用华丽的辞藻而不重视说理，是写不出好文章的。把水引入长江、黄河、淮河、大海之中，水顺河道而流，浩浩荡荡，日夜不停，冲过砥柱，穿越吕梁，注入于江湖而归纳入大海，舒缓则起涟漪，振怒则起波涛，激荡则起巨浪，狂怒则为雷霆，蛟龙鱼鳖，出没于其中，这就是水的奇特变化。把水引入江河之前，难道是这样的吗！顺水势而引导它，它就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有上述奇观。沟渠中的水东面决口，西边就会干竭，下游水满，则上游干涸，日夜吹激水面，想使其出现奇观，只不过是青蛙水蛭之类的嬉戏而已！说理透彻的文章，就像是长江、黄河、淮河、大海中

的水一样，不求其奇观而奇观自然而然就会出现。忽视说理的文章，就像是吹激沟渎中的水欲求其奇观一样，想靠文辞修饰来创造出好文章，这是不可能的。这样的文章反复咀嚼以后，使人一无所获，这才是最坏的文章。”当时学者都把这说尊为至理名言。我在写史书时，把这段话记述在他本人的传记中。对如何作文，吕南公也有自己的见解，他说：“士人不得已而必须写文章时，则行文一定要讲究文辞精美。如果文章道理充裕而文辞欠佳，就像是口吃的人与人辩论，虽理直气壮，却打输了官司，这是因为不善于表达的缘故。我观察到，自从有文字以来，有独特见解的士人，没有人不善于运用语言的。士人无志于著书立说也就罢了，如果一定想著书立说，那么怎么能用卑浅的词句去写文章呢？所以，决心著书立说的人一定要尽心竭力修练文辞，以求与古代的大作家看齐。”这是吕南公给人的信中这样说的，我也将它载入他的传记中。

郎官非时得对

【原文】 唐肃宗在灵武，关东献俘百，将即死，有叹者。司膳员外郎李勉过而问之，曰：“被胁而官，非敢反。”勉入见帝曰：“寇乱之污半天下，其欲澡心自归无繇，如尽杀之，是驱以助贼也。”帝驰骑全宥。以一郎吏之微，而非时得入对，虽唐制不可详知，想兵戈艰难时，暂如是耳！

【译文】 唐肃宗在灵武时，关东献上俘虏百人，不久即将处死，其中有哀声叹息的人。司膳员外郎李勉经过那里问其缘故，回答说：“是被胁迫当伪官，不是敢造反。”李勉入见皇帝说：“贼寇之乱污染之地接近天下的一半，对于那些准备从内心自新归顺朝廷而没有途经的人，如果全部杀死，这是驱赶他们去帮助贼人。”皇帝命令骑马传令全部赦免了那批俘虏。以一个郎官那样的微贱小吏而在非规定时间入宫奏事，虽然唐朝的制度不能详细知晓，想是在战争苦难时，暂时这样的吧。

王安石弃地

【原文】 熙宁七年，辽主洪基遣泛使萧禧来言河东地界，未决。八年再来，必欲以代州天池分水岭为界。诏询于故相文彦博、富弼、韩琦、曾公亮以可与及不可许之状，皆以为不可。王安石当国，言曰：“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于

是诏不论有无照验，撝拨与之。往时界于黄嵬山麓，我可以不瞰其应、朔、武三州，既以岭与之，虜遂反瞰忻、代，凡东西失地七百里。案庆历中，虜求关南十县，朝廷方以西夏为虑，犹不过增岁币以塞其欲，至于土地，尺寸弗与。熙宁之兵力胜于曩时，而用萧禧坚坐都亭之故，轻弃疆场设险要害之处。安石果于大言，其实无词以却之也。孙权谓：“鲁肃劝吾借刘玄德地云：‘帝王之起，皆有驱除，关羽不足忌。’此子敬内不能辨，外为大言耳！”安石之语亦然。

【译文】 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辽国皇帝洪基派遣使者萧禧来宋，谈判宋辽两国河东（今山西太原）一带边界问题，没有结果。第二年萧禧又为此事而来，坚持两国要以代州（今山西代县）天池分水岭为国界。神宗皇帝就能否接受辽国的条件下诏征求前宰相文彦博、富弼、韩琦、曾公亮的意见，他们都认为不能答应。当时，王安石作宰相执掌朝政，上奏皇帝说：“要想取之，必先与之。”于是皇帝下诏，不论察看勘验与否，都按萧禧的要求划分国界。以前，宋辽两国边界在黄嵬山麓，我方可以居高临下俯瞰辽国的应州（今山西应县）、朔州（今山西朔县）、武州（今山西神池）三州，现在把黄嵬山岭割给辽国，辽贼反而俯瞰我忻州（今山西忻县）、代县（今属山西代），从东到西，我国失地总共七百里。而宋仁宗庆历年间，辽又提出把关南十县割让给它们的无理要求，朝廷当时正为西夏的入侵而担忧，只不过每年多给辽国些钱粮来搪塞其贪欲，至于国土，却尺寸不让。熙宁年间兵力比庆历年间要强大，只因为萧禧不达目的坚决不走，就轻而易举地放弃了军事上的冲要之地。王安石说大话像是真的一样，其实是因为他没有其他措辞来拒绝辽国的无理要求。三国时吴主孙权曾说：“鲁肃劝我把荆州借给刘备时说：‘帝王之起，皆有驱除，关羽实不足挂齿。’这是鲁肃不能分辨形势，口吐大话罢了！”王安石的话与鲁肃的话没有什么两样。

双生以前为兄

【原文】 《续笔》已书《公羊传》注双生子事，兹读《西京杂记》，得一说甚详。云：“霍将军妻一产二子，疑所为兄弟。或曰：‘前生为兄，后生为弟，今虽俱日，亦宜以先生为兄。’或曰：‘居上者宜为兄，居下者宜为弟，居下者前生，今宜以前生为弟。’光曰：‘昔殷王祖甲一产二子，以卯日生嚳，以巳日生良。则以嚳为兄，以良为弟，若以在上者为兄，嚳亦当为弟矣。’许庄公一产二女，曰妖、曰茂，楚大夫唐勒一产二子，一男一女，男曰正夫，女曰琼华，皆以先生为长。近代郑昌时、文长倩并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

并以前生为长。霍氏亦以前生为兄焉。”此最可证。

【译文】 我在《续笔》中已记录了《公羊传》中所注双胞胎的事，最近我读《西京杂记》，见到一条记载，说得很详细。说是“西汉大将军霍光的妻子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却弄不清谁应当是兄，谁应当是弟。有人说：‘先生者为兄，后生者为弟，现在俩兄弟虽是一天出世，也应当以先出生者为兄。’有人则不以为然说：‘在娘胎中居上者应当是兄，居下者应当是弟，居下者先出世，所以应该以先出生者为弟。’霍光听完两种意后说：‘从前商王祖甲之妻生下一对双胞胎，嚚先出生，隔了一天才生下良。祖甲就以嚚为兄，以良为弟，假若按居上者为兄来分的话，嚚不应是兄而应当是弟。’春秋时，许庄公之妻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名字分别叫妖和茂，楚国大夫唐勒的妻子也生下了一对双胞胎，一男一女，男孩名叫正夫，女孩名叫琼华，他们都是以先出世者为长。近世的郑昌时、文长倩之妻都是一胞生下两个男孩，滕公之妻一胞生下两个女孩，李黎之妻一胞生下一男一女，他们也都是以先出生者为长。霍光也以先出生者为兄。”由此可见，双胞胎中以先出生者为长是古代流传下来的习惯，这是有据可查的。

风俗通

【原文】 应劭《风俗通》虽东汉末所作，然所载亦难尽信。其叙希姓者曰：“合浦太守虎旗、上郡太守邸杜、河内太守遇冲、北平太守贱琼、东平太守到质、沐宠、北平太守卑躬、雁门太守宿详、五原太守督 、汝南太守谒涣、九江太守荆修、东海太守 熙、弘农太守移良、南郡太守为昆、酒泉太守频畅、北海太守处兴、巴郡太守鹿旗、涿郡太守作显、庐江太守贵迁、交趾太守赖先、外黄令集一、洛阳令诸于、单父令即卖、乌伤令昔登、山阳令职洪、高唐令用虬。”此二十君子，皆是郡守、县令，惟移良之名曾见于史，恐未必然也。

【译文】 应劭《风俗通》虽然是在东汉末年写作的，但是它的内容也难全都可信。它在叙述姓罕见姓氏的人说：“合浦太守虎旗、上郡太守邸杜、河南太守遇冲、右北平太守贱琼、东平太守到质、沐宠、北平太守卑躬、雁门太守宿详、五原太守督稭、汝南太守谒涣、九江太守荆修、东海太守稽熙，弘农太守移良，南郡太守为昆、酒泉太守频畅、北海太守处兴、巴郡太守鹿旗、涿郡太守作显、庐江太守贵迁、交趾太守赖先、外黄令集一、洛阳令诸于、单父令即卖、乌伤令昔登，山阳令职洪、高唐令用蚪。”这二十位有地位的人，都是郡守、县令，只有移良的名字曾经见于史书，恐怕未必是这样。

俗语有出

【原文】 今人意钱赌博，皆以四数之，谓之“摊”。案《广韵》“摊”字下云：“摊，四数也。”竹工谓屋椽上织箔曰筩，《广韵》“筩”字下云：“竹也筩。”采帛铺谓剪裁之余曰子，一欢切。注：裁余也。挑剔灯火之捺，他念切。注，火杖也。李济翁《资暇集》云：“意钱当曰摊铺，疾道之，讹其音为蒲。”此说不然。

【译文】 今天人们从事的意钱（一种博戏）赌博，都是以四作为盈数，称此为“摊”。考察《广韵》，“摊”字下面注释道：“摊蒲，以四为盈数的一种博戏。”竹匠称屋椽上的织箔为楔筩，《广韵》解释“楔”字说：“方言称之为，这是用竹子编成的质地粗糙的席子。”彩帛铺称剪裁后余下来的丝织品为稿子。稿子，就是布帛剪裁后剩下的零头。挑拨灯光所用的工具称为捺，《广韵》注释说，捺，就是拨火棍。唐人李匡义在其《资暇集》中说：“意钱应当叫摊铺，说得快了，就把铺字的音错读成蒲了。”这种解释是不对的。

昏主弃功臣

【原文】 燕昭王伐齐，取其七十城，所存者惟莒、即墨，田单一旦悉复之，使齐复为齐。而襄王听幸臣九子之谮，单几不免。秦苻坚举百万之师伐晋，赖谢安却之，而孝武帝听王国宝之谄，安不能立于朝廷之上。桓温伐慕容，兵屡挫，议欲奔北，慕容垂一战，使燕复存，乃用慕容评之毁，垂窜身苻氏，国随以亡。朱孺据京师，德宗播迁奉天，李怀光继叛，李晟孤军坚壁，竟平大难，而德宗用张延赏之谮，讫罢其兵，且百端疑忌，至于鞅鞅以死。自古昏主不明，轻弃功臣如此，真可叹也！

【译文】 战国时，燕国国君燕昭王命乐毅率军讨伐齐国，齐国的七十余城都被攻占，只剩下莒（今山东莒县）、即墨（今山东平度东）两城。即墨人田单率军抵抗燕国的入侵，很快就收复了失地，为保卫齐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但齐襄王却听信九个宠幸之臣的诬陷，田单几乎自身难保。东晋十六国时期，北方的前秦皇帝苻坚率百万大军准备消灭东晋，东晋全靠尚书仆射谢安指挥有方，才以少胜多，打败了苻坚保全了国家，而晋孝武帝却听信王国宝的谗言，把谢安

排挤出朝廷，到地方任职。东晋大将桓温征讨前燕国，前燕皇帝慕容暉率军抵抗，屡战屡败，君臣商议想北逃，幸赖吴王慕容垂率军击败桓温，才使前燕转危为安，而慕容暉却听信太傅慕容评的谗言，慕容垂被迫逃命前秦，归附苻坚，前燕也很快被前秦所灭。唐德宗时，藩镇兵拥立泾原节度使朱 为皇帝，占领京师长安，德宗逃到了奉天（今陕西乾县），接着藩怀帅李怀光也反叛朝廷，时任右神策军都将的忠臣李晟，孤军奋战奋勇杀敌，终于讨平叛乱，收复长安，而德宗却听信权臣张延赏的谗言，罢除李晟的兵权，并对他百端怀疑猜忌，以至于李晟终日快快寡欢，抑郁而死。自古以来，那些昏庸无知的君主如此轻易地抛弃功臣的，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问故居

【原文】 陶渊明《问来使》诗云：“尔从山中来，早晚发天目。我屋南窗下，今生几丛菊？蔷薇叶已抽，秋兰气当馥。归去来山中，山中酒应熟。”诸集中皆不载，惟晁文元家本有之，盖天目疑非陶居处。然李太白云：“陶令归去来，田家酒应熟。”乃用此尔。王摩诘诗曰：“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杜公《送韦郎归成都》云：“为问南溪竹，抽梢合过墙。”《忆弟》云：“故园花自发，春日鸟还飞。”王介甫云：“道人北山来，问松我东冈。举手指屋脊，云今如许长。”古今诗人怀想故居，形之篇咏，必以松竹梅菊为比、兴，诸子句皆是也。至于杜公《将别巫峡赠南卿兄 西果园》诗云：“苔竹素所好，萍蓬无定居。远游长儿子，几地别林庐。杂蕊红相对，他时锦不如。具舟将出峡，巡圃念携锄。”每读至此，未尝不为之凄然。《寄题草堂》云：“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缠。霜骨不甚长，永为邻里怜。”又一篇云：“四松初移时，大抵三尺强。别来忽三载，离立如人长。”尤可见一时之怀抱也。

【译文】 陶渊明（陶潜）《问来使》诗说：“尔从山中来，早晚发天目。我屋南窗下，今生几丛菊？蔷薇叶已抽，秋兰气当馥。归去来山中，山中酒应熟（你从中山来，什么时候从天目山出发？我的房子南窗下，现在生出几丛菊花？蔷薇已经抽叶，秋兰的香气应当很浓郁。我回归到山中时，山中的酒应该已经酿熟）。 ”各种陶渊明集中都没记载这首诗，只是晁文元家的版本中有它，大约是天目山可能不是陶渊明的住处。然而李太白（李白）说的“陶令归去来，田家酒应熟（县令陶渊明回到旧居时，农家的酒应该已经酿熟）”，就是用的这首诗，王摩诘（王维）诗说：“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

未（您从故乡来，应该知道故乡的事，您来的时候美丽的窗子前，寒梅长出花了没有）？”杜公（杜甫）《送韦郎归成都》说：“为问南溪竹，抽梢合过墙（问一下南溪边的竹子，抽起的竹梢过了墙没有）？”《忆弟》说：“故园花自发，春日鸟还飞（故园的花应当已经开放，春天鸟儿往回飞来）。”王介甫（王安石）说：“道人北山来，问松我东冈。举手指屋脊，云今如许长（道士从北山来，我问他我东冈那棵松树怎么样？他举手指着屋脊说，现在松树已经那么长了）。”古今诗人怀念故居，表现在诗篇上，必然用松竹梅菊作比喻，上举诸位的诗句都是如此。至于杜公《特别巫峡赠南卿兄福西果园诗》说：“苔竹素所好，萍蓬无定居。远游长儿子，几地别林庐。杂蕊红相对，他时锦不如，具舟将出峡，巡圃念携锄（长满青苔的竹子是我一贯喜爱的，然而我却像浮萍蓬草那样没有固定的住处，在外远游的儿子也长高了，告别住过的园林已不知几次，面对杂着红色的花蕊，觉得别处的锦缎都不如它。准备好船将要出峡东下，在花圃巡行时想念起那拿着锄种花的时候）。”每次读到这里，未尝不因此而感到凄凉。《寄题草堂》说：“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缠。霜骨不甚长，永为邻里怜（我还怀念那四棵松树，他们容易被蔓草缠绕。带有白色的树干不十分高大，永远被邻居所喜爱）。”又一篇说：“四松初移时，大抵三尺强。别来忽三载，离立如人长（四棵松树乍移种时，只有三尺多一点高。离别它们忽然已经过了三年，它们并肩而立已经有一人多高）。”更可以看出当时他对故居的怀念。

唐宰相不历守令

【原文】 唐杨绾、崔璬甫、杜黄裳、李藩、裴膺皆称英宰，然考其履历，皆未尝为刺史、守令。绾初补太子正字，擢右拾遗，起居、中书舍人，礼、吏部侍郎，国子祭酒，太常卿，拜相；璬甫初调寿安尉，历藩府判官，入为起居、中书舍人，拜相；黄裳初佐朔方府；入为侍御史，太子宾客，太常卿，拜相；藩佐东都、徐州府，入为秘书郎，郎中，给事，拜相；璬由美原尉四迁考功员外郎，中书舍人，户部侍郎，拜相。五贤行业。史策书之已详，兹不复论。然则后之用人，必言践扬中外，谙熟民情，始堪大用，殆为隘矣。

【译文】 唐朝的杨绾、崔璬甫、杜黄裳、李藩、裴膺都可以说是一代名相。然而，从他们的出身和经历来看，他们都不曾做过刺史、郡守和县令等地方官。杨绾最初补升太子正字，后逐步擢拔为右拾遗、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礼部侍郎、吏部侍郎、国子监祭酒、太常寺卿，然后拜相；崔璬甫最初任寿安尉，后

任藩镇判官，调入朝廷后担任过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然后拜相；黄裳最初为朔方府（今宁夏灵武）佐僚，调入朝廷后历任侍御史、太子宾客、太常寺卿、然后拜相；李藩曾任东都（今河南洛阳）、徐州府（今江苏徐州）佐僚，调入朝廷后历任秘书郎、郎中、给事中，然后拜相；裴碣初任美原尉，经四次考核升迁，官至考功员外郎、中书舍人、户部侍郎，然后拜相。这五位名相的生平事迹，史书都说得清清楚楚，在此勿需赘述。然而，后代选官用人时，一定要求在地方、京师都要任过职，熟悉民情，才能授之宰辅，这样选宰相也未免太狭隘了。

张释之 柳浑

【原文】 汉张释之为廷尉，文帝出行，有人惊乘舆马，使骑捕之，属廷尉。释之奏当此人犯跸，罚金。上怒，释之曰：“方其时，上使使诛之则已。”颜师古谓：“言初执获此人，天子即令诛之，其事即毕。”唐柳浑为相，玉工为德宗作带，误毁一，工私市它玉足之。帝识不类，怒其欺，诏京兆论死，浑曰：“陛下遽杀之则已，若委有司，须详讞乃可。于法，罪当杖，请论如律。”由是工不死。予谓张、柳之论，可谓善矣，然张云“上使使诛之则已”，柳云“陛下遽杀之则已”，无乃启人主径杀人之端乎！斯一节未为至当也。

【译文】 汉代张释之任廷尉时，文帝出行时有人惊了为皇帝驾车的马，皇帝命人骑马去把他抓到，交给廷尉处理，张释之上奏认为此人惊了车驾，应处以罚金。皇帝大怒，张释之说：“那时候，皇上使人杀了他就算了。”颜师古说：“这是说在一抓到这个人的时候，皇帝当即命令杀了他，这件事就处理完毕。”唐代柳浑任宰相时，玉工给德宗制作腰带，偶然失误毁掉了其中一块玉，玉工私自买了一块别的玉补上。皇帝识出那块玉不像，认为这是欺君而非常生气，下诏给京城地方官把他定为死罪，柳浑说：“陛下立刻杀了他就算了，假如交给衙门去办，须要审问清楚才行。按照法律，他犯的罪应打板子，请照法律论处。”因此玉工没有死。我认为张、柳的议论，可谓很好，但是张说：“皇上使人杀了他就算了。”柳说：“陛下立刻杀了他就算了。”难道不是启发皇帝直接杀人的想法吗？这一点不是很恰当的。

人臣震主

【原文】 人臣立社稷大功，负海宇重望，久在君侧，为所敬畏，其究必至于招疑毁。汉高祖有天下，韩信之力为多，终以挟不赏之功，戴震主之威，至于诛灭。霍光拥昭立宣，势侔人主，宣帝谒见高庙，光从骖乘，上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其家既覆，俗传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祸，萌于骖乘。”周亚夫平定七国，景帝怒其固争栗太子，由此疏之，后目送其出，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讫以无罪杀之。谢安却苻坚百万之众，晋室复存，功名既盛，险求进之徒，多毁短之，孝武稍以疏忌，又信会稽王道子之奸扇，至使避位出外，终以至亡。齐文宣之篡魏，皆高德政之力，德政为相，数强谏，帝不悦。谓左右曰：“高德政恒以精神凌逼人。”遂杀之，并其妻子。隋文帝将篡周，欲引高颖入府，颖忻然曰：“愿受驱驰，纵公事不成，亦不辞灭族。”及帝受禅，用为相二十年，朝臣莫与为比。颖自以为任寄隆重，每怀至公，无自疑意。积为独孤皇后、汉王谅等所譖，帝欲成其罪，既罢之后，至云：“自其解落，瞑然忘之，如本无高颖。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迨于炀帝，竟以冤诛。郭子仪再造王室，以身为天下安危，权任既重，功名复大，德宗即位，自外召还朝，所领副元帅诸使悉罢之。李晟以孤军复京城，不见信于庸主，使之昼夜泣，目为之肿，卒夺其兵，百端疑忌，几于不免。李德裕功烈光明，佐武宗中兴，威名独重，宣宗立，奉册太极殿，帝退谓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顾我，毛发为之森竖。”明日罢之，终于贬死海外。若郭崇韬、安重诲皆然也。

【译文】 作为人臣，为建立新的王朝立下大功，享有海内重望，长期伴随君主，如果其声望地位连君主也对他感到敬畏的话，其结果必然会招致君主的疑忌，以至于被杀害。汉高祖刘邦统一天下，韩信的功劳最大，最后却因其功劳太高无以封赏，其权威在汉天下稳定后使汉高祖深感不安，以至于寻找借口将其诛灭。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有拥立昭帝、宣帝之功，其权势与皇帝一样威重，宣帝谒见宗庙时，霍光陪宣帝坐在车的右端，宣帝内心很害怕他，如有芒刺在背一样感到不安。霍光死后不久，宣帝就找到一个借口将其全家杀掉。民间传说：“威重震主者，没有好下场，霍氏灭族之祸，起自霍光与宣帝同坐一车之时。”周亚夫曾平定七国之乱，景帝对他坚持要立自己不喜欢的刘栗为太子非常恼火，并因此而疏远了他，一次周亚夫晋见景帝后离开朝廷，景帝目送其出朝，说：“看他这种快快不乐的样子，以后肯定不会与少主合作。”最后在没有罪过的情

况下杀了他。谢安打退了苻坚的百万军队，使晋朝再次生存下来，他的功劳名誉日益盛大，奸邪的往上爬的人经常诋毁说他的短处，使得晋孝武帝开始疏远猜忌他，又因相信了会稽王司马道子的奸滑的煽动，致使他辞职到外地去，以至于最后死去。北齐文宣帝篡位，都是靠高德政的力量。高德政任宰相，多次坚持进谏，皇帝不高兴，对左右的人说：“高德政经常用他的意志强迫我。”于是就杀了他和他的妻子、儿子。隋文帝将要篡夺北周政权时，准备将高稷引入自己的府中，高稷高兴地说：“愿意接受指挥奔走，纵然您的大事不成，也不怕灭门九族。”及至隋文帝接受北周的让位，任他为宰相二十年，满朝大臣没有一个能与他相比。高稷也自以为对他的信任非常深，经常怀有大公无私之心，没有对自己有过怀疑。因为多次被独孤皇后、汉王杨谅进谗言，文帝准备将他定罪。高稷罢官之后，文帝甚至说：“自从他解职后，无形中就忘了他，好像本来就没有高稷这个人。大臣不应该用自己的位置要挟君王，说自己是第一位大臣。”等到隋炀帝时，竟然被冤枉地杀死。郭子仪再造了唐王朝，他的存在关系着天下的安危，权力既重大，地位也很高。唐德宗即位之后，自外地把他召还至朝廷时，他担任的副元帅和各种使的职务一律被解除。李晟靠孤军收复了京城，但不被庸主所信任，使得他日夜哭泣，眼睛因此肿了。最后解除了他的兵权，并百般猜忌他，使他差一点不免于死。李德裕功劳照耀四方，辅佐唐武宗中兴，威望特别高。唐宣宗登上皇位时，在太极殿奉册。皇帝事后对左右的人说：“方才行礼时在我旁边的那个人，不就是太尉吗？他一看我，我的毛发都因为害怕而竖立起来。”明天就罢免了他，最后把他贬到海岛上直到他死在那里。像郭崇韬、安重诲也都是如此。

五经秀才

【原文】 唐杨绾为相，以进士不乡举，但试辞赋浮文，非取士之实，请置《五经》秀才科。李栖筠、贾至以绾所言为是，然亦不闻施行也。

【译文】 唐朝人杨绾担任宰相一职时，他认为进士不经过乡举里选，只是考试华丽的辞赋、不切实际的文章，这不符合选拔进士的真正意图，上奏皇帝，请求设置《五经》（即《易》、《书》、《诗》、《礼》、《春秋》五种儒家经典）秀才科。大臣李栖筠、贾至认为杨绾的建议很有道理，但也没有听到其施行的情况。

陶潜去彭泽

【原文】 《晋书》及《南史·陶潜传》，皆云：“潜为彭泽令，素简贵，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赋《归去来》以遂其志。”案陶集载此辞，自有序，曰：“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彭泽去家百里，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已交病。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在官八十余日。”观其语意，乃以妹丧而去，不缘督邮。所谓矫厉违己之说，疑必有所属，不欲尽言之耳！词中正喜还家之乐，略不及武昌，自可见也。

【译文】 《晋书》和《南史·陶潜传》都记载：陶潜任彭泽县县令时，一直简略傲气不私下里巴结上级官员。郡里来了一个督邮，县里小吏说：“应该穿戴整齐了去见他。”陶潜叹道：“我不能因为微薄俸禄而屈身去小心谨慎地伺候一个乡巴佬。”当天留下官印就离去了，并作了一篇《归去来》来表达他的志向。按：陶潜的文集记载了这篇文辞，并且有序言说：“我家贫，种田的收入不够保证自己的生活。彭泽县离我家有百里左右，所以要求了这个职位。过了些日子，回头一想产生了回去罢的心情。为什么？人的自然的本质，不是造作遁去。不久嫁给程家的妹妹死在武昌，在情理上必须飞快去奔丧，于是自己辞了职。共任职八十多天。”看他的语气，是因为妹妹的丧事才离去的，不是因为督邮。所谓“造作加工”、“违背自己的意愿”的说法，可能一定有所指，不准备全说出来罢了！文中正是喜爱还家的乐趣，一点不提武昌的丧事，从中可以看到这一点。

羌戎畏服老将

【原文】 汉先零羌犯塞，赵充国往击之。羌豪相数责曰：“语汝亡反，今天子遣赵将军来，年八九十矣，善为兵。今请欲一斗而死，可得邪！”充国时年七十六，讫平之。唐代宗时，回纥、吐蕃合兵入寇，郭子仪单骑见回纥，复与之和。诸酋长皆大喜曰：“向以二巫师从军，巫言：‘此行甚安稳，不与唐战，见

一大人而还’。今果然矣。”郭公是时年七十，乃知羌、戎畏服老将如此。班超久在西域，思归，故其言云：“蛮夷之俗，畏壮侮老。”盖有为而云。

【译文】 西汉宣帝时，居住在先零（今青海西宁一带）的羌族起兵反叛朝廷，进犯汉边塞。汉宣帝派老将赵充国前往征讨，消息传出，羌族的几位首领相互指责说：“让你们不要反叛，都不听。现在天子派赵将军来，赵将军已经八九十岁了，善于用兵，我们想和他决一死战，恐怕也没有机会了！”赵充国当时已经七十六岁了，最后他果真平定了先零叛羌。唐代宗时，回纥、吐蕃合兵入侵大唐，老将郭子仪单骑进入回纥营中，分析利害，回纥与大唐又和好如初。回纥各位首领十分高兴地说：“前时随军的两个巫师曾预言：‘此次行动非常安全，不会和唐兵打仗，见到一个大人物就可返回了。’果然是这样啊！”郭子仪公时年七十岁。从这两件事可知，羌、回纥等少数民族还是很畏服老将军的。汉班超长期驻守在西域，很想回到内地，所以他才说：“蛮夷之俗，畏壮侮老。”从上述事实看，他说这话是另外有想法的。

古人字只一言

【原文】 《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道也。”古之人命字，一而已矣。初曰子，己而为仲为伯，又为叔为季，其老而尊者为甫，盖无以两言相连取义。若屈原《离骚经》：“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案《史记》原字平，所谓“灵均”者，释“平”之义，以缘饰词章耳。下至西汉，与周相接，故一切皆然。除子房、子卿、子孟、子政、子孺、子长、子云、子兄、子真、子公、子阳、子宾、子幼之外，若仲孺、仲卿、仲子、长卿、少卿、孺卿、君卿、客卿、游卿、翁卿、圣卿、长君、少君、稚君、游君、次君、赣君、近君、曼君、王孙、翁孙、次公、少公、孟公、游公、仲公、长公、君公、少叔、翁叔、长叔、中叔、子叔、长倩、曼倩、次倩、稚季、长孺、仲孺、幼孺、少孺、次孺、翁孺、君孺、长翁、弱翁、仲翁、少翁、君房、君宾，君倩、君敖、君兰、君长、君仲、君孟、少季、少子、少路、少游、稚宾、稚圭、稚游、稚君、巨先、巨君、长宾、长房、翁思、翁子、翁仲之类，其义只从一训，极为雅训。至于妇人，曰少夫，君侠、政君，君力、君弟、君之、阿君。单书一字者，若陈胜字涉，项籍字羽，彭越字仲，张欧、吴广，枚乘字叔，楚元王字交，朱云字游，爰盎字丝，张释之字季，郑当时字庄，刘德字路，眭弘字孟。迨东汉以下，则不尽然。

【译文】 《礼记·檀弓》有记载道：“年幼时只有名，即将长大成人时才加字，五十岁开始称伯仲，这是周代的礼制。”古代人取字，只用一个字而已，年幼者称子，年长者或称仲、伯或称叔、季，年老而受人尊重者称甫，没有把两个字相连取义的。如屈原在《离骚经》中说：“名余曰正则，字余曰灵均。”《史记》记载屈原字平，所谓“灵均”，就是“平”的意思，只不过是用来修饰词章而已。到了西汉，制度基本与周代相同，所以，一切都和周代一样。除子房、子卿、子孟、子政、子孺、子长、子云、子兄、子真、子公、子阳、子宾、子幼之外，若仲孺、仲卿、仲子、长卿、少卿、孺卿、君卿、客卿、游卿、翁卿、圣卿、长君、少君、稚君、游君、次君、赣君、近君、曼君、王孙、翁孙、次公、少公、孟公、游公、仲公、长公、君公、少叔、翁叔、长叔、中叔、子叔、长倩、曼倩、次倩、稚季、长孺、仲孺、幼孺、少孺、次孺、翁孺、君孺、长翁、弱翁、仲翁、少翁、君房、君宾，君倩、君敖、君兰、君长、君仲、君孟、少季、少子、少路、少游、稚宾、稚圭、稚游、稚君、巨先、巨君、长宾、长房、翁思、翁子、翁仲之类，其字义只有一种解释，且文雅不俗。至于妇人之字，称少夫、君侠、政君、君力、君弟、君之、阿君。单书一字的，像陈胜字涉，项籍字羽，彭越字仲，张欧、吴广、枚乘字叔，楚元王字交。朱云字游、爰盎字丝，张释之字季，郑当时字庄，刘德字路，眭弘字孟。到东汉以后，制度略有变化就不全是这样了。

卷二

二叔不咸

【原文】 《左氏传》载富辰之言曰：“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士大夫多以二叔为管、蔡。案《蔡仲之命》云：“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降霍叔为庶人。”盖三叔也。杜预注以为周公伤夏、殷之叔世，疏其亲戚，以至灭亡，故广封其兄弟。是以方叙说管、蔡、霍十六国，其义昭然。所言亲戚者，指兄弟耳。

【译文】 《左氏传》中记载富辰的话说：“从前，周公痛惜二叔不归服，所以才把自己的亲属分封到各地，作为周朝的屏藩。”士大夫大多都认为二叔是管叔和蔡叔。据《蔡仲之命》记载：“群叔散布言论，才导致管叔在商地被处死，蔡叔被囚禁，霍叔被贬为庶人。”大概是他们三人。杜预作的注解认为，周公对夏、殷国运衰落之时，疏远其亲戚，以至灭亡的教训进行了反思，所以才大封其兄弟为各地诸侯。因此，前文所述管、蔡、霍等十六国，其意义是很明白的。所说的亲戚，指的就是兄弟。

官阶服章

【原文】 唐宪宗时，因数赦，官多泛阶；又帝亲郊，陪祠者授三品、五品，不计考；设府军吏以军功借赐朱紫，率十八；近臣谢、郎官出使，多所赐与。每朝会，朱紫满庭，而少衣绿者，品服太滥，人不以为贵，帝亦恶之，诏太子少师郑余庆条奏惩革。淳熙十六年，绍熙五年，连有覃霈，转官赐服者众。绍熙元年，予自当涂徙会稽，过阙，遇起居舍人莫仲谦于漏舍，仲谦云：“比赴景灵行香，见朝士百数，无一绿袍者。”又朝议、中奉皆直转行，故五品官不胜计，颇类元和也。

【译文】 唐宪宗时，由于多次施恩，大多数官员都升迁了官阶；每年冬至，皇帝又亲自到南郊祭天，陪同祭祀的官员不管考核政绩的优劣都授以三品、五

品官；军营中的武官也十有八九凭军功被赐予中高级官员所穿的朱紫之衣；皇帝身边的官员调外任向皇帝辞别，郎官受皇帝的派遣出使地方，也都会受到皇帝的恩赐升官，也着朱紫之衣。每到大臣朝见皇帝的日子，朝庭上的官员都是身着朱紫之衣，很少有穿绿官服的低级官员出现，由于官员服饰赏赐太滥，人们也都不以穿朱紫之衣为贵，皇帝也觉得这样太不成体统，就下诏让太子少师郑余庆逐条列出改革意见上奏。南宋淳熙十六年，绍熙五年（1195年），广施皇恩，很多人因此升官被赐以朱紫官服。南宋绍熙元年（1190年），我以当涂（今安徽南陵东南）调职到会稽（今浙江绍兴），经过京城皇宫附近时，在漏舍中遇上起居舍人莫仲谦，仲谦告诉我：“不久前，我去景灵寺烧香，见到数百位官员，竟没有一位穿绿袍低级官吏的官服。”再加上朝议、中奉等散官也身着朱紫，所以五品官有多少都数不过来，很像唐宪宗元和年间那样滥。

月非望而食

【原文】 历家论日月食，自汉太初以来，始定日食，不在朔则在晦，否则二日，然甚少。月食则有十四、十五、十六之差，盖置望参错也。天体有二交道，曰交初，曰交中。交初者，星家以为罗。交中者，计都也。隐暗不可见，于是为入交法以求之，然不过能求朔望耳。若余日入交，则书所不载，由汉及唐二十八家，暨本朝十一历，皆然。姑以庆元丁巳岁五次月食考之，二月望为入交中，七月为交初，唯十月二十日、二十一日连两夜，乃以二更尽月食之既，才两刻复明，十一月十八夜复如之。案此三食皆是交中。十月二十夜月在张五度，而计都在翼二度，次夜月在张十七度，计都未定，相距才四度耳。十一月十八夜，月在星五度，计都在张十九度，相距二十度。十二月十七夜五更，月在星二度，入交阳末，卯初四刻交甚，食六分半，八刻退交。十八夜四更，月在张六度，入交中阴初，至寅四刻交甚，食九分，卯五刻退交。其验如此。予窃又有疑焉，太阴一月一周天，必两值交道，今年遂至八食，一一如星官、历翁之说，仍不拘月望，则玉川子之诗不胜作矣，当更求其旨趣云。顷见太史局官刘孝荣言：“月本无光，受日为明，望夜正与日对，故一轮光满。或月行有迟疾先后，日光所不照处，则为食。朔旦之日，日月同宫，如月在日上，掩太阳而过，则日光为所遮，故为日食。非此二日，则无薄蚀之理。”其说亦通。

【译文】 历法家研究日食月食，从西汉武帝太初年间以来，才开始确定日食，日食现象一般发在朔日或者晦日，除了这二天以外，其它时间很少出现日

食。月食一般发生在十四、十五，十六三天，之所以有这种差别，是因为望日并非确定在其中一天，而是随月份的不同，望日会在这三天内变化。天体有两种交道方式，一种称交初，一种称交中。所谓交初，星象家认为就是罗 或称为蚀神。所谓交中，就是计都。当月亮隐暗看不到时，就可以用入交的办法去找寻，但所能寻找的日子，也不过是朔日或望日。至于其它的日子入交，书中就没有记载，从汉至唐共二十八家历法，以及本朝十一家历法，都是这样。我们姑且从宋宁宗庆元三年五次月食的情况来考察，二月望日入交中，七月则入交初，只在十月二十日、二十一日连续两夜，才在二更出现全月食，持续了大约两刻。十一月十八日夜类似情况又出现一次。这三次日食都是交中。十月二十日夜，月在张星五度，而计都在翼星二度，第二天夜里，月在张星十七度，计都没有确定，相距才四度。十一月十八日夜，月在星五度，计都在张星十九度，相距二十度。十二月十七夜五更天，月在星二度，入交阳之末，至卯时初四刻交甚，月食部分占整个月亮的六分半，八刻月食渐退。十八日夜四更天，月在张星六度，入交中阴初，到寅时四刻交甚，月食部分占整个月亮的九分，卯时五刻月食渐退。竟如此应验。我私下对它还有怀疑，月亮一月一周天，一定会有两次交道，今年就会有八次月食，如果都按星官、历法家的说法，仍然不会局限于月望之日，那么玉川子的诗就可以作得更多，应当更加追求一些有意义的东西。不久前见到太史局官刘孝荣，他说：“月亮本身并不会发光，只是接受太阳光的反射才显得明亮。望夜月亮正与日相对，所以出现一轮明亮的圆月。有时月亮运行得有快有慢，日光照不到的地方，就形成了月食。朔日那一天，日月同在一宫（古代划分星空的区域），如果月在日之上，运行时掩遮了太阳的光线，所以就形成了日食。如果不是在这两天，就没有日食、月食的道理。”他的这种说法也说得通。

庆善桥

【原文】 饶州学非范文正公所建，予既书之矣。城内庆善桥之说，亦然。比因郡人修桥，拆去旧石，见其上镌云：“康定庚辰”。案范公以景盥乙亥为待制，丙子知开封府，黜知饶州，后徙润、越，至庚辰岁乃复职，帅长安，既去此久矣。

【译文】 饶州州学不是范文正公（范仲淹）建立的，我已经记载过了。州城内的庆善桥是范文正公建立的说法，也是如此。最近因为当地人修桥，拆出

旧有的石料，看见上面刻着：“康定庚辰年（1040年）。”案：范公在景盦乙亥年（1035年）任待制，丙子年（1036年）任开封府地方官，降职任饶州地方官，后来又改任润州、越州，到庚辰年才复职，到长安统帅军队，距离庚辰年已经很久了。

西汉以来加官

【原文】 《汉书·百官表》云，侍中、左右曹、诸吏、散骑、中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将军、列侯、卿、大夫、将、都尉。给事中亦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议郎。其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诸曹受尚书事，诸吏得举法，散骑并乘舆车。并，步浪反。案汉世除授此等称谓，殆若今之兼职者，不甚为显秩，然魏相以御史大夫兼给事中。它如刘向以宗正，散骑，给事中；苏武以右曹，典属国；杨雄为诸吏，光禄大夫是也。至于金日磾以降虏为侍中，其子赏、建，诸孙常、敞、岑、明、涉、汤、融、钦，皆以左曹、诸吏、侍中，故班史赞之云：“七世内侍，何其盛也！”盖如今时阁门宣赞、祇候之类。但汉家多用士人，武帝所任庄助、朱买臣、吾丘寿王、东方朔诸人，皆天下选，此其所以为人贵重。东汉大略亦然。晋、宋以来，又有给事黄门侍郎、散骑常侍、通直散骑常侍、散骑侍郎等，皆为兼官，但视本秩之高下。已而复以将军为宠，齐高帝以太子詹事何戢领选，以戢资重，欲加常侍，褚渊曰：“臣与王俭既已左珥，若复另戢，则八座遂有三貂。若帖以骠、游，亦为不少。”乃以为吏部尚书，加骠骑将军。唐有检校官、文武散阶、宪衔，乃此制也。国朝自真宗始创学士、直学士、待制、直阁职名，尤为仕宦所慕。今自观文殿大学士至直秘阁，几四十种，不刊之典，明白易晓，非若前代之冗泛云。

【译文】 《汉书·百官公卿表》中所说的侍中、左右曹、诸吏、散骑、中常侍，都是加官，能加这些官职的主要是将军、列侯、卿、大夫、将、都尉等官职。给事中也是加官，能加此职的是大夫、博士、议郎。侍中、中常侍可以出入宫中，诸曹可接受尚书事务，诸吏可以办理法律事务，散骑能与皇帝一起乘坐御用车辆。据考证，汉代授予官吏这样一些加官，大概像今天的兼职一样，不是为了显耀某官的地位，如魏相以御史大夫之职兼任给事中就是这样。其它的像刘向以宗正之职，兼任散骑、给事中；苏武以右曹之职，兼任典属国；杨雄以诸吏之职，兼任光禄大夫等，都是这样。以至于金日磾身为归降的胡人而担任侍中之职，他的儿子赏、建，孙子常、敞、岑、明、涉、汤、融、钦，都

担任左曹、诸吏、侍中等职，所以班固在《汉书》中赞叹道：“七世内侍，多么兴盛啊！”大概像今天的阁门宣赞、祗候之类。只是汉代所用内侍大多是知识分子，汉武帝任用的庄助、朱买臣、吾丘寿王、东方朔等人，皆是国内选拔出的优秀人才，这也是内侍之职被人们尊崇的重要原因。东汉的情况基本上也是这样。晋、南朝宋以来，又有给事黄门侍郎、散骑常侍、通直散骑常侍、散骑侍郎等官职，都是作为兼职而出现的，只看原来品秩的高低。不久，官吏们又以有将军称号为荣，北齐高帝让太子詹事何戢主持选官工作，因何戢资历深，想给他加一个常侍的加官，褚渊对高帝说：“我与王俭刚加过常侍之职，若再给何戢加此职，那么八座（指尚书令、左右仆射、五曹尚书）之外，又有三个常侍。若给他加一个骠骑将军或游击将军称号也算上不低。”于是高帝就以何戢为吏部尚书，加官骠骑将军。唐代有检校官、文武散官、宪衔，也就是这种加官制度。大宋朝从宋真宗时开始设学士、直学士、待制、直阁等职名也都是作为官吏的加官，很为做官的所慕求。今天的加官，从观文殿大学士到直秘阁，将近四十种，典籍上没有记载，但明白易懂，不像前代的加官那样庞杂。

吕望非熊

【原文】 自李瀚《蒙求》有“吕望非熊”之句，后来据以为用。然以史策考之，《六韬》第一篇《文韬》说：“文王将田，史编布卜曰：‘田于渭阳，将大得焉。非龙非螭，非虎非罴，兆得公侯，天遗汝师。’文王曰：‘兆致是乎？’史编曰：‘编之太祖史畴，为禹占得皋陶兆。’”《史记》云：“吕尚穷困年老，以渔钓干西伯，西伯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龙非螭，非虎非罴，所获霸王之辅。’”后汉崔《达旨》，云“渔父见兆于元龟”，注文乃引《史记》“非龙非螭，非熊非罴”为证。今之《史记》，盖不然也。“非熊”出处，惟此而已。

【译文】 自从后晋李瀚的《蒙求集》中有“吕望非熊”这一记载以后，后来人都以此为根据加以引用。但是用史策来考证这句话它是有来由的。《六韬》中的第一篇《文韬》中说：“文王要去打猎，史编告诉他占卜结果：‘在渭水河北打猎，将会有大的收获。所获非龙非螭，非虎非罴，预兆会得公侯，是上天送给你的国师。’文王问道：‘征兆会这么准确吗？’史编回答说：‘我的太祖史畴，曾为大禹占卜到获得皋陶的征兆。’”《史记》中说：“吕尚穷困年老，经常在河边钓鱼，希望能遇到西伯（指周文王），西伯将出去打猎，对这次活动进行了占卜，结果道：‘所获得的东西非龙非螭，非虎非罴，而是帮你成霸王之业的

人’。”东汉崔 在《达旨》中说“渔父（吕尚）从大龟身上见到了征兆”，注文是引用《史记》中的“非龙非螭，非熊非罴”作为证据。今天的《史记》，就不是这样说的。“非熊”的出处，就是来源于此。

唐曹因墓铭

【原文】 庆元三年，信州上饶尉陈庄发土得唐碑，乃妇人为夫所作。其文曰：“君姓曹，名因，字鄙夫，世为鄱阳人。祖、父皆仕于唐高祖之朝，惟公三举不第，居家以礼义自守。及卒于长安之道，朝廷公卿、乡邻耆旧，无不叹息。惟予独不然。谓其母曰：‘家有南亩，足以养其亲；室有遗文，足以训其子。肖形天地间，范围阴阳内，死生聚散，特世态耳，何忧喜之有哉！’予姓周氏，公之妻室也。归公八载，恩义有夺，故赠之铭曰：‘其生也天，其死也天，苟达此理，哀复何言！’”予案唐世上饶本隶饶州，其后分为信，故曹君为鄱阳人。妇人能文达理如此，惜其不传，故书之，以裨图志之缺。

【译文】 庆元三年（1193年），信州上饶尉陈庄挖地得到一块唐碑，是一位妇女给丈夫作的。那篇文章说：“君姓曹，名因，字鄙夫，世世代代是鄱阳人。祖父、父亲都在唐高祖时代作过官，只有他考过三次科举都没考中。他平时用礼义要求自己，及至死在去长安的路上，朝廷的公卿、邻里中年高德重的老人，没有一个不叹息的。只有我不这样看，对他的母亲说：‘家里有田地，足以供养他的父母；屋内有他的遗文，足以教育他的儿子。人成形在天地之间，被包围在阴阳二气之中，生死聚散，只不过是人世间的一种形态而已，哪里有什么忧愁和喜悦呢！’我姓周，是他的妻子。嫁给他已经八年，现在恩义被夺走了，所以赠给他铭文说：‘他的生是由天定，他的死是由天定，假如明白了这个道理，还说什么悲哀呢！’”今案：唐代上饶本属饶州，后来分出来属信州，所以曹君是鄱阳人。妇女能写文章且通达道理到如此程度，可惜这篇文章没有传下来，所以写下来，用来补地方图志的缺漏。

唐史省文之失

【原文】 杨虞卿兄弟，怙李宗闵势，为人所奔向。当时为之语曰：“欲入举场，先问苏、张，苏、张尚可，三杨杀我。”而《新唐书》减去“先”字。李

德裕《赐河北三镇诏》曰：“勿为子孙之谋，欲存辅车之势。”《新唐书》减去“欲”字。遂使两者意义为不铿锵激越，此务省文之失也。

【译文】 杨虞卿弟兄依靠李宗闵的势力，成为一些人投靠的对象。当时针对这种情况有句话说：“要进入科举的考场，先要请教苏、张；苏、张还好，三杨可要置人于死地。”然而《新唐书》引用时减去了“先”字。李德裕《赐河北三镇诰》说：“不要因为替子孙打算，而欲（想要）和叛军保持辅车相依之势”《新唐书》减去了“欲”字。这样，就使得这两句话的内含失去了铿锵激昂的情绪，这就是单纯追求简练的过失。

李德裕论命令

【原文】 李德裕相武宗，言从计行。韦弘质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钱谷，德裕奏言：“管仲明于治国，其语曰：‘国之重器，莫重于令。令重君尊，君尊国安。治人之本，莫要于令。故曰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五者无赦。’又曰：‘令在上，而论可否在下，是主威下系于人也。’大和后，风俗浸敝，令出于上，非之在下，此敝不止，无以治国。臣谓制置职业，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弘质贱臣，岂得以非所宜言，妄触天听，是轻宰相也。”德裕大意，欲朝廷尊，臣下肃，而政出宰相，故感愤切言之。予谓德裕当国，它相取充位而已。若如所言，则一命一令之出，臣下皆不得有言，谏官、御史、给事、舍人之职废矣。弘质位给事中，亦非贱臣。宜其一朝去位，遂罹抵褐，皆自取之也。

【译文】 李德裕是唐武宗时的宰相，唐武宗对李德裕可谓言听计从。给事中韦弘质向皇帝建议宰相不能兼理财政，李德裕知道后就上奏武帝说：“春秋时，齐国相管仲善于治国，他曾说过：‘治国的要方，最根本的就在于朝廷的法令了。法令受到重视，君主就有了权威，君主有了权威，国家随之安定。管理臣民的根本，就在于尊重法令，所以说，臣下私自删减朝廷法令者，当死；私自增添朝廷法令者，当死；不执行朝廷法令者，当死；私自扣留朝廷法令不宣者，当死；不服从朝廷法令者，当死。这五种罪行都是不可饶恕赦免的。’他还说过：‘法令由君主制定颁布，而臣下议论其可行与否，这是君主的权威受到蔑视的表现。’自文宗大和年间以来，这种现象普遍存在，而且影响很坏，君主颁布的法令，臣下横加指责。这种陋习不革除，就难以治理好国家。我认为划分职务权限，是君主的权力，不是小人所能干涉的。韦弘质位卑言轻之臣，怎么说他不

该说的话，狂妄地干涉皇上处理国家事务的权力！这也是他轻视宰相的表现。”李德裕说这番话的本意是想使朝廷有威严，臣子肃穆，国家行政事务由宰相处理，因此言辞感愤激切。李德裕执政时专权擅政，其他宰相都只是滥竽充数而已。假如按他上述所言行事，朝廷任何一项命令一下达，臣下都不能有意见，那么朝廷设立的专司规谏皇帝、监察政令得失的谏官、御史、舍人等官职都应当废除了。再说韦弘质身为给事中，是门下省主管审核、封驳政令的重要官员，也不是微贱之臣。像这样偏激的话，李德裕说过不少，也因此得罪了很多。所以他被罢相以后，就遭到打击报复，这都是他咎由自取。

汉武 唐德宗

【原文】 汉张汤事武帝，舞文巧诋以辅法，所治夷灭者多，旋以罪受诛。上惜汤，稍进其子安世，擢为尚书令。安世宿卫忠正，肃敬不怠，勤劳国家，卒为重臣，其可大用不疑。而武帝之意，乃以父汤故耳。唐卢杞相德宗，奸邪险贼，为天下祸。以公议不容，谴逐致死。帝念之不忘，擢叙其子元辅，至兵部侍郎。元辅端静介正，能绍其祖奕之忠规，陟之台省要官，宜也。而德宗之意，乃以父杞故尔。且武帝之世，群臣不幸而诛者，如庄助、朱买臣、吾丘寿王诸人，及考终名臣，如汲黯、郑庄、董仲舒、卜式，未尝恤其孤。德宗辅相之贤，如崔璩甫、李泌、陆贽，皆身没则已。而独于汤、杞二人楔楔如此，是可叹也！

【译文】 汉代张汤在武帝手下任职，玩弄条文罗织罪状以补法律的不足，他处治过的人被处死的很多，不久他也因为有罪被处死。皇上对张汤的死感到惋惜，对他的儿子张安世适当加以任用，提拔为尚书令。安世侍卫皇帝忠心正直，严肃而不怠慢，勤劳国家大事，最后成为一位非常重要的大臣，他可以大用是不应该怀疑的。但是汉武帝提拔他的意图，是因为他父亲张汤的缘故。唐代卢杞任德宗的宰相，奸邪阴险，成为天下的祸害。因为为公论所不容，获罪流放而死。皇帝对他念念不忘，提拔任命他的儿子卢元辅官至兵部侍郎。卢元辅端庄而不浮躁，耿直而正派，能继承祖父卢奕的忠直规劝，提拔为台省的重要大臣，是合适的。但是唐德宗提拔他的意图，是因为他父亲卢杞的原故。况且在汉武帝时，大臣中不幸被处死的，如庄助、朱买臣、吾丘寿王等人，和善终的名臣，如汲黯、郑庄、董仲舒、卜式等人，都没有抚恤他们的儿子。唐德宗时宰相贤德的，如崔璩甫、李泌、陆贽等人，都是死了就完了。然而单单留恋张汤、卢杞二人到如此地步，真是可叹！

诸公论唐肃宗

【原文】 唐肃宗于干戈之际，夺父位而代之。然尚有可诿者，曰：“欲收复两京，非居尊位，不足以制命诸将耳。”至于上皇还居兴庆，恶其与外人交通，劫徙之西内，不复定省，竟以怏怏而终，其不孝之恶，上通于天。是时，元次山作《中兴颂》，所书天子幸蜀，太子即位于灵武，直指其事。殆与《洪范》云“武王胜殷杀受”之辞同。其词曰：“事有至难，宗庙再安，二圣重欢。”既言重欢，则知其不欢多矣，杜子美《杜鹃》诗：“我看禽鸟情，犹解事杜鹃。”伤之至矣。颜鲁公《请立放生池表》云：“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问安视膳，不改家人之礼。”东坡以为彼知肃宗有愧于是也。黄鲁直《题磨崖碑》，尤为深切。“抚军监国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为？事有至难天幸耳，上皇局脊还京师。南内凄凉几苟活，高将军去事尤危。臣结春陵二三策，臣甫《杜鹃》再拜诗。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赏琼琚词！”所以揭表肃宗之罪，极矣。

【译文】 唐肃宗是在安史之乱爆发，军事形势很严峻的情况下，篡夺父位而当上皇帝的。有人因此还替他推卸责任，说：“想收复被叛军占据的长安、洛阳两京，身不处于皇帝之位，就不足以节制号令诸将。”如果这还有情可原的话，那么太上皇从四川还京居于兴庆宫，肃宗害怕他与外人交往，强迫他迁到太极宫，而且也不再定期去探望，太上皇竟抑郁不乐而死，肃宗不孝顺父皇的恶名，是上通于天，不能原谅的。当时人元次山作《中兴颂》，所记载的天子（唐玄宗）出逃四川，太子（唐肃宗）即位于灵武，就直截了当地指出这件事。差不多与《洪范》中所载“武王胜殷杀受”之辞一样难听。其词是这样说的：“事有至难，宗庙再安，二圣重欢。”既然说道唐玄宗、肃宗父子相聚重欢之事，那么就知道他们之间有更多不欢的事。杜甫在他的《杜鹃》诗中道：“我看禽鸟情，犹解事杜鹃”。可见这首诗是对此事感伤至极而作。颜真卿上奏肃宗的《请立放生池表》中说：“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问安视膳，不改家人之礼。”宋人苏轼认为，颜真卿肯定知道肃宗在对唐玄宗这件事上是问心有愧的。黄庭坚在《题磨崖碑》中，言词更为深挚切实。碑文写道：“抚军监国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为？事有至难天幸耳，上皇局脊还京师。南内凄凉几苟活，高将军去事尤危。臣结春陵二三策，臣甫《杜鹃》再拜诗。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赏琼琚词！”可以说把肃宗虐待其父的罪行揭露得淋漓尽致。

孙马两公所言

【原文】 卢照邻有疾，问孙思邈曰：“高医愈疾奈何？”答曰：“天有四时五行，寒暑迭居，和为雨，怒为风，凝为雪霜，张为虹霓，天常数也。人之四肢五脏，一觉一寐，吐纳往来，流为荣卫，章为气色，发为音声，人常数也。阳用其形，阴用其精，天人所同也。失则 生热，否生寒，结为瘤赘，陷为痈疽，奔则喘乏，竭则焦槁，发乎面，动乎形。天地亦然，五纬缩赢，孛慧飞流，其危眚也。寒暑不时，其 否也。石立土踊，是其瘤赘。山崩土陷，是其痈疽。奔风暴雨，是其喘乏。川渎竭涸，其焦槁。高医导以药石，救以砭剂，圣人和以至德，辅以人事，故体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振之灾。”睿宗召司马子微问其术，对曰：“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夫心目所知见，每损之尚不能已，况攻异端，而增智虑哉！”帝曰：“治身则尔，治国若何？”曰：“国犹身也，故游心于淡，合气于漠，与物自然，而无私焉，而天下治。”孙公、司马所言，皆至道妙理之所寓，治心养性，宜无出此者矣。

【译文】 卢照邻生病，问孙思邈说：“高明的医生如何治病？”回答说：“天有春夏秋冬四时和金木水火土五行，气候寒暑更替，天气和平就化为雨，发怒就化为风，凝聚就化为霜雪，舒张就化为虹霓，这是天的正常的规律。人的四肢五脏，气息一呼一吸，流变为荣卫，表现为气色，发作为声音，这是人的正常的规律。阳依托于形状，阴依托于精髓，天和人是一样的。阴阳失常壅腾就生热，堵塞就生寒，郁结就生瘤，下陷就生痈疽，上奔就生喘息，枯竭就面色焦暗枯槁，焦暗枯槁表现在面孔上，喘息影响在形体上。天地也是这样，五星运行进退失常，彗星流星出现，是天地的危象。寒暑无常，是天地的壅腾或堵塞。石头立起、土壤迸起是天地的瘤，山崩地陷是天地的痈疽。狂风暴雨，是天地的喘息。江河干涸，是天地的焦暗枯槁。高明的医生用药石疏导，用砭石汤剂补救；圣人用最高的道德调和，用开明的政治辅助道德。所以人的病可以治好，天的灾可以补救。”唐睿宗召见司马子微（司马承祯）问道术，司马子微回答说：“修习道术要每日减少作为，减而又减，以至于不去作为。对于心目中知道的和看见的东西，我们尚且坚持不懈地去减少它们，何况追求非常正统的东西以加重精神的负担呢！”皇帝说：“调养身体是这样，治理国家又该如何呢？”司马子微说：“国家和身体一样，所以心思平淡，精神安宁，与外界事物同化于自然之中，而没有私欲，那么天下就会大治。”孙公、司马说的，都是最高深的

道理的集中体现，讲求精神修养，应该没有在这以外的道理了。

元微之诗

【原文】 《唐书·艺文志》元稹《长庆集》一百卷，《小集》十卷，而传于今者，惟闽、蜀刻本，为六十卷。三馆所藏，独有《小集》。文惠公镇越，以其旧治，而文集盖缺，乃求而刻之。外《春游》一篇云：“酒户年年减，山行渐渐难。欲终心懒慢，转恐兴阑散。镜水波犹冷，稽峰雪尚残。不能辜物色，乍可怯春寒。远目伤千里，新年思万端。无人知此意，闲凭小阑干。”白乐天书之，题云“元相公《春游》”。钱思公藏其真迹，穆父守越时，摹刻于蓬莱阁下，今不复存。集中逸此诗，文惠为列之于集外。李端民平叔尝和其韵寄公云：“东阁经年别，穷愁客路难。望尘惊岳峙，怀旧各云散。茵醉恩逾厚，樯歌兴未残。冯唐嗟已老，范叔敢言寒。玉烛调魁柄，阳春在笔端。应怜扫门役，白首滞江干。”乐天所书，予少时得其石刻，后亦失之。

【译文】 据《唐书·艺文志》中记载，唐代著名诗人元稹的《长庆集》有一百卷，《小集》有十卷，流传至今的《长庆集》，只有闽、蜀两种刻本，共六十卷。唐代的弘文、集贤、史馆三馆只收藏有《小集》。文惠公镇守越州（今浙江绍兴），因为在官府所在地，文集大概很缺，就找到它并把它雕刻下来。集外《春游》中一篇写道：“酒户年年减，山行渐渐难。欲终心懒慢，转恐兴阑散。镜水波犹冷，稽峰雪尚残。不能辜物色，乍可怯春寒。远目伤千里，新年思万端。无人知此意，闲凭小阑干。”著名诗人白居易亲自抄写，题名叫“元相公《春游》。”钱思公收藏着作品的真迹，穆父镇守越州时，曾临摹真迹重新刻制，立于蓬莱阁下，今天已不复存在。《长庆集》中遗失这首诗，文惠公为此把它列于集子之外。李端民、平叔曾和这首诗的韵作了一首诗寄给文惠公，诗是这样写的：“东阁经年别，穷愁客路难。望尘惊岳峙，怀旧各云散。茵醉恩逾厚，樯歌兴未残。冯唐嗟已老，范叔敢言寒。玉烛调魁柄，阳春在笔端。应怜扫门役，白首滞江干。”由白居易抄写而雕刻的碑文，我年轻时也收藏过，后来也丢失了。

谏缭绫戏龙罗

【原文】 李德裕为浙西观察使，穆宗诏索盘缭缭绫千匹，德裕奏言：“立

鹅、天马、盘绦、掬豹，文彩怪丽，惟乘輿当御，今广用千匹，臣所未谕。”优诏为停。崇宁间，中使持御至成都，令转运司织戏龙罗二千，绣旗五百，副使何常奏：“旗者，军国之用，敢不奉诏。戏龙罗唯供御服，日衣一匹，岁不过三百有奇，今乃数倍，无益也。”诏奖其言，为减四之三。以二事观之，人臣进言于君，切而不讦，盖无有不听者。何常所论，甚与德裕相类云。

【译文】 唐朝末年，李德裕担任浙西观察使，穆宗下诏要求上供盘绦、縹绦千匹，李德裕上书规劝穆宗说：“立鹅、天马、盘绦、掬豹，这些丝织品的花纹非常鲜艳秀丽，只有陛下的乘輿上可作装饰用，现在要求上供千匹之多，我弄不清楚要这么多干什么用！”于是皇帝又下诏书停止索求。北宋崇宁年间，使者手持皇帝的御札来到成都，命令转运司织戏龙罗二千匹，绣旗五百面，转运副使何常上奏说：“旗帜是军队和国家的必用之物，我不敢不奉诏。而戏龙罗只是供皇上做衣服用的，就是每天做衣用一匹，一年也不过三百多匹，现在都要上供数倍于此的戏龙罗，这对国家对陛下对百姓都没有什么好处。”皇帝知道后专门下诏对其忠言进行奖励，并把原来要戏龙罗的数目减去了四分之三。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作人臣的给君主提建议，只要有道理，态度恳切，而不是指责君主的错误，君主一般都会采纳听从。何常所讲的道理，与李德裕所讲都很相似。

详正学士

【原文】 唐太宗时，命秘书监魏征写四部群书，将藏内府，置讎正二十员。后又诏虞世南、颜师古踵领之，功不就。显庆中，罢讎正官，使散官随番刊正。后诏东台侍郎赵仁本等，充使检校，置详正学士以代散官，此名甚雅，不知何时罢去。然秘书省自有校书郎、正字，使正名责实足矣。绍兴中以贵臣提举秘书省，而置编定书籍官二员，亦其类也。

【译文】 唐太宗时，命令秘书监魏征负责抄写四部群书，藏到宫廷中去，并设置讎正二十名，后来又下诏令虞世南、颜师古继续负责这件事，但没有完成。显庆时，撤消了讎正官，派没有实职的散官轮流改正抄写错误。后来又派东台侍郎赵仁本等人负责检查此事，并设置详正学士来代替散官。详正学士的名称很雅，不知什么时候被撤消。然而秘书省自有校书郎、正字等官，使他们名实相符就足够用的了，绍兴时命地位高的大臣负责秘书省，同时设置编定书籍官二人，也是同类的事。

卷 三

人生五计

【原文】 朱新仲舍人常云：“人生天地间，寿夭不齐，姑以七十为率：十岁为童儿，父母膝下，视寒暖燥湿之节，调乳哺衣食之宜，以须成立，其名曰生计；二十为丈夫，骨强志健，问津名利之场，秣马厉兵，以取我胜，如骥子伏枥，意在千里，其名曰身计；三十至四十，日夜注思，择利而行，位欲高，财欲厚，门欲大，子息欲盛，其名曰家计；五十之年，心怠力疲，俯仰世间，智术用尽，西山之日渐逼，过隙之驹不留，当随缘任运，息念休心，善刀而藏，如蚕作茧，其名曰老计；六十以往，甲子一周，夕阳衔山，倏尔就木，内观一心，要使丝毫无嫌，其名曰死计。”朱公每以语人，以身计则喜，以家计则大喜，以老计则不答，以死计则大笑，且曰：“子之计拙也。”朱既不胜笑者之众，则亦自疑其计之拙，曰：“岂皆恶老而讳死邪？”因为南华长老作《大死庵记》，遂识其语。予之年龄逾七望八，当以书诸绅云。

【译文】 朱新仲（朱翌）舍人说：“人生活在天地之间，寿命长短各不相同，姑且把七十岁为准：十岁是儿童，在父母跟前，由父母照顾适应气候寒热燥湿的变化，调节哺养衣食的合理，期望他成人，这叫做生长计议。二十岁成为一名大丈夫，体格健壮，心里健康，试探着进入名利之场，喂饱马还磨好兵刃，去夺取胜利，如同马驹伏在槽头，志在千里一样，这叫做自身计议。三十岁至四十岁，日日夜夜深思熟虑，只作对自己有利的事，地位希望高，财富希望多，门庭希望光大，子孙希望兴盛，这叫做家族计议。到了五十岁，精神体力都已疲惫，只能随着世事而沉浮，智谋已经用尽，日薄西山的感觉日益临近，已过的光阴一去不再复返，应当听任机缘命运的摆布，放弃各种念头和心计，把一把完善的刀保藏起来，像蚕一样在自己周围作上茧，这叫做衰老计议。六十以后，活了一个甲子，已经落日衔山，不久就要进棺木，反省内心，要使自己没有丝毫可以惭愧的事，这叫做垂死计议。”朱先生经常和人谈这些，每当说到自身计议时，听的人就欢喜，谈到宗族计议时就非常欢喜，谈到衰计议时，听的人就不作声，谈到垂死计议时，听的人就大笑，而且说：“你的计议真不高明！”

朱因为笑他的人太多，就自己也怀疑这种计议是不高明的，说：“难道他们都是讨厌老和忌讳死吗？”我因为要给南华长老（释重辩）写《大死庵记》，就记下了朱的这些话。我的年龄已过七十而走向八十，应当把这些话像孔子的弟子子张把孔子的话写在束腰的大带上那样铭记不忘。

瀛莫间二禽

【原文】 瀛、莫二州之境，塘泊之上有禽二种。其一类鹄，色正苍而喙长，凝立水际不动，鱼过其下则取之，终日无鱼，亦不易地。名曰信天缘。其一类鹭，奔走水上，不闲腐草泥沙，唼唼然必尽索乃已，无一息少休。名曰漫画。信天缘若无能者，乃与漫画均度一日无饥色，而反加壮大。二禽皆禀性所赋，其不同如此。

【译文】 在瀛、莫两州，池塘湖泊上两种鸟。其中一种像天鹅，正青色而喙很长，凝立在水边不动，鱼经过它的下面时就叨上来，即使一整天没有鱼，也不换地方，叫作信天缘。其中另一种像鸭子，在水上来回奔走，即使是满是腐烂的水草和泥沙的地方，也要唼唼地搜索一遍才罢休，没有一刻稍稍休息一下，叫作漫画。信天缘像是没有能力的鸟，可是却和漫画一样都能度过一天而没有饥色，反而更加健壮肥大。这两种鸟都是天生这样，但他们却如此不同。

士大夫避父祖讳

【原文】 国朝士大夫，除官避父祖名讳，盖有不同。不讳嫌名，二名不偏讳，在礼固然，亦有出于一时恩旨免避，或旋为改更者。建隆创业之初，侍卫帅慕容彦钊、枢密使吴廷祚皆拜使相，而彦钊父名章，廷祚父名璋，制麻中为改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同二品。绍兴中，沈守约、汤进之二丞相，父皆名举，于是改提举书局为提领。自余未有不避者。吕希纯除著作郎，以父名公著而辞。然富韩公之父单名言，而公以右正言知制诰，韩保枢之子忠宪公亿，孙绛、缜，皆历位枢密，未尝避。岂别有说乎？

【译文】 大宋的士大夫，任官避讳父亲祖父名字的情况，与前朝有所不同。不避讳与祖父、父亲名字音相近的字，名有二字的虽有一字与官名相同的，也要忌讳，从礼节上说虽然如此，但大宋朝也有受皇帝特别恩准免于避讳的，或

者因此为之更改官称的。宋太祖建隆年间，正值创业艰难之时，侍卫帅慕容彦钊、枢密使吴廷祚都被授予使相避职务，而彦钊父亲的名字叫章，廷祚父亲的名字叫璋，在任命他们为使相的诏书中，把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改称同二品。高宗绍兴中期，沈守约、汤进之二位丞相，父亲的名字都叫举，于是改提举书局为提领书局。自此以后，任官没有不避讳祖父、父亲名字的。吕希纯被任命为著作郎，因为其父名字叫公著而辞职。但是富弼父亲的名字也只有一个字叫言，而富弼在右正言兼知制诰，韩保枢之子忠宪公韩亿，孙子韩绶、韩缜，都历任枢密之职，没有避其父、祖父的名讳。是不是还有其它的说法呢？

元正父子忠死

【原文】 唐安禄山表权皋入幕府，皋度禄山且叛，以其猜虐不可谏，欲行，虑祸及亲，因献俘京师，在道诈死，既含敛而逸去。皋母谓实死，恸哭感行路，故禄山不之虞，归其母。皋潜奉侍昼夜南奔。既渡江而禄山反。天下闻其名，争取以为属。甄济居青岩山，诸府五辟，诏十至，坚卧不起。安禄山入朝，求济于玄宗，授范阳掌书记，济不得已而起。察禄山有反谋，不可谏，因谒归，阳呕血不支，异归旧庐。禄山反，使封刀召之。曰：“即不起，断其首。”济引颈待之。使以实病告，庆绪复使强舆至东都。会广平王平东都，诣军门上谒，肃宗使污贼官罗拜，以愧其心。《唐书》列二人于《卓行传》，褒之至矣。有元正者，在河南幕府，史思明陷河、洛，辇父匿于山中。贼以名召之，正度事急，谓弟曰：“贼禄不可养亲，彼利吾名，难免矣。然不污身而死，吾犹生也。”贼既得，诱以高位，瞋目固拒，兄弟皆遇害。父闻，仰药死。事平，诏录伏节十一姓，而正为冠。皋、济之终，与正皆赠秘书少监。予谓皋、济得生，而正一门皆并命，故当时以为伏节之冠。而《唐史》不列之《忠义》、《卓行》中，但附见其祖万顷《文艺》之末，《资治通鉴》亦不载其事，使正之名寂寥不章显，为可恨也！白乐天作张 碑云：“以左武卫参军分司东都，属安禄山陷覆洛京，以伪职淫刑，胁劫士庶。公与同官卢巽潜遁于陆浑山，食木实，饮泉水者二年，讫不为逆命所污。肃宗诏河南搜访不仕贼庭、隐藏山谷者，得六人以应诏，公与巽在焉。繇是名节闻于朝，优诏褒美，特授密县主簿。”

【译文】 唐朝安禄山向朝廷上奏表请求权皋进入他的幕府，权皋揣度安禄山将要反叛，因为他为人猜忌暴虐不可以劝谏，打算出走，顾虑祸害延及长亲，借着往京师献战俘的机会，在途中诈称死亡，既已装敛入棺而逃离。权皋的母

亲以为他真的死了，哀痛大哭使行路人都为之感动，所以安禄山不加疑虑，归还了他的母亲。权皋暗中侍奉着母亲昼夜向南逃奔。既已渡过长江而安禄山反叛。天下闻说权皋的大名，争相获取作为部属。甄济居住在青岩山，各幕府五次征召，朝廷下诏到十次，他坚持蛰居不赴召。安禄山入朝，向玄宗请求甄济，授为范阳掌书记，甄济迫不得已而赴召。观察安禄山有反叛的阴谋，不可劝谏，因而告假归家，他佯装着吐血身体不能支持，让人抬着回到了旧居。安禄山反叛，派人封着一把刀召请他，说：“如果不赴召，就砍下他的脑袋。”甄济伸着脖子等待站使者来砍。使者以甄济真的有病报告，安庆绪又派人强行把他抬到东都。恰好广平王平定东都，到军门求见，肃宗令屈辱于贼人的官吏环列叩拜，以羞愧他们的心。《唐书》列权皋与甄济二人在《卓行传》，极为褒美了。有一位叫元正的人，在河南幕府供职，史思明攻陷黄河、洛水流经的地区，他挽着车拉着父亲藏匿在山中。贼人点着名召请他，元正考虑事情紧急，对他的弟弟说：“贼人的俸禄不可以供养亲人，他们利用我的名声，难以避免了。然而不使自身受辱而死，我仍和活着是一样的。”贼人既已得到了他，把高官来引诱他，元正怒目相视坚决拒绝，兄弟两人都遇害。他们的父亲听到这一消息，喝毒药而死。贼事平息以后，朝廷下诏录用坚守节操的十一个姓，而以元正为首。权皋、甄济的结局，与元正一样都赠官为秘书少监。我以为权皋、甄济得以生存，而元正一家合力致死，故当时认为他是坚守节操的首位。而《唐书》不把他列在《忠义》或《卓行》传中，只附见于他的祖父元万顷《文艺传》之末，《资治通鉴》也不记载他的事迹，使元正的名字默默无闻不明显昭著，是可恨的！白居易（白居易）作张嵇的碑说：“张嵇以左武卫参军分管东都，恰置安禄山攻陷洛阳，用封伪官和滥用刑法两种手段，胁迫劫持士人和百姓。张嵇与同僚卢巽偷偷逃跑到陆浑山中，吃树木的果食，喝泉水这样的生活有两年，终于没有被逆贼的伪命所沾污。肃宗诏令河南搜访不在贼庭为官、隐藏在山谷中的人，得到了六个人接奉王命，张与卢巽就在其中。因此他们的名誉气节著闻于朝廷，朝廷格外下诏表彰赞美，特授予密县主簿。”

萧颖士风节

【原文】 萧颖士为唐名人，后之学者但称其才华而已，至以笞楚童奴为之过。予反复考之，盖有风节识量之士也。为集贤校理，宰相李林甫欲见之，颖士不诣，林甫怒其不下己。后召诣史馆，又不屈，愈见疾，至免官更调河南参

军。安禄山宠恣，颖士阴语柳并曰：“胡人负宠而骄，乱不久矣。东京其先陷乎！”即托疾去。禄山反，往见河南采访使郭纳，言御守计，纳不用。叹曰：“肉食者以儿戏御剧贼，难矣哉！”闻封常清陈兵东京，往观之，不宿而还，身走山南，节度使源洧欲退保江陵，颖士说曰：“襄阳乃天下喉襟，一日不守，则大事去矣。公何遽轻土地，取天下笑乎？”洧乃按甲不出。洧卒，往客金陵，永王召之，不见。刘展反，围雍丘，副大使李承式遣兵往救，大宴兵客，陈女乐。颖士曰：“天子暴露，岂臣下尽欢时邪！夫投兵不测，乃使观听华丽，谁致其死哉！”弗纳。颖士之言论操持如此，今所称之者浅矣。李太白，天下士也，特以堕永王乱中，为终身累。颖士，永王召而不见，则过之焉。

【译文】 萧颖士是唐代的名人，后来的学者只称赞他的才华而已，甚至因他杖挞仆人为他的过错。我反复考察，他是一位有风骨气节、胆识和度量的士人。他为集贤校理时，宰相李林甫想见他，萧颖士不前往，李林甫恼怒他不甘心在自己之下。后来又召他到史馆，又不屈就，更加被李林甫忌恨，以至被免官改调为河南参军。安禄山受宠幸而放纵，萧颖士暗中对柳并说：“胡人靠着恩宠而骄纵，祸乱不久就要来了，东京是他先攻陷的地方吧！”随即托言有病而离去。安禄山造反以后，萧颖士前往会见河南采访使郭纳，向他讲抗击守卫之计，郭纳不采用，他叹息说：“当官的用儿童游戏抵御大的盗贼，难啊！”听说封常清在东京布列兵众，前往观看，没有留宿而当夜回还，只身走向山南，节度使源洧打算退守江陵，萧颖士说：“襄阳是天下的咽喉衣襟之地，此地一天不守，则天下的大事就丢弃了，您为何突然轻视这里的土地，而让天下讥笑呢？”源洧于是按兵不出。源洧去世，萧颖士前往金陵客居，永王李璣召请他，不与他相见。刘展反叛，包围雍丘，副大使李承式派兵前往救援，大肆宴请宾客，布列女妓奏乐。萧颖士说：“天子暴露在原野，难道是臣下尽情欢愉的时候吗！用兵于不测之地，却使自己的视听华美富丽，谁还为你效命致死啊？”不被采纳。萧颖士的言论操守就是这样，现今所称道他的太浅了。李太白，是天下的有名之士，只是因为掉在了永王的祸乱之中，为之终身受牵累。萧颖士，永王召请而不与相见，则是超过李太白了。

石尤风

【原文】 石尤风，不知其义，意其为打头逆风也。唐人诗好用之。陈子昂《入峡苦风》云：“故乡今日友，欢会坐应同。宁知巴峡路，辛苦石尤风。”戴叔

伦《送裴明州》云：“潇水连湘水，千波万浪中。知君未得去，惭愧石尤风。”司空文明《留卢秦卿》云：“知有前期在，难分此夜中。无将故人酒，不及石尤风。”计南朝篇咏，必多用之，未暇忆也。

【译文】 “石尤风”这个词，其确切含义不大清楚，大概是指顶头风的意思吧！唐代人作诗好用这个词。陈子昂在他的《入峡苦风》诗中说：“故乡今日友，欢会坐应同。宁知巴峡路，辛苦石尤风。”戴叔伦也有一首叫《送裴明州》的诗：“潇水连湘水，千波万浪中。知君未得去，惭愧石尤风。”司空文明在《留卢秦卿》诗中说：“知有前期在，难分此夜中。无将故人酒，不及石尤风。”估计起南朝的诗词中，用这个词的肯定更多，只是没有全部记录下来。

江枫雨菊

【原文】 作诗要有来处，则为渊源宗派。然字字执泥，又为拘涩。予于此学，无自得之见，少年时，尤失之雕琢。记一联，初云：“雨深荒病菊，江冷落愁枫。”后以其太险，改为：“雨深入病菊，江冷客愁枫。”比前句微有蕴藉。盖取崔信明“枫落吴江冷”、杜老“雨荒深院菊”、“南菊再逢人卧病”、严武“江头赤叶枫愁客”，合而用之。乃如补衲衣裳，殊为可笑。聊书之以示儿辈云。

【译文】 作诗要有来源之处，这样就成为渊源有自的流派。然而要是每个字都固执拘泥，又拘谨晦涩。我对于这门学问，没有自得的见解，少年之时，作诗尤其失之于雕章琢句，记得有一联，最初写道：“雨深荒病菊，江冷落愁枫（雨多忧虑荒芜了菊花，江冷担心枫树落叶）。”后来因为它太浅露，改成了：“雨深入病菊，江冷客愁枫（雨多人忧虑菊花，江冷客担心枫树）。”比前句略微有些含蓄。这是取自崔信明“枫落吴江冷（枫树落叶吴江已寒冷）”、杜甫“雨荒深院菊（因下雨荒芜了深院的菊花）”、“南菊再逢人卧病（南山之菊再次遇到人卧病）”、严武“江头赤叶枫愁客（江头的红叶枫树使行客悲愁）”，合起来来用，于是像补百衲之衣，特别地可笑。聊以写下来以告知儿辈们。

开元宫嫔

【原文】 自汉以来，帝王妃妾之多，唯汉灵帝、吴归命侯、晋武帝、宋苍梧王、齐东昏、陈后主。晋武至于万人。唐世明皇为盛，白乐天《长恨歌》云

“后宫佳丽三千人”；杜子美《剑器行》云“先帝侍女八千人”，盖言其多也。《新唐史》所叙，谓开元、天宝中，宫嫔大率至四万。嘻，其甚矣！隋大业离宫遍天下，所在皆置宫女。故裴寂为晋阳宫监，以私侍高祖。及高祖义师经过处，悉罢之。其多可想。

【译文】 自汉朝以来，拥有众多妃妾的帝王，只有东汉灵帝刘宏、三国吴归命侯孙皓、西晋武帝司马炎、南朝宋苍梧王刘昱、南朝齐东昏侯萧宝卷、南朝陈后主陈叔宝几位君主。晋武帝司马炎的后宫中嫔妃近万人。唐代以唐玄宗的嫔妃最多，白居易在《长恨歌》有“后宫佳丽三千人”的诗句；杜甫在《剑器行》中也写道“先帝侍女八千人”，都是说唐玄宗嫔妃之多。据《新唐书》记载，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后宫中嫔妃大概有四万人之多。嘻，这也太过分了！隋炀帝大业年间，离宫遍布天下，每座离宫中都有数量不等的宫女。故此，裴寂才能以晋阳宫监的身份，私下里归奉唐高祖李渊。唐高祖起义兵以后，所到之处，把离宫中的宫女人都释放回家。其宫女之多可想而知。

相里造

【原文】 唐内侍监鱼朝恩，怙贵诞肆，凡诏会群臣计事，折愧坐人，出其上。虽宰相元载辩强，亦拱默。唯礼部郎中相里造、殿中侍御史李 ，酬诘往返，未始降屈。朝恩不悛，黜 以动造，又谋将易执政，以震朝廷，乃会百官都堂，且言：“今水旱不时，屯军馈运困竭，天子卧不安席，宰相何以辅之？不退避贤路，尚何赖乎？”宰相俯首，坐皆失色。造徙坐从之，因曰：“阴阳不和，五谷踊贵，皆军容事，宰相何与哉？且军帑不散，故天降之 。今京师无事，六军可相维镇，又屯十万，馈粮所以不足，百司无稍食，军容为之。宰相行文书而已，何所归罪？”朝恩拂衣去，曰：“南衙朋党且害我。”此段载于《新唐书·宦者传》中，不能记相里造之本末。予谓造当阉寺威权震主，生杀在手之时，以区区一郎吏，而抗身与为敌，后来名人议论，及叙列忠言 词，未见有称述之者，《通鉴》亦不书，聊记于此，以章潜德。同时，刘给事争幸河中，亦然。

【译文】 唐代宗时，内侍监宦官鱼朝恩依仗皇帝的宠信，骄横跋扈，凡皇帝召见群臣商议国家大事时，他都要想方设法羞辱在坐的人，出尽风头。宰相元载虽然善辩好强，亦只好屈服沉默。只有礼部郎中相里造、殿中侍御史李 不屈抗争，始终不投降屈从。鱼朝恩对此很不高兴，罢免李 的官职以警告相里造。鱼朝恩又阴谋撤换宰相，以便进一步控制朝廷，于是就在都堂（唐尚书

省办公处）召集文武百官，指责宰相说：“今年旱涝灾害严重，军用匮乏，皇上为此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你们身为宰相是怎么辅政的？还不主动退位让贤，赖在宰相的位置上干什么？”宰相听后低头不语无言以对，在坐大臣也都大惊失色。相里造来到鱼朝恩跟前，反驳他说：“阴阳不和，灾害不断，五谷涨价，这都是你们这些观军容使干预政事的结果，与宰相有什么关系？况且军用物资没有供给军队就不见了，所以上天才降此大灾。现在京师安定无事，禁军就可维持京城治安，却又在京师周围屯军十万，这是军粮不足的主要原因，文武百官并没有多吃一点，这都是你们这些观军容使一手造成的。宰相只不过是照章行事而已，怎么能归罪于宰相呢？”鱼朝恩被反驳得哑口无言，气得拂袖而去，恼羞成怒地说：“这是你们南衙（指中央各行政司法机关）勾结起来诬陷我！”这段话收录在《新唐书·宦者传》中。《新唐书》没有能把相里造全部事迹记载下来。我认为，相里造在宦官弄权，控制君主，手握生杀予夺大权之时，以区区一个郎中小官，敢于挺身而出反抗宦官的淫威，真让人佩服！而后来名人在议论和记叙忠言谏词时，没有见到有叙述称赞这段话的，《资治通鉴》中也不记载此事，所以我把此事记述下来，以使他的崇高品德不致于被埋没。与他同时代的刘给事中规劝皇帝去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也与此事相同。

先公诗词

【原文】 先忠宣公好读书，北困松漠十五年，南谪岭表九年，重之以风淫未疾，而翻阅书策，早暮不置，尤熟于杜诗。初归国到阙，命迈作谢赐物一札子，审定两句云：“已为死别，偶遂生还。”谓迈曰：“此虽不必泥出处，然有所本更佳。东坡海外表云：‘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杜老《羌村》诗云：‘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正用其语。”在乡邦日，招两使者会集，出所将宣和殿书画旧物示之。提刑洪庆善作诗曰：“愿公十袭勿浪出，六丁取将飞辟历！”辟历二字如古文，不从雨。公和之曰：“万里怀归为公出，往事宣和空历历！”迈请其意，曰：亦出杜诗“历历开元事，分明在目前”也。绍兴丁巳，所在始歌《江梅引》词，不知为谁人所作，己未、庚申年，北庭亦传之。至于壬戌，公在燕，赴张总侍御家宴，侍妾歌之，感其“念此情，家万里”之句，怆然曰：“此词殆为我作！”既归不寐，遂用韵赋四阙。时在囚拘中，无书可检，但有《初学记》、韩、杜、苏、白乐天集，所引用句话，一一有来处。北方不识梅花，士人罕有知梅事者，故皆注所出。

其一，《忆江梅》云：“天涯除馆忆江梅。几枝开。使南来。还带余杭春信到燕台。准拟寒英聊慰远，隔山水，应销落，赴谁！空恁遐想笑摘蕊。断回肠，思故里。漫弹绿绮。引三弄，不觉魂飞。更听胡笳哀怨泪沾衣。乱插繁华须异日，待孤讽，怕东风，一夜吹。”元注引杜公：“忽忆两京梅发时。”“胡笳在楼上，哀怨不堪听。”“安得健步移远梅，乱插繁华向晴昊！”乐天《忆杭州梅花》：“三年闲闷在余杭，曾为梅花醉几场。”车驾时在临安。柳子厚：“欲为万里赠，杳杳山水隔。寒英坐销落，何用慰远客？”江总：“桃李佳人欲相照，摘蕊牵花来并笑。”高适：“遥怜故人思故乡，梅花满枝空断肠！”卢仝：“含愁更奏绿绮琴，相思一夜梅花发。”刘方平：“晚岁芳梅树，繁花四面同。东风吹渐落，一夜几枝空。”东坡：“忽见早梅花，不饮但孤讽。”“一夜东风吹石裂，半随飞雪度关山。”

其二，《访寒梅》云：“春还消息访寒梅。赏初开。梦吟来。映雪衔霜清绝绕风台。可怕长洲桃李妒，度香远，惊愁眼，欲媚谁？曾动诗兴笑冷蕊。效少陵，惭《下里》。万株连绮。叹金谷，人坠莺飞。引领罗浮翠羽幻青衣。月下花神言极丽，且同醉，休先愁，玉笛吹。”注引李太白：“闻道春还未相识，走傍寒梅

访消息。”“绿珠楼下梅花满，今日曾无一枝在。”江总：“金谷万株连绮萼，梅花隐处藏娇莺。”何逊：“衔霜当路发，映雪拟寒开。枝横却月观，花绕凌风台。”杜公：“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未将梅蕊惊愁眼，要取椒花媚远天。”“巡檐索共梅花笑，冷蕊疏枝半不禁。”乐天：“赏自初开直至落。”“莫怕长洲桃李妒，明年好为使君开。”王昌龄梦中作梅花诗。梁简文赋“香随风而远度”，及赵师雄《罗浮见美人在梅花下有翠羽啾嘈相顾》诗云：“学妆欲待问花神。”崔櫓：“初开已入雕梁画，未落先愁玉笛吹。”

其三，《怜落梅》云：“重闺佳丽最怜梅。牖春开。学妆来。争粉翻光何遽落梳台。笑坐雕鞍歌古曲，催玉柱，金卮满，劝阿谁？贪为结子藏暗蕊。敛蛾眉，隔千里。旧时罗绮。已零散，沈谢双飞。不见娇姿真悔著单衣。若作和羹休讶晚，堕烟雨，任春风，片片吹。”注引梁简文赋：“重闺佳丽，貌婉心娴，怜早花之惊节，讶春光之遣寒。”“顾影丹墀，弄此娇姿，洞开春牖，四卷罗帷。春风吹梅畏落尽，贱妾为此敛蛾眉。”又：“争楼上之落粉，夺机中之织素。”梁王诗：“翻光同雪舞。”鲍泉：“紫窗落梳台。”江总：“满酌金卮催玉柱，落梅树下宜歌舞。”太白：“千金骏马邀少妾，笑坐雕鞍歌落梅。”古曲有《落梅花》。又：“片片吹落春风香。”谢庄赋：“隔千里兮共明月。”庾信：“早知觅不见，真悔著衣单！”东坡：“抱丛暗蕊初含子，玉妃谪堕烟雨村。”王建：“自是桃花贪结子。”

第四篇失其稿。每首有一笑字，北人谓之“四笑《江梅引》”，争传写焉。

【译文】 先父忠宣公洪皓爱好读书，在松漠（今内蒙古巴林右旗南）被金人囚禁十五年，又被贬谪到岭表（即岭南，今广东广州市）九年，即使在这漫长而又艰难的岁月里，身患重病，仍然不停地翻阅书卷，无论早晚手不释卷，对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诗更是精通。当初从金国回到朝廷，让我作了一篇感谢皇上赐物的奏事札子，改定其两句叫：“已为死别，偶遂生还。”先父对我说：“这些话虽不必拘泥于出处，但有根据会更好。苏轼的海外表中说：‘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杜甫的《羌村》诗中说：‘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正是借用他们的妙语。”在乡邦的日子里，先父曾把两位使者招到家里，把珍藏的宣和殿书画旧物拿出来让他们看。提点刑狱公事洪庆善作诗道：“愿公十袭勿浪出，六丁取将飞辟历！”“辟历”二字如同古文之义，不是下雨时雷电轰鸣的“霹雳”。先父和其诗道：“万里怀归为公出，往事宣和空历历！”我请教先父“历历”二字出自何处，回答说：也出自杜甫的诗句“历历开元事，分明在目前”。宋高宗绍兴七年（1137年），处处都在传唱《江梅引》词，不知作者是谁，绍兴九年（1139年）、十年（1140年），北方也在传唱这首词。到了绍兴十二年（1142年），先父在燕地赴张总侍御家宴时，听到歌伎唱这首词，对其中“念此情，家万里”一句感慨万分，怆然泪下说：“这首词大概就是为我而作！”回到住处，辗转反侧，不能入睡，于是就用这首词的韵作词四首。当时，先父还在金人囚禁之中，没有书可供其查阅，手头只有《初学记》、韩愈、杜甫、苏轼、白居易的文集，作词所引用句子，统统都注明出处。北方人不认识梅花，士人中很少有人了解关于梅花的事，所以在此我把词中关于梅花的句子都注明出处。

第一首叫《忆江梅》：“天涯除馆忆江梅。几枝开。使南来。还带余杭春信到燕台。准拟寒英聊慰远，隔山水，应销落，赴谁？空恁遐想笑摘蕊。断回肠，思故里。漫弹绿绮。引三弄，不觉魂飞。更听胡笳哀怨泪沾衣。乱插繁华须异日，待孤讽，怕东风，一夜吹。”注引自杜甫的诗句：“忽忆两京梅发时。”“胡笳在楼上，哀怨不堪听。”“安得健步移远梅，乱插繁华向晴昊！”白居易的《忆杭州梅花》诗：“三年闲闷在余杭，曾为梅花醉几场。”当时天子在临安（今浙江杭州市）。柳宗元的诗：“欲为万里赠，杳杳山水隔。寒英坐销落，何用慰远客？”南朝陈末诗人江总的：“桃李佳人欲相照，摘蕊牵花来并笑。”唐朝高适的：“遥怜故人思故乡，梅花满枝空断肠！”唐朝卢仝的：“含愁更奏绿绮琴，相思一夜梅花发。”刘方平的：“晚岁芳梅树，繁华四面同。东风吹渐落，一夜几枝空。”苏轼的：“忽见早梅花，不饮但孤讽。”“一夜东风吹石裂，半随飞雪度关山。”

第二首叫《访寒梅》：“春还消息访寒梅。赏初开。梦吟来。映雪衔霜清绝

绕风台。可怕长洲桃李妒，度香远，惊愁眼，欲媚谁？曾动诗兴笑冷蕊。效少陵，惭《下里》。万株连绮。叹金谷，人坠莺飞。引领罗浮翠羽幻青衣。月下花神言极丽，且同醉，休先愁，玉笛吹。”注引自李白的诗句：“闻道春还未相识，走傍寒梅访消息。”“绿珠楼下梅花满，今日曾无一枝在。”江总的诗句：“金谷万株连绮萼，梅花隐处藏娇莺。”何逊的诗句：“街霜当路发，映雪拟寒开。枝横却月观，花绕凌风台。”杜甫的诗句：“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未将梅蕊惊愁眼，要取椒花媚远天。”“巡檐索共梅花笑，冷蕊疏枝不禁。”白居易的诗句：“赏自初开直至落。”“莫怕长洲桃李妒，明年好为使君开。”王昌龄的梦中作梅花诗。梁简文的赋“香随风而远度”，以及赵师雄的《罗浮见美人在梅花下有翠羽啾嘈相顾》诗中写道：“学妆欲待问花神。”崔櫓的诗句：“初开已入雕梁画，未落光愁玉笛吹。”

第三首叫《怜落梅》：“重闺佳丽最怜梅。牖春开，学妆来。争粉翻光何遽落梳台。笑坐雕鞍歌古曲，催玉柱，金卮满，劝阿谁？贪为结子藏暗蕊。敛蛾眉，隔千里。旧时罗绮。已零散，沈谢双飞。不见娇姿真悔著单衣。若作和羹休讶晚，堕烟雨，任春风，片片吹。”注引自梁简文的赋：“重闺佳丽，貌婉心娴，怜早花之惊节，讶春光之遣寒。”“顾影丹墀，弄此娇姿，洞开春牖，四卷罗帷。春风吹梅畏落尽，贱妾为此敛蛾眉。”又有：“争楼上之落粉，夺机中之织素。”梁王诗句：“翻光同雪舞。”鲍泉的诗句：“綦窗落梳台。”江总的诗句：“满酌金卮催玉柱，落梅树下宜歌舞。”李白的诗句：“千金骏马邀少妾，笑会雕鞍歌落梅。”还有古曲《落梅花》。又有：“片片吹落春风香。”谢庄的赋：“隔千里兮共明月。”庾信的诗句：“早知觅不风，真悔著衣单！”苏轼的诗句：“抱丛暗蕊初含子，玉妃谪堕烟雨村。”王建的诗句：“自是桃花贪结子。”

第四首词，稿子现已佚失。这四首词中每首都有一個“笑”字，所以北方称之为“四笑《江梅引》”，争相传抄。

州县名同

【原文】 晋、宋以来，置立州郡，惟以多为贵。先是中原陷胡、羯，本土遗民，或侨寓南方，故即其所聚为立郡。而方伯所治之州，亦仍旧名。如南徐、南兖、南豫、南雍州、南兰陵、南东海、南琅邪、南东莞、南鲁郡，其类不一。魏、周在北，亦如此。隋唐不复然。国朝之制，州名或同，则增一字以别之。若河北有雄州、恩州，故广东者增南字；蜀有剑州，故福建者，亦增南字。以至

西和、西安州亦然。其声音颇同，患于舛误，则俗间称呼，自加上下东西为别。故称岳为上岳，鄂为下鄂。清州与青类，称为北清；郢州与颖类，称为西郢；融州与容类，称为西融者是也。若县邑则不问，今河南、静江府、巩州皆有永宁县，饶、邛、衡州皆有安仁县，蔡、英之真阳，卢、汝之梁，光、台之仙居，临安、建昌之新城，越、筠之新昌，婺、蜀之永康，处、吉之龙泉、严、池之建德，渭、秀之华亭，信、吉之永丰，郴、兴国之永兴，衢、嘉之龙游，施、临江之清江，洪、万之武宁，福、循之长乐，郴、连之桂阳，福、桂之永福是也。

【译文】 自东晋、南朝宋以来，设立州郡，都认为越多越好。东晋初年，中原地区被匈奴、鲜卑、羌、氐、羯等少数民族占领，锋刃余生的本地百姓，有一部分迁到南方居住，所以就在他们所聚居的地方设立一个与原居住地州郡名相同的州郡（即侨置州郡）。而原来地方官管理的州郡，也仍叫其旧名。如当时设立的侨州郡有，南徐州、南兖州、南豫州、南雍州、南兰陵郡、南东海郡、南琅邪郡、南东莞郡、南鲁郡等，像这样的州郡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北方的西魏、北周也设置了一些类似的州郡。隋、唐时，彻底废除侨置郡县，不再有此类的情况。大宋朝的制度是，州名有相同的，就增加一个字以示区别。如河北有雄州、恩州，所以广东的雄州、恩州名前加一个“南”字。蜀地有剑州，所以福建的剑州名前也要加一个“南”字。像西和州、西安州亦是由此而来。州郡名字读音类似或相同的，为免于出错，就按民间的称呼，在州郡名前加上下东西以示区别。所以称岳州为上岳州，鄂州为下鄂州。清州的“清”与青州的“青”音同，称之为北清州；郢州的“郢”与颖州的“颖”音同，称之为西郢州；融州的“融”与容州的“容”读音接近，称之为西融，如果县邑名字不相同就不作此规定，如今的河南府、静江府，巩州都有永宁县，饶州、邛州、衡州都有安仁县，蔡州、英州都有真阳县，卢州、汝州都有梁县，光州、合州都有仙居，临安府、建昌府都有新城县，越州、筠州都有新昌县，婺州、蜀州都有永康县，处州、吉州都有龙泉镇，严州、池州都有建德县，渭州、秀州都有华亭县，信州、吉州都有永丰县，郴州、兴国军都有永兴县，衢州、嘉州都有龙游县，施州、临江军都有清江县，洪州、万州都有武宁县，福州、循州都有长乐县，郴州、连州都有桂阳县，福州、桂州都有永福县，这些名字相同的县邑，不因两地都有而改名。

三衙军制

【原文】 乾道四年正月，迈为中书舍人，因入对，论三衙军制名称不正：“以祖宗之制论之，军职之大者，凡八等。除都指挥使或不常置外，曰殿前副都指挥使、马军副都指挥使、步军副都指挥使，曰殿前都虞候、马军都虞候、步军都虞候，曰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秩秩有序，若登梯然，不可一级辄废。一或有阙，即以功次递迁。降此而下，则分营、分厢，各置都副指挥使，如捧日左厢第一军、天武右厢第二军之类。边境有事，命将讨捕，则旋立总管、钤辖、都监之名，使各将其所部以出。事已，则复初。累圣相承，皆用此术，以制军诘禁。自南渡以后，触事草创，于是三帅之资浅者，始有主管某司公事之称。而都虞候以下，不复设置，乃以宿卫虎士而与在外诸军同其名，以统制、统领为之长。又使遥带外路总管、钤辖。考之旧制则非法，稽之事体则非是。以陛下圣明，能知人善任，使所谓爪牙之士，岂无十数人以待用者？若法祖宗之制，正三衙之名，改诸军为诸厢，改统制以下为都虞候、指挥使，使宿卫之职预有差等，士卒之心明有所系，异时拜将，必无一军皆惊之举。于以销压未萌，循名责实，则环卫将军虽不置可也。乞下枢密院讨论故实，图议其当，恐或可以少赞布昭圣武之意。”读札子毕，孝宗甚喜，即批付枢密院。是时，知院虞允文使四川，同知刘 不乐曰：“舍人要如何行？”对之以“但随所见敷陈，若施行与否，自系庙堂处分。”竟寝不行。后阅《华阳集》，王 撰《高琼神道碑》云：“王为殿前都指挥使，管军员阙，兼领二司，王乃言曰：‘臣老矣，如有负薪之忧，谁为可任者？先朝自殿前而下，各置副都指挥使，及都虞候，常有十人，职近事亲，易以第进，又使士卒预识其威名，缓急临戎，上下得以附习，此军制之大要也。’有旨从之。”据琼所言如此，正合前说。

【译文】 乾道四年（1168）正月，我洪迈为中书舍人，因为面见皇帝奏对，论奏三衙军制的名称不正说：“以祖宗的制度而论，军职较大的，共分八等。除了都指挥使不常设置外，分别叫殿前副都指挥使、马军副都指挥使、步军副都指挥使，叫殿前都虞候、马军都虞候，步军都虞候，叫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每秩都有顺序，就好像些梯子一样，不可有一级动不动就废掉。一或偶有空阙，即以功劳依次迁升。从这一级往下，则分营、分厢，各设置都副指挥使，如捧日左厢第一军、天武右厢第二军之类。边境有战事，任命将官讨伐追捕，则随即设立总管、钤辖、都监的名目，使各自率领他所部属

的军队出征。事情完毕以后，则恢复当初的样子。历代圣皇相承，都用这个办法，以管理军队禁卫邦国。自从南渡以后，所碰到的事大都草草创设，于是身为三帅而又资历浅的人，才有了主管某司公事的称谓。而都虞候以下的官职，不再设置，于是用宿卫虎士，从而与在外各军用同一名号，以统制、统领为其长官。又使他们挂上外路的总管和铃辖之名。考核于旧的制度则不合法度，验证于事情的体统则不恰当。以陛下的圣明，能够知人善任，让所谓的爪牙之士，难道就没有十几个人以备起用的吗？若是效法祖宗的制度，是正三衙的名称，改诸军为诸厢，改统制以下为都虞候、指挥使，使宿卫的官职预先就有差别等第，士卒的心里明白，它时拜授将帅，一定不会引起一军都吃惊的举动。可以消除压制还没有发生的事变，循其名而责其实，这样环卫将军纵使不设置也可以了。请求发到枢密院讨论过去的制度，希图使它议论得当，或许可以稍有赞助宣扬显示圣明英武的意思。”读完这个札子，孝宗特别高兴，马上批示交付于枢密院。当时，知枢密院虞允文出使四川，同知枢密院刘鞬不高兴地说：“舍人要怎么办？”我回答他“只是随自己所见陈述，至于施行与否，自当由朝廷决定。”竟被扣压不予施行。后来我翻阅王癘《华阳集》，他撰写的《高琼神道碑》说：“王为殿前都指挥使，主管军官官缺，兼任二司，王曾向皇上说：‘臣年纪大了，假如我身体一旦得病，谁可成为担任此职的人？先朝自殿前都指挥使以下，分别设置副都指挥使，以及都虞候，常有十人之多，他们侍从君侧，容易提升，又可以让士卒事先知道他们的威名，不论军事紧急与否，上级与下级之间已习惯于原来领导与服从的关系，这是军制的要旨。’皇上下旨遵从他的建议。”高琼这里所说的情况，正好与我前面所说的一致。

欧阳公勋封赠典

【原文】 吉州新刊《欧阳公文集》，于年谱下尽载官爵、制词，无一遗落。考之今制，多有不合。虽非事之所以损益，谩书于策，且记典章随时之异云。公自太子中允初加勋，便得骑都尉，越过骁、武、飞、云四级。自龙图阁直学士初封爵，便得信都县子，越过男一等。翰林学士加恩而得五百户，初加实封，便得二百户。及罢政，为观文学士，遇郊而加食邑五百户，实封二百户。薨之后，以子登朝，遇大礼，自太子太师合赠司空，而 赠太尉，盖超空、徒、保、傅四官。再赠即为太师，仍封国公。今殊不然，除勋官既罢外，侍从初封，亦从县男为始，每加不过三百户。（待制侍郎只二百）初得实封财百户。执政去位，

但与侍从同，均为虚邑三百而已。身后加赠，只单转一官，两子升朝，乃进二官，虽三四人亦不增，未有宫师直赠太尉者（今太傅也）。又公任知制诰、知颍州转官而与直龙图阁、知亳州王洙同一词。《唐书》成，进秩，五人同制。公与宋景文公、范文忠公、王忠简公皆带从官职，而宋次道乃集贤校理耳。

【译文】 吉州新刊印的《欧阳公文集》，在年谱之下详尽记载了官爵、制词，没有一项遗漏。核之今天的制度，多有所不合。虽然不关涉事情的所以减损或增益，随便写在书册，并且记一下典章制度的随时之不同。欧阳公从太子中允初加勋爵，便得到了骑都尉，越过了骁骑尉、武骑尉、飞骑尉、云骑尉四级。从龙图阁直学士初封爵，便得到了信都县子，越过了县男一等。翰林学士加恩而得五百户，初加的食邑实封，便得到了二百户。等到罢免执政，为观文殿学士，遇到了郊礼而加食邑五百户，实封为二百户。欧阳公去世之后，因为儿子入朝为官，遇到朝廷大礼，从太子太师应该赠官司空，而却一跃赠为太尉，越过了司空、司徒、太保、太傅四个官职。再赠官即为太师，依然封为国公。现今就不是这样，除了加封的勋官已罢免以外，侍从官的初封，也是从县男开始，每加封不超过三百户。（原注：待制、侍郎只二百户。）初得到的实封仅只一百户。执政官离位，只与侍从官相同，都是给虚名的食邑三百户而已。死后加赠，只单独转一官，两个儿子入朝为官，才进加两官，虽然有三个四个儿子入朝为官也不增加，未曾有从东宫太师直接赠官太尉的人。（原注：现今的太傅。）又欧阳公任知制诰、颍州知州，转官时与直龙图阁、亳州知州王洙同一个诰词。《唐书》修成，进升官秩，五个人同一个制词，欧阳公与宋景文公（祁）、范文忠公（镇）、王忠简公（畴）都带侍从官职，而宋次道（宋敏求）才是集贤校理而已。

嘉彞四真

【原文】 嘉彞中富韩公为宰相，欧阳公在翰林，包孝肃公为御史中丞，胡翼之侍讲在太学，皆极天下之望。一时士大夫相语曰：“富公真宰相，欧阳永叙真翰林学士，包老真中丞，胡公真先生。”遂有四真之目。欧阳公之子发、颢等，叙公事迹，载此语，可谓公言。

【译文】 宋仁宗嘉彞年间，富弼作宰相，欧阳修为翰林学士，包拯为御史中丞，胡翼之为太学侍讲，他们在当时都是德高望重的人物。当时士大夫们都称赞说：“富弼公真宰相，欧阳永叙公真翰林学士，包公真中丞，胡公真先生”。

于是就有了“四真”之名。欧阳修先生之子发和祜等，在叙其父事迹时，也记载了此语，可以说这是公正的评价。

五方老人祝圣寿

【原文】 圣节所用祝颂乐语，外方州县各当筵致语一篇，又有王母像者。若教坊，唯祝圣而已。欧阳公集，乃载《五方老人祝寿文》五首，其东方曰：“但某太山老叟、东海真仙，溜穿石而曾究始终，松避雨而备知岁月。羲氏定三百六日，尝守寅宾之官；夷吾纪七十二君，尽睹登封之事。遇安期而遗枣，笑方朔之偷桃。风入律而来自岩前，斗指春而光临洞口。昔汉武帝尝怀三岛之胜游，有羡门生欲谒巨公于昭代，今则紫庭降圣，华渚开祥，远离朝日之方，来展望云之愿。千八百国，咸归至治之风；亿万斯年，共祝祷无疆之寿。”其颂只四句，西中南北方皆然。集中不云何处所作，今无复用之。

【译文】 皇帝生日所用的颂词和音乐，一般来说，外地州县在庆祝宴会上要献颂词一篇，送上一幅王母娘娘的画像。至于太常寺下属掌音乐教育的教坊，只奉上祝颂乐就可以了。欧阳修先生的文集中，还记载了《五方老人祝寿文》五首，其中东方老人的祝寿文写道：“但某太山老叟、东海真仙，溜穿石而曾究始终，松避雨而备知岁月。羲氏定三百六日，尝守寅宾之官；夷吾纪七十二君，尽睹登封之事。遇安期而遗枣，笑方朔之偷桃。风入律而来自岩前，斗指春而光临洞口。昔汉武帝尝怀三岛之胜游，有羡门生欲谒巨公于昭代，今则紫庭降圣，华渚开祥，远离朝日之方，来展望云之愿。千八百国，咸归至治之风；亿万斯年，共祷无疆之寿。”其颂词只有四句，西中南北四方老人的祝词也都与它一样。文集中没有说明祝寿文是在什么地方作的。现在为皇帝祝寿也没有再用过这样的祝寿文。

卷 四

作诗旨意

【原文】 《诗》三百篇中，其誉妇人者至多：如叙宗姻之贵者，若“平王之孙，齐侯之子”，“汾王之甥，蹇父之子”，“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妹，谭公维私”；夸服饰之盛者，若“副笄六珈”，“如山如河”，“玉之琫也，象之竈也”；赞容色之美者，若“唐棣之华”，“华如桃李”，“李蹏发如云”，“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颜如舜华”，“洵美且都”；语嫁聘之侈者，若“百两彭彭，八鸾锵锵，不显其光，诸娣从之，祁祁如云，烂其盈门”其词可谓尽善矣。魏、晋、六朝，流连光景，不可胜述。唐人播之歌诗，固亦极摯。若“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翠微窝叶垂鬟唇，珠压腰窠稳称身”；“深宫高楼入紫清，金作蛟龙盘绣楹。佳人当窗弄白日，弦将手语弹鸣箏”；“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楼上楼前尽珠翠，眩转荧煌照天地”，此皆李、杜、元、白之丽句也。予独爱朱庆余《闺意》一绝句上张籍水部者，曰：“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细味此章，元不谈量女之容貌，而其华艳韶好、体态温柔、风流酝藉，非第一人不足当也。欧阳公所谓“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工”，斯之谓也。庆余名可久，以字行。登宝历进士第，而官不达。著录于《艺文志》者，只一卷，予家有之，他不逮此。张籍酬其篇云：“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是人间贵，一曲菱歌直万金”，其爱之重之，可见矣。然比之庆余，殊为不及。

【译文】 《诗经》的三百篇作品中，赞誉妇女的作品是很多的，如叙述王亲国戚身份高贵的“平王之孙，齐侯之子（正是周王的外孙女，齐侯的女儿）”、“汾王之甥，蹇父之子（周王的外甥女，蹇父的女儿）”、“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谭公维私（齐侯的女儿，卫侯的妻子，齐太子的妹妹，邢侯的姨姐妹，谭公是她的姐妹丈）”。又如夸赞衣服首饰漂亮的“副笄六珈（插

着簪子的假发上面装饰六件玉饰)”、“如山如河（举止如山河一样庄重）”、“玉之璫也，象之璫也（玉的充耳，象牙的梳子）”。如称赞面貌美丽的“唐棣之华（象唐棣的花朵）”、“华如桃李（鲜艳如桃李的花朵）”、“鬓发如云（乌黑的头发非常繁密）”、“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手如柔软的新生芳芽，皮肤如洁白的凝固的油脂，颈部如同蝤蛴虫一样既白而长，牙齿如同瓠中的子粒一样洁白整齐。前额宽润周正，眉毛细长。微微一笑时口部很美，美丽的眼睛黑白分明）”、“颜如舜华（颜色如舜木的花）”、“洵美且都（真是既美丽又娴熟妇人的礼仪）”。如描婚礼的豪华场面的“百两彭彭，八鸾锵锵，不显其光。诸娣从之，祁祁如云，烂其盈门（一百辆走起来轰轰鸣鸣，车上的鸾铃叮叮咚咚，显得多么光荣。夫人的妹妹们跟着走来，慢慢的、静静的像冉冉的云。满庭院都令人感到灿烂耀眼）”。这些词句真可谓好到家了。魏晋六朝时代，人们迷恋于享受美好时光，所写赞誉妇人的诗句，多到数不过来的程度。唐代这类描写见于诗歌的，确实非常真挚。如“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外形艳丽神情安详美好而真挚，肌肤细腻骨肉匀称。绣花的罗衣在三月的天气非常显眼，上面绣着金色的孔雀和银色的麒麟）”、“翠羽葳叶垂鬓唇，珠压腰褊稳称身（头上戴的翠绿羽毛和花叶垂到了鬓边上，缀满珠玉的后衣襟和体态非常协调）”、“深宫高楼入紫清，金作蛟龙盘绣楹。佳人当窗弄白日，弦将手语弹鸣箏（天上仙府的深宫高楼，绘画的廊柱上盘着金色的蛟龙。美人在窗口摆弄太阳，用手拨弄丝弦去弹箏）”、“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回首一笑便有百种柔媚的风情，宫中的所有美女都显得丑陋）”、“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后宫有无数的美女，但皇帝只宠爱杨玉环一个人）”、“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在豪华的宫室中化好了妆夜间娇媚地伺候皇帝，在豪华的楼阁中饭后唱醉了酒陪侍皇帝）”、“楼上楼前尽珠翠，眩转荧煌照天地（楼上楼前都是珍珠光翠羽影，光芒闪闪照耀天地）”等，都是李白、杜甫、元稹和白居易的漂亮诗句，我特别喜爱朱庆余与给水部张籍的一首绝句《闺意》，这首诗说：“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洞房中昨夜留下了红红的蜡烛，等待着天亮后到堂前去拜见公婆。化完了妆低声问自己的丈夫，我画的眉毛深浅符合时下的流行样式吗）？”仔细玩味这首，本来没有谈论这个女子的容貌，但是她的光华艳丽，青春美丽和体态温柔，风流含蓄，如果不是最佳美女就达不到这种水平。欧阳公（欧阳修）所说的：“把很难描写的景色写得如在眼前一样，在语言之外含有语言无法表达的意蕴，这样才叫做工力。”说的就是这样的诗句。庆余名叫可久，但是他的字却更被人所熟知。宝

历年间就中了进士，但是没有作大官。他的诗《艺文志》记载只有一卷，我家有这个本子，其它的本子都不如这个好。张籍的答诗说：“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是人间贵，一曲《菱歌》值万金（镜子中照出了一个新化好妆的越地女子，她知道自己漂亮而故意沉吟不语。齐地轻纱不是人间最贵重的物品，她唱的《菱歌》价值真如万两白银）。 ”他爱护朱庆余、器重朱庆余的心情，都可以从诗中看到。然而拿它和朱庆余诗的水平比，是差得很远的。

平王之孙

【原文】 《周南》、《召南》之诗，合为二十有五篇，自汉以来为之说者，必系之文、武、成、康，故不无抵牾。如《何彼蓁矣》，乃美王姬之诗，其辞有“平王之孙，齐侯之子”两句，翻覆再言之。毛公笺云：“武王女，文王孙，造齐侯之子”，郑氏不立说。考其意，盖以“平王”为“平正之王”，“齐侯”为“齐一之侯”，若所谓“武王载旆”、“成王之孚”、“成王不敢康”，非指武与成者。然证诸《春秋经》，鲁庄公元年，当周庄王之四年，齐襄公之五年，书曰：“单伯送王姬”，继之以“筑王姬之馆于外”，又继之以“王姬归于齐”。杜预注云：“王将嫁女于齐，命鲁为主，庄公在谅暗，虑齐侯当亲迎，不忍便以礼接于庙，故筑舍于外”。末书“归于齐者”，终此一事也。十一年又书“王姬归于齐”，传言“齐侯来逆共姬”，乃桓公也。庄王为平王之孙，则所嫁王姬当是姊妹，齐侯之子，即襄公、桓公也，二者必居一于此矣。明白如是，而以为武王女，文王孙，于义何取？

【译文】 《诗经》中的《周南》、《召南》两部分，总共有二十五篇。从汉代以来解说《诗经》的，大多数把它们放在文王、武王、成王和康王时代，所以处处抵牾不通。比如《召南》中的《何彼蓁矣》，这是赞美王姬的诗篇，其中有“平王之孙，齐侯之子”两句，反复出现。毛公笺注为：“武王的女儿，也就是文王的孙女，嫁给齐侯的儿子”，郑玄在这里没有注释。然而仔细推敲诗的原意，则是把“平王”作为“平正之王”、“齐侯”作为“齐一之侯”讲，就像其他地方所说的“武王载旆”，是指雄武的君王载着大旗，“成王之孚”是指“成就君王的美名”，“成王不敢康”是“有成就的君主不敢淫逸”的意思一样，不是指的周武王和周成王。从《春秋经》上看，鲁庄公元年（公元前609年），当时是周庄王四年，齐襄公五年，经文上说：“单伯送王姬出嫁”，接着记“（鲁国）在城外为王姬修筑了一座馆舍”，再下来记“王姬嫁到了齐国”。杜预注释

说：“周天子准备把女儿嫁给齐侯，命令鲁国主婚。鲁庄公正在守孝，担心齐侯亲自来迎接，不忍心在祖庙里以便礼来接待他，所以在城外为王姬修筑了一座馆舍”。最后记“王姬嫁到了齐国”，把这件事一直讲完。鲁庄公十一年（公元前683年）记载：“王姬嫁到了齐国”，《左传》记载“齐侯来迎接共姬”，这里的齐侯是指齐桓公。周庄王是周平王的孙子，那么所嫁的王姬应当是他的姊妹，“齐侯之子”就是齐襄公或齐桓公，肯定是他们中的一个人。这样明白的事情，而一定要说是武王的女儿，文王的女孙，这和诗的原意岂不相去太远了？

毛诗语助

【原文】 《毛诗》所用语助之字，以为句绝者，若“之”、“乎”、“焉”、“也”、“者”、“云”、“矣”、“尔”、“兮”、“哉”，至今作文者皆然。他如“只”、“且”、“忌”、“止”、“思”、“而”、“何”、“斯”、“旃”、“其”之类，后所罕用。“只”字，如“母也天只，不谅人只”；“且”字，如“椒聊且，远条且”，“狂童之狂也且”，“既亟只且”；“忌”字，如“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止”字，如“齐子归止”、“曷又怀止”、“女心伤止”；“思”字，如“不可求思”、“尔羊来思”、“今我来思”；“而”字，如“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尔”；“何”字，如“如此良人何”、“如此粲者何”；“斯”字，如“恩斯勤思，鬻子之闵斯”、“彼何人斯”；“旃”字，如“舍旃舍旃”；“其”字，音基，如“夜如何其”、“子曰何其”，皆是也。“忌”唯见于《郑诗》，“而”唯见于《齐诗》。《楚辞·大招》一篇全用“只”字。《太玄经》：“其人有辑杭，可与过其”。至于“些”字，独《招魂》用之耳。

【译文】 《毛诗》用在句末作语气助词的，像之、乎、焉、也、者、云、尔、兮、哉等，现在写文章还用。其他的像只、且、忌、止、思、而、何、斯、旃、其之类，后世就很少用了。“只”字，像“母也天只，不谅人只”（“妈呀天呀，不体谅人呵！”）；“且”字，如“椒聊且，远条且”（“花椒球呵，香气远悠悠呵”）、“狂童之狂也且”（“情郎你太张狂了”）、“既亟只且”（“你也太性急”）；“忌”字，像“叔善射忌，又良御忌”（“太叔神射，又善赶车”）；“止”字，像“齐子归止”（齐子归来）、“曷又怀止”（为什么又怀恋他）、“女心伤止”（女心伤悲）；“思”字，像“不可求思”、“尔羊来思”、“今我来思”；“而”字，像“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等待我在门间呦？充耳绵丸是素的呦”）；“何”字，像“如此良人何”（“这样的妙人呵”）、“如此粲者何”（这等的明艳

呵”);“斯”字,像“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恩情呵,勤恳呵,这个孩子太可怜了)、“彼何人斯”(“他是个什么人呵”);“旃”字,像“舍旃舍旃”(“抛弃它吧,抛弃它”);“其”字,读作“基”,像“夜如何其”、“子曰何其”。这些都是例句。“忌”字只见于《国风·郑风》中,“而”字只见于《国风·齐风》中。《楚词·大招》全篇都用“只”字作语气助词。《太玄经》有这样的话:“其人有车船,可以和他一起渡过吗?”至于“些”字,只有《招魂》篇才使用过它作语气词。

东坡文章不可学

【原文】 东坡作《盖公堂记》云:“始吾居乡,有病寒而窮者,问诸医,医以为虫,不治且杀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饮以虫药,攻伐其肾肠,烧灼其体肤,禁切其饮食之美者。期月而百疾作,内热恶寒而窮不已,垒然真虫者也。又求于医,医以为热,授之以寒药,旦朝吐之,莫夜下之,于是始不能食。惧而反之,则钟乳、鸟喙,杂然并进,而漂疽、痈疥、眩瞽之状,无所不至。三易医而病愈甚。里老父教之曰:‘是医之罪、药之过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气为主,食为辅。今子终日药不释口,臭味乱于外,而百毒战于内,劳其主,隔其辅,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谢医却药,而进所嗜,气全而食美矣。则夫药之良者,可以一饮而效’。从之,期月而病良已。昔之为国者亦然。吾观夫秦自孝公以来,至于始皇,立法更制,以镌磨锻炼其民,可谓极矣。萧何、曹参亲见其窳丧之祸,而收其民于百战之余,知其厌苦、憔悴、无聊,而不可与有为也,是以一切与之休息,而天下安”。是时,熙宁中,公在密州,为此说者,以讽王安石新法也。其议论病之三易,与秦汉之所以兴亡治乱,不过三百言而尽之。

张文潜作《药戒》,仅千言,云:“张子病痞,积于中者,伏而不能下,自外至者,捍而不能纳,从医而问之,曰:‘非下之不可’。归而饮其药,既饮而暴下。不终日,而向之伏者散而无余,向之捍者柔而不支。焦膈导达,呼吸开利,快然若未始有疾者。不数日,痞复作,投以故药,其快然也如初。自是逾月而痞五作五下,每下辄愈。然张子之气,一语而三引,体不劳而汗,股不步而襍,肤革无所耗于外,而其中窅然,莫知其所来。闻楚之南有良医焉,往而问之。医叹曰:‘子无叹是窅然者也。天下之理,其甚快于予心者,其末必有伤,求无伤于终者,则初无望于快吾心。痞横乎胸中,其累大矣。击而去之,不须

與而除甚大之累，和平之物不能为也。必将击搏振挠而后可，其功未成而和气已病。则子之痞，凡一快者，子之和一伤矣。不终月而快者五，则和平之气，不既索乎？且将去子之痞，而无害于和乎！子归，燕居三月，而后予之药可为也’。张子归三月而复请之。医曰：‘子之气少全矣’，取药而授之。曰：‘服之三月而疾少平，又三月而少康，终年而复常。且饮药不得亟进’。张子归而行其说。其初使人慙然迟之，盖三投其药而三反之也。然日不见其所攻，久较则月异而时不同，盖终岁而疾平。张子谒医谢，而问其故。医曰：‘是治国之说也。独不见秦之治民乎？敕之以命，捍而不听令；勤之以事，放而不畏法。令之不听，治之不变，则秦之民尝痞矣。商君见其痞也，厉以刑法，威以斩伐，痛竊而力锄之。流荡四达，无敢或拒，痞尝一快矣。至于二世，凡几痞而几快矣。积快而不已，而秦之四支枵然，徒有其物而已。民心日离，而君孤立于上，故匹夫大呼，不终日而百疾皆起，欲运其手足肩臂，而漠然不我应。故秦之亡者，是好为快者之过也。昔者先王之民，初亦尝痞矣。先王不敢求快于吾心，阴解其乱，而除去其滞，使之悠然自趋于平安而不自知。于是政成教达，悠久而无后患。则余之药终年而愈疾者，盖无足怪也。’”

予观文潜之说，尽祖苏公之绪论，而千言之烦，不若三百言之简也，故详书之，俾作文立说者知所矜式。窃料苏公之记，文潜必未之见，是以著此篇，若既见之，当不复屋下架屋也。

【译文】 苏东坡作《盖公堂记》，文章说：“以前我在乡下居住的时候，着了凉就咳嗽，去看医生，医生认为有虫，不治疗就会死亡。于是我拿出百金来治疗，喝了打虫药，攻伐肾肠，烧灼体肤，禁食一切美味佳肴。一个月以后各种疾病都发作了，忽冷忽热，咳嗽不已，疲惫不堪，像真有虫子一样。又请了一个医生，医生认为是内热，开了清热药，喝下之后一直吐了一天多，于是饭也吃不下去了。医生害怕了，反过来给开了钟乳、鸟喙等，喝下之后，疖子、疮疥、眩晕等症状，又都来了。三次换药而病得越来越厉害。乡里的老人对我说：‘这是医生的责任和吃药的过错。你有什么病？人生在世，以气为主，以食为辅。现在您一直药不离口，味觉破坏之后，各种病毒发作于体内，气受劳顿，食物被阻，所以真的就病了。您回头休息一下，不找医生，停止服药，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气顺饭也就香了，那时一剂药就见效’。我听他的话，一个月后病真的全好了。以前治理天下也是这个理儿。我看秦自孝公以来至于始皇，颁布法令，更改制度，百般地搔扰百姓，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极点。萧何、曹参亲眼目睹了秦暴政的祸害，他们在百战之后统治天下，知道人民的疾苦和困顿，知道不能再继续下去，于是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从此天下稳定。

当时是宋神宗熙宁中期，东坡先生在密州（今山东诸城一带），他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在于讽刺王安石的新法。议论三次换药及秦汉兴亡的原因，只不过短短的三百字就把理说透了。

张文潜作过一篇千余字的《药戒》，文章说：“张文潜胸中郁闷，气积于中而下不去，从外吸的气，好象有东西的郁结进不来，于是他找到了医生，医生说：“必须把气顺下去”。文潜回来服了他开的药，一喝气就猛地下去了，以前郁结的气全部散尽，以前的郁结现在也变得十分柔和。焦膈通达，呼吸顺利，畅快得就像不曾有病一样。可是过了没几天，气闷又发作了，服了以前服过的药，也像以前一样畅快。从这以后一个多月中病发作了五次，每次用药之后气也就顺了。然而文潜的气却渐渐跟不上来，说一句话要停顿两三次，经常流虚汗，腿不动就发抖，并没有什么劳作消耗，内中却日见虚弱疲劳，不知道其中的缘故。听说南方有一位名医，于是文潜去拜访他。这位名医叹惜道：“你不要感叹这样疲乏无力。天下的事情都是一个理儿：那些一时畅快的东西，最后必然带来伤害；要想最终不受伤害，当初就不要图一时的快活。郁气横于胸中，它的危害性可大啦。要想把它赶走，不花费一定的时日就想成功，平和的东西是不行的，一定要搏击震挠而后可，那么，目的没有达到而和气已受了损伤。这样说来，你的病就在于图一时的痛快。痛快一次，你的和气受了一次损伤；不满一月你痛快五次，那么平和之气不就损耗完了吗？而且要去掉你的气闷，能不伤害和气吗？你回去将息三个月，然后我的药就可以用了’。文潜回来三个月后又去了名医那里。名医说：‘你的气比以前稍微全了些’，取一些药交给文潜，并交待说：‘服用三个月而病缓解，再服三个月身体开始恢复健康，一年后就完全正常了。而且不要喝得太快’。文潜回来后按医嘱行事。刚开始喝的时候使人郁闷气短，反复喝而效果也有反复。终日不见病去，但时间一长就见到了效果，一年后病也就完全好了。文潜到医生那里致谢，并询问治病的道理。医生说：‘这和治理国家的道理是一样的。你没看到秦国是怎样治理它的百姓吗？颁布命令，人民抗法不遵；不断征发，人民放肆而不畏法。人民不服从法令，不管怎样治理都是徒劳，说明秦国的民情已经有些郁结了。商鞅发现了郁结，用刑法进行迫吓，用斩杀进行威胁，痛加铲除。人民四处流荡而没有人敢于抗拒，秦国的郁结病症得到了一次痛快的渲泻。一直到秦二世，秦国几次郁结而几次渲泄。不停地图痛快，而秦王朝的四肢却已经麻木不仁了。民心日益离散，君主孤立于上。所以匹夫陈胜一声大呼，一天之内秦王朝的各种疾病一起发作，想运动一下手足肩臂，它们却木然没有反应。所以秦的灭亡，就是图一时痛快的恶果。过去先王治理百姓，开始时民情也有郁结，先王不敢图一时的痛快，暗地里缓解其纷

乱，除去其郁滞，让他们慢慢地在不知不觉中走向平安，于是政令完成而人民被教化，时间虽慢却没有后患。这样说来，我的药一年后才见效就不足为怪了’”。

我看张文潜的说法，也可以说是苏东坡先生的续论，一千多字的内容却赶不上短短的三百余字丰富。所以我把它们原原本本地抄在这里，让著书立说的人有所参考，我猜想张文潜一定没有看到东坡先生的文章，所以才写了这篇东西；如果他见了，就不应该再去重复了。

韩文称名

【原文】 欧阳公作文，多自称“予”，虽说君上处亦然，《三笔》尝论之矣。欧公取法于韩公，而韩不然。《滕王阁记》、《袁公先庙》为尊者所作，谦而称名，宜也。至于《徐泗掌书记》、《壁记》、《科斗书后记》、《李虚中墓志》之类，皆曰“愈”，可见其谦以下人。后之为文者所应取法也。

【译文】 欧阳公（欧阳修）撰写文章，文中大多自称为予，虽然说到君王处也如此，《容斋三笔》曾经论述过此事。欧阳公撰文取法于韩公（韩愈），然而韩公不在文中称予。《滕王阁记》、《袁公先庙》是为尊者所作，谦恭地称名，是合适的。至于《徐泗掌书记壁记》、《科斗书后记》、《李虚中墓志》之类的文章，都称“愈”，可见韩公谦逊而不傲人。这是以后的作文章的人应该取法的。

棘寺棘卿

【原文】 今人称大理为棘寺，卿为棘卿，丞为棘丞，此出《周礼·秋官》：“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郑氏注云：“植棘以为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也。棘与枣同”。“棘”之字，两竇相并，枣之字，两竇相承，此所言者，今之枣也。然孤、卿、大夫皆同之，则难以独指大理。《王制》云：“正以狱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听之棘木之下”。料后人藉此而言。《郑注》亦只引前说，此但谓其入朝立治之处，若以指刑部尚书亦可也。《易·坎卦》：“系用徽纆，置于丛棘”，以居险阻囚执为词，其义自别。

【译文】 现在人们称呼大理寺为“棘寺”，大理寺卿为“棘卿”，大理寺丞

为“棘丞”，这种叫法来源于《周礼·秋官》篇。这里记载：“朝士掌管建邦外朝的法令。左边植上九棵棘刺，代表孤、卿和大夫的位置；右边栽上九棵棘刺，代表着公、侯、伯、子、男的位置”。郑玄注：“栽棘代表位置，因为它心红而外边长刺。棘与枣是同一个字：‘棘’，从字形上看为两‘束’并立，‘枣’字则为两‘束’相承（繁体字枣作束——译者），这里所说的‘棘’就是今天的‘枣树’。然而孤、卿、大夫相同，那就难说独指大理。《礼记·王制》说：“正把审理的结果提交给大司寇，大司寇在棘木之下重新审理”，后人可能就是根据这则材料说的。郑玄注也只引前说，这里只说他入朝办公的地方，如果指刑部尚书也可以讲通。《周易·坎卦》说“用徽绳捆起来，放到棘丛中”，说的是居于险阻之地囚禁起来，这是另外一种意思。

晋代遗文

【原文】 故箧中得旧书一帙，题为《晋代名臣文集》，凡十四家，所载多不能全，真太山一毫芒耳。有张敏者，太原人，仕历平南参军、太子舍人、济北长史。其一篇曰《头责子羽文》，极为尖新，古来文士皆无此作。恐《艺文类聚》、《文苑英华》或有之，惜其泯没不传，漫采之以遗博雅君子。其序云：“太原温长仁、颍川荀景伯、范阳张茂先、士卿刘文生、南阳邹润甫、河南郑思渊。余友有秦生者，虽有姊夫之尊，少而狎之，同时昵好。张、荀之徒，数年之中，继踵登朝，而此贤身处陋巷，屡沽而无善价，抗志自若，终不衰堕，为之慨然。又怪诸贤既已在位，曾无伐木嘤鸣之声，又违王、贡弹冠之义，故因秦生容貌之盛，为头责之文以戏之，并以嘲六子焉。虽似谐谑，实有兴也”。文曰：维太始元年，头责子羽曰：“吾托为子头，万有余日矣。大块稟我以精，造我以形。我为子时发肤，置鼻耳，安眉额，插牙齿。眸子桥光，双权隆起。每至出入人间，遨游市里，行者辟易，坐者竦跽；或称君侯，或言将军，捧手倾侧，伫立冀觴，如此者，故我形之足伟也。子冠冕弗戴，金银弗佩，艾以当笄，窻以代带，百味弗尝，食粟茹菜，岁暮年过，曾不自悔。子厌我形容，我贱子意态。若此者，必子行已累也。子遇我如讎，我视子如仇。居常不乐，两者俱忧，何其鄙也。子欲为仁贤耶？则当如咎陶、后稷、巫咸、伊陟、保 王家，永见封殖。子欲为名高耶？则当如许由、子臧、卞随、务光，洗耳逃禄，千载流芳。子欲为游说耶？则当如陈轸、蒯通、陆生、邓公，转祸为福，含辞从容。子欲为进趋耶？则当如贾生之求试，终军之请使，砥励锋颖，以干王事。子欲为恬淡耶？

则当如老聃之守一，庄周之自逸，漠然离俗，志凌云日。子欲为隐遁耶？则当如荣期之带索，渔父之寤窥，栖迟神岳，垂饵巨壑。此一介之人，所以显身成名者也。今子上不道德，中不效儒、墨，块然穷贱，守此愚惑。察子之情，观子之志，退不为处士，进无望三事，而徒玩日劳形，习为常人之所喜，不亦过乎？子羽愀然深念而对曰：“凡所教敕，谨闻命矣。受性拘系，不闻礼义，误以天幸，为子所寄。今子欲使吾为忠耶？当如包胥、屈平；欲使吾为信耶？则当杀身以成名；欲使吾为节耶？则当赴水火以全贞。此四者，人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头曰：“子所谓天刑地网，刚德之尤。不登山抱木，则褰裳赴流。吾欲告尔以养性，诲尔以优游。而与虬虱同情，不听我谋，悲哉！俱御人体，而独为子头。且拟人其伦，喻子侪偶，曾不如太原温叟、颖川荀禹、范阳张华、士卿刘许、南阳邹湛、河南郑诩。此数子者，或蹇吃无宫商；或綦陋希言语；或淹伊多姿态，或呻呶少智惠；或口如含胶饴；或头如巾齏杵。而犹以文采可观，意思详序，攀龙附凤，并登天府。夫舐痔得车，沉渊窃珠，岂若夫子，徒令唇舌腐烂，手足沾濡哉？居有事之世，而耻为权谋，譬犹凿地抱瓮，难以求富。嗟呼子羽！何异牢檻之熊，沉阱之虎，石间饿蟹，灶中之鼠！事虽多，而见工甚少，宜其卷局煎蹙，至老无所也。支离其形者，尤能不困。命也夫，与子同处！其文九百余言，颇有东方朔《客难》、刘孝标《绝交论》之体。《集仙传》所载神女《成公智琼传》，见于《太平广记》，盖敏之作也。邹湛姓名，因羊叔子而传，而字曰“润甫”，则见于此。

【译文】 从旧的竹筐中得到了一帙旧书，题为《晋代名臣文集》，共有十四家，所载文章大多不能全面，真是泰山的一毫一芒罢了。有一位叫张敏的人，太原人士，历官平南参军、太子舍人、济北长史。他有一篇文章叫《头责子羽文》，极为尖刻新颖，从古以来的文人学士都没有这样的作品，恐怕《艺文类聚》、《文苑英华》中或许也有，可惜它泯没不流传，我详细地采录以送给博雅君子。（按《世说新语·排调》注，全录此文，文字稍有出入。）这篇文章的序说：“太原的温长仁，颖川的荀景伯，范阳的张茂先和士卿刘文生，南阳的邹润甫，河南的郑思渊，我的朋友还有个叫秦生的，虽然是姐夫理应尊崇，但从小在一起戏耍，同时都亲昵友好。张、荀之辈，几年之中，相继入朝为官，而这位贤才却身居陋巷，屡次想出仕而没有合适的位置，高洁自如，始终未衰退堕落，为他激愤感叹！又怪罪诸位贤才既已为官在位，却没有《伐木》诗中所称的求友之声，又不合‘王阳在位贡公弹冠’的大义，所以借秦生容貌的盛状，作头颅谴责他的文字以戏谑他，同时也嘲讽一下六位君子。虽然好像似以文字相戏弄，其实是有感而发的。”文章写道：“泰始元年（265年），头颅谴责秦子羽

说：‘我托为您的头颅，有一万多天了。天地赋我的精神，造我以形貌。我为您栽种头发皮肤，设置鼻子耳朵，安排眉眼额头，插栽牙齿，眼中瞳孔放着强劲的光，两边颧骨高高隆起。每每出入于人群之间，闲游于街市里巷，令行人退避，令坐着的人恭敬地跪下。有人称您为君侯，有人说您是将军，捧着手倾佩不安，久久站立倾侧张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的形状十分雄壮伟岸。您不戴礼帽，不佩带金银装饰，您用艾权当金簪，您用丝绳代替衣带，您各种滋味都不品尝，只吃粗饭和蔬菜，岁月迟暮年华已过，从来没有自己懊悔。您讨厌我的容颜，我轻贱您的意态。像这种情况，一定是您的行为所牵累的。您对待我像仇敌，我看到您像敌仇。平居常常不高兴，咱们双方都相互忧虑。何其鄙陋啊！您打算为仁人贤人吗？则应当像陶、后稷、巫咸、伊陟一样，保卫王家，永远被封爵封地。您打算取清高的大名吗？则应当像许由、子臧、卞随、务光一样，洗净耳朵逃避仕禄，可以千载流芳。您打算作游说的说客吗？则应当像陈轸、蒯通、陆贾、邓公一样，转祸害为福泽，含味辞章从容谈吐。您打算奋力向上吗？则应当像贾谊的请求试用，终军的请求出使，磋磨笔锋，以干办帝王之事，您打算安闲淡薄名利吗？则应当像老聃那样守着“一”，像庄周那样自我安乐，漫不经心地远离尘俗，壮志凌云。您打算作隐遁之士吗？则应当像荣启期腰围绳索，像渔父的出没水中，游息于大山，垂钓于巨川。这就是一个人，所以能够显耀自身而成就大名的啊。现在您上不羡慕道德，中不效法儒、墨二家，孤独地穷困低贱，守着这个愚昧的烦恼。探察您的情怀，观看您的志向，退隐不想做处士，进取不望位至三公。而白白地玩忽日月劳苦身体，所习为普通人所喜欢，不是过错吗？’秦子羽不高兴地深思之后回答说：‘凡所教诲戒敕，恭敬地听到了。天性的拘束，没有听闻过礼义，错误地以为天赋的幸运，为您所寄居。现在您打算使我为忠臣吗？就应当像申包胥、屈原那样。打算使我为信臣吗？则应当杀身以成就名声。打算使我为节臣吗？则应当赴汤蹈火以成全贞洁。这四种情况，都是人们所忌讳的，所以我不敢首倡这个意思。’头颅说：‘您所说的是天的法则地的网罗，是刚强之德的极端。不扶持着树木登山，就掀起衣裳涉水。我想告诉您以修身养性，教导您以闲适自得。而您与虻虱辈同一情怀，不听我的谋划。可悲呀！都驾驭人的身体，而独为您的头颅！况且比人必要比其同类，譬如您的同辈，您连太原的温癭，颍川的荀禹，范阳的张华、士卿刘许，南阳的郡谿，河南的郑诩都不如。这几个人，有的人说话结结巴巴没有音调，有的人瘦弱丑陋不善言辞，有的人浸沉在他的造作多姿态，有的人大声喧叫而缺乏才智，有的人嘴中好像含有胶质穀糖，有的人头上好像裹着个捣物的棒槌，然而仍然以他们的文采可观，意思详密有序，跟从英明的君主建功

立业，一并入朝为官，舐秦王痔瘡的人可得五辆车，沉入深渊之底可以窃得明珠，哪有像您这位夫子，白白地让嘴唇舌头腐烂，白白地让手脚沾湿啊？居于多事的当世，而耻于为权谄的计谋，这就好像凿地为井抱着水罐取水灌田一样，是难以致富的。嗟乎秦子羽！您与牢宠中的熊，深阱中的虎，石缝间的饿蟹，灶台中的老鼠有什么区别！您的事情虽多，而见工巧的很少，这就理应终生煎迫，到老也无所羡慕。分散于您的形体的，仍能不困惑，这是命啊，与您同处一体！’”这篇文章九百多字，很富有东方朔《客难》、刘孝标《绝交论》的体式韵味。《集仙传》所载录的神女《咸公智琼传》，见于《太平广记》，就是张敏所作。邹湛的姓名，因为羊叔子而流传，而他字润甫，则见于这里。

汉武帝 田蠡 公孙弘

【原文】 尚论古人者，如汉史所书，于武帝则讥其好大喜功，穷奢极侈，置生民于涂炭；于田蠡则诋其负贵骄溢，以肺腑为相，杀窦婴、灌夫；于公孙弘则云：“性忌忌，外宽内深，饰诈钓名，不为贤大夫所称述”。然以予考之，三君臣者，实有大功于名教。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六学散缺，高帝初兴，未遑庠序之事，孝惠高后时，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好刑名，孝景不任儒。至于武帝，田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帝详延天下多闻之士，咸登诸朝，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天下学士靡然向风乡。弘为学官，悼道之郁滞，始请为博士官置弟子，郡国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请著为令。而《诗》、《书》、《易》、《礼》之学，彬彬并兴，使唐、虞、三代以来稽古礼文之事，得以不废。今之所以识圣人至道之要者，实本于此。史称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号令文章，焕焉可述”，盖已不能尽其美。然则武帝奢暴，固贻患于一时；蠡、弘之为人，得罪于公论，而所以扶持圣教者，乃万世之功也。平帝元始诏书，尚能称弘之率下笃俗，但不及此云。

【译文】 人们议论古人，如汉史所撰述的，对于汉武帝就讥讽他好大喜功，穷奢极侈，置平民百姓于灾难困苦之中。对于田蠡就诋毁他恃仗尊贵而骄横，以武帝近亲为丞相，杀窦婴和灌夫。对于公孙弘则说：“性很猜忌，表面宽厚，而内心多忌害，矫饰行诈以沽取名声，不被贤大夫们称颂。”然而按我们考辨的史实，这君臣三人，确实对礼教有大功。自从秦始皇焚书坑儒，《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散亡缺失，汉高祖初建汉朝，没有馀暇顾及学校的事，

孝惠帝、吕后的时候，三公六卿都是以武力封官的功臣，孝文帝喜好刑名之学，孝景帝不信任儒生。到了武帝朝，以田蚡为丞相，废黜黄老、刑名等百家之说，延用的文学儒生有上百人之多。武帝全力地延用天下有道博闻的士人，都登进于朝廷，让掌礼仪的官员劝勉勤于学习，讲解议论知识丰富广博见闻，举遗逸的文章而振兴礼学，以此为天下之先务。而公孙弘因学《春秋》为丞相，天下学士相随归化。公孙弘任学官，伤感儒家学说的阻滞，开始请求朝廷为博士官下设博士弟子，郡国有秀逸之才不同一般者，就以其姓名上奏于朝廷。请求将此写成法令。而《诗》、《书》、《易》、《礼》的学说，文质兼备地一同兴盛，使唐尧、虞舜及夏、商、周三代以来稽考古道礼节仪式的事，能够不废弃。现在之所以知道圣人至高学说的要领，其实根据就在于此。史家称此“罢黜百家，显扬《六经》，发布文章，光彩地可以称述。”大概这已不能尽显其优美。如此看来，汉武帝过分使用暴力，固然给一个时期带来灾难。田蚡、公孙弘的为人，得罪了公众舆论，然而他们所扶持圣贤名教的事，则是万代的功绩。平帝元始年间发诏，还能称赞公孙弘统领百姓致力于民俗，但是没有言及此事。

近世文物之殊

【原文】 国家南渡以来，典章文物，多不与承平类。姑以予所亲见者言之，盖月异而岁不同，今聊纪从官立班随驾、省试官入院、政府呼召、百官随从、朝报简削数项，以示子侄。

侍从常朝，绍兴中分立于垂拱殿隔门上，南北相向，以俟追班。乾道中犹然。暨淳熙，则引于殿门上，东西对立。车驾出，常朝文臣自宰相至二史，武臣自宗王、使相至观察使，以杂压次序行焉。孝宗在普安邸，官检校少保节度使，每出必处正尚书之后。而乾道以来，两班分而为二，唯使相不然。故开府仪同三司皆与执政官联行，而居其上。

绍兴十二年壬戌，予寓南山净慈，待词科试，见省试官联骑，公服戴帽，不加披衫。每一员以亲事官一人执敕黄行前。是时，知举、参详、点检官，合三十一员，最后一中官宣押者，入下天竺贡院。及三十年庚辰，予以吏部郎充参详官，既入内受敕，则各各乘马，不同时而赴院。至淳熙十四年丁未，忝司贡举，则了与昔异。三三两两，自为迟速，其乘轿者十人而九矣。

宰府呼召之礼，始时庶僚皆然，已而卿、监、郎官及史局、玉牒所缘提举官属之故，一切得免。逮乾道以后，宰相益自卑，于是馆职亦免。迄于淳熙，则

凡职事官悉罢此制。

朝士驺从，至少各得雇募若干，取步军司名籍，而帮钱米于左藏，率就雇游手、冗卒，两分可供一名。如假借于近郡者，给其半。初犹破省，马并一馭者，后不复有焉。若乘轿，仅能充负荷而已。今日以益增，虽下列亦各占十余辈。

进奏院报状，必载外郡谢上或监司到任表，与夫庆贺表章一篇，凡朝廷除郡守，先则除目，但云：“某人差知某州，替某人”，及录黄下吏部，则前衔后拟云：“某官姓名宜差知（或权知、权发遣）、某州、军州兼管内劝农营田事，替某人。到任成资阙（或云年满），仍借紫借绯，候回日却依旧服色”。外官求休致，则云：“某州申某官姓名，为病乞致仕”，或两人三人，后云：“某时已降敕，命各守本官致仕。”今不复行，但小报批下。或禁小报，则无由可知。此必一宰相以死为讳者，故去之。外官表章闻，有一二欲士大夫见之者，须以属东省乃可。郡守更不报细衔。礼文简脱，一致于此。

【译文】南宋王朝建立以来，其典章制度与北宋时代有许多地方不大相同。这里只就我所见到的谈一谈。由于在不同的时代各项制度都有变化，这里只记从官立班随驾、省试官入院、宰相府呼召、百官驺从、朝报简削几项，以便让子侄辈明白。

侍从官平时上朝，高宗绍兴中年是分立在垂拱殿隔门外，南北两队面对面，以等待追班的到来。孝宗乾道中也是这样。到淳熙年间，就站到了垂拱殿门前，东西对站。皇上出来，文官从宰相到二史，武官从宗王、使相到观察使，以官阶排列次序前进。孝宗在普安邸的时候，检校少保、节度使等官，出行必随正尚书之后，而乾道年间以来，两班分开进见，只有使相不是这样，故开府仪同三司与各执政官并行，位居其上。

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年），我临时住在南山净慈，等待考试，看到省试官骑马并行，公服戴帽，不加披衫；每一员省试官面前都有一位亲事官执着敕黄在前引导。当时，知举官、参详官和点校官，共有三十一人，最后由一位宦官宣押，进入下天竺贡院。到绍兴三十年（1160年），我以吏部侍郎的身份担任参详官，进朝接受了高宗的敕令后，就分头乘马，进了贡院，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我担任主管贡举的官职，情形与过去已完全不一样了。三三两两，有快有慢，考官中大多数人都是乘轿进去。

宰相府呼召的制度，开始时群僚是一样的，不久，卿、监、郎官及史局、玉牒所沿提举官属的旧例，全部免除。到乾道年间后，宰相更加谦卑，于是各馆职官也都免除。到淳熙年间，所有职事官都废除了这项制度。

朝士随员，各自可以雇佣若干人，占步军司的名额，帮一些钱米给左藏，一般雇佣游手、冗卒，两分可供一名。如果从近郡假借，供给一半的费用。开始的时候他们还知节省，马仅一匹，后来就不再这样。如果乘轿，随员仅够扛扛挑挑之用。现在却大大增加了，即使官阶很低的人也有随员十儿人。

进奏院报状，一定要写明外郡谢上或监司到任表，以及一篇庆贺表章。凡是朝廷任命郡守，必先列明要目，只写明：“某人差知某州，替换某人”；到录黄下到吏部后，写的时候前边是官衔，后面是拟派的工作：“某官姓名，应该委任（即差知）（或权知、权发遣）某州、军州兼管州内农业生产事务，替下前任某人。任期过后，或说限满仍享受原来的服饰待遇，回朝时则依照原来的品位着装”。外官请求退休，应该这样写：“某州报告某官，因为生病而乞求退休”，或者两三人后面则写上：“某时已经降下敕令，命各守、本官退休”。现在这种制度已不再施行，只要小报批下来就行了。有时禁止小报，则无法知道皇上是不是同意。这当然是因为一位宰相以死为讳，所以去掉了这种制度。外官表章报上来，有些内容要想让士大夫知道，则要交给东省后才行。郡守不用详细禀报官衔的全称。制度简单到这种程度。

卷五

庾公之斯

【原文】 《孟子》：“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为愈己，于是杀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仪曰：‘宜若无罪焉’。曰：‘薄乎云尔，恶得无罪’？”此一段既毕，而继之曰：“郑人使子濯孺子侵卫，卫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吾死矣夫，’问其仆曰：‘追我者谁也’？其仆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仆曰：‘庾公之斯，卫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谓也’？曰：‘庾公之斯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于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也’。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为不执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曰：‘小人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于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虽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废’。抽矢，扣轮，去其金，发乘矢而后反”。《孟子》书子濯、庾公一段，几二百字，其旨以谓使羿如子濯，得尹公而教之，则必无逢蒙之祸。然前段结尾，自澄为文者处之，必云如子濯孺子施教于尹公之他则可，不然，后段之末，必当云：以是事观之，羿之不善取友，至于杀身，其失如此，然后文体相属。兹判为两节，若不关联，而宫商相宣，律吕明焕，立言之妙，是岂步趋模仿所能仿佛哉？人为儿童时，便读此章，未必深识其趣，故因表出而极论之。《左氏传》书卫献公奔齐云：“尹公他学射于庾公差，庾公差学射于公孙丁。他与差为孙林父追公，公孙丁御公。庾公差曰：‘射为背师，不射为戮，射为礼乎’！射两窠而还。尹公他曰：“‘子为师，我则远矣’。乃反之。公孙丁授公辔而射之。贯他臂”。即《孟子》所引者，而名字、先后、美恶皆不同。

【译文】 《孟子》说：“逢蒙向羿学习射箭，在完全掌握了羿的技术以后，认为天下只有羿的射技超过自己，于是就杀死了羿。孟子问：‘这件事羿也有错误。’公明仪说：‘应该好像是没有错误罢。’孟子说：‘你说的太轻松了，羿怎么能算没有错误？’”这一段写完之后，却接着又说：“郑国派子濯孺子侵入卫国，卫国派庾公之斯去追赶他。子濯孺子说：‘今天我的疾病发作，不能够拉弓，我死定了！’于是问他的仆人：‘追我的是谁？’他的仆人说：‘是庾公之斯。’子濯

孺子说：‘我得救了。’他的仆人说：‘庾公之斯是卫国最好的射手。您说得救了，是指的什么哪？’子濯孺子说：‘庾公之斯是从尹公之他那里学的射法，尹公之他是从我这里学的射法。尹公之他是个正直的人。他选择的朋友也必然是正直的人。’庾公之斯追到了，问：‘您为什么不拉弓？’子濯孺子说：‘今天我的疾病发作，不能够拉弓。’庾公之斯说：‘小人是向尹公之他学的射法，尹公之他是向您学的射法，我不忍用您的技艺反过来杀害您。然而今天的事是君王的大事，不敢不完成任务。’于是抽出箭，在车轮上磕掉了箭头，连射四箭然后掉头回去了。”《孟子》中叙述子濯和庾公的一段，近二百字，它的意思是让后羿像子濯一样，得到像尹公那样的好人才教，这样就不会有逢蒙的祸害。然而在前段结尾处，如果是一般人写文章，一定要说像子濯孺子教尹公之他那样才行，不这样写的话，则要在后段的末尾处加上这样一句话：这样看来，后羿交友不当，以致招来杀身之祸，他的过失就在这里。这样全文上下才能贯穿起来。这里分为两节，好象没有关联，然而却相辅相承，紧密联系的，孟子立论的巧妙，是那些亦步亦趋的人怎能模仿得了的？每个人从小都读《孟子》中的这一章，然而却未必都能够明了它的内部联系，所以把它列出来详细探讨。《左传》对卫献公出逃于齐是这样记载的：“尹公他学射于庾公差，庾公差学射于公孙丁。尹公他和庾公差替孙林父追赶卫献公，公孙丁为献公赶车，庾公差说：‘向他射击就背叛了老师，不射回去就要被处死，依照礼义射两箭吧！’于是向两个轮子射击后就回来了。尹公他说：‘公孙丁是你的老师，和我就隔得远了’，乃掉过头来准备射击。公孙丁把车缰绳交给献公，向尹公他射击，箭穿透了尹公他的手臂”。这就是《孟子》那段话的出处，只是名字、次序以及各人的美恶都不相同。

万事不可过

【原文】 天下万事不可过，岂特此也？虽造化阴阳亦然。雨泽所以膏润四海，然过则为霖淫；阳舒所以发育万物，然过则为燠亢。赏以劝善，过则为僭；刑以惩恶，过则为滥。仁之过，则为兼爱无父，义之过，则为为我无君。执礼之过，反邻于谄；尚信之过，至于证父。是皆偏而不举之弊，所谓过犹不及者。扬子《法言》云：“周公以来，未有汉公之懿也，勤劳则过于阿衡”，盖谄王莽也。后之议者，谓阿衡之事不可过也，过则反，乃诮莽耳。其旨意固然。

【译文】 天下所有的事情都不可过分，难道只有人事是这样吗？实际上即使阴阳造化也是这样。下雨是为了滋润四海，如果雨水太多就会酿成水灾；阳

气上升是用来培育万物的，如果过分就会形成干旱。奖赏是对善行的鼓励，过分就是僭越；惩罚是为了杜绝恶行，过分就是枉滥；过于仁慈，就会像墨家那样兼爱别人而忘掉自己的父亲；过分行义，就会像道家那样自私不要君主。过于拘礼，就好像是在向邻居献媚；太讲信守，最会揭发自己父亲的犯罪。这些都是偏执的行为，就像平常所说的那样，过分和不够效果是一样的。扬雄的《法言》说：“从周公以来，还没有人的德行像安汉公（王莽）那样美好，而其勤劳则超过了阿衡伊尹”，这是向王莽献媚的；后人议论说，阿衡的功德是没法超过的，超过就走向了反面，这是讥讽王莽的。本来要旨就是这样。

致仕官上寿

【原文】 国朝大臣及侍从致仕后，多居京师。熙宁中，范蜀公自翰林学士以本官户部侍郎致仕，同天节乞随班上寿，许之。遂著为令。元璽初，韩康公以故相判大名府，还都，拜司空致仕，值太皇太后受册礼毕，乞随班称贺，降诏免赴。皆故事也。

【译文】 本朝大臣及侍从官退休后，大多数住在京城。神宗熙宁年间，范蜀公从翰林学士的位置上以户部侍郎的身份退休，同天节的时候请求随着朝官上寿，神宗答应了，于是著为诏令。哲宗元祐初年，韩康公以原相身份分判大名府，回到京都，拜为司空而退休，正当太皇太后受册，大礼完了之后，他请求跟随朝官前去祝贺，太皇太后下诏免了。这些都是本朝有先例而形成的一项制度。

桃花笑春风

【原文】 王荆公集《古胡笳词》，一章云：“欲问平安无使来，桃花依旧笑春风”。后章云：“春风似旧花仍笑，人生岂得长年少”？二者贴合，如出一手，每叹其精工。其上句盖用崔护诗，后一句久不见其所出。近读范文正公《灵岩寺》一篇云：“春风似旧花犹笑”，以“仍”为“犹”，乃此也。李义山又有绝句云：“无赖夭桃面，平明露井东。春风为开了，却拟笑春风。”语意两极其妙。

【译文】 王荆公（王安石）集古人句作《胡笳词》第一章说：“欲问平安无使来，桃花依旧笑春风”（想问候他平安与否却没有使者来到，桃花却像旧时

一样在春风中微笑)。后一章说：“春风似旧花仍笑，人生岂得长年少”（春风如旧日一样花还是微笑，但人生哪能长久年轻？）两段话贴切符合，好像出于一人之手，我常常叹服他的精妙工致。这里上一句是用崔护诗，后一句长期不知它的出处。近来读范文正公（范仲淹）《灵岩寺》一篇说：“春风似旧花犹笑。”用“仍”字代替“犹”字，就是这句。李义山（李商隐）又有绝句说：“无赖天桃面，平明霜井东。春风为开了，却拟笑春风”（无端见到妖艳桃花的脸，那是天刚亮在霜井之东。春风使桃花为之开放，即比之为在春风中微笑）。语意在比拟和形容方面都极尽其妙。

严先生祠堂记

【原文】 范文公正守桐庐，始于钓台建严先生祠堂，自为《记》，用《屯》之初九，《蛊》之上九，极论汉光武之大，先生之高，财二百字。其歌词云：“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长”。既成，以示南丰李泰伯。泰伯读之，三叹味不已，起而言曰：“公之文一出，必将名世，某妄意辄易一字，以成盛美”。公瞿然握手扣之。答曰：“云山江水之语，于义甚大，于词甚溥，而德字承之，乃似巽巽，拟换作‘风’字，如何”？公凝坐颌首，殆欲下拜。

张伯玉守河阳，作《六经阁记》，先托游士及在职者各为之，凡七八本，既毕，并会于府，伯玉一一阅之，取纸书十四字，遍示客曰：“六经阁，诸子、史、集在焉，不书，尊经也”。时曾子固亦预坐，惊起摘伏。迈顷闻此二事于张子韶，不能追忆经阁所在及其文竟就于谁手，后之君子，当有知之者矣。

【译文】 范仲淹先生作桐庐（今浙江杭州市西南）县令时，在钓台建造严光先生祠堂，并作了一篇《严先生祠堂记》，用《屯卦》的初九爻辞和《蛊》的上九爻辞，充分论述了光武帝的胸怀博大和严光先生的节操高洁，全文只有二百余字。文末的歌词为：“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长”。文章写成后，他拿给南丰李泰伯看。泰伯读了以后赞叹不已，接下来便说：“这篇文章公开后一定要闻名于世，我冒昧地给您改一个字使之更加完美”。范仲淹惊奇地握住他的手，请他快说。李泰伯回答说：“云山江水一句，意义博大，蕴含丰富，下面紧接一“德”字，似乎显得窄了点，我准备换作“风”字，您认为怎么样”？仲淹端坐频频点头，几乎要拜下去。

张伯玉守河阳，作了一篇《六经阁记》，先让游士及僚属每人作一篇，一共七八篇，写完之后都拿到衙门里，张伯玉一一阅读之后，铺开纸写了十四个字，

让在座的人传看。这十四个字是：“六经阁，诸子、史、集在焉，不书，尊经也。”当时曾巩先生也在座，看完之后惊奇地站起来表示佩服。不久前我从张子韶那里听说了这两件事，现在已经想不起来六经阁究竟在哪里和《六经阁记》成于谁手，后世有博学的人，可能会知道的。

大言误国

【原文】 隗嚣谋叛汉，马援劝止之甚力，而其将王元曰：“今天水全富，士马最强，案秦旧迹，表里河山。元请以一丸泥为大王东封函谷关。”嚣反遂决，至于父子不得其死，元竟降汉。隋文帝伐陈，大军临江，都官尚书孔范言于后主曰：“长江天堑，古以为限隔南北，今日虏军岂能飞度邪？臣每患官卑，虏若渡江，臣定作太尉公矣。”或妄言北军马死，范曰：“此是我马，何为而死？”帝笑以为然，故不为深备。已而国亡，身窜远裔。唐元宗有克复中原之志，及下南闽，意以谓诸国可指麾而定，而事力穷薄，且无良将。魏岑因侍宴言：“臣少游元城，好其风物，陛下平中原，臣独乞任魏州。”元宗许之。岑趋墀下拜谢，人皆以为佞。孟蜀通奏使王昭远，居常好大言，有杂耕渭上之志，闻王师入讨，对宾客礲手言：“此送死来尔。乘此逐北，遂定中原，不烦再举也。”不两月蜀亡，昭远为俘。此四臣之佞，本为爵禄及一时容悦而已，亦可悲哉！

【译文】 隗嚣图谋背叛汉朝，马援很费劲地劝止他，而隗嚣的将领王元说：“现在天水安定富裕，兵马最为精强，按照秦国的老方案，内外有河山的险要。我王元请求用一个封送信件的泥丸为大王到东边阻塞函谷关。”隗嚣谋反的决心就定了，以致他父子不得好死。王元竟投降了汉朝。隋文帝进攻陈朝，大军来到江边，陈朝都官尚书孔范言对陈后主说：“长江是天然险阻，自古用来分隔南北方，今天敌军哪能飞渡呢？臣常忧虑自己官职卑下，敌人如果渡江，臣一定能立功做太尉公了。”后主笑着以为他说得对，所以不深加设防，不久国亡，孔范言被窜逐到荒远之地。五代南唐元宗（李稹）有收复中原的意志，到攻下南闽王延政的割据政权后，思想上认为各国可以轻易平定，而实力薄弱，而且没有善战的将帅。魏岑乘侍从宴饮时说：“臣少年时曾游过元城，喜欢这里的风土物产，陛下平定中原，臣独自求任魏州知州。”元宗答应了他。魏岑走到陛阶上拜谢，人们都认为他邪佞谄媚。孟蜀的通奏使王昭远平常喜说大话，有到渭水上耕田的志意，听说宋军去征讨，就对宾客们搓着手说：“这是来送死！乘此机会追击败兵，就平定中原，不用再次发兵了。”不到两个月蜀就灭亡，王昭远当

了俘虏。这四个臣子的佞谄，本是为了求爵禄及一时讨好而已，也很可悲的！

宗室覃恩免解

【原文】 淳熙十三年，光尧太上皇帝以圣寿八十，肆赦推恩，宇宙之内，蒙被甚广。太学诸生，至于武学，皆得免文解一次。凡该此恩者千二三百人，而宗子在学者不预。诸人相率诣宰府，且遍谒侍从、台谏，各纳一札子，叙述大旨，其要以为：“德寿霈典，普天同庆，而玉牒支派，辱居胶庠，顾不获与布衣书生等。窃譬之世俗尊长生日，召会族姻，而本家子孙，不享杯酒醢炙，外议谓何？今窥鸿之泽如此，而宗学乃不许厕名，于义于礼，恐为未愜。”是时，诸公莫肯出手为言，迈以待制侍讲内宿，适蒙宣引，因出其纸以奏，仍为敷陈此辈所云尊长生日会客，而本家子弟不得坐，譬谕可谓明白。孝宗亦笑曰：“甚是切当有理”。时所携只是白札子，蒙径付出施行，遂一例免举。其人名字，今不复能记忆矣。

【译文】 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年），光尧太上皇（宋高宗）过八十生日，施恩大赦，于是宇宙之内都蒙受恩惠。太学乃至武学学生，都得以免除文解一次，受此恩惠者达一千二三百人。而赵氏宗室子弟在学者不在免除之列，这些人于是一起到宰相府求情，并且一一拜见了侍从官和台谏官，向各衙门呈交一卷札子，讲述自己的要求，其大意为：“圣上大寿，普天同庆，我们这些在太学求学的宗室子弟，却得不到与平民子弟学生同等的待遇。我们私下打个比方，一般的老百姓长辈过生日，大会宾朋，假若本家子弟连一杯酒、一块肉都捞不到，别人会怎么评论这家人呢？现在这么大的恩泽，宗室子弟为太学生者却不在蒙受之列，无论从道义还是从大礼上讲，恐怕都不合适”。当时，朝官们都不肯替这些人在孝宗面前说话，我正以待制侍讲的身份宿在宫内，恰好赶上皇帝宣召，我趁势把他们的札子奏上，并向孝宗陈述道：这些人所说的尊长过生日会宾客，本家弟子却不得陪坐，这个比喻挺有意思。孝宗也笑着说：“这个比喻很是贴切有理”，当时我所带的只是白札子，承蒙皇上恩准，直接拿出去交外朝执行，于是宗室子弟也一律得免。只是当时写札子人的名字，现在我已记不起来了。

唐书载韩柳文

【原文】 宋景文修《唐书》，《韩文公传》全载其《进学解》、《谏佛骨表》、《潮州谢上表》、《祝鳄鱼文》，皆不甚润色，而但换《进学解》数字，颇不如本意：元云“招诸生立馆下”，改“招”为“召”。既言先生入学，则诸生在前，招而诲之足矣，何召之为？“障百川而东之”，改“障”字为“停”。本言川流横溃，故障之使东，若以为停，于义甚浅。改“跋前毳后”为“蹶后”，韩公本用《狼跋》诗语，非蹶也。其他以“爬罗剔抉”为“杷罗”，“焚膏油”为“烧”，以“取败几时”为“其败”。《吴元济传》书《平淮西碑文》千六百六十字，固有他本不同，然才减节辄不稳当。“明年平夏”一句，悉芟之。“平蜀西川”，减“西川”字。“非郊庙祠祀，其无用乐”，减“祠”、“其”两字。“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减下“臣”字，殊害理。“汝其以节都统讨军”，以“讨”为“诸”，尤不然。“讨”者，如《左传》“讨军实”之义，若云“诸军”，何人不能下此语？《柳子厚传》载其文章四篇：《与萧俯》、《许孟容书》、《贞符》、《惩咎赋》也。《孟容书》意象步武，全与汉杨惲《答孙会宗书》相似，《贞符》仿班孟坚《典引》，而其四者次序或失之。至云：“宗元不得召，内闵悼，作赋自儆”。然其语曰：“逾再岁之寒暑”，则责居日月未为久，难以言不得召也。《资治通鉴》但载《梓人》及《郭橐驼传》，以为其文之有理者。其识见取舍，非宋景文可比云。

【译文】 宋景文（宋祁）修《（新）唐书》，在韩文公（韩愈）传中全载他的《进学解》、《谏佛骨表》、《潮州谢上表》、《祭鳄鱼文》，都不大加以润饰，而只是改换《进学解》中几个字，很及不上原本的意思。原文说：“招诸生立馆下”，改“招”字为“召”，文章既说先生进入国子学中，那么这些学生就在面前，招呼来教诲他们就足够了，何必召唤呢？“障百川而东之”，改“障”字为“停”，文章本是说河川水流溃决，所阻挡使它向东流，如果以为“停”止，在意义上很浅。改文中“跋前毳后”为“蹶后”，韩公本来用《诗经·狼跋》中语句，不是“蹶”。其他以“爬罗剔抉”改作“杷罗”，“焚膏油”改作“烧”，把“取败几时”改作“其败”。《吴元济传》载《平淮西碑》文一千六百六十字，固然有与其他牌版本不同处，但刚一减省删节就很不稳妥。“明年平夏”一句，全被删去。“平蜀西川”句，减去“西川”二字。“非郊庙祠祀，其无用乐”句，减去“祠”、“其”二字。“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两句，减去下句“臣”

字，尤为有害于道理。“汝其以节都统讨军”，把“讨”字改作“诸”，尤其不妥。“讨”字的意思，本如《左传》讨军实的意思，如果说“诸军”，谁又不能写出这话。柳子厚（柳宗元）转载有他的文章四篇，《与萧俯》、《许孟容书》、《贞符》、《惩咎赋》。《与许孟容书》用意和写法，全和汉代杨惲《答孙会宗书》相似，《贞符》仿班孟坚（班固）《典引》，而其中四个部分次序恐有失当。至于说“柳宗元得不到召回，内心悲哀，作赋以自警戒。”但文中的话说：“超过两年的冬夏。”那么被贬斥在外时间不久，很难说不得到召回京城。《资治通鉴》只载《梓人传》和《郭橐驼传》，以为是柳文中有道理的篇章，他（司马光）的识见取舍，不是宋景文所可比拟的。

冥灵社首凤

【原文】 光尧上仙，于梓宫发引前夕，合用警场导引鼓吹词。迈在翰苑制撰，其《六州歌头》内一句云：“春秋不说楚冥灵”。常时进入文字，立待报者，则贴黄批“急速”，未尝停滞。是时，首尾越三日，又入奏，趣请付出。太常吏欲习熟歌唱，守院门伺候。适有表弟沈日新在军将桥客邸，一士人乃上庠旧识，忽问“楚冥灵”出处，沈亦不能知，来扣予，因以《庄子》语告之，急走报，此士大喜。初，孝宗以付巨礮霍汝弼，使释其意，此士，霍客也，故宛转费日如此。又面奉旨令代作挽诗五章，其四云：“鼎湖龙去远，社首凤来迟。”当时不敢宣泄，而带御器械谢纯孝密以为问，乃为举壬子年《拾遗记》，盖周成王事也。禁苑文书，周悉乃尔。

【译文】 光尧皇帝（宋高宗）死去，在棺材出发到陵墓的前夕，应该用警戒场内的导引鼓吹词。我洪迈在翰林院奉制作，其中《六州歌头》内有一句话说：“春秋不说楚冥灵”（论年岁不提那楚国南部以五百年为春，五百年为秋的大龟冥灵）。当时进奏的文字，立等报批的，就贴上黄色批条以急件上送，从未耽搁。这次，前后过了三天，又入朝奏闻，催促交出。当时太常寺的吏员要练习歌唱，守候在院门等待。正好有表弟沈日新住在军将桥旅舍，有一个士人和他在太学中是老相识，忽然问起“楚冥灵”的出处，沈日新也不知道，来问我，就把《庄子》的话告诉他，他急忙告诉这士人，这士人大喜。当初，孝宗把词稿交付给大太监霍汝弼，叫他解释词的意思。这个士人，是霍汝弼门客，所以转着费了这么多时日。又曾奉旨叫洪迈代作挽诗五首，其中第四首说：“鼎湖龙去远，社首凤来迟”（鼎湖地方黄帝乘的龙去得远了，周成王在社首山的凤来得迟了）。

当时不敢说出去，而带御器械官谢纯孝秘密地来问我，我就举出壬子年（王嘉）《拾遗记》，是周成王的事告诉他。宫禁中的文章，要求详知内容如此。

《左传》州郡

【原文】 《左传·鲁哀公二年》，晋赵鞅与郑战，誓众曰：“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注云：“《周书·作洛篇》：“千里百县，县有四郡。”然则郡乃隶县，而历代地理、郡国志未之或书。又《传》所载地名，从州者凡五：“鲁宣公会齐于平州，以定其位”。注云：“齐地，在泰山牟县西。”见于正经。它如“允姓之戎，居于瓜州。”注：“今敦煌也。”“楚庄王灭陈，复封之，乡取一人焉以归，谓之夏州。”“齐子尾使閭丘婴伐我阳州”。注：“鲁地”。后四十年，又书“鲁侵齐，门于阳州”。注：“攻其门也。”“苦越生子，将待事而名之，阳州之役获焉，名之曰阳州”，是齐鲁皆有此地也。卫庄公登城以望，见戎州，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以上唯瓜州之名至今。

【译文】 《左传·鲁哀公二年》记载晋国执政大夫赵鞅与郑国打仗，赵鞅承诺说：“能够战胜敌人的，上大夫赏给一个县，下大夫赏给一个郡，士赏田十万”，杜预注：“《周书·作洛篇》记载：‘每千里设一百个县，每县有四个郡’”。这样看来，郡原来是隶属于县的，而历代史书中的《地理志》、《郡国志》，却从未加以记载。又，《左传》所记载的地名，带“州”字的共有五个：“鲁宣公会齐于平州，以定其位”，杜预注释说：“齐地，在泰山郡牟县西边，见于经文”。其他的如“允姓之戎，属于瓜州”，杜预注：“即今天的敦煌”；“楚庄王灭陈之后，又让其复国，每乡只带走一个人，在楚国把他们安顿下来。称其组织为‘夏州’”；“齐子尾派閭丘婴伐鲁阳州”，杜预注：“鲁地”。后四十年，又记载，“鲁国入侵齐国，攻打阳州城门。”杜预注：“门就是攻打城门的意思”；“苦越生了个儿子，等待取得成功后再给他起名字。阳州之役取胜后，就给孩子取名‘阳州’”。这说明齐、鲁各有一个地方叫阳州；卫庄公登上卫都城墙望，看到戎州后说：“这里是华夏地方，有什么戎州呢”？以上只有瓜州的地名保留到今天。

贫富习常

【原文】 少时见前辈一说云：“富人有子不自乳，而使人弃其子而乳之；贫人有子不得自乳，而弃之以乳他人之子。富人懒行，而使人肩舆；贫人不得自行，而又肩舆人。是皆习以为常而不察之也。天下事，习以为常而不察者，推此亦多矣，而人不以为异，悲夫”！甚爱其论。后乃得之于晁以道《客语》中，故谨书之，以广其传。

【译文】 年少时听到前辈有一说法：“富人有孩子不自己喂奶，而叫人抛弃自己孩子去喂她的孩子；穷人有孩子不得喂奶，而抛弃了他去用奶喂别人的孩子。富人懒得走路，而叫人抬轿；穷人不能自己走路，而又要用轿子抬别人。这都是习以为常而不觉察其错误。天下的事情，习以为常而不觉察其不对的，据此推论也够多了，而人们不以为怪，可悲啊！”我很喜爱这论点，后来才从晁以道（晁说之）《客语》中查到，所以恭敬地记下，推广它的流传。

唐用宰相

【原文】 唐世用宰相不以序，其得之若甚易，然固有出入大僚，历诸曹尚书、御史大夫，领方镇，入为仆射、东宫师傅，而不得相者，若颜真卿、王起、杨於陵、马总、卢钧、韩皋、柳公绰公权、卢知猷是也。如人主所欲用，不过侍郎、给事中，下至郎中、博士者，才居位即礼绝百僚，谏官、御史听命之不暇，顾何敢辄抨弹其失？与国朝异矣。其先在职者，仍许引其同列，若姚元崇之引宋璟，萧嵩之引韩休，李林甫引牛仙客、陈希烈，杨国忠引韦见素，卢杞引关播，李泌引董晋、窦参，李吉甫引裴膺，李德裕引李回，皆然。

【译文】 唐代任命宰相不以等级秩序，得到相位的，有时好像很容易。然而也有些人出入于各重要衙门，历任各曹尚书、御史大夫，出为节度使，入朝为仆射，作太子的师傅，最终却得不到相位，像颜真卿、王起、杨於陵、马总、卢钧、韩皋、柳公权、卢知猷等都是这样。如果皇上想任用，即使是给事中、侍郎，甚至郎中、博士，居位不久就被提拔为宰相，谏官和御史们听从命令还来不及，哪敢抨击他们的过失？这一点和我们宋朝是不一样的。在唐朝先提为宰相的，允许推荐他的同列，像姚崇引荐宋璟，萧嵩引荐韩休，李林甫推荐牛仙

客、陈希烈，杨国忠推荐韦见素，卢杞推荐关播，李泌推荐董晋、窦参，李吉甫推荐裴盩，李德裕推荐李回等，都是这样。

史记简妙处

【原文】 太史公书不待称说，若云褒赞其高古简妙处，殆是摹写星日之光辉，多见其不知量也。然予每展读至《魏世家》、《苏秦》、《平原君》、《鲁仲连传》，未尝不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魏公子无忌与王论韩事曰：“韩必德魏、爱魏、重魏、畏魏，韩必不敢反魏”。十余语之间五用“魏”字。苏秦说赵肃侯曰：“择交而得则民安，择交而不得则民终身不安。齐、秦为两敌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齐而民不得安，倚齐攻秦而民不得安。”平原君使楚，客毛遂愿行，君曰：“先生处胜之门下几年于此矣？”曰：“三年于此矣。”君曰：“先生处胜之门下三年于此矣，左右未有所称诵，胜未有所闻，是先生无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遂力请行，面折楚王，再言：“吾君在前，叱者何也？”至左手持盘血，而右手招十九人于堂下，其英姿雄风，千载而下，尚可想见，使人畏而仰之，卒定从而归。至于赵，平原君曰：“胜不敢复相士。胜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数，今乃于毛先生而失之。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赵重于九鼎、大吕。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胜不敢复相士。”秦围赵，鲁仲连见平原君曰：“事将奈何？”君曰：“胜也何敢言事！魏客新垣衍令赵帝秦，今其人在是，胜也何敢言事！”仲连曰：“吾始以君为天下之贤公子也，吾今然后知君非天下之贤公子也。客安在？”平原往见衍曰：“东国有鲁仲连先生者，胜请为介绍，交之于将军。”衍曰：“吾闻鲁仲连先生，齐国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职，吾不愿见鲁仲连先生。”及见衍，衍曰：“吾视居此围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今吾观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也。”又曰：“始以先生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为天下之士也。”是三者重沓熟复，如骏马下驻千丈坡，其文势正尔。风行于上而水波，真天下之至文也。

【译文】 《太史公书》（《史记》）不必论说，若讲到褒扬称赞它的高古简洁精妙之处，简直是像摹绘星和太阳的光辉，只见到他的不知量力。但我每次翻开阅读到《魏世家》、《苏秦传》、《平原君传》、《鲁仲连传》，从没有不惊呼拍桌子的，自己也说不出所以然的道理。魏国的公子无忌（信陵君）和魏王论韩国的事说：“韩国必然感魏国之德爱魏国尊重魏国畏惧魏国，韩必不敢反对魏国。”十几个字中间五次用“魏”字。苏秦游说赵肃侯说：“选择邦交而得当就

使百姓得到安宁，选择邦交不得当就使百姓终身不得安宁。和齐、秦国为敌而百姓不得安宁，倚仗秦国攻击齐国而百姓不得安宁，倚仗齐国攻击秦国而百姓不得安宁。”平原君出使楚国，门客毛遂愿意随从，平原君说：“先生在我赵胜（平原君名）的门下至今几年了？”回答说：“至今三年了。”平原君说：“先生居于我赵胜的门下至今三年了，左右从未有所称赞，我赵胜也没听说什么，那么先生没有什么才能。先生不能去，先生留下吧。”毛遂竭力要求去，他当面折服楚王，再次说：“我的主人在面前，你叱责什么？”他甚至于左手拿着盛血的盘，而用右手招呼堂下的十九人，他的英姿雄风，在千年之下，还可以想像到，使人敬畏而仰望，终于决定了合纵而回来。至于赵国，平原君说：“我赵胜不敢再去考察士人。我赵胜考察的士人多时到千人，少时百余人，现在在毛先生身上错了。毛先生一到楚国，而使赵国比九鼎、大吕（古鼎名）还重。毛先生三寸长的舌头，比百万军队还强，我赵胜再不敢考察士人。”秦国包围赵都，鲁仲连见平原君说：“事情将怎么办？”平原君说：“我赵胜怎敢说事情！魏国客人新垣衍叫赵国尊秦为帝，现在这个人在这里。我赵胜哪敢说事情！”鲁仲连说：“我起初以为您是天下贤明的公子，我现在才知道您不是天下贤明的公子。客人在哪里？”平原君去见新垣衍说：“东方国家有鲁仲连先生其人，我赵胜请求作介绍人，和将军交友。”新垣衍说：“我听说鲁仲连先生，是齐国的高尚人士。我新垣衍是别人的臣子，出使有职任，我不愿见鲁仲连先生。”到鲁仲连见了新垣衍，新垣衍说：“我看住在这被围困的城市中的人，都是有求于平原君的；现在我看先生的容貌，不是有求于平原君的人”。最后他说：“开始我认为您是庸人，今天才知道您是天下有胆有识之士”。这些话反复再三就像骏马停在悬崖前，文章的气势十分凌厉陡峭。风刮在水面上才起波折，真是天下最奇妙的文章呵。

玉津园喜晴诗

【原文】 淳熙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车驾宿戒幸玉津园，命下，大雨，有旨许从驾官带雨具，将晓有晴意，已而天宇豁然。至晚归，迈进一诗歌咏其实云：“五更犹自雨如麻，无限都人仰翠华。翻手作云方怅望，举头见日共惊嗟。天公的有施生妙，帝力堪同造物夸。上苑春光无尽藏，何须羯鼓更催花”。四月四日，扈从诣景灵宫朝献，蒙于幕次赐和篇，圣制云：“比幸玉津园，纵观春事，适霁色可喜，卿有诗来上，因俯同其韵：春郊柔绿遍桑麻，小驻芳园览物华。应信吾心非遐逸，顿回晴意绝咨嗟。每思富庶将同乐，敢务游畋漫自夸？不似华

清当日事，五家车骑烂如花”。后二日，兵部尚书宇文价内引，上举似此诗曰：“洪待制用雨如麻字，偶思得桑麻可押，又其末句用羯鼓催花事，故以华清车骑答之”。价拱手称赞，明日以相告云。

【译文】 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年）三月二十六日，皇上及其宿卫驾临玉津园，命令刚下来，正好赶上天下大雨，皇上降旨允许从驾的各位官吏带上雨具。将亮时天开始放晴，不久就万里晴朗。晚上回来时，我献上一首记述当时情形的诗：“五更犹自雨如麻，无限都人仰翠华。翻手作云方怅望，举头见日共惊嗟。天公的有施生妙，帝力堪同造物夸。上苑春光无尽藏，何须羯鼓更催花”。到四月四日，扈从官吏到景灵宫向皇上朝献，我蒙恩在幕前得到皇帝赏赐的和诗，圣上是这样写的：“在我驾幸玉津园观览春色的时候，正赶上雨后放晴的美好景色，洪卿有诗献上，我俯用其韵和诗一首：春郊柔绿遍桑麻，小驻芳园览物华。应信吾心非暇逸，顿回晴意绝咨嗟。每思富庶将同乐，敢务游畋漫自夸？不似华清当日事，五家车骑烂如花”。过了两天，兵部尚书宇文价被引见，皇上好象是拿着这首诗说：“洪待制用雨如麻的比喻，朕偶然想起桑和麻可以押韵；他的末句诗用羯鼓催花的典故，所以我以华清池的杨家车骑来回答他。”宇文价拱手称赞，第二天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

虢巨 贺兰

【原文】 天下国家不幸而有四郊之警，为人臣者当随其事力，悉心尽忠，以致尺寸之效。苟为叨窃禄位，视如秦、越，一切惟已私之是徇，虽千百载后，睹其事者犹使人怒发冲冠也。唐天宝禄山之乱，可谓极矣。虢王巨为河南节度使，贺兰进明继之，拥数道之兵，临要害之地，尊为征镇，有民有财，而汗漫忌疾，非徒无益，而反败之。巨在彭城，张巡在雍丘，以将士有功，遣使诣巨请空名告身及赐物，巨惟与折冲、果毅告身三十通，不与赐物，巡竟不能立，徙于睢阳。先是太守许远积粮六万石，巨以其半给濮阳、济阴，远固争不得。二郡得粮，遂以城叛，而睢阳食尽。颜鲁公起兵平原，合众十万，既成魏郡堂邑之功矣，是时，进明为北海太守，亦起兵，公以书召之并力，进明度河，公每事咨之，军权始移，遂取舍任意，以得招讨。后诣行在，遂譖房琯，自岭南而易河南。张巡受围困棘，遣南霁云告急于其所治临淮，相去三百里，弃而不救。平原、睢阳失守，实二人之故。一时议者，皆不以为言，使之连据高位，显为佚罚。曾不十年，臣斥刺遂州，为段子璋所杀，进明坐第五琦党，自御史大夫

窜谪以死。天网恢恢，兹焉不漏。

【译文】 天下和国家不幸而遭到四方有敌寇的入侵，做人臣的应当根据他的能力，全心地为国效忠，以取得尺寸的报效。如果只是为了忝窃俸禄官位，把国家的安危看作像秦国人对待越国人的肥瘦一样漠不关心，一切只为了自己的私利打算，虽经千百年之后，见到他的事迹还叫人怒发冲冠。唐朝天宝年间安祿山的叛乱，可谓极严重了。虢王李巨任河南节度使，贺兰进明继任他的官职，他们拥有几道的兵力，正当要害的地方，地位尊为专证讨的镇将，掌握有民众和财力，而迂阔妒忌，不但没益处，而反使事情败坏。李巨在彭城，张巡在雍丘，张巡因将士作战有功，派使者到李巨那里请求空白的告身（任命书）及赏赐的物品，李巨只给了任命折冲、果毅等小官的告身三十份，不给赏赐的物品，张巡竟因此不能站稳脚跟，被迫迁到了睢阳。在此以前睢阳太守许远积贮粮食六万石，李巨把这些粮食的半数给了碭阳、济阴，许远力争不得允许。碭阳、济阴二郡得到了粮食，就以城叛变，而睢阳粮食用完。颜鲁公（颜真卿）在平原起兵，有兵众十万，已经在魏城堂邑建立功勋了。这时，贺兰进明任北海太守，也起兵，颜鲁公用书信召他来合力作战，贺兰进明渡过黄河，颜鲁公每件事都和他商量，军权就落入贺兰进明之手，他就任意取用和废弃人才，以此得招讨之职，后来到皇帝身边，因此谗毁房琯，从廩南节度使而调任河南节度使。张巡被敌人围困紧急，派南霁云到贺兰进明所治理的临淮去告急，相距三百里，贺兰进明放弃不加援救。平原、睢阳的失守，实在是李巨、贺兰进明二人的缘故。一时议论的人，都不加论说，使他们接连地占有高位，显然是失于责罚。但不到十年，李巨被贬斥为遂州刺史，被段子璋所杀，贺兰进明因是第五琦党羽，从御史大夫被流放贬斥而死。老天的法网宏大，对这些人并没有疏漏。

卷 六

鄱阳七谈

【原文】 鄱阳素无图经地志，元璽六年，余干进士都颉，始作《七谈》一篇，叙土风人物云：“张仁有篇，徐濯有说，顾雍有论，王德琬有记，而未有形于诗赋之流者，因作《七谈》”。其起事则命以“建端先生”，其止语则以“毕意子”。其一章，言澹浦、彭蠡山川之险胜，番君之灵杰；其二章，言滨湖蒲鱼之利，膏腴七万顷，柔桑蚕茧之盛；其三章，言林麓木植之饶，水草蔬果之衍，鱼鳖禽畜之富；其四章，言铜冶铸钱，陶埴为器；其五章，言宫寺游观，王遥仙坛，吴氏润泉，叔伦戴堤；其六章，言鄱江之水；其七章，言尧山之民，有陶唐之遗风。凡三千余字，自谓八日而成，比之太冲十稔、平子十年为无嫌。予偶于故箧中得之，惜其不传于世，故表著于此。其所引张、徐、王、顾所著者，今不复存，更为可恨也。

【译文】 鄱阳地区一直没有地理方面的著作，哲宗元璽六年（1091年），余干进士都颉才作了一篇《七谈》，叙述这一地区的风土民情，书中写道：“张仁、徐濯、顾雍、王德琬等人曾经写过文章，却从来没有人用诗赋的形式对这一地区的风情加以记述，所以我写下这篇《七谈》”，它的记事起于“建端先生”，止于“毕意子”。第一章叙述澹浦、彭蠡的险要山川、番君的英明；第二章讲述湖滨地区发达的渔业、农业和蚕桑业的情况；第三章进述林业、蔬菜和副业生产的情况；第四章记述冶炼、陶埴等手工业生产；第五章记述寺院情况：王遥仙坛、吴氏润泉、叔伦戴堤；第六章讲鄱江之水；第七章讲当地纯朴的民风。一共三千余字，都颉自己说八天写成，这本书与太冲十稔、平子十年相比一点也不逊色。偶然中我从旧籍子里翻到了它，为它没有流传于世而感到惋惜，所以写在这里以示表彰。所引张、徐、王、顾的著作，现在都已失传，更为可惜了。

经解之名

【原文】 晋、唐至今，诸儒训释《六经》，否则自立佳名，盖各以百数，其书曰《传》、曰《解》、曰《章句》而已。若战国迨汉，则其名简雅。一曰“故”，故者，通其指义也。《书》有《夏侯解故》、《诗》有《鲁故》，《后氏故》、《韩故》也。《毛诗故训传》，颜师古谓流俗改故训传为“诂”，字失真耳。小学有杜林《苍颉故》。二曰“微”，谓释其微指。如《春秋》有《左氏微》、《铎氏微》、《张氏微》、《虞卿微传》。三曰“通”，如注丹《易通论》名为《注君通》，班固《白虎通》，应劭《风俗通》、唐刘知几《史通》、韩竇《春秋通》。凡此诸书，唯《白虎通》、《风俗通》仅存耳。又如郑康成作《毛诗笺》，申明传义，他书无用此字者。《论语》之学，但曰《齐论》、《鲁论》、《张侯论》，后来皆不然也。

【译文】 从晋代、唐代到今天，学者们或者训释《六经》，或者自立一些好名目，总起来有上百家，其著作的名称不外是“传”、“解”，“章句”三类。战国至汉代，名目则要简朴典雅一些。第一叫做“故”。所谓“故”，就是通其思想，《尚书》有《夏侯解故》，为《诗经》作注的有《鲁故》、《后氏故》、《韩故》。《毛诗故训传》，据颜师古说，“故训”的“故”成为“诂”字乃是世俗所改，失去了它本来面目。文字学中有杜林的《苍颉故》。第二叫作“微”。微的意思就是阐释其微言大义。如《春秋经》中有《左氏微》、《铎氏微》、《张氏微》、《虞卿微传》。第三叫作“通”。比如注丹的《易通论》叫作《注君通》，班固的《白虎通义》，应劭的《风俗通》，唐代刘知几的《史通》和韩昉的《春秋通》。这些书中，只有《白虎通》和《风俗通》存世。又如郑玄作《毛诗笺》，阐明传义，其他书没有用“笺”字者。阐述《论语》的著作有《齐论》、《鲁论》和《张侯论》，后来都不是这样了。

卜筮不敬

【原文】 古者龟为卜，蓍为筮，皆兴神物以前民用。其用之至严，其奉之至敬，其求之至悉，其应之至精。斋戒乃请，问不相袭，故史祝所言，其验若答。周史筮陈敬仲，知其八世之后莫之与京，将必代齐有国。史苏占晋伯姬之

嫁，而及于为嬴败姬，惠、怀之乱。至遂至赧，通于神明。后世浸以不然，今而愈甚，至以饮食竈杂之际，呼日者隅坐，使之占卜，往往不加冠裳，一问四五，而责其术之不信，岂有是理哉！善乎班孟坚之论曰：“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及至衰世，懈于斋戒，而屡烦卜筮，神明不应。故筮渎不告，《易》以为忌；龟厌不告，《诗》以为刺。”谓《周易》之《蒙卦》曰：“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诗·小雅》之章云：“我龟既厌，不我告犹。”言卜问烦数，狎砢于龟，龟灵厌之，不告以道也。汉世尚尔，况在于今，未尝顷刻尽敬，而一归咎于淫巫瞽史，其可乎哉！

【译文】 古代用龟壳占卜，用著草筮算，这些神物都为我们的先民们所使用。先民们使用得非常严格，信奉得十分虔敬，求问极为详细广泛，所以神物的应答也极为精确。请问以前要先行斋戒，问题不重复，所以卜祝的话，就像回答问题一样灵验。周王室史官替陈完占卜，知道他八世之后没有人能与他抗争，必将代姜氏而有齐国。史苏占卜晋国的伯姬出嫁，将赶上怀嬴败坏姬氏，以及晋惠公和晋怀公时代的动乱。这其中的奥妙，简直直通神明。后世内气日坏，今天更甚。甚至在吃饭杂闹的时候，让占卜者坐在角落里进行占卜，这些人往往衣冠不整，接连发问，就这样却要批评占卜不能应验，哪有这样的道理？班固说得好：“君子有所动作，外出行动，问而有答，十分灵验。后世风俗衰败，懈于斋戒，而屡烦卜筮，神明也不应验了。所以衰渎之后神灵就不会告诉你，《周易》以此为忌；神龟烦了就不回答，《诗经》对此进行了批评。这里说的是，《周易·蒙卦》：“初次卜筮，神灵回答你，反复卜筮，衰渎了神明，神明就不回答了”；《诗经·小雅·小雅》说：“我们的灵龟已经厌倦，不再告诉我们未来的吉凶。”这是说卜问太多了，玩弄了灵龟，灵龟厌倦后就不再把吉凶显示出来。汉代尚且如此，何况今天？一点的虔敬也没有，却把不灵验的责任统统归咎到占卜者的身上，这怎么能行呢？

糖霜谱

【原文】 糖霜之名，唐以前无所见，自古食蔗者始为蔗浆，宋玉《招魂》所谓“糇饔炮羔有柘浆”是也。其后为蔗饧，孙亮使黄门就中藏吏取交州献甘蔗饧是也。后又为石蜜，《南中八郡志》云：“笮甘蔗汁，曝成饴，谓之石蜜”；《本草》亦云：“炼糖和乳为石蜜”是也。后又为蔗酒，唐赤土国用甘蔗作酒，杂以紫瓜根是也。唐太宗遣使至摩揭陀国，取熬糖法，即诏扬州上诸蔗，榨沈如

其剂，色味愈于西域远甚，然只是今之沙糖。蔗之技尽于此，不言作霜，然则糖霜非古也。历世诗人模奇写异，亦无一章一句言之，唯东坡公过金山寺，作诗送遂宁僧圆宝云：“涪江与中泠，共此一味水。冰盘荐琥珀，何以糖霜美”。黄鲁直在戎州，作颂答梓州雍熙长老寄糖霜云：“远寄蔗霜知有味，胜于崔子水晶盐。正宗扫地从谁说，我舌犹能及鼻尖”。则遂宁糖霜见于文字者，实始二公。甘蔗所在皆植，独福唐、四明、番禺、广汉、遂宁有糖冰，而遂宁为冠。四郡所产甚微，而颗碎色浅味薄，才比遂之最下者，亦皆起于近世。唐大历中，有邹和尚者，始来小溪之寮山，教民黄氏以造霜之法。寮山在县北二十里，山前后为蔗田者十之四，糖霜户十之三。蔗有四色，曰杜蔗，曰西蔗，曰竈蔗，《本草》所谓荻蔗也，曰红蔗，《本草》昆仑蔗也。红蔗止堪生啖，竈蔗可作沙糖，西蔗可作霜，色浅，土人不甚贵，杜蔗紫嫩，味极厚，专用作霜。凡蔗最困地力，今年为蔗田者，明年改种五谷以息之。霜户器用，曰蔗削，曰蔗镰，曰蔗凳，曰蔗碾，曰榨斗，曰榨床，曰漆瓮，各有制度。凡霜，一瓮中品色亦自不同，堆叠如假山者为上，团枝次之，瓮鉴次之，小颗块次之，沙脚为下；紫为上，深琥珀次之，浅黄又次之，浅白为下。宣和初，王黼创应奉司，遂宁常贡外，岁别进数千斤。是时，所产益奇，墙壁或方寸，应奉司罢，乃不再见。当时因之大扰，败本业者居半，久而未复。遂宁王灼作《糖霜谱》七篇，具载其说，予采取之以广闻见。

【译文】 “糖霜”的名称，唐代以前不曾见到。古来食用甘蔗的才有蔗浆，宋玉《招魂》中所谓的“糍鼈炮羔有柘浆“炖鼈羊加蔗浆”指的就是这个。后来发明了蔗糖，孙亮派黄门向中藏吏取交州献来的甜蔗糖就是。后来又发明了石蜜。《南中八郡志》记载说：“把甘蔗汁压榨出来，晒成糖块，就叫石蜜。”《神农本草经》也说：“把炼糖与乳汁和在一起，制成石蜜。”就是此类。后来又发明了蔗酒，唐代的赤土国用甘蔗制作酒，再与紫瓜根揉杂在一起，就是这种蔗酒。唐太宗派遣使者出使到摩揭陀国，学到了熬糖的方法，就诏令扬州献上各种甘蔗，按照它们的配方榨炼，所制作的糖的颜色和甜味都远远超过了西域的糖，但也只是现在的沙糖。甘蔗的提炼方法至此为止，没见到提及糖霜。由此看来，糖霜的制作历史并不久远。历代诗人描写奇异的事物，也没有一章一句提及糖霜。只有苏东坡到金山寺的时候，写了一首《送遂宁僧圆宝》的诗道：“涪江与中泠，共此一味水。冰盘荐琥珀，何以糖霜美（涪江与中泠泉，都在这一杯水之中。冰样透明晶莹的玉盘盛着琥珀，也比不上糖霜这样地美）。黄鲁直在戎州时，写了一篇《答梓州雍熙长老寄糖霜》说：“远寄蔗霜知有味，胜于崔子水晶盐。正宗扫地从谁说？我舌犹能及鼻尖。（知晓远方寄来的糖霜饶有甘味，

远胜过崔子的水晶盐的味道。向谁诉说正宗的调味品不再时兴之事？我的舌尖还能舔到鼻尖上去。）”由此可见，遂宁糖霜表现为书面文字的，其实发端于苏东坡和黄鲁直两位。甘蔗的产地哪儿都有，唯有福唐、四明、番禺、广汉和遂宁等地产有糖冰，而以遂宁为最佳。四郡的糖冰产量很低，其颗粒碎细、颜色较浅，口味淡薄，只能与遂宁的最差的糖冰相比，而且都开始于近代。唐代大历年间，有一位姓邹的和尚，来到小溪的稛山，教当地百姓怎样制作糖霜的办法。稛山在县城北部二十里处，山的周围有十分之四的田地种植着甘蔗，而制作糖霜的人家占总户数的十分之三。那儿的甘蔗有四个品种，即杜蔗、西蔗、糠蔗（原注：即《神农本草经》所载的荻蔗）和红蔗（原注：即《神农本草经》所载的昆仑蔗）。红蔗只能生吃，糠蔗可以制作沙粮，西蔗可以制作糖霜（原注：颜色较浅，当地人卖得不是很贵），杜蔗色紫质嫩，味道极为甜醇，专门用来制作糖霜。甘蔗种植极费土地肥力，如果今年田地用来种植甘蔗，那么明年就得改种各种粮食、谷物以养息肥力。制作糖霜人家的器用工具，有蔗削、蔗镰、蔗凳、蔗碾、榨斗、榨床、漆穆等，都各有一套制作定式。同一穆缸中的糖霜，质量和成色也各有不同。堆积成假山模样的最好，其次是结成团块和枝状的，其次是凝成穆镜状的，再其次是小颗、小块状的，最差的是沙末状的；紫色的最好，其次是深琥珀色的，其次是浅黄色的，最差的是浅白色的。宣和年间初期，王黼创设应奉司，遂宁的糖霜经常上贡运往外地，一年间可进贡好几千斤。那个时候，出产的糖霜尤为奇特，有的像墙壁那么大，有的只在方寸之间。应奉司撤销后，就再也见不到了。当时，糖霜产业因此受到很大影响，约有半数糖霜产家破产停业，久久不能复兴。遂宁的王灼撰有《糖霜谱》共七篇，详细记载了这些事，我择取其中的一些，以拓展人们的视野。

李彦仙守陕

【原文】 靖康夷虏之祸，忠义之士，死于守城，而得书史传者，如汾州之张克戡、隆德之张确、怀之霍安国、代之史抗、建宁寨之杨震、振武之朱昭是已。唯建炎以来，士之得其死者盖不少。兹读王灼所作《李彦仙传》，虽尝具表上进，然虑实录、正史未曾采用，谨识于此。

彦仙字少严，本名孝忠，其先宁州人也，后徙于巩。幼有大志，喜谈兵，习骑射，所历山川形势必识之。尚气，谨然诺，非豪侠不交。金人南侵，郡县募勤王军，彦仙散家赀，得三千人，入援京师。虏围太原，李纲为宣抚使，彦仙

上书切诋，有司逮捕急，乃易今名；弃官亡命。顷之，复从种师中，师中败死，仙走陕州。守将李弥大问北事，条对详复，使扼崤、渑间。金人再围汴，陕西范致虚总六路兵进援，仙请曰：“崤、渑险隘，难于立军，前却即众溃矣。宜分道并进，伺空以出。且留半军于陕，为善后计。”致虚曰：“如子言乃逗挠也”。仙曰：“兵轻而分，正可速达”。不从，争益牢，致虚怒，罢其职。既而败绩，卒无功。

建炎元年四月，金人屠陕州，经制使王燮度不能支，引部曲去，官吏逃逸。仙为石壕尉，独如平时，归者襁属，即徙老稚入土花寨，三髻、石柱、大通诸山，拔武锐者分主之，自营三髻。谕众曰：“虏实易与，今得地利，若辈坚守足矣”。少日虏复据陕，分军来攻，有健酋升前阜谩骂，仙单骑冲去，挟之以归，始料众，正部伍。虏数万围三髻，仙邀战，伏精兵后崦，掩杀万计，夺马三百，虏解去。京、洛间多争附者，势益雄张，未阅月，破虏五十余壁。初，虏再入陕，官其土人，俾召复业者，人给符别之。仙阴纵麾下往，约日内应。二年三月，引兵直州南，城中火起，虏方备南壁，而水军自新店，夜顺流蒲城东北蒙泉坡龙堂沟以入，表里夹攻，僵尸相藉，遂复陕。始，河东之人倡义拒虏，仙约胡夜叉者为助，假以沿河提举，意不满，叛趋南原。仙诱致杀之，夺五千众。邵隆、邵云本其党，欲为复仇，仙因客镌说，遂来归。乘胜渡河，栅中条诸山，蒲，解至太原皆响动，乃分遣隆、云等取安邑、虞乡、芮城、正平、解，皆下之，蒲几拔，会援至不克。以功迁窥门宣赞舍人，就畀陕，兼安抚司公事，悉哀所俘酋长护送行在。上咨叹，赐袍带，枪剑，许直达奏事，便宜处决。时关以东独陕在，益增陴、疏堑、募军、缮铠，广屯田，训农耕作。家素留巩，尽取至官，曰：“吾父母妻子同城存亡矣！”闻者感悦，各有固志。十二月，金酋乌鲁撒拔围陕，仙背城鏖斗七日，虏伤甚，跳奔。三年，娄宿孛堇自绛移屯蒲、解、谍知之，设伏于诸谷，鼓噪横突，俘覈十八，娄宿仅以身免。制置使王庶檄使轻军掎角，次虞乡，虏以万甲逆石钟谷，终日战，斩级二千，迁武功大夫、宁州观察使、河解同耀制置使。时河东土豪密附，期王师来为应。仙益治军，欲请于朝，乞诏陕西诸路各助步骑二万。会张浚经略处置川、陕，弗之许。十二月，娄宿众十万复围陕，仙夜使人隧地，焚其攻具，营部嚣乱，纵兵乘之，虏稍退。四年正月，益生兵傅垒，昼夜进攻，鹅车、天桥、火车、冲车丛进，仙随机拒敌，又为金汁炮，火药所及，糜烂无遗，而围不解。日凭堞须外援，浚为遣军，虏先阻雍，不得进，则令泾原曲端出邠坊绕虏后。端素嫉仙声绩逾己，幸其败，诡托不行。丁巳，城陷，仙挟亲军巷战，矢集身如，左臂中刃，不殊，战愈力，遂死之，并其家遇害。

先是，虜嘗許以河南元帥，及圍合，復言如前約，當退師。仙叱曰：“吾寧鬼于宋，安用汝富貴為”！虜惜其才，必欲降之，城將破，先令軍中，生致者予萬金。仙平時弊衣同士卒，及是雜群伍中死，虜不能察。其為人，面少和色，有犯令，雖親屬不貸。諸將敗事，或有他過，其外屯者，輒封礦，遣帳下往，皆裸就笞，不敢出一詞。當是時，同、華、長安盡為敵薮，陝斗絕一隅，初無朝家素定約束，中立，孤軍日與虜確，但誦忠義，感勵其眾。每拜君賜暨取敵金資，悉均之，毛銖不入己。以是精兵三萬，大小二百戰，皆樂為用。軍事獨裁決，至郡政必問法所底，闔境稱治。浚承制贈彰武軍節度使，建廟商州。

邵云者，龍門人。城破被執，蒔宿欲命以千戶長，肆詈不屈，乃釘之木架上，置解州東門外。惡少抚其背涅文，戲曰：“可鞘佩吾刀”。云怒，僵架扑之。后五月磔解之，至抉眼摘肝，詈不絕，喉斷乃已。初行刑，將礪刃，云叱之，失刀而死，其忠勇蓋如此。

【譯文】 靖康之難，死于守城的忠義之士，史書中有記載的，像汾州的張克戡，隆德的張確，懷縣的霍安國，代州的史抗，建寧寨的楊震，振武的朱昭等。只是高宗建炎以來，將士死得其所的又有不少。我讀了王灼所作的《李彥仙傳》后，雖曾寫了奏章獻上去，然而仍擔心實錄、正史等不能採用，所以我恭敬地把它抄在這裡。

李彥仙字少嚴，原名孝忠，祖居寧州，後來遷到了巩縣。自幼有大志，喜歡議論軍事，精于騎射之術，經過山川險要的地方一定要加以察看。重氣節，崇尚信守，結交的朋友都是一些豪爽俠義之人。金人南侵后，孝忠散盡家產，在本地招募了三千人，進京支援。敵人包圍太原，李綱當時為宣撫使，孝忠上書強烈批評他，有關衙門緊急下令抓他，于是改名叫彥仙，棄官逃命。不久跟上了種師中。師中兵敗而死，彥仙逃走到陝州。陝州守將李彌大問起敵情，彥仙對答如流，于是李彌大派他去扼守崤關和澠池之間的險要地方。金兵第二次包圍汴京，陝西的范致虛率領六路人馬支援，李彥仙請求說：“崤關和澠池之間地勢險要，難以站住腳跟，前隊人馬退却就會一哄而散，應該分頭並進，伺機出兵。一半人馬留下做些善后工作。”范致虛說：“如果照你所说的去做，那就等于在給敵人撓癢”。李彥仙更加堅決地爭辯，范致虛一怒之下免了他的官。不久六路兵馬大敗，沒有任何成效。

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四月，金軍殺向陝州，經制使王燮考慮支撐不住，帶領自己的人馬逃走，陝州官吏逃散。獨有作為石壕尉的李彥仙像平時一樣堅守崗位，陝州人紛紛投奔到他那里，于是他把老年人和小孩分別送入土花砦、三鰲、石柱、大通等山中，選拔年輕勇武的人編成軍隊，自己親自率軍把守三鰲。

他吩咐众人说：“对付金人不难，现在我们又得地利，你们只要坚守就行了”。不几天后敌人又一次占领陕州，分兵来攻，敌方一个健壮的小头目在山前叫骂，彦仙单骑出击，把他活捉之后夹在腰间带了回来，然后才整理队伍。几万敌军包围三觜，彦仙引敌深入，在后山埋伏了精兵，结果杀敌一万多，夺得马匹三百，敌人仓皇而逃。从汴京到洛阳之间的人民归者如流，势力更加强大，不到一个月破敌五十余阵。当初，金军第二次占领陕州，委任一些本地人作官，让他们做工作以便安定社会秩序，每人发给一张符以示区别。彦仙偷偷地让其部下潜入陕州城以作内应。建炎二年（1128年）三月彦仙率军直奔城南，城中火焰冲天，敌人正在防备城的南端，而水兵却从新店出发，乘夜顺流而下直扑城东北，从蒙泉坡龙堂沟打开缺口，攻入城内，内外夹攻，敌人尸骸枕藉，陕州被收复。开始的时候，河东人倡议抗击敌人，彦仙约请一个叫胡夜叉的人帮助，暂时委任他为沿河提举，胡夜叉不满意，叛投南原之敌。彦仙诱他回来后把他杀掉，夺取了他的五千人马。邵隆、邵云为其同谋，想替他报仇，彦仙托人晓之以大义，二邵于是归来。彦仙于是乘胜渡过黄河，在中条山上修造栅栏，薄、解乃至太原都闻风而动，于是分派二邵等向安邑、虞乡、黄城、正平、解县方向发起进攻，所向披靡，只有蒲因为敌援来到没有攻克。彦仙因功盍门宣赞舍人，在陕州就职，兼管安抚司公事，他把所俘敌酋全部送到了皇上所在地临安。皇上赞叹不已，赐给他袍带、枪、剑，并恩准他直达奏事，先斩后奏。当时函谷关以东只有陕州没有沦陷，彦仙不断修缮城墙，疏通护城河，操练军队，修缮武器，广开屯田，劝农耕作。过去家属一直留在巩县，现在也一并接来，他说：“我们全家决心与陕州城共存亡”。听的人都很感动，人心更加稳定。十二月，金军酋帅乌鲁撒拔围陕，彦仙率军背城鏖战七天，敌人严重受挫后撤围。建炎三年（1129年），敌帅娄宿孛堇从绛县换防到蒲、解，谍报获悉了这一消息，彦仙在各个山谷布置埋伏，敌人到来后伏兵突起，喊声冲天，抓获敌人十八名，娄宿孛堇只身逃脱，制置使王庶传令彦仙屯扎虞乡作为主力的犄角，彦仙军与敌军在石钟谷口遭遇，混战一整天，杀敌两千人，彦仙迁为武功大夫、宁州观察使、河解同耀制置使。当时河东地区地方上的大族私下里归附，盼望宋军前来，他们好作内应。彦仙进一步扩军，打算向朝廷请求，让陕西各路帮助给他招募两万人马。正好赶上张浚经略处置川陕地区事务，没有得到准许。十二月，娄宿孛堇率领十万人马再次包围陕州，彦仙趁着夜色派人打隧道，焚烧了敌人的攻城器械，敌阵大乱，宋军乘机发起进攻，敌人稍稍后退。建炎四年（1130年）正月，敌人增兵再一次攻城，昼夜轮番不停，鹅车、云梯、点火的车子以及冲锋车齐头并进，彦仙随机应变，制作了金汁驳向敌阵发射，火药所到之处，全被

烧烂，还是解不了敌围。彦仙整天靠在城垛上等候外援。张浚派出一支人马，敌人提前阻击，前进不动，于是下令泾原曲端从鞏坊出发绕到敌后以支援李军。可是曲端一直嫉妒彦仙的名声政绩超过自己，巴不得他吃败仗，于是百般托辞不去支援。丁巳日，陕州城失，彦仙率领亲兵进行巷战，箭头猥集，左臂被砍了一刀，仍然搏杀不止，直至壮烈牺牲，全家也同时遇难。

在这之前，敌人曾许愿给他个河南元帅的职位，围城之后，敌人又重申了此前的承诺，并答应撤围。彦仙叱骂道：“我宁愿作宋朝的忠鬼，要你的富贵干什么”？敌人怜惜他的才能，一定要让他投降，破城之前就下令，活捉李彦仙者赏给万金。彦仙平时穿着和士卒一样破衣服，这时混杂在士卒中战死，敌人找不到他的尸首。彦仙为人严肃，如果违犯命令，即使亲属也不宽容。诸将吃了败仗，或有其他过失，屯扎在外者，总是封着棒派部下前去，受罚者裸衣受刑，不敢有一声怨言。当时，同州、华州和长安成了敌人的大本营，陕州被隔绝于一隅，开始也没有朝廷的制度约束，陕州孤立于中原与敌较量，彦仙只念诵忠义来激励部下。每当朝廷赏赐或分配战利品，一律平均分配，自己丝毫不多拿。因此三万精兵，历经大小二百余战，都肯为他卖命。打仗的事彦仙自己决定，地方上行政事务由地方官吏依法办事，全境治理得井井有条。张浚后来承制追赠他为彰武军节度使，在商州立庙纪念。

邵云是龙门人。城破被俘，娄宿准备任命他为千户长，他大骂不屈，于是敌人把他钉到木架上，挂在解州东门外。有个地痞抚摸着 he 背上的黑纹说：“可以作我佩刀的鞘”。邵云怒而挣倒木架向他扑去。五天之后被敌人肢解，挖眼睛，摘肝子，邵云仍怒骂不已，直到喉管被割断才停下来，行刑开始时，刽子手拿着刀，邵云怒喝一声，刽子手吓得刀和人一起倒落在地上，其忠勇的程度，由此可见。

奸雄疾胜己者

【原文】 自古奸雄得志，包藏祸心，窥伺神器，其势必嫉士大夫之胜己者，故常持“宁我负人，无人负我”之说。若蔡伯喈之值董卓，孔文举、祢正平、杨德祖之值曹操，嵇叔夜、阮嗣宗之值司马昭、师，温太真之值王处仲，谢安石、孟嘉之值桓温，皆可谓不幸矣。伯喈仅仅脱卓手，终以之陨命。正平转死于黄祖，文举覆宗，德祖被戮。叔夜罹东市之害、宗沉湎佯狂，至为劝进表以逃大咎。太真以智挫钱凤而免，其危若蹈虎尾。唯谢公以高名达识，表里至诚，故

温敬之重之，不敢萌相窥之意，然尚有“为性命忍须臾”，及“晋祚存亡在此一行”之虞。孟嘉为人夷旷冲默，名冠州里，称盛德人。仕于温府，历征西参军、从事、中郎、长史，在朝竊然仗正，必不效郗超辈轻与温合，然自度终不得善其去，故放志酒中，如龙山脱帽，岂为不自觉哉！温至云：“人不可以无势，我乃能驾馭卿”，老贼于是见肺肝矣。嘉虽得全于酒，幸以考终，然财享年五十一，盖酒为之累也。陶渊明实其外孙，伤其道悠运促，悲夫！

【译文】 自古以来，奸雄得志以后，就包藏祸心，觊觎政权，执必嫉恨超过自己的人，因此常常信奉“宁可我对不起别人，不可让别人对不起我”的信条。譬如蔡伯喈（蔡邕）碰上了董卓；孔文举（孔融）、祢正平（祢衡）杨德祖（杨修）碰上了曹操；嵇叔夜（嵇康）和阮嗣宗（阮籍）碰上了司马昭和司马师；温太真（温峤）碰上了王处仲（王敦）；谢安石（谢安）和孟嘉碰上了桓温。他们都可以称得上是不幸的了。蔡伯喈不过是仅仅逃脱了董卓的魔掌，但终究还是丢了性命；祢正平辗转死在黄祖手下；孔文举被满门抄斩；杨德祖被戮杀；嵇叔夜在东市刑场惨遭杀害；阮嗣宗一直假装疯狂，甚至于撰写了《劝进表》呈献司马师以逃脱死难；温太真靠着聪明才智挫败钱凤，获得赦免，却依然像踩着虎尾巴一样面临危险；只有谢安石靠着盛名、超群的见识和极端的真诚获得桓温的敬重，使桓温不敢产生觊觎政权的念头，但谢安石仍有“为了性命忍受片刻”和“晋朝的存亡只靠这一趟了”的担忧；孟嘉这人平和、旷达、韬晦、少语，名望居州里的首位，他算得上是德高望重的人了。他在桓温的官府里历任西参军、从事、中郎、长史等官职。在朝廷中敢于仗义执言、主持公道，固执地不愿效仿郗超之流那样草率地与桓温相交往。但他自料最终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所以纵酒放浪。至于在龙山上坠落冠帽，哪是不自知的呢！桓温竟至于说：“人不可以没有权势，我竟能够驾驶您！”桓温这个老奸贼在这里暴露了他的内心！孟嘉尽管靠着酒得以保全性命，侥幸地自然去世，但享年也只有五十一岁，大概是被酒伤害的缘故。陶渊明是孟嘉的外孙，哀伤孟嘉“持道悠长却时运短促”，可悲啊！

俗语放钱

【原文】 今人出本钱以规利入，俗语谓之放债，又名生放，予考之亦有所来。《汉书·谷永传》云：“至为人起责，分利受谢。”颜师古注曰：“言富贾有钱，假托其名，代之为主，放与他人，以取利息而共分之。”此“放”字所起也。

【译文】 现在人们出本钱以图收取利息，俗语叫作“放债”，又叫“生放”，据我考证这种说法也是有来历的。《汉书·谷永传》说：“甚至为人收债，分利受谢”。颜师古注释说：“说的是富商们有钱，假托他们的名字，替他们作主人，把钱放给别人，收取利息后两家分”，“放”字最早就是从由此来的。

汉书多叙谷永

【原文】 予亡弟景何，少时读书甚精勤，昼夜不释卷，不幸有心疾，以至夭逝。尝见梁弘夫诵《汉书》，即云：“唯谷永一人，无处不有”。弘夫验之于史，乃服其说。今五十余年矣，漫摭永诸所论建，以渫予在原之思。薛宣为少府，御史大夫缺，永言宣简在两府。谏大夫刘辅系狱，永同中朝臣上书救之。光禄大夫郑宽中卒，永乞以师傅恩加其礼谥。陈汤下狱，永上疏颂其功。鸿嘉河决，永言当观水势，然后顺天心而图之。成帝好鬼神方术，永言皆妄人惑众，挟左道以欺罔世主，宜距绝此类。梁王为有司奏禽兽行，永上疏谏止勿治。淳于长初封，下朝臣议，永言长当封。段会宗复为西域都护，永怜其老复远出，手书戒之。建昭雨雪，燕多死，永请皇后就宫，令众妾人人更进。建始星孛营室，永言为后宫怀妊之象。彗星加之，将有绝继嗣者；永始日食，永以《易》占对，言酒亡节之所致。次年又食，永言民愁怨之所致。星陨如雨，永言王者失道，下将叛去，故星叛天而陨，以见其象。《楼护传》言：“谷子云之笔札”；《叙传》述其论许、班事。《许皇后传》云：“上采永所言以答书。”其载于史者详复如此。本传云：“永善言灾异，前后所上四十余事。”盖谓是也。

【译文】 我的亡弟景何，小时候读书十分勤奋，经常昼夜手不释卷，不幸心脏有病，以至夭折。有一次，他看到梁弘夫正在读《汉书》，立即接上一句：“哪儿都可以见到谷永的言行事迹。”梁弘夫在史书中一一验核，于是信服了我弟弟的说法。这件事距今已有五十多年了，我随意翻阅并摘录《汉书》中记载的谷永的各项论说和建树，以抒发我对患难与共的兄弟的思念之情。《汉书》载，薛宣任少府之职时，朝中缺乏可担任御史大夫职位的人选，经欲永建议从两府之中选中了薛宣；谏臣刘辅被捕入狱，谷永会同朝中大臣上奏营救；光禄大夫郑宽中去世，谷永请求按照老师的恩典待遇处理葬礼追封谥号；陈汤入狱时，谷永上疏称颂他的功劳；黄河在鸿嘉决口，谷永表示应当观察水势，然后顺从天意而行对策；汉成帝喜欢鬼神方术，谷永说那都是妖妄之徒惑乱普通人，凭借歪门邪道欺骗和迷惑皇帝，应当摒弃这类事情；梁王替有关部门奏禀有关动物

的事宜，谷永上疏谏止；淳于长刚刚受封时，朝下群臣议论纷纷，谷永称说淳于长应当受封的理由；段会宗担任西域都护之职时，谷永哀怜他年龄已大却又要外出远方，亲自写信提醒他小心从事；建昭年间下雪，许多燕子被冻死，谷永请皇后回到宫中，并让侍妾们轮流进宫伺候；建始年间，星象改变位置，谷永把它解释为妃嫔怀孕的征兆，而彗星相袭，则为将有继承皇位的人死亡的征兆；永始年间发生了日食现象，谷永以《周易》的占卦相对应，解释说这是酗酒无度造成的；次年又发生了日食，谷永解释说这是百姓的愁苦和怨恨所造成的；星石像雨点一般陨落，谷永解释说在位的王室没有仁道，部下将领纷纷叛离，所以星石叛离天空而陨落，以呈现征象。《汉书·楼护传》曾提及“谷子云（谷永）的笔记”；《叙传》中提到了谷永议论许、班等人的事情；《许皇后传》说：“皇上采用了谷永的话写了回信。”谷永在史书上的记载就是这样详细。《汉书·谷永传》载：“谷永擅于预言并解释自然灾害和特异现象，前后共上奏了四十余件事情。”指的大概就是这些。

玉堂殿阁

【原文】 汉谷永对成帝问曰：“抑损椒房、玉堂之盛宠。”颜师古注：“椒房，皇后所居；玉堂，嬖幸之舍也。”按《汉书·李寻传》：“久污玉堂之署”。注：“玉堂殿在未央宫。”翼奉疏曰：“孝文帝时，未央宫又无高门、武台、麒麟、凤凰、白虎、玉堂、金华之殿。”《三辅黄图》曰：“未央宫有殿阁三十二，椒房、玉堂在其中。”《汉宫阁记》云：“未央宫有玉堂、宜室阁。”又引《汉书》“建章宫南有玉堂，壁门三层，台高二十丈，玉堂内殿十二门阶，阶皆玉为之。又有玉堂、神明堂二十六殿。”然今《汉书·郊祀志》但云“建章宫南有玉堂壁门”，而无它语。晋灼注扬雄《解嘲》“上玉堂”之句，曰：“《黄图》有大玉堂，小玉堂殿”，而今《黄图》无此文。国朝太宗淳化中，赐翰林“玉堂之署”四字，其后以最下一字犯庙讳，故元符中只云“玉堂”。绍兴末，学士周麟之又乞高宗御书“玉堂”二字，揭于直庐，麟之跋语，自有所疑。已而议皆谓玉堂乃殿名，不得以为臣下直舍，当如承明故事，请曰“玉堂之庐”可也。今翰林但扁“文堂”三字，示不敢居。然则其为禁内宫殿明白，有殿，有阁、有台。谷永以配椒房之言，意当日亦尝为燕游之地，师古直以为嬖幸之舍，与前注自相舛异，大误矣。

【译文】 西汉末年谷永在回答成帝的问题时说：“应该贬损一些对椒房、玉

堂的宠爱”。颜师古注释说：“椒房是皇后居住的地方，玉堂是成帝嬖幸居住的地方”。按《汉书·李寻传》记载：“久污玉堂之署”，师古注：“玉堂殿在未央宫”。翼奉疏：“孝文帝时，未央宫还没有高门、武台、麒麟、凤凰、白虎、玉堂、金华诸殿。”《三辅黄图》记载：“未央宫有三十二座殿阁，椒房殿和玉堂殿是其中的两个”。《汉宫阁记》记载：“未央宫有玉堂殿、宜室阁”。它征引《汉书》说：“建章宫的南边是玉堂殿，它有三层壁门，台高二十丈，玉堂内殿有十二级台阶，台阶都由玉石砌成。还有玉堂殿、神明堂，共有二十六座殿阁”。然而今天的《汉书·郊祀志》只说“建章宫的南边是玉堂殿的壁门”，没有下面那段话。晋灼在注释扬雄《解嘲》中“上玉堂”一句时写道：“《三辅黄图》有大玉堂和小玉堂殿”，而今天的《三辅黄图》却没有这句话。本朝太宗淳化年间中期，御赐翰林院为“玉堂之署”，后来因为“署”字触犯了庙讳，所以到哲宗元符中只称“玉堂”。高宗绍兴末，学士周麟之又请高宗题写“玉堂”二字，悬于直庐，麟之在作跋语时产生了疑问。不久人们议论玉堂属于殿名，不能作为臣下办公地方的名字，应当按照承明先例，叫作“玉堂之庐。”现在翰林院只悬挂“褰文堂”三个字，表示不敢居内。然而它为禁苑内殿是十分明白的，它有殿，有阁，又有台。谷永用它来与椒房相配合，想来当时也曾经作过游玩场所，颜师古直接断言为嬖幸之舍，与前一个注自相矛盾，岂不大错特错了。

汉武帝喜杀人者

【原文】 汉武帝天资刚严，闻臣下有杀人者，不唯不加之罪，更喜而褒称之。李广以故将军屏居蓝田，夜出至亭，为霸陵醉尉所辱。居无何，拜右北平太守，请尉与俱，至军而斩之，上书自陈谢罪。上报曰：“将军者，国之爪牙也。怒形则千里竦，威振则万物伏。夫报忿除害，朕之所图于将军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颡请罪，岂朕之指哉！”胡建守军正丞（谓未得真官，兼守之也），时监军御史穿北军垒垣以为贾区，建欲诛之。当选士马日，御史与护军诸校列坐堂上，建趋至拜谒，因令走卒曳御史下，斩之。遂上奏曰：“案军法：‘正亡属将军，将军有罪以闻，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于用法疑，臣谨以斩。”谓丞属军正，斩御史于法有疑也。制曰：“三王或誓于军中，欲民先成其虑也；或誓于军门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将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建有何疑焉”。建由是显名。观此二诏，岂不开妄杀之路乎？

【译文】 汉武帝天性刚戾，听到臣下有人杀人，无论什么情形，不但不加

以治罪，反而大加赞扬。李广以故将军的身份退居蓝田，夜出至亭，被酒醉的霸陵尉羞辱一顿。过了不久，李广被拜为右北平太守，请求把霸陵尉调出随他一起走，到了右北平就把他斩首，接着上书谢罪。武帝批示道：“将军为国家的爪牙，发怒则千里惊恐，奋威则万物倒伏。报仇除害，正是我对将军你的期望。如果你摘帽赤脚，叩头谢罪，这哪里是我的意思？”胡建代理军正丞，监军御史推倒北军的一堵院墙作为军市，胡建准备杀了他。在挑选战士的那一天，御史和护军诸校尉站在武帝的两边，胡建跨前拜谒过皇上后，命令随从把御史拖下来斩掉。然后上奏武帝说：“按照军法，军正不受将军统属，将军有罪要及时报告，二千石以下的官吏可以就地处置。我对军法有点疑问，但我还是把监军御史斩了”。这是说军丞统属于军正，斩御史不知是否合法？武帝答复说：“三王之中，有的在军中起誓，这是想让战士不要有疑虑；有的在军门之外誓师，这是让战士先有个思想准备；有的则在战前誓师，这是为了鼓励斗志。你有什么疑虑的呢？”胡建由此出了名。看了这两道诏书之后，怎能不开妄杀之戒呢？

知人之难

【原文】 霍光事武帝，但为奉车都尉，出则奉车，入侍左右，虽以小心谨饬，亲信初未尝少见于事也。一旦位诸百僚之上，使之受遗当国。金日磾以胡父不降，没入官养马，上因游宴见马，于造次顷刻间，异其为人，即日亲近，其后遂为光副。两人皆能称上所委。然一日用四人，若上官桀、桑弘羊亦同时辅政，几于欲害霍光，苟非昭帝之明，社稷危矣。则其知人之哲，得失相半，为未能尽，此虽帝尧之圣而以为难也。

【译文】 霍光辅佐汉武帝时，官职仅为奉车都尉。汉武帝出宫，霍光就主管辇车；汉武帝入宫，霍光就紧跟在他的前后左右侍奉。霍光尽管小心谨慎对待汉武帝的亲近和信任，却也了解了不少宫中内幕。终于身居百官之上的高位，接受嘱托，主持朝政。金日磾由于他那胡人父亲不肯投降汉人，被抄没入宫中养马。汉武帝曾经在游玩时偶然见到了他所养的马，对他这个人感到奇异，于是很快就与他亲近起来。后来金日磾终于成为霍光的助手。霍光和金日磾两人都能符合汉武帝所交办事务的要求。但是汉武帝同时起用四个人，使上官桀和桑弘羊也同时辅政，就几乎使霍光遭到陷害。如果没有汉昭帝的明察，那么国家就危险了！如此看来，武帝了解人的明察能力是得失各占一半，不是完全正确。这一点，即使是具备了尧帝那样的圣明，也仍然是有困难的。

馆职迁除

【原文】 建炎南渡，稍置馆职，绍兴初，始定制，除监、少丞外，以著作郎、佐郎、秘书郎二员，校书、正字通十二员为额，仿唐瀛州十八学士之数。其迁出它司，非郎官即御史。唯林之奇以疾，王十朋以论事，皆徙越府大宗正丞。自乾道以后，有旨，须曾任为县，始得除台、察，曾任郡守，始得为郎。三馆之士固无有历此者，于是朝廷欲越次擢用者，乃以为将作、军器少监，旋进为监，即班在郎上，则无所不可为。欲径跻清要者，则由著迁秘郎，而拜左右二史，不然，不过兼权省郎，年岁间求一郡而去。而御史之除，皆归六院矣。尔后颇靳其选，俟再迁寺监丞簿，然后命之。向时郡守召用，虽自军垒亦除郎，今资浅望轻者，但得丞及司直，或又再命，始入省云。

【译文】 宋王朝自建炎南渡以来，慢慢重新设置各馆职，到高宗绍兴初年，制度确立下来，除了监和少丞外，定员一共十八人：即著作郎、佐郎、秘书郎各二人，校书、正字通十二人，以仿效唐代文学馆十八学士的数额。调往其它衙门的，不是郎官就是御史。只有林之奇因为健康的原因，王十朋因为论事的缘故，两人被升迁为越府大宗正丞。从孝宗乾道年间以后，皇上降旨，京官中必须当过知县官，才能任台、察官，出任过郡守，才能任郎官。广文、大学、律学三馆各官都没有这一经历，于是朝廷对于那些准备破格提拔的人，先委之以将作、军器少监，很快提升为监，地位既在郎官之上，升任他职就畅通无阻了。准备直接跻身于清显枢要的，则由著作郎迁秘书郎，进而升为左右二史；否则不过兼权省郎，一年半载之后求得一郡守的位置离去，而御史的选拔任命，都归登文检院、登闻鼓院、官告院、都进奏院、诸军司粮科院、两审计司六个衙门，其后选拔渐渐严格，要等到再迁为寺监丞簿之后，才能任命。以前郡守召用，即使从军营中直接调出就可任为郎官，现在资历浅、声望小的人，只能先任丞或司直，再次提拔后才能入省。

卷七

盛衰不可常

【原文】 东坡谓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予每读书史，追悼古昔，未尝不掩卷而叹。伶子于叙《赵飞燕传》，极道其姊弟一时之盛，而终之以荒田野草之悲，言盛之不可留，衰之不可推，正此意也。国初时，工部尚书杨玠长安旧居，多为邻里侵占，子弟欲以状诉其事，玠批纸尾，有“试上含元基上望，秋风秋草正离离”之句。方去唐末百年，而故宫殿已如此，殆于宗周《黍离》之咏矣。慈恩寺塔有荆叔所题一绝句，字极小而端劲，最为感人。其词曰：“汉国河山在，秦陵草木深。暮云千里色，无处不伤心。”旨意高远，不知为何人，必唐世诗流所作也。李峤《汾阴行》云：“富贵荣华能几时？山川满目泪沾衣。不见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飞。”明皇闻之，至于泣下。杜甫《观画马图》云：“忆昔巡幸新丰宫，翠华拂天来向东。腾骧磊落三万匹，皆与此图筋骨同。君不见金粟堆前松柏里，龙媒去尽鸟呼风。”《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云：“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孙剑器初第一。五十年间似反掌，风尘荏苒昏王室。梨园弟子散如烟，女乐余姿映寒日。”元微之《连昌宫词》云：“两京定后六七年，却寻家舍行宫前。庄园烧尽有枯井，行宫门阙树宛然。”又云：“舞榭欹倾基尚存，文窗窈窕纱犹绿。”“上皇偏爱临砌花，依然御榻临街斜。”“寝殿相连端正楼，太真梳洗楼上头。晨光未出帘影黑，至今反挂珊瑚钩。指似傍人因恸哭，却出宫门泪相续。”凡此诸篇，不可胜记。《飞燕别传》以为伶玄所作，又有玄自叙及桓谭跋语。予窃有疑焉，不唯其书太弃，至云扬雄独知之，雄贪名矫激，谢不与交；为河东都尉，奸辱决曹班，躅从兄子彪续司马《史记》，绌子于无所叙录，皆恐不然。而白云：“成、哀之世，为淮南相。”案，是时淮南国绝久矣，可昭其妄也。因序次诸诗，聊载于此。

【译文】 苏东坡（苏轼）曾说，衰败与兴旺，成功或失败无法预料。我每每在阅读历史书籍时追念古昔之时，总一定会合上书卷感叹。伶子于撰《赵飞燕传》，详细描述了赵飞燕姐妹俩短暂的盛势，但终归面临荒田野草般的悲惨境地。所谓的盛势不可久留，衰败无法推却，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建国初期，工

部尚书杨玢在长安的老房子大多被邻里侵占。杨玢的子弟们想要通过诉讼解决此事。杨玢却在诉状末尾批写上了“试上含元基上望，秋风秋草正离离（试着登上唐代含元殿废墟台基上望望，只见秋风萧飒秋草繁茂）”的诗句。离唐代还不到一百年，旧时宫殿就已经这样，大概已无于周代《黍离》诗中“彼黍离离（那繁茂的野黍啊）”的感叹了。慈恩寺塔上，有荆叔所题的一首绝句，刻字极小却非常端正有力，内容非常感人。词句为：“汉国河山在，秦陵草木深。暮云千里色，无处不伤心（汉代河山依旧在，秦朝陵墓草木深。晚霞暮云千里色，没有一处不伤心）。”旨意高远。不知作者是谁，但可以肯定是唐代的诗人所作。李峤的诗《汾阳行》写道：“富贵荣华能几时？山川满目泪沾衣。不见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飞（富贵荣华能持续多长？满目山河泪水沾湿了衣裳。君不见现在汾河水面之上，年年只有秋雁在飞翔）。”唐明皇听到这首诗后，竟至于落下了眼泪。杜甫的诗《观画马图》写道：“忆昔巡幸新丰宫，翠华拂天来向东。腾骧磊落三万匹，皆与此图筋骨同。君不见金粟堆前松柏里，龙媒去尽鸟呼风（回忆从前驾临新丰宫时，翠华铺天盖地向东飘来。三万匹矫健的奔马，都与这幅画上的马筋骨相同。您没见到吗？唐明皇陵墓前松柏里，骏马已经不见，只剩下鸟儿在风里鸣叫）！”《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写道：“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孙剑器初第一。五十年间似反掌。风尘穆洞昏王室。梨园弟子散如烟，女乐余姿映寒日（先代皇帝的八千名侍女当中，公孙大娘的剑器舞数得上第一名。五十年时间像一翻手掌那么快地逝去了，只有风尘不断，使王室昏暗。梨园子弟全像一股烟似地飘散而去，只有女乐手的半老面容在寒冷的日光中被映照着）。”元微之（元稹）的诗《连昌宫词》写道：“两京定后六七年，却寻家舍行宫前。庄园烧尽有枯井，行宫门阙树宛然（东西两京平定后的六七年间，又回到当年的行宫前寻找故园。只见庄园已被烧尽，只剩一口枯井，行宫门口的大树也依旧当年）。”又写道：“舞榭欹倾基尚存，文窗窈窕纱犹绿（歌舞的楼台已倾斜，只有基础还存在，雕花的窗口，窗纱依然碧绿如旧）。”“上皇偏爱临砌花，依然御榻临阶斜（唐明皇偏爱靠近台阶的花，御榻依然斜靠在台阶边上）。”“寝殿相连端正楼，太真梳洗楼上头。晨光未出帘影黑，至今反挂珊瑚钩。指似旁人因恸器，却出宫门泪相续（寝殿与端正楼相连接，太真杨贵妃在楼上梳洗。清晨太阳尚未升起，帘门影黑，至今还用珊瑚钩倒挂着。面对边上的人失声痛哭，退出宫门以后，眼泪依然流个不停）。”这样的诗篇数不胜数。《飞燕别传》，人们往往认为是伶玄所作，又有伶玄的《自叙》和桓谭的《跋语》。我却私下有所怀疑。这篇传记不但文字过于纷乱，而且叙及只有扬雄一人知道，以及扬雄贪图声名，骄傲跋扈，作者与其断交；任河东都尉时，曾妄然侮辱并判罪班固，班

躅跟着哥哥班彪续写司马迁的《史记》，没有把子于撰录入书，等等，恐怕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又竟至于自称“汉成帝和汉哀帝时，担任淮南王的相国。”事实上这时淮南国早已不存在。由此可以断定这些说法全是胡编。由于编排各诗的缘故，暂且在这里记载一下。

唐赋造语相似

【原文】 唐人作赋，多以造语为奇。杜牧《阿房宫赋》云：“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烟斜雾横，焚椒兰也。雷霆乍惊，宫车过也。辘辘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其比兴引喻，如是其侈。然杨敬之《华山赋》又在其前，叙述尤壮，曰：“见若咫尺，田千亩矣。见若环堵，城千雉矣。见若杯水，池百里矣。见若蚁垤，台九层矣。醯鸡往来，周东西矣。蟻螻纷纷，秦速亡矣。蜂巢联联，起阿房矣。俄而复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咸阳矣。累累蜚栗，祖龙藏矣。”后又有李庾者，赋西都云：“秦址薪矣，汉址芜矣。西去一舍，鞠为墟矣。代远时移，作新都矣。”其文与意皆不逮杨、杜远甚。高彦休《阙史》云敬之“赋五千字，唱在人口”。赋内之句，如上数语，杜司徒佑、李太尉德裕常所诵念。牧之乃佑孙，则《阿房赋》实模仿杨作也。彦休者，昭宗时人。

【译文】 唐代人写赋，大多数都把创造新鲜词语做为高妙奇绝。杜牧《阿房宫赋》说：“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烟邪雾横，焚椒兰也。雷霆乍惊，宫车过也。辘辘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它的比喻和征引，真是够丰富的了。然而杨敬之的《华山赋》作于《阿房宫赋》之前，叙述更加壮观。这篇赋说：“见若咫尺，田千亩矣。见若环堵，城千雉矣。见若杯水，池百里矣。见若蚁垤，台九层矣。醯鸡往来，周东西矣。蟻螻纷纷，秦速亡矣。蜂巢联联，起阿房矣。俄而复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咸阳矣。累累蜚栗，祖龙藏矣。”此后又有一位叫李庾的人以西都为题作赋说：“秦址薪矣，汉址芜矣。西去一舍，鞠为墟矣。代远时移，作新都矣。”这篇赋的文采和意境都比不上杨敬之、杜牧的作品。高彦休的《阙史》说杨敬之“赋共五千字，传唱在人口”。此赋中的用句，大致都如上文所引，唐司徒杜佑、太尉李德裕都时常背诵朗读。杜牧是杜佑的孙子，看来《阿房宫赋》实际上是模仿杨敬之《华山赋》写出的。高彦休是唐昭宗时人。

张蕴古大宝箴

【原文】 唐太宗初即位，直中书省张蕴古上《大宝箴》，凡六百余言，遂擢大理丞。《新唐史》附其姓名于《文艺·谢偃传》末，又不载此文，但云“讽帝以民畏而未怀，其辞挺切”而已。《资治通鉴》仅载其略曰：“圣人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壮九重于内，所居不过容膝，彼昏不知，瑶其台而琼其室；罗八珍于前，所食不过适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没而暗，勿察察而明，虽冕旒蔽目而视于未形，虽设纒塞耳而听于无声。”然此外尚多规正之语，如曰：“惟辟作福，为君实难。主普天之下，处王公之上，任士贡其有求，具寮陈其所倡。是故恐惧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转放。岂知事起乎所忽，祸生乎无妄。”“大明无私照，至公无私亲。”“礼以禁其奢，乐以防其佚。”“勿谓无知，居高听卑；勿谓何害，积小就大。乐不可极，乐极生哀；欲不可纵，纵欲成灾。”“勿内荒于色，勿外荒于禽。勿贵难得货，勿听亡国音。内荒伐人性，外荒荡人心。难得之货侈，亡国之音淫。勿谓我尊而慢贤侮士，勿谓我智而拒谏矜已。”“安彼反侧，如春阳秋露，巍巍荡荡，恢汉高高度；抚兹庶事，如履薄临深，战战栗栗，用周文小心。”“一彼此于胸臆，捐好恶于心想。”“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悬者，轻重自见；如水如镜，不示物以情，物之鉴者，妍媸自生。勿浑浑而浊，勿皎皎而清；勿没没而暗，勿察察而明。”“吾王拨乱，戡以智力，民惧其威，未怀其德；我皇抚运，扇以淳风，民怀其始，未保其终。”“使人以心，应言以行。”“天下为公，一人有庆。”其文大抵不凡，既不为史所书，故学者亦罕传诵。蕴古为丞四年，以无罪受戮，太宗寻悔之，乃有覆奏之旨，传亦不书，而以为坐事诛，皆失之矣。《旧唐书》全载此箴，仍专立传，不知宋景文何为削之也？

【译文】 唐太宗刚刚登上皇帝宝座时，直中书省张蕴古进献《大宝箴》一首，共六百多字，不久他被提升为大理寺丞。《新唐书》将他的姓名附在《文艺传·谢偃传》的后面，也没有载录这篇文章，只是说“以百姓惧怕君王而君王又未能施仁义于天下的现实向太宗进谏，其文辞亮直恳切”而已。《资治通鉴》仅仅摘录了其中的几句话说：“圣人敬受天命，拯救危亡，克服艰难。”“因此要以一人之力治理天下，而不能以天下之力事奉一人。”“在内宫修建富丽堂皇的宫殿，真正居处的也不过一身之地，那些昏庸的帝王不明此理，一味用美玉宝石装点他们的台榭宫室；面前罗列出百味珍馐；不过求一餐适合自己的口味，那

些迷乱心性的帝王不思此理，一味使美酒盈池、糟糠成山。”“不要身居帝王的高位而使朝政昏暗，也不要过于刚愎而自认为清明。纵然是冕旒遮蔽了眼目，也要像没有这些器物一样前视，即使是鲋纆塞在耳边，也要像没有这些绵丸一样不听无益之言。”然而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规劝帝王的良言，譬如《箴》中还说：“虽然只有君王可以专享威福，但做个好的君王的也是很不容易的。他主宰着天下万民，身居王公之上，八方贡物任凭他的支配，文武百官都得听他的指挥。因此居安思危之心会一天比一天松懈，懒慢乖戾之心会一天比一天增长。岂不知大难往往起于细微的小事，祸患往往生于意想不到的地方。”“太阳之光不因它的偏爱照耀万物，圣王的仁惠不因它的偏爱亲近哪个人。”“礼是用来阻禁奢侈的，乐是用来防备放荡的。”“不要说自己不察民情，居于高位要倾听万民的声音；不要说小错有什么祸害？小错积多了就成了大祸。享乐不要超越极限，享乐超越了极限就要转化成悲哀；欲望不能放纵，放纵了欲望就会酿成灾祸。”“在内廷不要沉溺于女色，在朝外不要沉溺于游猎。不要把难得之物看得过于贵重，不要听亡国的靡靡之音。沉溺于女色会使人精神昏聩，沉溺于畋猎会使人心性浮躁。难得之物看的过重就会变得奢侈，亡国之音听的过多就会变得精神萎靡。不要认为自己至尊无上就侮慢贤人志士；不要认为自己聪明睿智就骄傲而拒绝讽谏。”“对于那些稍有贰心的人要善于安抚，就像春天的朝阳，秋天的雨露，像高山巍巍，大河荡荡，具有汉高祖的广阔襟胸；对于日常诸事要谨慎处理，就像走在薄冰上、走到深渊前，要一丝不苟，认真学习周文王的恭谨。”“要把各方面的意见都装在胸中，要把喜好的和厌恶的感情都隐藏于心中。”“像衡器、量具，不要给事物限定什么标准，事物摆出来，它的轻重自己就会显现出来；像清水、明镜，不要给事物规定一定的情态，事物摆出来，它的美丑自己也会表现出来。不要浑浑噩噩头脑混浊，也不要自视高洁清高孤傲；不要沉溺于帝王的高位而使朝政昏暗，也不要过于刚愎而自认为清明。”“当今皇上平定天下，用的是智谋和武力，百姓害怕君王的威严，但陛下还未能在天下普施仁义；当今陛下治理天下，虽然已经注重教化仁爱，但百姓还只能爱其始，不能保其终。”“教化治理百姓要以诚心相待，言必信，行必果。”“天下万民一心为公，这才是君王一人的福分。”这篇文章用意大都不同一般，因为没有被史书记载下来，所以读书人也就传诵的很少。张蕴古担任大理寺丞四年，没有犯罪而却惨遭杀戮，事后不久，唐太宗也为此而深深懊悔，于是传旨恢复覆奏死刑犯者的制度，《新唐书》的附传也没有记载这件事，而误认为他是牵连罪案而受到诛杀，这都与事实不相符合。《旧唐书》将这篇箴言全文录入，又为他专立一传，不知宋祁为什么将这些内容删去。

国初文籍

【原文】 国初承五季乱离之后，所在书籍印板至少，宜其焚炆荡析，了无子遗。然太平兴国中编次《御览》，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种，其纲目并载于首卷，而杂书、古诗赋又不及具录，以今考之，无传者十之七八矣，则是承平百七十年，翻不若极乱之世。姚铉以大中祥符四年集《唐文粹》，其序有云：“况今历代坟籍，略无亡逸。”观铉所类文集，盖亦多不存，诚为可叹！

【译文】 宋朝开国于五代战乱之后，各地的书籍印版非常罕见，这当然是由于焚烧毁弃，所以几乎绝迹。然而太平兴国年间編集《太平御览》，引用书籍达一千六百九十种，这些书的目录全部记录在该书第一卷，而杂书和古代诗赋还没能够大量收录。拿今天的书录来核查《御览》，失传的书籍占十分之七八了，如此看来，宋朝太平一百七十年，反倒不如战乱频仍的时代。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姚铉收集《唐文粹》，他在该书的序言中谈道：“何况如今历代的经典图籍，大都没有亡失。”查检姚铉类编的文集，如今也有很多原书已经不复存在，实在可惜！

叙西汉郊祀天地

【原文】 郊祀合祭、分祭之论，国朝元丰、元璽、绍圣中三议之矣，莫辩于东坡之立说，然其大旨驳当时议臣，谓周、汉以来，皆尝合祭，及谓夏至之日行礼为不便。予固赞美之于《四笔》矣。但熟考《汉史》，犹为未尽。自高皇帝增秦四 为五，以事天地。武帝以来，至于元、成，皆郊见甘泉。武帝因幸汾阴，始立后土祠于竝上，率岁岁间举之，或隔一岁，常以正月郊泰 ，三月祠后土。成帝建始元年，初立南北郊，亦用正月、三月辛日，而罢甘泉、汾阴之祭。元丰、璽、绍三议，皆未尝及此。盖盛夏入庙出郊，在汉礼元不然也。是时，坡公以非议者所起，故不暇更为之说，似不必深攻合祭为王莽所行，庶几往复考贖，不至矛盾，当复俟知礼者折衷之焉。

【译文】 郊祀中的合祭和分祭，本朝元丰、元璽、绍圣年中已经议论了三次，没有比苏轼的说得明白的了，然而苏轼之说法主要目的在于驳斥当时参加议论的大臣，说周、汉以来，都曾合祭天地，并说夏至这一天行郊祭礼十

分不便。我原已在《容斋四笔》中对他说给以充分肯定，只是仔细地考察《汉书》，感到苏轼之说还不是十分详尽。自从汉高祖刘邦把秦朝的四个祭地增加到五个，并以此敬事天地。汉武帝以后，直到元帝、成帝，都在甘泉宫进行祭祀。因汉武帝曾巡行于汾阴，才在積上建立了后土祠，其后年年都到那里去祭后土，有时也隔一年去一次，通常是正月里祭泰，三月里祭后土。汉成帝建始元年（公元前 29 年），开始设立南北两郊，也还采用正月和三月的辛日祭天地，此后取消了甘泉和汾阴的郊祭活动。元丰、元蠡、绍圣间的三次议论，都没有说到这些。看来盛夏之时进入庙中、外出郊野，在汉代的礼制中原本就不是如此。当时，由于持错误意见的大臣占了上风，所以苏东坡来不及再提出详尽的说法。看来似乎没有必要深究合祭是王莽实行的制度，或许可以通过更详密的考证，使之不至于自相矛盾，这就要等待深知礼制的学者来做这项工作了。

騫騫二字义训

【原文】 騫騫二字，音义训释不同。以字书正之，騫，去乾切。注云：“马复絜，又亏也。”今列于《礼部韵略》下平声二仙中。騫，虚言切。注云：“飞貌。”今列于上平声二十二元中。文人相承，以騫亏之騫为轩昂掀举之义，非也。其字之下从马，马岂能掀举哉？闵损字子騫，虽古圣贤命名制字，未必有所拘泥，若如亏少之义，则涣然矣。其下从鸟，则于掀飞之训为得。此字殆废于今，故东坡、山谷亦皆押騫字入元韵，如“时来或作鹏騫”、“传非其人恐飞騫”之类，特不暇毛举深考耳，唯韩公《和侯协律咏笋》一联云：“得时方张王，挟势欲腾騫。”乃为得之。此固小学琐琐，尤可以见公之不苟于下笔也。

【译文】 騫騫两个字，读音和释义各不相同。用字书来订正它们，騫，读去干切。注释说：“马腹部的带子。又一义释为亏损。”现在列在《礼部韵略》下平声中的“二仙”韵中。騫，读虚言切。注释说：“飞的样子。”现在列在《礼部韵略》上平声中的“二十二元”韵中。文人们以讹传讹，认为騫亏的騫字应为轩昂、飞腾的意思，这是不正确的。这个字的字形偏旁是个马字，马怎么能飞腾呢？孔子弟子闵损字子騫，虽说古代的圣贤起名、造字不一定有什么拘泥限定，可是就像这个“亏缺”的意义，与损的意义相通，不是再明白不过了吗！騫形旁是个鸟字，那就和“飞腾”的解释相一致了。这个字恐怕当今已不再用，所以苏轼、黄庭坚都把騫字押入了“元”韵，比如“时来或作鹏騫”、“传非其人恐飞騫”之类的句子，都是落笔之前没有进行详细的考察。只有韩愈《和侯

协律咏笋》诗中的一联说：“得时方张王，挟势俗腾骞。”这里用得十分精当。这本来不过是琐屑的语言文字方面的东西，正因其琐屑，才更可以发现韩公严谨的治学态度！

书奇信陵事

【原文】 夜读白乐天《秦中吟》十诗，其《立碑》篇云：“我闻望江县，奇令抚遐嫠。（奇，名信陵）在官有仁政，名不闻京师。身歿欲归葬，百姓遮路歧。攀轭不得去，留葬此江湄。至今道其名，男女涕皆垂。无人立碑碣，唯有邑人知。”予因忆少年寓无锡时，从钱仲仲大夫借书，正得信陵遗集，财有诗三十三首、《祈雨文》三首。信陵以贞元元年鲍防下及第，为四人，以六年作望江令。读其《投石祝江文》云：“必也私欲之求，行于邑里，惨黷之政，施于黎元，令长之罪也。神得而诛之，岂可移于人以害其岁？”详味此言，其为政无愧于神天可见矣。至大中十一年，寄客乡贡进士姚羓以其文示县令萧缜，缜辍俸买石刊之。乐天十诗作于贞元元和之际，距其亡十五年耳，而名已不传。《新唐·艺文志》但记诗一卷，略无他说。非乐天之诗，几于与草木俱腐。乾道二年，历阳陆同为望江令，得其诗于汝阴王廉清，为刊板而致之郡库，但无《祈雨文》也。

【译文】 夜来阅读白乐天（白居易）《秦中吟》十首诗。其中《立碑》一篇写道：“我闻望江县，颖令抚耄嫠。在官有仁政，名不闻京师。身歿欲归葬，百姓遮路歧。攀轭不得去，留葬此江湄。至今道其名，男女涕皆垂。无人立碑碣，唯有邑人知（我听说江望县令颖信陵怜爱孤寡，在任期间实行仁政，却不为朝廷所知。他去世后将要送葬时，百姓们拦在路上，抓住灵车轭木不让离开，只得留葬在江边岸上。至今说起颖信陵的名字，人们依然落下眼泪。没人为他立下墓碑，但望江县城的人们都是人口皆碑）。”我由此想起了年轻时住在无锡时，曾向钱仲仲先生借书，正好借到了颖信陵的遗著，只有三十三首诗、三首《祈雨文》。颖信陵于贞元元年（785年）考中了鲍防门下的进士，同门有四个人。贞元六年（790年），颖信陵担任了望江县令。他的《投石祝江文》写道：“如果让个人的私欲在地方上膨胀、流行，让苛酷政令加在百姓身上，那么就必定是地方长官的罪责了。神灵应当抓住地方长官来进行惩罚、诛戮，怎么能够把灾祸转嫁到百姓身上，伤害农作物的年成呢？”仔细品味这话，可以知道颖信陵从政并没有愧对神灵和上天。大中十一年（875年），外地赶考进士姚羓把这篇文章呈给县令萧缜，萧缜用薪俸买来了石版刻印了它。白居易的十首诗写于贞元

和元和年间，穎信陵的事还不到十五年，穎信陵的名字就已经失传了。《新唐书·艺文志》只记载说穎信陵诗一卷，完全没有其它记载。如果没有白居易的诗，那么穎信陵的名字几乎要同草和树一样腐烂了。乾道二年（1166年），历阳的陆同担任了望江县令，在汝阴发现了穎信陵的诗。王廉清将它们刊刻成版，并呈送到郡的府库中。只是没有收入《祈雨文》。

贡禹朱晖晚达

【原文】 贡禹壮年仕不遇，弃官而归。至元帝初，乃召用，由谏大夫迁光禄，奏言：“臣犬马之齿八十一，凡有一子，年十二。”则禹入朝时，盖年八十，其生子时固已七十岁矣，竟再迁至御史大夫，列于三公。杜子美云：“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是不然也。朱晖在章帝朝，自临淮太守屏居，后召拜仆射，复为太守，上疏乞留中，诏许之。因议事不合，自系狱，不肯复署议，曰：“行年八十，得在机密，当以死报。”遂闭口不复言。帝意解，迁为尚书令。至和帝时，复谏征匈奴，计其年当九十矣，其忠正非禹比也。

【译文】 贡禹壮年时仕途不顺，于是就辞官返乡。到汉元帝初年，又复出得到朝廷重用，由谏议大夫升为光禄大夫，为皇帝奏上疏说：“下臣今年已经八十一岁，只有一个儿子，年纪一十二岁。”这样算来，贡禹入朝的时候，大约已八十岁，他的儿子出生时，他也七十岁了，此后竟再升迁为御史大夫，跻身于三公的行列。杜甫有诗说：“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看来也不完全是这样。朱晖在汉章帝一朝，从临淮郡太守的官位上卸任乡居，后来徵召为仆射，又被任为郡太守，朱晖上疏请求留在朝中，章帝答应了他的奏请。由于与朝廷官员议事意见不和，自己身陷于牢狱，三天后出狱，不肯再议朝中大事，奏道：“臣已经八十岁，蒙圣恩得居朝中显官，理当以死相报。”于是闭上嘴巴，不再说话。后来章帝怒气消了，提升他担任尚书令。到了汉和帝朝，陈晖又奏请朝廷西击匈奴，算一算他当时的年纪，大约有九十岁了。朱晖的忠贞正直是贡禹无法相比的。

琵琶行海棠诗

【原文】 白乐天《琵琶行》一篇，读者但羨其风致，敬其词章，至形于乐

府，咏歌之不足，遂以谓真为长安故倡所作。予窃疑之。唐世法网虽于此为宽，然乐天尝居禁密，且谪官未久，必不肯乘夜入独处妇人船中，相从饮酒，至于极弹丝之乐，中夕方去，岂不虞商人者它日议其后乎？乐天之意，直欲摅写天涯沦落之恨尔。东坡谪黄州，赋《定惠院海棠》诗，有“陋邦何处得此花，无乃好事移西蜀”、“天涯流落俱何念，为饮一尊歌此曲”之句，其意亦尔也。或谓殊无一话一言与之相似，是不然，此真能用乐天之意者，何必效常人章摹句写而后已哉？

【译文】 白乐天（白居易）所创作的《琵琶行》一篇，读者只羡慕它的风格，敬佩它的词句和篇章，至于谱曲歌唱，歌唱了还觉得不够，读者于是就认为的确是旧时长安的娼妓所作。我私下对此有所怀疑。尽管唐代的法律比现在要宽松一些，但是白乐天曾经住在严密控制出入的官府之中，而且又贬官不久，绝对不会趁着夜色进入独居妇女的船中一起喝酒，甚至极尽弹奏丝弦乐器的快乐，到半夜才离去。难道就不顾虑日后商人们在他背后议论吗？白乐天的写诗用意，只在于叙写沦落天涯的遗憾罢了。苏东坡被贬黄州时，曾赋写《定惠院海棠》诗。诗中有“陋邦何处得此花，无乃好事移西蜀（破旧的地域从哪儿得来这花，该是有好事之徒把它迁栽到西蜀的吧）”，“天涯流落俱可念，为饮一尊歌此曲（都是沦落天涯、互相怜悯，为这喝上一杯，唱一唱这首歌）”的句子。意境也与此相同。有人会说这两种意境根本就没有一词一句相似。并不是如此。苏东坡真正能够仿效白乐天的意境，又何必像普通人那样逐句逐章地模仿才行呢？

东坡不随人后

【原文】 自屈原词赋假为渔父、日者问答之后，后人作者悉相规仿。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以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杨子云《长杨赋》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孟坚《两都赋》以西都宾、东都主人，张平子《两都赋》以凭虚公子、安处先生，左太冲《三都赋》以西蜀公子、东吴王孙、魏国先生，皆改名换字，蹈袭一律，无复超然新意稍出于法度规矩者。晋人成公绥《啸赋》无所宾主，必假逸群公子，乃能遣词。枚乘《七发》本只以楚太子、吴客为言，而曹子建《七启》遂有玄微子、镜机子。张景阳《七命》有冲漠公子、殉华大夫之名。言话非不工也，而此习根著未之或改。若东坡公作《后杞菊赋》，破题直云：“吁嗟先生，谁使汝坐堂上称太守？”殆如飞龙转鹏，蚝翔扶摇

于烟霄九万里之外，不可搏诘，岂区区巢林翥羽者所能窥探其涯穢哉？于诗亦然，乐天云：“醉貌如霜叶，虽红不是春。”坡则曰：“儿童误喜朱颜在，一笑哪知是酒红。”杜老云：“休将短发还吹帽，笑倩傍人为正冠。”坡则曰：“酒力渐消风力软，飕飕，破帽多情却恋头。”郑谷《十日菊》云：“自缘今日人心别，未必秋香一夜衰。”坡则曰：“相逢不用忙归去，明日黄花蝶也愁”。又曰：“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正采旧公案而机杼一新，前无古人，于是为至。与夫用“见他桃李树，思忆后园春”之意，以为“长因送人处，忆得别家时”，为一僧所嗤者有间矣。

【译文】 自从屈原的辞赋里有假借渔父、日者问答典故以后，后代的作者都竞相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假托子虚先生、乌有先生和亡是公；扬雄的《长杨赋》假托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固的《两都赋》假托西都宾和东都主人；张衡的《两都赋》假托凭虚公子和安处先生；左思的《三都赋》假托西蜀公子、东吴王孙和魏国先生，都是更名改姓，相互抄袭，没有能够创出新意或突破这个格式的。晋代人成公绥写《啸赋》，没有宾客和主人两方，也一定要假托一位逸群公子才能开篇动笔。枚乘的《七发》原本只是假托楚太子和吴客来对答，而曹植的《七启》便假托了玄微子和镜机子。张协的《七命》也出现了冲漠公子、殉华大夫的名称。这些赋、七的词语不能说不工不稳，只是这种相互抄袭的旧习气没有人刻意去改变它。像苏轼写《后杞菊赋》，开篇时点破题目直截了当地说：“吁嗟先生，谁让你坐在厅堂上妄称太守？”几乎像飞腾的蛟龙搏击大鹏，高高飞翔在九霄之上、万里之空，没办法对答发问，难道是那些不值一提的林中小鸟能够企及的吗？对于诗来说也是如此。白居易有诗句说：“醉貌如霜叶，虽红不是春。”苏轼有诗句则说：“儿童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杜甫说：“休将短发还吹帽，笑倩傍人为正冠。”苏轼则说：“酒力渐消风力软，飕飕，破帽多情却恋头。”郑谷的《十日菊》诗说：“自缘今日人心别，未必秋香一夜衰。”苏轼则说：“相逢不用忙归去，明日黄花蝶也愁。”还说：“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正所谓妙用前人诗意，而手法焕然一新，前无古人，至此诗算是做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和那种用“见他桃李树，思忆后园春”的意境而化作“长因送人处，忆得别家时”之语，被一位僧人所嘲笑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

元白习制料

【原文】 白乐天、元微之同习制科，中第之后，白公寄微之诗曰：“皆当少壮日，同惜盛明时。光景嗟虚掷，云霄窃暗窥。攻文朝纷纷，讲学夜孜孜。策目穿如札，毫锋锐若锥。”注云：“时与微之结集策略之目，其数至百十，各有纤锋细管笔，携以就试，相顾辄笑，目为毫锥。”乃知士子待敌，编缀应用，自唐以来则然，毫锥笔之名起于此也。

【译文】 白居易、元稹两个人都是攻习制科考试，中进士以后，白居易寄一首诗给元稹说：“皆当少壮日，同惜盛明时。光景嗟虚掷，云霄窃暗窥。攻文朝鸢鸢，讲学夜孜孜。策目穿如札，毫锋说若锥。”这首诗的注释说：“当时白居易和元稹共同收集策试范本，总共收集了上百篇，每篇都抄在细锋细管的毛笔管上，带在身上去参加考试，参考后两个人相对而笑，称之为‘毫锥’。”由此可知举子们对付考试，把范本编排在一起背诵记忆，从唐朝时就已经有了，“毫锥”笔的名称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门生门下见门生

【原文】 后唐裴尚书年老致政。清泰初，其门生马裔孙知举，放榜后引新进士谒谢于裴，裴欢宴永日，书一绝云：“宦途最重是文衡，天与愚夫作盛名。三主礼闱今八十，门生门下见门生。”时人荣之。事见苏耆《开谭录》。予以《五代登科记》考之，裴在同光中三知举，四年放进士八人，裔孙预焉。后十年，裔孙为翰林学士，以清泰三年放进士十三人，兹所书是已。裔孙寻拜相，新史亦载此一句云。白乐天诗有《与诸同年贺座主高侍郎新拜太常同宴萧尚书亭子》一篇。注云：“座主于萧尚书下及第。”予考《登科记》，乐天以贞元十六年庚辰中书舍人高郢下第四人登科，郢以宝应二年癸卯礼部侍郎萧昕下第九人登科，迨郢拜太堂时，几四十年矣。昕目癸卯放进士之后，二十四年丁卯，又以礼部尚书再知贡举，可谓寿俊。观白公所赋，益可见唐世举子之尊尚主司也。

【译文】 后唐的裴尚书老年主持政务。清泰初年，他的门生马裔孙主持考试。发榜后马裔孙领着刚中举的进士们谒见并感谢裴尚书。裴尚书同他们一起高兴地宴酒了一整天，并写了一首七绝诗道：“宦途最重是文衡，天与愚夫作盛

名。三主礼闱今八十，门生门下见门生。”（仕途上最重要的是主持考试，上天赐于我以盛名。我现已八十岁，曾三次主持考试，如今见到了门生的门生。）当时的新进士把这首诗引以为荣。这件事见于苏耆的《开谭录》。我按着《五代登科记》考知，裴尚书在同光年间曾三次主持考试，四年（926年）录取进士八人，当时马裔孙也是其中之一。十年以后，马裔孙任翰林学士，于清泰三年（936年）录取进士十三人，上文记载的就是这件事。马裔孙不久被任命为宰相，《新史》也记载了这件事。白乐天（白居易）有一首名为《与诸同年贺座主高侍郎新拜太常、同宴萧尚书亭子》的诗。注释中写道：“座主在萧尚书门下及第。”我据《登科记》考证，白乐天于贞元十六年（800年）庚辰考入中书舍人高郢门下，为第四名。高郢则于宝应二年（763年）癸卯考入礼部侍郎萧昕门下，为第九名。等到高郢担任太常的职务时，已经过去了将近四十年。萧昕自从宝应二年（787年）癸卯录取进士的二十四年以后丁卯，又以礼部尚书的职务再次主持考试，真可以称得上是寿俊了。从白乐天的诗中，更能看出唐代中举进士对主考官的尊敬和崇尚。

韩苏杜公叙马

【原文】 韩公《人物画记》，其叙马处云：“马大者九匹，于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焉，行者，牵者，奔者，涉者，陆者，翘者，顾者，鸣者，寝者，讹者，立者，暉者，饮者，洩者，陟者，降者，痒磨树者，嘘者，嗅者，喜而相戏者，怒相眦啮者，秣者，骑者，骤者，走者，载服物者，载狐兔者，凡马之事二十有七焉。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秦少游谓其叙事该而不烦，故仿之而作《罗汉记》。坡公赋《韩干十四马》诗云：“二马并驱攒八蹄，二马宛颈鬃尾齐。一马任前双举后，一马却避长鸣嘶。老髯奚官骑且顾，前身作马通马语。后有八匹饮且行，微流赴吻若有声。前者既济出林鹤，后者欲涉鹤俯啄。最后一匹马中龙，不嘶不动尾摇风。韩生画马真是马，苏子作诗如见画。世无伯乐亦无韩，此诗此画谁当看？”诗之与记，其体虽异，其为布置错写则同。诵坡公之语，盖不待见画也。予《云林绘监》中有临本，略无小异。杜老《观曹将军画马图》云：“昔日太宗拳毛驹，近时郭家狮子花。今之新图有二马，复令识者久叹嗟。其余七匹亦殊绝，迥若寒空动烟雪。霜蹄蹴踏长楸间，马官厮养森成列。可怜九马争神骏，顾视清高气深稳。”其语视东坡，似若不及。至于“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不妨独步也。杜又有《画马赞》云：“韩干画

马，毫端有神。骅骝老大，矜矜清新”及“四蹄雷雹，一日天池。瞻彼骏骨，实惟龙媒”之句。坡公《九马赞》言：“薛绍彭家藏曹将军《九马图》，杜子美所为作诗者也。”其词云：“牧者万岁，绘者惟霸。甫为作诵，伟哉九马。”读此诗文数篇，真能使人方寸超然，意气横出，可谓“妙绝动宫墙”矣。

【译文】 韩愈《人物画记》中描述马的那一段说：“马肥大的共有九匹，在马群之中又有上等好马和普通的马。有正在行走的，有想摆脱牵缚的，有狂奔的，有过水的，有跳跃的，有翘着头的，有回头看的，有引颈长鸣的，有卧着不动的，有慢慢走动的，有站立不动的，有正在吃草的，有正在饮水的，有解溲的，有上坡的，有下坡的，有身痒在树下磨蹭的，有喷鼻的，有闻味的，有高兴而相互嬉戏的，有发怒而互相踢咬的，有正吃草的，有被人骑着的，有狂跑的，有慢跑的，有驮着服饰器物的，有驮着野兔狐狸的，马的活动形态共二十七类。这幅画一共画了八十三匹马，却没有一点雷同。”秦观称道此文叙述马的各种形态完备而不烦琐，因此模仿它的格式写了一篇《罗汉记》。苏轼作《韩干十四马》诗这样写道：“二马并驱攒八蹄，二马宛颈鬃尾齐。一马任前双举后，一马却避长鸣嘶。老髯奚官骑且顾，前身作马通马语。后有八匹饮且行，微流赴吻若有声。前者既济出林鹤，后者欲涉鹤俯啄。最后一匹马中龙，不嘶不动尾摇风。韩生画马真是马，苏子作诗如见画。世无伯乐亦无韩，此诗此画谁当看！”诗和记的体裁虽然截然不同，但它们的铺陈描绘则是相同的。读完苏轼的诗，几乎不用再看图画了。我的《云林绘监》里有这幅画的摹写本，与原画毫厘不差。杜甫的《观曹将军画马图》诗说：“昔日太宗拳毛騧，近时郭家狮子花。今之新图有二马，复令识者久叹嗟。其余七匹亦殊绝，迥若寒空动烟雪。霜蹄蹴踏长楸间，马官厮养森成列。可怜九马争神骏，顾视清高气深稳。”这些诗句和苏轼的诗相比，似乎稍逊一筹，至于“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一句，可谓无可超越之语。杜甫还有一篇《画马赞》说：“韩干画马，笔端像有神助。骅骝大而脱俗，秣稊清新悦目。”还有“四蹄如雷电，一日到天池。看它骏骨相，无疑是龙媒”的句子。苏轼的《九马赞》说：“薛绍彭家收藏有曹将军《九马图》，就是杜甫为之作诗的那幅画。”赞词说：“有马的是天子，画马的是曹霸，杜甫为它作诗赞诵，了不起啊，九匹骏马！”读了这几篇诗文，真能令人心胸超脱豁朗，意气风发，可以说是“妙绝动宫墙”了！

风灾霜旱

【原文】 庆元四年，饶州盛夏中，时雨频降，六七月之间未尝请祷，农家水车龙具，倚之于壁，父老以为所未见，指期西成有秋，当倍常岁，而低下之田，遂以潦告。余干、安仁乃于八月罹地火之厄。地火者，盖苗根及心，鼃虫生之，茎干焦枯，如火烈烈，正古之所谓蠹贼也。九月十四日，严霜连降，晚稻未实者，皆为所薄，不能复生，诸县多然。有常产者，诉于郡县，郡守孜孜爱民，有意蠲租，然僚吏多云：“在法无此两项。”又云：“九月正是霜降节，不足为异。”案白乐天讽谏《杜陵叟》一篇曰：“九月霜降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此明证也。予因记元璽五年苏公守杭日，与宰相吕汲公书，论浙西灾伤曰：“贤哲一闻此言，理无不行，但恐世俗谄薄成风，揣所乐闻与所忌讳，争言无灾，或有灾而不甚损。八月之末，秀州数千人诉风灾，吏以为法有诉水旱而无诉风灾，闭拒不纳，老幼相腾践，死者十一人。由此言之，吏不喜言灾者，盖十人而九，不可不察也。”苏公及此，可谓仁人之言。岂非昔人立法之初，如所谓风灾、所谓早霜之类，非如水旱之田可以稽考，惧贪民乘时，或成冒滥，故不轻启其端。今日之计，固难添创条式。但凡有灾伤，出于水旱之外者，专委良守令推而行之，则实惠及民，可以救其流亡之祸，仁政之上也。

【译文】 宋宁宗庆元四年，饶州盛夏季节淫雨连绵。所以这年六、七月时，没有祷天许愿。农村庄户人家的抽水车和翻水车都靠在墙上不用。岁数大的老人都说没见到过这种情况。农民许愿说如果秋天有收成的话，将用多出往年一倍的祭祀物品来祷谢上天。但低洼地势的田地还是被雨水淹了。余干和安仁两地竟在八月份遭受到了地火的灾害。所谓地火，大概就是庄稼的苗根和苗心生虫子，导致茎干部位枯焦，像被火烧过似的。这就是古代的所谓蠹贼。九月十四日，又连降浓霜，凡尚未结稻穗的晚稻都遭到侵袭，再也不能生长。几个县都是如此。有人把这事告诉给郡县政府。郡长官一心爱护百姓，有意豁免当年的租税。但是大多幕僚和小官说：“法律上并没有这两项豁免内容。”又说：“九月份正是霜降季节，不足为奇。”我查考白乐天（白居易）的讽谏诗《杜陵叟》写道：“九月霜降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九月份霜降，秋天早早地寒冷，禾苗和稻穗尚未成熟，都是青杆儿。地方长官明知此事却不肯申报，反而为求自己的所谓政绩而向农民急敛暴征。）这就是明

证。我于是想起了元嘉五年（1090年）苏东坡担任杭州太守之职时，曾给宰相吕汲公写过一封信，提到浙江西部的灾害和伤亡情况说：“聪明人一听到灾情报告，自然没有理解不了的事情。只怕世俗间谄媚成风，专门报告上司所喜欢听的事，而隐瞒上司所忌讳的事，争相谎报没有灾情，或者是有灾情而损失不大。八月末时，秀州数千人向政府拆说灾情，但地方官吏认为法律上有水灾、旱灾而没有风灾，就拒不接受豁免租税的要求。请愿的人蜂拥踩踏，死亡十一人。由此说来，大概有十分之九的官吏不愿报告称说灾情。这一点不能不予以明察。”苏东坡认识到了这一点，可以称得上是仁德之人的话语了。莫非先人刚刚立法时，所谓的风灾和早霜之类不像水灾和旱灾那样容易查考，还是担心百姓假托季节、时势冒称滥报？因此不轻易开此先例。现在的对策，当然难以添加和开创新的条款。但如有灾害，不属水灾和旱灾的，应专门委派好的地方长官参照水灾和旱灾的情况推衍实行豁免租税，这样，就可以使百姓得到实际的恩惠，并可以消除百姓流离失所的祸难。这才是最好的仁政。

卷八

白苏诗纪年岁

【原文】 白乐天为人诚实洞达，故作诗述怀，好纪年岁。因阅其集，辄抒录之：“此生知负少年心，不展愁眉欲三十。”“莫言三十是年少，百岁三分已一分。”“何况才中年，又过三十二。”“不觉明镜中，忽年三十四。”“我年三十六，冉冉昏复旦。”“非老亦非少，年过三纪余。”“行年欲四十，有女曰金銮。”“我今欲四十，秋怀亦可知。”“行年三十九，岁暮日斜时。”“忽因时节惊年岁，四十如今欠一年。”“四十为野夫，田中学锄谷。”“四十官七品，拙宦非由他。”“毛鬓早改变，四十白发生。”“况我今四十，本来形貌羸。”“衰病四十身，娇痴三岁女。”“自问今年几，春秋四十初。”“四十未为老，忧伤早衰恶。”“莫学二郎吟太苦，才年四十鬓如霜。”“下有独立人，年来四十一。”“若为重入华阳院，病鬓愁心四十三。”“已年四十四，又为五品官。”“面瘦头斑四十四，远谪江州为郡吏。”“行年四十五，两鬓半苍苍。”“四十六时三月尽，送春争得不殷勤。”“我今四十六，衰悴卧江城。”“鬓发苍浪牙齿疏，不觉身年四十七。”“明朝四十九，应转悟前非。”“四十九年身老日，一百五夜月明天。”“衰鬓蹉跎将五十，关河迢递过三千。”“青山举眼三千里，白发平头五十人。”“宦途气味已谙尽，五十不休何日休。”“五十江城守，停杯忽自思。”“莫学尔兄年五十，蹉跎始得掌丝纶。”“五十未全老，尚可且欢娱。”“长庆二年秋，我年五十一。”“二月五日花如雪，五十二人头似霜。”“老校于君合先退，明年半百又加三。”“前岁花前五十二，今年花前五十五。”“倘年七十犹强健，尚得闲行十五春。”“去时十一二，今年五十六。”“我年五十七，荣名得几许。”“我年五十七，归去诚已迟。”“身为三品官，年已五十八。”“五十八翁方有后，民思堪喜亦堪嗟。”“半百过九年，艳阳残一日。”“火销灯尽天明后，便是平头六十人。”“六十河南尹，前途足可知。”“不准拟身年六十，上山仍未要人扶。”“不准拟身年六十，游春犹自有心情。”“我今悟已晚，六十方退闲。”“今岁日余二十六，来岁年登六十二。”“心情多少在，六十二三人。”“六十三翁头雪白，假如醒黠欲何为。”“行年六十四，安得不衰羸。”“我今六十五，走若下坡轮。”“年开第七秩，屈指几多人。”

“五十八归来，今年六十六。”“无忧亦无喜，六十六年春。”“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七十欠四岁，此生那足论。”“六十八衰翁，乘衰百疾攻。”“又问年几何，七十行欠二。”“更过今年年七十，假如无病亦宜休。”“今日行年将七十，犹须惭愧病来迟。”“且喜同年满七十，莫嫌衰病莫嫌贫。”“旧语相传聊自慰，世间七十老人稀。”“皤然七十翁，亦足称寿考。”“昨日复今辰，悠悠七十春。”“人生七十希，我年幸过之。”“白鬓如雪五朝臣，又入新正第七旬”（时年七十一）。“行开第八秩，可谓尽天年。”“吾今已年七十一，眼昏须白头风眩。”“七十人难到，过三更较稀。”“七十三人难再到，今春来是别花来。”“七十三翁旦暮身，誓开险路作通津。”“风光抛得也，七十四年春。”“寿及七十五，俸沾五十千。”其多如此。苏公素重乐天，故间亦效之，如“龙钟三十九，劳生已强半，岁莫日斜时，还为昔人叹”，正引用其语。又“四十岂不知头颅，畏人不出何其愚”、“我今四十二，衰发不满梳”、“忆在钱塘正如此，回头四十二年非”、“行年四十九，还此北窗宿”、“吾年四十九，赖此一笑喜”、“嗟我与君皆丙子，四十九年穷不死”、“五十之年初过二，衰年记我今如此”、“白发苍颜五十三，家人强遣试春衫”、“先生年来六十化，道眼已不入二门”、“纷纷华发不足道，当返六十过去魂”、“我年六十一，颓景薄西山”、“结发事文史，俯仰六十逾”、“与君皆丙子，各已三万日”。玩味庄诵，便如阅年谱也。

【译文】白居易为人诚恳实在，光明磊落，因此他写诗抒情，喜欢记下自己当时的年岁。由于我仔仔细细阅读他的文集，故而记下一些诗句：“此生知负少年心，不展愁眉欲三十。”“莫言三十是年少，百岁三分已一分。”“何况才中年，又过三十二。”“不觉明镜中，忽年三十四。”“我年三十六，冉冉昏复旦。”“非老亦非少，年过三纪余。”“行年欲四十，有女曰金銮。”“我今欲四十，秋怀亦可知。”“行年三十九，岁暮日斜时。”“忽因时节惊年岁，四十如今欠一年。”“四十为野夫，田中学锄谷。”“四十官七品，拙宦非由他。”“毛鬓早改变，四十白发生。”“况我今四十，本来形貌羸。”“衰病四十身，娇痴三岁女。”“自问今年几，春秋四十初。”“四十未为老，忧伤早衰恶。”“莫学二郎吟太苦，才年四十鬓如霜。”“下有独立人，年来四十一。”“若为重入华阳院，病鬓愁心四十三。”“已年四十四，又为五品官。”“面瘦头斑四十四，远谪江州为郡吏。”“行年四十五，两鬓半苍苍。”“四十六时三月尽，送春争得不殷勤。”“我今四十六，衰悴卧江城。”“鬓发苍浪牙齿疏，不觉身年四十七。”“明朝四十九，应转悟前非。”“四十九年身老日，一百五夜月明天。”“衰鬓蹉跎将五十，关河迢递过三千。”“青山举眼三千里，白发平头五十人。”“宦途气味已谙尽，五十不休何日休。”“五十江城守，停杯忽自思。”“莫学尔兄年五十，蹉跎始得掌丝纶。”“五十未全

老，尚可且欢娱。”“长庆二年秋，我年五十一。”“二月五日花如雪，五十二人头似霜。”“老校于君合先退，明年半百又加三。”“前岁花前五十二，今年花前五十五。”“倘年七十犹强健，尚得闲行十五春。”“去时十一二，今年五十六。”“我年五十七，荣名得几许。”“我年五十七，归去诚已迟。”“身为三品官，年已五十八。”“五十八翁方有后，静思堪喜亦堪嗟。”“半百过九年，艳阳残一日。”“火销灯尽天明后，便是平头六十人。”“六十河南尹，前途足可知。”“不准拟身年六十，上山仍未要人扶。”“不准拟身年六十，游春犹自有心情。”“我今悟已晚，六十方退闲。”“今岁日余二十六，来岁年登六十二。”“心情多少在，六十二三人。”“六十三翁头雪白，假如醒黠欲何为。”“行年六十四，安得不衰羸。”“我今六十五，走若下坡轮。”“年开第七秩，屈指几多人。”“五十八归来，今年六十六。”“无忧亦无喜，六十六年春。”“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七十欠四岁，此生哪足论。”“六十八衰翁，乘衰百疾攻。”“又问年几何，七十行欠二。”“更过今年年七十，假如无病亦宜休。”“今日行年将七十，犹须惭愧病来迟。”“且喜同年满七十，莫嫌衰病莫嫌贫。”“旧语相传聊自慰，世间七十老人稀。”“皤然七十翁，亦足称寿考。”“昨日复今辰，悠悠七十春。”“人生七十希，我年幸过之。”“白须如雪五朝臣，又入新正第七旬。”注：当时七十一岁。“行开第八秩，可谓尽天年。”“吾今已年七十一，眼昏须白头风眩。”“七十人难到，过三更较稀。”“七十三人难再到，今春来是别花来。”“七十三翁旦暮身，誓开险路作通津。”“风光抛得也，七十四年春。”“寿及七十五，俸沾五十千。”其数量之多，由此可见一斑。苏轼一向敬重白居易，所以作诗时，在记录自己年龄方面也模仿白居易的作法，比如“龙钟三十九，劳生已强半，岁暮日斜时，还为昔人叹”一句，正是仿照白居易所作。又如“四十岂不知头颅，畏人不出何其愚”、“我今四十二，衰发不满梳”、“忆在钱塘正如此，回头四十二年非”、“行年四十九，赖此北窗宿”、“吾年四十九，赖此一笑喜”、“嗟我与君皆丙子，四十九年穷不死”、“五十之年初过二，衰颜记我今如此”、“白发苍颜五十三，家人强遣试春衫”、“先生年来六十化，道眼已入不二门”、“纷纷华发不足道，当返六十过去魂”、“我年六十一，颓景薄西山”、“结发事文史，俯仰六十逾”、“与君皆丙子，各已一万日”。细心咀嚼品味，就好象是在看他本人的年谱。

天将富此翁

【原文】 唐刘仁轨任给事中，为宰相李义府所恶，出为青州刺史。及代还，

欲斥以罪，又坐漕船覆没免官。其后百济叛，诏以白衣检校带方州刺史。仁轨谓人曰：“天将富贵此翁邪！”果削平辽海。白乐天有《自题酒库》一篇，云：“身更求何事，天将富此翁。此翁何处富？酒库不曾空。”注云“刘仁轨诗：‘天将富此翁。’以一醉为富也。”然则唐史以此为仁轨之语，而不言其诗，为未审耳。

【译文】 唐代的刘仁轨任给事中之职时，被宰相李义府所陷害，贬出京城当了青州刺史。等到回京复职时，李义府又想加罪于他，就给刘仁轨加了个漕船覆没的罪责，免去了他的官职。后来百济叛乱，皇帝下诏让刘仁轨以白衣检校带方州刺史。刘仁轨对别人说：“上天将要让我这老头富贵起来了！”刘仁轨后来果然平定了辽海之间的叛乱。白乐天（白居易）有一首《自题酒库》的诗写道：“身更求何事，天将富此翁。此翁何处富，酒库不曾空（这辈子还能求得什么，上天将要让我这老头富起来。我这老头上哪儿去致富呢？唯有酒库不曾空）。”注释道：“刘仁轨的诗写道：‘天将富此翁。’刘仁轨把醉个痛快当作富裕。”由此看来，《旧唐书》把这句话当作刘仁轨说的话，却不说他的诗，这是没有仔细查考。

白公说俸禄

【原文】 白乐天仕宦，从壮至老，凡俸禄多寡之数，悉载于诗，虽波及他人亦然。其立身廉清，家无余积，可以概见矣。因读其集，辄叙而列之。其为校书郎，曰：“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为左拾遗，曰：“月惭谏纸二千张，岁愧俸钱三十万。”兼京兆户曹，曰：“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廩禄二百石，岁可盈仓盗。”贬江州司马，曰：“散员足庇身，薄俸可资家。”《壁记》曰：“岁廩数百石，月俸六七万。”罢杭州刺史，曰：“三年请禄俸，颇有余衣食。”“移家入新宅，罢郡有余资。”为苏州刺史，曰：“十万户州尤觉贵，二千石禄敢言贫！”为宾客分司，曰：“俸钱八九万，给受无虚月。”“嵩洛供云水，朝廷乞俸钱。”“老宜官冷静，贫赖俸优饶。”“官优有禄料，职散无羁縻。”“官衔依口得，俸禄逐身来。”为河南尹，曰：“厚俸如何用，闲居不可忘。”不赴同州，曰：“诚贪俸钱厚，其如身力衰！”为太子少傅，曰：“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又问俸厚薄，百千随月至。”“七年为少傅，品高俸不薄。”其致仕，曰：“全家遁此曾无闷，半俸资身亦有余。”“俸随日计钱盈贯，禄逐年支粟满竝。”“寿及七十五，俸占五十千。”其泛叙曰：“历官凡五六，禄俸及妻孥。”“料钱随

官用，生计逐年营。”“形骸 踞班行内，骨肉勾留俸禄中。”其他人者，如陕州王司马曰：“公事闲忙同少尹，俸钱多少敌尚书。”刘梦得罢宾客，除秘监，禄俸略同，曰：“日望挥金贺新命，俸钱依旧又如何！”叹洛阳、长水二县令曰：“朱绂洛阳官位屈，青袍长水俸钱贫。”其将下世，有《达哉乐天行》曰：“先卖南坊十亩园，次卖东郭五顷田。然后兼卖所居宅，仿佛获缗二三千。但恐此钱用不尽，即先朝露归夜泉。”后之君子试一味其言，虽日饮贪泉，亦知斟酌矣。观其生涯如是。东坡云：“公廩有余粟，府有余帛。”殆亦不然。

【译文】白居易做官，从壮年到老年，其俸禄数目，全都记录在他各个时期的诗中，即使是牵涉到别人，也是如此，他为官清廉，家里并没有多余的钱财，从这些诗歌中也可以看出来了。由于详细诵读他的诗集，因而依次摘录如下。他担任校书郎时，有诗道：“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担任左拾遗，说道：“月惭谏纸二千张，岁愧俸钱三十万。”兼任京兆府户曹时，说道：“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廩禄二百石，岁可盈仓稊。”后来被贬为江州司马，说道：“散员足庇身，薄俸可资家。”《壁记》说道：“岁廩数百石，月俸六七万。”罢官担任杭州刺史，有诗写道：“三年请禄俸，颇有余衣食。”“移家入新宅，罢郡有余资。”又任苏州刺史，有诗写道：“十万户州尤觉贵，二千石禄敢言贫！”后任太子宾客，居住在西京长安，说道：“俸钱八九万，给受无虚月。”“嵩洛供云水，朝廷乞俸钱。”“老宜官冷静，贫赖俸优饶。”“官优有禄料，职散无羁縻。”“官衔依口得，俸禄逐身来。”担任河南府尹，说道：“厚俸如何用，闲居不可忘。”任命为同州刺史，没有赴官，说道：“诚贪俸钱厚，其如身力衰！”担任太子少傅，说道：“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又问俸厚薄，百千随月至。”“七年为少傅，品高俸不薄。”后来他年老致仕，说道：“全家遁此曾无闷，半俸资身亦有余。”“俸随日计钱盈贯，禄逐年支粟满稊。”“寿及七十五，俸占五十千。”其他泛泛而谈说：“历官凡五六，禄俸及妻孥。”“料钱随官用，生计逐年营。”“形骸 踞班行内，骨肉勾留俸禄中。”还有涉及别人的，比如说陕州王司马，说道：“公事闲忙同少尹，俸钱多少敌尚书。”刘禹锡罢免了太子宾客，新命为秘书少监，俸禄多少差不多，白居易说道：“日望挥金贺新命，俸钱依旧又如何！”感叹洛阳、长水（今河南洛宁县西南）两位县令时说道：“朱绂洛阳官位屈，青袍长水俸钱贫。”他临终前，有一首《达哉乐天行》诗说：“先卖南坊十亩园，次卖东郭五顷田。然后兼卖所居宅，仿佛获缗二三千。但恐此钱用不尽，即先朝露归夜泉。”后来的仁人君子若是能仔细品味一下这些诗句，即使是每天都饮贪泉之水，也会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人了。看白居易一生就是这样清贫廉洁。苏轼说：“白公粮库里有富余的粮食，仓库里有富余的丝帛。”这种说法

不一定对。

白居易出位

【原文】 白居易为左赞善大夫，盗杀武元衡，京都震扰。居易首上疏，诸亟捕贼，刷朝廷耻，以必得为期。宰相嫌其出位，不悦，因为贬江州司马。此《唐书》本传语也。案是时宰相张弘靖、韦贯之，弘靖不足道，贯之于是为失矣。白集载与杨虞卿书云：“左降诏下，明日而东，思欲一陈于左右。去年六月，盗杀右丞相于通衢中，迸血体，磔发肉，所不忍道。合朝震栗，不知所云。仆以书籍以来，未有此事。苟有所见，虽畎亩皂隶之臣，不当默默，况在班列，而能胜其痛愤邪？故武丞相之气平明绝，仆之书奏日午入。两日之内，满城知之，其不与者，或语以伪言，或陷以语，皆曰：‘丞、郎、给、舍、谏官、御史尚未论请，而赞善大夫何反忧国之甚也？’仆闻此语，退而思之，赞善大夫诚贱冗耳，朝廷有非常事，即日独进封章，谓之忠，谓之愤，亦无愧矣！谓之妄，谓之狂，又敢逃乎？以此获辜，顾何如耳，况又不以此为罪名乎！”白之自述如此。然则一时指为出位者，不但宰相而已也。史又曰：“居易母坠井死，而赋《新井篇》，以是左降。”前书所谓“不以此为罪名”者是已。

【译文】 白居易担任左赞善大夫时，宰相武元衡被强盗残杀，一时间京城上下震惊恐惧，议论纷纷。白居易率先向朝廷上奏，请求迅速捉捕杀人强盗，洗刷朝廷的耻辱，并请求朝廷要有关部门限期捕贼。宰相嫌他超越了权限，很不高兴，寻找借口将他贬为江州司马。这是《唐书·白居易传》里的记载。按：当时的宰相是张弘靖和韦贯之，张弘靖就不用多说，韦贯之在这件事上是很不对的。《白居易集》载有他写给杨虞卿的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贬官的诏旨已经下达，明天就要出京东行了，想把心中委屈详细地对阁下说一说。去年六月里，强盗在大街上杀害了右丞相武元衡，满身血浆，头发和肉体都被砸烂了，我实在不忍心再说下去。当时满朝文武震惊恐惧，不知该说什么话，我觉得有史以来，高级官员从来也没有过这样的事。假如人们当时见到右丞相死的惨状，即使是田夫奴仆，也不该闭口无言，更何况我是朝廷大臣，怎能闭口不言忍受这样的愤恨？已故武元衡丞相黎明时断的气，我的奏章中午呈上。两天之内，满城的人知道了，那些不乐意我这样做的人，有的人造谣中伤，有的说我这样做大错特错，都说：‘尚书、郎、给事中、中书舍人、谏官、御史对武丞相被杀一事还没有上书谈自己的看法，一个赞善大夫为什么倒如此忧国呢！’我听到这

些话，回到家中仔细思量，赞善大夫固然官职低微，而朝廷中发生了这样特殊的事件，当即进一奏疏，说这是忠诚，这是义愤，也问心无愧！说这是虚妄，这是张狂，我又怎么能辩解些什么呢？因为这样一件事而获罪，您以为怎么样？更何况还不是以这件事定罪呢！”这是白居易的自述。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指责他超越职权的人，还不仅仅是宰相而已。史书上又说：“白居易的母亲掉进井中淹死，而白居易却写了一首《新井篇》，因此受到贬斥。”上面那封书信里所说的“不是以这件事定罪”，可能就是说的这件事。

醉翁亭记 酒经

【原文】 欧阳公《醉翁亭记》、东坡公《酒经》，皆以“也”字为绝句。欧阳二十一也字，坡用十六也字，欧记人人能读，至于《酒经》，知之者盖无几。坡公尝云：“欧阳作此记，其词玩易，盖戏云耳，不自以为奇特也。而妄庸者作欧语云：‘平生为此文最得意。’又云：‘吾不能为退之画记，退之不能为吾《醉翁亭记》。’此又大妄也。”坡《酒经》每一也字上必押韵，暗寓于赋，而读之者不觉。其激昂渊妙，殊非世间笔墨所能形容，今尽载于此，以示后生辈。其词云：“南方之氓，以糯与粳，杂以卉药而为饼，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轻，此饼之良者也。吾始取面而起肥之，和之以姜液，俟之使十裂，绳穿而风戾之，愈久而益悍，此曲之精者也。米五斗为率，而五分之，为三斗者一，为五升者四，三斗以为酿，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升之赢也。始酿，以四两之饼，而每投以二两之曲，皆泽以少水，足以散解而匀停也。酿者必瓮按而井泓之，三日而井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盖三投而后平也。凡饼烈而曲和，投者必屡尝而增损之，以舌为权衡也。既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而后定也。既定乃注以斗水，凡水必熟而冷者也。凡酿与投，必寒而后下，此炎州之令也。既水五日而，得二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半日，取所谓赢者为粥，米一而水三之，揉以饼曲，凡四两，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而再酿之，五日压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劲者也。劲、正合为四斗，又五日而饮，则和而力、严而不猛也。绝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则糟枯中风而酒病也。酿久者酒醇而丰，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此文如太牢八珍，咀嚼不嫌于致力，则真味愈隽永，然未易为俊快者言也。

【译文】 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和苏轼的《酒经》，都以“也”字做语尾。欧阳修共用了二十一个也字，苏轼共用了十六个也字。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人

人都会背诵，而对苏轼的《酒经》，知道它的人就不多了。苏轼曾说：“欧阳修写《醉翁亭记》，遣词用语都很平易，恐怕是游戏笔墨而已，自己并没有以为多么奇特。但有的平庸而妄乱的人却假托欧阳的话说：‘我平生最满意这篇文章。’又假托说：‘我写不出韩退之（韩愈）的《画记》，韩退之则写不出我的《醉翁亭记》。’这又是胡说八道。”苏东坡的《酒经》每个“也”字的上一个字必定押韵，暗暗寄寓为赋的体裁，但读者并不易察觉到。文章激昂、深妙，远不是人间一般的笔墨所能形容的。现在把它全篇录在这里，以传示后辈。文章写道：“南方的百姓用糯米与粳米杂揉上草药做成饼。凡闻着香、嚼着辣、捧着轻的，就是好饼。开始，用发酵的面粉同姜汁拌在一起，蒸裂之后用绳子穿起来，让风吹干。时间越长，劲儿越足。这是酒曲的精华。以五斗米为标准，分成五个部分，其中三斗为一个部分，其余四个部分各为五升。三斗的那部分用来酿酒，五升的四部分用来当作投料。分三次用投料三部分，还有一部分五升的多余。刚酿的时候，用四两饼。每投二两饼曲，就用少量水沾湿，使足以散开、溶解均匀、停当。酿酒人一定要用缸扣住，并用栅口泼水。三天以后，栅口溢出液体，这就是酒味萌发。酒味萌发开始时很厉害，稍带些苦味，大概需要投料三次以后才能味道平和。如果饼劲儿冲而曲劲儿平和，那么投料的人就一定要反复尝味，随时增减饼或曲，用舌头来作衡量。满溢出以后的三天中投一次料，九天中投三次料，十五天以后才完成。完成后，往里灌进一斗水。水必须是凉开水。凡酿与投料，都要冷却后进行，这是炎州的规定。灌水以后的五天才榨出两斗半酒，这就是正酒。榨出半天后，把留下的渣（即一般称作粥的部分）按照一份米三份水的比例，揉入四两饼曲混合物，放进酒糟之中，搅拌均匀后再酿一遍。五天以后，压出半斗酒，这就是稍有劲儿的酒。把劲儿稍冲的酒同正酒合并为四斗，五天以后再喝，那就既平和又有力、既醇严又不过猛了。再次压榨时，应马上投入渣进到酒糟中，否则酒糟就会风干，导致酒变质。酿得时间越长，酒就越醇厚，否则结果也相反。所以酒必须酿上三十天才能喝。”这篇文章就像宫殿馐食中的八珍一样，理解起来并不难，而内蕴却非常丰富，意味深长隽永。只是不容易被性情爽快的人所称道。

白公感石

【原文】 白乐天有《奉和牛思黯以李苏州所寄太湖石奇状绝伦因作诗兼呈刘梦得》，其末云：“共嗟无此分，虚管太湖来。”注：“与梦得俱典姑苏，而不

获此石。”又有《感石上旧字》云：“太湖石上镌三字，十五年前陈结之。”案，陈结之并无所经见，全不可晓。后观其《对酒有怀寄李郎中》一绝句，曰：“往年江外抛桃叶，去岁楼中别柳枝。寂寞春来一杯酒，此情唯有李君知。”注曰：“桃叶，结之也；柳枝，樊素也。”然后结之之义始明。乐天以病而去柳枝，故作诗云：“两枝杨柳小楼中，竄娜多年伴醉翁。明日放归归去后，世间应不要春风。”因刘梦得有戏之之句，又答之云：“谁能更学孩童戏，寻逐春风捉柳花。”然其钟情处竟不能忘，如云“病共乐天相伴住，春随樊子一时归”、“金羈骆马近赏却，罗袖柳枝寻放还”、“觴咏罢来宾阁闭，笙歌散后妓房空”皆是也，读之使人凄然。

【译文】 白乐天（白居易）有一首诗，题为《奉和牛思黯以李苏州所寄太湖石奇状绝伦因作诗兼呈刘梦得》，结尾处写道：“共嗟无此分，虚管太湖来（都感叹没有这个缘分，枉然管理了太湖一场）。”注释道：“我与刘梦得（刘禹锡）都主管苏州，却没有得到这块石头。”又有诗《感石上旧字》写道：“太湖石上镌三字，十五年前陈结之（太湖石上刻了三个字，是十五年前的陈结之）。”今按，陈结之不见经传，完全无从查知。后来读到白乐天的一首绝句《对酒有怀寄李郎中》道：“往年江外抛桃叶，去岁楼中别柳枝。寂寞春来一杯酒，此情唯有李君知（多年以前在江外抛却桃叶姑娘，去年又在青楼中离别柳枝姑娘而去。春来只有寂寞一杯酒为伴，这份感情只有李君才知道）。”注释道：“桃叶，名结之；柳枝，名樊素。”这才明白了结之的意思。白乐天因病离别柳枝，写诗道：“两枝杨柳小楼中，袅娜多年伴醉翁。明日放归归去后，世间应不要春风（两枝杨柳栽在小楼中，轻盈温柔地陪伴我醉老头子。明天让她们回去之后，世上就不需要春风了）。”由于刘梦得（刘禹锡）有与他开玩笑的诗句，就答道：“谁能更学孩童戏，寻逐春风捉柳花（谁还能去学儿童的游戏，追赶着春风去扑柳絮）。”但他对柳枝的钟情一直不能忘却。例如，“病共乐天相伴住，春随樊子一时归（白乐天我与病为伴居住，春天随着樊子忽然归去）。”“金羈骆马近赏却，罗袖柳枝寻放还（金马嚼的黑鬃白马最近卖掉，身着绫罗绸衣的柳枝随即被放回）。”“觴咏罢来宾客闭，笙歌散后妓房空（酒饮歌罢宾阁闭，笙歌散了以后，妓房已空）。”都是这一类。读了以后让人顿觉凄然。

礼部韵略非理

【原文】 《礼部韵略》所分字，有绝不近人情者，如东之与冬，清之与青，

至于隔音不通用。而为四声切韵之学者，必强立说，然终为非是。如撰字至列于上去三韵中，仍义训不一。顷绍兴三十年，省闱举子兼经出《易简天下之理得赋》。予为参详官，有点检试卷官蜀士杜莘云：“简字韵甚窄，若撰字必在所用，然惟撰述之撰乃可尔，如‘杂物撰德’、‘体天地之撰’、‘异夫三子者之撰’、‘欠伸，撰杖屨’之类，皆不可用。”予以白知举，请揭榜示众。何通远谏议初亦难之，予曰：“倘举场皆落韵，如何出手？”乃自书一榜。榜才出，八厢逻卒以为逐举未尝有比例，即录以报主者。士人满廉前上请，予为逐一剖析，然后退。又静之与靓，其义一也，而以静为上声，靓为去声。案：《汉书》贾谊《服赋》“澹乎若深渊之靓”，颜师古注：“靓与静同。”《史记》正作“静”。杨雄《甘泉赋》“暗暗靓深”，注云：“靓即静字耳。”今析入两音，殊为非理。予名云竹庄之堂曰“赏静”，取杜诗“赏静怜云竹”之句也。守僧居之，频年三易，有道人指曰：“静字左傍乃争字，以故不定叠。”于是撤去元扁，而改为“靓”云。

【译文】 《礼部韵略》这部韵书的分字，有很多不合情理的地方，比如东和冬、清和青，竟然隔韵不有通押。而那些研究四声音韵的学者们，又强词夺理为它辩护，但最终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又如“撰”字，排列在上声、去声的三个韵部当中，对它的释义也不相同。在不久前的绍兴三十年（1160年）省试时，举子们应考的兼经题出的是《易简天下之理得赋》。当时我担任参详官，有一个批改试卷的蜀中士人杜莘对我说：“‘简’字这个韵太窄了，像‘撰’字肯定要用在答卷当中，可是只有撰写的撰才能与简相押，像‘杂物撰德’的撰、‘体天之撰’的撰、‘异夫三子者之撰’的撰、‘欠伸，撰杖屨’的撰，这些文句的撰字，都不能和简相押。”我把我的意见告诉了主考，请他写成榜文公开于天下。主考官谏议大夫何通刚开始时也为此事感到为难，我给他解释说：“如果这场考试都按出韵算，我们怎么批改？”于是自作主张书写了一道榜文。榜文刚刚张贴出去，各考区的监场士卒认为历次考试时都没有这样的先例，所以立即将榜文抄出送给知贡举。举子们也都拥到考官房前询问，我为他们一条条地分析，他们听得明白了，便又回到了自己的考厢。再如静字和靓字，两个字意义完全相同，但《礼部韵略》却把静字列于上声，而把靓字列于去声。按：《汉书·贾谊传·壘鸟赋》：“澹乎若深渊之靓。”颜师古注解：“靓字和静字相同。”《史记》中就写作“静”。扬雄《甘泉赋》：“暗暗靓深。”注释说：“靓字就是静字。”如今分成了两个音，真是不合情理。我为我的云竹庄中的堂取了个名字叫“赏静”，是取于杜甫诗“赏静怜云竹”中的诗句。看守田庄的僧人住在其中，不想一年中连连更换人，有位道士指着堂上的匾额说：“静字的左边是个争字，所以总是不安宁。”我把原来的匾额撤下去，把“赏静”改成了“赏靓”。

唐臣乞赠祖

【原文】 唐世赠典唯一品乃及祖，余官只赠父耳。而长庆中流泽颇异，白乐天制集有户部尚书杨於陵，回赠其祖为吏部郎中，祖母崔氏为郡夫人。马总准制赠亡父，亦请回其祖及祖母。散骑常侍张惟素亦然。非常制也。是时崔植为相，亦有《陈情表》云：“亡父婴甫，是臣本生；亡伯矚甫，臣今承后。嗣袭虽移，孝心则在。自去年以来，累有庆泽，凡在朝列，再蒙追荣，或有陈乞，皆许回授。臣猥当宠擢，而显扬之命，独未及于先人。今请以在身官秩，并前后合叙勋封，特乞回充追赠。”则知其时一切之制如此。伯兄文惠执政，乞以已合转官回赠高祖，既已得旨，而为后省封还。固近无此比，且失于考引唐时故事也。

【译文】 唐朝赠官的法令规定：只有一品官才能追赠他的父辈，其余官品的官员只为其父辈追赠官职。然而穆宗长庆年间，皇恩更为浩荡。白居易的制词中有写户部尚书杨於陵的一首诗，追赠杨的祖父为吏部郎中、祖母崔氏为郡夫人。马总得到恩准，追赠已故的父亲，又请求天子追赠他的祖父和祖母。散骑常侍张惟素也是如此。似乎不是法定制度。当时崔植担任宰相，也有一封《陈情表》说：“已故父亲婴甫，是我的生身之父；已故伯父矚甫，是我的继养之父。虽然过继给伯父矚甫，但孝敬亲父之心却念念不能忘怀。去年以来，朝廷对大臣们多有恩泽，凡是在朝的大夫，都得到陛下追赠先人的荣宠，只要把情况如实说清楚，都准许追赠前辈。我才疏学浅，有幸得到陛下的奖拔重用，只是荣显的恩泽还没有施及于先人。如今下臣请求用在身的官位和此前此后应当叙的勋阶和封爵，希望圣上允许追赠先人。”看来当时的法定制度就是这样随便。我的叔伯兄长洪适担任宰相职务时，也曾请求以在身应该迁转的官爵追赠高祖，随即得朝廷的恩准，却被中书省封还，不予办理。此种追赠近代确无前例，却没有详细地考察唐朝的旧制度。

承习用经语误

【原文】 经传中事实多有转相祖述而用，初不考其训故者，如：《邶·谷风》之诗，为淫新昏弃旧室而作，其词曰：“宴尔新昏，以我御穷。”宴，安也，

言安爱尔之新昏，但以我御穷苦之时，至于富贵则弃我。今人乃以初娶为宴尔，非惟于诗意不合，且又再娶事，岂堪用也。《抑》之诗曰：“ 谟定命，远犹辰告。”毛公曰：“ 谟，大也；谟、谋也；犹，道也；辰，时也。犹与猷同。”郑笺曰：“犹，图也，言大谋定命。为天下远图庶事，而以岁时告施之，如正月始和布政也。”案：此特谓上告下之义，今词臣乃用于制诏以属臣下，而臣下于表章中亦用之，不知其与“入告尔后”之告不侔也。《生民》之诗曰：“诞弥厥月。”毛公曰：“诞，大也；弥，终也。”郑笺言：“后稷之在其母，终人道十月而生。”案：训弥为终，其义亦未易晓。至“俾尔弥尔性，似先公酋矣”，既释弥为终，又曰：酋，终也。颇涉烦复。《生民》凡有八诞字：“诞置之隘巷”、“诞置之平林”、“诞置之寒冰”、“诞实匍匐”、“诞后稷之穉”、“诞降嘉种”、“诞我祀如何”，若悉以诞为大，其义亦不通。他如“诞先登于岸”之类，新安朱氏以为发语之辞，是已。莆田郑氏云：“弥只训满，谓满此月耳。”今称圣节曰降诞，曰诞节，人相称曰诞日、诞辰、庆诞，皆为不然，但承袭胶固，无由可革，虽东坡公亦云“仰止诞弥之庆”，未能免俗。书之于此，使子弟后生辈知之。《左传》：“王使宰孔赐齐侯胙，齐侯将下拜，孔曰：‘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无下拜。’对曰：‘天威不违颜咫尺，敢不下拜？’下拜，登受。”谓拜于堂下，而受胙于堂上。今人简牍谢馈者，辄曰“谨已下拜”，犹未为甚失，若“天威不违颜咫尺”，则上四字为天子设，下三字为人臣设，故注言：“天监察不远，威严常在颜面之前。”今士大夫往往于表奏中言违颜，或曰咫尺颜、咫尺之颜，全与本指爽戾。如用龙颜、圣颜、天颜之类，自无害也。

【译文】 经书和传注中的事实有不少被后人沿袭传用，却没有详细考察它的旧注，比如《诗经·邶风·谷风》这首诗，原本是对迷恋新婚、厌弃旧妻的人提出的警戒，这首诗说：“宴尔新昏，以我御穷”。宴即安的意思，是说安然无愧地爱你的新婚恋人，只把我当成穷苦时的伴侣，到你富贵便抛弃我。如今人们却把初次娶妻称为“宴尔”，不仅跟原诗诗意不相符合，而且即使是再婚再娶，难道就能使用吗？《诗经·大雅·抑》这首诗说“稽谟定命，远犹辰告。”毛亨注释说：“稽即大的意思，谟即谋的意思，犹即道的意思，辰即时的意思。”犹和猷在此处通用。郑玄注解：“犹即图的意思，是说远大的谋略就是王确定政令。为天下谋划大事，并在适当的时候里诏告臣民，比如正月里开始宣布一年中的大政。”按：这里只指人君诏告下民的意思，如今的舍人、学士们常用在诏令、诰词当中，用来训示臣下，可是一些大臣们的上表奏章里也用这个词，不了解它和“入告尔后”中的“告”毫不相同。《诗经·大雅·生民》这首诗说：“诞弥厥月。”毛亨注解：“诞即大的意思；弥即终结的意思。”郑玄注解：

“后稷在他母亲的腹中，足月十个月降生。”按：把弥解释为结束，这样解释也不是很清楚。至于“俾尔弥尔性，似先公酋矣”这句话中，既已经把弥解释成终结，又说：酋即终结的意思，这就显得重复烦琐。《生民》诗中共出现了八个诞字：“诞置之隘巷”、“诞置之平林”、“诞置之寒冰”、“诞实匍匐”、“诞后稷之穉”、“诞降嘉种”、“诞我祀如何”，如果把这其中的诞字都解释为大，恐怕也无法讲通。其他像“诞先登于岸”之类，新安人朱某认为是发语虚词，这是正确的。莆田郑先生说：“弥只能解释成满，就是说满了十月而已。”如今人们称天子生日为降诞、诞节；普通人之间相互称为诞日、诞辰、庆诞等等，都是不正确的。只是以讹传讹，越传越真，几乎没办法改变，就连苏轼这样的大家也说“仰止诞弥之庆”，不能不听这种错误的说法。现把这些说法详细地记在这里，让后学以及后来人明白其中原委。《左传》说：“周天子派宰孔赐给齐桓公祭肉，齐桓公准备下阶施跪拜之礼，宰孔说：‘周天子曾对我讲过：因为伯舅您年事已高，不必下阶施礼了。’齐桓公答道：‘天子的威德离我不过咫尺之远，我怎敢不下阶跪拜！’于是下阶跪拜，然后登上台阶，接受了赏赐。”说的是行拜礼于堂之下，而接受祭肉于堂之上。如今人们所看到的那些接受馈赠者，动不动就说：“谨已下拜”，这还不算什么大的失误，像“天威不违颜咫尺”这个句子里，前四个字是写周天子的，后三个字才是写臣下的，所以注释说：“上天神鉴明察并不遥远，天子的威严时常在脸面之前。”如今的士大夫时常在章表奏疏里说违颜，或者说咫尺之颜等等，和经书中的原意根本相反。假如用作龙颜、圣颜、天颜之类的意思，那就没什么妨碍了。

长庆表章

【原文】 唐自大历以河北三镇为悍藩所据，至元和中，田弘正以魏归国，长庆初王承元、刘总去镇、幽，于是河北略定。而穆宗以昏君，崔植、杜元颖、王播以庸相，不能建久长之策，轻徙田弘正，以启王庭凑之乱；缪用张弘靖，以启朱克融之乱。朝廷以诸道十五万众，裴度元臣宿望，乌重嗣、李光颜当时名将，屯守逾年，竟无成功，财竭力尽，遂以节钺授二贼，再失河朔，讫于唐亡。观一时事势，何止可为痛哭！而宰相请上尊号表云：“陛下自即大位，及此二年，无巾车汗马之劳，而坐平镇、冀；无亡弓遗镞之费，而立定幽、燕。以谓威灵四及，请为‘神武’。”君臣上下，其亦云无羞耻矣。此表乃白居易所作。又翰林学士元稹求为宰相，恐裴度复有功大用，妨已进取，多从中沮坏之。度上表

极陈其状，帝不得已，解稹翰林，恩遇如故。稹怨度，欲解其兵柄，劝上罢兵。未几拜相，居易代作谢表，其略云：“臣遭遇圣明，不因人进；擢居禁内，访以密谋。恩奖太深，谗谤并至。虽内省行事，无所愧心；然上默宸聪，合当死责。”其文过饰非如此。居易二表，诚为有玷盛德。

【译文】 唐代自从大历年间河北三镇被强悍的藩镇占据以后，到了元和年间，田弘正把魏地交还国家，长庆初年，王承元和刘总离开镇、幽二地，这时黄河以北才稍稍安宁。但唐穆宗是位平庸无能之辈，崔植、杜元颖、王播是几位庸碌的宰相，他们未能采取长治久安的良策，轻率地作出决定调离田弘正，结果造成了王庭凑之乱；又错误地重用张弘靖，结果引发了朱克融之乱。朝廷调集各道十五万大军，又凭着老臣裴度崇高的威望以及乌重嗣、李光颜两位当朝名将，在河北屯兵戍守一年多，最终也没有平定藩镇之乱，落得个钱财用完，精力耗尽，还是把兵权交给了王庭凑、朱克融两个逆贼，河朔地区大片领土再度失陷，一直延续到唐朝灭亡。纵观这一时的丧权辱国，岂止是可以痛哭就可解决问题的！然而当时宰相的《请上尊号表》中却说：“陛下自从就位以来，已有二年，不费征战辛劳，就平定了镇、冀二地；没有耗费一弓一镞，就又平定了幽燕。我们认为陛下威震四海，希望上尊号为‘神武’。”君臣上下也都说封之无愧。这篇上表是白居易所写。另外，翰林学士元稹想当宰相，唯恐裴度又立功勋、有所重用，妨碍自己的升迁，就经常利用机会中伤、诬陷裴度。裴度上表，竭力陈述实情。穆宗只得解除元稹的翰林学士的职务，但仍像从前那样对他施加恩泽和待遇。元稹怨恨裴度，想要剥夺他的兵权，劝说穆宗停止战争。不久，元稹被任命为宰相，白居易代他写谢表。大致说：“我遇上了圣明，不按人选顺序而被拨入禁宫之中，秘密地召见谋事。恩泽和褒奖过于深厚，谗言和诽谤也就相继而来。即使我在内省中办事心理无所惭愧，但是冒犯圣上，应当被判死罪。”竟是这样地文过饰非。白居易所撰两篇表，确实玷污了他的盛德。

元白制科

【原文】 元、白习制科，其书后分为四卷，命曰《策林》。其《策头》、《策项》各二道，《策尾》三首，此外曰《美谦逊》、《塞人望》、《教必成》、《不劳而理》、《风化浇朴》、《复雍熙》、《感人心》之类，凡七十五门，言所应对者百不用其一二，备载于文集云。

【译文】 元稹和白居易预习科举。其文集后分为四卷，收录预写的应试文

章，取各为《策林》。其中《策头》、《策项》各两篇，《策尾》三篇。此外，有《美谦逊》、《塞人望》、《教必成》、《不劳而理》、《风化浇朴》、《复雍熙》、《感人心》等等，共七十五类。他们自称所应试到的文题，一百个里面用不到一两个，都收载进了文集。

八种经典

【原文】 开士悟入诸佛知见，以了义度无边，以圆教垂无穷，莫尊于《妙法莲华经》，凡六万九千五百五字。证无生忍，造不二门，住不可思议解脱，莫极于《维摩经》，凡二万七千九十二字。摄四生九类，入无余涅槃，实无得度者，莫先于《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凡五千二百八十七字。坏罪集福，净一切恶道，莫急于《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凡三千二十字。应念顺愿，愿生极乐土，莫疾于《阿弥陀经》，凡一千八百字。用正见，观真相，莫出于《观音普贤菩萨法行经》，凡六千九百九十字。诠自性，认本觉，莫深于《实相法密经》，凡三千一百五字。空法尘，依佛智，莫过于《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凡二百五十八字。是八种经典十二部，合一十一万六千八百五十七字。三乘之要旨，万佛之秘藏尽矣。唐长庆三年，苏州重玄寺法华院石壁所刻金字经，白乐天为作碑文，其叙如此。予窃爱其简明洁亮，故备录之。

【译文】 信佛的人为使自己的思想进入更崇高的境界而使自身进入诸佛的智慧，用“了断”妙义脱离苦海，以“圆融”的深奥的道理教化他人，没有比《妙法莲华经》更为高妙的了，此经共计六万九千五百零五字。证实法界无生无灭，进入无言无说的法门，停留于不必再费思考议论的解脱境界，没有比《维摩经》更谈得精到的了，此经共计两万七千零九十二字。引导宇宙万物进入永远的涅槃，使无法得到度脱者得到度脱，没有比《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更直截的了，此经共计五千二百八十七字。消除罪孽，求得幸福，铲除一切罪恶根源，没有比《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更迅速快捷的了，此经共计三千零二十字。思有所应，愿有所顺，最终到达极乐之地，没有比《阿弥陀经》更简单易行的了，此经共计一千八百字。以诸佛般的智慧，能察万物其真相，没有比《观音普贤菩萨法行经》更高深的了，此经共计六千九百九十字。能解说自我之性、认清自己的精神境界，没有比《实相法密经》更透彻的了，此经共计三千一百零五字。剔除法界的污秽，归依佛祖的智慧，没有能超过《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的了，此经共计二百五十八字。这八种佛门经典计十二部，总共十一万六千八百

五十七个字。各派佛教学说的精华，历代诸佛的奥秘都囊括无遗了。唐穆宗长庆三年（823 年），苏州重玄寺的法华院石壁上刻写了金字佛经，白居易为它写作了一篇碑文，所述如上。我非常喜好它的简洁明了，因而全录在这里以留后世。

卷 九

畏人索报书

【原文】 士大夫得交朋书问，有懒傲不肯即答者。记白乐天《老慵》一绝句曰：“岂是交亲向我疏，老慵自爱闭门居。近来渐喜知闻断，免恼嵇康索报书。”案：嵇康《与山涛绝交书》云：“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俗自勉强，则不能久。”乐天所云正此也。乃知畏于答书，其来久矣。

【译文】 有的士大夫收到朋友的信后，懒散傲慢得不愿意马上回信。白乐天（白居易）有一首《老慵》的绝句写道：“岂是交亲向我疏，老慵自爱闭门居。近来渐喜知闻断，免恼嵇康索报书（哪里是亲朋对我疏远，而是我自己老来慵懒，喜欢闭门独居。近来越来越喜欢消息间断，以免像嵇康那样为别人向自己索取回信而感烦恼）。”今按，嵇康的《与山涛绝交书》写道：“我一向不便于写信，也不喜欢写信，而世间的事务又堆满了案几。如果不写回信应酬回答，则违犯礼教、伤了情义；如果勉强回信，又不能持久。”白乐天所说的正是这样。我这才知道害怕写回信的习惯由来已久了。

不能忘情吟

【原文】 予既书白公钟情蛮、素于前卷，今复见其《不能忘情吟》一篇，尤为之感叹，辄载其文，因以自警。其序云：“乐天既老，又病风。乃录家事，会经费，去长物。妓有樊素者，年二十余，绰绰有歌舞态，善唱《杨柳枝》，人多以曲名名之，由是名闻洛下，籍在经费中，将放之。马有骆者，籍在长物中，将鬻之。马出门，骧首反顾。素闻马嘶，惨然立且拜，婉变有辞，辞毕涕下。予亦愍然不能对，且命反袂，饮之酒，自饮一杯，快吟数十声声成文，文无定句。予非圣达，不能忘情，又不至于不及情者，事来搅情，情动不可，因自哂，题其篇曰《不能忘情吟》。”吟曰：“鬻骆马兮，放杨柳枝。掩翠黛兮，顿金羁。马

不能言兮，长鸣而却顾。杨柳枝再拜长跪而致辞，辞曰：‘素事主十年，凡三千有六百日。巾栉之间，无违无失。今素貌虽陋，未至衰摧。骆力犹壮，又无虺。即骆之力，尚可以代主一步。素之歌，亦可以送主一杯。一旦双去，有去无回。故素将去，其辞也苦，骆将去，其鸣也哀，此人之情也，马之情也，岂主君独无情哉？’予俯而叹，仰而蹙，且曰骆骆尔勿嘶，素素尔勿啼。骆反厩，素反闺。吾疾虽作年虽颓，幸未及项籍之将死，亦何必一日之内弃骓兮而别虞兮！乃目素兮，素兮为我歌《杨柳枝》，我姑酌彼金侯，我与尔归醉乡去来。”观公之文，固以遣情释意耳，素竟去也。此文在一集最后卷，故读之者未必记忆。东坡犹以为柳枝不忍去，因刘梦得“春尽絮飞”之句方知之，于是美朝云之独留，为之作诗，有“不似杨枝别乐天，恰如通德伴伶玄”之语。然不及二年而病亡，为可叹也。

【译文】 我已经在上一卷中记叙白居易钟情于小蛮和樊素，现在又见到他的一篇《不能忘情吟》，更加为之感叹。于是就记载了这篇文章，用来警戒自己。文章的《序》写道：“乐天（白居易）老了以后，又患了风痛病，于是就整饬家事，汇总经费，清除多余物品。有一位名叫樊素的歌妓，还只有二十多岁，风姿绰绰，能歌善舞。因为她善于唱《杨柳枝》这首歌，因此人们就经常管她叫‘杨柳’，她的名声由此遍闻洛阳。她被列在经费项目内，我将遣放她。有一匹骏马列在多余物品中，我将卖了它。马出门时回头相望。樊素听到马的嘶鸣声，悲伤地立起身来，又对我行了个礼，婉转轻柔地说起来，说完就掉下了眼泪。我也悲哀地无言以对。就让樊素掩袖擦干眼泪，并让一起喝酒。我自己喝了一杯，当即吟出几十句诗文。声声成立，文句不定。我不是圣人达节之人，不能忘却这份情义，又不是低下到不牵涉感情的人。世事挑动感情，感情一被挑动就不可自禁。于是自嘲，写了《不能忘情吟》。《吟》中写道：‘卖掉骏马啊，遣放柳枝。擦去粉黛颜色啊，废弃金马嚼。马不能说话啊，拉长了声音嘶着回头望望。’杨柳枝拜了两拜，跪下对我说话。她说道：‘我侍奉您已有十年，共三千六百天。日常生活中并没有犯什么过失。现在我即使容貌丑陋，也不至于衰败。骏马气力还壮，又没有残疾。骏马的气力还可以代您行步，我的歌声还可以为您助酒兴。可如果一旦双双离去，就有去无回。因此我将离开之前语辞哀苦；骏马将离开之前嘶鸣悲哀。这是人的感情、马的感情。难道您就唯独没有感情吗？’我低头感叹，又仰头而笑，说道：‘骏马啊骏马你别嘶鸣，素素啊素素你别啼泣。骏马回马厩去吧，素素你回房间。我即使犯了病、年岁衰老，也幸而没到项籍（项羽）将死的境地，又何必一天之内抛弃乌骓、离别虞姬呢。我于是望着樊素啊，樊素为我唱一曲《杨柳枝》。我且喝那金罍里的酒啊，我与你同往醉乡里去

吧。’”白居易的文章，本来就是借以排遣情怀、抒发情意，而樊素竟然终究离去。这篇文章收录在第一集的最后一卷，所以读过的人也未必能记得清。苏东坡（苏轼）原来还以为柳枝不忍离去，通过刘梦得（刘禹锡）的“春尽絮飞”的诗句才知道柳枝终于还是离别了白居易。于是就赞美朝云独能留住，并为之作诗。诗中有“不似杨枝别乐天，恰如通德伴伶玄（不像杨柳枝那样离别白乐天，而正如通德陪伴伶玄一般）”的句子。但是朝云不到两年就患病去世，非常可叹啊！

擒鬼章祝文

【原文】 东坡在翰林作《擒鬼章奏告永裕陵祝文》云：“大碣获禽，必有指纵之自。丰年多廩，孰知耘耔之劳？昔汉武命将出师，而呼韩来庭，效于甘露；宪宗厉精讲武，而河湟恢复，见于元璽。”其意盖以神宗有平 氏之志，至于大中，乃克有成。故告陵归功，谓武帝、宪宗亦经营于初，而绩效在于二宣之世，其用事精切如此。今苏氏眉山功德寺所刻大小二本，及季真给事在临安所刻，并江州本、麻沙书坊《大全集》，皆只自“耘耔”句下，便接“憬彼西戎，古称右臂”。正是好处，却芟去之，岂不可惜？唯成都石本法贴真迹，独得其全。坡集奏议中登州上殿三札，皆非是。司马季思知泉州，刻温公集，有作中丞日弹王安石章，尤可笑。温公以治平四年解中丞，还翰林，而此章乃熙宁三年者。二集皆出本家子孙，而为妄人所误，季真、季思不能察耳。坡内制有《温公安葬祭文》云：“元丰之末，天步为艰。社稷之卫，中外所属。惟是一老，屏予一人。名高当世，行满天下。措国于太山之安，下令于流水之源。岁月未周，纲纪略定。天若相之，又复夺之。殄瘁之哀，古今所共。知之者神考，用之者圣母。驯致其道，太平可期。长为宗臣，以表后世。往奠其葬，庶知予怀！”而石本颇不同，其词云：“元丰之末，天步惟艰，社稷之卫，存者有几？惟是一老，屏予一人。措国于太山之安，下令于流水之源。岁未及期，纲纪略定。道之将行，非天而谁？天既予之，又复夺之。惟圣与贤，莫如天何！然其所立，天亦不能亡也。知之者神考，用之者圣母。驯致其道，终于太平。永为宗臣，与国无极。于其葬也，告诸其柩。”今莫能考其所以异也。

【译文】 苏轼在担任翰林学士时，写了一篇《擒鬼章奏告永裕陵祝文》的文章，祝文这样写道：“出猎要想有所收获，一定要指挥得当，丰年百谷物丰收，谁会了解农民除苗培土的辛劳！当年汉武帝派大将出征，而单于呼韩邪来到朝

廷，宣帝甘露年中俯首受降；唐宪宗厉精图治，以武强国，而河湟一带才又重新归入大唐的版图，功劳显于大中年间。”文意是说宋神宗萌发平定穠氏的意向，到了元盦年间，果然打了胜仗，因而成就了功业，正如汉武帝和唐宪宗一开始就苦心经营，在汉宣帝和唐宗那两代成就了功绩、收到了效果，他运用典故是如此精心和贴切。现在苏氏在眉山功德寺刻印的大小两种版本，以及给事中季真在临安（今杭州）所刻的版本，另有江州本和麻沙书坊《大全集》，都在“耘耔”（播种耕耘）一句后，紧接“憬彼西戎，古称右臂”（西戎古来被称为中原的得力助手）。正是精彩的地方，却偏偏被删除掉了。岂不可惜！苏东坡文中的三篇登州时所上奏议，也都不对。司马季思任泉州知州，刻印了温公（司马光）的集子。其中有一篇担任御史中丞时写的《弹王安石章》，特别可笑。温公于治平四年（1067年）卸任御史中丞的职务，回到翰林院。但这篇文章却写于熙宁三年（1070年）。苏东坡和温公的两部文集都出自其本家后代，却被无知的人弄乱了，季真和季思都不能明察这点。苏东坡曾为皇帝写有《温公安葬祭文》。文中写道：“元丰末年，国运艰难。国家的护卫，活着的还有几人？只有他这一位元老，来保障我一人。他名扬社会，操行影响天下。使国家立于安宁之地，使政令通畅无阻。不满一年，朝纲政纪基本稳定。如果说天要帮助他，为何又要夺走他？病亡的悲哀，古今所一样。知晓这一点的是先皇，实践这一点的是太后。如果能恭顺地遵守并达到他所建立的大道，那以国家太平指日可待。他毕生为朝廷忠臣，成为后代的表率。我前往参加他的葬礼，借以抒发我的心情！”但石刻却要有很大差别，文辞是：“元丰末年，国运艰难。国家的护卫，活着的还有多少？只有这一位元老，来保障我一人。他使国家立于安宁之地，使政令通畅无阻。不满一年，朝纲政纪基本稳定。大道若要得以实现，不是天还有谁能为之？上天既然把温公赐给人间，又干吗夺走他？即使圣贤之人，对于天意也无可奈何啊！然而他的治理和他的表率作用，是上天夺不走的。真正了解他的是已驾崩的神宗，大胆任用他的是圣明的皇太后。如果按照他的政策治理，最终能出现太平盛世；让他久任宰相之职，对国家的贡献则无人可比。如今在他的葬礼上，我以此文来告慰他的英灵。”如今也没有办法来考察两者为什么相差这么多。

欧公送慧勤诗

【原文】 国朝承平之时，四方之人，以趋京邑为喜。盖士大夫则用功名进

取系心，商要则贪舟车南北之利，后生嬉戏则以纷华盛丽而悦。夷考其实，非南方比也。读欧阳公《送僧慧勤归余杭》之诗可知矣。曰：“超俗僭宫室，倾货事雕墙。佛屋尤其侈，耽耽拟侯王。文彩莹丹漆，四壁金*煌。上悬百宝盖，宴坐以方床。胡为弃不居，栖身客京坊？辛勤营一室，有类燕巢梁。南方精饮食，菌笋比羔羊。饭以玉粒粳，调之甘露浆。一饌费千金，百品罗成行。晨兴未饭僧，日昃不敢尝。乃兹随北客，枯粟充饥肠。东南地秀绝，山水澄清光。余杭几万家，日夕焚清香。烟霏四面起，云雾杂芬芳。岂如车马尘，鬓发染成霜？三者孰苦乐？子奚勤四方！”观此诗中所谓吴越宫室、饮食、山水三者之胜，昔日固如是矣。公又有《山中之乐》三章送之归。勤后识东坡，为作《诗集序》者。

【译文】 大宋朝太平的时节，全国各地的人们都把游京城当作一件非常开心的事，士大夫们想的大都是到这里求取功名利禄，商人们大都是贪图买卖上的利益，后生少年们游玩，也喜欢京城的繁华热闹。考察事实，还并不是南宋才是这样，读到欧阳修的《送僧慧勤归余杭》这首诗就可以清楚了。这首诗说：“超俗僭宫室，倾货事雕墙。佛屋尤其侈，耽耽拟侯王。文彩莹丹漆，四壁金礫煌。上悬百宝盖，宴坐以方床。胡为弃不居，栖身客京坊？辛勤营一室，有类燕巢梁。南方精饮食，菌笋比羔羊。饭以玉粒粳，调之甘露浆。一饌费千金，百品罗成行。晨兴未饭僧，日昃不敢尝。乃兹随北客，枯粟充饥肠。东南地秀绝，山水澄清光。余杭几万家，日夕焚清香。烟霏四面起，云雾杂芬芳。岂如车马尘，鬓发染成霜？三者孰苦乐？子奚勤四方！”由此可以看出，此诗当中所说的吴越之地宫室、饮食和山水三方面的豪华、丰盛、优美，北宋时就已经显现出来了。欧阳修还有《山中之乐》三章诗，也是送慧勤返回余杭的。慧勤后来也结识了苏轼，就是为苏轼的诗集写序言的那个和尚。

委蛇字之变

【原文】 欧公《乐郊诗》云：“有山在其东，有水出逶夷。”近岁丁朝佐《辨正》谓其字参古今之变，必有所据。予因其说而悉索之，此二字凡十二变。一曰委蛇，本于《诗·羔羊》：“退食自公，委蛇委蛇。”毛公注：“行可从迹也。”郑笺：“委曲自得之貌。委，于危反。蛇音移。”《左传》引此句，杜注云：“顺貌。”《庄子》载齐桓公泽中所见，其名亦同。二曰委佗，《诗·君子偕老》：“委委佗佗。”毛注：“委委者，行可委曲从迹也。佗者，德平易也。”三曰逶迤，《韩诗》释上文云：“公正貌。”《说文》：“逶迤，斜去貌。”四曰倭迟，《诗》：

“四牡，周道倭迟。”注：“历远之貌。”五曰透夷，《韩诗》之文也。六曰威夷，潘岳诗：“回溪萦曲阻，峻坂路威夷。”孙绰《天台山赋》：“既克于九折，路威夷而修通。”李善注引《韩诗》“周道威夷”。薛君曰：“威夷，险也。”七曰委移，《离骚经》：“载云旗之委蛇。”一本作“透迤”，一本作“委移。”注：“云旗委移，长也。”八曰透移，刘向《九叹》：“遵江曲之透移。”九曰透蛇，后汉《费凤碑》：“君有透蛇之节。”十曰蛇，张衡《西京赋》：“女、娥半坐而长歌，声清畅而蛇。”李善注：“蛇，声余诘曲也。”十一曰透迤，汉《逢盛碑》：“当随透迤，立号建基。”十二曰威迟，刘梦得诗：“柳动御沟清，威迟堤上行。”韩公《南海庙碑》：“蜿蜒蛇蛇”，亦然也。则欧公正用韩诗，朝佐不暇寻绎之尔。

【译文】 欧阳修的《乐郊诗》有这样一句：“有山在其东，有水出透夷。”近年丁朝佐的《欧集辩正》指出透夷这两个字用了古书中的变体，但欧阳修这样用一定是有他的道理的。根据这种说法，我翻阅古书，细细查检，发现这两个字一共有十二种变异形式。第一种是“委蛇”，本于《诗经·召南·羔羊》：“退食自公，委蛇委蛇。”毛亨注释说：“行走时摇摇摆摆。”郑玄注释说：“弯弯曲曲悠然自得的样子。委，於和危的反切。蛇读作移的音。”《左传》也引用了这一句，杜预注释说：“顺畅的样子。”《庄子》中记载齐桓公在大泽里所见到的动物，名称与此相同。第二种是“委佗”，《诗经·豳风·君子偕老》说：“委委佗佗。”毛亨注释说：“委委，指行为没有大幅度的偏颇摇摆。佗，指道德比较平和简易。”第三种是“透迤”，《韩诗》在解释上述这句话时说：“公正的样子。”《说文》说：“透迤，斜行的样子。”第四种是“倭迟”，《诗经》：“四牡骎骎，周道倭迟。”毛亨注释说：“走得很遥远的样子。”第五种是“透夷”，《韩诗》里的文字。第六种是“威夷”，潘岳的诗：“回溪萦曲阻，峻坂路威夷。”孙绰的《天台山赋》：“既已登上九折，路威夷而长通。”李善注引《韩诗》“周道威夷”来指明出处及其意义。薛综解释说：“威夷，陡峭高险的样子。”第七种是“委移”，《离骚》说：“载云旗之委蛇。”一种版本写作“透迤”，还有一种版本写作“委移”。王逸对此注解：“云旗委移，长长的样子。”第八种是“透移”，刘向的《九叹》说：“沿江边之透移。”第九种是“透蛇”，东汉的《费凤碑》说：“君有透蛇之节。”第十种是礪蛇，张衡的《西京赋》说：“娥皇女英坐而长歌，声音清畅而礪蛇。”李善注释：“礪蛇，指余音宛转曲折。”第十一种是“透迤”，汉代《逢盛碑》说：“当随透迤，立国号而建基业。”第十二种是“威迟”，刘禹锡诗：“柳动御沟清，威迟堤上行。”韩愈的《南海庙碑》：“蜿蜒蛇蛇”，其实也是这个词的一种形式。看来欧阳修用的正是《韩诗》中的词意，丁朝佐没能寻找该词的多种含义而已。

东不可名园

【原文】 今人亭馆园池，多即其方隅以命名。如东园、东亭、西池、南馆、北榭之类，固为简雅，然有当避就处。欧阳公作《真州东园记》，最显。案：《汉书·百官表》：“将作少府，掌治宫室。属官有东园主章。”注云：“章谓大材也。主章掌大材，以供西园大匠。”绍兴三十年，予为省试参详官，主司委出词科题，同院或欲以“东园主章”为箴，予曰：“君但知汉表耳！《霍光传》：‘光之丧，赐东园温明。’服虔曰：‘东园处此器，以镜置其中，以悬尸上。’师古曰：‘东园，署名也，属少府。其署主作此器。’《董贤传》：‘东园秘器以赐贤。’注引《汉旧议》：东园秘器作棺。若是，岂佳处乎？”同院惊谢而退。然则以东名园，是为不可。予有两园，适居东西，故扁西为西园，而以东为东圃，盖避此也。

【译文】 当今人们所修建的亭台楼馆、园林水池，很多都是根据它们的方位来命名，比如东园、东亭、西池、南馆、北榭之类，这样的名称固然明快典雅，可是其中有应当避而不用的字。欧阳修写《真州东园记》就是很明显的。按：《汉书·百官公卿表》说：“将作少府主管修建宫室，他的属官主要有东园主章。”注释说：“章指的是非常高的木材。主章主管搜求大木，供东园大匠选用。”绍兴三十年（1160年）时，我担任省考的参详官，主管委托我们出词科的试题，我的同事中有人想以“东园主章”为题目，我不同意，就反对说：“先生只见到《汉书·百官公卿表》了，《霍光传》记载：‘霍光死后，朝廷赐给他东园所制的葬器。’服虔解释说：‘东园所制作的这种葬器，用一面镜子放在其中，镜子恰好悬在尸体上面。’颜师古说：‘东园，是官署的名称，隶属于少府寺。这个官署负责制作这种葬器。’《董贤传》也有这样的文字：‘将东园的秘器赐给董贤。’注释转引《汉旧议》的说法说：东园秘器，就是棺材。这样的地方是什么好去处吗？”同僚听罢，吃了一惊，连说抱歉就回去了。这样看来，用东字来做为园的名称，是不合适的。我有两个园子，恰好一东一西，因此把西面的园子称做东园，而把东面的园子称做东圃，主要是避开这个意思。

一二三与壹贰叁同

【原文】 古书及汉人用字，如一之与壹，二之与贰，三之与叁，其义皆同。《鸛鵲序》：“刺不壹也。”又云：“用心之不壹也。”而正文“其仪一兮”。《表記》：“节以壹惠。”注：“言声誉虽有众多者；节以其行一大善者为谥耳。”汉《华山碑》：“五载壹巡狩。”《祠孔庙碑》：“恢崇壹变。”《祝睦碑》：“非礼，壹不得犯。”而后碑云：“非礼之常，一不得当。”，则与壹通用也。《孟子》：“市价不贰。”赵岐注云：“无二贾者也。”本文用大贰字，注用小二字，则二与贰通用也。《易·系辞》：“参天两地。”《释文》云：“参，七南反。又如字，音三。”《周礼》：“设其参。”注：“参，谓卿三人。”，是三与参通用也。九之与久、十之与拾、百之与伯亦然。予顷在英州，访邻人利秀才。利新作茅斋，颇净洁，从予乞名。其前有两高松，因为诵《蓝田壁记》，命之曰“二松”。其季请曰：“是使大贰字否？”坐者皆哂。盖其人不知书，信口辄言，以贻讥笑。若以古字论之，亦未为失也。文惠公名流杯亭曰“一咏”，而采借隶法，扁为“壹咏”，读者多以为疑，顾第弗深考耳。

【译文】 古书以及汉代人用字，比如一和壹、二和贰、三和叁，它们之间意义全都相同。《诗经·鸛鵲》的序言说：“刺不壹也。”又说：“用心之不壹也。”而诗的正文“其仪一兮”则用了一字。《礼记·表記》说：“节以壹惠。”注释说：“是说一个人的优点长处虽然很多，只选他品德中最为显著的一点作为他加谥号就可以了。”汉代的《华山碑》写道：“五年壹巡狩。”《祠孔庙碑》写道：“恢宏壹变。”《祝睦碑》写道：“不合礼法者壹不能犯。”而后面一碑文则写道：“如不符合常礼，一事也做不得当。”这样看来，一和壹是通用的。《孟子》说：“市价不贰。”赵岐注解：“没有二价的情形。”经文用的是大写的贰字，注文用的是小写的二字，看来二和贰也是通用的。《周易·系辞》说：“参天两地。”《经典释文》说：“参，读为七南相切。还有一个意义是读作三。”《周礼》说：“设其参。”注释说：“参，指的是三位卿。”那么三和参也是通用的。其他如九和久、十和拾、百和伯也都是通用的。前段时间我在英州（今广东英德市），到邻居利秀才家串门。利秀才刚建了一所茅屋，十分干净整洁，他让我为茅屋取个名字。这所茅屋前面有两颗高大的松树，于是我记起《蓝田壁记》的说法，而后取名叫做“二松”。他的弟弟问我说：“是用那个大写的贰字不是更好的吗？”在坐的其他人都嘲笑他，看来这个人不大读书，开口随便说，所以被别人讥笑。但如

果按古人用字来说的话，他的问话其实也并没有什么错误。我的兄长文惠公洪适的流杯亭取了个名字叫做“一咏”，写扁额时采用隶书，写成“壹咏”，看到此扁的人都觉得这样写未必正确，这只是对古人用字未能详细研究不了解古代人用字“一”与“壹”通用而已。

何恙不已

【原文】 公孙弘为丞相，以病归印，上报曰：“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颜师古注：“恙，忧也。何忧于疾不止也。”《礼部韵略》训恙字，亦曰忧也。初无训病之义。盖既云罹疾矣，不应复云病，师古之说甚为明白。而世俗相承，至问人病为贵恙，谓轻者为微恙，心疾为心恙，风病为风恙，根著已深，无由可改。

【译文】 汉朝公孙弘担任丞相，由于病重请求辞官。皇帝批答说：“爱卿不过是患了点风寒小病，哪里值得担心这病就好不了呢？”颜师古注释说：“恙，担忧的意思。这句话是说哪里值得担心这病就好不了呢。”《礼部韵略》在解释恙字的含义时也说：担忧的意思。看来恙字根本没有病的含义。总之，上面既然已经说过得病，下面当然不应该再重复说病，颜师古的解释十分清楚。而今以讹传讹，凡是问别人的病情都称“贵恙”，把小病叫做“微恙”，心病叫做“心恙”，风病叫做“风恙”。这种用法，由来已久，已经到了无法纠正的地步。

两汉用人人元元字

【原文】 《前汉书》好用人人字，如《文帝纪》“人人自以为得之者以万数”，又曰“人人自安难动摇”。《元帝纪》“人人自以得上意”。《食货志》“人人自爱而重犯法”。《韩信传》“人人自以为得大将”。《曹参传》“齐故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张良传》“人人自坚”。《叔孙通传》“吏人人奉职”。《贾谊传》“人人各如其意所出”。《杨雄传》“人人自以为咎繇”。《鲍宣传》“人人牵引所私”。《韩延寿传》“人人问以谣俗”、“人人有言轻重”。《张骞传》“人人有言轻重”。《李寻传》“人人自贤”。《王莽传》“人人延问”。《严安传》“人人自以为更生”。《王吉传》“人人自制”是也。《后汉书》亦间有之，如《崔 传》“人人有以自优”。《五行志》“人人莫不畏宪”。《吴汉传》“诸将人人多请之”。《申屠刚传》“人人

怀忧”。《王允传》“人人自危”。《荀彧传》“人人自安”。《吕强传》“诸常侍人人求退”是也。又元元二字，考之六经无所见，而两《汉书》多用之。如《前汉·文帝纪》“全天下元元之民”，《武纪》“烛幽隐，劝元元”、“所以化元元”。《宣纪》“不忘元元”，《元纪》“元元失望”、“元元何辜”、“元元大困”、“元元之民，劳于耕耘”、“元元骚动”、“元元安所归命”。《成纪》“元元冤失职者从”。《哀纪》“元元不赡”。《刑法志》“罹元元之不逮”。《严安传》“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严助传》“使元元之民，安生乐业”。《贾捐之传》“保全元元”。《东方朔传》“元元之民，各得其所”。《魏相传》“尉安元元”、“唯陛下留神元元”。《鲍宣传》“为天牧养元元”。《萧育传》“安元元而已”。《匡衡薛宣传》“哀闵元元”。《王嘉传》“忧闵元元”。《谷永传》“以慰元元之心”。《匈奴传》“元元万民”是也。《后汉·光武纪》“下为元元所归”、“贼害元元”、“元元愁恨”、“惠兹元元”。《章纪》“诚欲元元去末归本”、“元元未谕”、“深元元之爱”。《和纪》“爱养元元”、“下济元元”。《顺纪》“元元被害”。《质纪》“元元婴此困毒”。《桓纪》“害及元元”。《邓后纪》、《刘毅传》“垂恩元元”。《王昌传》“元元创痍”。《耿 传》“元元叩心”。《郎攸传》“弘济元元”、“贷赡元元”。《曹褒传》“仁济元元”。《范升传》“元元焉所呼天”、“免元元之急”。《钟离意传》“忧念元元”。《何敞传》“元元怨恨”、“安济元元”。《杨终传》“以济元元”。《虞诩传》“遭元元无妄之灾”。《皇甫规传》“平志毕力，以庆元元”是也。予谓元元者，民也。而上文又言元元之民、元元黎民、元元万民，近于复重矣。故颜注：“或云，元元，善意也。”

【译文】 班固《汉书》喜欢用“人人”二字，比如《文帝纪》说：“人人自认为得到的，要用万来计算。”又说：“人人都使自己安定稳固，难以动摇。”《元帝纪》说：“人人都自认为得到天子的满意”。《食货志》说：“人人自爱，对于违犯法律看得很重。”《韩信传》说：“人人都自认为能受封为大将军。”《曹参传》说：“齐地的老学者有几百名，可人人讲的都不相同。”《张良传》说：“人人都巩固自己。”《叔孙通传》说：“官吏们人人奉公尽职。”《贾谊传》说：“人人都认为他的意见与自己相同。”《扬雄传》说：“人人自比为咎繇”。《鲍宣传》说：“人人都提携自己的党羽。”《韩延寿传》说：“人人都问民俗民谣。”“人人都为他而饮酒。”《张骞传》说：“人人说的都轻重不一。”《李寻传》说：“人人修养自身。”《王莽传》说：“人人询问。”《严安传》说：“人人都自认为得到再生。”《王吉传》说：“人人自我克制。”即是如此。《后汉书》中这种用法也时而可见，如《崔真传》说：“人人都有感到优越的方面。”《五行志》说：“人人都十分畏服窦宪。”《吴汉传》说：“各将军人人都上前请求。”《申屠刚传》说：

“人人心怀忧虑。”《王允传》说：“人人都感到自身难保。”《荀彧传》说：“人人都感到安定。”《吕强传》说：“常待们人人都请求离去。”也属于此类。

还有元元两个字，六经之中并没有出现，而《汉书》、《后汉书》却用的很普遍，比如《汉书·文帝纪》说：“全天下元元之民”，《武帝纪》“烛幽隐，劝元元”、“所以化元元”。《宣帝纪》“不忘元元”，《元帝纪》“元元失望”、“元元何辜”、“元元大困”、“元元之民，劳于耕耘”、“元元骚动”、“元元安所归命”。《成帝纪》“元元冤失职者从”。《哀帝纪》“元元不贍”。《刑法志》“罹元元之不逮”。《严安传》“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严助传》“使元元之民，安生乐业”。《贾捐之传》“保全元元”。《东方朔传》“元元之民，各得其所”。《魏相传》“尉安元元”、“唯陛下留神元元”。《鲍宣传》“为天牧养元元”。《萧育传》“安元元而已”。《匡衡薛宣传》“哀闵元元”。《王嘉传》“忧闵元元”。《谷永传》“以慰元元之心”。《匈奴传》“元元万民”是也。《后汉·光武帝纪》“下为元元所归”、“贼害元元”、“元元愁恨”、“惠兹元元”。《章帝纪》“诚欲元元去末归本”、“元元未谕”、“深元元之爱”。《和帝纪》“爱养元元”、“下济元元”。《顺帝纪》“元元被害”。《质帝纪》“元元婴此困毒”。《桓帝纪》“害及元元”。《邓后纪》、《刘毅传》“垂恩元元”。《王昌传》“元元创痍”。《耿晔传》“元元叩心”。《郎 传》“弘济元元”、“贷贍元元”。《曹褒传》“仁济元元”。《范升传》“元元焉所呼天”、“免元元之急”。《钟离意传》“忧念元元”。《何敞传》“元元怨恨”、“安济元元”。《杨终传》“以济元元”。《虞诩传》“遭元元无妄之灾”。《皇甫规传》“平志毕力，以庆元元”也属此类。我认为“元元”指的是人民，但上面所引用的一些句子说“元元之民”，“元元黎民”、“元元万民”，这就显得过于重复了，因此颜师古注释说：“另有一种意义，元元，善良的意思。”

韩公潮州表

【原文】 韩文公《谏迎佛骨表》，其词切直，至云：“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监临，臣不怨悔。”坐此贬潮州刺史。而谢表云：“臣于当时之文，未有过人者，至论陛下功德，与《诗》、《书》相表里，作为歌诗，荐之郊庙，虽使古人复生，臣亦未肯多逊。而负罪婴衅，自拘海岛，怀痛穷天，死不闭目，伏惟天地父母，哀而怜之。”考韩所言，其意乃望召还。宪宗虽有武功，亦未至编之《诗》、《书》而无愧。至于“纪泰山之封，镂白玉之牒，东巡奏功，明示得意”等语，摧挫献佞，大与谏表不侔，当时李汉辈编定文集，惜不能为之除去。东

坡自黄州量移汝州，上表云：“伏读训词，有‘人材实难，不忍终弃’之语，臣昔在常州，有田粗给淖粥，欲望许令常州居住。辄叙徐州守河及获妖贼事，庶因功过相除，得从所便。”读者谓与韩公相类，是不然。二表均为归命君上，然其情则不同。坡自列往事，皆其实迹，而所乞不过见地耳，且略无一佞词，真为可服。

【译文】 韩愈《谏迎佛骨表》措辞恳切直率，直至说到“日后凡是国家再出现祸殃灾变，都情愿加在下臣一人身上，上天可证，下臣无怨无悔”。也正因为这封谏表，被贬为潮州（今湖南长沙）刺史。他在潮州作的《谢上表》中说：“下臣当时所作的谏表，也没有比别人更出格的言语，至于论到陛下的功德，用《诗经》、《尚书》相比拟，当时写的诗，置于神圣的郊坛神庙之前，即使是让古人复活，下臣也不肯承认逊色。而如今身负重罪，自己使自己困在海岛之中，内心的苦痛可谓齐天，死在这里也不能瞑目。但愿天地父母，惜我怜我。”细心考察韩愈这些话的意思，是希望朝廷能召他还京。唐宪宗虽说有以武捍边的功绩，也远不至于编在《诗经》、《尚书》中却毫无愧色吧！至于“功劳可在封泰山时刻石铭记，可在白玉的牋牒上镂刻铭记，东封时奏明此功，向天地表明成就”等话，都是一些献媚吹捧之辞，与《谏迎佛骨表》全然不同，可惜李汉等人编定《韩公文集》时，没有把这篇谢表删掉。苏轼从黄州（今湖北黄石市）转移到汝州（今河南临汝市）后，写的《谢上表》说：“谨读朝廷的训示，其中有‘人材难得，不忍毁掉’的句子，下臣过去在常州任职时，有几亩田地可以供我养家糊口，今请求陛下允许下臣居住在常州待罪。并念下臣任徐州知州时守护河决以及捕获妖贼的成绩。或者可以功过相抵，允许下臣的请求。”读到这两篇文章的人都说这篇谢表和韩愈的谢表相差不多，其实不然。这两篇谢表都是向君王请求赦命，但是感情大不相同。苏轼所述的往事，句句为实，况且所希望的不过是改派到另一个地方，全表没有使用一个谄媚的词，实在令人佩服。

燕赏逢知己

【原文】 白乐天为河南尹日，有《答舒员外》云：“员外游香山寺，数日不归，兼辱尺书，大夸胜事，时正值坐衙虑囚之际，走笔题长句以赠之，曰：‘黄菊繁时好客到，碧云合处佳人来。（注：谓遣英、倩二妓与舒君同游也。）酡颜一笑夭桃绽，清冷秋声寒玉哀。轩骑逶迤棹容与，留连三日不能回。白头老尹府中坐，早衙才退暮衙催。’”谢希深、欧阳公官洛阳，同游嵩山归，暮抵龙

门香山，雪作，留守钱文僖公遣吏以厨传歌妓至，且劳之曰：“山行良劳，当少留龙门赏雪，府事简，无遽归也。”王定国访东坡公于彭城，一日，棹小舟与颜长道携盼、英、卿三子游泗水，南下百步洪，吹笛饮酒，乘月而来。坡时以事不得往，夜著羽衣，伫立黄楼上，相视而笑，以为李太白死，世间无此乐三百余年矣。定国既去，逾月，复与参寥师泛舟洪下，追忆曩游，作诗曰：“轻舟弄水买一笑，醉中荡桨肩相摩。归来笛声满山谷，明月正照金叵罗。”味此三游之胜，今之燕宾者宁复有之？盖亦值知己也。

【译文】 白居易（白居易）任河南尹的时候，有一首《答舒员外》写道：“员外去香山寺游玩，好几天没回来，又给我写来一信，极言夸说赏心悦目的事。当时我正好值班，考虑刑事方面的事。就临时抛开公事，写了一首七言诗回赠给他。诗写道‘黄菊繁时好客到，碧云合处佳人来（原注：这两句说让英、卿两个妓女陪舒君同游）。酡颜一笑天桃绽，清冷秋声寒玉哀。轩骑逶迤棹容与，流连三日不能回。白头老尹府中坐，早衙才退暮衙催（金黄菊花盛开时节，佳客来到；蓝天白云交接处，美人到来。醉颜一笑，如桃花般绽红；清冷秋歌，似敲击寒玉般悲哀。车马犹豫啊船桨停滞，流连三天不能回返。白发的老尹坐在府中，早班衙吏刚走，晚班衙吏又紧催着而来）。’”谢希深（谢绛）和欧阳公（欧阳修）在洛阳做官时，一同游玩嵩山，回来途经龙门香山时，已是晚上，又下起了雪。洛阳留守官钱文僖（钱惟演）派下属带着厨师和歌妓到龙门去，并慰劳说：“在山上游玩确实很辛苦，可以暂留龙门观赏雪景。官府里没什么事，不必匆忙赶回来。”王定国（王觉）到彭城拜访苏东坡。一天，王定国偕同颜长道（颜复）领着盼、英和卿三位女子划着小船到泗水游玩，并往南到了百步洪，边吹笛子边喝酒，趁着月色而回。苏东坡当时因为有事，不能同往，就在夜间身穿羽衣，站在彭城东门楼上与他们相对而笑。大家觉得自李太白（李白）去世后，人间三百年没有这样的快乐了。王定国离去后，过了一个月，又与参寥师一起泛舟百步洪下。追忆昔日游玩情景，写诗一首道：“轻舟弄水买一笑，醉中荡桨肩相摩。归来笛声满山谷，明月正照金叵罗（轻舟荡水博一笑，醉时摇桨肩相摩。归途笛声满山谷，明月正照金酒杯）。”细细品味这三种游玩的乐处，现在的游客哪里还能再有？大概也是碰上了知己的缘故吧。

端午贴子词

【原文】 唐世五月五日扬州于江心铸镜以进，故国朝翰苑撰端午贴子词，

多用其事，然遗词命意，工拙不同。王禹玉云：“紫阁竚隐晓霞，瑶墀九御荐菖华。何时又进江心鉴，试与君王却众邪。”李邦直云：“艾叶成人后，榴花结子初。江心新得镜，龙瑞护仙居。”赵彦若云：“扬子江中方铸镜，未央宫里更飞符。菱花欲共朱灵合，驱尽神奸又得无？”又“扬子江中百炼金，宝奁疑是月华沉。争如圣后无私鉴，明照人间万善心。”又“江心百炼青铜镜，架上双绉翠缕衣。”李士美云：“何须百炼鉴，自胜五兵符。”傅墨卿云：“百炼鉴从江上铸，五时花向帐前施。”许冲元云：“江中今日成龙鉴，苑外多年废鹭陂。合照乾坤共作镜，放生河海尽为池。”苏子由云：“扬子江中写镜龙，波如细曛不摇风。宫中惊捧秋天月，长照人间助至公。”大概如此。唯东坡不然，曰：“讲余交翟转回廊，始觉深宫夏日长。扬子江心空百炼，只将《无逸》监兴亡。”其辉光气焰，可畏而仰也。若白乐天《讽谏百炼镜》篇云：“江心波上舟中铸，五月五日日午时。”“背有九五飞天龙，人人呼为天子镜。”又云：“太宗常以人为镜，监古监今不监容。”“乃知天子别有镜，不是扬州百炼铜。”用意正与坡合。予亦尝有一联云：“愿储医国三年艾，不博江心百炼铜。”然去之远矣。端午故事，莫如楚人竞渡之的，盖以其非吉祥，不可施诸祝颂，故必用镜事云。

【译文】 唐代五月五日，扬州（今属江苏）要向朝廷进献在长江江心铸造的铜镜，所以本朝翰林院撰写端午贴子时，往往用这件事做题材，但其遣词用意，水平和深度各不相同。王禹玉说：“紫阁穰穰隐晓霞，瑶墀九御荐菖华。何时又进江心鉴，试与君王却众邪。”李清臣说：“艾叶成人后，榴花结子初。江心新得镜，龙瑞护仙居。”赵彦若说：“扬子江中方铸镜，未央宫里更飞符。菱花欲共朱灵合，驱尽神奸又得无？”又说：“扬子江中百炼金，宝奁疑是月华沉。争如圣后无私鉴，明照人间万善心。”还有一首说：“江心百炼青铜镜，架上双绉翠缕衣。”李邦彦说：“何须百炼鉴，自胜五兵符。”傅墨卿说：“百炼鉴从江上铸，五时花向帐中施。”许冲元说：“江中今日成龙鉴，苑外多年废鹭陂。合照乾坤共作镜，放生河海尽为池。”苏辙说：“扬子江中写镜龙，波如细曛不摇风，宫中惊捧秋天月，长照人间助至公。”总体水平大致如上。只有苏轼与他们大不相同。苏轼说：“讲余交翟转回廊，始觉深宫夏日长。扬子江心空百炼，只将《无逸》监兴亡。”这首诗气势磅礴，光芒四射，真令人敬畏崇仰。像白居易的《讽谏百炼镜》诗说：“江心波上舟中铸，五月五日日午时。”“背有九五飞天龙，人人呼为天子镜。”还说：“太宗常以人为镜，监古监今不监容。”“乃知天子别有镜，不是扬州百炼铜。”其用意正和苏轼相同。我也曾写过一联说：“愿储医国三年艾，不博江心百炼铜。”但是与以前白居易、苏轼相比水平相去甚远。端午节的旧俗，没有比楚地百姓划龙船竞渡更为明快的了，也许是因为它起因于屈原投江自尽不太吉利，不能写进祝文颂词中去，所以都用江心镜的典故了。

卷 十

哀公问社

【原文】 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子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古人立社，但各因其土地所宜木为之，初非求异而取义于彼也。哀公本不必致问，既闻用栗之言，遂起“使民战栗”之语。其意谓古者弗用命戮于社，所以威民，然其实则非也。孔子责宰我不能因事献可替否，既非成事，尚为可说，又非遂事，尚为可谏，且非既往，何咎之云？或谓“使民战栗”一句，亦出于宰我，记之者欲与前言有别，故加“曰”字以起之，亦是一说。然战栗之对，使出于我，则导君于猛，显为非宜。出于哀公，则便即时正救，以杜其始。两者皆失之，无所逃于圣人之责也。哀公欲以越伐鲁而去三家，不完成，卒为所逐，以至失邦，其源盖在于此。何休注《公羊传》云：“松，犹容也，想见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犹迫也，亲而不远，主地正之意也。栗犹战栗，谨敬貌，主天正之意也。”然则战栗之说，亦有所本。《公羊》云：“虞主用桑，练主用栗。”则三代所奉社，其亦为松、柏、栗为神之主乎？非植此木也。程伊川之说有之。

【译文】 鲁哀公向宰我询问，作社主用什么木，宰我回答说：“夏代用松木，商代用柏木，周代用栗木。”哀公又问：“要使百姓战栗吗？”孔子听到了这些话，责备说：“已经做过的事就不用再解释了，已经完成的事就不便再直言规劝了，已经过去的事就不必再追究了。”古时候，人们祭土地之神而要为它做一个木主，只是各自根据当地祭祀土地神时常见的树木来制作，最初并不是有意区别并对木材的名称有所寓意的。鲁哀公没有必要提出这个问题。听说“用栗木”这样的说法，于是联想到“使百姓战栗”这层意思。他的意思是说古时候虽然没有严格规定，但在社中还是有所象征的，这象征用来镇慑百姓，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孔子指责宰我不能根据具体事情讲清楚可以怎样做或还可以怎样做，如果是还没有做的事，还可以再解释；还没有完成的事，还可以再劝谏，又不是已经过去的事，还有什么可追究的呢？还有人说“使民战栗”这一句也出自宰我之口，写书的人想让这句话和前边几句有所区别以示强调，所以

又加一个“曰”字来提示，这也可以作为一种说法，然而“使百姓战栗”这句话，如果是出于宰我之口，那么就是引导国君趋向严苛，显然是不恰当的。如果是出于哀公之口，那还可以马上劝谏他，以此来杜绝他趋向严酷。总之，这两种说法都是不正确的，所以没法逃避圣人的责备。鲁哀公想借越人的力量攻打鲁国的仲孙、叔孙、季孙氏三大家族，没能成功，反而亡了国，它的根源恐怕就在于对下过于严酷了。何休在注释《春秋公羊传》时说：“松，好比说容貌，想到了他的容貌并侍奉他，说的是人君之道。柏，好比说迫近，亲近而并不遥远，说的是地神之道。栗，好比说战栗，谨慎恭敬的样子，说的是天神之道。”由此来看，所谓“使百姓战栗”的说法也是有所依据的。《公羊传》说：“国君死丧，做木主要用桑木；祭奠国君，做木主要用栗木。”夏商周三代所供奉的社主，可能真的用松木、柏木、栗木做为神灵的木主吧？这里说的并不是在社周围种的树木。程颐先生有过这样的说法。

绝句诗不贯穿

【原文】 “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种花。棋罢不知人换世，酒阑无奈客思家。”此欧阳公绝妙之语。然以四句各一事，似不相贯穿，故名之曰《梦中作》。永嘉士人薛韶喜论诗，尝立一说云：“杜老近体律诗，精深受帖，虽多至百韵，亦首尾相应，如常山之蛇，无间断齟齬处。而绝句乃或不然，五言如‘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急雨捎溪足，斜晖转树腰。隔巢黄鸟并，翻藻白鱼跳。’‘江动月移石，溪虚云傍花。鸟栖知故道，帆过宿谁家。’‘凿井交棕叶，开渠断竹根。扁舟轻舫缆，小径曲通村。’‘日出篱东水，云生舍北泥。竹高鸣翡翠，沙僻舞蜚鸡。’‘钓艇收缙尽，昏鸦接翅稀。月生初学扇，云细不成衣。’‘舍下笋穿壁，庭中藤刺檐。地晴丝冉冉，江白草纤纤。’七言如‘糝径杨花铺白毡，点溪荷叶叠青钱。笋根稚子无人见，沙上鳬雏傍母眠。’‘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之类是也。”予因其说，以唐人万绝句考之，但有司空图《杂题》云：“驿步堤萦阁，军城鼓振桥。鸥和湖雁下，雪隔岭梅飘。”“舴艋猿偷上，蜻蜓燕竞飞。樵香烧桂子，苔湿挂莎衣。”

【译文】 “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种花。棋罢不知人换世，酒阑无奈客思家。”这是欧阳修的一首绝妙小诗。此诗四句，每句各说一件事，好像不相连贯，所以取个诗题叫做《梦中作》。温州士子薛韶喜好评论诗歌，曾创立一

家说法说：“杜甫的近体律诗，意义深远，用词熨贴，即使得多达一百韵，也能前后呼应，就像是常山巨蛇，中间绝没有间断梗阻的地方。而绝句就不一定如此了，五言绝句像‘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急雨捎溪足，斜晖转树腰。隔巢黄鸟并，翻藻白鱼跳。’‘江动月移石，溪虚云傍花。鸟栖知故道，帆过宿谁家。’‘凿井交棕叶，开渠断竹根。扁舟轻棹缆，小径曲通村。’‘日出篱东水，云生舍北泥。竹高鸣翡翠，沙僻舞麴鸡。’‘钓艇收缙尽，昏鸦接翅稀。月生初学扇，云细不成衣。’‘舍下笋穿壁，庭中藤刺檐。地晴丝冉冉，江白草纤纤。’七言绝句像‘糝径杨花铺白毡，点溪荷叶叠青钱。笋根稚子无人见，沙上鳬雏傍母眠。’‘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等等，亦都是如此。”我根据他的说法，考察了唐人万余首绝句，从中找出司空图《杂题》两首：“驿步堤萦阁，军城鼓振桥。鸥和湖雁下，雪隔岭梅飘。”“舴艋猿偷上，蜻蜓燕竞飞。樵香烧桂子，苔湿挂莎衣。”。

农父田翁诗

【原文】 张碧《农父》诗云：“运锄耕斫侵晨起，陇畔丰盈满家喜。到头禾黍属他人，不知何处抛妻子！”杜荀鹤《田翁》诗云：“白发星星筋骨衰，种田犹自伴孙儿。官苗若不平平纳，任是半年也受饥！”读之使人怆然。以今观之，何啻倍蓰也！

【译文】 张碧的《农父》诗说：“运锄耕斫侵晨起，陇畔丰盈满家喜。到头禾黍属他人，不知何处抛妻子！”杜荀鹤的《田翁》诗说：“白发星星筋骨衰，种田犹自伴孙儿。官苗若不平平纳，任是半年也受饥！”读这样的诗，令人悲伤不已。对照今日之情状，其惨状何止比唐代更甚几倍！

卫宣公二子

【原文】 卫宣公二子之事，《诗》与《左传》所书，始末甚详。《乘舟》之诗，为昫、寿而作也。《左传》云：“宣公 于庶母夷姜，生昫子。为之娶于齐而美，公取之，生寿及朔。宣姜与公子朔谗昫子。宣姜者，宣公所纳昫之妻，翻譖其过。公使诸齐，使盗待诸莘，将杀之。寿子告之，使行，不可。寿子载其

旌以先，盗杀之，遂兄弟并命。”案：定理公以鲁隐四年十二月立，至桓十二年十一月卒，凡十有九年。姑以即位之始，便成乱，而盱子即以次年生，势须十五岁然后娶。既娶而夺之，又生寿、朔，朔已能同母谱兄，寿又能代为使者以越境，非十岁以下儿所能办也。然则十九年之间，如何消破？此最为难晓也。

【译文】 关于卫宣公两个儿子的事，《诗经》与《左传》非常清楚地记载了它的开始至结尾全过程。《二子乘舟》这首诗，就是为寿而写的。《左传》载：“卫宣公与他父亲的妾发生淫乱关系，生下了儿子。卫宣公为从齐国娶来了美女做妻子，又自己把她娶了，生下了寿和朔。宣姜与公子朔诋毁。宣姜就是卫宣公为娶的妻子。她跟随卫宣公以后，反过来又诋毁的过错。卫宣公就派出使到齐国去，并派刺客等在莘地，待经过时就要杀他。寿把这事告诉，让他出走，不同意。寿就乘坐的旌车先行出发，刺客将寿杀了。兄弟二人终于全都因此断送了性命。”今按，卫宣公于鲁隐公四年（前719年）十二月立位，到鲁桓公十二年（前700年）十一月去世，共十九年。暂且假定他一即位的开始就发生淫乱，并且就出生于第二年，那么也势必十五岁才能娶妻，娶了以后又夺走他妻子，又生下了寿和朔，朔又已经会与母亲一齐诋毁他的兄长，寿又能够代充任使者越过国境，不到十岁的小孩是做不到的。那么十九年时间，怎样解释？这一点，最难以理解。

谓端为匹

【原文】 今人谓缣帛一匹为壹端，或总言端匹。案《左传》“币锦二两”注云：“二丈为一端，二端为一两，所谓匹也，二两，二匹也。”然则以端为匹非矣。《湘山野录》载夏英公镇襄阳，遇大礼赦恩，赐致仕官束帛，以绢十匹与胡旦，旦笑曰：“奉还五匹，请检《韩诗外传》及诸儒韩康伯等所解‘束帛葐葐’之义，自可见证。”英公检之，果见三代束帛、束纆之制。若束帛则卷其帛为二端，五匹遂见十端，正合此说也。然《周易正义》及王弼注、《韩诗外传》皆无其语。文莹多妄诞，不足取信。按《春秋公羊传》“乘马束帛”注云：“束帛谓玄三葐二，玄三法天，葐二法地。”若文莹以此为证，犹之可也。

【译文】 现在人们把一匹丝帛叫作一端，或者合称为一端匹。按杜预《左传》“币锦二两”句时说：“两丈叫做一端，两端为一两，就是通常所说的匹。二两，指两匹。”这样看来，把一端叫做一匹，显然不正确。释文莹在《湘山野录》记载英公夏辣镇守襄阳，遇到朝廷大礼加恩，赐给已经致仕的官吏们束帛，

把十匹丝绢赐给胡旦，胡旦笑着说：“我退还五匹。请你查检一下《韩诗外传》这本书以及儒士韩康伯等人对‘束帛襜褕’这句话的解释，就自会明白了。”夏竦查检了这些资料，果然明白了三代时束帛、束褕的制度。像束帛，是把丝帛卷起来便有两端，五匹就有十端，正和上面说的相合。然而今传孔颖达的《周易正义》和王弼的注解，与《韩诗外传》都没有见到这种记载，文莹这个人讲的话十分随便，不足为信。何休在注释《春秋公羊传》“乘马束帛”这句话时说：“束帛指的是黑三黄二，黑色三象征天，黄色二象征地。”如果释文莹用这句话来证明束帛为五匹，那还是很有说服力的。

唐人草堂诗句

【原文】 予于东圃作草堂，欲采唐人诗句书之壁而未暇也，姑录之于此。杜公云：“西郊向草堂”、“昔我去草堂”、“草堂少花今欲载”、“草堂西无树林”。白公有《别草堂》三绝句，又云：“身出草堂心不出。”刘梦得《伤愚溪》云：“草堂无主燕飞回。”元微之《和裴校书》云：“清江见底草堂在。”钱起有《暮春归故山草堂》诗，又云：“暗归草堂静，半入桃源去。”朱庆余：“称著朱衣入草堂。”李涉：“草堂曾与雪为邻。”顾况：“不作草堂招远客。”郎士元：“草堂竹径在何处？”张籍：“草堂雪夜携琴宿。”又云：“西峰月犹在，遥忆草堂前。”武元衡：“多君能寂寞，共作草堂游。”陆龟蒙：“草堂祇待新秋景。”又云：“草堂尽日留僧坐。”司空图：“草堂旧隐犹招我。”韦庄：“今来空讶草堂新。”子兰：“策杖吟诗上草堂。”皎然有《题湖上草堂》云：“山居不买剡中山，湖上千峰处处闲。芳草白云留我住，世人何事得相关？”

【译文】 我在东圃建造了一间草堂，本想采集唐人有关草堂的诗句写在墙壁上，但还没有来得及，暂且集录之于此。杜甫说：“西郊向草堂。”“昔我去草堂。”“草堂少花今欲载。”“草堂西无树林。”白居易有《别草堂》绝句三首，还有诗说：“身出草堂心不出。”刘禹锡的《伤愚溪》诗中说：“草堂无主燕飞回。”元稹的《和裴校书》诗中说：“清江见底草堂在。”钱起有《暮春归故山草堂》诗，又有诗说：“暗归草堂静，半入桃源去。”朱庆余的诗中有：“称著朱衣入草堂。”李涉的诗中有：“草堂曾与雪为邻。”顾况诗中有：“不作草堂招远客。”郎士元的诗中有：“草堂竹径在何处？”张籍的诗中有：“草堂雪夜携琴宿。”又说：“西峰月犹在，遥忆草堂前。”武元衡的诗中有：“多君能寂寞，共作草堂游。”陆龟蒙的诗中有：“草堂待新秋景”。还说：“草堂尽日留僧坐。”司空图的诗中有：

“草堂旧隐犹招我。”韦庄的诗中有：“今来空讶草堂新。”子兰的诗中有：“策杖吟诗上草堂。”皎然有一首《题湖上草堂》诗说：“山居不买剡中山，湖上千峰处处闲。芳草白云留我住，世人何事得相关？”

公谷解经书日

【原文】 孔子作《春秋》，以一字为褒贬，大抵志在尊王，至于纪年叙事，只因旧史。杜预见《汲冢周书·魏国史记》，谓“其著书文意大似《春秋经》，推此足以见古者国史策书之常也。”所谓书日不书日，在轻重事体本无所系，而《公羊》、《谷梁》二传，每事断之以日，故窒而不通。《左氏》惟有公子益师卒，“公不与小敛，故不书日”一说，其他亦鲜。今表二传之语，以示儿曹。《公羊》云：“益师卒，此何以日？远也。”“葬者不及时而日，渴葬也。不及时而不日，慢葬也。过时而日，隐之也。过时而不日，谓之不能葬也。当时而不日，正也。当时而日，危不得葬也。”“庚寅，入邲。其日何？难也。”“取邑不日。”“桓之盟不日，信之也。”“甲寅，齐人伐卫。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壬申，公朝于王所。其日何？录乎内也。”“辛巳，晋败秦于阡。诈战不日，此何以不日？尽也。”“甲戌，败狄于囿。其日何？大之也。”“子卒。此何以不日？隐之也。”“即位不日。”《谷梁》最多：“卑者之盟，不日。”“大夫日卒，正也。”“诸侯日卒，正也。”“日入，恶入者也。”“外盟不日。”“取邑不日。”“大阅崇武，故谨而日之。”“前定之盟，不日。”“公败其师。不日，疑战也。”“公败宋师。其日，成败之也。”“齐人灭遂。其不日，微国也。”“公会齐侯，盟于柯，桓盟虽内与，不日，信也。”“滕陈人之妇。其不日，数渝，恶之也。”“癸亥，葬纪叔姬，不日卒，而日葬，闵纪之亡也。”“子卒日，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见则日。”“戊辰，盟于葵丘。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辛卯，沙鹿崩。其日，重变也。”“戊申，陨石于宋。是月，六鹢退飞。石无知，故日之。鹢微有知之物，故月之。”“乙亥，齐侯小白卒。此不正，其日之，何也？”“壬申，公朝于王所。其日，以其再致天子，故谨而日之。日系于月，月系于时。其不月，失其所系也。”“丁未，商臣弑其君髡。日髡之卒，所以谨商臣之弑也。”“乙巳，及晋处父盟。不言公，讳也。何以知其再与公盟？以其日也。”“甲戌，取须句。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再取，故谨而日之也。”“辛丑，葬襄王。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辞也。”“乙卯，晋、楚战于 。日，其事败也。”“癸卯，晋灭潞。灭国有三术：中国谨日，卑国月，夷狄不日。其日，潞子贤也。”“甲戌，楚

子卒。夷狄卒而不日。日，少进也。”“癸酉，战于鞍。其日，或曰日其战也，或曰日其悉也。”“梁山崩。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鼯鼠食郊牛角。不言日，急辞也。”“庚申，莒溃。恶之，故谨而日之也。”“秋，公至自会。不日，至自伐郑也。”“丙戌，郑伯卒于操。其日，未逾境也。”“乙亥，臧孙纆出奔邾。其日，正纆之出也。”“蔡世子弑其君。其不日，子夺父政，是谓夷之。”“冬十月，葬蔡景公。不日卒而月葬，不葬者也。”“四月，楚公子比弑其君。弑君者日。不日，比不弑也。”“甲戌，同盟于平丘。其日，善是盟也。”“内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决者，不以日决也。定之即位，何以日也？著之也。”他释时月者亦然。通经之士，可以默喻矣。沙鹿、梁山为两说，尤不然。苏子由《春秋论》云：“《公羊》、《谷梁》之传，日月土地，皆所以为训。夫日月之不知，土地之不详，何足以为喜怒？”其意盖亦如此。

【译文】 孔子写《春秋》，往往用一个字进行褒贬，这主要体现了他的尊王思想。至于纪年和叙事，则是根据旧的史书记载。晋代杜预见到《汲冢周书·魏国史记》，说：“《汲冢周书》写作的文意褒贬和《春秋》十分相似，根据这部书，可以推测古时候各国史书撰写规律。”史家经常说的写出日期或不写出日期，这与事件的重要不重要、正确不正确本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但是《公羊传》和《谷梁传》二书，对于事件的记述使用写日期不写日期来定其善恶轻重，因此往往使文意不明确。《左氏传》里只有在记公子益师死时说，“鲁隐公不为他穿上葬服，因此不写具体日期”，其他也就很少见了。现将《公羊传》和《谷梁传》中此类例句抄出，用来提示子孙们。《公羊传》说：“公子益师死了，为什么不写日期呢？年代久远，孔子没有见到。”“送葬不记月份只写日期，是表示急于下葬。不记月份也不写日期，表示不能以礼下葬。不能按时下葬而记下日期，表示为此痛惜。不能按时下葬又不记下日期，是说不能尽快地下葬。写明了月份而不写日期，是确已下葬。写明月份又写明了日期，是表示还有危急，没有来得及下葬。”“庚寅这天，我军攻入邴。这里为什么要写日期呢？因为此战艰难，到这天才攻入。”“攻取城邑不写日期。”“桓公会盟诸侯一般不写日期，这里写了日期，表示诸侯相信这次会盟没有危险。”“甲寅这天，齐国攻打卫国。攻打他国不应该写日期，这里为什么写日期呢？这里是表示到达卫国的日期。”“壬申这天，鲁僖公到京师朝见周天子。这里为什么要写明日期？不写日期，怕为诸侯所憎恶。”“辛巳这天，晋国在盂地击败了秦国。不明胜败的战争不应写明日期，这里为什么要写明日期呢？是说秦军被彻底击败。”“甲戌这天，在地击败了狄人。为什么要写明日期呢？是要强调这一战的重要。”“子赤死了，为什么不写明日期呢？是因为遇弑不忍明言而隐去不书。”“国君即位不写明日期。”

而《谷梁传》里这种用法尤其多，比如：“与弱小者会盟不写明日期。”“写明大夫某日死，是准确的。”“写明诸侯国君某日死，是准确的。”“写明某日进入，是憎恶进入者。”“在外的会盟不应写明日期。”“攻取城邑不应写明日期。”“大规模的阅兵表示崇尚武功，因此特地写明日期。”“以前订立的盟约，不写日期。”“庄公击败了齐军。这里不写明日期，是表示不拘具体日期的奇袭。”“庄公击败了宋军。这里写明了日期，是表示列兵大战，不以奇袭取胜。”“齐军灭了遂国，这里没有写日期，是因为遂是个小国。”“庄公会见齐桓公，在柯地订立了盟约。虽然是与信义远著的齐桓公订盟，也不写明日期，是表示深信的意思。”“公子与陈国的陪嫁女子会面。这里不写明日期，是因为陈国多次背盟，表示憎恶的意思。”“癸亥这天，为纪叔的姬妾下葬，这里不写明死于哪天，葬于哪天，表示哀悯纪叔有丧。”“子野死，写明日期是应该的。子赤死，不写明日期，是因为事情发生得太早了。见到了才能写明日期。”“戊辰这天，庄公和桓公在葵丘订立了盟约。齐桓公的订盟不应该写明日期，这里为什么写明了呢？是表示赞美的意思。”“辛卯这天，沙山山脚发生了崩塌。这里写明日期，表示对这次变异的重视。”“戊申这天，有巨石陨落在宋国。这个月中，一群鸟倒着飞。石头是没有知觉的，这必是天意，因此写出了日子。鸟是稍有些知觉的动物，所以记下了月份。”“乙亥这天，齐国国君小白死了。这里并不该写具体日期，但还是记下了日期，为什么呢？”“壬申这天，鲁公到天子朝中朝见。这里记下了日期，是因为第二次朝见天子，所以谨慎地记下了日期。日是编排在月份上的，月份是根据天时历法来的。这里没有记下月份，是失去了依托。”“丁未这天，商臣杀死了他的君主髡。把髡的死日记了下来，是用来特意说明商臣弑君的。”“乙巳这天，鲁文公和晋国大夫阳处父订立盟约。不言明鲁文公，是避开不说。怎么知道是与鲁文公订立盟约呢？就因为这里记明了日期。”“甲戌这天，攻取了须句。按常规攻取城邑是不应该写明日期的，这里却记下了日期，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作者不认为再次攻取他人的城邑是应该的，所以特地记下了这个日期。”“辛丑这天，为襄王下葬。这里记下了日子，显得过分，这恐怕是暗示实际上并不下葬。”“乙卯这天，晋国、楚国两军在盂开战，这里记下了日期，是特意指出晋国失败了。”“癸卯这天，晋国消灭了潞国。消灭一个国家有三种不同的表示：中等的国家要专意写明日期，小国只写明月份，如果是夷狄之邦，就不再写日期了。这里写出了具体日期，是因为潞国国君是位贤君。”“甲戌，楚子吕死了。夷狄之国国君死去是不应写明日期的，这里写明了日期，这比以前是进了一步。”“癸酉这天，齐、晋两军在鞍地大战。这里写明了日期，可能是明确指出战争的具体时间，也可能是特地暗示鲁国大夫也参加了战斗。”“梁山

崩，不写明日期，这是为什么呢？高山自有它崩塌的规律。”“小麋鼠咬噬郊祀用的牛角，这里没有写明日期，是表示行文急切。”“庚申这天，莒军大败。作者对它充满恶感，所以特意把日期记下来。”“秋天，昭公从会盟处回来。不写明日期，是说从攻打郑国的前线回来。”“丙戌，郑伯死在操，这里写明了日期，因为郑伯没有死在国外。”“乙亥这天，臧孙纥逃到邾国，这里写明了日期，是准确记载臧孙纥出逃的日期。”“蔡国太子杀死了国君，这里不写明日期，是因为儿子夺取父亲的王位，这与夷狄之行一样。”“十月，蔡景公出葬，不写他哪天死而写明哪月里下葬，这并不是真的下葬。”“四月，楚国公子比杀了国君，按照记事的常理，杀其国君应该写明日期，这里没有写明日期，说明国君不是公子比杀的。”“甲戌这天，各诸侯在平丘订立了和约。这里写明了日期，是作者赞成这样的盟约。”“朝廷中的大事都应该写明日期。国君即王位，这是国君的大事，这里不写明日期，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史官看来，即位是按年来记的，而不是按日来记的。定公即位为什么写明日期呢？这是要特意地强调他的即位。”其他一些解释时间、月份的也都是这样。熟读经书的人们可以根据这样一些原则去理解古书了。沙鹿、梁山采取了两种不同的说法，显得尤其不合情理。苏辙在《春秋论》中说：“《公羊传》、《谷梁传》中，对于日期、月份、地点的记载，都附会了一些字义之外的解释。如果连日、月份和地点都不知道，又怎么能用来表示喜怒哀乐呢？”他的意见大概也是这样。

柳应辰押字

【原文】 予顷因见鄂州南楼土中磨崖碑，其一刻“柳”字，下一字不可识，后访得其人名应辰，而云是唐末五代时湖北人也，既载之《四笔》中，今始究其实，柳之名是已。盖以国朝宝元元年吕溱榜登甲科，今浯溪石上有大押字，题云：“押字起于心，心之所记，人不能知。大宋熙宁七年甲寅岁刻，尚书都官员外郎武陵柳应辰，时为永州通判。”仍有诗云：“浯溪石在大江边，心记闲将此地镌。自有后来人屈指，四千六百甲寅年。”有阍中陈思者跋云：“右柳都官欲以怪取名，所至留押字盈丈，莫知其何为。押字，古人书名之草者，施于文记间，以自别识耳。今应辰镌刻广博如许，已怪矣。好事者从而为之说，谓能祛逐不祥，真大可笑。”予得此贴，乃恨前疑之非。石傍又有蒋世基《述梦记》云：“至和三年八月，知永州职方员外郎柳拱辰受代归阙，祁阳县令齐术送行至白水，梦一儒衣冠者曰：‘我元结也。今柳公游浯溪，无诗而去，子盍求之。’觉而心

异之，遂献一诗。柳依韵而和，其语不工。”拱辰以天圣八年王拱辰榜登科，殆应辰兄也，辄并记之。

【译文】 我曾经在鄂州见到一块南楼土中磨崖碑。一面刻有一个“柳”字，后面一个字无法辨认。后来查考到这人名叫应辰，是唐朝末年和五代时候的湖北人。我已经在《容斋四笔》中记载了他，现在才考究出那个“应辰”就是这个柳姓的名字。他大约于本朝宝元元年（1038年）在吕溱门下考中第一名。现在的浯溪石上仍有他的大大的草书签名刻字。题词写道：“草书签名出于内心。心能记住的，人们却不能得知。大宋熙宁七年（甲寅岁）（1074年）刻。尚书都官员外郎武陵人柳应辰，这时担任永州通判之职。”并题诗道：“浯溪石在大江边，心记闲将此地镌。自有后人来屈指，四千六百甲寅年。”（大江边有浯溪石，闲来用心刻些字。后代自然有人来推算，黄帝纪年四千六百甲寅年。）阆中地方有个名叫陈思的人为之写跋道：“以上是柳都官想要靠怪异来博得名声，他所到之处，都要留下大得上丈的草书签名，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押字是古人的草书签名，用于文章记录之中，以替自己设立区别于别人的标识。现在柳应辰在石头上镌刻了这么大、这么多的草书签名，够怪异的。喜欢多事的人又替这件事作解说，说是能够祛除灾祸，真是太可笑了。”我得到这些石刻的摹帖以后，才为前文不正确的怀疑感到遗憾。石头边还有蒋世基的一篇《述梦记》写道：“至和三年（1056年）八月，官员外郎、永州柳拱辰回归乡里，祁阳县令齐术送他到白水时，梦见一位空穿着儒生衣服、载着儒生帽子的人对他说：‘我是元结，现在柳公在浯溪游玩，怎以能下留下诗文就离开呢？你何不求他写一首呢？’齐术醒来，感到奇怪，就向柳拱辰献上一首诗。柳拱辰按照齐术的诗韵和了一首，语句不甚精巧。”柳拱辰于天圣八年（1030年）在王拱辰为状元的那一科考中。他大概就是柳应辰的兄长。因此就一并在记载。

唐尧无后

【原文】 尧、舜之子，不肖等耳。舜之后虽不有天下，而传至于陈及田齐，几二千载。惟尧之后，当舜在位时即绝，故禹之戒舜曰：“毋若丹朱傲，用殄厥世。”又作戒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原丹朱之恶，固在所绝。方舜、禹之世，顾不能别访贤胄为之立继乎？《左传》载子产之辞曰：“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谓唐人之季，非周武王子封于晋者）。成王灭唐而封太叔。”又蔡墨曰：“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

累氏，曰御龙。”范宣子曰：“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御龙氏。”然则封国虽绝，尚有子孙。武王灭商，封帝尧之后于蓟，而未尝一见于简策。史赵言楚之灭陈曰：“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数，未也。”臧文仲闻蓼与六二国亡，曰：“皋陶庭坚不祀，忽诸！”尧之盛德，岂出舜、皋之下，而爵邑不能及孙，何也？

【译文】 尧、舜的儿子，都不修仁德、不求进取。舜的后代虽然没有享有天下，但传到了陈和齐田氏，将近两千年绵延不绝。而尧的后代，还在舜在位的时候便无继承人，固此舜告诫禹说：“千万不能像丹朱那样狂暴，他因此而覆灭了封国！”又作了一篇诫词说：“那尧帝啊，曾拥有冀地，如今后代不修道德，扰乱纲纪，终遭灭亡。”考查一下丹朱的罪恶，也确实应当让他灭国，舜、禹统治天下的时候，难道就选不出贤人的后代替他传宗立国吗？《左传》中记载有子产的话说：“唐国人居住在那里，臣服于夏商。唐国的末代君主叫做唐叔虞。（指的是唐国的末代国君，不是周武王之子被封在晋的那个人）。周成王消灭了唐国，而封唐叔虞为唐侯。”蔡墨说：“陶唐氏衰落之后，又有刘累氏，称为御龙。”范宣子说：“穰的远祖，舜帝以前为陶唐氏，夏代为御龙氏。”这样看来，尧的后代虽然失去了封国，还是有子孙的。周武王灭了商朝，把尧的后代封在蓟地，但是这种说法不见于历史记载。史官赵氏在说到楚国灭陈国时说：“有盛德的人必将得到百世的祭祀，唐叔虞才刚刚几世，还没有绝祀。”臧文仲听到蓼和六两个国家灭亡的消息，感叹说：“皋陶、庭坚就没有后代祭祀了！”尧的盛德难道在舜、皋陶之下吗？但尧却不能把封国和爵位传给自己的后代，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斯须之敬

【原文】 今公私宴会，称与主人对席者曰席面。古者谓之宾、谓之客是已。《仪礼·燕礼》篇：“射人请宾，公曰：‘命某为宾。’宾少进，礼辞。又命之，宾许诺。”《左传》季氏饮大夫酒，臧纥为客。宋公兼享晋、楚之大夫，赵孟为客。杜预云：“客，一坐所尊也。”乾道二年十一月，薛季益以权工部侍郎受命使金国，侍从共钱之于吏部尚书厅，陈应求主席，自六部长贰之外，两省官皆预，凡会者十二人。薛在部位最下，应求揖之为客，辞不就，曰：“常时固自有次第，奈何今日不然？”诸公言：“此席正为侍郎设，何辞之为？”薛终不可。予时为右史，最居末坐。给事中王日严予告曰：“景卢能仓卒间应对，愿出一转语折衷之。”予笑谓薛曰：“孟子不云乎？‘庸敬在兄，斯须之敬在乡人。’侍郎姑处斯须之敬

可也。明日以往，不妨复如常时。”薛无以时，诸公皆称善，遂就席。

【译文】 现在的公家或私人宴会，把与主人对面而坐的人称为“席面”。这也就是古代的所谓“宾”和“客”。《仪礼·燕礼篇》记载：“射人请示指定宾客。国君说：‘命令某人为宾。’宾不一会儿就进来，有礼貌地推辞。国君又一次命令，宾这才答应。”《左传》记载季氏宴请大臣们喝酒，臧纥作为客。宋国国君同时宴请晋国和楚国的大臣们喝酒，赵孟作为客。杜预注道：“客，就是满座中最值得尊敬的人。”乾道二年（1166年）十一月，薛季益（薛良朋）以代理工部侍郎的身份受命出使金国，他的部属为他在吏部尚书大厅举行饯别宴会。陈应求担任主持人。除了六部的尚书和侍郎长外，尚书省和中书省的官员都参加了，共到会十二人。在与会的人中薛季益的官位和级别最低，陈应求要请他当主宾。薛季益推辞不肯答应，说：“平时一向就有等级、次序，为什么今天却不那样。”大家说：“这个座席就是为侍郎您准备和安排的，何必推辞呢？”薛季益却说什么也不答应。我当时任右史大夫，坐在最后的位子上。给事中王日严注视我道：“景庐你能应付忽然出现意料之外事情的场面，请你说一说婉转的话来劝解。”我就笑着对薛季益说：“孟子不是说过这样的话吗：‘平时对兄长尊敬，偶尔也不妨对无知的施行片刻的尊敬。侍郎您不妨暂时接受片刻的尊敬。从明天以后，不妨再恢复平时的次序。’”薛季益无话可对，各位官员都说说得好，薛季益终于进入宾客的席位。

丙午丁未

【原文】 丙午、丁未之岁，中国遇此辄有变故，非祸生于内，则夷狄外侮。三代远矣，姑摭汉以来言之。高祖以丙午崩，权归吕氏，几覆刘宗。武帝元光元年为丁未，长星见，蚩尤旗亘天。其春，戾太子生，始命将出征匈奴，自是之后，师行三十年，屠夷死灭，不可胜数，及于巫蛊之祸，太子子父皆败。昭帝元平元年丁未，帝崩，昌邑立而复废，一岁再易主。成帝永始二年、三年为丙午、丁未，王氏方盛，封莽为新都侯，立赵飞燕为皇后，由是国统三绝，汉业遂颓，虽光武建武之时，海内无事，然勾引南匈奴，稔成刘渊乱华之衅，正是岁也。殇帝、安帝之立，值此二年，东汉政乱，实基于此。桓帝终于永康丁未，孝灵继之，汉室灭矣。魏文帝以黄初丙午终，明帝嗣位，司马氏夺国，兆于此时。晋武太康六年、七年，惠帝正在东宫，五胡毒乱，此其源也。东晋迄隋，南北分裂，九县飏回，在所不论。唐太宗贞观之季，武氏已在后宫，中宗

神龙、景龙，其事可见。代宗大历元、二，大盗初平，而置其余孽于河北，强藩悍镇，卒已亡唐。宝历丙午，敬宗遇弑。大和丁未，是为文宗甘露之悲，至于不可救药。僖宗光启之际，天下固已大乱，而中官劫幸兴元，襄王澄僭立。石晋开运，遗祸至今。皇朝景德，方脱契丹之扰，而明年祥符，神仙宫观之役崇炽，海内虚耗。治平丁未，王安石入朝，乱宗社。靖康丙午，都城受围，逮于丁未，汴失守矣。淳熙丁未，高宗上仙。总而言之，大抵丁未之灾，又惨于丙午，昭昭天象，见于运行，非人力之所能为也。

【译文】 丙午年和丁未年，中国碰到这两个年头就会发生灾变，不是祸乱出于国内，就是受到异族侵略。夏商周三代年代太久远，不说了，就摘录汉朝以来的事变来说。汉高祖死于丙午年，大权被吕后一族掌握，几乎使刘家天下毁于一旦。汉武帝元光元年（134年）是丁未年，这一年里彗星出现，贼星蚩尤旗横亘天空，这年春天，戾太子出生；武帝派大将西击匈奴，从此之后，一连征战三十年，匈奴死伤不计其数，直到发生巫蛊之祸，戾太子父子都毁于此祸。汉昭帝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是丁未年，昭帝驾崩，昌邑王刚刚登基就被废除了，一年之中两次更换天子。汉成帝永始二年（公元前15年）、三年（公元前14年）是丙午、丁未年，王氏家族正强盛，王莽被封为新都侯，赵飞燕被立为皇后，国家纪纲从此崩坏，汉朝基业从此动摇。汉光武帝建武年间，四海平安，然而后来勾引南匈奴，终于酿成了刘渊扰乱中原的惨祸，其根源也在这一年。汉殇帝、安帝，正在丙午和丁未二年，东汉朝政荒乱，实是从这时开始的。汉桓帝死在永康元年（167年）丁未，汉灵帝即位，终至汉王朝最后灭亡。魏文帝于黄初七年（226年）丙午驾崩，明帝即位，后来司马氏篡夺政权，祸根也生于此时。晋武帝太康六年（285年）、七年（286年），惠帝还为太子，其后五胡乱华，祸根也在此时。东晋到隋，南北长期分裂，天下动乱，更不必说。唐太宗贞观末年，武氏已经入了后宫，到中宗神龙、景龙年间，她的祸乱才告结束。代宗大历元年（766年）、二年（767年），叛乱刚刚平息，却将安史余孽安置在河北，形成强大的藩镇，最终使唐朝覆亡。宝历二年（826年）丙午，敬宗遭到杀害。文宗大和元年（827年）丁未，埋下了甘露之变的祸根，乃至一发不可收拾。僖宗光启二年（886年）、三年（887年），又是丙午年和丁未年，天下已经大乱，而宦官又把僖宗劫到兴元府，襄王李 篡位登基。后晋石重贵开运三年（946年）丙午之耻，这一大祸一直影响到如今。国朝景德年间，刚刚摆脱了契丹的威胁，第二年即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又大兴土木，修建神仙宫观，以至国库空虚，国力贫弱。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丁未，王安石入朝为宰相，搞乱了国家法度。靖康元年（1126年）丙午，京城开封府受到金人围困，到次年

丁未，京城陷落。淳熙十四年（1186 年）丁未，高宗去世。总之，丁未年的灾难，又往往比丙午年更为惨烈。天象高悬，造成人间祸福交替，这不是人的力量能够改变的。

祖宗命相

【原文】 祖宗进用宰相，惟意所属，初不以内外高卑为主。若召故相，则率置诸见当国者之上。太平兴国中，薛文惠公居正薨，卢多逊、沈伦在相位，而赵韩王普以太子太保散秩而拜昭文。咸平四年，李文靖公沆为集贤，而召故相吕文穆公蒙正为昭文。景德元年，文靖薨，王文正公旦、文穆公钦若为参政，不次补，而毕文简公士安由侍读学士、寇忠愍公准由三司使，并命为史馆集贤，毕公虽历参政，不及一月。至和二年，陈恭公执中罢，刘沆在位，而外召文、富二公，文公复为昭文，富为集贤，而沆迁史馆。熙宁三年，韩献肃公绛、王荆公安石同拜，韩在上而先罢，荆公越四年亦罢。韩复为馆相，明年荆公再入，遂拜昭文，居韩之上。元暨元年，召文潞公于洛，司马公自门下侍郎拜左仆射，固辞，乞令文彦博以太师兼侍中行左仆射，而已为右以佐之。宣仁不许，曰：“彦博岂可居卿上？”欲命兼侍中行右仆射，会台谏有言，彦博不可居三省长官，于是但平章军国重事。崇宁以后，蔡京凡四人，辄为首台。此非可论典故也。隆兴元年冬，汤岐公思退为右仆射，张魏公浚为枢密使。孝宗欲命张为左，请于德寿，高宗曰：“汤思退元是左相，张浚元是右相，只仍其旧可也。”于是出命。

【译文】 先代皇帝选拔宰相时，只考虑到用人意向，而完全不以内或外、位高或位低为标准。如果是召用旧宰相，就直接把他放在主持朝政的人前面的位置上。太平和兴国年间，文惠公薛居正去世，当时卢多逊和沈伦为宰相，而王韩赵普则从太子太保的散官的位上被任命为昭文公。咸平四年（1001 年），文靖公李沆为集贤大夫，却又召回旧宰相文穆公吕蒙正为昭文公。景德元年（1004 年），文靖公去世，文正公王旦和文穆公王钦若被任命为左、右参政，辅助宰相，不按次序任命，而文简公毕士安则由侍读学士、忠愍公寇准则由三司使一同被任命为史馆集贤大夫。毕士安尽管曾任参政，但不到一个月时间。至和二年（1055 年），恭公陈执中被罢免，当时刘沆在相位上，却又从外地召回文公和富公。文公重又担任昭文，富公则被任命为集贤大夫，刘沆则被调往史馆。熙宁三年（1070 年），献肃公韩绛、荆公王安石一起被任命为宰相。韩绛处于上位，先被罢免；荆公王安石过了四年也被罢免。韩绛重新担任宰相的第二年，荆公

又重新主持朝政，被任命为昭文公，位在韩绛之上。元祐元年（1086 年），从洛阳召回文潞公，司马公由门下侍郎被任命为左仆射。司马公坚决推辞，要求让文彦博由太师兼侍中担任左仆射。宣仁不同意道：“文彦博怎么能处在你之上呢？”就要任命文彦博由太师兼侍中担任右仆射。正赶上三公谏阻，说文彦博不能担任三省的长官，于是就只让他平章军事和国家大事。崇宁年间以后，蔡京等四人竟然当了首相。这是没有先例的。隆兴元年（1163 年）冬季，岐公汤思退担任右仆射，魏公张浚担任枢密使。宋孝宗想任命张浚为左仆射，就向太上皇宋高宗请示。宋高宗说：“汤思退本来就是左相，张浚本来就是右相，只须按照旧时官职任命就行了。”于是就按照宋高宗所说的意见发布任命。